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
MEDIA ECOLOGY SERIES

Media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著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52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美) 爱森斯坦著;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
ISBN 978-7-301-16862-2

Ⅰ. ①作…　Ⅱ. ①爱… ②何…　Ⅲ. 印刷史-研究-世界　Ⅳ. ①TS8-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0973 号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1st edition, ISBN 0521299558 by Elizabeth L. Eisenstei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书　　名: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著作责任者:〔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著　何道宽　译
责 任 编 辑:徐少燕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6862-2/G·292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47.25 印张　884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自20世纪中期传播学大发展以来，世界各地的传播学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新媒介、新媒体、新传播形式迅猛发展、快速更新的推动之下，传播学大有发展成为显学的势头。

长期以来，国内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是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所谓经验学派是以实证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效果研究为焦点、服务体制为导向的美国主流学派。所谓批判学派则以德国法兰克福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批评以及欧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

新千年以来，各国传播学界拓宽视野，开始瞩目以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代表的第三学派。

20世纪末，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为媒介环境学派，组建了媒介环境学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分梳，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对国内学界和读者并不陌生，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除麦克卢汉之外，哈罗德·伊尼斯、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詹姆斯·凯利等人的代表作都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研究他们的文章也日渐丰富。

然而毋庸讳言，国内学界对这个学派的阵容、思想和成就的了解还不深刻，把以上代表人物放进媒介环境学派的视野中研究十分

必要。

把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的鼓吹者是莫大的误读，把 media ecology 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我们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理由是：(1)从这个学派使用 ecology 的意义来看，ecology 是亚里士多德原本使用的“家居环境”，并不能和今天的“生态”画等号；(2)media ecology 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使人注意媒介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媒介环境学”的定名使人重视该学派人文主义(humanism)的关怀，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潮；(3)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关注的焦点是媒体之间的生态、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界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和北美的 media ecology 不是一回事。

媒介环境学的显著特点是：(1)具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关注技术、环境、媒介、知识、传播、文明的演进，跨度大；(2)主张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媒介论，关注重点是媒介而不是狭隘的媒体；(3)重视媒介长效而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4)怀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

媒介环境学从 20 世纪初开始孕育，走过了三代人的历程。

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等。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阿尔弗雷德·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沃尔特·翁(Walter Ong)、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和唐纳德·F. 特沃尔(Donald F. Theall)。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约书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等。

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思想和中华文明的和谐思想颇为吻合。它关注的首先是宏观的媒介环境，而不是眼前的那一点点媒体的运行规律，它有助于我们拓宽历史、哲学和人文研究的视阈。

何道宽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 年 6 月

内容提要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是一部历史巨著，它研究15世纪中叶兴起于欧洲的机器印刷，但它不囿于研究印刷技术本身，而是专注这场印刷革命对欧洲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启蒙思想和工业革命的影响。它有别于其他印刷史的著作，这是一部富有创新意义的“革命”之作。

全书共三个部分，计八章，外加“结束语”和“最后的话”。第一部分讲西欧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尝试勾勒这一次传播革命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讲印刷术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第三部分讲印刷术对近代科学的影响，并论述这次传播革命和其他社会发展的关系。

这又是一部传播学巨著，它集中研究机器印刷催生的传播革命。传播学分为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技术学派，技术学派又称为媒介环境学派。媒介环境学专注的焦点之一是媒介这种人造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人类社会、人的心理的长效影响。它认为，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五次伟大的媒介革命即传播革命，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五座高峰。媒介环境学认为，《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是该学派的重大成果之一，其作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这是一部论战之作，其论战锋芒指向文艺复兴研究权威雅各布·布尔克哈特、艺术史权威欧文·潘诺夫斯基、科学史之父乔治·萨尔顿、科学史权威托马斯·库恩、数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以及印刷史的权威鲁道夫·希尔施、吕西安·费弗尔、马丹和S. H. 斯坦贝格。

自出版以来，不仅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的专家争相研究并批评这一巨著，而且其他学科比如传播学也在争夺这一丰硕的资源。这是一部严谨、冷峻、细密的考据之书，其挑战足以使许多领域的学者深受启发、跃跃欲试。

一 珠穆朗玛峰

译稿完毕，思绪泉涌、感慨万千。然纵有千言万语，却难以厘清思路，不知从何下笔。既然难以诉诸理性的文字，那就首先诉诸感性的直白，借以破题吧。

用市井俗语说，这本书很“牛”！用新潮的网络语言说，它很“雷”人。半年多来，这部近 70 余万言的巨著把我“雷”倒了。

在三十来年的著述和翻译生涯中，如果说笔者曾经渡过了急流险滩，翻越了崇山峻岭，那么，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历史》却胜过蜀道，犹如珠穆朗玛峰，难如登天了。

在我四十余部的学术译著中，比较难的崇山峻岭有：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保罗·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和《思想无羁》、约翰·D. 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特里·N. 克拉克的《新政治文化》、林文刚的《媒介环境学》、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模仿律》、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和《伊拉斯谟传》以及《中世纪的秋天》、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它们都是难以对付的思想挑战、知识挑战和语文挑战。

然而，以上译事虽艰辛，却罕有令我畏惧者，唯独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这本书令我胆战心惊、难以安眠。

这本书之难之“牛”之“雷”人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的写作花了整整 15 年(1964－1979)！如果从搜集资料的 1962 年算起，那就是 17 年！爱森斯坦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开

创了印刷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使之成为诸多学科羡慕和争夺的资源。这本书耗去了她一生多半的精力，耗去了她30年学术生涯(1859—1988)的一半光阴。她专长法国革命史和19世纪法国史，生平著述不多，但这部论印刷传播革命的专著足以使她名垂青史。

其次，这部卷帙浩繁的书共790余页，正文约70万字，但由于她注释不厌其多、不厌其繁、不厌其详，全书共计2046条注释，字数多达十余万！在这数以千计的注释中，相当一部分注释很长，数十条注释各数百字，个别注释宛若文献综述，甚至像小文章。在有些页面上，小字号的注释文字远远超过正文。她钻研之深，钩稽之细，令人叹服！亦令人生畏！为了不令人生厌，译者不敢过多注解，但为了帮助读者，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有节制地提供了200余条注解，计两三万字。如此，正文和原注加上译者注和译者序跋就将近80万字了。

爱森斯坦的治学风格极其严谨，注重考据，颇像清代的乾嘉学派，亦像20世纪的王国维、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国学大师。

再次，全书文献共2000余种，涉及拉丁文、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等，几乎把欧洲人论印刷术的著作一网打尽。译者跟着她历尽磨难，深感艰辛。

再其次，全书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数以百计，涵盖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印刷术等领域，古典学者、中世纪研究专家、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启蒙思想家进入其研究视野，技术史家、科学史家、文艺复兴史家、中世纪史家成为其论战对象，仅论及的学者与印刷商兼于一身的人物就有数十人。遗憾的是，这些人物几乎全无注释，而且，书末的索引只列出了少数人物，大多数重要人物都不见于其中，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作者对他们了如指掌，或许是由于欧美的读者对他们也相当熟悉吧。但这苦了中国读者，译者不得不弥补这一缺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部四面出击、八方辩驳的力作。作者思想犀利、论证严谨、证据确凿、分析细密。译者序言准备专辟一节，描绘其论战色彩。

二 什么书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是一部什么书？这个问题既好回答，又难以准确回答。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书，而且是论印刷术的专著，其基本性质一目了然。但如果细察，其性质就难以限定在狭小的范围了。自出版以来，不仅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术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的专家争相研究、批评，而且其他学科也在争夺这一丰硕的资源。本书译者把它作为媒介环境学的经典介绍给华文

读者，有什么根据呢？

媒介环境学是传播学的三大学派之一，其专注焦点之一是媒介这种人造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人类社会、人的心理的长效影响。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媒介史及其五大分期：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网络文化。这五种媒介引起人类历史上的五大传播革命。爱森斯坦这本书研究印刷术掀起的传播革命，她被认为是媒介理论家，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的这套媒介环境学译丛把它作为主打选题之一，也就理所当然。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这本书不集中研究印刷技术本身，也不囿于印刷史本身，而是将其作为欧洲近代史的重要动因之一，认为印刷史掀起的传播革命对近现代的欧洲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有别于其他印刷史的著作，这是一部富有创新意义的“革命”之作。

三 三级主题

本序拟将该书主题分为三级介绍，以阐明其丰富的思想。一级主题是：印刷术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过渡期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由此引发的传播革命对欧洲近现代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欧洲史里的中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研究、近现代史研究、宗教改革研究、近代科学研究都必须以机器印刷为主要参照系，舍此会造成时代错乱。二级主题有：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与印刷术的关系。本书分章节逐一论述这些主题，逐一剖析机器印刷对这些运动的影响。三级主题是揭示近现代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种种误区，分别与各领域的专家展开论战。

15 世纪 50 年代初，德意志的美因兹地区掀起的机器印刷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史家称之为书籍革命、媒介革命、印刷革命、传播革命，爱森斯坦从人类历史的纵横视野出发，将其定名为“传播革命”。彼时，德国金匠约翰·谷登堡完成了机器印刷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用活字印刷《圣经》和古籍。他印制的《42 行圣经》就是历史上的第一部机印本《圣经》。自此，印刷术形成燎原之势，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机器印刷就传遍了德意志，每个州都有了重要的出版中心。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内，机器印刷就传遍了欧洲。北欧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校正了拉丁文《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使《圣经》得到“净化”；马丁·路德出版德语《圣经》，发布《九十五条论纲》，投下了震撼基督教世界的炸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出版《圣经》新译本和矫正本的目的，是服务教会、敬奉上帝，结果却适得其反：由此掀起的宗教改革撕裂了教会，不仅摧毁了教廷的权威、动摇了天主教，而且撕裂了抗议教廷的新教，使之宗派林立。这场传播革命的风暴迅速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其威力史无前例。在谷登堡发明之后的50年里，机印书比手抄书的成本降低了几百倍，印刷工的效率比手抄工的效率提高了上千倍，欧洲出版的机印书多达八百万册。从1517年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到1520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路德的30本书就印行了30余万册。伊拉斯谟著作的发行量又大大超过了路德的著作。稍后，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也传遍欧洲。

传统的印刷术研究嵌入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研究，沦为重要性稍次的历史事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贡献是：机器印刷必须被分离出来单独研究，且被当作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她说："但思想史家和文化史家始终未能在自己的断代史图表里为印刷术找到一席之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似乎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这个急遽变革本身看似矛盾的性质。我们不要把印刷术的出现和其他革新纠缠在一起，也不要把它当作另外一种发展的例子；我们必须要把印刷术的出现当作一个事件单独挑选出来研究，它自成一体，用传统的历史变革分类来研究印刷术是不恰当的。"（第167—168页，引语页码为原书页码，下同）

人文主义始于13、14世纪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穿越印刷术发明，其下限虽然模糊，但直达启蒙运动兴起的18世纪初倒是普遍的共识。15世纪中叶兴起的印刷术对人文主义产生影响。仅以"北欧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为例，如果没有印刷术，他能够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出版那么多著作，能够影响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吗？能够成为"唯一的权威"、"思想之王"、"世界之光"、"世界明灯"、"时代启蒙者"、"时代的大脑、心脏和良心"、"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铺路人"、"现代精神的先驱"吗？

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10月31日路德发布的《九十五条论纲》。我们可以说，没有印刷术就没有宗教改革。有何依据呢？首先是路德本人对印刷术的讴歌：印刷术是"至上的神恩，推进了福音传教事业"。同时他又看到其可怕的威力，说印刷术是"世界毁灭前的最后一把火"（第304页）。如果没有印刷术，教皇如何印制"赎罪券"？路德如何印制《九十五条论纲》？路德的德语版《圣经》如何进入千家万户？不同版本的《圣经》何以能够损害教廷和教会的权威？又何以产生不同的抗议宗？又何以使新教分裂为路德教、加尔文教、胡格诺教、清教、罗拉德教、循道宗、浸礼宗、安立甘宗、公理宗？

近代科学始于哥白尼的"新天文学"、维萨里的"新解剖学"、培根的实验科学、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马兰·梅森的"新哲学"。如果没有印刷术大量印行他们的著作，如果没有印刷术冲破教廷的《禁书目录》，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科学思想能够传播吗？相反，百科全书式的全才达·芬奇的大量著作，由于他深藏不露、束之高阁、不予刊布，致使他的许多天才成果被淹没了几百年。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第三级主题是与近现代忽略印刷术的各家学者展开论

战，详见下文。

四 各章提要

先说书名。为了批驳不实的批评，作者破题时就明确宣示，她不主张技术决定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其中的'an agent'表明印刷机是西欧变革的动因之一，我没有说印刷机是特定的变革动因(the agent)，更没有说印刷机是唯一的变革动因(the only agent)。"(第 xv 页)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共三部分、计八章，外加"结束语"和"最后的话"。第一部分讲西欧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尝试勾勒这一次传播革命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论述这次传播革命和其他社会发展的关系。第一部分"初说难以准确界定的变革"共两章："尚未被公认的革命"和"对初始的转变进行界定；印刷文化的部分特征"。

第一章叹息世人尚未认识并承认印刷革命，痛心疾首地呼吁研究这一革命，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她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受到麦克卢汉的启示。

有关印刷术的研究真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成果仅囿于印刷术本身的研究。最著名的几部巨著比如鲁道夫·希尔施的《印刷、销售与阅读》、吕西安·费弗尔和马丹的《书籍的出现》、S. H. 斯坦贝格的《印刷术五百年》对印刷术启动的传播革命都三缄其口，未置一词；印刷术在欧洲普及以后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也很少有人问津，直到 1962 年石破天惊的《谷登堡星汉》。这一巨著出自圈外人之手，作者是英语语言文学专家、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他研究印刷人的诞生，宣告线性展开、条块分割的历史研究已经过时，主张将研究重点放在印刷术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上。

第二章分八节讲述"印刷文化的部分特征"，分别是：从早期机印书到成熟机印书的演变，印刷术的标准化效应，资料的检索、整理、编订和分类，对错讹抄本的矫正，印刷术的保存功能和积累功能，印刷术对社会语言分割的强化作用和持久影响，从聆听型公众到阅读型公众的转化，机印书贸易对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促成作用。

第二部分讲印刷术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题为"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重新定向：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再评价"，分两章，各讲本书的三大主题之一。

第三章题为"古典复兴的重新定向：文艺复兴的两个阶段"，该章有四节，其最重要的创新是将文艺复兴分为印刷术前和印刷术后两个阶段。

第四章题为"《圣经》传统的重构：为宗教改革重新布置舞台"，其最重要创新是

率先阐明印刷术与宗教改革的因果关系，大量新版《圣经》尤其通俗语《圣经》的印行使基督教会分裂，印刷术产生以后50年就爆发了路德的反叛。如果说宗教改革是“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蛋”，那么，他们下的“蛋”和孵的“蛋”就是机印书传播的思想，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是机器印刷。

该章的亮点还有：研究新教伦理与新兴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首先要突出印刷术的影响，借以和麦克斯·韦伯论战；北欧新教与印刷术的结盟使之成为启蒙思想的温床；使基督教不断分裂的直接动因和导火索是各种新异的机印版《圣经》以及教廷历次刊布的《禁书目录》；新教首先是“书本宗教”，换言之，不同版本的《圣经》产生了不同的宗派。

第三部分“自然之书的转化”讲印刷术对近代科学的影响，分四章。这一部分在近代科学的上限和动因上与多学科的权威展开论战，爱森斯坦的论战对象有：文艺复兴研究权威布尔克哈特、艺术史权威欧文·潘诺夫斯基、科学史之父乔治·萨尔顿、科学史权威托马斯·库恩、数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她批评的对象还有：印刷史的权威鲁道夫·希尔施、吕西安·费弗尔、马丹和S. H. 斯坦贝格。

第五章“绪论：断代问题”争辩科学发展的连续性，研究近代科学的换代问题，批评“自然对阵书本”、意大利文艺复兴对阵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僵化观点，批判布尔克哈特的意大利“特殊论”。

第六章“技术性文献的印刷出版：科学著述与研究的新趋势”有四个重点：(1)印刷术普及文化，缩小了平民和学者的差距；(2)学者和印刷商的合作、学者和印刷商兼于一身的现象；(3)新型学者的知识开放、公共知识的产生和行会工匠秘不外传的知识；(4)印刷术使图文并茂的“新解剖学”成为可能，使维萨里超越了盖仑的古典解剖学。

第七章“为哥白尼革命重新搭台”分析哥白尼学说长期得不到发扬的原因：(1)他在世时印刷术刚刚发明不久，所以他阅读和出版机印书的机会自然比较少；(2)受中世纪秘藏知识、保守传统的影响，长期不出版、不宣传自己的著作和思想。与此同时，本章又分析哥白尼天文学最终得到发展的原因：(1)雷蒂库斯、约翰·雷乔蒙塔努斯、第谷·布拉赫、约翰·开普勒前赴后继的宣传与开拓；(2)测算游移不定的复活节是基督教宗教情怀的精神动力；(3)印刷术的保存功能和累积功能；(4)三角学和其他数学的发展。

第八章“科学著述的赞助与审查”是第七章的姊妹篇，继续讲近代科学的兴起。上一章主张为哥白尼革命重新搭台，这一章用类似的手法去研究伽利略受审的公案。所谓为哥白尼和伽利略“重新搭台”就是用印刷术掀起的传播革命去研究两人的学说受压制、被遮蔽以及最终得到传播和发扬的根本原因。这里有两个问题：(1)宗教改革和早期近代科学的关系；(2)外在社会制度和内在相对独立的科学生

命历程。作者用印刷术掀起的传播革命开辟新的路径去解决这两个问题；用新教徒与科学家的关系、图书贸易和科学的关系去研究近代科学的兴起；用新教和天主教不同的出版政策说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出版事业、文化事业、科学中心从南欧向北欧迁移的原因。

本书的“结束语”和“最后的话”长得出奇，计两万余字。我想这一异乎寻常之举不仅是要使她心爱的作品更加严谨，而且是要进一步表明心志、自我检讨、审视短长，既表明高调挑战各家的信心，又谦虚谨慎地袒露自己的不足。

五 创新与论战

先说创新，次说论战。

首先，爱森斯坦教授区别了 14 世纪到 16 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和此前欧洲文化的两次比较大的“复兴”。一般人只知道前者，对后者则不甚了了。其实，两者都是同一个词 revival。后者是 9 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复兴和 12 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完成的复兴。在这两次复兴中，文人和教士进行的工作和后来意大利人所做的复兴大同小异，都是将希腊古籍翻译成拉丁文，只不过前两次复兴比较短暂，后一次复兴比较长。所以她说：“中世纪的两次复兴是有局限的、短暂的；而文艺复兴则是全面的、持久的复兴。”（第 181 页）

第二，将意大利文艺复兴一分为二，印刷术以前那一段始于 14 世纪的彼特拉克，印刷术以后那一段止于 17 世纪初。前一段复兴和中世纪的两次复兴一样是短暂的、局部的。所以她说：“彼特拉克带来的复兴和印刷术产生的复兴需要更清楚地区别开来。不仅如此，两者的关系也必须要更仔细地思考。”（第 177 页）为了防止印刷术引起的传播规模被遮蔽，她进一步说：“‘文艺复兴’一语用来指一场两个阶段的文化运动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第一阶段是意大利文人和艺术家在手抄书时代启动的，第二个延伸的阶段涵盖了印刷术时代的许多地区和领域。然而毋庸讳言，当‘文艺复兴’被用来涵盖印刷术引起的众多的变革时，就必然会引起混乱。这样的用法不仅遮蔽了一场重大的传播革命，而且遮蔽了这场文化运动的重新定向。”（第 300 页）

第三，将 15 世纪的复兴一分为二，仍然以印刷术为分界线，以防止颠倒文艺复兴和印刷术的相互关系。诚然，两者相互作用，但彼此的影响有大小之别；印刷术加速了精神产品的生产。所以她说：“认为印刷术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副产品’的观念竟然长期存在，这一现象实在是难以理解。”（第 178 页）

第四，驳布尔克哈特“意大利特殊论”。布尔克哈特是 19 世纪瑞士历史学家、文艺复兴研究权威。在论述近代意识兴起时，他强调意大利的特殊性。

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向近代意识形式的转变”一开始就引用布尔克哈特的一大段话，然后仔细地予以驳斥。布尔克哈特说：“在中世纪，人的意识的两个方面……都在同一块面纱之下做白日梦或半睡半醒。织就这块面纱的材料有信念、幻想、幼稚的先入之见，透过这块面纱，世界和历史都裹上了奇怪的颜色。人们只意识到自己是种族、民族、政党、家庭或公司的成员——仅仅是透过某种一般的范畴。这一面纱首先在意大利化为乌有；客观看待这个国家和世间万物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人成了有精神的个体，而且意识到自己是有精神的个体……不难证明，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大利的政治环境造成的。”（第225－226页）仅举一句话看她的批评：“倘若近代早期真有什么意识变化，其变化大概既是群体身份意识的变化也是个体身份意识的变化。”（第226页）

她批评的另一种“特殊论”是所谓意大利特有的“多面手”现象和“冲动”现象：她说：“我和布尔克哈特的分歧在于：他说意大利出现了‘多面手’，坚持认为他们‘只属于意大利’；他不能解释为何产生了这样的‘多面手’，只好说他们产生于一种‘冲动’。我认为，对那些和‘个人的完善’同时产生的变化的最好的解释，不是靠诉诸自由意志学说，而是靠把在行动中学习和在读书中学习结合起来考虑。”（第139页）

她批评“意大利第一”时断言：“布尔克哈特声称：意大利人是近代欧洲的第一胎孩子……整个意大利半岛上，全体意大利人民都获得解放了。他还做了一个招人忌恨的比较：意大利人研究自然无不感到高兴，其他民族对研究自然却漠不关心……当人们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布置舞台时，‘意大利第一’总是得到更多的注意，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折得到的注意就少些。”（第488－489页）

第五，她批评萨尔顿的时代错乱。乔治·萨尔顿是20世纪美国学者、科学史之父。萨尔顿认为，14世纪人文主义者已经把“回归古典”和“回归自然”联系在一起。但爱森斯坦认为，这两个口号都是在16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不过我认为，这两个口号是很晚才提出来的，不能够准确传达手抄书时代主题的意义。‘回归古典’是书籍和作者博弈的结果……‘回归自然’带有后浪漫主义的弦外之音。”（第292－293页）

第六，她批评并补充托马斯·库恩研究哥白尼革命的思路。她认为，库恩撒大网，罗列了许多原因，唯独忘记了最重要的原因：印刷术引起的传播革命。她首先引用库恩一大段话，然后批评说：“库恩这一折中主义和多重研究的方法符合史学家长期以来看重的习惯。中世纪的贡献没有被忽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发生的一切几乎都端到读者面前……给予显要篇幅的变化有：使托勒密《地理学》失去威望的远航探险，推动哥白尼修订托勒密《天文学大全》的历法改革，促进托勒密文本重构的希腊文化复兴。最后，作者用比较长的篇幅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

图主义，认为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给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指出意义重大的新方向，尤其塑造了哥白尼的数学雅趣，促成了他对日心说假设的偏爱’。”（第 594 页）

六 印刷术与宗教改革

一如前述，机器印刷的发明促成了各种新版本《圣经》和各语种《圣经》的出版，撕裂拉丁文《圣经》和教廷一统天下的局面。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术“煽起了宗教论争的烈火”（第 139 页）。印刷术使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半个月之内传遍德国，一个月之内传遍欧洲”（第 310 页）。

爱森斯坦引用怀特海的话说明，印刷术对宗教改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宗教改革放纵大众的造反，使欧洲沉入血海，且长达一个半世纪。”（第 637 页）

她认为宗教改革研究应该以谷登堡为起点，而不是以路德为起点。她批评说：“大多数的宗教改革研究都以路德为起点，而不是以谷登堡为起点……他们常常告诉我们印刷术在新教传播里的作用，几乎不告诉我们印刷术在《圣经》传播里的先行角色。”（第 329 页）

她指出印刷术对《圣经》本身及《圣经》研究的影响：“使中世纪的拉丁文《圣经》过时的不是新教而是印刷术。”（第 354 页）“印刷术使拉丁文《圣经》遭遇到两面夹击：一方面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研究的威胁，另一方面是通俗语翻译的威胁。”（第 355 页）

她指出文艺复兴研究和宗教改革研究中遮蔽印刷术的偏向：“有关宗教改革的辩论往往掩盖了印刷术带来的变革，正如有关文艺复兴的辩论往往掩盖了印刷术的影响一样。”（第 368 页）

七 印刷术与近代科学

关于印刷术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爱森斯坦这本书有许多亮点。

第一，她断言，印刷术是近代科学的动因：“我说印刷术的出现为早期近代的科学革命搭建舞台，并应该占有更突出的地位。”（第 507 页）

第二，她批评韦伯对印刷术的忽视。众所周知，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和新教的研究非常精辟，但他对印刷术在两者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所以爱森斯坦批评说：“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韦伯关心的发展变化（含理性与科学）正是在印刷术这种新媒介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但他的著作给予印刷术的地位却很不引人注目。”（第 379 页）同时她指出，拥护和诘难韦伯的人都有这样的不足：“韦伯一起步就有疏忽，但许多批评他的人在这方面一事无成，并不比捍卫他的人多一点贡献。在争论新教徒和资本家的关系时，他们的记述对手抄书向印刷

术的转变不着一字。”(第 381 页)

第三,她认为,“公共知识”兴起于印刷术,近代科学是公共知识,没有印刷术就没有近代科学。她说:“手抄书文化不能够使详细的文字记录成为‘公共知识’,不能够使之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这一点上,她的意见和 20 世纪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代科学在……印刷术之后很快崛起……这绝非偶然……力量稍逊的技术不可能提供科学界需要的这种传播系统。”(第 478 页)

第四,关于近代科学兴起的断代问题,她既反对布尔克哈特派又反对亚里士多德。布尔克哈特鼓吹意大利特殊论,认为近代科学始于 15 世纪的意大利,如前所述。中世纪派则认为,近代科学萌动于中世纪的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他们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已经在研究‘严密科学’的问题,而且他们依据的方法几乎就要预见到后世的革新了……经院哲学鼓励继续不断地检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它已经为西方科学播下种子,就等开花结果了”(第 495 页)。

第五,她阐述了复活节的测算、新天文学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关系。由于复活节是游移不定的,其测定不但重要,而且要避开犹太教的逾越节。既然复活节的测定和星象的记录仰赖印刷术,这就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她说:“由于游移不定的复活节提出了历法的问题,所以教会在纪念福音真理时就需要天文学家的帮助……复活节的推算会引起历法问题,这种问题对印刷术带来的变化特别敏感……斋月不像复活节给人以动机去超越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去判定星体长期的缓慢运行。”(第 612 页)

第六,对印刷术用与不用的态度会酿成天渊之别。她以学者—印刷商查尔斯·埃蒂安纳和达·芬奇为例,做了一个生动形象、令人信服的对比。埃蒂安纳出版了许多著作,对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达·芬奇隐藏自己了不起的知识和成就,秘不外传,对当时的科学发展贡献甚少。她说:“在解剖学的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留下的印记远不如印刷大师查尔斯·埃蒂安纳。查尔斯是学者—印刷商王朝的成员,他的拉丁文化造诣和深厚学养都超过了列奥纳多和丢勒。他出版多语版《圣经》、编纂多语词典的许多技能有助于他用希腊—罗马和阿拉伯词语给人体部位和器官命名。”(第 566 页)她又断言:“实际上,列奥纳多大部分的天才设计和精确表达的观察结果并没有出版。后人的讨论表明,虽然他吸收了当时许多有用的技术资料,但他本人却没有对当时的技术资料积累做出直接的贡献。”(第 565 页)

第七,新教徒、印刷术和科学的结盟。17 世纪,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被迫流亡荷兰,积极投身出版业;荷兰本土的新教徒加尔文派也大力推动印刷业。彼时,荷兰赶走西班牙人,荷兰进入黄金时代,印刷业就是其重要产业之一。她说:“早期近代欧洲的出版商有一个特别的兴趣,那就是和新教徒结盟,同一时期的其他资本家

未必有这种特殊的兴趣。”(第 421 页)而且,全欧洲的新教徒都热心出版业:“到 17 世纪中叶,不仅阿姆斯特丹崛起成为文坛的中心城市,而且过去的中心比如威尼斯和里昂也经历了安特卫普同样的衰落。从 1517 年起,整个大陆的印刷商的运动方向都是新教的中心城市。”(第 409 页)

第八,新教的出版政策和天主教出版政策的强烈反差。本书第八章重新审视伽利略受审的公案,重点放在对比新教和天主教不同的出版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后果上。

首先,她开宗明义地说道:“研究这一案子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获取印书出路的问题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始终被忽视至为不当,需要被给予更大的分量。我还希望显示这一问题如何进入其他相关问题,并提供思想战场和思想冒险中某种缺失的环节。”(第 636 页)她指出荷兰人对伽利略的特殊贡献:“正是因为荷兰人赢得了独立战争……科学出版的途径才为伽利略敞开了,否则这扇大门是会关上的……伽利略最后一篇重要的手稿被偷运到荷兰,他大概可以在平静中去世了。”(第 637—638 页)

其次,她又对比英国皇家学会的开明出版政策和意大利几个著名学会保守的出版政策:“在出版《皇家学会通讯》的同时,英国皇家学会继续不断地推出丛刊,吸引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订户和读者。相反,西门托学会只出过‘汇编’,题名《例证》,而且其第一版在意大利国内是买不到的。皇家学会的《通讯》鼓励署名来稿,以扬名的诱惑力吸引国外作者。编者们注意保护知识产权,记录来稿日期,以裁定作者的优先权争议。西门托学会的《例证》则匿名发表论著,以保护投稿人免受迫害。如此,《例证》就剥夺了作者成名的机会,又使之失去投稿的动机。”(第 666—667 页)。

再次,她指出 1616 年和 1633 的教皇敕令和《禁书目录》对科学的遏制。“对意大利的精英人士而言,构建类似英国人的庇护所根本就不可能;剑与火堵塞了这条路。‘自然之书’没有敞开让公众审视,而是被删削了,大片的领地被宣告为禁区。图书馆被洗劫,印刷商被监禁。”(第 670 页)“无论今人如何解释 1616 年和 1633 的敕令,毋庸置疑,它们在天主教国家产生了抑制科学出版计划的后果。那时的教会主张,只要新体系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旧体系就必须维持;教会禁止伽利略进一步‘演示’新体系‘事实上正确’的尝试。”(第 673 页)

第九,她总结“印刷业—思潮—学术中心”迁移的规律:“当我们追溯思想从天主教南方向新教北方的运动时,印刷业先行从南到北的运动就应该被给予适当的分量。文坛学界的重心如何从 16 世纪的威尼斯迁移到 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在任何思想社会史的研究里,这个问题都特别值得注意。”(第 690 页)

八 对麦克卢汉的客观评价

在长期的历史教学中，爱森斯坦教授对历史研究中的循环论证、议而不决、固步自封的弊端感到不满，渴望另辟蹊径。1962 年，加拿大英语教授和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激发了她的“好奇心”，给予她启示，她决心从印刷革命和传播革命的角度去研究机器印刷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影响。

爱森斯坦对麦克卢汉十分肯定；同时，由于学科背景不同、研究视角殊异，她也认识到麦克卢汉之不足。现将她对麦克卢汉的臧否概述如下，依据出自本书，所以我们的论述以引语为主。

“在几十年讲授西欧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在学界流行的对早期近代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解释，我早就感到不满意了。麦克卢汉提到的一些变化很可能有助于对长期存在的问题做出更加令人满意的回答，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循环论证和议而不决的窠臼。”（第 x－xi 页）

“麦克卢汉促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思想和社会都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至少我认为，这是他最有价值的贡献。”（第 131 页）

“这位加拿大英语教授调笑广为人知的历史视角的失落，和美国史学界的扼腕叹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宣告历史研究方式的过时，谷登堡时代的终结……促使我思考 15 世纪传播变革具体的历史意义。”（第 x 页）

“……《谷登堡星汉》还是发挥了有用的功能，它指出了许多亟须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迄今无人问津。”（第 41 页）

与此同时，爱森斯坦教授宣示自己的特立独行，直言自己的研究方法既有别于麦克卢汉和哈罗德·伊尼斯之类的媒介理论家，又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史学家：“我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将印刷术作为文化分界线的学者。我所指的不仅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那些宏大而壮观的言论，而且还包括令人尊敬的学者们那些更加局限和谨慎的判断。”（第 171 页）

爱森斯坦认为，麦克卢汉的不足有以下一些表现：

“他又掩盖了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出现的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这就可能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进一步的研究。”（第 131 页）

“他试图用简单（却不优雅）的办法，完全摆脱历史纪年的顺序和历史语境。他似乎不关心比例和视角的保存，反而急躁地将这一切关怀搁置一边……麦克卢汉将一切事件做‘非线性’呈现，这一方式并没有激发读者对其论点的信赖。”（第 40 页）

九 自评与呼吁

爱森斯坦教授在“前言”和“最后的话”里承认不足、直面问题、呼吁合作，如上所述。

尽管她近二十年磨一剑，她还是非常谦恭地说：“本书踏足的领地太多，而作者的行迹则匆匆忙忙。”（第 704 页）

她坦承自己的视野受限：“本书第一部涵盖的却是陌生的领域……对身为史学家的本人尤其新异（因为我过去的专业领域是法国革命和 19 世纪初的法国史）。”（第 xi－xii 页）

所以她有意识地收缩本书的研究范围：“本书所谓的‘印刷文化’始终局限于特别狭隘的西方意义：指的是西方的后谷登堡时期的发展变化，将其与亚洲的前谷登堡时期的发展变化可能具有的联系搁置一边。不仅此前亚洲的发展被排除在外，而且此后东欧、近东和新世界的发展也被排除在外。”（第 xiv 页）

同时她又提出诸多问题、一些忠告与同行和有兴趣的学者互勉与合作：

“本书至少表明，时下的宏大设计及由此演绎而来的寻求潮流的时尚是不成熟的。抄书人和印刷商之间的鸿沟究竟有多宽多深，尚待我们充分探索。15 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这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中，恢复和革新的发展阶段是不平衡的，尚待我们去描绘……我作了诸多推测，但相关资料提供的知识并不均衡，不少资料是不可靠的一般记述，所有的资料来自于很有限的几个地区。”（第 704－705 页）

“即使不同领域的深度开发必然是分科进行的，也没有理由把一切‘刚性的’事实分配给某些领域，而把一切‘柔性的’事实就分配给其他的领域。专家们必须要考虑两种事实，无论他们探索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变迁。”（第 706－707 页）“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史家不妨多尊重刚性的事实和物质技术；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变迁的学者何妨多看重难以捉摸的因素、难以触摸的现象；果真如此，不同的专家群体就必然能够进行更加卓有成效的合作。”（第 707 页）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9 年 2 月 18 日

前　言

我坦率地承认，当初着手写这本关于印刷术历史的书时，我承揽的任务实在是太沉重，并没有清楚感觉到，我个人的能力实在是难以胜任……

——约瑟夫·艾姆斯(Joseph Ames)，1749 年 6 月 7 日[1]

本书的写作整整花了 15 年，始于 1963 年；那一年，我读到卡尔·布里登堡(Carl Bridenbaugh)以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身份所做的讲演词。讲演词的题名《伟大的突变》用的是当时(遗憾的是至今仍然很流行)那种天启式的样式。[2]他的讲演词惊呼，“失控的技术”正在切断我们与历史的一切联系，当代学者患了集体健忘症。他描绘史学家面临的困境，他悲叹普遍存在的“人类记忆的丧失”，对“阅读《圣经》的共同文化的丧失”尤其感到扼腕；但这些叹息似乎是一种症候，而不是明确的诊断。这篇讲演词缺乏将如今的惊呼放进历史视角的能力，历史视角是史学应该有能力提供的视角，其重要性超过它对一切其他学科的重要性。把“阅读《圣经》的共同文化的丧失”和整个西方文明画等号，这似乎有违史学的精神；这是因为阅读《圣经》的现象是很晚才出现的——而且这仅仅是一种只有 500 年历史的发明的副产品。即使在谷登堡①发明机器印刷之后，《圣经》阅读也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西欧和拉丁美洲文化程度很高的天主教徒也 ix

① 约翰·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1398—1468)，德国金匠，发明活字机器印刷，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浇铸铅合金活字、印刷机及印刷油墨，印制第一部机印版《圣经》(《42 行圣经》)。

不太注重阅读《圣经》。

我们这位美国历史学会会长遵循亨利·亚当斯[①]和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②]等杰出学者的传统，他似乎是在议论自己的感觉，把自己对日益淡漠的美国乡野童年的感觉投射到整个西方文明史之上。[3]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们对不牢靠的记忆的确感到忧心忡忡。不过我认为，集体遗忘并非史学界困境的恰当诊断。从我个人和同事们的经验来判断，构成前所未有威胁的是回忆，而不是遗忘。来自四面八方的浩瀚的信息急速地冲击我们，使我们为信息提供秩序和条理的能力紧张到近乎断裂的极限（或者说，它是否已经把我们投入陷阱？）。倘若有什么"脱缰"的技术导致史学界的文化危机感，那么这和日益快速的书籍出版有关，而不是和视听媒介甚至核弹的增加有关系吧？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自问，出版更多专著甚至培养研究生写专论，这是否是明智之举呢？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资料汗牛充栋，难以消化，且难以吸收。我读到马歇尔·麦克卢汉[③]的《谷登堡星汉》（*The Gutenberg Galaxy*）。[4]这位加拿大英语教授调笑广为人知的历史视角的失落，和美国史学界的扼腕叹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宣告历史研究方式的过时，谷登堡时代的终结。在此，我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用文化诊断的外衣掩盖文化危机的症状。麦克卢汉这本书似乎旨在证明印刷术带来的特殊问题，而不是新媒介带来的问题。它补充了许多例证，说明信息超载产生内在结构的涣散。与此同时，它又激发了我的兴趣（此前，思考《圣经》印制的问题已经刺激了我的兴趣），促使我思考15世纪传播变革具体的历史意义。在几十年讲授西欧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在学界流行的对早期近代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解释，我早就感到不满意了。麦克卢汉提到的一些变化很可能有助于对长期存在的问题做出更加令人满意的回答，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循环论证和议而不决的窠臼。但麦克卢汉神谕似的宣示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论证充分的出发点。首先要回答印刷术出现产生的实际结果，我们才能够着手对其他问题进行探索。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转变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有哪些？我着手调查这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已有的文献；原来预计掌握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资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过程。然而，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里所言，那时我能够请教的参考资料竟告阙如。事实上一本书也找不到，连长一点的文章都没有，纵览15世纪传播变革效果的资料根本就没有。

x

---

①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著九卷本《杰斐逊和麦迪逊总统在任时期的美国历史》、自传《亚当斯的教育》。

②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美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传记及巨著《美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15卷）等。

③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派创始人之一，著书十余种，要者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谷登堡星汉》等。

我意识到，一本书不足以校正这种局面。同时我又觉得，无论一本书多么不足，但总寥胜于无吧，于是我踏上十年磨一剑的征程。这十年首先是用来熟悉专论早期印刷术和书籍史的资料（天哪，太多，增加得太快）。从 1968 年到 1971 年，我发表了一些初步成果，在学界征求意见，以便听取并利用一些有见地的批评，然后才推出一部长篇的论著。已经见过这些文章的读者就会发现，本书前三章有一些部分似曾相识，当然每一章都经过了大量的修订。随着以下各章节的展开，新的内容会越来越多；第四章的大部分内容和其余各章的全部内容是首次露面。(5)

本书分两卷、共三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西欧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尝试勾勒这一次传播革命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论述这次传播革命和其他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些变革通常被认为与其相关的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联系在一起。（本书集中论述文化运动和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相关的问题放到另一本书里去讲。）所以，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讲述的是读者熟悉的社会发展，但观照的角度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不过，本书第一部分涵盖的却是陌生的领域——至少对大多数史学界人士是陌生的领地（虽然对专攻书籍的历史的学者并不陌生），对身为史学家的作者本人尤其新异（因为我过去的专业领域是法国革命和 19 世纪初的法国史）。 xi

在尝试开拓这个陌生领域的过程中，我发现仔细审视时（正如一切新入行者的感觉一样），乍一看相对简单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了解的新领域展开的速度，远远超过旧领域关闭的速度。正如读者期望中可能会想到的一样，在一部进程漫长的著作里，起初的想法会被第二波的想法取代，甚至第三波的想法也不得不加以修正。尤其是在论述印刷术的保存力量（这个主题在本书被赋予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得到反复宣示的待遇）时；我禁不住自问：以如此固化和恒久的形式和盘托出如此流动变化的观点，是否是明智之举？至今我对此仍然没有把握，唯希望此刻和盘托出的决定不至于被误解。我尚未做出终极的结论，仅仅是相信，越过这个临时休息站之后，接踵而至的回报会越来越少。

从一开始就应该指出，我主要的（当然并非唯一的）关注点是印刷术对文字记录的影响以及对文化精英观点的影响。我说“尚未被公认的革命”（unacknowledged revolution）时，心中想到的变革是从一种书面文化走向另一种书面文化的变革，而不是从口语文化走向书面文化的变革。这一点特别需要强调，因为它和目前的趋势相反。史学家们讲传播问题时，一般满足于指出，他们的研究领域有别于考古学或人类学，只限于研究有文字记录的社会。他们认为，文字记录的具体形式和界定研究领域的意义相比而言并不是很重要，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是是否有文字记录。最近，这个首要问题由于两个方面的抨击而进一步强化，这是对史学研究领

xii 域原有定义的抨击。一种抨击来自于非洲史学界，另一种抨击来自于研究西方文明的社会史家。非洲史家必然会挑战过去史学界的要求：历史研究必须要提供文字记录。欧洲社会史家反对的则是，这个要求集中关注的是一小群知识精英的举止，同时却忽视西欧的大多数人的行为。新的研究路径正在形成之中，它们常常是在史学家与非洲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研究的问题是“不擅辞令”(inarticulate)的民族的历史中需要处理的问题(虽然没有文字但大概同样喜欢说话的民族有时被称为“不善于辞令”的民族，实在是有一点莫名其妙)。这些新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校正陈旧的精英观点的不平衡性，而且给西方历史研究增加了许多新的维度。人口变化、气候变化、家庭结构、儿童养育、犯罪与惩戒、节日喜庆、葬礼和食物短缺引起的骚乱等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努力培育之中，正在取得新的进步，毫无疑问，这些成就必然会丰富并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当前“由下而上”的时髦方法在许多方面有用，但并不适合对本书的理解。简·凡西纳[①]既是人类学家，又通晓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历史。当他探索“口头传统与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关系”时，自然会略过手抄书时代的历史和印刷文化时代的历史的差别。(7)当西欧史学家探索印刷术对通俗文化的影响时，他们自然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从口头民俗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8)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者的注意力偏离了本书各章将要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陌生，读过我过去发表的文章的一些读者可能会匆忙得出错误的结论：我关心的问题和凡西纳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

可惜，这一误解容易解释，却不容易预防。首先，虽然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知识精英对待书面文本的方式，但它的确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其次，在手抄书的时代，甚至识文断字的群体依赖口头传播的程度也超过了后世文化人对口头传播
xiii 的依赖。在使用手抄书的学者中，口语文化的许多特征比如记忆术的培养和听众的角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使和文化人的群体打交道，口头传播也是难以避免的。尽管如此，手抄书学者的经验和他同时代不识字的人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印刷术的出现对通晓拉丁文的教授的影响和它对不识字的工匠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不考虑前者只考虑后者，那就失去了解释早期近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思想变革的机会。

在探讨这些变革时，我们不能忽略印刷术如何推动文化传播的问题。通俗语的翻译和普及产生的回响在学界内外提出了新的问题。不过本书研究的不是印刷术如何传播文化，而是印刷术如何改变学界内部的书面交流。其首要关怀是不流

① 简·凡西纳(Jan Vansina，1929—)，比利时裔美国非洲学家，代表作有《口头传统》、《作为历史的口头传统》、《雨林小道》、《与非洲共同生活》、《现代卢旺达的先辈》、《社会如何诞生》等。

行(如今叫做不时髦)的阅读拉丁文的专业精英们的"高雅"文化。我还发现有必要以不时髦的狭隘眼光停留在西欧的几个地区。[8]因此,本书所谓的"印刷文化"始终局限于特别狭隘的西方意义:指的是西方的后谷登堡时期的发展变化,将其与亚洲的前谷登堡时期的发展变化可能具有的联系搁置一边。不仅此前亚洲的发展被排除在外,而且此后东欧、近东和新世界的发展也被排除在外。偶尔有一些匆匆一瞥,提出一些比较的视角,但那仅仅是为了阐明西方基督教世界某些特征的特殊意义。由于许多古老的讯息影响到新媒介的使用,由于考察手抄媒介与印刷媒介的差异时必须要在思想史里穿越数百年的历史,所以在时间上限方面,我们不得不比所论的地理范围更富有弹性。于是,我们偶尔要回溯到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和早期基督教的习俗;我们不止一次在中世纪的手抄书和文具店跟前驻足流连;我们展望积累和增加的变革产生的影响。 xiv

然而,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并没有超越印刷术发明后的前 200 年的时间范围,但我们的故事却超越了伽利略受审的情形,目的是要看到哥白尼革命的完成以及期刊的滥觞,以便为启蒙思想提供一个适当的序幕。在牛顿和洛克的时代,文坛(Republic of Letters)领军人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伟大的商业出版家和学者—出版家让位于皮埃尔·培尔[①]和让·勒克莱尔[②]这样的文坛编辑。印刷术让位于编辑室的转折点代表着印刷大师的英雄时代的结束,成为本书驻足流连的一个适当的驿站。

我喜欢马克·布洛克[③]的名言:"优秀的史学家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巨人……他闻到人肉气味的地方就是他的猎物所在的地方。"[9]我喜欢强调本书书名里蕴含的人性成分,我将其中的印刷机作为"变革动因"含有这样的意思。虽然我不认为某些大师级的印刷商是早期近代欧洲未被颂扬的英雄,虽然他们是本书真正的主人公,然而不具人格的传输和传播过程也应该予以适当的注意。我断定,如果我们论述的是工具而不是工具的使用者,知识分类的问题自然就能够简化。当然,复制书籍的过程中涉及的工具不是一种,而是许多种。我在前几章里充分说明,本书语境里的印刷机一词只不过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标签,是论说一大群具体变革的简略形

---

① 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哲学家、评论家、启蒙时代先驱,代表作《历史与批判辞典》对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② 让·勒克莱尔(Jean LeClerc,1657—1736),瑞士百科全书编纂家、《圣经》学家,编纂《综合历史文库》、《精华文库》、《古今文库》等三部百科全书,对《圣经》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③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史学家,擅长中世纪历史,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秘密警察杀害,代表作有《封建社会》、《非理性乡村史》、《奇怪的战败:1940 年的证词》、《史学家的技艺》等。

式。这些具体的变革有金属活字、油墨等的使用。无论如何，我的出发点不是美因兹[①]某一家印刷厂发明的某一种设备，而是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欧洲各地许多都市中心里使用的设备。

最后该对书名做一点说明：其中的“an agent”表明印刷机是西欧变革的动因之一，我没有说印刷机是特定的变革动因(the agent)，更没有说印刷机是唯一的变革动因(the only agent)。读者对我初期几篇文章的反应使我有必要对书名中的“动因”作上述辨析。探索任何具体发明的念头本身就难免使人怀疑：作者偏爱单一原因的解释，或容易陷入还原主义和技术决定论。

xv 当然，序文里的宣示不应该被赋予很大的分量，只有靠书的分量支撑，这些宣示才能令人信服。不过开宗明义的明确宣示似乎是明智之举：我的目的是丰富对历史的理解，而不是使之贫乏；我认为，单一变数的解释与这样的宗旨格格不入。对技术革新的断言被吹嘘得过头时，历史视角就难以维持了，这个道理千真万确。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分辨和衡量不同断言的相对重要性。如果不对重要的革新予以说明，同样会扭曲人的视角。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长期忽略传播领域里一个转折点所造成的后果是，视角的扭曲日益严重。

作为一种变革动因，印刷术改变了资料搜集、储存和检索的方法，并改变了欧洲学界的交流网络。印刷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它产生了特别的影响。本书试图描述这些影响，并说明这些影响与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有何关系。但如果认为其他的变化能够被简化为传播方面的变化，那就荒诞不经了。不过，这些发展变化由于传播变革的发生而重新定向，似乎是值得予以说明的。我站在修正派一边，对流行的解说图式表示不满，我的立场是为迄今被忽略的历史变革的一个方面留下用武之地。我反对惯常的多变量解释(已经数次表态)，但这不是用单一变量解释来替代多变量解释，而是要说明为何长期存在的许多变量以新的方式进行互动。

许多种相互作用在本书各章不断出现，这些相互作用包括旧讯息和新媒介、文化文本和技术革新、手工与脑力、工匠和学者、布道者与印刷商的相互作用。一位友好的同仁建议我将 E. M. 福斯特[②]著名的诉求作为本书的铭文：“只要连接!”这句话确实很适合，既适合本书的样式，又适合其内容。因为虽然本书有一些分析和批判的部分，但它首先是一本综合性的书。它将分散领域里的专项研究结合起来，在有限的主题下用专论的形式去解决更加普遍关注的问题。

毋庸赘言，本书既有大型综合性著作的优点，也有其不足。其根基是专论性文

---

① 美因兹(Mainz)，德国西部城市，近代欧洲印刷出版中心之一。

② 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印度之旅》是他最重要的小说，含重要社会主题，被称为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杰作。

献，而不是文书档案的搜寻，这反映了作者对相关资料数据不均衡的熟悉程度。我 xvi
请教专家，参加研讨会，尽量利用发人深省的批评。然而，我并不能够排除犯错误的可能性。之所以犯错误，既可能是因为我依靠的权威资料过时或不健全，也可能是由于我个人演绎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尽管如此，我还是深信不疑，在这个大型而重要的课题上因疏忽而遭遇的危险，还是大大超过了资料不足、尝试性探讨所处的不利地位造成的危险。正如我将要在第一章里所示，严肃学者的疏忽使这一课题落入了不谨慎研究者的手里。虽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好奇心，但在我的许多同事中，他的著作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挫败了他们进一步研究印刷文化或其影响的勇气。目前，对这一课题的关心可能会被人怀疑，被扣上"麦克卢汉信徒"的帽子，可能会立即被人嗤之以鼻。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克服这一偏见，并能够证明，这一课题和对史学家技艺的尊重并非是不可兼容的。

在本书写作的长期过程中，我在学问上欠下的人情债之多非同一般。凡是我记得的地方，凡是提供特别信息的友人我都以脚注的形式表示感谢。以下的谢忱仅限于提供总体的指引、教诲和支持的朋友。

在给予持久鼓励的小群资深的学者中，我特别感谢已故的克雷因·布林顿(Crane Brinton)。从他20世纪40年代指导我的博士论文起到他临终前不久，他始终敦促我坚持在繁忙之余从事研究和写作。他的坚定支持对本书的最终完成关系很大，因为起初这本书似乎不太被看好。在稍后的阶段，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出乎意料的鼓励令我感到高兴。埃莉诺·巴伯(Elinor Barber)提供很好的帮助，始终对我的研究表现出内行者的兴趣。与J. B. 罗斯(J. B. Ross)许多小时的交谈使我获益匪浅。纳塔利·Z. 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和罗伯特·金顿(Robert Kingdon)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本书的注释里，这说明我多么仰赖他们对16世纪印刷文化的研究成果。他们两人还提供了许多其他的帮助，应当予以额外的
感谢。玛格丽特·阿斯顿(Margaret Aston)许多年给予支持，读初稿，提意见；我 xvii
们每周在福尔杰(Folger)图书馆会晤一次以后，我总是将手稿交给她请她审读，后来我们又隔海通信。

弗雷德里克·戈尔夫(Frederick Golf)让我在福尔杰图书馆参加他研究古籍的研讨会，我为此而表示感谢。鲁道夫·希尔施(Rudolf Hirsch)带我查阅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珍本书，邮寄文章和书籍给我，与我讨论富有争议的问题，十分和蔼可亲。纽伯利(Newberry)图书馆的约翰·泰德斯基(John Tedeschi)和美利坚天主教大学图书馆科学部的弗朗西斯·韦蒂(Francis Witty)给我提供了许多选印本、参考资料和有益的建议。

十多年来，我充分利用了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机会，我对辛

勤的馆员们表示感谢。在这家图书馆，我参加了 A. G. 狄更斯(A. G. Dickens)主持的研讨会，得到保罗·克里斯特勒(Paul Kristeller)的帮助，从与简·多斯腾(Jan van Dorsten)的交谈中受到启发。感谢该馆负责研究活动的 R. J. 舒克(R. J. Schoeck)；感谢该馆的两位主任：路易·赖特(Louis B. Wright)和 O. B. 哈迪森(O. B. Hardison)；感谢参考部的纳蒂·克里瓦茨基(Nati Krivastsky)；感谢手稿部的雷提蒂亚·杨德尔(Letitia Yeandle)，尤其要感谢该部的三位工作人员：伊丽莎白·聂姆耶尔(Elisabeth Niemyer)、蕾切尔·多吉特(Rachel Doggett)和桑德拉·鲍尔斯(Sandra Powers)，他们上了我初次主讲的早期印刷商的研讨班，这使我们能够教学相长。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手稿交易的问题，我反复请教牛津大学伯德利(Bodleian)图书馆西方手稿部的阿尔比尼亚·梅尔(Albinia de la Mare)，她慷慨地与我分享她对韦斯巴西亚诺·毕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及为他服务、为他抄书的公证人的无与伦比的了解。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劳斯(Richard Rouse)为我揭开中世纪手稿学的秘密，他校正了我的一些错误观念，给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研究资料，否则我难以见到这样的资料。本书第一部完稿之前，我之所以能够利用这样的专业知识，那是由于伊丽莎白·柯南(Elisabeth Kennan)的帮助；作为朋友和中世纪学专家，她在许多方面提供了帮助。我的中世纪研究进一步得益于玛丽·麦克拉福林(Mary M. McLaughlin)。

xviii 十分感谢查尔斯·施密特(Charles Schmitt)，他介绍我结识沃堡(Warburg)研究所的名家，并与我分享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专业知识。感谢保罗·劳伦斯·罗斯(Paul Lawrence Rose)，他提供了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图书馆学家和数学家的知识。马丹·罗利(Martin Lowry)让我分享他正在研究的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的心得；保罗·格伦德勒(Paul Grendler)向我通报他正在研究的威尼斯书商的进展。许多早期近代欧洲的史学家在许多方面给予我帮助，这些史家有米里亚姆·克里斯曼(Miriam Chrisman)、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爱德蒙·弗莱德(Edmund Fryde)、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本杰明·科尔(Benjamin Kohl)、南希·罗尔克勒(Nancy Roelker)、查尔斯·诺尔特(Charles Nauert)、欧雷斯特·拉努姆(Orest Ranum)、托马斯·腾特勒(Thomas Tentler)、查尔斯·特林考斯(Charles Trinkaus)等。麦伦·吉尔莫(Myron Gilmore)指引我研究上述一些史学家，他为我提供选印本，对我总是有求必应。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另一组专家即科技史专家的惠助。特别感谢罗伯特·帕尔特(Robert Palter)和罗伯特·维斯特曼(Robert Westman)，他们总是有信必回，审读我的初稿，让我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欧文·金杰里奇(Owen Gingerich)特别值得感谢，他使我能够出席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办的哥白尼讨论会,以后又向我提供自己的相关成果。除此之外,为我提供帮助的还有天主教大学的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他审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意见;史密森学会的乌塔·梅茨巴赫(Uta Merzbach)、D. L. 华纳(D. L. Warner)为我提供了数学和天文学资料;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的弗朗西斯·麦迪逊(Francis Maddison)给予我惠助;承蒙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举荐,玛格丽特·格洛因(Margaret Growing)在理纳克学院主持的研讨会为我提供机会,让我向牛津的学者们宣讲论文,希尔先生在过去十年间给予我令人心动的鼓励。

上述人士的建议和支持使我深受其惠,至于书的内容,我自然要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由于未能保存充足的记录而未提出感谢的帮助者,我还得表示歉意。我可能会忘掉一些事情,但对每一位曾经给予帮助的人,我从心底里表示由衷的感谢。

除了上述个人的帮助外,我还得到一些机构的帮助,这些帮助真是雪中送炭, *xix*
使我能够完成手稿。美国人文学科基金会惠予赞助,使我能够独立研究,给我六个月艰苦的伏案工作提供必要的激励。洛克基金会惠予赞助,使我能够到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并在意大利贝拉乔的维拉·塞贝罗尼会务与研究中心享受一个月的客座研究员待遇,本书最后一章就是在那里写成的。感谢美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负责人约尔·科尔顿(Joel Colton),他提醒我注意赴意大利研究的机会,感谢该研究中心的主任威廉·奥尔森(William Olson)博士及其夫人,他们尽力使我在中心工作的一个月过得很愉快。

几位编辑对过去的几篇文章和本书提供了帮助。感谢他们接受我的手稿并提出婉转的修订意见,感谢特雷弗·阿斯顿(Trevor Aston)、汉娜·格雷(Hanna Gray)、理查德·凡(Richard Van)、罗伯特·韦布(Robert Webb)。从头至尾负责处理我的打字稿的编辑是迈克尔·布莱克(Michael Black),他现在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出品人,最初引起我注意时,他是早期机印《圣经》版本的权威。他还代我请N. 卡罗尔·伊文思(N. Carol Evans)帮助编制索引。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对我这位一再拖延的作者表现出非凡的耐心和不懈的幽默。在完成两个索引的过程中,克拉丽莎·坎贝尔·奥尔(Clarissa Campbell Orr)的工作价值无法衡量。进入技术编辑阶段以后,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和莫林·里奇(Maureen Leach)给予帮助;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办事处的简·马杰斯基(Jane Majieski)承担没有回报的跨洋传递邮件的差事。本书法文版出乎意料地得到菲利普·阿尔勒(Philippe Ariès)的帮助,他以同情的态度耐心倾听,在交谈和通信中激发人的兴趣。

感谢为我的几次修订稿打字的菲利斯·莱文(Phyllis Levine)。在15年漫长的岁月里,我总是能够依靠她的善助。在亟须帮助的时候,她总是能够理清绞成一

团的脚注和潦草的字迹。在精确的重打、校对、校勘、审核一致性的工作中，我得到弗洛拉·西蒙斯(Flora Symons)的帮助；在校对打字稿漫长的时间里，她费劲心血，不只一次放弃休假帮忙。

xx 最后向我的家人表示感谢，很遗憾这样的谢辞已经成为老套；读者可能会觉得这已成为惯例，其实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在此，我的感激之情远远胜过了我的表达能力。我的先生和三个孩子以各自的方式帮助我的思想定型，加强了我完成这本书的决心。女儿玛格丽特在研究生院攻读历史，儿子泰德会铸字、会用手动印刷机；在我的写作濒临陈旧时，他们反复使我的兴趣得到更新。先生对我的学术活动的支持三十年如一日。在我们的最大的孩子中风以后，他的支持更如雪中送炭。先生约翰和他的兄弟姊妹始终对我的写作进展感兴趣。约翰专攻神经生理学，但对理科和文科都感兴趣；在评价写作风格时，他珍视清晰和准确。阅读我早期手稿中的一章时，他对拖沓的风格表示关切，敦促我减少那些犹如雾里看花的朦胧冗余(用方程式予以表示)。倘若约翰尚在人世，本书"雾里看花"的东西可能会少一些。他的父亲在编辑方面的帮助也减少了书中"雾里看花"的成分，所以本书的作者和

xxi 读者都要感谢朱利安·爱森斯坦。

目 录

译序 → 1

前言 → 1

第一部分　初说难以准确界定的变革 → 1

第一章　尚未被公认的革命 → 3

第二章　对初始的转变进行界定:印刷文化的部分特征 → 26

2.1　细看印刷术的传播:产量的增加和付印书籍的变化 → 42

2.2　考虑标准化的一些效应 → 47

2.3　文本重组和文献索引产生的效应:资料的整理、编订和分类 → 52

2.4　采集资料的新程序:从错讹的抄本到改进的机印本 → 63

2.5　印刷术的保存威力:固化功能和累积性变化 → 67

2.6　放大与强化:刻板定型和社会语言分割现象的持久影响 → 74

2.7　从聆听型公众到阅读型公众:社会变化和心理变化的不平衡发展 → 76

2.8　文坛与机印书贸易 → 81

第二部分　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重新定向;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再评价 → 97

第三章　古典复兴的重新定向:文艺复兴的两个阶段 → 99

3.1　本章概说 → 99

3.2　短暂的复兴与恒久的复兴 → 110

3.3　向近代意识形式的转变 → 138

3.4　破解奥秘:远古崇拜和“复兴”理念的变化 → 167

第四章 《圣经》传统的重构:为宗教改革重新布置舞台 → 187
4.1 本章概说 → 187
4.2 中世纪教会的结束:正统基督教的转变 → 193
4.3 福音真理的重构:拉丁文《圣经》的印行 → 204
4.4 为宗教改革重新布置舞台 → 227
4.5 新教伦理与新兴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 234
4.6 从南欧的天主教到北欧的新教:启蒙思想的温床 → 249
4.7 新型书本宗教面面观 → 262
第三部分 自然之书的转化 → 281
第五章 导论;断代问题 → 283
5.1 导论:"伟大的自然之书"与"渺小的人为之书" → 283
5.2 断代问题再思考: → 305
(1) 布尔克哈特派对阵中世纪派 → 305
(2) 中世纪科学之不足:关于新方法论的建议 → 311
(3) 错讹文献的复制:文化滞后的幻觉 → 318
第六章 技术性文献的印刷出版:科学著述与研究的新趋势 → 326
6.1 缩小民众与学者的差距 → 326
6.2 宣传科学:新的职业生涯向各种才俊之士开放 → 340
6.3 盖仑医学的复活与超越:为"新解剖学"搭建舞台 → 354
第七章 为哥白尼革命重新搭台 → 360
第八章 科学著述的赞助与审查 → 394
8.1 本章概说 → 394
8.2 分道扬镳的新教出版政策与天主教出版政策 → 402
8.3 堵塞思想试验,提倡创造行为 → 409
8.4 为伽利略的审判重新搭台 → 415
结束语:《圣经》与自然的转化 → 424
最后的话 → 439
注释 → 442
文献 → 603
索引 → 662
译后记 → 717
译者简介 → 719

第一部分

Part one

初说难以准确界定的变革

PDG

第一章
尚未被公认的革命

15 世纪后期，文书的生产从抄书人的书案转向印刷商的作坊。这一转变是一切学习形式的革命，对历史研究特别重要。自此，史家都感谢谷登堡的发明，印刷品贯穿在他们的工作中，从查阅卡片到阅读校样都离不开印刷品。一般的说，历史学家都热心研究重大变革，而这次变革尤其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条件，所以你可能以为这一次变革吸引了整个史学界。然而，一切历史文献查询表明，事实正好相反。历史女神克利俄仍然手握手写稿的确有象征意义。从书案到作坊的转变几乎就没有被史学家利用，所以谷登堡的发明之后五百年，主管历史的女神还身在印刷厂之外。“历史证明，新媒介的发明对人的信息传输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发明就很能说明问题……”[1] 就史家也已推出的验证这一场变革的论著而言，印刷术对社会的影响远不像是很重大的，而是相当不引人注目的。过去五百年间的许多研究成果对此未置一词。

谈及这一论题的人普遍认为，这一发明的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朗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印刷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外貌和状况”。这一名言反复被人征引，反复受到嘉许。但尽管许多学者赞同他的意见，却很少有人遵循他就谷登堡的发明提出的忠告：“要注意其威力、效应与后果。”人们非常关注这一发明为技术发展铺平道路的贡献。许多人努力界定谷登堡究竟“发明”了什么，试图描绘活字印刷如何滥觞，并且记述新兴印刷机如何普及。至于印刷术在欧洲普及以后产生的结果，却很少有人问津。阐述这些结果的明快的理论尚无人提出，验证或辩难的理论就更说不上了。 3

诚然，有关印刷术历史及相关课题的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且日益增多。[2] 虽然许多文献是专家写给专家看的；这些专家手里握有珍本，或在图书馆工作，或是研究印刷术或文献，或关心版本。不过，迄今的文献里的确包含了许多兴趣广泛的

素材。历史学家在相邻的领域里做出了各自特殊的贡献，这些领域有经济史、比较文献学或文艺复兴研究。社会史领域也许取得了最丰硕的成果。这里的研究成果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对早期印刷机的投资研究，各地区书籍销售的情况研究；对熟练排字工劳动条件和社会骚动的研究；对学者兼印刷商王朝和出版政策的研究；对审查、授权和行业管制的研究；对小单张、宣传和新闻的研究；对专业作家、赞助人和公众的研究；对阅读社会学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3]

再者，有几种近年问世的著作对这些浩瀚文献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整合和归纳。鲁道夫·希尔施概略地介绍了谷登堡发明之后的一百年里的“印刷、销售和阅读”方面的问题，其对象既是专家又是“对社会史和思想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4]。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丹(H. J. Martin)研究印刷术发明后前三百年的历史，真可谓驾轻就熟，该书进入“人类演进书系”(Evolution de l' Humanité)。另一部著作涵盖的范围更广，长达五百年，而这本半通俗半书卷气的书非常之简洁明快，其论述题材是印刷术在英格兰的历史，作者是斯坦贝格(S. H. Steinberg)。[5]这三本书都搜集了大量分散的资料，并做了归纳。它们偶尔提及这些资料的历史意义，但从未真正展开论述。和《剑桥现代史新编》(*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论印刷术那一章一样[6]，这三部概论的内容很少涉及人类演进的其他方面。

斯坦贝格认为：“印刷史是文明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遗憾的是，这句话大概适用于人类事务的实际进程，但未必适用于见诸文字记载的历史。印刷术研究的著作远没有和其他著作整合，它们被人为地孤立和封闭起来，和其他历史文献脱离。从理论上说，这些著作的核心的课题和其他许多领域关系密切。然而事实上，其他任何领域的学者很少阅读这些著作，原因或许是，它们和其他领域的相关性依然是不明朗的。“直到今天，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对西方文明影响的性质还有待解释。”[8]这句话似乎对情况估计不足。实际上，即使不太准确或尝试性解释的、其他学者能够利用的材料也非常之少。[9]印刷术的影响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并不是因为意见一致，而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明确而系统的意见。事实上，同意印刷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总是止步不前，不告诉我们如此重大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以下两例足以说明，学界广泛采用回避问题的策略。第一例出自杰出文学史家(literary historian)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著名的比较文学著作：“印刷术带来的宏伟而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印刷术之前的每一本书都是手写稿。”[10]库尔提乌斯接着以一种带有几分玄想和浪漫的口吻讲述手抄本的生产过程。[11]然而，他对书籍不再是手抄本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不置一词，或许这能够解释为何他做出以下判断：“我们已经使铁路现代化，但没有使我们的传播系统现代化。”[12]我认为，文学传统的传播在蒸汽机出现之前好几百年就已经“现代化”

了;不过除非观察者仔细审视"宏伟而革命性的变化",除非他们比库尔提乌斯多花一点时间,否则他们是看不见这种现代化的。这位出言谨慎的学者想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样的大变革,无疑是令人惊叹的。作者对印刷术专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该领域的才干增加了其观点的分量;在第二条引语里,他的看法就不那么特别了。另一位作者说:"哪怕只勾勒印刷术发明在人类事务一切领域里的深远影响,那也需要卷帙浩繁的篇幅。"[13]此言不虚。但无论厚薄,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勾勒出未经描绘或明确界定的影响。道格拉斯·麦克默特利(Douglas McMurtrie)关于未被写出的海量文献的评价并不比恩斯特·库尔提乌斯那句话更令人满意。我们从这两个例子中了解到的情况只不过是,那些看似巨大的影响已然发生了。但有兴趣的读者也没有得到如何获得更大收获的指导。 6

既然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关注的"深远影响"无不触及人类的一切领域,你多半会问,为何这样的影响至今尚未清楚认定。"如果不考虑印刷机的影响,充分了解任何政治、宪政、基督教和经济事件都是不可能的,充分了解任何社会学、哲学和文学运动也是不可能的。"[14]为了充分了解这些事件和运动,历代的学者都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如果印刷机对这些事件和运动产生了影响,那么,为何这样的影响常常无人注意、很少有人提及、遑论仔细研讨呢?即使暗示印刷术的影响绝不是不言自明的,也值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可能遭遇这个问题,就此而言,这些影响迄今都可能被忽视了。追踪并提出这些影响,用勾勒的形式或其他形式予以表现——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麦克默特利或斯坦贝格指出印刷术对人类一切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都产生影响时,他们心中想到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清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似乎指的是间接的影响,但这些影响还得经过一番演绎,它们和机印书的消费有关,和变化了的思维习惯有关。当然,这些结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人类活动的大多数形式产生了冲击。尽管如此,准确描绘这些影响有难度,连准确判定这些影响都有困难。描绘 15 世纪以后书籍生产的方法如何变化是一回事,估计书籍增产的比率也容易;然而,判断数量或种类更多的书籍如何影响有文化的精英的学习、思维和感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与此相似,证明标准化是印刷术的结果是一回事;判断法律、语言或心灵构造如何受到更加整齐划一的文本的影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从受访者那里得到的数据不可谓不多,舆论分析师、民意测验者或行为科学家也费尽力气;然而关于印刷材料的获得和使用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这个问题,我们迄今仍然知之甚少。[15](只需稍许一瞥近来在审查色情读物上发表的专论,就可以看到,我们实在是非常无知。)史学家不得不超越亡者的墓地去构拟古人的意识形式,他们研究印刷术这一类的问题时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影响识字率、学习程序、态度和期望等方面的变革并不平衡,有关这些变革的理论 7

难以化解为简单、明快的表述，也是难以验证的，整合到常规的历史叙事里也很难。

从手抄书到印刷书的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所带来的问题，无论间接演绎的结果带来的问题，抑或是难以估计、难以计量的问题，可能永远都难以克服。不过，倘若其他问题不挡道，我们还是可以直面这些问题。在需要注意的深远影响中，有一些至今影响我们的观察，而且对每一位专业学者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所以，经常获取印刷材料是史学家发挥专业技能的前提。为了评估印刷书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调查印刷书出现之前的情况。然而，手抄书文化的历史情况又只能够透过印刷文化的面纱来观察。

8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对人类学发现的粗浅了解或者对学前儿童的不经意观察都可以使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几位学者的研究阐明了两种心态的差别，一种是依靠口语词形成的心态，与之相对的是依靠书面词形成的心态。[16]我们的经验与完全依靠手抄书的文化精英之间的鸿沟更加难以想象。我们的经验中没有与之相似的东西，当下西方世界任何人的经验中都没有与之相似的经验。于是，手抄书文化的历史情况不得不依靠人为的手段来构拟，也就是依靠历史书籍和参考指南来构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著作更可能遮蔽我们要搜寻的对象，而不是揭示这样的对象。手抄书文化的主题在近代以后继续发扬，后印刷术趋势被回推向近代以前，所以我们难以想象建基于手抄书的特色鲜明的书面文化存在的情况。[17]印刷术之前的书面交流体系如何定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连一个一致赞同的术语也没有。[18]

我们让学童在完全相同的地图上去搜寻早期远航的线路。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古人航海并没有完全相同的世界地图，他们可能会心不在焉。当我们用日益精致的技巧去校勘手稿以便生产更加权威的版本时，我们就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类似的心不在焉。每一个新抄本都透露更多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过去的手稿是如何创作和抄写的。同理，每一个新版抄本都使我们更加难以想象手稿在抄书人的眼里

9 像什么样子；须知，他只有一份手抄本，没有任何信息指明其抄写地点、抄写日期、题名或作者。史学家的训练是区别手抄本源头和印刷的文本。但他们不会同样仔细思考手稿书在抄书人眼里像什么样子。[19]在手稿时代，除了被人听见的话之外，一切话语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与此相似，我们越是受到彻底的训练去掌握近代历史书里的事件和年代，就越是难以理解手稿书学者遭遇的困难；他们接触各种文字记录，但没有如今普遍使用的统一的历史纪年、地图和其他一切参考材料。

重构印刷术之前历史情况的努力产生了一个学术上的困境。重构需要使用印刷材料，这就使人难以清楚感觉到这些印刷材料通用时的历史情况。即使敏感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困境，即使他们在研究过无数的手抄稿后找到了真正的“感觉”[20]，重构的努力必然还是事倍功半、令人失望。

正是因为手稿文化的书写材料变动不羁，既不平衡，形态又多，所以几乎无法追踪其长期趋势。古罗马书店附近的情况、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情况、一些中世纪修道院和大学城的情况，使文化精英能够开发出一种相当发达的“图书”文化。[21]然而，一切图书馆藏书都可能缩水，一切文本在抄写的过程中都可能产生错谬。再者，在一些过渡性的特殊的中心，手抄书文化的书写材料材质纤细，即使文人圈子也非常依靠口头传输。在抄书房里，抄书靠听写进行，文书的“出版”依靠朗诵，连“书本”学习本身由于依靠口语词也受到约束——如此产生的是半口语、半书面的杂交文化，今天并没有预制准确对应的文化。印刷术之前的出版意味着什么，手抄书时代的书信如何传递，这些问题并没有大致相同的答案。[22]研究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代和地域。关于印刷术出现之前那一百年的情况，尤其可能会做出矛盾的判断；在这一百年里，纸张成了书写材料，文化人很可能自己动手抄书了。

10

研究初期机印本的专家可能会遭到残损的版本，他们有可能认为，早期印刷术的生产程序也缺乏类似的统一标准。对初期的印刷术进行概括无疑是有风险的，应该防止把现代的标准版本生产往回推[23]，同时又应该防止模糊手抄书文化的最后一百年与谷登堡印刷文化兴起后的第一百年之间的重大差别。早期印刷文化已经相当一致，使我们能够检测其变异。我们可以估计印刷的产量和平均水平，追踪其走势。比如，我们大体上可以估计初期机印本时代印刷品的总和。与此相似，我们可以说，早期版本的产量“平均”200 册到 1000 册。对手抄书文化最后五十年的情况，却难以做出类似的估计。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数字。1400 年到 1450 年之间的“平均”印数是多少？这个问题几近荒唐。“版本”(edition)这个词用于手抄书的抄本数量，几乎是时代错乱。[24]

11

估计手抄书产量的困难将在下一章里说明。我们将要说明，数量的概念不适合手抄书文化的情况。人们经常引用的数字根据的是一位佛罗伦萨手稿销售商的回忆录，但其回忆录完全是不可靠的。[25]15 世纪的佛罗伦萨无论如何难以说是意大利的中心城市(如波洛尼亚)的代表，更不能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代表。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任何地区够得上典型的称号。没有“典型的”书商、抄书人，甚至没有典型的手稿。[26]世俗书的生产和销售的复杂性令人绝望，即使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即使只考虑印刷术出现前教会的需求，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非常多样化的市场销售过程。为多种修会提供书籍的情况千差万别；托钵僧和隐修士的安排就不一样。教皇和红衣主教经常倚重意大利书商的“各种活动”；布道者常常准备自己节选的布道辞；半世俗的教派准备供自己使用的启蒙书和问答书。

我们试图还原印刷术出现前的时期时，有关平均印量或典型的市场销售的资料缺乏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障碍。比如，本章稍早的一个版本断言，书籍的生产在 15 世纪晚期从抄书房转向印刷商的作坊。一位中世纪研究专家对这一断言提出

批评，其根据是：早在 12 世纪，书籍的生产就已经离开了修道院，世俗的书商已经在为大学教员和托钵僧修会供应书籍。伴随 12 世纪的“书籍革命”和大学对抄书的监管，出现了书籍的“生产”体制。抄书人不再聚集在一间抄书房里，而是抄写各自被分配的部分，按照计件的方式从书商那里得到报酬（此所谓“计件”制度）。批评我的人认为，印刷术出现前三百年，书籍生产就已经离开了抄书房。

12 这位批评者的反对意见似乎值得进一步思考。无疑，我们应该注意 12 世纪和 13 世纪时大学城和其他城市中心兴起的世俗的书商。[27] 修士为赎罪的无偿劳动和世俗抄书人的工资劳动的差别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近年的研究强调书籍生产体制的采用，并且使长期以来书商已经设置抄书房的想法受到了质疑。[28] 所以，我们把抄书房这个词用来研究中世纪后期的情况时，尤其要谨慎，比我在本章初稿里所持的态度还要谨慎。

然而另一方面，在强调 12 世纪巴黎、牛津、波洛尼亚等大学城的趋势时，我们也要非常谨慎，虽然为了特殊的体制需要，这些地方在快速生产手抄书的许多副
13 本。当我们把大学“分工抄写”制推向书商的实际做法时，需要持谨慎的态度，研究为大学以外的读者服务的书商时更需要谨慎，那就更不用说了。[29] 13 世纪时相对清晰的模式到了 14 世纪晚期就模糊不清了，这个事实也要牢记在心。如果暗示“分工抄写”一直执行到印刷术发明前夕，那就错了。有证据显示，首批印刷机出现之前一百年，“分工抄写”就衰落了。[30] 1350 年到 1450 年这关键的一个世纪是打基础的一百年，那时的社会情况通常处在无政府状态，一些据信业已过时的习惯又得到复活。比如，修道院的抄书房就经历了“最后的黄金时代”[31]。

12 世纪的所谓“书籍革命”并没有完全终结主业社团（opus dei）里的抄书传统。在低地国家，杰拉德·格鲁特①创建的教派使之得到强有力的复活。“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如格鲁特的兄弟会那样强调书籍的生产。”[32] 这一次复活不限于近代虔敬运动②兴盛的地区，卡西奥多鲁斯③的传统在其他地方也揭开了新的一页。15 世纪初让·热尔松④撰写《抄书人赞》（*De Laude Scriptorum*）的目的就是要回答加

---

① 杰拉德·格鲁特（Gerhard Groote，1340—1384），荷兰宗教改革家，1381 年创立共同生活兄弟会，强调基督的人性而不是神性，重视苦行和默念而不是礼仪，与经院学派截然不同，促进了教会的改革，16 世纪的本笃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吸收了其教义。

② 近代虔敬运动（modern devotion），即现代虔信派，14—16 世纪天主教内的一个派别。产生于尼德兰，后传至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地，创始人为格鲁特，该派反对灵修，鄙视仪式，强调默思和内省，含共同生活兄弟会、温德舍姆兄弟会。

③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490—585），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僧侣，活跃于 6 世纪，建立寺院，组织僧侣誊写宗教文稿和世俗文稿，保存了罗马文化，著有《论宗教文学与世俗文学》等。

④ 让·德·热尔松（Jean de Gerson，1363—1429），法兰西基督教神学家、神秘主义者，曾任巴黎大学校长，参与教皇在教会里地位的论争，参与两位分立的教皇争夺教皇宝座的斗争。

尔都西会(Carthusians)和塞勒斯坦修会(Celestines)的质疑，认为可以在喜庆会的日子里抄书。[33]

修道院抄书房存在到印刷术发明的初期甚至更晚，饶有趣味的一个见证是一部异常的著作，其意图是在回应热尔松，且常常被当作印刷术初期的一篇怪论引用：约翰尼斯·特利泰姆斯①的《抄书人礼赞》(*In Praise of Scribes*)。作者时任斯彭海姆修道院院长，他不仅劝诫修士们抄书，而且丰富了古老修辞的主题，解释“印刷术发明后修士们为何不能停止抄书”[34]。他的论点包括：让手不得空闲、孤立勤奋、虔诚奉献、熟知《圣经》等；除此之外，他还不太合乎逻辑地将千年不朽的羊皮纸上的书面词与纸张上寿命较短的印刷词进行比较。至于抄书人对纸张(和刮削后 14
重写的羊皮纸)的使用，以及羊皮的特殊使用，他却没有提及。作为希伯来语学者、基督教学者和热尔松的读者，他显然熟悉古老修辞的主题，正是这些主题使耐久的羊皮纸和易毁的莎草纸形成强烈的对比。[35]他的论点说明，他关心保存一种特别适合修士的手工劳动形式。作为狂热的爱书人，他是否真的根据古训担心纸张使用量的日益增多，那倒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他的活动清楚表明，作为一位作家，他并不觉得手写书优于印刷品。一旦手稿完成，他就立即将其付印；他的《抄书人礼赞》是这样问世的，其他比较重要的著作也是这样问世的。[36]实际上，他经常使用美因兹的一家印刷所，“以至于可以将其命名为斯彭海姆修道院印刷所”[37]。

斯彭海姆修道院的院长就这样完成了从抄书房到印刷所的旅程，但在此之前，科隆的查特豪斯修道院的加尔都西修士们已经转向当地的印刷商；虽然他们受到修道院保持沉默的誓言的束缚，他们还是转向所谓的“用手”布道。[38]许多史料记 15
述，科隆之外的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且不限于加尔都西会的修士。[39]本笃会的一些改革派将许多手稿交给本地的印刷商印制，在有些情况下，修士修女们还自办印刷所。本书将在其他章节讲述资本主义企业进入宗教场所的意义。[40]这里略微提及修道院抄书和印书的情况，仅仅是为了说明，如果夸大 12 世纪世俗书商的兴起，那就可能会忽视其他一些东西。完全抹杀从“抄书房到印刷所”的公式，似乎将这段历史当作空白，都是不明智的。

以上述评暗示，概括书籍生产的新体制容易，概括书籍生产的旧体制比较难，概括 1350 年到 1450 年这一百年尤其难。印刷术出现之后，一致性和同步性司空见惯，但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在抄书人的时代里，一致性和同步性通常是不存在的。当我们所受的训练是远看事物时，我们反而看不见鼻子底下的东西。大多数学者看不见每天面对的媒介产生的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最有力地指出了这

① 约翰尼斯·特利泰姆斯(Johannes Trithemius，1462—1516)，德意志史学家、本笃会修士、修道院长，但其历史著作不太可靠，另有《抄书人礼赞》传世。

样的短视，并对此作了最详尽的阐述。[41]根据他的理论，反复扫描一行又一行标准化的印刷文字会产生潜意识的影响。习惯读书的人主观上深受这种潜意识影响，反而认识不到这种影响。《谷登堡星汉》(*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al*)的古怪版式旨在抗衡这种习惯的定式，使读者猛然摆脱心灵习惯的窠臼。麦克卢汉意识到印刷术准催眠术的力量，因而有能力予以抗衡，他把自己这样的觉悟和能力归因于新型的试听媒介和电子媒介。他认为，新媒介对我们的感官和感知产生独特的影响，开始突破书籍产生的符咒般的魅力。在过去的五百
16 年里，这种魅力囚禁着西方社会里的读书人。

麦克卢汉用非常规的版式论述，同时就可能损害了他论述的主题，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他在重申 19 世纪常规的书面文化主题时，征引了大量的常规学术文献。《谷登堡星汉》无序的版式与其说是要归因于新媒介的冲击，不如说要归因于大量搜集并组织素材的老套方式遭遇到的困难。他这本书规避了老式的糨糊加剪刀所遭遇到的困难。麦克卢汉认为，印刷术业已过时，“电力时代”使“读书识字的技术”过时；但是我认为，他个人未能注意到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读者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

解释人们对印刷术影响的短视似乎并不需要详细的媒介分析。自谷登堡以来，印刷材料就极其司空见惯。一个世纪前，它们就不再有新闻价值了，印刷品越普及却越不吸引人。如今，年历、地图、时刻表、词典、目录、教材和报纸已经被视之为理所当然(甚至被猎奇者斥之为过时)，然而，它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对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42]印刷品越丰富，使用得越频繁，其影响就越深刻而广泛。所以，要传播最复杂的技能，印刷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仍然是当前知识爆炸和许多现代艺术的深层原因。至少我认为，印刷术可以解释大多数被认为是 20 世纪中叶文化的特征。[43]但我要重申，印刷品积累得越多，我们就越容易倾向于忽视其影响，就越容易重视不太熟悉的媒介。于是，思考电视效应的文章自然比猜想印刷术影
17 响的文章更具有广阔的市场。因为后者的影响越来越不引人注目，所以虽然印刷术的反响当前还在日益放大，但奇怪的是人们却认为其影响正在日益减弱。

然而，印刷品长期的普及却难以解释人们当前的短视。早在培根、坎帕内拉①、伽利略或开普勒出生之前，初期机印本时代就已经结束了。但这几位伟人都不会将印刷术视之为理所当然；相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评说其伟大意义。诚然，按如今的标准，17 世纪初的印刷品还是比较稀缺的。然而按那个时代的标准来

① 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意大利神学家、人文主义者、诗人，曾为伽利略辩护，被控为异端，著有《太阳城》、《感官表现出来的哲学》、《论基督王国》等。

看，印刷品是非常丰富的，已经被描绘为泛滥成灾。托马斯·布朗[①]爵士责备说："印刷品的生产只不过是用来干扰和滥用学者们业已被削弱的判断能力，完全是为了维持印刷业的行业利益及其神秘色彩。"(44)在17世纪的文人圈子里，浏览印刷品已经是熟悉的日常习惯，但他们还在把凸版印刷机当作令人注目的革新来议论，所以我们今人忽略印刷术的倾向就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了。

还有几点值得思考。在17世纪，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与印刷所和印刷商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印刷术工业化导致新的劳动分工以后双方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在整个启蒙时代，高雅的出版人和机械的印刷商还没有走到分手的岔路口。17世纪初，开普勒这样的学界名流在印刷所里常常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仔细监察科学著作的印制，他们对印刷术的敏感程度大大超过了如今的天文学家。如今的学者出书的程序是：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寄给刊物的编辑，等到评审者做出赞同发表的评判以后，他们又静候成果的问世。他们和印刷厂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一事实如何影响学人的态度，这个问题尚待我们做出评估。(45)这一变化是否强化了"纯"研究学者对技术与应用科学的鄙视呢？

除了印刷业的机械化和新的脑力劳动分工之外，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也需要纳入思考的范围。在近代初期，出版路径的获取经常意味着绕过审查并从事违禁的活动。文人不得不将手稿走私出境交由国外的出版社出版，或者在当地找一家秘密的出版社付印，他们不太可能像今天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把出版社的服务视之为理所当然（至少在西欧是这样的）。坎帕内拉、伽利略和开普勒的遭遇尤其如此，稍后生活在天主教统治之下的启蒙思想家也有这样的遭遇。在新教徒得势的地区，对印刷机力量的礼赞与爱国主义的主题具有更大的兼容性；对于上述划时代功能的强调总是带有反教皇、反天主教的弦外之音。这个主题由反意大利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提出来，然后被路德派等新教徒放大，接着被胡格诺派[②]、清教徒以及自由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继承，最后在麦考利[③]等辉格党史学家及反教权主义者如米什莱[④]等人的著作里达到高潮。(46)然而此后，鼓吹进步思想的使徒们从火药和印刷术先后转向了蒸汽机和发电机。到19世纪后期，手摇印刷机快要进博物馆了，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何手摇印刷机对培根或孔多塞比对今天的我们更具有

①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国医师、作家，将科学和宗教融为一炉，著有《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

② 胡格诺派（Huguenots），16至17世纪法国的新教徒，多属加尔文宗。

③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辉格党议员，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等。

④ 于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被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史学家"，著有《人民》、《罗马史》、《法国史》（17卷）和《法国革命史》。

吸引力。

而且，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影响也促使 15 世纪发明的印刷术进入古董的地位；
19 古旧书商对印刷术的兴趣似乎超过现代观察家对它的兴趣。早期机印书与手抄书一道成了陈列柜里展示的稀缺宝贝，成为遥远、失传的古代必须珍惜的遗存。(47) 再者，由于晚近技术革新的快速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常常把印刷术与后古典时期发明并举的常规也使人对印刷术上的注意力逐渐减弱。新发明越快速倍增，早先的发明就越是不引人注目。所谓现代知识产业的扩张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现代学者正在快速地揭示古老的发明，而现代技术也正在以同样的速度推出新的发明。(48) 印刷机只不过是日益拥挤混乱的发明库房里的一种发明而已，所以它也逐渐失去了独特的地位。

在这个方面，自从印刷机加入后古典时期的发明以来，我们兜了一个圈子。谷登堡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划定的圈子，教廷图书馆长提出一个包含 22 种发明的清单（包括马蹬、机械钟、指南针和火药），以显示使用非拉丁语词汇的理由。(49) 到 16 世纪，对告别纯拉丁用法的语文学关怀转变成了对技术进步的庆贺。书面语的地位由于图像再现的手段而得到有力的强化。一套经常被复制的铜版画《新发明》庆贺“现代”的发明和发现。这是乔奇奥·瓦萨里①的学生斯特拉达②于 16 世纪 80 年代设计创作的，由安特卫普的加拉斯印刷所反复印行。在确立今天铜版画这个主题方面，这套铜版画的作用大概相当于任何长篇大论所起的作用。(50) 人们的兴趣
20 从语词研究转向发明之后，发明清单的顺序有所调整，其中的项目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意义。(51) 在许多人列举的不同清单上，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被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突出的地位。(52) 培根论及有必要注意人类发明或发现的“力量、效应和结果”时，认为“最突出”的发明只有这三项。(53) 但今天的我们再也不可能抱这样的想法。写报纸头条标题的记者能够对前无古人的事件进行甄别，用字号大小的变换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事件，但 20 世纪的史学家还是丢掉了给最重要事件排序的诀窍。(54) 我们列举的发明清单一团乱麻、杂乱无章。在目前的清单里，谷登堡的发明混杂在稀奇古怪的发明里（一个清单将其放在保险合同和冶炼进步之间，另一个清单把它放在机械钟和大学之间，又一个清单把它放在复式簿记和眼镜之间）。(55) 由此观之，真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印刷术了。

印刷术是否应该位于我们最习惯寻找它的位置，处在中世纪晚期的语境中呢？

---

① 乔奇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意大利画家、建筑师和艺术史家，画风属风格主义，代表作有《百日壁画》、《意大利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传略》。

② 斯特拉达（Johannes Stradanus，1523—1605），即杨·凡·德尔·斯特雷特（Jan van der Straet），意大利画家瓦萨里的学生和助手，其版画集《新发明》中包含火药、罗盘、印刷术、丝绸和马镫。

在许多方面，凸版印刷与动力工具和精密仪器的结伴似乎恰如其分，把印刷术与冶金、纺织、油彩水墨试验放在一个序列里也是恰当的。(56)但如果你与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专家为伍，把印刷术放在与书籍历史相关的序列里，似乎同样是妥当的。 21
在这个序列里，印刷术只不过是漫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这个过程至少可以回溯到古代的奴隶劳动，回溯到从莎草纸向羊皮纸过渡的时期。(57)如果是那样，最重要的出发点就不会是中世纪晚期的冶金术，而是12世纪的书籍革命。如上所见，这样的语境所持的观点是渐进的进化观。手稿书的出版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而纸的生产发展到足以满足日益扩张的贸易之后，印刷商的革新就没有什么余地了，新机器的采用也不会有多少用武之地。

另一种语境是由经济史家提供的。和图书馆学家相比，经济史家更容易把书商的后继者放进革新者的角色里去。因此，早期的印刷商被认为是都市企业家，他们用机印书取代手抄书；他们不得不投入巨资，争取资金支持；他们是早期大规模生产的拓荒者，把贸易网络拓展到中世纪行会和城镇之外；他们遭遇到劳工问题，包括早期的罢工；他们经常要面对靠赢利驱动的竞争对手。所以，对经济史家而言，早期的印刷商属于早期资本家的圈子，而不属于较早一个时期的手抄书书商的圈子。(58)

经济史家把早期印刷商描绘为早期资本家，这使人将资本家视为创新人士。但这也使其近乎市侩，处境尴尬，并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演绎，使人联想到经济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对印刷商扮演的许多其他角色的忽略——忽略它与文科和理科 22
的联系，或者与当时的学问和文学的联系。埃德加·齐尔塞尔①云："印刷是一种机械艺术，虽然出版商是古典学者，但他们并不是传播荣耀的文人，而是商人。"(59)不过，许多出版商是商人和文人兼于一身的人，这样去描绘他们似乎更准确。他们为文人服务，不仅提供传统的赞助，而且担任其出版代理人，他们成了新型的文化经理人。塔尔塔利亚②去世以后，他的威尼斯出版商刊布了他翻译的欧几里得著作。在描绘自己为这位自学成才的匠师—工程师出版译著的动机时，这位出版商说："使作者出名，使世人受益。"毫无疑问，出版商既希望赚钱，也希望为塔尔塔利亚赢得一点名气。问题是，赚钱的动机和其他动机纠缠在一起，而这些动机既是利己的又是利他的，有时甚至怀有传播福音的感情。印刷商既提高作者的名气又为自己赚钱，同时又因为人类服务而感到满足。这种动机混杂的现象进入早期印刷

① 埃德加·齐尔塞尔(Edgar Zilsel，1891—1944)，奥地利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现代科学的根源，提出著名的"齐尔塞尔论点"。

② 塔尔塔利亚(Niccolò Tartaglia，1499—1557)，意大利数学家，发现解三次方程的方法并创立了弹道学，著有《新科学》等。

业的快速发展中。受益的是各种利益，而不仅仅是经济人代表的利益。

在新型制造和营销技巧的开拓中，早期的印刷商与其他都市企业家有共同之处。但作为广告和推广、鼓动和宣传、词典学和目录学的拓荒者，他们却必须被归为一个独立的类别。他们的作坊与此前手稿书商和世俗书商的作坊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作坊里有新机器和开机器的工匠。同时，印刷商的作坊也不同于当时其他制造商的作坊，因为他们的作坊是学者、艺术家和精英的会聚之地，是外籍翻译家、移民和难民的庇护所，是高深学问的机构，是各种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的枢纽。

以上论述暗示，欧洲各地都市中心印刷所的建立很像弗朗西丝·耶茨(Fran-
23 ces Yates)描绘的另一个研究课题。(60)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多侧面的课题进行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关怀。书籍生产和流通的问题有经济史家和社会史家去研究；书籍消费的问题可能会由文化人士或媒介分析家去关心。书籍的历史一般分配给图书馆学的课程；印刷术本身分派给了技术史；而字形设计、排版和刻字却被当作设计学校传授的科目。既然这个课题被一再分割，人们难有一个总体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社会史家广博的领域也未能对早期印刷商这一新的职业文化提出充足、全面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全面评估其多方面的角色。(61)

于是，脑力劳动的不断分割(也许这是知识产业扩张难以避免的共生现象)使有兴趣遵循培根忠告的人越来越少。如果说印刷术在书籍史、西方技术史或早期资本主义史中仅仅是一笔带过，那么在其他领域，它得到的承认的篇幅就更加少。无数标准的西方哲学史、宗教史、科学史、政治经济史、史学史、文学史、美术史完全将其弃之不顾。不仅现代学科的分科越来越细，而且对物质和机械现象那种傲慢的愚昧在令人尊敬的哲学传统中根深蒂固，这两种倾向都可能有助于我们解释思想史家和文化史家对印刷术的忽视。由于这样的忽视，史学史这门学科就被削弱了。当思想脱离其传播载体时，思想与其历史情况的关系就被切断了，我们观察思想变化时就难以感知思想变化的语境了。这一点不仅是审视大多数西方哲学史或
24 文学史的重要参照，而且适用于大多数的科学史和史学史研究。(62)

从手抄书到机印书变革影响记录的方法和信息的流动。我们不可能人人都研究历史的所有侧面，思想史家最好把许多发明比如马蹬或磨粉机留给其他专家。但如果这样对待谷登堡的发明，我们就可能失去理解塑造现代思想主要力量的机会。倘若给印刷术的影响以更多的注意，史学史与其他历史联系的问题就可能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如果不考虑印刷术引发的传播革命，许多研究都可能产生牵强或尴尬的结果——将思想与社会行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努力，或者建立“知识社会学”的努力都可能受挫。大多数关于思想与社会、心态与生活条件的思考似乎都不成熟，都太抽象。对这些问题做理论概括前，难道不应该更加具体地思考，书本学习的具体形态与书籍生产和流通的具体技术

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从主题分类讲,印刷机不仅被当作一种特别的发明,而且被纳入书目学家、技术史家和其他相邻学者的研究范围。此外,从断代史来看,它还被纳入史学家专攻的15世纪这个大范畴。在断代史这个层面上,印刷术在年代表上通常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放在一起,在通史和教材里也出现在相应的章节标题下。在专心致志的学者的脑子里,它常常处在黑死病和美洲的发现之间;如此,当概览数千年历史的时候,印刷术在数不清的历史事件中的地位相对就不那么显眼了。大多数专业史学家专攻各个时期,他们更不容易停下来思考印刷术的出现,并不会比那些读导论课的学者多花一些时间。因此,印刷术可能难以引起大多数古史专家和许多中世纪专家的注意,可能也难以引起许多专攻后印刷术的历史学家的注意。结果,对手抄书过渡到机印书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探讨,一般就留给了专攻一个尚存争议的时代(抑或是一场文化运动?)的专家,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时代。(63)

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设计难以容纳印刷术的影响。其上下限太狭隘,其重点通常太专注意大利,不可能对印刷术这个课题给予公正的对待。16世纪初,对谷登堡发明天才的礼赞来自于德意志人,他们试图抵消意大利文人文化居高临下的宣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重申意大利人的宣示,他们更可能强调早期人文主义的出现,而不是稍后印刷机产生的基础。此外,早期复制的机印书依靠手抄书的存货;在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百年里产生的书籍文化和过去的手抄书文化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你越细察这个时期的初期机印本,印刷术带来的变化就越是不可能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要看清这一历史变迁的文化传播过程,你就必须要采用广角、长焦的观点,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普遍采用这样的观点。追踪单一地区14世纪和15世纪一连串发明的学者没有理由对印刷商和抄书人的差别大做文章。相反,彼特拉克①发动的文化运动就可能会给他们留下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印象。在他们想到的事物图式里,谷登堡的发明可能推动了业已存在的趋势(比如普及富有人情味的手写体),但印刷术的出现不能够被当作一个文化分界点。在他们的排序里,印刷术太靠后,排在近代欧洲头生子的降临之后,这些先驱已经按响了中世纪谢幕的铃声。

自布尔克哈特②以来,这个观点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常规,不同意见的学者无

---

①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著有《爱情诗集》、史诗《非洲》、《我的秘密》等。

② 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文化艺术史家,强调研究文化艺术对认识历史的重大作用,著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等。

力回天。新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每年都在强化这个观点。虽然早期的历史哲学家比如孔多塞[①]认为印刷术是划时代的事件，并据此断代，然而当前大多数的断代法却把印刷术流放到边陲之地，于是，印刷术就进入了一个界限不明的过渡时代的中间点。这个假设的时代的特征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印刷术的影响受到的关注比较少。在一般的书里，靠前的章节常常并不论及谷登堡的发明，直到文艺复兴
26 的末尾才提一提印刷术。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转变则不置一词。初期机印本时期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不引人注目，印刷术这个课题被分派到文艺复兴那些驳杂的子目下了。(64)

当印刷术这一发明比较准确地被放进 15 世纪时，它总是被漫不经心地一带而过，即使不是被当作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也是被当作同时并进的发展中偶发的一个事例而已；而且其目的在于显示世俗文人群体的扩张，或证明中世纪晚期的技术进步，或旨在探讨扩散理论和西方对远东技术的引进。(65) 当代专攻早期近代欧洲史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②]把印刷术置于一个从属地位，放在大炮和航海之间，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它不再居于培根挑选的三大改变世界的发明之首。相反，它“以同等的身份位于欧洲的倒退思想和进步思想之间”，“既加速手抄书掀起的潮流”，又“为数学的缓慢发展承担责任……”布罗代尔认为：“唯独航海造成了世界的巨变和非对称发展。”(66) 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希望本书读者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乔治·萨尔顿[③]把活字印刷描绘为“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发明”，并在一篇论文艺复兴的论文中简略地阐述了印刷术的一些影响。(67) 米隆·吉尔莫[④]也在他
27 为“现代欧洲的崛起”丛书撰写的书里用几个段落的篇幅对印刷术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当我们考虑专家对初期机印本之后历史时期所做的论述时，文艺复兴学者吉尔莫的论述看上去非常有远见：

> 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发展给西方文明中的思想生活带来了极其急遽的变

---

①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大革命时期立法会议中的吉伦特派，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论》等。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等概念，代表作有《15 世纪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文明史纲》等。

③ 乔治·萨尔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比利时裔美国学者、科学史家、科学史之父，出版国际性科学史季刊《爱西斯》和《奥西里斯》，主持这两个刊物直至去世，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代表作有《科学史引论》(3 卷)、《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和《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等。

④ 米隆·吉尔莫(Myron Gilmore，？—1978)，美国史学家，创建“文艺复兴研究会”，著有《人文主义世界》、《人文主义者与法理学者》等。

革，为教育和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迟早将感觉到印刷术的影响。(68)

虽然他点明了印刷术引起的反响，但这本书的年代上下限使他未能详细描绘这样的反响。我们本来指望，这套丛书的稍后几卷能够更加充分地描绘印刷术的影响，因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终将感到其影响，但这些书并未明确阐述这样的影响。16 世纪初，这场变革正在进行，且刚开始聚集声势，但学者们对其的探讨却突然中断，这一倾向典型而不幸。研究初期机印本之后几百年历史的专家把印刷术贬到边缘和次要的范畴。

在广袤的社会史无定形的园地里，一些作者的专著丰富了边缘的地区，它们研究书籍贸易、赞助与审查、畅销书、文学、新闻、教育、公共舆论和宣传分析，还有一些著作研究不同地区印刷业的内部组织。现有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然而除了偶尔提及 18 世纪“读者”的“兴起”、19 世纪“报业”和“公共舆论”的角色以外，你可以断言，印刷术引起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随着最后一张宗教改革的大单而逐渐消亡了。在印刷术的诸多影响中，大多数欧洲近代史学者唯一熟悉的恐怕就是为传播新教思想所需要的新型印刷机。正如其他运动留下的文字记述一样，在宗教改革的记述里，印刷术的影响往往被腰斩：仅限于“传播”思想一个功能。当《圣经》的传统文献付印以后，教士们就遭遇到新的问题；印刷术尚未广泛传播新教时，它就 28
已经使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了。这些问题都是尚未探索却可以探索的问题。(69) 总之，一旦宗教改革完结、新教的传播完成，印刷商和出版商的活动似乎就不再值得注意，历史的聚光灯就集中在后来似乎更加重要的发展动态上了。

在后宗教改革史学家的著作里，新传播系统产生的影响不见踪影，这种现象非常引人注目。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思想政治革命不是被放进后印刷术的语境，而是被放进前工业化社会里。比如，在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搭建舞台时，17 世纪的传播成为经常探讨的课题。读者被告知的是邮件系统的兴起、运河等运输系统的兴建。然而，17 世纪前的手绘图表和地图被机印图表和地图取代的历史事实却可能被略而不提。学者手写书信的日益趋同常常成为突出研究的重点，指向分散读者的那种更加新颖的“公开信”的出现却往往被忽视。科学人才的分布成为经常考察的对象，科学出版途径的分布却很少有人探索。(70)

为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或政治革命提供基础的研究工作，也是这样的情况。(71) 在解释这些革命时，与贸易路线和价格、土地的利用和收成、特权群体和阶 29
级的变革相关的讨论真可谓连篇累牍。而影响地图、图表、法律书籍和参考书籍、年历和条约、法案和请愿书如何复制的变革却很罕见。中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的角色总是与货币经济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然而文人的兴起和知识分子的角色却

很难得与印刷机日益增长的威力联系起来。商业革命的影响如雷贯耳，传播革命的影响却听不见一点声息。(72)

就像技术史的文献日益增多一样，有关“工业革命”的历史悠久的文献也攀得越来越高，这一事实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培根认为最重要的印刷术发明不再引人注目。比如在一般著作里，影响纺织生产和棉布贸易的变革比较突出。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不仅纺织印染走在书籍印刷之前，而且纺织业还进入了碎布造纸的工艺，并因此而为印刷机的使用铺路。尽管如此，凸版印刷对信息流动的影响还是比纺织厂或造纸厂的影响更加直接。

一篇书评告诉我们，信息流动是制度革新中被人忽视的重要领域；经济史家由于忽视信息流动而受到损害，当他们关注商业扩张和经济增长理论时尤其身处险境。(73)但文章止步不前，没有就印刷术如何影响经济信息交换的问题提出意见。在近代早期，印刷业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尚待我们探索。大多数经济史概论从中世纪后期跳到近代早期，并不说明印刷术的出现可能会对工商业产生影响，尤其不说明印刷术如何影响广告方法、保险计划和股市报告。在论述印刷术出现前两百年的变革时，影响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的变革太多，所以继后的继续革命阶段不可能全都注意；继后的变革诸如新型造纸厂的出现、铁器和蒸汽用于生产印刷品太多，所以印刷术的出现本身就只能一带而过。继后三百年里的变革密集成一团，印刷术最早的阶段就被遮蔽了。于是，印刷术的出现没有被当作自成一体的事件来研究和检查，而仅仅是被当作后来大批量生产技术的先兆。印刷术和采矿业及造船业并列，而不是与指南针及火药并列，经济史家给予印刷术先行者的地位，于是，它被认为是后来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先兆。

印刷术仅仅是众多发明之一，所以这种“神奇的艺术”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作为造成近代早期的一个革命进程，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转变被后来的变革遮蔽了，在历史分期的各种图式里，它往往被放进一个封闭的章节。尽管如此，史学家还是有精良的装备去打开这些封闭的章节。这毕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然而，本章的具体内容却像密码一样难以破解。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停留在大多数书籍给予印刷术的那个短暂的时段里，并试图仔细地审视印刷术的出现那个更加短暂的时段，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越仔细看就越不敢确信，我们想要检查的究竟是什么。谜一般的语词“金属活字”颇像消失了的柴郡猫①那淡淡的笑容，培根讴歌的前三大发明就只剩下这淡淡的一笑了。

发明的清单越来越长，专家之间的壁垒更加森严；而且，我们对“发明与发现”

① 柴郡猫(Cheshire cat)，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猫，她慢慢淡出并消失前总是咧嘴笑。

的分析也日益精细，以至于我们对其力度和效应的感知也比较迟钝了。我们比培根及其同时代人更加清楚，重大发明不会突然冒出来并发育成熟，不会像密涅瓦那样从朱庇特的眉头里跳出来。如今，这些发明不再被认为是单独的事件，而是复杂的社会过程了。(74)

为了说明活字印刷的使用情况，只到谷登堡作坊所在的美因兹地区去研究再也不够了，甚至你争辩说首先应该到科斯特①的印刷所所在的哈勒姆去研究也不 31
够了，检视约翰·富斯特②和彼得·舍费尔③的印刷业务亦不足以说明问题。相反，你必须要调查此前世俗文人增加的情况、手稿书贸易的情况，必须要说明早期印刷所资本的积累；或者你要尝试解释为何印刷业在15世纪后期的西欧发展得如此迅猛，而活字印刷的发明在远东却没有产生类似的结果。而且如今看来，首批印刷机不仅仅像是欧洲内外许多其他发明的终极产品了。影响各种产业、艺术和手工艺的变革都必须要考虑进去，从酿酒、制造奶酪、印玺雕刻、油画、纸牌游戏直到冶金和纺织生产等的变革都要考虑。与此前造纸厂的建立和雕版印刷一道，都经过非常仔细的研究以后，这些革新都足以将我们把印刷术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撕得粉碎。“只有长篇大论才能够说清楚什么构成了谷登堡的‘发明’。”(75)就我们为15世纪50年代绘制的事件图表而言，印刷机的定位是一个方便的抽象概念——这是把许多具体技术细节概括起来的表述，这些细节大多数被放在其他地方了。

描绘谷登堡的发明这一抽象概念的“力量和效应”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一方面，它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改变了一切。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同意，15世纪的前半叶和后半叶不能够划一条界限分明的分割线。他们一致同意这样的判断：“活字的使用或者活字用于机印书引起的革命并不是书籍的生产。事实上，起初的机印书和手抄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76)然而，他们几乎又都赞同，谷登堡“‘互换零件的理论’引进欧洲，比其在工业生产中的普及几乎要早三百年，这一机制是一切现代大批量生产的基础”(77)。也许，15世纪后半叶与过去之间的确应该划一条分界线。到1480年，用金属活字的印刷工和用羽毛笔抄书的誊写人产生的效应显示出根本的不同……结果是操作阳模雕刻机 32
的工人战胜抄书人，随之而来的是正宗书籍替代模仿手稿的书籍。(78)最后，连思想先进的许多人也回头求助于神话：“一次又一次，历史学家得到很深刻的印象……谷登堡工艺的衍生物一蹦出来就很成熟，宛若从宙斯额头蹦出来的雅典娜就全副

---

① 科斯特(J. Coster，约1370—1440?)，荷兰印刷商，据说他是谷登堡的竞争者。

② 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约1400—1466)，德国早期印刷商，首创套色印刷，刊布《圣经》、《祷告诗篇集》。

③ 彼得·舍费尔(Peter Schoeffer，约1425—1503)，德国早期印刷商，富斯特的女婿。

武装一样。”(79)

以上引文显示，不调整视角就难以看清印刷术出现的意义。这里的调整就是同时借助两种难以兼容的变化模式：一是渐进和演化的模式，二是突变和革命的模式。有一些论点颇有说服力，认为谷登堡的发明只不过是一个继续不断展开的过程里的一部分而已，论者（如费弗尔与马丹）笔下的谷登堡的发明只不过是一个大“团队”变化里的一个成分。于是，活字的发明和应用就可以被认为是此前一系列发展变化的副产品；那些变革包括世俗文化素养的扩散，这个因素反过来为后续的发展比如近代大众读写能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初期机印本的时代里，印刷商和抄书人模仿彼此的产品，为相同的市场复制相同的文本。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脑子里，“手抄书和活字印刷书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80)。至少在这一变化之后的 50 年里，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文化变迁；谷登堡的发明过了整整一百年，新世界图像的轮廓才开始进入人们的眼帘。

根据以上诸种考虑，赞同渐进式演化路径似乎有道理。但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认为，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变化本身是一个大“团队”的变化；还有理由将两种人才的调动及其作用进行对比：一种人是抄书人和书商，另一种人是早期的印刷商。各种研究证明，需要发挥想象力才能够弥合抄书人时代和印刷商时代的鸿沟。(81)但你首先得承认这条鸿沟，然后才能够弥合这条鸿沟。反过来，承认这条鸿沟就意味着，你要解释非连续的观点。所以，认为初期机印本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也是有道理的，认为印刷术的出现揭开了西方历史新文化时期的大幕也是有说
33 服力的。

在当前的文献里，很多人不太愿意采纳第二条思路，比较容易接受第一条思路。(82)凡是可能的地方，非连续的情况都被掩饰起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并没有得到充分阐述，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中隐含的命题总是被略而不论。然而与此同时，演化性渐进主义的主题也是断断续续的，并非是始终如一的。实际上，即使有一定的模式，读者也不得不到字里行间去猜想作者采用的模式。文字传达的解释迂回曲折、闪烁其词。难得一见的问题提出来时，做出的回答也是游移不定的。

> 从手稿到印刷的道路既连续又断裂，我斗胆说，在一切伟大的发明、一切所谓的新运动里，都包含反差极大的成分，都存在连续性和激进的变革。这种二分现象和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宗教改革……原子裂变……如影随形。雅各布认为，15 世纪是“新旧混杂、令人称奇的世纪……”，这句话有道理。
>
> 鲁道夫·希尔施的描绘符合 15 世纪书籍的情况。旧成分未变，其他成分

有所变化，新技术得到开发，书籍使用的情况随之而变。

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一个既连续又断裂的矛盾的线性模式，很适合复制旧产品的新工艺的结果那种奇怪的性质。印刷术初期产生的变革并没有粉碎传统的“线性”序列模式，这一模式遭遇的困难毫无疑问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如果考虑人文主义、资本主义或原子裂变等各种发展变化，走向印刷术的过渡时期产生的特别问题就有可能变得模糊。当我们得知一切运动既有连续成分又有急遽变革，一个世纪是新旧成分的混合体时，我们又可能会感到失望。提醒我们注意永恒的真理固然有道理，但这未必有助于我们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最后，那样的文字只不过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之偏离广泛的隐蔽问题，从而指向范围有限的问 34
题。一般读者退到后场，爱书人走到前台。在以上引文之后的几个段落里，鲁道夫·希尔施讨论印刷术对 15 世纪书籍的影响，而不是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即使在这个收缩以后的狭小课题上，作者调动其特殊的才干进行研究时，他的研究路径也是不确定的，印刷术引起的变化究竟是突变还是渐变，重大还是微小？——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费弗尔和马丹进行了更加雄心勃勃、视野广阔的历史综合，所以类似的模糊和不确定的研究路径也是他们这本书的特征。该书题名《书籍的出现》，书名本身就显示：他们未能抓住要害。本来它研究的是“机印书的出现”（马塞尔·托马斯[Marcel Thomas]在序言的第一页就点明了这一宗旨），然而书名却漏掉了这个意思。不知情的读者搞不清书籍的出现究竟在什么年代。知识渊博的读者禁不住要问：为何不把印刷术清楚地作为主题推出来，而是把书籍作为研究的主题？两位作者转弯抹角的态度把每一次文化蜕变的重大主题都笼罩得严严实实。在前言里，费弗尔强调谷登堡的发明应该放进一大群变革里去观看，把手抄书向机印书的转变描绘成以后更大变革的序幕。第一章讲此前纸张的出现，追寻一个演进的模式，描绘手抄书生产的增长和世俗阅读公众人数的增加。在后续的各章里，同一模式反复出现，手抄书和初期机印书的分界线被搞得模糊不清，作者强调的是，以后三百年里书籍生产缺乏重要的技术改进。[84] 作者还告诉我们，新型印刷机复制手抄书使效率更高，但“在加速新理论的吸纳、新知识的接受方面毫无建树”，反而促成了文化的惰性。[85] 不过，在散见于各章的文字里，本书的成就值得肯定：“印刷业‘迅速实现了近代化’”；早在 15 世纪 80 年代，“中世纪”作坊就变成了“近代工厂”； 35
在初期机印本时代，急遽增加的书籍产量就在欧洲产生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知识界；16 世纪中叶的印刷商对吸引最大多数购书者的关切被描绘成走向“大众文化”的重要一步；在 16 世纪的路德派地区，“针对每个人，人人能获取”这个目标已然实现了。[86]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散见的文字暗示令人惊叹的快速近代化和“思想躁动”，但它们总体上与该书的主旨不协调。作者倾向于贬低这些非连续的、革命性的变化的隐含意义，强调的是渐进和连续的主题；他们似乎顺从根深蒂固的历史常规。卡尔·斯蒂芬森(Carl Stephenson)讲到印刷机时说：“历史学家发现，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并非突然发生的革新，而是一个渐进的转移。”[87] 丹尼斯·海伊(Denys Hay)仿佛是在为整个史学界代言，一方面他注意到这一事件异乎寻常的性质，另一方面他又告诫人们不要将印刷术的影响过分戏剧化。

> 有些发明……过了数百年的时间才被广泛接受，更多的发明用的时间更久。印刷术在美因兹如火如荼、快速传播，到15世纪90年代，每一州都有了一个重要的出版中心，有些州还不止一个中心……
>
> 这一变革之迅速，怎么说也不会夸大。但夸大其影响却是太容易了……[88]

一般人容易忽视手写书生产的发展，容易低估印刷术之前世俗界文化的传播，也容易高估印刷术之后文化的快速普及，所以提出这样的告诫似乎是必要的。不过，虽然海伊的一部分读者也许需要听到这样的告诫，但他的大多数学术界同行却没有这样的需要。如果有什么倾向的话，他们更可能低估印刷术带来的变化，而不是过高估计这样的变化。

36 夸大印刷术初期的重要意义是危险的，当前的学术文献里已经对此做了充分的强调。现在需要唤起人们关切的是相反的危险——把演进模式强加于革命情景上的危险。为了具体说明这个观点，让我借用一家图书馆杂志1975年刊载的一篇文章。[89] 作者西尼尔(Paul Saenger)旨在重申演进式主题，驳斥我在本书形成阶段的观点。文章开头就告诫我们防止一种诱惑：“把印刷术对宗教改革明显的影响投射到印刷术对15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影响。”然后他介绍布鲁日一位由抄书改行从事机印书生产的出版人科拉德·曼逊(Colard Mansion)，为了满足赞助他的勃艮第贵族的需要，这位印刷商用手抄形式出版的书籍似乎和用机器印制的书籍一样多。

> 曼逊出版的同一版本机印书从来就不比他出版的手抄书多……布鲁日当时的情况是，机印书并不能担保拥有更多的读者。曼逊版次最大的机印书勉勉强强能够与同一版本的手抄书册数相当。他每一版的机印书通常只有四五个副本，而同一版本的手抄书则往往有20多个副本。[90]

西尼尔证明，作为印刷商的科拉德·曼逊和作为抄书人的科拉德·曼逊出版的书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差别不大，这就证明了他主张的演进性命题，他为此而感到

满意。然而，这位服务于布鲁日赞助人的印刷商未能利用新印刷机复制书的功能仅仅是一个孤例，我们不能因此而假定，设备的潜力在欧洲其他地方没有被利用。我们姑且把以下疑问搁置一边：将手抄书“版本”和机印书版本做比较的有效性；版本“通常”印数的有效性；“正常”发行量的有效性；接受作者估计的表面价值的有效性。四五册当然是一个“颇小的”数字，不仅和手抄书的许多副本比较是小数字，而且更加突出的是，如果和前宗教改革机印书每版的册数比较更是一个小数字。(91) 37
“从布鲁日的情况看”，印刷术“并不能担保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布鲁日并不是当时重要的印刷中心。实际上，科拉德·曼逊本人之所以能在印刷史上留名主要是因为他和威廉·卡克斯顿①的关系。(92) 此前，布鲁日曾经是精美手稿书的生产中心。印刷术出现后，作为欧洲大陆书籍生产的中心，布鲁日的地位则不值一提。印刷机在各地分散布局的情况并没有改变书籍贸易的模式。一千五百年前，新的生产和交易中心就已经涌现出来了。

如此看来，如果说前宗教改革的印刷术丝毫没有改变欧洲的书籍生产，这样的判断是不太谨慎的。

> 到16世纪初，印刷机复制和发行的印数很大的书籍显然超过了抄书房的能力。由于书籍的数量增加、成本降低，印刷术对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文明产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影响。然而，16世纪使印刷术变得重要的因素在科拉德·曼逊在世的年代里根本就不存在，那时的印刷术只不过是抄书房的辅助，而不是其竞争者……(93)

最近一位权威认为，曼逊印行奥维德②豪华版的花费毁了他，1484年，他被迫逃离布鲁日躲债，从此“渺无音讯”(94)。这说明，曼逊未能使自己的业务适应印刷 38
术提出的新要求，他对豪华版、小印数的偏爱不容易和早期成功的印刷机协调。由此可见，认为印刷术是手抄书生产手段的辅助而不是竞争者的观点得不到证实，即使曼逊这个非典型的例子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无论曼逊这个例子多么不典型，它还是提醒我们：谷登堡的发明本身足以解释15世纪的传播革命。曼逊通常推出的小印数版本正好凸显这样一个必要性：我们要考虑促进或阻碍新型印刷机普及和充分利用的多种因素。但如果说使印刷术重要的因素“在科拉德·曼逊在世期间一个也不存在”，那却是公然违背明显事实的过度概括。肆意夸张名不见经传的曼逊，同时又怠慢他著名的同事威廉·卡克斯顿，这似乎是乖谬的精心盘

---

① 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2？—1491)，英国印刷商、翻译家，于1476年创办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出版第一部英文百科全书《世界镜鉴》，译书24种。

② 奥维德(Ovid，前43年—公元17年)，罗马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岁时记》等。

算，意在扭曲历史的视角。

正如该例所示，研究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变革时，坚持渐进的、演进性变化的观点未必是谨慎的，甚至可能是轻率的。权威学者很少像上述文章作者那样明确拒绝接受这个变革的革命模式。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学者们更容易在理解变革方面犯错误，而不是在夸张中犯错误。正如上文所示，他们常常倚重规避的策略，为了保险干脆就不触及这个课题。

不过这里的情况再次表明，求保险未必是真正的保险，因为这样的态度使不够水平的判断抢占先机。史学家们容易过分谨慎，反而使其他人过分大胆。谨慎的学者回避问题，他们的缺席反而会使这个课题落入粗心者的手里。15 世纪的“媒介革命”对各个领域的先锋派（比如传播理论、媒介分析之类）也是有趣的课题；考
39 察当前景观但不注意过去景色的人也对这个课题感兴趣。(95) 然而，如果这些非历史类的学者试图赤手空拳穿越这 500 年发展阶段并不平衡的历史，他们几乎肯定会误入歧途。他们可能会急躁，可能会在没有指导方针的情况下独闯未知领域去寻求捷径，这一点不足为奇。

在《谷登堡星汉》里，马歇尔·麦克卢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试图用简单（却不优雅）的办法，完全摆脱历史纪年的顺序和历史语境。他似乎不关心比例和视角的保存，反而急躁地将这一切关怀搁置一边。五百年间逐步展开的发展变化，影响不同地区，在不同的时段里渗透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发展变化，被随意地混杂这一起，且被当作单一的事件——也许被描绘成“发生的事情”（happening）最恰当吧。

有些批评者和麦克卢汉本人都说，这种资料混杂、不顾时间序列的安排是刻意为之。《时代杂志文学副刊》告诉我们，《谷登堡星汉》是一本“风格异常的书”（anti-book）。作者着手颠覆“传统的哲学—历史论辩”，它劝告读者说：“书籍是语音单位的线性展开，由活字复制，不应该再受人信赖。”(96) 在这一点上，《时代杂志文学副刊》（或《谷登堡星汉》）的读者似乎并不需要多少忠告。他们很少信赖书籍本身；大多数人接受的训练都是对书籍持谨慎的态度，读到争论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不相信论证不扎实的论点（无论其形式如何）。

麦克卢汉将一切事件做“非线性”呈现，这一方式并没有激发读者对其论点的信赖。他自圆其说的手法只能增加读者不信赖的感觉。除了采纳马赛克拼图和新媒介之外，他还借助现代物理学的“场论”。他的训练并非电磁理论，而是文学和哲学，他细密的研究对象并非爱因斯坦，而是詹姆斯·乔伊斯①；这样的训练似乎最

---

①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善用意识流手法，著有《尤利西斯》、《芬尼根的觉醒》、《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

能够解释他的论点。通晓现代文学批评的人往往有一个预设的倾向：抗拒按时序展开的叙事，且不顾其他先锋派的潮流。对世俗时序的忽视还有一些令人尊敬的 40
宗教先例。天主教神学对理解媒介的影响可能会超过 20 世纪物理学的影响。(97)自相矛盾的是，《谷登堡星汉》还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历史学派得到启示。不仅年鉴学派对常规叙事历史的批评而且吕西安·费弗尔的一个特别命题都进入了麦克卢汉的解说；从“耳朵时代”转向“眼睛时代”。(98)但年鉴学派的目的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摈弃常规的叙事形式，费弗尔之所以重构先辈的心理经验，是为了丰富和深化对历史的理解。无论麦克卢汉的目的何在，丰富和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肯定不是他的目的。

倘若麦克卢汉真的着手颠覆传统的历史论述方式，那么，他也挑选了一个不合适的题目。几乎一切其他课题都比手抄书向机印书的转变更适合成为颠覆的对象。历史指针仍然不足以涵盖这一次转变。这些指针需要拓展而不是瓦解。说麦克卢汉断章取义并不是很准确，因为他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语境。已如前述，我认为他规避有条理组织素材的困难任务。他硬说条理本身已然过时，但我觉得他这个观点不令人信服。尽管如此，《谷登堡星汉》还是发挥了有用的功能，它指出了许多亟须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迄今无人问津。

或许，史学家们由于反复被人提醒这个任务的重大意义反而会感到泄气：

> 和美因兹城相联系的发明在一切人类思想与活动中造成了持续不断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累积性效应实在是太宏大，的确是难以充分地予以描绘。它对宗教、政治和产业的影响实在是一个宏大的主题，现有的史学界和目录学家都不能估计其影响，任何组合的学者都难以预料其影响。(99) 41

钻研一个对当代学者或后来学者都难以评估的“太浩繁”的课题时，其前景足以吓到任何一位胆略过人的学者。然而，倘若任何单个学者都难以对付这种浩繁的课题，那么任何学者也难以规避这样的课题。由于其领域几乎无限，这场“继续不断的革命”的累积性效应必然会影响到一切研究领域，甚至包括高度专门化的领域。因此，个体的专家无论多么小心和谨慎，或早或迟都不得不去对付它。我们必须对重大变革的影响进行评估，无论我们承认这些影响与否。它们必然以这样那样的面目进入我们的记述，对付它们的最好的办法是不让它们偷偷地溜进来而不被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发出了足够的警示。我们不必再提醒史学家们遵循培根的忠告的种种困难。不过，克服这些困难的重要意义倒是需要强调的。虽然这个任务永远都难以完成，但我们至少应该开始承担这一任务。 42

第二章
对初始的转变进行界定:印刷文化的部分特征

我们应该注意发明的力量、效应和结果。古人闻所未闻的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最引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格言第 129 条

阐述为何应该遵循培根的忠告或许助益不大,倒是尝试遵循其忠告更为有用。显然,这一任务绝非任何个人力所能及。它需要许多才俊协同努力,需要卷帙浩繁的著述予以阐述。只要这个课题对不同领域的相关性仍然朦胧不清,多学科合作就难以达成。在难以找到求助对象的情况下,提出初步假设似乎是必需的,我们将对手抄书到机印书的变革与重大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

反过来,这个任务似乎需要某种非常规的出发点,需要重新表述培根的忠告。我们不试图对某一种后古典时代的发明单独进行研究,因为它与其他发明是一起的,我们将关注一场重大的变革,它涉及大量丛生的变化。我认为,因为何谓印刷术的出现难以断定,所以对其后果的关注就难以发声,追寻其结果就更加困难。很难发现 15 世纪 50 年代美因兹地区的一家作坊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追寻其他问题时,绕开如此问题丛生的重大变革似乎是明智的选择。这样的追寻不适用于新职业群体的出现;这些人在新型的作坊里采用新技术,安装新设备,拓展贸易网络,寻求新市场,以便从销售中获取更多利润。15 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各地都没有印刷所,然而到 1500 年,每一个重要的都市中心都有印刷所了。印刷所给数以百计的城镇增加了一个新的文化元素。[1] 研究其他问题时绕开上述情况似乎并非谨慎的态度。因此,我将跳过新印刷工艺如何用活字完善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在解释谷登堡发明的浩如烟海的文献里踟蹰。[2] 相反,我将在许多人研究停止的地方起步,时间定在首批标明出版日期的书籍问世之后,即谷登堡的直接后继者开始工作的

43

时候。

所谓印刷术出现的时期指的是印刷机在莱茵河之外的地区已然扎根的时期，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与初期机印本时期同时。[3]对这一起点的研究少之又少，所以尚无约定俗成的统一名称。你可以说这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可以称之为书籍革命、媒介革命，或简单而明确地称之为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变革。威尔·杜兰特①称之为“印刷革命”。我则认为“传播革命”最适合本书宗旨，因为它可以很好地和业已扎根的“商业革命”并举，而且它指明了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历史向度。无论用什么称谓，它都应该涵盖一大批相对同时、密切联系的丛生的变革，每一种变革需要更仔细的研究和更清楚的表述。以下快速的勾勒就可以表明其内涵。

44

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书籍的产量显著增加，书籍生产所需的工时急遽减少。目前的一个倾向是认为，在印刷术出现以后的第一个世纪里，书籍产量稳步增长。于是，一个渐进模式就被用于需要用革命模式表述的情景。

> 韦斯巴西亚诺②生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1453年，50岁回顾生平时他会发现，这50年一共印行了800万册书，也许比君士坦丁皇帝于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以来全体欧洲抄书人完成的手抄书的总和还要多。[4]

“全体欧洲抄书人”实际的书籍产量必然是有争议的问题。姑且不论如何估计未经编目的书籍和被毁的书籍，连当代的证据也必须谨慎对待，因为这些证据常常产生错误的线索，导致书籍总量的错误估计。[5]被当作一本书的物件常常含有数量不等的成分，这就使手抄书时代的量化遇到困难。说到手抄书花费的工时的计算时，也有类似的困难。韦斯巴西亚诺曾经为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巴迪亚图书馆誊写200册书，过去的估计以45位抄书人需要几个月为计算单位，近年的深入研究使这样的计算方法一文不值。[6]

由此可见，“全体欧洲抄书人”自从330年或1400年生产的书籍总量可能是难以确定的。不过，作一些比较还是可能的。结果证明，印刷术的产量和此前手抄书的产量形成强烈的反差。“1483年，利珀里(Ripoli)印刷所排印菲奇诺(Guillaume Ficino)翻译的柏拉图的《对话录》，其收费标准是每5张书帖收3个意大利弗罗林③。另一位印刷商在同样的情况下却可能只收1个意大利弗罗林。利珀里印刷

45

---

①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哲学家和历史故事畅销书作家，著有《哲学的故事》、《文明的故事》(10卷)，其中的第十卷《卢梭与革命》获普利策奖。

② 韦斯巴西亚诺(Vespasiano di Bisticci，1453—?)，15世纪佛罗伦萨书商，参与建成三座著名图书馆，著有《插图艺术的生命力》等。

③ 弗罗林(florin)，最先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制造的金币，后来荷兰、英国等也铸造这样的金币。

所出版了1023册书，而抄书人却只能抄完一册书。”[7]鉴于这样的比较，“相同副本的批量复制”只不过是受到印刷机的“强化”的结果。这种言论似乎是受了误导。[8]毫无疑问，手抄复制帝王诏书或教皇敕令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9]13世纪时，刚编完的《圣经》就复制出了相当多的副本供学者使用，所以有人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说巴黎出版的某一种手抄书可以叫做“版本”。然而，13世纪完成任何一个“版本”绝非轻而易举之功。我们不妨把13世纪“版本”的手抄《圣经》与谷登堡和路德之间的半个世纪里印数庞大的《圣经》作一比较。[10]况且，抄书人复制诏书或生产全套版本的《圣经》时，他们就不能从事其他的任务了。

许多珍稀本幸免于亡佚；但无数的书未能存世。书籍的保存常常依赖读书人兴趣来时为自己抄书的举动。鉴于“孤本”复制和异本积累的情况，如果再说复制
46 “完全相同的副本”，那就令人生疑了。考虑技术文献的复制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即使为重要文献制作一份“完全相同的”的副本，那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你不敢信赖任何雇用的人员。文人不得不像奴隶一样“依样画葫芦”，一丝不苟地照抄那些表格、示意图和陌生的术语。全套天文学星表的出版并没有“强化”以前的趋势，而是颠倒了以前的趋势，使人有更多时间去观察和研究。[11]

应该指出，此前纸张的引进并未产生任何“相似的”效应，“手抄书正规贸易的组织”也没有产生任何“相似的”效应。[12]造纸服务于商人、官僚、布道者和文人；造纸加快了通信的步伐，使文人可以为自己抄书。然而，因为抄写一本书所需工时不变，书籍生产的增加就很缓慢，所以副本生产的效率还是没有规律。书商经营的书店成倍增长，以适应人们对图表、记录本、单张等文具的需要。[13]除了出售书写材料、教材和装订材料之外，有些书商还提供其他服务，协助顾客搜寻珍稀古本。他们接受委托制作副本，留一些放在店里出售，但他们从事书籍贸易仅仅是偶尔为之，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正规。

> 虽然一般书商专营某一方面的业务，但他们的活动还是多种多样的。最常干的活计恐怕是制作并出售供印制和装订书籍的材料。有些书商兼做插图或雇人做插图……抄书人多半还有其他的职业（常常是公证人或牧师），他们似乎在家里或自己的店铺里工作，接受委托订货……有些书商尤其那些专营
> 47 供印制和装订书籍材料的人，对手抄书的生产和销售很少感兴趣或根本就没有兴趣，后来对机印书包括新书或二手书都不感兴趣……[14]

佛罗伦萨最著名的书商韦斯巴西亚诺为高级教士和王公服务，“竭尽一切可能”吸引顾客促销，但那是零售业务，绝不可能成为大批量的业务。虽然他的促销策略富有进攻性，能够满足顾客的胃口，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从交易中“赚了多少钱”[15]。不过，他的确争取到了一些著名的赞助人，被誉为“出版王子”。他的书店

受到人文主义诗人的赞扬，与稍后的谷登堡和奥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①]受到的赞誉相当。[16]也许，他身后的名气更值得注意，那是在19世纪他的回忆录出版并且被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引用之后才姗姗来迟的名气。韦斯巴西亚诺印行的《名人传》提到乌尔比诺公爵(Duke of Urbino)藏书室里装帧漂亮的手抄书，他谄媚地暗示，机印书与其并置会"自惭形秽"。这位书商非典型的、显然带有偏见的说法被人夸大了，导致许多文艺复兴盛期人文主义者对通俗拉丁语机印书的鄙视，他们贬低机印书的评述显然起到误导人的作用。于是，1973年在摩根图书馆举行的"机印书的艺术"的展览会上，介绍词居然断言，美第奇家族[②]"认为，新出现的机印书是退化，不允许这些书进入自己的馆藏"[17]。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这个错误被机印本放大了："美第奇等佛罗伦萨的王公(原文如此)认为印刷术是堕落，他们阻止机印书进入自己神圣的手抄书藏书室。"[18]类似的扭曲全都来自布尔克哈特对韦斯巴西亚诺《名人传》的引用，这些引语在许多语境中被放大，学者的声明赶不上它们增加的速度了。[19]

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藏书家和赞助人打扮成机印书自命不凡的敌人，这样的需要有点奇怪却难以抗拒。否则，为何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竟有人经常津津乐道呢？为何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这样的故事会传到佛罗伦萨呢？实际上早在1470年，佛罗伦萨的藏书家就在从罗马搜求机印书。按照圭多巴尔多·达·蒙特菲尔特罗(Guidobaldo da Montefeltro)公爵的授意，他的乌尔比诺藏书室管理员竭力搜集机印书，然后用豪华的封套将其装帧成手抄书的样子(不知道他是否会以机印书为耻)。正是他的宫廷在1482年装备了一台印刷机。[20]出版商韦斯巴西亚诺想人非非，他难以找到王公贵族的足够支持，所以其豪华的书籍贸易难以为继。他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竞争对手扎诺比·迪·马里阿诺(Zanobi di Mariano)却能够继续营业，直至1495年去世。"扎诺比愿意销售机印书，而韦斯巴西亚诺则放弃机印书。在15世纪后期前途难测的岁月里，这就是扎诺比能够维持书籍营销的原因所在。由于韦斯巴西亚诺只销售手抄书，所以他被迫于1478年停业。"[21]

等到韦斯巴西亚诺关门大吉之后，才能说真正的书籍批发业务启动了。

谷登堡和舍费尔印完《圣经》的最后一页时，印刷所的投资人约翰·富斯特就着手印制十来部《圣经》，他想看看究竟能从他那耐心的投资里得到什么收获。他转向哪里去把他印制的《圣经》转换为金钱呢？于是，他前往欧洲最

① 奥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Aldus Manutius，1450—1515)，意大利学者、印刷商，在威尼斯创立阿尔定印刷所，刊印希腊罗马古籍，如但丁的《神曲》以及荷马、柏拉图等人的著作。

② 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意大利贵族家庭、佛罗伦萨统治者，出了三个教皇(利奥十世、克莱蒙七世和利奥十一世)，支持学术，赞助艺术。

大的大学城巴黎，在索邦神学院和其他学院里，一万余学生济济一堂。他发现什么了呢？令他失望的是，他发现一个组织严密、声势浩大的书籍贸易行会，由书商、装订工、插图师、代写书信书者与羊皮纸制造人组成的书业行会……1401 年就已经成立的行会……一位外地人携带闻所未闻的珍贵书籍在巴黎露面，使这些行会的人士感到惊慌；看到他一本又一本地售出《圣经》，他们急忙报警，找到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如此之多的珍贵书籍竟在一人之手，那肯定是得到魔鬼的帮助。富斯特急忙逃命，否则他的第一次巴黎之行将遭遇可
49 怕的焚毁之祸。(22)

以上故事和把富斯特与浮士德联系起来的传说也许如出一辙。(23)这个故事描绘的敌对反应不应该被当成是典型的现象，许多早期的记载里最坏的反应也就是爱恨交织的态度而已。(24)经常讲起的故事常常把印刷术与神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与魔力联系在一起。不过，大家最熟悉的话还是来自于图书的推荐广告和序言，而序言往往是由印刷商或编辑撰写的，或者是由作者本人撰写的，而作者又常常受雇于印刷所。(25)和行会人相比，这些人更倾向于从好的方面去看印刷术，因为行会人谋生靠的是手抄书。虽然在这场博弈中，巴黎的书商们还算是走在前头的，但他们还是感到惊诧；直到富斯特去世以后，手抄书的价值才开始下降。(26)行会的其他成员未能预料，印刷商创办首批印刷所以后，大多数装订工、套印红色标题的人、插图师和美术字工比以前更忙了。(27)无论印刷术这
50 个新工艺被认为是祸还是福，无论它是托付给了魔鬼还是归功于上帝，起初书籍产量的剧增的确使人惊叹，使人觉得其中必定有超自然力的干预。连怀疑产量剧增的现代学者也感到不安，他们试图计算，要多少牛皮才能够印制谷登堡版本的《圣经》。(28)其实，学者们达成共识并不太难：15 世纪下半叶，书籍的产量是陡增而不是渐增。

当考虑的对象从量转向质时，怀疑态度的克服就难得多了。如果你将同一文本的晚期手抄书和早期机印书各一本并排放在一起看，你就可能怀疑有任何变化发生，突兀或革命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

> 彼得·舍费尔印制的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一本曾经出版过的手抄书……决定用什么字钉、挑选首字母和红色标题、决定页面宽幅与行距、谋划页边和天头地脚……他要复制的手抄书把一切都为他规定好了。(29)

不仅早期印刷商试图尽量依样画葫芦地复制手抄书，而且 15 世纪的抄书人也抄写机印书。正如寇特·比勒所示，15 世纪后期大量的手抄书也是按照早期的机印书抄写的。(30)所以，即使印刷商告别了手抄书的常规，并采用印刷所固有的新特征之后，手抄书和机印书仍然难以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机印书的特征并不多，而这些不多的特征全都用上了。彼得·舍费尔尽量一丝不苟地复制手抄书，但事实上，作为印刷商的舍费尔和作为手抄书书商的舍费尔遵循的是不同的程序。两种产品外表几乎没有变化，但生产方式却截然不同，这就产生了上文所谓的矛盾：表面的连续性和急遽的变革相伴相生。尽 51
管如此，相反的命题也可以得到支持：我们可以强调两种生产方式的显著差异，指出 15 世纪结束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新特征。

对外表的关切必然约束抄书人的手工。他全神贯注地让同样的字母整齐地分布，对称，悦目。给排字工的嘱咐却需要截然不同的程序。为此目的，你必须要仔细审读手稿的内容并做出详细的标记。[31] 由此可见，交给印刷商的书稿必然要被新的眼光审视，这样的新眼光促使印刷商更加仔细地编辑、校勘、比对。[32]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印刷商审查稿子的结果就转移到新的方向：从忠实于抄书人的常规转向如何方便读者了。新的书籍生产方式的商业竞争激烈，促使印刷商相当快速地采用任何有助于吸引购书人的创新。[33] 1500 年之前，印刷商就已经在使用“不同字号的字钉、页头书名……脚注……目录……上标符号、参照等排字工可以利用的新手法”——这一切都是阳模雕刻机打败抄书人的胜利。[34] 书名页日益常见，这使书目和图书分类更加便利，同时又起到广告的作用。[35] 手绘的插图被更加容易 52
复制的木刻和版画取代，这一革新使“完全相同的可重复图像式表述”进入各种参考书，最终使技术文献实现革命性变化。

分散的读者能够同时看到完全相同的形象、地图和图表，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曾任大都会博物馆印刷部主任的威廉·伊文思（William Ivins）非常有力地强调这一场革命。[36] 许多制图史学家深表赞同[37]，然而，强调得过火的倾向却引起了许多专家的反对。批评者认为，可复制的形象可以回溯到古代的印章与金属钱币；相反，木刻难以完全一模一样地复制，因为重复使用之后的木刻会磨损。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既不要低估也不要高估新技术。一方面要注意，插入各种文本的木刻复制画不会走样，同时还要注意，手绘画插入数以百计的书本时难免会走样。虽然一些中世纪的插图师已经在用图样书和“印花”技术[38]，木刻和版画出现之前，完全精确地复制细部却是难以把握的。雕版和印版首次使可复制的直观图像成为可能。技艺精湛的匠师一旦有精挑细选的材料在手，在有人适当指导的情况下，连磨损的问题也可以防止了：磨损的地方可以再精细打磨；模糊的细部可以更加精细，完全可以获得令人惊叹的持久的生命力。[39]

伊文思误入歧途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印刷品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低估了印刷文本的意义。令人奇怪的是他的断语：“活字只不过是减少校对次数的办法。”他 53

反复征引的一个例子是：据小普林尼[①]记述，公元 2 世纪就有人为一本书抄写了 1000 个副本。伊文思以此为据说明，印刷术复制的能力是相对弱小的。[40]但他有所忽视：凭口授抄写时，任何两位抄书人（遑论 1000 人）都不能复制完全相同的副本。他曾经说："成套版画的历史始于活字印行的插图。"[41]但在其他地方，他倾向于将插图的命运和机印书的命运分离开来。他的表述似乎暗示，印刷品可复制的新奇效应被局限在图像表达中。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效应绝不仅限于图片，更加准确地说，绝不仅限于图像和文字。比如，数学表格也是可以转换的。对关心科学变化的学者而言，数字和公式的变化和图像或文字的变化一样重要。再者，在印刷术发明后的一百年里，许多重要的图像表达采用了各种办法：小旗、字母编号的索引和标记线，以建立图像和文本的联系。[42]把辅助性图标当作离散的单位就等于忽视了技术文献特别重要的联系，因为这些图标表现的是词语和实物的关系。

虽然雕版印刷和凸版印刷可能起源于不同的创新，可能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于是就出现这样的局面：纸牌和圣像用雕版印刷的时候，手工还在给机印书做插图），不久，这两种技法就交织在一起了。用字钉印刷的文本使用了木刻印刷的插
54 图，使插图人与抄书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43]我们考虑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转移如何影响技术文献的问题时，吸收乔治·萨尔顿的策略似乎有道理，他设想"双重的发明：用排字印文本，用雕版印图像"。[44]到 15 世纪末，字母、数字和图像在可复制的属性上都相似，我们要更重视这一历史事实。机印书使这些不同的成分以新形式相互作用，也许，这种互动比图像、数字或字母经历的变化更加重要。

思想史家发现"文字、图像和数字"的互动形式特别有趣。[45]我们还应该提醒社会史家注意不同行业的人在早期印刷作坊里的新型互动关系。准备付印的文案和插图导致书籍艺术和日常工作常规的重组。铸字、印刷等新技能引起职业的变化[46]；不仅如此，机印书的生产还将各种技艺聚集在一起。在过去的手抄书时代里，书籍的生产在各色各样人的庇护下进行。这些人有：大学城里的书商和世俗的抄书人；在特别的工作室里训练出来的插图人和微型画师；分属不同行会的金匠和皮革工；抄书房里聚集的修士和世俗的教友；在大法官法庭效命的御用文人和教皇秘书；为自己编辑布道书的牧师；为自己抄书的人文主义诗人。印刷术的出现创生了一种新型的作坊结构；产生了工作的重组，使熟练工人密切接触，促进了新形式的跨文化交流。

55 因此，早期印刷商常常是昔日的牧师或修士，他们身兼编辑和校对，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47]大学教授常常以类似编辑和校对的身份工作，所以他们与金工和

---

①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公元 61—112?），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的养子，罗马作家、执政官、总督，著有 9 卷信札。

机械工的接触加深了。其他有效的合作形式使天文学家、版画家、物理学家和画家聚集在一起，化解了过去的劳动分工，促进了大脑、眼睛和手协同工作的新形式。中世纪晚期神学、法学和医学教授使用的拉丁文概要书的出版有一个资金保障的问题，这个问题促成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富有的商人和本地的学者形成了更加密切的关系。新型的金融辛迪加为新型的印刷商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使城乡代表人物相会。(48)合作的关键人物是印刷商，一切安排围绕他转，他就是许多“世界”的桥梁。(49)他负责筹集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制定复杂的生产日程，应付罢工，估算市场销售，网罗有学问的助手。(50)他必须要和提供庇护的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客户也要有良好的关系以便确保他们委托的活计有利可图；同时他还要培养和扶持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使之能够为他带来丰厚的利润或威望。在印刷商业务兴旺、扬名显声的地方，印刷所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吸引本地的文人和知名的外域人士，成为日益扩展的学问共同体的聚会场所和信息中心。

当然，有些手抄书的经营者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就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感谢韦斯巴西亚诺，他提供的服务和印刷术出现之后奥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提供的服务有许多相似之处，上文业已对此作了介绍。然而，奥尔杜斯主持的印刷所在结构上和韦斯巴西亚诺经营的书店显然是不同的。奥尔杜斯既是早期资本家的原型人物，又是阿提库斯①及其后继者的继承人，他承担了更加广泛的角色。他在威尼斯的宅邸里汇聚三十来人，近来有人将其描绘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杂烩，既是血汗工厂，又是寄宿招待所，还是研究所”。(51)如果将早期印刷商所需的才华与以前的书商或手稿经营者进行比较，那将是非常有趣的。同样有趣的是将作为印刷商的彼得·舍费尔和作为抄书人的彼得·舍费尔的两种职业文化作一番比较。这两种文化在背景迥异的情况下运行，受到不同的压力，瞄准不同的目标。从抄书人到印刷商的转化是真正的职业生涯的突变，这一点有别于从书商到出版商的转化。舍费尔是实现这一飞跃的第一人，但到 15 世纪结束时，其他许多人已经走上了这一条道路。(52)

利曼-霍普特(Hellmut Lehmann-Haupt)论彼得·舍费尔的专著很好，由此判断，舍费尔的许多拓荒活动和一个变革关系密切，这就是从书籍零售向图书批发的过渡，他很快发起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书展。“有一段时间，图书贸易仍然在狭窄的手稿市场渠道里流通，但不久这条涓涓细流就成为滔滔大河再也控制不住了。”新的发行渠道建立了；大单张、通讯和销售目录印行了；图书沿莱茵河顺流而下，跨越易北河，西进巴黎，南达瑞士。开发市场的驱力和围堵竞争者的努力同时

56

① 阿提库斯(Atticus，前 109—前 32)，罗马骑士，崇拜伊壁鸠鲁，喜爱西塞罗并与其结为至交，整理出版西塞罗的书信，但他的其他著作散佚。

57 进行，办法是提供更好的产品，至少是印制本公司简介，宣传“可读性更强”的书籍、“更完全、更容易检索”的索引、“更仔细的校勘”和编辑。在为大主教和皇帝效命的官员的身上细心培养感情，不是将其作为潜在的藏书家或审查者，而是将其作为潜在的购书人来培养，让他们源源不断地发订单来印制法令、诏书、敕令、赎罪券、大单张和小册子。到15世纪末，舍费尔已经成为美因兹的显贵。他号令一个“地域辽阔的销售组织”，成为一座矿山的合伙人，建立了一个印刷王朝。他去世时把各种铅字留给儿子，其儿子继续经营，且将业务扩张到涵盖印制乐谱，父子两代人苦心经营舍费尔印刷所。(53)

如上所示，美因兹印刷商和巴黎抄书人之间存在许多反差。我们考虑15世纪的趋势时，需要把这一切差别明确地表现出来。许多学者已经对以下趋势做了很好的专论：图书生产中心从大学城、宫廷、巴黎别墅和修道院到商业中心的转移；新贸易网络和市场的组织；赢利的特权和垄断的新型竞争；官方强加的新的控制。(54)但我们需要强调这类变化隐含的意义，以便将其与当时的其他发展联系起来。书商、世俗的抄书人和半世俗的誊写人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竞争驱力和商业驱力，虽然其服务对象有所不同；书商为大学教授服务，世俗的抄书人受雇于托钵僧修会，半世俗的誊写人隶属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建立的社区。然而，和舍费尔及其竞争者后来的苦心经营相比，这些人难以望其项背；舍费尔之类的印刷商千方百计回笼启动的投资、偿还债务、用掉堆积成山的纸张、让印刷工人不至于失业。和印刷商不一样，手抄书经营者不必担心机器的闲置或工人的罢工。实际上有人指出，安装在
58 修道院里或附属于某一教派的一台印刷机就足以构成动荡不安的源头，会带来“许多金钱和财产方面的烦恼”，这些烦恼侵占以前用于静思和善事的空间。考虑到15世纪后期若干地方发生过这样的动荡，影响中世纪晚期宗教生活的这种变革似乎就更值得我们注意。(55)

我们还需要听取更多关于和图书印刷伴生的小印件的情况。小印件的承印很容易适应商业广告、官方宣传、分离主义的鼓动和官方文牍，过去的手抄书工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56)“avertissement”一词经历了饶有趣味的变化。在低地国家，中世纪的抄书房认为在宗教节日里抄书特别神圣。如果首页标明该书是在宗教节日抄写的，这个警示（或“广告”）就表示，这种书是非卖品。(57)当然，这样的警示可以被解释为手稿贸易商业化的标志。抄书不限于表达爱上帝，除了宗教节日外其余时间都可以抄书。而且，这种“广告”奏响了一个迥然不同、不肆声张的商业主题，这和印刷机牢牢扎根以后的广告是不一样的。

早期的印刷商不得不为自己宣传，他们印行书目、通讯和大单张。他们将公司的名字、徽标和地址印在首页上。实际上，他们使用书名页的方法刚好是手抄书生产程序的逆转；他们把自己置于书的首页和书名页。抄书人的惯例是将自己的信

息置于书末。印刷术将自我推销的技法推广到作家和艺术家，把作家和艺术家的信息也置于书前；于是，作家和艺术家成为世俗的文化英雄，就扬名显声，与出版商齐名了。会计和工匠与教授和布道师一样从书籍的广告中获益，他们的名气因此而走出作坊和课堂。(58) 有关世俗知识分子兴起的研究材料中，我们不妨用更多的篇幅研究这些早期广告的践行者；在知识分子地位上升的同时，匠师也被赋予新的尊严，“资本家精神”也增加了他们露面的机会。 59

再者，早期的印刷商对宣传设施的控制使之占有比其他企业特殊的优势。他们不仅为自己的产品谋求更大的市场，而且有助于其他商业企业的扩张，同时又使自己从中受益。新型广告技术的出现对 16 世纪的工商业有何影响？有些影响大概已经为人所知，其他一些影响或许还能够被发现。“小印件”的其他方面、“小印件”带来的变化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试举一例，谷登堡和富斯特在美因兹的印刷所最初印制的年历和赎罪券至少应该和更加著名的《圣经》受到同样的注意。实际上，赎罪券的大批量印行(59) 清楚显示了那种常常被忽视的变化，所以，其影响之难以估计就超过了实际所需的难度。

和以上勾勒的变化对照而言，与新印刷品的消费有关的变化更隐形、间接，也难以把握。研究这些变化时必须为不确定性留下大量的余地。许多变化还留待以后讨论，因为这些变化是跨度数百年的、持久的、阶段性不平衡的变化。常与印刷术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变化尤其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这些变化依靠识字的普及，并且和各种普及的趋势相联系。

估计印刷术前后的识字率是一个难题，卡洛·齐博拉的话似乎颇有说服力：

> 从我征引的或从我未及征引的星散证据，都很难得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我可以推断，到 16 世纪末，“识字的人数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多”……我同样可以推断，“识字的人数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少”，这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何谓“我们一般认为”……你可以冒险说，到 16 世纪末，西欧相对发达的地区，成年人口中的文盲低于 50%，而农村及落后城镇的文盲高于 50%。这一推断之含糊令人害怕……然而，现有的证据不容我们做出更加精确的推断。(60) 60

对 14 世纪和 15 世纪早期识字率的推断恐怕会是同样含糊不清的——甚至更加含糊。在缺乏刚性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可能用似是而非的言论去支持分歧很大的观点，革命性变化模式和渐进性变化模式的必然冲突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你可以设想，16 世纪发生了快速的“教育革命”，于是印刷术的影响就可能被放大；相反，你也可以描绘一场“漫长的革命”，其展开如此之慢，以至其影响完全被摊平了。(61)

鉴于支离破碎的证据和漫长的波动起伏，绕开与识字普及相关的令人烦恼的问题似乎是明智之举，等到其他问题有更多审慎的研究成果以后再议可能更好。除了阅读人数的增长和新思想的“传播”之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究——这一点本身就值得强调，这也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之一。无论如何，当我们考虑印刷术初期带来的变革时，已经有文化素养的群体经历的变化应该予以优先研究，这些群
61 体如何扩大的问题毫无疑问是非常迷人的，但应该退居其次。

一旦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文化的群体上，另一个问题就显露出来：这个群体的社会构成需要进一步思考。印刷术起初服务于高级教士和贵族，成为他们的“神圣艺术”吗？或者我们应该将其视为“穷人的朋友”吗？这两种描绘都见诸当时人的笔端，而且印刷术的确发挥了这两种功能。如果你回忆起初由罗马奴隶以及后来由修士、世俗兄弟会成员、书吏和公证人等行使的抄书人功能，你就可以断言，文化素养从来就不曾和精英社会地位一致。(62) 识字能力与静坐的职业更容易协调，而不是和许多贵族老爷喜欢的骑射狩猎的生活方式相宜。(63) 有鉴于此，设想新印刷机将以前高贵者读的书送到穷人手中，那就是被误导了。在铁路修通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许多乡村地区都没有受到印刷机的影响，这样的景观似乎是很真实的。在早期近代欧洲，农民人口庞大，方言坚守自己的地盘，在口语词和书面词之间强加了一道屏障；印刷术初期的影响恐怕只限于很小一部分人口。受影响的人口相对少，且多半是都市人，但这部分人却分布广泛。比如在 15 世纪的英格兰，从事手稿贸易的绸布商和职业抄写人既为律师、市政官或骑士服务，也为寒微的面包师和小商贩服务。(64) 14 世纪意大利城市里能够读写的商人人数之多令人注目，16 世纪晚期法国一位将领的目不识丁同样令人注目。(65)

62 但如果认为讨厌读书是贵族非常典型的特征，那就错了，虽然贵族和平民看似都讨厌迂腐的拉丁学问。是否可以把早期的读书界描绘成“中产阶级”，这一点似乎也拿不准。把图书种类和读者群配对时，无疑需要持极度审慎的态度。许多人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低额头”或“庸俗”作品反映的是“下层阶级”的偏好，虽然作者的署名和图书馆的检索目录提供的证据刚好与这样的设想相反。(66) 大众识字出现之前，最“流行”的读物的诉求对象是各种不同的读者群，而不仅仅是平民。

拉丁文读书人和通俗语读书人的分野和社会地位的关系更难以断定，比许多文献里记述的暗示更难。16 世纪的内科医生被认为高人一等，因为他们用的是拉丁文，而外科医生则被认为地位稍次，因为他们不用拉丁文；但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都不属于最高的等级，这也是事实。通俗语翻译运动的对象是未掌握拉丁文的读者，就此而言，其诉求对象既包括宫廷侍从又包括学徒，既包括乡绅、骑士和廷臣又包括店主和文书代理人。在低地国家，由拉丁文翻译成法语的著作常常避开城市里的非神职人员，因为他们只懂莱茵河下游的方言，这些译著的对象几乎专指宫

廷的圈子，与此同时，翻译成“荷兰语”的书可能是针对需要背诵《圣经》的布道师，而不是非神职人员（他们常常被认为是“通俗语”宗教著作的唯一对象）。早在印刷术着手“普及”读写技能前，许多人已经在实践中尝试了：教育王子的太师、宫廷或教会学校的老师、应宫廷邀约翻译拉丁文著作的牧师都在普及读写的技能。

然而，印刷术前普及识字的最大推力来自于布道师，他们感觉到有必要使听布道的教徒不昏昏欲睡，还觉得有必要抓住户外听众的注意力。[67] 印刷商和布道师不一样，他们只能猜想听众的性质。因此，我们把早期的机印书的书名当作可信赖的向导时，必须要格外小心谨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经常描绘的 15 世纪的图 63
解版《圣经》，这部书既有手抄本也有雕版印刷本，是穷人的《圣经》（poor man's Bible）。这样的描绘很可能会搞错时代，因为它是拉丁文足本的节本。《穷人的〈圣经〉》（*Biblio Pauperum Praedicatorum*）的对象不是穷人，而是贫困的布道师，他们对拉丁文一知半解，绘图本《圣经》是向导，使他们讲解起来容易些。[68] 精明的分析师建议区分各种不同的“读者群”和“公众”。所谓“读者群”就是根据图书馆编目、采购清单等客观材料判定的实际的读者，而所谓“公众”就是作者和出版商心目中假设的目标读者，即他们的作品指向的读者。[69] 我们判定实际读者的倾向时，以征引书名或前言的情况为依据，这样的区分值得牢记。

> 为了达成有效的结论……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行事。读书写字传播的信息……有限，必须辅之以整个生产情况的主题内容分析（本身并非容易办到的任务）；反过来，这为“阅读公众”的构成提供环境佐证：16 世纪印行了八九次的……一本烹饪书，显然有许多感兴趣的人读过它；《淑女教程》（*Doctrinal des Filles*）……传授修身举止的书，其首要读者显然是“淑女”或“女士”。[70]

然而，这样的“环境佐证”很值得怀疑。我们不想对早期的烹饪书读者做出判断（我觉得读者的性质绝不是一目了然的），有关淑女仪态的书未必吸引女性读者，它们可能对男老师、忏悔者或监护人同样是饶有趣味的。本书稍后一章将会说明，机印的礼仪书产生了广泛的心理影响；它们可能会加重家长的焦虑，这一情况不应该被忽视。再者，作者、翻译和礼仪书的出版商可能也会读这一类图书。作者和出版商涉猎的读物相当广泛，这一点必须要永远牢记。即使 16 世纪的宫廷诗人也要 64
利用机印的图书，虽然他们规避出版商并让自己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流通。[71] 有人说，讲复式记账法的图书的读者中商人不多，倒是比较多的会计书的作者和教师读这种书。你不禁要问：研究所谓《牧羊人年鉴》（*Shepherd's Almanacks*）的剧作家和诗人是否比牧羊人还要多？由于千百年来文献传承过程中的舛误，鉴于诊疗书里那些谬误方剂和难有疗效的处方，你真心希望，研究这些医疗书的人更多的是诗人而不是内科医生。考虑到药物书里描绘的新奇的药材，你可以设想，药剂师很

少按照早期印制的药典里的药方来配制药物，虽然他们可能觉得不得不在书架上堆放一些稀奇古怪的图书以备不时之需。(72) 无论是为了意向中的目的或实际的目的，有些早期的机印实用手册常常搜罗一些很难解答的猜谜。熟练的工匠已经非常熟悉一些通俗语手册介绍的工艺程序，既然如此，出版发行这些工艺又有何意义呢？(73)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值得牢记的：在印刷术出现后的第一个一百年里，作坊里的实践和课堂理论之间的鸿沟才刚刚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所谓“实用”的指南和手册传授的东西是不实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有关社会心理变革的猜想我们留待稍后考虑，但有些东西应该在这里指出。
65 我们必须像阿尔提克那样区分识字能力和读书习惯。无论如何，并非每一位有读写能力的人都成了读书界的成员。(74) 此外，学会阅读并不等于凭借读书学习。在抄写书的时代里，学习读书写字和通过当学徒、口耳相传和特别的记忆术的办法去学习是同时进行的。然而，等到印刷术出现之后，书面信息传输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不仅大学校园外的工匠靠自学受益，得到了新的学习机会，同样重要的是，聪明的大学生有机会超越老师掌握的知识了。有才能的学生再也不必匍匐在老师的脚下去学习语言或学业技能。相反，他们可以迅速靠自己掌握知识，甚至就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偷偷地写书——年轻的第谷·布拉赫①在成为天文学家之前就是这样学习的。一位 15 世纪历史纲要的作者问：“既然年轻人可以靠勤奋学到同样的知识，为什么要让老人教年轻人呢？”(75)

靠阅读学习获得新的意义之后，记忆术发挥的作用就下降了。再也不需要依靠韵律来保存公式和处方。集体记忆的性质因此而改变。

>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有一位学者在书房里沉思……出神地打量着一本机印书，这本书扰乱他收藏的手抄书。然后……他仰望那宏大的圣母院和衬托圣母院的星空……自言自语地说：“这书会摧毁圣母院。”雨果将机印书的出现和充满意象的圣母院进行比较，其比喻是，这本书出现的效应可以被用来观察印刷术传播的效应，它可能适用于叠加在修道院上的许多无形的记忆。机印书将使那些重重叠叠、充满意象的记忆显得多余。它将废掉自远古积累起来的习惯；凭借这习惯，一个“事物”一出现就立即储存在一个意象里，然后又储存在记忆库里特定的地方。(76)

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有一个浪漫的主题：它是“用石头表现的百科全书”，弗朗西丝·耶茨给这个尽人皆知的主题加上一个富有魅力的续篇。印刷术不仅清除了带

---

① 第谷·布拉赫(Tycho Bru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毕生辛勤观测天象、勤于笔耕，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资料，其弟子开普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基座的石雕和彩绘玻璃承担的许多功能，而且使人不必再将意象和客体放进记忆剧场的座位上，影响到不那么显性的修道院意象。这就为更加彻底地破除偶像铺平了道路，其效应超过基督教会过去的经验。"'拉米斯人'①必须要粉碎心灵内外的意象，必须要用新的无形象记忆法去取代旧的偶像崇拜艺术，这就是抽象的辩证法的秩序。"(77)

这一论说思路和沃尔特·翁②稍早对拉米斯主义和印刷文化的研究几乎是榫铆结合、天衣无缝的。在中世纪研究专家的一些判断中，耶茨和翁的契合真是太完美了。这些专家在中世纪手稿中看到图示特征，而翁却要将这些特征看成是机印书的特征。(78)虽然两人的论点并非同样可以接受，但其基本点仍然是有效的。印刷术使人可以不借助形象来帮助记忆，因而它强化了许多基督徒中业已存在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倾向。加尔文③反复重印的《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详细说明有必要遵守的第二条戒律就是反偶像崇拜。捍卫形象的人喜欢的文本是大贵格利④的箴言：雕塑是"文盲的课本"。(79)加尔文蔑视这一断言时并未提到印刷术，但印刷术这种新媒介的确潜隐在他以下观点的底层：不应该让文盲看雕塑，而是应该教他们读书。有鉴于此，以下观点可能是似是而非之论：印刷术养成了"从图像文化向语词文化"的迁移，这一趋势和新教的书籍崇拜和小册子风行比较兼容，与特伦托公会议⑤以后的天主教会倡导的巴洛克雕塑和绘画就不那么协调了。

其实，印刷术产生的文化变形比任何单一公式所能够表现的更加复杂。(80)比如，印刷厂在西欧普遍建立之后，雕塑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首先，新教的宣传利用的机印图像并不比机印语词少，漫画和卡通之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些新教徒连宗教图像都捍卫，其理由就是图像与印刷文化可以兼容。1547 年，史蒂芬·加

66

67

---

① 拉米斯人(Ramist)强调修辞的精确和清晰，对近代科学思潮产生影响。彼得·拉米斯(Peter Ramus，1515—1572)是法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他革新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修辞学，其主张被称为拉米斯主义。

② 沃尔特·翁(Walter Ong，1912—2003)，美国古典学者、人文教授，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是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弟子和同事，以研究中世纪人文学者彼得·拉米斯和口头文化著称。代表作有《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语词的在场：文化史和宗教史绪论》等。

③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神学家，创建加尔文教派，著有《基督教原理》、《信仰教程》等；16 世纪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曾经把日内瓦变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教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重要教派，表现出宗教上的不宽容倾向。

④ 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540？—604)，即教皇圣格列高利一世(Saint Gregory I，590—604 年在位)，他集中教廷权力，建立教皇领地，加强神职纪律，改革礼拜仪式，为中世纪罗马教皇制度奠定了基础，主持编订《格列高利圣咏》。

⑤ 特伦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天主教会的第十九次普世会议，讨论宗教改革的激进派马丁·路德被绝罚之后教会面对的重大问题。

德纳(Stephen Gardiner)为图像辩护,批驳尼古拉·里德利(Nicholas Ridley)说:"倘若雕刻被夺走,我们就不可能有印刷术。他们强调,语词不像雕塑……他们谴责机印书,然而,机印书的原型正是雕刻,雕刻是文字之母。"[81]仔细研究16世纪两个荷兰文版本的《圣经》就可以发现,新教的《圣经》和天主教的《圣经》确有不同的倾向:新教刊布的《圣经》不太强调图像,而是强调语词;然而两种《圣经》都印有插图,至少新教的路德宗鼓励用插图。[82]路德指出反偶像崇拜者行为举止的矛盾,他们撕掉墙上的图像,却以虔诚的态度去摩挲《圣经》里的插图。他说:"墙上的图像并不比书里的图像有害。"接着他陡转思路,讥讽地说:"我必须闭嘴,以免给毁图像的人不读《圣经》或烧毁《圣经》的借口。"[83]

再者,倘若我们接受从图像到语词过渡的观点,我们就难以解释欧洲北方艺术家比如丢勒、克拉纳赫①、霍尔拜因②的作品,他们与新教关系密切,然而其作品的广泛流布得益于印刷术。正如丢勒的生涯所示,新型的印刷艺术和版画艺术非但没有减少图像的意义,反而给作画人更多的机会,并推动艺术史走上今天的道路。虽然弗朗西丝·耶茨描绘的幻觉形象和记忆剧场的记忆功能业已过时,但是它们还是得到机会"开启新的生活"。在17世纪,它们为宏大的寓意画书籍提供内容,为玫瑰十字会③和秘术作品提供繁复的巴洛克插图。它们还给一种全新的文学提

供了灵感,这就是机器印刷的儿童图画书。在莱布尼兹的时代里,莱比锡的儿童是在看夸美纽斯④的图画书和路德的教义问答书中长大的。[84]古老的记忆形象就以这种形式重新进入新教儿童的想象中,最终为荣格(Carl Jung)及其追随者提供证据,使之能够提出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假说。无疑,想象丰富的寓意画书籍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这是16世纪印刷文化的另一个产物,不亚于无想象力的"拉米斯"修辞教材。

此外,在有些学术领域比如建筑、几何、地质以及许多生命科学中,印刷文化不仅与上述公式难以兼容,而且在压缩语词的功能时,它实际上增加了图像的功能。托勒密、维特鲁威⑤、盖仑⑥等科学家的作品的插图在千百年辗转抄写的过程中丢

---

① 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1472—1553),德国画家和雕刻家,属多瑙河画派,以众多的肖像画和宗教作品出名,其中一些作品描绘马丁·路德的神学观点,其子小克拉纳赫承袭其传统。

② 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1465? —1524),德国画家、插图家,以创作宗教作品为主,在一些著名教堂创作了许多壁画。

③ 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17和18世纪的秘密会社,从事宗教神秘主义研究,信仰神秘宗教。

④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捷克斯洛伐克神学家、教育家,提倡普及教育和"泛智论",认为通过全民教育可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合作,著有《大教学论》等。

⑤ 维特鲁威(Vitruvius),罗马建筑师、作家,活跃于前1世纪,著作仅存《论建筑》。

⑥ 盖仑(Galen,130? —200?),希腊解剖学家、内科医生、哲学家,提出著名的"四种体液"平衡理论,从动物解剖推论人体结构,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来阐述其功能,他奠定了欧洲医学的基础,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作品已经散佚。

失了,直到印刷术问世以后才得以恢复。(85)从形象到语词演变过程的观点把技术文献引入错误的方向。乔治·萨尔顿认为,扮演"西方科学救世主"角色的不是"印刷的语词","而是印刷的图像"。学术界借用古代中国一句箴言"一图胜过千言万语"来表达类似的观点,正日益成为时尚。(86)都铎王朝初期的托马斯·埃利奥特①表示偏爱"图像与图表"而不是"听人讲科学规则"(87),这句话似乎值得进一步思考。虽然图像对艰难的记忆不可或缺,但对口头传授的依靠始终是手抄书时代的交往特征。诚然,课堂讲授有时辅之以在墙上的图画,师傅向徒弟的传授常常伴之 69
以动作演示,木板和手指常用来传授计数,手势常伴随记忆方法的列举;然而,当我们力求快速重复一套指令时,语词必然是优先于其他交流形式的手段。除了用语词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向一群抄书人口授要他们抄写的文本吗?印刷术出现之后,直观的视觉辅助手段倍增,符号与象征用编码固定;各种图示和非语音的交流形式迅速被开发出来。教育改革人士设计新型的机印图画书,教育学家认为图画的用处日益显著——这些事实都说明,有必要超越简单的"从图像到语词"的公式去考虑问题。

正如以上评论所示,用一句话或一个公式来概括印刷术带来的变化可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我们要承认:我们日益依靠讲规律的书,而不是凭经验办事;我们靠阅读学习,其代价是通过听讲解和实干的学习受到削弱。然而你同时又必须考虑:印刷术促使我们反对在死抄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死读书,而且促使许多观察者用普遍接受的规律去检验新鲜记录的数据。与此相似,许多人觉得,越来越多的印刷词逐渐使口语词失声,人们越来越忽略听力、喜欢视觉——对此你必须要取审慎的态度。毫无疑问,谷登堡之后西方音乐的发展对忽视听力的观点是很好的反驳。至于"印刷术使口语词失声"的判断提出的许多问题,本章其他地方已经谈到一些,此处不赘。

本节旨在显示,从手写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产生了大量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所有的问题都太复杂,不可能用任何简单的公式来概括。然而,我们说没有简单的方式能够概括一大堆复杂的问题,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事实正好相反!

假定某种传播革命在15世纪后期的确发生了,它如何影响其他方面的历史发展进程呢?因为印刷术的影响尚未被彻底探索,我们就难以获得必要的指导。大多数常规的概览对人文主义的纲要性著作或新教的小书的广泛传播作一些介绍, 70
然后就止步不前。一些研究文艺复兴或科学史的著作就印刷术的影响提出了几种

① 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1490?—1546),英国学者和外交家,编辑了第一部《拉汉词典》,其《治人者》是英国第一部论教育的著作。

有用的建议，比如对学术和科学规范产生的影响。总体上说，这种新工艺的影响仅仅是含糊其辞地被提及，而不是被明确地界定，而且被大大地减小了。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印刷术问世以后的几百年里，旧文本的复制快于新文本的印制。有人据此告诉我们说："印刷术没有加速新理论的采用。"[88]但这些新理论来自何方呢？我们必须要召唤时代的某种幽灵吗？或者说，旧文本印制的增加有可能对新理论的形成作出贡献吗？也许，新型书籍生产方式有别于旧的书籍生产方式的其他特征也对新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需要评估这些特征，然后才能将印刷术的出现和其他历史发展进程联系起来。

无论如何，我发现追踪一些专题研究里含有的线索并进行评估是颇为有用的。我挑选一些突出的特征，心里想着这些特征，然后去检视各种历史发展。结果，过去不曾想到的一些关系浮现出来，老问题的一些解决办法也不请自来。在以下几个标题之下，请读者浏览我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提出的一些猜想，这些标题显示我主要的探究思路。

2.1 细看印刷术的传播：产量的增加和付印书籍的变化

许多研究成果提及印刷术的广泛传播时都语焉不详，未能说明不同的文本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数量增加的文本是指向不同市场的。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未能说清楚图书产量的增加如何影响消费模式。上文业已说明，文化素养的"铺展"(spread)产生的变化往往首先表现为有文化的人所经历的变化；同理，路德
71 教的观点、哥白尼理论的"传播"都不如托勒密的理论"传播"得快——这些问题似乎比其他问题更加重要。人们常常只给印刷商一个职能——印行书籍。他的影响只由发行量来评判。也许，"散播"(dissemination)一词分散注意力，我们更应该强调"异花受精"或跨文化交流，这或许更为有用。这是因为即使一版书的印数更多了，其"铺展、分散或撒播"的范围也更辽阔了[89]，然而，过去已经分散流布到各地的不同文本到那时又汇聚在一些人手里。在有些地方，印刷商出版的学术著作多得卖不完，充斥着地方市场。[90]在所有的地方，买书人都可能用较少的花销买到更多的书，把书带回书房或藏书室。如此，印刷商复制的似乎是陈旧的重版书，但他们给读书人提供的书更加丰富多样，远非过去的抄书人所能匹敌。"如今，认真的学生能够靠独自看书去涉猎大量的材料，远远超越过去的学生甚至成熟的学者需要掌握或希望掌握的数量；印刷术使图书便宜而丰富。"[91]学者再也不必四处游历去搜求书籍。后继的各代学者静坐书房，不再可能深究一本书，也不再可能毕生注解这一本书。注经者的时代结束了，"书籍互相参证的新时代"[92]开始了。

常常有人指出，16 世纪似乎经历了一种知识爆炸，其相关因素即使并非印刷术的出现，至少是北方的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征引马洛[①]或拉伯雷的相关文字，借以表明：读书使人陶醉是什么感觉，书本知识仿佛是长生不老药，每喝一口这种万能药都会给人新的力量。“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有学问的人、很能干的老师、宏大的图书馆……柏拉图、西塞罗的时代都没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93)] 亨利·奥斯本·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评述与这段文字相伴的拉伯雷的综合研究计划并指出，在此之前的三百年，罗杰·培根[②]也提出过类似的规划。他说，这两个时代之间产生了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因此，三百年前的罗杰·培根没有 16 世纪人文主义者“对经典著作的那种感觉”。除此之外，他的研究计划反映的目标和 16 世纪人文主义者的目标相同。但由于 13 世纪的人仍然尊奉神学为王，所以这位修士的计划未能像拉伯雷的计划那样圆满完成。

这样的论争思路隐含的观点是“世俗主义”的兴起和宗教虔诚的下降，虽然这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思路，但它似乎提出的问题多，回答的问题少。在路德和多语种《圣经》的时代里，神学究竟如何失去地盘？还有比用通俗语布道的中世纪托钵僧更加“拉伯雷”式的布道吗？也许，我们不应该絮絮叨叨地辩论何谓“拉伯雷的宗教”，而是应该更加注意“宏大的图书馆”和新的研究机会，因为这正是拉伯雷时代的特征。中世纪有两种欲望得到彰显，一是掌握《圣经》的源头语的渴望，二是掌握百科全书式知识以理解神创世界的各个方面的欲望。这两种欲望在 16 世纪的知识爆炸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依傍手抄书的学者和四处搜求古籍的人文主义者在丰富图书馆的收藏中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当我们搜寻 13 世纪仍然缺失、只有到了拉伯雷的时代才出现的重要因素时，面对拉伯雷和其他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所谓“神圣”的发明，我们多驻足思考一段时间，是值得的。

同样值得我们驻足研究的是 16 世纪著名学者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叹的学问。这些学者有康拉德·格斯纳[③]和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④]。格斯勒是目录学和动物学先驱[(94)]，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似乎完成了拉伯雷笔下人物高

---

①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剧作家和诗人，其无韵诗对莎士比亚产生影响，代表作有《帖木耳》、《爱德华二世》。

② 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英国哲学家、科学家、方济各会修士，强调数学和实验的重要意义，从事光学和天文学研究。

③ 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1516—1565)，瑞士医师、百科全书编纂者、博物学家，近代物理学、目录学、植物性及登山运动的先驱，代表作有《通用目录学》、《康拉德·格斯纳氏图书总览》、《动物志》等。

④ 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法国著名古典学者、语言学家，代表作有《年代学校正》。

康大(Gargantua)为庞大格吕埃(Pantagruel)设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成为“深不可
73 测的学海”。(95)马克·帕提森(Mark Pattison)对斯卡利杰的嘉许是:“前所未有的用于学海的蕴藏最丰富的头脑”——他实在是实至名归。不过,为了对过去的学者公平起见,我们应该考虑这样的事实:斯卡利杰得到了印刷商更好的服务,而以前的学者从抄书人那里得到的服务难以与之相比。

我们考虑与古典学问或与科学进步相连的发展时,这一点尤其值得牢记。正如本书以下各章所示,在研究16世纪任何重要的思想变革时,接触更多图书引起的激动,远不如航海发现、路德反叛、人文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和烦琐哲学的抨击那么受人关注。比如,近人审视蒙田著作反映出来的精神危机时,蒙田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地理发现和人文主义者对古典的恢复。(96)如果借此断言,那个时代最值得注意的大事没有给如此敏锐的蒙田留下什么印象,那实在是愚蠢之至。然而,如果忽视最直接影响他喜爱的观察位置的重大事件,那似乎就被误导了。在波尔多塔楼的书斋逗留的几个月里,他读的书就比以前的学者终生游学看到的书还要多——这一事实也是需要考虑的。在他查阅的著作里,他比稍早的中世纪学者感觉到更大的“冲突和多样性”——我们在解释这一点时应该讲一讲他信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图书。

更多的藏书显然增加了学者可以查阅和比较的书本。印刷商们使更多杂乱的文献整理后问世,更多地印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和阿拉伯的文献,这一举动足以鼓励学者们整理混乱文献的努力。一些中世纪的海滨地图比许多古地图准确,但很少有人见过这些新地图。(97)为了印制近代的地图,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地图
74 被搜集起来了;同理,内科大夫和天文学家的藏书室也搜集了许多技术文献。于是,矛盾更为彰显;迥异的传统更难以协调。一旦将阿拉伯学者与盖仑的信徒、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和托勒密的信徒对立起来,普遍接受的意见就难以展开。即使人们对旧理论的信念有所削弱,更加丰富的读物也能促进他们思想的发展,能够促进新的思想结合和思想转换。

由此观之,印刷术养成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解释萨尔顿的评述:“文艺复兴是价值转换,是‘新政’,是重新洗牌,但大多数牌还是旧牌;科学复兴也是‘新政’,但许多牌是新牌。”(98)正如柯斯特勒①所言,复合性的思想活动激励许多创造行为。(99)一旦旧文本汇聚到同一书房里,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专门化的学科就可以结合起来。总之,针对相对稳定的图书市场而日益增加的图书为人们创造了条件,首先是有利于旧思想的结合,然后就能够产生新的思想体系。

---

① 亚瑟·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代表作有《正午的黑暗》、《梦游者》、《创造行为》等。

应该指出，首先体验到跨文化交流的是那些生产机印书的职业群体。在参考书印刷完毕离开印刷机之前，铸字工、校对人、翻译、编辑、美工、图版印刷工、索引编制人和其他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就已经有过卓有成效的交流。早期印刷商就是他们机印书的第一读者。他们还以焦灼的目光盯着竞争者的产量。于是，首先体验到获取更多图书（以及一切与印刷术相关的特征）强大效应的，就是在印刷所作坊里工作的人，就是新书籍的生产商。埃蒂安纳家族（Estiennes）或克里斯托弗·普朗坦（Plantin）之类的学者兼印刷商于一身的人充实了图书馆，同时，他们自己的珍 75
贵收藏还包括他们日常工作的许多副产品。[100]

人们经常指出，在近代早期的学术中心之外，学术和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大量的革新。印刷所对出没大学课堂的学者和文人产生了新的吸引力，有助于解释这种创造力爆发的现象。[101]这一点也适用于探讨艺术家和学者、实践者和理论家的新型的交流，正是这样的交流产生了近代早期硕果累累的科学成就。稍后一章将要阐述，印刷作坊吸引各种才俊的方式有利于各种“杂交”的思想成果。[102]印刷商促进各种形式的联合行动，既有社交性质的活动也有思想性质的活动。这就改变了学者的关系，也改变了思想体系的关系。

跨文化交流以矛盾的方式刺激思想活动。印刷商第一个百年的特征首先是思想的“发酵”，是“广角的、没有焦点的学术活动”[103]。旧的学科联系尚未切断之前，新的学科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可以用来解释一些混乱的交叉流动。比如，在手抄书时代里，巫术与机械技艺和数学怪才联系在一起。本书稍后的探讨将要说明，“技术付梓印行后”，大量的秘术也印行了，但很少读者能够把两者区分开来。在近代早期的学界里，炼金术、占星术、“巫术和秘法”以及其他秘术享有崇高威望，对此仍然迷惑不解的史学家们不妨考虑，古代近东的文化记载在手抄书时代是如何传播的，这样的考虑将有助于他们解开谜团。其中一些记录只剩下一些片段，这些残存的文献和计算、医学、农学、神秘崇拜等有关系。其他的文献已经蒸发，只剩下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一些宇宙周期和人生周期是人类的共同体验，所以在文献和 76
象形文字的碎片里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要素。认为万物同出一源，看似有道理；那些认真对待早期教士遗稿里暗示的乌尔城[①]残存文字的含义的观点，看似也有道理，这些教士暗示，这些文字包含了亚当堕落之前上帝创造的一切秘密。有人相信，这些泥板文字里的教诲是圣人和先知仔细保存下来的，在以后的黑暗时代和蛮族入侵时代才发生了舛误和混乱。科西莫·德·美第奇收到来自马其顿的大批藏书，里面包含大量的古代口传故事。1463 年，菲奇诺将这些希腊语文献翻译成拉

① 乌尔城（Ur），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的城市，位于今天的伊拉克东西部，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城市，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是苏美尔文化的中心之一。

丁文,1500 年以前,这些文献印行了 15 个版次。其形式为与埃及月神透特(Thoth)的对话,内容和中世纪学者早已接触到的片段有相似之处。据说,这批文献是摩西之前的赫耳墨斯·特利斯米吉斯图(Hermes Trismegistus)留下的遗产。这批神秘的遗稿印行了很多版次,直到伊萨克·卡索本(Isaac Casaubon)揭开了一个秘密:它们是基督纪元以后才编纂的文本。以此为基础,有人告诉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犯了一个"断代的大错"。毫无疑问,他们铸下了大错:这批新柏拉图主义的、公元后编纂的东西竟被误认为柏拉图之前且影响了柏拉图的文献。不过,给古文献演绎出来的手抄本断代本身可能也是错误的。[104]

印刷术出现之后流通的奥秘和深奥的手抄书故事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一些神秘的希腊、希伯来和叙利亚古籍不再那么神秘,另一些却更加神秘了。一些象形文字由机器印行三百年后才被人破译。不会解读这些神秘刻画文字的读者赋予它们重要意义。它们还被建筑师和雕刻家用作装饰。埃及象形文字被他们用作巴洛克装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整个理性时代,学者、玫瑰十字会或共济会又
77 赋予它们复杂的解释,这就给现代学者提出了一些永远不可能解开的谜团。下一章将仔细探讨象形文字的命运。笔者在此仅仅提示,我们考虑印刷术的影响时,不应该只思考启蒙的新形式。此间受到促进的还有神秘化的新形式。

有鉴于此,似乎有必要对下述这句话进行适当的修正:印刷术出现后的前半个世纪给予"伟大的推力,使西方思想源泉的准确知识得到广泛的传播,包括古典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105]神秘著作、女先知的预言、"象形文字集"(Horapollo)以及其他许多看似权威、实则荒诞的奥秘著作的复制适得其反。一方面它们传播了准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它们又为以后清洗基督教知识的来源铺平了道路。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有必要区分初始的效应和后来的影响。丰富学术典藏的效应迅速出现;整理内容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大量非学术性的通俗材料相比,三语词典、希腊文版或拉丁文版的图书似乎印数不多,你难免怀疑,"广泛传播"是否能够被用来说后面这一类学术性图书的流通情况。

词典中所界定的"传播"一词用来说识字课本、入门书、问答手册、年历和祈祷书似乎特别名副其实。然而这类材料的印刷品的增加并非总是有利于学术的进步或跨文化的交流。因为教义问答、宗教小册子和《圣经》可能会塞满书架,挤掉存放其他书籍的空间。与新的广角、非聚焦的学术并行的是一心一意、思想狭隘的虔诚。与此同时,实用指南和手册也更加丰富了,于是制订计划向前推进就比较容易——这就可能会使人忽略来世的不确定性。于是,16 世纪的地图绘制者就不在地图上标示"天堂",因为其位置太不确定。[106]伽利略引述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
78 (Baronius)的话区分两种概念:"如何去天堂"回答的是圣灵问题,"天体如何运行"是实际演示和数学推理的问题。[107]如上所述,许多"实用指南"并不实用。而且,牛

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发表之前，关于“天体如何运行”的知识，互相冲突的理论和天文学星表的出版提供的指引是非常不确定的。祈祷用的手册和精神问题指南提出的忠告却是毫不含糊的，使用交通图、短语书、换算表等辅助书籍的人也可能信赖心灵指导书，相信他们死后灵魂的旅程。解释《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的小册子非常倚重数学推理。殚精竭虑判定上帝创世或基督再临的日子的，也就是那些绘制天文星表、提出地图投影术的天才人物。[108]

无论如何，在16世纪初，“新发明的印刷术对学术的影响”是否一定比它对阅读通俗语《圣经》的影响更加重要，这是值得怀疑的。[109]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许多不相同的影响都很重要，且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到来。如果这一点能够说得更加清楚，我们就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看似矛盾的发展变化。如此，宗教虔诚和世俗精神的强化都可以理解得更好；一些断代分期的争论也就可以绕过去了。在追踪新潮流的时候，印刷术使悠久的、广泛使用的但常常被忽视、有时被(错误地)以为过时的文献更加引人注目。在印刷术的第一个百年里，许多中世纪的世界图像被快速复制，其生产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整个中世纪。它们之所以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保存下来，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讨厌扰乱旧秩序”[110]。16世纪的诗人和剧作家比13世纪的吟游诗人和哑剧演员更容易看到这样的图像。

鉴于诸如此类的考虑，我不能同意乔治·萨尔顿的意见，他说：“没有必要说明，印刷术对文化传播具有什么意义，但不应该太强调传播，而是应该多讨论标准化。”[111]印刷术如何改变文化传播模式，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更多地进行研究。而且，个人用上各种各样的图书是一回事，许多人共同关注一个文本又是另一回事。当我们过分强调“标准化”的时候，个人用上各种各样的图书就容易被忽视了。 79

2.2　考虑标准化的一些效应

标准化必须和许多其他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但标准化值得更仔细研究倒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位专家认为，目前的趋势是夸大了标准化的重要性。[112]我们不能忽视早期印刷方法和晚近印刷方法的区别，我们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扭曲历史视角。但同样重要的是，另一个方向也不要走得太远，以免过高估计抄书人工作程序的效率，誊写的工作程序不可能达到早期印刷机那样的结果。毫无疑问，中世纪大学教师“试图取得后来的印刷机那样的成就”[113]；但即使学校的教材生产实施了“分工抄写”工作制，抄写完全相同副本的目标始终是达不到的。事实上，将范本拆开分成几个片段让人抄的办法虽然加速了亟须教本的抄写，同时又可能正好加速了舛误的发生。何况所谓母本是不存在的，只存在许多范本(没有两个范本完全相同)，

这些范本分配给书商，它们为各自有关系的大学服务。[114]

早期的印刷方法不可能生产现代学者熟悉的那种“标准”版本，然而那样的印刷方法已然是一种伟大的飞跃。当印刷品的变异很多时，无数的勘误表随之产生。事实上伊拉斯谟或贝拉明[①]能够印发勘误表，圣哲罗姆[②]或阿尔昆[③]却不能。出版
80 勘误表本身就显示了印刷术赋予人的新的能力：准确找出文本错误，并将这一信息同时送达分散的读者手中。因此，勘误表清楚展示了标准化的一些效果。无论中世纪晚期的抄书人如何在监察之下工作，由于实际的控制比许多人记述的故事要松弛得多，所以他们不可能犯印刷商那种“标准化”的错误，不可能像出版商那样因为 1631 年那“可恶的”《圣经》而被罚款。[115] 如果说一位排字工的错误可能会在许多副本中流传，一位学者的勘误同样可以广泛流传。

> 一位伟大的学者的一份勘误表能够在数以千计的书里流通，不会出现抄书人造成众多讹误的危险，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学术活动条件的彻底革命。[116]

有人不重视早期机印书里排印工造成的错误，他们强调印刷术的意义时可能会夸大其词，但和那些低估手抄书千奇百怪错误的人比较，他们还不是那么离题万里。修正标准化论题的需要并不是很紧迫，倒是追踪其结果是更加紧迫的。萨尔顿说：“印刷术使出版数以百计相同副本的书成为可能，而这些书又可以到处流通，这是开天辟地的首创。”[117] 这句话太重要，不会因为对机印书的吹毛求疵而被淹没。机印书的一致性足以使不同地区的学者就同一引语展开通信，他们可以就自己发现的错误做同样的校勘。[118]

然而我说标准化的意义可能被低估时，心里想到的不仅是勘误，我还想到年历、词典、历书和其他的参考指南，还想到地图、表格、图示和其他的直观材料。生
81 产相同时空形象的能力常常被归因于文字的发明，却没有留下足够的余地，让人去考虑靠手工绘制完全相同的形象会遇到的困难。[119]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标记系统，包括音乐和数学的标记系统。完全相同的复制如何影响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审美风格，这个问题尚待探索。值得指出的是，所谓的两种文化都受到影响。印刷技术复制的特性既影响“四艺”④，又影响“三艺”⑤，在影响诗歌和音乐的同时又影响数学

---

① 贝拉明（St. Robert Bellarmine，1542—1621），意大利红衣主教、神学家，在宗教改革中为天主教辩护，加入耶稣会，同时又对新教持温和态度，参与对伽利略的审判，但允许伽利略为自己辩护。

② 圣哲罗姆（Jerome，公元 340？—420？），早期基督教最著名的教士和学者之一，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和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翻译成拉丁文。

③ 阿尔昆（Alcuin，735？—804），盎格鲁—撒克逊高级教士及学者，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领袖之一。

④ “四艺”（quadrivium），古罗马和中世纪七种学科中的几何、天文、算术和音乐。

⑤ “三艺”（trivium），中世纪七种学科中的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

和医学。

标准化主题的重要变异实在太多，不可能在此逐一罗列。它进入了与印刷术相关的一切运作过程，从铸造完全相同的字钉到制作完全相同的木刻画，而且使木刻画的尺寸刚好和排版的表面吻合。[120]它还对分散的读者产生“下意识”的冲击，因为他们反复接触完全相同的排版风格、印制手法和书名页装饰。[121]书法本身也受到影响。16 世纪手抄的样本书(specimen book)剥夺了抄书人个人发挥不同“手法”的潜力。[122]这些样本书对书法的影响，相当于体例书(style book)对印刷术的影响，相当于图案书(pattern book)对化妆、家具、建筑图案和平面图的影响。像图案样张和样本书一样，作文手册在手抄书时代闻所未闻。[123]和 15 世纪英格兰各地 82
的老师所用的手抄本语法书和发蒙书一样，机印书也是多样化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124]

当手写和硬笔(stylus)的缮写被标准化的字钉排印取代时，“风格”(style)的概念发生变化看来是可能的。抄书的字体和铅字字体显然不同，只需将手写稿和机印书放在一起，你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个人手写的特征。[125]如果把草图和素描与其机印复制品作比较，那就会显示更加戏剧性的差异。手绘的原件看上去更新鲜、更具有“原创”(original)性。所以，印刷术出现之后，那新鲜和原生的手稿与可重复、可抄写的机印本的差别可能就更加显著了。标准化过程使不同建筑、雕像、画作与艺术品反映出来的偏离古典形式的特征更加清楚。“哥特式”起初的意思是“尚未达到古典的标准”；“巴洛克”的意思是偏离古典形式的特征。从此，西方艺术史终将从固定的古典原理和各种偏离的角度去进行追踪：“每一位初学者了解到的风格和历史时期演变的过程——古典式、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主义、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整个过程表现的都仅仅是两个范畴的一连串标记，即古典的和非古典的标记。”[126]

多样化的个人书写风格消失了，铅字更加两极化，形成两种特色鲜明的字体：“哥特式”和“罗马式”。[127]一个类似的两极化对建筑设计产生影响。建筑图版和版画以及新论著和旧文本的印行量逐渐增加，对维特鲁威界定的“三秩序”的觉悟随之提高。[128]统一边界和地名的地图增多，远方边界的意识也随之提高。[129]类似的 83
发展影响到地方风俗、法律、语言和服装。15 世纪 20 年代在塞维利亚(Seville)印行的一本服装式样书使西班牙风格风靡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裁缝们得到新的指引；同时，在布鲁塞尔人或利马人的眼里，各地服饰的多样化都更加突出了。

实际上，对多样化的充分认识与标准化同时发生。16 世纪的出版物不仅推广了相同的时装，而且促进多样化服装的收藏。介绍多样化服装的图书在世界各地流传，翻检得破破烂烂；艺术家和镌版工人都仔细研究这些图书，而且在多种语境下予以复制，于是地区风格服饰的套路就应运而生。这些套路获得了永恒的纸媒

生命，在如今的玩偶身上、歌剧里、化装舞会上，我们还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影子。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观念、典型和独特的观念是相互依存的，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方面，你可以认为，个人主义新意识的出现是标准化新形式的副产品。实际上，风格越标准化，个人自我特异化的感觉就越强烈。任何时期都必然既有典型性又有个性化，然而由于标准化图书的出版，这两种观念都随之改变了。蒙田这样的作家正在创造一种非正式的、特异化的文学体裁，正在揭开界定个性化的“我、我自己”的观念与类型观念相对的癖好和特异。尽管如此，其他类型的文学也在界定理想的类型：它们提出为国王或国家效命的要求，描绘牧师、商人和农民扮演的角色——贵族和贵妇人、丈夫和妻子、有教养的少男少女都应该扮演这样理想的角色。(130)

在这里，“完全可复制的图像表达”再次强化了标准版图书出版发行产生的效应。人们反复看见相同着装形象的夫妻，代表贵族、市民和农民这三个社会群体的
84 形象，身着独特服装的形象，而这些图片又以地区特色为背景——所有这一切促成了阶级分野和地区群体的鲜明意识。(131) 同时，王室肖像画和入城式版画的印行也使王室以一种新的方式在臣民的意识里留下亲切的印记。以前，王室可复制的形象铸造在钱币上，其新形象则是印刷术的副产品，两种形象表现在法国革命一个相当著名的场景中。皇帝和国王的个人特色在钱币上表现得并不充分，他们微服出行时是难以被臣民辨认出来的。但印在纸币上的肖像使一位机敏的法国人认出了路易十六，他在意大利的瓦伦市认出了国王，并使国王留步。

应该指出，个性化和典型性的新意识进入的圈子可能首先是印刷商和版画家经常接触的圈子，他们出版发行服装手册、图案书、王室入城式纪念册和地区指南。勘误表的出版使印刷所的人防止错误的意识增强，同理，建筑装饰、地区边界、地名、服装和地方风俗细节的准备也使印刷人增强了防止错误的意识。由于插图版指南和服饰手册的出版，对地区和历史时期的意识以及对服饰细节的关注似乎也增强了。诚然，用同一建筑轮廓的镌刻画来表示许多不同的城市、用同一帧头像表示许多不同的历史人物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似乎又是一个反证。《纽伦堡纪事》(*The Nuremberg Chronicle*)即为一例。为了节约成本，许多早期的印刷商把少数图版用于多种功能。(132) 在德国乌尔姆市 1483 年印行的《纽伦堡纪事》里，“一幅图版就用了 37 次，19 个印版用了 134 次”(133)。尽管如此，在同一个十年即 15 世纪 80 年代，美因兹地区的两种出版物里却印制了一位旅行艺术家兼镌刻家的新作品，他受命到圣地去朝觐，专门创作表现沿途所见城市和风物的作品。厄尔哈特·
85 卢维奇(Erhard Reuwich)为布雷登巴赫(Bernhard von Breydenbach)的《圣地朝觐图》(*Peregrinatio in Terram Sanctam*，1486)所做的城市景观插图，以及他为彼得·舍费尔的通俗版《德意志植物志》(*Gart der Gesundheit*，1485)所做的插图的

确表明，用视觉形式表现观察印象的作品越来越精确而细腻了。[134]此外需要区别的还有：粗心将少数印版多次用于许多目的的做法和刻意将“典型的”城镇或肖像重复用于指引读者的做法。[135]无论这种用法的目的何在，比如《纽伦堡纪事》里那种重复使用，少数有关个性化和标准化两极现象的论断都是适用的。典型的城镇、头像或植物越是标准化，图像起草人就越容易感知到一个个城镇、头像或植物的特性。画家和镌刻家常常在手稿的边缘描绘一些自然的图形，比如过去数百年里教会的法衣或石头的喷泉。但从彼得·舍费尔开始，他们的才能就被著名的印刷商和有学问的编辑用于技术目的，用于启动出版计划了。

在这里，我们要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记住：早期的印刷商不仅出版创新的参考指 86
南，而且要亲自编纂其中一些著作。[136]对我们之中那些常用后世的分工思考问题的人而言，早期印刷商担任那么多角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一切兼学者和印刷商于一身的人不仅是出版人和书商，而且是百科全书、词典和编年史的学者。无论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在加工文本以备出版的整个过程中，采用什么标准的决策都是无法规避的。他们必须选择或设计并实施内部的运作规范——正字法、标点符号、缩略语等都必须由他们决定。[137]文本的变异、插图是否可取、翻译是否令人满意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样的决策要求他们请教教授和医师、图版经销商、画家、翻译家、图书馆馆长等有学问的人，所以印刷商的作坊就成为一些城镇的学术中心。换言之，16 世纪最先进的学术中心似乎从讲演厅和教学中心转移到了一些印刷商的作坊。而且，印刷商还处在异常优越的地位，他们把为自己设计的体制传递给其他的体制，并从中获益。他们不仅践行自助，而且鼓吹自助。在中世纪后期，他们编写并出版各种实用手册，指引宗教审判官、忏悔者、牧师和朝觐者以及世俗的商人。他们出版大型的“大全”以吸引学者，同时又出版篇幅紧凑的“小全”、综合指南，在各种题材上提供实用的指引——从如何编写布道辞到如何在静卧中去 87
世等无所不包。[138]在这里，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印刷商似乎接过了教会抄书人留下的角色。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极大地扩张了原有的主题。“如何”之类的入门书“雪崩”似的从新型印刷机里流淌出来。它们解释如何“轻松入门”，如何通过“简易的步骤”去掌握各种技艺，从如何学乐器到如何记账的入门书应有尽有。在抄书人的文化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相比的书籍。

许多早期的资本主义产业需要有效的计划，需要有条不紊地注意细节，且要合理地精打细算。然而，早期印刷商的决策直接影响着工具的制造和符号的创造。他们的产品重新塑造人们操纵客体、感知并思考万千气象的能力。关心“现代化”或“理性化”的学者不妨再仔细想想，静静地扫描地图、星表、海图、示意图、词典和语法书究竟会养成什么样的新型的脑力劳动，如此，他们必定会获益匪浅。他们还需要更加仔细地看看编辑和生产这些参考指南的人的日常追求。这些日常的工作

程序有助于养成一种新的“有条不紊的思维方式”。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①]率先出版的大地图编制有附录、索引，还有他致读者的序言。在《世界地图集》(*Theatrum*)的序言里，他把地图比喻为“装备齐全的作坊”，井井有条，读者容易找到所需的工具。(139)另一位16世纪的出版商说：当事物各就各位而不是随意分散时，找起来就容易得多了。(140)这句话是在为他刚刚重编的书稿寻求合理的依据。同理，如果他这家大型企业里的会计随意放置账簿而引起混乱，他很可能也会抱怨的。

2.3 文本重组和文献索引产生的效应：资料的整理、编订和分类

印刷商对版面安排和表现形式的编务决策对重组读者的思维有一定的影响。
88 麦克卢汉认为，扫描印刷文字的线性展开时，人的思维模式会受到影响；乍一看，他这个观点有一点神秘色彩。但细想之后显示，读者的思想的确受内容安排和表现方式的指引。书籍形式的根本变化可能会导致思维模式的变化。比如，为了利用印制的参考书，读者就必须要掌握一些如今看来是初级的技能，但这些技能曾经被有学问的人看成是深奥的东西。1604年出版的一种英语词典在编辑凡例里一开始就说：“读者必须要学会字母表，即按照字母依次排列的顺序。”(141)你难免会问，为什么在如此晚的年代里英格兰人还认为，有必要给字母表的意思下定义呢？许多ABC入门书为约翰·戴伊(John Day)这种得到特许的印刷商带来滚滚利润，人们可能因此而认为，给字母表下定义不是必需。无论如何，机印的参考书促使读者反复求助字母表。16世纪以来，牢记用无意义的符号和声音表示的字母表始终是西方所有儿童学习书本知识的途径。印刷术发明之前却不是这样的情况，13世纪一位编纂百科全书的热那亚人竟然会写下这样的文字：

> “amos”排在“bilo”之前，“a”是表示“amos”的第一个字母，“b”是表示“bilo”的第二个字母，“a”放在“b”之前……这是上帝的神恩在我身上的启示，我设计了这个顺序。(142)

这并不是说，充分使用字母表顺序的系统在13世纪以前完全不为人知，而是
89 说字母顺序对那时的人还相当深奥，百科全书似的编纂者还觉得它比较生疏。(143)其他排序系统被用于参考文献的可能性也不小。至于图书馆的编目系统，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著名的馆员也充分使用字母表系统，可惜这个系统随着该图书馆被焚毁而灰飞烟灭了。(144)雷诺兹与威尔逊说：“说到编目，一首诗远不足以作为卡片索

---

① 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比利时地图绘制家，地图、书籍和古玩商，编制了新型投影世界地图、埃及地图和亚洲地图，其《世界地图集》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地图集。

引之用。”18 世纪约克郡图书馆编目时，遇到如何看待一些诗歌的问题，雷诺兹与威尔逊因此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45]据传，这些诗歌是阿尔昆描绘 8 世纪约克图书馆编目的诗歌。那本韵书不齐全，因为严格的音步要求把一些应该编目的书籍排除在外。诚然，中世纪图书馆的编目系统一般不用诗歌，但绝不是按照现代的卡片系统设计的，也不是按照任何统一的标准完成的。这些系统的情况反映了手抄书文化的多种形态特征，其宗旨是帮助馆员找到他自己分类编目的图书，这些书安静地躺在书橱或书柜里，或在特定的图书室内用链条固定的书台上。[146]

完全字母表顺序的系统既用于编制书目，也用于编制索引，其日益规范的使用被归因于纸张的使用，因为纸的使用使制作卡片的成本降低了。[147]无疑，价格比较低廉的书写材料减少了编制索引和书目的花销，不过人们对反复手抄长篇的单子还是抱天然的抗拒心态，降低成本对克服这样的抗拒心态于事无补。偶尔有人努力为几个副本做一个共同的索引，但这样的努力必然要遭到挫折，因为用手誊写书时产生的错误五花八门。大多数情况下，中世纪的图书收藏者为自己编制索引，他们不觉得有任何义务要采用其他任何人的系统，总是随意地使用自己喜欢的系统。[148]与此相似，图书馆员在检索自己的馆藏时也没有任何激励他使用其他人检索系统的因素——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因素激励他遵循任何明确的安排方式。
(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在世的真本书收藏家的编目情况，你难免怀疑，馆藏的安排越 90
难以捉摸，中世纪的藏书家就越高兴。)然而，印刷术出现之后却是另一番景象，馆藏目录之外又加上了针对图书馆高墙之外的读者的售书目录，同时，任何一本书的索引都可以复制数百次。于是，机印书贸易的商业竞争性和印刷术的标准化耦合在一起，不仅使更系统的编目和索引有了可能，而且使之非常令人满意。开发市场，吸引买书人，同时又牵制竞争者，这一切都要求书商的销售目录条理清晰，要求印刷商印行的版次被人描绘为索引完善的图书，其“版次新颖且质量改进”。

彼得·舍费尔的印刷所的介绍词声称，他的公司提供“更加完全、安排更好的”的索引和“可读性更强”的文本，胜过竞争者的产品[149]，所以顾客不应该用外表的价值来衡量该公司的图书。早期的印刷商和现代的新闻宣传者一样，常常言过其实，许诺多于兑现。尽管如此，竞争压力还是推动他们改进常销产品的质量，并克服内部抗拒变革的心态，即珍本书誊写人的典型心态。版式的合理化有助于各领域学术的系统化。在 1542 年至 1547 年间，罗伯特·埃蒂安纳发行了五种巴黎书目，反映了许多领域的迅速进步。这些书目分成三个语种的栏目，每个栏目都按照统一的样式展开，起首是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字母表，然后是语法、词典和普通书；这种书目被誉为“安排醒目的奇迹”[150]。同样的技巧安排用于他在词典学领域的拓荒工作[151]，还用于他一系列的《圣经》版本中。在 16 世纪的巴黎，罗伯特·埃蒂安纳不断出版经过改进的《圣经》，这些版本完全可以和抄书人 13 世纪在巴黎 91

誊写的“版本”媲美；同理，他对词典学的许多贡献也相当于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①]的指导下完成的独步天下的双语词汇书。(152)

这样的比较之所以有用，不仅是因为它们显示，印刷机的新型力量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而且说明，印刷术出现之前就有人在尝试词典编纂了。印刷术以前，布道者和教师就已经在努力尝试编码化和系统化，就在为教友编纂字母表索引，或者为自己编排《圣经》里的段落、布道的讲题或《圣经》评注。一首诗“远不足以应付卡片索引之用”，而且诗歌离许多神学、医学和论题相去甚远。这些论著处在技术术语的包围之中，满布荆棘丛生似的缩略语和旁注。有些论著用图表显示学问的分支、抽象概念或人体器官与天体的关系。(153)一些论著粘贴着羊皮纸或纸张做的小标号，以方便读者参照。换句话说，你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夸大印刷术创造的新
92 奇，也不要忽视先行的发展如何有助于疏导继后的新工具的使用。(154)在中世纪的编纂者和注经人中，图表、括号和段落互相参照等手段不乏先例，只不过这些手法的形式更加带有个性、更加多样而已。所有参考词汇按照字母表顺序的统一用法并非全都是印刷术发明的产物，统一的字母表检索还需要拼音文字做基础；同理，16世纪学术特有的编目、相互参照和索引也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印刷文化的产物，相反，这些产物反映了教士和职员实现旧目标的新机会。

> 以其最典型的特征而言……中世纪人是组织人、编码人、系统建设者。他们想让万物各得其所，且各就其位。区分、界定、用图表说明是他们乐意的追求……中世纪人最擅长、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分类和整理。在一切近代发明中，我想他们最钦佩的是卡片索引。(155)

正如这段引文所示，研究使西方制度合理化的冲动时，你不必只考虑“装备精良的作坊”。“让万物各得其所”的欲望是中世纪学人和早期资本家共同的欲望。印刷所将思想活动和商业活动集于一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惜这一功能被人忽视了。印刷所使思想活动和商业活动互相强化，因而造就了一种特别强大的、几乎“过于武断的”驱力。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警惕诱惑，不能过分强调中世纪偶尔有预兆的、直到印刷术出现之后才会出现的潮流。中世纪的学人可能会羡慕我们的卡片索引，但他们对秩序的感觉并不是建立在这种索引的使用上。一种独特的双语词汇表不可能像成千上万册的三语参考指南那样发挥重要作用。中世纪的学堂或修院的藏书室根

---

① 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75—1253)，英国林肯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哲学家、神学家，哲学思想介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之间，主要贡献是将希腊和阿拉伯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介绍给基督教世界。

本就没有和16世纪、17世纪机印的多语版《圣经》相当的成就，也没有和这些版本的《圣经》的参考文献和指南对应的设施。与此相似，日内瓦版《圣经》条理清晰，便利阅读的辅助手段是很多的，中世纪罕有能够与之匹敌者。说到互相参照的提示和索引的制作，你不禁赞叹手抄书文化时期的编纂者付出的“巨量的劳动和聪明才智”，这几乎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须知，他们意识到，以后世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 93
成果必然会显得不足，因为在他们手工誊写和编排纸张序号的过程中必然会出错，这样的工作程序“通常是不完全的”，且“几乎总是有误的”[156]。

西奥多·贝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在众多的学者中千里挑一，认为约翰尼斯·特里特姆斯(Johannes Trithemius)是真正的“文献学之父”。他对特里特姆斯的评价是“对系统性具有深不可测的热情”[157]。特里特姆斯是斯蓬海姆(Sponheim)修道院院长，他编纂的《基督教著者名录》(*Liber 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长达三千页，包括书名及其作者，1494年由约翰·阿梅尔巴赫在巴塞尔首印。特里特姆斯称得上贝斯特曼赋予他的“文献学之父”的雅号。[158]他开创性的机印本文献目录里包含一个字母表顺序的索引，远远走在其他中世纪作者编制的目录前面。该书“收录的作者接近一千，包括他们的生平和著作，从教会之父直到在世的作者”。他的《德意志名人著述目录》(*Catalogus illustrium virorum*)(美因兹，1495)提出了“加洛林王朝中兴”的概念，促使约翰·卢克林(Johann Reuchlin)和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这样的文人互相尊重。表面上看，这位修道院院长在从事宗教文献的编目工作，实际上特里特姆斯成了德意志人文主义圈子的宣传员。[159]他出版的著作反映了美因兹和巴塞尔印刷所的氛围，至少反映了斯蓬海姆修道院的气氛。

> 斯蓬海姆地处德国边陲，远离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它成了一个活 94
> 跃的思想交流中心。来访者的溪流源源不断，使边远的修道院与世界交流的大门洞开。来访者的原因多种多样：检视其藏书，借用藏书作研究，师从院长。15世纪90年代，特里特姆斯的主要著作用机器印刷出版之后，访问者的小溪……变成了浩荡江河，他的名声与日俱增。那些不能踏上朝觐之旅的人——大多数人是不能成行的——也和他通信交流。[160]

特里特姆斯在斯蓬海姆的政策激起了其他本笃会的敌视，1505年，他被迫告辞，转任维尔茨堡修道院院长。在这里，他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①]的庇护，写了几部编年史，编造自己的家族史，篡改加洛林王朝的文件，放大本笃会和法兰克·德意志帝国的荣光。[161]在他生涯的后期，他不再将书稿刊行于世，

① 马克西米连一世(Emperor Maximilian I，1459—1519)，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留下的许多年鉴、编年史和论著在他身后才得以出版。皇帝的荫蔽使其不再那么需要求助于印刷商吗？或者是由于法国学者波韦勒斯(Bovillus)对他那些巫术著作出乎意料的反对，使他公开出版更加谨慎了吗？他决定，“将我那些令人惊叹的神秘的发现打入永恒静默的世界”，而不是“激起恶毒的巫术活动”，这是他身后才问世的《密码学》(*Polygraphia*，1518)透露出来的原因。他对年轻的阿格利帕[①]的忠告见他给阿格利帕的书信，他要阿格利帕防止庸俗的头脑亵渎神圣的神秘现象。他在《论神秘哲学》(*De Occulta Philosophia*)的自序里引述了这样的忠告。(162)

然而，在后期的著作里，特里特姆斯反复赞颂美妙的印刷术，强调印刷术形成于“德意志莱茵河畔的美因兹，而不是如某些人误传的形成于意大利……”他援引
95 自己在与彼得·舍费尔的交谈中给谷登堡和富斯特两人的角色定位：谷登堡是发明者，富斯特提供经济支持。(163)他晚年纪事的作用之一是作为彼得·舍费尔情感的载体，表现舍费尔对父亲和祖父(约翰·富斯特)的孝敬，又把舍费尔祖孙三代当作利用印刷术的首批作家，把美因兹作为印刷机的诞生地。(164)特里特姆斯身后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把“对系统性的热情”推进到目录分类和纪事之外，他进入了密码学、数命学和巫术的领域，其表现是他的两部著作：《密码学》(*Steganographia*)和《密码学》(*Polygraphia*)。(165)他之所以激励后世的信徒和仰慕者比如阿格利帕和约翰·迪伊(John Dee)博士，不仅是因为他掌握了图书馆学，而且是因为他通晓“波斯秘法和犹太秘法”(166)。1563 年 2 月 16 日，迪伊从他在荷兰安特卫普的印刷商威廉·西韦尔(Willem Sylvius)的作坊致信塞西尔(Sir William Cecil)[②]说：“我花了一千克朗买一本书，有人出售，但尚未到手。”“约翰·特里特姆斯在他的《密码学》、书信和其他许多著作里都提到密码学”，“密码学非常精美、令人头痛却欲罢不能”，所以他“夜以继日地连续誊写十来天”。迪伊至少抄写了一
96 半。(167)看来，未刊行的《密码学》的名气仰赖其他已经印行的书，靠的是迪伊与安特卫普印刷商的接触。无论如何，这部《密码学》包含“离奇古怪的复杂计算”(168)，所以解读它的作者众说纷纭：在谈密码学的外表之下，特里特姆斯是否在召唤天使和魔鬼？在陈述密码时，他是否提出的方法多而疯狂的程度少呢？这样的密码是否能够吸引谍报大师和秘密使节呢？方家们始终为此而争论不休。(169)

对不再着迷的现代学者而言，无论特里特姆斯追求各种系统性的倾向是多么

---

① 冯·内特斯海姆·阿格利帕(von Nettlesheim Agrippa，1486—1535)，神秘学家、哲学家，查理五世秘书，西班牙和意大利军事掮客，遭遇坎坷，曾经被驱逐出德国，在巴黎被囚禁，著有《论神秘哲学》、《论艺术与科学的无益与不可靠》等。

② 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1520—1598)，伊丽莎白女王枢密顾问、国务大臣。

执著甚至非理性，这种倾向却不能被描绘为“难以说清”的。相反，那是由许多力量的合力产生的。姑不提年历的计算、占星术和炼金术的论著，仅众多的索引就足以说明，类似的“追求系统性的热情”早就见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大学与研究机构里了。[170]不过在当时，手抄书文化的环境始终遏制着这样的热情。在特里特姆斯造访的印刷作坊里，追求系统性的激情可以得到尽情的发挥。

继承“目录学之父”特里特姆斯衣钵的是令人赞叹、年富力强的瑞士学者康拉德·格斯纳，他充分继承并超越了特里特姆斯的成就。他致力于编纂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真正综合性的“通用”书目，以陈列印刷术百年之内出版的一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著作；他充分利用当时出版商和书商发布的书目。首版的《通用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1545）搜罗的条目多达一万种、学者多达三千（30年后，他身后出的第三版的条目将翻三倍）。1548年，他出版了这一巨著的姐妹篇《图书总览》（*Pandectae*），搜罗了三万主题条目，每一条都与作者及其著作互相参照，按主题和分主题排列，主题和分主题又按照各门类学问安排。[171]《图书总览》分19个门类，每个门类就是一门学科，辟栏目介绍那时在世的杰出学者—印刷商，列举他们的出版物和成就。[172]格斯纳以这种方式宣传他那一代人中著名的大出版商，正如特里特姆斯宣传他那一代人中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一样。和特里特姆斯一样，格斯纳追求编目和系统化的激情大大超越了图书馆学。但和特里特姆斯不一样的是，他非凡的分类学天赋（费希尔[Hans Fischer]称之为“难以压抑的定向追求”）被用于动物的研究，而不是精神现象的研究。他积二十余年之功，从植物学入手，然后搜罗有关动物界的巨量信息。通过各种检索所得的文献摘录，依靠在各地聘请的五十来位通讯编委，他搜求图谱，复制木刻，小心谨慎地注明出处。[173]格斯纳终于推出了四卷文字、三卷图谱的巨著《动物的故事》（*Historia Animalium*）。这本书为他身后赢得了“动物学之父”的美名。费希尔认为，格斯纳的心血之所以特别令人赞叹，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人委托的情况下完成的，完全是一位世俗学者乐意为之的劳动，他没有赞助人，也没有受到什么指令的驱使。和特里特姆斯院长相比，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马西里奥·菲奇诺相比，他没有王公或教会的支持，而菲奇诺可以依靠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但同样重要的是，他却得到繁荣昌盛的印刷业界的不懈鼓励。[174]刚满21岁，他就在洛桑学院获得希腊语教授的教席，原因之一是他得到巴塞尔出版商海因里希·佩特利（Heinrich Petri）的支持，出版了他编纂的《希腊语—拉丁语词汇》（*Graeco-Latin Lexicon*）。[175]他成熟的著作从各家印刷商印行的书目中获益良多，而且得到苏黎世出版商克里斯托弗·弗洛绍尔（Christopher Froschauer）的积极鼓励。格斯纳将两卷书献给两位皇室的顾问，他向19位显赫的印刷商致意，这可能是弗洛绍尔的建议。[176]由此可见，虽然格斯纳是没有担任神职的新教徒，但他并非生活在没有制度支持的真空中。他和

97

98

早期印刷商过从甚密；实际上，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要的出书计划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特里特姆斯的出版商包括美因兹和巴塞尔两地的出版商的庇护，由于格斯纳在苏黎世的出版商克里斯托弗·弗洛绍尔的支持，由于约翰·迪伊的安特卫普朋友威廉·西尔维尔的激励，人们理解自然的神圣布局的悠久渴望，以及让上帝创造的万物类别分明、井井有条的强烈渴望获得了新的动力。原有的宗教和精神生活中对“系统性的追求”和编辑工作中所需的缜密的学科训练结合起来，和谋利商人的合理的举措结合起来了，因为他们必须要精明能干，能够记账、操作机器、营销产品。于是，书目、词典、地图和其他参考资料的出版就满足了实际生活的需要和宗教情怀的冲动。克里斯托弗·弗洛绍尔为瑞士的新教之父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以及目录学和动物学之父康拉德·格斯纳刊印书稿。罗伯特·埃蒂安纳出版的许多词典来自于他刊布《圣经》的“副产品”。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普朗坦在词典编纂方面的贡献纯粹是来自于其外来移民商人的地位。他在安特卫普定居，与莱顿大学建立了联系，决定学习荷兰语。他学习的词汇一个也没有浪费，他把学会的每个词都“摞起来、按字母顺序排列”。于是，一个合作项目应运而生，这就是他编纂的《条顿语义类词典》(*Thesaurus Theutonicae Linguae*)——第一部名副其实的荷兰语词典。[177]

实际上，根据字母顺序放置词语(字钉)是印刷所操作的常规。每一个索引的编制过程都是文本分析的过程，是分析从未做过索引的许多文本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佛罗伦萨的手抄书销售商韦斯巴西亚诺和佛罗伦萨的印刷商劳伦蒂伊(N. Laurentii)作一番有趣的比较：韦斯巴西亚诺说服佛罗伦萨市书法漂亮的公证人在业余时间为他抄写书稿；劳伦蒂伊劝说贝尔纳多·马基雅弗利(Bernardo Machiavelli，尼科罗·马基雅弗利之父)在业余时间为李维[①]的《历史》(*Decades*)做索引。贝尔纳多·马基雅弗利在1475年花了9个月时间做这篇索引，清理其中的城市、省份、岛屿、山脉、河流。[178]老马基雅弗利做索引时处理文本的方法和历代的抄书人和注经者的方法都不一样。比如，彼特拉克喜欢征引圣奥古斯丁[②]来反驳帕多瓦、波洛尼亚和巴黎等地的大学教授。他主张“研究人的天性”，同时谴责“徒劳无益地追求有关纯事物的知识”[179]。然而，为李维做索引的人就不可能将这两种形式的知识截然分开。参照自然现象和其他“纯事物”的研究是在为一切古典文

① 李维(Livy，公元前59— 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历史共有142卷，记述罗马自建城到公元9年的历史，现存35卷。

②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aint of Hippo，Augustine，354—430)，被认为是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著有《忏悔录》(7卷)、《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等。

本做索引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是早期人文主义者最敬佩的工作。

誊写文本或为文本做索引本身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态度;不仅如此,搜集道德范例(中世纪布道者做索引时就经常搜寻这样的范例)和搜集地名、花草树木或飞禽走兽的中性数据也大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值得特别强调。启动人们做索引和编写参考材料的动机起初是宗教的传授和说教;然而当索引和参考材料的工作被印刷商用于一切文本时,这样的工作就中性化甚至不带道德色彩了,因为他们心 100
里想的是销售的吸引力。

这是一种新的就事论事的编辑方法,也许和更加中性的对政治和历史的非道德色彩的研究有关系。这种态度常常和贝尔纳多的儿子尼科罗·马基雅弗利的著作联系在一起。尼科罗几次代表父亲到印刷所去办事;他看见父亲如何加工李维的《历史》,后来写《论李维》(*Discourses*)时,想必他还记得父亲那满篇批注的李维文本。他最"臭名昭著的论著"等到父亲去世后才出版,有人以此为据证明,印刷术似乎不如我推崇的那么重要,并且说:如果印刷术"如此重要",为什么马基雅弗利《君主论》(*The Prince*)的手稿出版前就产生了"臭名昭著的影响"?[180] 在这里,似乎值得我们再次强调,印刷术的影响不限于传播思想。观看父亲为出版商做索引或独自一人使用索引和参考指南时,尼科罗就受到了影响;至于他如何受到影响的问题,那就要留待专家去研究,而不是我们能够在这里回答的问题。但即使非专家也可能会说,不应该由于马基雅弗利在去世前未能看到《君主论》问世,就把他的观点和印刷文化的语境割裂开来。

同理,在研究与马基雅弗利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和学者时,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的观点和印刷文化的语境割裂开来。他们是最早的一代学者兼印刷人。做索引的工作和其他的印刷工作程序使编辑工作的指向有别于稍早的人文主义者的工作指向;人文主义者的主要关怀是准备讲演词、对话或注经,他们反对老师使用野蛮的语言和书法,也反对中世纪那些"注经"、"汇编"里野蛮的安排:大量繁复、离题、无关的细节。和这些"野蛮的"手抄书一样,早期的机印书也是复制品,这的确是事实;但复制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稍后才可能做出创新。过去的口头表达和零碎抄写掩盖了混乱,到了文本编辑和索引编纂者的手里,这些混 101
乱就很明显了;在出版商的眼里,它们就更加讨厌,因为出版商珍视井井有条的工作程序。于是,统一、内在一致与和谐的经典标准就被推广到讲演词、诗歌和绘画之中,而且还被推广到涵盖大型图书的编纂里,推广到早期人文主义者未曾涉足的整个研究领域。

> 组织的清晰和逻辑性、版面的布局成为……编辑的执著追求,这一追求本身几乎就成了目的。这是16世纪末百科全书式学者熟悉的现象,与之相关的

是对排字技术可能达到的水平的日益增长的迷恋，以及彼得·拉米斯方法论的重大影响……拉米斯主张，每一门学科都可以按照主题分类来研究，最好的阐述是在分析过程中展开的阐述。出版商和编辑热情地采纳了拉米斯的理论……[181]

尼尔·吉尔伯特指出，早期人文主义者禁用“方法”一词，认为其野蛮，但方法一词在笛卡尔之前一百年就在通用了，这个词“在16世纪论著的题名里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182]。正如沃尔特·翁所述，拉米斯主义运动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时尚最突出、最广泛的表现。[183]不过，这一时尚首先并不是归因于改变信仰的人，其主要原因是：印刷术使写教材成为一种新的有利可图的时尚。为各学科编写分级的教材本身就促使人去重新评估继承下来的教学程序，去重新安排各领域里不同的方法论。[184]比维斯①所著的《论学科教学》(*On the Teaching of Disciplines*，1531)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在论读史的恰当方法时，他用字母顺序罗列了相
102 关的故事。后来，让·博丹(Jean Bodin)在《轻松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ies*)一文里借用这个清单。博丹描绘的不是一连串的书名，而是一连串民族的兴衰，是这样的兴衰构成的世界史图景。[185]从博丹这本书可以看出，强调系统性的新现象并不局限于教育学，也不局限于写教材。正如吉尔伯特所言，与之相关的还有“编辑古典作家重要版本的极其严格的训练”[186]。编辑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研究生用的非古典文本时，遇到的挑战更大。

比如，中世纪的老师讲授《查士丁尼法典》(*Corpus Juris*)时，他们“不关心法典的部分与总体的逻辑联系”[187]，部分原因是，很少的老师有机会看到《查士丁尼法典》的全貌。《法规汇集》(*Code and Digest*)的手抄本流散了，早在一批又一批的评注者叠床架屋的堆砌之前，就产生了“普通”和“非普通”两种讲稿。[188]这些手稿分解为上课时间内必须要诵读完的段落，结果就造成了对全书的分割肢解，其顺序就更加混乱。[189]即使管窥《法规汇集》重要手稿的原貌，人们也不得不去比萨朝觐，收藏在佛罗伦萨的羊皮纸卷抄写的《法规汇集》戒备森严，即使获准察看，也只能匆匆一瞥。[190]在印刷术出现之后的一百年里，目睹这些羊皮纸卷的渴望始终是困扰学者的问题，他们试图给法律文献来一个“千年大扫除”，在评注本的丛莽中披荆斩棘，重构其古代的原貌。不少法律学者就在佛罗伦萨吃了闭门羹，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就只能在门外远望戒备森严的羊皮纸卷，参观者只能匆匆一瞥
103 那宝贵的文物。[191]所以，1553年《法规汇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这使以雅克·居

① 路易·比维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西班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学生，曾在欧洲若干国家任教，险遭宗教裁判所处死，以教育著作流芳于世，代表作有《论儿童教育的正确方法》、《论纪律二十卷》、《论心灵及生活三卷》。

雅斯[①]为首的新一代法学家和较早的学者比如比代、安德利亚·奥尔恰托(Andrea Alciato)和卜尼法斯·阿梅尔巴赫(Boniface Amerbach)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92]居雅斯的校订从"简单的文本错误"到"时代错乱"都有。他还"为引文做索引"。到16世纪末，整个编纂工作完毕，《法规汇集》的校订本问世，并附有索引。[193]褪尽了浮华外表之后，这一古籍风格上更连贯，内容上更一致。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似乎与当代法学的关系更加紧密。和西塞罗的拉丁文风格一样，当古典法律逐字逐句完全复原之后，其活生生的精神就荡然无存了。[194]

另一方面，这一批活生生的法律书也受到编辑、索引和校勘的影响。即使古代编纂的法律文本比如《查士丁尼法典》似乎和它重新刊布的时代关系不大，但仍在实行的一些法律和敕令也因此而被赋予了更锐利的锋芒。在瓦卢瓦王朝(Valois France)时期，皇家敕令(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业已在印行)和私人合同的区别更加明显，私人的合同继续以手写加公证的形式成立。于是，"私"法和"公"法的区分也更加明显。[195]在都铎王朝的英格兰，王室的告示印制以后，不仅继续在墙上、门上和公共场所张贴，而且以书籍的形式刊印并加上目录以便检索。[196]英格兰法律的印行始于威廉·麦克里尼亚(William de Machlinia)，他是与威廉·卡克斯顿同时代的人，但默默无闻。15世纪80年代，英格兰刊印法律的业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雄心勃勃的伦敦人，比如理查德·平森(Richard Pynson)、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105]、托马斯·伯特勒(Thomas Berthelet)和托马斯·莫尔[②]的姻兄约翰·拉斯泰尔(John Rastell)。[197]

104

> 他们知道彼此的产量，努力使自己的库存跟上新潮，以吸引司法界的注意。平森重印自己的1521年版本……大概是不满意雷德曼1528年出版的法令汇集的节本……平森为这个重印本加了书名页，加上了四张对开的"新增补说明"……拉斯泰尔不甘落人之后，他用印制《豪华版法律节本》(*Magnum Abbreviamentum*)予以应战，其中收录的法令到1523年截止……这是拉丁语、盎格鲁—法语和英语的对照本。[198]

约翰·拉斯泰尔及其儿子出版法令节本和索引，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一种合理化的法律图书版式如何影响到政体里的重要机构。书名的系统排列；严格按字母顺序的目录；索引和参照准确到标记了序号的段落——这一切都显示，印刷商的

---

① 雅克·居雅斯(Jacques Cujas，1522—1590)法规法学家、古典学派学者，执教于瓦朗斯大学和布尔日大学，研究《查士丁尼法典》，著《法典简要注释》即《法规汇集》，表达了罗马法的基本原理，其他著作有《狄奥多西法典》、《居雅斯全集》(10卷)。

②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天主教圣徒，曾任下院议长、内阁大臣，著《乌托邦》，因对国王亨利八世离婚案及教会政策持异议，被诬陷处死。

新工具使公法系统更加秩序井然，编辑方法更加合理。[199]到15世纪末，断定“某一法律究竟是什么”仍然不容易，各种各样的“大”许可证使混乱更加严重。[200]在整理出版《法律全书：1530—1533》(*Great Boke of Statutes* 1530—1533)时，约翰·拉斯泰尔精心准备了一个导引“目录”：“1327年到1523年法律条目的编年记录”的目录长达46页。其实他提供的不只是目录，这个目录是对议会历史的系统检阅——这是许多读者前所未见的首例。[201]

这种壮观的创新活动值得仔细研究，同时又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不那么令人注
105 目却更加普遍的变革。人们越来越熟悉规整的页码、标点、分节符、页头书名、索引等，这些创新都有助于重组一切读者的思想，无论其职业背景或技艺是什么。于是，无数的活动都受到一种“系统精神”的影响。阿拉伯数字标注页码的方法说明，最不起眼的创新也可能会产生很有分量的结果——这种标注页码的方式使检索、评注和互相参照都更加精确。[202]大多数印刷术的研究成果都认为，页码的标注是机印书版式最重要的创新特征，这实在是非常正确的。[203]至于书名页如何有助于图书编目和文献检索，那自然是毋庸赘言了。至于它如何有助于养成注明地点和日期的习惯，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204]

总体上看，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试图说明，爱书人和印刷术专家的研究课题对所有的史学家都有关系——至少对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有关系。如果我们开垦分派给印刷术的领域，所有这些领域的布局方式就能更好地理解了。兹举例说明：1595年安德鲁·蒙塞尔(Andrew Maunsell)在伦敦印行“英语机印书目录”。其中收录的图书计有6000种，井然有序，分三部，“均按字母顺序排列”，各部题名分别为“神学”、“科学”和“人文”。每部均由蒙塞尔作序，献给伊丽莎白女王、艾塞克斯伯爵和有兴趣的专家(第一篇序里的“有兴趣的专家”是“令人尊敬的牧师”，第二篇序里的“有兴趣的专家”是“数学、物理学和外科学的教授”，第三篇序里的“有
106 兴趣的专家”是“虔诚的匠人、典狱长、书商的助手以及一切文具商、印刷商和书商”)。在致科学家的话里，他指出，自己的系统包括对“作家、题材、译者和印刷商”的介绍；同时他自夸，他改进了过去的编纂者比如格斯纳、约西亚·西姆勒(Josias Simler)或约翰·贝尔(John Bale)编印的“拉丁文书目”。“他们的书目按照作者的教名排序，而我则用作者的家姓排序。他们把神圣的法则、物理混为一谈，我则为神学单独开辟一部。”[205]蒙塞尔的系统不仅为神学独辟一栏，而且把我们如今所知的一切科学、数学和医学置于“科学”一部；同时又把我们所知的“语法、逻辑、修辞、法学、史学、诗歌、政策”等学科和门类置于“人文学科”之下，而且认为这些门类“多半都与幸福和乐趣有关”[206]。在第一部致神学家和第二部致科学家的赠言中，他对科学家专业工作的界定常常与后世的定义异曲同工。[207]

2.4　采集资料的新程序:从错讹的抄本到改进的机印本

蒙塞尔编纂分类书目,使之有别于过去不分类的"混合"书目,这是对同行竞争做出的反应,竞争压力使印刷商们印行更加完整和系统的编目。同时,蒙塞尔 107
又借此机会在格斯纳等前人的基础上改进,正如格斯纳在特里特姆斯的基础上改进一样。大型的编纂图书或书目在印刷商的手里越来越系统清晰、井井有条;相反,抄书人誊写的文本却越来越混乱。面对统一文献或越来越多的地图版本时,印刷商不仅与对手竞争,不仅在先行者的基础上改进,而且还能够在自己的基础上改进。罗伯特·埃蒂安纳接连出版的拉丁文《圣经》以及奥特利乌斯接连出版的地图均说明,历史悠久的手抄书文化的变革不仅被注意到了,而且被逆转了。

这个观点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有理由怀疑一切有关早期印刷商的论断。前言和勒口文字反复吹嘘自己的改进,但实际上不加批判地照抄甚至忽视校勘的做法却揭穿了吹嘘的真相。[208]将同一本书的今版和早期机印本比较以后,你常常发现长期错讹的过程在印刷商之后反而加剧加速了。以《圣经》插图为例,劣质雕版的长期使用导致字体不清,模糊不清的图版说明文字被文化程度不高的雕工误解,从而产生神秘莫测的图文不匹配的现象;而数十年间刊布的盗版使讹误更加严重。[209]

和早期机印的《圣经》一样,早期机印的植物学图书也经历了一个错讹增多的过程,从 15 世纪 80 年代到 1526 年出版的草本书显示,"失真的数量不断增加",导致的后果是:1526 年出版的一本英语印制的草本书成了"一个令人很难受的例证,说明在一次接一次的誊写之后,视觉信息会出现什么样的扭曲"[210]。在抄书人时代,这个扭曲的过程虽然不断加速,但它相对比较慢,也不一定是惯例;有了印刷术这个新媒介以后,这个扭曲的过程在有学问的人眼里更加刺眼,但印刷术首次使校正这样的扭曲成为可能。如上所示,安德利亚·维萨里①《人体结构》的第二版的插图并不模糊,也未变样,而是更加鲜明而精致。[211]但愚昧的印刷人想尽快赚钱, 108
数据在他们手里被扭曲的情况反而加速了。在技术熟练的师傅的指导下,新技术可以使人超越誊写书必然给熟练抄书人造成的局限。

最近有人仔细研究了 16 世纪接连出版的百科全书;借此,舛误众多的一连串抄本如何被一连串改进的版本取代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塞巴斯蒂安·明斯特

---

① 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医师、解剖学家和外科大夫,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代表作为《人体结构》(7 卷)。

(Sebastian Munster)的《宇宙结构学》(*Cosmography*)的首版问世于 1544 年,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出了 8 版,到 1628 年一共印行了 35 版。每一版都增加了篇幅,其数据更充实,插图更丰富,图表更多,其索引使读者能够检索书中储存的快速增长的信息。编辑们认真而敬业,每一版都更新内容,过去的版本中有所忽视的地区总是得到更多的版面。正如格斯纳的"通用"《目录学》一样,明斯特的《宇宙结构学》命中注定要被不那么全面的参考指南取代;这是因为快速积累的数据使人可以"在一卷的封皮之内容纳整整一个专题,涵盖一切有益而有趣的内容"(212)。

应该指出,这种快速的数据积累是由印刷商的作坊驱动的,他们印行各种各样的参考书。16 世纪的编辑和出版商为学界服务,但他们并不仅仅消极地在书籍中储存数据,而是建立了庞大的通讯网络;他们听取读书人对每一版的批评,有时还公开承诺公布批评者的名字,感谢提供新信息的人或指出错误的人,承诺有错必纠。

> 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用这个简单的办法来表示诚信并恳请读者批评和建议,这使他的《世界地图集》成为一种国际范围的合作。他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建议,绘制地图的人争先恐后地寄给他《世界地图集》尚未覆盖的地区的地图。
>
> 《世界地图集》……很快就重印了几次……纠正和修改的建议使奥特利乌
> 109 斯及其制图人忙得不亦乐乎,为新版本而修正图版……不到三年,他就收到许多新地图,于是他增加了 17 幅地图作为附录,稍后又将这些新图融入《世界地图集》。奥特利乌斯 1598 年去世时,用拉丁语、荷兰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出版的《世界地图集》至少已达 28 种……最后的一种是 1612 年由普朗坦的印刷所印制的……(213)

诚然,并非每一版都能够纠正已经被发现的一切错误;在实际印制的过程中,他在前言里表达的良好意向并未全部兑现。即便如此,出版商们搜求信息的呼吁还是鼓励读者自己动手去搞研究和田野调查,这就促成了其他的出版计划。知识爆炸应运而生。奥特利乌斯的《世界地图集》的"余波"就包含地形学和地方史的论著,波及从俄罗斯到威尔士的广大地区。(214)

征集或接受新数据的人并非总是印刷商或出版商。经常听到读者意见的常常是作者或编者,他们根据读者意见在后续的版本中校正或增补信息。马蒂奥利[①]的《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学》(*De Dioscorides*)出版问世于 1554 年,印行了一版

---

① 马蒂奥利(Pietro Andrea Gragoria,1501—1577),意大利医师、植物学家,编纂《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学》,该书是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论》的评注译本,另有《论梅毒的治疗》问世。

又一版，每隔一段时间就根据从通讯中得到的药物样本和信息修订一次。许多奇花异卉、异域树木因而被引进欧洲（通过马蒂奥利 1581 年版的《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学》，土耳其的七叶树、丁香和郁金香就进入了欧洲的植物园）。很多来自外域的报告还使人对本国植物的描绘更加完整和精确。

> 到 16 世纪中叶，园艺家争先恐后地从印度、新世界、东突代、沼泽和沙漠——从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得到新奇的植物。远方的植物和动物或非常新 *110*
> 异或迥然不同，总是令人困惑，促发了进一步的研究……一种新的科学家应运而生，这就是旅行的博物学家……早期贪婪的冒险此时被知识的追求取而代之……
>
> 异域的发现激发了博物学家的兴趣，包括那些不得不留守的物理学家、教授、植物园和温室的园丁，迫使他们更精确地描绘本土的动物和植物……结果，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混乱也随之增多，所以呼唤新的大部头书籍的需求与日俱增……(215)

反过来，新的考察又促进交流，交流又推动新的调查；数据的积累使更加精确的分类成为必需等，以至无穷，一连串改进的版本和日益扩容的参考著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序列——不像亚历山大城的统治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君王积累的大量藏书。康拉德·格斯纳注意到远古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焚毁以及不久前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藏书的毁灭；他在那部更加开放的“通用”书目的献辞里提到这些藏书的毁灭。(216) 在格斯纳推动下确立的自然科学和图书馆学是能够无限扩张的。它们扩张的过程是一个开放、无限、绵延不断的过程。“回馈”一词丑陋，用得过滥，然而，它有助于传播变革前后数据搜集上的不同之处。印刷术出现之后，大规模的数据采集的确受到新回馈形式的影响，这样的回馈在抄书人时代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阐述其他事情之前就详细阐明而不是一笔带过新传播系统的影响，是大有裨益的；印刷术是早期近代学术和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你对这个新的系统给予更多的关注，你就不太会将非常好的美德赋予 16 世纪的学者，也不大可能把“贪婪的冒险家”和没有私心的博物学家对立起来。作者、编辑和出版人之所以采用“简单的诚信宣示手法”，之所以感谢提供信息的读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常人高尚，而是因为这一简单的宣示手法更能够满足混杂在一起不同的动机，比印刷术出现之前更令人满意。正如埃德加·齐尔塞尔所言，当 *111*
奥特利乌斯在他印制的地图册里感谢惠助者时，他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合作的现代理念”。但如果说匠人“诚实”且有合作精神，说书斋人或文人虚荣、狡猾、为自己服务，那是使人伤感情的比较，我们不能说工匠就为他人谋利，学者或文人就

只为自己工作。[217]没有任何职业群体垄断任何美德或邪恶。用合作态度采集数据，确认资料源头与撰稿人的做法绝不限于科学领域，古典学术、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也受到这一态度的影响。[218]我们看到，目录学和动物学都成为合作的学科，都在不断地深化与拓宽。实际上这两门学科之父就是同一人——康拉德·格斯纳。

从一连串错讹的文本到一连串改进的版本的变革涵盖了一切学科领域，就此而言，这一变革对整个学界都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可能是在意料之中的。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考虑的；研究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时就需要考虑这样的影响，无限的进步和陈旧的“自然退化”的主题日益协调的趋势就是这样的思想运动。容我在这里指出，文字记载的传播不再强化昔日那样的感觉：文本的退化是一连串辗转抄写的必然后果。大卫·休谟①致信他的出版商说：“印刷术赋予我们的力量是使我们在接连推出的版本中继续不断地改进和校正我们的著作，这似乎是印刷术的主要优势。”[219]适用于一位作家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分析大型的合作完成的参考书，只不过印刷术对这些大型书的影响更大而已。一套新的增补版图书使启蒙思想的前景胜过以往。

托马斯·库恩②认为：“哥白尼去世后半个世纪之内，天文学家可资利用的数据中不存在任何潜在的革命性变化。”[220]然而实际上，哥白尼一生跨越的年代正好是巨变的几十年，许多变化在改变一切读书人“可资利用的数据”，只不过许多人不容易看见这些变化。如果更仔细地研究这些变化，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释这样的历史现象：绘制天体运行体系、绘制世界地图、并列对照编年史使之同步、使法律典籍化、编纂书目等工作为何到 16 世纪末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每一种变化中，你都注意到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复制希腊化时期的成就，但在令人惊叹的短时间内，整个复制阶段就被超越了。在每一种情况下，新出版的图式都可以随时校正、发展，都可以进一步提炼。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 16 世纪的博学鸿儒的遗产上继续前进，而不是去再现这个遗产的只言片语、零碎片段。早期近代的思想“革命”大大受惠于这些特征，不少学人已经勾勒了这些特征。[221]然而，倘若印刷术保存遗产的威力没有发挥作用，那些如今被认为是里程碑的大部头著作、图表和地图就有可能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成果而已。印刷术的固化功能是学术快速进步的基本的先决条件。这一功能有助于解释其他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似乎将过去五百年的历

---

①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② 托马斯·库恩(Robert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科学史》、《科学革命的结构》等。

史和以前的各个时代区别开来——我希望以下的论述将阐明这样的区别。

2.5　印刷术的保存威力：固化功能和累积性变化

印刷术的复制力具有多种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它保存的力量。[222] 为了 113
理解其重要性，我们需要回忆文本可以用字钉排印之前的情况。在誊写人手工抄书的情况下，无论手抄本多么有用，任何文本都是不可能长期保存而不至于错讹丛生、文本退化的；而且，就连这样的“保存”也随着地方精英变幻莫测的需求和誊写人训练水平的波动而变化。就文字记录在传阅和使用中的情况而言，它们必然会有所磨损。储放的文稿难免会遭受潮气、虫蛀、失窃、火灾。无论在庞大的讯息中心里如何搜集或保护，它们最终难逃散逸和损失的命运。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信息的传递不得不依靠变化的文本和消失之中的手稿。

现代学者常常没有理解手抄书文化的这个特征。近年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则完全掩盖了手抄书文化的这一特征，因为人类学的重点是比较过去数百年间的口语传承和文字记录。因此，人类学家可能会赋予手写文字这样的力量：“昔日时光的永恒记录文本。”[223] 然而，一份手稿即使誊写在羊皮纸上也是不太持久的，除非它被精心保存起来而不被使用。若需要一份以上的记录，那就需要誊写，誊写就导致文本的变化。耐久的记录需要耐久的材料。石刻耐久，莎草纸卷则容易起皱。这些一望而知的差别导致了这一条规律：“写得少就保存得多，写得多就保存得少。”[224] 然而，印刷术出现之后，书写材料的耐久性不再那么重要；用上充足的纸张而不是稀少且昂贵的羊皮纸以后，保存就容易做到了。数量比质量重要。即使经受了时间考验的规律在印刷品中被复制下来，这些规律也过时了。一位修道院院长训示修士们抄写机印书以便使之永久保存而不毁损，现代学者读到他这个念头时，不禁莞尔一笑。[225] 不过，现代学者也像 15 世纪的修士一样容易受表面现象的欺骗，而且表面现象越来越带有欺骗性。

大体上说，印刷术需要用纸，纸不如羊皮纸或牛皮纸结实耐久，而且这几百年来，纸张越来越容易损毁，因为其中的碎布含量越来越少。羊皮纸的刮削或重写并 114
不完全抹掉过去的陈迹旧字，相反，印刷品的丢弃或回收并不会留下什么重写本。当书写的讯息可以大量复制时，其归宿就可能是垃圾箱，也可能是被作纸浆了，它们就不再激发如何更长期保存的念头。珍宝室内严密防护的手稿、保险库里紧锁的遗嘱、镶嵌在镜框里的毕业证书，似乎都不像地图、厨房里的挂历或日报那样容易毁损。[226] 况且，我们还反复听人提醒古本非凡的保存价值——火山灰掩埋的或陶罐里储存的古本十分珍贵。印刷术的结果之一是发现早已失传的记录，因此而开启了一个再现古本的过程；同时，我们却反而容易低估经过掩埋的手稿容易损毁

的程度。复原和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久已失传的著作重见天日，同时我们对这些新技术采用之前已经损失的文稿却并不放在心上。

过去的学者不像如今的学者那样漫不经心，托马斯·杰斐逊就深刻体会到印刷术的保存威力。

> 在研究弗吉尼亚州法律的过程中(他致信乔治·怀特[George Wythe])，我很早就注意到，许多法律已经湮灭，还有许多处在坏死的边缘，仅仅在细心人或好奇者的手里藏有孤本，他们去世时，这些孤本就可能被当作废纸。于是，我着手搜集一切尚存的法律文本……为搜寻这些遗存，我不惜时间、心血或成本……但……问题是，什么是保存这些遗存使之不至湮灭的最有效的手段呢？无论我多么精心保存，我不能防止虫蛀、纸张的自然老化、意外的火灾或因公共目的而转手他人……经验告诉我们，公共机构保存的孤本或少许副本靠不住，不可能保存很久。火灾与兵祸造成的损失令人悲叹。有多少古代的珍贵著作仅以手稿形式存在时就已经失传了呢？自从印刷术复制并分散副本以来，还有任何文稿湮灭的情况发生吗？这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保护我们法律遗存的唯一的手段是用印刷机复制许多副本。(227)

朱利安·博伊德(Julian Boyd)认为，这封给人启示的信影响了威廉·赫宁(William W. Hening)，直接导致他出版《弗吉尼亚法令汇编》(*Statutes of Virginia*)。博伊德认为，该书反映的观点与此前杰斐逊的观点异曲同工；杰斐逊致信《历史文献汇集》(*Historical Collections*)的作者哈泽德(E. Hazard)说："失去的已无法挽回；让我们保存遗存的文献：不是用密室和锁链挡住公众的视线，不能不让公众利用这些文献，不是让其在时间的流逝中损毁，而是用许多副本保存，将其置于防止意外毁损的地方。"(228)

强调印刷术保存威力的民主性质，这似乎很符合杰斐逊的秉性。印刷术不是把文件紧锁深藏，而是把它们从箱子和密室里拿出来复制，让人们都能看到这些文档。保存宝贵资料的最佳途径是将其公开，这一观念和传统的观念背道而驰，导致与新审查者的冲突。这是早期近代科学和启蒙思想的核心观念。杰斐逊惋惜古代的"珍贵著作仅以手稿形式存在"，故而导致"古代珍贵著作"的亡佚；他同时奏响了一个古老人文主义的主题：把古代学术的复活与新印刷术联系起来。本书下一章将讨论与此相关的问题。笔者在这里仅仅指出：首批印刷商迁居意大利之前，古典的复活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奥斯曼土耳其人步步进逼，尽管法国人入侵意大利，尽管发生了英格兰修道院被洗劫的灾难，尽管宗教战争的恐怖绵延不绝，古典的复活还是坚持不懈。一旦希腊字钉被铸造出来，意大利内乱的破坏也好，伊斯兰对希腊的征服也好，一切主要的希腊著作都被翻译成拉丁文也好，都不可能使希腊的知识

在西方衰退了。考虑到希腊文档得到永恒的再现，印刷术固化功能的隐含命题是难以穷尽的。考虑到那么多古代的语言失而复得，印刷术固化功能的意义就难以 116
尽述了——不仅对西欧而且对全世界都能失而复得，何况还是数千年的失而复得呢。它们造就了整个现代的“知识产业”，其书目日益增容，对书架和图书馆都构成了无情的压力。

这些语言造成的问题与其说是学术问题，不如说是地缘政治问题。在同一时期，在希腊古代文档被“固化”的时期，欧洲的语言地图也“固定”下来。通俗语的书面形式被固化的重要意义时常有人强调，但印刷术扮演的战略角色却常常被人忽视。(229)印刷术的战略意义从下文的摘要可见一斑，这段文字引自斯坦贝格：

> 印刷术“保存、编码有时甚至创造”一些通俗语。印刷术在16世纪的一些小语言社群里的缺失“明显地导致”一些通俗语的消失，或者将其排除在文学领域之外。在这个世纪里，印刷术在相似通俗语群体里的存在使之能够不断复兴或继续扩张。印刷术强化了语言群体之间的障壁，使墙内的语言同质化，摧毁小的方言分歧，为了千百万的读书写字人而使语言的习惯用法标准化，使偏远的方言得到边际的角色。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保存常常有赖于这样一个因素：几种通俗语启蒙读物、问答式小册子或《圣经》是否有机会在16世纪得到印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印制)。当这些读物得到出版时，一种“民族的”书面文化随即扩张。没有这样的出版机会时，萌动的“民族”意识的先决条件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就是一种不通用的方言了。(230)

研究王朝或民族主义的巩固时，我们不妨将更多的篇幅给予印刷术。印刷术抑制了语言的偏离，丰富了通俗语并使之标准化，为欧洲主要语言的进一步纯洁化和典范化铺平了道路。各地随意铸造的字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神话的精细 117
化，使多语种王朝国家内的某些语言群体受益。通俗语启蒙读物和译作还以其他的方式促成了民族主义。在家里“自然”学会“母语”以后，儿童学习读书写字时接受的是机印书灌输的语言，于是，在家里学会的“母语”就得到强化。在记忆最深刻的童年时代，眼睛首次看到了靠耳朵听而学会的语言，儿童看到的语言比听到的语言更加规范。在语法学校的初级教育里，儿童使用的是通俗语而不是拉丁语，他们的“母语”进一步得到强化，语言的“根子”和他们在国土上的根基就扎得更深了。

印刷术还以其他方式促进了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永久分裂。各种各样的统治者长期追求的国家至上论的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在手抄书时代，仪式、仪轨、教会法的文件由教士复制，到了印刷术时代，文件的复制由雄心勃勃的非神职人员进行，他们服从当朝者的权威。在教廷法院鞭长莫及之处，哈布斯堡王朝、瓦卢瓦王朝或都铎王朝的君主都将利润丰厚的特许授予地方公司，让其为国家的神职人

员提供印刷品。安特卫普一位印刷商和一位西班牙国王联手为所有的西班牙牧师服务，16 世纪的一种《每日祈祷书》(*Breviary*)印行了 15,000 册，这个版本和特伦托公会议以后授权的版本略有不同。于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就展示了他对治下教士的控制，印刷商克里斯托弗·普朗坦就规避了向罗马授权的印刷商进贡(这位享有特权的印刷商正是威尼斯的保罗·马努蒂乌斯)。马努蒂乌斯得到教廷授权印制《每日祈祷书》，获利丰厚。[231] 印刷商追求私利，同时又使欧洲各地与罗马的联系松弛，甚至切断了与罗马的联系，这就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情怀和王朝的巩固；印刷术如何以其他方式发挥了这样的功能，我们无法在此仔细探索。但这些其他方式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232]

118 印刷术固化功能的许多其他后果也需要探索。本书稍后一章将要阐明 16 世纪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分裂尤其是永久的分裂。异端受谴责，分裂的国王被革出教门，难以磨灭的印记史无前例。同理，诏令更容易看见，因而就更不容易撤销。比如，《大宪章》[①]在每个郡都正式“出版”(即通告)，每年两次，令人注目。到 1327 年，混乱已经产生：究竟《大宪章》是哪一次发布的宪章就不是很清楚了。[233] 然而，到 1533 年英格兰人翻看这本正式出版的“大书”的目录时，他们才知道，《大宪章》已经在国王的诏令和律法中三令五申了。[234] 法国的情况也类似，“国王发布意志的机制”放进了“出版”的法律中而“记录在案”，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大概也改变了这个机制。[235] 国王不可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授予豁免权或签署诏令时，他是在遵循古已有之的惯例。儒尔当[②]元帅了解到，他说的话是“散文”，同样，君主们从政治学说了解到，他们在“制定”法律。但议员也从法学家和印刷商那里了解到，他们古老的权利被篡夺了。于是，围绕确立司法先例的斗争愈演愈烈，每一个先例都更加持久、更加难以打破了。

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在许多活动领域都产生了偏离先例的新倾向，其标志是更加明确地承认个人的发明，是宣示发明、发现和创造。我认为，在争夺优先权和民族对立的宣示中，印刷术脱颖而出成为首要的发明，这绝不是偶然的。围绕谷登堡、科斯特和詹森[③]谁是第一人的专论为其他一切有关“哥伦布纪念日”的
119 专论定下了基调。[236] 你还可以比较眼镜发明者的默默无闻和后来伽利略自称望远镜发明者时引起的争论。[237] “新世界”这一命名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地图出版商和印刷商？[238] 人体器官的命名、月球上环形山的命名似乎都说明，有名有姓的

---

① 《大宪章》(Magna Carta)，1215 年 6 月英王约翰在拉尼米德签署的保障公民政治和自由权的宪章。

② 儒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in，1762—1833)，拿破仑帝国的元帅之一，著有《回忆录》。

③ 尼古拉·詹森(Nicholas Jenson，1420—1480)，意大利出版商和印刷商，曾师从谷登堡，改进了罗马体活字，设计了许多字体，印行了 150 多部著作。

“发现”是印刷术以后才出现的现象。

到1500年，已经有人设计法律推定来判定发明的专利和授予文学著作的版权。[239]在此基础上，一个萌动之中的官僚体制将要建立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法律构架。有关认证和授权的法律的研究工作已经涵盖广阔的范围，但将其作为印刷术副产品的审视却尚未展开。如果开展这样的研究，行会控制的瓦解以及围绕重商主义政策的冲突就可能被澄清了。一旦发明者的权利可以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护未经文字记录的秘诀，使之不被损害的问题就不必再提了。只要没有新的限制强加在身，你就可以通过公开宣传而获取利润。个人的首创精神可见于从依靠行会保护中解放出来，不过新的权力又被交到官僚主义者的手里。[240]围绕著作出版权利的竞争也引起了有关垄断和盗版的新问题。印刷术迫使法律不得不明确界定什么产品属于公共领域。[241]文字的“公共领地”受“圈地运动”的蚕食，占有欲强的个人主义成为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典型态度。“对行吟诗人而言，不存在剽窃和版权等字眼。只有在印刷术出现之后，这些词语对作者才有意义。”[242]

如今，个人的名气与印刷品的宣传有关系。我们稍后的探讨将显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过去，尤其适用于有关中世纪个人主义和文艺复兴个人主义差异的辩论。发明人姓名的确定和作者个人身份明确的现象是同时出现的，而且是同一过程的产物——在研究这些辩论时，回忆这种现象是颇有裨益的。比较价廉的书写材料促进了私密生活和个人通信的记述。但使个人短暂人生完好记录下来的不是造纸厂，而是印刷机。“追逐名气的驱动力”本身可能就受到印刷术造成的不朽观念的影响。写作的冲动既表现在尤维纳利斯①的时代，也表现在彼特拉克的时代。但如果使“不可救药的写作癖”重新定向，我们就可以将其转化为“出版之痒”。[243]将自己的作品印成书（使自己的名字永远固定在卡片档案和和文选里）的愿望和手写几行字的愿望是截然不同的；手写的文字不可能永远保存，可能会湮灭，也可能会在抄写的过程中走样。如果你书写的东西真的值得牢记，它可以靠口头传播并最终被放进“不久”的范畴。除非你能够区分作诗和诵诗、写书和抄书，除非图书可以不用卷首的文字而是用其他的什么东西分类，否则现代的图书和作者之间的游戏怎么玩得下去？

13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圣波拿文都拉②说，写书有四种方式：

一个人可以誊写别人的书，一成不变，一字不加，这样的人只能够叫做“抄

---

① 尤维纳利斯（Juvenal，60？—140？），古罗马讽刺作家，传世讽刺诗16首，抨击特权阶级的腐化和奢侈。

② 圣波拿文都拉（Saint Bonaventura，约1217—1274），意大利籍基督教神学家、红衣主教，活跃在法国，方济各会会长，著有《彼得·郎巴德〈教父名言集〉注疏》、《〈圣经〉评注》、《神学概要》等。

书人”。另一人誊写别人的书，加上一点并非自己的东西，此人被称为“编纂
121 者”。再一人既写自己的，又抄别人的，以别人的东西为主，加一点自己的东西作为解释，该人被称为“评注者”……还有一人既写自己的又抄别人的，但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加一点别人的东西作为确认，这样的人应该称为“作者”。

这段文字令人称奇，不仅因为它略去了完全原创的第五种方式，如果不略去这第五种方式，其文字就很对称；而且，它还暗示一个统一的“写作”的概念。作者就是“制造书”的人，他用笔写书，就像皮匠在鞋楦头上制造皮鞋一样。(244)

给誊写“作者”应有地位的许多问题可能来自于误导：那是把印刷文化造成的观念用于不确定的地方。所谓“伪造的赫耳墨斯文稿”仅仅是这种观念的许多表现之一。谁写下了苏格拉底那些话、亚里士多德的书、萨福①的诗歌、《圣经》里的篇章？上帝并不是《圣经》的作者。最近有人在一篇论《〈圣经〉的灵感》的书评里说：

> 但谁是《圣经》的作者呢？这是学界提出的一个新鲜而尖锐的问题，揭示了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作者身份”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现在阅读的《圣经》文本中有很多作者。但以赛亚并没有“写”《以赛亚书》。(245)

新的作者身份形式和文学产权破坏了过去集体作者身份的观念，不仅影响到《圣经》创作的观念，而且影响到哲学、科学和法学文本。由于古圣先贤重新被构造成个体的作者，对智慧时代的崇敬就被修正了——他们也难免常人过错，还可能曾经剽窃过他人的著作。(246)对“古人与今人”的书籍之战的研究可以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获益。在界定文学产权、塑造新的作者身份观念、利用畅销书、开发市场潜力等方面，早期的印刷商发挥了首要的作用，既然如此，他们在这一著名的“古人与今
123 人”之争里扮演的角色就不应该被忽视。比如，在16世纪初，印刷商就雇佣人翻译古罗马的著作和当时用拉丁文写作的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出版其通俗语版本。(247)印刷商给各国的通俗语翻译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力，在讨论拉丁语学者和新通俗语的提倡者之间的争论时，有必要考虑这一强大的推力。(248)

古代与现代、发现与恢复、发明与魔法这些词语可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也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将从先例出发得到的重要收获永恒地记录在案。(249)“在早期教父时代和中世纪，对真理的追求被认为是恢复深藏传统的东西……而不是发现新东西。”(250)大多数学者同意这一观点。在手抄书时代，区分发现新东西和恢复原来就有的东西是困难的。“发现一种新技艺”与恢复一种失传的

---

① 萨福(Sappho)，希腊抒情诗人，女性，活跃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常被视为女同性恋的象征，作品讴歌爱情，存世不多。

技艺很容易混淆。这是因为在恢复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一些优越的技艺和知识体系。(251)也许，摩西、琐罗亚斯德①或透特②并没有“发明”所有被发现的技艺。(252)许多古代巨人的技艺的确是被恢复的，他们的著作经过千回百转重新进入西方时，即 123
使证明了曾经有过的非凡技艺，其本来面目保留下来的也不多了。有人相信，一些异教先知被赋予了道成肉身的先见之明。或许，神还赋予他们获取一切知识的特别秘密的钥匙。对古人智慧的崇敬并非和学问的进步不协调，模仿也未必和灵感不协调。努力像古人那样思考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希望：体验突然的顿悟，在经过漫长的哥特式夜晚的迷茫之后，突然接近一种纯清、澄明、笃定的知识。

再者，史无前例的革新的确是发生了，然而印刷术出现之前，人们却没有稳妥的办法去认清这些革新。谁能够断定什么是已为人知的东西呢？无论是地区之内祖祖辈辈的先人已知的东西，抑或是当代远方的居民已知的东西，我们都不能断定。萨尔顿说：“稳步前进的意思是，已经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准确坚定的。”在他看来，印刷术使这一坚定性“无与伦比”地容易了。(253)但他可能表述得不够到位。印刷术之前，这种准确的坚定性是不可能的。由于文本的流动、手稿的迁徙、局限于地方的纪事、多形式的地图，有条不紊的向前运动是不可能的，没有累积性的跳板能够使一代人在前人到达的地方起步迈进。一些艺术和技能的不断精细化能够发生且的确发生了。但没有任何精深的技艺能够牢牢地确定下来、永恒地记录下来并储存起来为后人检索。尝试解释进步“理念”之前，我们不妨更加近距离地审视复制的机制，这一机制使一连串改进的版本成为可能，而且使固化下来的记录不断积累。这是因为产生不断变革的动因似乎是永恒性。总之，旧的保存下来，新的传统就启动了。

在手抄书时代，学问进步的形式是搜寻业已失传的智慧。印刷术出现之后，这样的搜寻就加速推进了。然而古代的地图、图表和文本一旦整理并断代以后，就会出现多种断代方式而不是一种断代方式。地图出版商印行改进后的地图集和星座图，这些新版的印刷品显示，近代的航海家和观星人对天体和地球的理解胜过古代 124
的圣贤。雅克·卡蒂埃③在 1545 年刊印的《航海记略》(*Brief Narration*)里说：“靠真实的经验了解到和古代哲人相反的东西。”(254)古代文本改进后的新版也开始

---

① 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亦名查拉图士特(Zarathustra)，创建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该教亦称祆教、拜火教，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后失传。

② 透特(Thoth)，埃及月亮、智慧和学识之神，诸神的文书，保护知识和艺术。

③ 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1491—1557)，法国探险家，深入如今加拿大东部探险，为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奠定基础。

积累，这些古籍揭示的古代哲学学派之多超过以前的梦想。支持一位权威抨击另一位权威的分散意见积累起来，成为对一切普遍接受的观点发起总攻的弹药。

传承下来的传统中那些不兼容的成分是可以抛弃的，部分原因是，保存传统的任务不再那么紧迫。抄写、记忆和传播所吸收的精力比过去少。有用的参考书不再因事件的流逝而被抹掉或变得模糊。韵律和节奏、形象和意象不再行使保存集体记忆的传统功能。技术信息可以直接用明快的语词、清晰的数字、图表和地图来传递。审美经验日益自主，艺术品的功能必须要重新界定。虽然讲记忆术的图书在印刷术之后倍增，但依靠记忆术的需要反而降低了。手抄书时代的誊写方法由于印刷术而变精致，最终却走向僵化，形同化石，现代研究的成果正在复原那种化石般的手抄书文化体系。那些在初入行者的圈子里保存诀窍和技艺的特别公式也消失殆尽了。记忆术的余存被转换为神秘的形象、仪式和咒语。(255)

然而，抄书人对古人学问的崇敬，即使在养成古人学问的氛围荡然无存之后，依然流连而不肯退场。比如，玫瑰十字会和互济会就长期相信，“新哲学”实际上很悠久。(256)笛卡尔和牛顿只不过是再现了古人掌握的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钥匙而已，金字塔的建造者就掌握了这样的钥匙，但后来骗人的教士们不让俗人知道这把钥匙，或故意把它搞得模糊不清。然而实际上，用于检索文献的索引只能在印刷术之后出现，异教学问的保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修士和托钵僧。但一些开明的自
125 由思想家却张冠李戴，把反宗教改革的制度提前送给哥特式的黑暗时代，而且把琐罗亚斯德变成哥白尼式的人物。(257)与此相似，一旦把模仿从灵感中分离出来，把誊写从创作中分离出来，古典的遗存就越来越干巴巴、越来越迂腐了。搜寻原生由来的经验曾经是在醇美的甘泉里痛饮，如今却与干巴巴如锯末的学究味联系起来。但古代先贤、吟游诗人和先知的声誉并未消减。新浪漫主义者号称继承了他们神奇的衣钵，他们给“原创”一词的意义重新定向，试图到神秘术士的嬉戏中去寻求灵感，并在印刷时代复活手抄书文化时代的艺术。即使曾经和手抄著作的磨损和舛误紧密联系的“自然的退化”观念，也被忧心忡忡的现代预言家重新加工、重新定向了，他们看到的是“脱缰的技术”，感觉到的是退步而不是进步，认为退步是时代的特征。

2.6 放大与强化：刻板定型和社会语言分割现象的持久影响

嵌入手抄书的许多其他主题与塑造它们的活生生的文化脱节，印刷术出现之后，它们被“推进”到机印书页面的“类型”(typology)里。随着岁月的流逝，手写文化的“原型”(archetype)转换成印刷文化刻版的“定型”(stereotype)；正如罗伯特·

默顿[①]所言，巨人的语言变成了侏儒的“陈词”(clichès)。“stereotype”(铅板)和“clichè”(凸印版)都是谷登堡之后过了三百年才在排版工艺中形成的。然而，它们指向印刷文化的其他一些值得更仔细考虑的总体特征。过去的五百年既广泛传播新的讯息又同时放大和强化了旧的讯息。我希望，“放大”(amplify)和“强化”(reinforce)这两个词不会干扰我所指的效应。之所以用这两个词，那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词表达我的意思。我们需要这样的语词来表达这样的效应：完全相同的段落和诗歌、逸闻与箴言越来越频繁的重复，其源头却是非常有限的手抄书文化。虽然古典、《圣经》或早期通俗语著作不断再版重印，但这样的重复并不是由于这些 126
著作的一版再版产生的，而是由于无数新著的作者无意之间的合作产生的。在五百年里，作家们各自报告新事件、推出新思想时，其实是在联手用放大的频率传输旧的讯息。所以，即使作家们的笔下凑巧有一处提及希腊人和波斯的古战场塞莫皮莱，但成百件对不同战役的报导都会把希罗多德对这场希波战争的描绘烙印在读者的脑子里，而读者在扫描不同战役的报道时又会成百倍地放大希罗多德留下的烙印。印刷材料越来越多，这种放大的效应就愈加明显。(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就好几次在报纸上看到塞莫皮莱战役。)缮写在稀缺而分散的手稿上的许多其他讯息同样会经历放大和强化的效应。读者的涉猎面越宽，他接触同一描述的频率就越高，他的印象就越深刻。因为作家的涉猎特别广泛，一个倍增的“回馈”效应随即产生。至于杜撰人们熟悉的引语、描绘广为人知的事件、创作符号或陈词，古人(即作品最先被付印的人)一般会超过现代人。自从一篇《日耳曼人》的手稿在一所15世纪的修道院里被发现以来，塔西佗[②]对热爱自由的条顿人的描写已经被重复了多少次啊！又有多少次在不同语境下改头换面地现身啊！在对日耳曼人以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法兰克人的描写中，塔西佗对条顿人的描绘就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

一切讯息传输的渠道首先是由书面语言边疆的固化形成的，语言边疆的固化决定讯息传输的频率。一种特别的强化机制是对母语的重新学习，学习读书写字的过程就是重新学习母语的过程。和这个过程同时展开的还有多种取向的民族“记忆”逐渐被放大的过程。传承下来的拉丁文化被转换为不同的因素与文化时，并不是相等份额的遗产成分在同一时间被传承下来了。[(258)]更为重要者，完全不同

---

① 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美国社会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师从科学史家乔治·萨尔顿，著有《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科学社会学》、《在巨人的肩膀上》、《理论社会学》、《论社会结构与科学》。

② 塔西佗(Tacitus，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曾任多种行政职务，其两部最伟大的著作是《历史》和《编年史》，可惜仅存残卷。

的王朝、城市和教会的纪事都用铅字排印并永远固定下来，其他的地方口头传说，包括口传的和手抄的传统故事，也用铅字排印并永远固定下来。偏远地区的中世
127 纪成就和各种古典及《圣经》的源头啮合在一起，到 17 世纪初，两者的啮合将迥然有别的刻板定型与各不相同的通俗语文学镶嵌在一起了。(259) 当然与此同时，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坛也在迅速扩张，讯息跨越语言边疆广泛流布，送达国际读者，起先是靠拉丁文，接着还用上了法语。技术文献的作者开发出来的一种手段能够更好地超越语言的障碍。不必借助翻译，数学和图像表达就可以向各国学者和科学记者传递完全相同的讯息。到 18 世纪，拉丁文学术刊物、活跃的法国报界和科学交流进入了很大一部分读书人的圈子，然而，多样的国际书面文化并不具备各种通俗语的放大威力。来自异域的外语讯息只能间歇性地偶尔强化人们共享的参照系统，而这些共享的参照系统却是在国内用熟悉的母语学会的。(260)

另一方面，横切语言边界的宗教边界在 16 世纪固定下来，这对某些讯息传输的频率产生强大的影响。比如，通俗语《圣经》的选段在天主教区文人圈子里的分布就比较稀少和弱小，不像在新教徒圈子里得到广泛的传播。(261) 新教教区放弃了教会使用的拉丁语，使基督教传统和王朝传统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反，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在天主教区就不那么紧密了。我们考虑不同的国家如何解决政教冲
128 突时，这一点值得注意。最后值得考虑的问题还有：文化素养的社会发展不平衡，读书习惯模式不那么有规律，昂贵的新书和廉价的重印书在不同社会界别中的分布不那么平衡——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各种讯息在语言群体里被接受的频率。

2.7 从聆听型公众到阅读型公众：社会变化和心理变化的不平衡发展

上述最后几句话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印刷人的诞生”的命题有关系。他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思想和社会都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至少我认为，这是他最有价值的贡献。但他又掩盖了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出现的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这就可能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进一步的研究。“印刷术使心脑分割，这样的创伤影响了欧洲，从马基雅弗利直到现在。”(262) 因为这样的言论无法验证，所以它不能刺激进一步的研究。假定默默的扫描取代了会话，假定不那么亲切的互动取代了面对面的接触，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就必然是：我们需要思考不同的群体如何受到不同的影响，少用比喻的、抽象的方式，多用历史的和具体的方式。即使匆匆一瞥，我们也知道这两个问题似乎都非常复杂。

比如在许多情况下，口语词是由印刷品里的讯息传递的，而不是被这些讯息取代的。布道辞和讲演词被转换为印刷词语的形式，但它们还是继续由嘴巴说出来。然而，这两种传统的口语形式还是因为这种静默出版的可能性而产生了变化。诗歌、戏

剧和歌曲被刊印之后，诗行和台词的吟诵、歌唱和创作的方式随之变化。一方面，“垂死的讲演词”被编写出来交付印刷，却没有机会用于演讲；另一方面，印刷形式的宣传品却使福音传道者和蛊惑人心者能够在户外对大群的公众践行传统的讲演术。印刷术创造的书面文化通过课堂讲授、剧场演出和诗歌朗诵会传递给耳朵，而不是传递 129
给眼睛。狄更斯甚至迪伦·托马斯[①]的时代以后，印刷术仍然继续把作者驱离书案、赶上讲台。没有任何一个简单的公式能够容纳这些新活动反映的变化。

不同的群体如何受影响也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比如，大多数村落人都是那种排他性的聆听性公众，直到 19 世纪。但许多情况下，村民们聆听的东西已经在两百年前就被印刷术改变了。这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已经被颇有墨水的村民取代了，有文化的村民从一摞廉价书和民歌单张中抽取出一些段落来高声朗诵，而这些印刷品则是由不知名的小商贩销售的。(263) 一种廉价的“流行”文化降生，其基础是陈旧的中世纪通俗传奇故事，在 19 世纪的蒸汽印刷机和大规模识字运动之前很久，这种乡村“流行”文化就已经产生了。然而，消费大多数流行文化产品的却是中世纪的聆听型公众，在他们和同时代的早期近代的阅读型的公众之间，横亘着一条心理上的鸿沟。(264)

这种新生产方式和旧消费模式的分裂只不过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许多复杂情况之一。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同样的阅读型公众的成员受到的影响，却可能是迥然不同的。比如，机印《圣经》掀起了两股不同的潮流，一股指向现代主义，一股指向原教旨主义——这是稍后的研究揭示的迥然不同的结果。黄色印刷品和虔诚的印刷品都采用了新形式。读者的阅读并不止步于宗教生活手册或实用手册，同理，印刷商也不会止步于刊印诸如此类的图书。和纯精神修养、虔诚事主相联系的是静默、独处和沉思的生活态度；同时伴生的生活态度还有：仔细阅读丑闻单张、“下流歌谣”、“意大利快乐书”和其他“白纸黑字的堕落故事”等生活态 130
度。(265) 这不是从世俗社会或都市退缩的生活态度。在 18 世纪，静默地细读杂志、小报或通讯可以满足一窝蜂追求世俗生活的好奇心。事务缠身、知识丰富的人每天都要独处一段时间，不和同伴打交道，这是日益明显的潮流。

个人与星期日报纸的交流取代了上教堂的交流。人们容易忘记，牧师的布道曾经和闲聊如影随形；教友们上教堂谈论本地新闻、外国事务、地产交易和其他世俗的事情。然而在印刷术之后，新闻的采集和流布就交给世俗的机构去处理，且更加有效了。我们思考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和“去神圣化”时，就可以注意这些问题。这是因为在一切地区（暂时回到 18 世纪以前去看），布道坛最终都要被报

① 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英国诗人，作品多探索生与死，著有诗集《死亡和出场》、《诗集》、散文《艺术家作为一条小狗的画像》、广播剧《奶树林下》。

刊取代,“无任何神圣可言”的名言成为记者生涯的特征。与“狂热的猎奇之痒”、“普遍的新闻渴望”[266]相对抗时,天主教卫道士和新教的福音传教者的努力甚至主日学校和其他守安息日的措施[267]都收效甚微。月刊被周刊取代最后又被日报取代。越来越多的地方报纸办起来了。[268]到了19世纪,原来上教堂闲聊的人常常可以通过在家里浏览报纸去获悉本地新闻了。

报刊取代布道坛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个过程与世俗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因为它能够解释地方社区纽带削弱的过程。

> 昔日城镇或乡村的社区生活那种可以触摸的性质……如今却令人困惑……不仅是因为它太容易使人伤感。人们似乎愿意相信,昔日有这样一段时光:人人生活在一个积极的、互相扶持的社区里,社会提供的是可以感觉到的日常生活框架。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即使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种社区生活的现象及其消亡是永远难以把握的。[269]

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探索传播系统和社区结构的关系,或许这一现象就不那么难以把握了。听讲演时,人们必须要聚集;读印刷的书面报告却使个体的人分开。1775年,马尔塞布[①]在一次讲演时说:“罗马和雅典的讲演人处在聚集的人中,今天的文人则处在分散的人中。”[270]此话说明,传播使人如何参与公共事务的意义改变了。完全相同的点滴信息广泛流布,这就给互不相识的人提供了不太个性化的纽带。

阅读型公众的性质本身决定,他们不仅更加分散,而且和聆听型公众相比,他们还更加原子化和个性化。从传统的社群意义来看,人们常常聚集起来去接受讯息;完全相同的讯息被复制以后,传统的社群意义就被削弱了,这就使独自看书的阅读者来到前台。诚然,书店、咖啡屋、阅览室也提供了新型的聚会场所,但订购单和通信圈子代表的是不太个性化的群体,而且无论个人身处哪里,他收到印刷讯息后总是需要暂时的独处,就像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独处一样。社会可以被认为是一群分离的单位,个体先于社会群体——这样的观念似乎与阅读型公众更协调,而不是和聆听型公众更兼容。论坛从公共广场讲演转变为新闻纸和小报以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性质就不太可能顺从古典模式了。

但即使社群团结有所减弱,对远方事务的间接参与却增多了;即使地方纽带松弛了,与更大集体的纽带却在锻造之中。印刷材料促使静默读者对事业的忠诚,这种事业的倡导者不见于任何一个地区,他们从远方对无形的公众讲话。新的群体

---

① 马尔塞布(Chrétien-Guillaume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721—1794),法国律师和行政官,曾任新闻出版总监,批准启蒙哲学家的许多著作,比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大革命中以反革命罪被送上断头台。

身份形式开始了与原有的、比较地方化的忠诚者的纽带的竞争。

宣传战犹如火上浇油，使王权与平民产权、宫廷与国土、教会与国家之间传统的摩擦愈演愈烈，这就为政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政党和过去的“派别”迥然不同。在谷登堡之后的两百年里，从十字军征伐土耳其人开始，宗教战争始终处在首要的 132
位置。“殉道者”和“宗教屠杀”(Massacre)这两个词语世俗化了，“宣教”(propaganda)一词也世俗化了。[271]派别报刊推波助澜，使骚乱、反叛和暴乱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72](到19世纪，巴黎一打喷嚏，整个欧洲都会感冒。)但都市群落不仅被分离了，而且更多非个性化的传播渠道又用新的方式把它们联结起来。在公民职能和都市事务中，亲身在场的参与越来越多地被间接参与取代。从早期的机器印制的单张和廉价的铜版画开始，人们就可以待在家里欣赏市民活动比如王室的入城式甚至公共节日了。这些仪式采用的繁复的符号和视觉效果显示，设计这些仪式的人接触过机器印行的文学和插图。[273]都市社会行为的宁静形式越来越受到印刷术的影响，静默的、非个性化的交流媒介的出现对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房地产的交易、慈善活动的安排等的影响越来越大了。[274]

个人生活和公共事务都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印刷术这种新媒介使这两个领域的差别更加鲜明。道德说教不竭的溪流渗进家庭的私密生活，产生多种多样的家庭剧。“家庭”被赋予新的教育功能和宗教功能，在非神职人员受委托刊印《圣经》
和教义问答书的地区，这种趋势尤其突出；不仅如此，家庭还成了复杂的文学交叉 133
火力攻击的靶子。图书市场的扩大，劳动分工的加强，女性读者与男性读者的区分随之加大，给儿童提供的读物也不同于家长用的图书了。过去分配给不同年龄段的图书在分类形态上既不分明又互相交叠，如今，这样的分类被按时序编码的年龄段取代了。[275]学生隔离在不同的班级里，不同的教材用于不同的学习阶段，分类的“同龄组”终于出现。与“家庭”不太协调的特色鲜明的“青年文化”产生了。特色鲜明的女性主义运动也应运而生。特色鲜明的女性读者群的出现显示了悠久的两性之战的一个方面，这一现象值得充分研究。然而直到19世纪，这样的发展才真正形成，那是在印刷术和学校都发生新的变化之后才出现的现象。

然而，正如许多历史研究所示，公共生活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惜除了少数例外，这些研究很少为印刷术的出现留下一点篇幅。实际上，印刷术必定在许多方面影响到了传统的治人者的群体。比如，纹章官和骑士的徽章的印制或许就促进了世袭贵族的阶级意识，使地位、优先权和等级的功能典制化。[276]你可以从马克·柯蒂斯(Mark Curtis)的书里获悉，“印刷术带来的巨变”如何影响牛津和剑桥的本科学习，“门第高贵的中世纪继承人”如何获得丰厚的利益。[277]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路径似乎是例外。印刷术对中世纪课程设置和学术机 134
构的影响通常只能够从字里行间去演绎。研究其他课题的著作也语焉不详：“伊丽

莎白时代英格兰能言善辩的公民”的出现[278]、17 世纪政治话语非个性化的增长[279]、“利维坦式的国家”的增加、在旧政体的欧洲到处都是蜂拥成群的官员和官僚主义者等现象为何形成、有何意义，你都不得不到字里行间去解读。

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冷漠的官僚主义被赋予过分扩张的权力；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留下空间去研究治人者个人高度显明的特征与活动，以及令人注目的大单张和版画的流通。[280]印刷品使“国王的两个身体”——王权职能的身体和国王本人的身体在臣民的眼里都更加分明了。统治者的形象和肖像被大量复制，最后用镜框装饰起来挂进农舍，和圣像及偶像挂在一起，遍布天主教欧洲——其结果尚待政治学家去研判。无论如何，大众追随一位领袖、其人格魅力遍及全国等现象都可能是新传播系统的副产品，这是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早期近代统治者如何利用新近出现的印刷机，这个问题终于引起人们注意了。最近问世的一部研究路易十四时代的专著如是说：

> 君主们过去用笨重的手稿与臣民交流，此时他们迅速转向小册子，用印刷品去宣战、刊布战报、公布条约、就争辩的问题发布敕令。他们竭力……“打赢心理战，为作战做心理准备，或贯穿战役的过程中”……根本的理念是激发法兰西即是祖国的观念，而法王就是祖国的人格化。与此相似，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和托马斯·克伦威尔有条不紊地利用议会和报界，以争取臣民对宗教改革的支持……
>
> 路易十三摄政时期的法国在 1789 年之前召开了三级会议；此间，王室创办的报纸成为欧洲王室的第一家报纸。王室控制的周报《公报》(*Gazette*)取代了不稳定的国民议会，同时发生且具有同等象征意义的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对印刷品的重视，他利用印刷术达到国家建设的目的。[281]

与之相关、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早期近代战争，约翰·黑尔(John Hale)最近的研究指向印刷术对军事战略和军官训练的影响。[282]当然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都还有许多问题尚待研究。

印刷品如何影响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将使人获益匪浅。对不同社会等级、乡绅地产的耕耘、领主的征税权、廷臣的举止、谋臣的策略、外交和财政政策的态度，印刷术有何影响？甚至对成为绅士的渴望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过去的争鸣围绕近代早期新阶级如何崛起并获得政治权力；近年，有些史学家开始放弃这样的争论。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旧统治精英的再教育和重组上，从而促发了新的争鸣。[283]倘若印刷术的影响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两种探索恐怕就可以调和起来并获得丰硕的成果了。

2.8　文坛与机印书贸易

除了旧精英的重组和识字平民的政治意识的提高之外,社会史家可以考虑生产和发行印刷品的新群体组成的情况。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异化的知识分子"、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知识分子的逃亡"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可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兴起却几乎没有人论述。[284]最杰出的文化英雄比如伊拉斯谟和伏尔泰与大多数在格拉布街①穷困潦倒、默默无闻的文人之间的鸿沟,还有待我们去评估。早期近代的格拉布街本身也有待史学家去研究。罗伯特·达恩顿一系列的著作阐明了18世纪法国"文学的低俗生活",追名逐利却又沮丧的文人将启蒙运动的主张转化为激进的政治行动,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作 136
品研究16世纪初威尼斯和伦敦的情况,这些著作在匆匆一瞥中考察了与世俗文学相联系的亚文化。[285]然而透视18世纪法国所需的完整画面却尚待我们去勾勒。有利可图的秘密图书贸易以及禁书的黑市亦无人仔细研究。在各种课题的著作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对这种现象的一鳞半爪的研究,这些零星的研究有:16世纪初通俗语《圣经》的走私、伽利略在软禁期间如何避开耳目等等。但这个课题的全貌宛若巨大的冰山,大部分被淹没了。[286]冰山之巅之所以看得见,主要是因为法国革命前煽情文学引起的激烈争论。所谓"第四等级"兴起的故事还需要有人讲——这个故事始于和早期机印书贸易有关系的多才多艺的专业群体,止于1484年杂志编辑们对法国的接管。

印刷机作为早期近代欧洲一支日益壮大的力量被掩盖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文人被当作各阶级代言人的原因;他们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唯独不代表自己的利 137
益。知识界共同的价值、文坛特有的制度都尚待我们去进行界定。[287]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编辑的《文坛新闻》(*New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之所以从鹿特丹发出,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鹿特丹还"提供了培尔需要的唯一的赞助者",即他的出版商雷尼尔·里尔斯(Reiner Leers)。里尔斯"则依靠荷兰印刷商享受的相对自由,依靠相对大的国际读书界"的支持。[288]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17世纪期间,国际学界的语言从拉丁语转向法语。[289]但18世纪文坛的中心城市不是巴黎也不是鹿特丹。大多数权威认为,这个中心是阿姆斯特丹。[290]此前,阿姆斯特丹已经在向欧洲人提供他们首批阅读的报纸;直到法国革命前夜,它仍然向法国提供报业服务。[291]

然而,当你在地图上准确指出文坛的总部或边疆时,你还得为不确定性留一点

---

① 格拉布街(Grub Street),伦敦一街名,穷作家聚居地,现改名为米尔顿街。

余地。从一开始，文坛就是一个不太好把握且常常刻意被神秘化的领域。其“居民”罕用自己的专名——当他们不刻意使用通俗语笔名或完全匿名以便隐藏自己的身份时，他们喜欢用更加优雅的拉丁语或希腊语名字。[292] 即使他们依赖的印刷商对版本页的处理方式也反映了作者放低身段的欲望，他们并不想吸引潜在的读
138 者（相反，版本页通常的目的正是要吸引顾客）。作者希望转移官方的注意力，避免被罚款或被逮捕。“乌托邦”和“大都会”发出的产品促进了这些新奇语汇的普及[293]，同时却增加了这类语汇给人造成的非真实的和不实际的感觉。但那些抓住机会卖文为生的人、那些利用新生涯发挥才干的人却不是无形无象的鬼魂，必须要肉体显形才能够使人相信。相反，他们就是复杂的血肉之躯。（到 18 世纪中叶，介绍“文坛”所有比较有名的“居民”大约需要用 40 余卷书了。）[294] 而且，为满足这个表面上虚拟领域的需要，实体的铸造厂、印刷所和办公室纷纷建立起来；通过向文坛倾斜，开发其才能，印刷商和出版商实实在在地大把赢利。[295]

早期迅速扩张的印刷业的许多领军人物表现出精明的实践活动与理想主义的混合，他们喜欢的地名有“大都会”和“乌托邦”，“伊柳塞拉”（Eleuthera）和“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就更不用说了。煽起宗教论争烈火的印刷机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对泛基督教主义和谐与宽容精神的兴趣，这就是一种悖论。批发机印书的产业使宗教、王朝和语言的边疆更加持久地固定下来，同时图书贸易商又靠开发国际市场而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印务公司接待异教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鼓动分裂的希腊人，把大批外国异见人士迎进他们的作坊和家里，并因此而对基督教学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一种悖论。丹尼尔·邦贝格（Daniel Bomber）或奥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在威尼斯的印刷所、阿梅尔巴赫或奥珀利努斯在巴塞尔的公司、普朗坦在安特卫普的作坊、维谢尔家族（Wechels）在法兰克福的印刷厂形成的
139 交往圈子都说明，在整个欧洲大陆的都市中心都分布着“多语种”的家庭。在宗教战争的时代，这样的印刷所成为微型的“国际会所”。它们给流落异乡的学者提供会晤、讯息交流、庇护所和文化中心合而为一的场所。这门新产业促进辛迪加和远程网络的形成，这些网络和近代早期商人开辟的棉布贸易和其他大型产业的网络不无相似之处。不仅如此，新的印刷业还促成了与知识界相联系的一种时代特征——不必世俗化却泛基督教化而且宽容；虔诚却又反对狂热；常常把外在表现出来的对各种教派的顺应与内心对异端信条的忠诚结合起来。

在稍后的一章里，我们将要更仔细地审视这个发展过程，审视促成这一时代精神的各种因素。[296] 请容我们在这里强调这样一种需求：我们要区分与图书贸易相关的泛基督教意识形态与更具派别色彩的秘密会社和异教，有些著名的印刷商就属于这些秘密会社和异教。至此，我们的描绘已经详尽：有些出版商和书商将自己的作坊和书店作为秘密活动的大本营，同时又进行正常的经营。[297] 由于他们的两

手活动，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在从事不明智的研究，把秘密会社的活动与大型的国际图书贸易的正常经营混为一谈了，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过分低估了表面上小型且隐匿的秘密会社影响力的强大杠杆。

> 在那些日子里，印刷商和出版商常常成为隐匿的宗教运动的中心。我们知道，伟大的安特卫普印刷商克里斯托弗·普朗坦是“爱之家”(Family of Love)的秘密成员……法兰克福的印刷商维谢尔在 1572 年在圣巴托罗缪屠杀[①]之后曾经给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及其朋友提供庇护。另一位维谢尔家族的法兰克福印刷商曾经保护过布鲁诺[298]……由于其家族长期与法兰克福印刷业的关系，印刷商约翰·西奥多·德布莱(Johann Theodore De Bry)应该了解，深层的欧洲思潮在这个大型国际图书贸易中心里流淌与混合……
>
> 16 世纪晚期的一切秘密运动可能都暗地里同情围绕选帝侯巴拉丁(Elector Palatin)的运动。我们知道“爱之家”是秘密会社……该会容许会员表面上参加任何教派，暗地里却要求会员与会社保持关系。“爱之家”这种态度……与共济会有相同之处。我们知道“爱之家”的秘密会员有许多是君王……印刷商德布莱家族和普朗坦的印刷公司有关系，可能也是其秘密会员……德布莱家族的公司迁移到普朗坦公司的地盘，而且出版了……“玫瑰十字会”感兴趣的书……这可能和他们对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里的运动暗暗同情有关系。[299]

140

由于不够谨慎，这几段话把掩饰与秘密作为各种群体与活动的共同因素来探讨，除此之外，这些文字倒给人启发。巴拉丁领地里的事件和大型印刷中心的运作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些事件又和首要的秘密活动有关系。“爱之家”遵从官方批准的宗教习俗，同时又悄悄地忠于自己的兄弟；就此而言，他们搞的这一套掩饰却是普遍的现象，不仅在 16 世纪的其他许多“外表天主教内心新教”(Nicodemite)的教派里也很普遍[300]，而且在许多“秘密基督徒”(crypto-Christians)和西班牙—犹太裔的“改宗者”里也很普遍，在后来的胡格诺派里亦很普遍，胡格诺教徒选择留在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国。断言所有这些群体“和共济会有相同之处”并不能使我们大有所获；或者更加准确地说，这样的论断使我们离题太远，因为它发挥过分，有点可怕，似乎像无限发挥。“16 世纪晚期的一切秘密运动可能都暗地里同情围绕选帝侯巴拉丁的运动”——这一判断似乎同样不明智。“一切秘密运动”这一

141

① 圣巴托罗缪屠杀(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1572 年 8 月 24 日，法国王室和天主教在圣巴托罗缪节前夜屠杀新教(胡格诺派)首领，由此掀起全国镇压新教的狂潮。

标签不仅包括宗教幌子，而且把任何乔装的代理人和间谍以及一切地下活动都囊括在内，“地下”这个标签颇具歧义。考虑到这样的掩饰活动主要局限于安特卫普和法兰克福，上述引文里的猜想把一个短暂的局部政治事件放大到涵盖秘密图书贸易达到的辽阔地域了。

规避审查、从事秘密活动的需要司空见惯，成为早期近代许多“正常”的大型图书贸易企业的重要特征。结果，公开和秘密经营的界线就很难划清。许多活动发生在朦胧的领域，人们常将其描绘为“半合法”、“半秘密”或“被默许”。即使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有共和主义倾向的自由思想家也不能依靠完全“自由的”出版界。

> 论敌的文献里对自由思想家的指控始终是，他们形成了一个阴谋集团或党派。史学家日益将这样的指控斥之为……官方的妄想，这不太明智。虽然大多数证据并未刊布，但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自由思想家互相认识，抱团，共同策划文字工程……早在 17 世纪 90 年代，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就是秘密会社会员……因为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姑且就用早期共济会对他们的指控吧。自由思想家……在许多场合的确用上了一些秘密手段。在不讨人喜欢的出版物可能会遭遇到迫害的社会里，他们偏好私密的甚至秘密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301)

不过，虽然担心因为不合宜的出版物而受到迫害，托兰德及其圈子的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还是用出版物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对托兰德本人的最恰当描绘恐怕是“宣传家”。他编辑或修订英格兰知识界的著作，谋求辉格党人的庇护，与“格
142 拉布街”穷困潦倒的文人为伍，为大陆上以荷兰为中心的法语出版业工作——无论做什么，他从未远离过一家又一家的印刷所。(302) 前不久才揭开了这样的事实：他的“秘密生活方式”包括重大的秘密关系，他通过“欢乐骑士团”与国际图书贸易网络建立联系；该骑士团 1710 年在海牙聚会，其成员在荷兰的出版业里占有重要地位，这里的出版业由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经营。(303)“欢乐骑士团”的秘书普洛斯珀·马尔尚(Prosper Marchand)是出版商兼书商，曾撰写早期印刷术的历史，参与编辑并发行培尔 1720 年版的《词典》(*Dictionarire*)。(304)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贝尔纳·皮卡尔(Bernard Picart)，他为培尔的《词典》做了扉页插图，这使人猜想，共济会里有一个特殊的“密涅瓦”艺术分部。“密涅瓦”常常和“墨丘利”等象征同时出现，反复出现在图书的扉页插图里，有一些共济会员特别喜欢这种插图。(305) 我们知道，密涅瓦也被印刷业选中，是印刷商特别尊崇的守护神。皮卡尔的铜版画技艺超群，所以行业内非常需要他的版画，他的版画被大量复制且广泛流通。(306) 这是我们反复
143 看见的现象。和印刷商的参与一样，版画家参与秘密会社的工作必然会无限扩大该会社的影响，因为版画和图书一样到处流通。

正常的批发业务拥有广阔的(偶尔秘密的)销售网络，但其运作常常和非正常的秘密会社特殊而隐秘的运作纠缠在一起，要将两者完全分开是很难的。普朗坦庞大通讯录上的每一个名字，连那些在他家住过的人，不应该全都算成是“慈善会”(Domus Charitatis)、“家园”(House)或“爱之家”等秘密会社的成员。并非每一本饰有贝尔纳·皮卡尔版画的18世纪的书都应该被当作18世纪初共济会的产物，并非每一处提及密涅瓦的文字都含有炼金术、神秘性或共济会的意思，甚至密涅瓦和墨丘利同时被提及时也未必含有这样的意思。约翰·迪伊在欧洲大陆上造访过那么多印刷商、书商，但并非他造访过的每个人都应该被说成是“和迪伊有关系的人”；迪伊和当时大多数著名的地图出版商、宇宙志学者和书商来往或通信，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根子就扎在“爱之家的世界里”。在这些事情上，已故的罗萨莉·科里(Rosalie Colie)提出了许多有用的指引，她还对阐明英格兰—荷兰的思想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试图把一群有共同志趣、关系松散的人说成是关系牢固的，那会遭遇到许多问题，把“爱之家”假设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万能药，那似乎超过了我们所知或所能知的情况……把这个假设作为了解一群知识分子的关键，似乎是相当冒险……因为我们可以证明，他们的关系只不过是一般的关系。(307)

如果把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之间的“一般关系”纳入这一背景，那就会遭遇更大的风险。这是因为你必须去研究那些“一般关系”，而一般关系总是和某种程度的秘密活动有关系。

1517年，伊拉斯谟首次写到文人的“密谋”时，是以一种相当轻松的语调：

> 似乎在一个信号的启动之下，世界各地的才俊都在躁动和密谋，以便复活最杰出的学问。当各国所有最伟大的学者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时，这不是密谋是什么？(308)

这些充满希望的文字发表不久，路德的反叛就爆发了，基督教世界的内战继之而起。自此，把伊拉斯谟的著作送进天主教国家的书店和私家藏书室就需要另一 144
种“密谋”。(309)特伦托公会议之后，在天主教欧洲的“文坛”几乎全都被迫转入“地下”。黑市书价没有给本地公司带来利润，而是给其国外的新教竞争对手带来利润。正如稍后探讨宗教改革图书贸易的一篇文章所示，《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反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不对称现象。新教徒的图书公司得到了一连串赚钱的图书，他们有广告宣传的自由，能够让潜在的天主教徒购书者知道这些书的存在。

从16世纪起，尽管官方不许可，天主教欧洲的文坛也壮大了，不仅是因为世俗

统治者与教士有矛盾，而且是因为审查官负担太重、效率太低或容易受贿。文坛队伍的壮大还有另外的原因：咄咄逼人的新教徒出版商提供了新的机会，对天主教地区出版渠道被堵死的作家造成诱惑。这种不对称使早期近代的科学向新教倾斜，稍后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同时，这对旧王朝下法国“知识分子的逃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语对欧洲的征服为法语血统的文人创造了特殊的机会。需要法语翻译时，他们对母语的掌握就派上了用场，即使在法语可能被绕开时，还有人向他们求助。不过，国际的法语出版业在荷兰很繁荣，在法国反而不那么兴旺。与幅员辽阔的波旁王朝相邻的小国创办了很多出版社，以便利用利润丰厚的秘密图书交易并开发人口众多的法语市场对禁书的需求。“从 1690 年到 1790 年的一百年里，大多数著名的法国作家的作品在整个欧洲都拥有众多的读者，他们的著作是在法国
145 之外出版的。”(310)

法国天主教国王治下雄心勃勃、才华卓著的臣民，昔日担任作家、家庭教师、秘书、法庭书记，或效力于贵族家庭，在这一百年里却受雇于外国新教徒开办的公司。要弄清楚他们为何“背弃”波旁王朝，新的职业生涯是值得牢记在心的。国际知名度的诱惑使他们的渴望从本地精英的目标转向国外的成就。各种背景、渴望成名的作家踏上了“危险的航程，走向名利双收的彼岸”。(311)他们舞文弄墨，为欧洲各地的印刷商写书。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他们成功地进入巴黎的沙龙和外国的宫廷（当然也还有人锒铛入狱、穷困潦倒）。有些人被才智未开的贵族当作侍从；有些人被其他贵族雇用；一些最著名的启蒙作家本来就出身名门，比如孔多塞、艾狄安·孔狄亚克（Étienne de Condillac）、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爱尔维修（Jean Helvétius）等。18 世纪其他的地区都不曾有过法国这样的氛围，这里的文人都希望依靠自己的奋斗而出名并获得国际威望，外国印刷所的需要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这些雄心勃勃的新人来自各个阶层，他们脱离了对本地的忠诚，在后世人的眼里，他们是捉刀人或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如果用不那么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但他们的地位不同于法国商人、制造商、医师和律师。他们的兴趣和生意人的兴趣也不一样，生意人在法国国内经营享有特权的公司。

> 启蒙思想家是文人。这并非一般的角色表述，而是界定了他们的观点。围绕他们作为哲学家的地位而展开的论争陈旧乏味，文人的表述有助于清除这一争论……对写作的热爱赋予他们力量，力量又来自于他们令人尊敬的行业身份……无论他们的关注如何千差万别，他们专一的生涯是写
> 146 作……(312)

这里所谓的“写作艺术”已经远离这段文字描绘的印刷业务。即使在18世纪,有些诗人和文人仍然致力于过去手抄书意义上的“写作艺术”,但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绝不是那种“写作艺术”。因为他们“专一的生涯”意味着将笔头用来为印刷机新的力量服务,只说笔耕已经不足以界定他们的“观点”[313]。不过,这段引文还是自有其长,因为它把启蒙思想家和一种特色鲜明的职业文化联系起来了。

启蒙思想家是一个新的文人阶级,而不是穿袍贵族、第三等级或王权的代言人。他们敦促人们信赖自己的理解,抨击教会,争取思想交流的自由,希望开明君主断绝与教廷《禁书目录》的合作,断绝与天主教宣传机器的来往。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他们施加的压力与众不同,我们有必要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传统的暴发户,他们不谋求被所谓的“封建反动势力”封闭的职位。

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了,对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文人而言,难道这不是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吗?从1600年到1756年,八百多作家、印刷商、书商和印刷品销售商在这里受尽牢狱之灾。[314]曾经在这里吃尽牢狱之苦的人用宣传手段逐渐把巴士底狱塑造成王权暴政可怕象征的具体形象。1780年,当兰盖(Simon Nicholas Henri Linguet)被投入巴士底狱时,格林(Heinrich Grimm)说:“阿雷蒂诺(Aretino)的职业始终有风险。”[315]直到今天,巴士底城堡的导游和许多史学家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述攻陷巴士底狱的讽刺意义,耗尽如此众多的人力去攻陷的监狱里只囚禁了七个人:四个制造赝品的人、两个“精神病人”,最后一位是萨德侯爵。然而对那些从事“阿雷蒂诺的职业”的人而言,完全摧毁巴士底的目的绝不是反常的,这些人正是7月12日下午骚扰王宫的人。聚众攻击巴士底的人寻找炸药,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瞄准群众的大炮,他们心中想到的是收费的路障和面包的高价。对那些欢呼巴士底狱陷落的人而言,它像是另一种暴政的象征。那些宣传鼓动的人将继续不断地放大攻陷巴士底狱的意义,他们在一代又一代的国王和皇帝的统治下维护了共和制传统的活力,直到7月14日成为法定的、每年举国庆祝的节日。

这个新的文人阶级的影响,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课题。[316]争论中常见的观点是思想与社会行为的关系。印刷术的具体效应则很少进入这场争论。然而,如果不考虑印刷术的效应,无论是启蒙运动宣传的冲击力还是头脑的无形碰撞形成的冲击力都是难以理解的。毕竟,使人能够与著名的哲学家间接相会的是印刷术,我们因而知道,原来哲学家和我们的思想感情还是相近的。他们勇敢地说出了我们被压抑的心灵对话。他们详细论述你不能够在仆人、父母或邻居面前议论的事情,而且颇有说服力。这样的邂逅不会留下多少明显的印记,仅有的痕迹或许是在破旧的书页上翻检过的指纹,或许是偶尔冒出来的对心仪作家的充满青春激情的评论。怕人非难,孤独感,本地社群力量的制裁,顺从传统权威的习惯——即使在默默无闻、穷乡僻壤的读者身上,这一切压力可能都被削弱了,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内心

深处的信仰原来和流行而著名的作家有相同之处！再者，印刷术似乎是独特的非人格的媒介。有了印刷术的帮助，神职人员布道鼓动时，老师对聚众者讲话时，似乎就比能在社区里被耳闻目睹的人更有权威了。

多种版本推出、以前难以想象的思想经过反复刊布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社会行为，这是间接的、远程的行为。

> 革命精神显然不是在静默和独处中形成的。你可以撰写革命的著作，但如果其中的思想并未在热烈的交谈、讨论和舌战中得到发酵，你的著作只不过是不冒犯人的玄想而已。若要成为有力的思想，它们必须要影响公众……(317)

148

然而，印刷术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接受思想力量的新型的公众。(318)这个新型的阅读公众未必都公开宣讲自己的观点，其成员未必经常光顾政治面貌已为人知的咖啡屋、俱乐部或沙龙。他们是静默、独处的个人，常常互不相识，其联系纽带仅仅是书店、图书馆或讲演厅，或者偶尔在这里那里存在的“通信社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319)

那些早已走进坟场的，生前静默、独处的读者究竟想过什么，我们实在是无从知晓，没有把握。面对读者在自己的作品里读出来的意思，作者们常常会感到吃惊。每当你试图解读其他读者的脑子时，你都必须为不确定的东西留下广阔的余地。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显示余地何在，因为不确定性是不能消除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是有用的。交往互动不能用回顾来确定，也不能够靠前瞻来确定或控制。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去思考启蒙思想家对公众的间接影响，所以我们寻找 1789 年使法国人躁动不安的那只陌生而无形的手时，就毫无斩获了。波旁王朝的法兰西子民原本是遵纪守法的，可是他们那一年的行为却让人大吃一惊。如果我们绕开他们令人吃惊的行为引起的社会心理问题，那些创造神话的因素就会不请自来，我们的辩论就会集中在详细描绘的结论上，不确定性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49

倘若把印刷术的各种影响考虑在内，围绕共济会、读书社团和法国革命里的密谋神话就可以比较好地理解了。(320)这种现代神话的底层都隐匿着有关秘密、宣传、复制和审查的新形式；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仔细检视这些问题。容我顺便指出，关于密谋的假设一般会被推动而不是被驱散，因为不赞成这种假设的意见往往会突然止步。有关的文献越来越多，气氛越来越紧张；怀疑和相信密谋说的人都难以说服对方。(321)一种静默的传播系统产生了多种无形的互动，论辩双方都倾向于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双方的大多数人都同意，笔杆子被用来指控天主教徒、共济会员、雅各宾派、耶稣会士、犹太人搞密谋时往往会毒化气氛。如果这一观点不错，舆论

的气氛就可以受到笔杆子的影响，因为调动笔力的目的至少是回应舆论。起初，密谋的观点是叛乱煽动者搞暗杀阴谋或煽风点火，后来它变本加厉成为一个庞大的令人生畏的网络，这个由秘密大本营控制的网络在遥控指挥追随者奉命行事。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从一般密谋到秘密网络的发展过程，我们就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早期近代欧洲“媒介事件”的性质，就需要对“远程社会行为”的可能性更加敏锐。(322)

凭借探索不同群体的作家和读者新型而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就可以澄清许多其他的进展情况。比如，和新近创作中的虚构世界接触的间接经验既影响人的头脑又影响人的心理。(323) 阅读小说产生的通感可能有助于支撑各种人道主义运动。和印刷材料的接触磨砺了人的计算能力和抽象能力。新的想象力和同情心也发挥了作用。应该记住，在使用印刷材料的人中，诗人、艺术家、社会改良家和憧憬未来的人毕竟是少数。“由于使用印刷品和纸张的习惯，思想失去了流动的……有机的性质，获得了抽象、分类、刻板的属性，满足于纯粹语言的表述和语言的解答……”(324) 虽然芒福德和麦克卢汉界定的“印刷人”是一个后浪漫主义的构建，有别于“古典的”“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形象，但这一构建在抽象性和刻板性上并不比其先辈稍逊。相反，在麦克卢汉的笔下，18 世纪的人“锁定在一个封闭的视觉体系里”，这似乎是他试图诊断的病症：印刷术和纸张的产物，和麦克卢汉天才的另一产物构成了门当户对的伴侣：“机器新娘”。

这类构建看来与使用印刷品和纸张的习惯有关系。毫无疑问，如果血肉之躯被看成统计数字的平均数，或成为刻板的角色扮演者，那会产生不幸的后果。但 15 世纪以后，许多读者又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书本学习是有局限的。比如，16 世纪的读者从帕拉切尔苏斯①及其追随者那里获悉：“病人应该是医师学习的书本。”(325) 本书稍后一节将要显示：印刷术培养的不是语言表述，而是一切人和团体的行为——政治人、本真人、天人、地人的行为；早期近代许多作家鲜明地感觉到并有力地表达了万物的习性，结果，对书本学习的谴责本身成了迂腐的陈词滥调。到了 18 世纪，长期的学校教育已经在开始替代学徒训练。然而，这时的读者不必等后世的约翰·杜威或马可尼②和电子媒介(326) 就可以理解“靠行动学习”的价值。许多 18 世纪的家长和老师非常用心地听从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提出的原则。自我的意识或某种程度努力表现出来的“自然举止”都是“靠读书学习”的

① 帕拉切尔苏斯(Philippus Aureolus Paracelsus，1493—1541)，瑞士医师和炼金术士，发明并使用了多种化学新药，著有《外科大全》和关于梅毒的论文。

② 马可尼(Marhese Guglie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工程师、发明家，1901 年把长波无线电信号传送过大西洋，1909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151 副产品。“靠读书学习”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对印刷术养成的抽象概念的谬误保持警惕。

此外，多样性仍然是读书人生活的调料。正如都市人喜欢乡村空气一样，由于阅读对生活的调剂，触觉、听觉或其他感知留下的体验可能会更加鲜明而深刻；由于在户内生活的间歇享受，户外生活的体验因而更加鲜明而深刻了。由于更加有意识地把这样的体验当作审美的、独立的活动领域，人们更加有意识地享受这样的体验。听音乐、搞园艺、观鸟或品尝美食和“印刷人”的生活是协调一致的。新文学家表现出非凡的鉴赏力，他们单凭文字就可以创造出味觉、触觉、嗅觉或声音，就可以完成更加仔细的感官体验的观察，然后又将这样的体官体验传递给读者。

事实上，一切创造性艺术都被印刷术改变了。有人认为，手抄书时代结束以后，西方音乐、艺术和文学的伟大时代开启以后，人的体验反而贫乏了，他们应该对印刷术改变艺术的方式予以考虑。毫无疑问，习惯欣赏巴赫赋格曲和贝多芬交响乐的耳朵并没有变得更加迟钝；画家在画布上表现的风景和人物并没有使人的眼光萎缩。正如贡布里希所言，早春时光你在林间漫步时，你“看见”了柯罗[①]似的风景画，你的视觉感知随之改变；你瞥见一碗水果时觉得“看见”了塞尚[②]，于是你的视觉感知也随之改变。艺术家改变听觉和视觉感知的能力拓展到文学领域，因而丰富了而不是妨碍了人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拓宽了而不是缩小了对各种人体体验的共鸣。一代又一代的技艺高超的小说家学会了模仿生活里的色彩、嗅味、噪音和质地粗糙的的东西；他们模仿一代又一代人不同的声音，表达岁月的流逝，达到了吟游诗人望尘莫及的程度。一代又一代的小说读者间接栖居在许多不同的环境和时代里，这是有道理的。

常有人说，阅读“轻松小说”提供的消遣使人能够“逃避”枯燥、单调、乏味的生活。但鲜有人注意到，小说读者间接参与许多虚构世界的生活以后，他们的真实生活似乎更加单调乏味了。在 19 世纪，最常见的是对无聊、厌倦的抱怨，对日常生活难以忍受的单调的抱怨，不是来自于劳苦工人、窘迫的商贩或店主，而是来自于文
152 人。拉马丁[③]宣告“法兰西感到厌倦”，缪塞[④]述说“世纪病”。人们相信过去比现在色彩斑斓，异域风情的地方比家乡更吸引人，现代社会生活单调乏味完全是“印刷人”的特征，尤其在畅销小说出现以后。

---

① 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法国画家，因其意大利陆上风景素描而著名。

② 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法国画家，后印象派头面人物，西方人尊之为“现代绘画之父”。

③ 阿方索·拉马丁(Alphonse Marie Louis de Prat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政治家，代表作有《沉思集》、《吉伦特派的历史》、小说《葛莱齐拉》等。

④ 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作家、剧作家，浪漫主义运动领导人，代表作有抒情诗《夜歌》、剧本《罗朗札齐奥》、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等。

在此，我们不妨再次指出，小说家也可能是小说的读者。无论诗人、小说家或历史传奇的作者，所有的文学家都更加充分而刻意地探索新媒介。不仅如此，像早期的印刷商一样，他们还以笔力雄健的文字记述大量增加的印刷品对人产生的影响。读者人数的增加对文学家的视野产生影响，同理，书报杂志流通的日益增多也影响到文学家对社会的看法。文学家反映时代精神主要是以读者的身份，他们把学究型哲学家灰色的、抽象的观念转变成一把新的钥匙，用生动而具体的直观形象来体现这些观念。[327]一方面，形象塑造者被赋予了改变感知的力量，另一方面，思想责任又被托付给枯燥无味的学究和科学家——这一劳动分工始终是印刷文化的特征，直至现在。

印刷术发明之后，文学市场的扩张造成了多种紧张的气氛，近年的几种研究成果对此做了阐述。[328]但尽管有这些成就，有一种倾向依然存在：讨论文学的商业化或赞助人制度的消逝时，人们还是倾向于察看文学家创造的形象的表面价值。本来是传播革命的力量塑造了社会情况，但人们总是经常把“工业”社会的出现说成是社会变化的动力。从一开始，作者署名权的问题就和新技术关系紧密。正如费弗尔和马丹所言，印刷术之前，“文人”(man of letters)这个语词还是新词。[329]贵族赞助人的浪漫形象往往使更加平民化、平凡化的早期资本企业家的形象模模糊糊；这些企业家自己不以学者、翻译、编辑和编纂者的身份工作时，就雇用学者、翻译、编辑和编纂者为自己工作。作者往往以准业余的身份工作，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8世纪。其原因有：手抄书时代的誊写人从来不付钱给作者；新书只不过是早期图书贸易的一小部分；文学劳动分工模糊不清。在这段时间里，印刷商既给作者提供赞助，本人也是作者，同时又寻求官方的支持，以获得一些权利和荫庇。那时的文人和学者是熟悉印刷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这一点常常被后世的观察家忽视。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特别把知识分子挑选出来，认为他们缺乏“与任何生机勃勃、功能完善的社会阶层的直接接触”。

> 独居在书房里的研究和对印刷品的依赖使他们只能获得社会过程派生出来的观念。难怪这个社会阶层长期意识不到变革的社会性质……当这些后来者登场时，无产阶级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330]

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的兴起标志着社会意识成长的最后阶段。”而我则认为他本末倒置。大多数16世纪的文坛居民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印刷所里，而不是“独居在书房里”。所以，他们直接接触“生机勃勃、功能完善的社会阶层”。伊拉斯谟那个时代还没有在排字盘上撰写自己著作的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时代也没有这样的作家。实际上，早期印刷机的操作简单，所以美国文人可以担任自己的印刷商——正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担任自己的书籍誊写人一样。

识字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手握一册莫克森(Joseph Moxon)的《印刷机操作手册》(Mechanick Exercises,1683)就可以从头到尾自学印刷技术。在伦敦，机器操作的简便不是人们考虑的首要因素……但在偏远地区和殖民地却至关重要。在那些地方，操作熟练的印刷商必要时可以独自调和油墨、轻松完成排印、操作机器、烘干一页又一页的印张，甚至手拿报纸到附近的客栈和咖啡屋去出售和分销；如果他没有学徒，或者找不到为一分钱的工资而替他跑腿的
154 人，他就只能事必躬亲。这个过程是自学者的天然学堂；对于能够实际撰写并完成整个印行过程的作者而言，成长为作家的道路是敞开的，这是双重意义上的撰写，在笔头上和排字盘上的撰写。两位功成名就的作家马克·吐温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样自学成才的印刷工。(331)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印刷所里的工作可能还引起了曼海姆这类社会学家的兴趣，他们关心的是社会活动如何进入人的世界观。但正如本书稍后研讨韦伯时所显示的那样，社会学家忽视了富兰克林从事的具体活动，这令人感到奇怪。在曼海姆笔下，近代早期的思想社团包括大学、朝臣、宫廷、沙龙和学苑；然而对提供工作、食宿和各种交往的印刷所却只字不提。在早期近代欧洲的许多都市中心，文人中的“历史和社会意识”比其他社会群体里的历史和社会意识都出现得早。即使到了19世纪初，沃尔特·司各特①这样一位职业文人还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我喜欢听印刷机的轰鸣，喜欢那余音绕梁的哐啷哐啷声。这为我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我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工作。”(332)如今，“独居的书房”是许多知识社会学家的工作环境，但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情景追溯到很久以前。无论如何，从16世纪到18世纪，知识分子、工匠和资本家是没有脱离接触的。

但即使在这个历史阶段，诗人、剧作家、寓言家、讥讽作家和传奇故事作家也体验到对技术怀抱那种比较间接的和爱恨交织的感情；他们和“宫廷与都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身处享受王室恩典和出版商补贴之间却没有得到安慰。之所以心情矛盾，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究竟是应该服务于缪斯女神还是服务于印刷商，是应该从事“神圣的艺术”还是“唯利是图的工作”；早在17世纪，这种矛盾的心态已经在法国文坛表现出来。(333)这些“爬格子的人”是一个地位不稳定的群体，贵族常常对其鄙夷不屑。没有任何与地位、优先权和等级相关的传统机构或体制会考虑他们
155 的存在。高居庙堂时，他们是品味的仲裁者，如有神助，“不食人间烟火”；地位低下时，他们把作品送到市场上公开兜售，或为追求恩宠或为获得报酬。他们的地位在

① 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作品有长诗《玛密恩》、《湖上夫人》，历史小说《威弗利》、《艾凡赫》等。

这两级之间徘徊。所以，新型造纸厂、蒸汽印刷机和大规模的小说读者群出现之前，这些卖文为生的人处在两极紧张状态中，扮演着完全矛盾的角色。随着市场的扩张，随着新读者群的开发，这样的紧张状态有增无减。

能干的商人或专业人士曾经是早期印刷商天然的盟友，后来却成了专业作家或著名诗人的天然敌人。辛勤工作的人依靠的是事实和数字，凡是苦于谋生的人都无暇读小说或诗歌。十几岁的书虫、年轻的学徒和职员以及众多的女性读者更可能有心绪去读小说或诗歌并受到感染，他们有想象力去阅读、被吸引而难以自拔。对休闲的强烈兴趣，推动玩乐和休闲的价值，培养对“高雅”物品的消费，这一切都精心嵌入了一切小说家和诗人（及其他艺术家）的技艺中。19 世纪唯美主义者的浪漫信条只不过是把审查制度的卫道者和讲究实际的功利主义者的价值颠倒一下而已。19 世纪的原理是，唯美的眼光更有道德价值，更有用。在不安的妥协中，优越的历史尊严和精神价值与畅销书生产得到兼容，畅销书像毒品一样好卖；在这样的妥协中，图书广告上了日报。格拉尼阿（César Graña）注意到一种矛盾的现象[334]：作家抱怨被无情的、缺乏想象力的庸人误解时，那只不过意味着书卖得不顺利。

对得到并保持读者注意力的焦虑嵌入了新职业作家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必须要牢牢扎根，抗衡对手的激烈竞争；不仅如此，即使获得了一本接一本出书的空间，即使得到文学刊物的青睐，他们也必须要反制捕捉新闻要目的政客、购买版面的广告商以及新闻记者的干扰。专业作家获得的金钱报酬和威望依靠印刷品的宣传，就像商行的金钱收入需要宣传一样。受人尊敬的地位不是靠名气获得的，而是靠丑闻的轰动获得的，和资产者的交易也是有利可图的冒险。商界人士或专业人士可能会受到冒犯，但用小说吸引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在这种特别的游戏中，女性读者或年轻读者很容易被这种间接的参与吸引，他们不会惧怕。[335]对丑闻的追逐决不仅限于对体面的爱家男人的攻击。“除非有一具开始腐烂的儿童尸体吸引人，否则就抓不住读者……读者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愚笨。”[336]如此追逐越来越刺激或震撼效应的心态，难道不能解释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所谓的“浪漫的痛苦”吗？

许多作家厌恶别人搞庸俗的轰动效应，但他们却不会放弃自己制造轰动的希望。独自握笔书写，远离印刷所和铸字作坊，同时又远离摇摆不定的读者，而读者正是他名誉和机遇之所系，这样的作家不仅仅是反映产业社会或都市化社会里别人的异化的镜子，他们本身就是异化的人，拼命倡导休闲，追求他鄙视的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挑动妻子斗丈夫、儿子斗父亲，即使到了暮年还要讴歌青春。不过，即使新的工厂、矿山、矿渣场不曾在历史上出现，由于继续不断的传播革命的推动，他们可能还是会产生怀念手抄书文化的情绪，还是会担心文化的混乱和品位的庸俗化，

还是会把公众看成是多头怪兽，还是会抨击“金钱关系”和无情的商人。(337)

在19世纪，大多数最敏锐的艺术家、最有才华的塑造形象的作家都完全放弃了兼容商业技巧和不朽角色的努力。日常的谋生和生产成功作品的努力是脱节的。最“原创性”、最吸引人的形象是在避世的象牙塔中炮制出来的，其服务对象则是小群的鉴赏家，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维持对缪斯的信仰所得的报偿往往在死
157 后才能得到，一般是在文选的最后章节里得到后人的确认。但印刷术的保存功能使这个崇高的志向越来越难以实现，一代比一代难。一代人的声音越高亢，下一代人受到的震耳欲聋的静电干扰就越严重。在随之产生的各种反应中，可以挑出两种予以考察：一种是博物馆文化，保存在文选和课堂里的文化，它受到猛烈的抨击；另一种是现代文化的“无政府状态”，维持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受到怀旧情绪的批判。反过来，虚无主义的意象比如“过往历史的垃圾”和“当下的荒原”又被恪尽职守地记录下来并得到阐述。目前的一些文选的最后章节里就含有这样的意象。（你不妨说，这些意象将当前这一代学者介绍给社会，当前这一代学者正在走向成熟。）这一机制过去引进了作者的身份，将成名的驱动力用于印刷术确保的不朽；同样，这个机制又使文坛人口过剩。“历史的包袱”积累越多，对付这个包袱所需的力气就越大。不断展开的革命的后续阶段促成了文化悲观主义，但我们无暇在此探索这个主题的多重变异。

这一段偏离近代早期主题的文字仅仅是为了说明，当我们试图构建过去几百年里文学精英的经验时，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焦虑不安，即恒久而累积性的印刷文化带来的焦虑不安。我们试图理解近年来变得日益尖锐的文化危机感时，也需要考虑这些焦虑不安。鉴于新电子媒介可能带来的干扰效应，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最后这一点因素。无论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古老的文学主题还是在继续被放大，剧作家和歌词作家还是在通过广播电视放大这些文学主题。再者，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围墙的图书馆和和博物馆开始萎缩了，也没有迹象表明，今日精英肩负的历史重担在减轻。因此我说，虽然我相信手抄书文化已经结束，但我不相信你可以说印刷文化业已走到尽头。印刷术的影响似乎一直是不平衡的，然而自15世纪晚期以来，这些影响从未中断，且不断积累。在这几百年的时
158 间里，我找不到这些影响不发挥威力的时候，也找不到它们有所减弱的时候。我找到大量的证据显示，它们延续至今，力量日增，直至现在。近年有人为谷登堡时代唱挽歌，说明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338)然而这些唱挽歌的人中几乎没有史学家，这说明其观点似乎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从许多方面看是不成熟的。

另一方面，此刻在这里作最后的结论也为时尚早。这一节导论的意向是开辟未来研究的领域，而不是提供下结论的基础。请容我简略小结如下：五百年前，一种复制手写文字即人工缮写艺术的新方法开发出来并用于实践。“印刷术给西方

文明史的精神生活条件带来最急遽的变革……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或早或迟都感受到印刷术的影响。”目前，我们要考虑印刷术“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产生的影响”，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影响孰早孰晚，也不清楚这些影响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明快的理论业已过时。这一部分导论仅仅是做了初步的勾勒，迈出了理论建设的第一步。其宗旨是刻画课题的全貌，显示一些被忽视的影响，说明印刷术可能对许多不同形式的历史变革产生的影响。

在以下章节里，一些发展过程将得到更加仔细的考察。一些可能的关系和联系将予以探索，目的是为一些初步结论提供一个基础，就传播变革对三种运动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在塑造现代思想中，这三种运动似乎具有战略意义。

第二部分

Part Two

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重新定向;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再评价

PDG

第三章
古典复兴的重新定向:文艺复兴的两个阶段

3.1 本章概说

我们都知道……15 世纪前,一切欧洲书籍都是手抄的,此后,大多数书籍都是机印的。我们还知道,在同一世纪里,西方文化的中世纪特征不复存在,其近代特征则十分明显。但我们很难逼真地构想这些技术变革和文化变革之间的联系,只知道它们发生在同一时期。[1]

这段话是一位图书馆学教授于 1940 年写下的,它描绘的情景似乎仍然如在目前。虽然技术与文化关系的问题一直是不断积累的文献研究的课题,但印刷术的出现与 15 世纪文化变革的关系尚无人探索。部分原因是,描绘关系本身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巴特勒接着说,"一旦我们的思想深入事实",一种"密切关系"就不言自明。然而我必须承认,我难以想象他心中想到的"密切关系"究竟是什么。虽然从手写书到机印书的变革可以被认为是已知的事实,但那并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正如上一章所示,15 世纪发生了许多彼此相关的变革。

我们转向方程式的另一边时,事情之复杂不亚于此,甚至还更加模糊。我们是否真的"都知道"西方文化究竟在哪一个世纪变成了"显而易见的近代"呢?史学家们更可能会承认,他们知道围绕这一点的争论所积累的大量文献。因为不存在共识,只存在没有结论的长期争论,所以你可能禁不住要将这个问题斥之为语义陷阱。然而,历史理论和历史事实是有区别的。从理论上说,断代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但从实践来看,的确划定了一些明确的界线。在大多数教学计划和学术刊物里,已经划定的界线似乎支持巴特勒的观点。从反映在授课和文章里的学术分工来看,15 世纪似乎真被当作了这样一个间隔期:中世纪研究专家的专长在此结束,早期近代欧洲史专家的专长从此开始。

163

然而我们在此还得重申，事情并不像局外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当你考虑《反射镜》(*Speculum*)和《现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这类杂志的政策时，这一分界线似乎很自然；然而，当你考虑《文艺复兴研究》(*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这一杂志时，同样的分界线似乎就很武断，甚至使人误入歧途。大多数文艺复兴学者认为，印刷术的出现太迟，不能被当作转入近代的出发点。他们认为，这个转折的起点始于乔托[①]和彼特拉克这两代人，始于古典复兴的时期，而古典复兴在15世纪初就颇有势头了——离谷登堡着手搞印刷术还有一段时间。在勾勒巴特勒暗指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革之间的联系前，你必须首先解决一个论题：他所谓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革并不同时发生，而且主要的文化变革在手抄书文化时期就已经发生了。

印刷术在德国美因兹开发之前，“文艺复兴”就来到了意大利，这一点可以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定论。然而，纪年排序容易解决，断代却仍有问题。在手抄书时代，彼特拉克就在意大利复兴了，证明这一点是一回事；但为何彼特拉克及其追随者被认为是时代变革的动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另一回事远未得到确认而不可动摇。布尔克哈特认为，我们应该把彼特拉克时期的意大利人当作“近代欧洲的第一批孩子”，自此，他这个观点引起的争辩就不绝于耳。由于在时代变革的动因

上缺乏共识，许多史学家倾向于回到过渡时期的观念——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三百年时期。此间，西欧被认为经历了类似于化学反应的文化阶段。[(2)]然而，和液态变固态或气态那种化学反应不同的是，这个文化过渡阶段的性质从来就没有被准确地加以界定。我们被告知的是：“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或“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或“某种难以估量地迥然不同的东西”发生了。[(3)]“某种意义重大的、革命性的东西发生了……我们不妨继续将这个某种东西称为文艺复兴。”[(4)]这是最近一篇书评中就这个熟悉的主题所作的总结。然而，“这个某种东西”的性质却难以把握；在穷追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确定性始终挥之不去。1920年，赫伊津哈[②]问道：“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变革？其构造成分是什么？其结果又是什么？”[(5)]这个问题始终找不到清楚的答案。

因此，有一些学者反对说，赫伊津哈这个问题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他们看见，早在12世纪甚至更早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另一些人看见，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17世纪甚至更晚；但从12世纪到17世纪这段时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革。

---

① 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6？—1337)，佛罗伦萨画家、建筑师和雕塑家，文艺复兴之前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

②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欧洲著名古典学者，擅长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等。

有人为某些目的而拖长中世纪，另有人将近代提前，以便弥合想象中的鸿沟，并消除用过渡时期来弥合鸿沟的必要性。因为两派都用“文艺复兴”这一术语去指一种特殊的古典复活和审美风格，所以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就被捆绑在一起而产生意义上的混乱。把这个标签引申到涵盖整个过渡时期而产生的混乱就引起进一步的争论。根本问题是：无论用何标签，这个时期是否包含重大的历史变革，故而必须要单独断代；或者说这是一个虚假的构建，故而必须要予以抛弃。这场争鸣有一个应该予以反对的特征：它主张双方在默许中跳过一个的确发生了的变革，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一个难以清楚界定的假设进行辩护。

赫伊津哈认为，为了解决文艺复兴问题，我们应该着力的出发点是：将中世纪 *165*
与文艺复兴对比，文艺复兴与近代文化对比。[6] 与此相似，华莱士·弗格森(Wallace Ferguson)呼吁“系统分析中世纪文明与近代文明的基本差别，分析这个过渡时期的特征究竟是什么”[7]。不过我认为，换一种方式可能会节省学者们的精力，我们可以从回答那个问题着手：“这个过渡时期的特征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回答直截了当，且言简意赅。我们不妨呼应一位 16 世纪的纪年史家说，在保留给这个时代的新事物中，“印刷术值得被置于榜首”[8]。采用这一策略后，我们就可以绕开围绕模棱两可的标签或构建而进行的争辩。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指向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是 15 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情，而且是西方历史其他时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从可操作性来看，“中世纪”、“近代”之类的语词标签是难以界定的。它们意指的具体现象难以操作，系统的分析或有用的比较几乎不可能实现。相反，对手抄书和机印书差异的分析所需要的却是检查具体的客体，是特定群体的活动。如此，不同的解释必然要建立在考察相同的经验数据上。不仅其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一组变化(不像“过渡时期”那种抽象的观念)，而且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过渡也是整个欧洲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变革。在几十年里，印刷所就遍布整个欧洲的都市中心了；到 1500 年，印刷品产生的影响就业已记录在案。如果和 1250—1550 年或 1300—1600 年那样的三百年比较，早期机印书的时代的确是很短。也没有必要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去寻找重要的转变。相反，为了寻找早期的文艺复兴，你不得不离开巴黎及其附近的哥特式教堂和神学院，翻越阿尔卑斯山，步入意大利。当你考虑 1350 年至 1450 年间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你难免要问：和富有特色的地方情况的接触是否已经被误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呢?然而，如果你在 15 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漫游，你却可以跨越各种欧洲边疆——从埃 *166*
特纳火山到斯德哥尔摩以北，从大西洋海滨到东黑山——你都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主要的都市中心里，同类型的新建印刷所几乎都在用一切西欧语言印制书籍。[9] 新的行业比如排字工和铸字工行业正在出现；金属加工工人、商人和学者开

发的传统技艺正在被用于新的目的。在一切地区，新的职业群体正在被世俗的企业家调动起来去开发新的市场，去拓宽贸易网络，并在年度书市上展示自己的印刷品。到 1500 年，你可以有把握地说，抄书人时代已经结束，印刷术时代业已开始。

那么，在一个时代何时终结、另一时代何时开始的问题上为何如此争论不休呢？为何围绕假设的过渡期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争论不休呢？尤其要问，为何有这么多错误的开端呢？如果用语气比较缓和的方式问，为何把两个阶段的动态捆绑在一起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呢？人们总是把手抄书文化最后一百年的情况和印刷文化最初一百年的情况混杂起来，制造一个麻烦的过渡时代，从而掩盖了真正的革命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你也许会说，书籍生产的新方式必然会被削弱或延迟，因为它不能影响文盲，起初只能够影响少数精英。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驳倒这种意见，而不必担心对 15 世纪的文盲率了解不够。这是因为有些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审视的仅仅是识字的精英；他们或者强调 16 世纪以后的“中世纪世界图像的遗存”，或者接受彼特拉克将异教黑暗和基督教光明本末倒置的观点，并将其作为新文化时代的出发点。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更加清晰地聚焦：有人告诉我们说，印刷术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最重要的事件；“在西方文明史上，它给精神生活带来了最急遽的变革”[10]。但思想史家和文化史家始终未能在自己的断代史图表里为印刷术找到一席之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似乎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这个急遽变革本身看
167 似矛盾的性质。我们不要把印刷术的出现和其他革新联系在一起，也不要把它当作另外一种发展的例子；我们必须要把印刷术的出现当作一个事件单独挑选出来研究，它自成一体，用传统的历史变革分类来研究印刷术是不恰当的。

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书籍生产、发行和消费的条件。但这种改变的完成方式是很具欺骗性的——它不是靠抛弃手抄书文化的产品，而是靠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复制手抄书文化的产品。机械手段复制的技艺（*ars artificialiter scribendi*）[11]首先是一种复制的机制。尽管手抄书文化的条件业已过时，但反映这些条件的文本却更丰富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精灵被释放出来了。

后世的学者回顾印刷术的第一个一百年时，除非事先知道去搜寻什么，否则他们看不到新文化出现的迹象。如果靠扫描书商的销售目录去搜寻新书，他们不可能探查到印刷术最重要的变革。这种扫描和搜寻的活动本身就阻碍了认清一个新的迹象：频繁使用书名页就是这一百年里的新迹象（书商的销售目录也是新迹象）。诚然，那时健在的作家从印刷商那里得到的服务胜过作家从抄书人那里得到的服务，但已故的作家也会得到印刷商同样的服务。这种新技术起初产生的最革命性的影响仅仅是增加幸存文本的产量——无论这些文本出自何方。

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常常被忽视。人们注意力的焦点通常是去判断，早期

印刷商的库存里是抄书人的库存目录多还是当代作家的书目多。这种幼稚的设想是，如此搜寻到的证据就足以说明，印刷商是否促进了新思想的流传。在这个基础 168
上，他们判断印刷术对认知进步的贡献。既然证据本身是含混不清的[12]，既然 15 世纪最“新”的著作有一些是旧著作里的典范，而印制出来的旧著作看上去是新的，那么互相冲突的解释必然就会产生。一位权威作家写道：印刷商非但没有横扫旧著作，“他们人为地延长了苟延残喘的中世纪文化”。另一位作家却说，早期的印刷商急于把新书推向市场，以至于斩断了当时的读者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联系。[13]这种互相矛盾的评论削弱了印刷术影响西方文明的信念。如此传递的文化变迁的印象太含糊、太混乱，所以它不会在历史记述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记。

正如上文介绍印刷术的传播功能时所示，印刷商起初对“学科发展的贡献”，与其说是靠推销所谓的“新”著作，不如说是靠给个体的读者提供更多的著作。流通图书纯数量的增加实际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扩大的图书生产改变了消费模式；增加的产量改变了个人购书的性质。16 世纪读者读书的口味和 15 世纪读者的口味有质的区别。他们的主要读物更丰富了，他们的思想酵母更强大了，无论他们读的书是在世作家的书还是已故作家的书，是“新”书还是“旧”书。但身处 20 世纪的观察家追踪昔日思想风格的趋势或转变时，往往处在不利的地位。

现在观察家计算法学、神学、科学和文学图书的数量时，或细读相关的文本时，都会发现，在 1450—1550 年和 1350—1450 年这两段时间里，欧洲的书籍文化并没有显著的不同。[14]同时，他们还意识到一个不断展开的文化运动，这是由 14 世纪到 16 世纪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意大利艺术家和文人支撑起来的文化运动。因此，他们倾向于把手抄书文化的最后一百年与印刷文化的最初一百年合在一起。文艺复 169
兴的新书给他们足够的准备，使他们在走向 15 世纪末的过程中发现，古典文本和人文主义文本都越积越多。但即使哥特式风格定型、“新学”(new learning)启动以后，悠久的古典著作、学术概论、亚里士多德评注和骑士传奇等书籍仍然在大量增加，这倒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当他们进入 16 世纪初时，他们可能会发现有一点倒退的现象。不过，用拉丁文或通俗语撰写的新书也更加丰富了，所以我们要为某些混乱的交叉潮流留一些余地。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思想航程中，当今的观察家不可能在 14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中叶这一段时间里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发生过一场文化和思想革命。至于艺术社会史，一位权威告诉我们说：“在 15 世纪……诚然，一些事情已经成熟，但没有任何绝对新的东西发轫。”[15]另有一篇记述天文学动态的文章说：“15 世纪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意义重大的突变成分。”[16]

在稍后的一章里，我希望说明，雷乔蒙塔努斯(Johann Regiomontanus)15 世纪在纽伦堡创办印刷所时，把意义重大的突变成分引入了天文学研究。在本章里，我想要说明，印刷术在复活古典的过程中产生了突变。这一观点采用的方略和本章

题解的引语有所不同。我研究技术与文化变革的关系时不采用巴特勒的路径，他把两者当作同时发生的现象；相反，我认为两者发生的时间不一样，我研究两者如何互相影响。让我们姑且把确定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问题搁置一边，把意大利的文化复兴作为起点，这个起点走在印刷术之前。既然文化复兴业已开始，我们不妨问：这一场文化复兴如何受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的影响？

这个问题似乎很平常，但你会惊奇地发现，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在
170 断代问题上的争论大概挡住了我们的目光。一方面，那些认为 14 世纪开启了新纪元的人从一开始就赋予它一切近代的属性，给新技术很少留甚至不留任何余地。另一方面，对布尔克哈特的论点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彼特拉克的复兴是有限的、局部的一幕，他们很少问：这一转化是如何发生的？无论如何，我们这里尝试的研究路径对读者很陌生，所以他们不可能误解本章已经提到的一些研究路径。因此，为预防可能出现的误解，先做一些交代似乎是很恰当的。阐述具体的问题之前，容我澄清印刷术和文艺复兴关系中的一般问题。

我说 15 世纪后半叶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革时，并不试图贬低彼特拉克及其后继者在他们所处的各个时代的重要意义，也不试图否认彼特拉克推动的复兴给欧洲文化引进了新的成分。我说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印刷术出现之后发生了突变或形变，并不是主张，印刷术出现之前不存在你可以描述为文艺复兴的现象。

这些声明是不得不做的，不仅是为了预防误解，而且是为了澄清，我和类似立场的学者的研究路径不一样，我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将印刷术作为文化分界线的学者。我所指的不仅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17]那些宏大而壮观的言论，而且还包括令人尊敬的学者们那些更加局限和谨慎的判断。比如柴特尔就断言："就文学风格而言，中世纪以印刷术的发明为终点。"萨尔顿的后期著作里将科学复兴的起点界定为印刷术和镌版术的出现。[18]我相信，如果将他们这条分析的路子延伸，那就会出错，因为那似乎将抹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如果要研究印刷术对彼特拉
171 克复兴的影响，那就需要首先承认，彼特拉克复兴在此之前业已开始。14 世纪到 16 世纪始终贯穿着显著的连续性，这段时间是不能完全分割的。后辈的意大利艺术家和文人不能与其前辈分割，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首次利用印刷术和镌版术。他们在前辈驻足的地方继续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工作，但目标与前辈一样。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许多成分保持不变。正如上文探讨新媒介的放大和强化功能时所示，当我们为新媒介的出现开拓更广阔的天地时，旧讯息的持久性是不容忽视的。即使在试图更加清楚地区分手抄书文化和印刷文化这两个阶段时，我也无意否认一个统一的逐步展开的过程。

再者，早期人文主义者用"复兴"来庆贺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学和学问的再生，如果有人试图用其他语汇来描写这场运动，我看是没有多少好处的。我对放弃"复

兴”这个词的建议远不只是反对，而且我认为这一建议是徒劳的，不能令人满意的。[19]首先，“复兴”这个标签已经用于许多语境，比如书名、章节名、授课提纲、大学指南、文献、卡片资料、博物馆标签、艺术图书、唱片等，根本就没有办法清除这个广泛使用的语汇。我故意详细罗列这个清单以便说明，印刷术的强大功能是一种固化的功能。有了印刷术以后，你可以追加卡片目录的内容，却没有办法减少其内容。如果你撰文质疑“复兴”一词的使用，你只会使质疑它的文献增多。放弃使用一个深深扎根的标签是徒劳之举，不仅如此，支持继续使用它的理由是难以抗拒的。我同情那些不喜欢“复兴”一词的人，因为这个词使沾沾自喜的宣传运动长期存在。你不必通晓中世纪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令人沮丧的现象：学生按字面价值去理解人文主义者的历史观，认为整个中世纪的一千年是“黑暗”期，一直延续到彼特拉克发动的文化复兴。然而如此之多的庆贺中世纪终结的文献是存在的，这本身就显示，一场特色鲜明的运动需要一个特色鲜明的标签。

况且，对文艺复兴时期文人的主观评价还有一些伴生的客观迹象，显示一场独具特色的运动正在兴起。骑马人雕、立身裸像、青铜纪念章、古典母题与古典主题的结合、圆顶教堂、聚焦透视的使用、新的字体风格以及新的手稿插图——这一切似乎都证明，意大利的早期文艺复兴已经开启了艺术史的新篇章。这个时期出现了抨击繁琐哲学和赞美城邦人文主义的著作，所以思想史家也有充分的理由断言，一个新的篇章开始了。专家们研究彼特拉克启动的复兴时开启了一些不同的篇章，而我们这段文字的篇幅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记述各种专家为各种新篇章提供的一切理由。然而，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完全略去不提。

请容我快速列举 15 世纪印刷术起作用前文艺复兴运动里的一些成分。一整套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这些领域和新的职业群体相联系。有人撰写讲演稿，教大学生，他们将道德哲学和文学关怀进行糅合。有人追求雄辩术，批判“哥特式”风格；对语言艺术尤其是修辞和语文学的关怀与日俱增；城邦人道主义的新精神产生，对人性化都市的赞美出现了。[20]和这一切发展伴随的现象还有：对曾经被中世纪研究生院忽视的一些古籍的锲而不舍的搜寻，对城邦统治者、高级教士和教皇的支持，对欣欣向荣的文学商人阶层的支持。我们还应该注意其他一些动态：对廉价书写材料的需求，作为纺织业副产品的造纸术的发展，这导致意大利文化交流步伐的加快，而这一切都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出现的。因为这一切发展都集中在都市化的地中海地区，所以意大利人觉得特别亲近古罗马的文学精英和城邦精神。

地中海地区的都市背景，与古代诗人和艺术家亲近的感觉，对哥特式思想和表达风格的厌恶感，这三大特点应该列入 15 世纪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之中。这些特征使 15 世纪的复兴有别于 9 世纪的加洛林复兴和 12 世纪的意大利复兴。然

173 而，这三次不同时代的复兴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依靠手抄书文化的有限资源。每一次复兴都依靠有围墙的图书馆，依靠紧锁在箱柜里的书籍，依靠搜藏手抄的文稿，而这些资源的增加总是有局限的，而且常常是要减少的——毁于火灾、战争或洗劫。此外，这三次复兴的另一个特征是严重依靠口头传输信息、讲演术和记忆术的培养，以及记忆辅助手段的采用。这三次复兴都显示出相同的趋势：紧锁初稿本，在封闭的学徒圈子里传授新技术和技能。

到第三次复兴时，这些局限都被超越了，意大利复兴运动得以重新定向。我认为，这就反映了印刷术的影响。于是，新的学问和新的艺术就脱离了地中海背景，脱离了对城市特有的忠诚，对城市的忠诚是意大利城邦产生的条件。人文主义不仅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而且其涵盖的群体还包括曾经与人文主义敌对的职业群体。彼特拉克反映的是新学术派别的对立：艺术院系推动一系列的人文主义研究领域，实现设置艺术讲师和教授的教席；同时又抨击医学、神学和法学研究院。[21] 人文主义的后期发展阶段见证了许多医师、史学家和法学家的贡献，他们与学者型印刷商合作，成为人文学科的倡导者。[22] 每一个研究生院都增设了新的系科，并激起了生龙活虎的小册子大战。与神学、医学和法学一样，布道坛讲演术也卷入了论争。布
174 道者和教士谋求达成传统的福音传播目标，所以他们提倡“新学”、追求雄辩术。[23] 同时，意大利的城邦意识也改变了，并被移植到其他地方。自鸣得意的主题和歌功颂德的讲演超越了意大利城邦的边界，用来讴歌西班牙、法兰西、英格兰的王朝和德意志的皇廷。即使以前由教廷图书官和学者阐述的野蛮的“黑暗时代”概念也被重新定向，并最终反过来被用于抨击教廷了。[24]

兹将早期文艺复兴和后期文艺复兴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做一简述：前者仅限于特指的学科，后者拓宽到思想比较全面的范围；前者仅限于意大利，后者拓宽到包含北方。这些差别隐含在许多研究成果里。偶尔，这两个阶段的区别还得到明快的阐述——贡献尤为突出者是 P. S. 艾伦。他把后期文艺复兴与印刷术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这个立场走在我的前面。[25] 然而，在艾伦对伊拉斯谟的研究之后的几十年里，其他立场的研究占了上风。在艾伦研究历史的 20 世纪初，两个阶段是“容易区分”的；最近几十年来两者的区分却不再那么分明了。两者的区分之所以被模糊了，是因为对文艺复兴进行了其他一分为二的切割，比如：“古典的”文艺复兴和“基督教的”文艺复兴的分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北方的文艺复兴的分割，以及其他形式的一分为二的图式。[26] 近年来，围绕“12 世纪的复兴”和 15 世纪的复兴的争鸣没有给 15 世纪的复兴的进一步分期留下多少余地，再对 15 世纪文艺复兴的前后两期进行对比就无用武之地了。艾伦的两个分期不再“容易区分”，证据是：一部论文集本来是研究“早期”文艺复兴的，可是却收录了一篇论米开朗基罗诗歌的文章。[27] 无论米开朗基罗从 15 世纪初期的诗人和艺术家那里得到了多少灵感，他的

全部作品以及拉斐尔、提香等人毫无疑问是属于15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的，换言之，他们属于后印刷术阶段的文艺复兴。然而，艺术史的原理从来就不给印刷术的影响留下多大的余地，从来不关心印刷术对最伟大的文艺复兴巨匠的艺术作品的影响。 175

在艾伦对伊拉斯谟的研究里，15世纪文艺复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很明显的，但在潘诺夫斯基[①]对丢勒的研究里，这两个阶段却不分明，虽然印刷术对德意志艺术家丢勒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对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影响。[28]在他的许多博学迷人的研究成果中，这位艺术史家似乎太执著于区分早期的一些复兴和12世纪以后的意大利复兴、北方的趋势和意大利的趋势，却不给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本身的不同阶段留下立足之地。在一篇文章里，潘诺夫斯基确实提到了“迅速增加的媒介”的课题，但那是为了对比所谓北方的普及和平均主义倾向与意大利的精英主义和神秘性。[29]然而，意大利的印刷商和镌刻家与佛兰芒人、德意志人、荷兰人都同样乐意采用新的宣传技术，这是可以肯定的。难道威尼斯人不是率先搞宣传，率先建立了欧洲文明的新闻街吗？[30]保密和宣传的反差似乎与印刷术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后的情况不同有密切关系，与意大利和北欧的差别却不那么关系密切。[31]和丢勒一样，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从机印书的宣传中获益匪浅。实际上，乔奇奥·瓦萨里告诉我们，丢勒的铜版画促使拉斐尔延聘波洛尼亚的镌刻家马坎托尼奥·拉伊蒙迪[②]镌刻他的作品。[32]新的印刷术诞生不久，印刷所就如同满天繁星遍布意大利了；到1500年，单威尼斯一个城市就聚集了许多印刷所，这也说明，“迅速增加的媒介”在意大利受欢迎的程度并不亚于在北方受到的欢迎。 176

正如上文所示，目前对文艺复兴的种种解释常常不能区分意大利独有的特征和印刷术独有的特征。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著作里，这种疏漏尤其明显。在探讨人文主义从意大利向北欧传播的过程中，研究者常常没有考虑到，传统的文化扩散形式包括意大利内外的文化扩散形式可能已经变了。我们可以借用彼得·伯克(Peter Burke)对“扩散的构造成分”(mechanics of diffusion)的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评论权威学者的论著时，伯克就扩散的动因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边问边答：“谁是那些中间人呢？”“翻译家、印刷商、旅行家；造访意大利的外国人……旅居国外的意大利人都是中间人，一定意义上整个意大利都起到中介的作用……”[33]翻译家、旅行家的角色和“整个意大利”的角色不仅得到印刷商的辅助，而且由于印

①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德裔美国艺术史家，代表作有《圣像画法研究》、《丢勒的生活与艺术》、《文艺复兴与其他的复兴》等。

② 马坎托尼奥·拉伊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1480—约1534)，意大利铜版画大师，复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作品，早期的作品有《派拉默斯和提斯皮》，最佳版画有《屠杀大批无辜者》。

刷术的出现而改变了。成批的通俗语翻译被调动起来;词典和义类词典减轻了作者对亲身接触研究对象的依赖和对外国侨民的依赖。有鉴于此,区分文化扩散的旧动因和新近登场的"中间人",似乎是令人满意的。罗伯托·魏斯(Roberto Weiss)也探讨这个问题,他在研究"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播"时把这个问题表达得非常清楚。魏斯把教廷挑选出来作为一个"强大的传播因素"[34],却没有说清楚,他指的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或之后的时期。实际情况可能是:教廷作为"传播因素"的力量受到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转变的影响。学者型的印刷商印行的书籍增加以后,北方学者对旧的信息交换方式的依靠就有所减少,旧的教会会议信息交换是不定时、不稳定的。

彼特拉克带来的复兴和印刷术产生的复兴需要更清楚地区别开来。不仅如此,两者的关系也需要更仔细地思考。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行了一本论书
177 籍历史的大部头,其中一章由该书编辑维夫列特(Hendrik Vervliet)撰写。他说:"与其说印刷术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不如说文艺复兴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35]这句话的前后两个分句似乎都需要修正。考虑彼特拉克掀起的复兴运动时,前半句似乎力度不够。印刷术根本就不可能使彼特拉克的出现"成为可能"。谷登堡来得太晚,比彼特拉克晚了一百多年。后半句"文艺复兴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则需要证明,但维夫列特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明,这似乎难以理解。印刷术的传播如何受到新一轮研究的促进呢?古典的复兴又如何推动印刷术的传播呢?早期印行的西塞罗著作充斥市场时,难道不是没有促进印刷术的传播反而使早期的印刷商破产了吗?毫无疑问,识字率的提高与意大利纸张生产的发展有关系。反过来,纸张又是印刷术发展和传播的必要条件。北方的印刷所同样是促进印刷术普及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地区离意大利却很遥远。手抄书的经销商比如韦斯巴西亚诺既可以被认为是笃信人文主义的印刷商奥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的先驱,又可以被当作15世纪文艺复兴的体现;但他并没有对印刷术的推广做出任何贡献,这倒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有什么贡献的话,情况正好相反。谷登堡的印刷术可能使韦斯巴西亚诺被迫关门。莱茵河流域早期印刷所的繁荣并不是回应意大利需要的结果,而是仅限于对天主教罗马需要的回应。讨伐土耳其人的十字军派使者到谷登堡的印刷所来接洽印制赎罪券。《圣经》、布道辞、祈祷书、赎罪券、年历和年鉴是早期莱茵河流域图书贸易的大宗产品。最初对这一新媒介的利用是为了唤起大众广泛的支持,和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并不相关,而是和中世纪晚期的十字军东征有关系,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促进了人们对印刷术的使用。

在这个方面,认为印刷术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副产品"的观念竟然长期存在,这
178 一现象实在是难以理解。[36]无论那难以捉摸的"精神"如何界定,在首批印刷所创建的地区,它总是行影不彰的。应该记住,在15世纪60年代,这种新技术及其职

业文化越出美因兹，传遍德意志和瑞士德语区的城镇；此间，首批德国印刷商甚至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印刷术传到斯特拉斯堡、科隆、奥格斯堡、纽伦堡和巴塞尔等城镇，同时又传入意大利。卡克斯顿传播印刷术的路线是科隆——布鲁日——伦敦，这条路线也说明，当时的潮流远离 15 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近年对印刷术传到里昂的研究同样证明，意大利人文主义在里昂所发挥的作用是可以略去不计的。(37) 你甚至可以说，和里昂类似的威尼斯之所以成为图书生产新形式的主要中心，那是因为中世纪晚期的贸易模式，而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文艺复兴意大利培育的新文学艺术。

当我们考虑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成功的因素时，应该把“文艺复兴副产品”这个因素和中世纪基督教关怀的副产品这个因素结合起来。谷登堡的合伙人约翰·富斯特的第一次商务行是携带《圣经》到巴黎大学，他希望开拓“旧学”的市场而不是“新学”的市场。从美因兹和谷登堡《圣经》到斯特拉斯堡和门特林《圣经》的思想漫游，再到维滕堡和路德《圣经》的思想漫游，这一切都说明，新产业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扎根于基督教插图而不是古典插图；当然与此同时，这些动力还来自于早期资本家谋利的冲动。(38) 为了寻找印刷术扩张的最初动力，你应该首先看《圣经》，这是西方人心目中永恒的“畅销书”。传播福音的冲动的终极结果是在非洲和亚洲建立印刷厂。在西方推动印刷术的因素里，传播福音的冲动所起的作用恐怕要超过 15 世纪把缪斯女神请回佛罗伦萨的努力。

然而，把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截然分开也是错误的。意大利的造纸术和北方的冶金术靠新技术结合在一起，同理，长期分割在不同的课堂里的不同文本传统也在学者型印刷商的作坊里结合在一起了。比如，威尼斯、巴塞尔、里昂等地对希腊语文本的加工就把新旧学问结合起来。同理，合参本《圣经》和通俗语的翻译作品也使新旧学问结合起来。一旦这些版本的《圣经》和通俗语的翻译作品被大量复制，希腊语语法和词典就可以发挥多种功能——不仅对诗人、神话整理者和天文学家有用，而且为解剖学家和神学家服务。旧课堂维持的分割在新型印刷所里就不可能维持了。人文主义者和《圣经》印制人成为亲密的盟友，而人文主义者与教书先生反倒时常争执不休。

179

由此可见，如果把维夫列特的后半句话“文艺复兴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里的两个要素颠倒过来，那就更有道理。文艺复兴传播印刷术的作用大概比较少，反过来，印刷术传播文艺复兴的作用可能比较大。我的这一说法是重申他人的论断，(39) 而不是提出新的洞见，已经有人对印刷术如何改变古典的复兴作过论述。不过古老的真理需要我们时常重申。由于许多人研究“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播”时常常忽略印刷术，这一点尤其值得在此强调。让我们回顾伊拉斯谟对威尼斯的奥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印刷商的警告，这是为伊拉斯谟立传的朋友转述的话。据

庇突斯·雷纳努斯记述，伊拉斯谟对奥尔杜斯说，如果他印制希腊文版本的对欧里庇得斯①和索福克勒斯②悲剧的评论，那就是鼓励“野蛮人”待在家里，就切断了野蛮人造访意大利的旅程。(40)结果，伊拉斯谟不幸言中，阿尔定公司印制的希腊悲剧评论的确产生了他预计的效果，北方学者因此能够学会并传授希腊语；于是，他们就代代相传而不必离开故土去意大利朝觐了。在这个方面，传播可能和学者的重新定向有关系；由于这样的重新定向，“永恒的”罗马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影响就减弱了。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讨论局限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播”，把注意力聚焦在传播上，那就错了；虽然人们总是要论述这个课题，但那仅仅是印刷术的一个功能而已。正如前面几章所示，印刷术的其他几种功能也应该被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印刷术的保存功能尤其应该被赋予很重要的优先地位；当我们把一种复兴功能挑选出来，认为它是永恒的、有别于以前类似的复兴运动时，我们尤其要重视印刷术的保存功能。

3.2 短暂的复兴与恒久的复兴

所以，请容我回过头来说这样一个问题：印刷术的出现为何与所谓恒久复兴的出现有关？既然新的保存功能发挥作用时，古典的复兴仍然在进行之中，你可以期待，古典的复兴会获得独有的特征。既然它在一套环境条件下启动，在老一套环境条件下获得恒久的保存力量，这一次的复兴起初就可能类似过去的复兴，但其走向会越来越偏离原来的轨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的差异之中，你可以预期，这一次的复兴将比过去的复兴更加持久。

“简言之，中世纪的两次复兴是有局限的、短暂的；而文艺复兴则是全面的、持久的复兴。”(41)在当前的论辩里，正如潘诺夫斯基这一著名的论断所示，恒久性问题的确显得突出，但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却不显得突出。诚然，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人文主义思想的永久保存可能要归功于谷登堡的发明。”(42)可惜，这句话是他随意间的一句旁白，用于修饰他的主要论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受到“印刷机新颖技术”的推动。波尔加又争辩说，印刷术产生影响前，“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模式就已经清楚确定下来”。由于他不研究印刷术如何影响文化运动模式的问题，我觉得他的论述含混不清，意思不完整。不过这倒不是核心问题。我的基本

---

①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5—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作品达90多部，但仅存《美狄亚》、《希波吕托斯》、《特洛亚妇女》等19部。

②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共写123部剧本，仅存《俄狄浦斯王》、《埃阿斯》、《安提戈涅》等7部。

担心是，波尔加比较随意的“恒久保存”断言并没有引起后续的论争。在文艺复兴研究中，印刷术固化功能的意义并不是经常被人搁置一边，但那仅仅是因为其隐含意义通常被完全忽略而不予考虑了。

印刷术的保存功能被忽略是不幸的事实，部分原因在于其隐晦的、难以察觉的性质；我们上一章业已对这种性质展开讨论。以前的探讨足以暗示，我们有理由相 181
信，保存功能是印刷术的重要特征。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特征是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艺术家或文人造就的。如果说缪斯女神回来不走了，那是因为她们被召唤回来之后，另有史无前例的事情发生。而且，印刷术的保存功能改变了一切遗存与复兴形式的特征；其冲击力决不仅限于缪斯女神在15世纪意大利的回归。中世纪的遗存和早期的基督教复兴也受到印刷术固化功能的影响，这方面的影响如何起作用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然而，印刷术保存功能的强大影响目前却被文艺复兴问题掩盖了。如今，恒久性并没有被认为是印刷术的特征，甚至没有被认为是一种需要予以解释的新的文化特征，而是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印刷术被当作文艺复兴文化的固有特征，它被人用来保全一种有百年历史却被人抨击的理论。为什么中世纪的古典复兴比15世纪意大利的复兴短暂？至今尚未有人做出解释。[43] 15世纪意大利的复兴更加持久，更容易继续不断地、系统地发展，这一事实常常被用来解释，为何把这次复兴和以前的复兴区别开来，为何说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如此，反对布尔克哈特论点的意见就可以遭到反驳，一个似乎无休止的论争就可以延长了。

至此有一个道理已然彰显：区别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此前的若干复兴的大多数标准，又可以将以前那些复兴区别开来，而且都具有同样的效度。以前的复兴，从查理大帝①时期到美第奇家族时期的复兴是由不同的精英发动的，服务于不同的职业群体，发生在不同的地区文化的语境中。相反，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一些独有的特征，值得挑选出来作为新颖而重要的特征，上文业已对此进行讨论。[44] 与此同 182
时我们说，加洛林王朝9世纪的复兴和12世纪的复兴也具有重要的新特征。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赋予15世纪的复兴特别重要的划时代的作用呢？看来，如果不用心提供证据，这个道理是难以说清的；我们要到15世纪的文化产品中去钩稽后世发展的先兆。在19世纪，早期人文主义的文本被用来解释世俗的和现代主义的异端，即那些被打入《邪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的异端。目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如以前那样颇像19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了，相反，他们更像20世纪的史学家。作为“现代语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先驱”[45]，我觉得他们太像当代的

①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32—814)，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的学术中心。

专业学者，他们真实的面貌反而不容易看清了。

> 在中世纪与古代的关系里，有一个同化阶段和非同化阶段周而复始的现象。自文艺复兴以来，古风就和我们如影随形，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活在我们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它牢牢扎根，就在史学、哲学和考古学那些单薄但尚未坍塌的墙壁背后。
>
> 尽管加洛林王朝和12世纪出了那么多人文主义者，史学、哲学和考古学这三门学科对那时的人还是很陌生；它们的形成和最终定型表明，中世纪人和近代人对……古代……的态度根本不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在固定的距离观察古代，这个距离类似于“眼睛到客体的距离”；这个距离表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典型的发明，即焦点透视……这个距离妨碍直接接触……但容许整体的、理性化的观点。(46)

中世纪人和现代人的古代观有根本的区别，这一点不容否定。中世纪学者不会像我们今人那样在固定的距离看古代。他们不会把古代当作置于玻璃柜里的容器，只等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去研究。他们也不熟悉我们今天采用的那些历史学科。然而即使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人们仍然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如何正确解读他们对古代的态度。他们赞赏以古典为标本的复兴，热情恢复、搜集并审视古代的作品，他们有一个新奇的信念：相信存在着一个分隔他们和古人的野蛮时期。既然如此，他们孵化了一种新鲜而独特的现代历史意识吗？他们的空间距离感和我们的空间距离感相似吗？潘诺夫斯基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许多杰出的权威也同意他的观点。他援引了文艺复兴时期多种文本来支持自己的观点。(47) 如今有一个观点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世纪人能够从固定的距离看古代，这是中世纪思想最突出的区别性特征；这个特点把意大利的复兴与后来的发展联系起来，又将其与以前的复兴区别开来。

尽管这个观点得到的支持令人望而生畏，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仍需要争辩。一方面，这个观点用上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证据；另一方面，它又忽视了许多反证。比如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怀念其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时，其怀旧情绪和现代人的“固定”距离感就可以画等号——我认为这样的证据就牵强附会。这是因为，类似的怀古且惋惜的表情已经出现在中世纪的文本里。早在12世纪就有人说：“每一个时代都觉得自己的时代不令人满意，都喜欢古代甚于自己的时代。”(48)

潘诺夫斯基认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和12世纪的复兴里“不存在”“怀旧情绪”，但其他权威提供的证据并不支持他这个观点。比如，弗雷德里克·恰博(Frederico Chabod)就援引一首12世纪的挽歌，诗人勒·曼斯的希尔德伯特(Hildebert of Le Mans)借以抒发怀念古罗马的幽情。恰博援引这首挽歌的目的是对比中世

纪诗人的终局感(finality)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信念：古代文化是可以复兴的。恰博认为，彼特拉克的复兴运动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乐观主义：古代可以复兴，不必老是悲叹古代一去不复返。

> 模仿：我们在这里发现诗人说出了这个最重要的、区别科拉(Cola)的世界和勒曼斯的希尔德伯特的世界的忠告。在钦佩与惋惜交错、悲叹一去不返的幽情里，我们发现了他顺从古人的教诲的决心。轻快的心情变成了行动。我们体会到的不是挽歌，而是复兴古代辉煌、罗马光辉的忠告。(49)

184

汉斯·巴伦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之所以独特，那是因为它“不是以惆怅悲凉的心态去把古代当作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而是将其当作与当下相似的范本，鼓励当代人用自己的通俗语及其文学去和古人一比高低”(50)。恰博强调的是彼特拉克培育拉丁学术、赞美罗马的主题；巴伦则断言，15 世纪初的佛罗伦萨特别富有创新精神，佛罗伦萨人变换古人的主题，使之适应非罗马的制度，而且给予托斯卡纳通俗语①和古拉丁语同等的地位。(51)

无论你是像恰博那样强调模仿还是像巴伦那样强调效仿，事实都一样：那不是距离感，而是亲近感，正是这个亲近感鼓动了意大利的复兴。其典型特征是重新点燃古代精神，而不是沉湎于怀旧的挽歌心绪。如果你接受我们这样的分析，潘诺夫斯基所谓的距离感——即“妨碍直接接触……但容许整体的、理性化的观点的距离感”，那么他所谓的距离感不仅对中世纪人是陌生的，而且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而言，也是陌生的。

185

在这个方面，我们这位艺术史家的观点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他认为，如果用中心点透视来表述，在固定距离看古代的能力就“可以比喻为眼睛和耳朵的距离”(52)。在 20 世纪，古代的意象出现在人的脑子里(和历史题材的书皮上)，这似乎需要调动文艺复兴的透视技法，但这不可能给我们透露上述两种发展过程的历史环境。有人不太谨慎地借用潘诺夫斯基的这个观点，特别突出的例子有麦克卢汉的著作，这些书大肆发挥史学家使用的“透视”和“观点”的字眼。(53) 中世纪的词源学证明，玩弄文字游戏几乎可以证明一切。我认为，光学论文和天文学论文的区别还需要更加仔细地加以评估。

在统一的参考指南和地区指南问世之前，要提出对任何古代文明“整体的、理性化”的观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古代的物件、地名、人物和事件尚未被永恒地在空间定位之前，怎么可能“从一个固定的距离”观看整个古代呢？如此观看古代的能力不可能通过文艺复兴艺术家设计的新的光学效应来获得，只能靠文件和人工

---

① 托斯卡纳通俗语(Tuscan volgare)，中世纪意大利的一种方言，后成为意大利标准的文学语言。

制造物的重新安排来获得，而不是靠图像空间的重新组合来获得。

> 中世纪人没有失去对古代铭文和考古遗存的兴趣。他们偶尔搜集铭文，注意纪念碑。他们失去的是……系统搜集古代一切文物来恢复文明的理念……16 世纪伟大的文物学家……把文学、考古学和铭文文本结合起来。他们逐渐把罗马纪年表、地图、法律和宗教拼凑起来……(54)

186 无疑，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急于模仿和效仿，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就开始复制铭文和图像、搜集古物。不过，至少还要过一百年，“系统搜集”文物、“慢慢拼凑”记述、掌握古代纪年的事情才会发生。(55)这不仅是因为系统构建古代文明的理念不存在，而且是因为那时的人文主义者还缺乏进行构建的手段，这就使前人的古代观念和我们今人的古代观念根本不同。

至少在印刷术出现一百年以后，手抄书时代遗留下来的多种形式的地图和乱麻一团的纪年史才清理出头绪，资料才得到再加工，更加统一的资料整理才得以完成。在此之前，哥特式风格与古典式风格的区分、中世纪拉丁文与凯撒时代的拉丁文的区分、共和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分、古代凯撒的罗马与中世纪教皇的罗马的区分是有的。但这样的区分发生在无形态的时空语境中，而这个语境和现代的语境根本不同。(56)在这样的语境下，古代的某些部分似乎近在咫尺，其他部分则可能被拒之于千里之外。有人告诉我们，15 世纪的艺术品鉴赏家居然不能区分一块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碑刻和米开朗基罗的一件雕塑(57)，既然如此，希腊—罗马古代史的某些部分到 15 世纪以后似乎还是近在咫尺。

潘诺夫斯基认为，中世纪的思想特征是：认为古代“强有力地存在”，但同时又“遥不可及”，以至于不可能被“构想为历史现象……语言学家将西塞罗和多纳图斯
187 (Donatus)当作先辈……数学家将其祖先追溯至欧几里得”，即使意识到异教时代和基督教时代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思想特征的两方面依然存在。“这两种趋势尚未达致平衡，所以历史距离的感觉是不可能产生的。”“中世纪人不可能把古代文明当作自身完整的现象……他们渴望属于古代……渴望和当代拉开距离。”(58)潘诺夫斯基的探讨似乎同样适用于 15 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实际上也适用于许多 15 世纪学者的思想。

在这个方面，15 世纪搜集古代艺术品、抄写古代铭文的艺术家和文人的心态与现代博物馆馆长的学者心态是不一样的，虽然两者从事的是类似的活动。我们有必要加以区分。现代人对古罗马的书写风格和加洛林王朝抄书人的书写风格是很敏感的。他们不太可能混淆古代艺术家的作品和 15 世纪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鉴赏家则刚好相反。连丢勒的作品都被认为是古代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以古代作品的抄本和雕刻本为模本——有潘诺夫斯基本人的话为证。(59)而

且，和中世纪的艺术家一样，丢勒和米开朗基罗的后继者也继续用古代形式来表现基督教的题材。15 世纪后期，乔奇奥·瓦萨里的一位学生表现的阿波罗太阳神模仿米开朗基罗的“基督升天”……那时，正如丢勒一样，艺术家们已经习惯于……用阿波罗的形象来塑造上帝的形象，阿波罗的形象又可以用上帝的形象来塑造。按照米开朗基罗的当代人和后继者的判断，米开朗基罗与古风已经对等了。(60)

不仅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古代作品混淆，不仅异教形式仍然被用于基督教题材，而且有些中世纪手写体(尤其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小书写体)也被误解为古代的书写体。(61)15 世纪的文人摩挲 11 世纪和 12 世纪的手抄书时，他们认为自己正在看的是古罗马书店流传下来的手稿。当他们坐下来用类似的手写体撰写自己的书稿时，他们必定体会到贴近古人的感觉，这和我们的体会截然不同。我们不妨比较 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和我们的感觉：一位 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誊写李维的书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在“写”李维的书(62)；我们从勒布古籍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一册手抄书时，则是另一种感觉。两者的体会是迥然不同的。

毫无疑问，誊写并评注古代作家比如李维的著作时，这种活动本身就足以使人敏锐地感觉到：古文本语法和中世纪文本语法是不同的，古代思维和表达风格与中世纪课本里反映的风格也不相同。精致的语文学方法论成为给古籍断代的钥匙，有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尤其是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①具有这样的能力。(63)不过，15 世纪的人非常倚重记忆术和言语艺术，他们缺乏给文本断代和定位的统一的规范，这不利于强化处于萌芽状态的文本意识。由于无所不在的记忆术训练，古典的形象更可能被放进“记忆库”的格子里，而不是被放进固化的过去的永恒场所中。(64)

再者，由于缺乏固化的指针，古文物的复制、古文本的誊写与其说是将古代固定在相当的距离，不如说是使之仿佛近在咫尺。

> 彼特拉克直接向李维学习，用自己的著述直接和李维交流；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和布卢尼(Leonardo Aretino Bruni)的佛罗伦萨直接向共和政体的罗马学习，佛罗伦萨自认为是古罗马的复活……马基雅弗利著名的书简……描绘他自己读古籍的情景：身着正规的衣装，走到古人跟前与其交流。他和古人交流的目的不仅是要自己理解政治，而且要间接地让市民实际参与政治。与古人直接交流的思想是一切形式的人文主义的至关重要的概

①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5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保守的批评家和杰出的雄辩家。被奉为宗教改革的先驱，著述范围很广，以《论君士坦丁赠礼》考证《君士坦丁赠礼》为伪书而闻名世界。

189 念……(65)

与古罗马人“直接会话”的思想似乎指向一种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和我们的“整体的、理性化的”古代观却是不协调的。即使为修辞训练的传统性质留下一定的余地，给早已去世的作者写信似乎和与古人拉开距离也是矛盾的，两者的目的不一样。(66)彼特拉克致信李维时注明写信日期，说“倘若你有幸增寿，你一定对道成肉身有所耳闻”，他表达的是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似乎和但丁致信维吉尔的距离感类似；但丁称呼维吉尔“诗人，以你不知道的上帝的名义”(67)。以上两个事例都证明现代视角缺乏的一种心态——既把古诗人当作同类，又认为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前基督教语境中。

早期人文主义者受限，不可能形成固定的距离感，他们对比较晚近发生的事情缺乏明确的时间意识，这也是缺乏距离感的表现。野蛮人首次洗劫罗马之后的几百年里书写的古代史，纪年清楚、广为人知——彼特拉克致信古人的日期可以为证。但这几百年里发生的事情却比以前的事情模糊，古代史学家的著作有人仔细研究，中世纪的编年史却被忽视了。(68)黑暗、模糊的形象似乎比光亮、清晰的形象遥远；对 15 世纪学者而言，古罗马凯撒似乎比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更近一些。和“希腊罗马时期的教会史”(69)相比，中世纪的历史是互相矛盾的地方史的一团乱

190 麻，也是互相矛盾的教廷设计和帝王设计的一堆乱麻。此前一千年的政治史简直是混乱不堪、纠缠不清；其文化史甚至更加黑暗。(70)凯利说：“分辨力减弱的势头始于波伊提乌①和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②；瓦拉的分辨力减弱，且厌恶感也随之增加。”(71)皱巴巴的难以辨认的书简、不符合语法的拉丁语、扭曲的图像都没有给辨别力的训练提供多少余地。穿透这段黑暗的时期，你可能会感觉到过去黄金时代的光芒。但拉开帷幕的活动、拭去画作上的封尘是一回事，跨越一段固化的距离遥看昔日的景色却是另一回事。“黑暗时代”的一片空白和黑暗仍然使时间的间隔被紧缩，空间的距离被缩短。(72)

时间距离的紧缩、贴近古罗马书店的感觉、欢呼缪斯女神的回归和黄金时代的再现，这一切贯穿并超越了印刷术的前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激励意大利复兴的精神加快了节奏，连书籍文化的质地也丰富了，艺术家和匠师的技艺也完善了。有如神助的艺术家和匠师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他们掌握了古人的秘密，效仿古人最精湛的成果。伊拉斯谟重编圣哲罗姆的著作，哥白尼和维萨里“恢复”天文学和解

---

① 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480？—524？)，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用拉丁文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以通敌罪处死，在狱中完成以柏拉图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名著《哲学的慰藉》。

②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约 560—636)，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大主教、百科全书编纂者，著有大量语言学、自然科学宇宙论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语源学》(*Etymologies*)。

剖学，路德回归基督教创教时期的教会和纯净的基督教，他们都因此而著名。(73)希腊文本发掘得越多，舛误众多的拉丁文译本越是被净化，接近纯净灵感之源的感觉就越强烈，人们就越是觉得贴近上古的智慧之源，这是上帝灌输给人的智慧之源。一位学者略带困惑地说，“可靠性”与“时间上的优先排序相联系”，这样的“可靠性”绝不是后文艺复兴时代思想的特征。(74)

191

我们不妨注意“original”一词意义的变化，其原本意义是“接近神的灵感；接近源头、源泉、原初、起源”。由此产生了激励人的口号：“回到源头去！”可是其现代意义却截然不同。正如每一位艺术批评家所知，具有原创性就是与先例决裂，就是偏离传统。艺术家、学者或科学家回归以前的研究成果时，他就在新方向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

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线索，使我们能够解读古典复兴的重新定向，解读那种新的感觉：一个固化的距离把活生生的当下与古老的过去分割开来。这一变化反映在上文业已指出的两种传输方式中，一是手抄书文化支撑的方式，一是印刷文化支撑的方式；前者产生一连串舛误丛生的誊写本，后者产生一连串的改进且增版的副本。在手抄书文化中，学科进步的目标是恢复旧文本；古人和现代人瞄准同样的目标；既可以构想回归昔日的黄金时代，同时又可以展望更光明的未来。在印刷文化中，第一版或“原初的”手稿交付给藏书室珍藏，创新者必须要避免重复他人业已做过的事情。诚然，对文本原创性的崇拜要等到 18 世纪中叶才真正形成；直到德莱顿①的时代，人们才感觉到“历史包袱”的压抑。(75) 16 世纪业已经历了时空定向的迁移，古代与当下的距离因此而拉大了。

我们可以通过探讨各学科的发展来显示这一变迁。就本书的宗旨而言，最有力的例子是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ia*)被取代，它曾经被当作构建地球的权威指南。在初始阶段，托勒密在 15 世纪的复兴推动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它给新的测绘、绘制地图的技巧提供灵感，也为开发坐标的三维形式提供灵感。(76)作为一本大尺度绘图法的精湛专著，这本《地理学指南》深受航海家亨利②那代人的欢迎，它似乎既指向过去又指向未来。然而，17 世纪初的情况不再是这样。在地图出版商竞争的推动之下，新的地图集日益扩版、更新，以前所未有的序列问世。纸上谈兵的航海家再也不使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世界地图，他们对已知世界的边疆感兴趣。奥特利乌斯的《世界地图集》(自 1570 年起连续出版许多版)是一座

192

① 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70)，英国桂冠诗人、剧作家、批评家，著有诗歌《奇异的年代》、剧作《奥伦—蔡比》、文学评论《论戏剧诗》等，他的创作时代被称为“德莱顿时代”。

② 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葡萄牙王子，创办航海学校和气象台，推动葡萄牙殖民帝国的航行探险，本人从未亲自出海，但推动了地理大发现。

地标。在他之前，断代地图被视为托勒密地图的附件。在《世界地图集》里，古代地图单独放进一个栏目，尾随在断代地图之后。于是，古人知识的局限性就用图解和文字的形式凸显出来了，读者一眼就看清古人的世界观“非常残缺不全”，还不到“我们发现的这个地球的四分之一”[77]。古典学者继续深挖史料，直至现在，但航海家和探险家却走向不同的方向。古地图的恢复显然和新土地的发现是脱节的。在一个半世纪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推动了革新，但其活力很快枯竭，日益成为古玩家感兴趣的收藏了。

这个例子不仅说明，恢复和发现的概念本身在印刷术之后被重新定向了，还说明为什么焦点透视的发明需要和固定时间距离的感觉区别开来。焦点透视的发明是重新发现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推动之下的产物，相反，固定时间距离的感觉是在《地理学指南》被束之高阁并被取代以后的产物，连续出版的地图集取代了它的地位。在这个方面，我们似乎有必要修正潘诺夫斯基的话：“古代仍然生活在现代数学和科学中。”[78]古代的某些遗存仍然以那种方式存在，但许多东西已经像托勒密的论著一样被搁置起来了。我们思考古代时，罗马数字、盖仑的解剖学或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被抛弃的事实特别需要强调，正如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或阿基米德
193 的定理遗存至今需要强调一样。它们被抛弃是在印刷术之后一百年才发生的。在1490年至1598年的一百年里，盖仑的著作已经印行了660版。印行盖仑著作是为了满足医师的需要，他们手边没有更好的医学教材。老普林尼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1550年之前印制出来，其内容而不是风格受到重视。[79]只要科学技术的目的是恢复逸失的古籍，古典文化就不可能被束之高阁或被拒之于千里之外。古典文化还可以给后世传递许多重要的讯息。诚如乔治·萨尔顿所云：

> 古代科学论著在文艺复兴时期印行绝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为了服务学界的既得利益（如今日之景观），而是为了使用……新文本的发现不具有很多考古的意义，而是（至少可能是）积极的知识积累，当代科学家或医师用得上这样的知识……搜寻医学手稿就是一种形式的医学研究。[80]

有些古籍失去活力，不再为当代人添加可用的知识，这种情况在科学界特别富有戏剧性，但决不局限于科学界。古籍失去活力对法学研究有何影响？米隆·吉尔莫对此做了很好的描绘。他有一大段评述16世纪巴黎大学法学教授莫雅克·居雅斯的文字：

> 居雅斯……为恢复查士丁尼之前的法律文本以及整理重要的版本和评注本奉献终生……当他的弟子问，在可怕的宗教战争里他们应该追随什么路线时，他的回答是：“这和执政官的法令没有关系”……他的责任是传授历史，而不是从中吸取教益。古代的形象恢复了，但它不再直接和现代世界交谈。[81]

居雅斯的回答似乎是当时新观点的典型代表，潘诺夫斯基认为，这是文艺复兴时代典型的观点："古代首次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与当下分开。"(82) 实际上，这个观点对彼特拉克推动的复兴是全然陌生的观点，吉尔莫对此的评述如下：

> 历史正在成为学术问题。对彼特拉克或瓦拉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博丹(Jean Bodin)和居雅斯的论战似乎难以理解。对这些人文主义者而言，靠语文学分析发现的历史真相永远是真相，适用于当前。但是，到了居雅斯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文艺复兴已经结束了。(83)

194

自16世纪起，语文学、考古学和古典研究使古代日益显露真容。虽然永恒的发现过程在逐渐展开，但古代并不更接近当代人。这个永恒的过程此刻仍在进行，它延续到未来，永不终结；即使B类线形文字①破译以后，即使更多的死海古卷②揭开神秘的面纱以后，这个永恒的过程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虽然越来越多的古遗址映入眼帘，我们也绝不可能更接近古罗马的书店或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它们永远被固定在一段距离之外，那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世界。无论发掘多少文物，这个古代都不可能复原——这种感觉是我们现代意识的标志。我们这种意识与古人的意识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觉得过去就处在再生的边缘。后面这种意识是彼特拉克时期复兴的特征，就此而言，如果把15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当作我们现代人观点的预兆，那就扭曲他们的观点了。

如果要再体验15世纪的人贴近古人的感觉，那就需要发挥历史想象力。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观点被我们过早地现代化了，他们不太可能发挥那种历史想象力。再者，16世纪的学术看上去有一点难以名状的迟滞，因为此前的学术太早熟了。我们可以借用让·塞内克(Jean Seznec)的专著《异教诸神的遗存》(*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来说明这一点。塞内克认为16世纪出版的主要的神话著作代表着"明显的倒退，向中世纪回归"。刚刚被恢复应得地位的异教神"被强行塞进语言的母体中"。这样的神话学者有焦瓦尼·巴蒂斯塔·吉拉尔迪(Giovanni Battista Giraldi)、纳塔尔·孔迪(Natale Conti)和文森佐·卡尔塔里(Vincenzo Cartari)，他们不仅太"野蛮"，而且太"迂腐"(84)。

195

---

① B类线形文字(Linear B)，古希腊的一种线形的音节文字，分布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皮洛斯和迈锡尼，前15世纪到前12世纪流行，后湮灭。

②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1947年以来在死海海滨洞穴里陆续发现的古卷，对研究晚期犹太教和基督教起源有重大意义，但其研究成果尚未公开。

他们缺乏批判力，更缺乏历史感。他们不注意地点或时间。他们混淆所有的神祇……吉拉尔迪甚至不区分希腊神和罗马神。(85)

应当承认，社会环境的观念和演化的观念是新近的成就，责备16世纪的学者没有这样的观念显然是不公正的。再者，古典时代本身就助长了混淆与混乱……

纵然有所保留，我们还是不得不做出严厉的评判……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团深奥的大杂烩，杂乱无序……(86)

既然责备16世纪的学者没有掌握后世的概念显然是不公正的，那么如此严厉的批判就大可不必。塞内克的评判是不公平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相信，以下观念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成形："古代这个观念是一种清晰的历史环境，是一个时期，自有其流程。"他认为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不一样；他的结论是："文艺复兴……感觉到……历史的距离。"(87)而16世纪的学者没有感觉到这个距离，他们"不注意地点或时间"，于是塞内克认为这就是倒退。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期盼有问题，而不是16世纪人的期盼有问题。你要谴责16世纪的神话学者倒退，你就先得要举例证明，以前的神话学者更先进。事实上这样的证据是没有的。只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文艺复兴最辉煌的阶段并没有产生任何神话研究成果……也许……接触古代、贴近古代的直觉使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治学辅助工具"(88)。

塞内克没有把握必备的文艺复兴学者的辅助工具，所以他在阐述主题时不得不借助当今艺术品对异教神的表现。于是，绵延不绝的寓言文本传统就被他武断地切断了，早期机印书的洪流就被他筑坝拦截了。(89)塞内克搜罗了很多图文并茂的现代参考书和图像学著作，他转向壁画、圆形浮雕、素描和版画，借以证明，中世纪艺术家撕掉了诸神奇异的伪装即中世纪的视觉形象，他们把诸神送回奥林匹斯山。(90)遗憾的是，16世纪初的学者试图解开乱麻一团的古老故事时，其装备远远不如现在的塞内克。他们只握有一些刚刚出版的手抄本小书，所以难免缺乏统一的时空感。他们不能迅速辨认赫拉克勒斯的半月形刀和阿拉伯人的半月形刀，不知道他手握的木杖是否就是古代的木杖。他们也难以察觉以赫拉克勒斯为中心的希腊神话如何转变为罗马神话。他们掌握的地图形态多样，编年史相互矛盾，他们缺乏标准化的正字法和术语，所以他们的著作在现代人的眼里必然像"一团深奥的大杂烩，杂乱无序"。

那时的手抄书已经为异教神话编制了一个寓言的网络，后世的学者最终解开了这个纠结的谜团。毫无疑问，文艺复兴收藏家的出土文物、文艺复兴印刷所印行的图像都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但旧词语和新版画到16世纪中叶才刚刚被并置

196

在书里。虽然有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书虫也是古董收藏家[91]，但在16世纪时，许多勤勉的学究尚未接触到古代艺术，解释古代艺术的时期还遥不可及。 197

塞内克讥讽“倒退”小册子的作者，说他们利用“数以千计出土的钱币、浮雕和人像，利用各种收藏……充斥着大理石和青铜器”。他接着说，和14世纪的学者不同，16世纪的“神话学者有价值无穷的文献可以利用”。既然15世纪的艺术家已经利用过出土文物，你“自然指望”吉拉尔迪及其同事效法前人。古董宝藏近在咫尺，“整理成清单，被复制，现成可用。就在这几本神话书出版的同一时刻，就在卡尔塔里①的神话小册子(1556)问世的同一年，阿尔德罗万迪②整理的书目作为卢奇奥·莫罗(Lucio Mauro)的《古董》(*Antichità*)一书的附录问世了”[92]。

塞内克所说的“同一时刻”掩盖了大量的信息。书籍印制完毕的那一天不会离开印刷商的作坊。除非你说的是一群聚集在印刷所的学者，否则书籍的发行、购买和阅读是要花时间的。在16世纪，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是很长的。况且即使是现在，你也不能假设，如果两本书是同一年出版的，即使其研究课题不相关，同一读者也会在这一年读到这两本书。指望读者立即吸收同样书目中的内容，那是事后诸葛亮的谬误。塞内克知道，尾随其附录文献出版的还有更多的古典考古学——考古学“毕竟是在16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93]。然而，当时的神话学者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在他们的首版书里，他们甚至没有上述附录“可以利用”。塞内克提到的两本手册出版、第三本正在印制的时候，这个附录才问世。[94]

自然，你不能指望，学者们列举的参考文献只是在他们自己的著作出版以后才问世的图书。在历史文献里，这种不合理的预期相当普遍，我们需要对此做出解释。也许，疏忽者没有为“后见之明”留下余地，这大概可以解释疏忽的原因。查阅 198
16世纪首版书的学者容易忘记，现在看来似乎开风气之先的书，当时的人却茫然不知其未来的意义；况且，因为一版书只不过印制了几百册，所以当时的人可能浑然不知其存在。现在的史学家可以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1556年出的许多书，并且将它们搁在自己的书案上，这些史学家同样可能忘记，1556年的学者甚至不可能像现在的学者那样找到这些书。

即使以“后见之明”而言，16世纪的学者也处在不利的地位。他们没有掌握编排有序、积累了数百年的藏书。他们接触到的大多数文本源头不详，而且仅仅是刚刚得到命名。至于纪年、地理、术语和正字法，一致赞同的规矩是不存在的。塞内克说到16世纪学者的一个失误：未能“按照地理或历史的路子组织素材”。他似乎

---

① 文森佐·卡尔塔里(Vincenzo Cartari，1531—1571)，意大利艺术家和神话学家。

② 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和医师，任大学教授，研习数学、拉丁语、法律和哲学，由他执笔完成官方药典《解毒药集节录》，另著有《罗马城的古迹》。

忘记了:地理历史本身还处在混乱的状态。早期的机印书并未提供现代参考书那种指南。由于没有统一的程序给书籍编目归档,那时的材料必然是杂乱无序的。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新的程序被开发出来,提供了新的指导方针。于是,图书既可以按照它们出版的日期编目,又可以按照统一的程序排序了。我们可以按照固化的顺序去追溯各种传统,可以看到渐次展开的各种发展过程。塞内克描述寓言传统时,他从古籍开始,接着讲中世纪的文本,他讲述的顺序是图书出版的顺序,这是思想史家认为理所当然的顺序——可能过分视之为理所当然了。这是不假思索就采用的现代常规的研究方法,它常常掩盖了过去的实际情况;当我们追溯手抄书时代形成的文本传统时,掩盖实际情况的现象就更加严重了。比如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文本写就的时间顺序绝对不是西欧阅读拉丁文的教授们接触到这些文本的时间顺序。任何西方哲学史著作都要为手抄书流通所花费的时间留下余地(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必须要放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之后,柏拉图的对话必须要放在两者之后),这是史家们解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观点时必须要注意的因素。我
199 们要按照这些文本重新进入西方的时间顺序来给它们排序;如此,我们就可能更加贴近中世纪发展的实际情况。即使用这样的研究路径,我们离把握那时的混乱情况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 16 世纪的学者们不得不面对那种混乱局面。他们看见的文本几乎完全是混乱的,而我们都受到的激励是一定要给这些混乱的文献排序。

无论那几种神话书看上去多么书呆子气或野蛮,它们都反映了 16 世纪初的学术水平。潘诺夫斯基认为中世纪的人很不熟悉的"史学、哲学和考古学"对塞内克笔下的神话学家而言也是很陌生的;他们写那几本神话书时,潘诺夫斯基在他的断代史中确定下来的文艺复兴的三百年已经过去。[95] 许多铭文和图像已被复制,古典的书写形式和建筑已被复活。焦点透视系统已经充分发展,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已经完全实现。然而,斯卡利杰①对编年史的修订尚未完成,墨卡托②和奥特利乌斯启动的地图出版的伟大时代尚未开始。

我认为,"整体的、理性化的古代观念"在印刷术之后一百年才出现,而不是在彼特拉克的时代出现的,印刷术的保存功能是这个古代观念出现的先决条件。"古代始终与我们相伴"的时期并非"始于文艺复兴",而是始于印刷术和镌刻术的出现。再者,影响意大利古典复兴的变革同样影响阿尔卑斯山两侧的中世纪遗存。16 世纪所谓的"历史革命"也许受惠于"现存习惯法的系统化与典籍化",同时又归功于对罗马法律传统的研究。[96] 于是,他们对中世纪历史的看法和对古代历史的

---

① 尤利乌斯·凯撒·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1484—1558),意大利古典学者、医生,移居法国,以科普和哲学著作闻名,代表作有《植物论》、《论拉丁语》、《诗论》等。

②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佛兰德地图学家,发明了绘制地图的圆标形投影法。

看法一样都受到修正，所以他们对中世纪的观察也处在一个“固化的距离”[97]。连哥特式艺术最终也和古代艺术一道扎根于高墙深院的博物馆了。中世纪的许多制度以及思想和表达风格难道不可以被描绘成“始终与我们相伴”吗？英格兰的法律协会、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托马斯主义哲学、自由恋爱和亚瑟王传奇等难道不是“始 200
终与我们相伴”吗？诚然，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哥特式”一词始终有贬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和大多数审美品位的评判人都瞧不起“哥特式”这个词。然而，新古典时尚并没有吓到法学家、古董鉴赏家、语文学家等早期近代学者，包括有神职的和世俗的学者，并没有妨碍他们构建骑士精神和古代体制那种黄金时代的理想形象。即使在“哥特式”等于“野蛮”的时期，也有一些蛮族的风俗习惯受到人们的钦慕（塔西佗《日耳曼人》里的许多引语就是明证）。从 15 世纪起，对封建制度的赞美、俗语文学激起的豪情在学者的圈子里是很普遍的，在古代崇拜者的圈子里也司空见惯。“我们这里也经历了自己小小的文艺复兴，也可以说是哥特式的复兴。”[98] 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这句话的适用范围似乎超越了英格兰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时欧洲大陆的情况。[99] 为了对抗兴旺的哥特式的复兴，19 世纪的“文艺复兴”观念终于得以成形。

我们审视潘诺夫斯基如何展示他的主题时，诸如此类的考虑是值得牢记在心的：

> 我们的文字和凸版印刷来自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版式，而且是有意识地抗衡哥特式字体对加洛林王朝的范式和 12 世纪的范式影响的产物；反过来，加洛林王朝的范式和 12 世纪的范式又是在古典范式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你不妨说，哥特式字体是中世纪复兴的短暂象征；我们现代的字体无论罗马字体还是意大利字体都验证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持久性。自此，我们文明中的古典成分是可以抗拒的（但不能忘记，抗拒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依赖），但这个古典成分是不会完全消失的。[100] 201

这段引文的结尾似乎同样适用于我们当代文明里的哥特式成分。[101] 在印刷术的第一个百年里，所谓“哥特式”字体在大多数地区都以平等的地位与“古体”竞争。[102] 字体的寿命长过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地区的文艺复兴。它们对德国文本的影响贯穿并超越 19 世纪—— 这一切在潘诺夫斯基的书里都漏掉了。如下文所示，现代字体证明了尾随印刷术而发生的一整套复杂的变化。靠“思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永恒性”或中世纪复兴的“短暂性”都不能理解这些变化的意义；只有靠检视印刷术对 15 世纪手写体的影响，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变化。到了 17 世纪，字体的模式反映了宗教边疆的固定，明显地偏离了文艺复兴字体的常规。潘诺夫斯基

写道:“20 世纪的读者觉得加洛林字体比哥特体容易辨认,这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说明了一切。”[103]讽刺意义在于,这绝非事情的全部;20 世纪的读者在童年时代阅读的母语课本用的是“哥特式”字体。

“哥特体”被当作短暂性的象征,“我们的现代字体”被认为具有永恒的意义,这样的反差说明,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被赋予新的印刷术才能够行使的功能时,混乱只能是有增无减。为了理解书写风格的发展,对比各种不同的手写体或印刷体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将一种手写体和一种印刷体比较,那就是徒增混乱,从一开始就会混乱不堪。潘诺夫斯基说“文艺复兴的字体刻意与哥特体对抗”。我们并不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罗马体”和“意大利体”刻意对抗“哥特
202 体”,还是说这些早期印刷体复制的手写体曾经是“刻意对抗”的呢?这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这一解释并不能得到所有专门研究的支持。有人刻意采用一种手写体来誊写古籍,这种手写体像加洛林时期的草写小字,就此而言,权威人士告诉我们说,老花眼似的目光可能在这种手写体中发挥了作用,“审美中的厌恶情绪没有起作用”。再者,认为“人文主义者的手写体改革是罗马体对哥特体的战斗”[104]。

既然中世纪书写体从前期到后期的演化是复杂的,既然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本的书写体有区别,而且其区别可以用来追溯手稿出自不同的修道院、大学和宫廷,所以似乎没有任何一种二分法足以描绘中世纪书写体的情况。[105]潘诺夫斯基断言,加洛林书写体“有一个古典的根基”,同时他却忽视“哥特”书写体出自加洛林书写体的事实。[106]况且,加洛林草写小字依托的是不稳固的“古典根基”。人文主义者唯一真正的书写体出自于古罗马纪念碑,其铭文经抄写和复制而成为罗马字母表。[107]据信,罗马字母表的大写字母以对称原理为基础,与毕达哥拉斯的和谐、黄
203 金分割、完美比率等原理有关系。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艺术家、抄书人和字体设计师全神贯注,根据既定的公式去重构罗马字母表。[108]铸字工设计了一套小写字母以便和古代的大写字母匹配,最终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字体提供了“古典的根基”。就此而言,判断书写体的古典根基是对的。然而即使在这里,一些非古典的、野蛮人的或中世纪的成分也插进来,其形式是装饰性花絮和晶格状设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喜欢的装饰性首字母和装饰性页边并没有古典的血统。[109]中世纪的书籍,无论手写的还是机印书籍,自始至终都是混血的文化产品。15 世纪誊写人采用的各种手写体和装饰性图案也好,早期大量字体设计出来模仿幸存的手稿也好[110],都不能用简单的两极划分图式来归类。

早期机印书的字体并非如此井然有序,试图用二分术语将其分类的后果见诸苏比亚科(Subiaco)整理的那版著名的“西塞罗”著作。这是他 1465 年推出的《论雄辩》(*De Oratore*)。这个版本常常被誉为最早的机印书之一,有时被说成是用罗

马字体排印的。[111]据后世学者考证的当时人文主义者的常规，用其他字体排印西塞罗的书是不可想象的。[112]实际上，说到这本由斯韦因海姆(Sweynheim)和潘纳兹(Pannartz)排印的书，对如何给其中的混合字体归类，权威学者看法不一："半哥特式或人文主义式，你自己选吧！"[113]比勒在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上的结论说明，在早期文艺复兴字体的设计上，"刻意对抗哥特体"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们怀疑文艺复兴的手写体和印刷体都"刻意对抗哥特体"，这不是否认，有些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以论战的姿态用大型圆黑体来针对潦草的尖角体。潦草的字 204
母、连线和略语与文本的舛误有关系，学问的失传则是难免的后果。誊写人的笔误因写作而被助长，难以辨认。无论如何，字母的形状、文本的性质、学问的品质和洛伦佐·瓦拉这样的学者相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两极分化，定下了初期论争的用语。

现代学者觉得瓦拉的手抄本论文意义重大[114]，但许多早期的字体设计人、印刷商和赞助人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许多人无意之间吹捧人文主义者采用的手法，或追随人文主义者却另有盘算。[115]还有人虽然支持新学，但绝不会摒弃哥特式风格，因而促进了哥特式风格的保存。在北方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字钉设计模仿哥特手写体和哥特草书，这和通俗语文学的繁荣有关。[116]在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百
年里，关于印刷设备和字体的决定以及不同的文本选用什么字体的决定真是千变 205
万化，有赖于许多迅速变化的地方环境和个人选择，任何总体设计的感觉几乎都是不可能成立的。[117]试图把复杂的模式简单化，把这段时间的字体分布和某一种趋势或发展挂钩，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由此可见，用"抗拒人文主义精神"来解释"德意志四百年里使用的粗黑哥特体"，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用神学著作在科隆和维滕堡的主导地位来解释这一现象似乎也站不住脚。[118]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神学著作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占据主导地位。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反宗教改革的小册子来看，把采用"人文主义文学"作为"批判中世纪教条主义"的象征似乎也是不明智的。[119]实际上，有一本神学著作对固化后世的印刷术边疆可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本书就是《圣经》。在罗马字体的推广中，《圣经》的主要印制中心从安特卫普向日内瓦的转移似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路德派《圣经》版地区之外占主导地位。[120]罗马字体用来排印通俗拉丁语《圣经》和其他通俗语《圣经》绝不是"象征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永恒属性"，而是与人文主义者的常规字体决裂的标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路德的德语版《圣经》用的是哥特体，这符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惯例(用非古典字体排印通俗语的神学著作)，这对固定后世看上去古怪的传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21]有鉴于 206
此，丹尼斯·海伊的话似乎离题万里。他说："文明的意大利印刷术传播到北方，更雄辩地说明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某些成分的……传播。"[122]因此，低地国家的一位

印刷商用哥特体排印阐述维特鲁威建筑原理的一本书，“以便让普通人更容易看懂”[123]。虽然这位印刷商用的是“错误的”字体，但把维特鲁威介绍给世俗的建筑师是符合意大利人文主义精神的。分割日内瓦和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和维也纳的印刷术边疆同时又把索邦神学院的教授与佛罗伦萨人联系在一起。[124]看来，印刷术边疆与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争论、神学家和新学提倡者的争论丝毫不搭界。到了17世纪，这些边疆跨越了思想、文化和宗教分界线，完全消除了曾经由手写体反映的边疆。“罗马”字体的传播不能被当作人文主义传播的象征，其证据是：在使用“哥特体”的瑞典或荷兰印的书在“罗马”字体的西班牙或意大利被禁止，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在“罗马”字体主导的地区遭遇挫折——只需瞥一眼就足以明白：罗马字体不是人文主义传播的象征。

同样误导人的是把哥特体当作中世纪复兴短暂的象征。就手写体而言，哥特式非常不适合被当作加洛林草书小体复兴的象征。路德《圣经》印刷商普及的字体绝不是中世纪字体，至今也没有被证明是短暂的。只需在书报摊上随意挑选20世纪的《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任何一份报纸，你都不难看懂其中的哥特字体文字。[125]文艺复兴字体之所以留下永恒的印记，并不是因为它吸收了一种风格而不是另一种风格，而是因为它是用字钉印出的，不是用手写的。

这使我想起持久性主题的一些变异，其中心是古典学术的兴起和古典文本的恢复。克里斯特勒有一篇很重要的研究文艺复兴思想的文章[126]，他引用潘诺夫斯基的理论来研究思想史，突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研究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他指出，这些研究不附属于神学，反而是更加独立自主的。与此同时，中世纪学者拥有的选择大大增加，几乎堪与如今的学者媲美。他强调文艺复兴发展的新奇要素，却没有指出印刷术产生的新颖成分。于是，人文主义运动就被赋予了在西方世界推进一切古代文本的功劳，它介绍给西方世界的古代文本迄今仍然是标准的古典。

> 认为古典拉丁文学……在中世纪被忽视是错误的……同理，否定人文主义者的发现使拉丁文学的遗产几乎达到了目前的极限，那也是错误的……
>
> 几乎全部希腊文学都藏于西方图书馆，都通过手抄书和机印书而传播开来。
>
> 于是……在拉丁文和希腊语领域，中世纪都拥有意义重大的古文献原典，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将古文献知识几乎拓展到幸存的一切领域，在此基础上，现代学术又靠羊皮纸和莎草纸的写本做出了进一步的发现。[127]

人文主义者的发现离我们“目前的水平”还有多大的差距，现代学术在哪一点

上接过了人文主义者的成就，达到引文最后一句话所谓的“进一步发现”，这个问题难以断定。从印刷术出现时起，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重新发现的过程，历史研究的技艺继续不断发展的过程。进一步的发现从未停止（比如米南德[①]的戏剧是20世纪才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从未终结。但晚近的发现来得太晚，无法插进本科课程里，因为本科课程或多或少以永恒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这是16世纪就已经形成的定式。因此，这些后来的发现就被当作核心的希腊和拉丁 208
文本之外的边缘。这个永久性的核心文献的规模前所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誊写人再也不能像中世纪的誊写人那样完成抄写的任务。(128) 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知识的拓展”几乎达到了我们目前的极限，那是因为古文献被发现后再也不会得而复失了，不会再被损毁或舛误丛生了，也不会被误植或误放了。

事实上，彼特拉克激起后继者发现并誊写过的许多手稿后来又失传了。含有“重新发现”的文本的一些图书馆后来又消失了。(129) 15世纪的一些评注本和以它们为基础的收藏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物性论》(*De Rerum Natura*)不为人知，有一段时间，其遗存仅靠一个孤本。后来，波焦[②]于1414年末发现了这个孤本。”(130) 在这一关键的发现之前，这一熟悉的传说中断了。波焦发现的卢克莱修的诗歌也得而复失。所幸的是，波焦自己誊写了一份。因此，要调动多少抄书人来保存卢克莱修的著作，有多少托钵僧可能找到并销毁一切幸存的副本，有多少副本可能会被后来的古籍搜求者再“发现”——这些问题都难以做出肯定的答复。不过现在可以肯定，卢克莱修的文稿的命运仍然不确定，直到1473年它进入了布雷西亚的一家印刷所。它仍然有可能前途未卜，不过它等待的时间不长。到16世纪末，卢克莱修的著作已经印行了30版。于是，一部异教学派的令许多教士长期皱眉头、忽生忽灭的著作首次在西方文化中有了立足之地。(131) 是波焦还是布雷西亚的这位印刷商把这位古代的享乐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古典作家呢？ 209

正如这个问题所暗示的那样，15世纪人文主义者寻觅古籍的努力对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些古籍不像以前的文献得而复失，人文主义者抢救的古籍是用机器印行的，因而永久保存下来了。

---

① 米南德（Menander，前342—前292），希腊戏剧家，擅长轻松喜剧，作品达一百余部，但仅有《恨世者》存世。

② 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aracciolini，1380—1459），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现许多古典拉丁文手稿，著有《论吝啬》、《论命运》、《佛罗伦萨史》等。

> 西方发现古籍手稿的时代走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波焦、尼科利[①]和库萨的尼古拉[②]那一代人业已向世人昭示了大多数重要的拉丁古籍，后世再也看不到类似的经验了。(132)

就其所指的那个范围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但我相信它不够深入。它止步于15世纪40年代，这就排除了使那一时代特别非凡的广度。那一代人的经验不再重现，因为他们在1453年之前"昭示于天下"的著作从此以后进入了公共领域。他们的经验本身并非完全是前无古人的。维京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有可能登陆过美洲；毫无疑问，克雷莫纳的杰拉德[③]或巴斯的阿德拉德[④]那个时代的学者经历了一个手稿大发现的高潮。他们的经验本身并非前所未有，前所未有的是其结果。

完成发现和保全发现的区别或许有一点微妙。然而，如果做出这样的区分，棘手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对付了。比如，既然人文主义者"发现"的古籍早就被中世纪的学者发现了，因为人文主义者发现的是中世纪学者的抄本，那么为什么还要赋予他们做出"发现"的功劳呢？陈旧的办法是绕开这个问题，用这个姿态去暗示，人文主义者发现的"功劳""被贬低了"(133)。但倘若我们不提出这个问题，中世纪对古籍保存的贡献可能就被掩盖了。

> 倘若古拉丁文本只剩下一两份加洛林时代的抄本，倘若在其后的几百年里，罕有迹象表明曾有人读过这些抄本，而人文主义者发现了这个抄本，复制了若干副本并使之广为人知，那么他们的发现就应该被认为是真正的发现……不错，有些古典拉丁学者比如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加[⑤]或波伊提乌已经广为人知；但这不能用来否定另一事实：卢克莱修、塔西佗或马尼利乌斯[⑥]
> 210 是人文主义者发现的。(134)

你越仔细察看那"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事实就越不明显。新近的研究驳倒（曾被认为）的"明显事实"：波焦1416年"发现"维特鲁威之前，维特鲁威"不为人知"。

---

① 尼科利(Niccoli，约1364—1437)，佛罗伦萨富有的人文主义者，大量收藏、抄录、整理古籍，对15世纪意大利的古籍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②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红衣主教、数学家、古典学家、实验科学家、哲学家，著有《论公教和谐》、《论学而无知》等。

③ 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约1114—1187)，意大利学者，终生客居阿拉伯，曾将80种阿拉伯文著作译成拉丁文，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医典》等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和炼金术著作。

④ 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活跃于12世纪初，英国经院哲学家，曾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的阿拉伯文版译成拉丁文，游学并执教于欧洲许多地方。

⑤ 塞内加(Seneca，前4—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哲学著作有《论天命》、《论愤怒》、《论幸福》，悲剧有《美狄亚》、《奥狄浦斯》等9部。

⑥ 马尼利乌斯(Manilius)，创作时期在1世纪初，最后一位罗马劝世诗人，著有诗篇《天文学》。

马歇尔·克拉吉特[①]对阿基米德的研究也证明，中世纪的人并非不知道阿基米德。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驳倒人文主义者声称的其他发现。[135]再者，“发现”一个文本和使其“广为人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用含混的“发现”一词将两者捆在一起，混乱就相继而起。事实是，大量的维吉尔或奥维德的中世纪抄本被发现，而卢克莱修或塔西佗著作的抄本却很少。但查理曼帝国瓦解之后，关于古籍流传的证据实在是靠不住，任何可靠的结论都不可能。[136]除了不太均衡的记述之外，没有可靠而标准的作者引语或书名。[137]比如，中世纪读者并非不熟悉“亚里斯泰迪斯[②]失传的辩护词”。虽然直到19世纪这篇辩护词才正式“被发现”，但它一直存在于通俗的传奇故事《巴拉姆和约萨法特》(Barlaam and Josaphat)中。[138]

问题还是存在：如果说波焦因找到一篇手稿就享有“发现”卢克莱修的功劳，那么11世纪那位抄书的无名氏难道不该同样享有发现的功劳吗？须知，给15世纪的古籍搜寻者提供那件弥足珍贵的塔西佗—阿普列乌斯[③]羊皮纸文献的，正是这位无名氏。有人引证一位人文主义者的三个手抄副本，就断言这一著作的“流布相当广泛”[139]。既然如此，“那加洛林时期的一两个副本”历经几百年的混乱而幸存下来，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它们的流布也相当广泛吗？正如这些问题所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言论似乎常常建立在双重标准上。此前各代参与抢救古籍残篇的人似乎被塞进不公平的竞争中。那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把那个文本交给印刷商印行，无论他这部古籍是从修道院窃取的或从通常的渠道买来的，无论他是否仅仅印制几份，他都名垂史册，成了文化英雄。相反，那位保存古籍的中世纪的无名学者、抄书人或誊写人却消隐在黑暗时代的重重雾霭中。

我们应该能够给这两个群体公正的评价，而不是“不恰当地贬损”任何一个群体。只需放弃“发现”一词(从最好处说它读起来麻烦，在手抄书文化的语境下尤其麻烦)，强调那是再发现，我们就可以不贬损任何一个群体。在15世纪人文主义者再现的古籍中，几种重要的文献濒临失传的境地。但这些濒危的珍本之所以能够被再现，那是因为此前就反复有抄书人在拯救这些文献。波尔加的一段话为我的观点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彼特拉克及其圈子继承了图尔修道院和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传统，享受其荣光。倘若印刷术没有发明，这个圈子保存古籍的努力还是不得不反复进行，他们不得不和前人一样操劳，反复抄写。”[140]

---

① 马歇尔·克拉吉特(Marshall Clagett，1916—2005)，美国科学史家、古典学家，阿基米德研究专家，代表作为《中世纪的阿基米德》(5卷)。

② 亚里斯泰迪斯(Aristides，前530？—前468？)，雅典政治家和将军，提洛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曾参加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被称为“公正的亚里斯泰迪斯”。

③ 阿普列乌斯(Apuleius)，活跃于2世纪，罗马哲学家、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金驴》、《论柏拉图及其学说》等哲学著作。

彼特拉克及其后继者维持一条岌岌可危的生命线，将古籍残篇传承到印刷术时代。其实，他们发挥的功能和 9 世纪加洛林时期的抄书人与宫廷学者所起的作用大致相同。他们从拜占庭进口希腊文本，与希腊学者合作，将其翻译成拉丁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 12 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大同小异，经院哲学家重新把亚里士多德、盖仑、欧几里得等人的著作引进西方。12 世纪的复兴和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走的是不同的跨文化路径，但两者都受到手抄书文化强加的局限。所以，这两次复兴都局限于狭小的地区，都囿于局部的古典遗产，其目的主要是恢复过去失去的领地。人文主义的古籍搜寻者谋求恢复的地盘以及这些地盘失去的方式，特别值得认真思考。手抄书固有的局限性暴露无遗，而且 12 世纪复兴和 15 世纪复兴的关系也隐含其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搜寻的古籍的供应是比较短缺的，相反，正如最近再现的阿拉伯路径所示，阿拉伯路径提供的古籍比较多，
212 这是不是意大利古籍短缺的原因之一呢？

在追问这一建议的隐含命题前，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建议和艺术史家比如潘诺夫斯基的分析思路刚好相反。在这个方面，我们对接受他的意见需要持谨慎态度，他的意见是把自己的主张“拓展到其他思想史领域”[141]。他的解释强调 13 世纪极端偏离古典的趋势。他认为，“与古典的极端疏离”表现在文学艺术的“典型的哥特式”风格里。中世纪早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典遗产，但持久地堵塞了完全吸收古典遗产的可能性。其古典形式始终和古典内容脱离。墨丘利这样的希腊神可能被画成主教；朱庇特和雄鹰化身为格列高利教皇和圣鸽。在这位艺术史家的眼里，这样的分离表现的是对古典的矛盾态度，矛盾的化解只能靠彻底的批判。在哥特式风格的盛期，柱顶的古典装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古典的影响被禁止和清算，“在所有国家”都跌落到“零点”或“谷底”。赋予伟大的文艺复兴的“完全的复兴”有一个预设，那就是建基于经院哲学时期古典传统的“完全的湮灭”。“仿佛是从零点起步，真正的文艺复兴才能够开始。”[142]

我认为，哥特式风格中古典成分中的“完全”湮灭说得太过分了，这样的断言赋予中世纪的哥特文化一致性和风格的整合；但哥特式风格这样的一致性和整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在印刷术之后，这种一致性和风格整合才能够到来。潘诺夫斯基这种说法好比是错误地想象，抄书人有意识地清除圆形加洛林字体，设计“哥特式”手写体，就像 19 世纪的哥特式复兴主义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潘诺夫斯基书中挑选出来的许多偏离古典的现象似乎是无意之间的偶尔为之，而不是刻意的雕琢；是传输过程中的意外现象，而不是爱恨交织的矛盾产物。[143]什么条件导致继承的材料被贴上错误的标签？什么条件导致人们为了便于记忆就把古典的形象和母
213 体从其语境中剥离出来？在探讨“典型的中世纪思想”的特性前，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让·塞内克对其中的一种分离现象做了很好的描绘：

艺术家有一个视觉模式但……缺乏一个解释性文本时，他不能正确地表达这一文本；他只有一个文本时，就没有一个检验自己表达的视觉模式。

即使有一个模式传承，这个模式也会产生越来越多走样的复制品，于是理解就模糊起来并被丢失了。(144)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异教神的变化，塞内克追溯了这样的变化。古籍里对植物和动物的描绘也有丢失的情况，建筑流派、海岸线、星座等的记述也会丢失。文本与图像的分离反映的是复制模式的工匠和插图人必然出现的劳动分工，工匠复制的模式所需的材料是木头、石头、象牙或金属，插图人复制图像是用墨水在羊皮纸上描绘。（值得注意的是，新近的复制技术使不同媒介的区别愈加难以感知。原来在不同材质上表现的形象如今在同一材质上并置，放在同一本书里。我们对这样的并置和差异习而不察，我们可能忘记，这一现象在过去是很罕见的。）

手抄书文化不仅促成形象和文本的分离。它还经历反复的丢失和偶尔的增益。一部分古典被再现时，另一部分古典有可能丢失。古代文献复兴时，古典法律和科学可能会蒙受损失。就经院哲学家关注法律和科学而言，他们试图保存和传播而不是毁损或批判传承下来的古典文化。在“哥特式”盛期，他们提倡更多地研究希腊，罗杰·培根试图更加接近古籍，而不是反映“经院哲学家”的偏离。不过，在努力恢复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盖仑、托勒密和罗马法的全貌时，其他古典文化却蒙受了损失。在经院哲学家的庇护下，古希腊的天堂在哥特式的兴盛期经历了重构的过程。即使在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被恢复的过程中，希腊神的名字和神性也被丢失了。这两种现象并非是没有联系的。 214

古典成分中的所谓“中世纪盛期”风格或哥特式风格绝对没有绝迹，它表现在建筑物的穹顶之中。在哥特式尖塔指向天空的时代，圆形的地球和圆顶的天球形象就在恢复之中。洛夫乔伊指出：“中世纪最经典的事物可以说就是宇宙……天空的构造并非哥特式设计……而是希腊式大厦。”(145)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说得温和一点，13 世纪对古典遗产的摒弃也是不完全的。我们还应该警惕，不要认为看似古怪的非古典成分就是刻意摒弃古典的象征。一些异教神的形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珀尔修斯①和赫拉克勒斯②在中世纪后期就经历过奇怪的变形，“在人形、服装和装备上就实现了彻底的东方化”。潘诺夫斯基认为，这意味着，哥特式思想远远偏离古典文化，它甚至摧毁了加洛林复兴传承下来的表征传统。(146)他的读

① 珀尔修斯(Perseus)，宙斯之子，杀女怪美杜莎(Medusa)。

②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即罗马神话里的赫丘利(Hercules)，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因完成赫拉要求的十二项任务而获得永生。

者可能会引申出这样的意义:希腊神被贬为撒拉逊人[①]和异教徒,很像中世纪神秘剧里的恶棍"撒拉逊骑士派勒特爵士"。这样的演绎是错误的。异教神获得东方佩饰是无意为之,这是阿拉丁天文学文本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给星体的定位比舛误丛生的加洛林文本准确。这样的东方形象不是偏离古典文化(甚至不是与之矛盾),而是反映了学者们恢复的希腊化时期发达天文学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遗存在阿拉伯人的手里。

用神话人物来指星象的外貌使我们想起手抄书文化传承的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中世纪文化里分离的现象。我们要考虑图像逐渐漂移离开文本的趋势
215 以及传输中的其他偶生的意外,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将生动形象和母题作为记忆辅助手段的趋势。已如上述,当古典形象被放进想象中的"记忆库"里时,它们就必然要从历史语境中脱离出来。对记忆术的依靠促成了历史年代误植的现象。有学问的人掌握了记忆术以后,他们构拟昔日文明全貌的能力不是强化了,而是削弱了。由此可见,赫拉克勒斯和珀尔修斯的东方化被人刻意理解为一个象征了,他们认为手抄书文化不能传输古典遗产的全貌。古典天文学的恢复必然引起古典神话的失落。在不同的地区,这个遗产的不同成分可以被不同的人群恢复。但只要学者们不得不依靠手抄书文化有限的传输手段,希腊—罗马文明的全貌就是不可能恢复的;如果是那样,古典文化就不可能被恢复成一个完整的、结构清晰的文化系统。

恢复并传输希腊人表现天空的建筑的结构和其他古典智慧的努力同时并举;中世纪的人努力吸收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的学问(姑且不提罗马法和阿拉伯科学);这样的努力必然耗尽了手抄书文化的资源。据最近的研究,哥特式缩略语和手写体的使用显示资料数据太多,大量的数据要记录,而羊皮纸的供应却很稀缺。[147] 与此相似,古抄本相对稀少的事实说明了这样的问题:专职的誊写人不多,雇佣他们来维持旧文本流通和新文本的抄写就遇到困难。为保存 11 世纪和 12 世纪发现的大量的技术资料并使之流通,为抄写以这些文本为基础的大量的修订本和综合本、词汇表和评注,都需要雇佣大批专职的誊写人。誊写工作转入主要的学术书生产中心(位于巴黎和奥尔良之间),这大概能够说明,古代文学的供应为何会逐渐减少。此前,这些文学书是大教堂里的教学用书,后来就成为 15 世纪的古籍搜寻者的猎取对象了。

216 无疑,中世纪的发展很少是协调和同步的。正如本书前面一章所述,新的书籍生产中心按照教学和布道的订货组织时,修道院的手抄书生产逐渐衰落。看来,14

① 撒拉逊人(Saracen),阿拉伯人的古称。

世纪的修道院不可能全都像薄伽丘[①]创建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早些时候那种“对新方言的狂热”也不可能同时让各种群体的抄书人得到解脱。但彼特拉克及其后继者搜寻的著作（通常指在13世纪前“发现”的手抄书）的供应量在减少，这倒是可能的，因为新的努力方向是吸收古典遗产的其他成分。推动这一趋势的是新创立的研究院，这里的教授们将神学推上御座，使之成为学科之王，他们还指导书商们的图书贸易。神学没有在意大利的大学里占统治地位，那里兴旺的是法学和医学。耐人寻味的是，佛罗伦萨人可以更加自由地经营文学艺术图书的进出口贸易，而不是经营法学和医学图书，因为法学和医学图书要受关税管制以及严格的学术控制。(148) 由于书写材料的供应充足，由于教廷和城邦可以征用教士的劳动，15世纪的书商大概比较容易满足意大利北部图书市场对“西塞罗那些讲演词和昆体良[②]那些修辞原理”的需要。然而，倘若没有印刷术那种“神奇发现的”、“神性的艺术”（路易·勒·罗伊语），假如不付出某种代价，人文主义者珍惜的誊写工作在意大利半岛上是难以为继的，遑论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地区。倘若没有那神奇的印刷术，“比较轻松地恢复已经死去的文学”就很艰难了。(149)

印刷术出现之前，古典的复兴必然范围有限，时间短暂；那时，持久而永恒地恢复古典遗产的一切成分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造纸术产生之后，这样全面的恢复也是不可能的。比较廉价的书写材料助长了布道辞、书信和诗歌的记录，促进了数量更多的通信、日记、回忆录、抄写簿和笔记簿。从羊皮纸向纸张的转化对商人和文人的活动都产生了冲击。(150) 尽管如此，正如上文所示，在减轻专业誊写人的劳动或增加其产量方面，纸张都不能起到丝毫的作用。(151) 只要文本的复制依靠手抄，古典遗产的长期保存就只能建立在靠不住的本地精英人士波动的需求上。从一个地方输入的文本使来自其他地区的供应绝迹；古代学问的注入使一些领域的知识丰富，同时又使另一些领域的知识贫乏，因为它要求誊写书的劳动力转向特定的方向。在彼特拉克“加冕”后漫长的一百年里，意大利的学术复兴就像过去的若干次复兴一样是有限的。一种复兴是几次有限而短暂的复兴，另一种复兴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史无前例的复兴；倘若我们接受这样的区分，那么在彼特拉克之后，我们还得等待一个半世纪才能够说，一种新型的复兴模式确立起来了。

对早期近代以“历史革命”为核心的解释，这一点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52) 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一点，然后才能把创建新学科的责任赋予任何一个具体的学者群，才能考虑语文学、古典考古学和其他的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认为

①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诗人和作家，反对贵族势力，拥护共和政权，作品有传奇、史诗、短篇故事等，代表作为《十日谈》。

② 昆体良（Quintilian，35？—96？），罗马修辞学家，著12卷《雄辩术原理》。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近代学科的创建者，是站得住脚的；他们影响阿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这类著名的印刷商的出版计划，就此而言，他们开风气之先，启动了印刷书以后继续发展的潮流。尽管如此，就像手抄书文化的学者一样，他们不能确保任何学术门类的持续发展，也不能确保文本生产中的持久的革命。古典学术、历史研究和其他辅助性的学科启动新形式的继续革命有一个前提：只能在15世纪后半叶印刷厂建立起来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218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印刷术文化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确立的手抄书文化的先例作一番比较，这可能会给人教益。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历代学者在这座图书馆里皓首穷经，他们整理的书目文献并没有完全消失，然而，和以后的书本学问对照而言，这些残篇断卷却表现出明显的非连续性。该图书馆的藏书散轶之后，莎草纸卷和羊皮纸卷的分类技能没有在西方保存下来，书写这些纸卷的语言知识也没有保存下来。印刷术发明四五百年以后，学者们通力合作产生的“书目文献之文献的文献”(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的形态和亚历山大图书馆整理的文献全然不同。凭借越来越精致的系统和技巧，全世界的学者正在绘制一个迅速扩张的书籍的世界，正在为它编制越来越精细的分类目录。在献给威尼斯印刷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的一段警语里，伊拉斯谟充分描绘了这两个世界的差别。他说，阿尔杜斯的任务过去是由伟大的君主承担的，比如建立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托勒密王朝的传奇式人物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但托勒密王朝这座图书馆“限定在围墙之内的狭小范围里”，而印刷商“建立的图书馆却没有其他局限，除了世界本身”(153)。

这一段警语所示的差异具有深远的意义，伊拉斯谟不可能预见到其全部的隐含命题。而且这些命题的意义太深远，本章小小的篇幅不可能讲完。新的信息流远远超越了古代基督教的视阈，正是这样的视阈拘束了伊拉斯谟的世界。无围墙图书馆的扩张似乎无穷无尽，这一特征有助于解释我们视野无穷无尽的感觉，无限扩张、不断展开的景观正是巴洛克时代文学艺术的特征。“极限的否定”、“封闭圈子的打破”等类似的观念在伊拉斯谟的时代尚未成为支配性主题，在探讨这些主题时，应该考虑古代图书馆与现代数据库的差别；古代图书馆有围墙的拘束，印刷术以后形成的数据库则是无穷无尽的、开放的。在本书稍后的论述里，我希望说明从
219 “封闭世界”到“新宇宙论的无穷世界”如何与“没有围墙的图书馆”联系在一起。(154)这里仅仅指出，天文学家哥白尼和伊拉斯谟一样都受惠于阿尔杜斯等早期印刷商创建的新型图书馆。从印刷所发出的古典文献新版本、词典、语法书和参考指南为西方持久的希腊复兴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使人能够超越古人掌握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问。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①]以后，希腊研究的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例证，说明印刷术如何改变传统的文化变迁模式。

> 历史上一个奇怪而持久的神话是：希腊著作的人文主义研究始于1453年，一群有学问的难民匆忙逃离君士坦丁堡，随身携带一些珍惜的手稿。其实，这样的逃亡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早在15世纪初，人文主义的活动就很活跃……此外，人文主义者自己证明，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对他们是一场悲剧。典型的证词是人文主义者、红衣主教伊利亚斯·西尔维尔斯·皮克罗密尼(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的惊呼……1453年7月，他绝望地致信教皇尼古拉五世："多少伟人的名字将化为乌有！这是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缪斯之泉干涸了，永远干涸了。"(155)

"奇怪而持久的"神话说明，此前的趋势出现了令人注目的逆转。就我所知，这是重要的手抄书中心文献散轶中的首次逆转，这次逆转与学术复兴而不是与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这位人文主义的红衣主教预料的可怕后果是基于他那个时代所知道的历史教训：每当大都市陷落时，学术都会被遮蔽而黯然失色。相反，我们现在理所当然地认为，主要的希腊文手抄书落到异族手里后，希腊研究继续发展；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当古人发现荷马与柏拉图并没有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被埋葬，而是被挖掘出来时，他们会多么惊讶。

无疑，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如果发生在印刷术之前必定是一场浩劫：散落在周边地区的文本和学者可能会延长希腊研究，但那只能是暂时现象。据布尔克哈特考证，到1520年，"随着最后一批流亡的希腊学者群落的消亡"，希腊文学的研究濒临死亡。他指出："由于非常好的机运，阿格里科拉[②]、罗伊希林[③]、伊拉斯谟、斯特法尼家族[④]和布多伊斯[⑤]在此期间学会了希腊语。"(156)正是这"非常好的机运"使后代学者进一步发挥那个神话：启动文学复兴、从愚昧的修士手里"拯救"学术的是伊拉斯谟和罗伊希林，而不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157)

实际上，伊拉斯谟和罗伊希林这两位北方学者正是因为得到一位意大利印刷

---

① 君士坦丁堡陷落，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首都，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

② 阿格里科拉(Bauer Agricola，1494—1555)，16世纪德意志采矿和冶金学家、作家，矿物学之父。

③ 约翰·罗伊希林(Johanne Reuchlin，1455—1522)，德国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研究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的先驱，著有《希伯来语语法纲要》，推进了希伯来语和《旧约》的研究工作。

④ 斯特法尼家族(the Stephani)，即法国出版商埃蒂安纳家族(Estienne)，包括创业的亨利·埃蒂安纳、儿子罗伯特、孙子亨利，著名产品有《拉丁语词典》、希腊文《新约全书》、古希腊著作和《希腊语词典》。

⑤ 威廉·布多伊斯(William Budaeus，1467—1540)，亦名比代(Guglielmus Bide)，法国古典学者、外交家，法兰西学院创始人之一，两次担任法国驻教廷大使，后任皇家图书馆馆长，著作颇丰，代表作为《希腊语言评注》。

商及其希腊语编辑的标注才获得“拯救”。据罗伊希林自述，如果没有阿尔定出版社的书，他就不可能传授希腊语。[158]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印行的图书还丰富了维滕堡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约翰·罗伊希林的侄儿菲利普·梅兰希顿[①]在这里担任希腊语教授，后来还任该校校长，并被誉为“德国的校长”。哥白尼这位北方学者造访意大利时聘请了一位希腊语老师。老师不幸去世以后，哥白尼借助词典和新近出版的书学会了希腊语。[159]在其他地方，布尔克哈特赞扬阿尔定出版社，但他并没有帮助读者把“非常好的机运”和“斯特法尼家族之类的北方人”的新事业联系起来。[160]这一点适用于其他研究希腊学术复兴的成果，它们只追溯从15世纪初开始
221 的趋势，却不驻足思考文艺复兴承受君士坦丁堡陷落打击的非凡表现。

到16世纪初，与拜占庭的联系中断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推进在巩固，难民聚居地在消亡，意大利也成了北方人侵的战场。以此为背景，如果你记住，到1520年，一切主要的希腊文本都已经翻译成拉丁文[161]，你就可能会以为，人文主义者研究希腊的冲动自此将消亡。然而事实上，手抄书中的陈词“像希腊语一样难懂”，在西方文本里逐渐消亡，且一去不复返了。[162]希腊研究一劳永逸地进入了欧洲所有学校的教学计划。古典学者研究的领域延伸到涵盖希腊化文明早期的阶段。[163]如果说旧的合作形式产生了全新的效果，这大概是因为希腊语字钉被铸造出来了，词典和语法书已经编纂印行了，大批的机印书和和原文图书进入读者手里了。

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谨慎，当我们探讨侨居西欧的希腊人对西方文艺复兴学术的影响时，我们不要模糊了早期的手抄书学者、古籍收藏者和誊写人与后来聚集在印刷所里的学者、出版商和书商的区别。[164]从1494年到1515年，克里特人和其他希腊流亡者成为阿尔定印刷商大家族的成员、阿尔定“学苑”的核心；他们在许多方面为阿尔杜斯效力，为阿尔定出版的图书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值得指出的是，这
222 些学者二十五年中在威尼斯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一百年里在佛罗伦萨取得的成就。[165]他们在阿尔定出版社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前辈移民学者发挥的作用，但他们的成就不止于此，因为他们受雇为印刷商服务，为新型印刷机加工文本，所以他们的功能必然是全新的。当我们说他们的活动代表着“从拜占庭学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一章时”[166]，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一章非同寻常的性质。在这个时期，一切形式的学术传播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思想交流的路线出现了重大的调整，使东西方的传统接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前依靠个人交流的模式过时了，移民活

① 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on，1497—1560)，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路德派领袖之一、维滕堡大学希腊语教授，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动的影响下降了。阿尔定版的图书吸取了希腊人的帮助，同时又把西方学者从这种传统的依靠中解放出来。无论君士坦丁堡、雅典、克里特、威尼斯、佛罗伦萨或罗马的希腊人的遭遇如何，不仅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人可以从事希腊化时期的研究，而且海峡对岸的英格兰人甚至新世界的西方殖民地的学者也可以从事这样的研究了。

虽然西方的希腊研究与希腊学界在和平环境中的接触中断了，但西方对希腊的研究还是方兴未艾。这是印刷术促进学术繁荣的表现之一。希伯来研究和阿拉伯研究也获得了新的活力。[167] 中世纪的《圣经》研究既依靠与犹太人的接触，也依靠与希腊人的接触。15 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世界才难以维持“闪族语研究不绝 223
如缕的传统”[168]。威尼斯一位安特卫普的移民印刷商丹尼尔·邦贝格(Daniel Bomberg)为威尼斯的闪族语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推动了希伯来研究和阿拉伯研究，正像阿尔杜斯推动希腊研究一样。[169] 此前对欧洲人来说全然陌生的其他外语图书也首次能看到了。在 1517 年至 1657 年间，合参本《圣经》在阿尔卡拉、安特卫普、巴黎和伦敦出版发行。这四个版本在语种数量上一个赛过一个；1657 年伦敦印行的合参本《圣经》不少于 9 种语言(包括波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其排字工和校对人至少要掌握 9 种语言。[170] 相关的字钉铸造以后，词典和语法书发行以后，新学科的发展就有持久的基础了。[171]

古语言的恢复和古籍恢复的模式一样。此前断断续续的过程成了连续、增强的过程。一旦一种发现用印刷品永久记录下来以后，一连串无穷无尽的发现的道路就被铺平了，研究技法的系统发展道路就被铺平了。历史探索的深度稳步拓展；千百年失传的文本和语言在研究古人的过程中被恢复、重构和破译了，不仅对欧洲人是这样，对世界各地的人也是这样的。和我们目前使用的精制技法相比，16 世纪的研究方法看上去粗糙而笨拙。然而，无论今天的发现多么精致，我们还是不得 224
不继续依靠 15 世纪的发明来确保这些发现。即使在目前，无论学术发现的性质如何(无论其凭借的工具是铲子或吊车、烹饪书、镊子或碳 14)，它都必须要用印刷品记录在册——在期刊上发表并予以详细阐述，然后才能够被承认，被认为有贡献或被用于实践。

罗伯托·魏斯写道：考古学“是文艺复兴的创造。对古代的崇敬……从古至今几乎贯彻始终。但如果你到古代世界或中世纪去搜寻系统的古代研究，那将是徒劳无功的”[172]。系统研究要等到彼特拉克之后一百年才会出现。正如魏斯所言，15 世纪上半叶的古代研究还处在没有条理的状态。只有等到人文主义的冲动与印刷文化的新特征结合起来以后，系统化才会到来。此外，古代研究的系统发展也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先例。誊写和校正教父遗著和《圣经》的需要本身就刺激了人们对古文物和古语言的好奇心，并使之经久不衰。

有鉴于此，在解释古典学术的兴起和辅助学科的发展时，如果我们止步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那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人文主义可能会促进古代研究，使人敏于发现年代的误植，加速人们对古代成分的好奇心；然而，它不能提供隐含于“兴起”一词里的连续性要素。有关失传文本和语言的发现之所以大量积累，且积累的方式前所未有，那不是由于 15 世纪特有的时代精神，而是由于各地的学者有了可以利用的新型的印刷术。

3.3 向近代意识形式的转变

还有很多其他的发展容易用类似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展常常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似乎指向现代。我们不妨看看布尔克哈特这段著名的论述里提
225 到的发展：

> 在中世纪，人的意识的两个方面……都在同一块面纱之下做白日梦或半睡半醒。织就这块面纱的材料有信念、幻想、幼稚的先入之见，透过这块面纱，世界和历史都裹上了奇怪的颜色。人们只意识到自己是种族、民族、政党、家庭或公司的成员——仅仅是透过某种一般的范畴。这一面纱首先在意大利化为乌有；客观看待这个国家和世间万物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人成了有精神的个体，而且意识到自己是有精神的个体……不难证明，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大利的政治环境造成的。(173)

在我看来，这段话的某些部分似乎有问题——尤其关于中世纪人缺乏自我意识的断言似乎缺乏说服力。问题是作者可能被误导了，他把集体意识赋予一个时代，把个体意识赋予另一个时代。然而实际上，属于“一般的范畴”和“精神的个体”的意识似乎一直并存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圣奥古斯丁和圣贝尔纳[①]那个年代就开始并存。实际上，倘若近代早期真有什么意识变化，其变化大概既是群体身份意识的变化也是个体身份意识的变化。(174) 这段引文的其他部分也需要修订。以其现在的面目来看，这段话的意思太暧昧，你很难确定，布尔克哈特所谓的“这个结果”究竟是什么意思。

尽管如此，我不会附和有些人的非难，说他这段话没有包含实质问题，我不会说，人的意识里没有发生真正的需要解释的变化。况且和一些批评家不一样，我不怀疑，意大利的政治环境有助于形成一种特色鲜明的气质，这种气质里包含着许多

---

① 圣贝尔纳(St. Bernard)，即明谷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法兰西人，天主教西多会修士、神秘主义者，在政治、文学、宗教等方面对西方文化有重大影响；在明谷(今德国奥布省)建立隐修院，成为五任教皇的心腹，著有《〈雅歌〉讲道集》，1953 年教皇庇护十二世追封他为“甜如蜜的教义师”。

新颖而且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分。与此同时我认为，就这段话所示的变化而言，更多的变化应该归因于印刷术的出现，只有很少的变化能够归因于当地的环境。既然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既然同时又发生了传播革命，把这些变化归因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似乎颇有些牵强附会。

在布尔克哈特讨论的人的意识的两个方面中，所谓的“客观”方面不会让我们 226
停留太久，因为上文已经讨论过“世界和历史”观点的变化。但容我顺便指出，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提问题，问题解决起来可能会更加令人满意。中世纪人的心态是否特别幼稚或轻信，我认为这样的提问不会给人以启发。相反，我宁可强调精明、聪明和有文化的成年人（属于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其他地方被描绘为“奇幻的历史和幻想的地理”(175)。不能区别天堂与亚特兰蒂斯、中国与耶路撒冷、独角兽与犀牛、虚构的和真实的心态，似乎正是前人和今人心态区别的表现，这引起我们的好奇，需要我们的解释。我们如何解释那奇怪的、带有颜色偏见的视觉？布尔克哈特那段话暗示，中世纪梦想和面纱的暧昧诗意在意大利政治环境的冲击之下化为乌有；我认为，他这样的解释不够充分。正如上文所示，如果考虑手抄书文化的条件及其在印刷术出现之后的变化方式，我们的解释就更加充分。奥特利乌斯那个时代的人围绕天堂定位互相争论，有人认为天堂在诸如叙利亚和北极之类的陌生地方。回顾了这样的争论以后，奥特利乌斯决定排除这个问题，认为这不是地理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我想所谓的天堂应该理解为幸福生活所在的地方。”(176) 当我们考虑如何揭掉那层面纱时，地图印制商的出版计划不应该被忽视。在我看来，缺乏划定了政治疆界的统一的地图，那是政治意识模糊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比此前历代的大多数历史研究指出的因素都更加重要。(177) 如同希罗多德一样，奥特利乌斯认为，地理学是“历史学的眼睛”。媒介的变迁改变了这只眼睛所能看列的史实。奥特利乌斯编制的《世界地图集》使人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过去的世界和当前的世界。这是因为意大利的数据搜集方法改变了，而不是政治环境改变了。 227

容我不在这一点上赘言，我们转向布尔克哈特对人类意识“主观”方面的探讨，我们将考虑他在那段非常著名的论“个人发展”的文字里触及的一些问题。一望而知，他对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的处理是不平衡的。布尔克哈特从抄书人时代向印刷商时代过渡时，他从摇晃的基础过渡到坚实的基础上。他那几段开篇文字描绘的变化是：“在 13 世纪末，意大利人的个性特征如何蜂拥而起。”这句话似乎难以抵挡来自许多方面的批评。(178) 不过，这段话的末尾更加率直地描绘了一种新的职业生涯，指向未来、以利用印刷机这种新力量为基础的职业生涯。

> 出版商阿雷蒂诺提供了滥用宣传的首例……一百年前波焦与其论敌互相讨伐的语气和目的都声名狼藉，但那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阿雷蒂诺将这些书信悉数公开，从中赢利；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被视为现代新闻业之父。他本人的书信和文章在相当广泛地流通之后，又由他定期予以出版。(179)

对阿雷蒂诺这种黄色小报的奠基人而言，“现代新闻业之父”的桂冠实在是太高贵了。虽然他不是追求文字生涯的第一人(180)，但他的确是利用新的宣传系统的第一人。就像“格拉布街”的后继者的追求一样，他的活动至少说明，印刷术出现之后，文人就手握新的力量供自己驱使了。(181)

考虑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时，我们需要牢记，文人可以用这些力量来为自
228 己服务。皮埃尔·梅斯纳尔(Pierre Mesnard)指出，16 世纪的文坛颇像一个新获得解放的国家，每个公民都觉得有出任首相的天职，且难以抗拒这一天职的呼唤。(182)如今的新闻记者使用的许多手法在伊拉斯谟的时代就已经有人尝试了。在那时新的宣传技巧中，很少有作家不高度重视宣传自己。吹嘘的艺术、广告词的撰写和其他广为人知的推销术都被早期的印刷商用上了。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他们用咄咄逼人的手法宣传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使之得到读者的认可。(183)

一般的说，印刷机的新力量似乎总是和承认个人成就的高涨意识密切相关；如果在探讨“主观”意识时不提个人的成就，人们就会感到不安。(184)先师和布道者的证词被引用来说明，人们对个人私生活的好奇心本来就有令人尊敬的先例，人们喜欢世俗的名气和荣光，喜欢贪财、色情或虚荣。这样的心理使印刷商可以用伟人、圣徒和明君的故事为榜样，可以用寻常普通人的传记和自传来激励人去追求各种各样的职业。(185)印刷业鼓励出版商宣传自己的作者，鼓励作者宣传自己——这样的现象没有悠久的历史，需要用历史来验证。手抄书文化不能维持
229 发明的专利或文学创作的著作权，而是抗拒知识产权的观念。(186)它不长于保存个人特性的痕迹，不有利于公开私密的思想，不善于利用静悄悄宣传的任何形式。相反，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印刷术在保存和宣传方面的长处造就了人们的自我意识。

手抄书文化里亦有披露私密思想的先例，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s*)、阿伯拉尔①的《灾难》(*Calamities*)、彼特拉克的《我的秘密》(*Secret*)等就是这样的著作。尽管如此，作者开始为一群静默和独处的读者写作时，将私密思想公开的悖论才被人充分意识到。(187)古典修辞的传统本来就容许预期的差别：在公开

---

① 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法兰西逻辑学家、神学家、经院哲学家，用古希腊逻辑原理阐释中世纪天主教义，因而被控为异端，著有《神学》、《伦理学》(亦称为《自我认识》)、《灾难》等。

场合对一大群人讲话时，需要强大的肺活量和夸张的手势；法庭上申辩需要注意细节，声音要柔和，说话要谨慎。[188]但先例里不存在这样的语境：对不是聚集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地的人讲话，这些人是独处的个体，兴趣各异，更乐意接受亲近的交流而不是泛泛的修辞效果。也许应对这种新语境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些随笔，率先使用这种文体的是蒙田。

蒙田与许多未知读者建立亲密关系的特殊天才，历来有论者予以评说。同时，他还具有自我崇拜的特殊心态。[189]不过，传统修辞和随笔这两种现象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探讨的可能性比较大，与印刷术带来的影响放在一起探讨的可能性比较小。[190]然而，如果我们更注意这两种现象与印刷术的关系，我们对其与个人主义关系的困惑就会减少。正如上一章所言，反复接触相同的字钉使人对个性差异的感觉更加敏锐。[191]蒙田充分利用了这一感觉。他描绘的生存状况是特异的、轻快的、关注生活琐事的状况，他笔下的生活与其他人笔下僵化的规范和形式构成强烈的反差，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他描绘的是理想的典型人物的行为，他们的身份由其在群体里的归属来界定。在他的笔下，王公、廷臣、谋士、商人、教士、农夫各色人等的语言使读者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他们不仅在自己扮演的角色里有自己的不足，而且还是独处的、与众不同的个体，各有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没有社会补偿功能或表率功能，因而并没有什么文化价值。蒙田以极其卑谦的语气描绘那独一无二的自我，用爱心去描绘自己的每一个特质，他把这个私密的自我从深藏不露的地方请出来。他率先有意识地展示这个自我，让公众细察。他利用新近发现的怀疑传统[192]，赋予特色鲜明的个人令人尊敬的古典血脉；他以艺术家登峰造极的文艺手法给他笔下的人物涂抹上了一层永恒的亮色。他还为与未知读者的亲密接触奠定了新的基础，这些读者可能会拉开距离去钦慕值得尊敬的人物；读到不那么有价值的自我时，他们感觉更加自在。尤为重要的是，他让人觉得心安理得：独处的读者体验到的独特性也是作者的体验，是大家可以共享的。蒙田声称，他表现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具有“普世”吸引力；如果将其与新出现的静默的交流手段联系起来考虑，而不是把它看作围绕文艺复兴的争论里的一块广为人知的硬骨头，那就更容易理解了。

230

标准化产生了高涨的个性意识，个性意识对视觉艺术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对文学的影响。当一位艺术家比如拉斐尔的一件作品被印刷商比如马坎托尼奥(Marcantonio)批量复制时，一种新的价值就会被赋予“原”作即艺术家亲手绘制的作品。[193]你难免会问：当手抄书越来越少时，艺术家的创作和签名是否会被人更加珍视？[194]无论如何，由于印刷机的威力，艺术家、赞助人和公众的关系改变了，但如何改变的却尚待探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231

杰出的艺术家如何从默默无闻的匠师的队伍中冒出来？对这种现象予以解释

时，印刷术的保存作用更值得注意。这并不是要否认，早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个别的艺术家已经被当作杰出的公民（尤其在佛罗伦萨）广受赞誉了。[195] 也不是对一些手写书里明显的佐证置若罔闻，几位佛罗伦萨艺术家用自传讲述自己的生平和艺术，他们的自尊心和自我意识高涨。[196] 我只是说，手抄书文化的环境不断瓦解人物崇拜，而印刷术却大大强化了人物崇拜。书写材料的供给不丰裕时，即使最杰出的大师的生平也不会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述不可能出现在用印刷术复制之前，它们也不可能长期完好地得到保存。当 15 世纪的手稿交付机器印刷时，稍纵即逝的素材就和正规的出版物同时保存下来了。论文、讲演、私人通信、趣闻轶事和绘画都被维萨里搜集起来用作他写《艺术家列传》的素材。

232 维萨里的书常常被誉为艺术史的第一部专著。他的文化周期理论常常被誉为重要的建树。[197] 但他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思想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些思想显示，传记艺术如何受益于印刷术带来的变化。该书的多卷本第二版收录的艺术家人数众多，本身就值得注意，其中的人物均从事类似的艺术活动。250 位艺术家，作品与生平匹配，成为空前巨著。除了容量扩大之外，研究内容更有深度。该书是第一部建立在系统调研基础上的艺术史专著，其研究方法包括访谈、通信和田野调查，研究内容包括历代欧洲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作品。[198]《艺术家列传》还反映了印刷术为艺术品拓宽影响所提供的新机会，以至一版接一版地重印。1568 年的第二版在 1550 年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篇幅。它突破了佛罗伦萨公民对自己城邦忠诚的局限，介绍了 75 位非佛罗伦萨公民的艺术家。木刻肖像是显著的革新之一，每个人的生平介绍都配上一幅肖像。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做了种种努力用肖像配生平简介，15 世纪前的艺术家的肖像却只能是纯粹靠猜想绘成的。[199]

15 世纪以前，即使画家本人的自画像也没有丝毫的个性。手写文化的条件对自恋情绪起到制衡的作用。一位艺术家可能会决定把自己的人像放进壁画、刻在门上；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他在后世人的眼里就失去了身份，成了一位普通的工匠，和没有留下形象的工匠无异。即使由于偶然的因素有幸留下画像的作者也会

233 遭遇同样的命运。在不断抄写的过程中，一位作者的脸被误植到另一位作者的文本中，五官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被抹掉。[200] 千百年之后，伏案工作的、穿袍的、手握书本的作者只不过是一般作者的没有个性的象征而已。正如前文有一章所示，当印刷术取代手写文化时，这些无个性的形象并未消失。相反，它们进一步被标准化，被木刻画和铜版画大量复制。[201] 正如同一城市轮廓被用来作为不同地方的标签一样，同一张人像也用来表示从事同一职业的不同的个人。然而与此同时，追名逐利的驱动力高速运转；自画像获得了新的功能，对个性的赞赏与标准化同步发展，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版商和书商用新的方式促销，希望多卖他们的作品。书名页

和销售书目录成为刻意的促销手段，紧接着用上的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头像。(202) 特色鲜明的外貌永久地和特定人物的名字连在一起了。伊拉斯谟、路德和罗耀拉[①]等16世纪人的肖像被频繁复制，出现在无数的历史书中，直到现在还很容易被认出来。

历史人物被赋予清晰的形象后，同时又获得更加独特的人格。和以前的杰作比较起来，文艺复兴时期杰作的独特个性大概和新的保存技术有关，通过复制面孔、名字、出生地、生平，保存作家和艺术家的个性就有了新的可能性。艺术史家们的研究证明，中世纪插图画家或雕刻家的心灵手巧并不逊色。但那些大师（通常只能靠名字的首字母、他们写的书、作的祭坛画和拱圈为人所知）的个性并不比木工或玻璃工出名。即使那些史上留名的大师也缺乏个性。他们能留名，是因为他们 234
不自谦，他们认为谦虚属于“卑微”的工匠。他们呕心沥血把自己的名字雕刻在永久性材料上，但他们也缺乏个性，因为他们满怀豪情镌刻下来的名字旁边没有其他的说明文字。

在11世纪和12世纪之交……雕塑家韦利杰尔摩[②]在摩德纳[③]修道院的立面上镶嵌了一块铭牌，留下了这样的铭文：

> 在雕塑家中，你多伟大、荣耀，且名副其实；
> 如今，韦利杰尔摩，你的雕塑光芒万丈。

在费拉拉[④]……和维罗纳[⑤]修道院的入口，韦利杰尔摩的一位学生在12世纪30年代创作时也宣示自己万世流芳，其铭文与老师的铭文类似：

> 五湖四海的参观者将世世代代颂扬
> 高超的艺术家尼科罗(Nicolo)和他的作品。

……从这个时期开始，这一类铭文经常在意大利北部露面，同时也在法国出现。(203)

显然，韦利杰尔摩和尼科罗这样的雕塑家意识到自己的个体身份，但他们无力将自己个性化的感觉传播到自己墓地以后的时空里去。

有人说，每一本手写书“都是个人的成就”。实际上，许多手写书都是出租给若

---

① 罗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西班牙教士，原为军人，1534年创立天主教耶稣会，制定会规，强调绝对服从会长，无条件听命于教皇，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一。

② 韦利杰尔摩(Wiligelmo，约1099—1120)，意大利雕塑家。

③ 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

④ 费拉拉(Ferrara)，意大利北部城市。

⑤ 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

干人誊写完成的。[204]然而，即使一个人单枪匹马从头至尾抄完一本书，且签上了自己的全名，假设中的“个人成就”也不会留下丝毫的个性踪影。[205]我们必须要等到没有个性的铅字取代有个性的书写，等到标准化的版权页取代个人的签名时，富有个性的独特经验才能为后世保存下来，独特的人格才能从群体或集体性的铅字里分离出来，这似乎有一点荒谬，但的确是事实。

于是我们知道，建筑师与音乐人在中世纪艺术里的排名相当高。有些建筑师
235 和歌唱家想必在本地已经小有名气，然而他们的名气如今几乎已无迹可寻。如今要给他们画像时，比如布尔克哈特，我们就只能根据他们的服装或与同类职业群体成员共享的生活方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至少足以引起中世纪研究专家气愤的证据表明，中世纪人不乏精神个性的感觉。不过，尽管专家可以追溯中世纪人的精神生活，但史学家们想要让笔下的人物成为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时，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细节还是缺乏的。[206]千百年来，布道坛一直是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公共讲演系统，然而我们对中世纪布道者的个人风格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布道的语言罩上了一层面纱，记录人写下他们的讲演时，用的是拉丁文传统的提纲。[207]我们读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或盖勒·冯·凯瑟斯伯格(Geiler von Keysersberg)的布道辞时的感觉和读中世纪布道辞的感觉是多么不同啊，因为他们两人的布道辞很快就转换成了印刷品。

如果我们转向一个截然不同的职业群体，我们进行的比较会更加令人注目。想一想两位著名的意大利数学家比萨的莱奥纳尔多(Leonardo of Pisa，亦名菲伯纳奇)和基罗拉摩·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亦名杰洛姆·卡当)。13世纪的传记家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他们相貌或私人生活的任何信息。为卡尔达诺立传的人素材丰富，可能会使他无从下手：痣疣的位置、胡须的样式、鞋子的尺码、性生活等应有尽有，供他使用。[208]诚然，卡尔达诺死后问世的自传《我的一生》(*De Vita Propria*)[209]很异常，足以引起人们对传记的例外和规则产生疑问。正如后来的一些作家围绕莎士比亚的争论经久不息一样，过去五百年里的名人生平并非全都像卡尔达诺的生平那样详尽无遗。但对菲伯纳奇的生平不会有什么疑问。大多数中世纪
236 数学家生平的描绘更不详细。但无论真相是否就是布尔克哈特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中世纪人的自我意识“只能靠一些一般的范畴”，史学家描绘他们时难免会误入虚构的境地，难免会背弃历史女神克利俄而转向艺术女神缪斯。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或古艺术史家。古典理想必须要以某种抽象的方式体现在理性化的人物身上。掷铁饼者和书写者、老人和年轻人、少年与女监护人；记录日常生活的零碎材料搜集起来；抒情诗、讥讽的闲言、讲演和伪经得到整理。一代又一代的古典考古学家和社会史家呕心沥血地构建古人的形

象。然而，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①]或几何学家欧几里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还是只能把他们构想为大理石雕像、贝特曼档案馆里色彩丰富的版画甚至残缺不全的就业表格里的名字而已。偶尔，我们能够靠第二手资料窥视到他们个人生活之一二，比如索福克勒斯的悍妇、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得到灵感，但这些管窥蠡测的片断也僵化为原型似的象征了。建筑师、医师、天文学家和廷臣的伊姆霍特普[②]被尊为神。哈德良[③]或许和杰斐逊一样多才多艺，但他没能像杰斐逊那样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利昂·巴蒂斯达·阿尔贝蒂[④]是第一位表现维特鲁威才俊理想的人物，他具有运动、讲演、学术和艺术的才能。但除了留下审美论著和他的建筑设计文字以外，后世还知道他茶余饭后吹嘘自己曾经是神童，他恐怕是第一个留下这类文字的人。

于是就出现了布尔克哈特经常被引用的赞词："在所有受赞扬的人中，利昂·巴蒂斯达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赞扬的第一人…… 他那严肃而诙谐的谈吐被认为是值得搜集的名言警句……"(210) 这句话还需要给予其他的思考。这位建筑师"严肃而诙谐的谈吐"不仅可以搜集，而且可以保存并传诸后世。部分原因是，他可以被放进多种心绪与活动中展示，作为矫健的青年和有学问的圣贤，穿透各个年龄层的人，在一人身上将多种原型和集体的社会角色人格化，所以他在布尔克哈特的笔端成了"完人"。"敏锐而老道的目光能够逐步追溯 15 世纪'完人'数量增加的趋势。"(211) 这一趋势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从誊写人和插图人的时代过渡到印刷人和镌刻人的时代时，就比较容易看见"全面的"(in the round)人了。然而，用复制的办法来保存记录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显著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从古到今的过程中，虽然详细的记述越来越多，但"完人"并不见得增多。相反，多才多艺的人似乎还在减少。集体传记开始出现，它们追踪的是各种艺术和科学独特的谱系。(212)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新的劳动分工和功能的特化显然是与日俱增了。

"我们普遍认为以多才多艺和全面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实际上是艺术与科学、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壁垒开始构筑的时代。"(213) 在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个世纪里，这些障壁还比较低矮，跨越起来还比较轻松；这些障壁越来越高，早期的多才多艺者

---

①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 460—前 377)，古希腊医师，西方人称誉的医药之父，现存《希波克拉底文集》，但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

② 伊姆霍特普(Imhotep，活跃于前 27 世纪)，古埃及圣贤、占星家、建筑学家，埃及第三王朝第二代法老约塞尔的宰相，被埃及人和希腊人尊为医神。

③ 哈德良(Hadrian，76—138)，罗马皇帝，巡幸各省，编纂法典，122 年巡幸不列颠时下令建造哈德良长城。

④ 利昂·巴蒂斯达·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意大利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建筑师，还从事制图学和密码学研究，著有《论绘画》、《建筑学十书》等。

就显得越来越非凡超群。“在中世纪，区隔事物使之井井有条却又使之分割的墙壁”[214]正在消失，新墙刚开始奠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艺复兴人似乎把两个世界的好处都享尽了。

一方面，文艺复兴人从世世代代从事艺术、技艺和运动的人积累的经验中获益匪浅；另一方面，他们又获得掌握新技术资料的机会，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更加显得多才多艺。他们是最后一代能够同时轻松吹奏笛子和耍弄刀剑的人，是能够读懂乐谱或计算炮弹弹道的第一代人。宫廷文学中描绘的“全面发展的人”“能够作战、舞蹈、游泳、狩猎、求爱与歌唱。他们将有条不紊的研究引进各个领域。战争变成战略，商务成为簿记，治国方略成为外交，艺术成为透视”[215]。一方面，旧的艺术得到完善；另一方面，新的职业创造出来了。

布尔克哈特说，列奥纳多·达·芬奇“与阿尔贝托相比好比是起步人与终极
238 者、初出茅庐的新手与功成名就的大师的关系”。和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一道，列奥纳多至少把自从乔托以来的意大利艺术传统发挥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他在同时代人里享有盛名，一方面完善了旧的艺术，另一方面又被后世认为创造了新的科学。这位《最后的晚餐》的画家被公认为艺术大师；这位飞行器设计者被誉为神童。实际上，列奥纳多大部分的天才设计和精确表达的观察结果并没有出版。后人的讨论表明，虽然他吸收了当时许多有用的技术资料，但他本人却没有对当时的技术资料积累做出直接的贡献。[216]几百年后，在其著名的笔记刊印之后，在天才崇拜彻底地浪漫化和现代化之后，他才被赋予先驱的美名，人们才意识到，他预见到20世纪高度发达的专门化领域比如航空学或胚胎学。

虽然浪漫的传记作者往往过分夸大这一主题（没有为后来的专业化和专门化留余地），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把文艺复兴人和新型的多才多艺联系在一起。利用印刷术长处的博学鸿儒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各门学科作出了贡献。学会读书写字的工匠成为更加全面的人，有了更多向上爬的可能性，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职业获得了新的驱力，学者—印刷商、解剖学家—印刷商、天文学家—印刷商这一类复合词语正好说明了这种新的气象。我和布尔克哈特的分歧在于：他说意大利出现了“多面手”，坚持认为他们“只属于意大利”；他不能解释为何产生了这样的“多面手”，只好说他们产生于一种“冲动”。我认为，对那些和“个人的完善”同时产生的变化的最好的解释，不是靠诉诸自由意志学说，而是靠把在行动中学习和在读书中学习结合起来
239 考虑。

同理，我同意潘诺夫斯基的意见，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何发明家、军事工程师和土木工程师尤其艺术家能够获得新的威望。[217]但我觉得他的讨论使我们远离正在探讨的领域，走向了玄想“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形而上关系。当我们检视印刷机

引起的具体的变革时，它可能会绕开这类问题，进而审视更实在的文体。比如，发明家威望的增长可能和印刷术产生的新的知识产权形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宪法》第一条里，“作者”和“发明人”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保证了两者在一定时间内拥有“自己的著作和发现”的权利，以便推动“科学和应用艺术的进步”。率先赋予印刷商权利，率先制定专利法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十年内完成的：1469 年至 1474 年威尼斯制定了版权法和专利法。[218] 诸如此类的法律把无名的工匠变成了有名的发明人，把个人的创新能力从行会隐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名利的光辉奖励创新，并赋予人发财的机会。

> 搞计算的人……没有保护自己的行会。他们有文化却不是学者，不得不自谋出路，常常游走奔波去寻找学生施教，所以就有必要利用广告宣传自己的能力。但除了发明新的算法工具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于是，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历届的书市就塞满了丰富多样的测高计、婴儿身长计、万能测角仪、电感计、万能计算器等计算工具。雅克·贝松[①]就开始了这样的职业生涯，成为巡回授徒的数学老师，他的著作之一讲解“万能计算器”(cosmolabe)，这是使一切数学仪器走向末日的万能工具，其复杂性难以想象……这些著作的成功使他产生宣传自己机器的念头。[219]

书市制度要建立起来，小大单张广告要印制好，书市上才会有大量的图书展销，广告才会有收益。搞计算的人和造仪器的人出现了，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这一现象常常和近代早期的君主、贵族和商人对更精确的计算需求有关。数学仪器、地球仪和机器图解的出版有赖于一种新的宣传设施的出现，这一新设施使人可以从解释而不是堵塞各种职业技巧中获利。 240

于是，发明人新的威望就和他新的角色挂上钩了，这个新角色就是他署名作者的角色；之所以担当起这个角色，部分原因是推广产品把生意送上门的实际需要。在印刷术的第一个世纪里，许多技术手册印行，这些书可以被视为促销手段。它们使机械技艺获得尊严和价值，同时吸引读者注意本地商店里提供的特别服务和产品。但并非所有的新型技师都像算师那样在巡回中推销。有的时候，图书上印有技师的地址，以方便读者就近请教。例子之一是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的英译本《十进制艺术》(*The Art of Tens or Decimall Arithmeticke*)(伦敦，1619)。书里的广告请读者到出版商格利芬(Edward Griffin)先生的印刷所去了解作者亨利·顿特(Henry Lyte)的地址，其目的是希望有人雇请

---

① 雅克·贝松(Jacques Besson，1540—1576)，法国工程师，革新机床，对机床工业和仪器制造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著有《仪器一览》。

作者担任家庭教师。至于想要订制十进制的非常标准的直尺的读者，他们还可以请教“汤姆逊先生，他家住霍希尔巷，精于制造几何仪器”[220]。这真是一举三得，干得漂亮：出版商、作者和仪器制造人都从中受益。另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仪器制作人罗伯特·诺曼(Robert Norman)论天然磁石的小书《关于磁针磁性衰减后新的增磁力方法》(伦敦，1581)。该书的序文围绕作者害怕宣传、害怕泄密大做文章。然而，为了“为主增光”和帮助同胞，他不再犹豫，决定留下自己的住
241 址：拉特克里夫街。[221]

鉴于以上例子以及下文里的其他例子，一些权威学者断言的自我服务的拉丁文学精英与合作性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匠人之间的强烈反差，似乎是难以证明的。证据显示，这两个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其驱力都兼有自利和利他的两种动机。况且，技术文献的出版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开发。稍后对阿格里科拉的《金属学》(*De Re Metallica*)一书的讨论将会说明，技术的出版发行需要学者和教士的支持。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维特鲁威的通俗语版本也需要阅读拉丁文的精英的合作。[222]许多古代技术文本的翻译反过来提高了建筑师、测量师、制图师和工程师的地位，使他们披上古典血统的光彩。分享古人久负盛名的智慧有助于提高各种实际工作者的地位。

用铅字宣传和阐述发明能够使人获利，一旦有了这种可能，雄心勃勃、心灵手巧的工匠就获得了新的刺激去驾驭文字，并为日益增多的文献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工匠和机械工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于是精英对他们的看法就更加好了。缪斯女神最后也受到工匠型作者纯朴通俗语风格的影响。制陶师帕利西、理发师兼外科医师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se Paré)和其他许多16世纪的行会人从默默无闻到一举成名，他们是早期书名页和机印书的受益者——这是他们成名的主要因素。

> 和有学问的作者一样，他们用自豪的作者肖像向不知名的购书人推销自己，这和中世纪手稿里卑微的赞助人形象截然不同。于是，在他1574年出版的商务计算的小书里，以前地位低下的里昂计算师迈尔斯·诺里(Miles de Norry)就以衣冠楚楚的形象和希腊算法向世人展示了……行医的药剂师也出书……外科医师写自己的业务技术……水手出版新世界游记。
>
> 女性作家也涌现出来……人数令人注目……制绳匠的女儿路易丝·拉贝(Louise Labé)，……印刷商的女儿、内科医师的妻子尼科尔·埃蒂安纳(Nicole Estienne)，……助产士路易丝·布尔热瓦(Louise Bourgcois)……写自己当助产士的经验，相信自己是写这种书的第一人。她声称，自己广泛的经验证明内科医师和外科大夫也犯错误，连祖师爷盖仑也……[223]

诸如此类的作者常常不太可能向大学教授那样敬重盖仑那样的大师。他们大 242
多数人没有正规的学历，没有掌握拉丁文或修辞律；他们也没有学会用古代哲人的图式去看世界。他们用朴实而率真的语言写下长期从艺过程中亲眼所见、亲手所做的经验体会。就这样，都市匠人进入了文坛，赢得了外域王公贵族和通晓拉丁文的哲人听取他们倾诉的机会。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知道法国的制陶商贝尔纳·帕利西[224]；威廉·塞西尔爵士将丢勒和维特鲁威与阿尔贝蒂归为同类，把丢勒当作建筑军事堡垒的权威。[225]

布尔克哈特将“人格觉醒”与新的独立精神联系起来，认为这一觉醒与塑造自己的生活有关系，这是要独立于自己的“父母和祖先”的生活。[226]他似乎认为这一现象“仅见于意大利”。但帕利西或帕雷的生涯显然不是由意大利的发展塑造的。乌尔里希·胡腾①显示出对自学问题的关怀，他并未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对一位条顿骑士而言，对自学的关怀是很新奇的。[227]如果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你就不可能意识到，新形式的自助和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世纪中期德国发明的印刷术。许多研究成果详细描绘了这样一种景象：许多论著在 16 世纪汹涌而出，它们鼓励各种形式的自我帮助和自我提高，从家庭祈祷到唱抒情小调再到记账的小书无所不有。[228]即使匆匆浏览 16 世纪文献的人也会留意到“雪崩式”的图书，也不可能不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市上流通的各种书籍解释如何“轻松入门”（常常配有鲜明的图表），比如“如何”绘画、创作抒情小曲，如何建方尖石塔，如 243
何设计建筑、桥梁和机器。[229]正如本书稍后的讨论所示，这么多“自学”入门的小册子如何影响实际的行为和操作，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30]毋庸置疑，这种新文体为未来的作者和自学成才者提供了新的机会。

与这些雪崩式的小册子同时问世的还有大量的促销印刷品，虽然仅仅是意在促销，但它们也刺激了人们自我提高的志向。伊丽莎白时代的读者得到的保证是，只要购买托马斯·莫利的《轻松入门音乐手册》（*Plain and Easy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Music*），他们就可以在音乐书满街卖时消灭自己可耻的愚昧和无能。[231]无疑，当读者显然缺乏天生的音乐细胞，而诸如此类的吹嘘被检验无效时，自信心反而可能会受到损害。（用羞耻做文章的广告商应该与 16 世纪用罪孽做文章的赎罪券销售人和忏悔者放在一起看。）另一方面，对许多自学者而言，如果有机会掌握新技能而不必接受正规的学徒期和学校教育，这的确有助于培养新的独立感。虽然这些新的“静默的老师”[232]只不过复制了课堂和作坊里传授的功课，它们的确斩

① 乌尔里希·胡腾（Ulrich von Hutton，1488—1523），德国骑士、人文主义者，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作为骑士，他留恋中世纪；作为改革家，他又向前看。他以文学形式讽刺诸侯、教廷、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是《蒙昧者书简》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断了迫使学生和学徒附属于老师的纽带。

自学机会既影响工匠又影响精英，我们考虑各领域的思想革新时，这一点更值得强调。波尔加写道：纪尧姆·比代是“那种罕见的奇才，他们主要靠自学，外界的帮助极少。手边有意大利和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以后，比代达到并超越了这
244 些人文主义者的高度”(233)。稍后，我们可以在年轻的艾萨克·牛顿身上看见这样的活动。他利用本地的书市和图书馆，搜罗了古代和当代的数学书之后，他在他身处的“神奇的一年里”达到并超越了笛卡尔的高度。

> 牛顿自学数学，他的知识来自于他购买或借阅的书籍，几乎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年轻的牛顿不懂数学，只有一点算术知识；他读不懂占星术著作，因为他缺乏代数基础。他居然成了高等数学的创始人，实在是令人惊叹……在一个小笔记本里，牛顿着手编纂一本希伯来—英语词典的条目，他列举了……毕达哥拉斯公理……不久，他就深入研究几何复合运算……这是在1664年。不久，他又深入研究数论和代数而且……他掌握了“奥特雷德(William Oughtred)的算术符号”和“笛卡尔的代数符号”(234)。

此前，接受各种传统时，人们不得不依靠师徒口耳相传的个人交流；当你不必先匍匐在老师的脚下然后才能够站立时，原来那种口耳传授的方式大概就受到修正了。年轻人可以靠读书继承知识，且自学的效率还高于聆听长者教诲的效率，这是被人忽视然而意义重大的学习刺激，这是激励他们了解古今人之争的学习方式。同理(正如本书稍后所言)，一旦非神职人员有机会自己阅读《圣经》时，神圣传统的传播就受到影响，教士的权威就被削弱了。(235)

吉斯·托马斯有一段文字赞扬罗拉德教徒“坚韧的自学精神”，认为其“无人帮助而保持信仰的终极源头神秘莫测”(236)。接着他指出，虽然都市里的“木匠、铁匠、修鞋匠尤其是纺织工人等人”支持罗拉德派①的事业常常被用来解释那“坚韧的自学精神”，但未必充分；都市里各行业的人未必比乡下人与新精神的关系更加协调。假定一切“终极源头”往往包裹在神秘莫测的氛围里，假定罗拉德信仰的许多谜团
245 仍然解不开，“自学精神”倒是越来越显著——无论如何在16世纪和17世纪是很显著的。然而，如果我们把和图书贸易相关的许多职业考虑进去，这个“终极源头”的神秘色彩就会越来越淡化了。

实际上，如果印刷术的影响受到更多的注意，托马斯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比如，有这样一种现象使他困惑：文艺复兴没有与“技术革命同时发生：面对环境危险时，16世纪的人和中世纪的前辈一样脆

---

① 罗拉德派(Lollards)，14至15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中的一派，反天主教，约翰·韦克利夫的信徒。

弱。但许多人在没有设计出一种神奇的新机构来取代教会之前就把教会扔掉了”[237]。然而事实上，文艺复兴的确和一种传播革命的初期同时发生了，这一场革命为宣传商务秘密提供了新的刺激，它改变了巫术的性质，同时也改变了宗教体验的性质。[238]托马斯看到，早期专利申请中反映出“对人的创新潜力的激动人心的信任”[239]；如果你考虑印刷术赋予发明者和仪器制作人新的刺激和机会，托马斯这个困惑是不会那么令人困惑的。在预防和治疗没有取代任何进展前，“实用的自助精神”就在医学领域里反映出来了[240]；同理，倘若他给予“静默的老师”更多的注意，这种现象就不会显得那么异常了。[241]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即使在医师治死的人比治愈的人还要多的情况下，为何印刷术能够助长新的医疗自助。这个例子就是17世纪的医疗改革家泰奥福雷斯特·勒诺多①，他又被描绘为“法国新闻业之父”：

> 1642年，他出版了一本“《自疗手册》(*malades absens*)，其中的方剂明白易懂，不仅乡间药剂师或外科医师能够据以治病，不仅那些不懂病症的人能够据以自助，而且连那些纯朴的农村妇女和儿童也可以用其中的处方为自己治病。只要他们读书识字，能够向我们说明病况、病症和环境，我们就能够有条不紊地为他们治病，而且能够把他们治好，仿佛他们就在我们的诊所求医。”这本蓝封皮的60页小册子定价5个苏②，配有一个复杂的索引，版式与定价说明，其意向是嘉惠更多的读者。书中有人体图解，不在诊所的病人可以判断不舒服的部位；大量的病症供病人挑选适用于自己的部分。填完相应表格之后，病人将其邮寄到勒诺多的诊所，让医生诊断。这种远程诊断使人在确认和分辨病症时要格外准确……由于勒诺多对化学医疗的热情，他的诊所吸引了许多淋病患者……那些患“羞耻”病的人……能够不必露面就得到诊所的治疗。[242]

诚然，泰奥福雷斯特·勒诺多在其同胞中是一个异常优秀的人物，而且他开拓多种多样的试验时，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然而，即使你的注意力只限于较早的时期，限定在更加“平常、普通、平凡”的印刷品上，你也很难不注意到，自助自立受到多种多样的鼓励。16世纪的欧洲“充斥着小型、便利的手册”，传统的课题“简化为简单的规则，让任何儿童、任何人都能够自学”[243]，凡是识字的人都能够学。书市上塞满了启蒙书和入门书，所以自学读书写字是可能的，于

---

① 泰奥福雷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1586—1653)，法国医生、法国新闻业之父，1631年创办《新闻报》，曾任路易十三的御医和路易十四的史官。

② 苏(sou)，旧时法国的一种硬币，币值很小。

是自我选择的成分甚至进入了识字的阶段。像印刷商那样的自学成才者是一种新型的人才，不同于父辈和祖先的人才。

作为北方的画家和建筑结构制图家，阿尔布雷特·丢勒追求的生涯是人们比较自然地指望一位纽伦堡金匠的儿子应该追求的生涯。然而，他又撰写了许多论人体比例、几何学和修建要塞的著作，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模式。在后一种外观下，
247 他引起了外国贵族的注意。他的同胞还把他放进纽伦堡一批博学鸿儒的行列，这个圈子包括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244]他那些被翻译成许多文字的自序如今被人们挑选出来说明，他预见到了“培根式”的科学革命，这一革命是为人类谋福利的有组织的合作，以不断积累的成果揭示自然秘密的努力。[245]这位匠师—作家、自学成才者和镌刻画家、纽伦堡的大师常用“A. D.”署名，他偏离了中世纪晚期行会人保密传统的角色。

丢勒的世界观与早些时候的纽伦堡行会人的世界观截然不同，许多权威人士认识到这样的差别，并常常把这一区别归之于意大利的影响，或者含糊地将其称为“文艺复兴精神”。最近有一篇文章试图更加具体地评估塑造这位独特“新人”的各种因素。作者探讨了公民的忠诚、阶级结构、军事技术、农民造反、伊拉斯谟的影响、路德的新教和其他同时代的发展，借以描绘塑造丢勒生活与工作的社会力量。[246]马戈林的这篇文章对早期印刷商的职业文化不置一词；我则认为，这种文化是15世纪晚期纽伦堡最重要的新成分，也是丢勒生活工作里最重要的新成分，这一成分在他的生活工作中扮演了绝对重要的角色。[247]毕竟，他不仅是一位金匠的儿子，而且成了伟大的版画家。他还是15世纪图书贸易的最伟大的企业家安东·柯贝尔格(Anton Koberger)的教子。丢勒的妻子因为丈夫交友的圈子而感到不安，反对他离开画室去与韦利波尔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之类的贵族人文主义者交往。她持有的观点是传统的观点。她认为，靠勤劳的双手谋生的人不应该浪费时间去议论图书和古董，丢勒不属于绅士和学者的圈子。[248]但从童年时代起，丢勒就经常出入印刷所，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也因此而与妻子的看法不同。在这些印刷所里，学者的确和工匠混杂在一起。而且，多才多艺的有成
248 就的印刷商兼有学者和工匠的两种品质。

“文艺复兴弥合了分隔学者与思想家和实干家的鸿沟。”[249]当然，“文艺复兴”太抽象，不可能完成重要的使命。像其他探讨这个问题的学者一样，潘诺夫斯基这句话的意思实际是：这条鸿沟在文艺复兴期间被填平了；和其他人一样，他心里想到的是某些因素。只不过有些人强调某些社会经济因素，而他强调的则是15世纪的艺术家表现出来的多才多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障壁被拆除了，首先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艺术家(常常被齐尔塞尔和斯特朗忽视)。”[250]实际上，许多不同的群体分别在不同的时期谋求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比如医学、音乐和

建筑学里就有这样的群体。但在我看来，这种永恒的结合要等到印刷术出现以后才会到来。当它出现时，职业裂变随即产生，这样的变革对解剖学的影响不会亚于对艺术的影响。(251)

在寻求解释理论与实践、学人与匠人的互动时，很少有权威学者提及印刷术的出现。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匠人更容易获取图书，使学者更容易获取实用手册；印刷术促使艺术家和工程师发表理论著作，给翻译技术文本的学人以酬劳。潘诺夫斯基说，印刷术发明前的情况是：

> 体力劳动方法和脑力劳动方法缺乏互动……妨碍了中世纪工程师和匠人叹为观止的发明的传播，使博物学家难以看到这些发明……反过来，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同样令人惊叹的推导演绎也受到妨碍，难以用实验来检验了。(252)

但印刷机正是博物学家不可能不注意的发明。印刷机来自于伍尔坎①的作 249
坊，势利者瞧不起，但它既服务于语法学家和哲学家，又服务于匠师和工程师。印刷术也和智慧女神密涅瓦有关系，文人和教士都尊之为“神圣的艺术”(253)。

巴克斯②和刻瑞斯③教人如何酿酒、如何做面包，被尊为神；谷登堡的发明档次更高、神性等级也更高，借助他提供的铅字，一切所言所思都可以写下来，可以翻译、保存并传诸后世了。(254)

新的图书生产方式不仅使工匠注意哲学著作，而且使哲学家注意工匠的工作。它还使爱书人和机械工聚在一起，在同一作坊里合作。在学者—印刷商的身上，它造就了一种“新人”；这样的“新人”能够熟练地开机器，精于推销印刷品，同时又能够编辑图书、建立学会、推销艺术家和作者、推进新的数据采集形式、发展各种深奥的学科。仅以活动的多样性而言，16 世纪比较有名的印刷所发起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就令人叹为观止。希腊和拉丁古籍、法律书、药物书、《圣经》译本、解剖图谱、算术书、插图漂亮的诗集——诸如此类的一切书可能会来自于同一家印刷所，说明各种人的邂逅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我们用怀疑的精神去对待当时人对著名印刷商及其产品的颂扬，正如今天人们对作者和书商过分夸大的宣传文字要持怀疑态度一样。然而，即使用夸张的词语来描绘 16 世纪著名印刷商促成的交流人数和种类的盛况，那也不是用错地方的夸大其词；威尼斯、里昂、巴塞尔、巴黎、法兰克福、安特卫普和其他的 16 世纪图书生产和贸易的主要中心都促进了那时的思想活动与实践活动。(255) 250

① 伍尔坎(Vulcan)，罗马神话中的火与锻冶之神。

② 巴克斯(Bacchus)，罗马神话里的酒神，相对于希腊神话里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

③ 刻瑞斯(Ceres)，罗马神话里的谷物女神，相对于希腊神话里的得墨忒耳女神 (Demeter)。

潘诺夫斯基讨论“群体和友谊的形成有助于各种人的思想交流……”，在他的讨论中，学者—印刷商的人物形象并不显得高大，这的确令人吃惊。[256] 在这种“新人”的手里，编辑、翻译、校勘工作离开了修道院的抄书房、学苑、大学课堂，脱离了贵族高墙深院的别墅。相反的局面出现了：文稿在熙熙攘攘的商业设施里处理，穿长袍的学者和商人与穿工装的匠人和机械工并肩工作。印刷商的活动将各种形式的劳作结合在一起，此前这些劳作是分割的，而且此后它们还得再次分家，只是后来分割的方式不同而已。他们的产品使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新的互动，抽象的脑力劳动和感知经验、系统逻辑和仔细观察的互动也出现了。

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结合的必要早已得到古人的承认，这样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医学文献和建筑文献。[257] 中世纪有一些开明的外科大夫比如居伊·肖里亚克(Gui de Chauliac)，他坚持认为，这门技艺里的行医人需要书本知识。但手抄书文化的情况抗拒这样的改革家。[258] 人们支持维持自古以来“手和脑”的纷争，时势使然。[259] 彼特拉克及其后继者比如萨卢塔蒂著名的咒骂使这种情况长期维持下去，他把行医的人叫做机械工：

> 机械工，你要是有能耐，你就继续干吧。你要是能够治病，你就治吧。你要是不能治病，你就杀人吧；你因为杀人而得到报酬……但你怎么斗胆把修辞放进低于医学的场所？你怎么能够把贵妇人的身段放在仆人之下、把文科放在医学之下？
>
> 照顾人的身体是你的责任。至于脑子需要的关爱和教育，你就让给真正的哲学家和演说家吧。[260]

于是，自由人从事的“自由”艺术和努力从事的“机械”劳动的分割就被早期人文主义者继承下来，用于抨击行医的人。

当然，15 世纪艺术家面对的情况不同于使彼特拉克愤怒的医学院那种情况。诚然，有行会组织把画家和药剂师联系起来；毕竟，这两种人都使用碾钵和碾槌。同理，石雕工和外科大夫都有技术上的共同关注。然而，在与法学院和医学院的争吵中，人文主义者并不认为艺术家是敌人，而是将其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且，由于有非常好的市立学校，建筑业、绘画或雕塑界的年轻学徒的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北方的同行[261]，所以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艺术家就熟悉相关的技术资料，不仅熟悉如何制作油彩的记述，而且熟悉几何学和光学。有一些大师比如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①、洛伦佐·吉贝尔蒂②和利昂·巴蒂斯达·阿尔贝蒂也

---

① 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20—1492)，意大利画家，注重师法自然，运用透视和比例，作有壁画组画《圣十字架故事》、《耶稣复活》等。

② 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佛罗伦萨雕刻家，早年学金饰，代表作有取材于《圣经》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青铜大门上的浮雕组图。

著书立说。但这些著作旨在恭维某一位王公或赞助人，而不是为未来的艺术家或一般的读者服务。(262)实际上，用通俗语论透视和比例的书并不见于艺术家的工作室，即使15世纪的佛罗伦萨也不见重要的论著，正如大多数技术文本在印刷术出现之前都缺乏视觉辅助手段一样。印刷术出现之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鸿沟才可能被填平，从事新技术训练的制度才能够创造出来。

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早期的印刷商必须要精通机械、精于学问，他们为后人指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印刷业里，如果熟练工想要自己当老板的话，他们尤其要有文化。由于出版的步伐加快，其他行业需要提供文化水平的压力也加大了。在有些情况下，整个行业的技术焕然一新；在另一些情况下，行业技术发生了分裂。凡是书本学习和体力劳动结合的地方都产生了职业的变化。于是，学院建立起来，学术刊物问世，专业标准确定下来；仍然依靠手工劳动的人开始与有文化的精英接触。16世纪意大利艺术家的地位提高，下面是一个著名的案例：

252

> 绘画、雕塑、建筑这三种视觉艺术……显然和以前与之有关的其他技艺分离开来了……“设计艺术”一语大概是“美术”的基础；乔奇奥·瓦萨里率先使用“设计艺术”一语，将其作为他那著名的《艺术家列传》的指导观念……1563年，在瓦萨里本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佛罗伦萨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斩断了和工匠行会的关系，组建了一所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这所学院成为后来类似学院的模板……艺术学院仿照已有一段历史的文学院的模式，这些艺术学院取代了昔日的作坊，有了正规的课程，包括几何学和解剖学等理科课程。(263)

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新的结合产生的结果而言，从工匠到艺术家的转化似乎与其他行业里的裂变类似。(264)当然，每一种情况都需要具体分析。印刷术对音乐人的影响是一种方式，对行医者的影响是另一种方式。即使在医界内部，药剂师和外科大夫的命运也不一样，在外科医师内部，军医又构成一个特殊的范畴。再者，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专业传统和学术传统。没有两所大学的教员会对新的要求做出相同的回应。治人者和赞助者的反应绝不会整齐划一。为了解释用凿子或油刷的匠人如何转化为搞“美术”的人，我们必须要解决一整套特别的、极其复杂的问题。然而，在探讨这些情况时，牢记印刷术的出现是有好处的。试图解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变了的角色时，仅仅指出人文主义者与研究生院的对抗是不够的；断言古籍证明古代的艺术家受尊敬，那也是不够的，判定暴富的赞助人投资美丽的艺术品的目的是要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那也不足以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在手抄书文化转变为印刷文化的过程中，艺术家的地位和艺术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53

印刷术减少了人们对记忆术的依赖，因而改变了过去由形象创造者行使的重要功能。同时，印刷术又使艺术家能够“为赢利而出版自己的设计，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被人看见”[265]。于是，艺术家有机会去分享赋予知名的匠师—工程师、作家和发明家的新的威望。[266]

> 艺术家不再是人人必需品的供应者，他们的作品不再像其他产品那样被人订制，他们成了面对公众的个体……到16世纪初有文化的非神职人员可以发表有用的艺术评论，这已经成为公众接受的理念，甚至出现了非神职人员论艺术的著作……
>
> 此时的艺术家面对广大的公众……在这种竞争精神的引领下，他们开始创作并非直接由人订制的绘画作品……[267]

与此同时，“美术”和“美文”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读书的画家和赏画的文人不断交流，这样的交流延续至今。[268]新建立的学院巧妙地利用印刷的宣传品，扩大了市场——不仅为艺术品开拓了市场，而且为评论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图书打开了市场。[269]各种各样的批评家与画商、收藏家与鉴赏家、审美专家与中介人都赞扬、“发现”或赞助新的“不朽之作”，并因此而获得了不朽的名声。日益精湛的阐释文

献使印刷品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艺术品，受到博物馆的精心呵护。从15世纪初出现的对乔托的赞誉开始，前人的杰出作品就引起注意，里程碑式的成就记录下来，于是，模仿和改进就更加刻意为之了。

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影响到图像被塑造的方式，影响的途径又改变图像搜集、分类和复制的方式。印刷术鼓励相同母题被循环往复地复制，其复制力量还给新的视觉词汇赋予越来越大的价值。原本用来挂在墙上或画在羊皮纸上的图像此时可以用木刻和镌刻复制，由印刷品商人提供了，还可以由木工、玻璃工、制陶工和织毯工来加工，被新一代的艺术家用作大型作品的构成要素，而这一切又可以由印刷商复制发行，供各地的匠人使用。[270]如此，视觉的陈词老调就被创造出来，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不得不自觉而巧妙地利用，同时又拼命地摆脱其影响。许多新的类型和主题应运而生[271]，但一代人的创造越来越成为下一代人的负担。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匠人到创造性艺术家的转变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给人解放的力量。与作曲家、剧作家和诗人那样的文化英雄一道，艺术家被印刷术的保存功能抬举到“不朽”的高度。他们渴望这个被拔高的地位，所以他们越来越疯狂地追求新奇，受到压力越来越大的“历史包袱”的威胁。

诚然，要过几百年，这样的积累效应才会显著，“新传统才会充分发展”。然而，其他的变化却立即到来。阿尔贝蒂劝画家读《修辞学》后，有的印刷商立即跟进出版这本书，以使画家们便于在作品中遵循这一忠告；批评家也跟进，他们不会对这

一趋势置若罔闻。文学创作的原理和悠久的修辞律把图像设计锚泊在诗性的结构 255
上。从贺拉斯与西蒙尼得斯[①]的隽语中演绎出了绘画和诗歌的相似性，从 16 世纪起，这样的相似性在画论中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272) 创作一幅“历史画”犹如创作一首史诗。“学者型画家”与“学者型诗人”伴生，承担了越来越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这样的人物对画家的要求不亚于今天的人对专家团的要求，今天的历史题材电影常常要聘请专家团把关，请他们检查镜头里的服装和家具、建筑与场地、植物和动物是否地道和真实。阿尔贝蒂认为，画家应该从阅读中获取足够的材料，使他与饱学之士交谈时表现出足够的聪明才智。后来的批评家要求，画家“不仅要通晓《圣经》和通俗文学，而且要熟悉地理学、气候学、地质学、神学以及各国的民情风俗……”(273) 正如 R. W. 李所言，学者型画家几乎是不可企及的理想高度——如果泡图书馆的时间过多，画家留给工作室的时间就很少了。尽管如此，诗画相若、画家学者化的理论还是显示，书籍生产量的增加必然要拓宽艺术家承担的使命，与此同时，艺术家达到新目标的实力也会水涨船高。

艺术家与解剖学家的合作促成了所谓的“科学革命”；同理，艺术家与古玩家的联手促成了所谓的“历史革命”。探查时代错乱与风格变迁的工作大大拓宽，超越了洛伦佐·瓦拉等拉丁学者的语文学关怀，直到涵盖重建历史事件中一切物体的视觉精确性。

慎重的画家应该知道如何妥帖地表现个人、时间和地点……他表现的埃涅阿斯[②]不能在查士丁尼[③]皇帝时代光临意大利，迦太基战役不应该有庞蒂乌斯·彼拉多[④]的参与……

圣哲罗姆的画像头戴一顶今天的枢机主教戴的红帽子，那是不是错误？他的确是枢机主教但……七百多年以后，教皇英诺森四世[⑤]才命枢机主教戴 256
红帽、穿红袍……这一切都是画家们因愚昧而犯的错误。倘若他们多受点教育，就不会犯这样低级而明显的错误了。(274)

---

① 西蒙尼得斯(Simonides，前 556？—前 468？)，希腊抒情诗人、警句作者。为祝贺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创作胜利者颂歌，其酒神颂歌在雅典竞赛中多次获奖。

② 埃涅阿斯(Aeneas)，维吉尔的史诗里表现的特洛伊英雄，特洛伊沦陷后，他背父携子逃出火城，最后流浪到意大利定居，据传罗马为其所建。

③ 查士丁尼(Justinian，483—565)，拜占庭皇帝，主持编纂《查士丁尼法典》，征战波斯，征服北非及意大利等地。

④ 庞蒂乌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罗马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⑤ 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1200？—1254)，意大利籍教皇，主张教廷统治一切，召集里昂会议，废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

于是，不能精确描绘历史事件被认为是够不上“学者型画家”的错误。努力搜寻这样的错误有助于推进鉴赏文物的研究，有助于整理混乱的历史资料。

于是就出现了坚持在书本里“正确表现”服装和置景的态度，这就产生了对历史事件的更加直接、更受时间约束的解释，此前的书面表现则不太受时间语境的束缚。对更加充分的视觉信息的要求包括如何表现埃涅阿斯或圣哲罗姆之类早期教父的要求。但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容易满足这样的新要求。比如，构想用令人信服的笔法来表现打造和装配诺亚方舟的细节时，画家们就遇到特殊的问题。中世纪的学者绘制诺亚方舟的草图；圣威克多修道院的于格①和里拉的尼古拉②暗示了一些可能的计划和启示(275)；有人从学理上探讨了希伯来肘尺的长度。(276)不过，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视觉想象比 16 世纪的学者的想象更灵活，16 世纪的学者习惯于根据中心透视原理的恰当比例来想象动物的形体。试图想象诺亚方舟的准备工作时，新出现的坚持“正确表现”的观点既无助于事，又可能促使人们去想《圣经》
257 是否应该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277)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学者型画家的批判意识高涨的同时，愚昧的图版印制人粗心的产品也大批问世。16 世纪的文人之所以从学理上关心恰当的语境，部分原因是早期印刷人犯了许多大错，许多早期的木刻画和镌刻画张冠李戴、留下恶名。上文业已显示，图解的文字和图像颠倒、同一雕版画反复在不同场合使用等错误实在不少，许多早期的插图与其说是视觉辅助手段，不如说是视觉障碍。(278)从《圣经》到植物学图书里的粗劣木刻画并不能忠实地复制中世纪手绘的图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6 世纪的博学鸿儒对早期印刷品野蛮而愚昧的错误持鄙视的态度，这可能和新媒介笨拙的操作有关系；错乱而劣质的木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黑暗时期”物品的写真。(279)无论这些图像是视觉障碍还是视觉辅助手段，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新的插图形式并非简单地使过去手写书的传统长期保存，也不是使之中断。

有鉴于此，我们没有必要修正几位权威学者的观点：图像和文字传统的“团聚”是文艺复兴盛期的特征。(280)但在图书插图领域，我们至少可以说，15 世纪晚期出现的局面似乎很像是“离婚”而不是“复婚”。当联系文本与页边装饰的优美线条被切断时，图像和语词就脱节了。图像被复制后就脱离了起初的语境，且容易被滥用。文本与插图的关系、文字描述和图像都可能会被移动到错误的地方，可能被扰

---

① 圣威克多修道院的于格(Hugh of Saint Victor，1096？—?)，亦称圣维克托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法兰西经院神学家，首倡奥秘神学。

② 里拉的尼古拉(Nicholas of Lyra，1270—1340)，法兰西方济各会神学家和《圣经》评注家，第一部印刷版《圣经》评注的作者，其《普世〈圣经〉评注》强调诠释经文而不重视神秘主义的解释，不考究比喻暗示，有人认为这部著作对路德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乱了。

书法艺术一直和手稿插图紧密相连。即使在许多人合作的情况下，配红字标题的和配插图的人加工文本的方式也像口授记录人和誊写人。[281]机印书里的插图还需要利用金匠、木刻工和机械工的才华。[282]这一类工人未必直接在纸张上工作；也未必总是知道他们的产品去了何方。有一位中间人即出版商介入其中。如上所述，由于俭省的习惯，人们把有限的雕版和图版用来给许多题材不同的文本配图[283]，这一做法常常使图像和文字不匹配。在16世纪的大单张和公报里，祈祷书里的圣像被借用来配战地新闻和王公入城式，实在是格格不入。比如，1528年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在康布雷的入城式就用了圣像，至少可以判定，刻意用圣父支持基督受难的圣像来表现这次入城式是不太可能的。[284]还有一些更加荒谬的效果是这样产生的：思想自由不拘的工匠不熟悉抄书人的传统，试图用图像配诗句，或者用误植的文字配图。散文和韵文的混淆产生特别滑稽的隐含意义，这颇像堂吉诃德与仆人桑丘·潘萨主仆颠倒的关系——让仆人来为堂吉诃德喜欢的骑士故事配图。有一幅镌刻画可能给菲利普·锡德尼爵士[①]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因为它把勃鲁盖尔[②]画笔下的村姑和维吉尔的田园诗放在一起了，这使人想起仆人波坦闯入仙王奥伯龙[③]领地那样的荒唐事。[285]长着一副猪嘴、嘴唇被锁的仆人被用来突出故事的教谕意义，勒达[④]与天鹅被用来装饰《希伯来书》——诸如此类不协调的图像都引起了现代学者的注意。[286]

然而，我们面对这一切不协调时却应该小心谨慎。不谨慎的人会落入陷阱；有时，现代学者也可能会犯错误而沦为笑柄。比如，奥维德的勒达故事很久以来就被中世纪的寓言赋予了基督教寓意。我们从瓦特堡学院的学者那里获悉，在文艺复兴时期，异教故事很少被剥去宗教联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阿曼纳蒂[⑤]创作的雕塑《勒达与天鹅》（以米开朗基罗的设计为基础）不是描绘一件事，而是将其作为爱情力量的象征，它足以使人灵魂解放、与神合一。"[287]因此，用了勒达插图的《圣经》可能是精细区分的证据，而不是粗心的错误。（你不禁要问：这一插图是何时、为何变得"臭名昭著"的？）同理，正因为印刷商将维吉尔的田园诗和佛兰

---

① 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英国诗人、廷臣、军人，著有传奇故事《阿卡迪亚》、牧歌短剧《五月女郎》、十四行组诗《爱星者与星星》及文学评论《论辩》等。

② 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eughel，1525—1569），佛兰德画家，擅长风景画，代表作有《农民的婚礼》、《盲人的寓言》等。

③ 奥伯龙（Oberon），中世纪民间传说中的仙王。

④ 勒达（Leda），斯巴达王后，主神宙斯化身天鹅与之亲近，生下海伦和波吕克斯。

⑤ 阿曼纳蒂（Bartomomeo Ammanati，1511—1582），意大利雕塑家及建筑师，曾参与设计和创作佛罗伦萨一批著名的建筑工程与雕塑。

德斯的风俗画印在一起，菲利普·锡德尼爵士才从中得到灵感，而且这样的并置还可能是有意识地要表现高明的风趣[288]，而不是意外的“错乱”。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16世纪的图像特别令人困惑。你很难有把握说，一个微妙暗示是有意为之的典故还是纯粹的错误。对一个具体的图像而言，你可能无法确定其责任所在；参与的人太多：画家、镌刻家、为图片写文字说明的人、文稿编辑、图片经销商、出版商。连现代学者的创新也可能引起混乱。在考证典故时，他们找到的联系对16世纪的人未必很明显。现代人观察时，他们的视野之所以被扭曲不仅可能是因为短视，而且可能是由于他们太敏锐。而且，除了令人烦恼的有意无意问题之外，你还必须考虑，字面解释和寓意解释并未穷尽图像的所有用法。其他的目的还需要考虑，记忆、教谕和纯粹的装饰都需要考虑。

一方面我们要为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留有余地，同时你至少可以说，16世纪诗人和剧作家在图文的互动中得到启发。多种风格主义和巴洛克式的发明比如奇想、双关语和悖论，都可以追溯到早期印刷品中的图像及其与印刷文本的各种接触。其他的发明比如具有科学意义和技术意义的发明难道就不可以追溯到印刷品中的图文互动吗？无疑，新形式的书籍插图的刺激效应绝不仅限于富有幻想力的文学。新的组合与变化可能是在多种技术文献插图的刺激下产生的，印刷机开动之后，技术文献的种类就快速增加。[289]谷登堡的发明“释放出一条采矿和冶金书籍的溪流”；“化学工业进入艺术品的时间还略早于冶金书籍”[290]。各行各业的工具、作坊的内容、工人的日常工作都有了具体的图像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积压的未获专利的发明和博物学家的观察心得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印刷术这种新媒介被用于宣传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和面孔，也被用于围城工事、运河闸道等大规模公共设施的宣传。新的木刻画、镌刻画、大单张和团花图案使各种“精巧”的设施更加令人注目，更加富有魅力。重要的公共设施一旦用印刷品表现出来，就成为旅游景点，并且与悠久的朝觐圣地和罗马遗址相媲美。[291]在高明的艺术家手里，杠杆、画论、齿轮和螺丝钉的平凡的功能带上了戏剧的色彩；用图像表现的工程业绩也具有史诗一般的英雄色彩。至少16世纪的一些工程史诗可以被描绘为雄心勃勃的技术人员为寻求赞助人和佣金而做的宣传。丰塔纳①在为西克斯图斯五世②效力而迁移方尖碑的竞争中胜出，但没有赢得桂冠；不过，他印行了一幅大型对折的精美宣传品，旋即又刊印了许多小册子。[292]其他豪华的图画

① 丰塔纳(Fontana，1543—1607)，意大利建筑师，设计了梵蒂冈图书馆、永乐宫等，将公元1世纪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从梵蒂冈广场移至圣彼得大教堂前。

② 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1520—1590)，意大利籍教皇，整顿教廷中央行政机构，进行反宗教改革运动。

书用来表现“机器房”，不仅成为仪器制造者的广告，而且指向 18 世纪大百科全书 261
的图版，甚至预演了 19 世纪工业展览会真实的场景。[293]技艺不凡的镌刻家在两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的立体，即使最晦暗的采矿机也获得一丝尊贵和魅力。与此相似，从鬼蜮底层升华出来的尸体也失去了腐烂的臭味和狰狞的面目，它们（比如在《人体的结构》里）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田园里跳上流社会的孔雀舞。

用相同的视觉手段来描绘机器零件和人体器官可能促进了水泵与心脏、水管与血管的类比——这些零件和器官以前是看不见的。这个类比（借自 A. R. 霍尔）[294]难以详细阐述。[295]同样难以把握的（稍后一章再讲）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反复接触论比例、透视、光学和几何学书里新型的轮廓分明的插图以后，人们自然会作这样的类比，这可以用来解释哥白尼和开普勒表现出来的对“固定对称”的特别关注。[296]我发现这样的思考发人深省，但别人可能会觉得太牵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机器印刷的大量图像的生产过程改变了科学资料搜集的性质。

考察植物学和解剖学等领域的发展，这一点可能就会得到最有力的证明；在这些书里，视觉信息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伊文思对两种草本书的讨论提供了相关的例证。[297] 1480 年在罗马印行的那一本用的是手抄书里的图像，由于辗转复制，这些图像已经严重变形，早已远离原来的拉丁文手写本。抄书人手绘的图像，经过粗制滥造的木刻画在书中复制以后就频频出现问题。[298]它们显示，盲目使用新媒介只会使旧媒介固有的不足长期保存并大量增殖。况且，这些复制品出现的时间正是起初的图谱完成的时间，而这些母本又是画家熟练的写生作品。如果说 15 世纪的人追求视觉手段，今天的我们难道不应该检视画家从自然写生得来的画，反而要去看旧书里那些走样的图像吗？有几本书说，新媒介只不过使陈旧 262
的插图苟延残喘。[299]但进一步反思就会发现，这一观点没有考虑到印刷术之前的手写书在方法上的局限性。这个观点假设，在直接观察过程中描绘的新鲜图画是可以长期保存的，而且以其为参照，任何变形或低劣的复制品都是可以被抛弃的。然而，印刷术发明以前，如今被贴上“过时”标签的传统却有绵长的寿命。而新鲜的观察却只能够在特殊的制图室、作坊或课堂里保存，而且其保存是靠不住的、暂时的。它们不可能长期流通而不变形，也不可能在封闭的圈子以外流通而不走样。

作为反复复制的媒介，绘画当然比木刻或镌刻画优越，但这一独特性并非一目了然。（下文将要阐明，现代复制技术使人根本就难以看清这一特性。）就“百闻不如一见”而言，木刻画看上去的确低劣，即使仔细看也是这样。在精确描绘特定对象时，笔墨的绘画显然优于木刻的描绘。笔墨画不仅更新鲜、更自然，而且更适合描绘细节。除了这两种媒介固有的差别之外，15 世纪晚期还显示了这两种艺术的

强烈反差，这样的反差使新的插图形式处境不妙。誊写人和插图人用笔书写和描
263 绘时早就形成了高超的技能。与这种手稿书写和描绘的精湛和优雅相比，早期机印书的图像似乎就特别笨拙和粗糙。(300)最重要的是，任何视觉比较都不可能传达两种媒介跨时空传递精确形象时各自的相对优势。

于是，我们不习惯区分两种手绘的图画：一种是长期使用后的图书里已经反复复制过的手绘画，一种是速写簿或手稿里刚刚描绘的新鲜画。因为“细腻”工笔画和“粗糙”木刻画的视觉反差实在太大，所以新鲜的绘画和复制过的绘画之间的差别就特别容易被忽视。这是不幸的。手工复制的图像在时间流逝中会走样，相反，可重复的镌刻画可以校正和改进，这一区别对印刷术如何影响图像至关重要。多次复制后的图像的命运被彻底逆转，所以其存在几乎从视野中消失。在这个方面，现代复制技术没有帮上什么忙，反而堵塞了我们观察过去变革的视野。数以百份地同时复制旧的图画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所以我们难以记得，这一壮举在手抄书时代绝对是不可能的。

然而印刷术到来之前，为读者详细描绘自然现象实在是一种“边际的活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边际活动。因为我们目前有能力在手稿书或风景画中辨认“真实的”飞鸟或植物，我们就容易忘记，过去的读者缺乏植物手册和观鸟指南，他们没有能力区分凭想象画的鸟和逼真描绘的鸟。(301)这不是要贬低有些工作室里的大画师逼真表现花卉树木、飞鸟虫鱼的能力，仅仅是要指出，这种能力既可能用于《诗篇》的装饰和法衣的绣花(302)，也可能用于书籍的插图，但很少被用于技术文本的
264 装饰。

在手抄书时代，你可以雇一位插图家为一位主雇装饰手稿，但正如阿格里科拉所言，你为了装饰一个技术文本请一位插图家画“血管、工具、闸门、机器和熔炉”就没有多大意思了。(303)阿格里科拉提供插图的目的是“以避免非文字传达的描绘形象使当代人或后世人难以看懂”。他这种新的态度似乎预示了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的精神。同时，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语词和形象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样或变形，阿格里科拉认为，他正在告别手稿文化里的先例。(304)

> 历史学家常常迷惑不解，他们难以解释为何15世纪植物志里的木刻粗糙而传统，而同期画家及细密画家的作品却比较精细，艺术史胜人一筹，两者的反差令人惊诧。我们有理由认为，15世纪的人不觉得两者有冲突：木刻是复制手绘插图的作品，像手抄书里的文字一样忠实；文本里插入的图像为的是装饰文本，而不是装饰自然或具体的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那时还没有真正独立的植物学或动物学。
>
> 这样的贡献还要等到16世纪……出现在植物志里……这场革命爆发，因

为作者们对单纯文字描绘的不足感到绝望，所以他们寻求熟练的誊写人和艺术家的帮助，这是些训练有素、精于仔细观察的誊写人和艺术家。(305)

早期印刷商因出版植物志而复制粗糙的木刻时，他们只不过是在15世纪抄书人驻足的地方继续前进。颠倒、替代、磨耗或破损的旧雕版有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但母版的原画或变形的图像的差距却是手抄书时代的遗产。与其说那是由于"纯语言描绘的不足"而产生的新意识，不如说那是产生这一意识的新媒介，正是这一媒介可以解释"16世纪的革命"。开天辟地第一次，熟练誊写人的手写书能够以数以百计的副本保存下来了。

总之，伊文思似乎有理由把1480年一本劣质的机印版植物志当作手抄文化传播的终极产品。作为比较，他指出另一本书——彼得·舍费尔1485年在美因兹印行的《德意志植物志》。这本具有开拓精神的书的序言描写了，他如何委托人作画用以出版。首先他请一位医学专家（他编印了盖仑、阿维森纳[①]等人的著作）审核刚刚做完插图的稿子。问题是，许多植物并非本土所见，"不可能按照真实的颜色和形式来画，只能靠听说的样子来画"。于是，舍费尔组织了一种世俗的朝觐之旅（伊文思称之为为即将印行的书创作插图的首创的科学远征，是恰如其分的），他还聘请了一位"精细而老练的"画家随行。(306)这位画家的作品被制成雕版付印，和质量不均等的其他木刻一道进入这本植物志。编订后的拉丁文被译成通俗德语，以方便非神职人员的德国读者。这本植物志成了先驱，里面既有新作的图版，又有许多已经多次复制过的图版，在当时并不典型，但它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265

到16世纪中叶，植物插图不再简单地依靠直接的观察。这样的装饰告别手抄和印刷的先例，走向示意图式的表现，促进了对快速增长的数据库的分类工作。(307)此时，多语种的"口袋本"新鲜插图的植物志印行了，以方便野外考察者使用。(308)新的大规模植物学出版计划正在由欧洲不同的印刷厂合力完成。远程通信开始提供种子和标本，考察报告和植物图样被送给马蒂奥利和克鲁西乌斯[②]等著名的编辑。(309)一旦远程搜集的直接观察和真实标本送交技术出版物的编辑，你就可以说，近代科学数据的搜集就踏上了如今的道路了。

266

镌刻画制作人取代手绘插图人以后，文艺复兴时期誊写人"精细而老道"的妙手对解剖学研究作出了贡献。(310)唯有专家有资格参与如下的辩论：卡尔加的

①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波斯医生和哲学家，其《医典》（*Canon of Medicine*）在欧洲一直被当作标准的医学教科书，直到17世纪。

② 克鲁西乌斯（Carolus Clusius，1526—1609），法国植物学家，现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提出新的园艺栽培法，引种了郁金香、马铃薯等植物，在莱顿大学执教时促进了荷兰郁金香的栽培。

约翰·斯提芬努斯(Joannes Stephanus)是否为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做过插图，提香工作室的誊写人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本书的工作，维萨里本人又在多大程度上亲自指导他雇用的艺术家和工匠的工作。[311]非专家只能说，这些观点的证据不完全，其断语似乎不是最后结论。无论这一场争辩里的论断是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型解剖人—作者和通过当学徒而学会技能的匠人—誊写人的新形式合作是受到鼓励的，新的解剖学出版计划促进了这样的合作。

解剖书里的机印图谱和《人体的结构》等书里“图文相互参照的繁复体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权威人士已经对这一角色阐述得非常透彻，无须过多置喙。[312]鲁珀特·霍尔(Rupert Hall)的记述似乎达到了特别好的平衡。他不仅说明，插图版教材有助于指导科学观察，而且为印刷术之前15世纪艺术家的新绘画传统留有一定的余地。[313]鉴于有些媒介分析家倾向于忽视机印书插图之前誊写人
267 改变图像表现的方式，这一点似乎值得我们在这里重申。

只需对中世纪模糊的医学图谱短暂一瞥就足以使人怀疑以下这句话(摄影术时代常被视为理所当然)：一幅图画胜过许多言辞。一张画既可能不清楚，又提供误导人的信息，未必比理解陌生的外语容易。贡布里希才华横溢的研究表明，一切图画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解码，一切图像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欺骗眼睛”[314]。他还指出图像既可能澄清信息，也可能使我们对自然现象的感知产生混乱。但传达正确信息的图像可以和提供错误报告的图像区别开来。艺术家可以凭借校正和反馈而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条件当然是：正确的信息是他们选择的目标。[315]即使在机印的插图常见之前，15世纪的艺术家已经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开发新的审美规范，强调统一构图和焦点透视，力争清晰而逼真，为16世纪的解剖学家提供了实用的新形式的词汇。应当承认，视觉词汇的开发是解剖学的重要成分，但这一条件本身并不足以形成解剖学。如果忽视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素描簿，那是被误导了；同理，如果忽视新的配图文字移植到技术图书里的形象，那也是被误导。[316]

> 倘若没有图像记录的方法来保存观察结果的话，倘若这样的图像不是完全而准确的三维图像，作为一门科学的解剖学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句话适用于其他一切观察性和描述性的科学)。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即使最准确的观察
> 268 也会得而复失，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其他的观察用来对照检查，没有办法验证其普遍有效性。在现代科学史上，透视的出现是现代科学史第一期出现的标志；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是第二期的标志；摄影术的发现是第三期的标志：在观察性科学或描述性科学里，图像显示与其说是对语言表述的说明，不如说它本

身就是一种语言表述。(317)

在我看来，认为透视表达的出现是现代科学的起点，认为图像表述本身是自足的系统，那是夸张。“用图像记录保存观察所得的方法”以及用其他方法核对这种方法的机会，不应该被认为是存在于艺术家的素描簿里。只过分强调图像记录这一点就会导致错误的结果：潘诺夫斯基把列奥纳多当作“解剖学的奠基人”。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列奥纳多实际上（稍后将讨论）似乎证明，那种鹰眼观察（即使和那大手笔的素描画解剖结合时）本身并不足以使解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航道。其他需要的条件是熟悉图书和人体。中世纪和古代的术语的知识，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以及拉丁术语的掌握，以及在编辑古籍过程中掌握的其他技能——这些条件都进入了解剖学家的艺术。潘诺夫斯基说，维萨里的编辑工作和列奥纳多的艺术创作“在目的和方法上不存在根本的区别”，这就忽视了合作出版计划和保存一个素描簿的区别。

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当我们考虑解剖学或植物学这类领域里的发展时，我们不能太强调新的视觉手段和艺术家的特殊才能。影响这些领域的其他变化更加全面的讨论只能留待稍后的一章里去讲。我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当我们研究观察性的或描述性的科学时，合作和协调的问题值得更多的注意。毫无疑问，有些画室、学苑、宫廷和大学必须要挑出来予以特别的注意。有些大师的贡献的确很伟大，但如果在一个地域稽留太久，或在一种活动上集中过多的注意力，那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需要考虑的新的主要因素是同时开发许多种不同的才能。由于许多地区的都市印刷所同时推出许多出版计划，人们分散的调查所得能够结合与协调起来了，这样的结合与协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如果没有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印刷所内的新型互动以及印刷品流通而引起的 269
互动可能就不会这样成效卓著。印刷术的保存功能使人能够克服潘诺夫斯基所谓的“障壁”。“文艺复兴是拆除部类分割的时期：破除了中世纪时期使事物有序同时又使之分割的障壁。”(318) 如他所言，这些障壁以前将不同形式的知识分割成分离的部类，使这些部类里知识的传递沿着“传送带”运行。他认为，“难以压抑的部类分割冲动”是“中世纪盛期人脑的特异倾向”(319)。相反我认为，这是手抄书文化里固有的连续性。使传输渠道分离大概有助于防止信息充塞或减损，使信息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不至于失真。

中世纪时期的许多知识形式如果要得到保存就不得不带上几分秘传的色彩。这些知识形式绝不是宗教正统和异统的问题；封闭体系、神秘态度甚至心态壁垒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尽管有文本漂移、手稿迁移、资料收藏散失和毁损的问题，许多信息还是可以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通过尝试和错误的过程去获取。但如果不采

取措施防止讹误和混淆，不用保密的办法来堵塞泄密，先进的技术是无法传承的。为了完好无损地保存信息，先进的技术就不得不托付给一批精选的内行，他们不仅要学习特殊的技能，而且必须要得到“秘密”的传授。特殊的符号、仪式和吟唱发挥必要的功能，它们组织数据、制订日程并且用容易记忆的保存技术来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跨文化交流的机会必然是受拘束的、有局限的。学习使用外科大夫—理发师工具的学徒是一条路子，誊写注解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医学文本拉丁语译本的大学生是另一条路子，他们学习的技能是在“完全分离的传送带”里
270 传递的。即使在大学内，手抄书文化的条件也妨碍了学科之间的交流，连现在关系密切的学科比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在那时也缺乏交流。诚然，手稿的迁移本身偶尔就使两种分离的文本传统产生富有成效的接触。有幸得到新近发现的亚里士多德文稿的经院哲学家就完成了神学与自然哲学的融合。虽然这一次融合起初受到保守派的抵制，但它最终还是被人接受了。希腊化时期和基督教教父时期的宇宙论结合得很好，所以天使等级和天体轨道可以同时被记住而不会被遗忘。然而，阿奎那的宏伟设计里还是省略了天体运行轨道的更加复杂的计算，这样的计算是用均轮和载轮来追溯天体运行轨道的。摇晃和倒退运动并不影响但丁直升九重天的宏伟构想。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图表和星表保留下来了，在哲人和诗人邂逅的圈子外得到保存，在专业天文学家精英的圈子外保存下来了，哥白尼最终从天文学家的圈子里脱颖而出。[320] 包含精确计算的记录要求誊写人接受特殊的训练，要求对抄书房进行细心的监察，要求对幸存文本的仔细监管，还需要对如何使用这些记录的不厌其详的培训。在这种条件下，对天体天文学的掌握几乎必然要使之与其他学问分离开来了。

奇妙的是，修士和修女培育的教义并不像非神职人员和工匠体验的职业和秘术那样被围堵得严严实实。教会有大批的使徒和传教士，有口头和视觉的宣传，有无处不在的玄妙的符号和仪式，它代表着主流传承规则令人惊叹的例外。虽然它不得不依靠誊写人抄书，但即使它公开宣告自己的教义，即使它远离异教特有的神秘性和神秘崇拜，它却成功地使基督教教义代代相传。不过，由于教会控制着大多数图书出版中心，控制着誊写人的招募和培训，所以能够在培训神职人员的同时公开向俗人宣示神的真理，教会是两者皆顾的唯一机构。在千百年的时间里，为了确保与基督教符号、仪式和圣餐礼相关的特殊意义不致失传或被冲淡，同时又确保这
271 些特殊的意义能够在已经部分拉丁化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蛮族的民族中间传承，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这一福音传播的任务而调动起来的精力往往耗尽了手抄书文化的能力，使之难以在不设限制的情况下传承其他讯息；手抄书文化不得不将其他讯息限定在精选的少数人圈子里，让他们用各自的传输渠道来保存各种封闭的知识体系。

3.4　破解奥秘：远古崇拜和“复兴”理念的变化

这些按部类分割的系统进入公共领域时就会产生交流，但其过程绝不是一清二白、雅致悦目的。生机勃勃的艺术家、机械工、天文学家等行业和学科互相勾连，回头去研究其关系容易走错方向。弗朗西丝·耶茨认为，机械工和机器“在神秘传统中被认为是一种巫术”[321]。然而，在手抄书时代，把巫术与机械技艺联系起来的倾向并不仅限于特利斯米吉斯图的赫耳墨斯教义的追随者。只要行业的秘密在封闭的圈内人中间传承，各种不成文的诀窍对圈外人似乎都是神秘的。即使师傅的面授记录下来保存在记事簿里，它们对圈外人仍然显得“莫测高深”。石匠的围裙有可能被用作霍鲁斯①的眼睛，以表示神秘面纱背后公众看不见的秘密。[322]炼金术士的秘密配方难以和药剂师、金匠、玻璃工或弦乐器制作人的秘密区别开来。[323]这些行业都属于“学问的地下世界”[324]，它们大约在同一时间浮出地面进入人们的视野。

于是，“技术付梓出版”了，许多积累的秘术和配方也出版了，很少有读者能够将两者区别开来。至少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混乱的局面挥之不去。研究看不见的自然力的出版物在世界各地流传，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后来被描绘为“一派胡言的自然历史”的出版物大大地丰富了。[325]宣传体制使乐器制作人能够推销自己的货品，从而对公共知识作出了贡献，但同样的宣传体制又怂恿许多耸人听闻的言论的大量出笼。自学有成、自封能够创造奇迹的人常常鼓吹自己发现了哲人石、一切知识的钥匙或万能的药方，这些人常常很善于利用报刊宣传，而不是擅长任何传统的技艺。同时，中世纪许多神秘态度深深扎根于许多工匠中，甚至在行会瓦解以后也挥之不去。谷登堡之后两百年，约瑟夫·莫克森还在抱怨说：“雕切加工这样的手工活迄今仍然是匠人中深藏的秘密，我没有听说过谁向谁传授过这样的技艺。”[326]

害怕新的审查官以及对新的宣传手段的矛盾心态在专业人士和学术精英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起初，刻意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隐藏的典故和隐秘的评论等手法的现象比印刷术发明之前更加司空见惯；古人对公众隐藏真理的深奥的训谕被放大并强化了。[327]本书稍后的讨论将要表明，有些自然哲学家追随弗朗西斯·培根，他们敦促人们敞开封闭的作坊，鼓励更加自由的思想交流；相反另一些学者比如沃尔特·罗利②则反对公开宣传，罗利赞扬古代圣贤保密或隐藏某些真

① 霍鲁斯(Horus)，古埃及的太阳神。

② 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1552？—1618)，英国大臣、航海家、殖民者、作家，把烟草和马铃薯引进欧洲，著有《世界史》，另有诗歌和回忆录存世，曾被囚禁在伦敦塔，后被处死。

相的做法。[328]哥白尼和牛顿不愿意轻易出书，而维萨里或伽利略却急于刊布著作。
273 “科学合作的观念是名人的相会，但他们都以嫉妒心捍卫自己珍贵而神秘的发现。”[329]这一观念在培根的时代根本就没有被彻底击败。然而，一旦书商将首批书目推向市场以后，这个观念的基础就急遽改变了。

人们知道有必要保存资料以避免讹误丛生，但这种需要塑造的观点与在市场上大规模推出的印刷品却不协调。正如斯普拉特主教(Thomas Sprat)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正在出版畅销书或“最伟大神秘著作”的作家却始终坚持要遮遮掩掩。[330]帕拉切尔苏斯写道：“我们要求你以极端的保密措施对待和保存这一神圣的秘密。”[331]这句话针对圈内一群精英说似乎是妥当的，但当它通过商业促销而面向公众以后就很荒唐了。与此相似，听见高声叫卖珠宝的人说什么防止明珠暗投时，那就使人既怀疑其意图又怀疑其货品是否物有所值了。巫师利用人们抗拒未知事物的心理，到头来沦落为江湖郎中，只能靠利用别人的愚昧谋生了；至少在“开明”的专业人士和学术精英的眼里，这些人是骗子。兜售秘术的人从“下层学界”(underworld of learning)里冒出来时，与他们为伍的是匠师和手工艺人，其终极命运是再次进入地下，不过他们这次潜入的是另一个地区，与他们为伍的有各色各样的人：从玫瑰十字会、方济各会和梅斯梅尔式的催眠师、信仰治疗师、招魂术师到各种各样的伪科学家。“玫瑰十字会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赫耳墨斯神智学和其他神秘论的倾向，这些神秘论将在17世纪潜入底层，从原来与主流哲学联系的观点变成秘密会社与少数人群体执著的关怀。”[332]

旧的“下层社会”和新的“下层社会”有许多重要的区别，旧“下层社会”包含的
274 是不识字的工匠和不成文的秘诀，而新“下层社会”则栖居着文人——区别太多，此处难以一一赘述。[333]让我仅仅指出，这些新的“秘密”会社与过去的行会和会社形成特别戏剧性的反差，它们利用宣传手段表现非常矛盾的态度。这些新会社不局限于小型的封闭圈子，它们向不认识的读者发出邀请，暗示圈内人才知道的秘密，似乎把秘密作为招募会员的手段。玫瑰十字会的宣言“大张旗鼓地宣传，广泛传播，颇具煽动性。既然秘密会社的首要目的是保密，一个真正的……秘密会社居然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宣传自己，这真是奇怪之极”[334]。

> 与玫瑰十字会联系的常态方式是这样的：读过他们的宣言以后，发表一点以其为对象的东西，或对其表示钦佩。这些诉求是得不到回信的；该会既不给钦慕者回信，也不给批评者回信……
>
> 玫瑰十字会激动人心的……宣言激起的狂热很快就引起了极度的混乱，大批人想要参加，却不知道内幕，不知道其宗旨，仅仅是被那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吸引，仅仅是想要与那些神秘的人物接触……或者由于那幻想中的危险巫

师或鼓动家无处不在，人们因此而愤怒和惊恐。(335)

“何为其宗旨”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令人困惑。接下来的发展同样地莫名其妙。初期狂热刚过，新的轰动又产生了。正如 1623 年加布里埃尔·诺代所言，巴黎到处都竖起了广告牌，宣称“玫瑰十字会的主要分会代表正在本市或隐或现地逗留”(336)。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广告牌被印刷或张贴，只不过是诺代的报告而已，正是他的报告使谣言满天飞。无论如何，当时的确有大量的小册子喷涌而出，捍卫和抨击玫瑰十字会的人各执一词。隐而不现也好，难以理解也好，反正玫瑰十字会的兄弟们激起了足够多的争端，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和 17 世纪的观察家一样，现代学者对该会的看法不一致：这件事是否值得认真研究？是否应该将其视为骗局而不屑一顾？学界看法始终不一致。玫瑰十字会的兄弟们已经将秘密带进坟墓。无论其意图如何，我们在一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成功地制造了一起经久不息的“媒介事件”。

旧的“下层学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这一点令人注目。中世纪炼金术士和稍后的帕拉切尔苏斯的重大差别是，后者觉得宣传者的角色很合胃口。早期的印刷商和镌刻家是亲密无间的朋友。(337)其他号称扮演“文艺复兴巫师”角色的人，似乎也觉得宣传者的角色合胃口；这些变化无常的人物对他们初期玩弄的花招似乎半遮半露。最近问世的几种研究对于从巫师到圣贤的转变作了描述，重新评价了在特里特姆斯、阿格利帕和约翰·迪伊等人那个时代的巫术。(338)这一转变使人想起其他几种职业的突变，上文已经就此作了讨论。实际上，弗朗西丝·耶茨将巫师地位的上升和艺术家地位的上升作了比较，说明识字和学问对两者都产生了影响。(339)巫师的徒弟学会了使用扫帚和书籍以后，他们的地位大概就有所上升；他们获得了有学问的名气。如果只善于玩花招，那就只能与阴暗角落里的骗子和小偷为伍；如果出版隐秘神力的图书，那就意味着加入了学者的行列，本人就能得到饱学之士的美名了。(340)

再者，翻译古籍、破解铭文和象形文字自然与研究幻方和犹太秘籍符号联系在一起。当几何学仍然被当作“黑色艺术”，当阿拉伯数字和希腊字母仍然被视为神秘莫测时，各种高深研究里使用的著作就容易引起“巫术书”的嫌疑。(341)希伯来字母表不仅用来校勘《圣经》文本，而且在巫术中崭露头角。许多中世纪学者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为大型的图书编写参照和索引，因此，密码、离合诗字谜和字母编号等是否应该被当作犹太秘法研究的标志，这一点始终不清楚。(342)除了和手抄书文化相联系的特殊的行业秘密之外，还有许多记忆手段把记忆术搞得更加混乱。此外，由于千百年来对记忆术的依赖，人们认为，破解事物性质的线索包含在事物的名称里，这似乎成了一个合理的假设。(343)人们相信，上帝赋予亚当神圣的秘密，这些秘

密又进入了亚当命名的事物里，这个信仰常常和所谓的赫耳墨斯式传统的影响联
277 系在一起。赋予埃及书写神（希腊人称之为三次受到祝福的赫耳墨斯）的文本汇聚功能仅仅是几种文本编纂功能之一，这些功能都指向相同的方向。(344) 倘若赫耳墨斯式的文献不符合饱学之士的经验，它们是不可能对权威人士产生影响的，可惜学者们当初依靠的传播形式已经消失了。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基督教著名学者对研究犹太秘术表现出来的热情，这些学者有皮柯·米兰多拉①、约翰·罗伊希林和勒费弗尔·戴塔普尔②。(345)

直到19世纪，象形文字的隐秘意义才被解开；希伯来语元音点标记的神秘意义维持的时间略微短一点。(346) 然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希伯来研究学者比如皮柯或罗伊希林而言，埃及字母和希伯来字母里紧锁着相同的神秘魔幻性。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秘性和上帝创世的秘密是镌刻在石板上传给摩西的，亚当被告诉万物之名时接受托付要保守这些秘密。一位都铎时代的主教抱怨说，连最愚昧的巫师也吹嘘，自己的法术来自于亚当、摩西或天使长拉斐尔。(347) 这些愚昧的巫师掌握着讹误丛生的传说故事，既受到正统主教的鄙视，也受到非正统学者的鄙视。不过，摒弃他们的理据并不相同。皮柯鄙视中世纪的巫师，将其斥之为“愚昧又野蛮”(348)，因为他们呼唤亚当和摩西的名字并使用希伯来字母；皮柯谴责巫师的精神和批评家反对愚昧的历史画卷一样。人们怀疑的是巫术师而不是巫术本身。
278 换言之，皮柯看“巫术和秘术”的方式可能和他看其他艺术和文学一样。秘术受到“哥特式”蛮风的影响，正如西塞罗的拉丁语风格受到蛮风的影响一样。所以，已经混乱和错误的东西必须净化和恢复。

巫术师是千百年来古代秘密传承的接受者，他们似乎握有打开寓言知识宝库的钥匙，旧的神庙被摧毁、语言的混乱降临人世前，这把钥匙掌握在缮写书籍的祭司手里。巫术师的命运和古代崇拜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崇拜是由手抄书文化的条件决定的；远古崇拜长期受到手抄书文化的推进，但学者与印刷商兼于一身的新人产生后，远古崇拜就被取代了。

桑蒂拉纳评论耶茨的《布鲁诺》，指出“一些问题表现出神秘混杂的倾向，赫耳墨斯式的、犹太秘法式的、不可知论的、诺斯替教派的、新柏拉图主义式的、赛伯伊人③的、毕达哥拉斯式的和一般的神秘观念都混在一起，形成一股洪流，席卷整个

---

① 皮柯·米兰多拉（Pica della Mirandola），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

② 勒费弗尔·戴塔普尔（Jacques Lefevre d'Etaples，1455—1536），法兰西人文主义者、神学家、翻译家，将拉丁文《圣经》译成法文，翻译出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形而上学和政治学著作，对年青一代学者影响很大，常被誉为宗教改革前夕的宗教改革家。

③ 赛伯伊人（Sabean），伊斯兰教以前的一个民族，建立赛伯伊王国，《圣经》里称为“示巴”。

欧洲，与席卷过去一切的文艺复兴同时发生。”(349)在这里，我要再次重申，这股洪水不是“与文艺复兴同时”爆发的，而是借助印刷商的油墨生成的。我认为，它是和铸字、复制古铭文以及一件又一件古籍的出版一道汹涌而来的；初看之下，这些重刊的古籍似乎是浩瀚的乌尔知识宝库的片断。许多后基督教时期编纂的文献以及希伯来元音点的解释告诉我们，字形固定以后，其中一些文稿的神秘色彩就逐渐减少了；语法书和词汇书发行了；学术积累厚重了。在多语对照的参考书里，希腊字母和希伯来字母看上去也和熟悉的拉丁字母对等了。

然而，并非一切神秘的字母都容易在印刷过程中处理。阿尔定出版社推出希腊古籍和词汇书，为启蒙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它刊布的《象形文字集》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350)在随后的三百年里，不懂埃及象形文字的读者赋予它重要的意义。此间，大多数人能够读懂伊拉斯谟的《格言集》，而且的确读了这本书；许多读者认为这些“神圣的字钉”是古代祭司设计的，虽然它们保存了古人的智慧以便让后世训练有素的头脑去破解，然而其目的却是隐藏智慧，不让俗人知晓。(351)阿尔贝蒂把 279
象形文字描绘为“永恒的普世知识的符号，一般的文字消亡了，其意义也随之消亡，象形文字却保存下来了”(352)。其他的秘密揭开以后，神圣的象形文字更加迷人、更加神秘了。

印刷商的一种手段为伊拉斯谟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是公司的商标。这些广泛宣传的商标常常传达特殊的神秘意义，印刷商和镌刻家的圈子知道这样的意义。(353)于是，印刷商带头效法智慧的埃及人；其他有学问的非神职人员也随之效法，直到整本整本的书里充斥着用象形文字隐藏的讯息。有学识的工匠雕制的镌刻画上覆盖着罗马拱门，拱门上复制一些他们刚刚从最近的新书中吸收的象形文字。新的印刷手段和徽标缀加在象形文字上以后，过多的符号产生进一步的混乱。(353)一波又一波揭开金字塔秘密的努力不仅没有澄清问题，反而使之全然朦朦胧胧了。即使斯芬克斯之谜破解以后，其他深不可测的象形文字和镌刻仍然难以破解，比如约翰·迪伊的《摩纳斯象形文字》、玫瑰十字的徽标或歌剧《魔笛》的歌词，这些谜团还要吊足后世学者的胃口。

在印刷术的三百年里，象形文字新解的意义继续不断，这有助于解释后来赫耳 280
墨斯传统更加令人困惑的表现。这是因为伊萨克·卡萨本 1614 年证明，菲奇诺翻译的古籍是在基督纪元初期写成的，所以埃及书写神的名气并未因此而受到致命一击。(355)赫耳墨斯传统的文献有可能是在基督纪元后问世的，但透特-赫耳墨斯神显然不是在公元后形成的。他有令人尊敬的悠久历史（圣奥古斯都作了考证），他发明算术、几何、天文学和文字（柏拉图在《斐德罗篇》里作了这样的回顾）的角色已经被确认。在基督和柏拉图之前很久，透特-赫耳墨斯神就存在了；“造假”的污名丝毫不能做出相反的证明。(356)君士坦丁皇帝捐献的“伪书”断代以后反而证明，君

士坦丁皇帝没有造假。赫耳墨斯式古籍的断代说明，埃及的书写神不能为后世的造假负责。但赫耳墨斯究竟专司什么职能却依然不清楚。那块从埃及移到罗马的方尖碑上的铭文为创世的秘密提供了破解的线索吗？或者说这些铭文是否预示了后世的基督教真理呢？只要铭文尚未破解，谁能说清楚呢？

再者，《赫耳墨斯秘义书》[①]表现了古代不同时期和地点的许多作品的集合，表现了与这些作品相关的人们熟悉的问题。它们并不是一部印制的专著，没有单一的出版日期，也不是由单一的作者完成的。但17世纪的学者不容易体会到这一特点。在那个世纪，柏拉图和荷马被指控造假和欺骗，因此把他们两人用来诋毁赫耳墨斯·特利斯米吉斯图是很自然的，“那位骗子一般叫赫耳墨斯·特利斯米吉斯图，他是半柏拉图、半基督教的冒牌货，无论他的名气有多大。”(357) 然而，这一点值
281 得牢记。直到今天，学界也没有统一的意见，这批进入后基督教时代的秘义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真正的古埃及材料，还是说不清。(358) 剑桥大学的柏拉图主义者没有被卡萨本的观点完全说服，他们相信其中有一些古埃及人的教诲；和同时代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相比，这批剑桥学者的看法可能更加中肯。(359) 大主教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抱怨说：“并不含有埃及哲学的、伪造的赫耳墨斯书”被用来“解释并非哲学的古籍”(360)。然而，既然人们还读不懂古埃及的著作，我们这位大主教又怎么能够肯定，某一种哲学不是古埃及人的哲学呢？

沃伯顿抱怨的对象是耶稣会的巴洛克巨著、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②]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弗兰克·曼努埃尔称之为“拉丁文对开本的四卷巨著”、“一切时代最博学的巨著之一”。

> 象形文字被证明是古埃及智慧的秘密宝藏……基歇尔的《埃及的俄狄浦斯》充满了20种语言的引语，他证明，埃及祭司业已充分开发了……一切学问的门类。基歇尔熟悉古典文本、中世纪犹太律法、古犹太秘法、希伯来和阿拉伯哲学；通过他迂回的解释，每一个埃及图像，包括木乃伊、方尖碑、墓室、莎草

---

① 《赫耳墨斯秘义书》(*Hermetic writings*)，又称《赫耳墨提卡》(*Hermetica*)。这是一些有关骑士、神学和哲学的作品。据称出自埃及透特神即希腊的赫耳墨斯·特利斯米吉斯图(Hermes Trismegistus)。该神是文字发明者，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守护神。这些作品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出现于约1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之间，采用柏拉图对话式体裁，分两大类：“通俗的”秘义作品，论述占星术和其他神秘学科；“学术的”秘义作品，论述神学和哲学。“通俗的”秘义作品早于“学术的”秘义作品。秘义书反映罗马帝国初期的思想和信仰。在希腊化时期，人们开始不相信传统的希腊理性主义，向神和先知寻求智慧，赫耳墨斯-透特是他们求助的圣灵之一。

② 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德国耶稣会士，被称为最后一位文艺复兴人，曾在法国、瑞士、罗马等地任职，扮演科学情报中心的角色，研究范围极广，著有44卷书，留下2000多篇手稿和书信。

纸上的图像都有了具体的科学意义或神学意义了。(361)

基歇尔靠通信积累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埃及象形文字，后世的埃及学家承认他的学术贡献。(362)但由于他是耶稣会士，那个时代讨厌耶稣会的人就讥讽他的研究成果。其原因并不是人们不承认，既然象形文字尚未破译，要解读他搜集的古籍就徒劳无益。相反，相互矛盾的解读的出版物很多；新的解释一层又一层地叠压在旧的解释上。

282

到 18 世纪，一些“开明的”学者准备将斯芬克斯斥之为纯粹的迷信，将埃及人斥之为“原始的”野蛮崇拜者。(363)但其他人相信，金字塔的修建者已经掌握了测量地球、描绘天穹的精湛记述。阿尔贝蒂所谓的“普世知识的永恒符号”被赋予了新的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的意义——就像我们当代人赋予英国巨石阵新的意义一样。(364)那些神圣的镌刻文字至少被一些耶稣会士当作特别启示的神秘符号，但在“新哲学”的追随者里，其神秘—巫术意义已经丧失很多。同时，这些神秘符号从神秘和隐藏的状态转变到可以展示和观察的现象，并据此而获得新的属性。(365)在有些人的解释里，隐藏的古典保留下来，奥秘的内容被否决了。这些象形文字代表纯粹、清朗和笃定的知识，古代祭司不让普通人了解，正如拉丁文论著隐藏宗教对科学真理的诋毁一样，目的是不让一般人知道，这是 17 世纪把拉丁古籍翻译成通俗语的人所持的观点。古代智者隐藏象形文字的秘密，不让俗人知道，借以提高“自然哲学”的威望，但他们没有推进自然哲学；许多人对此作了阐述，其中之一是皇家学会的宣传家大主教斯普拉特。(366)牧师强制实施的秘密是为了防止非神职人员读《圣经》，与之同行的是审查官强制实施的秘密，意在防止欺骗。在 1641 年出版的《速记术》(*Tachygraphy*)里，托马斯·谢尔顿(Thomas Shelton)推出一种使用《圣经》和其他图书的速记法，以避免落入“血腥审查官”之手的危险。(367)象形文字可以用作圈内人欺骗审查官的速记法，而不是牧师愚弄平民的办法。倘若象形文字真用来速记，那么，其神秘意义就可能适合文人、印刷商和镌刻家的目的，有助于他们从事的秘密图书贸易。倘若它真是速记方法，其奥秘意义并不奥秘，对不懂拉丁语、希腊语或数学符号的外行人而言，它们不就是有点神秘吗？或许，正如阿尔贝蒂所言，智慧的埃及人真的掌握了一种普世语言，即真正超越各种语言边界的语言，就像夸美纽斯的图画书和莱布尼兹的数学符号超越了语言障碍一样。(368)到启蒙时代末，各种可能性都已经探索过了。没有破解的象形文字的形象既代表一切秘密的东西，又代表一切已知的东西。

283

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修正人们就文艺复兴的融合与 17 世纪批评所作的对比。据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试图

不仅废除哲学、宗教和巫术之间的边界，而且废除一切哲学、宗教和巫术

之间的边界，包括秘义书秘密、奥菲士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犹太秘法、埃及和印度的古代神秘现象之间的边界。这种超常的混杂不可能抗拒17世纪到来的批评，包括科学的和语文学的批评。(369)

17世纪的学者解决了一些谜团，分离了一些过去结合在一起但可以分离开来的成分。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学者也使人迷惑，他们冒险超越的语文学能够引领他们的可能性——很像此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尝试。我认为，这两种学者并非故意混淆不同的事物，而是试图永续一个根基很深的一神教传统，但他们被空前宏大的数据洪流淹没了，不同文化的数据混杂在一起向着他们席卷而来。

“文艺复兴对综合、融合的渴望是难以遏制的。”(370)这一点业已成为学界的常识。但正如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常被人归之于文艺复兴的东西似乎同样是中世纪的特征。从明显对立的东西中生成综合，这似乎是经院哲学家训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至少自从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的《是与否》(*Sic et Non*)、格拉提安①的《论不和谐教义之和谐》(*Concordance of Discordant Canons*)发布以来就有了这个传统。毫无疑问，与15世纪和16世纪“超常的混杂”相比，13世纪的“大全”之类的著作融合的成分显然融合得更好。部分原因可能是，虽然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常常遭到非难，但他们受教会权威的束缚毕竟少于中世纪的托钵僧所受的束缚。(371)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托钵僧掌握的配料比较少。(372)在我看来，至少可以说，这种大混杂的洪流并非来自故意清除界线的意图，也并非有意识地制造新的信仰的融合，而是为了给阅读拉丁文著作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古籍。这是中世纪传统激励的结果。于是，大量的古籍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版发行了。

有鉴于此，你难免要问，“融合的”(syncretist)一词是否真的适合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努力。融合论的言下之意是将互相对立的不同学派的思想或各色各样的材料结合起来，而这些思想和材料一直是分离的。归之于琐罗亚斯德、奥菲斯、赫耳墨斯、柏拉图和柏罗丁②的著作都是在15世纪晚期翻译成拉丁文以后流传开来的，但这些古籍还没有来得及分类。有谣言盛传，这些古籍来自一个源头，它们是尾随这些谣言问世的。后来的学术界需要努力给这些古籍断代和定位。古时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处境和16世纪神话学家的处境非常相似。本章说过，这

---

① 格拉提安(Gratian，367—383)，西罗马皇帝，包围高卢，抵御异族入侵，信奉基督教，迫害异教徒，死于暗杀。

② 柏罗丁(Plotinus，205—270)，埃及裔古罗马哲学家，创建新柏拉图主义，提出“流溢说”，著有《九章集》。

些神话学家发现，“历史和地理”混乱不堪。(373)

让·塞内克把这些神话学家描绘得“迂腐且野蛮”；与此相似，新柏拉图主义者遭到韦因·舒梅克的猛烈抨击——不是因为他们退回中世纪，而是因为他们绝不离开中世纪：“文艺复兴人的头脑在许多预设上是中世纪的或前中世纪的。”(374) 虽然舒梅克偏离布尔克哈特描绘的图式，但他所谓“中世纪”还是像布尔克哈特那样 285
带有贬义：幼稚、轻信、不能面对现实或不能区分事实与幻想。布尔克哈特是19世纪的瑞士教授，抗拒浪漫主义的中世纪精神；舒梅克是20世纪的美国教授，反对校园书店里日益增多的神秘主义内容。捍卫西方科学和理性的共同努力把他们两人联系起来了。你难免会问：他们心里看到的“中世纪”人容易受骗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接触到自己时代校园里的青年文化所产生的结果呢？这个问题有利于吸引人们注意现代人如何从理性退却去注意前科学时代人们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好处，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提出来考虑的。今天的文人（比如我）无论多么强烈地批判反科学的姿态，还得（即使是为了自己）对许多成熟学者的工作予以尊重，因为前人缺乏后来人那种后见之明。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人们对神秘主义的关心绝不是出于反科学的态度。实际上，有人似乎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对神秘主义的关心对后来笛卡尔和牛顿的观念框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375) 姑不对重要的论证作价值判断，这种论证本身就足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学和今天的神秘学有重大的差别。即使那时装帧精美而昂贵的波林根出版的图书也不能说对近代天文学、物理学或化学做出了什么贡献。

耶茨研究成果的优点之一是将诸如此类的区别说得清清楚楚。她描绘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家机敏的科学好奇心、哲学的功底和思想的训练，这一形象与后世在神秘主义里用科学做诱饵的戏水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即使耶茨也会偶尔感到吃惊，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不能区分不同文本的传统，比如马西里奥·菲奇诺“惬意地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与他自己牌号的柏拉图主义神学结合在一起”。她说：“文艺复兴时期神秘主义的哲学家有一种忽略差异、只看相似性的了不起的才能。”(376) 正是这种“了不起的才能”使舒梅克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写一种耽于“融合论和迷信”的文化；她认为，这种文化激发 286
“人脑减轻心理冲突的欲望，也就是修正分离的信息断片使紧张不复存在的欲望”(377)。

舒梅克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融合论是一种精神抚慰，旨在“减轻心理冲突”。在结束融合论的讨论前，再费点心思去思考传输“分离的信息断片”的不同方法，似乎是值得的。由于主客观的双重原因，这些方法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过去学者的眼里，它们的外观和在我们眼里的外观是不一样的。

到15世纪，许多古籍已经化为诱惑人的片断和符号。它们似乎显示出一些后

来被证明是虚假的相似性。同时，许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差异那时是朦朦胧胧的。到 15 世纪，奥古斯都划定的异教谬误和基督教真理之间的异常分明的界线已经被抹掉，且变得很模糊了。雅典和耶路撒冷的距离常有人说起，但从来没有清楚确定下来；从亚历山大城流传下来的图书可以被定位在两者之间的任何地方。各种古代文明的重构工作还不成熟，埃及、波斯、希腊和希腊化文明还不能清楚区别开来。我们能够本能地将古籍和不熟悉的文稿分别放入不同的古文化里，相反，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却不加区分地寻求一个单一的源头，他们更熟悉记忆图谱而不是地图和教材。

他们习惯于用一神教去思考远古的宗教，想象有一种单一的乌尔城的语言走在后世的语言混乱之前。(378) 在我们的眼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摆弄的素材来自于不同的学派和文化；相反，他们却认为自己在努力把单一源头、散佚破碎的文献重新聚合在一起。他们的这个信仰并非没有道理，只不过它还需要一个飞跃。这是因为在古籍的断简残篇的背后，的确可以看见某些相似性。毕竟，字
287 母编号、吟唱、图表和诗行曾经被用于记录并传播有用的数据。(379) 这些断简残篇可能会提供天体运行的统一线索；对那时的人而言，掌握地球上的自然力并非不合理的假设。

早在菲奇诺的时代之前，人们就认为古代遗存的刻画符号来自于同一个“逻各斯”，而逻各斯掌管创世，教导亚当如何给万物命名，告诉他万物的性质。(380) 11 世纪以后，脱离历史语境的多种知识体系重新进入西方，新的内容就使这一逻各斯信仰更加丰富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盖仑、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从伊斯兰和拜占庭输入西方，不同群体的学者分头努力，用令人惊叹的精深技术掌握了这些古籍。(381)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查士丁尼的《查士丁尼法典》仰仗记录和研究工作中非凡的设施和持久的合作，直到今天，其依靠的条件仍然被人忽视。古代巨人可以利用一些非凡的图书馆和丰裕的誊写劳动力，以前的学者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条件。到 17 世纪，弗朗西斯·培根谋求驱散古代巨人使后人产生的敬畏，他暗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忽视了传播领域的变化），这些巨人只不过“认为发表自己的笔记、详细记录和常识是多余之举和自讨麻烦，所以他们仿效建筑工的惯例，一旦房子修好，就立即拆掉脚手架和扶梯”(382)。在此前的千百年里，诸如此类的结构似处处繁花，突然绽放，如像著名的莱克格斯①法典或智慧女神现身。古代先知创建这样的结构时，似乎不需要脚手架或扶梯，他们必定有超自然力的特别惠助吧！

---

① 莱克格斯（Lycurgus），公元前 9 世纪斯巴达法典的创立者。

上帝将镌刻着戒律的石板授予摩西，又授予异教诗人预言的能力，并使之能够预见道成肉身；同理，上帝似乎授予古代哲人神奇的洞见，并使之能够洞悉自然的奥秘。看来这都是可能的。人们用犹太秘法探究《圣经》。由于他们接受的亚里士多德笼罩着阿拉伯和希伯来评注，正统的束缚就绷紧了。当新的印刷机释放出“滔天洪水”时，这些束缚就绷断了。最后的结果是基督教教义被净化；教会分裂以后，天主教和新教都划定了更加清晰的疆界。“巫术和秘术”研究逐渐与学术研究分离开来。如今，两者的分离完全彻底，所以我们难以想象，研究尘封的古籍和死亡的语言怎么会在历史上引起了那样剧烈的动荡。 288

研究文艺复兴的现代历史学家发现，有必要提醒读者，“解释原初的古籍时伴生出……复活的感觉”(383)。如今的我们难以捕捉住文艺复兴人的那种感觉，因为“原初的”（或曰“原生的”）一词的意义早已涤除了给人灵感的联想。一位现代语文学家或考古学家破解一段古代铭文时，他预期将要发现的往往是一张商人的提货单或一件杂货目录，而不是上帝托付给亚当的秘密。诚然，令人敬畏的力量仍然和解读自然之书联系在一起，但破解这段铭文的钥匙再也不会到研究线形文字 B 或死海古卷中去寻求了。

“像细密模仿这样的批判理论牢牢地束缚了聪明人，他们非常夸张而奴性十足地崇拜数百年前的人，这样的理论怎么会……盛极一时呢？”(384)提问的学者想要解释，在书籍之战展开以后为何还有人捍卫古人。他的回答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他说，古典的“自然衰变”主题简直是挥之不去。我则认为，更加可能的原因是：脱离了手抄书文化的环境后，这个主题转变了。虽然印刷术推进了这个主题，但它失去了与文人生活的相关意义，带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性和陈规性。(385)但在印刷术之前， 289
人们并不需要人工制造物来维持这个信念：失落与退化必然与时间的流逝相伴。只要古代学问不得不依靠手抄书来传播，它就很可能要变模糊或被抹掉，而不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放大和改进。舒梅克的观点尤其令人困惑。他说：“把‘一切自然事物精确而绝对的知识’归之于最早的作家，‘因为威望的源头从来不会淡化到满足我好奇心的地步……’”(386)他的预设是：“最远古的人必然是正确的，因为越靠近源头，溪水越纯净，错误发生在世代相继的过程中。”(387)这个预设完全符合手抄书时代学者的经验，所以它被视之为理所当然。只有等到手抄书时代终结时，古人的优越地位才需要捍卫。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手稿经过辗转誊写后，必然会产生一种更加弥散和讹误的文本传统；相反，16 世纪相继再版的机印参考书却越来越容易使用，而且也更有用。正如上文所示，后来的版本必然会补充、澄清、编码和超越早期版本里的数据。诚然，对玩古董或喜爱书的人而言，早期版本会越来越增值。但专业群体却将其抛弃，他们转向最新的版本或最新的成果，他们的业务需要最新的版本或最新的成

果。[388]况且，最新的技术资料使有些领域里的年轻人能够绕开师徒关系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早在20岁出头的时候，艾萨克·牛顿就已经掌握了所有面世的数学论文，从欧几里得到最新版的笛卡尔论文他都掌握了。于是，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并未重新体会12世纪学者的经验，对12世纪的学者而言，恢复欧几里得公理(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主要的成就。

> 我们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多亏他们的帮助，我们比他们看得远，我们忙于研究古人的论著，我们汲取其精华的思想，这些思想淹没在尘埃里，被人们忽视，我们将这些思想捡起来……使之摆脱死亡，获得新生。[389]

290 切努引用布卢瓦的彼得的话来证明中世纪人对“文明进步”的意识。这句话暗示，为何中世纪研究家质疑那些非宗教复兴的主题的特色，他们把这些主题归于早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但这段话又指明关于学术进步的一种思考方式；到牛顿的时代，人们不再将这种方式视为理所当然。当17世纪的精英“忙于研究古人的论著”时，他们的目的不是通过吃力的抄写来保存古籍，也不是靠讲演来传播古籍，亦不是靠审慎的编辑来校勘古籍，也不是为新的纲要搜集精彩的段落；而是发现前人之所作所为以便超越前人——突破前辈业已设定的疆界。与固化功能同时到来的是累积性的认知进步，这样的进步使传统的兴衰观念受到质疑。在一段著名的文字里，弗朗西斯·培根玩味这一悖论：古代是世界的青年时代：

> 我们期待更丰富的知识、更加成熟的判定时，我们寄望于长者而不是年轻人……同理，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期待的东西可能会大大超过从古代期待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更进步，储藏并保存着无穷的试验和观察……[390]

对手抄书文化的学者而言，寿命越长越容易丧失记忆，越容易糊涂，而不是被赋予更多的知识。他们可以从再发现的早期手稿学到的东西要超过从最近的手抄本学到的东西，不仅如此，失传文本的发现几乎仍然是任何领域实现突破的主要手段。在这个方面，断言“热心增加知识”以及“对阻碍知识的东西极不耐烦”是“反叛古人”的“原因”，那会使人误入歧途。[391]弗朗西斯·培根之前的千百年里，人们就表现出类似的求知欲，只不过达到目标所用的方法在印刷术之前必然不同于现在而已。在手抄书时代里，“对新颖事物的非理性仇视”也好，“对古旧的东西和经过检验的东西同样非理性的热爱”也好，都不曾进入人们崇古的心态。相反，人们的精力用在恢复古籍上，因为他们有望从古籍中找到许多仍然新
291 鲜和未经验证的材料。

> 中世纪始终存在大量的技术进步……但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前，技术进步产生的心理影响似乎比较微弱，这令人感到困惑。中世纪没有产生广为人知的技术进步观念……发明人……是找到失传东西的人，而不是设计出前人不知道的解决办法的人。(392)

在印刷术之前，所谓“前辈不知道的东西”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所以“失传的东西”常常就等于设计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倘若早期近代科学家“把自己的贡献仅仅看成是对古人智慧的恢复，是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失传的东西，以及仅限于圈内人中遗存的东西”，那未必是由于“他们想要掩盖革新的事实”。相反那是因为，在前辈生活的时代里，创新的机制刚开始与恢复的机制分离开来，刚开始获得我们今天赋予它的意义。

如今，因为“古代智慧的单纯恢复”已经耗尽了激励人的内容，所以我们可能会忽视它对古人认知进步的贡献。我们认为古人在一切领域都有卓越成就时，也有可能误解其后果。相信古人的卓越表现绝不会妨碍革新，反而促使效仿者超越他们常态的水平。在过去的黄金时代里，古人在神的启示下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成就——这样的观念将模仿与灵感联系在一起。作为新音乐剧形式的歌剧是在恢复希腊戏剧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同理，新的航海路线是在搜寻青春泉和黄金城的过程中开发出来的。连焦点透视的“发明”也可能是在重构亚历山大城失传古籍的插图的过程中产生的思想火花。只有在古籍靠机印书永恒地固化之后，“亡佚”文献的研究或原生源头的搜寻才显得格格不入，才和创造力的释放不协调，才和得到特殊的宣示不协调。

“回归古典”和“回归自然”现在被视为两个分离的主题，但对那时的人文主义者而言，这两个主题是纠结在一起的。乔托受到薄伽丘的赞许，他栩栩如生的画面被誉为文艺复兴的成就时，这两个主题就联系在一起了。“绘画纳入复兴的理论……产生了……分叉……彼特拉克的主要主题是‘回归古典’；薄伽丘与此相反，他体会到的新的主题是‘回归自然’。这两个主题在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中的纠结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393) 不过我认为，这两个口号是很晚才提出来的，不能够准确传达手抄书时代主题的意义。“回归古典”激起书籍和作者的博弈，而手抄书作者却不能玩这样的游戏，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的装订得漂漂亮亮的图书。“回归自然”也是时代错乱的用语，它带有后浪漫主义的弦外之音，指向后世学者与艺术家、学究与诗人的分割。 292

如果用潘诺夫斯基引用薄伽丘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表述：“乔托不是要艺术回归”自然，而是要艺术“从墓地回归现实”。薄伽丘这个主题并不是和彼特拉克喜欢的主题“对立的主题”。艺术和文学（15世纪的文人不厌其烦地如是说）同时

复兴，同时繁荣，正如它们在普林尼和西塞罗时代一样。[394]佛罗伦萨的画家之所以因模仿自然而受到赞誉，那是因为普林尼这样赞许过远古的画家[395]，而不是因为佛罗伦萨的画家找到了什么新的自然主义的主题。换句话说，“回归古典”和“回归自然”这两个主题还是融合的。分叉的现象从未发生。失传艺术的恢复紧紧地和古籍的恢复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洛伦佐·吉贝尔蒂悲叹狂热者摧毁古代遗存时，他心中想到的既有捣毁偶像的场面也有焚烧书籍的悲剧。“……于是，不仅雕像和绘画被毁了，人们在这种伟大、上佳和优雅的艺术训练中仰仗的书籍、评注、手册和直尺也被毁了……”[396]15 世纪的艺术家和作家认为，清除图像中扭曲的自然和清除文字里的讹误、恢复古人的著作和恢复图画的自然状态的思想携手并进。

对古人的崇敬在手抄书时代的形式和后来的形式不一样，有了这样的认识以
293 后，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变化中的对文艺复兴的认识。

> 强调的重点从宗教事务转移到世俗事务后，那个古老比方的意义就被颠倒过来了：过去认为古代是“黑暗时代”，如今古代成了“光明时代”，是必须要恢复的时代；相反，古代以后的时代反而被淹没在晦暗朦胧中了。[397]

然而，首先欢呼古代艺术和文学复兴的人，未必都注意到关注重点从宗教事务向世俗事务的转移。“光明与黑暗的暗喻”未必会“失去原来的宗教价值，因为它获得了字面直解的含义”[398]。在 14 世纪初的阿维尼翁，人们把“光明”这个比喻用于新发现的古籍，用这个比喻的人并不仅限于佛罗伦萨的诗人彼特拉克。编纂布道辞的教士们也用这个比喻，彼特拉克不喜欢他们编纂的布道辞，因为他们用其“直解的”含义。[399]至于早期人文主义者恢复古典原理的特别兴趣，那是为了求得语言的雄健或对称，求得艺术的自然比例；如果把这一兴趣当作背离“宗教事务向世俗事务的转移”，那就错了。即使哥特式风格被贬为野蛮和堕落，那也可能是时代精神渴求的表现；那时的人相信，即使上帝和天使在天上的寓所也是根据古典的路子建造的。回顾上文阐述过的一个观点是有好处的。那些相信统一的时代精神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希腊人的天在哥特式教堂和经院哲学中得到恢复了。[400]在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圆屋顶和圆形平面图呼应了阿奎那时代想象中的神圣的秩序。

后浪漫主义时代的几代人觉得，把经院哲学家的全集、中世纪的拉丁文和哥特式的教堂与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但早期人文主义者并没有这样的感
294 觉，他们没有意识到，彩绘玻璃、尖顶拱门或教会拉丁文反映了“基督教的天性”。在经院哲学的词汇或石头的怪兽滴水嘴里，他们看不见任何升华的东西。从罗马

陷落到黑死病爆发之间产生的人工制造物尚未获得古典的名分，更不会被他们当作独具特色的基督教文化的象征。混乱的句法和怪诞的意象证明异教徒造成的破坏。据潘诺夫斯基记述，彼特拉克“把基督教中世纪看作黑暗时期，这个观念几乎就是异教的观念”(401)。吉本①的确把基督教的胜利与蛮族的胜利联系起来，彼特拉克却不会这样做，“基督教的中世纪”对他全然是陌生的观念。基督教真理曾经被异族的思想遮蔽，这个观念并非“几乎是异教的观念”，而且和彼特拉克的观点更加协调。(402)像瘟疫和战争一样，汪达尔人②式的破坏仍然是上帝因为愤怒而给人的惩罚。巴别塔③、语言的混乱、古籍的失传和讹误与其他灾难同时发生。(403)一切都说明，上帝收回了他的指引。

莫姆森问道：彼特拉克用“tenebrae”(熄灯礼拜)④一词时想要说什么呢？他指的是自己致阿加皮托·科隆纳(Agapito Colonna)的信，他在信中为自己辩护，解释他为何没有提及科隆纳家族。莫姆森引述了彼特拉克这样一段话：“我不希望为了少数几位名人而让我的笔走这么远并穿透这样的黑暗。因此……我决心给我记述的历史定一个下限，截止在这个世纪之前。”接着他问道：

> 彼特拉克用“熄灯礼拜”一词是想要说什么？之所以说这个时期黑暗仅仅是因为它缺乏资源因而使历史学家难以照亮它吗？或者说是因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的灯光都熄灭了呢？”说到这个可能的原因，我们来到解释彼特拉克历史观的关键点上了。如果我们接受的是第二种解释，那就意味着，彼特拉克给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了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404)

在接受他的第二种假设(并惊叹他的假设先于爱德华·格雷⑤勋爵)之前，你 295
不妨驻足多停留一阵思考他提出的第一种假设——哪怕是问一问：为什么它竟如此随意地被抛弃了呢？“缺少资源”被莫姆森当作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但缺少资源正是手抄书文化学者最担心的事情。此外，第一种假设更像是第二种假设的补

---

①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记述从公元2世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

② 汪达尔人(Vandals)，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4世纪和5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和北非，455年洗劫罗马。

③ 巴别塔(Tower of Babel)，又译作巴比伦塔，《旧约全书》中的城市名，诺亚的后代在此修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命修建者突然操不同语言，使其不能交流，通天塔工程因此夭折。

④ 熄灯礼拜(tenebrae)，纪念耶稣受难的赞美诗晨祷，在复活节前一周最后三天的早课经和赞美经，伴随有烛光渐灭的仪式。

⑤ 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1862—1933)，英国外交大臣，奉行亲法反德政策，联合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支持国际联盟。

充，而不是一种选择。难道对蛮族入侵的惋惜不是对缺少资源感到惋惜的补充吗？正如上文稍早的讨论所示，单单解开蛮族王国混乱的编年史的困难就不应该被低估。[405]正如汉娜·格雷(Hanna Gray)所言，在彼特拉克所谓的黑暗时代里，才高八斗、品德高尚的人并不缺乏，缺乏的是保存这些人记忆的雄辩之才。[406]雄辩才能的失传就是对集体记忆的损害，结果就导致漫长的"健忘症昏迷"——彼特拉克如是说。当然，给一个时代派上一个黑暗时代的名义必然会产生消极的价值判断。这个消极的价值判断用在相对空白和黑暗的一千年里，这个漫长的一千年没有充满独特的基督教意义，独特的基督教意义是后来的人赋予它的。

"这段漫长的健忘症昏迷不会永恒。黑暗被驱散之后，我们的孙子辈就能够回头步入纯净光明的过去。"[407]彼特拉克写下这段著名的文字时，他大概没有把"晦暗的愚昧"归之于君士坦丁改宗后的基督教文化，而是指记忆的丧失，手抄书文化的学者把记忆的丧失归之于忘记神恩的堕落。[408]彼特拉克希望黑暗将被驱散，昔日的光明将被恢复，他指的是"思想文化状态的迁移"吗？是以前用来指"灵魂状态"的暗喻吗？[409]更大的可能性是，他把灵魂与思想结合在一起，认为知识是回忆灵魂上留下的印记的一种形式，他认为神的智慧是一切光明之源，他把自己对古代的仰慕归之于这个光明之源的激励。他以诗人和学者的身份关注古

296 籍的失落，尤其关注那些有关记忆术和修辞律的失传——这很可能是他的关切。他反对编纂选集和词汇小书，谋求回归"纯净"的源头——这是很明显的。他希望能够恢复真正的雄辩和罗马的光辉——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必要设想，他正在把"普遍接受的价值完全颠倒过来"，也不明白为何要说他正在完成历史解释的革命化，他仅仅是在将不久前的黑暗和过去的辉煌进行对比而已。

在中世纪修道院里，对学问的热爱与对上帝的渴望同行，世俗王国和天国之间复杂的通信系统建立起来了，把历史人物作为记忆手段以强化基督教真理的习惯养成了，这样的系统和习惯早已模糊了神圣与世俗的区别。[410]即使在最正统的宗教圈子里，关于古代的观念也包含了太多的基督教先辈和先知，也被"东方之光"照耀得透亮，也装饰了非常丰富的寓言，所以古代不可能被简单地描绘成"黑暗时代"。彼特拉克写作时，区分假托基督教先知的异教诗人和假托文人的早期基督教神父有一定的困难。两种人都对拉丁散文驾轻就熟；两种人的雄辩才能都显示，他们似乎有特别的灵感。[411]彼特拉克把黑暗时代的上限定在哪里(君士坦丁的改宗或蛮族皇帝的登基)，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但无论他把上限定在哪里，异教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道成肉身已然发生。彼特拉克所谓的黄金时代包含了耶稣受难的目击者、使徒和殉道者。耶稣受难和复活就发生在那个时代。毫无疑问，为

了把那段历史描绘成光明的时代，我们不必颠倒传统的价值；只有不虔诚的人才会把它描绘成黑暗的时代。同理，彼特拉克净化拉丁语、复活希腊语的计划和对福音真理的崇敬以及对教父遗著的崇敬携手并进——后来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作了详细的阐述。

诚然，圣哲罗姆担心自己是胜过西塞罗的修辞家，而不是很好的基督徒，彼特 297
拉克和薄伽丘似乎也为此而感到不安——后来的伊拉斯谟也因此而惶恐。[412]但如果他们感到不安，那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被颠倒了，而是因为他们的两难感情，这始终是基督教学者天职的特征，那时的基督教学者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413]问题是，人文主义者感觉到，“黑暗时代”遮蔽了西塞罗的智慧，也遮蔽了基督教的智慧。使徒和门徒的话与元老院议员的话混杂起来了；早期教父的文本和异教的文本都受损而变形了。连造物主塑造的人的外形也被笨拙的手扭曲变形了，结果，道成肉身的圣迹本身也被遮蔽了。[414]总之，穿透哥特式黑暗的冲动尚未脱离逼近基督教真理的希望。

> 意大利“复兴”的整个思想和此前那个被当作黑暗时代的观念是难分难解的。生活在“复兴”时代里的人认为自己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他们想要与中世纪历史及其全部传统决裂，而且他们深信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决裂……[415]

耐人寻味的是，这段引文里的大部分词语虽然在15世纪很流行[416]，但此后其意义就变了。“与中世纪及其全部传统决裂”的希望不再传达以下的渴望：掌握拉丁文、阅读早期教父的著作、恢复古籍或古代遗存里的图像。“革命”（正如许多人的研究所示）的含义和马基雅弗利及哥白尼原来的意思也迥然不同了。“复兴”的理念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彼得·格雷写道：“人文主义者的‘古代和百科全书派的‘古代’不是一回事，只是类似而已。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就像手抄书和机印书的关 298
系——前者是先辈，有一点老态龙钟，但两者都是同一家庭的成员。”[417]手写体被外貌相似的字钉取代，传播过程随之改变，但两者的相似性掩盖了已然发生的变化。彼特拉克希望，他的后代能够回头走进过去那“纯净而革命”境界，他的观点和孔多塞的观点是反向而行的。就启蒙时代能够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后嗣而言，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观念是保留下来了。但当运动方向颠倒过来后（以便指向一个清明的理性之光，这个理性之光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远离古人智慧的古朴源头），其含义也随之而变。学科的进步脱离了对古人学问的恢复。灵感和模仿对立，今人和古人对立。早期人文主义者自身越来越像两面神，他们以企盼的眼神同时看两个不同的方向。

这并不是要否认，意大利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大张旗鼓地利用了“属于新时代的

观念”。相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观念被用上之后经过了完全的重新定向，所以现代学者必须要实现想象力的飞跃才能够理解它起初的语境。虽然本能或“时代感”有助于完成这样的飞跃，但更为有用的做法是能够客观地测量你需要弥合的鸿沟的各个维度。手抄书时代的学者使用“复兴”一词描绘自己的文化复兴，后来，其范围涵盖印刷术、新教及哥白尼革命的变革——不加区分地使用意义不同的“复兴”，这样的延伸于事无补。柴特尔说：“那些阅读和批判中世纪文献的人并非随时或充分意识到手抄书时代和印刷时代之间的鸿沟。”(418) 这句话可以超越柴特尔所论的范围被用于许多领域，不过，它的确非常适合文艺复兴研究。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研究者常常不得不穿越这条鸿沟，但其维度却尚未有人测量，这条鸿沟的存在几乎完全被掩盖了。

299 回头看本章早些时候引用法兰克·沃恩克的那段话。我赞成的是，14 世纪和 15 世纪之间“发生了意义重大的、革命性的事情”；但我不赞同他的这一说法：“我们不妨继续将这一意义重大的、革命性的事情称为文艺复兴。”(419) 相反我建议，我们与米什莱和布尔克哈特提出的先例决裂，并区分如今“文艺复兴”这个标签之下掩盖着的不同的历史发展。(420)“文艺复兴”一词用来指一场两个阶段的文化运动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第一阶段是意大利文人和艺术家在手抄书时代启动的，第二个延伸的阶段涵盖了印刷术时代的许多地区和领域。然而毋庸讳言，当“文艺复兴”被用来涵盖印刷术引起的成群的变革时，就必然会引起混乱。这样的用法不仅遮蔽了一场重大的传播革命，而且遮蔽了这场文化运动的重新定向。其必然后果是，难以防止给尚不成熟的彼特拉克复兴赋予印刷文化的特点。印刷术以后的古代观是“完全与当前隔断的过去”，彼特拉克时代的古代观却是“濒临复兴的时期”。

彼得·伯克一篇有趣的论述对我下一章的内容是很好的铺垫。他指出，16 世纪初的改革家要求回归早期基督教的实践，这一做法既有历史的意义，也有非历史的意义。他说：这一要求表明了一种“新的历史感，因为它含有这样一种意识：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那时的改革家认为，有可能回归最早的教
300 会，我们却觉得这一想法‘不符合历史真相’——不过，那又是另一回事了”(421)。这两个不同的观点没有被分离开来的时候，矛盾的混血构造随即产生——“永恒的文艺复兴”观念就是这样的悖论。永恒的“复兴”这一用语自相矛盾。有生命的事物是必死无疑的，唯有逝者才可能会被涂油而永远保存。永恒后死亡的理念，有可能与现代学术史协调，可惜它和所谓文艺复兴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加快发展的感觉格格不入。

请注意，我这个观点意在适用于两个文化阶段：伊拉斯谟的时代和彼特拉克的时代。用本章尝试的图式来说，传播变革并不和近代历史意识的起点同时发生，而

是比近代历史意识早一百年以上。在统一的时空框架建立起来以前，此前的历史不能被确定在特定的距离之外。直到墨卡托、奥特利乌斯、斯卡利杰和格斯纳的时代，也就是说在印刷术发明一百年以后，历史的距离才能定下来。到那时，正如稍早时我们引用的米隆·吉尔莫的话所示，文艺复兴已经结束。正如大多数重要的运动一样，文艺复兴不可能是永恒的。

印刷术的保存功能延长了文献再生的过程，同时又耗尽了它的激励意义，印刷术似乎有一种消极的、很大程度上令人振聋发聩的效应。从近代文化里浪漫主义批评家万事批评的观点来看，学术性的历史学家和文艺复兴人相比而言似乎是冷酷无情、枯燥无味的人。不过有一点必须记住，从彼特拉克到瓦拉的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之所以被誉为生龙活虎的文化英雄，要归功于印刷术造就的平凡朴实的知识产业。在他们的著作发表以后，如果没有连续不断的新形式和不断增加的变革，他们今天是不可能再被誉为历史学术宗师的。他们以前的学者就不如他们幸运。

一个在时间上的巧合的历史事实产生了那个两阶段的文化运动，我们如今称之为文艺复兴。也许，我们应该玩味一个与事实相悖的命题才能够挖掘出这一巧合的深层意义。鉴于13世纪大学城里兴旺的图书贸易，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倘若那时的一位金匠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它可能会受到大学教授和布道的教士的欢迎，还会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时代的中世纪商人的欢迎。我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印刷术的发明可能会推迟到16世纪初以后，也就是发生在法国人入侵意大利、罗马城被洗劫、希腊移民群落分散以后。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运动似乎是可能的——在这样一场运动里，本土的才干、市民的忠诚、商务活动、16世纪意大利的地中海传统等属性就比较少了，而这样设想的运动就可能被誉为提供了“现代欧洲诞生的首批孩子”。倘若印刷术到16世纪以后才出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可能像是12世纪所谓的“原型人文主义”运动。如果是那样，文艺复兴运动就不是逐渐失去活力，而是迅速死亡——在兴旺之前就夭折了。

还应该记住的是（不再是与事实相悖的设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文化的兴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早期的印刷商——尤其归功于威尼斯的印刷商。在这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出版业、古籍翻译成的“通俗语”版本、“通俗语”的新著、木刻艺术和镌刻艺术以及第一条“格拉布街”的新闻业亚文化都欣欣向荣。有鉴于此，一方面要强调新媒介使文化失去活力的消极效应，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新媒介对发明力和想象力的刺激作用，我们要平衡印刷术这个新媒介两方面的功能，我们还要考虑它对提高个性意识和人格意识的贡献——个性意识和人格意识始终使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迄今依然如此。

转入下一章之前，有一个命题已水到渠成。如果设想印刷术的出现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一切重要的运动（有些媒介分析家有时就作如是观），那就错了。正如我们刚才所作的与事实相悖的遐想所暗示的那样，运动所在地、文本传统的具体内容，尤其时机的“凑巧”等因素都应该考虑在内。在早期印刷机的推动下，古典的复活在意大利实现了重新的定向。但在同样的推动下，德国却诞生了新教。

第四章
《圣经》传统的重构：为宗教改革重新布置舞台

4.1 本章概说

从1517年到1520年，路德的30种著作大概销售了30万册……这一切都和宗教思想的传播有关系，印刷机的重要意义似乎怎么夸张也不过分；没有印刷机，宗教改革这样一场重大的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和威克里夫[①]派及韦尔多派[②]不同，路德派一开始就是机印书的孩子；凭借这一媒介，路德能够在欧洲人的思想上打上准确的、标准化的、难以磨灭的印记。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人口庞大的读者群，他们用印刷术这个大众媒介去批判革命思想的有效性，印刷术用上了通俗语言，又用上了新闻记者和卡通画家的艺术……(1)

正如这一引文所示，印刷术的影响在讨论文艺复兴时常常被忽视，在研究宗教改革时更容易被忽视。在研究宗教改革的领域里，历史学家面对的运动一开始就是由印刷机的力量塑造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刷机引起的。有人说："宗教改革是第一场获得印刷机辅助的运动。"(2)不过，即使在路德举旗之前，在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欧洲基督教世界已经在借重印刷机器的力量。教会领袖已经在欢呼上帝恩赐的这种新技术——把它当作上帝的发明，它证明西方的力量是胜过愚昧异教的力量。(3)

303

①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8？—1384)，英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者，他反对《圣经》作为教皇权力的基础，抨击圣体论，由此激起新教改革运动；曾将《圣经》译成英语，其追随者世称罗拉德派(Lollard)。

② 韦尔多派(Waldensian，Waldenses)，法国南部的一个基督教派别，1170年出现，16世纪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

诚然，反土耳其的十字军东征是利用印刷术的“第一场宗教运动”，但新教运动率先开发它作为大众媒介的潜力，那倒是毫无疑问的。同样，在宗教运动和世俗运动中，新教也率先把印刷机用作公开宣传鼓动、反对现存体制的工具。为了调动大众的支持，并针对不懂拉丁文的读者，宗教改革家们写小册子，无意之间成为革命和造反的开路先锋。他们用大单张和漫画的形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们反教皇的漫画引人注目，激发了16世纪的热情；直至今天，我们在历史书中看见这些漫画时，仍然感觉到它们强大的冲击力。新教徒对这一新媒介的利用在现代学者的心目中仍然很引人注目，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

而且，改革家们也意识到，印刷机对改革有用，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承认印刷机的重要地位。在反对“愚昧的”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中，罗马人率先奏响了印刷术这个主题，将其作为自己精神优越和文化优越的证明。德意志人接过这个主题，抗衡意大利人优越的风头。谷登堡加入本土文化英雄阿米尼乌斯①的行列，由于他为反对教皇的路德派布道者、王公和骑士提供帮助，他的形象更显得高大。(4)路德本人把印刷术描绘为“至上的神恩，推进了福音传教事业”。这是典型的新教思想，他还把印刷术看作“世界毁灭前的最后一把火”(5)。和他的宗教观点不同的人可能会认为，人在世上的前途由于印刷术的问世而无限延伸，因此他们可以把印刷术和进步的启蒙联系在一起。路德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历史的前进很快就会被末日审判终结。和许多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许多稍后的新教徒在谋求战胜哥特式黑暗走向光明时，仍然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当约翰·福克斯欢呼“近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最美的发现是印刷术……对基督教会特别有利”时，他心中想到的是，“给这些迷茫的时代恢复知识”，“更新健全的古代作家的思想，否则他们的业
304 绩和教诲就会被淹没而不为人知。”(6)

然而，新教图式中赋予印刷术的划时代角色偏离了过去的历史记述。从路德开始，上帝对德意志民族的特别恩惠总是和谷登堡的发明联系在一起，印刷术使德国人摆脱了罗马的束缚，把真正的宗教之光带给一个敬畏上帝的民族。在《致帝国各界人民书》(*Address to the Estates of the Empire*，1542)中，16世纪中叶的德意志历史学家约翰·斯莱登(Johann Sleidan)发挥了这个主题，这是一部多次重印的论战之作。

> 仿佛是要证明上帝选择我们去完成一件特别的使命，我们的土地上发明了一种神奇而精妙的技艺即印刷术。这使德国人大开眼界，又给其他国家带

① 阿米尼乌斯(Arminius)，日耳曼英雄，活跃于基督纪元前后，公元9年率众击败罗马人的三个军团，使日耳曼人从罗马统治下解放出来。

来启蒙。每个人都热心渴求知识,多多少少对自己以前的迷蒙感到吃惊。(7)

英国女王玛丽一世时代的流亡者接过并利用了这一主题,使之适合伊丽莎白女王的治国术。新教徒把印刷术和兴旺发达、迅速扩张的帝国的神圣使命结合起来,指明了稍后的两种发展趋势——其一是旧世界的革命救世主信念,其二是在新世界扩张的命定说。"……印刷术将传播这样的知识:了解自己权利和自由的平民不会再接受压迫,于是,一切王国将逐渐走向马卡利亚王国(Kingdom of Macaria)那样的乌托邦境界……"(8)新教诸神在许多问题上和启蒙思想家不同。但两者都认为,印刷术是神的设置,它将永远终结教士对知识的垄断,将战胜一切愚昧和迷 305
信,将挫败意大利教皇驱使的邪恶势力,将使西欧脱离黑暗时代。(9)上帝不用利剑帮助教会,不征服他那值得尊敬的对手,而是用印刷术、书写和阅读帮助教会……世上的印刷机数不胜数,数不胜数的小木屋拱卫着高大的圣安吉洛城堡,除非教皇废除知识和印刷术,否则印刷术终将把他连根拔除。(10)

印刷术和新教似乎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了,相反,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却不是这样的,部分原因是,早期历史图式的遗存进入了当前的记述。彼特拉克去世后,印刷机才开发出来,它对"复兴"的早期观念没有影响;相反,路德尚未降生,印刷机的功能就已经充分调动起来,以后又深入到他的宗教改革观点中。而且,在路德改革的过程中,印刷机既影响思想又影响历史事件,实际上对路德反叛的第一步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路德建议就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展开辩论时,他的建议本身并没有什么革命性。那仅仅是神学教授常规的建议而已,赎罪券是辩论的问题之一,"教堂大门是中世纪人发表意见的习惯性场所"(11)。但这些论纲并没有停留在教堂门口(倘若它们真的贴过)。(12)在一位16世纪史学家的笔下,"这些论纲的出现仿佛是作为信使的天使送来的,天使把它们展现在人们的眼前"(13)。论纲出现之后6个月,路德本人在致教皇利奥十世的信中对它们的冲击力感到迷惑不解:

> 我的"论纲"为何比我的其他著作和其他教授的著作流传到如此之多的地 306
> 方,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谜。我的意向本来限定于这里的学术圈子……其措辞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论纲……使用的是学术范畴……(14)

一位现代学者认为,"本来用于学术辩论的'论纲',用拉丁文写就,怎么能够得到如此热情的支持,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个问题仍然是宗教改革史里的一个谜团。"(15)

路德的"论纲"究竟是何时在维滕堡之外印刷的?谁率先将这些著作从拉丁文译成德语然后又译成通俗语?在少数几座城市比如纽伦堡、莱比锡和巴塞尔印行以后,它们为何大批量地复制并广泛流传,他的"论纲"长期在中欧的销售榜上名列

前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们居然能够和报道土耳其人威胁的新闻争夺地盘，在印刷所、书摊和乡间集市上占了上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16] 限于篇幅，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解答。[17] 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仅仅是要人注意，从学术建议到广受欢迎的印刷品之间经过了哪些中间阶段。换句话说，这个谜团在于跳过了一些中间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看指向少数人的讯息可以被许多人获得了。如果我们想要驱散这个谜团，我们就不该从教堂门口张贴的“论纲”一步跳到公众的欢呼，而是应该一次只迈出一步，更加仔细地审视印刷商、翻译人士和发行商的活动，因为他们发挥的作用成了变革的动因。或许，我们应该在 1517 年 12 月驻足思考，特别仔细地考察印刷出版的情况；就在这个月，三位印刷商在三座城市
307 几乎同时刊布了路德著作的三个版本。[18]

路德“论纲”的出版得到了这三位出版商朋友的帮助，这是可能的。他说对自己的著作激发的公众兴趣感到惊讶，这可能是自欺欺人。在 1518 年 3 月的一封信里，他显露出对追名逐利的矛盾心态。信中写道，虽然他“并不希望或打算出版这些论纲”，但他愿意让朋友们为他宣传，请他们决定这些论纲是应该“受到压制还是应该在圈子之外流传”[19]。既然让朋友选择，他还会怀疑朋友们如何选择吗？海因里希·格林写道：“毫无疑问，路德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论纲发表的情况，这三个版本也不可能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20] 虽然当时的维滕堡还不是重要的印刷中心，但路德已经很熟悉印刷机的新威力。在为出版商编辑拉丁语和德语书籍的过程中，他已经体会到印刷机的威力。他对多种德语书市场相当敏感，发现通俗语版本的图书可以满足各种胃口的读者。[21]

我们需要研究他的讯息是如何传播开来的，此外，我们还要更仔细地看看他所谓的“学术圈子”。在这个方面，中世纪人邀请辩论的常规形式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到 1517 年，学术辩论的受众已经大大拓宽，早已超过布道坛或讲台。在宗教改革前的辩论里，已经有人“有意识地越过……大学权威，用出版小册子直接向有文化
308 的公众发出诉求”。拉韦纳的彼得(Peter of Ravenna)就是其中之一。[22] 懂拉丁语和神学辩论的文化精英已经不限于教士和教授。主持学术中心的学者—印刷商通常是非神职人员，几乎都没有大学学位。诚然，印刷商的作坊离商业路口比较近，离修道院比较远，但他们的印刷所还是吸引了当时最有学问、最著名的学者。印刷品使远距离的学术辩论成为可能。无论路德的“论纲”是否曾经在诸圣日前夜(All Hallows Eve)真的钉在维滕堡教堂的门口，看到“论纲”的都是一小群有学问的非神职人员，他们聚会的地点不太可能是在教堂，而是在都市作坊里，市民和学者在这里闲聊道听途说的新闻，看编辑工作，校勘文本，看清样。[23] 在这里，印刷商尝试新的计划，推动图书畅销。到 16 世纪初，印刷机和图书贸易路线都已具备，再加一小批追随者，你就可以在几座城镇里掀起前所未有的轰动了。

庇突斯·雷纳努斯[①] 1519 年致茨温利[②]的一封信说明,路德的小群拉丁文读者如果采用适当的策略,就可以在短期内引起反响。在这封信里,雷纳努斯向茨温利推荐一位书商,"如果书商没有其他的货,自然就会销售更多的路德小册子"。这位书商在城镇和乡村巡回,走家串户,只卖路德的书。"这实际上是强制人买书,如果有许多书可供选择,情况就不是这样。"(24) 对救赎的关切与精明的商业经和"硬性推销"联系起来了,16 世纪初的这一策略似乎并不比今天的《圣经》推销术逊色。许多宗教改革的研究成果都注意到这样一个悖论:回归早期基督教传统反而推动了近代的出现;对新媒体的精心利用则可以用来解释这一悖论。

"罕有任何一种发明能够像印刷术对宗教改革那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路德 309
"邀请人和他公开辩论,但没有人响应"。于是"像变魔术一样,他发现自己在对全世界讲话"(25)。这是一个革命因果关系的例子,一般的说,先决条件和结果的区分是难以确定的。(26) 人们似乎普遍一致认为,路德 1517 年的举动的确加速了新教的反叛。10 月 31 日"在信奉路德宗的国家里至今仍然是宗教改革的周年纪念日,这是有道理的。围绕赎罪券的争论使路德和历史的机缘走到一起:这标志着中世纪教会的终结"(27)。为了理解路德的"论纲"如何成为这样的标志,我们就不能够在维滕堡教堂门口去寻找"论纲"了。因为如果我们在那里逗留,我们就看不见那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莫里斯·格拉维尔指出,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神学辩论的传统形式已经被全新的宣传技法改变,所以德国修士路德的举动才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28)

> 路德这些论纲……半个月之内传遍德国,一个月之内传遍欧洲……印刷术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力量,宣传自然就应运而生。印刷机为路德发挥的作用相当于誊写人为威克里夫发挥的作用,印刷机使交流领域为之一变,它孕育了国际性的反叛。这是一场革命。(29)

印刷术的出现总体上看是新教革命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印刷术你就不可能"担任所有信徒的牧师"。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新媒介又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它的"魔力"使维滕堡一个默默无闻的神学家动摇了圣彼得的宝座。

在这个方面,几位权威学者将路德的命运和过去的异端人士的命运作了对比:路德有印刷术这个新的载体发布他的思想,以前的异端人士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

① 庇突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1485—1547),德国人文主义者、作家,支持宗教改革,编订了大量的古籍,著有《日耳曼事物三书》,是为伊拉斯谟著作编目和编订的第一人。

② 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提出《六十七条论纲》,否认罗马教廷权威,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解散修道院、将弥撒改为圣餐礼等。

310 这样的对比值得进一步讨论。[30]亚瑟·狄更斯认为，罗拉德派“只能成为一场流产的改革”，部分原因是“1530 年以前，它没有印刷机这个资源”[31]。你可能会问，是否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判断韦尔多教派或胡斯[①]教派。约翰·福克斯认为，毫无疑问是可以这样说的：“虽然胡斯的嘴巴可以被堵住，但上帝却开启了印刷机的布道，虽然教皇有三顶桂冠的威力，但他从来就不可能封锁印刷机的声音。”[32]但新教的论争远没有给人提供充足的指导。印刷术的出现究竟如何影响中世纪后期的异端呢？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我们在这里难以展开论述。[33]然而，前人对文艺复兴的讨论指明的一条分析思路，值得进一步追踪。换句话说，当我们将 16 世纪的剧变和以前的宗教运动比较时，牢记印刷术的固化功能也许是有用的。因此，中世纪的异端和新教反叛的区别，可以比照中世纪的复兴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区别来研究。在这两种情况下，地方性的、过渡性的影响被广泛流布的、永久性的影响取代。在这两种情况下，追寻的路子既可以回溯也可以前瞻，于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文化英雄和异端创始人的形象日益高大，且成为运动之父。这时的宗教异端是靠印刷术实施，所以它留下难以磨灭的、深远的印记，远远超过以前的异端留下的印记，印刷术至少是其原因之一。[34]

311 比如，西方教会里始终有一些裂痕。教皇与帝王不和，与教会公会议不和，又与觊觎王位的人不和。但 16 世纪英王那场离婚案粉碎了教会的团结，这是前所未有的事端；从卡诺萨[②]到康斯坦茨[③]那样的事端都没有粉碎教会的团结，即使三位教皇鼎立的时候，教会也没有彻底或永恒地分裂。“在欧洲国家中，首先用运动的形式”充分利用印刷机潜力的人是托马斯·克伦威尔，他支持英王亨利八世离婚。[35]这位首相和路德的各国朋友一样善于调动宣传者，用通俗语版的《圣经》来吸引大量的公众。诚然，即使在印刷术之前，大量发布论战的小册子也可以影响舆论，也可以使反对教皇的帝王行动得到舆论的支持，美男子腓力[④]的谋臣发动的宣传就是这样的。不过，手抄书时代的宣传运动产生影响的时间比较短，其效应具有更大的过渡性。[36]相反，一旦用印刷术实施宣传，已经出现的分裂就会进一步加深，就不容易抹掉了。

16 世纪的异端和分裂彻底粉碎了基督教世界的团结；即使在宗教战争结束以

---

① 胡斯(John Huss，1372？—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被革除教籍并被判处火刑。

② 卡诺萨(Canossa)，意大利中北部一村庄，1077 年 1 月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被逐出教会后，在这里的城堡中忏悔，以期得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宽恕。

③ 康斯坦茨(Constance)，德国西南一城市，1414 年到 1418 年，天主教第十六次普世会议在此召开，解决三位教皇鼎立的大分裂局面，1417 年会议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教会大分裂至此结束。

④ 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1268—1314)，即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作风强悍，大有作为，甚至迫使教皇驻地迁移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

后,善良的人领导的四海一家的基督教运动也不可能把分裂的碎片重新组装起来了。分裂的群体、分离主义者和独立教派太多,这些人都认为,集中的教会管制和真正的信仰是不可兼容的;不仅如此,主要的分割线已经跨海越洋,和《圣经》及祈祷书一道遍布几大洲了。安全抵达新世界的殖民者向同样的上帝祈祷,正如中世纪的朝觐者或十字军一样。然而,他们的十字架符号却已经分裂。祈祷虽然相同,祈祷的语言不再相同。新英格兰教友崇拜的形式和新西班牙的基督教兄弟在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里望弥撒的形式,显然是不一样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新教和天主教的鸿沟加深了,反差强烈的书面文化和生活方式随之产生。[37] 神学争论早已不 312
再挑起战争,欧洲和美洲的基督徒却被无形的障碍分开了,直至今天,这些障壁依然存在。

4.2 中世纪教会的结束:正统基督教的转变

持久的反教廷教会,长期的异端信仰宣传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印刷术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绝不仅限于新教的抗议或非正统教义的长期存在。正统的信仰和制度也受到影响,也应该予以考虑。

> 印刷机的发明使基督教能够破天荒第一次坚持崇拜的统一。此前,祈祷文只能够用手抄写,所以地区差异必然产生而且实际上得到宽容。此时,统一文本和题名的印刷书产生了。在一切服从罗马教廷的西方国家里,拉丁语都保留下来,成为统一的崇拜媒介;同理,整个天主教世界都可以诵读统一的文本、举行统一的仪式。同时,礼拜仪式自发的发展、变化和调适就被杜绝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崇拜仪式也就僵化了。[38]

毋庸赘言,这幅完全统一的画面把"驳杂的实际情况"描绘得过分简单化了。如上所述,君主们和教皇同样急于利用印刷术。国家万能论和教皇绝对权力论的趋势都被强化了。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①治下的领地里,教堂里吟诵的文本不完全一样,而是略有不同。[39] 然而和以前比较,你可以说,天主教的礼拜仪式的确是标准化了,以或多或少持久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至少固定了四百年左右。

印刷术使正统的教徒能够瞄准悠久的目标,礼拜仪式并不是其表现的唯一领域。教会坚持不懈地努力,使牧师掌握基础拉丁语,把教区的记事簿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教皇的敕令和公会议的指示在分散的主教管区里贯彻执行;不过在中世纪的 313
一千年里,教会取得的成绩并不平衡。相反,印刷术却使教会能够向前推进,并巩

① 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1527—1598),西班牙国王,英国女王玛丽一世的丈夫,兼并葡萄牙并任葡萄牙国王(称腓力一世),反对宗教改革,迫害"异端",加强专制统治,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遭惨败。

固上述各条战线取得的成果。[40]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的改革也受益于印刷机的威力。罗马教会不仅能够实行推迟已久的内部改革，进行更加严格的教士培训，而且可以更加成功地履行其使徒职能。让·德鲁默(Jean Delumeau)最近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16世纪欧洲的传教运动之所以需要，那是因为还有异教的遗存——晚至16世纪依然存在；在欧洲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到海外去传教的活动也在努力进行。这个主题和传播革命联系起来考虑也可能大有裨益。中世纪教会虽然很努力，但欧洲的蛮族并没有完全基督教化；当我们把手抄书文化的局限考虑进去以后，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就迎刃而解了。[41]在这个方面，宗教改革研究偶尔给印刷术留下一点余地，但几乎总是空洞无物，而且迟迟不肯引人印刷术这个主题。至于路德思想的传播，本章破题引文的作者亚瑟·狄更斯认为："印刷机的重要意义怎么夸张也不过分。"几乎总是在探讨新教的小册子时，史学家们才驻足思考印刷术。

实际上，早在路德成年之前，教会传统就已经受到印刷术的影响了。以新的形式和新的方式固化之后，正统观念必然要发生变化。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以铅印的形式出现并成为可以复兴的目标时，其生命就获得了新的一页——早在特伦托公会议上获得教会官方认可之前就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42]到13世纪，有些神学院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造成了一些困难。经院哲学的综合以更加恒久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再摒弃他的宇宙论就更困难。和经院哲学一样，当精神操练离开修道院的高墙以后，神秘主义也转变了。"精神祈祷的静思形式"开始受制于统一编定的规范手册。[43]试图激励俗人虔诚的运动比如北欧的"近代虔敬运动"，以前只具有地方性特征，此时传播到广阔的区域了。在南欧，托钵僧们布道时既用讲演又用印刷品，谈虔诚的书大量印行，其对象与其说是修士不如说是世俗大众：

> 大量的圣徒传和其他图书问世，以满足大众崇拜的需要，与此同时，在16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几十年里，大量讲内心生活的图书也出版了，意在满足俗人之需，这和修士的需要迥然不同。[44]

激励俗人虔诚的运动走在抵制新教异端运动的前面。1500年前后，西班牙戏剧性地"突然闪亮"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激起反应之前，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业已展开；此间产生的西班牙语的著作达3000种之多，直到17世纪晚期这一风尚才显露颓势。[45]与西班牙复兴相关的"精神能量"由出版商传到意大利和法国，在满足这一新时尚的同时，他们也有利可图了。[46]

布道辞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布道坛上的讲演也越来越受到印刷机新力量的影响。其中一些变化对活生生的口语构成威胁。学究味的布道人手册为布道坛的讲演制定了一些僵化的规则。对雄辩口才的追求曾经点燃古典修辞复兴的火

花，真诚的基督教热情又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一旦受到印刷品规律的制约，这一次修辞复兴的活力就被抽干了。据说，讲授新修辞规则的图书最终扼杀了灵活的中世纪拉丁口语。(47) 另一方面，旨在使教众不打瞌睡的、活泼的布道辞也特别适合这个新的大众媒介。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院长沃纳·罗勒文克①在一篇文章里说，他要把一篇布道辞复制，以便和更多的人“交流”，目的是为许多牧师提供示范，而不是要对听众和读者进行比较。(48) 作为加尔都西会会士，罗勒文克这个教派“用手势布道”。但把布道辞转化为印刷品的还大有人在。即使在去世以后，最富有才华的布道人比如萨伏那洛拉②或盖勒·冯·凯瑟斯伯格③仍然从墓地里发出他们的讯息，因为他们的布道辞文集在他们百年之后仍然继续出版发行。 315

最后的结果是，能够成为布道者的才俊之士转而成为精于宣传的人士。诚如丹尼尔·笛福所言：“布道辞针对少数几个人，印行图书却是在对全人类讲话。”(49) 笛福是英国记者、非国教基督徒和小说先锋，与16世纪初的人文主义者构成许多强烈的反差。伊拉斯谟也奏响了类似的主题。当他争取一位非神职人员的赞助时，他作了这样一个对比：那些布道者默默无闻，因为听到他们布道的只有一两个教友；而他伊拉斯谟的著作却是“世界各国都在读”(50)。

在赞颂自己著作的影响力时，笛福和伊拉斯谟奏响的实际上还是古老的手抄书文化主题的变奏曲。

> 每一个时代都讴歌笔的使徒传道功能……率先讴歌这一功能的是卡西奥多鲁斯④。阿尔昆在一首诗歌里发挥了这一功能，这首诗镌刻在弗尔达修道院抄书房的门口。圣徒彼得⑤说到孤独的……修道院生活时，心里想到的就是笔的传道功能：“他不能掌犁头？那就让他握笔吧……他不用张嘴就可以布道；他不用打破寂静就可以让主的声音在各国人民的耳朵里回荡，他不用离开修道院就可以走遍天下、巡游四海。”(51) 316

① 沃纳·罗勒文克(Werner Rolevinck，1425—1502)，德国神学家、《圣经》学家、加尔都西会会士，其神学主张趋向现代虔敬运动，著有《论贵族制度的起源》等。

② 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主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民主政权，被教会阴谋推翻后判火刑处死。

③ 盖勒·冯·凯瑟斯伯格(Geiler von Keysersberg)，德国神学家，生平不详。

④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古罗马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僧侣，曾效命东哥特王国，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维瓦留姆修道院，以保存和发扬罗马文化，强调研究非宗教书籍，以便加深对《圣经》的理解，为此收集了史地、天文、音乐、数学、农业、语法、逻辑等世俗作品，设置抄书房，配备装订工，著有百科全书式的《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指南》、《拼写法》、《杂录》、《远古史》、《论灵魂》、《哥特史》(已佚)等。

⑤ 圣徒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1092—1156)，法国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组织包括翻译《古兰经》在内的庞大的跨宗教学术工程，号召基督教学界学习并掌握希腊哲学和阿拉伯文化，著有《撒拉逊异议教派总览大全》。

与此相似，抄书房就为非神职人员新的宣传目的提供了主题。一旦利用起来，“笔的使徒传道功能”就像伊拉斯谟一样离开修道院来到人世间。到19世纪，本土的“佳音”几乎全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淹没了。即使到那时，基督教传教士仍然继续在世界的偏远角落建立印刷厂，以刊布《福音书》和《诗篇》，就像四百年前德国美因兹印刷业那样兴旺。(52)

“笔的使徒传道功能”这个观念显示，书面词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书面词被当作在人世间传教的媒介。稍后的讨论将要暗示，这一观念使基督教在笔转向印刷机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受到的伤害。它还有助于解释生产业迅速扩张的原因。15世纪罗马教会热情欢迎印刷机，因为它不但有助于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而且有助于推进教会内部的工作，罗马教会的这一态度应该和新教的序幕结合起来考虑。路德称颂印刷术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恩惠，他阐述的这个主题也深受高级教士和教皇的欢迎。据一位教士记述，红衣主教库萨的尼古拉①把印刷术誉为“神圣的艺术”，这位教士就是后来的阿勒利亚的主教贾南德里亚·德比西(Gianandrea de Bussi)。从15世纪80年代到1515年，即使大主教和教皇发布的审查敕令也赞扬这一发明是神的灵感，也阐述印刷术有利的用途；稍后，教廷才逐渐注意到有必要限制其滥用。(53)教会不仅使印刷术合法化，而且为这一幼稚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贫穷的牧师比富有的平民更迫切需要书籍。在新教反叛之前的50年里，大多数教士欢迎这一发明，因为它对教士和平民都提供服务。

317 1510年，一位纽伦堡教士写道，虽然圣灵用印刷书挖掘了隐藏的智慧宝库，但有学问的忏悔者还没有为罪人写出通俗语的指南。相反，世俗的读者得到的仍然是愚蠢的歌谣和指南，这些读物仿佛给人这样的印象：诉讼似乎比圣事更重要。他写道，为了抗衡这一趋势，他写了一本论教育的手册《心灵之镜》(*Peycht Spigel der Sunder*)。(54)无意之间，他预览了即将被描绘为抗议宗的新教运动。保守的宗教冲动要克服世俗的干扰，要指引罪人救赎，其结果却丝毫不保守，而是刊布大量的旨在宗教自助的印刷品。(55)有了印刷书以后，忏悔者的角色和忏悔的圣事带有更大的争议性，没有印刷书作为忏悔者和牧师之间的中介时，问题就没有那么多。与此同时，忏悔者的角色受到更加严格的个人标准的限制，而供牧师们给罪孽分类与开列惩戒和宽恕的指南又使正统教义的复杂和矛盾更加令人注目，如果没有决疑法上的良好训练，由此产生的问题似乎是难以解决的。基督的教义简明易懂，而官方认可的教义却叠床架屋、繁琐冗赘，两者的反差越来越明显，这就使满怀真诚天命的神职人员越来越感到压抑。教会执行的纪律和管制越来越严厉和僵化，即

①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德国枢机主教、科学家、哲学家，认为人类的认识必须依靠经验，发展实验科学，著有《论有学问的无知》，指出唯有有自知之明的人才是有学识的人。

使这样,《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还是用各种语言不断印行,《圣经》有史以来首次成为畅销书。

由此可见,虽然印刷机给宗教前程和热情注入了很大的活力,但它同时又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那就是挑起教士的斗争。同理,对保守的教士长期占有并珍视的特权,非神职人员的福音传道和俗语的布道之风也构成威胁。对印刷术释放的力量是鼓励还是阻碍,这个问题成为所有教会内部论战的核心问题。经书编辑中 318
的注疏带来的问题给这样的冲突雪上加霜,注经引起激烈的争端,《圣经》学者和神学家的纷争经久不息。鉴于由此而引起的可怕的"杀戮",你真难以想象,效率更高地复制宗教文本竟然是利弊皆有。各界人士都欢呼印刷术这一"和平的艺术",但在摧毁基督教的和谐、点燃宗教战争的烈火这一点上,谷登堡这一发明可能比任何兵法都更加可怕。我认为,早期近代的宗教动荡很重要的原因是,早期教父的著作和《圣经》再也不会以传统的方式传播了。作为神圣的遗产,基督教受到的保护不足以抗衡大多数形式的变革。基督教是靠文本传播的遗产,其宗旨是"传播佳音",印刷术革命的影响很容易对它造成伤害。

诚然,在印刷所里加工文本是平和的都市工匠和商人从事的平和的活动。然而,印刷术使许多过去被蒙混或抹平的麻烦问题凸现出来。比如,诗人不再通过吟唱或背诵进行创作时,口授或阅读一篇文本与铅印出版一本书分离开来时,口头的证词更容易清楚地与书面的证词区别开来。[56] 所以,有关上帝教会的问题和圣灵像使徒口授的问题更容易在这样的时候冒出来。福音意在靠"告诉在场的人而传播吗?"[57] 上帝的"道"在寂静中传播时、在独自一人阅读《圣经》时是否会受影响 319
呢?[58] 一切基督教遗产都记录下来了,都包含在《圣经》里面吗?其中一些遗产是否保存于"使徒直接从上帝那里聆听得来的传统里,并没有记录下来呢?是否存在于圣灵激励产生出来的传统里呢?是否靠使徒手把手地传递给我们呢?"[59] 根据传播佳音的使命,道是人人直接获取的吗?抑或是像千百年来习惯使然的那样,道是通过牧师的手、经过阐述以后才能够送达普通人的呢?然而,当世俗的语法学家和语文学家应邀到学者—印刷商的作坊里编辑古籍时,不经过斗争又如何维护这个牧师中介的古老传统呢?牧师可能会坚守在上帝与人之间担任中介的天职,但说到《圣经》的诠释时,许多编辑和出版商赞同罗杰·培根和洛伦佐·瓦拉的主张;他们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能够更好地承担注经的任务。[60]

学者—印刷商常常比同时代的大学神学家更有学问,他们不太像过去的手写人或誊写人那样顺从教士的判断。作为非神职人员,学者—印刷商效忠君主和地方官。除非得到世俗官方的支持,教士的管制对他们的强制力似乎不如宗教的裁决那样强大。他们用最鄙夷不屑的绰号去议论经院哲学家的语法和修士的学问。而且,他们的观点得到在印刷所里济济一堂的编辑、翻译和作者的支持。

1516 年，伊拉斯谟在一封信里谈及他编辑的《新约全书》时说："我证明，奚拉里[①]有一些错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也有一些错误。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但他们毕竟是人。"(61) 和新学问一起出现的是表示知识产权的作者署名的新
320 形式。基督教早期教父或天使般的神学家的声誉下降，不仅是因为回过头来看时他们被赋予的角色是文人的角色。笛福心中的荷马不仅剽窃他人的作品，而且还当老板雇佣枪手用他的名义写诗。(62) 和中世纪教士"作者"(auctores)关联的集体权威被个人化的作者观念取代，于是古代先师和圣贤的声望也随之下降。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凡人，难免犯错误，显然剽窃过他人的成果，所以古代的巨人就更像是现代的侏儒。诚如纪尧姆·比代所言，古人更像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笔下的文字常常是他们知之甚少的东西。(63) 拉米斯甚至说，亚里士多德的一切著作都是伪造的。(64) 反亚里士多德运动成为批判古人总体潮流的一部分，这样的批判既有古典的意义，也有基督教的意义。

到 17 世纪，古三语研究势不可挡地前进，人们很难再继续忽略《圣经》文本的差异。《圣经》作者的问题也很有争议了。希腊学者伊萨克·卡索本证明，"伪造的赫耳墨斯文稿"实际上是基督纪元后的作品。希伯来学者采用同样的技巧证明，摩西五经不可能是摩西本人写的。据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研究，摩西以他发现的手稿为基础写下了《旧约》里的前几卷，但实际上这几卷书的作者后来成为一些编年史家和案卷保管人。(65) 古人相信，摩西十诫是上帝在西奈亲传，认为先师摩西不过是案卷保管人的想法本身，就足以使人像泄了气的皮球。阅读清样、校勘文稿养成的心灵习惯动摇了神秘的抄书人笔下的摩西形象。

> 理查德·西蒙……首先认识到《圣经》经历过的复杂的修改和变迁过程，从写定文本以来直到近年，《圣经》都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说，《旧约》各卷经书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经过誊写人辗转复制……常有变化。他认为，在长期的抄写过程中，松散的文本纸张混杂错乱……这样一个过程摧毁了《圣经》
> 321 来自口头神启的理论……(66)

然而，这个过程既提高了对手抄书文化传播过程的觉悟，又损害了《圣经》直接来自神启的信心。于是，将古老的神启观念与新的作文方法调和起来就越来越难了。吟唱诗歌或讲故事的作文方法和神启灵感的信仰有天然的亲和性。"金嗓子"讲演者和弹琴的吟游诗人与今天的演员或器乐师有若干相似之处。他们依靠的是训练良好的记忆力和实际操练中开发的技能。然而，和现代的布道者、法庭上辩论

---

① 奚拉里(Hilary of Poitiers，315？—367？)，(普瓦蒂埃的)圣奚拉里，高卢人，基督教教义师，承认普瓦蒂埃主教，著有《论三位一体》、《论各届宗教会议》等。

的律师或爵士乐号手一样,他们给人难忘印象的手法之一就是留下大量的余地供临场即兴发挥。他们让"神灵感动自己",让自己"忘乎所以"——有时甚至达到"神疯"或"疯狂"的境地。[67] 当然,并非手抄书时代的所有作者都是行吟诗人,也有一些诗人是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而且,手摇印刷机使用的灵活性往往超过一般人了解的情况。你得到的印象是,伊拉斯谟的一些讽刺作品是自然流露、直接排印的,周围簇拥着的朋友们越过他的肩头看他校勘文本、摆弄铅字。尽管如此,如果创作时心中想到印刷机,即兴发挥就被腰斩了,这样说似乎是稳妥的。不仅是因为写作可能脱离了在听众面前表演的机会,而且一旦印刷机取代抄书人以后,无论用什么方式写作的文本都不得不经过若干文本编辑的阶段。最后一刻修改、临时想起补充,这是情急之下的行吟诗人得到的神的恩赐,对时间紧迫的编辑或作者而言,这样的机会却是一种麻烦的奢侈。由于创作尤其文学创作的冲动性越来越少,越来越回应新媒介的需要,优秀作品的标准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编辑、翻译、批评家的圈子里,真正的文采和"有灵感"的即兴创作越来越少;创作越来越多地服从修辞规则,这样的规则反映在仔细润色、没有瑕疵的散文里。越来越多的文人将这样的规则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反映在神的指令下产生的那种质朴完美 322
的古老《圣经》文本,在他们的眼里反倒莫名其妙地布满瑕疵了。[68]

"到神圣的使徒书的讲演辞和著作里去搜寻语法错误、不合语法的表达和错讹的希腊语,这是在亵渎通过使徒说话的圣灵……"这是维滕堡神学院对一位"放肆"的德意志学者的责难。[69] 既定的信念是:真正的文采是神激励灵感的象征;所以《圣经》学者面临这样痛苦的困境:要么掩盖他们业已发现的文本差异和错误,要么就怀疑《圣经》的神性权威作者。[70] 无论学者个人如何解决这一冲突,善辩的学者总是要确保读者知道真相。先知和圣徒未能达到语文的标准,继后的平庸学者和作家也未能达到语文的标准,这样的发现广泛传播开来,凡是不畏惧宗教裁判所的地区都广为人知。

> 他发现《创世纪》开篇就错谬丛生,他让你猜测他的意思,虽然他没有说出口,但他的意思很清楚:犹太教无异于伪造,犹太教没有多少万能上帝启示的证据。[71]

这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对英格兰叛教者的指控,在那个时代,"升迁的道路既可以是政治颠覆也可以是争论。不出书的教士可能会在偏远小村里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有千万条理由感谢"那些提供机会表达"虔诚义愤"的著作。[72]

另一种义愤很快就展现出来,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反教士的义愤,但他们收到 323
的必须要出书的忠告一点也不少。他们能言善辩,把神学争鸣略加变换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效地反驳了虔诚者的抗议。每当遇见令人生疑的归因和记述中混乱

的证据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相信最坏的错误，都相信有人造假。他们是印刷时代的作者，不给手抄书文化的具体情况留下宽容的余地。他们迫使自己遵守知识产权的规矩，以前的作者对知识产权的态度，自然使他们气愤。他们与在世的牧师和修士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根本没有心绪对已故的亡灵表示宽容。18 世纪的自由思想家抛弃了《圣经》学者和自然神论者犹豫的语气。他们发起攻击，直指要害，抨击基督教源头的核心神迹：

> 福音传道者在许多问题上彼此矛盾，例如耶稣的寿命、神迹、最后的晚餐的日期、耶稣的受难……总之几乎在一切事实上都彼此矛盾。早期的基督徒写了 49 篇《福音书》，全都彼此矛盾……最后他们挑选了其中的四篇……即流传至今的四篇……他们想象三位一体，而为了使之可信，他们就硬说最早的《福音书》是伪书。
>
> 他们为使三位一体而加了一段文字；正如他们编造一位名为约瑟福斯(Josephus)的史学家，并托他讲述耶稣一样……他们……编造了西比林(Sybilline)诗篇……使徒准则、书体教义……纳撒勒人玩的花招、伪造、欺骗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
> 啊，编造神迹的骗子们……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些使徒写了算在他们头上的篇章呢？如果教义可以编造的话，难道《福音书》就不能编造吗？你们自己不承认造假吗？……在当时的史学家中，没有一人提到过耶稣及其使徒的名字。承认吧，你们甚至用谎言来支撑谎言……(73)

以这一明确的宣示为标志，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神迹只不过是一帮伪造者和骗子刻意玩弄的花招，这是在逝者身上玩弄的成套的花招，目的是要奴役人的头脑；以此为标志，我们来到西方基督教历史一个关键点，人们不再将邪恶归罪于巫师和
324 鬼怪，而是开始抱怨邪恶的牧师。(74)

关于《圣经》的撰写及其作者身份的麻烦问题是新问题，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会出现的。此外，印刷术还使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更加尖锐了。比如，在整个中世纪，俗人读《圣经》的问题偶尔也引起动荡，但这样的动荡仅仅是偶尔爆发，且局限在局部地区，能够用权宜之计逐一解决，能够归罪于少数人的捣乱。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早期和后期各有不同；而且中世纪的不同地区也用不同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 16 世纪后期的低地国家，共同生活兄弟会鼓动世俗人员福音传道时，他们并没有遭遇多大的反抗；相反，在英吉利海峡那一边，在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上，却爆发了反叛和镇压，罗拉德派出了不少的殉道者。《圣经》的销售可以实现(且有利可图)以后，俗人读《圣经》的问题成了一切教士和政客必须面对的更加紧迫的问题，其形式上也更加尖锐。他们不得不作出非此即彼的决策；没有办法不明

确宣示立场;争论两边的压力剧增,妥协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这个方面,《圣经》的印行有助于理解这一现象,尤金·赖斯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

> 中世纪教会比16世纪……的教会……视野更开阔,更和蔼且包容,教义上更能容忍不同意见……教会内部的教义灵活性更有余地……在正统教义里容忍不同意见和争论……后来成为16世纪新教神学和天主教神学的种种问题,在中世纪的思想里是处在消融状态的。宗教改革时期爆发的戏剧性争端使这样的溶液结晶为两种迥然不同、互相对立的体系,它们互相排斥,坚守各自的立场,更加僵硬,比其派生源头的中世纪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75)

虽然这段文字没有提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我认为它有助于解释其 325
中描绘的发展。由于完全可能达到古老的福音传教目标,由于扩大图书市场的压力,新的决策就势在必行,而且要非此即彼。你可以捍卫教士的特权或鼓励俗人读《圣经》;你甚至可以像亨利八世那样起初执行一种政策,后来又实行另一种政策;但你不可能长期同时支持两种政策。各种教义之所以可以大致和平共存,那是因为罕有完全照办的情况,但印刷商着手印书以后,不同教义的分歧就表现出尖锐的冲突了。

再者,由于印刷术的固化功能,立场一旦确定就难以逆转。著书立说的论战延长了两极分化,小册子的论战加快了分化的进程。路德派和英国国教先行一步,天主教会当局很快就起而仿效。1622年,罗马一个天主教堂组建时装备了一间印刷所,"宣教"一词就是在这里启用的。(76)争论自身在积累能量;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看见魔鬼在敌营里作祟,魔鬼点燃了激情的烈火。不久,降低挑衅性问题的调门再也不可能降低了;笔仗的烈火越烧越旺,互相杀伐的笔杆子实在是太多了。

交叉火力虽然渐弱,但温和派还是陷入困境,他们被剥夺了中立的地位。完全倚重《圣经》的人怀疑教士权威的合法性和教会的传统,且不会就此止步。苦战的教廷保皇派毫不犹豫地攻击新教徒的《圣经》崇拜。手腕高明的耶稣会士质疑《圣经》文本可靠的依据。他们利用怀疑论的手法来瓦解人们对《圣经》的信心,借以加强人们对教会的信心。(77)据一位胡格诺教徒记述,为了拼死捍卫"不成文传统的权威",耶稣会士走极端,以至于污损《圣经》,"称之为异端之书、黑色的《福音书》、墨黑的神灵……不和的金苹果……"(78)实际上,即使在新教阵营里,《圣经》也是一个 326
"不和的金苹果"。这是因为《福音书》的作者们没有预料到尼西亚会议①上制定的教义。于是,将《圣经》与教会对立起来的三位一体论者被逼到根基摇晃的场地

① 尼西亚会议(Nicene Council),325年和787年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尼西亚(Nicea)举行的两次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制定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阿里乌斯教义(Arianism)被定为异端。

上了。

>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口号不是……和平的孵化器,而是刀剑的孵化器;这柄剑之锋利足以刺破……新教的骨节和脊髓。起初它受欢迎……被当作反抗……罗马……和特伦托公会议……如今,索齐尼[①]及其教徒在它的背后捅了一刀……索齐尼的观点……总体上为罗马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显著而诱人的目标……显然,即使对三位一体说这一最基本的教义而言,“唯独《圣经》”(The Bible Only)的基础也不牢固了。(79)

新教抨击教会权威和不成文传统,而天主教则努力瓦解唯独依靠《圣经》的主张,两者的争斗均一无所获。恢复或保存传统信仰的努力仅仅是磨砺了分析工具,而这样的工具最终却推翻了传统的信仰。

信仰的冲突最终把神学拉下马,瓦解了对基督教本身的信心,这一点常常有人论述。我并不认为,对立教会的争鸣为后世的观点铺路,而是认为,印刷术(通过使一切传播过程革命化)必然使教士们偏离以前的观点,并使之彼此不和。由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维持原状完全不可能了,因此,某种混乱是必然的后果。

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圣经》本身的地位。在手抄书时代,保存圣哲罗姆编订的拉丁文《圣经》的工作就是誊写人确保抄写无误。为此目的,教士们聘请了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誊写,鼓励人们研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频繁组织人进行审读和校订。然而,到了印刷时代,保存这一拉丁文《圣经》就是另一番意思了,那就是反对修订;于是,主张保存这个版本的人就站在尚古主义者一边去反对《圣经》研究者了,他们阻碍根据新发现要做的修订,坚持认为讹误丛生的文本很正宗。在特伦托公会议之后,他们这一立场成为天主教的官方政策;但到了 16 世纪初,这一立场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于是在 1525 年,加斯帕·斯卡茨盖耶尔[②]就用小册子发起论
327 战,反对他的老朋友奥西安德尔[③];他认为,拉丁文《圣经》完美无缺,在为教会服务的两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任何错误。(80)

在 13 世纪,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着手校勘了拉丁文《圣经》,统一采纳一个校勘后的范本。(81)到了 16 世纪,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却审查一位学者—印刷商,其实他做的工作和两百年前的校勘工作完全一样。罗伯特·埃蒂安纳陆续刊布的拉丁文《圣经》版本里的注释、索引和评注越来越多,索邦神学院神学家们的惊恐随之

---

① 索齐尼(Faustus Socinus,1539—1604),意大利神学家,反对三位一体说,认为耶稣仅为凡人,奠定索齐尼主义,对后世上帝一位论神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追随者称为索齐尼派(Socinians)。

② 加斯帕·斯卡茨盖耶尔(Caspar Schatzgeyer,约 1463—1527),德意志天主教神学家,反对宗教改革。

③ 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Andres Osiander,1498—1552),德意志基督教神学家,在纽伦堡推行路德的教义,失败后转往柯尼斯堡,后来与宗教改革的其他领袖产生分歧。

加剧。

> 他是俗人,他的编印工作失去了教士的控制,他正在校订当代普遍接受的拉丁文《圣经》,他强调……早期文献中有一些异文,他又加上……解释性注释……仅举一例他受到的审查……就足以说明:……他的评注是:"教会有权公开集会。"神学家们的审查说:"这一主张……是伏多瓦派教徒和罪人喜欢的命题,而且它还削弱了高级教士的权力。"(82)

最后,埃蒂安纳被迫离开巴黎去日内瓦,侥幸逃避了夏多布里昂敕令[①]的迫害。敕令明确禁止"印行或销售有关《圣经》的书籍、评论、评注、解释、图表、索引或概要以及过去 40 年里撰写的有关基督教的著作"(83)。但任何基督教重镇强加的教会管制都难以遏制 16 世纪的图书贸易,四十年的《圣经》研究也难以一笔勾销。然而,遏制的尝试还是实施了。夏多布里昂敕令就是欧洲基督教官方采取的一连串措施之一,意在保护拉丁文《圣经》,反对新的《圣经》研究。这些保护措施的集大成者是 1592 年的敕令,特伦托公会议以后教廷转向教皇克雷芒八世[②]钦定的拉丁文《圣经》,敕令宣告这个版本"可靠"。和埃蒂安纳的版本不同,克雷芒八世版本的拉丁文《圣经》里不含衍文,受到一系列教皇敕令的保护;敕令不允许新的修改,使"天主教徒难以进行……新的创造性工作",直到 19 世纪。(84)

由此可见,16 世纪天主教会对《圣经》研究的政策与其 13 世纪追求的政策显著不同。从圣哲罗姆继承下来的早期教父的学术传统被抛弃了或任由其退化了。世俗的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天主教教士却不由自主地阻挠这个传统,与其说是由于新教的反叛,不如说是由于印刷术构成的压力。况且,圣哲罗姆倾其学问编订拉丁文《圣经》,目的是为了当时的人更好地理解《圣经》的语言。16 世纪的教廷只授权克雷芒八世版本的《圣经》,但此时的多种通俗语已经取代拉丁语,所以这样的敕令就违背了初期教父们留下的先例,违背了来自基督本人的使徒。实际上,在特伦托公会议上,即使持反通俗语立场的主要代言人也质疑遵循古代习俗的价值,也主张变化的时代呼唤变化的政策了。(85)

16 世纪的教士们持保守的立场,即便如此,他们也难免搞一些革新,《禁书目录》、出版许可证、耶稣会的许多政策就含有革新的意思。说到革新,我们也不能不提路德派。实际上你不妨说,在印刷术诞生后的一百年里,大多数教士基本上都是保守的。当然,他们或要求改革,或希望维持现状;或谋求恢复早期的基督教习俗,

---

① 夏多布里昂敕令(Edict of Châteaubriant),法王亨利二世 1551 年 6 月 27 日颁布,旨在加强对新教徒的控制和迫害。

② 教皇克雷芒八世(Clement Ⅷ,1536—1605),意大利籍教皇,与法兰西结盟,支持法王亨利四世发动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曾印行拉丁语《圣经》及其他礼仪书。

或渴望延长中世纪晚期的习俗；然而无论他们提倡的是什么，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任何教士在福音传道问题上的任何立场都必然会偏离过去的先例，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的条件业已改变，随着福音传道形式本身的变化而变了。

4.3 福音真理的重构：拉丁文《圣经》的印行

329 “通俗语《圣经》的印行……在几个国家里远远走在宗教改革的前面，这一点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86) 大多数宗教改革研究都以路德为起点，而不是以谷登堡为起点，这已成为常规。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研究者难得驻足留意，编辑和传播福音的一种新媒介是基督教世界分裂的一个重要前提。他们常常告诉我们印刷术在新教传播里的作用，几乎不告诉我们印刷术在《圣经》传播里的先行角色。诚然，在捍卫教会、对抗新教徒的攻击时，有一些天主教学者已经注意到路德之前《圣经》印制的情况。比如，丹尼尔-罗普斯以讥讽的口吻驳斥这一个观点：《圣经》“本来应该是虔诚的教徒日日夜夜爱不释手的，如今它却隐藏在坐椅下，落满灰尘，被人遗忘”。他说，从印刷机的发明到 1520 年，“拉丁文《圣经》出了 156 个版本，德语译本出了 17 种，还不算手抄本，估计手抄本超过了一百种”(87)。如此迅速复制《圣经》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

新的书籍生产方式如何影响人们对《圣经》的信仰？这个问题几乎还无人问津，这一现象令人注目。这个问题只出现在一种场合，但其形式是颠倒的：《圣经》信仰对印刷业的影响，而不是印刷术对《圣经》信仰的影响。因此，罗伯特·金顿认为（我认为有道理），把《圣经》作为终极真理来依靠是西方印刷业发展和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88) 劳伦斯·斯通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可兰经》对伊斯兰教的功能相当于《圣经》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功能，但《可兰经》没有产生类似《圣经》的压力。他认为，“关键的要素”并非基督教新教。在 16 世纪初，天主教徒害怕《圣经》研究会引起异端，宗教改革家则害怕因为缺少《圣经》研究而产生迷信。新教要求教徒熟悉《圣经》，但基督教社会并没有口头记忆和背诵经文的流行传统，因为《圣经》的
330 语言拉丁文是业已死亡的语言。(89)

在我看来，“新教的新要求”是古老的福音传播驱力的副产品，只不过它那时首次有了用武之地。同样的道理可用来解释《圣经》的人文主义，字钉的铸造使人文主义获得新的动力。《圣经》学者怕“迷信”胜过怕“异端”，他们的异见不仅走在路德反叛之前，而且从来就不和天主教—新教的两级划分吻合。路德反叛之前就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几场论战，这样的书籍之战所争论的问题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古三语研究”，学科研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普遍接受的《圣经》文本。以学者—印刷商刊布的《圣经》为开路先锋的这场斗争，超

越了教派的界线，使天主教学者和天主教神学家分裂，在新教内部也产生了强制性的分割。

于是，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天主教徒内部就发生了争论：关于佩利根[①]和罗伊希林研究希伯来语的问题，关于法国勒费弗尔·戴塔普尔对“三位玛利亚”[②]分析的问题，关于将希腊语引进英格兰大学课堂的问题。(90) 此外，参与《圣经》研究争鸣的学者在路德反叛以后也分裂了。托马斯·莫尔成了天主教的殉道者；梅兰希顿[③]成了新教牧师。伊拉斯谟遭到路德派和新教的反对。西班牙围绕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④]的辩论呈现出同样的局面。(91) 罗伯特·埃蒂安纳被迫离开巴黎去日内瓦，但红衣主教希梅内斯[⑤]在西班牙的阿尔卡拉大学供职时完成了富有学术性的《圣经》编纂工作。特伦托公会议的决策损害了天主教的《圣经》研究，后世的学者还是继续面对来自两个阵营的教条主义的反对。

> 16世纪神学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哪一个文本才是真正的《圣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相信《圣经》绝对正确。关键问题是，哪一个文本才是给予启示的正确的文本。在反动的经院哲学家看来，希伯来语的《旧约》是犹太拉比伪造的，其根据是，马所拉版的《旧约》标注了元音，这是追加在犹太学者原版之上的记号……况且，他们相信圣哲罗姆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宠，他翻译的拉丁文《圣经》最可靠……此外，西班牙国内还存在基于反犹主义的抗议情绪。(92) 331

引文中所谓“反动的经院哲学家”指的是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他们谴责安特卫普合参本《圣经》(由普朗坦印制)的一个附录。这篇补充的论文解释和翻译希伯来语《圣经》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篇论文使卢万的一些朋友惊恐，他们劝作者删掉这篇附录。

> 如果虔诚的教徒获悉，希伯来语《圣经》的“直译”是可能的，因为这种语言缺乏元音，一个单词可以直译出几种意义，那么拉丁语《圣经》的权威就会被损害殆尽。实际上，审查官的担心有道理，因为这篇文章将要在罗马受到最严厉

---

① 康拉德·佩利根(Conrad Pellican，1548—1556)，德国人文主义者、神学家。

② 三位玛利亚(three Marys)，《圣经》里被上帝选中的三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Mary the mother of our Lord)、贝瑟尼的玛利亚(Mary of Bethany)和玛格德林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

③ 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on，1497—1560)，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④ 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数种译文分栏并排的《圣经》版本中最早的一种，1514—1517年由红衣主教希梅内斯主持，共约六百册，在西班牙完成。

⑤ 希梅内斯(F. Ximenes，1436—1517)，伊莎贝拉女王的告解神父，托莱多大主教，创建阿尔卡拉大学，提倡多语版《圣经》。

的审查。[93]

最后，这篇令人惊恐的论文由普朗坦在莱顿的新教徒女婿拉菲伦吉乌斯(Frans Raphelengius)印行，这是一个单行本，题名《犹太古事记》(*Antiquitates Judaicae*)，1593 年问世。[94]

以此为例，你可能禁不住要将天主教的西班牙、罗马和卢万愚昧的审查官与莱顿开明的新教徒作一番对比。然而请注意，这篇附录是一位杰出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撰写的，而且稍后一位新教学者遵循同样的研究路线时，一开始就遭到教友强烈的敌视。法国新教学者路易·卡佩尔提出的转写希伯来语《圣经》的理论，不仅遭到英国清教徒的批驳，而且在 1674 年新教大会上的庄重气氛中遭到更加严肃的批判，会议通过《赫尔维西同意书》(*Consensus Helveticus*)。[95] 鉴于新教倾向于直译，大会批判卡
332 佩尔并不奇怪。但对他的谴责说明，通常的公式被颠倒是多么易如反掌，使宗教改革家看起来比天主教徒更害怕过多的《圣经》研究。实际上，法国的天主教教士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真的尝试利用这个颠倒的公式。他两面开弓，既抨击新教徒，又抨击索齐尼派；他的分析思路是，“誊写人的心血来潮”使人依靠《圣经》不如依靠教会。但波舒哀[①]主教影响下的法国天主教徒对奥拉托利会(Oratorian)的理查德·西蒙并不宽容，正如瑞士宗教改革家对新教学者卡佩尔不宽容一样。[96]

除了各种出版工程引起的对抗之外，给予《圣经》研究的赞助也说明，《圣经》研究的分歧超越了教派的界线。合参本《圣经》的出版计划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天主教主持的。[97] 另一方面，东方研究和三语学术主要是得到荷兰的新教印刷所强有力的推动，天主教的印刷所难以与之相比，正如荷兰版的蒙塔诺、卡佩尔和西蒙的论著所示。在荷兰，正如许多赞同哥白尼的论著一样，相当自由的印刷所的存在而不是自由忏悔的存在对这些工程的推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98]

无论如何，区分学术性注经的《圣经》研究和《圣经》阅读的《圣经》研究似乎是有必要的。在这第二种研究领域，新教—天主教的反差是极端重要的。诚然，充分实现历史悠久的福音传道目的能得以实现，那是印刷术的功劳。然而，新教强调阅读《圣经》是救赎的必由之路，这一教义的确给读书识字造成了非同寻常的压力。另一方面，特伦托公会议之后，天主教不批准圣哲罗姆编订的拉丁文《圣经》之外的
333 任何版本，它和新教反向而行。实际上，一位近代英国的耶稣会士讨论 18 世纪天主教对詹森主义[②]的谴责时，似乎同意那常规的公式。他说，教会“认为，少读《圣

---

① 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神学家、历史学家，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新教，著有《根据经文论政治》等。

② 詹森主义(Jansenism)，17 世纪天主教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创建者为荷兰天主教神学家柯尼利斯·詹森(Cornelis Jansen)，强调宿命论，否认自由意志，认为人性本恶，被教皇圣乌尔班八世定为异端。

经》、多一些异端似乎更安全”。但他急忙补充说，“没有阻碍教育发展的欲望。”[99]当然没有这样的欲望。但新教徒认为，新教不讨人喜欢的结果还是达到了：“反对不识字的尚古主义必然是……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他们只让牧师一人读给许多教友听。”[100]

劳伦斯·斯通的《识字与教育》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他认为，给读书识字造成的非同寻常的压力是由《圣经》的特点决定的。《圣经》不像《可兰经》那样适合口头传播。这个观点指向比较宗教学里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你也许会对这个观点的某些部分提出质疑，你怀疑中世纪晚期的拉丁文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你可能会反对说，《圣经》的通俗语手抄本也在流传，基督徒也使用口头传播的形式。[101]不过你不得不同意，《圣经》和《可兰经》的基本差别就是这样的。即使对早期的基督徒，《圣经》的文字版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实际上，正是因为基督徒坚持用书面的《圣经》推动了古籍形式的重塑：从莎草纸卷转向羊皮纸。[102]

基督教长期依靠书面形式的传播，而不是口头形式的传播，其结果是，面对印刷术引起的变革时，它显得特别脆弱。“对我们而言，书籍的自然处所是物质的东西比如纸张，它既可能记在心间，也可能记不住。对阿拉伯人而言，记忆既可以付诸文字，也可以不付诸文字。”[103]和记忆相比而言，手稿更容易受到书籍生产新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口头传播一直是伊斯兰的重要传播方式，但《古兰经》还是写成了文字，伊斯兰还是用上了抄书人。另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因素是：基督教世界不仅更加紧守“用笔传播福音”的方式，而且它在接受印刷机取代笔的时候并不像伊斯兰那么不情愿。有趣的是，这一判断还可以用来讨论犹太教。到1494年，犹太人已经在伊斯坦布尔创办了一家印刷所，印刷希伯来语的书籍。相反，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看来，印制宗教书籍是罪孽。[104]

《圣经》文本兼有犹太—基督教成分的混血，这指向另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和相当同质化的《可兰经》对比，《圣经》成分的多样性特别令人注目，不同材料的数量很多，这些材料来自不同的地区、时代和语言群体。《旧约》和《新约》跨越若干世纪和文化，此外，《圣经》各卷单独抽出来看也显示出特别驳杂的质地。

《可兰经》里有什么堪与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的复杂性对等的成分吗？这部希腊文《圣经》是在埃及翻译成书的《旧约全书》。《可兰经》里有什么堪与《新约全书》里阿拉姆语布道辞和希腊语使徒书混合的对等成分吗？《可兰经》近乎《旧约全书》里的一部先知书；即使如是观之，《可兰经》也似乎更加同质化。比如，《以赛亚书》是在几百年里写成的，而穆罕默德的圣言是在几十年里发布的。当然，以赛亚这位先知从犹太人的经卷里吸取了大量的成分。然而，《可兰经》里的一切成分都经过了穆罕默德一个人头脑的过滤，是由他一个人说出的，是在他一生的时间里成型的。无论《可兰经》的阿拉伯语文本传统有多大的争论，这个传统都可以追溯到

穆罕默德身后几十年里一个地区的一种语言。相反,《圣经》涉及的先知、编年史家、《福音书》作家、语言、民俗、世纪和地区却很多,这是多么鲜明的反差啊!相比而言,《圣经》文本之谜多么复杂、断定其文本出处多难啊!在回溯并解码这些文本
335 时,你要在时间上回溯到多么渺远的过去,在空间上要回溯到多么辽阔的地域啊!

对神圣文本的崇敬激励人去进行研究,一种新技术使这样的研究成为可能。《圣经》丰富而驳杂的内容在决定西方学者探索的道路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旦掌握了这一新技术,他们就着手进行无穷无尽、似乎不可能的"唐吉诃德式"或"浮士德式"的追求。无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西方学者总是达不到目的地,无论是搜寻上帝创世的年代、使亚当堕落的果子的名称、亚拉腊特山(Arafat)的所在地或救世主诞生的年代,他们总是难以达到目的。[105]尽管如此,由于对奇风异俗地域的探险、陌生语言的掌握、考古资料的复原,各种各样深奥的研究还是得到了强大的动力。

事实上,《圣经》激发的研究大致决定了西方学术追寻的模式。比较印刷术出现前和出现后《圣经》研究的方式,这有助于说明影响知识形式的基本变迁。在手抄书时代里,《圣经》的传播很艰难(很像罗马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传播),靠的是"奴隶式"的抄写和记忆术的辅助,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辗转誊写。然而,到了学者—印刷商的手里,《圣经》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研究过程,人们逐渐逼近不断退缩的边疆。一个封闭体系即一套口头文化遗产的传播让位于不断积累的数据,资料的积累使每一代人都再深入一步,他们对过去的研究都超越前人的进步——虽然不是更了解来世,至少是更了解现世。

罗伯特·埃蒂安纳刊印的图书说明,在学者—印刷商的印刷所里编辑《圣经》时,新的发现如何快速地积累。他为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编纂索引,后来又率先编纂词典。[106]从 1500 年到 1800 年,面世的希伯来语词典超过 70 部。[107]16 世
336 纪后半叶,普朗坦着手修订《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1517—1522)。他发行的这部卷帙浩繁的新版《圣经》分五卷,附三篇参考材料,收录了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古叙利亚语的语法书和词典题名。[108]1645 年巴黎版的合参本《圣经》进一步扩容,达到高潮的版本是 17 世纪中叶英格兰的合参本《圣经》。1657 年,这部伦敦版的《圣经》的预告书吹嘘说,即将问世的新版优于过去的一切版本(后来,斯普拉特主教赞美皇家学会的论调呼应了这篇预告书的吹嘘)。[109]这个伦敦版说明,印刷术两百年之后,《圣经》研究开拓了多么辽阔的领地。这个版本用"希伯来语、撒马利亚语、七十子《圣经》的希腊语、迦勒底语、古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波斯语、圣哲罗姆《圣经》的拉丁语"印行,并因此而为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字钉。其繁复的附录说明《圣经》的印刷如何推动了现代知识产业。这些附录有:

> 这个庞大的资料库包括一个古代纪年表，由路易·卡佩尔编制，还有圣地与耶路撒冷的文字描绘与地图，收录的论述有神庙平面图、希伯来辅币、度量衡、语言与字母表渊源、希伯来成语等方面的论文；亦有《圣经》主要版本和主要译本的历史记述；变异的行文简表；还有一篇论文介绍原始文本的完整与权威等问题。(110)

这个"庞大的资料库"显示，归于摩西的文本迫使学者们回溯并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归于穆罕默德的文本并没有迫使学者们走这么远。显而易见，《圣经》的文本比《可兰经》的文本脆弱，容易受到有关作者和知识产权新形式问题的影响。(111) 对西方学者而言，《圣经》翻译过程中词语意义变化的问题比伊斯兰学者在《可兰经》研究中遭遇的问题要麻烦得多。上帝的圣言似乎越来越受制于令人困惑的变化。一代学者—印刷商获得自信后认为，他们出版的《圣经》"相当正宗"，是"希伯来语 337
《旧约》和希腊语《新约》相当权威的译文"；可是不久，另一个版本的合参本《圣经》又开始筹划，他们的自信心再次流失。有人宣告克莱门泰因合参本《圣经》(*Clementine Vulgate*)很正宗时，新教学者可能会讥笑他们是顽固不化的尚古主义者。但正是这些讥笑别人的学者早晚会觉得，大家有必要赞同一个"普遍接受的文本"(textus receptus)。这个用语不是在宗教会议上首创的，而是荷兰一家出版公司的莱顿分公司率先用于《圣经》宣传的。(112)

之所以频繁推出《圣经》的新版本，部分原因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后，上帝的圣言本身就产生了许多变异和翻译的问题，所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日益关注上帝的圣行。(113) 年轻的菲利普·梅兰希顿(在维滕堡大学就任希腊语教授的演说词里)追溯了《圣经》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文本的本源意义，他说："真正的意义将如日中天，照亮我们的心田。"(114) 然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研究越深入，围绕语词意义的争吵就越激烈。经院哲学家关于天使性质的激辩里的含糊其辞对《圣经》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学者们围绕《圣经》作者的辩论也具有同样的破坏性。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这段话很有道理： 338

> 含有大量异文的大量手抄文本非但没有导致不确定性，也没有给怀疑论正当的理由，反而为构拟原初的文本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手段。他问道："倘若两百年前恢复希腊语《圣经》时只有一种手稿……那个文本的情况能够胜过我们现在有 30000 种(异文)的情况吗？"(115)

然而，数以千计的异文并不能使事情像梅兰希顿形容的那种如日中天的澄明。《圣经》注解无休止的积累产生的结果是普通基督徒能够自己读《圣经》的感觉逐渐消磨掉，他觉得不依靠别人的解释就难以理解，就难以发现明晰的意义……《圣经》成为专家才能读懂的书，要有精致的语言学训练和史学训练才能够恰当地理解其

意义……[116]

只要书籍生产依靠誊写人的劳动，防止年轻的梅兰西顿鄙视手抄文本讹误的永久性补救措施就难以找到。《旧约全书》卷首抄写一段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这样的错乱在手抄本《圣经》里并非少见。[117]《新约全书》的大段文字里常常混杂其他的材料，尤其在为教士和牧师准备的手抄本里常有这样的错乱。用《教父名言集》之类的汇编取代《圣经》的趋势至少引起 13 世纪经院哲学家罗杰·培根的反对。[118]但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位方济各会的学者远远"走到时代之前"了。正如《查士丁尼法典》被许多词语汇编遮蔽了一样，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语《圣经》被"深埋"在叠床架屋的注解下面了。[119]

手抄书的传播过程不仅可能会深埋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语《圣经》，而且可能会掩盖其《圣经》之下丰富的文本传统。在这个方面，清流的污染和极乐的愚昧齐头并进。虽然自圣哲罗姆起，不时有《圣经》学者主张回归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圣经》，但在 16 世纪，这个念头本身纪就具有"革命性意义"[120]。为了保护这部拉丁文《圣经》，使之不被错讹污染，为了找到校勘其中的错讹所需要的文本，通常需要搜罗一切藏书的资源，搜遍手抄本学者的研究中心。本特利有幸得到数以千计的异文，而约翰·司各特①遭遇的尴尬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手稿——他想尽办法搜寻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终不可得。[121]阿尔昆使徒校勘《圣经》，但他不通晓希腊
339 语，对希伯来语也一窍不通，难以胜任。[122]况且，即使语言辅助手段和文本缺乏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以后，即使注经的学派围绕收藏的手稿形成以后，《圣经》学者还是注定要像西西弗斯，劳而无功。在安条克②《圣经》研究者和后来在威克多修道院的《圣经》研究者都不知道前人取得的成就；在他们的时代里，一个学派或教派发现的东西无法传给下一代。[123]

中世纪理论上支持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研究，但实际上这两种语言的研究走不了多远。实际上三语《圣经》的念头"发轫于奥利金③的时代"，中世纪晚期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找到了。[124]然而，到了 1498 年，当奥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准备浇铸字钉印刷这样的《圣经》时，还有人把这个工程描绘为"全然是新奇的想法"[125]。与此相似，1311 年维也纳的教会会议就已经批准在大学设置多语研究的思想，并指令设置教席。然而，在欧洲大学设置永久性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教席却还要等一段时间，等到欧洲完全恢复了这两种语言的古籍以后才能够实现。[126]大学永久性

---

① 约翰·司各特(John the Scot，约 815—877)，爱尔兰神学家、哲学家、诗人。

② 安条克(Antioch)，古叙利亚城市，位于今土耳其北部，希腊化时期重镇，使徒保罗曾到此传教。

③ 奥利金(Origen，185？—254？)，希腊天主教哲学家，以其对《旧约全书》的解释而著称，他的解释包含在六种经文并列的《旧约全书》(*Hexapla*)里。

教席新的设置、异教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联手被用上之后，古三语研究反而遭到了抨击。老牌大学很快就开始捍卫拉丁文《圣经》，竟然忘记了维也纳会议的决议。索邦神学院试图压制多语研究的教席和学术编著。尽管红衣主教希梅内斯竭力保护，但编纂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的学者还是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127] 早些时候得到教会支持的那些学术计划被后来的教会抨击颠覆了。大多数情况下，尚古主义者担心，与异端学者和书籍的接触具有颠覆性，会导致叛教。他们特别担心， 340
研究犹太经典《塔木德经》会导致污染。[128] 从长远来看，颠覆来自于其他角落。即使基督教学者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搜求纯净源头的努力也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复杂情况。他们的追求非但没有减少人们对圣言的困惑，反而使之有增无减。实际上可以断言，喜欢平和、讨厌神学争端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虽然只静悄悄地研究《圣经》，但他们打破旧秩序的影响很大，其效应并不亚于高声鼓噪的好斗的新教徒或拥护教皇的天主教徒。

1517 年初，伊拉斯谟展望一个新黄金时代的曙光，论述复兴最优秀学问的“共谋”；他很自信地说，他和朋友们对时代的贡献相当于“圣哲罗姆为他留下的遗产：恢复并净化基督教传统”[129]。回过头来看，伊拉斯谟的乐观主义似乎有一点滑稽，不仅是因为他未能预见到维滕堡一位神学家引爆了“修士的争吵”，而且是因为他看不清自己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和印刷商密切合作（或者正是因为太密切，所以他缺乏预见的眼光），但他并未充分估计到他掌握的新力量；早期教父看到这样的力量，路德将这些力量转而用于其他目的之前，也得心应手地驾驭了这些力量。在这个方面，从表面价值上去评价伊拉斯谟的自我估计是不对的，太忠实地追随他的领导，过高估计他与圣哲罗姆的契合也是错误的。诚然，学者型的人文主义者与早期基督教圣贤在“精神上的契合”是不能够忽视的，但圣哲罗姆的研究与弗洛本印刷所之间的物质差距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要把宗教改革放进恰当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正确评估两者的距离。[130] 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回头向早期教 341
父寻求指引。他们忠于早期的基督教传统，有意识地承担复兴的任务。他们无意之间成了革新者。他们达到“改革”目的所凭借的媒介很新颖，最终产生迥然不同的后果的正是印刷术这一新媒介。

《福音书》应该如何研究的问题富有争议，《福音书》应该如何传播的问题同样富有争议。当我们从前一个问题转向后一个问题时，印刷术造成的分裂性压力就更加明显。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黄金时代必然是短命的，教士们的尖锐分歧是阻挡不住的。在他编订的《新约全书》的序文里，伊拉斯谟有力地表达了福音传道的使命意识：

> 我希望每一位妇女都读《福音书》和《使徒书》……我希望这些书翻译成每

> 一种语言……不仅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而且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都能够读懂这些书……我希望农夫一边耕地一边吟唱其中的片段，织工随着织布的梭子的节奏吟唱……行路人讲《圣经》故事……能够解除旅途的劳顿……[131]

勒费弗尔·戴塔普尔根据伊拉斯谟这番话的意思推出法语版的《新约全书》。他本人继续留在天主教会里，但他的法语版《圣经》并没有留在天主教会里。这部《圣经》上了教廷颁布的禁书目录，经过加尔文教徒之手以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132]在印刷时代里，那些翻译出版通俗语《圣经》、只想借此追随早期教父的人注定要把早期教父抛在后面。后谷登堡时代的翻译家发现，即使他们声称早期教父的先例在自己一边，而且这一说法似乎还有道理，然而他们实际上在服务于相信国家万能论的君主和主张改革的新教反叛者，为他们开辟了新的道路。

伊拉斯谟满怀希望地讨论出版凯尔特语或土耳其语的《圣经》时，他仅仅是在追随前人引导的路子。拉丁文版本《圣经》(Vulgate)这个词本身提醒我们，圣哲罗姆把《圣经》翻译成了他那个时代的通俗拉丁语。与此相似，继圣哲罗姆版的拉丁文《圣经》以后编辑的多语版《圣经》要求编者掌握若干古代语言比如叙利亚语、埃塞俄比亚语、波斯语，这说明早期教会鼓励用通俗语翻译《圣经》。即使在印刷术广
342 为人知以前，一位胡格诺教徒已经在1554年说，依靠圣灵的恩惠，凭借听众能够听懂的语言，使徒们在布道时已经把《福音书》"烙印"在听众的心上了。由此可见，教徒的错误不是来自读《圣经》，而是来自阅读拉丁文的有学问的神学家比如教皇![133]在特伦托公会议上，反对通俗语《圣经》那一党人难以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历史佐证，因而不得不步步牵强附会；相反，福音改革派能够自信地回顾历史。使徒保罗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可以引用保罗的话来反对教皇保罗二世。[134]即使今天，新教史学家也能够很自信地研究早期教会的惯例，能够发现清晰而可靠的先例。相反，自从特伦托公会议以来，天主教徒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含糊其辞了。[135]

> 把《圣经》的每一卷都交给儿童捧读，这是4世纪《宗徒宪章》(Apostolic Constitution)的训示……除了在教堂里由教士诵读之外，《圣经》通过销售途径流通，圣奥古斯丁如是说……原则一目了然：在基督教化形成的年代里，有通俗语的《圣经》流通……教会期待非神职人员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教堂里听教士诵读《圣经》，也期待他们在家里阅读《圣经》。[136]

对格林斯莱德这位牛津大学利吉乌斯教授来说，"原则一目了然"。赞同伊拉斯谟的教士们在特伦托公会议上坚守这条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但特伦托公会议以后，天主教学者却可能说，早期教会的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137]有趣的是，这样
343 的意见分歧遵循特伦托公会议上争辩的路子。和通俗语翻译运动同行的信念是：福音真理质朴简明，普通人是能够理解的。牧师的唯一角色是尽量清楚地传递上

帝的圣言。《圣经》应该剥离一切浮华夸张的辞藻，不假虚饰地展开在教徒的面前，应该用日常语言来表达。一旦新的教义与清晰明白的文本、简明扼要的宣教和开放的书籍联系在一起，天主教的反应就是走相反的道路，就为神秘化、精英主义和审查制度辩护。天主教捍卫拉丁语不仅是因为教会传统珍惜用拉丁语布道，而且是因为它可以将神秘掩盖起来，使之不受渎神的沾染。[138] 印刷机的力量可以用来提高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必须牢牢控制在审查官的手里，以便使非神职人员服从。[139]

刻意培育神秘气氛，坚持不让猪一般的大众得到智慧之珠，尤其强调高雅的教士和没有文化的俗人的区别，这是特伦托公会议上反对通俗语《圣经》主张的特点。“看一看 1546 年 4 月 8 日的教皇敕令，你就会明白为何直至今天，无数的天主教徒仍然对《圣经》一无所知。”[140] 即使在允许通俗语翻译的地方，即使在新教统治者控制的土地上，天主教的《圣经》也用了大量的拉丁文和繁复的词语。一位英格兰天主教学者对他的教会政策作了这样的解释：“唯有简明的《圣经》文本才被认为是有害的。”[141] 然而，如果认为俗人手里的简明《圣经》有害，这就是助长糊涂和困惑，就是剥夺俗人直接接触圣言的机会。反过来，如果对福音传播抱忧心忡忡的态度，设置障碍防堵早期教父先例的事情必然就会发生。

常有人指出，新教的政策比天主教改革家的政策更加紧密地遵循早期基督教会的模式。不过，特伦托公会议后的天主教政策和中世纪教会的政策迥然不同，这 344
一点无论怎么反复重申也不过分。中世纪教会的教义似乎比罗马帝国时期教会的教义更有精英倾向和神秘倾向，这固然是事实；但这种教义变化和语言的变化、新俗语的兴起以及教会法的发展都可以归于同样的因素。教会的准知识垄断以及教士和俗人属于不同派别的区分，与其说是刻意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历史条件使然。姑不论一波又一波野蛮人的入侵，单就说靠手抄书的传播手段来维持基督教信仰一千年不变，那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源源不断地为各地提供既通晓拉丁语又能够处理日常教务的牧师，这个任务本身相当困难。满足俗人教育的需要，哪怕是不正规的、时断时续的需要就更加困难了。换句话说，在罗马帝国解冻以后，俗人实施的福音传播事业也断断续续，主要原因是：印刷术出现之前，这是福音传播的唯一方式。

尽管如此，在 16 世纪前，推进俗人从事的福音传播事业时，没有必要总是回到早期教会里去寻找先例。新教学者强调指出罗拉德派和胡斯派受到的迫害，常常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反宗教改革的政策是中世纪教会的特征，这个时期的教会不让俗人接触“基督教的记述”[142]。但如上所示，16 世纪前，教会在通俗语《圣经》上的立场比它在 16 世纪以后的立场灵活。比如我们还记得，1235 年，巴黎大学发起编纂了法语版《圣经》，这个由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翻译的版本似乎更传统，而不是

更先锋。[143]共同生活兄弟会更接近许多宗教改革家的生活，这个兄弟会以俗人身
345 份传播福音，并没有受到禁止。

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创建者杰拉德·格鲁特是狂热的爱书人。他一开始就“积极推进读书”，使之为兄弟会的运动服务。[144]这场运动把非常规的推进俗人识字的运动和比较官场的修士般虔诚结合起来。所以，共同生活兄弟会提供的书籍和学习并非仅仅是为教士服务的。即使这场运动里比较讲究学术的一派即温德舍姆修道院也为通俗语布道辞和小册子的产生作出了贡献。[145]就像修院的誊写人抄写的《效法基督》一样，兄弟会的启蒙书和祈祷书以异乎寻常的连续性从旧的抄书房和新的印刷机里流淌出。[146]伊拉斯谟在青年时代就获益匪浅。

格鲁特在低地国家创建的共同生活兄弟会仅仅是中世纪晚期兴盛一时的俗人推进的福音传播运动的象征之一。也许，基督教的罗马为中世纪晚期的宽容和中世纪以后的不宽容的强烈反差提供了最鲜明的例子。意大利的教会“没有对《圣经》翻译表现出敌意，没有对将《圣经》翻译成意大利民众的语言设置严重的障碍”[147]。在此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用比较的眼光考察这个问题，而不是用英美人那种熟悉的眼光看问题大有裨益，所谓英美人熟悉的眼光就是认为，对罗拉德教徒的迫害是当时各国的惯例。15 世纪已经有许多通俗语版本的《圣经》，德意志和意大利尤其多，其他语言的也多；这就说明中世纪后期教会的政策给地方的主动性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148]

346 印刷术出现之后，控制或削减通俗语《圣经》和祈祷书生产的努力随地方当局的决策而各有不同。但机印《圣经》和祈祷书的生产构成了新的问题，于是，新的审查形式就被设计出来去对付这些问题。第一个里程碑 1485 年出现的地方正好是谷登堡印制《圣经》的地方。美因兹的大主教发布命令，要求一切德意志通俗语译作必须要获得特许后才能够出版。[149]接着，教皇发布了一系列相应的诏书和敕令，说明教廷对印刷术危险的担心日益增长，帝国内的担心尤其突出。这些措施以利奥十世的诏书为终极的顶点，诏书决定实施普遍的审查制度，这就是 1515 年 5 月 4 日第五届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以后发布的诏书：

> 可能是受到围绕罗伊希林的争论的影响，利奥十世发布诏书，要求审查一切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古巴比伦语翻译成拉丁语以及从拉丁语翻译成通俗语的著作。主教及其代表或异端裁判所负责实施这样的审查制度。诏书惋惜地说，印刷术给读者提供的书籍……促成了信仰上的错误和日常生活里的错误……教会看到紧迫的危险，认为魔鬼“可能会一天天越来越猖獗”(的确是这样的)……[150]

于是，即使在路德反叛之前，罗马教廷已经决定反对印制《圣经》，而且在宗教

裁判所的支持下提出了新形式的审查制度。1520 年的皇帝诏书和教皇敕令旨在控制新教异端的传播，禁止的对象是路德派的著作而不是《圣经》的翻译。但路德的异端也导致未获许可证的《圣经》版本和通俗语的译作。早些时候，地方性措施已经很快两极分化为新教和天主教两条路线。到 16 世纪中叶，神圣罗马帝国、法 347
国和西班牙分别针对《圣经》的新版本和翻译本发布诏书和敕令。接着，反宗教改革的教廷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而持久的措施。[151] 1559 年，保罗十世发布的禁书目录重申了一切禁令；《圣经》阅读和《圣经》印刷特别被纳入禁令的十大规定里；1564 年，庇护四世颁布的《禁书目录》首次做出这样的规定，以后的一切《禁书目录》都重申了这一规定。[152]

特伦托公会议以后，教会采取这些措施，给意大利天主教严肃的《圣经》翻译画上句号，使这样的工作停顿了两百年。[153] 潮流的逆转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反弹。威尼斯的印刷商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新的禁令使他们原来的畅销书也卖不出去了。[154] 自此，意大利俗人的福音传播事业就和秘密的图书贸易联系在一起。[155]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情况更加混乱。天主教国家的国家至上论统治者竭力不让特伦托公会议的敕令处处得到贯彻。新教地区的天主教教士想要用自己的《圣经》译本对抗异端的译本；这些天主教译本得不到官方支持，且常常被投以怀疑的目光，但它们并没有在每一个地方停顿。况且，特伦托公会议上的意见分歧极其错综复杂，存在模棱两可之处，给地方也留有机动的余地，所以至今仍然难以厘清，特伦托公会议宣告“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真实可靠”的意图究竟是什么。[156]

尽管意见分歧，罗马教廷规定的指导方针，以及维持拉丁文《圣经》，坚持在教堂使用拉丁语的主张，还是在天主教地区普遍占了上风。因此，在印刷术的第二个世纪里，很少有天主教的统治者支持通俗语《圣经》的出版。“罗马教会不出版通俗语《圣经》，但在它觉得受到新教《圣经》译本威胁的地区，却例外发行自己的通俗语 348
版本，目的是用自己适应天主教教义的《圣经》取代新教的《圣经》。”[157] 此外，在天主教地区出版通俗语《圣经》常常会遭到迫害和监禁。通俗语《圣经》一般是在国外或非正统教义的支持下出版的。所以，西班牙译文的《圣经》是在伦敦、日内瓦、巴塞尔和阿姆斯特丹印制的；在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西班牙译文的《圣经》是在印制希伯来文出版物的印刷厂里印制的。新教徒焦瓦尼·迪奥达蒂(Giovanni Diodati)那著名的意大利语版《圣经》是在日内瓦印制的。法语《圣经》“几乎全部是在国外印行的”，或者是里昂出版商用假地址秘密印制的。[158] 连盎格鲁—天主教(兰斯—杜埃)版《圣经》也不是在英格兰印制的。一种通俗法语《圣经》工程(短时期内由路易十三批准的)激起一场成功的反抗运动，题名《俗气不能染指的〈圣经〉，亦名禁止俗气的〈圣经〉》(*The Sanctuary Closed to the Profane or the Bible Prohibited to the Vulgar*)一书的出版使反抗运动达到高潮。[159]

一切主张改革的教会都采用通俗语《圣经》、祈祷书和教义问答书，这一点和天主教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凡是和罗马决裂的统治者无不官方正式批准印行通俗语翻译的《圣经》，这仅仅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于是在新教国家，这些新译本就进入民族文化的主流。因此在英格兰和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潮流刚好是颠倒的，这一点耐人寻味。(160) 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多次发布敕令，禁止法语《圣经》和《诗篇》；与此相反，自罗拉德派以来被禁止的《圣经》英语译本，到了克伦威尔主政和托马斯·克兰麦①掌教的时期却获准印行了。逆转的时机至关重要。因为印刷术出现之后，启蒙书、教义问答书和各种教材都可以统一，全国统一的字钉可以长期定
349 型了。

在英格兰，国王不仅钦准通俗语《圣经》和《英国国教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而且恩准语法书和启蒙书，这些书以统一的通俗语形式为世俗的阅读、教育和宗教铺平了道路。

> 陛下的旨意是确保臣民一致的民意，以及纯净而真正的宗教和谐：他对青少年臣民的温情深入到教育领域，意在用绝对统一的学识培养青少年……考虑到年轻人迷惑与混乱及稚嫩的心智……凭借各种语法规则与技术来培养年轻人。(161)

以上文字引自威廉·利利(William Lily)1542年出版的著名的《埃及语词类导论》(*An Introduction of the Eyght Partes of Speche*)。三年以后的1545年，一本钦定的启蒙书问世，由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出版，“目的是要避免成泛滥之势的各种各样启蒙书……在我们的一切领地里实现启蒙书秩序的统一”(162)。这本钦定的小书将一个指南送到英格兰读者的手里，一举多得，为统一的事业、英国国教和普及教育服务。(163) 瓦卢瓦王朝和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耶稣会的《学校课程表》和斯特拉斯堡的路德以及创办胡格诺学院的加尔文派推进的教育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圣经》研究问题上，天主教和新教的做法却形成强烈的对比。《圣经》研究整合进了新教教育的各个阶段，相反，在耶稣会的学校里，阐释《圣经》的任务由神父和神学家来承担。(164) 天主教的修订版教义问答书是响应特伦托公会议的敕令完成的，旨在呼唤改进初级宗教教育，其对象是牧师和神父。英格兰儿童习惯印刷文字很久以后，法国儿童学习教义问答书主要还是靠口头练习。实际上，在1570年之前，巴黎一直没有印行特伦托公会议批准的罗马教义问答书的完整的本子。(165) 等到18世纪70年代耶稣会解散之后，法国人才共同

---

① 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6—1556)，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支持英王亨利八世推进宗教改革，促进英文版《圣经》的出版，主持出版《讲道集》和《公祷书》。

努力设计一套更加统一的新教育体制。法国战胜地区方言的差异是在反教士的斗 350
争中完成的，以此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世俗教育体制才建立起来。(166)

尽管法国教会有爱国情怀，并敌视极端的教皇至上论，但它从未像英国国教那样完全整合一体，凝聚成一种民族文化。波舒哀用法语布道，但他的布道辞从未出版发行，不能够像集会或独处时朗诵的《圣经》和祈祷书那样进入同胞的脑海和心田。胡格诺教徒被驱逐以后，波旁时代的修辞以团结为主题："一位国王，一种信仰，一种法制。"虽然法国的宗教一致性和英国对异见的宽容似乎反差明显，但英国教会与政体牢固黏合的特征是法国教会不具备的。(167) 和英国的情况不一样，法国有一个语言屏障的隔阂，宗教仪式的用语一直是拉丁语，法律用语却已经改用通俗语。希腊罗马著作转换成了法语经典，所以普卢塔克①和蒙田一样进入了法国的主流文学。但《圣经》却游离于法国的主流文学之外。拉辛②听说过萨希(Isaac le Maistre de Sacy)优美的译本，但这个译本绝对达不到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的水平。和法国的世俗《圣经》阅读一样，萨希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国的詹森主义。(168) 詹森主义遭到教廷谴责时，这个译本就不再流行了。

> 法国缺乏一个标准的法语《圣经》译本，其后果之一是，《圣经》的表达方式 351
> 没有像嵌入英语那样嵌入法语。由于《圣经》文本没有固定下来，法语引文就
> 来之不易。对大多数有文化的法国人而言……权威文本是拉丁文《圣经》，帕斯卡版本或纪德版本《圣经》的读者知道，法国人多么喜欢用拉丁文的引语。(169)

斯图亚特王朝时，忠于王室的纽带断裂，内战爆发，但英国人知道，无论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分裂，他们还是继续从同样的《圣经》文本吸取资源，还是操同一种语言。即使《圣经》本身成为争论的焦点后，冲突各方还是用相同的语言征引相同的章节和诗篇。在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庄重仪式上，弑君者的激情正是来自于钦定本《圣经》那铿锵悦耳的韵律。除了法律书和编年史之外，《旧约全书》里的先例自然涌上心头。18 世纪的法国人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行刑的场面则迥然不同。他们很难得征引《圣经》里的先例，断头台周围的观众手里没有祈祷书。吟诵诗篇的激进者涌上法国街头的场景，要回到 16 世纪才能够看到短暂的一幕(在短暂的宽容期里，马洛-贝扎的著名《诗篇》获准在胡格诺教派里流通)。(170) 塞巴斯蒂安·梅西埃(Sébastian Mercier)写道："倘若罗伯斯比尔出场时腋下夹着《圣经》，并以此号召

---

① 普卢塔克(Amyot Plutarch，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②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安德罗玛克》、《爱斯苔尔》、《菲德拉》等。

同胞们皈依新教，他或许能成功。”[171]然而，倘若这一幕真的发生，法国几百年的历史就得推倒重来。况且，到18世纪晚期，巴黎的工匠很难得把古老的《圣经》和他们认为重要的事业联系起来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骚动不是由宗教上的不顺从酿成的。[172]就模仿成分进入革命喜剧而言，古代作家比如普卢塔克提供了必要的材料。然而，对那些未受中等教育的人而言，共和时期的罗马太遥远，对大多数目击路易十六被处死的人而言，斩首这一幕发生在真空里；宗教的神圣性耐人寻味地缺乏；
352 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神秘气氛填补了这个空白，这种气氛集中在“武装的国民”身上。

这段简要的文字前瞻后来的发展，目的仅仅是要说明：16世纪在《圣经》翻译上的分歧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如果考察新教和民族主义，两者的关系是可以澄清的。鉴于这种长远的影响，你可能会赞成亚瑟·狄更斯的意见。他认为，特伦托公会议上的决议“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 意见分歧的神父们未能……确立《圣经》研究的优先顺序……未能激励俗人阅读《圣经》，他们没有为俗人准备《圣经》导向的教义问答书，而人文主义者却有这样的计划。1546年摒弃这种教义问答小册子的做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伊拉斯谟和勒费弗尔的精神在这个阶段遭到最灾难性的打击，对新教的恐惧在这个领域对天主教发展的影响至重至深。[173]

“1546年特伦托公会议上摒弃不同意见的决定”里，还有比畏惧新教更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会议决定支持拉丁文《圣经》，遮掩《福音书》文本，强调世俗人的服从优先于世俗人的教育；这些决定显然是对新教威胁做出的反应。毫无疑问，对路德异端的恐惧在会议上也显得很突出。不过，早在路德降生之前，天主教教士们已经在反制开始颠覆中世纪教会的力量；新教热情退潮以后很久，这些力量还在继续威胁罗马天主教。[174]

使中世纪的拉丁文《圣经》过时的不是新教而是印刷术，产生新的驱力去开发大规模市场的不是新教而是印刷术。无论维滕堡或苏黎世发生什么事情，即使特伦托公会议上研究的是其他问题，教会总是不得不直面印刷术对《圣经》文字编辑的影响，总是不得不研究三语教育的问题，这是一方面；教会还不得不直面日益扩张的图书市场，这是另一方面。无论路德的异端是否传播开来，无论教会的弊端是
353 否完成改革，对付印刷术释放的力量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是予以遏制，要么是容许其发展；这些力量总是指向更加民主和民族形式的宗教信仰。

有人说，天主教政策和新教政策一样反映了对16世纪的“近代化”力量适应的过程，这个观点需要修正，修正的办法是考虑俗人阅读《圣经》的各种情况。比如，伊文内特认为，谷登堡的发明“对双方起作用”，既有助于罗耀拉又有助于路德，一方面它推动天主教的复兴，另一方面又传播了路德的小册子。[175]当然，早期的印刷

商为许多天主教的教师和布道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然而即使在这种服务方面，新教徒似乎也先着一鞭，占有优势。[176] 在 1517 年以后的十年里，你发现很多人齐声抱怨，新媒介并未“对双方起作用”，相反，其偏向对传统的信仰不利。

> 学者们抱怨，整个市场都为路德及其追随者服务，没有人愿意为教皇印行任何文字，也没有人愿意刊布任何冒犯路德的东西……天主教的论战者和作者难以找到愿意印制他们手稿的印刷商和出版商。美因兹一位从路德派回归天主教的论战者格奥尔格·韦泽尔(Georg Witzel)抱怨说，印刷商许诺印刷，却把他的手稿压了整整一年。他说：“如果我是路德派教徒，那就没有困难，但作为天主教徒，我写书就徒劳无益。”[177]

不过，到了 16 世纪后半叶，特伦托公会议以后的天主教会成功地调动印刷商发起反攻。正如伊文内特所言，16 世纪的天主教改革像新教一样利用印刷术来宣教。天主教印刷所为罗马教会服务，也赚了钱。它们为远方的教团印制《每日祈祷书》和其他宗教用书；为新的修会创办的神学院印教材；为虔诚的世俗人印祈祷书；它们印制的小册子成为后来 17 世纪的宣教会讲演堂(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nda)可资利用的文献。此外，英格兰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英国国教占上风以后，天主教印刷商也证明自己和清教徒印刷商一样手腕高明，他们善于解决秘密印刷和秘密图书贸易的问题。[178]

354

如果你的探询仅限于图书和小册子的流布，你可能会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新媒介的利用大致相同。但正如我在本书自始至终论证的那样，印刷术的新功能远远超越了传播小册子的功能。特伦托公会议上制定的天主教政策旨在钳制印刷术的新功能。特伦托公会议以后，教廷的政策是摒弃通俗语《圣经》，强调世俗人服从教会，对世俗人阅读《圣经》进行限制，用《禁书目录》和出版许可证之类的新机制来疏导文献的走向，使之按狭窄的规定路线前进；由此可见，特伦托公会议以后的教廷政策绝没有通融的余地。教廷的姿态是决不妥协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姿态越来越僵硬。特伦托公会议的决策仅仅是一系列后卫战行动，旨在遏制谷登堡发明释放的新力量。罗马教会和印刷术扩日持久的战火在以后的四百年里继续燃烧，至今仍未完全熄灭。19 世纪中叶的《邪说汇编》①证明，即使在四百年之后，通融的余地也微乎其微。[179] 即使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②之后，教皇与印刷商的

---

① 《邪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教皇庇护九世 1864 年发布的著名通谕，历数各种“异端邪说”。

②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Vatican II，1965)，天主教为适应 20 世纪新形势而召开的重要会议，发表了告世界书等主要文献，由此而引起基督信仰的三重变化：从服从性信仰转变为理解性信仰，从表白性信仰转变为体验性信仰，从功效性信仰转变为负责任的信仰。

魔鬼之间的敌对行动也没有停止的迹象。(180)

上述评述含有这样一层意思:中世纪拉丁文《圣经》的命运紧紧地和中世纪教会的命运纠缠在一起。通过考察印刷术对圣哲罗姆《圣经》的影响,我们就可能揭示扰乱基督教世界的力量。(181)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长话短说,归纳一个本来需要长篇大论的课题;我认为,印刷术使拉丁文《圣经》遭遇两面夹击:一方面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研究的威胁,另一方面是通俗语翻译的威胁。中世纪教士的权威被拦
355 腰斩了两刀:一是来自学术精英世俗学问的威胁,一是来自大众阅读《圣经》的威胁。在精英层次上,俗人的学问比教士的学问深奥,语法学和语文学挑战神学的统治地位;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研究进入学校。在大众层次上,普通的男男女女对《圣经》的熟悉堪比教区牧师对《圣经》的熟悉;通俗语的教义问答书和祈祷书的市场在扩大;教会的拉丁语再也不是团结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圣语言。人文主义学者怀疑,圣哲罗姆《圣经》的拉丁文译本质量不佳,福音传播的改革家们又认为它太深奥而予以鄙弃。

当然,这两个层次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连在一起的。首先,伊拉斯谟的学问和路德的异端由于它们共同的对立面而纠缠在一起。因此,当教廷宣告拉丁文《圣经》为正统时,《圣经》研究和通俗语翻译都被打入共同的禁令范围。其次,凡是想要更新圣哲罗姆《圣经》的人都把《圣经》研究和通俗语翻译结合在一起。认真严肃的翻译家需要藏有学术性书籍,且需要掌握三种语言。廷代尔①或路德式的人物必然要利用罗伯特·埃蒂安纳这种学者—出版商印制的书籍;另一方面,学者和翻译家则比较容易兼于一身,勒费弗尔·戴塔普尔即为一例。(182)最后,拉丁文《圣经》遭遇的两面夹击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那就是刚刚创办的印刷所。词汇书和参考资料编纂者给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同时,印刷商对开拓大众市场推进畅销书也产生了新的兴趣。罗伯特·埃蒂安纳不断印行新的版本,使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感到沮丧,这个例子也说明16世纪印刷术的破坏性影响。理查德·格拉夫顿不断请求托马斯·克伦威尔为每一个教区的教会和修道院订购马修版《圣经》,这是16世纪印刷术影响的又一个例子。(183)

在许多方面,这两面夹击是结伴的,但有理由将其分开来考虑。我分的两个层
356 次究竟有何区别,这个问题不必赘述。总之,这两个层次的区别基于社会分层和市场定义。换句话说,学术性版本在精选的读者中流通,通俗语译作瞄准的是广大的市场。这一区别似乎太明显,无须长篇大论。但其他一些区别则不那么明显,因此需要更加留意。比如,学者和福音传道者追求圣言的路径并非总能交汇,有时甚至

---

① 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1494? —1536),英国宗教改革家、殉教者,他的《新约〈圣经〉》译本是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的基础。

产生抵牾。圣哲罗姆和圣奥古斯丁在《圣经》翻译问题上就持有不同的意见；到了17世纪，他们几百年前的争论又以新的形式爆发出来。起初，路德感谢伊拉斯谟及其希腊文《圣经》译本，但后来，他意识到，

> 纯粹从语法和历史关怀角度去直译经典的字面意义和历史语境，可能会造成确定无疑的损害……路德认为自己是神学家而不是语法学家。如果有人要他界定基督教学术，他到哪里去寻求指引是显而易见的……"杰罗姆和伊拉斯谟一样唠叨。奥古斯丁……是使徒以来最杰出的神学家……"(184)

路德抨击伊拉斯谟是语法学家而不是神学家。从另一个立场看，托马斯·莫尔抨击路德派的翻译家比如廷代尔，反对将通俗语《圣经》而不是拉丁语法书送到学生的手里。莫尔与伊拉斯谟一道努力将希腊语研究引进英格兰的大学里，其立场和尚古主义者相对。在俗人的福音传道问题上，莫尔和《新约全书》(*Paraclesis*)的译者分道扬镳了。(185)

此外，文艺复兴时期君主们的立场往往和莫尔的立场一致。他们赞助学问，支持学术性的《圣经》版本，对通俗语译本的《圣经》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通俗语译本政治上更具爆炸性，在教会事务上涉及复杂而微妙的现象。天主教君王可能会像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那样赞助多语版《圣经》，给本地的教士们提供特别的祈祷书和弥撒书。然而，在通俗语取代教会拉丁文或拉丁文《圣经》的问题上，他们会戛然止步。英王亨利八世曲折多变的政策充分说明，这位都铎王朝君主的立场是半天主教、半新教分割的立场。起初，他迫害廷代尔等翻译路德著作的人；稍后他又 357
鼓动他的首相克伦威尔放手让麾下的出版商和印刷商抨击教皇；然后他却指控这位首相让人把一些伪书翻译成英语。(186) 1543年，英王政府似乎用一只手颁发翻译的特许状，另一只手又收回这样的特许：

> 1543年的一份诏书禁止使用廷代尔翻译的《圣经》，以及任何加注的《圣经》，又禁止未经特许的个人在教堂里或集会上朗读或阐述《圣经》……然而，1543年的主教会议又指令，每个礼拜日和瞻礼日，唱完《赞美诗》和《圣母颂》之后，要用英语一章接一章地朗诵《圣经》。(187)

这里并没有逻辑的矛盾；但这两次诏令的宗旨不一样。从逻辑上说，禁止使用注释本《圣经》，禁止未经授权的人诵读或阐述《圣经》，不让"工匠、学徒、熟练工、自耕农、牧人和雇工"(188)染指《圣经》，这一诏令和指令教士在教堂里诵读英语版《圣经》未必是不可兼容的。但如果你不想让世俗的读者接触《圣经》，那么让教堂里的教众听教士诵读《圣经》未必是明智之举，因为那会引起他们对《圣经》的兴趣。人常说禁果通常很吊胃口。1543年的两个指令大概共同增强了市场对《圣经》的需

求。亨利八世驾崩以后，禁令自然就放弃了，接下来的王室政策不再那么两难。在女王玛丽·都铎治下[189]，《圣经》的英语化遭受挫折，王室不时对清教徒里的狂热分子做出反应，尽管如此，《圣经》的英语化还是在王室庇护下向前推进，终于在詹姆斯一世治下完成了胜利的结局。钦定本《圣经》问世以后，英国人加入了“读书民族”的民族之林。

一旦钦定的通俗语《圣经》确定以后，《圣经》就实现了所谓的“民族化”，英国新教教会和其他的新教教会就分隔开来，现有的语言边疆就巩固下来了。

> 《圣经》的通俗语翻译使《圣经》获得了新的尊严，使之成为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发展的起点。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生产更加容易，使书价更加低廉；与此同时，人民就容易享受到民族文学了。[190]

358

一如本章所示，这些发展势头与书籍生产的成本下降“刚好同时”，我认为这不是纯粹的巧合。科恩认为，俗语和《圣经》联手以后身价倍增，这是很有价值的洞见。以下观点同样富有洞见：“拉丁语成为人数日益增多的受教育阶级的通用语言……也就是在这一刻，它就失去宝座了……”[191]科恩借以说明，为何有必要将拉丁文《圣经》遭到的两面夹击分开来考察；正是因为《圣经》的通俗语译本强化了语言疆界，同时又和《圣经》研究鼓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背道而驰。

虽然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研究损害了圣哲罗姆版拉丁文的《圣经》，但各国基督教学者拥有共同学坛的强烈归属感还是保留下来。即使在宗教战争时期，学者间的通讯网和访学也有助于维持天主教的卢万和新教的莱顿之间的联系。普朗坦编纂刊印的多语版《圣经》汇聚了不同领域、不同信仰的学者。[192]即使被基督教认为是一种分割的力量，即使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国际语言以后，共同的古典教育根基和共同的古三语研究兴趣还是将学界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不断的世纪交替之后，这一普世的共同体似乎更加壮大，有更多共同的追求。即使在16世纪，犹太人和希腊人非正统的圈子还是有合作，这就促成了一种普世、宽容的精神；在学者—印刷商的圈子里，这一精神尤其显著。他们常常提供食宿，以换取外国学者的帮助，因此可以说，他们在接纳奇乡异土云游而来的学者时，真的使之“宾至如归”[193]。编纂刊印多语版《圣经》的过程促使学者们超越西方基督教的事业去审视异域的文化和远方的土地。通俗语《圣经》的翻译工作受惠于古三语研究，同时又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导致了《圣经》原教旨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混合，这是新教信仰的典型特征。

359

16世纪的通俗语翻译运动还产生了隐性的反对理智追求的后果，其作用和古典学者的目的矛盾。当然，16世纪50年代编印日内瓦《圣经》的学者群没有反理智的倾向，辛勤耕耘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的编委会也不可能有反理智的倾向。唯有靠学养深厚的学者才能够完成权威的翻译，他们要倚重多语版《圣经》和古三语

研究。[194]然而,有许多热衷宣传鼓动的人公然谴责博学和学究气,鼓吹将《圣经》"英语化"[195]。几种专题研究显示,16 世纪英格兰学界各种因素复杂的互动,其结果是法律和文学的"英语化",这些互动的要素有廷臣、清教徒压力群体、法律协会、伦敦剧场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新闻街。[196]在莱斯特伯爵之类的赞助者的支持下,翻译团队把各种有用的、给人启迪的著作翻译成母语。非神职的福音传道者阻挠任何人拦截福音真理的企图,其传教热情和新的翻译运动是完全协调的。[197]"让他和其他印刷商都刊印拉丁语书籍吧,因为我们这里不可能印拉丁语书籍;正是因为我们不印拉丁语书籍,所以英格兰印行的书籍在国外引起人民的怀疑。"[198]因此,大 360
主教帕克 1572 年这封信谈到约翰·戴伊不愿意接受他委托印书的态度——不过后来戴伊接受了他的委托,但那是在谈好报酬以后。毋庸赘言,戴伊不会不愿意印行"教义少的入门书"和"韵律好的诵诗"——这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格兰印刷商利润最丰厚的两种书。不过,戴伊还是全心全意为推动新教事业而奋斗。他从这两种入门书的垄断印刷权获利,又将利润投入大型出版计划中,并印制玛丽女王时代殉道者和回国的流亡者的教义小册子和布道辞;他接连不断地印行《殉道者之书》,不断扩版;他雇请作者为之撰稿。[199]戴伊还印制了欧几里得著作的英语译本,这是亨利·比林斯利(Henry Billingsley)著名的译本,约翰·迪伊为这个译本作的序文也很著名。戴伊还印行了迪伊的《完美的航海术》(*Perfecte Arte of Navigation*),不过,印行"航海术"这本书大概并非出于他的主动。[200]但是,通俗语的技术文献和欧几里得的译本和其他早期印刷商的出版计划也是一致的,其他印刷商也雇佣专职的翻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

新教徒对遮掩福音真理的态度持反对的立场,翻译家采纳了这些反对的立场,借以服务更加世俗的目的。比如他们就说,文理科学不应该"隐藏在希腊语和拉丁语里",而是应该让"普通人"熟悉这些学问。他们用"率真和粗俗的英语,去满足成千上万世俗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十来位教士"的需要。[201]翻译家们谋求弥合的鸿沟与其说是教士与俗人的鸿沟,不如说是学术或专业精英和"普通"读者的鸿沟;在那时文人的笔下,普通人是"无技能"、"没有文化"、"不懂拉丁语"的。[202]如此,翻译家们将新教徒里从事福音传道的世俗人和所谓的文化普及者联系起来;文化普 361
及者发动反对学术垄断和专业精英的造势运动。[203]各种反对拉丁学问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抨击经院哲学家、继承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教授和盖仑学说的医师。在英伦三岛共和国时期,一位名叫尼古拉·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的医学编辑和翻译积极进取、著作颇丰,他的成名作是未经授权的伦敦药剂师的官方指南《伦敦药典》(*Pharmacopeia Londinensus*),他还抨击皇家内科医师学会,谴责其是拥护教皇的保皇党,因为他们抵制在医学里用通俗语。[204]

对传统专业精英的抨击在政治精英面前止步。实际上,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

命中，这两个主题是结合在一起的。在都铎王朝早期，多才多艺的印刷商约翰·拉斯泰尔善于宣传造势，他捍卫法律书籍的英语化。[205]同一主题又被叛逆的约翰·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用来反对法律专业和斯图亚特王室。利尔伯恩认为，英国的法律不应该隐藏在拉丁文和古法语的背后，而是应该用英语来书写，以便让“每一位自由人像律师那样阅读法律文书”[206]。在序文里，这些翻译家们坚持一个主张：将“深奥、罕见和困难”的知识转换为与人人相关的、有用的知识，他们坚信广大读者的聪明才智，他们似乎预见到启蒙运动大量的宣传内容。他们渴望将知识送到普通工匠的手里，这反映了走向新市场的驱力，而新市场的动力又是由新出现的印刷机提供的。约翰·弗洛里奥①说：“知识越普及越好……为何庶民百姓不应该掌握一切知识呢?”弗洛里奥用他的译著和词典把这一信条付诸实践。[207]但只有用母语表达的知识才能够送达普通读者手中。英格兰这一批翻译家和夸美纽斯及哈特立伯②的信徒不同，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也不同，他们坚持不懈地玩弄沙文主义的主题——反复阐述捍卫“乡土”的主题并将其民主化，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提倡这样的沙文主义。

新教的《圣经》翻译事业始终贯穿着民主和爱国两大主题的结合。实际上，让每个人能够阅读《圣经》的驱动力有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样的矛盾显示了传播革命总体上的矛盾效应。人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基督教的《圣经》必须要实现民族化，然后才能使人人都懂得《圣经》。一位评论家问道：“有人说班扬③的《天路历程》‘普世皆知、普世皆爱’，这里的‘普世’究竟是何意义?”[208]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它使人去注意常被忽略的意义重大的过程。一旦靠印刷术来完成以后，传播福音的欲望就促成了基督教世界的破碎化。以路德派《圣经》或詹姆斯一世的钦定本《圣经》的形式印行以后，西方世界这本神圣的经典越来越普及，但它同时又越来越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众识字携手并进，绝非偶然。一旦欧洲人引用《圣经》、吟诵祈祷词时说的不再是同一种语言，这两个过程就连在一起了。

有人常常把新教和民族主义画等号，J. H. 赫克斯特对此表示质疑并指出，加尔文教徒宣称的教义“不是民族的……而是十分普世的，很像天主教，在使人生疑的意义上说，他们的教义和天主教徒的教义一样是中世纪的”[209]。诚然，加尔文派

---

① 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1553？—1625)，英国词典编纂者，编意英词典《语词世界》，将《蒙田散文》翻译成英文。

② 塞缪尔·哈特立伯(Samuel Hartlib，1600—1662)，英国教育家及农业改革家，提出全民教育，介绍夸美纽斯的思想和著作，发表论著30余篇，代表作有《马卡里亚》、《顺利完成英格兰政教改革的一些设想》、《发展农业论》等。

③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清教徒牧师、散文家，反对王政复辟，因传教违背国教而被囚禁12年，代表作《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描绘从毁灭城到天堂城的朝觐之旅。

有一点特殊,因为瑞士这个小州的居民所操的语言和17世纪人口最多、力量最强大的王国的语言同为法语。加尔文本人不懂路德的德语著作,但德国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室都懂法语,而且阅读加尔文用法语写的著作。法语成功取代拉丁语成为多用途的国际语,部分原因是它作为中世纪国际语产生的长期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文化新的辐射作用,不过主要的原因还是波旁王朝成功的治国之道。(210)尽管如此,加尔文的母语从来就不曾得到那种普世的地位,只有中世纪的拉丁语才在宗教事务里获得了这样的地位。

作为共同的宗教用语,中世纪的拉丁语继续团结天主教的欧洲和"拉丁"美洲。由于早期近代语言疆界的分化,新教的教会永远处在分割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 363
长老会和其他新教教会一样陷入了同样的矛盾。正如赫克斯特所言,长老会宣称的教义具有普遍的价值,然而,如果不将《圣经》放进更加民族性的模子里铸造,就没有办法使之更加"普遍"被人接受。于是,对所谓"新教罗马"即日内瓦而言,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的用英语印行日内瓦版《圣经》全然是陌生的。(211)怀旧的美国人常常描绘建立在莎士比亚、布莱克斯通①和钦定本《圣经》之上的一种口头传统,声称它提供的"一种共同文化"业已在20世纪失落。(212)诚然,《圣经》这一阅读材料的确漂洋过海来到美洲,而且把新世界蛮荒地的律师与旧世界维多利亚帝国的开拓者联系起来。然而,日内瓦《圣经》在旧世界却在海峡水滨止步不前。在欧洲大陆上有教养的欧洲人中间,这一共同的文化传统根本就不普遍。在天主教欧洲以外的地区,一种《圣经》信仰深入一切社会阶层,奠定了某种"共同文化"的基础。虽然一条"《圣经》"带横跨许多国土并留下永恒的印记,但"昔日的宗教"在新的语言疆界面前受阻而突然止步了。

这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生成"《圣经》"带的力量和生成《禁书目录》的力量是相同的。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结合当作"过时的行为习惯",认为它们在伊拉斯谟的时代似乎在退却,到了宗教战争时才得以复活——那肯定是错误的。(213)思想相近的人引用同样的章句和吟诵同样的诗篇,借以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能力依靠一个前提:他们要能够得到相同版本的《圣经》,而且这些《圣经》必须是印数相当大的标准版本。

中世纪的手抄书文化为《圣经》留下的用武之地比传统记述的天地广阔。(214)但手抄书促使《圣经》段落与其他文字混杂的情况发生。相反,机印书却容易形成截然不同的心态,在中世纪,"大多数人无从知道什么是《圣经》里的文字,什么又不是 364
《圣经》里的文字"(215)。借助混杂的媒介比如玻璃窗、墙纸、教堂门、神秘剧等传达

① 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国法官、教育家,代表作为《英国法律评论》。

的故事帮不上多大忙。《圣经》注疏和《圣经》意象侵入中世纪生活的“各个方面”。萨瑟恩详细描绘了表面上的一个悖论：中世纪的《圣经》无孔不入地钻进“人们的话语中，同时，《圣经》在教堂里诵读的时间却在急剧减少”[216]。到了12世纪，“许多圣徒节日里插入的特别功课”产生的后果足以使人气愤，托马斯·克兰麦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作的序就表达了这样的愤懑之情：

> 古代教父确定的这种神圣而体面的顺序……被改变、中断和忽视了，正文里插入了出处不明的故事、传奇、回应、诗歌、毫无意义的重复、纪念活动、宗教会议，以至于造成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打开《圣经》诵读其中任何一卷时，总是读不完三四章，其他的章节就弃之不顾了。[217]

托钵僧形成的布道风格很流行，致使《圣经》混杂的局面更加严重。教众被五光十色的趣闻轶事俘虏，布道人用这些五花八门的手法使听众不打瞌睡。乔叟[①]和后来的拉伯雷得到许多诸如此类的趣闻轶事可资利用。但《圣经》里混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外域素材。[218]如果说非神职人员难得一见《圣经》，教士们倒是很熟悉彼得·朗巴德[②]编纂的《教父名言集》和布道者用的小册子，但他们掌握的素材并不见得比普通人多。[219]布道者的布道辞应该直接从《圣经》取材——在伊拉斯谟的时代，这个观点远没有过时，而是刚刚才开始形成。非神职人员的行为举止也依据《圣经》，他们顽强地坚守《福音书》，把《圣经》当作唯一的指南。

那时，诵读《圣经》有可能取代弥撒之类传统仪式，由此而产生了多种社会和
365 心理影响。“唯独《圣经》”的口号即为其一，但这口号有点含糊其辞。一种宽泛用法的含义是“不能没有《圣经》”，另一种用法是路德赋予的含义“只能用《圣经》”[220]。用于第二种意义时，《圣经》阅读可能会优先于其他一切经验，其优先意义可能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据说，靠阅读《圣经》去追求“真实在场”的思想含有这样的意思：“将过去在显性的圣餐等仪式里公开宣示的经验进行内化。”[221]新教在摒弃弥撒时形成了许多公开宣示的仪式比如祈祷会和诗篇合唱会，有鉴于此，靠《圣经》阅读完成经验内化的观点不应该太牵强附会。宗教改革家们改革布道艺术以后，这一艺术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强化了。

然而，将《圣经》送达每一位教徒手里的做法的确造成了教众的永恒分割，由此而产生的趋势是宗教自助。过去形成的上教堂的集体礼拜就遇到新的问题。一些新教教派中形成了顽固教条的甚至迷狂的宗教态度，他们把准确可靠的《圣经》抬

---

① 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英国文学家奠基人、诗歌之父，著有《特洛伊拉斯和克莱希德》、《公爵夫人之书》、《坎特伯雷故事集》等。

② 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1100—1600)，意大利神学家、巴黎主教，编纂标准神学教材《教父名言集》4卷。

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甚至超过了天主教徒对教皇称颂的高度。独自捧读《圣经》的教徒反复独自阅读同一本书，他们得到无声的指引，开始了一种内向的精神生活。在班扬的时代里，自学有成的布道者和宗教迷很普遍；德拉尼说："《圣经》对这类自学有成的人产生强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几乎不读其他任何一种书。"[222] 如今的情况似乎依然是这样的。应该记住，像"基甸《圣经》"(Gideon Bibles)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并没有停止在本世纪滋生。关于原教旨主义的滋生，此地不宜赘述。严格地说，原教旨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而不是16世纪的产物。我只想强调指出，在伊拉斯谟的时代，《圣经》直解的思想非但没有濒临消亡，而且其近代形式才刚刚开始形成。中世纪丰富多样的社区宗教经验给西方人的"共同文化"提供了特有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同于依靠《圣经》阅读的新经验。在有些情况下，开卷学习反而导致封闭的心灵。 366

于是，印刷术对西方《圣经》信仰的冲击指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伊拉斯谟式"的趋势，最终走向高层次的批评和现代主义，二是更加僵化的正统教义，最终走向原教旨主义和"《圣经》带"。通俗语《圣经》翻译运动利用人文主义者的学问，培养了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倾向，反过来瓦解了人文主义。这一场翻译运动必须和抨击拉丁文《圣经》的学术研究区别开来，因为它和许多非学术性的反理智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况且，正如学术性图书和"不赢利的多语版《圣经》"一样，这一场翻译运动和早期的印刷商的赢利冲动是同时发生的。[223] 并非每一位印刷商都是学者，他们也并非人人虔诚，他们都必须赢利以维持印刷所的生存。对虔诚的读者而言，《圣经》总是神圣的经书，对神学家而言，《圣经》总是认识上帝的指南。然而到15世纪以后，《圣经》被当作潜在的畅销书了，在世俗人中，《圣经》有时被当作打发时间的消遣读物了。[224]

4.4 为宗教改革重新布置舞台

一如上述，我认为印刷商的贡献不限于出版异端的大单张和小册子，这是过去的异见者无缘掌握的宣传工具。路德的第一本小册子尚未写成——遑论印行广布之前，印刷商已经为学者们刊布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古籍；不同语言和版本的通俗语《圣经》已经人人可得。路德发布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已经手握罗伊希林编写的希伯来语基础读物和伊拉斯谟翻译的希腊语《新约全书》。[225] 路德到维滕堡 367
大学执教之前，该校图书馆已经藏有16世纪初最优秀的学术著作。图书馆采购的依据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出版商的建议。[226] 路德出生之前，《圣经》的德文版已经印行。在新教反叛之前，教会的地位和基督教信仰的性质已经在手抄书向印刷书的过渡中有所变化了。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当时广告中占据显赫的位置，在今天的历史书中仍

然现身于大字标题中。自“论纲”问世以后，美因兹印刷厂印制的赎罪券和《圣经》就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不过，新教的小册子问世之前，《圣经》已经在快速复制之中。借助印刷品的福音传播走在新教反叛之前，且加速了路德反叛的出现。在研究这场反叛时，传统的做法是推迟提及印刷术，等到因果理论辩论完结说到结果时以后才提出印刷术的影响（如亚瑟·狄更斯所谓的“传播革命”）。在辩论的过程中，人们探讨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探索了神学问题和和基督教的弊端问题，分析了富于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近年还作了心理分析。但16世纪的人们很难让印刷机进入探讨的视野，直到路德在教堂门口张贴他的《九十五条论纲》。

如此，有关宗教改革的辩论往往掩盖了印刷术带来的变革，正如有关文艺复兴的辩论往往掩盖了印刷术的影响一样。在这两种辩论中，新技术的功能都受到论者极大的限制。印刷术塑造人们观点的功能被完全忽视了，其作用仅仅被认为是传播过程业已形成的观点。因为古典的复活开始于手抄书文化阶段，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推迟探讨新出现的印刷机，且容易低估其作用，这就可以理解了。既然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到路德反叛有一段时间，我们要解释宗教改革研究为何把两者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还实在是不容易。一个答案也许可以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目前的定义中去寻找。手抄书文化阶段的“复兴”概念因承袭而进入“改革”的观念以后，印刷术的出现（彼特拉克时代很难预见到其出现），就容易在宗教改革的讨论中被省略了。关于意大利人文主义和北方人文主义、古典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人文主义、15世纪人文主义和16世纪人文主义的区别的辩论都很吸引人，难以为手抄本《圣经》和机印本《圣经》的讨论留下什么余地。无论如何，在大多数人的记述中，人文主义从意大利到北方的迁移、从“古典”复兴到“基督教复兴”的地位都放在前，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迁移都放在后。就这样，为路德登台亮相的舞台置景就把历史的聚光灯从美因兹、斯特拉斯堡等德意志的印刷所移开，打在路德的身上了。而印刷商却仿佛悄悄地在幕后就位。他们安装好印刷机，投入生产，不引人注目，谁也不注意他们的产品，直至路德利用他们的印刷品为自己的宗教改革事业服务。

几乎任何人对宗教改革前的发展动态的描绘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剑桥〈圣经〉史》的舞台置景就以勒费弗尔·戴塔普尔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开始，他给西方宗教复兴的断代是“大约始于君士坦丁堡被基督的敌人攻陷的时候”。接着是巴西尔·霍尔的文章，他探讨基督教人文主义有希望的前景：

> 这是新的现象，对16世纪初的文化世界至关重要：当它载入史册时，它不应该仅仅是14世纪甚至更早开始的人文主义研究的另一个阶段。16世纪的前二三十年有一个福音传播的准备阶段；在这二三十年里而不是在此之前，人文主义的学者—印刷商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三种语言的语法和句法的精深研

究成果问世;经济发展和城邦爱国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文学在这些地区兴盛一时……

再者,就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充分感觉到一种持久需求……的力量……需要根基牢靠、理据充分的《圣经》知识……不仅来自于勒费弗尔这样的学者型的牧师,而且来自于学养深厚的俗人……满足这一需要的努力可见于拉丁文《圣经》的大量通俗语译本,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这些译本源源不断地在德意志和法兰西涌现出来。(227)

在许多方面,这段话支持我的观点,令人高兴,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似乎是上述发展的底层力量。不过,这一隐性的力量从这段文字的表面看一点也不清楚。比如,它并未提醒我们注意,勒费弗尔用来给复兴断代的事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正好和印刷术的出现巧合。他也没有鼓励我们把那种强大而持久的需要——我们需要理据充分的《圣经》知识——和谷登堡的发明联系起来看问题。大量的通俗语译著没有和出版商的赢利驱力联系起来看。"人文主义的学者—印刷商"的成就被游离出来单独考察,而没有和相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没有和古三语研究的系统追求、日益积累的俗人学问、文化力量的爆发等发展联系在一起;其实在印刷业起步的都市中心,这些发展动态与爱国热情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印刷革命的影响被预备福音神学(*preparatio evangelica*)的喧嚣压住了,所以印刷术对宗教改革的贡献未能得到很高的评价。如果把印刷商的功能限定在传播路德派的小册子,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配角而已。在一些专业化的研究成果中,印刷商的角色完全被删除的情况也不罕见。

详细描绘宗教改革来到斯特拉斯堡的过程,这有助于说明印刷商的角色。这样的描绘显示,大多数亲路德派的小册子是在该城市民开始改宗路德派以后才印行的。这似乎暗示,"印刷商反映而不是影响了宗教改革"(228)。与此观点对应,霍尔在这里强调的是"布道",印刷术的作用则被贬低,以至于一位评论家说:"使斯特拉斯堡人改信印刷书和建立教区学校的,不是印刷书,而是斯特拉斯堡的布塞尔①、黑丢②、卡皮托③和泽尔④等改革家的口语词。"(229)这样的结论似乎就难以避

---

① 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1491—1551),法兰西宗教改革家,客居德国斯特拉斯堡,持温和立场,希望调和新教与天主教、路德派与茨温利派,客死英国。

② 卡斯帕·黑丢(Caspar Hedio,约 1494—1552),德国新教神学家,翻译神学著作,思想温和,反对思辨神学,著有《教会圣职人员用福音及传道书提要》。

③ 沃尔夫冈·卡皮托(Wolfgang Capito,1478—1541),德意志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在巴塞尔大教堂布道,并在巴塞尔大学执教,支持宗教改革。

④ 马修·泽尔(Matthäus Zell,1477—1548),德意志作家、宗教领袖,曾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向教众宣传福音派观点。

免:有效的布道在使人改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该市的大多数市民不识字,向他们布道时只能够靠“口语词”。(230)

然而,换一个角度论证也是可能的:如果超越路德小册子传播的视角去看问
370 题,出版商扮演的角色就不再那么消极了。布道与改宗是1520—1522年间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过程的终极产物,而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据巴西尔·霍尔记述,有一些城市的文学早已欣欣向荣,最早一批模仿谷登堡印刷术的世俗人早就在推动福音传教运动。斯特拉斯堡就是其中之一。在传播路德派小册子之前的50多年里,斯特拉斯堡的印刷机就已经在印书了。(231)路德出生之前20年,德语版的第一部《圣经》已经在这个城市问世。从1480年到1510年的30年里,神圣罗马帝国杰出的学者和文人被吸引到这座城市来担任编纂、翻译、校对和咨询的工作。斯特拉斯堡的印刷所成了博学的世俗人的汇聚之地,成为舆论形成群体聚首的要津。在这30年里,在同样的氛围里,德意志历史的新观念和国民性得以形成并广为人知了。世俗人的公民义务和宗教责任经过了重新评估;新的公共教育体制规划制订出来了。教育规划尤其得到急速的推进。正如温普斐灵①所言:“没有教育,人们就看不懂《圣经》,也看不懂法律书。”(232)

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书籍和教区学校时,改革家们传达的讯息首先是靠印刷品传达然后才由口头传达的。当然,印刷品传达的讯息并不新鲜,正如世俗人的虔诚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市民中并不新鲜一样。新鲜的是这一讯息深深扎根的机会,是让《圣经》阅读和书本学习成为人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了说服追随者,改革家们利用布道坛的效果并不亚于利用印刷机的效果。但使信众一劳永逸地改变斯特拉斯堡教育制度的是印刷机而不是布道坛。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最持久的结果是建立新型的市立公共教育体制。教育改革的推进遭遇到保守教会执事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书本应该专属大教堂和修道院附属的学校。(233)倘若学术书的供应还是处在教士的督察之下,倘若教科书的供给还是由手抄书来调控,那么新教育体制
371 遭遇到的抗拒是否能够克服就令人怀疑了。倘若手抄书的生产仍然在有效地继续进行,那么宗教改革的热情恐怕还是会继续集中在教士的教育培养上,一如既往。

实际上,50年之久的印刷术改变了教士教育的质量,给出身寒门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机会。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那一小群领军人物显然和过去“知识贫乏、不善辞令”的教士截然不同了。(234)一位领袖的父亲是鞋匠,另一位的父亲是铁匠,但他们都通晓新学,精通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们对口语词的态度由于印刷书的普及和古三语研究的学养而不同于前人。他们把雄辩口才的理想带到布道坛,这一

---

① 雅各布·温普斐灵(Jacob Wimpfeling,1450—1528),德国人文主义者,著有《哲学的垄断》。

理想来自古代,由意大利文人复活,被用于宗教事务。他们的追求是使自己传达的讯息深入人心,他们学习西塞罗雄辩术的目的不是唤起民众支持某一位民事领袖,也不是要灌输爱国热情,而是要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传达上帝的圣言,要重新点燃业已昏睡几百年的宗教信仰的激情(昏睡是他们的观点)。[235]他们主张不拘形式地用《福音书》向俗人布道,而不是按照布道手册照本宣科,这使教区里保守的教士非常不安。这些新型教士鄙视旧手册里的"大杂烩"[236]。他们曾经聆听非神职人员对福音充满智慧的讨论。比如,卡皮托就曾经与阿梅尔巴赫和弗洛本共事,曾经帮助伊拉斯谟编辑《新约全书》,他不仅是聪颖的铁匠之子,仅仅应聘担任教士而已,他对拉丁文的掌握绝不是"皮毛"。到斯特拉斯堡就职布道之前,他已经在巴塞尔出过书,那是他自己编印的《诗篇》。[237]

甚至在别人反映宗教改革前,有些出版商就已经对宗教改革产生影响。马修·泽尔(Matthäus Zell)的活动就是证明。他在斯特拉斯堡启动了新型的布道, 372
遭到教区的反对,但他还是赢得了一批追随者。他是一位桀骜不驯的福音传道者,在传统的体制外布道。[238]和16世纪的大多数反叛者一样,他也有一些先例可循。他的布道不仅使人想起基督委派的72位布道者,还使人想起此前斯特拉斯堡的布道人盖勒·冯·凯瑟斯伯格的教诲。在16世纪初,书面词只能够送达少数人,但除非用书面形式表达,已故布道人的讯息世人是听不见的。盖勒把出版和布道结合起来,这位出版商为让·热尔松①印行了全集,热尔松是著名的布道人和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者。[239]盖勒身后有两人为他立传歌功颂德,名重一时。[240]他的布道辞印行以后得到更热烈的响应。他的布道辞结集成书以后多次印行,成为最早的畅销书之一,他洪亮的声音从墓地里传出来"影响到泽尔"[241]。这使人想起路德和斯特拉斯堡另一位改革家的对话。"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很自负,他敦促维滕堡的神学家走进社会去布道,路德的回应意味深长:'我们用书籍来布道。'他深知他所处的世纪。"[242]

路德和布塞尔的对话不无讽刺意味。首先,布塞尔也深知自己所处的世纪。他在斯特拉斯堡居留期间出版的书逾80种。[243]其次,靠书籍布道的理念绝不是路德那个世纪或印刷文化特有的现象。如上所述,"用笔传道"的传统可以回溯到古罗马政治家卡西奥多鲁斯给修士的忠告:

> 用手向人布道;用手指头解开舌头……用笔和墨水……去斗魔鬼。抄书人誊写的每一句上帝的圣言都是刺伤撒旦的利剑……抄书人坐在一个地方,

① 让·德·热尔松(Jean de Gerson,1363—1429),法兰西基督教神学家、神秘主义者,曾任巴黎大学校长,参与教皇地位的论争以及两位分立的教皇争夺教皇宝座的斗争。

373 但由于他抄写的圣言传播到五湖四海，所以他穿越了不同的国土。[244]

对禁欲修会的修士而言，卡西奥多鲁斯这一忠告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的主张是避开布道坛的宣教，仅仅“用手宣教”。由于他的修会宣誓保持静默，12 世纪一位修道院院长写道：“既然我们不能用嘴巴宣讲上帝的圣言，让我们用手宣教吧。当我们写一本书时，我们就成了上帝的使者……”[245] 和查尔特勒修道院(Grande Chartreuse)院长比较而言，路德更加信守口语词的力量，不那么情愿将嘴和手的功能分隔开来。印刷品宣传发挥的布道功能就像它发挥的其他言语功能一样。这一点值得牢记，他告诫我们不要把印刷术的影响过分简单化，不要匆忙断言，印刷术迫使人偏重视觉而不是声音，偏重阅读而不是聆听。“对路德(他写了很多著作!)而言，教堂不是用笔头的场所，而是用嘴巴的场所。用声音宣讲的福音具有使人归宗的力量；布道是表现神恩的手段；圣言和圣餐绝不能分离。”[246] 路德说谷登堡的发明是上帝的“至上神恩”，那是因为印刷品放大了口语词，而不是让口语词静默。把印刷机和布道坛对立起来的做法违背了路德革命的精神。然而，如果你设想，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向市民宣讲时并没有把新近出现的印刷机推到前场，那就是受了误导。主张改革的教士走上布道坛，着手让斯特拉斯堡等德意志城市的市民归宗新教之前，新发明的印刷机就已经影响到布道人的职业习惯，影响到德意志市民的观点了。

如果让重要的事情优先，我们描绘宗教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 1466 年机印的德语《圣经》来到斯特拉斯堡，而不是 1520 年的一次布道。[247] 我们将要调查构造舆论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倾向于印刷所的文人是如何阐述新观点的，然后才去估计路德派小册子的产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显示，预备福音神学必不可少的印刷
374 机如何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至少，斯特拉斯堡的情况是清楚的，这里的印刷商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只是反映宗教改革，而是为宗教改革铺平道路，他们确保了宗教改革的开花结果。

如果让重要的事情优先，我们还应该指出，赎罪券是先印制出售然后才受到抨击的。谷登堡印刷所印有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是赎罪券。[248] 从 15 世纪 50 年代美因兹印刷所印行赎罪券到 1517 年路德抨击赎罪券，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赎罪券成了有利可图的一种小量印件。“1498 年 5 月，约翰·卢施纳(Johann Luschner)在巴塞罗纳为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修道院印制18,000 封赎罪信，这样大批量的印刷堪与皇家印制的征税表一比。”[249] 既然有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高压的推销术难以避免。倾销就需要中间人，其酬金由印刷商支付。印刷商还发现有利可图的副产品，那就是印制促销的小册子和大单张，用基督的神迹来促销赎罪券。[250] 诚然，商业利用赎罪券的做法在印刷术之前就出现了——乔叟的

《卖赦罪符的人》(*Pardoner*)就是一例。[251] 不过，一旦赎罪券交易被用于大规模赢利的企业，赢利所得就可以用来补贴大型的出版工程。赎罪券对现金短缺官员的吸引力增加，专业的筹款人利用人们在救赎方面的恐惧，他们无孔不入，对真诚关 375
怀灵魂得救的信众构成的压力就加重了。

>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筹款方式的伦理基础和神学基础都越来越令人生疑。1476 年，西克斯图斯四世[①]把赎罪券的范围扩大到炼狱里的离婚，利用淳朴人对已故亲人的担忧捞钱。路德的反叛最初是由这种救赎保险公司刺激起来的，其保险的范围从天堂、地上扩张到炼狱了。[252]

即使在美因兹印制赎罪券之前，雕版印刷已经被用于新的弊端。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赎罪券推销人与托钵僧》(*Pardoner and the Friar*)剧本里的无赖不仅使用赎罪券里的语言，而且鼓吹用木刻的圣像作为赚钱的副业。[253] 这样的圣像一印就是几十份，匠人们将其与扑克牌一道销售，既用圣像赚钱又用俗物赚钱。[254] 对于允许圣像崇拜，西方教会始终持矛盾的态度。流行崇拜被用于牟利并且和打牌及算命纠缠在一起时，似乎更难以被人接受了。同理，如果用印刷品在市场上宣传兜售圣物，就像兜售药品一样，那么，持怀疑态度的人就觉得很滑稽，而主张改革的人就会很生气。铅印的指南大量发行，它们历数各个教堂里收藏的圣物，这就使虔诚的教徒难以断定，哪一座教堂里可以看到真正的圣物了。[255]

加尔文抓住了印刷术潜在的用途，将其用于清除假圣物。他以典型的决断出 376
版一本小册子，警告读者不要假装“任何不知情的借口”。这本小册子里的一小段文字值得我们引述如下：

> 就在本书即将付梓时，有人让我看耶稣的第三块包皮，这块包皮在赫德舍姆展出……诸如此类的主的遗物不计其数……圣物也多得不计其数：因为一切都混杂不清，结果你崇拜的根本就不是殉道者的骸骨，反而可能是杀人犯的骸骨，或者说驴、狗、马的骸骨，这样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你也不能崇拜圣母的遗物比如戒指、梳子或腰带，因为你崇拜的可能是一位妓女的指环，这样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因此请注意，谁也别陷入这样的危险；从此以后，谁也别假装“以不知情为借口”[256]。(Sig. H7^{v})

印刷商接过赎罪券的复制和圣物的宣传以后，传统的教会习俗显然沾染上了商业主义。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复式记账法”精神又渗透进反教廷的运动。

---

① 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14—1484)，意大利籍教皇，卷入不少纠纷和战争，赞助文艺、扩建并开放梵蒂冈图书馆，修复和兴建多座教堂。

诉诸造势文字和高压推销术是约翰·特泽尔(Johann Tetzel)这类人兜售赎罪券的策略,这样的特征也是早期宗教改革家比如庇突斯·雷纳努斯的特征,他们用这样的策略去宣传路德对赎罪券的抨击。即使在天主教国家里,乡村市场也向新教《圣经》的小商贩开放了。[257]实际上,无论新教徒如何抨击"机械的虔诚",他们对"机械印刷商"的倚重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徒。新教徒的交流强调与圣言接触,于是阅读《圣经》取代了望弥撒,他们绕开牧师的静默冥想,绕过教皇的权威,结果,他们对《圣经》印刷商和销售商的倚重就大大加重了。

路德将印刷术描绘为上帝的至上神恩,但他同时又严厉抨击使《福音书》的顺
377 序错乱的印刷商,谴责匆忙重印《圣经》以求尽快赢利的印刷商。在1541年版的《圣经》序文里,他批评印刷商说:"他们只满足自己的贪婪。"[258]尽管如此,由于他坚持认为,《圣经》阅读是体验主的存在并达到真正信仰的方式[259],所以他还是把精神渴望与扩张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结合在一起了。为了绕开牧师,直接把《福音书》送进俗人的手里,必须要借重印刷商和书商。"因此,多种语言广为人知,知识增长,判断力提高,书籍广为流布,《圣经》由常人诵读,故事书开卷有益,不同的时代得到比较,真理得到明辨,谬误得到纠正……这一切(如我所言)都是印刷术给人的施惠。"[260]福克斯赞颂印书人的语气和前人赞扬抄书人的语气何其神似。然而,印刷所和修道院的抄书房判若泥云。新教教义把传统宗教和新技术联系起来,结果,西方基督教踏上了任何世界性宗教从未尝试过的道路,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和外貌;和其他宗教比较,它经历了倚重历史性的突变。[261]

4.5 新教伦理与新兴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读者或许已经从上述文字猜想到我的倾向;在围绕马克斯·韦伯主题的争论上[262],以及围绕雅各布·布尔克哈特著作的争论上,我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两人主题的争论都围绕一个难以把握的现代化过程,但两人都掩盖了从手抄书文化
378 向印刷文化过渡的问题。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韦伯关心的发展变化(含理性与科学)正是在印刷术这种新媒介的强大影响产生的,但他的著作给予印刷术的地位却很不引人注目。印刷术发明以后,业已存在于西方文化里的走向理性化和系统组织化的驱动力就能够更加有效地付诸实践了。与此同时,传播革命使科学数据的采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本书稍后将要探索印刷术与近代科学兴起的关系,以及围绕新教与科学的争论。这里只简略说一说韦伯的重要论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提出的几个问题,以便说明这些问题可能和印刷术启动的变化有关系。

请容我从读者耳熟能详的“特殊天职”(special calling)观念开始，这一观念大概是从修道院走进人世间的。[263]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12 世纪的布道辞里已经在赞扬辛勤耕耘、效命天职的世俗人，这样的世俗人有骑士、商人或农夫；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赋予后来兴起的新教观念过多的新奇特性，因为世俗工作神圣化的观点早就存在。[264]此外，关于什么形式的侍奉最令上帝满意，不同教派的教士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正如“世俗”教士(‘secular’clergy)一语暗示，“世俗”教士已经在修道院之外的人世间从事神圣的工作，至少从使徒彼得和保罗的时代起就一直在这样做。即使你追随韦伯引领的路子，即使你只考察修士的工作，情况仍然是清楚的：不同修会的规章允许不同形式的特别神圣的工作。尽管如此，西方隐修制度始终不变的特色是赋予抄书人的工作很高的价值。根据三令五申的训令，这是“很适合修士”的工作。表现“特殊天职”的工作(借用一位加尔都西修道院院长的话，这是记录他训令的保存下来的常规)是“持久而不是短暂的工作”，也就是用手抄书的工作。[265]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图书生产已经冲破修道院院墙进入了尘世，这个观点并未受到挑战。于是，托钵僧修会就雇佣抄书人并以此提供书籍；都市里的商人自办书店，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学术需要；与此同时，意大利独立的手抄书书商获得赞助人和保护人的帮助，他们从事豪华本手抄书贸易。然而，读手抄书特别适合静修的思想并没有因为这一切发展变化而销声匿迹。不仅古老的修院遵守这样的规章，而且新建的修会也重申这样的规定，温德舍姆修会就是这种新建的修会，于是，神圣的空间继续被用于这种恒久的神圣工作。

然而，新的印刷机却使这“恒久”的工作突然走到尽头。斯蓬海姆修道院院长在印制《抄书人赞》的过程中就给它敲响了丧钟。一些修道院邀请印刷商在自己的院墙内设置了印刷所。(印刷商就是这样来到意大利的。)一些修道院让附近的印刷公司承包一些印刷工程，将自己收藏的手抄本租借给印刷商，允许其复制，以换取一些印制的副本。[266]无论修道院采用的是什么解决办法，神圣的制作图书的工作决定性地离开了修士的手工操作，而修道院藏书的内容就向各种世俗的读者披露了。与此同时，由于同样的印书机制，拓宽图书市场穿越以往局限的强大压力产生了，非宗教人士对《圣经》、祈祷书和各种题材的虔修书的需求迅速增加，这些图书的消费过去是仅限于各种宗教修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修士和世俗人都开始用有别于过去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职责，尤其对世俗人而言，有关宗教“自助”的观念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由于书籍生产商接过了由修士完成的神圣工作，早期印刷商的工作似乎和韦伯提出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相关意义。印刷商们把资本主义企业与精神升华和福音传道的冲动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韦伯这位社会学家提出的问题：“过去伦理上最多只能够容许的活动，为何能够转化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那种意义

380 上的天职呢?"[267]这种基于"理想类型"的分析产生一些令人遗憾的后果,其中之一是,人们在不用心确定富兰克林实际天职的情况下就尝试去回答这一问题。诚然,韦伯将富兰克林挣钱的"理念"和"文艺复兴人"比如阿尔贝蒂挣钱的"理念"作了比较,但富兰克林实际挣钱的方式他却只字不提。如果你像韦伯那样对一位18世纪费城的印刷商的"伦理和生活方式"做出历史性的解释,你需要首先考虑的是这位美国人的职业和以前的人有何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殖民地时代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情况虽然都有趣,但它们总体上的相关性并不是同等的。[268]倘若富兰克林的格言警语反映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把这一"精神"和他所从事的新的资本主义企业联系起来,是颇有道理的。既然将富兰克林的观点与活动联系起来有道理,为何又要求我们不去争辩路德所用的字眼"职业"(Beruf)或加尔文关于"高利贷"的观点呢?这一点特别令人困惑。[269]如果解释《穷人理查德的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表现的"精神"时总是审视新教徒,且总是忽略印刷商,那就是从一开始就误入岔道了。

由此可见,韦伯一起步就有疏忽,但许多批评他的人在这方面一事无成,并不比捍卫他的人多一点贡献。在争论新教徒和资本家的关系时,他们的记述对手抄书向印刷术的转变不着一字。罗伯逊对复式记账法重要性的阐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提到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建议:"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日"可以定为
381 1202年。那一年,比萨的莱奥纳尔多(Leonardo of Pisa)的《算经》(*Liber Abaci*)问世;桑巴特还说,"科学记账方法慢慢传播开来",这是中世纪商务的传统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还讨论这种记账法如何迅速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他断言:遵循"和韦伯同样的路子,很容易用系统分析的图书来说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不过,他的结论是,韦伯的路子太受拘束:

> 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本身;这种精神是由总体的文化条件决定的……尤其是由商业技术的发展决定的,由影响事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决定的……[270]

听他说"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本身",我们就想起,20世纪的历史解释仍然常常和莫里哀[①]时代的医学解释相似,这令人感到不安;莫里哀时代用鸦片诱导睡眠的性质和如今"由总体的文化条件决定的"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日,我们应该考虑从完成手稿到发行机印书相距的时

---

① 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原名 Jean Baptiste Poquelin,法国剧作家、演员、剧团经理,首创法国现实主义喜剧以及喜剧的新风格,代表作有《伪君子》、《吝啬鬼》、《贵人迷》等。

间。《算经》是大部头,至今仍存 1228 册,但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得到一册《算经》并不比得到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容易。[271] 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虽然是商业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但这里的商人还在用放在木桌上的计算器,需要算账的时候,商人们就请会计师上门服务。[272]

16 世纪之前,"科学记账方法慢慢传播开来",此后其传播才加速,恐怕这和手抄书向机印书的转变有关系。中世纪后期有证据显示,商业算术由大学老师私下授课来传授,不过大多数未来的商人还是靠学徒见习的方式向师傅学习算术。[273] 382
比如在 1476 年,一些英格兰学徒投奔旅居南安普敦的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学习"做生意的秘诀"[274]。但卡克斯顿这样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掌握了"印刷机的秘密"以后[275],记账的秘密和商业算术就容易被商界人士掌握了。[276] 会计师与学徒发现出版小册子和著作很来钱,既可以宣传他们的业务,又可以给自己的名字增添光彩。他们尤其强调复式记账法,一是因为其优雅和精确满足他们自己的美感,二是因为一般商人仍然把复式记账法当作"秘密"。如果新的记账艺术给普通的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希望雇请训练有素的会计师和专业的簿记员服务的。和其他地方一样,南安普顿成功的印刷商绝不是等闲之辈。普朗坦的安特卫普印刷公司山水相隔的分公司靠精细的分类账经营管理,这反映了令人惊叹的精致的成本核算技巧。这样的技艺并非普朗坦本人精通的,而是由科尼利乌斯·冯·邦贝根(Cornelius von Bomberghen)提供的,此人的曾外祖父丹尼尔·邦贝格(Daniel Bomberg)是威尼斯著名的印刷商,大概在经营过程中学会了复式记账法。[277] 不过有人说,对普通商人而言,复式记账法对早期近代的商务实践并不像教科书的促销人鼓吹的那样重要。[278]

无论如何,商务艺术书籍的大量出版的确给欧洲的书面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读者听到的忠告是,有条不紊地读书可以使他们得到"在另一个世界里寻找的那种心宁神静"。这样的忠告对早些时候的商人也不陌生,不过,它传达的讯息的确不同于以往的文体传达的讯息。毫无疑问,这样的忠告特别适合早期的印刷商,因为他们担心如何使收支平衡。但这样的忠告还反映,布道人和教师的劝说艺 383
术可以被用于其他的目的。我们稍后的讨论将显示,印刷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师开辟了新的职业生涯。精于布道且受欢迎的托钵僧从事科学写作,为开辟这一新文体助了一臂之力,在用印刷术普及"四艺"方面,他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这样,一位意大利托钵僧和神学教授成了"复式记账法之父",1494 年,帕奇奥里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论著。[279] 笛福的《英格兰商人》(*English Tradesman*)宣告,在会见上帝之前做好灵魂里的准备很重要,他的这一宣示未必反映了"世俗化的清教徒"观点。他只不过换一种说法来表达这样一个主题:这是从文艺复兴时期首次在会计书封皮上写广告词时就出现的主题,那是为了促销的宣传而已。[280]

伴随机印的记账书而兴起的促销文字是新兴的几种文体之一，其含义可能使后世学者觉得，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业已兴起。一如纳塔利·Z. 戴维斯所示，对于布道人反对强势推销和高利贷的立场，商业计算图书里的大量内容似乎起到了瓦解的作用。演示不同计算方法的文字描绘商人如何强势讨价还价，丝毫不表示反对意见，仿佛与读者一致默认：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写这样的书时，连天主教修士也搁置自己的道德判断，保持一种中性的口吻。计算大笔利润或天价利息的程序被作为学习的功课向认真的读者兜售，而不是被当作让上帝高兴的举动。

> 这些教科书……传授商业技巧和计算，一般不提宗教—道德告诫，不提教义规定和新教理论；其或隐或现的意思是，必要的商业惯例是普通的行为指南。这就为商业道德的中性态度奠定了基础。这些教程在马克斯·韦伯描绘的有趣过程中不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韦伯的笔下，宗教精力（常常在无意之间）被引向有利于商务生活的渠道。(281)

不过，这些书的确显示，各教派信徒的才能发生了偏转，由于印刷术提供新的机会，他们的才能迁移到新的机会了；印刷术出现以后，知识的传授瞄准非道德的世俗目的了。

走向统一性和理性化的新驱力还有另一种因素的推动，那就是计算书的生产，这些书在设计时就以大发行量为宗旨。语词问题必须要小心翼翼地选择，以便超越局部市场，使出版地之外的读者受益。度量衡或货币体制要审慎选择，以便使作者所在地区之外的读者能够看得懂。(282) 换算表受到欢迎，因为它们使书能够卖到不同的地区。当然，这样的换算表对批发商、工厂或代理人也有用，因为他们也要跨地区推销自己的货品。在这里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事业兴旺的出版商自己就可能是所供货品的顾客。

和修士或托钵僧比较而言，印刷商的日常事务显然和财务盈亏的计算更加协调。他们参与编辑并出版商务手册和计算书，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他们传授的功课也是他们自己必须要学会的功课。成功的教材出版商既要兜售精确的会计制，又要践行这样的会计制。诚然，16 世纪的印刷商无疑从出版布道辞赚钱，但他们并不会从认真对待布道辞来获取金钱上的利益。

富兰克林的《穷人理查德的年鉴》问世之前很久，印刷商已经从日常经验中认识到，实践就是金钱，赚钱和虔诚是并行不悖的。他们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载体，理由很简单，他们本人就是资本家。如果说他们值得被单独挑选出来评说，那是由于他们有一段时间掌握了新兴的传播产业，在重塑文化产品和传递思想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的观点反映在诸如《商人的商业地图》（*The Merchants Mappe of Commerce*）的小册子里，反映在书里的忠告上。(283)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意大利的

小册子里已经出现了表格和规章，反对奢侈的告诫和提倡节省的忠告，比如“点滴节省好处无穷”[284]。这些东西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商业或许并非全然是陌生的。但推出这种指导的方式以便使之进入了英国的千家万户——比宾夕法尼亚州的印刷商建厂早了一两百年。到17世纪，至少在英格兰，年鉴的销量已经超过《圣经》。“没有任何英语书能够赶上年鉴的销售量。”[285]

385

这些年鉴和过去的手抄祈祷书或牧人年鉴有所不同，它们含有计算产品成本和支付工资的统一表格，有度量衡换算表，有主要城镇间的距离。即使传播了不少错误的信息、错误的治疗术和无用的预测，商人仍然可以更加有条不紊地办理商务，因为它们不必再用自己错误的方法去吃力地计算成本、距离或工资了。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的实用手册、指南、地图和地球仪；印刷术出现之后，这些东西都大量问世了。诚然，社会史学家偶尔也注意到实用手册增产的情况，然而，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时，他们几乎一无例外地说，那是“新兴中产阶级”的需要。另一种解释说，那是早期现代社会发展中“普遍的文化情况”，如果我们对第二种解释不满意的话，我们也许会同意赫克斯特对“新兴中产阶级”观点的批评。[286]说实话，第二种解释和第一种解释一样空洞无物。我们不应该集中考虑模糊设想的、日益扩大的需求，而是应该更多地思考影响生产和供给的具体变化。

> 洛佩兹(Robert Lopez)教授证明，文艺复兴总体上是一个经济倒退的时期，不过，许多城市里的店主却需要大量的计算书。只要想一想印刷所和书店之多就明白这种需要，大学城里的印刷所和书店尤其多……在16世纪初，仅萨拉曼卡一市就有52家印刷所、84家书店……这些小商人对数论不感兴趣，但他们需要账务方面的实际指导。[287]

386

在此前的几百年里，需要实际指导的商人并不少。洛佩兹就把13世纪说成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正如萨尔顿所示，这个时期(意大利北部之外地区)的商业计算“慢得令人难以置信”。虽然自11世纪以来，城镇的增长和贸易的扩张已经产生了新的需求，但实用手册、图表、地图和表格还是五花八门，且供不应求。16世纪大学城里店铺和商贩的集中本身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诸如“中产阶级的兴起”并没有改变商业计算的发展慢得出奇的局面。扩张的市场早已存在。业已发生的变化是供销售的产品改变了。反过来，其中一些产品在设计时，印刷商就想到特别的需要。查理·埃蒂安纳1533年出版的《法国道路指南》(*Guide des Chemins de France*)很受欢迎，即为一例。其实，该书介绍的道路书商们早已熟悉，埃蒂安纳归属的出版王朝已经在推销图书的道路上奔走了50年。[288]按照埃蒂安纳的道路指南出行的法国商人是一个完美的象征，能够说明总体上起作用的历史进程。15世纪以后，西方商人在许多领域创办各种新的企业，开辟新的道路；在创业活动

中，他们都非常感谢早期印刷商筚路蓝缕的拓荒精神，因为印刷商给他们指明了道路。

印刷所建立起来以后，图书生产决定性地掌握在牟利的资本家手里，他们不满意教士的规矩和控制。如果更加明确地承认这样的转变，我们就可以阐明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而不必依靠业已滥用的19世纪图式。这些图式导致一种循环论
387 证，彼得·伯克对此做了这样的小结："每当发现一种理性的计算方法时，当事人就被描绘为资产阶级。"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理性、更精打细算"，"其社会地位的上升是理性的、精细世界观兴起的原因"(289)。

19世纪的图式里有这样一些二分术语：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建立在这些二分术语基础上的解释是由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塑造的。也许，它们有助于18世纪晚期的评论家对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政治紧张形势进行界定。但在描绘前革命或前工业的情况时，这些19世纪图式并非总是有助益的，相反，它们可能会被人用来解释16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原因，那就误入歧途了。虽然韦伯谋求与马克思的图式决裂，但他的解释仍然使这些人们熟知的两级图式安然无恙。他认为，新教教义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助燃的推力，反而促使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挥他们喜爱的主题。韦伯的论著可用来说明加尔文主义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一观点使资产阶级对旧秩序的反抗更加僵化了。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新教运动的成功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有联系，其兴起必然损害封建贵族——这个观点当然不限于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中心的辩论。新教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力量在早些时候"辉格"史学家麦考利①和基佐②的笔下是纠缠在一起的；"天主教的—封建的—中世纪的"和"新教的—中产阶级的—现代的"等公式在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依然赫然醒目。(290)在批判这些公式时，赫克斯特指出，研究17世纪的发展时，还要考虑许多其他的两级对子（他列举了10种）。在他看来，它们都宛若"天主教—新教"的分割，因为这10个两级对立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模式；16世纪是巨大的分水岭，一边是封建主义—中世纪的，另一边是中产阶级的—民族的—近代的"(291)。他列的清单排除了基于阶级、等
388 级或社会群体的分割，因而完全忽略了贵族和平民的冲突，实在是耐人寻味。他清楚证明，传统的研究如何扭曲证据，牵强附会地建立本来不太可能的联系。然而，经过他自己修正的模式却忽略了的确可能存在的联系，并存在使我们看不见任何

---

①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

② 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提倡君主立宪制，曾任教育大臣、外交大臣、首相，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

内在严密的模式这样的冒险。

比如上文业已显示,在和通俗语《圣经》翻译相关的问题上,有理由将新教与爱国主义的和民族的趋势联系在一起,有理由将反宗教改革的教会放在对立体的另一边。[292]正如赫克斯特拒绝区分天主教的和加尔文教的"国际"运动显示,这些理由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倘若我们继续坚持把16世纪的两级对子与更大、更长远的趋势分离开来,我们就会永远忽视这些理由。实际上,把宗教改革完全与断代图式分离开来的趋势,似乎完全违背了历史常识。再者,如果渐进演化的预设不再受欢迎,灾难性解释就必然成为时髦,那就会使历史学家的处境空前恶化。关于新兴民族主义和新兴中产阶级的令人讨厌的陈词滥调需要尖锐的批评;然而,如果要我们把每一次事件都当作非连续的跳跃,把每一个时代都当作"危机的时代",那就会使历史视角受到严重的扭曲。[293]

> 如果我们考虑那些两级对子……必然的直线前进趋势的感觉……就会减弱。灾难的感觉就会加重。15世纪有一段时间,各种紧张关系……处在……复杂的平衡中。随后,一两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路德不服从教皇成功了;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了……美洲的矿藏。在几十年之内,这些事件急剧地放大了体制里的紧张关系……接踵而至的事件之流不像壮美的冰川,倒像是毁灭性的火山爆发。[294]

这段文字使我们再一次回头去等待路德的到来,我们看他在教堂门口张贴他那反叛的《九十五条论纲》,却没有首先回顾在作坊里工作的印刷商,没有看到教士们在印刷术提出的问题上意见分裂。由此可见,修正论的史学家和传统的史学家都同样忽视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宗教改革和近代的出现仍然是漫无目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论述了生产方式变迁的重要性,他们竟然没有在这个转变上做更多的文章。既然人们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方式变迁上的论述,你还有理由期待,连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去研究印刷术出现所带来的力量迁移了。 *389*

迄今为止,这个课题上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我们不得不深挖有关早期印刷术的文献,以便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论你如何解释这些研究成果,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书籍生产的转变难以被塞进和现有历史图示相关的模式。因此,大多数基于体制冲突或阶级斗争的理论考虑的,与其说是封建贵族受到的损害,不如说是教士受到的损害。当政体分割为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时,和三个等级相连的三元图式难以获得容身之地。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根据阶级路线将教士一分为二。[295]宪政派史学家专注代议制议会上演的戏剧,将世俗人和教士的分割置于从属的地位,他们优先考虑贵族与平民的对立或宫廷与国家的争端。"抗税人"和

"纳税人"争吵时,教士("祈祷的人")就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了。然而,一旦印刷人开始工作,祈祷人本身就成了问题。到 15 世纪末,不仅祈祷书的生产成了都市里赚钱的产业,而且祈祷书的供应首次能够满足俗人的需要。辛辛苦苦的抄书人难以满足教士市场的需求,他们的抄书成了特权;精明的印刷商接过这一令人生畏的任务,旨在促销。教会不得不设计新的控制手段,否则教士的特权就会被瓦解。远程的辛迪加迅速形成;在一年之内,胡格诺派的《诗篇》就印行了 100,000 册,满足了法国市场的需求;《每日祈祷书》的印数多达 22,000 册,使腓力二世加强了对西班牙教士的控制,使他能够抗拒教皇的主张。[296] 这就说明,祈祷书的生产由资本家
390 掌握以后,力量的天平倾斜,有利于反罗马的趋势了。

一旦更加明确地承认了 15 世纪的图书革命,再来解释以下的现象就比较容易了:仪式的祈祷和修士的理想价值下降,更加世俗形式的禁欲即勤奋和功利的价值上升。大多数人探讨这样的价值转变时,往往把最明显、最重要的反差忽略了。当他们把"中产阶级"的节俭和勤奋与"贵族"的休闲和慷慨进行对比时,真实的人的非刻板行为就难以解释了。于是,随着天主教银行家、胡格诺派的贵族、地位上升的地主、慵懒的食租人、节俭的农夫出现时,难以解释的问题就越积越多。基于祈祷得救的理想转向基于有用的工作和对繁荣关注的理想,社会史家和经济史家提出的方法不能够充分解释理想的转变,因为他们研究的变化是羊毛贸易或地产管理的变化。思想史家的方法也不太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为他们比较的是阿奎那的论述和加尔文的论述。相反,如果对比抄书人和印刷商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我们就可能更加接近给予充分解释的目标。

抄书人或在修道院里抄书以求罪孽获赦,或以俗家兄弟的身份为修道院的抄书房工作,他们可能会抽时间写虔修方面的书,《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即为一例。德莱塞的书《坎普滕的托马斯的自传手稿》提供了这部名著如何写成的大量素材。[297] 作者坎普滕的托马斯是托钵僧,他在一所大学城的研修室把托钵僧会的兄弟们组织起来抄书,人们期待他把神学送上学科女王的宝座。然而,牟利的印刷商印行虔修著作和神学著作时,更加可能的做法是评估图书的预期销售价值。为了不至于负债,不至于债权人登门要账,印刷商不能从坎普滕的托马斯或托马斯·阿奎那的忠告里学到多少东西。他们对基督教美德的想法未必和那些修士的观点相符。

与此同时,印刷商的新企业也有助于商业和贸易获得尊严。圣徒的生平被用于商业时会失去光泽,同时,商业活动和路德之类的修士结合时却会增添几分光彩,因为路德说印刷术是"上帝的至上神恩"。这一"神圣的艺术"与主业社团有关系,和修
391 士的善行相关,同时它又为世俗的哲人和学者服务,所以它从来就不曾被降低到其他商务行业那种仆从的地位。早期印刷商不遗余力地在序文里强化这样的印象:他们的行业是非凡而神圣的天职。[298] 他们开发了一切自我推销的艺术,担任自己的新闻

广告员。与此同时,他们用印行手册等方式去满足其他商人的需要,用富有诗意的序文和大量的典故,使图书带上尊贵的色彩。巧妙地征引波伊提乌、毕达哥拉斯和缪斯,商务算术就可以被提拔到"自由艺术"的高度,和古代哲人的智慧挂上钩。(299)即使"新闻街"的居民剧增,作家们还是被视为不朽,被捧上奥林匹斯山的高度。异教的出版商很容易就混迹于文人雅士、贵族名门的圈子里,或在市政府里谋得一席之地,或在法庭上受到礼遇。即使熟练的印刷工人也挖苦寄人篱下的生活模式,表现出相当的自尊。古代抄书的奴隶百依百顺,抄书的修士也强调谦卑和罪孽;与之相比,16 世纪里昂的印刷工人自认为是"自由人,自愿为卓越而高尚的天职"工作;他们视智慧女神缪斯为自己的守护神,不断罢工以求提高工资,致使劳工成本飞快增长。(300)

印刷商尤其容易因罢工停产而受损(审查人在神学问题上挑刺时的延误也使之受损)。农事有季节周期,教士的日常作息由教堂的钟声定型;与其相比,印刷机的工作节奏则冷酷无情、不停分秒。世俗的手抄书商人将书籍的抄写分包出去,其工作是没有规律的,他们的抄书人往往是需要一点外快的兼职人。(301)然而,早期印刷商却不得不学会掌握时间-动作的技艺,以便让工人一直有活干。即使在第一笔投资的成本收回以后,不断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的。一令又一令的纸张要付钱,书市的截止日期要赶上。工作需要稳步不停地进行,公司才能兴旺。停运的印刷机意味着灾难。行业里有一种讨厌不规则工作或停顿工作的根深蒂固的情绪。(302)阿尔杜斯有一篇非常著名的序文清楚地表示,印刷商太忙,不可能虚度时日,甚至无暇彬彬有礼地接待来客。(303)他们用粗鲁的方式杜绝无目的的闲聊,把友谊置于无情的效率之下,这一处事态度在 16 世纪的佛罗伦萨商人和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商人身上都同样显著。

印刷商是干劲十足、自我奋斗、埋头事务的人,不仅和其他都市资产阶级一样讨厌托钵僧修会,而且比其他商人更有理由鄙视修士们学问里的瑕疵。再者,他们得天独厚的处境能够使自己的观点广为人知。中世纪始终盛行的反教权主义可以用大量韵文故事、滑稽剧、流浪学子的吟游诗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尚不论方济各会修士讽刺其对手托钵僧的那些故事。手稿的天头地角装饰、行列里的大写等仍然可以是恶作剧的象征,印刷商借此让牧师扮演古怪的角色,让主教和教皇下地狱。当然,正如大多数权威一样,印刷商必须要小心区分两种讥讽。一种是中世纪的讥讽,其基础是公职与人的鸿沟、理想与表现的距离;另一种讥讽彻底摒弃公职和理想,表现在启蒙运动的代表作家比如吉本和亚当·斯密身上。比如亚当·斯密就说:"忏悔,禁欲……以及修士那一整套美德处处都被人摒弃,凡有理性者莫不予以拒斥。"(304)另一方面,幽默的天性就是规避一般规律,后世史家所作的区分在中世纪的反教权主义讥讽中可能并非总是显露无遗。贪婪和好色的修士并未践行理想,反而十分可笑,这样的现象残留到理想主义时代之后。我猜想,即使在中世

纪，贞操和禁欲也并非总是受到尊重，那些聚居在拉丁区的浪荡学生不会守身如玉。拉伯雷的《自由意志的修道院》(*Abbey of Free Will*)显示被颠倒的理想；其实
393 在中世纪提升古典美德的流行文本中已经隐而不显了。本笃会教规很适合不敬的话题，在默恩①、乔叟和薄伽丘重述的故事里，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305)

无论如何，印刷商不仅在塑造争强好胜的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伦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他们还使原有的一切反教权主义的主题实现了充分的协调。尤其在木刻画和镌刻画取代了手绘插图以后，反教士的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喉舌。“辛辣的新闻艺术把矛头指向各级教士，越来越锋芒毕露。”(306) 正如希斯所示，私下的或“圈内的”俏皮话被放大为“公开的丑闻”，反教权主义在“规模、特征和信念上都发生了变化”(307)。在小酒店里和朋友笑谈本地一位教士行为不检点、讥笑托钵僧乞讨时没有怜悯之心是一回事；在广为流传的印刷品里公开宣示对削发的或穿道袍的修士内心的厌恶，讥笑他们不该在街上乞讨施舍，仿佛他们无权乞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没有完全压抑住被禁止的想法，无个性的印刷品似乎还是为内心隐藏的厌恶提供了群体的支持。

对修士和托钵僧的抨击使贵族和平民、骑士和商人甚至宫廷和乡民罕见地站在同一立场。用赫克斯特的话说，“俗人—教士”、“世俗的—宗教的”、“教会—国家”等两级对立赫然在目，超越了基于阶级或地位群体的划分。对修士和教会的第一波攻击绝不仅限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阿雷蒂诺②的反教廷色情作品很受意大利贵族的欢迎；乌尔里希·冯·胡腾参与了德意志印刷商对教廷垄断的攻击；威尼斯的寡头对受辱托钵僧的抱怨充耳不闻。(308) 法国革命以后，教士和贵族被
394 视为天然的盟友；但胡腾的时代绝不是这样的景象。

贵族善于决斗和狩猎，却不善于读书，其威望一落千丈，因为军事谋略家、学问渊博的参事和官僚在宫廷受宠，使贵族的地位受到损害。

> 在我那个年代，绅士们读书只需走进教堂，即便如此，他们也满足于学拉丁文和祈祷书。为宫廷或军队培养的人进专门的学堂，诚为恰当之举。他们学骑马、跳舞、用武器、吹横笛……再学一点数学，这就是他们的全套本领……已故的元帅蒙莫朗西③知道如何保住自己在各省和宫廷里的地位，但他并不

---

① 让·德·默恩(Jean de Meung，约 1250—约 1305)，法国作家，续写纪尧姆·罗利斯(Guillaume de Lorris)的《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将其变成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该书以极端的写实手法和自然主义手法表现色情，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独霸贵族爱情的论坛。

② 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擅长写讽刺作品。

③ 蒙莫朗西(Anne de Montmorency，1493—1567)，法国陆军元帅，三朝重臣，多次参加内外战争，在与胡格诺派的战斗中伤重不治。

识字。(309)

一旦军事指挥需要指挥官掌握论兵器和战略的“大量书籍”(310)，一旦宫廷谋士应召时必须要能够“清晰思考、分析形势、草拟文稿、通晓法律技术细节、通晓一门外语”(311)，如果他们再不识字，要保住“宫廷里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了。诚然，炸药使骑士过时。然而，博学的宫廷谋士制定战略，使国内善于决斗的贵族服服帖帖，在国外实施宏大的谋略。如果有时不能采纳新的谋略，那就是为新人的崛起铺平道路。

比如，法国穿袍贵族的地位就日益显赫，无论我们是否将他们的上升描绘为“崛起”或“重组”，我们在考察其地位升迁时都要记住这一新老交替的变化。16 世纪以后，购置了地产、接受了贵族生活方式的行政官僚和治安官僚显然放弃了许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312)。但他们并未放弃一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从 16 世纪初开始，穿袍贵族(robe nobility)有了私人藏书室，他们不仅将佩剑贵族(noblesse d' epée)抛在后面，而且到 16 世纪末已经超过了教士。(313) 穿袍贵族与佩剑贵族获得平起平坐的地位，难道不是由于靠读书学习和在实干中学习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吗？新的权力进入了司法官僚的手里，他们界定和解释有关特权、垄断、专利和行政职位的法律条文，且同时谋求自己的特权、利润和地位。詹森派的议员之所以像新教的司法官，大概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精神无孔不入，而是因为世俗的《圣经》阅读和司法训练养成了他们类似的态度。

然而，(正如 J. H. 艾略特在另一语境下所言)“有文化的和训练有素的世俗人的崛起”未必是“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崛起”(314)。相反，这通常只意味着名门之后得到了一种新的学历。1517 年，从弗洛本在巴塞尔的印刷所发出了新时代最著名的一篇宣言，由红衣主教沃尔西①的秘书、《文科教育之裨益》的作者理查德·佩斯执笔，这是给圣保罗学校创办人的献辞：

> 作者对这篇献给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的文稿起草时的情况作了一番描绘。几年前在旅途上……他在进餐时遇见一位绅士……绅士抨击做学问的人……“凡是有学问的人都是穷光蛋——连伊拉斯谟都抱怨受穷。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如果我的儿子做学问，我宁可让他被绞死。绅士的儿子应该会吹猎号，精于狩猎，灵巧地调教和使用猎鹰。学文学的事情应该让给乡巴佬的儿子。”佩斯禁不住尖刻地反问：“国王需要回复外国使节的文书时，他不会去找会吹猎号的绅士，而是求助于有文化的乡巴佬。”(315)

① 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1475？—1530)，英国枢机主教、大法官、政治家，控制英王亨利八世的内外政策，1529 年因未能促成罗马教皇同意亨利与王后凯瑟琳离婚而以叛逆罪被捕。

诚然，理查德·佩斯这漂亮的反驳嵌入了他的既得利益，但他的观点的确适合他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每当重臣抱怨查理五世启用出身寒微的朝臣时，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总是三令五申地告诫他们说，他们的子女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316)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提醒读者注意，这一传闻似乎是精心安排从而为家庭教师、学校教员和教材作者服务的。重要的问题是，16 世纪是学校教员和教材
396 作者自立的时代。这个过程应该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加以区别，因为它促成了欧洲贵族的“重新构建”。据赫克斯特记述，英格兰不仅出现了“书本教育的迅猛发展”，因而把教士排挤出一些学校，而且当绅士们衣锦还乡去经营自己的庄园时，各种书籍也接踵而至。“……接受了书吏训练的人不再集中在学校里，也不再直奔教堂或中央政府的办公室。书本知识和他们一道进入各郡，治理乡村的绅士们普遍掌握了书本知识。”(317)

贵族养成读书的品味对早期近代欧洲的书面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证明了以下等式的荒谬：“读书界的兴起”等于“中产阶级的兴起”。作为早期印刷商的赞助人和消费者，欧洲贵族在文坛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不仅对自由思想家和勇敢的无神论者产生了影响，而且对鉴赏家、文学爱好者和艺术爱好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对迂腐的学究或专业行话不屑一顾，喜爱通俗语而不是拉丁文学。(318)

当世俗的平民接过书籍生产时，第一等级似乎比第二等级蒙受更大的损失。那些手抄书文化的主要掌管人失去的东西自然更多些。在第一等级内，修会的教士尤其容易受伤害，因为他们曾经在教学、布道和提供书籍的工作中挑重担。在过去的时代里，修道院被毁意味着书籍生产的倒退，但印刷术之后，倒退就不至于发生了。毫无疑问，在都铎王朝的英格兰，修道院被掠夺、手抄书散佚之后，文学和学术的繁荣并没有停止。从事教学和布道的教徒被调动起来以满足中世纪城镇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印刷所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也遭遇到更大的抵抗。教材的生产、教学计划的形成因教皇和世俗官员的冲突而受到影响。从事教学的教团（比如耶稣
397 会）咄咄逼人的活动显示，教士督察教育的情况再也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了，他们不得不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直至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天主教圈子里争论的核心问题。）当世俗的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员自立以后，世俗的教士也被卷进了这样的论争。(319)我们已经看到，面对世俗的公共教育体制的确立，过去负责为本地学校提供教科书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区也不能阻挡，而是束手无策了。(320)

如上所示，我认为，书籍生产的转变给基督教的影响相当迅速的一击；尽管中世纪晚期世俗图书生产迅速扩张，俗人的虔诚有增无减，基督教的影响还是很强大。在教会和神学院的庇护下，一批印刷所很早就开办起来了。在教会的赞助下（在红衣主教胡安·德·托尔克马达[Juan de Torquemada]主持的一所德意志本笃会修道院里），斯韦因海姆（Sweynheim）和潘纳兹（Pannartz）（两人都是新教徒）

建立了意大利第一家印刷所。这两位印刷术先驱离开苏比亚科(Subiaco)奔赴罗马时,他们走的线路和中世纪教士及抄书人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不过,他们的印刷所并不兴隆。[321]在 1460 年和 1500 年间,罗马建立起来的印刷所达四十来座。稍后,阿尔杜斯的儿子保罗经营的印刷公司孜孜不倦地为反宗教改革的教皇服务并从中获利,就像阿尔杜斯以前为人文主义者服务而赚钱一样。然而,罗马从来就没有成为重要的印刷中心。这一扩张中的产业需要很大的市场,而教会提供的市场太小。到 15 世纪末,最兴隆的印刷中心都处在商务的十字路口,处在教会的控制之外。到 15 世纪和 16 世纪之交,这样的中心很少是由奉承教皇、红衣主教、多明我会的宗教裁判官或神学院的教员经营的。相反,威尼斯的印刷商敦促作家们写受读者欢迎的世俗主题。

> 威尼斯主导意大利的印刷业:也许 16 世纪的图书有一半是在这里印制的……威尼斯印刷商反映并强化变革……引领公众的胃口……使流行的通俗语文学在商务上获得成功,给意大利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独立生活与写作的机会……阿雷蒂诺对教堂的辛辣批评未经审查而问世。针对托钵僧和牧师 398
> 的侮辱、诽谤甚至色情已经司空见惯,以至于反教权主义成了一种文学传统……作家们仅仅避免批评威尼斯本市的事务。[322]

和威尼斯的早期印刷商比较,法国的印刷商无论是巴黎、莫城或里昂的印刷商都在教士审查官的手里遭遇到更大的困难。在 15 世纪 70 年代,索邦神学院仅仅在短时期内给法国的第一家印刷所提供了厂房。[323]但在早期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对神学审查官更友善,这些审查官阻碍出版,引起法国出版业的反感。[324]罗伯特·埃蒂安纳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索邦神学院的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位无神职在身的、商界的匠人就在索邦神学院附近印制欧洲著名的作品,这些书体现了很高的品位,而神学家们因忽视了这样的品位而受到抱怨,这些书是《圣经》研究的书、科学研究语言的书。"[325]

> 每当巴黎大学书商的作坊和书摊附属于大学,每当其宗旨是为神学院和文科服务时,这些学者—印刷商经营的印刷所就成为赋予学者报偿和威望的独立的中 399
> 心。这些印刷所从事远程的经营,推动世俗学问前进,它们吸引游学的学者,就像修道院的藏书室和中世纪的大学吸引人一样。这些新办的印务公司的老板不仅赢得了君王的荫庇,而且自己也向别人提供帮助,向贫寒的学生和职员提供业余的工作和食宿,这些人过去依靠教会就业。当他们不再将教会补贴当作谋生的主要支持时,当他们能够得到世俗的惠助时,学者们就比较大胆地谴责教士的知识垄断,并指出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了。[326]

与印刷商的合作使新一代的文人能够嘲讽时弊,就像德意志小册子作家讥讽

科隆大学的教授那样。就像“无名小卒”折磨如日中天的约翰·罗伊希林那样，索邦神学院学富五车的博士们很快就成为伊拉斯谟式讥讽的对象，成为拉伯雷式调笑的靶子。不仅世俗人的学问超过了经院哲学家的学问，而且新的机会为“出身卑贱、敢于冒险的笔杆子”敞开了大门。默默无闻的年轻教士比如伊拉斯谟和拉伯雷既不用待在修院里又可以扬名显身。他们可以在印刷所里找到更加合意的工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天才去赢得赞助和名气。[327]年轻的修士弗朗索瓦·拉伯雷在里昂一家印刷所找到工作，边打工边上医学院，因而免受下地狱般纪律的束缚。他为印刷商格里菲乌斯(Sebastien Gryphius)担任医学古籍的编辑；稍后，他以此为基础获得了市立内科医师的职位。他发现写作这种可能冒犯神灵的技艺特别给人以报偿，于是就吹嘘说：“我的《巨人传》两个月之内销售的数量超过了《圣经》10年的销售量。”毋庸赘言，这样的态度不会受到学者气质的印刷商的欢迎，也不会受到
400 索邦神学院神学家的欢迎。罗伯特·埃蒂安纳本人就谴责这位畅销书作者口出狂言、不敬上帝、亵渎圣灵。[328]但审查制度的政治造成了同床异梦的伙伴。埃蒂安纳神圣的《圣经》和拉伯雷低俗的故事都受到索邦神学院审查官的谴责，但都被法国后世的自由思想家所怀念。

年轻的教士伊拉斯谟来自鹿特丹，无亲无故，他也逃避对高级教士唯命是从的生活，充分利用了印刷术提供的新形式的惠助。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荷兰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将自己的名字塞进一位法国学者书中的空白，讨好一位心地善良的印刷商，有了更好的交易后就把人家抛弃——读到P. S. 艾伦对他的记述之后，你发现难以把这位令人讨厌却雄心勃勃的年轻修士和高贵的、文坛崇拜的“人文主义之王”的形象加以协调。[329]艾伦笔下的野心家已经够坏，但稍后让·奥约(Jean Hoyaux)的文章则太过分了。文章显示，印刷商赠予的数以百计的样书被这位狡猾的作者用来愚弄数以百计的人，使之自认为是有幸得到题献书籍的人，并使之满怀希望地为他提供数百种补贴。[330]我们难以想象，坎普滕的托马斯会采用类似的谋生手段，也难以想象德文特的伊拉斯谟在修道院里完成学业以后会乖乖地在那里当抄书人。无论如何，伊拉斯谟显示，即使在有人梦想拥有版权或版税之前，文人就能够从受雇佣的地位里解放出来了——他们可以把笔的力量和印刷机的新力量结合起来。他从无数的绅士和女士那里得到宠爱和赞助，不必单独依靠任何人；他颇有说服力，能够为自己真爱的事业赢得支持。[331]

有趣的是，年轻的加尔文出道时也追随伊拉斯谟走过的路。1532年，他自费
401 出版了对塞内加的评论，希望造成轰动。该书问世时，他致信朋友们说：“色子已经投出去了”，敦促他们布道或讲话时提他这本书。[332]然而，在16世纪30年代，在塞内加的评价问题上和伊拉斯谟争论可不是扬名显身的好办法。加尔文论塞内加的书“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涟漪，看来靠写作为生的希望微乎其微了”[333]。如果说加尔

文的下一步举动更加成功,那就是对他估计过低了。他的《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使他一举成名。当然,到 1535 年时,加尔文就不只是一位渴望成功的作家了,他经历了信仰上的改宗。这本书反映了他新的使命感和福音传播的激情,也是一种新型神学家的亮相,他是没有获得神学院学位的神学家,是没有被授予牧师职位的神学家。

印刷术为布道者和教师开启了新的机会。希望对大批信众讲话却不必接受神职或进神学院的人有了布道和执教的机会。印刷术使瑞士的一座小城成为新教的罗马。(334) 和文人一样,由于借重印刷术,赋有真诚的精神天命的宗教改革家从过去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不必经过传统的渠道,不必讨好地方的宗教法庭,不必翻越阿尔卑斯山去罗马朝觐,他们就可以发起改革运动了。在贯彻执行新规划时,他们不再等待教皇恩准成立一个教派或改良一个教派。相反,靠地方官的支持,凭借和出版商及书商的合作,他们的目标就可以实现。在中世纪社会里,修会的教士总是和地方官不和,总是更直接地向教皇负责,而不是对其他的社会群体负责。而里昂或威尼斯的印刷商的忠诚却指向相反的方向。转而使用印刷机的宗教改革家不仅减少了对修道院长和教皇的依附,而且他们和蔑视修士学问、喜欢世俗文学的人更加亲近。伊拉斯谟和加尔文的共同价值有别于以前的宗教改革家,试图理解这样的差异时,思考他们和印刷商的关系似乎是值得的。神学家和学者将自己的文稿送到印刷所时,或者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时,他们接触的是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企业精神,他们熟悉的是一种新的职业文化。(335)

4.6 从南欧的天主教到北欧的新教:启蒙思想的温床

大多数描绘宗教改革思想语境的文献都用一些过度概括、过分宽泛的字眼,仿佛这一思想就是漂流的浮萍,没有任何时间地点的根基。探讨"世俗力量"含糊其辞、不留余地,既不去造访新的作坊,也不审视城镇里配置的印刷机有何意义。

> 新时代的象征不是伊拉斯谟这位庄重而沉思的德文特人……而是安特卫普和奥格斯堡的国际商业世界,或丢勒的纽伦堡,纽伦堡是欧洲商业的象征,它因融合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和德意志的技术而具有吸引力。新欧洲的主要成分是律师、银行家、实业家、官僚、大师、宣传家、印刷商、设计师和熟练工匠以及法官和市民……(336)

不把 16 世纪的纽伦堡、奥格斯堡和安特卫普当作新时代的象征,而是当作旧时代的象征,那也是可能的。在那样的旧时代里,都市社团仍然是强有力的政治单位,中世纪的贸易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337) 比如,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6 世纪 50 年代的纽伦堡经历了"商业地域的收缩"。纽伦堡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

束。在此之前,“传奇的经济政治扩张是德意志中世纪晚期历史非凡的一章”。

> 到16世纪70年代,欧洲和德意志的政治经济力量蓄势待发,然而受传统束缚的都市贵族既不理解又不同情这样的力量……独立的城邦已然成为另类……城邦那种自足的体制……其价值和狭隘的取向……很快就要成为博物馆的展品了。(338)

403

纽伦堡的商人珍视稳定,喜欢经营比较保险的商品,大多数都“规避高额投资那种难以把握的世界”。很少的企业家“实行有风险的金融资本主义”,或在新兴的海洋贸易里投资。一个令人注目的例外是“雅各布·克隆伯格(Jakob Cronberger),他曾经到塞维利亚[①]办印刷所”,其儿子和女婿也来参与经营,他们从加勒比贸易中赚钱。(339)不过,到16世纪初,纽伦堡有了一家大型的国际性企业,其创办人是商人出版家安滕·克隆伯格(Anton Cronberger),他在丢勒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丢勒的纽伦堡”和前几代匠人熟悉的纽伦堡截然不同,和15世纪70年代以前的居民所熟知的纽伦堡大不相同。总体上说,两个纽伦堡的不同不是由商业、人文主义或一般技术引起的,构成丢勒所熟悉的“新欧洲”的主导因素是印刷所的建立。一家印刷公司使丢勒的画作在世界各地发行。

同样的精神促成了异端和宽容。1524年,教皇的一位使节访问纽伦堡时感到惊讶和不快,因为市政府心甘情愿地允许路德派的书籍在这里出版和销售。他评论纽伦堡公开表现出来的对四十几种宗教信仰的宽容,这是在伏尔泰对比英格兰人的宽容与法国人遭镇压之前两百年发生的事情。(340)

当“庄重而沉思的德文特人”伊拉斯谟和“狭隘的”和“受传统束缚的”纽伦堡进行比较时,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语境去给宗教改革的思想定位是不容易的。当我们的注意力更加明确地集中在印刷所上,当我们注意到印刷所建立在悠久的教堂、大学、市场和行会议事厅的附近时,问题就似乎接近解决了。印刷商给小城镇和大城市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要素;这个新要素在各地都是类似的,德文特受到的影响并不亚于纽伦堡、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威尼斯受到的影响。几种研究15世纪

404

里昂的成果显示,印刷商来到一座相当大的商业城市时,仍然会引起相当大的轰动。他们使罗纳河畔的这座文化荒漠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肥沃而兴旺的思想中心,吸引学者和文人来到这个仍然受赚钱和诉讼主导的城市。(341)印刷商在路德的维滕堡、伊拉斯谟的巴塞尔、茨温利的苏黎世和继后的日内瓦的存在也值得注意。在每一座安装了新印刷机的城镇里,一些传统的障壁都土崩瓦解。新的职业机会有了,不仅商人和工匠而且教授和布道者都得到了新的机会。比如,15世纪的奥格斯堡

---

① 塞维利亚(Seville),西班牙西南部城市。

就有一位牧师转行搞印刷,然后他又出国去担任巴塞尔一家大公司的代理人。[342]然而,在宗教改革研究领域里,像他这样转行搞印刷的牧师很少;研究他们并不那么有趣,更加有趣的可能是使许多牧师坚守岗位的力量,即使与罗马决裂,他们还照常布道。在这场大规模的、难以逆转的运动里,许多中世纪晚期的城镇和公国表面上依然守旧,这样的特别取向发挥了意味深长的作用。

雄心勃勃的印刷商利用多元的司法体系和不同的地区法规,在不同的城镇建立了分公司和分销处。他们发现,继续出版被禁的图书和小册子是相对容易的,尽管他们遭遇到欧洲最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君主发布的最强硬的审查敕令,以及忠于罗马的神学家和牧师的坚决反对。除了销路畅通、廉价纸张供货充足和金融市场有保障等因素之外,机印书贸易的兴旺取决于他们出版受欢迎产品的机会;他们设法避免审查造成的稽延、重金的处罚和人身的危险。由于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和城邦、社区和小公国壁垒森严,这样的机会成倍增加,因为在近代早期,彼此隔绝的地区成了互补往来的独立的政治单位。[343]我们习惯把大规模的商业活动视为排外思想的敌人,但灵活经营的出版商有充分的理由规避秩序井严、内部巩固的王朝,有理由惧怕来自罗马的集中控制。但他们能够从推销通俗语《圣经》和《诗篇》中赢利,从出版伊拉斯谟、拉伯雷、阿雷蒂诺等人的著作以及富有争议的宗教小册子中赚钱。当他们的产品上了《禁书目录》在欧洲各地流通时,他们无需花钱打广告而获得的利润就更加可观了。

由于印刷商和新教徒的利益交汇,既然新媒介达成了昔日福音传教的目标,所以如果再去争论在改变西方基督教的诸多因素中,究竟是物质因素或精神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或宗教因素更加重要,就毫无意义了。这些二分对子似乎建立在虚假的范畴上[344],但它们同时又使人难以感知到特色分明的、由于不同压力群体的合作而产生的混合范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坚持,列举要素、分析原因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倘若我们在分析这些混合的因素时忽略了印刷商的利益和观点(大多数论者的记述就有这个缺陷),那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机会:新教—天主教这一对二分术语和其他改变欧洲社会的同步发展是彼此关联的。并非印刷术产生的一切变化都和宗教改革的事业协调;许多变化和宗教改革没有关系,有些变化对宗教改革是反感的。在新教的教会法庭管理的地区,牧师和印刷商常常关系不和。[345]但新教徒和印刷商的共同之处显然要超过天主教徒和印刷商的共同之处。宗教分化对欧洲社会的未来发展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和印刷术释放的其他新力量互相影响。如果说新教徒与某些"近代化"趋势的关系比较密切,似乎胜过天主教徒与这些趋势的关系,那么主要原因是新教改革家不大阻碍这些新趋势;相反从一开始,他们就大力强化这些新趋势。

当社会运行的重心从教士转向平民以后,三个社会等级的平衡就改变了,传统

的社会等级体系随之瓦解。这一转变的后果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显示出来。但对其初期后果，不同的宗教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就决定了以后的历史模式。
406 在新教国家里，这些效应很快就实现了：修会瓦解，印刷商被鼓动起来去完成使徒的使命，他们用不同的语言传播福音。在反宗教改革的教会控制的边疆之内，各种措施被调动起来去减轻和抵制这些后果。新的修会比如耶稣会、宣教会讲演堂建立起来；其他教派的传授和宣讲受到《禁书目录》和出版许可证的钳制。因此，在前景光明的地区，印刷商财富盈仓；在地域小、人口少、新教已经扎根的国家，印刷商的财富就逐渐亏损了。

> 索邦神学院对路德教义的谴责(1521 年 4 月 15 日)凑巧和巴塞尔非凡的商业机遇同时；在巴塞尔，《路德教义》(*Lutheriana*)和其他福音传播文书……得到宽容，那里的政治同盟……支持……和法国的图书贸易。(346)

在 16 世纪教派界线尚未确定之前，天主教地区的人阅读《圣经》的热情似乎并不亚于后来新教地区的人。与此相似，天主教印刷商也将人文主义者的学问和虔诚及谋利结合在一起。他们和新教印刷商一样雄心勃勃、勤奋工作。他们还为 16 世纪欧洲人口最多、国力最强、文化影响最大的王国和公国服务，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及其辽阔的帝国)、奥地利、法兰西、南德意志的公国以及意大利的城邦。尽管如此，天主教印刷商的确不如新教印刷商成功：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他们在拓展市场、扩张运营、业务多元化方面，略逊一筹。

> 到 16 世纪中叶，路德宗教改革的动力业已耗尽；然而，新教及新教的图书贸易在德意志的精神生活方面仍然呈现上升的态势，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 19 世纪初。顺便指出，这一趋势从德国南部到中部再向北部蔓延。哈布斯堡家族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的统治者竖起了防止异端著作的壁垒，却反而给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出版商垄断他们领地的市场以可乘之机，这的确是事实；不过，异端著作对德意志生活与文学的影响几乎是零……
>
> 从 1550 年到 1800 年，铸字、印刷、出版和售书几乎全部是新教的保留地。法兰克福也是这样的保留地。即使在法兰克福书市被耶稣会毁掉的时候，法兰克福在书籍生产、字钉销售、图书设计、插图版印制方面仍然保住持了领头羊的角色……(347)

407 这段文字对德意志发展的描绘和整个欧洲在印刷术第二个一百年里的发展情况是有关联的。也许，从南到北的最戏剧性的转移是在 16 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发生的。“在 16 世纪 50 年代，西班牙语的世界出版中心从西班牙(塞维利亚、阿尔卡拉、萨拉曼卡)转移到低地国家。”(348)普朗坦在安特卫普开设的印刷公

司在西班牙海外图书贸易扩张的黄金时代里获得了最大的份额。普朗坦本人不仅成了唯一的皇家印刷商，而且成了一切竞争对手印刷品的主要审查官，他垄断了地域辽阔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教士们需要的一切礼拜仪式书。

当然，我们在归纳数百年间不同地区的发展时，必须要为可能的修正和例外留下余地。在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地方，16 世纪末的天主教地区出现过短暂的活跃期，宗教复兴使反宗教改革的印刷所忙个不停。(349) 而且在 17 世纪，一些天主教印刷公司继续生意兴隆，不仅在巴黎这种迅速扩张的都市中心是如此，而且在安特卫普这样衰落的都市也是如此。

比如，在其黄金时代过了很久之后，在安特卫普这个海港城市里，普朗坦-默雷图斯的印刷公司还是有利可图的，该公司继续从西班牙领地的图书贸易中赚钱。它还为国内市场生产礼拜仪式和虔修著作，同时出口装帧精美的寓意画图书。鲁本斯①这类高水平的艺术家应聘为该公司精美的图书作画。普朗坦的公司为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它还是未能逃脱上述规律。1585 年，天主教徒夺回安特卫普之后，公司的视野开始萎缩，其多种多样、颇具国际视野的出版政策走向终结。扩张市场的追求走到尽头，公司的政策转向服务地区市场，为富有的天主教顾客永恒不变的需要服务；公司遵循小心翼翼、安稳保险的路子蹒跚而行（和其富有冒险精神的创业路形成强烈的反差）。(350) 天主教徒默雷图斯留在安特卫普，他调整政策以适应萎缩的市场。相反，普朗坦的另一个女婿弗兰斯·拉菲伦吉乌斯却奔赴莱顿，皈依了加尔文派。在那里，他找到了更多的机会。(351) 天主教徒在安特卫普胜出以后，弗莱芒印刷商的天地就缩小了，不过，加尔文教徒在荷兰胜利以后，荷兰印刷业的黄金时代即将出现。不久，拉菲伦吉乌斯在莱顿的大学出版人地位就被埃尔西韦尔家族夺取了。 408

路易·埃尔西韦尔是家族印刷公司的创建人。他走的路和拉菲伦吉乌斯的路大同小异，先在安特卫普工作（或许曾经在普朗坦手下服务），然后在西班牙人掀起的狂热中逃离安特卫普，来到莱顿定居。和默雷图斯的天主教印刷所不同，埃尔西韦尔家族的企业善于扩张，在许多不同的世界开启了窗口。尤其在阿姆斯特丹的分部成立以后，公司的眼光越出了新教的莱顿大学与荷兰的加尔文教徒的市场，走向了更大范围的多种多样的社群。(352) 埃尔西韦尔的公司的经营方针和威尼斯的阿尔杜斯、安特卫普的普朗坦颇为相似，其服务对象是普世的学界，不局限于任何宗教、王朝或语言边疆。多亏加尔文教在低地国家的印刷业，天主教的哲人比如伽利

①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艺术代表人物，在欧洲艺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绘制了许多肖像画、寓意画、历史画和宗教画，代表作有《基督下十字架》、《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农民的舞蹈》等。

略和笛卡尔才能够为一种新形式的公共知识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样的公共知识重新塑造了全世界的人类文化。

到 17 世纪中叶，不仅阿姆斯特丹崛起成为文坛的中心城市，而且过去的中心比如威尼斯和里昂也经历了和安特卫普同样的衰落。从 1517 年起，欧洲大陆的印刷商们的迁移方向都是新教的中心城市，市场扩张和多元化的趋势在新教治理的地区比在天主教治理的地区迅速，这一趋势足以和其他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考虑。

比如，如果考虑早期近代图书贸易中心的转移过程，我们就可以阐明保罗·哈
409 扎德(Paul Hazard)追踪的思想运动以及特雷弗-罗珀提出的与此相关的问题：

> 在第一个阶段，北方诸国到地中海沿岸去寻找思想；同理，在第二个阶段，地中海诸国到北方去寻找思想……宗教深深地卷入这一转移过程中……文艺复兴是天主教现象，启蒙运动是新教现象。在 17 世纪，无论在经济还是思想领域，新教国家……都从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夺取了领头的角色。(353)

虽然你可能会跟着这一论点的冲击力走，但你也可能会质疑这一断言：文艺复兴是天主教现象，启蒙运动是新教现象。实际上，试图将两种文化运动与两种教会联系起来的困难也可能使你怀疑，宗教是否真的卷入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即使你坚持认为其中真有宗教的卷入，除非你考虑印刷商的活动，否则宗教卷入的性质仍然是模糊不清、颇有争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都具有世界眼光，都反对教条，不可能被教条主义的忏悔路线分割开来。然而，这两个群体都非常倚重印刷机，而且印刷机的重心都偏离主要的天主教商业中心，向与罗马决裂的北方地区倾斜。

毋庸赘言，印刷业的命运和其他早期资本主义企业一样，都受到许多变量和同期变化的影响。考察中世纪晚期贸易模式而不是宗教事务，我们就可以解释威尼斯和里昂发展成为早期印刷业中心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要理解为何维滕堡和日内瓦的印刷机开始轰鸣，你也必须考虑宗教因素。日内瓦的第一种出口产业是由法国的宗教难民创建的："法国人装备了日内瓦的第一种出口产业即出版业……加尔文 1562 年去世时，日内瓦的唯一出口产品是机印书，出版业既是宗教企业也是经济企
410 业。"(353)在 16 世纪 50 年代，涌入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的宗教难民潮急剧地改变了该市的专业人才结构。印刷商和书商从三五家飙升到三百多家。(355)正如 16 世纪 20 年代索邦神学院对异端印刷品的谴责使巴塞尔受惠一样，16 世纪 50 年代日内瓦受惠的时候法国也蒙受了损失。"富裕的宗教难民偷偷地把资本转移出法国。"(356)主要的印刷公司离开法国，里昂和日内瓦之间双向流动的印刷工人"突然变成单向流动，且流动的比例又刚好颠倒过来"(357)。罗伯特·埃蒂安纳离开了巴黎，不过劳工和资本的逃亡主要来自于里昂。1585 年，让·图尔内二世(Jean Ⅱ de Tournes)

将公司从里昂迁移到日内瓦；此时，里昂这个法国昔日伟大的印刷中心辉煌不再，留下的公司局限于为日内瓦的印刷品重新包装，加上书名页，以便掩盖其加尔文教的原产地，然后就转手贩运到天主教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到16世纪末，里昂印刷商依赖日内瓦的印刷商的大局已定，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很复杂。劳工成本、纸张供应和其他许多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法国存在的宗教依附关系及其对通俗语《诗篇》、《圣经》和各种畅销书的控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58)

和里昂及安特卫普的印刷商一样，威尼斯的印刷术也陷入了衰落，原因有多种，包括地中海贸易向远洋贸易的转移。(359)不过，16世纪初灵活的经营方式不复存在，印刷商的经营受到反宗教改革教会的控制，《圣经》印刷停顿下来。(360)在1570年到1490年之间，威尼斯共和国对罗马的审查采取合作的态度。地方官不允许出版上了《禁书目录》的著作，威尼斯印刷公司就遭到持久的打击。(361)即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总督和教皇不合作时，意大利通俗语版《圣经》还是不得不从国外走私进入意大利，这使外国竞争者而不是威尼斯印刷公司的腰包鼓了起来。 411
焦瓦尼·迪奥达蒂印制他翻译的意大利语《圣经》不是在威尼斯，而是在日内瓦。同样，他翻译的伽利略的朋友保罗·萨尔皮的《特伦托公会议的历史》也不是在威尼斯而是在日内瓦出版的。该书对天主教的审查官发起抨击。萨尔皮(Paolo Sarpi)写道："《禁书目录》是假借宗教使人疯狂的阴谋，一切阴谋，莫此为胜。"(362)在评估萨尔皮对威尼斯共和国及其对罗马的政策所持的立场时，肯定应该说一说威尼斯印刷术业已低落的地位，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曾经世界知名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了。

> 萨尔皮的宗教立场似乎……更接近维滕堡和日内瓦，而不是罗马……这不是因为新教吸引他，而是因为新教教义的立场似乎和他珍视的自由共和国的自由市民的价值更加协调。如此，萨尔皮能够给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大趋势提供一些洞见，尤其对两者的关系提供一些洞见。(363)

在寻找维滕堡和日内瓦对萨尔皮这位威尼斯托钵僧产生吸引力的因素时，我们需要考虑印刷商发起的运动。威尼斯人也许会因为自由共和国自由市民的身份而感到骄傲，然而他们很清楚，他们不再享受出版自由。彼得·伯克说："为了理解萨尔皮面对的问题，现代读者想一想东欧作者在西欧出书的现象，这对他有帮助。"(364)日内瓦的印刷商为他提供的服务胜过他的同胞提供的服务。文质彬彬的人文主义提供的帮助不如外国君主提供的荫庇。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给了他在威尼斯得不到的出版机会。(365)你可以在威尼斯鼓动反对教会诏书和有敌意的托钵僧，但你不能在这里出版反教皇的论著。和伽利略、坎帕内拉等爱国者一样，萨尔皮不得不诉诸迂回的策略。他说："我不得不戴上面具。"(366)在这里如同在其他问 412

题上一样，他的立场更接近与秘密书商打交道的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而不是接近于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那种文质彬彬的人文主义者。意大利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必考虑如何对付教廷颁布的《禁书目录》。

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对威尼斯自由的高度估计："……一般的说，反宗教改革压制过去的政治秩序支持的文化遗存。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威尼斯是唯一的例外，威尼斯保留了意大利其他地区失去的自由。"(367) 在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的时代，威尼斯人不必将手稿走私到英格兰或日内瓦去出版。到了萨尔皮的时代，他们却不得不走私书稿到国外去印刷。(368) 本书稍后对伽利略案例的讨论说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一回事，出版自由是另一回事，两者有重大差别。在解释文坛的中心城市从威尼斯转移到阿姆斯特丹时，我需要强调这一差别。

当然在近代早期，图书以外的商品贸易也转移到北方，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值得再次重申的是，除了宗教分割之外，印刷业的迁移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想要理解宗教分割如何影响印刷术这一早期资本主义企业，最好是审视印刷业而不是冶金、纺织、造船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企业。而且，印刷业的扩张可能还影响到其他许多产业的发展速度——不仅是因为铸字和冶金有关、纸厂和纺织有关、宣传广告和销售有关，而且是因为技术创新和熟练劳工发展最快的地区可能就是印刷业兴旺发达、图书市场扩张的地区。

413 在1570年到1630年之间，曾经支配低地国家图书贸易的安特卫普让位于荷兰北方诸省，这几个省反叛西班牙成功获得独立，成为尼德兰联合共和国。最近一篇研究荷兰北方诸省图书业快速发展的文章显示，北方令人惊叹的繁荣主要是由于来自南方的进口。根据这一研究，不仅外来移民提供了至少68%的人力，而且"几乎所有最精明的书业人都来自南方"(369)。另一种类似的迁移是熟练技术人员的迁徙：南特敕令①撤销以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造纸商移居荷兰，这有助于加强荷兰的优势。(370) 有一种现象是马克斯·韦伯非常关注的现象：新教徒在"训练有素的高级技术人才和商务人才"中占大多数(371)，我们考虑这一现象时发现，如此之多的印刷商和造纸商"用脚投票"，支持新教地区，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同理，不同教派对文化学习的激励各有不同，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尽量绕开和识字率有关的问题是明智之举，因为数据的不足和标准的不稳定使有关

① 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1598年4月13日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法令，准许新教徒（含胡格诺教徒）享受宗教自由。1685年10月18日，法王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剥夺新教徒的一切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几年内，移民英格兰、普鲁士、荷兰和美国的胡格诺教徒达四十余万，法国因此而失去了最勤劳的商业阶层。

识字率的一切概括都令人生疑。18 世纪以前的刚性证据不仅缺乏，而且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的是学会写字而不是学会读书——遑论通过阅读来学习的数据。以后几百年里大量的技术证据显示，法国国内两个地区的差别，和两个国家对比的差别一样显著——这就说明问题之复杂。(372)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满足于经常有人做的那种无端的结论："师资问题是基本的个人能力，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都至关重要。"(373) 除了其他问题之外，"整个现代化过程"之难以界定是众所周知的。不过，正如我上文所言，你太大胆可能出错，但太谨慎也可能出错。在通俗语《圣经》阅读 414
上的分歧使"基本的个人能力"受到的影响，似乎是很值得牢记在心的。(374)

福克斯印制的《行动与丰碑》(*Actes and Monuments*)的书名页上的插图捕捉到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强烈的反差：虔诚的新教徒膝头上放着书，天主教徒手握念珠。(375) 这样的反差应该增补到教区的记事簿里。在 16 世纪，偶尔在各地印行的通俗语《圣经》在天主教徒中是禁书，而在新教徒中几乎是必读书。"自从伟大的《圣经》进入教区教会以后，宗教训诫与劝说读《圣经》就携手并行了——1538 年、1547 年和 1559 年的三次禁令就是证据。"(376) 殷实的苏格兰家庭"如果没有通俗语《圣经》和《诗篇》"，就会被罚款 10 英镑，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处罚是强制执行的。(377) 于是，在世俗的天主教家庭里，读书识字的刺激销声匿迹；在新教徒中，刺激读书则是明令提倡的。自此，图书市场扩张的速度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一旦获准印制《圣经》，《圣经》的印刷就成了特权，结果，天主教中心的《圣经》印刷就开始衰落，这些地方人数相对少的印刷商就受到直接的影响。(378) 但是，由于压制阅读《圣经》影响到世俗天主教徒里一个潜在的庞大市场，整个印刷业就受到间接的影响。再者，特伦托公会议之后，通俗语《圣经》绝不是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的唯一畅销书。伊拉斯谟为他的印刷商带来大笔财富，稍后路德才后来居上。和许多受欢迎的作者一 415
样，伊拉斯谟和路德都上了《禁书目录》。(379) 上《禁书目录》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反而可能推动了销售。但天主教印刷商因此赢利是比较偶然的，新教印刷商因此赢利的机会却比较多。

伊拉斯谟的著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从出版畅销书赢利的地区发生了迁移：

> 书名页上的地名原来是巴黎、奥格斯堡、美因兹、阿尔卡拉、塞维利亚、萨拉戈萨、威尼斯、摩德纳，但这些地名逐渐消失时，取而代之的是巴塞尔、日内瓦、阿姆斯特丹、莱顿、汉诺威、海德堡、莱比锡、牛津、斯德哥尔摩和阿伯丁。(380)

由于罗马控制范围之外的印刷商能够赢利，天主教的审查制度像飞去来器那样伤害自己的下场是可以预见的。比如，《禁书目录》列举的删除文字反而准确地

把读者引向“书名、章节”，甚至准确到“行”，使人能够寻找到那些反罗马的段落。新教的宣传家们反而节省了精力，不必自己动手去搜寻著名作家、令人尊敬的著作里那些反罗马的文字了。(381)“各种原版的《禁书目录》一旦问世就立即进入莱顿、阿姆斯特丹和乌特勒支的市场，并立即被雄心勃勃的荷兰印刷商用作指南。”(382)牛津的伯德莱图书馆馆长也认为这些《禁书目录》有用。1627 年，他要图书馆各部负责人在《禁书目录》中寻找那些最值得收藏和保存的图书。(383)

禁书对购书人有一种固有的吸引力，新教出版商印行禁书时不会没有天主教地区同行的竞争。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禁书的外贸有利于入行的新手，他不会受到享有特权的出版社垄断印刷业务的阻拦。

> 面对既得利益者的长期反对，又缺乏上佳的手稿，沃尔夫(John Wolfe)心生一计：印制受人欢迎、广为人知而意大利印刷商(一般情况下)又不能印行的图书，因为它们新近上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384)

国外的天主教读者和国内好奇的读者构成了“双料市场”，这个市场特别吸引人，因为国内一切可靠的大宗图书比如《圣经》、祈祷书、启蒙书、语法书、法律书、音乐书等都由一个特许的体制分配给现存的印刷商了。

> 沃尔夫这位雄心勃勃的印刷商入行时，找到了一个其他印刷商尚未抢占先机的领域，这是他与之苦斗的“垄断者”尚未占据的空当。他抢占了一个名震国际的名人榜。他立即搜寻这些人的著作，首批选中的人之一是百年之后仍然热销的一位作家。(385)

他选中的是阿雷蒂诺，阿雷蒂诺曾经是意大利印刷商的摇钱树，此时却使他们悲痛。正是因为“男男女女拥抱的异常风俗，必然产生丑闻，宗教裁判所不容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它谴责这一类龌龊的甚至尚未堕落到这一步的东西，即使那些传奇故事里的爱情冒险，也受到谴责”(386)。

对爱国的英格兰人或荷兰人而言，买卖这类传奇故事不像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认为的那样“肮脏”。买卖这类书使英格兰人或荷兰人感到特别满意，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干扰天主教徒的宏伟计划，挫败他们捍卫教皇的努力。于是，由于自由宣传赋予的特别有利的竞争力，加上对国外市场的垄断，这些英国印刷商与荷兰印刷商真的觉得自己为爱国的反天主教事业作出了贡献。把这类书走私到外国市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巴结位高权重的朋友。担任宣传人或外国代理商还可以赚取外快。(387)熟悉大陆秘密图书贸易网络的印刷商在国内地位不俗，偶尔还可以做一些情报工作。总之，凡是紧盯最新《禁书目录》并据此预告自己即将上市的新书目的新教印刷商，总是获益良多，损失极小。无意之间，天主教审查官的决定使新教

徒的出版政策向国外的异端、自由和创新的趋势倾斜。

这一倾斜的决策值得驻足沉思。这说明，我们必须把印刷商当作独立的决策 417
者，他们试图将天主教—新教分野和其他发展联系起来。印刷商出版《禁书目录》上的阿雷蒂诺、布鲁诺、萨尔皮、马基雅弗利、拉伯雷等作家的作品时，他们是牟利的印刷商，而不是虔诚的新教徒。如果不考虑这个中介因素，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在虔诚的新教控制区，如此世俗的、自由思想的和享乐主义的文学居然会繁荣兴旺。

新教徒之教条和倔强不输天主教徒，其教义甚至更强调命定和原罪。那么他们控制的地区怎么会成为启蒙运动思想的“温床”呢？

> 加尔文教的荷兰、清教的英格兰、加尔文教的瑞士……如果我们审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连续不断的传统，这些清教社会就像连续不断的喷泉，给这个传统提供活水，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城堡，使这个传统退入城堡保存起来。我们不妨问，如果没有那些喷泉和城堡，这个传统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后果呢？……格劳秀斯、笛卡尔、理查德·西蒙[①]、约翰·洛克、皮埃尔·培尔当然照样会出生，但他们会那样写作吗？会出版那样的作品吗？如果没有先行者，没有出版商，启蒙运动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须知，启蒙运动最主要的特质来自于此前一百年间的思想，来自于这场运动自身在宣传上的成功。(388)

引文选自特雷弗—罗珀论“启蒙运动的宗教源头”的《17世纪的危机》，这些源头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和稍后的索齐尼—阿米尼乌斯[②]思潮。特雷弗—罗珀认为，启蒙运动的异见先驱团结起来支持好斗的加尔文教徒，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恐惧的压力之下”，这样的压力是以罗马为代表的更大的邪恶。虽然加尔文主义本身是“尚古主义的偏离”，但它强化了反教廷的立场。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被天主教的反弹驱赶到“左的立场”，他们暂时接受“日内瓦的领导”，后来才亮出自己真正的旗帜，宣告精神上的独立，最终以反索齐尼教派和阿米尼乌斯教派的加尔文教义的真面目出现。(389)

这一论点的优点在于区分教条主义的新教神学和更加自由意志的、普世教会的思潮。然而，它并不能真正解释后者存世的原因。伊拉斯谟、索齐尼、阿米尼乌斯的思潮怎么能够被置于加尔文主义之下却又不受它影响呢？为什么没有宽容精 418
神的加尔文主义者又允许如此之多的异见在他们的队伍中保留“错误的”教义呢？

---

① 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1638—1712)，法国《圣经》批评家，著有《历史批评》。

② 雅各布斯·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1560—1609)，荷兰新教神学家，创立阿米尼乌斯派，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

实际上，好斗的加尔文主义者和多明我会的宗教裁判一样乐意诉诸压迫与火刑。阿米尼乌斯教徒有理由害怕加尔文派的宗教会议，正是这样的宗教会议决定囚禁格劳秀斯。塞尔维特[①]更接近索齐尼教派而不是加尔文教派，因而被加尔文派处以火刑。卡斯特利奥[②]抗议处死塞尔维特，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但对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徒而言，他仍然是不受欢迎的人。

为了理解“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连续不断的思想传统”是如何维持的，我们必须要从加尔文的日内瓦转向伊拉斯谟的巴塞尔。卡斯特利奥的抗议是由这里的出版商奥珀利努斯印行的，他为在此流亡的约翰·富克斯提供了帮助，他还率先在欧洲印行《可兰经》。

> 巴塞尔始终不渝地支持塞尔维特在日内瓦的行动；然而谁也不会看不见，它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卡斯特利奥对宽容精神的诉求……塞尔维特始终持有异见，此时他已经去世。否定一家姊妹教会的虔诚信仰，从而削弱其权威，那实在是没有意义。但卡斯特利奥仍然活在巴塞尔的城垣之内。他的谦虚和正直广为人知。参与日内瓦人追寻巫师毫无意义……态度的暧昧不如争论危险。印刷业对这一精心谋划的犹豫不决态度持欢迎的态度……印刷业站在卡斯特利奥和宽容精神的立场……(390)

从卡斯特利奥的时代到伏尔泰时代，印刷业是自由主义、异见和普世哲学天然的盟友。雄心勃勃的印刷商急于扩张市场，使印务多样化，他们是心胸狭隘者天然的敌人。如果说印刷商喜欢新教而不是天主教，那不是因为日内瓦是他安然无恙的堡垒（虽然对一些印刷商来说，日内瓦的确是安全的堡垒），而是因为日内瓦不如
419 教廷所在的罗马强大，在它的地皮之外，这座小城市就不能控制图书贸易了。(391)

贝扎论述君主政治之恶的著作未获允许在日内瓦出版，他就把书稿送到海德堡，其首版就是在那里印行的。(392) 1706 年，不宽容的《赫尔维西同意书》(*Consensus Helveticus*)败下阵来，具有说服力的阿米尼乌斯派的宣传曾经在荷兰盛极一时，但后来还是被逐出了荷兰。(393) 这里值得再次指出的是，由于缺乏一个国际控制中心，众多的新教社区各走各的路。为多种地方礼遇服务的官方的审查制度常常起到相互矛盾的作用，因为这些地方没有统一的《禁书目录》作为统一的指南。已如上述，唯有天主教的罗马发布这样的目录，而这些目录起到的作用是促使新教印刷商出

---

① 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西班牙裔神学家、医生，支持宗教改革，发现血液循环的第一人。因发表《论三位一体论之谬误》而被加尔文派处死。

②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法国神学家，16 世纪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的主要倡导者，反三位一体论，先与加尔文合作，后因教义不同而分手，著《论异端》(*De haereticis*)，死后被对手掘墓焚尸。

版不虔诚的著作。

为启蒙运动准备条件时,“城堡”、“喷泉”之类的比方实在是太虚,不足以成为栋梁。活生生的印刷机和印刷所使格罗秀斯、笛卡尔、理查德·西蒙和约翰·洛克能够在欧洲人脑海中留下永恒的印记。大多数印刷机都在荷兰境内,安特卫普衰落之后,阿姆斯特丹成为文坛的中心城市。有鉴于此,特雷弗—罗珀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设问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假如荷兰人在独立战争中战败,前启蒙运动最主要的论著就会掉进不毛之地了。倘若荷兰的印刷机被禁止而不能发声,许多新哲学著作就会被剥夺出版的渠道了。如果是那样,让·克莱尔编辑的《伊拉斯谟全集》就会胎死腹中了。倘若是那样的局面,皮埃尔·培尔就会走上另一条路,他给伏尔泰的灵感大概就不会那么有力了。

> 培尔著名的多卷本《历史与批判辞典》(*Dicionnaire*)……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其第一卷未获允许在法国出版,而且国外印制的《历史与批判辞典》也不允许进入法国……这本重要的著作没有献给任何贵族赞助人……培尔所需的唯一支持者是出版商,而出版商依靠的是庞大的阅读公众的存在……[394]

对依靠相当庞大的阅读公众的出版商而言,新教地区(虽然比天主教地区小,且人口亦较少)同时又提供了内在的保障。迫害塞尔维特和格劳秀斯的人与迫害伽利略和布鲁诺的人的确有相似之处,然而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毕竟不一样,天主教徒在特伦托公会议上胜出以后阻挠通俗语书籍的阅读,或控制世俗人口中的识字率;相反,加尔文教徒却从来不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他们积极提倡培养阅读习惯(甚至强制儿童快速提高读写能力),其后果谁也不曾料到。

于是,早期近代欧洲的出版商有一个特别的兴趣,那就是和新教徒结盟,同一时期的其他资本家未必有这种特殊的兴趣。在考虑新教徒和资本家的关系时,如果你不考察印刷术提供的特殊情况,你就可能会像赫伯特·卢希(Herbert Luethy)那样得出一个负面的判断:宗教改革家只不过比反改革的教会较少伤害新兴的企业而已。你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宗教改革家“给资本主义的崛起……制造了最小的障碍”[395]。

然而,对于富有创新精神的印刷商所需要的日益扩张的市场,宗教改革家扮演的是更加正面的、积极参与的角色。他们不是制造较少的障碍,而是提供强大的刺激。在世俗阅读能力令人满意这一点上,教条的加尔文教徒、更加宽容的伊拉斯谟追随者、雄心勃勃的文人和谋求利润的印刷商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派的长老和天主教的神父构成了最极端的反差。比如,谨慎的英国国教徒1543年就表明,反对“女人、学徒和庄稼汉”读《圣经》。真正的清教徒不会放弃这一条最主要的教义。

> 宗教生活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实践，人人不能不做的事情就是读《圣经》。这是改革家们替代弥撒的精神体验中至关重要的高峰，新教徒不在教堂双膝跪地领圣餐，他们用教徒日常熟悉的语言来表达与圣灵接触的体验，靠通俗语印行的《圣经》与圣灵接触……(396)

4.7 新型书本宗教面面观

421 新教首先是一种“书本宗教”(book religion)，毫无疑问这是人们经常反复述说的新教特点。(397)如果将新教特点与其他印刷术启动的发展不平衡的变化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在比较研究中对这一特点进行更加充分的探索。新教徒中有一种明确的刺激促使人去学习识字，而天主教徒中就没有这样的刺激因素；有了这个既定的事实，在印刷术的第二个世纪里，你就可以期待在新教徒中发现一种深入社会的、特色分明的文化素养，在天主教徒里，这样的识字文化是不存在的。从16世纪50年代到17世纪50年代，在新教徒中，识字的社会阶层和不识字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界线可能变得比较模糊了，行政官员、商人、教师和游走的工匠、自耕农之间的分界线也不那么分明；但在天主教徒中，两种社会阶层之间的界线却不那么容易抹掉。新教徒这一特色有助于集思广益，聚集各个社会阶层的才干。在教士和俗人使用相同的《祈祷书》和《圣经》的地方，阅读拉丁文图书的精英和阅读通俗语书籍的公众之间的差别是不太鲜明的。在工匠受到鼓励去学文化的地区，他们就能够更好地为技术文献的丰富作出自己的贡献，能够参与大规模的数据搜集，能够为思想的交流尽一份力量。本书稍后的章节将要阐明，在考虑近代早期的科学变革时，用通俗语书写的工匠与撰写拉丁文专业著作的精英之间的对立常常被过分夸大了。然而，新近获得读写能力的工匠、机械师、水手等阶层人士为印刷商的技术图书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市场，而且还为近代早期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圣经》阅读的几百年里，激励学习识字的各种因素对科学史或思想史意义重大，而且在政治意识和集体行动里也有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圣经》阅读关联的是读写能力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这样的变化改变了群体身份，产生了“期望值日益上升的革命”。于是，政治归属就进入了社会鼓动和社会流动、政治分野和凝聚的
422 各种形式。我们知道，法国的大多数生产方式的机械化过程比英国慢，但蒸汽印刷机的影响也许具有更大的爆炸性。毫无疑问，宗教对阅读《圣经》的德国再洗礼教徒或英国的弑君者的影响并不是鸦片剂的影响。许多门第卑微的伦敦人已经很有学问，许多人已经在著书立说，并号称自己“生而自由”。在这一点上，他们远远走在法国革命中激进的无裤党之前。(398)

凡是不妥协地坚持人人有义务读《圣经》的地区都产生政治上的早熟。即使在

18世纪,有些开明的受耶稣会教育的启蒙思想家已经害怕在仆人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扬自己的观点。在此前一百年的英格兰,清教徒听从罗拉德派的传统,想要把书籍送进侍女和穷人的手中。他们鼓动门第低下的人蔑视门第高贵的人,鼓动他们以基督教斗士的身份反对天主教徒和修士。富克斯的《殉道者列传》不断增版,内容不断充实,描写富有戏剧性,渔夫、裁缝、家庭妇女等栩栩如生,使学问深厚的修士张口结舌,使迫害者无计可施,他们个个英武不屈,视死如归。(399)富克斯的巨著极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它使普通的男男女女间接地参与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他们借此了解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这些殉道者英勇不屈,为的是战胜反基督的迫害者,推翻贞操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普通人发现自己不再被亚当的原罪压得抬不起头,发现自己就像早期基督教的殉道者,发现自己不像滑稽的织工博滕①,而是像亚瑟王的骑士;到了这一步,为后世的圣徒统治布置的舞台就准备就绪了。这种大批阅读公众间接参与的宏大的民族历史剧在法国也有对等的版本,但法国的版本要等到19世纪初才出现。到了拿破仑之后的法国,反映反教士观点的教义问答书和史诗出现了,激进共和派开始从事巴黎工人阶级的成人教育。(400)你不妨将17世纪英格兰静悄悄的语词之战与革命时期法国歌谣和节庆的喧嚷作一比较。在道德上,雅各宾派是"清教徒",在口头和视觉宣传上,他们不像清教徒那样拘谨。循道宗②是对雅各宾派的矫正,部分原因是早些时候的《圣经》阅读已经扎根。总之,海峡两岸革命"群众"的识字率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423

也许,天主教文化和新教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可见于最贴近家庭生活的现象。对任何社会史家来说,家庭是否拥有自己的《祈祷书》和《圣经》是个大问题。"老师和学堂的关系应该像布道者和家庭的关系,如此,地位最高的人和地位最低的人都得服从上帝的意志",这是日内瓦版《圣经》里的一条旁注。(401)以前委派给牧师的职能此时还托付给了父母,"家庭生活的精神化"随之发生。贵族有自己的家庭牧师,资产不多的普通家庭和贵族不一样,他们只能依靠教区的牧师提供精神指引。家长被告知,在家里举行宗教仪式、教化孩子和学徒是自己的职责。在新教家庭里,普通的丈夫和父亲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职能,这是天主教家庭完全缺失的职能。(402)

> 宗教改革以来,家庭成了……教会管理中最基本的单位。家长有义务确保家庭成员参加宗教仪式,孩子和仆人得到教化。此外,他还应该在家里主持

---

① 博滕(Bottom the weaver),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性格开朗、浪漫、幽默。

② 循道宗,1738年由英国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查理·卫斯理(Charles,1707—1788)兄弟创立于伦敦,又名卫斯理宗,提倡遵循各种道德规范,认为传统传教活动不足以应付现存社会问题,主张改良社会,着重在下层群众中开展传教活动,宣传内心的平安喜悦即幸福。

崇拜仪式，照料全家的福利，清教尤其期待家长承担这样的义务……一家之主
424 对家庭成员来说既是国王，又是牧师。(403)

圣灵进入家庭以后，家庭的观念大概也改变了。

对清教徒家庭而言，宗教就是家庭宗教。对上帝的崇拜不是偶尔为之的崇拜，而是首要的家庭崇拜……

家庭被有意识地而不是非逻辑地改变为教会。此时的情景不再是家庭走向庙堂，而是庙堂走向家庭并重新打造家庭。(404)

家庭生活的性质还因新教政策而变化，但这些政策和机印本《圣经》没有关系。婚姻作为圣事的观念被放弃了，这就为离婚留下一条路；允许教士结婚，有助于给婚姻赋予庄重的色彩，这是很容易想到的两个例子。然而，“庙堂”进入家庭却采取了机印本《圣经》的形式。《圣经》和《祈祷书》放进每一位敬畏上帝的家长的手里之后，教士与俗人、祭坛与壁炉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了。在这里，印刷商抢占商机，鼓励自助：“为了自助，父亲可以倚重印刷机源源不断生产的袖珍本手册，例子有《家用指南》(*A Werke for Householders*)(1530)……(405)或《在家里静思和念诵的祈祷书》(Godly private prayers for householders to meditate upon and to say in their families)(1576)。”(406)

通过祈祷和静思，凭借数以十计的书籍提供的范例，布料商和屠夫……都很快学会了亲近上帝而不必借助教士的帮助……伦敦市民学会了在家里举行
425 崇拜仪式……在上帝面前，公民个人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了……(407)

一旦学会在学徒、妻儿面前对上帝说话，清教徒商人就踏上了自治的道路。(408)无论在教区居民里的排名多么卑微(409)，他们在家里都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认可，家人承认他们的尊严和价值。(410)

天主教商人没有机会在家里进行宗教仪式。(411)1548 年，一篇天主教论文说，《圣经》不应该译成法语，这篇文章印行了很多次。《圣经》是朦胧的，因为上帝想要它这样朦胧。圣言应该委托给神学家和牧师，普通人不应该通过中介来聆听圣言。(412)玛丽·都铎在位时，天主教大主教雷金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告诫伦敦人不要自己读《圣经》。他对伦敦人讲话时说：“你们不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413)“家庭宗教是颠覆活动的温床。”反宗教改革的教会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至理名言。这样的教会不鼓励“家庭里的《圣经》阅读”，但没有提出有效的替代手段去保证如何贯彻家庭圈子里的宗教习俗。(414)

法国商人更渴望高尚的地位，他们的渴望不是把金钱用于再投资，而是购置土

地或官位；部分原因是，在家里扮演国王和牧师的机会是为抵消从商的污名。[415] 不 426
妨设想，天主教复辟的威胁会引起新教家长强烈的关切，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珍惜家人承认自己是“主人”的价值。有几种研究阐明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造成反天主教情绪的不同因素。这些研究证明，聪明的宣传者如何激起大众的仇恨和恐惧，其手法就是利用天主教大屠杀的幽灵，大肆渲染反西班牙的黑色传奇。[416] 除了杜撰暴行文学之外，还有人提出其他一些因素：各阶层的英国人都觉得启示录和千禧年的幻觉令人魂牵梦绕，集体幻觉导致挥之不去的过分夸大的天主教威胁，对任何教廷阴谋的暗示都做出过度的反应。[417] 毫无疑问，集体幻想和操纵性宣传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从一开始，印刷机的力量就为这样的滥用提供了方便。不过，在反教廷的造势中，还有更多的成分是合理的要素；普通人为何觉得难以容忍一位信天主教的国王，那是有充足理由的。即使在没有大屠杀和世界末日怪兽威胁的情况下，天主教的政策还是会使英格兰人厌恶，因为他们珍惜家用的《圣经》，把《圣经》作为新发现的自尊的源泉。加尔文教义令人生畏的一些内容应该受到一定的制衡，比如喋喋不休的关于人性堕落的说教以及它助长压抑、焦虑和罪感的倾向就应该受到制衡，我们应该用加尔文教义提供的一些机会来加以平衡，这样的机会是自己当家做主和自我价值的成就感。

无论如何，家庭变教堂、家长变牧师的转变似乎证明了韦伯的断言：

> 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用一种新形式的控制来取代以前的控制。它批判的控制是非常松弛的控制……它主张对所有的行为举止进行调控，深入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样的控制非常难以承受，却又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418]

具体思考因《圣经》阅读而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泛泛地考虑宗教改革的影响，你 427
就可以更加确切地理解新旧控制机制的差别，你可以比较聆听牧师在布道坛上读《福音书》和在家里独自一人阅读相同的段落。听牧师读《福音书》时，圣言来自牧师，他和你有距离，且高高在上；独自阅读时，圣言来自一个寂静的声音，且来自内心。

当然，进行这一比较要小心谨慎，不应该太过火。在非正式的聚会时朗诵《福音书》可能是新教社群诞生的重要因素，独自一人阅读《圣经》难能与之相比。[419] 此外，独自阅读的经验并非完全是印刷术发明以后的新现象，印刷术发明以前，有些中世纪修士已经有这样的体验。再者，我们不应该认为，上教堂的人和独处的读者指向两种互相排斥的行为。在 16 世纪，大多数教徒既听牧师布道，又在家里读《圣经》。然而我认为，如果我们注意到，机印书比布道坛便利，比牧师众多，其中的讯息更容易内化，那么，“新控制机制深入”生活的各个领域就更加容易解释了。

清教徒充分利用了新出现的“以书为准”的新风尚，其家庭特质的形成可以用这一事实做出部分的解释。为了理解加尔文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仔细看看早期书本学习的一些例子是很有价值的。当我们回顾印刷术产生的新特征时，我们必须再次指出，驻足查看那些家用小册子和指南（比如有一种小册子就点明其宗旨：“按照上帝的圣言来安排家庭生活。”）[420]是很有价值的。

至于“家政管理”和“家庭责任”的图书，前人的一些观察似乎特别令人信服。在这里，肤浅的观察者只看见印刷术推动文化惯性的证据。印刷术之后出版的家政建议似乎和手抄书时代发出的建议没有丝毫的差别。试图在16世纪和17世纪
428 的行为举止指南书中寻求新奇观点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实际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引用的是同样的古人的智慧，发出的是同样小心谨慎的告诫，得出的是同样的教谕。[421]在这个事例中，我不得不承认，麦克卢汉大胆的公式似乎是恰如其分的：使家庭生活特征发生最深刻变化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新讯息，而是一种新媒介。在手抄书时代，也有人写家政书，这些书和烹饪书、药草书同时面世，但在那时，这些书并没有被大批量地复制。只要依靠未成文烹饪书的局面依然是主流，家庭生活如何做到井井有条的观点相对而言就是随意的、形态飘忽不定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购买家政手册和婚姻指南时，他们得到的忠告并不是新的忠告，但他们接受的忠告是以新的方式出现的旧忠告，这种形式的忠告更加难以规避。

在印刷时代，奉献给家长的角色比以前的范围小得多，但也规范得多。他们接触到的不再是传递随意印象的闲聊构成的交叉火力，也不是对布道辞的随意解释；相反，他们接触到的是推出（所有标点符号都是标准化的）准确行为准则的书籍，这些准则是优秀家长必须遵守的准则。家长熟知这些准则，其他人比如亲戚和邻居也知道这些准则。静默而独处的读者将其内化于心，就此而言，个人良心的声音就得到强化了。另一方面，这些准则以标准化的形态复制，通过不具人格的媒介传递给许多读者，他们构成了“孤独的人群”，所以同时被塑造成型的还有一种集体的道德。于是我们说，印刷所的铸字工艺促成了家庭里新的角色。回归色诺芬[①]和《圣经》的“中产阶级”道德似乎在一个永恒的模式中定型了。

研究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家庭里的角色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尾随印刷术而来的文化分化。书籍进入新教家庭的频率比较高，进入天主教家庭的频率比较低。新教徒里的书本学习可以被描绘为比较平常、不那么气派的事情，天主教徒里的书本
429 学习却不是这样的。[422]然而，在欧洲各国和各个地区，启蒙书和语法书、算术书和作文书却比较统一、更加丰富了，而且这样的新气象大致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沃

① 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5？），希腊军人、作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远征记》、《马术》、《苏格拉底的答辩》、《回忆苏格拉底》、《会饮篇》等。

尔特·翁说得对，老师要学生“看第七页第三行第四个单词”时，一种新教学方法诞生了。[423]有了印刷书以后，家庭作业和学习过程的结构都重新调整了。教育制度和育儿的性质都变了，在各个领域都影响到教养良好的青年。

在16世纪，“上层阶级”的礼仪和“中产阶级”的道德都以新的方式得到固化。少男少女的行为必须遵守的规矩并非真正新的规矩（因为这些规矩在中世纪的布道辞和手抄书里已经存在），但父母和老师比过去更难以忽视这些规矩了。出版商弗洛本刊布的伊拉斯谟所著的《论男孩的礼貌教育》（*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Basel，1530）一炮打响，估计1600年前已经发行了47，000册。该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剽窃、盗版和模仿，使礼貌的举止固化，并产生了一种新的字体（“雅体”），这一字体成为当时的老师传授作文的规范字体。[424]这本教材发挥了双重作用，既传授读书识字，又灌输健全的基督教道德观；后来，19世纪美国人编纂的《麦克古费识字课本》（*McGuffey's Reader*）继承了这一传统。最能够吸引儿童心理学家兴趣的特点是，《论男孩的礼貌教育》强调外貌和体态语。它不仅教育儿童言行举止、餐桌礼仪和衣着服饰等“正确”仪态（沿袭莎剧人物波洛尼厄斯[Polonius]教育儿子累尔提斯[Laertes]的不朽名言），而且以极其细腻的笔法告诉儿童，他们如何用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显示，他们是有教养的人。儿童首先读到的是各种控制眼球和眉毛动作的方式，以避免给人留下狂热、傲慢、疯狂、淘气、懒散、暴躁的印象；接着读到的内容是学习如何利用面颊、嘴唇和四肢。学完这一切之后，你可以期待发现，业已提高的自我意识会将早期近代的鉴赏力和中世纪的鉴赏力区别开来。你还可以理解，为何那么多风格主义的肖像画传达的是那种戴了面具的漠然的标签，为何社会史家觉得，学校、父母和教士似乎都在努力将儿童置于完全的控制之下。一如上述，如果你认为，因为这类书的对象是儿童，所以其读者就局限于儿童，那就错了。读这些礼仪书的老师和家长免不了更加焦虑，更加为他们照看的儿童感到担心。在我看来，这类书似乎产生了无情的压力，使感觉无助的家长和儿童都感到压力。 430

菲利普·阿利耶筚路蓝缕，研究旧制度时期的法国。[425]《历代童年研究》（*Centuries of Childhood*）这部拓荒性的著作建立了一个新的学问产业和研究领域。自此，影响15世纪至18世纪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变化已经有许多著作进行研究。许多书对阿利耶的方法和研究进行拷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对他使用证据的方式和作品的有限范围提出疑问。[426]阿利耶发现，人们对待童年的态度有所变化，但很少有人建议，我们有必要选择另一种研究出发点。不错，人们对他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他的观点：近代早期出现了“发现童年”的现象，但大多数批评者仍然一致认为，的确发生了一种变迁，15世纪以后有一种倾向是把儿童和成人分离开来。有人说：“‘中世纪没有给儿童留下一方天地。’如果这句话有道理，那是因为

它依存在一种感觉里：儿童不生活在界定分明、隔离清楚的地域比如幼儿园、家庭和学校里。”[427] 15 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那就是把儿童与成人隔离开来，其办法是把儿童放进特别的机构里，或者是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文学；这一新的倾向还需要我们做出解释。解释的唯一线索出现在阿利耶这本书末尾的一段话里。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在近代早期，人们对教育的兴趣复兴了。”这一次复兴的火花是教士、律师和学者点燃的，他们首先是道学家，而不是人文主义者。[428] 尽管如此，“教育兴趣的复兴”并非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变迁影响了育儿和学校教育，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首先考虑育儿和学
431 校教育这个首要因素呢？[429]

书本学习（以前指定给老人和修士的活动）逐渐成为童年、青春期和青年期日常生活的中心。欧洲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任何社会革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菲利普·阿利耶对这一巨大变革的早期阶段做了这样的描绘：“家庭、教会、道学家和行政人员夺走了此前儿童在成人中享受的自由。”学校“脱胎换骨”，成了“执行严格纪律的工具”[430]。我的论点则是：诸如此类的变革大概和“在实干中学习”到“在阅读中学习”的变迁有关系。无疑，需要一种新的纪律让健康活泼的青少年在阳光明媚的白天坐在书桌旁学习。由于传授技能的方法变了，委派给父母和老师的职能也随之而变。勾勒老师职责的图书、题名针对不同市场的图书目录使人提高了对不同年龄段的认识。针对不同学生依次设计的教材从最初级技能到最高级技能循序展开。[431] 教材出版的竞争加剧，不同样式的图书比如入门书、拉丁语法、法律书被承包给获得授权的公司，不同层次教材的分别就更加分明了。成长中的儿童消费的印刷书分为不同的学习阶段，于是，儿童受影响的发展阶段就不同于中世纪的学徒、耕童、新手或侍从了。

印刷术产生了累积性的认知进步的新形式，变革也随之递增。就此而言，印刷术还加深了书面文化和口头文化的鸿沟，使广览图书的成人和未经学校训练的儿童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成年男女需要更加努力和儿童接触，作家需要重述“童话”，家长需要自然而然地参与儿童的游戏。[432] “成人的言行像‘大孩子’”，旧制度
432 时代的官员为此而忧心忡忡——或许，这一点和日益加深的文化水平鸿沟也有关系。这一点大概同样适用于“‘理性’和‘非理性’、‘清醒’和‘疯狂’的重新界定”[433]。实际上，成人的活动越是受到刻意的管束，越是以书本为据，儿童行为的自然和冲动就越是与成人的言行构成更加令人注目的反差，重塑青少年“身体和灵魂”的努力就越是费劲。清教徒儿童“很早就开始读《圣经》”，那是为了让他们“起跑时抢在魔鬼前头”[434]。

在宗教改革的时代里，撒旦的力量之所以看上去更具有威胁力，可能是因为自然而冲动的行为必须要受到更加严厉的压制，至少这是部分的原因。常有人指出，虽然新教徒接受多明我会托钵僧的鬼魔学（demonology），他们却常常批判圣母玛

丽亚研究，抨击圣徒崇拜和经院哲学家的天使学。基督徒在许多教义上可能会意见分歧，但在对魔鬼的看法上却意见一致。当然，宗教战争使基督徒更加执著于魔鬼撒旦，因为他被赋予了敌营统帅的角色。然而，当基督徒执著于强化更加严格、更加亲近地“与上帝同行”时，邪恶的势力可能会被放大并赫然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接受新的更加严格的道德要求，这就对教士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无论教会是否强调俗人服从教会的义务或阅读《圣经》的义务，各地的教士在16世纪都受制于更加严格的“以书为准”的纪律。在同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经历了最持久、深入的猎取巫师的狂热，我认为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不过，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过渡和巫术审判同时出现的现象，远比上一段文字暗示的情况复杂。这也是涉及多方面研究的课题，值得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延伸，可惜我们在这里难以赘述。鉴于这一课题最近受到的骑士享受到的那种尊敬，请容我简单地强调这一需要。休·特雷弗-罗珀著名的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刷术的效应被简化为“单纯的物证倍增”，然而这些证据却被认为太微小，不足以解释猎杀巫师的狂热何以会快速蔓延。“无论我们对印刷术以后证据倍增的现象留下多少余地，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猎巫的狂热可怕地蔓延开来，那是在文艺复兴之后。”(435) 接着，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思考，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有组织的、系统的鬼魔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获得了那种可怕的声势。可惜，作者在这里又没有提到印刷术，虽然印刷术和他思考的诸多问题有关系。

这一课题在一篇书评里受到更多的注意，被评的书研究的是法国的执法官，作者是罗伯特·曼德鲁(Robert Mandrou)。该书之所以受重视，部分原因是它论述了印刷术的一些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它算是一个例外吧。(436) 书中探讨巫师故事从口头传播向印刷传播定型的过程。其他探讨的问题有印刷品的流布对猎巫狂热的火上浇油以及法律的印行和规范对鬼魔学的影响，法国的巫师审判尤其详细。该书最后比较注意的问题是：轻信态度不复存在，怀疑态度取而代之，因为巫术的法律界定改变了(1682年的一份诏书裁示，巫师和骗子与江湖郎中相联系，而不是和鬼神相联系)。曼德鲁研究了这一态度转变提出的问题(多年前吕西安·费弗尔提出过这些问题)(437)，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些问题和印刷术的影响联系起来考虑。他强调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却忽视了新的宣传系统对旧秘密形式以及巫师立场的影响。(438) 肖努(Pierre Chaunu)准备赞同曼德鲁的一个观点：更加有效的司法机器使审判的案子增加。他还同意：印刷词被赋予的权威和论著的流布有助于解释对巫师威胁有增无减的执著态度。然而，肖努最后断言(颇像特雷弗-罗珀)：单纯的倍增因素太微小，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规模的猎巫运动。最后他设问并断言：“小原因，大结果？你必须进一步研究。”(439)

肖努的进一步研究使他偏离法庭和读者，进入凹凸不平的蛮荒地，这是特雷

弗-罗珀等人有所斩获的探索领域。我发现这一旅程使人大受裨益，部分原因是它
434 暗示，16 世纪传教士的“扫荡”行动（旨在使欧洲遗留的蛮族皈依基督教）归功于教义问答书和祈祷书；另一个原因是，该书为以后西方列强和土著文化的冲突提供了一番非常有趣的预演。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传教士与土著的冲突。传教士开化土著的咄咄逼人的使命是冲突的一方，孤岛似的、拼死抵抗的、固守熟悉程序的土著文化是冲突的另一方。在我看来，这样的冲突和近年土著文化的复活颇为相似，复活的例子有肯尼亚的矛矛党或海地的伏都教。肖努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严苛清教徒的顽强抵抗，尤其为保护生殖仪式而进行的顽强抵抗，能够用来解释猎巫档案里的许多材料。面无表情、身着黑袍的传教士强行进入苏格兰高地以及法国孚日山脉隐秘的社区，要求人们以上帝的名义放弃悠久的仪式，这对他们的出生、性事和死亡习俗构成威胁——总之，这对社区的生存构成威胁。传教士的入侵引起焦虑，接生婆和草药医师拒不接受其权威，他们拒绝领圣餐，猛烈抨击基督教的符号，死守自己的未成文法——这一切并不奇怪。传教士和执法官认为，顽固的、亵渎圣贤的老媪向十字架吐唾沫时就成了撒旦的奴仆——这也并非不自然。(440)

虽然肖努的述评没有明确提到印刷术的出现，但他阐明了这个课题的一个方面。传教运动对基于口头传播的习俗构成压制，这样的压制靠印刷品来贯彻，又得到法庭和执法官的支持。我认为，这样的压制和 16 世纪的另一个历史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进程里，欧洲人冲动的、自发的行为受到压制，在家里、学校或工作岗位上都受到压制。在我看来，皮耶尔·肖努以同情的态度研究传教士入侵引起的焦虑给人以启发；在这一点上，他胜过特雷弗-罗珀，因为特雷弗-罗珀曾经以鄙夷不屑的态度说起“农民轻信上当和妇女歇斯底里的精神垃圾”。

《女巫的铁锤》（*The Hammer of Witches*）系统地构建了撒旦王国和撒旦
435 成就的神话，这一神话的基础是农民……轻信上当和妇女歇斯底里的精神垃圾……一旦构建完成，这一神话就获得了自己的势能，就成为根基牢靠的民俗，会生成自己的证据，适用于远离它故土的地方……(441)

特雷弗-罗珀的记述漏掉了促成这些神话及其势能的新媒介，所以猎取巫师的狂热运动给他带来了不必要的迷惘：

猎巫狂热时间之长实在令人吃惊……14 世纪是瘟疫、压抑和社会混乱的世纪，那时的心态可能有利于这一狂热。然而，15 世纪后期猎巫狂热正式发动时，欧洲扩张的新时期也开始了……而“猎巫敕令”①和《女巫的铁锤》问世

① 教皇英诺森三世 1484 年发布的训令《最大的心愿》（*Bulle Summit Desiderante*）。

> 的时间却是在新型的开明批评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此时,教会过去伪造文书的弊端得以揭露,《圣经》的文本得到批判性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荒诞举动为何逃避了批判的审视呢?(442)

一旦我们意识到,"正式发动"的意思是以印刷品形式问世,特雷弗-罗珀这个问题本身就荒唐了。1486 年,《女巫的铁锤》首版问世,这是两位多明我会审判官编纂的鬼魔学的百科全书。书中收录了 1484 年教皇号召根除德国巫师的敕令,借以推进多明我会的事业和图书销售。不到九年,《铁锤》就印行了 6 版。(443)"多明我会此前的传教局限于局部地区……此后,他们被赋予了普遍的使命,或冥冥之中感觉到的普遍的使命……过去偶尔发生的迫害……就普遍发生了。"(444)特雷弗-罗珀引文里那个问题即印刷媒介在手抄书时代为何没有得到扩散的问题,实在是浪费学者研究的精力。思考 15 世纪瘟疫造成的"有利的心态气候"这个问题,也是文不对题、毫无意义的。用来解释一个历史事件出现的是印刷术的发明,而不是瘟疫;印刷术可以解释"新的流行病似的猎巫狂传到欧洲各地……镇压巫术的权威……传遍了欧洲"(445)。

这一点对特雷弗-罗珀没有影响,但对其他学者有影响。比如,吉斯·托马斯在研究英格兰发展的专论里就试图解释,为何中世纪以后猎巫狂还会变本加厉。他指出,16 世纪中叶的观察家就已经感觉到,巫师问题已经走火入魔,令人恐惧。他在书中暗示,大陆上新的印刷机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大陆的思想凭借印刷术涌入英格兰以后,巫术才凸显成为最大的罪行。"(446)可惜,这一建议刚提出来就被他抛弃了,他认为这一猜度是理由不太充分的解释之一。

《女巫的铁锤》在大陆印行首版是在 1486 年,进口并本土化其中的内容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内容的"夯实"则需要数十年。有鉴于此,把新问世的印刷品和朱厄尔主教(Bishop Jewel)等官员的言论联系起来,理由似乎并不充分。1559 年,他"断言,在上一个王朝,'各地都冒出了众多的巫师……过去几年里巫师的人数大大增加了'"(447)。吉斯·托马斯的论述不是从印刷术以后开始,而是从瘟疫流行、多明我会的宗教裁判活跃的那个世纪开始。他说,教士和宗教裁判发起的猎巫狂运动不能解释迫害巫师的狂热,因为"从 14 世纪和 15 世纪大陆思想的推广到一百多年以后英格兰才开始的迫害巫师的运动之间,时间相隔得太久了"(448)。然而,"大陆思想的推广"(有别于这些思想的形成)达到新的规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发生在《女巫的铁锤》印行、其内容跨越海峡而来之后。换言之,在 15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猎巫狂运动才出现。

再者,如果更注意印刷术的影响,有一种现象就不会使我们感到吃惊: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竟然和整理鬼魔学的努力并存,和担心与魔鬼签订契约的现象并存。

如上一章所述，从手抄书时代继承的资料传到16世纪的学者手中时是一团乱麻，整理这些资料需要时间。早期印刷商的产品既产生神秘化的东西又产生启蒙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和精神世界的信仰绝不是不可调和的。学术研究的结果使人接受了许多“伪造”和错误的文本，包括《象形文字集》、炼金术、占星术、犹太秘法专论等资料。况且，文艺复兴爱书人的事业和怀疑与魔鬼勾搭的态度并不是毫
437 不搭界的。

浮士德博士那种书本学问被认为有害于正统的神学，这不无道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被认为无害的学问似乎更具危险性。文本分析对《圣经》传统的重构和净化越深入，千百年来异教和基督教并存的要素就越容易产生冲突，古代、拉丁时代和野蛮时代的遗产就显得比例越大，而这个遗产就归到魔鬼的头上了。奇怪的是，特雷弗-罗珀没有将对赫耳墨斯秘义书的信仰放进他所谓“新荒诞”的范畴里，但和多明我会的鬼魔学一样，赫耳墨斯秘义书的风行也经不起批判性文本分析的检验。[449]马西里奥·菲奇诺是很有学问的人，他端坐书房里吟唱奇怪的咒语招呼鬼神的景观[450]太奇怪了，不轻信的现代人是难以相信的，总觉得它比老媪向牧师吐唾沫还要奇怪。吹嘘自己魔力的赫耳墨斯神秘主义者偶尔抨击猎巫狂，但在驱散人们对鬼神的恐惧心理方面，他们并没有发挥作用。弗朗西斯·耶茨最近告诉我们，玫瑰十字会利用新的宣传技术，宣告“隐身人”的出现，用戏剧手法表现他们的秘术，结果十字架成为一种繁琐神话的研究对象，玫瑰十字会的神话近乎撒旦的组织方式，会员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活动，以六人为一组。[451]玫瑰十字会的宣言开启了困扰欧洲的幽灵，这和早期近代欧洲的猎巫狂极为相似。无处不在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搞密谋，它那可怕的魔力处处安插隐身人，玫瑰十字会的代理人无不听命于幽灵。

偏远地区对基督教化的抵抗需要我们予以适当的考虑。同时，学界内部的紧张、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心态和笔仗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地方。无论如何要记
438 住，农夫并不垄断轻信，妇女并不独霸歇斯底里；尤其在思想混乱的时期，在修士和教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两种症状。毕竟，发动猎巫狂的是有学问的多明我修士，而不是乡巴佬。

在研究16世纪的鬼魔学时，特雷弗-罗珀所犯的基本错误就是我在上文指出的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实际上，他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了：把“行将就木的猎巫狂”和“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两者放进他罗列的“过时的思想习惯”清单上，却又认为这些思想习惯“在伊拉斯谟的时代正在退却”。我已经指出，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我认为，《女巫的铁锤》出版后出现的巫师审判也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

> 《女巫的铁锤》宣扬的荒诞的鬼魔学并不是任何宗教思想的逻辑后果……也许,到文艺复兴前夕,这样的神话即将消亡。倘若伊拉斯谟胜出而不是路德和罗耀拉胜出,谁能说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倘若是伊拉斯谟胜出,文艺复兴可能就直接导致启蒙运动,而猎巫狂在人们的记忆中就纯粹是中世纪的疯狂了。(452)

然而,由《女巫的铁锤》"正式启动"的猎巫狂热绝不可能以"纯粹中世纪"的疯狂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和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以及伊拉斯谟的生涯一样,猎巫狂热同样是谷登堡印刷术的副产品。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说:"放弃巫术实际上就是放弃《圣经》。"印刷术以后,捧读《圣经》的人增多了。《出埃及记》第22章第18节的指令是:"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记住这句话的人在印刷术以后大大增多了。(453)幻想《圣经》阅读和猎巫狂热在"文艺复兴前夕"即将消亡,那就忽略了推进这两种现象的力量。请注意,正是同样的力量塑造了伊拉斯谟的生涯,产生了启蒙运动。

认为猎巫狂热在"文艺复兴前夕"消亡是错误的,基本的错误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单一的方向,使我们做出错误的理解:有一条直线从文艺复兴走向启蒙运动;除了傻瓜和狂人,谁都会走这条直线。凡是不走这条指定路线的运动都被划归倒退、过时或反常的范畴。于是,加尔文教依旧被斥为"蒙昧的偏离";因此,手抄书时代的《圣经》阅读、达尔文时代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汽车大王福特时代的出现、斯科普斯[①]审判的举行——这一切似乎都完全不能解释了。

考虑印刷术影响的好处之一是,我们可以和难以调和的观点共存,可以接受互相矛盾的运动的长期存在,不必将其中任何一种运动视为反常,也不必强制把任何一种运动塞进失之过简的宏大设计。新技术带来的许多变革绝不可能顺利地同步展开,也不可能指向单一的方向,而是会产生断裂,难免会存在互相矛盾的功能,或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不协调。

为了阐明这个道理,再次审视《圣经》阅读就顺理成章了。到16世纪中叶,新教地区的《圣经》阅读如火如荼,而天主教地区的《圣经》阅读却停滞不前,从而产生谁也不曾料到的后果。即使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回头看,也找不到任何简单的公式去解释这些后果。不仅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分道扬镳,而且新教地区内部也助长矛盾的趋势。新的生产方式对印刷商和出版商产生的影响和以前的生产方式对消费者或生产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全程看见书稿各个生产阶段的人对文本的

---

① 斯科普斯(John Scopes),田纳西州戴顿(Dayton)市的中学教师,因传授进化论而被地方政府告上法庭,原告律师威廉·杰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代表原教旨主义的神创论,被告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是美国最著名的诉讼律师。被告大胜,原告大败,轰动一时。

态度和只看见印刷品的人对文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16世纪的虔诚基督徒而言，能够用自己的母语读《圣经》恐怕是令人敬畏的体验。通俗语《圣经》的印行和消费与日俱增，很可能是新形式的“宗派”基督教和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加工书稿的编辑室和印刷所里，在谋求市场的书商手里，机印的《圣经》和其他上市的商品是联系在一起的。

> 斯特拉斯堡的第一位印刷商约翰·门特林……印务很粗心，但显然是精明的商人。他的第一个成品是《圣经》，1460—1461年印制，直接和美因兹的印刷商竞争。美因兹印行的《圣经》是每页42行，共1,286页；门特林却把拉丁文本《圣经》硬塞进850页的版面里，节省了三分之一的纸张。他印制的第二本书证明了其健全的商业本能。这是用德语印制的第一种《圣经》，也是第一种通俗语版本的《圣经》，满篇小学生水平的错误，但它一直是标准的德语版《圣经》，直至路德编订的《圣经》问世。(454)

当然，许多印刷商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呕心沥血，印制圣书，认为印制《圣经》是人生的无上荣光。另一些人热情满腔，不惜冒险受折磨甚至被处死，有人就为信仰而殉道。(455)但即使最虔诚的印刷商也必然大多数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业务上：市场要评估，财务要安全，特许证要争取，天主教修士和官员要规避，排字工要督察，发行要组织。对虔诚的读者而言，书籍生产的过程呈现出一种准神奇的外观；对同样虔诚的印刷商而言，这个过程同样神奇：加工文稿、精明的政治考虑、实际的问题解决都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财神爷和政治家的精明都必然要进入印刷商的盘算之中。同一圣言圣语的不同解读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此外，印刷商不会“协力同心”，所以他们在新的生产方式中所受的影响不一样。有些人是火一样热情的信徒，他们一心一意为一个真正的教会或“上帝选民”效力；另一些人却不是这样，而是为许多教会效力。早期的巴塞尔印刷商的政策尤其灵活。他们多谋善断，和日内瓦的印刷商形成强烈的对比；为了加尔文的事业，有些日内瓦的印刷商甘心“冒掉脑袋的危险”，为了传播教义、使人皈依，他们“大胆诉诸非法的手段”(456)。当然，也有一些日内瓦印刷商并未表现出“加尔文那种使命感”，他们只想夺取里昂印刷商的业务。他们偷偷生产适合天主教徒口味的图书，以占领南欧天主教区的市场。正如亨利四世觉得巴黎价值连城、红衣主教黎塞留觉得“国家利益”决定了与异教的土耳其人结盟一样，印刷商似乎也采用灵活的政策，为了维持家族印务公司的运转，为了让印刷机不停地工作，马努蒂乌斯、埃蒂安纳、普朗坦等印刷商可以和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各种各样的法国人结盟，不加区别，一视同仁。(457)

海克斯勒指出，世俗主义的增强必然削弱宗教信仰的假设是错误的假设。他

认为,世俗主义和宗教信仰这两种倾向在16世纪都有所加强,部分原因是它们在 441
相互作用。于是,宗教狂热分子的战斗越激烈,政体所受的威胁就越大,政治家对确保国内稳定的关注就越强烈。[458]他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思考问题。然而,正如其他界限分明、条理清晰的图式一样,其优点中亦有不足。对立的派别阵线分明,一边是世俗头脑的政客,一边是狂热的信徒——如果你要在这里寻找一般的、模棱两可的、前后一致的人,那么你会徒劳一场、一无所获。朝三暮四的印刷商"既要撒鹰打猎又要讨好兔子"[459],他们满足天主教、加尔文教和世俗市场的需要,始终如一;这样的政策使我们想到人性之复杂。他们不可能被恰如其分地塞进任何简单的二重性图式或三重性图式。他们的理据常常和宗教狂热分子相抵触;有些人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又具有被禁的异教徒身份。他们与强势的统治者合作,但他们的兴趣又不同于参与建国大计的政治家,不会拿起武器去参与改朝换代的战争。他们的业务在松散的联邦里兴旺发达,在高度整合的联邦里就略为逊色;在小公国里的生意好,在大的或扩张中的公国里就稍差。审查图书的政治使他们不但成为教会官员天然的敌人,而且成为官僚主义、规章制度和文牍主义的敌人。作为独立的行动者,他们为"第三势力"提供宣传机器和隐蔽的支持,这里所谓"第三势力"是不和任何教会或国家结盟的势力。[460]当我们试图解释"宽容精神的上升"时,"苏黎世的公民"和"英格兰有地产的贵族"值得进一步细察以便于解释。分布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印刷商也不应该被忽视。[461] 442

异端商人和印刷商的辛迪加与地域辽阔的销售网络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表明,新产业促进非正式的社会组合,而这些组合则横跨传统的疆界,包容不同的信仰。新产业还促进社会接受一种新精神的特质:四海一家、基督教会一体的、宽容的精神,同时又不必离开修院、盲目轻信,也不必成为抗议教廷的新教徒。这一精神特质似乎预示启蒙时代某些共济会教义的出现,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其教义带有秘密的性质,甚至是准密谋的性质。

提倡这种完全成熟的新气质的中心之一是印刷商普朗坦在安特卫普的印刷所。虽然它保留了与天主教的关系,但它同时又得到学界、商界和不同信仰的政界人士的支持。普朗坦圈子里有些人和尼科德默派(Nicodemite sect)即"爱之家"(Family of Love)结成了比较松散的关系。普朗坦在安特卫普的印刷所以及托马斯和戈弗特·巴松父子(巴松父子是英国人,在莱顿办印刷所,后来为在荷兰受迫害的阿米尼乌斯派服务)的印刷所为"爱之家"会员刊印了很多书;近年来,这些书引起学界相当的注意[462],实在是不足为奇!不断发现的文献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我们能够一窥16世纪这一影响很大的地下运动的运行机制,当时的人未能发现这样的运行机制。"在普朗坦的友人和熟人圈子里,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秘密会社的绝佳例证;普朗坦—默雷图斯博物馆的资源……使我们看到这一运动的概貌,看

到他们是如何做到不被人发现的。”[463]这个网络能够发展且能够规避迫害，固然有许多原因，普朗坦极善于和位高权重者交朋友尤为重要，他善于为自己谋求到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也许，他最非凡的成就是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封为“首席印务官”，国王任命他督察低地国家的印刷业，检查这里的每一位印刷商的能力和宗教正统性。[464]几乎同样非凡的成就是他赢得了博尼托·阿里亚斯·蒙塔诺(Benito
443 Arias Montano)的信任，蒙塔诺是国王腓力二世的谋臣、朝廷最杰出的学者。国王委任蒙塔诺到安特卫普去督察多语版《圣经》；蒙塔诺回到西班牙时，国王授予他新的荣誉，但他还是悄悄地和在低地国家新结交的普朗坦圈子通信，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改变了西班牙图书贸易的常规模式。

> 西班牙人频繁地从安特卫普出版界收到运抵的图书，这是西班牙和低地国家学术联系的最好写照。蒙塔诺的影响是西班牙对外国书的需求大大增加的原因之一。1586 年，普朗坦决定在萨拉曼卡开一家分店……
>
> 萨拉曼卡选作分公司的地址是一招妙棋。萨拉曼卡大学有 8000 名学生。表面上看，这个书店的建立是要促进祈祷书的销售，因为自 1569 年国王降旨以后，祈祷书就只能在安特卫普刊印。但毋庸赘言，这个渠道还用来发行其他性质的图书……
>
> 当然，这一外来学术与官方宗教裁判所的政策背道而驰。自 1559 年起，教会当局就在比利牛斯半岛周围设了一道封锁线。印刷所受到严密的监视，进口图书需要许可证……[465]

然而，阿里亚斯·蒙塔诺是王室牧师和谋士，享有处理禁书的特许，又被任命为埃斯科里亚尔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在气氛晦暗的宫廷里，他拥有一群追随者，在西班牙所谓的“伊拉斯谟”运动中，他们给生活增添了新的一页。普朗坦圈子和爱之家的故事之所以迷人，部分原因是它们揭开了深藏的历史事实：一位显赫的天主教官员而且是著名的反宗教改革学者实际上干的事情刚好相反，他在西班牙的京畿重地组织了颠覆性的“小分队”。

普朗坦那地域辽阔的出版帝国在当时的欧洲独占鳌头，其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善于赌注、结交不同教派权贵的能力。“尼科德默派”允许教徒在各
444 自生活的地区服从当地的宗教习俗，这就有助于为出版商的外国代理人铺路，容易使潜在的迫害人难以近身。[466]所以，普朗坦的非正统教义的普适性和“尼科德默派”的性质可以被视为一种补充，他的主要活动是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活动。他的安特卫普圈子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例证，宗教信仰和经济自利是可以互相强化的”。

在普朗坦及其债主身上，我们揭开了一个群体的面纱，这个群体颇像一个

微型……名曰“新教银行”的长寿的财团……赫伯特·吕希(Herbert Lüthy)最近对此作了研究……也许，我们应该像吕希那样断言，使这类人结成财务联盟的主要力量是血缘和友谊。然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前进一步并发现类似……马克斯·韦伯寻求的关系。我认为，“爱之家”成员的信仰……对于在意识形态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工作的商界人士而言，有积极的经济意义。一套秘密的“尼科德默”信仰，由于强调兄弟之爱，使其成员能够规避灾难。相反，那些死守……教条主义立场的商人尤其是印刷商，却不能适应推行相反意识形态的政权。(467)

为了预防误解，我们可以假设，金顿这段话不是说，普朗坦选择信仰时心中想到的是这些信仰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此理性选择的信仰本身几乎就是矛盾的。相反，金顿是在沿着达尔文主义的路子寻找一个演进模式；他的意思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商人尤其是印刷商最适应生存，能够在宗教战争命运飘忽的岁月里发财。如果这些商人们接受宽容的、能够暗地里坚持的教义，即使在他们吸引外国人财务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规避狂热分子的迫害。这个观点受到欢迎。不过，它还是留有余地让我们进一步思考问题。

当然，成功的商人—出版人那种普世的眼光和他们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立场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强权中心和宗教疆界频频迁移的时代，他们这样的立场是明智的。不过，他们的观点与其产品特性也有关系。普朗坦的商品使他和其他经销商及贸易商迥然不同。他的出版物把文人及其学术引进他的作坊里，使他在陌生的学者、书虫和文人面前感到轻松自在，比他与邻居和亲友打交道时还要更加自在。这位生意兴隆的出版商必须要熟悉图书和思想潮流，就像纺织品商人要熟悉纺织品和服装时尚一样。他要像艺术品鉴赏家一样熟悉各种字钉、图书目录和大宗图书销售。他掌握许多语言，善于鉴别异文、研究古籍和古本铭文，亦善于印制新地图和年历。总之，他的业务性质给他提供了宽厚的人文教育基础，拓宽了朋友圈子，包括和外国人的密切联系。外来移民和外国人之所以受到他的欢迎，那很少是因为血缘或友情纽带，也并非总是为了追求投资、新市场、赞助或特权。他还需要外国专家担任编辑、翻译、校对和设计。外国领土里的新教孤岛需要通俗语《圣经》、《诗篇》和《祈祷书》，这也促进了印刷商与“外国移民社区”打交道，其基础是移民孤岛的宗教需求。为伦敦的意大利社区、日内瓦的英国人社区、荷兰的法国教会提供祈祷书不仅使印刷商和外国商人打交道，而且使他们更加理解各种不同的基督教经验，更加了解不同语言的宗教仪式里那些细腻的差别。

外国翻译常常被迎进印刷商的住所和作坊。印刷商常常给他们提供食宿，有时还请他们进入家庭的圈子。出版维萨里医学著作的巴塞尔出版商奥珀利努斯接

纳的外国人大名鼎鼎，也许比后来普朗坦在安特卫普吸引的名人还要出类拔萃。那个时代大多数“激进宗教改革”领头的指路明灯都曾经在奥珀利努斯的印刷所工作，他们是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雷里奥·索齐尼(Lelio Sozzini)、贝纳蒂诺·奥基诺[①]、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厄科兰巴丢[②]、卡斯帕·施温克菲尔特(Kaspar Schwenckfelt)——且不论英王玛丽时代的流亡者约翰·富克斯。奥珀利努斯还
446 与帕拉切尔苏斯过从甚密。他还为戴维·若里斯(David Joris)提供庇护，若里斯是“爱之家”的三位创建人之一。(468)在后来的启蒙思想家的圈子里，以及再后来的圣西门的追随者的圈子里，“家”一词用以指示共同的思想承诺，更具有象征和形而上的意思。不过，寄宿在印刷商家里的翻译、审校和校对的确成为临时的家庭成员。编印多语版《圣经》的家庭不乏其例，带有风险的大型学术著作常常由这样的出版商推出。

《圣经》的印行应该再次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圣经》的多语特性促成了编辑和翻译《圣经》的学者—印刷商的接触。考虑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身边的圈子时，就应该记住他心中多语版《圣经》的蓝图。(469)普朗坦在安特卫普后期的规划团结了不同领域和信仰的博学鸿儒。为了完成这个八卷本的宏大工程，确保各种背景的编辑达成顺利的合作共事关系是他们向往的目标。内部的和谐还依靠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埃蒂安纳推出《圣经》时就拥有这样的工作环境。罗伯特·埃蒂安纳和佩蕾特·巴迪乌斯(Perrette Badius)的餐桌和工作台周围聚集了十几个不同民族的学者。据两人的儿子亨利记述，连他们的仆人也学会了一点拉丁语，因为这是他们
447 唯一的共同交流工具。(470)巴塞尔的阿梅尔巴赫-弗洛本印刷所也形成了这样一个非正统的、国际性的圈子。(471)在欧洲各地，许多出版《圣经》的其他印刷所也形成了这样的圈子。马德里附近深藏着一个搞颠覆活动的集团——这个想法能激发人们想象斗篷加匕首的阴谋。许多城镇里的许多印刷所的观念似乎同样可以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想象：每一家印刷所都是一个思想交流的交叉路口，一个微型的“国际家庭”——会晤场所、讯息中心和庇护所合而为一的“国际家庭”。在16世纪晚期，文明史上首次出现了全球规模的和谐世界(*Concordia Mundi*)的观念，“人类家庭”(family of man)的观念涵盖的范围包括世界各国人民。(472)若要理解这样的观念何以形成，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出版商和学者—印刷商入手，看看他们如何在宗教战争

---

① 贝纳蒂诺·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1487—1564)，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审读并批判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后改奉新教，被控异端，逃亡到日内瓦，皈依加尔文教；后逃到英格兰，参与宗教改革；后又返回大陆，游历多国，著有《三十篇对话》。

② 厄科兰巴丢(Johannes Oecolampadius，1482—1531)，瑞士神学家，宗教改革的一方领袖。

的连天烽火中艰难地驾驭他们的航船。以普朗坦为例,他的书简显示:他就古代叙利亚语字钉的问题向波斯特尔请教,从蒙塔诺得到一份犹太经典《塔木德经》,回答墨卡托就巴黎地图提出的问题,向巴伐利亚一位官员推荐在英格尔斯塔德(Ingolstadt)聘任教授的人选,就如何为宗教书做插图向人请教神学问题,如此等等。(473)查阅这些书简,揭示通讯联系,这个过程就是揭示文坛萌芽期的中枢神经和通讯交换台的过程。普朗坦的账簿为经济史家研究早期近代企业家的经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除了指向早期资本主义之外,他的通信还在其他方面给我们启示。产生后世"欧洲良心的危机"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在这些书简里找到了。

448

我想再次指出,如果特雷弗-罗珀给予印刷商和出版商的角色更多的注意,他那意味深长的分析会更加具有说服力。为了解释鼓励神学妥协的态度何以会增强,仅仅指出宗教战争三次低潮的间歇是不够的。(474)即使在西班牙人宗教战争最狂热的巅峰时期,一个国际和平运动也在悄然形成。在一个半世纪的宗教战争中,"伊拉斯谟牌号"的趋势也在不断推进。游徙的学者、思想移民和宗教难民不仅在出版商的家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而且还在这里找到了同气相求的同事和出版渠道。然而,如果只划分出"伊拉斯谟时代"或"培根时代",将其作为热爱和平的启蒙思想家避难的时期,那么,如何理解启蒙运动的宗教源头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即使《圣经》印行促进了宽容的精神,《圣经》还是有可能强化教条主义;考虑到这种复杂的情况,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在研究宗教改革中其他类似的交叉潮流及矛盾态度时,这样的方法同样是有助益的。

文艺复兴研究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基本因果关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更多地注意印刷术的影响也是值得的:

> 基本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16 世纪初基督教世界的情况是否表现出岌岌可危的平衡,以至于革命性的或改革性的剧变势在必行?16 世纪初的欧洲是否在"为宗教改革呐喊"?
>
> ……我们所知太少……最多只能作一些试探性的表述……尽管如此,此刻的一般结论似乎是,欧洲社会的稳定性远远超过了传统观点的估计。换句话说,如果路德和其他早期宗教改革家在襁褓中就夭折了,天主教就可能不会遭遇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剧变。(475)

假定 1500 年欧洲社会和基督教制度相当稳定,那么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五十 449
年以后,《圣经》传统是否也稳定呢?正如本章所示,《圣经》传统是很不稳定的。围绕教士特权和《圣经》研究的新问题总是会产生一些冲突,而这些冲突是不可能无限期推延的。即使路德、茨温利和其他人在摇篮里就夭折了,总有一些改革

家转向印刷机，以便能够完成悠久的田园生活关怀，并达成福音传播目标。或许，基督教世界的内战并非不可避免，但印刷术的出现至少会排除长久维持内乱的可能性。

总之，似乎可以保险地断言，如果我们尊重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将印刷术的出现置于前而新教的反叛置于后，那么，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和混乱相关的一切问题就不会那么令人困惑了。

第三部分

Part Three

自然之书的转化

PDG

第五章
导论：断代问题

5.1 导论："伟大的自然之书"与"渺小的人为之书"

和近代科学兴起有关的问题也可以用类似的观点来论述。换句话说，我认为，科学史家在为托勒密的天文学、盖仑的解剖学或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布置退场的舞台时，应该给印刷术的出现以更加突出的地位。这就是说，我们要对当前科学史研究的指针作一些重大的修改，比我们对宗教改革研究所作的修改要更加猛烈。在宗教改革研究领域，印刷术的影响可以往后推；不过在判断路德改革的动因时，印刷术的影响一般算动因之一。滚滚而来的小册子和卡通给人的印象太生动、太强烈，人们在研究新教反叛时，不可能完全忽视印刷术这种新媒介。然而，在所谓"科学革命"的研究中，情况则刚好相反。有一些权威暗示，印刷术的"催化剂"影响使16世纪的科学经历了一场革命。尽管如此，他们强调的是"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这一观点并没有给其他科学史家留下什么印象。[1]这是因为利用大众媒介的现象在占卜师和江湖郎中里很普遍，在用拉丁文写作的专业科学家里则不太普遍，因为这些科学家不将自己的著作交由印刷机刊布于世。即使重要的科学论著用机印书的形式出版发行，它们也很难成为畅销书。由于《天体运行论》之类 453
的书的流通范围非常有限，而且能够看懂这些书的读者很少，印刷术的重要意义似乎容易被低估。由于古籍的流布范围比较广较，许多权威学者倾向于走得更远，他们甚至给早期的印刷商排定一个消极倒退的角色。"没有证据表明，印刷术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宗教领域算一个例外……事实上，中世纪科学文本的刊布可能使哥白尼……被接受的时间推迟了。"[2]

然而，如上一章所示，即使在宗教领域，"新思想的传播"也仅仅是需要考虑的几种新功能之一。印刷术的新功能既影响异端又影响正统。这些新功能给《圣经》

的文本传统重新定向。在谋求理解科学变革时，我们也需要审视“新思想的传播”之外的因素，需要将印刷商与普及和宣传之外的功能联系起来研究。比如，和《圣经》传统一样，在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完成之后，从亚历山大时代继承下来的文本传统也不太可能维持不变了。印刷商取代誊写人之后，修订和追求悠久目标的尝试也可能得到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结果。

然而在当前，我们不仅倾向于将路德小册子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哥白尼论著有限的吸引力进行对比，研究科学变革问题时，我们还倾向于完全忽视文本传统。传统的图像材料促使我们把新教徒构想为手捧书本的人（尤其与天主教徒手数念珠的形象形成对比）。然而，近代早期科学家更可能被描绘为手握植物或星盘的人，
454 而不是研究文本的人。博物学家可能研究过托勒密、普林尼、盖仑或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早期机印版本。就此而言，他们常常被指责为看错了方向。“你可能会想，航海家令人惊叹的发现使人的注意力从渺小的人为之书转向了伟大的自然之书。”(3) 但你禁不住要问，如果不用“渺小的人为之书”交换信息，“伟大的自然之书”又如何研究呢？考虑近代科学的兴起及其相关的趋势时，即使仅仅是为了挖掘出我们看错方向的趋势，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的。我们心中的天文学家总是仰望不变的天象，解剖学家总是把人体当作书来观察。之所以 16 世纪的观念革命特别难以解释清楚，这样的现象至少是一部分原因。此外，观念的革命发生在凝视星空或解剖人体的方法之前，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在这个方面，绕开其他书以便去读自然之书的比喻是使人上当的一个源头，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有人打了这样的比方：“普世的、公共的手稿摊开，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思想史家和文化史家笔下的这一比方提供了令人神往的思想史游历，但他们很少驻足思考，如何将新鲜的观察资料“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

> 我从两本书采集神性。除了那本有关上帝之书，还有一本是有关他的仆人的自然之书，自然之书是宇宙的公共手稿，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在一种书里没有看见上帝的人，已经在另一种书里看见了上帝……毫无疑问，上天比基督徒高明，上天知道如何参与并阅读这些神秘的文字。我们粗枝大叶地扫视这些常见的象形文字，以鄙视的目光匆匆一瞥自然之花，不愿意从中吮取神性。(4)

455 托马斯·布朗勋爵把《圣经》与自然之书进行比较时，他不仅在重新加工弗朗西斯·培根喜欢的主题(5)，而且还吸收了更早的一些资源。据恩斯特·库尔提乌斯记述，中世纪的修士们已经提到这两本“书”，而且其终极来源是近东的古籍。库尔提乌斯认为，这一衍生的过程证明文化的连续性，这正是他用以反驳布尔克哈特主题（或至少是其庸俗化的翻版）的证据。他说：“这是许多人喜欢的陈词滥调……

文艺复兴掸掉了发黄的羊皮纸上的尘垢,开始阅读自然之书或世界之书。但这个比方本身衍生自拉丁文化的中世纪……”[6]他指出“自然之书”已经在中世纪文本里出现,但这一事实本身并非反对陈词滥调的有效证据,虽然那陈词滥调本来是可以驳倒的。初期使用的老比方常常掩盖着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情况下,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引起的变化被掩盖起来了。当一位 17 世纪的作家把《圣经》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时,他可能在呼应古老的文本。他心里想到的真实的书和比方的“书”必然不同于 12 世纪修士所知的任何书籍。

12 世纪的圣贝尔纳说“自然之书”时,他想的不是植物和行星,和托马斯·布朗勋爵想到的不同。他想到的是修院的纪律和艰辛而有益的农田劳作。[7]他的修士兄弟们庆贺自然的生殖时,眼里看到的还有虔诚的目标。学习道德教谕时,人们需要许多栩栩如生的画面作为辅助记忆的手段。15 世纪的一本布道书里有一句话:“人类是盲目的。”书中收录了许多自然历史著作的选段。

> 人的灵魂在神圣的事情上总是健忘,但取自自然的例证能够很好地捕捉记忆,使之难以忘记……能够使人的思想锁定在造物主身上……自然例证对布道者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不仅能够抓住注意力,而且比训诫更有意义。[8]

寻求意蕴丰富的例证的布道者有形式多样的大量例证可供调动。[9]中世纪的布道辞以教谕宗旨为首,《圣经》和自然不是分离的,而是纠缠在一起的。自然包裹在寓言里,担任配角。

> 我们看见的有关动物行为的论述……偶尔指明某种观察的感觉。但我们在此又面对这样的情况:《动物寓言集》(*Bestiary*)的寓言叠加到我们观察的动物身上。自然界里的一切都具有象征意义。其象征来自于《圣经》或古典传统,但它们都带有道德寓意……《快乐花园》(*Hortus Deliciarum*)之类的书被用来传授所有的美德,用香花美卉的意象来美化整个的心灵花园。香果的意义寓于其属性中。无疑,很少西方修士有机会看到曼德拉草……或石榴,只能看见作者在书里为他们描绘的花果……[10]

布朗那段引文提到“不屑”从“自然之花”“吮吸神性”的异教徒;如果把这段话和中世纪“花园”的序文比较[11],布朗这段话似乎表现出对前人心灵习惯的不满。正如拉伯雷讥讽给花草赋予“美德”的人一样,布朗似乎拒不接受世世代代的修士培育的文学寓意常规。[12]

到 17 世纪,产生这类常规的环境变了。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英格兰不用再把花卉当作道德寓言来铭记。当花草和美德与恶习联系在一起时,那是为了获得诗意的效果,而不是为了获得教谕的效果。《圣经》本身不再用一些“混合媒介”比如

彩绘玻璃、祭坛、石门、合唱乐或神秘剧来表现。当权威的审定版《圣经》进入每一座教堂后，神圣的故事就明显地和渎神的故事区别开来了。把阅读《圣经》和研究自然结合在一起、把宗教文选与植物学文本联系起来的现象再也不自然了，那需要诉诸文学手法，布朗本人那种巴洛克式的华丽风格本身就说明问题。

布朗再加工这个旧主题时，他心中想到诗歌花园和真实花园的反差吗？他是在强调“基督教”花园与“异教”自然的区别吗？当他论述参与并阅读神秘文字或“共同的象形文字”时，他指的是日心说吗？是托马斯·迪吉斯(Thomas Digges)阐述的“毕达哥拉斯派的古老的学说”吗？该学说“最近由哥白尼修正且被地理学证明了”(13)。他那似乎矛盾的“宇宙的公共手稿”形象是否说明，他熟悉伽利略的这段著名的文字呢？伽利略说：“宏大的宇宙之书矗立在我们眼前，继续不断地凝视我们……这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其文字是三角形、圆形等几何图形。”(14)

布朗的著作里压缩了许多层次的意义，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是难以回答的；若要试图回答，难免会产生一些离题的话。为了本书这里的目的，只需指出一点：无论布朗心里是否还想到其他的问题，他对印刷媒介和印刷的视觉辅助手段是熟悉的。在这个方面，他的比方所依据的物体是圣贝尔纳从未见过的。

你可能会说，这一点太明显，不用再提。几乎没有什么概论不提醒我们，科学
458 和宗教一样在近代早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每一位学童都知道，12 世纪的世界地图和 17 世纪的世界地图是不一样的。然而，在教科书的陈词滥调之外，还存在大量富有争议的文献：如何描绘差异、如何最好地解释变革为何发生等问题，是有争议的。我认为，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我们要更加强调明显的事实，要停下脚步更加仔细地思考这样一个事实：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变迁发生在前，世界观的转变发生在后。如果持这样的态度，我们必然会大有斩获。

目前的情况是，这个看似明显的事实常常被人搞得朦朦胧胧。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哥白尼和长期流行的地心说决裂？为什么第谷·布拉赫和威廉·哈维的观察与前人不同？为什么“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能够用新的方式去观察广为人知的现象”？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科学史家和宗教改革史家一样，习惯于考虑多种因素。他们可能会驻足思考“文艺复兴问题”，他们会掂量意大利人针对北方人的宣示、经院哲学家针对人文主义者的言论、亚里士多德学派针对柏拉图学派的辩难。“新柏拉图主义”、“古原子论的复活”、“阿基米德的再发现”等“新奇的现象”要他们去注意。(15)和研究宗教改革一样，科学史家不能忽视中世纪“先驱”可能拥有的重大意义，也不能忽略个别“天才”提出的问题。正如研究路德的学者一样，科学史家可能会接触到心理学家的发现——不仅用这些发现去研究“年轻人牛顿”的心理生活，而且去思考集体“格式塔转换”的可能性。(16)人们(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提醒他

们不要忽视社会经济变革对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他们还可能倾向于和社会学家合作去再次检视“韦伯主题”[17]。然而，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略，即使注意到15世纪的传播革命，他们似乎都仅仅给传播革命以短暂的一瞥，就急匆匆直奔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了。[18]在新发明或新工具里，伽利略望远镜已经比谷登堡的活字印刷的形象高大。如果稍微详细地考虑了传播革命，给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赋予一定的意义，他们的讨论就可能集中在17世纪的通信，而不是15世纪的机印书了。 459

在大多数介绍早期近代科学的概论里，作者在处理欧洲的传播革命时都把主要的变化推迟到期刊的诞生，直到期刊取代了“信箱”，比如勤于通信的修士梅森①的信箱。专攻某几个世纪的积习造成的障碍时，人们常常难以感觉到积累性的、连续不断的趋势。在这里，诸如此类的障碍堵塞了“天才的世纪”，仿佛筑坝拦截了科学出版物的洪流，将其与产生这一洪流的生产力割裂开来。于是，邮政的发展和改进博取了更多的注意，此前建立的早期印刷所、贸易网络和书市反而不那么引人注目了。[19]“在17世纪，印刷词起初获得重要意义，如今却开始失去其意义了……我们的首批学术刊物比如《博学者杂志》(*Journal of Sçavans*)和《哲学通讯》(*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都是1665年创刊的。”[20]

标准的学术著作都挑选这些学术刊物评述，因为它们加速了科学新闻的传播，使分散的学术精英能够了解彼此的最新进展。于是，期刊出版被认为是过去手写书信的科学报道的进一步延伸。[21]当你研究的氛围局限于科学刊物时，把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定在17世纪，这似乎是公允的判断。然而，当你关心的范围扩大到近代科学兴起的大课题时，这一判断就是错误的。书信让朋友知道同事的活动固然可行，但有局限。当你传达的是实际的研究成果时，手写的书信就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了。毫无疑问，如果手写书信传达的是开普勒正在研究一套公式的新闻，那是有效的。然而，用书信来传递《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那就行不通了。当你印行数百册的一部专著，而里面又包含着大量的数字、图表、地图和海图时，甚至当你需要精确而详尽地传达口头报告时，手抄本的效能和机印书相比就极其低下了。[22]本书稍后将要讨论，开普勒仅仅是竭力获得印刷商出书的精英学者之一。连梅森也花时间张罗以便请人印行开普勒的著作。倘若印刷术的重要意义被推迟到17世纪60年代中期，那么，伽利略受审的历史意义就必然会遭到误解。[23]雷乔蒙塔努斯在纽伦堡创办印刷所是在15世纪70年代，这就是印刷词在 460

① 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法国社会学家、自然哲学家，提出梅森数，勤于通信，因为那时尚无科学杂志，所以通信十分重要；据传“告诉梅森一个发现就意味着在全欧洲公开发表”；著有《科学中的真理》等。

欧洲科学界获得重要地位的最初年代。如果其重要意义被推迟到17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一估计几乎就相差两百年了。(24)

毫无疑问，17世纪60年代滥觞的期刊影响到科学活动的步伐与性质。科学社会学家有理由主张，这些新期刊的功能值得更仔细地观察。(25)而且，当前的科学文章和科学著作的功能经常似乎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富有创新性，后者则比较保守。(26)然而我们不清楚的是，这一区分是否符合19世纪科学出版的实际情况，那
461 时，赖尔①、达尔文、麦克斯韦②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注意到创新成果既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也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而且，如果再继续往回追溯，论文和专著的区分就更显得无的放矢、毫无意义了。19世纪晚期，牛顿的专著《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问世，皇家学会的《哲学通讯》创刊，这样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再考虑这个"天才的世纪"早些时候出版的著作，或者追溯哥白尼革命的整个过程，把著作和期刊对立起来的做法不仅不能澄清任何问题，而且会把许多事情不必要地搞得模糊起来了。

无论你怎么评价学术刊物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你都不该走向贬低"单纯的科学著作印行"的结论。或许，学术期刊对专业科学家的更加鲜明的形象界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新的脑力劳动分工，促成了一个"裁判体系"。学术期刊并没有引出成套的系列出版、数据的保存、"从动机明确的保密到动机明确的公开袒露"，也没有引出读者的反馈以及作者和编辑对读者的回应。(27)这些特征早在150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那是早期机印书的时代。这些特征的断代应该是在哥白尼之前，而不是在伽利略之后。如果我们需要理解科学数据的搜集是如何完成变革的，我们就必须这样看问题。

再者，如果将邮政和陆路运输的改进与新型图书生产的方式并列展示，邮政和陆路运输的改进产生的后果，实在是微不足道。早期近代欧洲人交流的信函并不比古罗马时期快多少，不过，信息流动的方式的确是改变了。然而，将17世纪欧洲天文学家的设备和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的设备区别开来的，并不是效率更高的邮政或道路。(也不是货币经济或都市化。)为什么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的权威性维持了一千四百多年？为什么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不到一百年就被超越？在谋求解释这一差别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印刷机对抄书人的取代。

我们坚持认为，必须要更加鲜明地区别"手写"交流系统和"印刷"交流系统，认

---

① 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主张地质结构的自然成因，反对灾变论或求助于《圣经》，代表作为《地质学原理》。

② 麦克斯韦(James Clark Maxwell，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创立电磁理论，提出麦克斯韦等式，认为光的本质是电磁波，发展了色觉定量理论，最早制成彩色照片。

为这一分别更加重要,而"机器印刷"的图书和"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分别却不那么重要。我们这样的坚持并不是钻牛角尖。怀特海[①]曾经问:为什么一直"无精打采"的研究"在16世纪和17世纪突然加快步伐"?要回答这个问题,考虑"欧洲的心灵"如何为这一新的冒险做好准备,我们就必须更加细心,更加注意细致的区别。 462

> 没必要详细论述标志科学兴起的各种事件和人物:财富和闲暇的增加、大学的扩张、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收复;哥白尼、伽马、哥伦布;望远镜。土壤、气候和种子均已具备,森林就蔚为壮观了。(28)

绝不是"没必要",我认为在讨论这些驳杂的"事件"时,有必要作详细的论述,而且,对这些事件进行辨析是同样重要的。

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博学的欧洲人从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走到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些非凡的"思想冒险"的每一步都打上了一个烙印:"单纯将手稿付印的习惯。"由于这一习惯在15世纪前不为人知,所以在1500年前利用亚历山大城、帕加马和其他伟大学术中心的特殊设施搜集资料的人留下了大量的遗产,给欧洲人以很好的教益。15世纪之前,训练有素、能够誊写技术资料的人很少,确保足够的誊写人相当困难,所以《天文学大成》这样一部书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一千四百多年,实在是令人称奇。阿拉伯人赋予天文学研究非常优先的地位,唯有这个因素才能够解释,为何阿拉伯人能够保存《天文学大成》达一千四百多年,为何这一巨著在西方却已失传。在伊斯兰人征服的土地上有许多古代的讯息中心。阿拉伯天文学家构建新理论,改造旧理论,记录新天象。但在伊斯兰世界里,再也没有产生堪与《天文学大成》一比高低的权威巨著。(29)

12世纪《天文学大成》在西方恢复并翻译成拉丁文之后,其保存和传播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在手抄书时代,它始终是非常深奥的论著,任何时候都很少有完整的足本存世。哪一代的西方天文学家都很少读到全本的《天文学大成》,很少有人传授应用该书的心得。天才的天文学家穷毕生精力,抄写、校订、做概要,但他们所用的抄本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讹误不断增加的本子,这个本子是12世纪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 463

> 有时真难以弄懂,重构古代世界的知识体系比如天文学和算术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精力。那还不是超越古人的问题,而仅仅是了解古人曾经知道什么,知道以后失传了什么。这是艰巨的任务,需要许多学者付出艰苦的劳动。直到12世纪,拓展科学知识边疆那种意义上的"研究"冲动才刚开始萌动,而

---

① 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被称为永恒的伟大学术著作,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且很微弱。[30]

在12世纪后的三百年里，亚历山大城的人们确立的科学知识疆界一直处在西方人的视野之外。据说，《天文学大成》的足本“几乎完全不见于欧洲天文学文献里，直到16世纪”[31]。这句话可能有些言过其实。1451年出过一个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本子，1496年又印行过一本精心编辑的概要，其根据是12世纪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本子。[32]尽管如此，到12世纪时，研究过程无穷无尽的观念才开始“微弱地萌动”，新信息不断积累、未知边疆退却的观念还不太为人所知。拓展科学知识的近代冲动尚未从过去那种恢复和重构科学知识的旧冲动中剥离出来。

> 到16世纪，天文学家还在关注托勒密研究的同样问题……对许多人而言，这一段停滞期似乎……长得无法令人宽恕，他们搜寻造成这一局面的人，将其作为抱怨的对象……这样看问题就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向近代观点转变的过程……需要一系列大胆的思想步骤，但这些大胆的步伐在新证据逐渐
464 积累以后才能迈出去……这必然要花费时间。无论如何，这个过程不可能立即启动。在亚历山大城被砍断的……希腊科学幼苗必须要移栽到新的土壤里。[33]

然而，面对长期的“停滞”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不能漏掉。从托勒密到雷乔蒙塔努斯的千百年间，新证据不太可能“逐渐”积累，而是容易出错和脱漏，因而不得不再现和复原。[34]“时常出现的令人震惊的抄写错误……总是存在于中世纪的天文图表中，因为这些副本不是天文学家抄写的。”研究印刷术之前的情况时，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停滞”的问题，也不是进步缓慢的问题，而是错漏的过程是如何得到遏制的，甚至有时是如何逆转的。

这一逆转发生在古亚历山大城。在图书馆庞大的精英团队的指导下，新的资料得到保存，且“逐渐积累”起来了。[35]这样的“温床”条件产出了几百年的累累硕果。既然有如此悠久的合作及其繁复的技艺，你可以质疑“幼苗”的概念，考虑其非凡的成熟果实。众多卓尔不凡的设施产生了地球绘制和星图绘制的伟大进步。此后，一些新园地开拓了，更多的旧园地失去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藏图书散佚以后，古代“巨人”在数据搜集上取得的伟大成果就难以检索了，后代的“侏儒”难以望其项背。亚历山大城的成就是难以超越的，换句话说，在文本传播的机制改变、数
465 据搜集的基础构建之前，该图书馆的成就是难以超越的。

印刷术将优于亚历山大城的设施交付给学者使用。一旦这一事实得到澄清，为何学者们的活动取得前无古人的成果就容易解释了。印刷术时代的学者信仰数学秩序，具有“明白而精确思维的习惯”，关心准确计量，哲学现象不再被当作需要解释的中世纪晚期的新奇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不同群体

长期的共同态度；在此之前的手抄书时代，这样的态度却表现得比较弱小。比如有证据表明，天文学领域里就有人认为，“追求日益精确标准的抱负”“在古代两河流域和在现代世界一样强烈”[36]。由于哥白尼具有专业的性质，他渴望达成数学上典雅的图式；在解释他的渴望时，我们既不必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不必用文艺复兴时的新柏拉图主义。“哥白尼是全身心投入的专家。他是希腊化时期复活的那种数学天文学的传统学者。”[37]无论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宇宙论上有什么样的分歧，专业天文学家总是认为，宇宙是根据某种数学秩序设计的。

因此，你可以给怀特海的建议补充一点意见：经院哲学家给欧洲人灌输了一种“明晰而精确思维”的习惯，你可以考虑这一思维习惯是如何灌输给一切文化里的天文学家的。《天文学大成》的保存对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同样重要。但对准确描绘天象的关心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年历面对特殊的问题，正如多语版《圣经》面对特殊的问题一样。比如，测定复活节就比测定斋月的出现复杂得多。哥白尼检视亚历山大图书馆遗存的古籍，研究星象图，他利用三角的新成果，走的是和前辈基督教天文学家相同的路子：受教会雇用解决年历问题。然而，和前辈天文学家不同的是，他不用承担抄写图表的任务，他有空余时间阅读和思考。他获得的论著、记录和语言工具更多。而他的后继者比他拥有更大的优势，他们有更多的纸张形式的工具。

466

赫伯特·穆勒问：“人们为何想要……比过去更加准确地测量万物？到16世纪末，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渴望，那就是更准确地知道事件、距离、速度、数量……”[38]穆勒所指不是天象研究，而是更加世俗的、地球上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相关的是“计算利息表格的出版”、十进制和对数的发明、“精打细算的商务习惯的传播”。靠肉眼观察精确计算天象的第谷·布拉赫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无论精确计量影响到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不妨尝试换用一种方法去看这个问题。再次，我们暂且不去假定新的“渴望”兴起的问题，不妨多看看旧的渴望是如何得到满足的。14世纪有一种英格兰-诺曼人讲“十进制”的书，含137对押韵的对句，“多半是10音步古法语句子”，表现动物寓言书、计算书和占卜书等图书里的实用性。[39]然而，背诵对句虽然有助于技艺，但并不有助于研究革新高等数学的符号。和纸张比较，沉重的木制换算表笨重不便。用手指头计数、算盘计算并不能促进笛卡尔坐标的发明。诚然，莱奥纳尔多·斐波纳契(Leonardo Fibonacci)在13世纪初编制了《算经》(*Liber Abaci /Book of the Abacas*)，但“记住书中的换算表真是苦差事”，而且，“直到15世纪印刷机普及了印度数字[①]以后”，著名的《算经》勾勒的体系才得到广

① 即阿拉伯数字。

泛的应用。[40]

> 看起来，高标准的观察和计量的科学实践受到局限的首要因素……正是科学的性质本身。只有等到科学研究的观念改变以后，才可能注意到如何实现这些高标准……[41]

467 然而，首要的局限因素可能在“科学的性质”之外，决定这一因素的是复制图表、表格、示意图和地图的困难。印刷术之前，如果要求精确和统一的标准，那无异于异想天开，不可能有助于研究。印刷术之前，航海人和土地测量师最接近普世通用单位的计算方式就是用自己的手脚，他们用腿脚丈量甲板和土地。[42]人不再把自己作为丈量的工具时，观察和计量才比较精确。同理，当图表和详细记录可以精确复制、当按比例的草图不再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或污秽时，观察和计量才比较精确。早期印刷商出版西蒙·斯蒂文的《十进制》小册子和莱昂纳德·迪吉斯(Leonard Digges)的《计量筑造学》(*A Booke Named Tectonicon*)(该书的副标题是“准确计量并快速演算一切土地、广场、木材、石料、尖塔、梁柱和球体”)之类的小册子时[43]，原有的局限就被超越，更高的标准就达到了。

柯隆比认为：“产生科学革命的思想要素和实践要素在西方文明里已经有几百年的孵化过程。”[44]你可以详细阐述他这句话，强调在中世纪晚期有多少群体追求更精准的效果。西蒙·斯蒂文将自己的“十进制”奉献给“天文学家、土地丈量师、壁毯测算师、酒桶和体积计算师、造币师和一切商人”[45]。有鉴于目前强调理论与实践、工匠群体和学术群体分割的趋势，值得指出的是，和内皮尔的对数一样，斯蒂文的十进制对军事工程师和数学教授都有用。机印书里的图表还割断了普通人和大学师生的障碍。和古法语的有韵对句不同，新形式的无声传播超越了学术语和通俗语的分别。

468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新型的可重复的图像表述，在机印的技术著作里，这样的表述越来越普遍。和十进制及对数一样，木刻和镌刻跨越语言疆界，给生命学科“提供了一个相同的对全人类说话的尺度”——这是约瑟夫·班克斯勋爵(Sir Joseph Banks)描绘与库克船长同行的画家的作品时留下的评语。[46]阿格里科拉写道：至于“叶脉、工具、容器、水闸、机器、熔炉，我不仅详细描写，而且雇人做插图，以描摹其外形，以免文字描写难以理解，防止后人难以看懂”[47]。亚历山大城的图书之所以常常使西方人难以理解，部分原因是：托勒密、维特鲁威、普林尼和其他人的著作经千百年的辗转抄写以后，原有的插图脱漏。维特鲁威的文稿里曾有过示意图和图画，但 10 世纪以后，这些插图脱离了文字抄本。[48]托勒密的地理书经抢救发现了，但其中的所有地图早已荡然无存。[49]简单的象形文字更容易保存。在 16 世纪，人们还不太懂手抄书传播的困难，所以常常觉得，过去的权威学者表述的意思

含糊朦胧,而且其晦涩似乎既率性而为,又刻意求之。

> 阿格里科拉不赞同所谓的随意性,因为知识应该是能够传播的,传播知识的语言应该是精确的,主体间是可以传播的。还有许多书论述这一主题,但这些书都难以理解,因为作者们使用一些陌生的、不适合那些金属的名字,因为有些作者忽而使用这一名字,忽而使用那一名字,虽然事物本身并没有变化……[50]

千百年来传承有关"动物、植物、金属和石头"的观点再也不能使阿格里科拉及 469
其同时代的人感到满意。他们把自己发现的不足和不一致的地方归咎于哥特式黑暗时代的"语言蒙昧",归咎于人们长期对自然现象"缺乏兴趣"。但当前的证据显示,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并不缺乏好奇心,他们缺乏的是一些基本的研究工具。阿格里科拉对"可传播的描述性技法"的关注当然值得强调,但这一关切应该和当时的新传播系统联系起来考虑。维萨里所谓的"细节重要性的强烈意识……精确而充分报导观察所得的强烈意识,"同样应该和新传播系统联系起来考虑。考虑"传统的知识框架……陷入危机"这一转折时[51],毫无疑问,我们更应该注意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同时复制精确而详细的文字报告的可能性。与此相似,"一切试验和观察都要用充分而逼真的细节写成文字报告,而且最好伴以证人和证书"[52]。这样一种要求应该和一种新报告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考虑,只有在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完成以后,这种可能性才存在。正如这段论述所示,由于印刷术能够传输观察记录,且详尽而无缺失,所以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的传统随之改变。鉴于印刷术提供了新的设备,首先值得我们多多思考的似乎是旧目标在新环境下实施的情况,然后再去设想重要的变革来自于态度和目标的改变。面对宗教改革造成的问题时,这样的研究路径似乎颇为有用;同理,研究早期近代科学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有用的。

再者,如果更着重研究印刷术如何给重要的传统重新定向,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将宗教变革和科学变革联系起来。抄书人传承下来的《圣经》文本和科学文本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重新定向的,也就是在印刷机的影响下重新定向的。从亚里士多德、盖仑和托勒密继承下来的文本和从圣哲罗姆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本的命运有相同之处——这是本书最后一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470

《圣经》和自然都被重新定向,就此而言,它们的结合不再具有相同的意义。布朗勋爵既紧跟皇家学会的出版物,又紧追《圣经》学者的著作。《圣经》阅读和自然研究在他的脑子里的区分是清楚的,所以他分别赋予两者不同的功能和语言。和他的精英同道一样,他充分意识到在古希伯来文本中破解上帝圣言时荆棘丛生的困难。[53] 阅读《圣经》遭遇的困难是不确定的语义和晦涩的寓言,他将这些困难与"异教"哲学家比如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圆形、三角形等"共同的象形文字"进行对照——他知道如何将其联系起来解读。巴西尔·韦利指出,当《圣经》里的表述

和科学真理冲突时，布朗一定会坚持阿基米德的表述，因为他的表述精确，而不是文词比较空泛的神圣的《圣经》。(54)

托马斯·布朗勋爵把阿基米德的公式和《圣经·列王纪》里的所罗门对照，他这样做并不是在“给发黄的羊皮纸掸灰”，也不是在以崭新的目光审视广袤的户外世界。相反，他藏身图书馆，眼睛盯着古籍。不过，此时他正在阅读的文本是使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能够说得更加“准确”的机印本图书，有了印度—阿拉伯数字和统一的图表的辅助以后，这些机印书传递的信息前所未有地准确了。(55)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分析去审视布朗那个时代的其他精英的各种活动。

> 我相信，开普勒实际的工作程序里有一个从未被人揭示出来的重要特征。简单地说，他的假设没有用归纳法去论证，不是靠观察自然得出的结论。他既没有读自然之书，也没有读《圣经》，而是在读古人和当时人的著作……(56)

文艺复兴人抛弃“尘封的羊皮纸”，爱上了“自然之书”，这一观念并非无懈可击，但那不仅仅是因为“书”的比方被人忽视了，主要是因为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被曲解了。这一有漏洞的陈词建立在对科学活动的天真构想上，它认为科学活动应该抛弃旧书、摒弃曾经被接受的观念、亲自做第一手的观察。“凡是想要探索自然的人都必须将自然之书踩在脚下。学习写作是从学习文字开始的。相反，研究自然却要在土地上巡游：一块土地就是一页书。这就是‘自然之书’(Codex Nauturae)，你必须一页一页往下翻。”(57) 布朗表述的“宇宙的公共手稿”的意象本来就难以捉摸，这一天真的科学观却按照他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仿佛观察者真的穿上了飞毛腿的靴子，看见整个世界摊开在他的眼前；仿佛他可以不用地图和星图、世界地图和出行手册；仿佛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观察记录不必搜集、保存并联系起来研究；仿佛不学习过去的东西就可以对植物、动物、矿物进行分类比较；仿佛试验数据可以不必在许多记录本中保存下来核查就具有科学价值。

> 卖掉你的土地……烧掉你的藏书……买双结实的靴子，走进深山，搜寻深谷、荒漠、海滩，进入地球上最深的凹地；仔细观察各种动物、植物、矿物的差异……不耻下问，向农夫请教天文学和地象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你采购煤炭、修建高炉、观察并控制炉火……用这种方法而不是其他任何方法，你就能够掌握万物的知识和属性。(58)

这一幼稚的科学观摒弃第二手的记述，坚持亲眼观察，其根据很大程度上是16世纪经验主义者的论述，他们将新鲜的观察以及民间智慧和学校里传承的拉丁文书本知识对立起来。在怀特海的笔下，这些经验主义者发起的运动是“对中世纪思想里僵化理性的反弹”。“经过中世纪的理性狂欢以后……世界需要用数百年的

时间来思考不可简约、难以改变的事实……”(59)

然而，如果从僵化理性的经院哲学家跳跃到热爱自然的经验主义者，那就跳过 472
了搜寻古籍的人文主义者。对咬文嚼字的经院哲学家的“反弹”早在 15 世纪就已经发生，不过那是以古人和古文名义的“反弹”，而不是以“难以改变的事实”的名义的“反弹”(60)。由于 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抨击经院哲学家，由于他们偏爱例证而不是原理，由于他们对历史资料的兴趣，人们有时把他们和 16 世纪的经验主义者混为一谈了。有些 16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比如比维斯或拉伯雷表达经验主义的观点，所以两者似乎有某种联系。然而人文主义者的口号是：“回到源头去！”这使他们回到希腊研究，回头去搜求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当时的大学教授如果在固化的教材里插入了新材料，那是要受处罚的，人文主义者回归古籍的做法和教授添加新教材的做法是相当协调的。(61)而经验主义者的口号则是：“烧掉你的藏书！”两者的指向不同，经验主义者向没有文化的民众学习。帕拉切尔苏斯的露面和阿尔丁版的盖仑著作问世几乎同时……任何两件事的反差莫此为甚。帕拉切尔苏斯对人文主义者的古典作家的关切没有丝毫用处，和他们的语词没有丝毫关系……对大多数人文主义的盖仑主义者而言，帕拉切尔苏斯及其追随者是令人厌恶的。(62)此外，人文主义者对修辞和口才的追求难以和经验主义倾向妥协，经验主义的倾向是讴歌“对万物的研究”，贬低“语词的暴众”(63)。

> 唯一的要求是一定的观察力。他要观察天象的性质，无论天气阴晴，他要观察平原、山地、树林里的事物的性质。他出去观察，到生物的栖息地去了解其属性和习性。他要请教园丁、牧人和猎手……因为如果没有来自多种多样的方向的帮助，谁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切观察。(64) 473

即使在这一小段文字里，比维斯也超越了“一定的观察力”的简单要求；他最后的构想是对许多人的观察所得进行协调的人。尽管如此，他似乎认为，未受书本学习污染的实在的人能够提供足够的“帮助”。通过学习古代语言以便掌握记录古人仔细观察所得的技术文献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的规划里没有一席之地。反之，他倒给反智主义和尚古主义的观点留有地位，反智主义和尚古主义抨击一切学术训练，谴责经院哲学的或人文主义的学术训练，甚至对两者都予以谴责。在一位权威学者的笔下，这一场运动是反对教师、教材和其他拘束的，他认为，这样的限制是印刷文化强加于人的。

利巴威斯①说“自然之书”时，心中想到的是课堂里井井有条的教材。相

---

① 利巴威斯(Andreas Libavius，1540—1616)，德国化学家、医师和炼金术士，编写第一部近代化学教材，完成许多重要的化学发现。

> 反，奥斯瓦尔德·克罗尔的书……更神秘……归根结底来自于上帝的圣言……其对象多半是不能读书的，帕拉切尔苏斯和克罗尔敦促追随者放弃教材里的语词……要他们拥抱不识字的农夫和工匠的心态……(65)

欧文·汉纳维描绘教师和帕拉切尔苏斯的冲突，他似乎将教师的“资产阶级”印刷文化和帕拉切尔苏斯的口头“民间”文化对立起来。但这一公式并非总是有效。首先，课堂教学方法适应口耳相传的交往模式，适应口授听写和背诵。其次，克罗尔(就像比维斯)属于文艺复兴学者的群体，他们在图书馆和君王赞助人的宫廷里如鱼得水。克罗尔效命南波希米亚的宫廷圈子，这个圈子仅亚于布拉格的鲁道夫圈子。(66)他的主要著作《奇米卡大教堂》(*Basilica Chymica*)最后由法兰克福的维谢尔出版社印行，其对象是读拉丁文图书的学界。这本书反映的心态和农夫、工匠相差十万八千里。帕拉切尔苏斯本人就近似自学成才的工匠—作家。他以这样的身份与巴塞尔的印刷商交往，利用新的宣传系统，源源不断地出书，这说明，他
474 既有治病疗伤的技艺，又有阿雷蒂诺式的诗样才华。总之，他也是印刷文化的产物。

抨击学术体制、讥讽学究的确是阿雷蒂诺的追随者常用的主题，他们是16世纪能够用多种语言写作的威尼斯人。(67)看来，为反体制的讥讽提供最大市场的是学者，而不是农夫。(许多学者挖苦家长和老师强加给学生的纪律，难道他们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印刷文化吗?)无论如何，16世纪的确经历了反学究的、尚古主义主题的异常丰富的文学大合唱，这样的主题将淳朴民众的经验和拉丁学者的愚蠢对立起来。他们泛化反叛传统的学术追求和书本智慧的情绪，希拉姆·海登(Hiram Haydn)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在令人目眩的“反文艺复兴”的题目之下，他从16世纪神学家、哲学家、诗人等精英的著作里搜集了大量的语录，以此说明，业已发生的事情既不仅仅是经院哲学的“反弹”，也不仅仅是对教师的反叛。(68)

在我看来，怀特海描绘的“反弹”和海登所谓的“反文艺复兴”运动反映的都是一种不满情绪，矛头指向从手抄书时代继承下来的教学形式和书本学习形式。记忆力训练和“吃力的抄写”不像以前是必需的技能；印刷品生产出来以后，不一致和不规则的东西更加刺眼，对已被接受的观点的不信任、对证据持新鲜的看法是各种好奇人士的自然之举。

> 我和皮柯在哲理问题上的分歧在于：我从解剖一只昆虫、一片小草学到的东西……胜过从有史以来一切著作里学到的东西。事情正是这样。自从我开始……阅读上帝之书以来，这就是我的学习模式……据此模式，我校正了抄写得粗心而任意的书，其错误根源是不注意书写在宇宙的母本上的事物……(69)

直接而仔细地观察自然现象的观念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或盖仑。“自我形
475 象”(ego vidi)一语在许多学术评注里并不少见。(70)许多手稿两边的插图技巧娴熟，

昆虫和鸟类清晰可辨。然而，只有在印刷术出现之后，人们才有机会抛弃传承的图式，搜集新鲜记录，创建改进的模式。鉴于印刷术第一百年里印行了讹误众多的资料（“抄写得错漏百出的人之书”），鉴于复制新鲜记录的可能性，某种新奇的反应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其表现是反对普遍接受的文本、固化的书信和广为接受的观点。然而，如果你假设摒弃技术文献的态度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那又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走向近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不是焚烧图书，而是印行图书。

鉴于从手抄的记录里继承的错误在所难免，鉴于“吃力的抄写”的习惯不再需要却仍然继续存在，经验主义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更倚重直接观察而不是靠死记学习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同情。尽管如此，直接走向“自然之书”的态度不久就带上了它有意摒弃的属性。这一立场成了倚重仪式性的公式，空有文字而没有真实的意义。[71] 正如奥尔茨基（Olschiki）评述自然哲学家时所言：“这些思想家的出发点全都是这样的座右铭：‘图书靠边！’……但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全都来自于书本！他们给读者的观察材料仅仅是基于自己经验的趣闻轶事，仅仅来自于传闻……”[72] “新哲学”的主张者源源不断地出版新的著作，可见精英们在抨击书面词时并非总是始终如一的。

1665 年，皇家学会刊布了一卷书，题名《远航水手指南》，据皇家学会界定的目的，该书“研究自然而不是书本”，然而它同时又表明这样一个意向：“以观察为基础……编写它（自然）的历史，以便创建扎实而有用的哲学基础。”[73] 皇家学会的出版物大概也是想要人阅读的吧。难道皇家学会不是在努力将更多的自然现象写进书里吗？无论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如何珍视从直接经验里获得的知识，这些新型学会的会员们仍然要从事数据加工，提供第二手的材料。和牧人或猎人不同，如果不 476
参考别人的论文和记录，天文学家和解剖学家真的会寸步难行。就以实际调查研究来说，除了哲理表述或宣传之外，他们还得掌握当代的技术文献。实际上，除非研究报告写完并正式出版，任何科研工作都是不完全的。任何不可简约的“事实”、直接的观察和原始数据都必须要写下来以便让他人检验和证实。

对大多数 20 世纪的观察者而言，科学家的责任不限于仔细观察并且对“难以改变的事实”表现出必需的尊重。但作这一判断时，通常的意思是，科学活动中需要的不仅是归纳。大多数权威学者同意，有必要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并提出理论框架，以整理搜集到的数据。而且，数据的搜集和实验室的检验常常被赋予第二位的角色，数理逻辑的运用和思想试验的诉求反而被赋予第一位的角色。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必须要承担的任务。也许，这一任务太一目了然，所以它反而没有被说清楚。科学家踏上思想之旅或真实的旅途前，必须通览别人业已写下的文献。“文献搜寻”必不可少，所以文盲科学家的说法本身就是近乎矛盾的表述。约翰·黑尔说，探险家和其他航海人不同，因为他“为可能被发现的事物的有组织

的视野服务，”而且他谋求“将可能的发现与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和漫游人不同……探险家自视为可以对事前估计的知识做出贡献的人”(74)。

这一点和科学家也相关。科学家不仅能够掌握技术文献，而且能够将自己的发现和前人已有的成就联系起来，用可以验证的方式加以表述，以便于别人接受或拒绝。这一工作程序将科学家与精明的观察家区别开来，也正是这一点将其与异想天开的“奇人”与摆弄小玩意的聪明人区别开来。

> 实验报告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从个人经历的直接和自然的角力开始，
> 477 那是一条漫漫征程……研究者个人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体验自然。
>
> 我们说科学知识……牢牢地扎根于经验证据时，我们不是说，每一位科学家亲眼目睹过他相信的一切奇迹，而是说，我们有一套可靠目击者做得规范的观察报告……他们提供的是精心编订的……有关事件的报告……这些报告成了公共知识的一部分……成了第二手的信息，即远离我们任何人的直接经验的信息。(75)

这段引文出自一位英国物理学家，他的表述和罗伯特·默顿有异曲同工之妙。默顿认为，科学是公共知识而不是私密知识；他强调印刷机在造就这种公共知识中扮演的角色。“近代科学在……印刷术之后很快崛起……这绝非偶然……力量稍逊的技术不可能提供科学界需要的这种传播系统。”(76)

读过齐曼(John Ziman)教授的上述引文以后，布朗勋爵“自然之书”里隐形的悖论就一目了然了。“宇宙的公共手稿”也许能够撩拨我们巴洛克式的瑰丽幻想，然而重要的是记住，只要新鲜的观察记录停留在手抄本里，它们就不可能变成“宇宙的”和“公共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人们很容易患健忘症。大多数权威似乎忘记了，15 世纪以前，一切文字记录都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保存。即使没忘记，他们也贬低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人们时常能够注意到，“集体记忆”起初由口语传播，继而由文字传播，却没有注意到：手抄书文化不能够使详细的文字记录成为“公共知识”，不能够使之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比如，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描绘“公共形象”的出现时就犯了错误，他误将统一空间参考框架的功能赋予了手抄本地图。印刷术出现之前，世界地图形式驳杂古怪、大小不一，他却似乎想象，这些地图仅仅是我们现代统一地图略微模糊的版本而已。他说，这些地图的边缘有点模糊，直到航海
478 发现产生“地理空间的封闭……回顾漫长的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空间形象……经历了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早期的形象总是可以被认为是后来更加准确的形象的部分模糊的表达而已……”(77)

当你把公元 2 世纪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与后来的世界地图并排放在一起时，博

尔丁这段话需要修正就不言自明了。一连串的手抄本地图表现不出“有序的发展过程”，反而表现出逐渐退化和衰变的迹象。浏览一下一千多年来的地图，你就可以看到，“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进程”产生的“空间形象”不可能是有序的，即使有了今天的后见之明和断代的技术，也无法整理出手抄书时代地图的有序发展过程。

> 经过时间的荡涤和岁月的沧桑，公元 300 年到 1300 年之间的地图和草图，有 600 余幅流传下来……大小不等，手工艺质量相异；不可能在这些地图中追踪发展的过程、思想进步的过程……也不可能按照精确性和实用性给它们分类定级。(78)

从手抄稿到机印书的过度完成之后，博尔丁描绘的“错乱的手稿”才能够表现出来。如果把我们现代统一的参考框架和手抄书产生的五花八门的“世界图像”混淆起来，那就是忽略了历史上系统搜集数据所遇到的重重障碍，就会误解清除这些障碍以后的情景。

> 我们的地理知识多半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而不是从直接经验中学到的。我从未去过澳洲。然而在我的脑子里……它的形象似乎是百分之百确定的。如果我按照地图绘制人标定的方位航行到那里，结果却发现浩渺的大洋，我就会是世界上最惊讶的人。然而，我固守这一形象……纯粹是因为我信赖权威……赋予它非凡的、胜过所有宗教经书的权威的……是一个反馈的过程，是地图使用者向地图绘制人反馈信息的过程。绘制不准确地图的人很快会注意到不准确的事实……人们会告诉他，他的地图和他们的亲身经历不吻合。(79)

这段话里描绘的“反馈过程”是机印版地图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我们已 479
经提到，奥特里乌斯的地图集如何扩编，他如何向全欧洲的读者征求资料。(80) 紧随奥特里乌斯和墨卡托的一代人看到机印版图书的发展。安特卫普的“黄金时代”凋谢以后，荷兰地图出版商和地球仪制造商比如约翰·布劳(W. J. Blaeu)和洪第乌斯把阿姆斯特丹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的搜集整理资料的中心城市，结果就产生了约翰·布劳那 10 卷本的《大地图集》(*Grand Atlas*)，他的父亲威廉·詹森·布劳(Willem Janzoon Blaeu)创办了这家出版社，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他对博尔丁笔下的那个过程做出许多贡献；我们还应该注意他如何利用地图这种新媒介潜在的各种优势。

起初，威廉·詹森·布劳从事鲱鱼贸易；在 1595—1596 年间，他在瑞典的希文做第谷·布拉赫的助手，最后在阿姆斯特丹做生意，制造并出售天文观测仪器和航海仪器、海图、指南，这间店铺临海，生意兴隆。到 1637 年，他的业务扩大，乔迁新址，设计了一个金色日晷的店徽。他的店铺和厂房几乎和普朗坦在安特卫普的

"金色指南针"一样媲美,他的设备有九台凸版印刷机、六台铜板印刷机、一间铸字作坊,还有专用的镌刻师工作间。不过,他把书店留在原址,"在海滨旧桥头"。威廉·詹森·布劳1638年去世,未能见到儿子约翰·布劳印制的大地图集问世,但他看见这套书的预告,其广告刊登在1634年2月11日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报纸上。(81)

布劳的制造活动涉及面广,从改进的一台印刷机(首台是以谷登堡印刷机为基础改进的)到一座巨大的四分仪,这台四分仪促成了"著名的莱顿天文馆"的修建。以出版论,他刊布当代异端著作的袖珍本,这些异端作家包括格劳秀斯。在这一点上,他走在埃尔西韦尔家族的前面。他推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616年该书被禁不久就由他印行。他出版拉丁文著作,以满足拉丁学界的需要;同时他又为水
480 手提供简化的纬度表、通俗语水手指南和海图;而且,他为水手提供的印刷品几乎可以包退,他印制的卡片胜过手抄的卡片。(82)此外,他还承担推广"第谷的星星"的角色,与洪第乌斯竞争,为尚未绘制星图的星空提供最新信息,本书稍后一章将对此予以介绍。我们在此仅勾勒布劳及其竞争对手在阿姆斯特丹码头等待远航归来的水手那热闹的一景,他们争夺航海日志、水手或船长,以便获取改进地图和地球仪的新数据。(83)我们看到的是肯尼斯·博尔丁视为理所当然的"反馈"过程,这一过程是在17世纪初加速的。

实际上,这一过程从未停顿,测地学在不断增加信息,地图绘制人(如博尔丁所述)仍然在"检验,说明在地理空间旅行里是可能的"。但没有统一的地图,在航海人没有受到鼓励给制图人提供信息前,这样的验证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经过了几个世纪,失去了许多生命以后,人们才对近代地图测量具有绝对的信心。(84)航海人寻找一条西北方向的航路时,经过了漫长的、似乎难以完成的壮举,这说明对地理空间的认识过程是多么艰难,说明传播技术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重要。

> 虽然远航一次又一次无果而终,尽管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致命失败,探险者还是扬帆远征,完成那似乎不可能的使命。他们遭遇的困难不仅有身体的磨难……还有难以将探险知识传给他人的困难……海图上的轮廓线可能是清晰的,但这一信息纳入辽阔海域的地图时,却也可能放进错误的地方,在犬牙交错的海峡、海湾和岛屿中,这些本来清晰的线条可能会被误置。错误一次次
481 重复,机会一次次失去……(85)

印刷术出现之前,反复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非常普遍。15世纪和16世纪的航海人遭遇到许多奇怪的经历,连美国小学生的课本里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现的时代"所用的地图完全没有"堪与宗教经典一比的非凡的权威",没有博尔丁现在赋予现代地图的那种权威。当我们考虑人们面对神启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时,这一

点值得牢记在心。描写世俗生活的文学被赋予的新权威出现以后，对圣言的信心就受到影响了。

> 阻碍人们到全球探险的一些最大的障碍……是心理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妨碍他们用新发现来拓展知识的障碍与其说是他们无力克服天堑，不如说是他们被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捆住了手脚。(86)

伊萨维(Charles Issawi)接着说，腓尼基人和维京人并不因为缺乏后世那些装备就裹足不前。然而，在整个手抄书时代，无论航海家们完成了多少次登陆，用新发现来拓展知识的目标还是受到阻碍，技术上和心理上都有障碍。

从公元300年到1300年，许多冒险的商人、虔诚的朝觐者和热情如火的北欧人到海上或陆上旅行。从13世纪以后搜集的证据看，中世纪后期训练有素的绘图人就在利用探险者送回的报告。然而，有一套特别的地图集完成以后却不能“出版”。维也纳大学附近一座修道院是一个重要的绘图中心。克罗斯特斯堡修道院里绘制的地图是不向来访的学者和天文学家展示的。(87)无论他们多么爱惜这些无与伦比的手抄本地图，分散各地的读者都无缘求教、检验或反馈信息。实际上，最好的地图常常深藏不露，比如为一位14世纪佛罗伦萨商人绘制的地图就藏在一间仓库里，“秘密收藏，仔细包裹，任何人都看不到”(88)。手工复制地图不可能改进地图，只会产生众多的错讹，一切新增的信息都可能失真和衰变。

数字和图像、语词和名字同样会遭遇到失真和衰变的情况。在整个手抄书时代，语词脱离图像、标签脱离物象的趋势始终对观察性科学起到削弱的作用。读者不能断定图式或论文所指的究竟是哪一颗恒星、行星或哪一个人体器官，就像水手在海上看见陆地却不知道是什么海岸一样，这种不确定性一直困扰着手抄书时代的研究者。难怪人们相信，上帝托付给亚当的最大的秘密之一是如何给万物命名！

> 林·桑代克(Lynn Thorndike)教授评述康拉德·格斯纳的《动物的故事》，言简意赅，抓住了要害。他说，该书首先关注的，与其说是名字和语词，是为学者和读者获取信息、引语和愉悦，不如说是为了科学目的而搜集和表述事实。(89)

在我看来，这一评述太简单。在格斯纳及其同时代人生活的时代里，科学和学术必然是互相依存的。在搜集和表述事实的过程中，掌握前人的记录是必不可少的。16世纪的研究者必须要关心古语和古籍，关心“名字和语词”，无论其兴趣是否是“文学”。给动植物分类并将其标注在地图上时，既需要对前人的观察进行分类，也需要自己做新的观察。“历史”研究和“科学”数据的搜集几乎就是相同的工作。所以，奥特里乌斯之类的地理学家必须要研究老地名，从而给语文学和地形学

483 的重要研究提供灵感。哥白尼这样的天文学家必然会沉浸在古代编年史和钱币的铭文里。天球制造商约翰·布劳学会了拉丁语、希腊语甚至阿拉伯语的术语。天文学家对希腊星座和阿拉伯星座进行比照匹配时，连神话也不能够忽视。如果解剖学家不善于语言研究，如果他们缺乏编辑古籍的经验，他们就会遭遇到和达·芬奇类似的困难：达·芬奇研究人体解剖时，看不懂盖仑书里的插图。乔治·萨尔顿注意到，地理学倾向于成为语文学的一个分支，薄伽丘写专著论述江河海洋的名字，尽管如此，当他看见“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文学”及“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时，他还是感到吃惊。(90)

其实，这样的结合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许多早期的田野考察是由出版商、编辑和翻译发起的，他们为新市场生产图书，因而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文学”兴趣。(91)萨尔顿笔下的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贝隆想要把迪奥斯科里德斯①和泰奥弗拉斯托斯②翻译成法语，但他的翻译工作步履维艰，他很难辨认古籍里的动植物。他意识到……需要到东方去考察……古希腊博物学家描绘的动植物。(92)

贝隆得到皇家赞助到中东考察，记录观察到的动植物，满载而归。他的书成为自然历史研究的里程碑，1553 年在巴黎首次印行，接着出了很多版，并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这一点上，萨尔顿的评论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接着说：

> 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贝隆首先是博物学家，而不是人文主义者……他热爱自然的事物而不是文字描写。这种真正的博物学家是非常罕见
484 的。非常奇怪，过了这么久的时间聪明的人们才找到机会去描写大自然。(93)

将“自然的事物”和客观事物的“文字描写”对立起来的态度本身就有一点奇怪。毕竟，贝隆的出发点是翻译“文字描写”。倘若他不是努力辨认古人描写的自然的事物，他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路径将是另一种形式。他对文字描写绝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正是由于不能分辨文字描写的动植物，他才感到沮丧。

> 早期编辑泰奥弗拉斯托斯、迪奥斯科里德斯、普林尼和盖仑著作的人遭遇到一些问题，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编辑古籍时常见的问题。他们着手工作时依据的手抄本已经是错讹丛生的文本。疏忽的损害和愚蠢的错误使每一个文本都成为一连串难解之谜，勤勉的编辑不得不依靠自己天才的校勘去解决。

---

① 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约 40—约 90)，希腊医生、药理学家，其《药物论》为现代植物学提供了最经典的原始材料。

②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前 371—前 287)，希腊逍遥学派(又称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提出物质运动的观点，在植物学和逻辑学方面作出贡献，著有《植物研究》、《品格论》等。

> 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家不得不依靠最经典的古代语言知识……以便校勘古抄本。他们跳过观察活着的动植物去解读错讹与脱漏丛生的段落。
>
> 将古典植物学文本与大自然联系起来比对校勘的工作在16世纪盛极一时……古代作家用自己漫长考察之旅成为后人的典范……
>
> 然而,描写性技术词汇的缺乏使人难以将被命名的植物……和田野中活着的植物联系起来。如果说活着的植物不会说话……那么显然的替代办法就是依靠图像……(94)

将"古典文本和自然"联系起来的努力使人偏离古典的先例,使人用上了木刻画和镌刻画。"依靠图像"的决策不只是在一个方面急剧地偏离。"古人看重观点,这一倾向不鼓励人用插图来记录和传达植物学知识。"(95)经验主义者的口号是,应该亲眼观察,应该信赖自然而不是书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口号来源的经验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已经过时。古典权威告诫人不要信赖图像,其理由很充分,那就是因为图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样变形。(96)盖仑说:"病人是医生的医书。"在手抄书文化的环境里,他这句话有道理。如果帕拉切尔苏斯重复这句话,他对业已变化的形势就没有做出恰当的回应,他就不如用拉丁文写作的教授富克斯和维萨里了,因为富克斯和维萨里用一些新作的素描制成耐久的版画。"因为活着的植物不能说话",不能像可以重复的图像那样交流,所以古人只了解很少一部分植物。画家和版画家的才能调动起来以后,缺乏令人尊敬的古典渊源的新鲜信息就开始进入科学文本了。

在其他地方,乔治·萨尔顿又责备早期近代研究者,说他们过分关注"语词而不是事实"。他抱怨,早期科学论著的机印本

> 显示了典型的文艺复兴研究方法相对的弱点……文字冗赘而不是注重实验,就事论事。除了伟大的自然之书以外,科学研究在书里兜圈子是难有收获的,学者们发现这个道理所花费的时间之久,实在是令人吃惊。少数意识到这个道理的人更可能成为像贝尔纳·帕利西那样的反叛者……(97)

就贝尔纳·帕利西的反叛而言,那显然不像是尝试新陶釉的陶工,而是更像工匠尝试写书。一代又一代的陶工在窑坑里工作,但古代的陶工没有为法国文学作出贡献。陶工出身的作家帕利西是一位先驱。部分原因是,从16世纪开始,更多的人能够以作者的身份工作,更多的自然可以被写进书了。印刷术使人不仅能整理过去的文献,而且能在小巧玲珑的书本里获得新鲜的文字记录和插图。

早在印刷术问世之前,画家和木刻家、金匠和石匠已经从观察自然中获得一些感悟,但很少有人熟悉手抄书那一套规范。即使到了16世纪,眼睛盯着书本的人还是很少的。因为印刷术问世之前,大多数人完全是文盲,很少有人掌握了学校里

所用的语言。他们记住教授照本宣科引用的盖仑的言论，云里雾里地窥视解剖台上的尸体，但没有得到大学学位。他们不知道，只有用拉丁语命名的植物才有资格
486 写进论文。他们尽量仔细地按照编辑和作者的嘱咐行事，但偶尔也会歪打正着，因错误而画出“更忠实于生活”的图片，超过了书中的意图。(98)除了远程的田野调查和读者送进来的标本之外，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以新的眼光观察花园里的普通花草也成了很好的补充。

凯伦·利兹指出，对挑战公认意见产生的影响，解剖学家和植物学家的体会有一点不同：比较而言，植物学家的体会是渐进的。“没有任何植物学家不得不挑战迪奥斯科里德斯的权威，相反，维萨里就必须反对盖仑。”尽管如此，这位描绘了600来种植物的权威的局限还是日益明显，因为采集数据的新机制越来越有力。到1623年，学界描绘的植物已经从600来种增加到6000来种。

> 植物学家逐渐完善了采集和与人共享数据的技巧，他们考察植物的地域越来越辽阔，所以，他们逐渐意识到，古人在植物学上绝不是万能的，古人命名的植物仅仅是世界上植物的一小部分而已……每天似乎都有新的发现，“新发现的药草在古人的著作里未曾提及”(99)。

已如上述，一旦从自然界得来的新观察可以用机印书来复制，这些观察心得就可以传播给分散的读者，读者最终能够用这些新观察来检查书本，而且能够反馈修订意见，新观察就会编入新版本。库克①船长的远洋探险产生了植物学和动物学的信息爆炸，林奈②从分散的读者那里收到邮寄的种子，并希望能够用修订版使这些种子永存。这些成果代表一个发展进程的后续阶段，这一进程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100)

实际上，从16世纪开始，观察植物就获得了和类似今人观鸟的性质，依靠类似
487 的袖珍型的观察工具和指南。(101)植物学书籍的出版也开始采用丛书的形式了。

> 马蒂奥利因评论迪奥斯科里德斯而声名鹊起，其评论首版于1554年，印行了许多版本，定期修改校勘，不仅出拉丁语版，而且推出许多通俗语版本。马蒂奥利对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评论成了植物学专著，正如“托勒密”是地理学专著一样。他的著作极受欢迎，一共售出32,000册。他的权威无与伦比，发现新植物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将新的信息告诉他，以便在他的下一版书里

---

① 库克船长(James Cook，1728—1779)，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太平洋和南极探险家，在测绘海图、改进航海卫生、防止坏血病等方面成就卓著。

② 林奈(Linnaeus，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原名卡尔·冯·林奈(Karl von Linné)，创立双名法，最早阐明动植物种、属定义，为近代分类学奠定基础，代表作有《自然系统》、《植物属志》。

收录进去。[102]

马蒂奥利用定期修改和校勘的形式,推出连续更新的版本,以便收录读者的反馈,这一形式很像后世的科学期刊。这种合作性出版说明,为什么将印刷术的影响推迟到17世纪晚期是错误的;认为皇家学会的《科学通讯》问世是印刷术开始发挥影响的标志,那也是不妥当的。

在稍后的几节里,我希望详细阐述上述观点。这一节导论的主要目的是说明,自然哲学家的观点由于印刷术而改变了,至于其观点是如何改变的,则尚待我们研究。中世纪晚期工匠的活动也发生了类似的改变。印刷术这种新技术使自然哲学家和工匠都用新媒介去实现旧目标。考虑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时,新问世的印刷机应该是优先研究的因素。15世纪晚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此而言,我的主张是:这一转折不是人从书本转向自然,而是书本从手抄的形式转向机器印刷的形式。

5.2　断代问题再思考

(1) 布尔克哈特派对阵中世纪派

目前,我提出的这个命题是非常规命题。大多数研究近代科学兴起的史学家都不得不直面断代的问题,同时他们还不得不驻足思考如何平衡连续性和变革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文艺复兴问题"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布尔克哈特声称:意大利人是近代欧洲的头生子,这一断言显然包括"自然科学领域"[103]。在研究自然时,布尔克哈特明确区分偶尔得到解放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全体人民"的集体解放:经院哲学家仅仅是个人从"书本和传统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全体意大利人民都获得解放了。他还作了一个招人忌恨的比较:意大利人研究自然无不感到高兴,其他民族对研究自然却漠不关心。[104]无论是捍卫或抨击、发挥或限制,他这一命题在后续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研究中始终是一个放大了的命题。实际上,当人们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布置舞台时,"意大利第一"总是得到更多的注意,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折得到的注意就少些。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研究"近代化"问题时,我认为学术研究的优先顺序应该予以修订。

488

为了预防误解,让我首先申明:我不否认,有些意大利发展成就应该挑选出来特别强调。考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产生的雕塑和绘画时,将其归因于本土的天

才是很有道理的。曼坦那[①]或波莱沃洛[②]之类的意大利艺术家创作的裸体人像塑造了新的视觉手段，对“新”解剖学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品比其他地区的作品更重要。[105] 同理，考察早期近代的医学研究时，某些意大利大学必须要单独提出来予以特别关注。由于从维萨里到哈维传承的一条线，你难免要给帕多瓦大学赋予特殊的角色。然而，如果不必要地把佛兰芒人和英格兰人的重要革新归功于意大利人的天才，那就会刺伤他们的民族感情。而且，如果把这个意大利主题玩得过分，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或哈维[③]的《论血液循环》里重要的新成分就难以发现了。

有些人描绘维萨里的时候，说他在提香的威尼斯画室里工作，就在“彼特拉克家乡”附近，却只字不提他继承了一系列弗莱芒医师的成就，也不提他曾经在卢万
489 和巴黎学习，亦不说他编辑了医学书。这样的描绘使你觉得，这个意大利主题是强调得过分了。有人告诉你，《天体运行论》的读者很讨厌北方潦草的哥特体，相反，《人体的结构》的读者却受到粗黑的意大利体的吸引。此时，你的疑虑会进一步加深。[106] 毕竟，《人体的结构》是在一位德意志裔瑞士人的支持下印行的，这位出版商名叫赫布斯特·奥珀利努斯，是一位北方艺术家的儿子。维萨里不畏艰险将沉重的雕版运出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送到奥珀利努斯在巴塞尔的著名印刷所。断言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北方“哥特体”潦草，如此编织的模式实在是太武断，不仅是因为《天体运行论》的字钉不是潦草的，而且是因为哥白尼曾经造访意大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受到了意大利老师的影响。

尤其谈到天文学的进步时，老是说意大利的创新精神就容易使人讨厌了。具有国际视野的拉丁文写作精英不能接受这样的分割：“意大利的”要素和其他的要素不同。布尔克哈特把他所谓的“哥伦布的同胞”的外延拓宽[107]，无意之间激起了一场争夺“哥伦布日”的无休止的争吵，使德国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感到痛苦。有人说：“哥白尼的思想转向天文学是在意大利，不是在纽伦堡。”[108] 这样的言论可能激起波兰人论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大学学习工作的潮水般的文章，一想到这样的后果，你很难不感到痛苦。1492 年，海尔布隆一位印刷商骄傲地宣称，雷乔蒙塔努斯是德国人[109]，相反，布尔克哈特却将雷乔蒙塔努斯与自称“意大利人的学生”的哥白尼等学者放在一起。[110] 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诸如此类的争夺注定会激起

---

① 安德利亚·曼坦那(Andrea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巴杜亚派画家和雕刻家，开创仰视透视法及天顶画装饰画风，代表作有《凯撒的胜利》、都卡莱宫的壁画《婚礼厅》等。

② 安东尼奥·波莱沃洛(Antonio Pollaiuolo，1443—1496)，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画家、雕刻机、金匠，代表作有绘画《赫拉克勒斯的苦役》、青铜小雕像《赫丘利与安泰俄斯》和石雕《裸体斗士》等。

③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医学家、生理学家、胚胎学家，实验生理学创始人之一，发现血液循环，曾留学意大利帕杜瓦大学，著有《论血液循环》、《动物心血运动的研究》等。

更多激烈的争论，而不是给人更多的启示。

正如上述评论所示，排他性地强调一个民族的天才（无论这样的言论多么受意大利人欢迎）很容易引起其他民族的反感和敌视，很难产生有益的结果。再者，宣 490
称意大利人在科学追求中领先的同时，布尔克哈特还强调他们的经验主义，以及他们进行研究和探索的集体献身精神。他说，全体意大利人“有一种天然的乐趣，他们研究自然……而其他民族却漠不关心”。在此我再次想说，他使后来的研究产生偏离。在他的笔下，富有冒险精神的、喜欢大自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和中世纪欧洲静坐不动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把书本对阵自然的、错误的二分术语引进他的断代图式。就这样，中世纪人被描绘为受“书本和传统”奴役的人，而获得解放的人是“善于航海”、热爱自然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然而，为了使这样的论断有说服力，本来在15世纪的意大利扮演显著角色的“书本和传统”，就被布尔克哈特掩盖起来了。连后来拥护布尔克哈特的学者都觉得这一点难以掩饰。有一位拥护者就坦承：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和自然主义的异教接触……由此吹来一股新风……尽管如此，文艺复兴首先关注的是书本学习，而不是第一手的自然研究……”[111]强调古典里的异教成分和自然主义成分，将其与基督教教义对照，古典的复兴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近代化——这就是布尔克哈特的追随者玩弄得得心应手的策略：被恢复的希腊罗马古籍像一股清新的海风，吹进了这使人压抑的氛围。诗人和画家……受到激励，他们对自然现象焕发了新的兴趣……在这些方面，现代主义（modernism）本质上是古典的复兴，现代主义是在古典文学的帮助下产生的。[112]但即使作为反教会的手段，崇古之风也保留了某种模仿和书卷的趋势。布尔克哈特始终没有完全调节好向后看的崇古之风和向前看的“意大利人民的天才”。他反对赋予古典复兴过多的重要性，同时他又刻意在自己的书里只给这个课题从属的地位。[113]

15世纪的爱书人使布尔克哈特处境尴尬。他想将其塞进自己的图式里，但未能完全成功。他怀疑这些书虫对早期近代科学的贡献，这就为以后的辩论确定了 491
条件。无论你怎么强调文艺复兴艺术家与工程师、探险家与数学家的成就，美第奇家族时代的佛罗伦萨和罗马总是高度重视尘封的羊皮纸和古代作家的，它们赋予古籍的价值从来就不亚于中世纪的牛津和巴黎——这是事实。实际上，中世纪使人“受奴役”的书比较少，古典语法也不是那么严格。在谷登堡之前，敏于观察、勇于航海却从来不翻书的人比文艺复兴时期还要多。

由此可见，中世纪学者可以把“书籍对阵自然”的二分术语反过来辩驳布尔克哈特这个主题，林·桑代克的《15世纪的科学与思想》（*Science and Though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就用大量的篇幅予以反驳。和布尔克哈特一样，他也喜欢谴责对古书的依附。不过，对人文主义的角色，他不像布尔克哈特那样爱恨两难。桑代

克走上了贬低文艺复兴时期古籍搜求者的极端，在他的笔下，托勒密地理学著作的再发现是一种挫折，同时他又指出，中世纪的探险家冒险的范围大大超过了希腊人。桑代克把区别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和近代的中国不当一回事，也无心在杂乱的手抄本地图上去寻找中国的位置，他甚至声称："13 世纪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胜过 19 世纪的我们。"(114)在这类问题上，你可以反驳说，他对中世纪成就的热情被推向极端了。(115)有人认为，和文艺复兴时期相比，中世纪的水手和商人同样精于观察、勇于冒险，常常更善于旅行，他们肯定比彼特拉克及其追随者的同时代人更少书卷气——对这个论点，你还真难以挑刺。还有人提出一些类似的论点：通过研究艺术史，他们发现，中世纪的工匠常常以自然为师。效命霍亨索伦王室①皇帝或米兰公爵的艺术家们的动植物素描惊人地逼真，这一现象其实和布尔克哈特富有弹性的断代图式并非完全不协调。然而，在远方和古代（比如著名的"罗伯特·索斯韦尔的树叶"或"伯利·圣·埃德蒙兹的药草"）发现的图像说明：仔细观察并记录自然
492 形态的成就根本就不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16)

因此，当怀特海说到"近代科学兴起的最后一个要素"时，他进入的领域对布尔克哈特的图式全然是陌生的领域，这个领域最先是本笃会占据、继而由共济会占据的领域，他们工作的场所在意大利之外，而且是在乔托的时代之前。

格列高利和本尼迪克特（均为教皇——译者）是很讲究实际的人，他们具有欣赏普通事物重要意义的眼光……科学与技术结盟，学问借此和不可简约的、难以改变的事实接触，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本笃会讲究实际的倾向……

修院和自然事物的接触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艺术领域。中世纪晚期自然主义的兴起是近代科学兴起的最后一种欧洲思想要素。这是对自然客体和自然现象的兴趣兴起的过程。一个地区的天然植物的雕塑作品进入了它最偏僻的地方……每一种艺术都率真地表现了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热爱。在这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雕塑家以及近代的艺术家的文人比如乔托、乔叟、华兹华斯②、沃尔特·惠特曼 ……罗伯特·弗罗斯特③的精神都是契合的。身边朴实的事实是他们感兴趣的题材，这些课题在科学思想里重现时就成为那些不可

---

① 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这个家族占有的国土统称为普鲁士王国，从 14 世纪到 19 世纪先后统治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

②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桂冠诗人，"湖畔诗人"杰出的代表。他崇拜大自然，人称"大自然的祭司"，其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与柯尔律治合作的《抒情歌谣集》（1798）被认为是英国诗歌史的一个转折点。

③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善用传统形式和口语表达新内容和现代感情，作品常以新英格兰农村为背景，探究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四次获普利策奖，代表作有《白桦树》、《修墙》、《少年的意志》、《林间空地》等。

简约的、难以改变的事实……[117]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著名的文字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却只字未提:艺术家对自然形式的强烈兴趣如何成为与哲学家共享的兴趣?艺术家的兴趣为何有助于抑制哲学家咬文嚼字?不仅艺术家和经院哲学家的沟壑原封不动;而且中世纪艺术家和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之间的距离也被鲁莽地一笔勾销了。最近的一部概览认为,这样的倾向扭曲了观察的视角。书中说:"中世纪的艺术家和工匠从书本转向自然,有时他们被当作科学革命的启动人。"[118]华兹华斯、歌德等文人的确"从书本转向自然",从"灰色"的理论转向"绿色"的树叶。然而实际上,"中世纪的艺术家和工匠"并没有优良的装备去完成这一转向,他们之中很少人拥有赖以转向的书本,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学会识字。

尽管如此,怀特海这段经常被人引用的文字的确证明,在意大利之外的欧洲, 493
在文艺复兴之前,"以自然为向导"的敏锐的观察家已经在开展工作。布尔克哈特起初的论点被敌营接过以后,后来捍卫他的人常常把他的论点倒立起来。于是,这些捍卫者不得不强调说,科学理论和简单地体验原汁原味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一方面他们贬低纯真的经验论,另一方面他们看重亚历山大城古籍的再发现。此时的中世纪学者符合布尔克哈特大师的第一条论断:人文主义"损害了对自然的归纳法研究"[119]。为了和这些中世纪学者划清界限,捍卫者们就赋予古典复兴积极的价值,因为古典的复兴既丰富了文学又丰富了科学文献。这些捍卫者强调研究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好处(而不是重复普林尼或盖仑的错误而产生的消极的后果),他们又强调"毕达哥拉斯"或"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数学关怀,借以承认,古籍搜寻和希腊研究可以被认为是有用的。"在科学领域,向后看的结果是大踏步前进……"[120]另一位权威则如是说:"为要远跳,必须后退。"[121]

后期的布尔克哈特追随者欢呼文艺复兴编辑们支持的亚历山大城科学的复兴。他们实际上是在复活稍早一个学派的主张。这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率先研究科学史,其特征之一就是强调亚历山大城科学的复兴。在这一点上,布尔克哈特的追随者和这些英国人有许多相同之处。[122]然而,威廉·惠韦尔(William Whewell)那个时代普遍的看法是,就"严密科学"而言,中世纪是黑暗时代。[124]当然,诗人和艺术家可能觉得哥特式复活很适意。然而,仍然在皇家学会魅力之下生活的19世纪科学史家却相信,每当鬼神精灵信仰挥之不去时,科学事业必然会虚 494
弱无力。[124]他们觉得没有理由去拷问早期机印书里的编者序或出版者的话,在这些序文里编者和出版商庆幸自己为恢复几百年被忽视的尊贵学科作出的贡献。从托勒密到雷乔蒙塔努斯,严密科学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成果,这一点被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毋庸赘言,这不是事实。一位令人尊敬的权威直截了当地说:"再也不

能认为，中世纪是科学停滞的时期……”[125] 实际上，自 20 世纪初以来，惠韦尔的观点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被称为“奇怪的错觉”。“16 世纪的物理学家曾经被赞誉为创造者，世人为文艺复兴感谢他们。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传承者，有时甚至是剽窃者。”[126]

自从皮埃尔·迪朗所著的《系统》(*Système*)第一卷问世以来，越来越多被发现的中世纪评注和论著显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已经在研究“严密科学”的问题，而且他们依据的方法几乎就要预见到后世的革新了。迪朗及其后继者认为，亚历山大时代的人不必要再被复活。经院哲学鼓励继续不断地检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它已经为西方科学播下种子，就等开花结果了。相反，人文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推迟了这样的果实，人文主义者的书本复活不仅偏离了技艺的经验主义，而且充满了精英主义者对机械工作和手工劳动的精神鄙视。他们的人文主义还对严密科学抱有强烈的偏见。

> 现在许多学者一致认为，15 世纪的人文主义……中断了科学的发展。所谓“文艺复兴”反映的是兴趣从物质向文学风格的转移；在回到古典的过程中，这些人装腔作势，忽视前几百年的科学进步。同样荒诞的自负使人文主义者蔑视刚刚过去的前人……使之随意借用经院哲学家的成就而不表示感谢……[127]

一些权威赞誉中世纪对严密科学的贡献，他们强调用神学谴责亚里士多德，强
495 调托钵僧在牛津和巴黎扮演的角色，强调主要的经院哲学评论向其他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写书中心的传播，直到科学的种子在伽利略的物理学里开花结果。其他一些权威(突出的有兰德尔)比较接近反教会的意大利主题，他们强调世俗医学院的角色以及异教的阿威罗伊[①]学者向帕多瓦的转移。无论他们强调的是神学家还是世俗的大学教师，反人文主义者一致认为，对经院哲学和大学研究生院的抨击严重影响了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贬低的这两种人正在进行最有希望的科学探询。由此可见，围绕近代科学兴起的辩论正在重新点燃昔日的战火，给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辩论以及研究生院的研究工作和本科的“文科”(liberal arts)之争火上浇油。这个领域的历史研究不但无助于弥合所谓“两种文化”的鸿沟，反而大大地助长了旧争端的长期保存。

> 数学和天文学受到精心的培育……人文主义引进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可能粉碎了对自然界的一切科学兴趣。

---

① 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伊斯兰学者，将伊斯兰哲学和希腊哲学融为一体，评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柏拉图的《共和国》。

和流行的传说相反,对自然科学而言,人文主义几乎就是危害不减的诅咒,曾经如此,而且始终如此。它把最卓越人才的兴趣和精力都集中于非科学的、狭隘的希腊罗马的伦理经典。倘若不是这样,伽利略就可能不是出现在17世纪,而是14世纪,科学研究的发现就可能比现在提前三百年。(128)

人文主义几乎成为危害不减的诅咒,所幸的是它有一个缓减危害的因素:"亚历山大城数学的复兴。"J. H. 兰德尔承认,15世纪的希腊研究使研究者熟悉"数学分析方法和阿基米德的综合法",所以它的确提供了一个曾经缺失的要素。(129)后来的研究证明,即使在文艺复兴之前,这个要素也不是完全缺失的。马歇尔·克拉吉特阐明,经院哲学家并非不知道阿基米德。实际上,阿基米德已经被翻译成了拉丁文,翻译者正是使阿奎那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弗莱芒人。克拉吉特说,阿基米德"在那个脆弱的希腊数学传统中扮演的角色不大也不小,但很重要。这个传统如涓涓细流经中世纪流进近代了"(130)。但涓涓细流和水量丰沛的溪流是有区别的。比如,中世纪最"先进"的统计数字是在没有阿基米德帮助的情况下编制完成的。(131)虽然莫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在13世纪晚期翻译了阿基米德的大多数著作(后来成为机印本的形式)(132),但其中比较繁难的著作一般没有人读。"中世纪的学者只懂得几何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们不能利用"阿基米德这些著作"(133)。正如迪朗所言,经院哲学家未能掌握"阿基米德学说里比较高级的成分"。除非掌握这些比较高级的成分,否则"尼科尔·奥雷姆(Nicole Oresme)和若安内·比里当(Joannes Buridan)播下的种子"就不可能"开花结果"(134)。此外,除了数学工具之外,迪朗指出,观察工具也缺乏。

迪朗试图解释"为何经院派物理学不能超越14世纪的巴黎人达到的边疆"这一现象。这正好说明,除了应该"诅咒"的人文主义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一边疆是存在的,经院哲学家也不能超越它,这两种现象是许多中世纪研究专家都承认的事实。克拉吉特说道:"14世纪伟大的开头之后,你也许会期待15世纪的巴黎进一步发展。但情况似乎并不是……和比里当率先的研究成果相比,托马斯·布里科特(Thomas Bricot)的讨论就相形见绌。"(135)与此相似,穆迪(Moody)指出,14世纪的经院哲学没有"用自己提出的新思想去研究特殊的情况",没有用这些新思想去"取代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并进而创立一门新科学……"(136)连柯隆比都指出:"没有堪与逻辑学媲美的连续不断的数学传统。"(137)这样的坦承至少为后来的布尔克哈特派学者留下了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并获得一定的成功。

496

497

(2)中世纪科学之不足:关于新方法论的建议

潘诺夫斯基强调短暂、有限的复兴与永久、全盘的文艺复兴的区别;同理,那些

认为布尔克哈特的图式对科学史有用的人也强调部分预期和实际突破的区别。

> 约达努斯·内摩拉利乌斯(Jordanus Nemorarius)用字母取代数字进行算术运算以后,谁拓展了字母的用法?谁发展了尼科尔·奥雷姆的符号?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研究鸟类、陌生者彼得(Peter the Stranger)研究磁体、弗赖堡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Freiburg)研究彩虹的了不起的成果为什么后继无人呢?(138)

罗森试图解释,为何起步很有希望的许多成果渐显颓势,他同意迪朗的观点:中世纪的研究者受制于某些设施比如数学技能和观察仪器的缺失。他还同意迪朗所谓的辩证法狂热,认为这是一个大的陷阱。经院哲学家接受的训练是赢得"辩论的胜利"而不是"寻求真理",这就使他们的才能偏离正道,即使在人文主义者激起公众的文学兴趣以前,经院哲学家就在坚守这样的道路了。(139)罗森认为,最大的障碍或许是未能区分坠落的天使和坠落的石头的区别。在此,罗森的诊断显然与迪朗派的诊断分道扬镳;罗森认为,神学关怀从一开始就把科学引入了岔道。(140)

既然有人做出极端的判决,认为人文主义对西方科学几乎是"危害不减的诅咒",也许有必要做一点平衡并且说:把神学拉下神坛并非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与此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说:这场辩论的方式使各种偏见登台表演。只要忽略手抄书文化强加的局限不被人注意的现象,不那么中性的动因就会继续受到人们的抱怨。人们试图解释中世纪的期盼和17世纪科学的目标达成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努力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点:老的辩论不断翻新,而新的收获却越来越小。

> 13世纪晚期的经院博士约翰·邓斯·斯各特①思维缜密、广受赞誉,可是人文主义者却把他变成16世纪儿歌里的傻瓜。近代史学家钦佩14世纪数学家的天才,同时又悲叹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的反感,并且认为人文主义者对古文化的崇拜对科学的顺利发展有害。不过,无论14世纪的哲学家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有多高,但历史还需要刺激近代科学的另一种要素……到15世纪初,中世纪给科学的激励进入低潮,希腊思想给科学的激励更多了。(141)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印刷术出现之前"科学的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你就可以避免赋予人文主义太多的功劳,也可以避免过多地抱怨人文主义。跳过拉丁—阿拉伯传统,直接回到希腊源头时,的确有助于研究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或帕加马的阿波罗尼奥②。(142)不过,"希腊的激励"固然重要,但那绝不是早期印刷商提供的唯

---

① 约翰·邓斯·斯各特(John Duns Scotus,1266—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唯名论者,认为意志高于理性,行动高于思维。

② 帕加马的阿波罗尼奥(Appollonius of Perga),希腊数学家,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研究圆锥体。

一重要的要素,比如,希腊语就没有表示"零"的符号,这个符号是经过穆斯林的路线传到西方的,放弃罗马数字就是反古典的举措。许多成分的混合本身就是新的灵感源泉,吸收混合物的方式也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更多地注意印刷术出现之后技术文献的丰富,又注意到每次研究时能够浏览到的文献的广度,我们 499
就能够兼收并蓄对立学派的互相冲突的主张,就能够以更加同情的态度去看待以前学者的不足。

一位学者说:"不是中世纪的数学家忽略了阿基米德定律,而是近代史学家忽略了中世纪的数学家。"他发现,14 世纪的邦菲尔斯(Bonfils)发明了一种精密的数学工具(小数理论)。[143] 实际上,这个工具虽然发明出来了,但谁也没有用过它。"这一理论用希伯来语记录在一张纸上,但被束之高阁,淹没了六百年之久。那时的希伯来语誊写人不知道它的意义……邦菲尔斯的发明对同时代人和后来人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144] 我们试图理解"近代科学的兴起"时,我们选择的起点究竟应该选在邦菲尔斯深藏的 14 世纪秘密,还是西蒙·斯蒂文那广泛流布的 16 世纪成果呢?他们两人的起点大致相同,都始于亚历山大城文本的再现。然而,斯蒂文流传给我们的东西很多。[145] 桑代克责备德雷尔①等人将哥白尼和第谷从"中世纪背景"分离出来时,他也给我们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桑代克指出,13 世纪诺瓦拉的坎帕努斯的一篇主张削减"球体"数量的论文,又责备德雷尔没有提到这篇论文。其实,哥白尼、第谷都不知道这篇论文,但桑代克认为,作为现代史学家,德雷尔应该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146]。

毫无疑问,哥白尼是第一位谋求简化托勒密天文学图式的基督教天文学家,而 500
且在"奥卡姆剃刀"②出现之前,数理天文学家就珍视简约了。[147] 尽管如此,桑代克所谓的"广阔视野"对 16 世纪的科学家还是太苛刻,他认为,这些科学家"莫名其妙地上当",指责他们没有承认中世纪的先驱者;但事实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先驱者的论著,16 世纪的科学家当时是看不见的。若要充分描绘哥白尼或第谷的"中世纪背景",那就一定要考虑,今天的我们比上一辈人看到了更多地从亚历山大城流淌下来的"涓涓细流"。16 世纪的研究者没有我们今天"搜求文献"的能力。他们缺乏在印刷术以后的四五百年里知识产业积累的文献。那时的研究者们声称实现了自亚历山大时代古籍湮没以来的"艺术复兴"或"学问复兴"时,他们未必是在

---

① 德雷尔(J. L. E. Dreyer,1852—1926),丹麦天文学家,编纂《星云星图总表》,编辑第谷全集 15 卷,1916 年获皇家学会金质奖章,后任皇家学会会长。

②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即奥卡姆简化论,认为"若无必要,不应增加实在东西的数目",应把所有无现实根据的"共相"剔除干净,亦作"简约律"(law of parsimony)。其提出者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1285? —1349),英国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中世纪唯名论代表人物,方济各会修士,反对教皇干预世俗政权,著有《逻辑大全》等。

沾沾自喜于“荒诞的自负”[148]。相反，他们所说的是自己看见的事实。重要的是，他们看事物的方式肯定和我们不同。若想要具有真正“广阔的视野”，你就必须时刻牢记这样的不同。16 世纪的精英继承的技术遗产遭遇到一些中断和断裂的情况，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一些中断和断裂已经被填补起来了。如果现代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健忘，“莫名其妙地上当”的正是他们自己。

在推断中世纪“先驱”和早期近代的开拓者之间连续的线索时，我们呼唤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我这样做时似乎仅仅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过分简化早期近代的学问是荒谬的，经常有人强调指出这样的荒谬。比如，罗森就质疑“从 13 世纪开始的近代力学连续不断的发展”；他的根据是，我们今天认为许多中世纪的解决办法是伽利略学说的预兆，但这些预兆伽利略多半是看不见的。

> 伽利略没有迪朗那种浩如烟海的学问。他勤奋读书，喜爱他所谓的自然之书……对喋喋不休的神学思辨、神话传说，他几乎没有任何同情；他对开普勒自传里那种漫游式的表述没有耐心，开普勒的天才成就只好隐藏在那散漫的自传里。[149]

如引文所示，虽然其他人也反对追溯连续的线索，他们一般不考察传播的状
501 况，而是只考察很突出的“书本对自然”的二分术语。应该承认，这样的二分术语在伽利略的著作里赫然在目。他反复强调指出，自然之书远比亚里士多德的书值得信赖；他反复告诫读者，将目光从印在书里的图像转向真实的世界。[150]有后见之明的我们容易理解伽利略的立场，不容易不分享这一立场。我们现在知道他们错了，所以我们很难同情那些更信赖亚里士多德和盖仑而不是信赖自己眼睛的倔强的教授。我们更容易为那些勇敢的人比如帕拉切尔苏斯欢呼鼓掌，他谴责盖仑并焚烧阿维森纳的著作，把人体作为唯一值得信赖的书。

但你也必须同时考虑，销毁希腊和阿拉伯医学古籍的举动意味着中世纪医学新的黑暗时代的出现。首先是印刷术抢救了阿维森纳的《医典》(*Canon*)，然后才有它被抛弃的可能，才有人认为抛弃《医典》是科学的进步。盖仑有些书的印行不但没有将传统的观点长期固化，反而是为 16 世纪开辟了新的天地。一位 16 世纪的解剖学家说：“你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书本。”他很可能就是在老老实实地引用盖仑本人的原话。[151]再者，任何时候销毁阿基米德的任何一本著作，都无助于力学的建立。确保拥有阿基米德的著作以后，伽利略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他才有可能忽略那些湮没在中世纪拉丁文本里的“错误和晦涩”。但阿基米德的例子说明，阅读自然之书和研究古籍绝不是不可调和的。当然，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阅读帕加马的阿波罗尼奥的圆锥体著作，适用于阅读开普勒那种浮华的文字。说到天
502 体天文学时，倘若伽利略阅读天文学著作像他用望远镜观察一样刻苦，他本来可以

不至于在天体力学上遭遇到那么多困难的。(152)而且，倘若17世纪的读者太看重他的告诫，真的躲避一切“纸上印刷的图像”，他们就无缘追踪那些天图、海图和世界大地图上的新发现了。(153)

如上所示，如果太强调“书本对自然”的矛盾表述，搜求技术文献的关键问题可能就被掩盖起来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古代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都有幸使用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帕加马的盖仑成了维萨里的老师，托勒密成了哥白尼的老师。印刷术之前，亚历山大城的成就不能被超越，印刷术将“世界印在纸上”以后，端坐扶手椅里的旅行者就能够走遍天下了。印刷术出现之前，发现和保存古人已知的东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任何研究生院的主要功能都是保管好一套用作遗产的手抄本。

> 你可能会问：14世纪这些经院哲学家解答了特殊的问题时，他们为何不创建新学科去取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呢？我的回答是，作为大学教师，他们的哲学课程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演绎出来的。他们既没有机会又没有动力去改弦更张；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从教本中演绎出最佳的意思，而不是废掉这些书。(154)

自然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和传播继承的文本，据此而言，他们的处境和中世纪法学院教授的处境雷同。正如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言，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在亚里士多德体系的边界上游戏”(155)。正如一代又一代的《查士丁尼法典》的注解人仅仅是在其变异主题上做文章一样，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注解人也在某些方向上有所创新。在这两种情况下，古典都在新环境、新思潮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然而，无论自然哲学(亦如法学)开辟了什么样的新路子，教授们任何时候都没有处在能够放弃而不是解释传承的古籍的地位。 503

> 和广泛接受的观点相反，14世纪不存在关于位移(local motion)的一般理论的力学，这里所谓一般理论就是适用于自然界、建立在少数统一原理上的理论。在中世纪晚期物理学文献中搜寻那些……三个世纪以后重要的思想……你可以构建……一种中世纪的力学，看上去似乎整合一体、有新基础的力学取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力学。然而，这纯粹是幻想，是时代错乱的虚构。我们之所以能够虚构这样的力学，仅仅是因为伽利略和牛顿给了我们据以依靠的模式，我们用他们提供的模式去挑选零碎的片段并将其组合起来……(156)

如果像兰德尔那样暗示，14世纪的研究生院处在伽利略时代那种“突破”的边缘，那就忽略了手抄书文化给技术文献流通强加的限制。在我们追踪发现的手抄本里，有希望的端倪似乎在逐渐削弱，其成果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古籍和亚里士

多德难懂的论著一样“处在冬眠状态”。如果是这样，手抄书文化至少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责备。困扰中世纪研究工作的许多弱点恐怕和手抄书文化那种传播方式也有关系吧，这些传播方式的弱点有低水平的数学技能、观察工具的缺失、“无节制的玄想”等。

柯隆比说：“中世纪的思想抱负难以与实际的需要沟通，这是一个困境。”他又说：“理论观念和实际的量化方法不能进行完全的交流。”这些话都意味深长。(157) 印刷术改变管束交流和对话的条件之前，这种困境可能会继续存在。除非发表“公开
504 信”成为可能，除非你能够充分利用田野调查的报告，除非你吸收更新版本里的图表、地图和著作里的新数据，否则“理论观念”和“观察资料的接触”就是不可能的。与此相似，除非新宣传形式能够将赞助和利润带到家门口，否则仪器制造商就不会有那种广为人知的搞发明的动机。(158)

> 柯隆比博士指出，他正在研究的人并没有对永久性的科学知识做出什么贡献，他们实际的研究和他们表面上宣示的科学方法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
> 我本人也发现，嘴巴说出的观念和实际表现的差距令人困惑……柯隆比博士的唯一解释是……“某种东西使中世纪思想家凝视的方向不同于17世纪科学教导我们凝视的方向，两者的差别看来是明显的……”(159)

既然一连串的讹误丛生的手抄本和一连串不断改进的机印本之间存在差距，手抄书学者和机器印刷以后的学者凝视“不同的方向”，那就在意料之中。只要精力集中于恢复和保存古代文献，推进新研究的精力就所剩无几了。文字记录的仔细观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遗失或错乱。亚历山大图书馆汇集资料的伟业代表着历代能够达到的极限水平。托勒密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再发现自然就被认为是重大的进步了。

> 难以知悉、长期受批驳的理论一次又一次复活，然后又再次被批判和摒弃。总体上说，这一趋势养成了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心态。这一心态的基础是，科学真理过去已为人知，唯一的问题就是再发现这些真理。这一心态把研究者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他们不知道，科学永远是未来的事物。(160)

不过，科学并非“永远是未来的事物”。对求解欧几里得定理的学者，对获得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拉丁文译本而心怀感激的学者，科学就是过去的事物。有百
505 年历史的旧论著也可能胜过刚写的论著，一位研究中世纪光学的史学家如是说。

> 14世纪主要的光学活动是照抄皮切姆(Pecham)的《共点透视》(*Perspectiva Communis*)……到14世纪末，我们并没有向小孔成像的理论迈进一步。事实上，我们离小孔成像理论更远了……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13世纪不仅

比 14 世纪更加清楚，而且对解决问题的条件也更加清楚。[161]

同理，抱怨“无节制的玄想”，而不是驻足思考保存精确数据用于理论检验的困难，那也是不公平的。与此相似，“口头辩难在教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现象需要和给学生提供教材的背景联系起来考虑。“无偏见的自然研究存在诸多障碍，”迪克斯特乌斯从中挑选出来予以批判的是“对一个健全理念不适中的应用，这个理念是口头交换意见的刺激作用和澄清效果”。遗憾的是，他又呼应迪朗的观点说：口头交流搞过头了，因此

> 就产生了与目的背道而驰的效果。学生的前途取决于在各种辩难中……得到好的成绩，其结果必然是为辩论而辩论……是战胜论敌……于是追求真理反而成为次要目的。总体上说，中世纪大学教学存在严重的不足，太注重虚荣心的诉求……希望晋升的年轻学者必须要在辩论中出类拔萃……[162]

如果学术精英停止搞竞争性展示真有一个时间点，而且从此以后，他们就停止了好辩的倾向，成为纯粹而有兴趣追求真理的人，那么这个时间点是难以确定的。比较容易确定的是这样趋势：依靠口头辩论、未成文的诀窍和记忆辅助手段的倾向减弱，没有口头辩论天分的年轻学者仍然可以靠写书而出类拔萃。印刷术到来之后，争取优先权的竞争可以取代“辩证的狂欢”成为竞争驱力的主要出口。[163] 虽然虚荣心的诉求并未减弱，但科学事业还是在这一替代过程中获益。无论如何，对口头交流的依赖不是 14 世纪“任何人瞄准的效应”，也不再是经院哲学家特有的爱好。科学事业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而物质条件又不受任何一群学者的控制。中 506
世纪科学脆弱且时常受阻的性质，大概要到技术文献的涓涓细流太纤细、太不可靠的事实里去寻找。如果是这样，你就可能不再那样抱怨其他的替罪羊。混杂的动机可以分配得更加均匀。你可以用更加平静的心态去看待神学和人文主义扮演的角色，或许你可以达成一致意见：两者都不是纯粹的神恩，也不是危害不减的诅咒。

我说印刷术的出现为早期近代的科学革命搭建舞台，并应该占有更突出的地位，这并非完全非常规的姿态。有人在我之前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已故的乔治·萨尔顿就反复强调指出这一点。

> 印刷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它对科学史尤为重要。印刷术改变了历史的经纬，因为它取代了不可靠的传统形式（口头形式和手抄本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可靠和持久的形式，仿佛人类突然获得了一种值得信赖的记忆，而不是飘忽不定容易使人受骗的记忆。[164]

萨尔顿的后期著作常受到其他权威学者的忽视，但它们却传达了印刷术对科学史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和中世纪研究专家或布尔克哈特派的学者不一样，他

紧紧抓住“从活字印刷和铜板镌刻而来的印刷术的双重发明”，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165]他指出这种新技术带来的“价值观变化”，甚至走极端说（我看是太极端），“把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和中世纪分离开来的主要事件是印刷术的发明”[166]。

这样大胆的论述至少出现在萨尔顿的三部著作里，而且他是科学史创建人之一。但这些意见接受的人不多，也没有激起足够的争论以吸引批评文章。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们采用了分散概览、匆匆一瞥的形式，往往止步于长篇的讨论之前。更
507 加重要的是，他这些强有力的正面断言被同样强有力的负面断言抵消了。那些负面的断言强调早期印刷商“异乎寻常的好奇心或惰性”以及早期机印书“倒退的”性质。[167]这些文字反映了萨尔顿反复感到惊奇的发现：早期印刷商使抄书人的文字风格得到保存，同时又忽视那些先锋派的发现。萨尔顿指出印刷术“矛盾的”影响：“既促成了新思想的诞生与传播，又给旧思想的生命翻开新的一页。”[168]他借此宣示自己对“伟大的转折点”所抱的矛盾心态。你的印象是，他的期望值太高，故而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失望。

> 你会想到令人惊叹的航海发现……你的注意力会从渺小的人之书转向伟大的自然之书，但这样的发现远不如你期望的那样频繁发生。赋予斯特拉本①言论的分量超过了赋予哥伦布言论的分量……阿尔戈英雄②的远征比麦哲伦③的远征更有趣。[169]

这类文字显示，萨尔顿赞成极端经验主义的观点，损害了自己正面的主题，使技术文献的重要性打了折扣。[170]倘若将“渺小的人之书”搁置一边科学才能前进；“倘若科学研究不能在书本里进行”，而是只能在“伟大的自然之书”里进行[171]，那么影响四开本和八开本的变革就不可能有什么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在他的早期著作里，印刷术促成文化惰性的负面主题是非常突出的。可惜人们常常错误地引用这个负面的主题，把它作为萨尔顿对印刷术的影响所持有的唯一的观点。

(3)错讹文献的复制：文化滞后的幻觉

正如萨尔顿关于印刷术“矛盾”效应的正反兼有的论断所示，围绕布尔克哈特
508 的争论起到了干扰的作用，但这不是科学史家给印刷术的重要性打折扣的唯一原

---

① 斯特拉本(Strabon，约前64—公元23)，罗马时期最杰出的地理学家，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其代表作《地理学》(17卷)集历代各家之大成，是古代西方保存比较完整、篇幅大、资料丰富的一部重要文献。

② 阿尔戈英雄(Argonauts)，希腊神话，乘阿尔戈号航行寻找金羊毛的人。

③ 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1519年率领西班牙船队作首次环球航行，在穿越美洲进入太平洋时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1521年在与菲律宾土著冲突中丧生，1522年其船队中的一条船回到了西班牙。

因。许多早期印刷商复制的材料质量低劣是应该考虑的另一个原因。不错，有些学者—印刷商（比如奥珀利努斯）与几个领域里的专家密切合作，还有一些科学家—印刷商（比如雷乔蒙塔努斯或查尔斯·埃蒂安纳）刊布了一些创新性著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计划不能也未能利用专业技术特长并直接为“新思想的诞生和传播”作出贡献（萨尔顿语）。然而，大多数早期印刷商和出版商只不过吃力地复制手抄本材料，即书商和抄书人已经在发行和流通的手抄本。他们还将自己的预言汇集成书，谋求利用最具有轰动效应的“伪科学”的吸引力。于是，在印刷术的第一百年里，大量科学上“毫无价值”的材料就被复制并广泛流布开来。一方面，“毫无用处”的材料印行了许多版次；另一方面，许多现在看来具有非凡科学价值的论著却遭遇到类似于达·芬奇笔记本的命运：它们仅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甚至没有流通”[172]。由于雷乔蒙塔努斯英年早逝，他的一些著作可能就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进入哥白尼视野的[173]；与此同时，哥白尼本人的著作迟迟没有印行面世，所以告诫我们不要夸张印刷术新媒介的正面功能的人们常常把哥白尼作为一个例子。“科学进步不依靠印刷词，实际上，许多科学家比如哥白尼把自己的著作压在手里，许多年不交给出版商印行……”[174]

而且，即使哥白尼的著作印行以后，他的观点传播得也很慢。亚瑟·柯斯特勒笔下的《天体运行论》是“全天候的滞销书”，他责备作者没有利用宣传技术。[175]你不用赞同柯斯特勒的意见也会承认，印刷商的积极性不是由用拉丁文写作的天文学家调动起来的，也不是由宗教改革家调动起来的。教士们继承了使徒的传统，所以福音传道的追求对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数学家回顾毕达哥拉斯和神庙里的抄书人，所以他们不那么热衷于福音传道。[176]无论如何，作为传播活动的执行人，印刷商使近代史学家的断代图式纠缠不清。因为在16世纪后半叶，他们竭力使读者熟悉但丁时代就已经出现的世界图像。“极其受欢迎的”是萨克罗伯斯柯的约翰（Joannes de Sacrobosco）的《地球》（Sphaera），而不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亦不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地球》印行了600余个版本，一直到1600年以后。[177]

如前所示，如果想象“中世纪世界图景”在伊丽莎白时代仅仅是“存活下来”，那就错了。由于印刷商和镌刻师的努力，托勒密关于行星运动和陆地分布的模式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图式常常是用图像的形式表达，并且广泛地送到了16世纪的诗人和剧作家的手里，这些印制的图像的普及程度大大超过了它们在行吟诗人中和在但丁时代的普及程度。我们使用“中世纪的”一语时，心中想到的可能是我们的教科书里那种“精确的可重复的”图像，就此而言，“中世纪的”在这里就是误导人的形容词。虽然中世纪的手抄本里已经描绘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图式：用地球为中心的一连串同心圆表示天体和地狱，但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图式到了中世纪以后才固定并统一起来。[178]尽管如此，哥伦布以前的地图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完成以

510 后还在继续复制，哥白尼以前的宇宙图示到了牛顿时代也还在继续印行。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印刷术“加速了新发现的使命”的命题，这也使大多数权威人士争辩说：实际情况正好相反。[179]有人甚至说，早期印刷商起初所起的作用是限制而不是拓展供专业精英使用的文献，因为他们复制的仅仅是15世纪手抄本一小批低劣的文献。

> 印刷术起初并未……改变欧洲的文化背景。实际上，它起初可能起到限制的作用。费弗尔和马丹指出，高昂的成本……使谨慎挑选成为必需；虽然一本书可以印制很多副本，但选题的范围反而更窄了，而且反映了印刷商—出版商对各种因素的判断。[180]

然而，并不因为手抄书全都付诸机器印刷，手抄书的流通就有所减少。“机印书贸易没有立即取代手抄书贸易，而仅仅是加诸手抄书贸易……一般的图书馆都既有手抄书，也有机印书，公共图书馆或私人图书馆都是这样……一位博士先生收藏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既有手抄书，也有机印书。”[181]无论早期印刷商多么缺乏鉴别力，他们并没有减少书籍供应量，从来就不曾缩小图书馆藏书的范围，而是拓宽了其藏书范围。[182]

也许，正如费弗尔与马丹所言，印刷术未能“加速”“新”理论的采用。不过，测量速度相当难，甚至判定新奇度都相当难，因为你首先必须要测试印刷术前和印刷术后相对速度的命题。比如：手抄书“以多快的速度”传播维京人登陆的消息或小孔成像的理论呢？在15世纪20年代，托勒密的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新的理论还是旧的理论？如果你考虑的是旧理论被摒弃的情况而不是新理论被接受的情况，问题就不会那么麻烦。也许，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印刷术“加速”了托勒密天文学、盖仑医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衰落。因为托勒密的“伟大著作”享有的权威长达一千多年，所以机印本《天文学大成》的生命力相对比较短。至于盖仑的解剖学和胚胎学或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恐怕我们也能够做出同样的判断。中世纪的人
511 习惯引用校订本和评注本比如萨克罗伯斯柯的《地球》或蒙蒂诺(Mondino)的《解剖学》(*Anatomia*)，仿佛每一个版次都是独立的著作，但这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迹象，并不能说明亚历山大时代的著作已经过时或已经被超越。比如，虽然萨克罗伯斯柯的《地球》并非直接以托勒密为基础，但其大部分内容的确来自于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阿拉伯文的校订本。说萨克罗伯斯柯“吃力地照抄了一本初级的阿拉伯著作”并非完全正确，因为它吸收的阿拉伯论著不只一本，而且它还吸收了马蒂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的思想。尽管如此，凡是作者偏离抄袭的地方，他一般都会出错(常常暴露他对“希腊语可怜的无知”)。[183]因为早期机印本地图受托勒密束缚，一位权威就把它们描绘成倒退。奇怪的是，正是这位权威学者居

然又把这本中世纪的低劣的校订本《地球》说成是“一切时代最有用的书”[184]。《地球》生动地证明，在哥伦布之前很久，经院里的修士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归根结底，地球是圆形的知识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时代优秀的技艺，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中世纪后期传授地球是圆形的天文学书籍的效应并没有得到强化；那些手抄的世界地图和粗糙而程式化的图像给“一般无批判眼光的抄书人或学生”的印象是：地球是“平坦的圆盘”[185]。据巴格劳记述，印刷术使 T-O 图像的生命一直延长到 16 世纪。[186]然而，在抄书人的手里，T-O 图像的生命似乎无限长。有多少(16 世纪以前)端坐扶手椅里的旅行者有机会看见这样的图像呢？

> 那种环宇地图流传的时期超过了人们的估计。合格的图解航海手册或海岸图表从 13 世纪开始就已经在流传，而且此前可能就已经存在。不过，虽然 512
> 这些手册和图表对航海人有用，但学者们未必一致予以关注。[187]

但那些永远看不见的东西，学者们怎么会“一致予以关注”呢？新绘制的图表和其他手抄本一样，难免会退化。地图要抄写成很多副本才有助于足不出户的旅行者。辗转用手复制的图解航海手册也很古板，其实用性就会减弱。

如上所示，如果你忽视早期印刷商继承了手抄书这一事实，你就可能把他们的印刷品描绘为倒退。当后人追溯中世纪早期的发展时，他们往往忽视手抄本生产的事实。他们常常鼓励我们从一种新著跳跃到另一种新著，直到谷登堡降临。今人常常以后见之明去要求早期的印刷商，希望他们在文化英雄驻足的地方接过神圣的使命，希望他们成为(按目前的定义)最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最博学的学者或最精明制图人的继承者。印刷达不到我们期待的高标准，这不足为奇。大多数情况下，印刷商接受的只不过是书商和“吃力的抄书人”的稿子，这些稿子是市场稳定需要的材料。最有用、最常用的参考书不仅容易退化，而且常常没有书名页，使人难以判定其出版地点和日期。这些稿子送到印刷商的手里时往往一团糟。

> 中世纪往往被认为是或多或少完全停滞的时期。“进步”被认为是近代的成就。然而，谁能将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的《语源学》(*Etymologies*)和托马斯·阿奎那伟大的《神学大全》相提并论，并且说，7 世纪和 13 世纪之间没有思想进步呢？[188]

如果权威学者教导我们这样去思考中世纪的思潮，15 世纪晚期刊布 7 世纪《语源学》的印刷商似乎就在使事情先后颠倒。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继续以前抄书人的工作。他们复制的《语源学》并没有因为《神学大全》的问世而过时，而且 513

阿奎那去世以后,《语源学》还在继续使用。博韦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①]的《窥镜》(*Speculum*)和中世纪晚期的其他"百科全书"可能会取代伊西多尔在近代概览和文本方面所做的工作。不过,到中世纪晚期,给书籍标注出版日期、按时间顺序排列图书的习惯才刚刚开始形成。那时,库存 80 册《语源学》的威尼斯书商[189]并不是在给 15 世纪的图书文化引进一种古怪或时间错乱的成分。他只不过像以前的书商一样试图满足读者的需要,那时的读者并不知道今天的学者所谓的"思想进步"。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首版的插图本《语源学》(1472 年,奥格斯堡)里粗糙的世界地图,如今的历史书将其作为第一幅机印版的世界地图。[190]这幅世界地图仅仅是当时抄书人木刻版的复制品,但它似乎和我们现在期待之中的 15 世纪制图学格格不入。鉴于今天的学者发现的"手绘地图明显的"、"连续不断的发展"(将新发现的许多地图排好顺序以后的发现),机印版地图反倒像是在倒退。那时,水手的手绘地图已经开始记录古人不知道的海岸,相反,机印版的地图刚开始将托勒密的世界介绍给端坐扶手椅里的旅行者。所以,那时的地图给人特别突出的感觉是:机印版地图倒退了。有人说,当我们浏览印刷术第一百年里印制的地图时,机印版地图给"你的印象是缺乏手绘地图那种明显的连续不断的发展"[191]。

>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史诗般的发现更快、更精确地在手绘地图里记录下来,比早期机印版地图还略胜一筹,因为机印版地图仍然受托勒密常规的束缚,被不符合实际的世界地图捆住手脚了。[192]

印刷术的出现引起了制图学一百年的倒退,出现了明显的"频繁的倒退和奇怪的错乱"[193]。直到 16 世纪末,奥特里乌斯、墨卡托与荷兰的一批新派地理学家才
514 终于将制图学从过时的陈规中解放出来了。

> 初期的机印版地图的特点是盲从旧原理,深受托勒密的影响;取而代之的制图学新时期有这样的特征:努力将有关地图的知识建立在第一手的信息和科学研究上,而不是建立在古人的著作上。但如上文所见,手抄本地图其实早就摆脱了古籍的影响……[194]

就印刷术影响制图学的发展而言,彭罗斯的上述文字可能会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刷术使制图学倒退和时代错乱,而制图学一直在"继续不断地发展"。然而,事实与他的记述大相径庭:初期的机印版地图不仅受到重新发现的托勒密陈规

---

① 博韦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约 1190—1264),法国学者、百科全书编辑,所编《大镜》可能是 18 世纪以前最大的百科全书,该书含三大部分:历史之镜、自然之镜和教义之镜。14 世纪有一位佚名作者为其编辑第四部分《道德之镜》。

的束缚,而且受到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世界地图"的束缚。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注意,"手抄本地图"并未记录航海家亨利时代的一切"继续不断的发展"。

> 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大多数是在修道院的抄书房里绘制的。这些地图也试图忠实地描绘已知的地理事实……它们仍然尊重基督教的宇宙论模式……直到15世纪后半叶,适宜人居的世界仍然用一个圆盘来表现,周围是大洋,耶路撒冷位于地图中央,东方(和地上天堂)在地图的上方。T-O图式的对称模式仍然表现在相当精致的世界地图中……
>
> 这个基本模式中容纳的变化是为了接受新的地理信息、思想或新的制图学理念。(195)

初期的机印版地图显示出"盲从旧原理"的特点,这反映了手抄书文化陈规的延续。手抄书文化里那些孤岛从来就不受这些陈规的支配;同理,那些彼此隔离的、碎片式的地区地图多半是由海岸加模糊不清的内陆组成的,所以,当这些地区图被纳入更加完整的世界地图时注定会产生错乱。

初期的机印版地图看上去怪异,因为那些手绘的地区地图已经湮灭,许多人看不见了;对15世纪的学者和印刷商而言,这些手绘的地区图是最容易得到的。一旦被复制以后,原来那些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手抄本地区地图就过时了,它们已经被机印版地图的图式掩盖起来。这些新图式难以容纳记录地理的地区性方法。这些新图忽略手绘地图不一致的现象,绘制手法长期缺乏统一规范的历史事实被人忽视了。晚期的手绘地图之所以看上去有明显的进步,那是因为手抄书文化的非连续性在记述中被略去了。精确的手绘海图既没有被送到滨海的海图室,也没有迁移到形态混乱的世界地图上,甚至早期的印刷商也没有将它们当作托勒密地图的更新版附件。它们仅仅是凭记忆迁移到近代的轮廓地图里,以表示在那个发现的时代取得的平稳进步。(196)"陈旧"地图的轮廓线被抹掉以后,15世纪的人回头研究希腊化时期地理学史的成就自然就被认为是倒退了。"人类知识史上有一章奇怪的记录,认为恢复托勒密的影响推迟了15、16和17世纪精确世界地图的形成,罕有比这更奇怪的章节。"(197)这一章之所以看上去奇怪,那是因为印刷文化产生的期待回过头来被投射到了早期近代的历史之上。哥白尼从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停步的地方起步;同理,奥特里乌斯和墨卡托在托勒密的《地理学》里为中世纪找到了一个出发点。"精确的世界地图"能够显示新的航海收获前,原有的制作世界地图的规则是必须要研究吸收的。

> 托勒密的《地理学》是完整的绘图人手册,清楚阐述了地志学与地理学的区别,具体说明了精确天文测量和正确数学缩略式的需要,描绘了制作地球仪的方法以及将地图投影到平面上的方法。(198)

托勒密学说的复活对哥白尼必不可少，对墨卡托和奥特里乌斯也必不可少。地图出版的“黄金时代”以对亚历山大时代遗产的透彻掌握为基础，先要消化这一
516 遗产然后才能够超越它。此外，一系列的托勒密版本常常含有令人惊奇的“新闻”，其形式可能是序言、增补或附录。现代出版商促销的手法是给旧教本换上新书名，而早期印刷商服务的学术市场却珍惜古人的智慧：新内容常常掩盖在旧包装之下。如果只计算16世纪书目上出现的旧书名的频率，而且将其当作文化滞后的铁证，那就不能够显示旧书名掩盖新内容的事实。以反复重印的萨克罗伯斯柯所著的《地球》为例，每次重印前，早期的印刷商都要补充新的数据。(199)

由此可见，用机印本复制已有的手绘地图和古地理学著作表面上看似乎是“倒退”，实际上却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进步。将全世界的知识建立在“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上完全是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第二手的资料比如报告、航海日志、海图是必要的，而且要许多代人的积累。尤为重要的是，为了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绘制地图时需要统一的网格。不一致的地图要复制到足够的数量才有可能搜集起来比较和对照，有了这个前提，全面而统一的世界地图才可能出现。(200)

《世界地图集》附有按字母表顺序的索引，列出参与编纂的作者，这类地图册的生产过程井然有序、发行量逐渐增大，这种工程之新奇值得注意。过去，搜集数据的大型合作工程总是断断续续的，动用的设施仅限于一家海图室或手抄本藏书室，到那时，这样的工程却成为继续不断、日益扩张的工程。有人指出新发明的印刷机使人接触学术文献的机会增多，在这里对这一观点予以阐述尤为有用。“小型藏书室由主要的权威独霸的局面被打破了。学者们可以轻松地进行运算、反复纵横参照，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201)

517 最大型的手抄本图书馆的局限也打破了。在手抄书向机印书的转变完成以后开拓的资源面前，即使亚历山大城那种特别丰富的资源也戛然止步了。15世纪以后开放的新信息流使新发现的积累日益加速。熟练的研究人员也随之增多，他们可以在大型工程中合作，比如绘制世界地图，寻找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和岩石。在这个方面，手抄书时代有围墙的图书馆可以和世世代代的哲学家那种封闭的宇宙观联系起来。在那个时代，有关远方陆地或海洋、奇异的动植物或南方天空星座的可以搜集、保存和传播的数据，是很有限的。正如赫拉克勒斯之墩①是地理空间的尽头一样，人类知识在手抄书数据库的局限面前也止步不前了。

请注意赫拉克勒斯之墩常常被用来指古代知识封闭的圈子，据说上面镌

---

① 赫拉克勒斯之墩(Pillars of Hercules)，直布罗陀海峡在地中海入口处两岸的两个岬角，古代欧洲人认为这里是陆地尽头。

刻着赫拉克勒斯留下的铭文“尽头”……地理知识的剧增大大超越古人，有意无意地瓦解了古典作家的优越性，后人有意识地用各种地理学比方揭示这一事实，借以表达现代知识的快速增长。(202)

手抄书向机印书的过渡完成以后，封闭的圈子被打破了。已知植物的数量从600种增加到6,000种，而且随后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同样，读者向出版商反馈信息以后，许多其他形式的数据搜集也迅速增加了。诚然，无穷无尽的概念在手抄书时代的基督教学者中并不陌生，但那个观念是用来比方人与上帝的差距：人类的认识有限，上帝的神性却是无限的，难以言说、难以知晓。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用“无穷”作论著的题名时，他们表达的意思超越了基督教教义中的思想：亚当的领地在自然之上。他们暗示，过去给人的认识设定的局限是虚幻的。他们以子孙万代的名义宣示拥有一切尚未探测的大洋深处和浩渺的天穹，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上帝保存的。

当我们比较希腊人有限的世界和文艺复兴时期不断拓宽的视野时，当我们追溯宇宙的运行从“封闭的世界走向无限的宇宙时”，更多地思考“没有围墙的图书馆”的出现这一现象是值得的。萨尔顿说得好，和望远镜或回旋加速器一样，大型图书馆是一种科学工具。(203) 16世纪的观察家缺乏图书馆设备。那时的观星人不得不依靠“肉”眼。不过，信息流业已重新定向，对自然哲学产生了影响，这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第六章
技术性文献的印刷出版：科学著述与研究的新趋势

6.1 缩小民众与学者的差距

在实验室的设施齐备甚至在新的观察工具发明之前，一种新兴的合作搜集数据的工作就已经启动了。这一事实值得我们驻足思考。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移有助于解释，为何人们觉得旧理论有些缺失，为何在望远镜、显微镜和科学研究出现之前新理论就设计出来了。谷登堡的发明走在伽利略的望远镜之前，而且印刷术还是多功能的辅助手段，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数据。有些教授规避争鸣，不将手稿付印，就像有些教授不使用望远镜一样。但谁也不会不查阅机器印刷的指南书，也没有人喜欢动手去抄写机印书里的图表。无论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或盖伦持什么观点，无论反对使用通俗语或宣传效应的意见是什么，机印的地图、海图、图表都迅速被所有的人接受了。实际上，和文化水平低的工匠一样，阅读拉丁文的专业群体也从机印书得到实惠。例如，鉴于威廉·吉尔伯特[①]写《论磁体》(*De Magnete*)就查阅了许多新版的机印书，如果把他这本书描绘为“只凭借观察和实验”所得，那就有误导人的嫌疑了。[1] 与他亲自观察和实验一样，吉尔伯特很可能从阅读他人编写的技术著作中搜集资料。第谷·布拉赫和艾萨克·牛顿通过阅读学
520 到大量的东西，这对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数和计算尺既为阅读拉丁文著作的天文学家服务，又为阅读通俗语著作的工匠—工程师服务。图表和图示既有助于外科医师、测量师和商业冒险家的工作，也有助于大学教授的教学。从“吃力的抄写”和徒劳无益的书籍搜寻中解放出来尤其有助于师生的教学。

① 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英国医师、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电学与磁学研究先驱，提出地球是大磁体的理论，率先把物质分为带电和不带电的两种，著有《论磁体》。

发明电脑以前，还有什么发明为做学问的人节省了如此之多的“工时”呢？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手抄书时代的手写被字钉取代、印刷商接过大学文具店和誊写人的工作以后，大学教授就受到鼓励，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和作坊里的印刷工、印刷商接触。新的印刷设施准备好之后，教授和印刷商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教授常常受雇于印刷商去担任编辑、翻译或校对工作。他们有时还协助出版商筹措经费，并且常常督导医学和天文学书籍的印制。因戈尔施塔特一位年轻的数学教授亚皮阿努斯[①]还开了一家印刷所。皇家数学家奥隆斯·斐奈(Oronce Finé)在巴黎几家印刷所工作。新的科学写作生涯既向大学教授敞开大门，也向工匠敞开大门。科学家—印刷商有资格与学者—印刷商并驾齐驱、登堂入室，他们都是一种新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

有必要驻足思考印刷商和大学教授的交流，因为当前的解释往往把他们分开，甚至给人这样的印象：印刷术的变革并没有影响科学家—印刷商。在这一点上，两个对立的派别强化了彼此的立场。一方面，有人认为，在考虑科学变革时强调问题的解决和精神生活，他们可能把早期的印刷商及其印刷机排除在外，他们会排除其他的“外部”因素或“社会经济”因素。有一篇评论甚至走极端，把印刷机和“巫术及专利法”一股脑描绘为“思想史的异物”(2)。即使不这样极端，他们也不太可能认为，印刷所的建立对自己关注的技术活动和思想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另一方面，有人强调早期近代科学的“社会根源”，试图将观察星象与更加世俗的活动整合起来，他们也在新印刷所和旧讲堂之间打上楔子。(3)于是，艺术家—工程师、商人、机械工等世俗的都市群体与阅读拉丁文著作的教士精英就被对立起来了。“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工匠的联盟就和被传统束缚的教士—封建思想家对立起来，这种对阵的形势似乎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图式。这样阵线分明的图式似乎也适用于以前世俗人文主义者与经院哲学家对阵的形势，以及工匠—作家与索邦神学院神学家对阵的形势。这种图式从17世纪清教徒小册子对牛津和剑桥的抨击得到特别的启示。无论这种阵线分割的根源何在，二分图式总是阻碍我们看清社会因素与科学变革的联系。于是，“社会根源”被人为地堵塞了，仿佛除了给阅读拉丁文的学者结下苦果之外就一无是处。早期的印刷商和商人与工匠很接近的事实常常被用来说明，印刷商和商人与大学教授和专业精英非常疏远。当科学史强调非学术环境的贡献时，谷登堡发明的重要意义就受到承认；反之，每当说到在图书馆和课堂里提出或重构的理论时，科学史家对印刷术的影响常常就不置一词了。

这种失衡的态度误导人的印象类似于宗教改革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印刷术

521

① 彼得·亚皮阿努斯(Peter Apianus，1495—1552)，又名彼得·比内维兹(Peter Bienewitz)，德国天文学家，以研究彗星著称。

对异端的影响得到强调，其对正统教义的影响则被忽视了。托马斯主义神学并没有维持不变，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也没有维持不变；同理，中世纪晚期的自然哲学似乎也没有维持不变。(4)《圣经》研究从手抄书走向机印书产生的新问题使神学院意见分歧；同理，加工亚里士多德古籍和亚历山大城古籍的新方法也影响到其他的大学院系。

> 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各种力量联手瓦解经院哲学里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使之失去了主流哲学的地位……
>
> 视野拓宽……人文主义者恢复了一个浩瀚的古典思想的世界，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世界表现出来的冲突和多样似乎远远超过了支配经院哲学思想的那几位古人……
>
> 经院哲学里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经过了重组……以迎接挑战……新教的“新”经院哲学借用了伊比利亚半岛学识渊博的耶稣会士的评注。在一些著名的意大利大学尤其是帕杜瓦大学里，一种经过“净化”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生命科学的重要发展奠定了基础……(5)

有关古典传统“冲突和多样”的意识有了提高，这和文本的丰富多样肯定有关系，图书生产的增加必然是精神食粮的丰富。“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也是图书生产增长的结果。当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的手抄本在天文学家的小圈子里传阅时，评论亚里士多德的人难得有机会看见《天文学大全》，所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高级课程就不太可能和托勒密的计算课发生冲突。(6)与此相似，当盖仑的著作还没有完全恢复时，阿拉伯人的医学思想和盖仑的医学思想之间的麻烦就少得多。当人们能够在同时同地研究阿威罗伊和托勒密以及阿维森纳和盖仑著作的机印版著作时，过去那些词汇单、评注本和编纂本掩盖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7)和《圣经》研究经历的变化一样，印刷所编辑工作的过程使人意识到，千百年来流传的文本内部有不一致的现象，这就使文本的直解派和现代派分道扬镳。

> 近来的研究……使人得出如下论断时不得不踌躇再三：天文学、物理学和解剖学等科学的革新和批评即所谓的科学革命完全是或主要是大学校园之外的力量和变化运作的结果。情况似乎正好相反：这些学科的发展是内部相争的结果，学术革新的一方试图从学术对话中人多势众的另一方夺取一点地盘。无疑，这正是维萨里及其解剖学同行与哥白尼、伽利略相争相搏的情况。在盖仑、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学说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上严重分裂的，正是学术界和专业界人士。这些学者的争吵和资本主义没有关系，和新教伦理也没有关系。(8)

如果更加完整地描绘印刷术的影响，“大学校园之外的力量和变化的运作”和“学者的争吵”的关系就可能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同时，“学术革新”及其引发的争论也可能得到澄清。比如，如果教学方式是教授口授、学生抄书，当教授偏离文本时，处罚教授的规定就有用。这是因为当教授变动文字或插入评论时，精确信息的传输就受到危害。但印刷术发明以后，这类规定就失去了大部分存在的理由了。然而，即使这些规定的重要功能有所减少，规避起来还是比较难，强化起来却可能更加有力。约束教授遵循课本的规定僵化并不等于说，大学校园针插不进，校外的力量和变化对其丝毫不产生影响。事实刚好相反！僵化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加速了一种学术领域的重新分割。西塞罗的崇拜者、巴尔托鲁注释派①、逍遥学派②和盖仑学派享有的地位和正统的教士相当。当学者—印刷商着手修订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时，就遭到教士们的反对。

523

但16世纪的大学还发起古三语研究，产生了一批多语学者，他们编辑并翻译《圣经》。如果把正式反对篡改拉丁文《圣经》的言论当作16世纪反对一切《圣经》研究的典型言论，那就是受了误导。同理，把处罚偏离盖仑医学典籍的规定当作近代早期一切科学的惯例，那也没有根据。然而，当今的科学史家在研究印刷术的影响时似乎把那时的科学描绘为僵化的、反对革新的。例如，斯提尔曼·德雷克论述论印刷术与早期近代科学兴起的文章开风气之先时，就指出这种僵化的观点。[9]他的研究给人启示。然而，关于在印刷术对用拉丁文写作的专业精英影响的问题上，这篇文章却打了折扣。它给人的印象是，“科学在大学校园外的传播”对学术机构没有影响。早期印刷商领头的“非学院派”科学就被用来和较早的“学院派”科学对照，“学院派”科学抗拒变革之风，维持“彻头彻尾亚里士多德派”的传统。他的文章告诉我们：“印刷术发明以后，官方的科学一如既往，维持了原来的面目。”

524

我们不驻足探讨亚里士多德学派是否有所变化，也不审视针对德雷克观点的其他批评[10]，但我们必须指出，他把研究印刷术对早期近代科学的影响圈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力学的发展指向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衰落，这一点他强调指出了。在他的文章里，自学成才的匠师—作家比如塔尔塔利亚的通俗语翻译也显得突出。但天文学和解剖学等领域的革新在“近代科学的兴起中”并不具有同等的意义，这一点却被他搁置一边了。帕杜瓦大学的教授对伽利略观点的抵制固然是指出了，

① 巴尔托鲁注释派(Bartholists)，14世纪中叶意大利北部一批注释和评论罗马法民法的法学家，以巴尔托鲁(Bartolus)为首，巴尔托鲁的代表作是评论《查士丁尼法典》的著述。

② 逍遥学派(Peripatetic)，即亚里士多德学派。

但哥白尼、雷蒂库斯①、梅斯特林②、开普勒等人对托勒密理论的驳斥却被忽视了。同样，从维萨里到哈维等用拉丁文写作的教授们对盖仑学说的批驳也被忽视了。这些例子说明，虽然有些权威学者认为，把“官方科学”描绘为受制于传统、不受印刷术影响的断言，仿佛是站得住脚的，但如果把托勒密和盖仑学说衰落的情况纳入眼底，这些断言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

况且，即使将讨论限定在伽利略的生涯里，把教授置于远离印刷商的位置也是不明智的。毕竟，伽利略出版第一部通俗语著作时已经是帕杜瓦大学的教授。(11)他宣传自己是望远镜发明人时也还在教授任内。他在大学的授课不需要顺从固化的教材，但他的出版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在这个方面，基于两极化的解释是不对的，把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和帕杜瓦大学的亚里士多德追随者对立起来有误导
525 人的后果。最近有一篇文章走极端，认为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造就了普通的阅读公众，伽利略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且能够独立于既定的权威。“1610 年以后，伽利略转向公众求助，这个公众不是大学教授，而是普通公民例如小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 Jr)、雅阁珀·纳尔蒂(Jacopo Nardi)、科西莫·迪·巴尔蒂(Cosimo di Bardi)，当然还有科西莫·德·美第奇和洛林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of Lorraine)。”(12)这些名字绝不是什么“普通公民”。如果大公爵和大公爵夫人被认为是“普通的阅读公众”，人文主义者就完全有资格被纳入这个范畴。但佛罗伦萨的王公贵族(他们毕竟代表着“既定的权威”，几百年来一直在给手抄本的学者提供赞助)大概应该和“普通的”阅读公众区别开来。即使 17 世纪初那些既买《星空信使》(*Starry Messenger*)的拉丁文版又买其通俗语翻译版的人恐怕也不是“普通的”阅读公众。无论如何，伽利略在某些方面独立于“既定的权威”；他在帕杜瓦大学执教时更容易走向“普通的阅读公众”，到了依靠托斯卡纳的大公爵的赞助生活以后，他就不那么容易接触“普通的阅读公众”了。

在帕杜瓦担任教授期间，伽利略并没有停止和威尼斯商人、工匠或实务家的交往。此间，他甚至握有发明家和仪器制造者的专利。在致信请求美第奇家族赞助时，他希望能够更加专注地写书。然而在担任教职期间，他既出版了几本书，又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他发明望远镜的消息闻名遐迩。在考虑 15 世纪的潮流时，你不妨将“中世纪……大学的教士气氛”和佛罗伦萨作坊里“思想和行动共生”的现象进行对比。作为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继承者”，伽利略大概想到了这样的对比。(13)

---

① 雷蒂库斯(Rheticus，1514—1576)，奥地利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朋友，传播其日心说，代表作有《天文学初步》、《三角形综述》等。

② 迈克尔·梅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1580—1635)，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最早接受哥白尼日心说的学者之一。

不过,迁移到佛罗伦萨使他能够将“科研世界”和“技术世界”联系起来的这种说法, 526
似乎是令人生疑的。[14]这次迁居带给他王公贵族的赞助,却使他离开了和威尼斯印刷所的接触——而印刷所正是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的地方。一旦离开大学讲堂,他不仅离开了拉丁文教务、亚里士多德式的课程和怀有敌意的同事,他还将自己置于最终导致软禁的境地。之所以迁居佛罗伦萨,怀旧大概是原因之一,更加肯定的原因是,他最终得到了美第奇的赞助。虽然他喜欢通俗语,但他不讨厌精英,而是想讨好精英。讨论数学、天文学或解剖学时,他瞧不起普通人,因为他们依靠“常识”或印象。他坚持认为,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优于普通观察者;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比有些人对他的解读更像是精英。[15]这一次迁居使他得到王公贵族的赞助和教皇的召见,还使他有机会加入了一个很早的学会,但他失去了免于宗教裁判所审查的环境,最终不得不低头服从非学术的思想控制。

伽利略的科学研究与宣传才能并行不悖,他发表通俗语小册子,抨击坚持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教授。相反,其他促进托勒密和盖仑学说衰落的人却羞于宣传,他们只为阅读拉丁文的同仁写书。因此,近代科学的“悄然”兴起陷入了敌对信仰“闹嚷嚷的”冲突之中。伽利略的情况倒是例外,但无论他的表现是多么壮观,这样的例外都不能被当作规律,把印刷文化和早期科学连在一起时尤其如此。

17 世纪的审判产生的影响可能会使我们在研究此前的发展时误入歧途。即 527
使在研究这个天才的世纪时也可能产生扭曲的观点。例如,在尤金尼奥·加林的《意大利人文主义》那令人信服的记述里,意大利的大学欢迎审查制度,以便摧毁反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对手,然后就传授“疲惫、枯竭、没有任何反响的知识”。加林指出,初期的竞争获胜之后,课程改革似乎就可能了。柏拉图主义者和其他革新者引进新教材,造成“大学与校外思想氛围的紧张”。但入侵者被逐出校园。比萨和帕杜瓦成为反对入侵的堡垒。佛罗伦萨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和帕杜瓦经院哲学的教授长期互相攻击,这场笔仗最后以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加林对这场论争的解释和德雷克的解释大同小异:大学“推广的只剩下灯尽油枯的传统,别无其他”[16]。

伽利略与同时代的科学家分享“时代的文化”时,意大利的学术氛围似乎比较独特。在 1592 年和 1610 年间,威廉·哈维在帕杜瓦留学,其教授是伽利略的医生。哈维的剑桥导师劝他到帕杜瓦留学,以便受益于欧洲大陆高质量的训练。对他这位剑桥本科生而言,帕杜瓦的学习显然具有革新和试验的特征。诚然,亚里士多德在有些课程中地位显赫,但对哈维的研究工作而言,这大概助了一臂之力,而没有构成障碍。[17]

《论血液循环》卓有成效地将有力的逻辑论证和解剖技巧结合起来。可以说,逻辑必修课磨砺了哈维对辩驳的感知能力。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很注意

528 新近印行的解剖学教本里比较薄弱的论述(甚至停下来纠正印刷错误),饱受批评的大学为他完成这一任务做了很好的准备。[18]据伽利略的一位传记作家记述:"16世纪大学通向新科学思想的大门是从外面被关上的。"[19]哈维的血液循环模式是来自内部的新科学思想——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几乎排外的学术辩论。他不主张用通俗语写科学著作,也没有伽利略那种宣传天分和对教学生活的厌倦。相反,他用拉丁文为专家写书,推迟了用印刷品抨击盖仑的时间。[20]

然而,如果过分夸大哈维对亚里士多德拉丁学问的掌握,那就被误导了,正如过分夸大伽利略偶尔使用通俗语是受了误导一样。我觉得,斯提尔曼·德雷克对印刷术的讨论有一点片面,但对于有些中世纪研究专家比如林·桑代克鄙视早期印刷品的态度,他的观点倒成了必要的矫正剂。桑代克大笔一挥就勾销了业余爱好者的"粗制滥造"和帕拉切尔苏斯的"粗话"。他认为,新的印刷机只不过把"一点点知识""在比较多的人中薄薄地摊开"。印刷机模糊了真正的科学,放大了迷信。[21]德雷克讨论过的格马·弗利休斯(Gemma Frisius)、西蒙·斯蒂文等北方人对"精密"科学的贡献,桑代克不置一词,同样德雷克笔下的许多意大利人也被他漏掉了。然而实际上,这些通俗语科学作家的贡献绝对不只是摊薄了一点点旧知识。尽管拉丁文继续用作知识界的通用语言,针对非学术读者(包括潜在的赞助人和仪器购买人)的通俗语科学著作或许真的有助于改变一些旧知识领域。通俗语著作
529 吸引业余爱好者去从事新的发现,创建新学科,比如那时的应用数学和力学。

例如,16世纪的应用数学家改造了数的语言,为稍后的费马①和笛卡尔之类的精英的革新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新专业群体的人急于从出名中获利,但他们不应该被纳入单纯普及者或宣传者的范畴。[22]德克·斯特卢克或E. G. R. 泰勒也不该纳入这样的范畴。欧文·汉纳维和玛丽·博厄斯描绘的"化学老师"亦不能纳入这样的范畴。博厄斯强调指出,《化学入门》(*Chemistry for Beginners*)之类的"简单、精确和详细"的教材不给"炼金术的秘密留下任何空间",在校园新研究领域里赢得了一席之地。[23]类似的发展影响到其他的生命科学,许多医学论著和植物学图书就是证明。这些领域里产生了一种新的说明文,其风格"简单、精确和详细",影响到对自然现象的阐述,给吹得过胀的理论放气,拉丁文浮华的文风曾经掩盖了这些过分夸张的理论。

你可能会同意桑代克的意见:印刷术为滥竽充数和吹牛皮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之有可能提出一些荒谬的主张,也有可能使江湖郎中从大众的轻信态度中牟利。但你也应该注意,中世纪的课堂上也并非没有骗人的把戏。印刷术以后,有些

① 皮埃尔·费马(Pierre de Fermat,1601—1665),法国数学家,创立现代数论和概率论。

学术花招玩起来不如过去容易了。针对律师、建筑师、测量师、外科医师、药剂师、航海家等人的论述，意在给同事留下深刻印象的论述，以及为了赢得教廷或宫廷修辞比赛的论述，必然是截然不同的。不过，通俗语用得越来越多的局面有时也给国际知识界带来损害。[24] 用通俗语写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狭隘的爱国观点，这种观点常常和作者为人类服务的宣誓不协调。推动通俗语写书的动机是获利的欲望，作者希望用发明或仪器将利益带进家门。不过，通俗语的科学著作使知识界阵容扩大、民主推广。挖掘才能的范围拓宽了，仪器制造和数学理论联系起来了，数据搜集也在许多新的方向上得到推进。 530

虽然通俗语使用的增加是重大的发展，但这绝不是科学交流经历的最重大的变革。首先，许多新的“简单、精确和详细”的文本是先用拉丁文写成然后才翻译成通俗语的。大多数情况下，科学教材的作者（阿格利帕、罗伯特·利科尔、帕奇奥里等）使用古代和近代语言。其次，正如伽利略所言，主要的科学语言既不是拉丁语也不是通俗语，而是数字和图表、圆形、三角形和方形。罗马数字或古法语韵诗被放弃了，这说明变化穿越了普通人和大学师生的分割，深入到大学课堂了。这些变化充分反映在新出版的应用数学中，这些书常常起到为数学仪器打广告的作用。于是，过去由不同渠道传播的不同的文本传统就自由地组合起来了。“基本掌握新领域之后，作者们自由地将阿拉伯文本和应用代数里的材料组合起来。”印制图表和地图的新的可能性产生了实用的妥协，虽然违背了哲学教条，却产生了真正实用的纸张印刷的工具。

> 三角定理……翻译成计算技巧之前对航海人没有用处……图表的准备……反过来需要计算者放弃几何精确度以求计算的近似和材料的插入……和教条不同的是……航海人、制图人、工程师……把算术和几何当作拥有共同边界的领域……西蒙·斯蒂文……重视阿基米德的几何学，设计了……十进制的小数位置数……进行代数研究……内皮尔……用点在线上的移动来构想对数，但他忽视欧几里得，因为点的移动的比率是用数来计算的，四舍五入化为整数……目标不是理论严密，而是足够精确的大值数运算和三角函数的技巧。 531
>
> 统一的实用精神主导着数学和力学古典的……区分，促进数学工具的研究……内皮尔的……《对数》出版之后不到六年，布利格斯（Henry Briggs）的《对数》（*Logarithms*）出版之后不到三年……理查德·冈特（Richard Gunter）和埃德蒙·温盖特（Edmund Wingate）就发明了计算尺。[25]

统一的数学符号使大学教授更接近计算师。这些符号使科学家远离诗人，却没有使学者和工匠分离。在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战端之外，又加上了一种

新的分裂:数字党和语词党的分裂。印刷术确保了“十进制计算者”(algorists)对“算盘计算者”(abacists)的胜利。学校里的新算术课本取代了波伊提乌的著作。“四艺”中的其他三门学科和更高级的数学也得到改造。16 世纪的精英比如弗朗索瓦·维埃特[①]的成就并不是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批判上,而是建立在用印度—阿拉伯数字符号解析亚里士多德不曾提出的问题上。高等数学和中世纪自然哲学家的关怀相去甚远;同理,传授商务算术时也不涉及道德关怀和逻辑关怀。这两种发展都反映了印刷术以后新知识产业的迅速扩张。正如古典考古或查找植物一样,数的语言也在印刷术的推动之下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数的解析受到加速变革的影响。

顺便指出,早期印刷商和镌刻家“推拉”字母、数字和图形,使之结成新的联盟。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虽然罗马数字被阿拉伯数字取代了,但人的比例却要符合古罗马拱形上镌刻的字母。(26) 立体几何表现在两维平面上,沉重木质的换算
532 表让位于纸上的换算表。总之,“四艺”的“积木块”即字母、数字和图形以及音符和歌词全都经过了一番排列重组,简直就是被扔进了一个熔炉,它们再从熔炉里出来时就面目全非了。研究“四艺”各个学科如何受这类变革的影响,实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不可能在这里完成。容我仅指出一点:印刷术出现之后,这四门学科都经过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于是,代数更接近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的圆锥截面重新塑造了球体的“和谐”。影响“四艺”各个学科的变化不会不深入拉丁语学校和大学的课堂。学院派科学不受革新潮流的影响是错误的观点,近来有人关于管理医学院的研究把这个错误观点归于一些错误的印象:规章制度掩盖了进入旧形式的新内容。“一遍又一遍,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开始,你看见无数不变的教学……规章以及改变了的学科题材。”(27)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算术、语法等教材的内容;印刷术发明以后,教材的内容总是一版接一版地变化。(28) “通观印刷术发明以后……用于教学的著作,可以看见一百多年间教材的主要特征……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更能说明:15 世纪的科学进步停滞不前了。”(29) 然而,所谓停滞可能是幻觉,常常是因为没有看到旧标签掩盖的新内容。(30) 例如,第谷·布拉赫在哥本哈根读书时,据说学生学习的是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保守的”课程。(31) 然而,根据梅兰希顿的教育改革计划,他们还有新的领域和希
533 伯来语的教科书。和早些时候的中世纪学生一样,他们还要学萨克罗伯斯柯的《地球》;不过,他们用的版本不是中世纪的评注本,而是雷乔蒙塔努斯更精致的批判性版本。与此相似,亚皮阿努斯的《宇宙结构学》(*Cosmography*)看似托勒密式的旧

---

① 弗朗索瓦·维埃特(Francois Viète,1540—1603),又译韦达,法国数学家,首创代数符号,代表作有《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分析数引论》、《论方程的整理与修正》等。

书，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三角测量法的新内容，这是由格马·弗利休斯补充的，很有用。[32]年轻的第谷接受与“三艺”和“四艺”传统的循环得势的有关课程，与此同时，他又掌握了新的数学技能和语言技能，而且接触到了新的资料——尽管这些新资料常常以被掩盖的形式出现。

德克·斯特卢克说：“大学与拉丁文学校并非精密科学生活的载体。”但他同时又指出，格马·弗利休斯的《算术》(*Arithmetica*)几乎进入了每一所拉丁文学校。此间，他本人在卢万大学讲授的课程有地理和数学，以及“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支柱”[33]。内皮尔论对数的研究在杰出教授亨利·布利格斯爵士的指导下得以完善并刊布于世了。弗利休斯和布利格斯在此执教，十进制和对数在这里得到应用，这都说明，如果过分夸大“拉丁化的大学博士”与“商业都会里粗俗的技师和簿记员”之间的差距，那就荒唐了。[34]

> 罗伯特·利科尔的《艺术基础》印行了28版，必定是“被人翻阅得破破烂烂”了……利科尔绝不是“粗俗的机械工”，而是牛津万灵学院的研究员(1531)、剑桥的医学博士(1545)……他参与“近代”采矿业，并在布里斯托造币厂供职。[35]

“精密科学生活的载体”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方程式、图示、表格、地图和海图，这些新东西是不能用讲授或论辩来传递的，唯有静默地扫描书面讲解才能够理解和吸收。大学生不必再听老师口授、自己记录，他们可以靠自学提高数学能力。都市的印刷所生产出“无声的老师”以后，大学设置了新的数学讲师教席。西蒙·斯蒂文不仅被莱顿大学录取入学，而且最终还在那里谋到教席。他受聘在此任教并非这所北方著名大学接受变革的唯一信号。“那时的大学遵循传统的‘四艺’设计：法学、医学、神学和心理学；但不久，莱顿大学就增设了现代大学才有的机构：工程院、植物园、天文台和大学出版社。”[36]

到16世纪末，这些近代化迹象并非莱顿大学所独有。此前的几百年里，数学和植物学在新建大学比如维滕堡大学里大发展；同时，历史悠久的大学中心比如巴黎和帕杜瓦获得了新的设备，增加了教授职位。“帕杜瓦大学的解剖学院起初的名气归功于维萨里。”[37]维萨里在巴黎和卢万的经历使他跻身这两所大学的学术圈子，这两个圈子一般被认为是受传统束缚的。但这位16世纪的弗莱芒人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镌刻师及印刷商交往，在这后一种的圈子里，还可以见到圈外人和标记不明显的人比如帕拉切尔苏斯和塞尔维特。在维萨里及其印刷商奥珀利努斯看来，在学术圈子与由外科医师、内科医师、艺术家和文人组成的阅读公众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界线。维萨里最早的著作之一(1538)显示，他在打破这种分割中如何尽力。他把讲演时用的大牌子或图表印制成图板，在许多城镇里发行，以满足感

535 兴趣的读者的需要。[38]布道者既用布道坛又用印刷机，以求扩大影响范围；同理，维萨里这类教授也用类似的办法，以求接近课堂之外的公众。和布道者的效果一样，新的宣传方式常常激发观赏著名作者讲演的兴趣。维萨里出名以后，他讲解的解剖课引起的激动颇为壮观，和观赏巴洛克式的景观或戏剧引起的激动可有一比。[39]

而且，当我们讨论的范围拓宽到包括伽利略之外的其他人以及力学和物理学之外的其他领域时，学院式和非学院式科学的区分就更加模糊了。物理学最先进的成果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评注出现，其源头是经院哲学家的自然哲学课程。但其他领域的先进成果常常在课堂之外出现。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全集恐怕是大学生难以得到的，比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更难以看到，因为研究生院不开设高级天文学的课程。[40]在整个中世纪，大多数专业天文学家可能在大学课堂之外工作。他们常常造访宫廷、市政厅和海图室。他们用星象为君主算命，给航海人或制图人提供帮助，给铸币或度量衡提供咨询，和教士一道解决年历的问题。普通人和大学师生的分割仍然无关紧要。中世纪以后，高级教士和王公贵族的赞助仍然起主导的作用——从雷乔蒙塔努斯（先效命一位匈牙利国王，后来在赞助人的支持下在纽伦堡开办印刷所）到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等，赞助都是重要的因素。无论印刷术对天文学产生多大的影响（我相信相当大），它都不会大大促进天文学家去
536 研究大学校园之外的实际问题。很少有天文学家曾经在校园之外长期工作。[41]

在高等数学的发展史上，赞助人起到同样的作用。13 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莱奥纳尔多·斐波纳契和天文学家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相识于腓特烈二世的宫廷，而不是在大学校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斐波纳契的《算经》很少用于教学，正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很少用于教学一样。[42]萨克罗伯斯柯笔下的简写本被用来传授天文学和算术的基本知识。虽然有人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上做了不少精湛的眉批，但高等数学在大多数中世纪的大学里只被赋予了课外学习的角色。[43]正规的授课仅限于给本科生提供的敷衍了事的“八天”的讲座。在担任大学教授期间，伽利略还在家里私下授课。

因此，如果你想象，为了让塔尔塔利亚、卡尔达诺①、维埃特、费马、帕斯卡②、笛卡尔、莱布尼兹等数学精英施展才能，就必须打破某种中世纪的学术垄断，那就错了。有人说：“新的哲学和科学被迫在校园外生根，它们在那里找到了最肥沃的土

---

① 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1501—1576），又译卡尔丹，意大利医师、数学家、占星术士，所著《大衍术》是代数的奠基石之一，其他著作有《算术实践与个体测量》、《事物之精妙》、《余之一生》等。

②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概率论创始人之一，著有《致外省人书》、《思想录》等。

壤。”[44]在匆忙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强壮的常青树已经在大学围墙之外根深叶茂，已经有千百年的寿命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数学怪才有过丰富多样的人生经历——从商务学徒和自学成才的算师到大学教授和足不出户的哲学家。这些奇才有的是医师、律师和教士，可能仅仅在业余时间玩数字。无论你怎么给这个驳杂的群体分类，他们和学校关系（亦如他们喜欢拉丁文或通俗语一样）似乎是文不对题。[45]

至于生命科学，情况则略有不同。例如医学是研究生院的课程，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天文学或数学。实际上，“四艺”教育主要是为有志于攻读医学学位的本 537
科生设计的。于是，和法学一样，医学的高级研究工作就由大学承担了。不过，医学教授同时又行医，在宫廷和市镇里获得临床经验。而且，在整个中世纪，外科医师和药剂师的临床经验和医学分支被排除在大学课程之外，这两种人和学术的联系微弱，甚至没有任何联系。据说，中世纪晚期医学研究的状况是：“墨水和羊皮纸的浪潮使手脑分离。”[46]汹涌而来的拉丁文翻译的古籍可能加重了教授与行医人的隔阂。古人反对学者弄脏手的现象故态复萌了。医学教授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去研究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古籍；外科医师和药剂师则不懂拉丁文，在校园外开业。我们在讨论文艺复兴时已经指出，印刷术的出现扭转了这些趋势。于是，属于药剂师行会的画家和有学问的内科医师合作就成为机印版药草书的重要特征。为外科医师服务的通俗语书籍出版，医学书配上了解剖图谱，这些新潮以新的方式使手脑结合起来。尤为重要的是，经过中世纪的反复受挫之后，外科学家著书立说的事业终于有保障了。

在中世纪晚期，蒙蒂诺（Mondino）的《解剖学》（*Anatomia*）在学校里已有一席之地，但居伊·肖里亚克的《外科学》（*Chirurgia*）尚无立足之地。居伊本人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曾经在博洛尼亚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深造，后来才为里昂市民服务，为阿维尼翁的几位教皇效命。他敦促外科医师掌握语文、学好解剖学，然后才开业行医。在阿维尼翁教廷的庇护下，居伊搜集了大量的藏书，打破了意大利人在博洛尼亚的垄断，意大利人警觉地守护外科学书籍，不让外传。但阿维尼翁教廷寿终正寝、百年战争爆发以后，居伊的藏书散尽，阿尔卑斯山之外的外科学界著书立 538
说的事业再次受挫。[47]到了16世纪，居伊的计划才得到实施，“新解剖学”才成为大学课程设置的一部分。到16世纪50年代，巴黎大学增设了解剖课，这是居伊被法国医学院接受的标志。16世纪稍晚，蒙彼利埃教授新编了法语版的《解剖学》，旨在使有志于外科使命的人利用“书籍这种静默的老师”，于是“如今的书籍比公开讲课还先进一步了”[48]。

至于解剖学，你可以看见，课程和教材如何合作，各种才能如何以新的方式组合。但即使新的合作形式受到鼓励，旧的竞争也进一步恶化了。外科医师、内科医

师和药剂师的分工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别，我们很难做出反映真实情况的概括。尽管如此，这样说似乎还是保险的：印刷术带来的变化几乎在各地加剧了不同医务群体的竞争。以英格兰为例，17 世纪伦敦出版的《药典》(*Pharmacopeia*)使药剂师的技艺受到尊敬，同时又加剧了人们对现状的抨击。该书披露，几个世纪以来各个学校里"盲目抄写"的结果是流传了许多极其复杂、荒谬和夸张的疗法。(49)人们抨击拼命捞钱的内科医师，抨击在《药典》的刺激下出版的医学文献里那些号称廉价且保证疗效的家庭疗法，这些抨击的现代调子都令人惊叹。与此相似，在医界之外，推销药丸及万能药的广告词和手法与现代的促销手段也如出一辙。同样，学院派医学对新形式宣传的商业压力也十分敏感。帕拉切尔苏斯准备详细宣传，证明愈疮树脂对治疗淋病无效，这使他和莱比锡医学院的关系遇到麻烦——莱比锡医学院担心，如果富格尔家族①在愈疮树脂上的收入受到危害，学院会失去其赞助。(50)法国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之间的争吵特别激烈而持久，间歇性发作的敌对攻击长达三百多年。(51)

医界内部人士为地位和角色长期争夺，这再次说明，大学院系并没有与变革之风隔绝。在手抄书文化时代，巴黎大学始终是大学图书贸易的主要中心，在新潮面前，这所大学显得特别脆弱。印刷所靠近校园，这既促进交流，又引起摩擦。在这个方面，巴黎印刷商扮演的积极角色需要与以前书商和抄书人比较消极的角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此我们再次看到，如果过分强调伽利略研究里的潮流，我们就可能会误入歧途。

> 在法国，大学校园之外似乎没有任何第二条科学小溪变成浩荡的洪流，这或许有两个原因：巴黎大学长期遵循中世纪数学与物理学联系的传统，这一追求的实践比其他任何大学的时间长得多，此其一；巴黎的印刷业与巴黎大学的联系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大学与城市的联系，此其二。(52)

在手抄书时代，巴黎的书商经营大学图书时，往往扮演配角。然而到了印刷商时代，大学各院系图书的经营者是更加独立的企业家。正如罗伯特·埃蒂安纳的经营所示，巴黎印刷商遵循的政策未必和索邦神学院的政策一致。这两个群体的冲突不止一次。对国王和议会的需要，巴黎印刷商也比以前的书商敏感。机印版图书贸易的规模宏大而多样，旧的大学规章制度是无法控制的。有些巴黎印刷商的角色仍然可能和过去的书商一样，直接为大学服务。即使这些人也常常和法国其他地方的印刷商有联系，和外国公司也有联系。(53)我们首先要检视他们各种各

---

① 富格尔家族(Fuggers)，德意志实业家族，业务横跨金融、采矿、贸易等领域，15 世纪和 16 世纪鼎盛，17 世纪衰落。

样的关系，然后才能够弄清楚其中任何一种关系。 540

法国印刷商有时以公务的身份为巴黎大学服务，这是事实。[54] 而且，有些巴黎的学院还崇敬经院哲学式的物理学，甚至有人安排铅印牛津和剑桥经院大学教授的论著，这也是事实。[55] 尽管如此，虽然中世纪晚期的学术市场对早期印刷商很重要，但开发新市场也有利可图，所以他们积极地追求新的市场。在印刷术发明后的一百年里，所谓非学术出版的“第二条小溪”可见于塞纳河（与罗讷河）畔。通俗语的科学新作从法国的印刷机不断地流淌出来，其数量之多并不输给拉伯雷的小说，他的小说讥讽学究、牧师和索邦神学院神学家。在里昂，执业的药剂师冲破阻挠出书，抨击“内科医师的陋习和愚昧”，其势头不输伦敦。[56] 在巴黎，镌刻师（如杰弗里·托里）也在写几何学的书，风头不让纽伦堡。如下文所示，法国印刷商推出一位解剖师—印刷工出身的作家，即贝尔纳·帕利西，让他督导帕拉切尔苏斯和卡尔达诺的著作的出版，使他能够出版抨击索邦神学院的通俗读物。帕利西的《奇妙的讲演录》（*Discours Admirables*）收录他对“内科医师、业余爱好者、时髦人”的讲演；他邀请读者到他的作坊看他表演制陶；他的书是印刷术产生的新型通俗语科学著作的典型代表。[57] 自封的理发师—外科医师昂布鲁瓦兹·帕雷的著作也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帕雷不懂拉丁文，竟然晋升为教授（虽然是外科学院的教授而不是内科教授），这说明有些学术陈规已经被打破（使一些巴黎教授惊惶不安），死气沉沉的学术陈规难以为继了。[58]

再者，数学和医学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法国镌刻师也著书立说，不输法国理发师。和其他语言拥有译本一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著作翻译成了法语。和 541
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法国家庭教师和算师也急于吸引富家子弟和赞助人。家庭教师和算师获得了与文学家一样高的社会地位。16 世纪的法国不乏新型算术书。许多教科书试图提高算师技能的地位，使之受人尊敬；但“联系数学和物理学的中世纪传统”不再是大多数教材的突出特征。将数学和物理学与亚里士多德集注本联系起来的中世纪传统，也不是这些新教材的突出特征。以前装饰虔修书的文学手法开始出现在算术书里，这些书用表格传授利息计算和记账方法。作者们强调金融界和政界认识经营理财艺术的重要意义，他们雄心勃勃、向往打入上流社会，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上贵族才使用的冠词，他们的书瞄准行政官员和地方大员。他们还找到办法使应用几何学即实用几何学令人尊敬。他们强调这类几何书对拥有庄园的绅士和军事指挥权的贵族的实用价值。[59]

这一段话暗示，索邦神学院的阴影未能阻止出版商刊印许多实用书籍，他们将新的数学语言送达商人、测量师和军人手里。在 16 世纪，与学者－出版商和编辑有联系的学界人士似乎并非不情愿推进课程改革。相反，改造数学教学的计划与改造绘图学和语法的计划同时并进，与讴歌法语优雅的时尚同时并举。在这个方

面，勾销“反亚里士多德哲学家”的一切“方法的批判”，认为弗朗西斯·培根和彼得·拉米斯这类学者对大学的科学教学和研究没有产生影响，就可能错了。[60]虽然拉米斯没有对“新力学”作出贡献，但他帮助推进数学并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他发出的一场挑战激发了年轻的开普勒的想象力。[61]1569 年在巴塞尔出版的《数学论集》(*Scholarum Mathematicarum*)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服务，就像维萨里为
542 画家和雕塑家服务一样；拉米斯这本书使算师的地位上升到令人尊敬的高度，他们和灵感奔放的诗人及艺术家可以相提并论了。[62]他新造“负数”之类的术语，可以说对那个时代的“新数学”作出了贡献。无论如何，拉米斯不同于弗朗西斯·培根，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数学语言的重要意义。他热情地推进法国大学课程的改革，宣传德国的成就(尤其梅兰希顿的改革)，激励了爱国的瓦卢瓦国王。[63]至少他有一个计划成就不菲：巴黎大学设置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教授席位。反过来，法国的范例又被英国的课程改革家用来推动当局的改革了。

6.2 宣传科学：新的职业生涯向各种才俊之士开放

在医学和数学里，增加之中的学术机会和获取写作名气的机会同时并进。印刷术创造的新形式的作者权益和知识产权对未来的教授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对工匠和其他群体的吸引力。为扩张的图书市场服务的机会鼓励教授、家庭教师和职员采取新的态度。文化精英群体经历了内部的变化，因为旧的教育动力被疏导到新的渠道了。16 世纪的科学写作给老师施展才华提供了教学之外的道路。他们面对前人未曾遇到的各种冲突和选择。

雅克·佩尔迪埃①的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戴维斯教授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64]佩尔迪埃在巴耶、普瓦捷、波尔多等地辗转任教，同时撰写论述“四艺”各学
543 科的著作，与“七星诗社”的其他诗人合作以净化并讴歌法语。在任教的间歇里，他在巴黎和里昂印刷商的公司里借宿，为他们撰写书稿。1547 年至 1548 年冬，在圣雅各街的瓦斯科桑印刷所[65]，佩尔迪埃及其朋友(如泰奥多尔·贝扎)每天在这里热烈地讨论和争辩：算术书应该选取什么问题？应该用拉丁文还是法语写作？设计统一的正字法有何用处？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涉及。从 1553 年到 1555 年，佩尔迪埃旅居里昂，在“让·图尔内二世的印刷所里”安营扎寨，辅导其儿子，使他的正字法观点进入图尔内 1554 年印制的精美的法语版新教《圣经》。宗教战争的爆发使他不安，他决心留守天主教，不再和新教徒来往，放弃用通俗语的科学写作，放

① 曼斯的雅克·佩尔迪埃(Jacques Peletier du Mans，1517—1582)，法国诗人、评论家，推动诗歌改革，组建“七星诗社”，翻译贺拉斯《诗艺》并作序，著有《法国诗诗艺》以及有关数学和拼写改革的重要著作。

弃自己的改革计划。不过，他在巴黎和里昂的经历说明，在16世纪塑造人们的学术生涯中，印刷机所起的作用比许多人描绘的作用大。

再举一例强调说明这一点。16世纪30年代，巴黎大学的皇家讲师奥隆斯·斐奈足以为证。他被描绘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数学家”[66]，不过，他的天文学著作在技术性问题上比同时代的许多著作略逊一筹。他具有的教师、技术员和插图师的身份似乎更能够发挥其专长。他喜欢炫耀自己相当深厚的拉丁学问，用几部专论反对用商业算术里的庸俗问题来污染“高等”数学。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通俗语的科学写作作出了贡献（大概脑子里还有“庸俗的”商业动机吧）；他为16世纪初的外行人传授了“四艺”的各门学科。他捍卫通俗语的立场是典型的精英主义立场：“因为在许多绅士和资产者中间，有许多高贵而优秀的人物缺乏拉丁语知识，他们并不比机械工强多少。”即使这样，他还是利用印刷机向广大的公众传授知识，大学课堂不能与之相比。再者，他和其他“文艺复兴人”一样多才多艺：在意大利战役期间，他为弗朗索瓦一世修筑要塞提供咨询，为绘图师和测量师开发新技巧。和大多数中世纪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一样，斐奈既愿意动手又能够动手做工，亲手设计仪器和地图，而且他的仪器和地图堪与其他技术高超的工匠媲美；在业余时间里，他甚至为巴黎印刷商西蒙·科里内（Simon de Colines）设计图框标题。

正如以上两例所示，教师比工匠更有可能利用印刷术开辟新的职业生涯，并为技术文献的丰富作出贡献。紧接比林古乔[①]著作问世的第一本论采矿和冶金的书是一位身为市长的内科医师撰写的，他既不是矿工，也不是金属工；这一现象看似矛盾实有道理。这位作者就是阿格里科拉，曾担任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67]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先入之见：希腊语和拉丁语老师是学者—印刷商的朋友，不会卷进文学翻译运动。毫无疑问，商人、矿工、金属工很少有闲暇和必要的文字功夫。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显然有助于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技术文献。伊拉斯谟的一位朋友格奥尔格·鲍尔（Georg Bauer）在城里行医教书，他似乎兼有多种才能，正是出版那一著名手册的恰当人选。中世纪的国王号召教授们把有些古籍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同理，印刷商为世俗的读者出版古代的艺术和手工艺著作时又不会聘请不通晓拉丁语的学者。同时，印刷商常常敦促工匠—作者用母语写新书，不过通俗语翻译者需要掌握一定程度的拉丁文知识，否则他们根本就不能动笔。此外，通俗语翻译并非总是规范流通规矩的最佳途径。一位英格兰炼金术士说，他用“鲁钝而粗俗的英语”写书，以便“满足成千上万的俗人”而不是“十来位能干的教士”[68]。然而，荷兰语和弗莱芒语的数学书和植物学书籍必须要从这种不太为人

544

① 比林古乔（Vannoccio Biringuccio，1480—1539），意大利冶金家、武器制造家，曾任教廷兵工厂厂长，1540年出版《论烟火制造术》而一举成名，该书图文并茂，记载大量原始资料，至今仍有价值。

545 所知的通俗语翻译成拉丁语，以便进入国外更加广阔的市场。(69)

况且，即使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为了普及的目的而用通俗语写作已经是教士和布道人经常诉诸的手段。在手抄书时代，用通俗语布道已经是布道坛演讲一种重要的宣教手法。越来越多的布道人在撰写布道辞时注意培植一种活泼的趣闻轶事风格，旨在使听讲的信众打起精神。(70)新鲜和新奇的风格也很受重视，布道辞选集的序言能说明这一趋势。(71)此外，中世纪天文学、光学等领域的入门书也是用通俗语为天主教学校的学生撰写的。(72)在向幼童灌输知识时，家庭教师和学校老师也走在这种潮流的前头。那些为王室效命、在王室学校里教书的人也尽量简化传统的材料并使之生动活泼，他们还把重要的著作翻译成通俗语。

这不是要贬低新涌现出来的工匠—作家，例如帕雷、帕利西、丢勒、塔尔塔利亚；仅仅是指出，即使在这些自学成才的作家写作之前，习惯教书和布道的学者就已经率先翻译和缩编古籍了。你也许记得，尼科尔·奥雷姆将他翻译成法语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献给他的王室赞助人；你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塔尔
546 塔利亚翻译的欧几里得的著作“偏离了普通的学术惯例”；你不太可能认为，“没有任何教授会自找麻烦去从事通俗语翻译”(73)。然而事实上，在塔尔塔利亚之前50年，卢卡·帕奇奥里就极力主张把欧几里得的几何传递给俗人，并且用新出现的印刷机印制这样的书籍。须知，帕奇奥里是一位神学博士，而且在几所大学执教。

雅各布·巴尔巴里(Jacopo de'Barbari)为帕奇奥里(Luca Pacioli)作的那幅著名的肖像画显示，这位修士正在给未来的乌尔比诺公爵讲欧几里得。这幅画不足以表现帕奇奥里率先公开授课、从事科学写作的非凡的角色。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被他人洗劫一空。作为教师，威尼斯的“里阿尔多学校”大概使他获益匪浅，青年时代他在那里学习；作为宣传人，威尼斯的印刷所显然给他很大的帮助。(74)同时，他反映了13世纪以来各地托钵僧布道人的态度。“帕奇奥里表现出适合普通人的文风。他背向学者直接对公众说话。”(75)他不齿于从事通俗语翻译，非但如此，他呼吁诗人们能够督导通俗语的欧几里得著作，这是因为“如果更多人读到他的书，几何学将更加硕果累累”。

> 帕奇奥里知道，生活需要……数学，需要研究欧几里得……他具有天生的感悟和判断能力：除非改用阿拉伯数字，除非诉诸母语以求达到大多数的学生，否则数学就不会有多大作为。(76)

帕奇奥里的主要论著《算术、几何与比例大全》(*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et proportionate*)(威尼斯：帕格尼尼，1494)是献给教皇乌尔比诺的，但也得到马尔科·萨努托(Marco Sanuto)的赞助。他刻意用通俗语写这本书，这是因为：“如果用拉丁文写，没有一个人读得懂。”(77)以后，帕奇奥里的书被翻译成拉

丁文和许多其他语言。16 世纪无数的著作都摘录它的片段，包括大学课本里的数 547
学教材。库特伯特·滕斯托尔主教(Bishop Cuthbert Tunstall)和杰洛姆·卡当对其内容进行译述。[78]帕奇奥里本人复制("剽窃"?)了许多手抄书的大段文字，他本人坦诚这一事实，后人的文献也常常指出这样的抄袭。[79]但有关这部 15 世纪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的另一面，后世的文献却较少提及：它如何把复式记账法和商务算数与毕达哥拉斯的和谐及球体的和谐联系起来。于是，斐波纳契讲算盘的实用书和评述欧几里得的论著就联系起来了。例如，诺瓦拉的坎帕努斯的论著就强调诸如神圣的比例和黄金分割之类的东西。帕奇奥里的《算术、几何与比例大全》是古典与阿拉伯、学术与商务的折中主义的集合，成为一座里程碑。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各方面的内容。这位修士和神学家深交的朋友中有 15 世纪著名的艺术家，他弥合了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鸿沟。在该书的序言里，他不仅称颂经院哲学的文化英雄比如亚里士多德、波伊提乌、巴尔托鲁、塞韦尔的伊西多尔和约翰·邓斯·斯各特，而且赞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如韦罗基奥①、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②、曼坦那和阿尔贝蒂。[80]他把彼埃罗论透视的手抄书变成机印书，把这篇手稿从拉丁文翻译成通俗语，又把它插入自己意大利语版的《神奇的比例》(*Divina Proportione*)，作为其中的一节。[81]他为商人阐述神秘的复式记账法，又对测量师、建筑师和其他"多才多艺者"强调研究欧几里得的重要意义。

像丢勒和托里③这样的镌刻师和字体设计师对帕奇奥里《大全》这方面的内容 548
特别感兴趣。设计字钉的过程遵循古典的原理。他们相信，古代的字体以古罗马维特鲁威的设计为范本，他们生产一些非同寻常的人形的字母，做了大量的字体试验。[82]据潘诺夫斯基记述，丢勒在规整的多边形稿纸上印书有助于"制桶工人和橱柜木匠熟悉欧几里得和托勒密……有助于专业数学家熟悉……作坊里的几何学"。这位托钵僧也做出了类似的贡献，可能给丢勒的论著以相当的启示。当我们思考维特鲁威式的人越来越时髦的趋势时，我们会想到使开普勒终生迷恋的那成套的"完美"立方体，会想到帕斯卡将其与直觉对立的"几何学精神"，甚至会想到以心中的理想构建的城市的神奇布局，帕奇奥里早期的机印版论著值得我们良久审视、多

---

① 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1435—1488)，佛罗伦萨画家和雕刻家，达·芬奇之师，师从费拉·利比。初学金饰，曾任宫廷珍宝监管人，雕塑代表作有《基督和圣托马斯》。

② 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约 1420—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从抽象数学方式和专门技法入手研究，对绘画透视学和解剖学贡献良多，早年入印刷所当学徒，曾为教皇庇护二世和乌尔比诺公爵服务，创作颇丰，画作有《圣贝尔那蒂诺祭坛画》，著作有《绘画透视学》、《论五种标准人体》等。

③ 杰弗里·托里(Geoffroy Tory，约 1480—约 1533)，法国图书发行人、出版家、作家、表音法改革家、镌刻家，竭力推行罗马字体以对抗流行的哥特字体，发行了许多"祈祷文卷册"，著有语言学杰作《野花》。

多细察。他编辑欧几里得的工作也值得多加注意，因为他提供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约翰·迪伊等人重新予以加工的主题。(83)

> 1570 年，约翰·迪伊在伦敦印制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是由伦敦人亨利·比林斯利翻译的欧几里得著作，是欧几里得的第一个英语译本。约翰·迪伊为该书写了一篇长序，该序介绍了一切数学科学，包括柏拉图式的数学和神秘数论的数学，其目的是使之对工匠有实用意义。这篇序言大量引用维特鲁威的文字……介绍维特鲁威的建筑理论……不仅介绍“罗马人维特鲁威”，
> 549 而且介绍“佛罗伦萨人利昂·巴蒂斯达·阿尔贝蒂”(84)。

根据迪伊的引语和他介绍的内容，他对帕奇奥里的折中主义著作并非不熟悉。实际上，他称帕奇奥里“来自布尔戈的卢卡兄弟”，确认帕奇奥里和塔尔塔利亚、丢勒等人是将欧几里得介绍给“非拉丁化的人们”的先驱，走在他之前。迪伊认为，意大利大学并不觉得帕奇奥里“用通俗语”写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使他们“丢脸，或使他们的研究受阻”(85)。

当然，迪伊的序言后来被用于反亚里士多德和反学术的目的，这和他本人的宗旨格格不入。于是，“专业而博学的迪伊博士”这位方济各会的修士的“欧几里得的序言”就被一位清教牧师作为炮弹了，这位牧师敦促英国大学的课程改革，抨击“亚里士多德派”以及“学校的消极疏忽”(86)。然而，帕奇奥里写这本书在前，两军对垒的形势发生在后。帕奇奥里是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翻译、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导师、神学博士，为了维护他“复式记账法之父”的重要角色，他展现出了放眼世界的胸怀。起初，出版商给他出版那部卷帙浩繁的《大全》的特权，这一特许过期以后，《大全》就分解开来分卷出版了。《商人的完美学校》和《神奇的比例》往往就独立成书了。但在 1494 年到 1504 年的十年间，这部通俗语的数学百科全书就把最超凡的和对世俗的关怀结合在一起了。

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的第一个一百年里，帕奇奥里大概是最有力地提倡数学的人，他主张数学为普通人服务，他涉猎最广，影响最大。他的著作反复强调实用、普及和进步的主题。对齐尔塞尔而言，这一追求表明，帕奇奥里“必定与艺术家—工
550 程师和商人的关系密切”(87)。按照齐尔塞尔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图示，情况似乎是：一旦早期资本家登上历史舞台，修士和学者就没有资格启动“进步的潮流”了。对公共知识作出贡献的创新冲动总是来自于商人和工匠—工程师。然而事实上，教士往往比行会工匠更乐意启用印刷机。无疑，帕奇奥里与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之类的艺术家关系不错。但用拉丁文撰写专著、将其翻译成通俗语并出版机印本的是彼埃罗。(88)帕奇奥里得到列奥纳多的帮助，请他为《神奇的比例》设计，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89)但使这本书能够为建筑师和测量师服

务的创意肯定是来自彼埃罗这位修士，而不是来自列奥纳多这位工匠—工程师。

帕奇奥里、布鲁诺、福斯卡里尼(Foscarini)、坎帕内拉、梅森等修士是非正统的科学作家和宣传家，他们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一点无疑值得更多的注意。思考15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或“毕达哥拉斯”潮流时，格罗斯泰斯特、罗杰·培根、约翰·皮切姆等传播的方济各会传统也值得注意。皮切姆的《共点透视》成为帕齐奥里科学写作的范例。这本书的对象是巴黎和牛津的修士以及教廷的大学或神学院的神职人员。在早期近代印刷商的帮助下，皮切姆等人的论著针对的却是另一种公众，这一现象令人注目。达·芬奇和其他文艺复兴的工匠－工程师很可能读过1482年意大利版的《共点透视》。(90)

帕奇奥里频繁使用新问世的印刷机，而列奥纳多却偏爱密码和秘密，这一反差也给人启示。这突出证明了我的论点：教师和布道者更容易扮演宣传者的角色(如滕斯托尔主教或帕奇奥里修士)，艺术家和工匠在这方面却略逊一筹，因为他们缺乏修辞和誊写文本的训练。人们常常挑选塔尔塔利亚作为例子，借以说明铸炮人和军事工程师的心态(91)，这样的心态值得检视。这位自学成才的工匠—作家率先用通俗语翻译欧几里得，但他还是不愿意和算师这一行业里最新的技巧分手告别。实际上，卡尔达诺公布他解三次方程的办法时，塔尔塔利亚竟然大发雷霆，实际上，金工卡尔达诺在《伟大的艺术》里专辟三章讲述塔尔塔利亚的贡献，且反复表示感谢。(92)

551

> 现代学者满脑子装着罗伯特·默顿这样表述的一个观点：“你将一个想法传达(也就是宣传)给别人之前，这个念头并不真是你的想法。”对这样的学者而言，塔尔塔利亚的态度似乎莫名其妙。然而……个人拥有想法的观点本身在塔尔塔利亚那时就是新异而奇怪的。(93)

鉴于塔尔塔利亚反对宣传自己的数学解题方法，有必要修正人们比较熟悉的塔尔塔利亚的形象：他是一场非学术普及运动的代表，这场运动与工匠—工程师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关系比较密切。相反，比较能够全心全意接受“新异而奇怪”的宣传手法的代表是杰洛姆·卡尔达诺(Jerome Cardano)；和塔尔塔利亚不同，他上过学。作为科学作家的杰洛姆·卡尔达诺以他的非婚生父为榜样。其父法齐奥·卡尔达诺(Fazio Cardano)是大学教授，用通俗语翻译皮切姆的光学著作。上文已经提到，列奥纳多·达·芬奇参考过皮切姆的光学著作。(94)列奥纳多参阅并利用机器印刷的技术文献，以增长自己在众多领域里的知识，但同时又维持他那种中世纪工匠的保密习惯。他的行为举止颇像塔尔塔利亚，这提醒我们注意：在中世纪晚期，拉丁语法的流通比行会内部流传的“秘密”更加自由。

552 很久以来，大学学者就表达了和工匠更加密切合作的欲望，例子有博韦的樊尚、大阿尔伯图斯①、罗杰·培根等。(95)事实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似乎热心向行会的工匠学习，而工匠们却不大热心宣传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似乎再次值得记住的是：中世纪教师养成了传播喜讯的习惯，而中世纪学徒被灌输的纪律则是保卫行业秘密。以工匠—作家对16世纪的技术文献作出的贡献而言，他们冒着遭受同行责难的风险，因为行会人担心，写书人有意识地泄露行会的"秘密"。这些书的序言显示，作者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在诉诸宣传时，这些作家不是在长期卫护作坊的传统，而是在与之决裂。

即使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没有强制要求保密的地方，即使在那些作坊主的儿子学会了读书写字的地方，学徒制和不成文的规定仍然是传授一切行业技能的习惯性渠道。新技术、新技能也可能用文字提及，但那是在一些教士的布道辞里。在印刷术出现之前，重要的事件即使报告，也是在布道坛上口头报告的。"透镜在13世纪已广为人知……但在三百年的时间里，有关透镜的一切都停留在一种静默的密谋中……到了16世纪以后，透镜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96)到中世纪晚期，发明眼镜的消息则没有受到"密谋"的压制，但消息的传递靠的是口头，比较含糊，消息的记录则是在书面的布道辞里。(97)然而，到了17世纪初，技术发明已经见之于印刷品了。报界披露光学仪器的发明，于是，许多人就开始争夺发明的优先权，所谓"伽利略的镜筒"即为一例。如上所述，活字印刷的发明具有独特的优势，影响之大胜于其他的发明。因为它是唯一能够自己宣传自己的发明。所以印刷术的快速传
553 播就引起了谁是发明人的辩论。指南针、炸药的发明也可以被描绘为"一种静默的密谋"。(98)起初，这些技术发明被鄙视或低估，没等到新的资产阶级到来之后；相反，到15世纪晚期，布道坛的功能开始被印刷机取代了。印刷术的出现虽然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去开启封闭的速写簿，去公开宣示各行业的秘密，然而对口头传播的依赖也因此而减弱了。结果就出现了印制技术论著和自学书籍的雪崩式增长，这对高深的研究和作坊的工作程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期机印书如何影响人的事务和技术发展，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有证据支持怀疑者的观点："自学书"对老师更有用，而不是对实际工作的学生更有用。(99)上文已经指出，复式记账法对教会计的老师更有用，而不是对商人更有用。(100)最近出版的费马传记也记述了同样的现象：许多16世纪的"实用"的算术书也是对撰写人更有用。(101)与此相似，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

① 大阿尔伯图斯(Magnus Albertus，1200—1280)，13世纪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捍卫阿奎那学说，在巴黎大学宣扬亚里士多德主义，曾在欧洲各地讲学，是中世纪注解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唯一学者，认为获取知识的方法有两种：启示和信仰；哲学和科学。

ison)强调指出，水手们继续用航位推测法，对那些为他们而写的论著并不重视。

> 如果认为一旦仪器发明，一旦破冰用的开辙犁或航海天文年历印行，每一位航海的船长都熟悉这些发明和书籍，那实在是彻头彻尾的谬论。靠太阳所在子午线的观察来判断纬度这种非常简单的数学运算也太复杂，对1550年的大多数水手来说太复杂，即使对20世纪的许多水手来说也太复杂了。(102)

有些人对技术文献里的宣示不持批判的态度；当然，对这种宣示持怀疑态度是 554
有道理的，但怀疑主义也可能走极端。无论复式记账法、“柯氏代数”或航海天文年历遭遇什么坎坷，总有许多印刷品是提供了实际帮助的，比如度量衡换算表、标注城市间距离的地图或外语指南。而且，虽然工匠继续按照经验法则办事，但许多学界的专业团体却靠规范手册而获益匪浅。普通水手或许无法掌握改进后的偏角换算表，但制图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又如何呢？难道他们不能利用诸如此类的图表吗？直到现在，实际干活的机械工很少读《大众力学》(*Popular Mechnics*)，但在校学生却读这一杂志且获益匪浅，因为他们受科学生涯的吸引。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类似的潮流盛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数学的魔力》(*Mathematical Magick*)吸引了年轻的牛顿。这是一本“科普”书，从西蒙·斯蒂文和伽利略早期的小册子得到启示。(103)在书市上浏览、随意读点书的生活大概能够说明“业余爱好者”和“艺术爱好者”大量滋生的原因——这些有闲暇的绅士加入科学协会，没有专属的单位，也没有专业的角色。同样的活动在专业科学家里也很普遍。上文业已指出，技术手册提供了重要而新异的服务，成为学生们“静默的老师”。

研究“学者对技术状态做出的反应”时，无论如何要更多地考虑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技术已经被写进书里出版了还是被隐藏着呢？从最早出版的维特鲁威和罗伯托·瓦尔图里(Roberto Valturi)的介绍军事设施的插图书，经过比林古乔和阿格里科拉的著作，直到16世纪的阿戈斯蒂诺·拉梅里(Agostino Ramelli)和雅克·贝松，西欧“端坐扶手椅里的旅行者”都可以看到大型工厂和矿山的机器了。有鉴于此，以下情况就令人生疑：

> 古代哲人有机会欣赏到工匠的发明，他们不可能将16世纪和17世纪工匠当作自己的后继者……在近代早期，工匠经验的成功并不新鲜……倘若智 555
> 者意识到工匠的成功对科学的意义，那是因为他们的成功比古代更具戏剧性。他们的成功始终存在，只等有洞察力的人去看，所以变革就在观察者的眼里。(104)

只要口头传播和手抄书传播占主导地位，工匠的成功就难以被人看见。文艺

复兴时期的插图显示，摧毁要塞或方尖碑的镌刻画的确戏剧性地展示了工程方面的成就。翻阅雅克·贝松《机器一览》(*Theatre of Machines*)的读者看见的显然是以前的学者未曾谋面的戏剧性景观，正如阿格里科拉和维萨里的读者看见的“静脉和动脉”一样，此前的人是不可能清楚看见这些血管的。(105)

在这个方面，如果过分强调 12 世纪以来学者们表现出来的继续不断的兴趣，如果列举一长串“技术论著”去显示“高级工匠日益清晰的文字表达”，那大概会使人误入歧途。

> 如果一直往回上溯，寻找 12 世纪巴斯的阿德拉德和狄奥菲卢斯(Theophilus)牧师的化学论著的源头……然后往下寻求亨利的沃尔特(Walter of Henley)……琴尼尼(Cennini)……阿尔贝蒂等 15 世纪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学者论军事工程的著作，如果我们往下追溯的名单继续拉长，通过 16 世纪阿格里科拉……和拉梅里的工艺和发明……直到皇家学会准备撰写的各种行业史和《大百科全书》的图版，那就会使人误入歧途。(106)

在牧师狄奥菲卢斯的时代，通向《大百科全书》的道路尚未打通。虽然“文字表达日益清晰”，变革的到来还是比较突兀的。在印刷术之前，即使最善于“文字表达的工匠”也喜欢将自己的记事簿秘藏起来。他们可能

> 格外小心地用左右反写的方式来描绘自己的设计……他们强烈倾向于不向他人袒露自己的发现。在不知版权或专利为何物的世界里，发明者没有兴趣公布自己的作品，那会给人偷窃的便利。只要发明仍然是秘密，它们就有价值；一旦成为公共财产，它们就一钱不值。难怪，很少有“发明者”愿意暴露其
> 556 脑力劳动成果，让同道批评。
>
> 尽管如此，专利制度也开始成长。君主对……私人隐藏发明不那么感兴趣……愿意像祖先曾经授予人土地那样授予版权，作出规定，复制别人的发明在几年之内是非法的。在这样的保护之下，机械师可能会觉得，用书籍告诉世人自己的发明值得冒险……日益增长的数学书市场……可能给了他们这样的启示：像保守秘密一样，公开宣传也是愿意效劳的仆人。(107)

特色鲜明的算师和仪器制造人以职业群体的身份出现，这常常与早期近代的君主、官僚和商人更加精确的要求有关系，常常与中产阶级的进取心和扩张的王朝国家联系在一起。数学仪器、地图集、地球仪和“仪器世界”的生产以及工匠对行业秘密态度的转变有关系：袒露而不是秘藏有可能获利，这是过去不曾有的新情况。新的宣传机器使有创造才能的个人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又能够使官僚和军事工程师长远的“公共”目标得到满足。事实并不是“君主对私人隐藏发明不那么感兴

趣”；而是发明者得到了新的激励去公开他们的脑力劳动成果。

> 在16世纪，对航海仪器的需求日益增长，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对测量、建筑和矿山仪器的需求也应运而生。人们觉得旧的经验法则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更加精确的计算和计算仪器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108]

若干世纪以来，有些群体觉得旧的经验法则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是有可能的。鲁珀特·霍尔(A. Rupert Hall)提醒我们注意，炸药和大炮用于战争之前，人们对准确预测弹道的兴趣就兴起了。“投掷抛射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手臂、抛石器和弓弩，它们提出的运动问题并不亚于更加复杂、强大的设施。”[109]公开宣传抛射体轨道的欲望在等待时机，但它等待的不是炸药的发明，而是印刷术开辟的机会。 557

早期印刷品对科技文献的影响值得怀疑，但印刷术作为“科学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不那么值得怀疑的。许多人在研究中指出，许多作者在序言里提出了有社会觉悟的、公共精神的和进步的主题。16世纪的学者表达了为后代事业服务、为人类无私奉献、反对行会垄断、反对个人名利的愿望，这样的愿望走在后世的启蒙运动观点之前。[110]但序言里表达的这些新观点较少来自于工匠作坊里的老一套追求，更多地来自于对印刷术宣传设施的反应。通过一种奇妙的炼金术，印刷术把为自己谋利的活动改变成了公共的善事。给发明或海图打广告不会使商品失去价值，反而会吸引人到仪器制造商和地图出版商那里去登门求购。

在这个方面，我赞同质疑齐尔塞尔立场的人。齐尔塞尔强调：作坊和兵工厂发挥了战略作用，这里的工人习惯合作共事，熟悉进步的观念，并将这些观念应用到艺术和技艺的改进中。[111]当我们解释一种进步观念兴起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略不断改进的积累过程，正是这些改进最终使工匠的技艺完美。但我们必须为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留下一个重大的战略角色。如果你仔细寻找，你就可能发现，在手抄书时代的图书馆、天文馆以及作坊和矿山里，各种进步主题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印刷术使所有这些主题更加充分地得到协调，首次实现了这些主题的发展。

“技术必须靠出版才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在16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12]主要原因是技术有了“付梓印行”并进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地图出版商比如奥特里乌斯、墨卡托、布劳、洪第乌斯(Jocundius Hondius)赞助了新形式的思想合作，他们以新的方式为天文学家、矿工、史学家和商人冒险家服务。出版 558
商之所以提供资助，并不是因为他们与画家和低地国家的行会人有关系，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新媒介来复制海图和书籍。[113]“行会的秘密泄出”并不是因为大企业的普遍发展，而是因为日益扩张的印刷业的发展，因为印刷业使有关技术的出版计划可以实现了。

换句话说，对公开宣传的新态度应该和新宣传形式联系起来看。讨论技术著作的作者对所谓“贡献机制”抱什么态度，这应该和新的“贡献”联系起来考虑，这是得到印刷商服务的作者的新型的贡献。[114]工匠与赞助人在大工程上的合作由来已久。修建大教堂和后来的大炮铸造都要求各种才干的协同共事。然而，合作搜集数据的工作要等到印刷商开始工作以后才能够继续不断地、系统地进行。[115]自此，作者才可能在序言里坦诚地表明心志，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为改善人类的境遇、为集体积累的知识进步贡献力量，并补充传统手抄书文化的不足。

这一为集体目标作贡献的新关怀，这一为人类和后代作贡献的新欲望被误解为特别利他主义的追求。齐尔塞尔评述皇家学会《哲学通讯》时说：“知识不再是文人追名逐利、经院哲学家一争高下的勾当。”[116]只需看一看那一长串争夺优先权的斗争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兴起并没有减少知识人或发明人的贪婪、虚荣或争吵。对社会有利的技术之所以能够在15世纪得到宣传，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而是因为印刷术的出现。工匠—作家和文人及经院哲学家一样受到新的知识产权
559 的诱惑。《丢勒传》的序言表达了为集体事业贡献的愿望以及为后代改进绘画的愿望[117]，这一愿望并非和大张铅印的木刻画没有关系；这些画“像一艘巨大的商船，独特旗帜上书写着丢勒大名的缩写‘A. D. 丢勒’，在全世界招摇”[118]。无论序言里说什么为了上帝的荣光、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事实总是事实：印刷术出现之后，技术文献的贡献者不仅能更好地为他人服务，而且能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 在16世纪的“工匠师傅”和工程师的著作里，我们首次看见……科学进步的新观念……初步形成。为了获得写书的正当性，这些技术人自称，他们旨在推进上帝的荣光和公共的福祉。这样的著作被认为是给现存知识宝库添砖加瓦的成果，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这一知识宝库必定会经久不衰、逐渐完善、整合一体。埃德加·齐尔塞尔用精美的形象将军火作坊和宝缇嘉公司……与修士的静修室和人文主义者的书房进行对比：在作坊和公司里，人们合作共事；而修士和和人文主义者却独自一人工作。齐尔塞尔做出的结论……并非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能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和……经济竞争使人将目标理论化……而这些目标……截然不同，更加个性化，和个人圣洁或文学不朽的目标相去甚远。[119]

然而，即使在对非个人目标“提出理论”时，这些工匠—作者也收获了名气。丢勒、帕雷、帕利西等人的名气和不朽是以前的行会人望尘莫及的。

这些作家不仅像手抄书时代的诗人那样追名逐利，而且还受到金钱报偿和物质利益的吸引，且不输任何其他社会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为“卑微的”工匠写书争
560 取“正当性”的高调文字还和呼吁读者上门买书的文字同时并举，作者希望读者到

印刷所去“看令人惊叹的事情”，他们的序言里还附录了出售仪器的地址。[120] 重要的是，这些举措既为自己服务，也为他人服务。印刷术具有满足混合动机的功能，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这种功能，因为这可以用来解释印刷机的驱动力。

这一点既可以用来解释拉丁文学术著作，也可以用来解释更加普及的通俗语著作；既可以用来解释教授的“脑力劳动成果”，也可以用来解释仪器制造商的成果——倘若这两种人真的可以分开来的话。[121] 起初，学者和工匠对新宣传形式的态度都很矛盾。两个群体里都有人既渴望出于美好的动机而披露信息，同时又卷入夺取优先发明权的争论。有人说：“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纪尧姆·菲歇和纪尧姆·比代等语文学家的技艺。同理，炸药和指南针的发明改变了理发师—外科医师和水手的技艺。两者改变的方式有类似之处。”[122] 而我则认为，工匠与学者以及语文学家都由于同样的印刷术发明在同样的时间里改变了。当帕雷这样的理发师—外科医师能够成为出书的作者时，他的技艺随之大变，可能比治疗箭伤向治疗子弹伤的变化还要大。有人在批评齐尔塞尔时指出，在近代早期，“学术界所持的累积性进步观点可能和技术界所持的类似观点同样有根据”[123]。但学术和技术拥有共同的场地，这就是印刷商的作坊。新的技术文献流所需的技能是在课堂里培养的，但这样的技能同样可以在城市作坊或郊野矿山里培养。鉴于“科学进步新观念”的“初步形成”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所以有必要重申：为工匠和工程师使用的书本并非总是由他们自己撰写的。假定“在许多16世纪的‘技术’书里有一种显著的意识……即思想合作有必要的意识以及知识渐进性的意识”。不应该认为工匠师才有这种意识；布道者、教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意识。 561

此外，当我们分析对新宣传形式所持的不同态度时，我们要给个人特色赋予更多的分量，因为个人特色比职业角色更重要。卡尔达诺在自我广告宣传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既要归因于他父母的言传身教或他所处的专业群体的地位，也要归因于他个人的气质。维萨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著作付印出版，而其他解剖学教授却没有出书。[124] 有些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自己经营印刷机，另一些人却不愿意让印刷商染指。有人指出，帕拉切尔苏斯兼有公开宣传和保守秘密的矛盾态度。托马斯·斯普拉特主教在这一点上的抱怨值得在此引用：

> 渴望荣光，渴望被人视为作家，这对所有人都具有诱惑力，即使对那些神秘和保守的化学家也具有诱惑力：他们也把自己最神秘的成果印成书，虽然这样做很不像是心甘情愿的……这就使他们的文风带有一丝云遮雾罩的神秘色彩。[125]

早期近代的潮流使科学史特别混乱的一个原因是，许多江湖郎中和伪科学家急于追名逐利，相反，许多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却死守手抄书时代养成的秘而不宣的

习惯。区别巫术师和科学家需要一定的时间;真正的科学家可能不会泄露有关自己技艺的一切信息,其文风可能会"云遮雾罩",他们不愿意明快地表述自己的理论,不想使之以可以公开验证、接受或拒斥的形式露面。

> 神秘色彩死死地纠缠着炼金术。对真正科学精神的公开袒露的利他主义而言,这是犯罪。科学的原则是自由交换信息。卢瑟福[①]爵士说:"科学依靠成千上万人在共同思考同一问题时将智慧结合起来。"炼金术士掩盖自己的思想,不让他人知道,认为这些思想属于自己。他们设计神秘的体系。神秘的字母表……回文构词法、离合诗成为他们掩盖自己成果的面罩。(126)

卢瑟福憧憬的合作包含印刷术,弗朗西斯·培根在17世纪初已经明确阐述了
562 这样的前景。"自然的知识应该公开;实际上严格保守秘密的工匠应该用多种文集的形式来写成'历史'。"(127)培根谴责炼金术那种"非进步、非合作的方法",抨击炼金术太强调"个人天才的、独自的灵感",指责炼金术依靠"特殊的秘密传输",而不是"正常的公共渠道"。他为人设计的掌握自然的规划建立在合作的集体努力上,在这场游戏的过程中,每一步都需要诉诸书籍的出版。(128)

培根的规划被知识界接受,后来又成为启蒙思想的标记;不过,他那个时代的学界倒是不分享他的观点。实际上,沃尔特·罗利爵士站在他的对立面。由于被囚禁在伦敦塔,他的脾气无疑是变坏了,他赞扬阿基米德密藏发明,断言其发明"旨在丰富机械贸易、传授杀人的艺术"。罗利捍卫"炼金术士和其他一切拥有……秘密技能的人",认为他们不想"把一个睿智头脑艰苦卓绝的收获白送给不值一文的人"(129)。正如罗利这些话所示,在17世纪初,隐秘性绝不是江湖术士的明确标志。神秘的字母表……回文构词法、离合诗未必就隐藏着欺骗。奇怪的符号和密码的出现可能是一种迹象,说明一位数学天才即将发明一种新的数学语言,说明堪与毕达哥拉斯定理比肩的发明即将诞生。(罗塞塔石碑[②]发现之前,人们一直相信,古埃及人在神秘的象形文字里隐藏着重要的方程式。)(130)培根反对保守秘密,同时他讨厌数学家和数字的语言,他始终不理解数学语言的意义。应该注意的是,隐藏秘密并非仅限于炼金术,这还是哲学家和机械工的惯常特征。(131)藏头诗和密码继续吸引许多数学家,直到莱布尼兹以后。到17世纪初,仍然有一些"科学协会"用密
563 码和代码交换信息。(132)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成果显示,在16世纪初,隐藏秘密和"真正的科学精

---

① 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发现元素衰变、原子核,提出核型原子模型。

②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镇发现的石碑,碑文用希腊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刻成,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线索。

神”还可以结合在一起。丢勒转向印刷术，达·芬奇则规避之，乔治·萨尔顿将两人对比的那一段著名的文字给人以启示：

> 两人的对比有价值，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是：列奥纳多积累笔记和令人困惑的手稿，丢勒的思想不如列奥纳多深刻却更加丰饶。除非有实用的目的比如写书，丢勒不太可能自找麻烦去研究一个课题。他不仅像其他写书人那样书写，而且把他的书铅印成册……
>
> 丢勒总是讲究实际、脚踏实地。列奥纳多刚好相反。列奥纳多鄙视印刷术和镌刻术，丢勒立刻领悟到这两种艺术可能具有的商业价值……他确立了自己印刷人、镌刻师和书商的地位……我们对他的商业经营十分了解，因为他详细记录一切收支……在所有的书上签名，而且还注明日期。列奥纳多不会为这些事情费心思。他像印度人一样对年表不感兴趣……
>
> 丢勒是商人……对科学问题有一定的兴趣，但本人并不是科学家。相反，列奥纳多是纯粹的艺术家、不图赢利的发明家、科学家。(133)

对比很生动，但欠公允，有时代错乱的弦外之音，有损丢勒的形象。这位德意志商人的形象仅仅被用作陪衬，为那位意大利艺术家的浪漫化形象服务，所以人们就看不见丢勒铜版画《忧郁》那沉思形象背后的创作才能。像19世纪的中产阶级市侩一样，丢勒被脸谱化了，但他不应该被塞进先定的框框；和充分利用印刷术和镌刻画的其他人文主义者比如伊拉斯谟或拉斐尔一样，他不应该被描绘为刻版的人。萨尔顿是孜孜不倦、认真负责的编年史家，但他的许多大部头著作可能会被浪漫主义者宣告为味同嚼蜡的迂腐之作。他笔下的列奥纳多既是“乖僻”的波西米亚诗人和梦幻人，又是真正的“科学人”，这似乎有一点自相矛盾。萨尔顿完全承认，尽管列奥纳多有那么多辉煌的科学研究成果，但他对我们今天的科学贡献不多——如果注意这一点，萨尔顿的悖论就更严重了。 564

> 他对科学的热爱和热情无须争论……但除了素描中隐含的所谓发明外，我们能不能够把任何一种发明归功于他呢？
>
> 为了赢得发明的声誉，仅仅做出发明还不够。你必须要解释；你必须要非常清楚地证明你理解它……你可以说，在公开证明其价值之前，任何发明都是不完全的。
>
> 列奥纳多的思想像种子，可惜他没有培植。它们都深埋在他的笔记和素描里……
>
> 列奥纳多最精细的科研工作是解剖学研究，但他这方面的成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你可以说，即使列奥纳多其人从来没有在世上生存过，解剖学的演进可能会是同样的面貌……

> 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伟人……由于自己的过错而不为人知，因为他没有出版自己的发现；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甚至不花工夫去完成自己的发现……
>
> 再也没有比这位机械发明家的乖张……更令人奇怪和困惑的现象。列奥纳多发明和重新发明了一系列的机器，然而他忽略了他那个时代和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两种发明：印刷术和镌刻术。(134)

实际上，列奥纳多忽视印刷品的好处并没有达到拒绝查阅印刷品的程度。如上文所示，他参考了不少的机印书。(135)但他缺乏拉丁学问，这就限定了他的阅读范围。他常常不得不面对生词而苦苦挣扎，这就放慢了他在技术发达的领域里的研究进度。

565

> 和维萨里相比，列奥纳多在透彻了解古典解剖学的精华方面相当缓慢……他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这使他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经验上的优势……他的早期解剖工作往往只反映退化了的传统中的部分知识。(136)

他后期的解剖工作显示，和学者及其著作的接触使他的知识比以前丰富。但列奥纳多本人反过来对他人的贡献却微乎其微。许多权威重复列奥纳多喜欢的一句话："绘画是自然哲学。"他们不妨驻足思考，为何列奥纳多不能为那个时代的自然哲学作出贡献。鉴于他喜欢"静默的"视觉表述、反对"盲目的"言语表述，他自己那些无与伦比的胚胎发育过程的系列绘画却不为人知，这真有一丝讽刺的味道。这些绘画太"静默"，不能对 16 世纪的科学家说话。这里还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如果说解剖学的发展过程漏掉了列奥纳多的观察所得，那不是因为大学的大门没有打开，而是因为他那令人惊叹的素描本始终是被秘藏起来的。

6.3 盖仑医学的复活与超越：为"新解剖学"搭建舞台

在解剖学的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留下的印记远不如印刷大师查尔斯·埃蒂安纳。查尔斯是学者—印刷商王朝的成员，他的拉丁文化造诣和深厚学养都超过列奥纳多和丢勒。他出版多语版《圣经》、编纂多语词典的许多技能有助于他用希腊—罗马和阿拉伯词语给人体部位和器官命名。这些术语对列奥纳多是难以跨越的障碍，但对迈克尔·塞尔维特这种学者型的编辑和校对而

566 言却是比较容易掌握的(137)，对埃蒂安纳这样的学者—印刷商王朝的成员来说，它们也容易驾驭。这位都市企业家还为法国商人编制了道路交通图、为有地产的庄园主编印了指南，同时他又与大学校园里的科学研究保持密切的联系。16 世纪 30 年代，维萨里担任杰出的君特尔(Guinther)教授的助手，协助君特尔编辑盖仑的

《解剖程序》(*Anatomical Procedures*)；与此同时，埃蒂安纳在为他的亲戚、巴黎的印刷商西蒙·科里内工作，担任其助手，科里内负责这部重要的拉丁文本的首版印制工作。[138]此后，维萨里转到大学执教，埃蒂安纳则继续在出版界工作。然而，作为插图版新书的拓荒作家，两人既是关系密切的竞争对手，又互相激励。[139]

> 从16世纪20年代起，解剖学书籍汹涌而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所有这些书……都或多或少受到盖仑的影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优点和发现；它们合在一起形成“新解剖学”。难以分清它们的出版时间，因为那时的书常常经历若干年的出版过程；维萨里的特色之一是匆忙出书。[140]

如上所述，年轻的维萨里急于出书，其他人则不急。然而，16世纪的大多数解剖学教授都为日益重要的解剖学作出了贡献，他们和前辈解剖学家不同：心里的终极目标都是要出书。他们许多人自己准备图版、加工书稿文字，另一些人请教印刷商、镌刻师和艺术家；过去的大学教授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无论他们是帮助指导插图、编辑医学手稿或追踪论战的小册子，新一代的解剖学家的所有成员都受到鼓励去重新思考业已熟悉的问题，并根据新的路子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一字之误就可能使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拉伯雷如是说。拉伯雷为格里菲乌斯比照校勘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古本，格里菲乌斯急于完成这些书，以赶上1532年的里昂书市。[141]

教授们心里想着出书，这可以用来解释他们态度上的变化，这一变化正是维萨里执教的学校与以前的医学院的不同之处。维萨里及其同行表现出“观察”和“描绘真实数据”的“谨慎而勤勉的态度”，已经有许多权威学者对此做了专门的论述。他们的论述往往和保罗·罗西的评述一致：这种新态度“使传统的知识框架……处于危险的境地”[142]。偶尔，中世纪研究专家的看法与此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维萨里在他的领域里探索时持一种新的态度，他坚持进行“系统、仔细批判的”描绘，使用不太容易让人觉得“含糊其辞、难以捉摸的术语”。这些中世纪研究专家挑选出来评述的其他特征有：肯定机械技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新出现的特殊的插图技术……以便将观察所得转化为最清晰、最容易理解的图像。这种追求清晰的欲望、追求精准的意志是为了避免错误，是为了有意识地使自己远离看待事物的神奇观点；这种欲望和意志正是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和阿格里科拉的《金属学》的共同特征……[143]

除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保罗·罗西还引用其他人论述维萨里的观点：维萨里引进了“一种重视细节、掌握特殊方法和精确而充分报道观察所得的敏锐感”，并将其转化为生物科学；“在正确图像的旁边配陈词老调的解说词更加使人反感了”[144]。作为新观点和新态度的描写，罗西的技术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如果要解释如何或

为何这种新观点在那时发生，那就要给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变迁留下一方天地。对“可传播知识”的态度变化依托的是传播技术的变化。倘若不首先考虑印刷术产生的新特征，把维萨里或阿格里科拉的观点和中世纪百科全书编纂者隔离开
568 来的“巨大的鸿沟”就是无法理解的。

正如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书籍装饰的讨论所示，15 世纪绘图人和新出现的镌刻师开发的新的视觉词汇在改变解剖学研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在盖仑著作悉数出版的同时，盖仑所用的语汇全部恢复重建起来了。有些学院聘任理发师—全科医师执教，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尽管如此，在重构医学院的课程设置方面，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还是不如盖仑著作的重新编辑发行的意义以及袖珍书出版的意义。

> 在那时反中世纪、反阿拉伯的氛围里，出版商千方百计将……盖仑著作送达医学院学生的手中：于是，在 1528 年，巴黎就推出了一套 4 本口袋大小的袖珍书……这一迹象表明，人们对盖仑的兴趣重新焕发出来，巴黎大学医学院地位的上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巴黎大学教授安德纳克的约翰·君特尔首先出版了新发现的盖仑最重要的著作《解剖程序》的拉丁文译本……君特尔是医学人文主义者，而不是执业的解剖师；不过，他的确既从事翻译，也做过……一些解剖。维萨里师从君特尔，帮助他整理教材。(145)

中世纪还有一个习惯：学生帮助老师编写并抄写教材。然而，维萨里 16 世纪初在巴黎求学时，他作为“唯命是从”的抄写员的职责并不是太重，所以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本编辑工作。毕业以后，他把教学活动和作家—编辑的活动结合起来，既和提香画室里的艺术家过从甚密，又和著名的学者—印刷术频频接触。(146) 他编辑了盖仑全集的主要版本。他在威尼斯督察著名的镌刻画，然后请一家杰出的印
569 刷所协助他把这些雕版运送到巴塞尔，这些雕版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奥帕利乌斯的印刷所；维萨里在这里坐镇督察，终于将《人体的结构》印制完成。(147) 奥帕利乌斯的父亲是斯特拉斯堡的画家赫布斯特(Herbst)；在巴塞尔为印刷商阿梅尔巴赫和弗洛本工作时，奥帕利乌斯掌握了拉丁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后来，他成为帕拉切尔苏斯的助手，稍后在巴塞尔担任医师和医学讲师，但时间不长。最后，他创办了自己的巴塞尔印务公司，与托马斯·普拉特(Thomas Platter)合伙。他对所有“激进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殷勤款待，还接纳遭受英王玛丽一世迫害的流亡者。他刊印了第一部拉丁文的《可兰经》。于是，他成为早期学者—印刷商人物优秀品格的典范。他的作坊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他具备出类拔萃的优秀品格，能监察和指导出版《人体的结构》这种书的各种任务。(148)

16 世纪初，盖仑的著作得到复兴，这是在威尼斯、里昂、巴黎和巴塞尔的学

者—印刷商的庇护之下完成的；其复活的历程不同于以往任何类似的复兴，部分原因就是印刷商在起作用。

> 人文主义是另一股力量……在科学革命的出现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人们熟悉的盖仑著作的改进版本和新译本……以及不为人知的盖仑著作的发现和出版……大大推进了解剖学研究……《人体的结构》……这是科学革命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本身……就建立在维萨里之前根本不为人知的盖仑著作上。
>
> 因此，在科学革命源头的任何讨论中，科学古籍的再发现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其重要性是有限的。人文主义者把古典时期当作黄金时代……这个观念延伸到古人的科学。然而，科学革命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在……古代世界的观念之上……做了改进。因此，古籍的再发现虽然给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却不能解释这些研究最终选定的方向。(149)

我则认为，盖仑复兴走的是新方向，因为传播的方法改变了。给予“有力推进” 570
并使研究者超越古人、首次走向新边疆的不是人文主义，而是印刷术。“重要的动力”是复制前人技术文献的新方法提供的，这样的新方法使学者们免于手抄书的劳作，提供了达到谋求长远目标的新手段。维萨里与盖仑相对的立场颇像伊拉斯谟与圣哲罗姆相对的立场。维萨里的目标是重构、改良和校订而不是取代或抛弃一种古代艺术。他满怀希望地写道：“解剖学很快将要在我们的学院里培育，”“就像它在亚历山大时代受到的培育一样。”他谋求“到先逝世者里去恢复有关人体器官的知识”——以求逼近“原生的”但业已退化且有混杂成分的知识。“哥特人入侵以后，古人的原生医学和解剖学观念丢失了，这样的观点在《人体的结构》里随处可见。”(150)

这一观念是帕拉切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和其他许多人共同的观念，它似乎是广为人知的彼特拉克主题的变奏；彼特拉克的主题是：经过一个黑暗、破坏和遗忘的时期以后，就会出现一段再生、重建和回忆的时期。毫无疑问，彼特拉克觉得医学无用，他轻蔑地把不光彩的人体归之于医师，把高尚有修养的头脑保留给哲学家和修辞学家。(151) 维萨里采纳了院系之争过程中许多文艺复兴时期医师所持的立场：医学包含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经验。理想化的文艺复兴医师就像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心中理想的建筑。他扮演高人一筹的角色，因为他的艺术包含其他一切艺术，他把头脑和手连接起来。(152) 维萨里悲叹把脑力技能和体力技能分离开来的局面，认为那是医学地位卑贱的迹象，而这样的地位又是哥特人的洗劫造成的；如此，维萨里的解释走在许多现代学者最近的解释之前。然而，他记述“古人优雅文章”和“正确医药知识”的亡佚，他抨击哥特人入侵接踵而至的“野蛮的命名和错误的治

疗”，他欢呼正在冲破“全然的黑暗”而兴起的“至福时代”；彼时，他似乎在重奏彼特
571 拉克那广为人知的主题。(153)

彼特拉克这一主题普遍存在于早期近代科学先驱的著作里。试图解释这一主题时，手抄书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值得超乎寻常的注意。许多早期近代科学家认为，他们仅仅是在重新发现“古人曾经清楚感知到的真理”；如今的许多权威学者似乎觉得这有点奇怪。大多数情况下，这一信念被当作集体幻觉，被归于早期近代科学家的远古崇拜或神秘插图崇拜的、异乎寻常的走火入魔。比如，许多当今权威苦苦思索这一现象并且说：“在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历史主义，他们深深地陷入赫耳墨斯的神秘主义传统……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是古人真理的再发现，那些天才的、本色的哲学奠基人清楚感知到这些真理。”(154)然而实际上，那些相信自己正在重新发现古代先贤智慧的近代精英们未必就陷入了“赫耳墨斯的神秘主义传统”。应该说，他们在反思由于手抄书的反复亡佚而形成的、历史悠久的态度，同时在思考自己对手抄书证据的依靠。

鉴于医学文献在时间流程中的亡佚，维萨里之类的解剖学家表达的观点无论如何是有道理的。解剖数据乱麻一团；药学著作与活生生的药物治疗经验脱节；手抄书在沿着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这样的线路漂游时，医药术语混淆了；动植物图谱走样了，恰当图谱的命名遗失了；有些重要的盖仑著作几乎完全亡佚。到16世纪30年代，盖仑《解剖程序》的印行“开辟了新的天地”。对维萨里时代的教授与学生而言，盖仑的再发现就意味着自然现象的发现。

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应该作这样一番比较：中世纪某些学院完成的短暂而不完全的复兴与印刷术以后所发生的全面的复兴是不一样的。16世纪的解剖学和13世纪的解剖学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因为解剖的实践不同。相反，16世纪的解剖学前所未有的特征是：医学文献得到恢复，而且终于能够用印刷术保存下来了。解剖的实践早在13世纪就曾经出现过复兴，那是在博洛尼亚大学。杰出
572 的医学教授蒙蒂诺(Mondino)不仅用尸体来演示解剖，而且还编写了一本实用的、广泛使用的教材。然而，他去世以后，解剖学的退步就来到了。

> 在卢兹的蒙蒂诺(约1275—1326)手里，中世纪的解剖学达到顶点。他从事解剖研究而且……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以来第一位用人体公开演示解剖的老师。他的《解剖学》被后人多次印行，而且是长期使用的通用教材。但他急于调和权威们的意见，没有冒险张扬自己的观点，致使许多错误长期流传。优秀的解剖师步其后尘……但解剖学的教学却出现了普遍的倒退……人体再次成为显示高贵人士所用语词的标本，解剖学沦为语词和名字的重复。
>
> 到15世纪末，变化曲线又再次上升。一个因素似乎是医学院里要求更多

> 演示课的呼声……另一个因素是教廷……承认解剖学。15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和 16 世纪的上半叶，出版了许多带插图的解剖学图书，说明那时有一大批能干的……解剖师在工作。(155)

我认为，变化曲线不仅“又再次上升”，而且走的是一个新的方向，其中的变化是矫正、反馈和渐进的改良，而不是退化和流失。和中世纪的复兴不同，16 世纪的盖仑复兴之后再没有出现退化的阶段。相反，盖仑全部著作的恢复仅仅是一个超越盖仑时代的序幕。一旦他的全部文献用铅字固定以后，这些文献就可以接受批判性的仔细考察了。体会古籍中的数据和描绘之间的差别，即古人感知到的或揭示过的差别，就有可能了。维萨里意识到，盖仑讨论的是驴的脊椎骨，而不是人的脊椎骨。(156) 而且，第二版《人体的结构》比第一版又有改进。(157) 而长期受人尊敬的解剖学家蒙蒂诺的书却没有改进。《人体的结构》之后，一种又一种更加精细的出版计划纷至沓来，其目标都是要超越维萨里这本书。维萨里挑起了一场持久而活 573
跃的辩论，他对盖仑的批评给后世的贡献相当于哥白尼的著作对后代的贡献。(158) 给医学院学生提供的教材不再是单一权威的文献，不再是指望他们学习并代代相传的教材。他们接触各种可供选择的观点，这些观点促使他们重估证据，鼓励他们进一步用数据去核对描绘的文字，于是，继承下来的图式就得到全面的检视了。

16 世纪以前，解剖学发展之缓慢神秘莫测；相反，在 1500 年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却快得令人吃惊。(159) 倘若我们在别人的怂恿之下认为，学科的发展不受印刷术变革的影响，这种剧变就必然会被认为是“神秘莫测和令人吃惊的”。事实正好相反，“无论 16 世纪的大学的校门”对“新科学思想关闭得多么严严实实”，但对印刷商的作坊以及作坊里发生的新的思想交流，这些校门确实是敞开的。 574

第七章
为哥白尼革命重新搭台

在某些方面，哥白尼革命的初期类似刚才勾勒的“新解剖学”初期的情况。和解剖学一样，天文学的改变始于内部，是由少数操拉丁语的精英发动的；他们试图保存并传播由古人开发、12 世纪曾经被恢复的复杂技术。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均在 1543 年出版，但其共同点并不止于此。

> 维萨里在解剖学发展中的角色和哥白尼在天文学发展中的角色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哥白尼一样，维萨里摒弃前人某些关键的预设，并且用自己的思考取而代之……两人均用内容丰富、水平相等甚至略胜一筹的著作去取代他们试图取代的前人的著作。(1)

在内容的全面上，这两位作者出版的技术论著不亚于前人的著作，而且在某些主要论点上，这两本书和前人的著作分道扬镳。于是，他们就为下一代的同行专家提供了历代学者不曾有过的选择。如此，两人都启动了一个未曾预料到后果的革命程序。他们的目标是矫正一个旧传统，却启动了一个新传统；就此而言，这两本书似乎都容易用本书一直在尝试分析的思路来解释。两本书都显示，传播技术改变以后，旧的追求会产生新的结果。

575

尽管两位作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两人对新的印刷术和镌刻术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年轻的解剖学家维萨里“急忙印书”；年迈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却让手写的书稿流传，在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里，哥白尼都规避印刷机、躲避公开宣传。这一反差值得深思，因为它使许多研究哥白尼革命的史学家低估了印刷机的作用。对印刷术这一媒介，哥白尼似乎做出了负面的反应，而维萨里却急忙加以利用；在研究这一反差时，几种特殊的情况是需要记住的。

首先，不同学科的不同追求需要考虑。数学等式和图表的吸引力可能就不如解剖谱图，因为解剖学家和艺术家都可以用这些图谱。(2) 16 世纪的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或数学家写的书常常引用这样的警语:“不懂几何学者免进。”据说这是柏拉图学园入口处的警语。(3)《天体运行论》的书名页上赫然在目的就是这样的警语,而《人体的结构》的扉页插图却展示了一台一目了然的解剖术。这就说明,两本书假设的公众是不一样的:天文学家心中想到的读者圈子比解剖学家更为受限。此外,维萨里更适应广告宣传,因为他的专业惯例是向观者展示解剖术。相反,虽然哥白尼造访意大利时可能做过几场讲演,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安静的书斋里度过的,他远离讲演厅和人群。

哥白尼提倡的理论古人认为不虔诚,似乎和《圣经》的直解相抵触,很容易遭到时贤的讥笑,所以哥白尼躲避公开宣传,他害怕公开宣传可能带来的反应,他的担心比别人多一些独特的理由。(4)

> 我长期犹豫不决,一方面我想,是否应该让我证明地球运行的评述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又想,追随毕达哥拉斯等人的做法,只将自己的哲理秘密传达给周围的朋友,而且不用文字只靠口传……(5)

576

他预料自己与《圣经》和常识相抵触的理论可能会引起敌对的反应,除此之外,哥白尼的秉性似乎可以称为“内向”。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过着安静、勤勉的生活。与此相比,维萨里似乎喜欢交友,喜欢在公开场合工作,靠近嘈杂的人群。也许,他在印刷所度过了大量的时光,在难以安宁和独处的场合工作,其职业和气质的独特我们都应该考虑在内。毫无疑问,哥白尼和印刷商及镌刻师接触的时间比其他著名的天文学家要少得多。我们知道,这就是他和维萨里反差大的另一个方面。就印刷经验而言,哥白尼没有与雷乔蒙塔努斯、第谷和开普勒对应的经验。雷乔蒙塔努斯掌握了印刷技艺,第谷和开普勒密切监察并指导印刷工作。他委托雷蒂库斯完成印书的全部工作,包括图表和文本的印制,甚至印书的地点和公司都由雷蒂库斯挑选。他对自己的书和数据如何加工缺乏兴趣,这可能和他那本书异常的性质有关系。

学者们常常指出,《天体运行论》绝不是观察科学中的里程碑,它依靠旧的图表和有误的数据,借以运算行星围绕太阳的运行以支撑自己的理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天体运行论》与《人体的结构》的反差。《人体的结构》的图谱精心准备、仔细督察,维萨里的这本书因此而著名。这说明他关心精确而详细地报告观察到的现象——第谷也表现出这样的关怀,而哥白尼的书似乎缺乏这样的关怀。

577

> 哥白尼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在许多方面,他缺乏维萨里那种近代气质,对自然的真实面貌他尤其缺乏敏锐的意识:和许多中世纪人一样,他非常关心的是设计理论,并使之符合未加评判而搜集到的观察数据;至于检查观察所得的材料的质量,他就不那么关心了。半个世纪以后,第谷·布拉赫成了天文学界

的维萨里。(6)

不过，哥白尼绝不愿意接受“未加评判而搜集的观察数据”。比如，在《驳维纳》(*Letter against Werner*)一信中，他敏锐地批评一位同事断代的程序，批评过去一种观察的时间判断；在其他地方，他对前人报告里不一致的地方也明察秋毫。(7)

在此，我们还得考虑学科差异。和解剖学家及物理学家不同，天文学家不得不研究在长时段的不同时间里的观察所得。例如，凡是研究分点岁差(precession)的人都必须要关心亚历山大时代人和阿拉伯人提供的数据。如果要改进年历，那就必须要掌握长时段的周期；如果要掌握长时段的周期，那就必须要排列千百年间一系列的观察所得；如果要搜集千百年间的观察所得，那就必须要掌握不同的语言以及描写时空的不同体系。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平衡他的不足和他持久而热情的努力。一方面，他未能提供后来由第谷·布拉赫提供的新鲜发现；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厘清前人观察所得的那些尘封已久、混乱不堪的记录。(8)

如果天文学家做文献研究的合作意向得到更多的注意，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的第一百年里，哥白尼革命的早期阶段和与之同时的图书馆及图书贸易线路的变化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作为印刷术产生之后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有机会浏览范围更加广阔的记录、使用更多的参考材料，他比以前的任何天文学家都更加幸运。

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在激烈争辩中，却常被人搞得朦朦胧胧了。人们往往围绕文本传统的角色争论，究竟哪一种文本传统应该被赋予更大的分量：亚里士多德的持续批评、柏拉图的重新复活、赫耳墨斯秘义书的时髦——哪一种更重要？如果诸如此类的影响在哥白尼的研究中很重要，同样值得思考的就是许多不同文本的相互作用对他一个人的思想的影响。从很费时间的“盲目”誊写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多的词典和参考书，又有了书名页、书目等基础的文献辅助手段，于是，哥白尼就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广阔范围内从事文献研究了。

他决定“重读一切能够到手的哲学家的著作……”，以便一网打尽地解决“不确定的数学传统”的各种可能的办法；接触各种记录的机会增加了，这不仅有助于他寻求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9)，而且使他能够解决长远周期的技术问题——手抄书时代的天文学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 有空闲做研究的时候，我的老师在博洛尼亚……罗马……然后又在福隆堡(Frauenberg)观察。从观察的恒星中，他于 1525 年……挑选一颗作进一步研究……然后，他将前人观察所得与自己的观察进行对比，他发现，一个不均衡循环的……周期完成了……
>
> 为了将这些观察简约为一个确切的体系，让一切观察协调一致，我的老师计算所得的结果是：那个不均衡运行是在 1,717 埃及年的周期里完成的……

均衡运行的完整周期需要 15,816 埃及年才能够完成。[10]

对研究 15,000 余年为运行周期的天体的天文学家而言，得到越来越多的文献和书目指南肯定是有助益的。

毫无疑问，哥白尼在博洛尼亚师从一位新柏拉图主义的教授，获益匪浅；同时，他又从帕杜瓦大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辩论中获益良多。他的著作显示，他熟悉大量的文献——从《对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到正弦换算表。1509 年，他首次铅印出版了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文的一本书：忒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Theophilactus Simocatta)的《书简》。这是在克拉科夫(Cracow)印行的第一本这 *579*
种类型的译著，幸亏阿尔杜斯在威尼斯的出版社热情相助才得以问世。[11] 虽然西莫卡塔一般被描绘为不太重要的作家，但研究中世纪地理的学者挑选他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了解亚洲的地理情况。看来，哥白尼挑选西莫卡塔是因为自己对地理和拜占庭书信感兴趣。[12] 毫无疑问，他勤于研究地名和立法、古代编年史和钱币，实际上他必须要这样钻研，否则他是不能够区分被抄书人混淆了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和那波纳塞尔(Nabonassar)的，也不能判定前人观察的元旦的不同起点。柏拉图的复兴也好，对亚里士多德的持久批评也好，都不能帮助他整理古人的观察，即使回溯到纪元前的研究也不能使他比较亚历山大时代的和阿拉伯人的观察所得，亦不能使他确定“埃及人月份的名字”和“卡利普周期”(‘Callippic cycles’)的长度，更不能使他指出一位同事给托勒密观察的一次秋分的断代错了十年。[13]

> 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或新型的天文学观察使哥白尼相信古代天文学有不足之处，或使他相信有变革的必要。哥白尼去世半个世纪以后，天文学数据的积累才发生了潜在的革命变化……[14]

然而，哥白尼出生之前不久，书籍生产的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且影响到天文 *580*
学家可资利用的技术文献和数学工具。15 世纪 40 年代，克拉科夫年轻的大学生哥白尼可能还难以找到一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即使错漏很多的中世纪拉丁文抄本也难以找到。[15] 然而到他去世前，他已经拥有三种不同版本的《天文学大成》。1560 年，哥本哈根 14 岁的少年第谷·布拉赫就可以买到托勒密的全部著作了，其中包括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校订后的《天文学大成》的足本。不久，少年第谷又买到了一本《普鲁士星表》(*Prutenic Tables*)，该书是根据哥白尼的主要著作刚刚计算出来的结果。[16] 在此期间，“没有新型的观察”影响天文学。然而，古人观天所得的传播却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人们不用等到“哥白尼去世半个世纪”就能够看到这一变革的结果了，因为早在哥白尼出生之前，这一变革就已经影响到天文学研究。诚然，第谷的后继者们能够得到精确记录的新鲜数据，而稍早的哥白尼尚不能

得到；然而，和雷乔蒙塔努斯的后继者、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的同时代人一样，他
581 已经得到辅助技术文献搜集的指南了；这些指南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搜集到的希腊文抄本中精选出来的，而且是在图书馆高墙之外首次流通的文献。“到 1543 年，一切古代天文学的重大成就都已经有铅印的版本了。”(17)

早期机印书的序言有夸大之词，夸大之词必然使人气愤，有鉴于此，我们评估雷乔蒙塔努斯的角色时难免犹豫不决，不太愿意赋予其太重要的意义。

> 库萨的尼古拉、波伊巴赫①、雷乔蒙塔努斯等人曾经被视为 15 世纪科学复兴的先驱，但近来对他们的研究则强调其思想的继承性，而不是显示其即将与过去决裂。(18)

毫无疑问，翻译《天文学大全》、编制《阿方索星表》(*Alphonsine Tables*)的中世纪学者对西方天文学的“恢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成就至少不亚于那些把其译著和星图铅印成册的喜欢自吹的编辑。(19)不仅《天文学大全》的“恢复”发生在雷乔蒙塔努斯之前数百年，而且雷乔蒙塔努斯和哥伦布的“发现”的因果关系也不像后来他的同胞所吹嘘的那样大。

> 开普勒的星表……陪伴……踏上发现之旅的人们，正如雷乔蒙塔努斯的星表陪伴哥伦布一样……这两位德国人并未踏足世界很多地方，但他们对征服全球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0)

所谓实用指南是一回事，将其用于实践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业已指出，塞缪
582 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坚决反对这样一个想法：16 世纪凭经验推算航位的水手会接受忠告去使用新近出版发行的新发明的推算法。假定哥伦布真的随身带着新近印制的星表，他是否能够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星表仍然是一个尚待证明的问题。(21)

这个例子似乎可以支持许多权威发出的警告：不要夸张“印刷词作为革新的传播渠道的有效性”(22)。然而，尽管许多 16 世纪的水手没有应用新近印制的星表，但 16 世纪的天文学家无疑是使用了这些星表的。哥伦布出发驶向印度那一年，哥白尼在克拉科夫上大学了。“在学生时代，他就买到一套《阿方索星表》和雷乔蒙塔努斯的《星历表》(*Ephemerides*)。”(23)和莫里森笔下坚强的水手不同，第谷·布拉赫充分利用了印刷商和镌刻师发明的数学工具和仪器。第谷力图增加观测精度，“如果没有雷乔蒙塔努斯相当精确的星表，他的努力就会徒劳无益”(24)。雷乔蒙塔努斯在这个领域拓荒，拉特多尔特、雷蒂库斯、莱因霍尔德(Erasmus Reinhold)等

---

① 波伊巴赫(Peurbach，1423—1461)，奥地利天文学家、数学家，出版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拉丁文版，编制十分精确的正弦表，师从雷乔蒙塔努斯。

继续前进。第谷既没有对数工具也没有望远镜可以利用，但他拥有前辈天文学家 583
不曾有过的纸上印制的工具。[25] 即使未能指引航海人，至少在指引观星人方面，雷乔蒙塔努斯这位开创性的天文学家—印刷商也居功至伟。

如果过分夸张早期印刷商的作用，历史视角就会被扭曲，但如果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历史视角同样会被扭曲。贬低印刷商作用的倾向常常走得太远了。

> 15 世纪似乎没有出现意义重大的突变因素。没有重大的译作或发现。乔治·波伊巴赫率先编印托勒密《天文学大全》的译本时，大吹大擂；雷乔蒙塔努斯后来完善了这个译本，但他只不过是做了少许修订的节本。保罗·托斯卡内里(Paolo Toscanelli)和雷乔蒙塔努斯都公开表示，他们意识到：传统的托勒密—阿方索天文学需要修正，但他们可以利用的观察材料和计算理论都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26]

考虑到波伊巴赫和雷乔蒙塔努斯编译《天文学大全》时继承的数据和工作条件，这个“大吹大擂”的译本还是相当成功的。首先，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节本”。它指出了托勒密天文学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搜罗了后亚里士多德数据；后来的哥白尼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数据。[27] 其次，它给许多年轻的天文学家提供了检查《天文学大全》细节的机会——须知，一千多年来，天文学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雷乔蒙塔努斯这个版本以一个中世纪阿拉伯语版本为基础，但这个阿拉伯语本子讹误颇多。雷乔蒙塔努斯又未能充分利用更好的希腊语文本，原因是保存《天文学大全》的任务紧迫，他准备以后再修订，但修订的计划由于他不幸英年早逝而夭折了。

15 世纪产生的一个“突变因素”最终使天文学家的寿命增长了一倍[28]，所以尽 584
管波伊巴赫和雷乔蒙塔努斯享年不多，天文学的革新还是越来越多。《托勒密天文学精要》(*Epytoma in Almagestum Ptolemai*)的出版开创了一个天文学恢复时期，亚历山大时代天文学古籍印行得越来越多，下一代的天文学家有了经过净化的托勒密著作。哥白尼去世之前，希腊语版的《天文学大全》在巴塞尔出版，并从此永远保存下来(这个文本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由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带到威尼斯、雷乔蒙塔努斯查阅的那个版本)。[29]

感觉迟钝的现代学者回头看过去的五百年时，早期机印本的《天文学大全》似乎令人失望，甚至有些倒退。[30] 然而，正是这些印刷品为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家开辟了令人激动的前景。

> 哥白尼精心研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他的《天体运行论》就是《天文学大全》的翻版，一卷对一卷、一章对一章，处处对应，是《天文学大全》的重写，中间加上自己的新理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变化。开普勒后来的评价是，哥白尼的工作是解释托勒密而不是解释自然，这句话有一点道理。[31]

实际上，开普勒构想解释托勒密的另一种途径时，心中想到的并不是“自然”的方法，而是第谷的数据。哥白尼完成了一个与托勒密平行的、充分展开的长篇文本，里面包含了他自己的另一种理论，这就为第谷提供了搜集开普勒所用数据的动机。(32)他为天文学的大发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不应该责怪他生前未能完成可供他人应用的丰硕成果。在第谷之前的天文学家，不可能研究开普勒后来所谓的“自然”。

然而，作为雷乔蒙塔努斯的后继者，哥白尼在重构托勒密《天文学大全》时的处
585 境胜过了他以前的天文学家。他并非有幸得到详细记述托勒密天文学古籍的第一人，但幸运的机遇一次又一次降临到他身上；在这个方面他的确是第一人。雷乔蒙塔努斯为哥伦布导航的贡献不大，但在指引哥白尼及其同事寻求有用的技术资料方面却贡献良多，不仅使他们得到托勒密的论著，而且使他们得到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亚历山大的希罗①、维泰洛②等人的论著。雷乔蒙塔努斯师从红衣主教贝萨里翁，任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维努斯图书馆馆长，国王在布达的藏书堪与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和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藏书一比高低，所以他能够以“准确无误的判断”挑选出这些人的论著。布达图书馆收藏了五万册古籍，其中许多是雅典和君士坦丁堡流传下来的科学著作。这庞大的库藏全部湮灭之后，雷乔蒙塔努斯的书目就成为指引出版计划和端坐扶手椅的旅行者的指南，在一个多世纪里长期发挥作用。(33)

第一批天文学家——印刷商发挥的新作用和手抄书时代的天文学家的作用大不相同，更加明确地区别两者的差别十分有益。1470 年以前，雷乔蒙塔努斯与他的先行者托斯卡内里或波伊巴赫一样是游学之士，效命红衣主教或国王。他将图书馆工作和天文学结合起来，就此而论，他追随的模式是典型的亚历山大人和阿拉伯
586 人的模式。1470 年，他离开布达(Buda)图书馆，到纽伦堡去创办印刷所；此举跨越了一道伟大的历史分水岭。此前，他以传统方式服务同事、效命赞助人。在一位纽伦堡富人的支持下，他开办印刷所和天文台，印行复制的正弦表和切线表、成系列的星历表，为仪器打广告，培养学徒继承他印制技术论著的业务，发布他将出版的书籍等等——如此，他以多种新的方式为后世服务。1476 年，他不幸英年早逝；他的一些手稿直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得以印行面世；其他一些手稿完全湮灭，所以他改造天文学的终极计划将永远不为人知。而且，他精选的布达图书馆藏书

---

① 希罗(Hero of Alexandria)，希腊数学家、发明家，活跃于 1 世纪，发明了许多水动力机和蒸汽动力机，设计了测定三角形面积的公式，存世著作有《几何》、《测地术》。

② 维泰洛(Witelo，约 1225—约 1275)，波兰科学家、哲学家，所著《透视学》成为西方 17 世纪以前光学的主要教科书。

散佚，1527 年又被土耳其人洗劫一空。此前类似的浩劫也曾经使天文学倒退。所幸的是，他遵循的方针的发展势头日渐强劲。他启动的系列出版计划从未停步。星历表和三角表像永不枯竭的溪流，直至今日。他培养印制科学著作和制造仪器的助手，产生了日益彰显的效果。他体现了印刷商和科学家“集于一身”的典范，他是这一新范式的第一人，但不是最后一人。[34] 其他人在他停留的地方接棒。他刚去世，厄尔哈特·拉特多尔特及其同事就在威尼斯接棒；在他去世 60 多年后，纽伦堡一家印刷所印行《天体运行论》，继续他未竟的事业。[35]

拉特多尔特印刷所的创新有：率先用书名页，率先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出版日 587
期，留下现存最早的模式标本，率先用勘误表，率先用三色插图，率先在机印的几何书里使用镌刻的图表——凡是以爱书人为对象的著作都经常述说他创造的这些“第一”[36]。这些革新在科学史的广阔视野中的意义还有待我们探索。例如，拉特多尔特发表出版欧几里得的著作《编辑原理》(*Editio princeps*)，这本书被人称为继承了“潦草的中世纪手稿”传统的著作，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巴斯的阿德拉德。[37] 萨尔顿说：“希腊数学的辉煌”在诺瓦拉的坎帕努斯“拙劣的翻译中显得很晦涩”[38]。不过，《编辑原理》(1482 年由拉特多尔特在威尼斯印行，年轻的哥白尼读过这本书)不仅使欧几里得的著作广为人知，而且还阻止了其文本的退化，并率先用上了棱角分明的视觉手段。[39] 拉特多尔特为《编辑原理》精心设计了六百多幅图表，使之不那么“晦涩”，且胜过手抄本。其中的图表使《几何原本》(*Elements*)清楚、一致，这是其手抄本不曾有过的特质。[40] 此后，如果说欧几里得与拉丁文的联系较少，与三角形、圆形和方形的关系紧密，那不会太富于狂想了吧？

拉特多尔特为平面几何印制图表，其他早期印刷商(大概始于卢卡·帕奇奥里)为立体几何印制图表，他们借用 15 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透视。[41] 表现帕奇奥里《神奇的比例》(*Divina Proportione*)的线条分明的三维几何图形[42] 以及其他 16 588
世纪后期的图书，似乎提供了开普勒心里想到的模式，他用平面的运行轨道来表现“完美的立体”的栖身之所。[43] 有人指出，《天体运行论》也反映了人们对图表一致性和视觉对称模式新的关注。[44] 诸如此类的关注难道不是归因于印刷术发明的新的插图形式吗？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对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并不陌生。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早已进入了学校里的“四艺”教育。古代观天的星盘和中世纪的机械时钟证实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用创新的形式结合起来了。有人制作并研讨了机械时钟似的宇宙模型。[45] 但抄书人和插图人提供的视觉手段既不频繁，又不具备多样的形式。上文业已指出，古人没有用 T—O 图形和表现平面圆盘的素描去强化，连显示世界是圆形的论著也没有用上这样的视觉手段。[46]

哥白尼和开普勒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太阳系的设计必须要符合“固定对称” 589
(fixed symmetry)原理的要求，就此而言，他们反复接触的相同的对称图形和几何

图形的三维表达这种新奇的现象，可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从早期机印书开始，指南手册和教科书里新异的视觉手段使“中世纪世界图像”容易看懂了。[47]眼睛本身的解剖也首次能够用统一的图像来表现了。[48]在大量印行中世纪手册比如萨克罗伯斯柯的《地球》时，你可以说印刷商此举和抄书人以前的所为是一样的。然而，厄尔哈特·拉特多尔特的举动是抄书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举动。[49]

然而，多色图表仅仅是雷乔蒙塔努斯昔日的助手为技术文献追加的几种新特征之一。在哥白尼即将成年的岁月里，一版接一版的《地球》印行，其补充材料有助于刺激人们对陈规观点的重估。拉特多尔特 1482 年印行的萨克罗伯斯柯的《地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抽掉克雷莫纳的杰拉德原有的评论，加上最新、最老到的批评，这是他自己撰写的评论。[50]这正是他何以身后对成长中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产生影响的许多原因之一。他 1474 年印行的新书预告是许多早期印刷品的典型特征：预告的书远远多于实际出版的书。但这一书目又为未来的科学出版计划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后来的出版商遵循的指针。[51]同时，这一新书预告为哥白尼那一代天文学家提供了阅读指南，对这一代天文学家而言，参考文献和参考书颇难寻觅。诚然，15 世纪雷乔蒙塔努斯在纽伦堡启动的出版计划不那么有新闻价值，不如哥伦布远征那样轰动，但它可能对哥白尼一生的工作产生了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哥白尼可能熟悉雷乔蒙塔努斯撰写、编辑或印行的每一本著作，当然包括雷氏身后出版的《论三角形》(*De Triangulis*)。”[52]

至于哥白尼如何且何时接触到这些不同的文本，萨尔顿那简明的概览之作没有篇幅予以阐述。实际上，哥白尼不熟悉雷乔蒙塔努斯的重要著作《论三角形》——这是西方第一部长篇论述三角的著作。直到 65 岁时，他才接触到这本书。1539 年，他才有机会一窥其手抄本；雷蒂库斯给他带来这个手抄本。在雷乔蒙塔努斯去世后的五十多年里，这本书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保存。《论三角形》的第一版是 1533 年由佩特雷乌斯在纽伦堡印行的，大约十年以后，这家出版社刊布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在完全不了解雷乔蒙塔努斯《论三角形》的情况下完成了《天体运行论》中论三角的那一部分，这一事实说明，当科学著作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时，科学交流是多么孱弱。哥白尼读到雷乔蒙塔努斯已有五十余年历史的《论三角形》以后，重写了《天体运行论》里必不可少的定理。这说明，纽伦堡一台印刷机如何拓展了雷乔蒙塔努斯的影响。[53]

在这个方面，值得重申的是，“哥白尼那一代的欧洲人”从事天文学研究的环境和前辈学者从事天文学研究的环境大不相同。不过，在描绘新环境的特征时，首先应该审视天文学家在书房里工作的情景，而不是冒险远离其家门，这似乎是比较审慎的态度。

在哥白尼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天文学家可资利用的资料并没有发生潜在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我们对革命时机的理解以及酿成革命的因素的理解，原则上要到天文学之外去寻找，也就是到天文学家栖居的广阔的思想环境中去寻找。(54) 591

一旦着手到“天文学之外”的“广阔的思想环境”去寻找新的因素，史学家们如今喜欢的多重策略自然会使这一征程难以止步，他们要描绘在哥白尼时代发生的一切事情。

文艺复兴已然发生……商业革命业已开始……人们已经习惯于广阔的视野。环球航行完成，证明地球是圆的，这是人们喜爱的时尚。地球的另一边也居住着很多人……再者……前所未有的宗教动荡促使人的思想更加不受禁锢……罗马之外出现了几个宗教生活中心。通俗语文学……助了一臂之力……新近发明的印刷术新奇而激进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在这一思想发酵的过程中，哥白尼考虑……并主张……天文学的参照系统已然变易，这对他并不难……伦敦和巴黎的地位使之宛若罗马；在缺乏反证的情况下，遥远的天体就被认为是貌似地球了……(55)

即使印刷术拉近了远方的时间，通俗语的兴起、罗马遭受的挑战或王朝国家的巩固是否对哥白尼重构托勒密理论的努力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似乎仍然令人怀疑。对这位试图修正托勒密理论的天文学家而言，新发现的土地的记述无疑意义重大(56)，然而，更加重要的是要获取过去的天文观测者搜集的资料。只要我们忽视影响旧文献传播的方式已然变化，多重解释并不比单因解释给人以更多启示。在许多情况下，单因解释肯定于事无补。尤其单因解释用于文艺复兴时，这样的解释难以避免纠缠，必然会卷入大量无益的争论中。 592

如今许多人认为，哥白尼两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旅程（就像他之前的无数天文学家一样）比他在普鲁士度过的三十年更重要，尽管他用上了“端坐扶手椅的旅行者”从未有过的设施。有人鼓励我们去想象“在意大利阳光下和开放的思想氛围里他度过的十年岁月”，将这段时间和他日益拓宽的思想视野结合起来考虑。也有人把哥白尼在福隆堡居留的塔楼小屋与思想的狭隘和哥特式的晦暗联系在一起；在“福隆堡这间晦暗的小屋里”，哥白尼“凝视室外的雾霭，注视托勒密的手抄本和天文学图表”(57)。然而实际情况是：“哥白尼在福隆堡有闲暇从事研究，”他搜集了亚历山大人和阿拉伯人的观测资料，在那里作出了自己的结论。(58) 雷蒂库斯给他送来欧几里得和托勒密著作的希腊语版本，还送来其他重要的技术文献。(59) 毫无疑问，哥白尼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旅程对其研究工作意义重大；而且，他在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研究、他对罗马教廷的造访、他学习希腊语的机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对他在

故乡克拉科夫的学习经验的重要补充。然而，作为北方来客，哥白尼在意大利的研究生学习和希腊语学习与他在家乡 30 余年的学习研究都不能同日而语；在家乡漫长的岁月里，这位天文学家研究浩如烟海的文献，足不出户。他在博洛尼亚的希腊语教师去世后，他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掌握了这门很难的语言，仅有的依靠就是机印本的词汇和指南；这一事实耐人寻味。(60)

当学者能够安居一地而不必四处游学寻求“活的百科全书”以及分散在各地图书馆的手稿时，他们的思想视野大概能够最迅速地扩张。第谷·布拉赫拥有便携的文献，又有一个固定的天文观测点，这些条件都有利于他在北方一个小岛上做天文学研究，其条件并不亚于哥白尼在普鲁士塔楼的书斋的条件。着手介绍两人的成就前，我们需要在此思考影响“天文学家可资利用的数据”的种种变化。“天文学家栖居的广阔的思想环境”这句话表达的概念太含糊；同时这句话又太宽泛，成了一个百纳箱。

其实，以下的引文就太含糊、太宽泛，否则，作者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是非常有用的。

> 对哥白尼那一代的欧洲人而言，行星天文学……践行的思想社会环境与过去任何时代天文观测的情况都截然不同。一部分不同来自于神学的扩张……更加重要的变化来自于……若安内·比里当和尼科尔·奥雷姆等人的批评。但这些贡献是中世纪的贡献，而哥白尼并不是生活在中世纪。他一生(1473—1543)处在文艺复兴盛期的几十年里，宗教改革和新奇的特征对开启和塑造他的研究工作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61)

库恩这一折中主义和多重研究的方法符合史学家长期以来看重的习惯。中世纪的贡献没有被忽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背景和前景仔细分开了——或许比通常仔细，所以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关系避免了。土耳其人的威胁产生的远方回响、新教反叛、民族国家的兴起、新兴商业贵族的崛起——作者都给予了小段的文字。给予显要篇幅的变化有：使托勒密《地理学》失去威望的远航探险，推动哥白尼修订托勒密《天文学大全》的历法改革，促进托勒密文本重构的希腊文化复兴。最后，作者用比较长的篇幅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认为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给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指出意义重大的新方向，尤其塑造了哥白尼的数学雅趣，促成了他对日心说假设的偏爱”(62)。

讨论过新柏拉图主义运动以后，“观念的舞台置景”就被认为是完成了。一切“开启和塑造哥白尼工作的新颖的特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概都登台亮相了。虽然和哥伦布、路德、马基雅弗利和加尔文相关的运动产生的遥远的回响都得到了承认，但谷登堡发明的后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库恩没有提及新投入生产的

印刷机，你不妨由此而推断，16 世纪的天文学家查阅的技术文献仍然是用手抄写的。

594

我们说印刷术的出现在这里应该被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主张在业已拥挤的舞台上支撑另一块道具。我们不请求“负担过重的史学家”在给他那张“文艺复兴特征”很长的清单上再加上一个项目，甚至不请他们重组这个清单，以便给印刷术“过高的排位”(63)。相反，我要建议：为哥白尼革命提供恰当舞台的问题必须要全盘重新考虑。

一旦把手抄书和印刷文化的转变纳入我们的记述，目前的舞台似乎就需要在重要的关节点上进行调整。首先，被人挑选出来当作哥白尼工作最重要的几种“新奇现象”，并非完全是新奇的，可能过去就已经登上舞台。远航探险在哥伦布之前业已发生；中世纪学者在西西里研究过希腊语的托勒密文献；历法改革的压力一向受人尊敬，就像令人尊敬的比德①(稍后详细讨论)。其次，除非把印刷术纳入我们的画面，否则哥白尼摒弃托勒密天文学的态度究竟新在何处是感觉不出来的。他反对“托勒密传统的扩散和长期的差错”(64)。就此而言，他反对的特征是靠手抄传播的一切文本的特征。如果说他和以前的天文学家有所不同，那是因为他们长期维持了手抄书的传统，是因为这些“可怕的”特征变得更清楚了，而且，他可以不再忍受这些“可怕的”特征。

这不是说，文艺复兴的“思潮”在哥白尼的工作中微不足道。无疑，经院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观点对他尝试的解决办法起到了一定的决定作用。他认识到，一些古代的权威相信日心说或地动说，这样的认识得益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比如乔治奥·瓦拉(Giorgio Valla)在文艺复兴时期编选的古籍。(65)他拥有几种人文主义者新编的古籍，他拓宽了古人宇宙论的意识和天文学理论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当然都得依靠机印书。(66)日益增多的文本似乎和一种高涨的关切有特别的关系：“数学家不能始终如一”。此外，我们还必须谈一谈他推算出新结论的机运，他把太阳和地球的方位颠倒过来，用详尽的算法把托勒密的公式重新计算了一遍。印刷术以前的欧洲天文学家有这样的机会吗？我们试图理解哥白尼革命的时机以及促成这一时机的因素时，难道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595

> 时间的流逝……提出了一个伪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伪问题比行星的真实运动情况更让人相信；而行星的真实运动情况使人能够辨认托勒密方法中的错误。哥白尼继承的大量数据……是错谬的数据……有些错谬的数

① 比德(Saint Bede，673—735)，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神学家，在神学、史学、哲学等方面均有研究，代表作有《英格兰人教会史》。

> 据是不称职的观测者搜集的，其他一些错误则是在抄写过程中的……笔误或传输过程中的误置……文艺复兴时期的数据表现出来的问题的复杂性比天体还复杂……(67)

产生这个伪问题原因的不是“时间的流逝”，而是手抄书文化的历史条件。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伪问题，但它又是千真万确的问题。即使天文学家意识到自己继承的数据有误，他们在制止这样的错漏趋势中也无能为力，变易之中的文本是漂移之中的星球的不确定的记录器。此外，只要人们不得不依靠一套看似权威的文献，对错误的知觉就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只要行星的位置不得不依靠托勒密的教诲去计算，就不可能把“天体本身”用作独立的审核标准。“托勒密第二”的哥白尼提出另一套完整的教诲，他就使天文学家从完全依靠“托勒密第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有两位托勒密而不是一位托勒密可以请教以后，这个时期的天文学家就能够辨认错误了，至于他们何以能够辨认错误，可见于人们经常引用的年轻的第谷·布拉赫的一件趣闻轶事中。第谷悄悄地从老师那里拿走天文学书籍，以便晚上挑灯夜读，这就是他自学天文学的趣事。第谷买到了(托勒密式的)《阿方索星表》、(哥白尼式的)《普鲁士星表》和斯塔狄乌斯(Stadius)的《星历表》(以《普鲁

士星表》为基础)。

> 不久，第谷就掌握了这些星表，并且感觉到书中计算的行星位置不同于它们在星空中的实际位置……他甚至发现，斯塔狄乌斯用莱因霍尔德的《普鲁士星表》计算出的位置是正确的。16岁的第谷大开眼界，他看到了伟大的事实，我们今天觉得很简单，但他之前的欧洲天文学家却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这就说明，唯有通过坚持不懈的长期观测才有可能更好地洞察行星的运动。(68)

第谷“大开眼界”，他看到了获取新数据的必要性，部分原因是，他比以前的观天人掌握了更多的古籍。早在少年时代自学时，他就能够比较哥白尼和托勒密，就研究从他们的理论衍生出来的星表。(69)古籍中关于行星交会的预测矛盾重重，促使他重新观测“星空中书写的星图”。他搜集新的数据，得到了新近锻造的数学工具，使他在判定星球在星空中的位置时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第谷的研究模式并不完全像“用旧工具观测旧对象时看到新事物的天文学家”(70)。在第谷的时代，机印的正弦表、三角书、星体目录等的确是新的对象和工具。作为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依靠书本掌握天文学的学者，第谷本人就是一种新的观察对象。

由于他没有望远镜却能够看到天空中别样的“书写”，而且在这个方面胜过以

前的观天人，这位丹麦天文学家给科学史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

> 不需要第谷·布拉赫的精致工具也可以发现，新星与彗星比月亮遥远……梅斯特林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断定，1572 年那颗新星比月亮还遥远……加速传统宇宙论崩溃的观测……其实从远古时代起的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进行的。在第谷出生两千年前，这样的现象和工具都已经具备了，然而，那样的观测并没有人做出来，或者即使有人做出来了，其结果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解释。在 16 世纪后半叶，古已有之的现象迅速改变了意义和重要性。如果不 *597*
> 参考科学观念的新气象，那些变化似乎就难以理解，这种科学观念的杰出代表之一就是哥白尼。(71)

你禁不住要问，稍纵即逝的星象事件在分散观察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不能与其他的观察协调、核对并确认，“新星与彗星比月亮遥远的性质”如何能够被确定下来呢？只要分散的星象观察是用手抄本的形式传播的，只要分散的观天人缺乏统一的方法去定位和记录观察所得，只要最精细的观天人都尚未掌握三角，流星就不能永远定位在比月亮更为遥远的空域。(72)“为纯粹过渡性、短暂性的星象寻找轨道的愿望，标志着对彗星的理论解释中一个重要的变化。”(73)也许，重要的观测并不需要第谷的“精致工具”，但梅斯特林的一根线不足以确定稍纵即逝的星象并对其定位，并不足以让人清楚看到这样的事件与传统天文学矛盾的地方——那倒是毫无疑问的。(74)

为了弄懂“古已有之的现象”何以在 16 世纪快速发生了意义上的变化，值得我们追溯到哥白尼以前、第一台印刷机在美因兹投产以后印行的越来越细密的彗星观测记录。(75)在此，雷乔蒙塔努斯又像是地位显赫的先驱，他身后出版的论 1472 年彗星的书以及他那推算未来彗星离地球距离的 16 点计划都具有重大意义。到 *598*
梅斯特林的时代，这个 16 点计划的大部分目标都已经实现了。各种判定视差的方法都在数学家笔下描绘清楚了，彗星观测报告催生了大量分散的文献，彗星目录的编辑出版也应运而生。1533 年的彗星挑起了分散观测者的笔仗。到 1541 年，雷蒂库斯致信一位维滕堡同事说：“在这个方面，彗星兴起于比月亮更加遥远的星空，”这一点广为人知。(76)源源不断的出版物使公众的兴趣和好奇心高涨。1572 年的新星吸引了欧洲各地的观星人，观星的人数前所未有。(77)第谷公布他的观测结果时说，他好不容易“才压倒许多人的喧哗之声”(78)。在这场空前的热闹场面中，他大获全胜；这颗新星消逝很久之后，“第谷之星”还在月球之外的星空中闪光，天文学家不可能忽视它，编年史家也不可能误置它出现的年代。“1572 年到 17 世纪末，几乎每一张星图和地球仪都显示，这颗新星……曾经在哪里出现，促使天文学家注意它下一次的回归。”(79) *599*

印刷术出现之前观测到的星象无法准确定位，因为无法长期保存，不可能将这样的事件与某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任何详细的记述进入各个领域后变得比较模糊，都难以避免这样的后果。就像许多世俗的事件一样，一旦被编织进生活的画面或写进修士的编年史，原本界限分明的事件就会混合为一个神秘的范畴[80]；常规的形象和标准的公式就会使仔细记录的细节模糊不清。耶路撒冷始终居于世界的中心，彗星始终位于月球的下面，两者都不可能长期脱离其被指定的位置，直到手抄书稿的传播形式走到尽头。

599 “用金色标注的星星是第谷勋爵发现的；其余星星和古人的观测对应。”这是英语译本中的一句话，放在威廉·詹森·布劳(Willem Janzoon Blaeu)从1596年到1599年设计制造的天球仪的上方。[81]布劳“极其精确的天球”不仅清楚标明了古代最伟大的观星人的记录，而且追加了这位伟大的现代天文学家观测到的星象；该书还明确断言，无畏的探索者超越了已知的世界，必然会发布更多更令人激动的新闻。

> 有些接近南极的星星躲避我们观测的目光，但其辉煌并不亚于位于北方的星星，无论观测纪录或编年史家的记录都说明其光辉，不过具体的描绘并不是很确定，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记录对它们的观测。[82]

布劳在16世纪90年代的书里省略的南极星象到1600年就由一位竞争者填补了。这说明追求利润的印刷商的竞争如何加速了数据的搜集，如何将数据搜集在新的道路上推进；同时说明，分散的观星人又是如何合作的。正当布劳即将完成他制作的图版时，一支远征队正在回程的路上，带着前人未曾测绘过的星空的记录回来了。“16世纪末，两位荷兰人……有时一起工作，他们率先系统地对南方星空展开组织和分类的工作。”1595年到1597年间，两人乘“荷兰号”航行到东印度群岛，记录了南方星空的观测结果。其中一位是引航员，在航海途中去世，但他记录的数据被带回阿姆斯特丹，交给布劳的主要竞争对手约昆狄乌斯·洪第乌斯，被用于洪第乌斯1600年印制的天球。这个天球展示的新发现的星座不下14个。

> 毫无疑问，布劳指望他印制的第一个天球大受欢迎、广泛流通。然而情况正好相反，出版不久，他的书就过时了。他无可奈何，只好将其从市场上收回，重新制作一个新的模型。[83]

600 印刷时代的重新起步和手抄书时代的重新起步迥然有别。1602年，布劳印制了一个尺寸较小的更新后的天球，内含荷兰人远征带回的新鲜数据，而且记录了他自己独有的全新观测。1600年8月，他在天鹅座观测到一颗第三星等的新星，于是他把自己的观测结果记录在自己的天球上，这颗新星不断被复制，即使光亮淡

出、肉眼不可见以后仍然被复制。[84]而且，他的工作从未真正全部推倒重来。他为天球制作的大型图版太珍贵，不忍割舍，所以经修订以后，到 1603 年，他还在继续使用。这一版的天球就成为“如今著名的 1603 年的 34 厘米天球”，他的名字和他的恩师“第谷勋爵”的名字一道在书名页上展示，令人注目。[85]

据怀特曼记述，第谷·布拉赫追求的研究计划成为后世皇家学会的特征，他是从事这种研究的第一位西方人。[86]斯普拉特主教强调指出，第谷是新型天文学家的先驱。这类新型的天文学家“研究天文学，不仅使之成为一时的风尚或依靠幸运机会的事业，而且使之成为经久不衰的事业，一种稳步、持久、普及、连续不断的事业。”[87]第谷在天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实至名归，说他受“幸运机会”惠顾是说他生之逢时，并不会使他的名气减少分毫。无论其天才是多么的出类拔萃，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天文学这种宏大的合作工程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无论其寿命多长，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保证使天文学成为稳步、持久、普及、连续不断的事业。天文学的“经久不衰”超乎任何一代天文学家的控制范围，遑论肉体凡胎的任何个人。莫城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eaux)曾经每晚观测 1315 年的彗星，第谷稳步观测以获取新数据的持久计划并非前所未有。[88]正如哥伦布之前有维京人发现新土地一样，第谷之前也有细心的观星人在努力。前所未有的(新星和新世界一样)是，记录和证实观察所得天象的方式改变了。

601

上文或已表明，试图解释“古已有之”的天象比如 16 世纪有关新星和彗星的新观点时，有必要考虑印刷术带来的变化。泛泛地谈论动荡的时代，甚至召唤比较具体的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科学思想的新气候”都不足以解释“第谷新星”之类的现象。哥白尼师从意大利学者比如多梅尼柯·玛利亚·诺瓦拉(Domenico Maria de Novara)等人时，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潮的确对他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年轻的丹麦贵族第谷并没有接触到类似的思潮。实际上，第谷踏上天文学研究的道路时，他没有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靠自学。他利用印刷品学习，绕开了传统的师徒关系。由于不受当时主导宇宙论假设的束缚，他坚守了自学成才的天文学家异乎寻常的立场。[89]在第谷的天文学里，对称和太阳崇拜退居次要的关怀。[90]其天文学涉及不同于哥白尼的审美或形而上的关怀。这两位天文学家没有那种互相欣赏的联系，没有相同的古典传统或基督教文献传统。[91]作为 16 世纪的天文学家，他们之所以和前人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这种或那种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免于繁重的手抄和记忆，他们可以利用新的纸媒工具和机印的书籍了 。

无论 16 世纪的天文学家接触的是公元前 4 世纪的古籍还是公元 14 世纪比较新鲜的文献，无论他们是更容易接受经院哲学思潮还是人文主义思潮，在利用纸媒工具和机印书籍方面，这些问题都不那么重要，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各种各样的材料。对哥白尼和第谷，结果都是一样的：对千百年传承的文献

602

有差异的意识提高了，不满意的感觉也增加了。

>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上能干的天文学家首次摒弃了本学科内在的、悠久的科学传统……在此之前，这一传统并不显得可怕。到了哥白尼的时代，这一传统巨变，哥白尼的序言生动而令人信服地描绘了天文学家感觉到的这一巨变的种种原因。(92)

哥白尼的序言强调权威学者观点的多样性，他们描绘的“太阳、月亮和行星运行”的图式是难以调和的。他以前的学者“对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很没有把握，以至于连解释或观察季节周期年的恒定长度都难以对付”。这些体系并排展示时不可能表现出一致性；“他们既不使用相同的原理和假设，又不演示明显的运行和周期”(93)。太多的教科书过分夸大哥白尼对托勒密天体机器复杂性的不满。(94)只有少数的学者清楚地说明了哥白尼原话的意思：“数学家在这些天象研究中不一致，仅此而已。”(95)在许多人的记述中，哥白尼对托勒密天文学的不满难以和外行人的不满区别开来，仿佛哥白尼在复杂的运算图式面前一筹莫展。然而，哥白尼的反应不仅要和阿方索十世[①]的反应区别开来，而且要和后世对所谓“科学革命”作出贡献者的反应区别开来。他的反应不是建立在漫长“常态”研究中微小差异的积累上，也不像后世的牛顿批评者的反应，他不仅针对托勒密天文学理论的不足(96)，他还在表达自己的关切：他发现，没有一种理论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始终如一的一
603 致性。

哥白尼的评论既指明整理前人天文观测资料的难度，又显示了前人模式之难以协调：前人使用五花八门的计算图式，所以他们留下的文献难以整理；他们推出的模式“的构造成分都很有道理，但难以组合成一个整体”(97)。在这两种情况下，令人厌烦的主要因素是不一致造成的。

> 哥白尼及其同时代人不仅继承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而且继承了许多伊斯兰天文学家和一些欧洲天文学家的理论，而这些人又批判并修正了托勒密的体系……统一的托勒密体系不复存在，天文学体系有十多种，而且其总数还在迅速增加，技术上娴熟的天文学家也在迅速增多。(98)

许多不协调的理论快速增加可能和这一事实有关：印刷商开始创业以后，机印的书籍增多。然而，无论哥白尼有多少同行，无论雷乔蒙塔努斯在世时欧洲天文学家多么稀少，印刷术出现之后，天文学家的人数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书籍那样地“快速增加”。这段引文提出的数字不太确定，但有一点事实是可以确定的：技术上娴

---

① 阿方索十世(Alfonso X，1221—1284)，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国的国王，编有《七法全书》。

熟的天文学家、16 世纪初能用上托勒密《天文学大全》的天文学家相当少。[99]“对哥白尼那一代的欧洲人而言，行星天文学几乎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100]

604

倘若行星天文学对哥白尼那一代人“几乎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就不太可能是“常态科学”瓦解的领域。杰罗姆·拉维茨认为，16 世纪初的科学组织并不严密，不符合后来历次科学革命的模式。[101]拉维茨的看法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观点非常吻合。手抄书文化传播产生的模式和印刷术以后的信息流截然不同。产生亚历山大人成就的条件不是“常态”，而是异常的特例。反复转抄以后仍然精确的星表也是例外。那时的人还在谋求给每一颗行星绘制轨迹，“万物井然有序的、牢牢扎根的期望”不可能是他们的特征。

换言之，16 世纪的欧洲天文学家刚开始利用技术上的“突破”，继续不断的技术进步刚踏上稍后出现的“常态”道路；这时的天文学家还没有看到“常态研究”前所未有的“瓦解”的局面。[102]那时，“常态的”解谜工作才刚刚开始，讹误丛生、顺序错乱的文献才开始清理，新鲜的观测资料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搜集。因此，把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序言描绘成天文学“危机状态的经典描写之一”似乎是不妥当的，把他摒弃托勒密的原因说成是“常态的技术解谜的瓦解”[103]，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 16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最优秀的欧洲天文学家认识到，天文学范式在解决传统问题上是失败的。这样的认识是哥白尼摒弃托勒密范式、寻求新范式的先决条件。[104]

605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天文学家面对的主要的“传统”问题是教会历法问题：他们始终不能校正复活节和春分的关系。意识到这一不足可能是哥白尼革命产生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并不必等到 16 世纪“越来越多最优秀的欧洲天文学家”来认识。从欧洲中世纪早期开始，这个问题一直是基督教教士们的关切。

倘若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天文学家有可能完成“常态”的解谜工作，立法改革似乎应该早在哥白尼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但对 16 世纪的西方天文学家而言，从技术上充分掌握亚历山大人和阿拉伯人的历法计算仅仅是不久前才刚刚完成的事情。与此相比，立法改革的压力，“使天体运动之谜特别紧迫的压力”是 13 世纪罗杰·培根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特征。实际上，教会就主张天文学研究，而且在恢复亚历山大时代科学文献中作出了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之所以对天文学感兴趣，就是因为天文学有助于解决历法这个永恒的问题。“历史上呼吁历法改革的基督教学者络绎不绝。”许多教皇对历法改革特别感兴趣。在多届教会公会议上，这个问题都显得很突出。[105]

这使人联想到确立古三语研究的过程。在哥白尼时代，感觉历法有误并不是

新鲜事；正如修正拉丁文《圣经》需要通晓三种语言的学者一样，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并不新鲜。[106]像拉丁文《圣经》的修订一样，历法改革的新奇性在于达到长期渴望的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步骤上。虽然千百年来一直有人鼓动历法改革，但历法改革的具体实施却反复受挫，受挫的原因尚待阐明。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任何两位学者会持相同的意见。（哥白尼的工作对最
606 终得到贯彻实施的格里高利的历法改革究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还是与之无关呢？这个问题难以查清。）[107]大多数人的记述都暗示，官方的惰性是主要的原因。人们难得谈论未解决的天文学问题，所以就难以判断，这些问题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还是根本没有起作用。有些人的研究只是说，那需要“简单的算术和常识”[108]。另一些人暗示，哥白尼着手工作之前几百年，那些技术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儒略历改革有限，是一个量的问题，中世纪的天文学家业已着手解决而且事实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109]显然，13 世纪就有人从事短期的儒略历改革，而且进一步改革的方针已经提出来了。[110]然而，对古罗马的历法进行修补并不等于完全取代它，中世纪的历法改革似乎并没有完成取代古罗马历法的任务。雷蒂库斯代表自己的老师哥白尼抱怨说：“在改进历法的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列举各家计算的各种年的长度。但其做法相当混乱，且没有做出结论……”[111]

在手抄书时代，在这类问题上要做出可靠的结论是极其困难的。据杰罗姆·拉维茨记述，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低估完成格里高利所需要克服的技术困难。他认为，完成这一改革并不像后见之明（以 18 世纪高斯计算公式为基础的事后诸葛亮）那样容易。在他看来，只有透彻理解“历代天文学记录之不足”以后，格里高利历改革才可能发生；哥白尼的研究就是要了解历代天文学记录之不足。[112]如果拉维茨此说不错，彻底的历法改革之所以难以达成，手抄书文化环境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更
607 加突出的。

有人将历法改革的长期延宕归咎于“应用科学成果中的制度阻力”，并且认为，这样的延宕与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延宕类似，英国人的历法改革推迟到 1752 年，俄国人的历法改革推迟到 1918 年。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似乎会使人误入歧途。[113]中世纪的官员难以确定何谓“科学成果”，除此之外，他们受制于这类成果“出版”上遭遇的困难，且难以保证这类成果得到统一的采用。制度上的阻碍和态度上的不情愿都必须要纳入考虑的因素。

> 在每 308 年为一个周期的时间里，准备并发布一个新的金数（Golden Numbers）表，以实施这个小小的修正，那应该是极其简单的小事。但这一小事并未实施。显然，对革新的惧怕或者对已然确定的金数表的迷信阻碍了任何变革。[114]

首先，金数的修正看上去“简单”，那只是在恰当的公式被设计出来之后。后来人们才知道，在 308 个回归年的周期里，每 19 个儒略年的 235 个朔望月里总是要少 1 小时 29 分钟。[115] 在这样的调整做出之前，历法的计算绝不会是简单的。其次，制订历法的天文学家不太愿意告诉官员，每 308 年就必须要修正金数表，那是明智的，而不是“迷信”的；手抄书时代没有办法出版“勘误表”，任何抄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都可能发生变异；倚重口头传播的局面意味着，任何修正都必须要改变记忆里的公式——而修正记忆公式的确是危险之举。主日字母[①]在铅印的星表里展示出来以后，培训教士去读历书就比较容易了。然而在此之前，研究 13 世纪到 16 世纪的历法计算的牛津的教士们却需要令人生畏的记忆力。他们必须要记住 160 行六步格的诗，为此，他们要将每一根手指头分为 6 节，10 根手指头的 60 节全都用上。[116] 在机印本的历书出现之前，仅仅“寻找一个与某个周日对应的某月某日”就是“极其艰难的数学壮举”[117]。

鉴于确保顺应既存体制有一定的困难，任何“惧怕革新”都是有理由的。无论如何，把历法改革的延宕归咎于“教会的内部争吵”，致使教会 16 世纪末之前都不能够采取任何措施——这样的观点似乎是受了误导。采取改革措施以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争吵并未减弱。库恩做出的解释更加似是而非，他认为王朝国家的扩张和官僚体制的萌芽是改革受阻的原因，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加令人生疑。他说：“……政治、经济和管理单位以效率和统一确定日期的手段为优先考虑的因素，”这一说法似乎本末倒置。[118] 16 世纪的新事物不是赋予历法较高的价值，而是达到这一长期渴望的目标的手段。从一开始，历法改革就是教会主持并提倡的工作。世俗的政客根本不重视历法改革，所以稳坐交椅的新教官员甘愿向反教廷的情绪低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乐意将历法改革往后推。

赋予历法改革优先地位的是中世纪的教士，而不是近代早期的国家官员，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指明了西方科学里一些被忽视的根源。历法问题的研究是基督教信仰的神圣关怀的副产品，这一信仰以纪念耶稣复活的奇迹为中心。尼西亚公会议对复活节做了界定，于是，西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着手研究手抄书时代规避的一套问题。基督教社会特别重视这样一个神圣的节日，它对太阳表和月亮表里的错误特别敏感，它坚持不懈地试图解开春分运行之谜。还有比基督教社会对这样的错误更敏感的吗？[119]

像多语版《圣经》一样，和伊斯兰历法的简易性比较，基督教会历法之复杂性最容易看清。穆罕默德说：“我们这个民族不书写，不计算。”虔诚的穆斯林计算月份

---

① 主日字母(Dominical letter)，以 ABCDEFG 等 7 个字母分别代表一月份的首 7 日。

的流逝时，他们不需要 60 个指节，也不需要数百行 6 音步的歌谣，他们只需要 10
609 个指头伸出三次，第三次把大拇指屈起来。[120] 基督徒在尼西亚公会议上把闪族人的历法搞复杂了，而穆罕默德则使之大大简化，他不设闰日或闰月，忽略太阳的周期。每一年被等分为 12 个朔望月，四季变化和斋月无关。在千百年里，穆斯林历法和太阳周期有理由不协调（如今相差四十年），但日益增加的差距并没有带来麻烦。穆斯林“调节时间图式时干脆就忽略自然规律”[121]。这并不是说，穆斯林的一切神圣关怀都漠视自然规律。比如，在一个日益扩张的帝国里，一切清真寺朝向麦加的要求可能就推动了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研究。[122] 但基督徒面对的则是另一套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天球时钟结构的运行和他们一年一度在复活节庆祝的耶稣复活奇迹越来越不协调了。

在中世纪，时间上游移不定的复活节盛宴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汇点：天文学与编年史、神圣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在此交汇。不仅太阳周期和月亮周期难以协调，而且犹太人的逾越节也必须避开基督徒的复活节。古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时间图式是
610 必须要掌握的。春分运行之谜不能够搁置起来，《福音书》里的矛盾也不能够置若罔闻。[123] 复活节时间计算中的问题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基督教的天文学家直到牛顿时代始终执著于《圣经》纪年[124]，为何基督教士喜欢回溯到圣比德的时代，为何他们殚精竭虑绘制行星图、编纂潮汐表，他们又如何将计算的秘密传授给后世的教士。

> 经统计计算的文献大大促进了星表和图示的使用。虽然星表有许多错误……但其构造至少刺激了科学推论……这样的天文学图式技法对 14 世纪人将其用于研究位移问题和质变问题产生了影响，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未经证实。[125]

马歇尔·克拉吉特在这里描绘的中世纪早期符号不仅对 14 世纪力学的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而且还直接指出，天体天文学包含在基督徒神圣的关怀里。这些符号证明，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重新进入西方之前，教会学校里已经表现出对一致性、规律性和数学秩序的关怀。强大的“确定、精准思维的习惯”在基督教文化中长期扎根以后，“辩证法狂热”才出现。当然，在专业的天文学家之中，这一习惯还可以回溯到基督纪元前。然而，即使古代天文学失传以后，即使在它被恢复之前，有意掌握计算技术以便成为教士的新手还是要被灌输精准思维的习惯。由于这个貌似悖论的习惯，基督徒这个最神圣的节日使之将精力倾注于解谜的纯科学活动了。

在这个方面，你可能不同意有些现代学者的意见，他们把最近的一场争端投射到过去的科学与神学争论里去。对中世纪教徒的虔诚而言，“彗星和怪兽比每天的

日出和生养正常的子女重要”[126]。即使在我们今天不太虔诚的时代里，怪事的新闻价值还是超过了普通事件的价值。人咬狗比狗咬人的新闻价值高，就此而言，教士编年史家与现代新闻记者的共同之处比较多，与中世纪自然哲学家的共同之处比较少，这些哲学家描绘行星的运动，研究潮汐的涨落。每天的日出是天球时钟结构的一部分，但日出始终与复活节不协调；就此而言，虔诚的教士绝不能忽视，这是他们持续不断关怀的源头。对超自然事件的信仰促使有学问的教士坚持不懈地研究自然的秩序。他们渴望在恰当的神圣日子里纪念耶稣复活的奇迹，这使他们反复研究非奇迹的天体周期运动。 611

印刷术之前，关于“天体如何运行”的研究与“如何进天堂”的宗教关怀携手并进。人们需要天文学家在纪念福音真理中助一臂之力。然而，印刷术以后关于天体构造的研究被推进到另一个方向；很快，这个方向的研究就达到了精深的水平，历法问题的研究就被远远抛在后面了。而且，随着铅印星表的增加，培训教士掌握计算年历的工作就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功效。复杂的记忆术、羊皮纸卷以及“复活节、金数、主日字母、耶稣受难的细节等旨在帮助历法推算的设施曾经困扰研究学问的教士”[127]。有了印刷术以后，这一切困扰都隐入记忆，淡化为迷迷糊糊的哥特式历史了。在中世纪，聪明的成人的确沉浸于幼稚的歌谣比如“九月里啦有三十天……”在“启蒙”时代学者的眼里，这样的歌谣使中世纪人显得莫名其妙地“迟钝”。此后，教士和天文学家分道扬镳，到了今天，谁要去回想两者曾经携手改进历法，那就显得稀奇古怪了。

和《圣经》研究引起的语言问题一样，复活节的推算会引起历法问题，这种问题对印刷术带来的变化特别敏感。《可兰经》不像拉丁文《圣经》那样推动人们去掌握新奇的语言或挖掘古代的抄本。斋月不像复活节那样给人以动机去超越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去判定星体长期的缓慢运行。相反，神圣的复活节和《圣经》使基督教学者向手抄书文化强加的极限冲击。特殊的宗教动机提供了初始的动力，但在后人的眼里，这些动机好像成了渎神的“浮士德”追求。 612

在引发哥白尼革命的《天体运行论》中，这种特殊的宗教关怀是显而易见的。起初，哥白尼着手修正托勒密天文学，并没有多想历法问题。[128]尽管如此，在他人生的最后 30 年里，在修订这部巨著的过程中，对历法问题的关怀的确指引着他的研究，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有整整十年，他“集中研究季节长度不均等的问题，并解释不均等的原因”[129]。他坚持不懈的研究并非没有产生重大的成果：

> 在哥白尼成熟的《天体运行论》里，固定的拱点线被运动的远日点取代。
>
> 毫无疑问，这一发现和哥白尼加强研究年的长度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其研究基础是仔细审视前人的成果。有人说，哥白尼太相信前人的观测。但在

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轻信，因为他发现两位前人观测的太阳远地点不一致，他必须在这两位最杰出的中世纪伊斯兰天文学家中做出选择。(130)

由此可见，雇请史学家和天文学家帮助历法改革和聘用通晓三种语言的学者修订《圣经》，是非常相似的。米德尔堡的保罗敦请哥白尼研究第五届拉特兰公会议(the Fifth Lateran Council)没有解决的历法问题，这其实是许多有学问的教士做过的事情。接受这一委派时，哥白尼扮演的其实是传统的角色。(131)然而，对天文学家和对《圣经》学者一样，当印刷术这种新手段辅助人追求旧目标时，往往会产生
613 意料之外的成果。哥白尼着手改革托勒密天文学和伊拉斯谟着手修订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一样，其目的是效命教会，而不是颠覆教会。“也许，从来没有如此保守而沉静的思想家像伊拉斯谟这样对人的思想和心灵产生过如此之大的影响……”(132)

《天体运行论》想必是一个常恒的谜团和悖论，因为……它相当平静、冷静，不具革命性……除了地球运动之外，《天体运行论》各方面都接近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家的著作……而不是接近后代天文学家的著作……后人阐述了它产生的激进后果，但那是连作者本人都没有看到的后果……(133)

如果考虑印刷术产生的新力量，哥白尼这部“冷静的不具革命性的书”产生的“激进的后果”似乎就没有那么令人困惑了。目前的事态是，这些力量主要局限于和宣示及宣传有关的功能。在路德反叛的早期，印刷术的力量的确放大得赫然在目；然而，在哥白尼革命的早期，这些力量却隐蔽到接近消失点的程度。但应该指出，无论是用于传播路德派的小册子还是被用于传播哥白尼的理论，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的面目却姗姗来迟。早期印刷机在历史舞台上的地位要等到 1517 年才得到承认，印刷机的变革作用随后才得到宗教改革研究学者的承认。自此，印刷机就被委以重要的功能。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创造了畅销书的记录。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柯斯特勒的断言，你都不得不承认，比较而言，路德引起轰动，而哥白尼被接受的情况却是很低调的。据柯斯特勒记述，哥白尼身后问世的《天体运行论》“引起的轰动比不上雷蒂库斯首次对该书的转述。雷蒂库斯担保，这本书给人启示；实际上却令人失望……无论在公众中或天
614 文学家的圈子里，它都没有引起什么争论……”(134)

但许多学者认为，虽然哥白尼未能引起广泛注意，但情况并不如柯斯特勒描绘的那样令人扼腕。比如，怀特海就作了这样的对比：近代科学“悄悄地”兴起，而“普及的”宗教反叛“使欧洲沉入血海”。其意思是：胆怯的科学家是优秀的基督徒，他们胜过爱争吵的教士。他说：“自圣婴在马槽里降生以来，如此伟大的事情竟然只引起如此之小的轰动，这是可以存疑的问题。”(135)库恩认为，《天体运行论》被“悄悄

地接受”有助于其颠覆的宗旨。他说，由于哥白尼这本书“除少数博学之士外谁也看不懂”，实际上就锻造了“一件近乎理想的武器”，为未来的斗争做好了准备。等到反对力量动员起来时，专业天文学家已经习惯依靠他的数学技法，习惯从一颗运动的地球去计算行星的运动了。地动说遭遇官方强烈抨击前，它已经取得了“渗透的胜利”。库恩甚至说，印刷术使人难以“完全压制这本书”，这就有助于巩固它取得的胜利——这一观点似乎值得一辩。(136)

对《天体运行论》的有效反对之所以最终受挫，是不是因为它是机印书而不是手抄书呢？这个问题还值得一辩。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早期印刷商扮演的角色不那么引人注目，他们在哥白尼革命中的角色比在宗教改革里的角色更令人生疑。16 世纪的印刷商没有像支持路德那样支持哥白尼的事业，而且他们还为普及托勒密的天文学观点做了大量的工作。(137) 已如上述，他们倾向于支持托勒密“错误的”天文学理论，这一点常常被人用来警告我们不要夸大印刷术的影响。这一过分夸大的论题最拙劣的版本见诸一卷评论集，文章作者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版画部的部长：

> 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之前，印刷商倾向于让科学创新成果以手抄本形式保存。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因为 1543 年约翰·开普勒证明行星绕太阳而不是绕地球运行时，他开创近代天文学的论著销售得如此之慢，以至于在 23 年之内都不必重印。(138)

只要早期印刷商的功能被局限于“新思想的传播”，只要他们与改宗和宣传联系在一起（甚或与颠覆和渗透联系在一起），他们与新天文学打交道时似乎就不太有效，与新的福音传道方法打交道时却是比较有效的。当然，《天体运行论》和路德的《圣经》及小册子比较就显得是“销售最差的书”。但这样的并举也会使人觉得，维萨里写了一部“销售最差的”《人体的结构》。

> 维萨里的书并未获得它应该得到的大胜；经过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他大胆推出的真相才站稳脚跟……盖仑的教诲继续在大学里占据重要的地位，且长达一个世纪……(139)

在当今的许多概论书里，16 世纪的许多解剖学书籍和天文学论著一样可能会遭遇到“文化滞后”——虚幻的滞后，因为这些概论书所持的“滞后观”忽视了“事后之明”赋予今人的各种优势。倘若盖仑和托勒密的“错误”理论在 16 世纪后半叶继续流通、继续在大学里传授，部分原因是：开普勒和哈维的“正确”理论尚未充分阐述清楚。自然，16 世纪的印刷商和教授不能预见到开普勒和牛顿对哥白尼著作的接受和理解。《天体运行论》技术性强，难以理解，而雷蒂库斯的《天文学初步》却出

616 了5个版本;有鉴于此,巴塞尔的印刷商海因里希·佩特利(Henric Petreius)认为,《天体运行论》在首版二十三年之后值得印第二版,这倒是令人称奇的。[140] 1617年,布劳的阿姆斯特丹印刷所才认为它值得出第三版。[141]

我们已经看到,《人体的结构》和《天体运行论》差别很大,两位作者对印刷术的态度也差别很大。然而,比较1543年出版的两篇科学论著似乎更恰当,而不是再把哥白尼和达尔文及马克思并排——而且还把路德也加进去进行比较!

> 达尔文革命如迅雷闪电,马克思革命却经过了七十余年的孵化。哥白尼革命……的传播最缓慢、最迂回;这并不是因为印刷机才露面,也不是因为哥白尼的课题很朦胧。路德的论著不能像《天体运行论》那样简约为一句口号:"不是太阳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太阳转",尽管如此,他的论著却立即引起了全欧洲的动荡。[142]

实际上,地动说在《天体运行论》出版前几十年就已经发布了。"地球动太阳静"的观点早在1514年哥白尼的一本小册子里就宣示过。[143] 柯斯特勒本人就提到卡尔卡尼尼(Calcagnini)那本书名里吸引人的"关于天体如何静息、地球如何运行"的噱头——这本书的灵感大概来自库萨,其宗旨是"呼应非常流行的……思想"[144]。使《天体运行论》不能成为畅销书的障碍不是它缺乏吸引人的口号,而是

617 它那冗长而繁复的计算。没有迹象表明,这本书的少数读者感到失望;没有迹象表明,哥白尼大部头《天体运行论》的出版使读者感到,雷蒂库斯的《天文学初步》激起的希望破灭了。相反,事实证明,这位"托勒密第二"的壮举甚至给那些未能采纳他观点的16世纪天文学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45](一本"难以卒读"的书常常使人感到敬畏,人人能读懂的书岂能与之相比,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被人接受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感到失望的是20世纪的科学记者,这是他们翻阅《天体运行论》时的感觉,因为据称这本书启动了哥白尼革命。在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日心说并不缺乏吸引人的意义,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读到"最悠久的毕达哥拉斯学说最近被哥白尼修正了",他们似乎并不失望。[146] 尽管如此,哥白尼的假说并不像新近的皇家婚礼或教皇的当选那样吸引读者的注意。就天体被认为有新闻价值而言,围绕既定天体关联意义的争论可能会吸引大量写小册子的人。

对科学史家而言,雷乔蒙塔努斯之所以有新闻价值,那是因为他编辑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星历表》,他身后还为后人提供了一本三角学

618 的开山之作。他去世一百年以后,他的一首关于世界末日的占星术诗歌依然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文人非常激动。[147] 16世纪有关预兆和预言的书籍不应该被视为纯粹的垃圾而被嗤之以鼻。正如上文对第谷新星的讨论所示,有用的观测可能是公众高涨情绪的副产品。《星历表》的市场扩大了,占星术工具制造商就可能红

极一时，对日月食和天体交汇的强烈兴趣就可能给一连串的出版物提供灵感。[148]此外，互相冲突的预言和预测大量印行，反而在读者对占星术信任的瓦解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49]尽管如此，任何论著的宣传价值和科学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正相关的关系，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即使在伽利略轰动文坛以后，即使王公和诗人对科学的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之后，奇异现象的新闻价值还是超过了普遍现象的新闻价值。天地构造的冷静探讨不可能卖得好，不可能达到轰动性“伪科学”报道那种畅销的程度。而且，科学家从来没有达到福音传道者那样高的地位。即使在启蒙运动如日中天之际，卫理公会的小册子和赞美诗集也使印刷机响个不停，新的《圣经》社团充分利用了印刷术的威力。再者，娱乐的销售绝不会次于教育的销售。皇家学会庆贺把鬼魂和妖精逐出自己的研究领地。浪漫主义小说家、空想家和新闻街的记者仍然拥有庞大的阅读公众，读者仍然被他们兜售的东西迷倒，不能从痴迷中解放出来。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情况并没有多少变化。天文学家和数学力学家的人数大大增加，但比例上还是比较小，绝不能和哥特式巫术故事、飞碟报道之类吸引的读者人数相比。哭泣的雕塑、闹鬼的住宅的新闻价值难以撼动，天 619
体物理学论著、类星体报道难以与其较量。无论美国的《大众机械》杂志多么受欢迎，其销量从来就难以匹敌占星术书籍或《圣经》的销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传播消息是16世纪福音传道者自然而然的追求，相反，保密则是毕达哥拉斯追随者传统的做法。这一局面确有一些变化：贸易秘密广而告之，秘密袒露出来，未成文的诀窍进入公共领域，科学成为“公共知识”，和诡秘的巫术区别开来。然而，即使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有趣的现象：和福音传道者（或记者或任何类型的表演艺术家）相比，科学家仍然对宣传感到不安。无论如何，哥白尼时代保密的态度完全是常见的态度（甚至后世的牛顿也仍然持保密的态度）。指望16世纪的天文学家分享现代科学记者的态度，似乎是没有道理的。[150]

开普勒并没有被柯斯特勒描绘为“胆怯”或“偏离”的人，他的论题也可以简约为一句话。他证明行星的运行轨道不是圆形，但他引起的轰动并没有超过哥白尼推出日心说引起的轰动。至少《天体运行论》的主题传到了开普勒的手里。开普勒的著作“无与伦比地难以卒读”，以至于伽利略也忽视了其中的一些段落。[151]他提 620
出的椭圆轨道不能和抛物线弧形接触，直到稍后才有改进。[152]哥白尼未能像路德那样吸引众多的追随者，有人认为这是其胆怯的保密倾向使然。相比而言，同时代人对椭圆形轨道的忽视仅仅被认为是开普勒走在时代之前付出的代价。这种双重标准特别缺乏一致性，因为读得懂哥白尼与托勒密争论的人比读得懂开普勒的人还要少。只有能够读懂《天文学大全》的天文学家才能够判断“托勒密第二”哥白尼

的著作。如上所示，能够读懂托勒密的天文学家人数不会多。(153)

哥白尼属于人数很少的专业团队圈子，史学家在研究他的著作时罕有考虑印刷术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印刷术的影响局限于传播的范围，如果只强调发行数字，《天文学大全》究竟是机印书还是手抄书似乎就无关紧要。在近代早期，许多有用的天文学数据并没有铅印成书却仍然继续传承。据说，雷乔蒙塔努斯的一些著作在付印之前，哥白尼就已经读过了。(154) 第谷搜集到哥白尼的一些手稿；开普勒继承了第谷的一切手稿。晚至 1854 年，哥白尼的《驳维纳》在他去世后仍然在靠手抄本流传。(155) 同样，《天体运行论》靠手抄本流传，有能力的天文学家可能已经在小范围内用上了，这一可能性难道是不可想象的吗？

621 许多人的期望似乎倾向于给予肯定的回答。因此，他们把传播变革的事件推迟到 17 世纪学术刊物问世的时候。和桑代克一样，他们可能争辩说，既然手写文本的交流足以满足专业科学家的需要，早期的印刷品的作用只能是扩散错误，传播一点点知识，在大范围的公众里把那一点点知识摊薄而已。这些学者有可能像斯提尔曼·德雷克那样持更肯定的观点；德雷克欢迎打破学术垄断，欢迎开发大学校园之外的科学人才。无论阅读拉丁文书籍的专业精英是进步或反动，他们似乎在一个问题上意见相同：抄书人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 中世纪大学学者的人数显然相当少，而且比较均质……在那个小群体里，任何书籍的大量副本从来就不需要，无论我们把这个群体设想为一所大学、一个地区的几所大学或欧洲的所有大学。长期在大学群体里生活的人不太可能长期不知道和他的兴趣相关的主要著作。即使某一抄本不在手边，告诉他这一手稿信息的学者也能够为他勾勒其内容的性质。(156)

这一点立论似是而非，难以赢得普遍的赞同。我认为，它忽视了手抄书文化造成的障碍，严重地高估了它为学术精英服务的效能。在搜求价值很高的技术文献时，即使最大无畏的“游学之士”所遭遇的困难也超乎我们可能承认的难度，因为许多书锁在密室里，或者用锁链固定在大学图书馆或公爵的藏书室里。传授教义和布道的修会把手抄文本存放在不同的地方，使用这些抄本的范围仅限于同门的修士。世俗的大学教授同样不愿意让重要的文本流传到校园之外。(157) 由于不同的馆藏文献仅限于少数人使用，学者思想的自由交流比行会秘密公开交流更少。学界并非均质的社群，其结构相当驳杂。一组人在一所大学或一个修会里达到的很高水平的学问在其他的课堂里并没有得到共享，这一情况司空见惯。在手抄书时代
622 里，地区障碍更加令人生畏，每年一度的书市出现以后才有所好转。例如，在中世纪晚期，切线函数知识就极少越出巴黎和牛津。(158) 印刷术出现之前，足本的《天文学大全》在任何大学都难以看到。

即使一位天文学家听说，某地存有某位古人写的一部伟大的作品，那也不会有多大助益。听人勾勒其内容后，他的想象力可能会被激发出来，但他利用这一古籍的能力却没有得到开发。仅仅靠偶然听天文学家谈话，第谷就能够“自己学会”天文学吗？而且，如果不拥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星表以备仔细检查，他就会感到难以压抑的动力去重估实际的观察所得吗？手握一部论著的全文借以绘制图表、编制星表是一回事，依靠道听途说的内容去从事这一工作则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同值得我们驻足沉思。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天文学长期处于前哥白尼的工作状态。即使开普勒也不得不勉强承认，哥白尼“令人失望”的论著为作者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因为《天体运行论》出版八年以后成了伊拉斯谟·莱茵霍尔德写《普鲁士星表》的基础。无论这些星表作为流行读物是多么不令人满意，但它们很受欢迎，取代了“早已过时的《阿方索星表》”。如上文所示，新的《普鲁士星表》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不是由于它“代替”了《阿方索星表》，而是因为它成了另一种选择，这就促使天文学家用两种星表去观测天象。无论如何，这两种星表很快就被用于观天了——第谷的观测就是明证：

> 1563 年，第谷 17 岁，8 月 17 日晚间，他的老师韦德尔（Anders Sörensen Vedel）已经入睡，他注意到，土星和木星贴得很近，几乎难以分辨；于是就检查星表，因而发现《阿方索星表》的误差是整整一个月……哥白尼星表的误差有好几天。[159]

623

亚瑟·柯斯特勒不仅转述了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的老生常谈，而且还做了一番广为人知的掩饰。[160] 预言和观测结果竟有如此之大的误差，这使第谷十分震惊；他的惊讶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思维习惯的象征。和这种思维习惯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权威几乎被催眠的顺从”，和这种顺从态度相关的是对托勒密和传承数据的依赖，这表现在此前一切天文学家包括哥白尼的身上。[161] 1563 年，《普鲁士星表》12 岁。在考究为何第谷能够开发这两种星表的新用途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在此之前，没有一位天文学家掌握了两种星表的全套版本，所以他们不可能将其用于实际观测。[162]

第谷之所以有别于过去的观星人，并不是因为他观测夜空而不研习古籍。我认为，这也不是因为他比亚历山大人或阿拉伯人更加关注“难以扭曲的事实”或精确的测量。但是，他的确掌握前人很少掌握的资源，那就是两种不同理论的两套计算方法；他可以比较这两种相隔几百年的星表。对第谷而言，文献研究也很重要，这和过去的天文学家无异。和前人一样，他没有望远镜的辅助。但他的天文台不同于前人的观象台，他有一所图书馆，塞满铅印的文献，他还有擅长印刷术和镌刻艺术的助手。他亲自动手（呕心沥血，耗资不菲）安装印刷机，还在他工作的赫文岛

624

上办了一座造纸厂。[163]

岛上有 50 余位助手，自己印制的出版物源源不断，有人认为，第谷这座“天文堡”(Uraniborg)可能是培根的“所罗门宝屋”的原型，有可能是后世“皇家学会”的原型。[164]“天文堡”天文观测的合作与出版规模宏大，在欧洲历史上前无古人。第谷的观测有仪器相助，他能够挖掘镌刻家的才能，而且他们知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意味着什么。[165]第谷还用镌刻术来向读者展示天文仪器。他在自画像里展示了自己那台印刷机。[166]自从他少年时代偷偷借出老师的书晚上看以来，第谷从其他人的出版物中获益良多。在这些方面，他与前人的不同应该予以重视。他可以用公开宣传来疏导人们激动的情绪，使人关注转瞬即逝的星象事件，借以鼓励大规模观测来求得新的数据，这是第谷永恒的、前无古人的成就之一。这位丹麦天文学家不仅是最后一位伟大的肉眼观星人，而且是充分利用印刷机新功能的第一位仔细的观星人；印刷机的新功能使天文学家能够发现旧文献里的异常之处，能够准确
625 地寻找、定位并记录星象，能够编制星表，寻求许多地方的合作者，用永久的形式记录新的观测、在后续的版本中做出必要的修正。

上文业已述及第谷之星非同寻常的命运。他的星表的增容同样值得注意。

>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鲁道夫星表》成为必备的天文研究工具……该书大半是观星的规则，包括预测行星位置的规律以及第谷编制的 777 颗星球的目录，这一目录由开普勒扩编至 1,005 颗星球。该书率先将折光表和对数表用于天文观测；书中还有一张世界城镇表，城镇的经度指的是第谷的“格林尼治”经度，即他在赫文岛上的“天文堡”的经度。[167]

开普勒着手印制《鲁道夫星表》以后，柯斯特勒对印制“难以卒读”的技术著作有何价值的评估似乎有所变化。你不妨比较他对《鲁道夫星表》和《天体运行论》的不同评价，他对前者的评价很高，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估价却不乏贬词；同时你要记住，他设想两者的首版是同等的规模。[168]

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开普勒完成了他自己编制的价值连城的《鲁道夫星表》；这说明政治和宗教动乱对科学发展的冲击——正如其对《圣经》研究的冲击一样。《鲁道夫星表》和普朗坦在安特卫普印制的合参本《圣经》一
626 样说明，印刷术之后，新鲜而精确的信息的积累多么迅速，知识丰碑的大师们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169]开普勒掌管一个大型的技术出版计划，参与了共有 568 页的书稿的排版、印刷、发行的全过程，这位梦幻、神秘、“梦游似”的天文学家似乎被委派了一个非典型的角色。开普勒每天在印刷所里工作几个小时，成功地解决紧迫的政治问题和人员配置问题，采购了充足的纸张，督察印刷符号的铸造和雕刻，直到排版，直到最后以游商的伪装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市，与书商为伍，兜售自己的图

书。在四年磨难的最后阶段，他在乌尔姆抽时间帮助地方官解决度量衡问题。作为一位天才的小玩意发明家，他还为乌尔姆地方官设计了一种新的标准量具。[170]他既能动脑又会动手，《鲁道夫星表》这部巨著的卷首插图就是他本人设计的。[171]

他设想的天文台（House of Astronomy）模仿巴洛克线条，在现代人的眼里或许有一点梦幻色彩，甚至超现实色彩。像弗朗西丝·耶茨描绘的记忆库一样，这一设计的母题新异驳杂却又密切相关。古代先贤和现代大师展现在这座设计缤纷的殿堂里。缪斯女神代表数学，高居穹顶周围；德皇的鹰徽在穹顶翱翔，给予（令人企盼的）惠助和黄金，从穹顶向下俯视，各色工具挂在柱头上，印刷机镌刻在墙根，这一切说明，“梦游者”开普勒有他实用的一面。[172]

开普勒那浪漫的传记描绘了这一卷首插图，但其中的印刷机和其他工具却被省略了，这一点耐人寻味。亚瑟·柯斯特勒赞美开普勒的《鲁道夫星表》是“必备的工具”，是开普勒“实用天文学登峰造极的成就”。尽管如此，他似乎鄙视这个星表中那种“赫拉克勒斯似的、笨驴似的辛劳”。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同情开普勒厌倦“单调乏味的机械计算”的心情。[173]然而，他并不同情开普勒的先行者，其实艰苦的前人更值得同情。手抄星表的编纂工作比机器印刷星表更加“单调乏味”。他的赫拉克勒斯比方似乎更适合手抄书时代的劳作，那时的天文学家知道，刚刚校勘完毕的星表里就会发现不少错讹。

如果忽视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图书不能做到精确无误，人们常常就认为作者冷漠或愚蠢。早期的天文学家被斥为浪费“安身立命的要务”，因为他们给航海者和观星人提供的是错误的而不是准确的星表。[174]柯斯特勒同情开普勒从事单调乏味工作的辛劳，但他只字不提开普勒用上了省力的设备，其实这些装置颇有助益。柯斯特勒所著《梦游者》的索引没有收录内皮尔的名字，内皮尔发明的对数也不见于《梦游者》的正文。只有一个脚注提到梅斯特林有所保留的评论：“仅仅因为计算工作比以前容易，数学教授就表现出童稚般的欢乐，那似有不妥。”[175]虽然一些天文学家抑制了自己欢乐的情绪，但史学家有责任予以注意。当我们对开普勒的星表和从哥白尼著作里演绎出来的星表进行比较时，如果不考虑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出现的新工具，这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我们还失去了一个机会，那就无法理解亚历山大时代的天文学为何被后人超越。

这是因为，说哥白尼胆怯、绕弯子也好，说开普勒坦率、大胆也好，那都是文不对题。重要的是，信息流业已重新定向，前所未有的认知进步累积起来了。把内皮尔的对数用于《鲁道夫星表》时，开普勒所做的事情是他的老师不可能做的事情。虽然第谷希望引用这些星表，但直到这位丹麦天文学家去世，这些星表都未能出版。不过，第谷已经能够对《普鲁士星表》和《阿方索星表》进行比较，而以前的哥白尼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阿方索星表》是哥白尼去世以后才由后人从他的著作里

627

628

整理出来的。哥白尼修正了托勒密的计算，从运行地球的角度绘制了行星的轨迹，他是否取得了手抄书时代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呢？答案必然带有猜想的性质，但就像彻底的历法改革一样，彻底修正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需要一些先决条件，也就是需要免除抄写的劳作，需要得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古籍散佚以后天文学家们使用的那些参考材料，这些条件看来是必需的。

或许，哥白尼最重大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不如说是提出了经过透彻研究的另一种理论；于是，他提出问题，让下一代天文学家去解决，而不是自己做出答案，让后人学习。在里奇奥利 1651 年版的《新天文学大全》的卷首插图里，哥白尼的图示和第谷的图示被置于缪斯女神天平的两端，而托勒密的图示则被置于地上，所配文字是：“若被修正，我就站起。”如图所示，缪斯的天平向第谷倾斜、托勒密需要“恢复”的观念是一望而知的，但这些事实都不应该干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画框里表现三种图示清晰的行星模式，这倒是颇为新异的。(176) 互相矛盾的《圣经》评注鼓励人们去研究《圣经》本身，同理，“渺小的人之书”里那些互相矛盾的判断促使人坚持不懈地用“伟大的自然之书”去检验。

开普勒在蒂宾根求学时，天文学家必须要在三种不同的理论中做出选择。一百多年前，哥白尼在克拉科夫求学时，学生能接触到一种理论就够幸运了。看来开普勒的老师梅斯特林授课时，对这三种理论都做了介绍。有人说，这说明大学的教育落后，大学抵制来自校外的革新潮流。(177) 相反我认为，向学生传授这三种方法，
629 以便于他们计算行星运行轨道并给太阳和地球定位——这正好说明令人惊叹的变革。(178) 但三种权威理论都未能正确描绘行星的运行轨迹。和托勒密古老的理论一样，第谷崭新的图式注定也要被后人证明为不准确。1543 年以后，为大师级人物所做的评注、提要或附录的工作被正面接触不同的选择取而代之，学生就不得不做出某种选择了。托勒密《天文学大全》的编纂、恢复和保存工作已经进行了千百年，突然在一个世纪之内却出现了两种新的完全成熟的行星运行理论，这不能说明文化滞后或惰性力量的存在。相反它说明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上的突破。(179)

而且应该指出，可供选择的理论总是伴有可供选择的星表，可供选择的星表迫使天文学家做出选择，使之集中观测重要的星象。在 16 世纪 40 年代以前，天文学家只依靠《阿方索星表》，我们不妨将这一局限和 17 世纪 40 年代的情况进行比较，那时的天文学家有了六套不同的星表。伽利略的朋友文森托·莱因涅利(Vincento Rienieri)在 1639 年的《美第奇星表》(*Tabulae Medicae*)里介绍了这六种不同的星表。至此，年轻的第谷用两种互相矛盾的星表对照天象那种独特的经验业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观测同一星象，以便检验星表是否准确。人们用公开信发出挑战，要全欧洲的所有天文学家观测特定的星象，并且用各自的观测反复检验不同的预测。

> 天文学家用实际观测到的日月星辰的位置和星表里的预测进行比较，再用由此得出的结果和对立的天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借以判断，耗尽精力去掌握难以理解的开普勒方法是否值得一试……(180)

630

1631 年，伽桑狄按照开普勒的建议给欧洲的天文学家发出公开信，请大家观测水星凌日的天象，他断定这一天象发生的时间是 1631 年 11 月 7 日。这一例子说明，印刷术使共同努力、同时观测成为可能，而在手抄书时代，这样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这一事例中还出现了新的反馈机制。一位德国观星人接受挑战，不仅发现《鲁道夫星表》的预测更精确，而且还在 1632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通报他的发现，勾勒开普勒的理论，他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开普勒的著作以求进一步了解细节。(181)

我们回头看一看伽利略忽视开普勒发现椭圆形轨道的问题。据爱德华·罗森记述，伽利略对开普勒浮华的散文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名副其实的成就被繁冗的神学思辨、神秘的用典和自传式的漫游掩盖起来了。”这样的文风使他感到丧气。(182)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剩下的问题就是，伽利略的反感是如何克服的，“名副其实的成就”是如何最终揭示出来的。近年的一些成果描绘了天文学家们接受《鲁道夫星表》优越性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到年鉴和星图表的出版商和编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竞争环境的推动之下，他们研究不同天文学家对立的论断，热心寻求最明快而正确的图式。有些天文学家（比如伽桑狄）证明，掌握开普勒的技法之后就可以印行更好的星表。一旦被说服之后，对陌生对数的笨拙程序的抗拒、不情愿硬着头皮去啃开普勒那令人生畏的文字的情绪都被克服了。(183)在英国内战中，一位年鉴出版商进入欣欣向荣的大众市场，由此而做出这样的结论：开普勒是“有史以来最细腻的数学家”，开普勒的著作“最令人钦佩、最完美地恢复了他之前的天文学成果”(184)。这位出版商名叫文森特·温（Vincent Wing），著有《不列颠天文学》（*Astronomia Britannica*），牛顿后来阅读并评注了这本书。(185)牛顿成年之后，《鲁道夫星表》和《哥白尼天王星提要》（*Epitome Astronomiae Copernicanae*）开始把对手逐出竞技场——至少在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区无竞争对手可言。椭圆轨道终于可以和抛物线接触了。

631

哥白尼出生之前不久，雷乔蒙塔努斯辞掉匈牙利国王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到纽伦堡建立世界上第一所科学出版社。不久，哥白尼去世，第谷被送到维滕堡去寻求专家帮助创建印刷所；离开丹麦时，他带着一台印刷机在路上使用。开普勒经历千辛万苦把老师第谷的星表铅印成书，上文业已描述开普勒诸如此类的磨难。伽利略年轻时喜欢为争夺发明优先权而争吵，到了晚年则把自己的手稿偷偷地送到国外去印行，他的生涯仰赖对印刷机新兴力量的利用。援引这些例子时，我们就容易看清，在许多对哥白尼革命作出贡献的天文学家的活动中，新兴的印刷机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主张，印刷机应该在我们的技术中占据更加突出的地位，那似乎有一点似是而非。然而，如果我们设想，哥白尼把自己封闭在塔楼里，牛顿将手稿塞满书桌的抽屉，那似乎就更加令人生疑。他们两人启动并完成了哥白尼革命。他们不仅为阅读拉丁文的同事写作，而且推迟把自己的手稿铅印成书，因为羞于抛头露面，他们很少在印刷所逗留，即使偶尔逗留也很短暂。

哥白尼和牛顿对印刷机表现出矛盾的感情，保持着秘不外传的精英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相反，隐秘的哲人启程到陌生的思想海洋里去探索时，往往用印刷商的产品去为自己的漫漫征程做好准备，而抄书人所做的准备则大为逊色。以下引文颇能说明问题：

632

> 牛顿读本科最后一年(1664)年初的笔记本给我们……各种符号……他放弃了只读古人的习惯……一头扎进当代的著作……他了解到自己时代学者的科学著作，我们可以追踪……他天才之花……绽放的过程……他贪婪地吸收玻义耳[①]和胡克[②]的著作……读皇家学会的《哲学通讯》并做了详细的笔记，详细记录了阅读伽利略《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on Two World Systems*)……和笛卡尔《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的心得，他抄录笛卡尔英译本的惯性原理……我们翻阅他的笔记时，可以看到他的脑子从归纳他人的思想飞跃到记录自己的原理和成果……他开始设想，引力延伸到远至月亮的天体……他的主要精神教父是笛卡尔。牛顿研读笛卡尔的《几何学》(*Geometrie*)这一名副其实的数学《圣经》，从详细批注的斯库滕(Schooten)拉丁文第二版获得灵感，从 1664 年夏天起长达两年时间里研读……在那两年里，数学家牛顿诞生了……他唯一真诚的惋惜必定是：他尚未找到将自己的成就传达给别人的出路。他的论著……跳动着活力和想象力，同时又受到幽闭恐惧症的困扰，他完全把自己包裹起来，他与世界的唯一接触就是他的书了……(186)

牛顿在沃尔索普母亲的苹果园里的形象充满了神秘的弦外之音(187)，以至于他到书店或教区长的图书馆流连的习惯可能被人忽视了。

几年前，教皇写了两句话戏说牛顿："自然和自然规律在夜间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寻找吧！——于是天就亮了。"即使作为诗性的夸张，这样的调侃

---

① 玻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确定了气体体积与压力成反比的"玻义耳定律"，发展了物质的基本微粒概念。

②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英国物理学家、发明家和数学家，发现弹性定律，率先用"细胞"一词，制成反射望远镜，系统阐述行星运动理论。

> 也没有说服力。牛顿的《原理》并非一夜间绽放……牛顿……的发现之旅坎坷曲折……那个苹果故事虽然可能是真的，然而，从他在母亲的苹果园里的初步洞见到精湛的数学验证，那是一条漫长的征途。[188]

也许，那个苹果故事应该被剥去神话的外衣，“母亲的苹果园里的初步洞见”可以根据怀特海对牛顿神秘岁月的仔细钩沉来予以重新解释。[189]这并不是要贬低他在母亲的苹果园里观察苹果落地的重要意义。慵懒时的异想天开为许多创造之举 633
释放出无意识的能量。然而，发生了最重大变革的是图书馆而不是苹果园，图书馆给这位羞怯的本科生提供了“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主要手段。牛顿是“独步天下的自学成才人士”，比第谷·布拉赫更典型；他靠读书学到的知识大大超过了他和老师交谈、听老师讲课学到的知识。和他用棱镜试验一样，他对自由落体的观察主要是由阅读许多书的经验塑造的；他的试验从孩提时代试验油漆配方的经验起步。[190]牛顿极具好奇心，但性格内向，所以静静的扫描阅读是他很喜欢的取代言语交流的方式。无论如何，青年牛顿的形象不只有“棱镜加静默的面孔”。如果我们要想知道苹果落地和油漆涂墙为何传达了前人没有感觉到的模式，我们就应该注意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游戏，与印刷品中的星表和公式、图式、方程式的交流是他“学徒”时代的特征。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独处塔楼的哥白尼和独居小屋的牛顿最后被说服交出手稿付印，从而为自己时代的科学作出了贡献。幸亏热心的中介人雷蒂库斯和哈雷的惠助，哥白尼和牛顿使我们的公共知识大大丰富了。雷蒂库斯 60 多岁时欢迎年轻的奥拓担任自己的助手：“你来看我的年龄和我去造访哥白尼的年龄相同。如果我没有去拜访哥白尼，他的著作全然不会为人所知。”[191]就牛顿的大量笔记里包含的“自然和自然规律”而言，哈雷使之“曝光”也居功至伟。

> 哈雷率先向皇家学会报告牛顿的解答，但皇家学会印行弗朗西斯·威洛比(Francis Willughby)的《双鱼座的故事》(*De Historia Piscium*)已经耗尽财力，哈雷承担了出版牛顿著作的费用和责任。[192] 634

科学出版中这些耗资不菲的工程的重大意义常常被人忽视。某些领域的出版风险是心甘情愿的，其他一些领域的出版却心有不甘，这样的区别值得进一步思考。这是因为，谋求出版出路的问题迫使科学与宗教和政治接触，其接触方式尚待研究。本书下一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索。 635



第八章
科学著述的赞助与审查

8.1 本章概说

本章是上一章的姊妹篇。上一章主张为哥白尼革命重新搭台，这一章用类似的手法去研究伽利略受审的公案。既不尝试详细描述事件本身，也不准备全面审视这一公案提出的一切问题。研究这一案子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获取印书出路的问题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始终被忽视至为不当，需要被给予更大的分量。我还希望显示，这一问题如何进入其他相关问题，并提供思想战场和思想冒险中某种缺失的环节。在以下的探讨中，我们特别注意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

首先是宗教改革和早期近代科学关系的问题。其次是外在社会制度和内在相对独立的科学生命历程的问题。我阐述出版的重大作用问题，希望提出一条新的路径去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希望为新教徒和科学家的关系提供新的启示，还想说明图书贸易的外部调控如何影响科学理论和创新之举。

让我借用怀特海等人的一个生动的对比，以此破题：一方面是科学静悄悄的、和平的崛起，在全世界产生回响；另一方面是对立信仰的流血冲突，撕裂西方基督
636 教世界。怀特海认为，科学的兴起在“一切方面”与同时代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强烈的对比。[1] 新的学问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既不必动刀兵，也不必强迫改宗，亦不必操纵大众的思想。相反，宗教改革放纵大众的造反，使欧洲沉入血海，且长达一个半世纪。乔治·萨尔顿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研究天主教徒哥白尼和新教徒雷蒂库斯在 16 世纪中叶和和气气的合作，尽管那时的宗教狂热已经登峰造极。萨尔顿说，“崇高的”真理追求使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超越混战”[2]。最后以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勋爵为例，他用世界史的观点来透视科学革命，于是断言：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使宗教改革降格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内部一个

小小的插曲，一次小小的新桃换旧符”[3]。

然而无论这些对比多么有效，它们似乎都太走极端，它们挣断了早期近代科学与历史的锚链，砍断了催生近代科学的力量与科学的联系。我认为，最重要的联系之一是，科学家感觉到有必要出版研究成果。如果更强调出版途径的获取，强调承印这些科学成果的出版商的命运，你就可以看到，即使西欧战场上小小的插曲也会对人类思想的重大成就产生影响。

怀特海说：“对目击了三十年战争、记得荷兰的阿尔瓦①那一代人而言，欧洲科学人经历的最严重的事情就是，伽利略在安眠中去世前受到体面的软禁和温和的指责。”[4]从这一段话，你很难想象，低地国家的军队调动和伽利略的成就有何关系。然而，正是因为荷兰人赢得了独立战争（从世界史的观点看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打斗），科学出版的途径才为伽利略敞开了，否则这扇大门是会关上的。在17世纪，因为某一出版物而遭殃的事情可能就不只是“体面的软禁和温和的指责”了。科学家可能根本就没有出书的机会。伽利略最后一篇重要的手稿被偷运到荷兰，他大概可以在平静中去世了。但也有不如他幸运的研究者，进入墓地以后，他们数以千计的遗稿被尘封起来了。

在这一点上，怀特海著名的断言应该修正，他说：“1500年，欧洲人的知识还不如阿基米德……然而到1700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已经写成了。”[5]皇家学会的经费耗尽时，幸亏哈雷出手相助，牛顿的《原理》得以印行，而且欧洲的主要学术刊物都展开了对这本书的讨论。一篇拉丁文的书评使之在学界闻名遐迩，这就刺激了1713年第二版的重要修正；莱布尼兹在尚未见到牛顿的书稿时，就在书评的激励下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用法语翻译的长篇书评使《原理》在学界名声大振，这篇书评的作者可能是约翰·洛克。[6]

如果《原理》在哈雷出手相助之前就停步不前，那就会让哥白尼发动的革命残缺不全，那就是说，牛顿的文稿还凌乱地堆放在他的案头上。许多人的记述正是到此为止。它们追寻精英名士的活动，研究其实验，记录其观察，直到其理论的形成和论著的完成。但他们就此止步，不再追问手稿是否送印刷商刊布，实际的印刷和发行是否发生。只有在著作印行以后，科学的“内在”生命才能够与外在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社会力量从科学诞生之日起就塑造着科学。如果在私密的情况下培育得太久，而且被剥夺了暴露的机会，即使最精湛的实验也注定在生命的藤蔓上凋谢枯萎。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出版之日自然而然会到来；他们简单地设想，雷蒂库斯或哈雷这样的中介在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完成自己的使命；或者设想，科

① 阿尔瓦（Alva，1508—1582），西班牙将军、荷兰殖民地行政官（1567—1573）。

638 学家自己会想办法确保印刷商发挥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是，对三百年前的精英名士而言，他们必须得到的服务却常常是悬而未决的。

> 开普勒忙于出版《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以介绍哥白尼的理论结构时……哥白尼的著作已经被禁。1619 年夏天……他获悉……他 1617 年印行的《概要》的第一部也上了《禁书目录》。这一消息使开普勒警觉……他担心，如果审查制度在奥地利得到承认，他就不可能在那里找到印刷商了……他想象的情况非常阴暗，以至于他认为，他应该放弃天文学的使命……(7)

朋友让他放心，他最可怕的担心显然是被夸大了。他们来信说，即使在意大利，也有人读他的书，有学问的人经过特许可以读。一位威尼斯朋友的话非常精明：作家常常因自己的书被禁而获益。他写道，在意大利，“即使被禁，德国学者的书还是在悄悄地销售，人们秘密地购书，津津有味地阅读”(8)。

直至今天，史学家们发布的成果仍然叫我们放心，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对赞同哥白尼著作的谴责是可以打折扣的。(9)一旦有把握出书之后，如果在一些地区被禁，作者反而会得到好处。不过，如果作者在印制技术图书的过程中就遇到了麻烦，如果官方为了恐吓出版商而宣告禁止旨在印制的书，那就非常不利了。(10)这些话足以说明，为了理解 17 世纪科学家面对的环境，我们需要更重视出版印刷本身，更重视中介在确保出书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如果我们更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就能够寻找到近代科学的兴起和貌似无关的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王朝战争和宗教战争的结果对出版计划产生显著的影响，决定着某一领域里出什
639 么书，决定着承印某一著作所冒的风险有多大。宗教虔诚和赞助的形式、特许证和审查制度、识字率和阅读习惯各地不同，因战争结果而异。既然印刷业的分布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图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绘制出来；印刷中心的迁移与宗教疆界和王朝疆界的相关系数就可以准确地判断了。

科学中心的迁移又如何呢？相比而言，追踪这一迁移轨迹显然要困难一些。实际上，一批印刷所聚集在一起时，它们究竟是否形成了真正的科学活动中心，这个问题就引人质疑。印刷商的身份一望而知，科技的角色却迟迟难以彰显。正如当前的定义所示，科学家仍然是界定不明的标签。在近代早期，“科学家”这个标签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11)在那个时代，对“科学”进步作出贡献的才俊之士的分布仰赖大范围内的各种活动（数学技法、仪器制造、数据搜集等）。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把“科学家”这一标签用于那些并不自认为是科学家的人，这个问题仍然值得争论。再者，从 16 世纪初到 17 世纪 40 年代，现在认为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协调的。聚有一批才俊之士的地区比较分散，丹麦一座小岛上有天文台，纽伦堡有成群的仪器制造商，阿姆斯特丹有磨制棱镜的技师，罗马有耶稣会天

文学家——这些地区在地图上星罗棋布，不太有规律。有些生机勃勃的“中心”比如第谷的天文堡、梅森的“信箱”或鲁道夫二世的布拉格宫廷都昙花一现，很大程度上依靠某个人的迁徙，这些人所在的地方并不能证明任何规律。(12)

科学活动的“主要中心”的定位必然存在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对于促成科学中心形成和初期发展的因素，必然会众说纷纭。有人说，在战略“起飞”的阶段，首要的角色是由天主教地区尤其意大利扮演的，因为柏拉图主义在这些地区很兴盛，大学教授们推动了自然哲学，首批科学社团在那里出现。(13) 另有人看重与罗马决 640
裂的地区。他们认为，新教教义推动人们系统地研究上帝那本开放的书。有人选中维滕堡而不是帕多瓦，认为维滕堡大学是近代科学的温床；有人与马克斯·韦伯的主题略有不同，他们强调加尔文派的中心比如莱顿大学和其他地方的清教徒学府。(14) 另一派认为，一切大学和教派都太保守而且受传统束缚，所以他们寄望异端的圈子和非学术群体，看重其代表的“隐形的学苑”和“夜间的学校”。所以，弗朗西丝·耶茨认为，“新教存在与否”的命题不如“赫耳墨斯秘义—犹太秘法”的传统重要。牛顿之类的精英从英国国教的主教和清教徒牧师获得的灵感不如他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家那里得到的灵感，那些占星家追求的是吹奏潘①的排箫。(15) 还有人认为，牛顿的炼金术或神学不应该和他的数学物理学混为一谈，并同意爱德华·罗森的观点：“从文艺复兴巫术……衍生出来的不是近代科学，而是近代巫术。”(16) 他们强调“新哲学”去神秘化的诸方面及其开放和公共的性质，强调其预测功能，这样的功能对讲究实际的人颇为有用。他们大多数人将科学与唯物主义视为同一，认为科学与精神世界的信仰不可调和。于是，反教会的圈子和自由思想的群体就被挑选出来作为这最后一种人的代表，他们与前基督教异端思想的复兴同时兴起，这样的异端思想与原子论和快乐论相联系。(17) 641

最后讲一讲折中主义的一派，即使在坚持多样方法论的时候，这一派在以上各种观点中都看到一定的道理。在合作共事的宏伟事业中，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机构、传统、教义或阶级扮演了战略意义的角色，这样宏伟的事业是由各种方法和追求组成的。(18) 互相争夺的多重“外在”力量争夺首要地位，如果从总体上去看这些外在力量，它们就显示出互相抵消的倾向。这就为重申活动自主性的主张铺平了道路，这些活动与以上各群体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与其中任何一个群体有特别的关系。我们又回到萨尔顿的“对真理的崇高追求”，这些中性的、没有派别利益的脑力活动不受竞逐教义冲突的影响，在“超越混战”的情况下展开。

虽然这些论述都有长处，但我认为都走得不够远。对研究活动的探讨应该和

---

① 潘(Pan)，希腊神话里的畜牧神，人身、人头、羊足，掌管树林、田地和羊群，爱好音乐，创制排箫，亦贪女色。

研究成果的出版一并考虑。而且，在寻求苗圃或温床的过程中，早期的印刷所值得进一步审视。同理，分散的圈子如何联系，它们如何开始在许多战线上合作，也值得进一步考察。无论各种解释多么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认为合作是必需的，信息流不会被扰乱或切断。我们看到，现代权威学者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多于17世纪印刷商或精英学者的设想。

诚然，并非一切研究都忽视了传播问题与合作问题，但当这些问题被提出时，其形式是研究与出版分离，中介的作用被略去不计了。

> 从巴黎的一所修道院，马兰·梅森……将当代大多数领头的科学家纳入他的通信网络中，无论其宗教信仰或国籍，他甚至到了钦佩培根、哈里奥特①、
> 642 奥特雷德②的地步。虽然他立足巴黎，但他的圈子遍及西欧。这个圈子包括旅居荷兰的笛卡尔、身在普罗旺斯的伽桑狄和佩雷斯克③、蒂宾根的施卡尔德④、莱顿的霍滕秀斯⑤、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和布鲁塞尔的海耳蒙特⑥……科学研究的进步建立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局限于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上……
>
> 伽利略时代的欧洲知识界不注意后来的国界。有趣的是，虽然有三十年战争的阴云笼罩，宗教分歧对他们似乎是无关紧要的。(19)

马兰·梅森进行大范围的通信，这无疑有助于协调分散的精英们的各种活动，同时又使他能够摆脱权威当局可能给他制造的麻烦。但梅森信箱位于巴黎的事实并不足以解释其著名的内容。千百年来，巴黎修士们的私人通信一直在进行。梅森信箱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向整个欧洲发出公开信。其特色是，它嵌入了印刷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传播网络。这个大网络有几个节点，全都在巴黎之外的北方新教地区，位于法国的边界之外。

---

① 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t，1560—1621)，英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创立英国代数学，与伽利略同时制成望远镜，著有《用于解代数方程的分析术》等。

② 威廉·奥特雷德(William Oughtred，1574—1660)，英国数学家、基督教圣公会牧师，发明计算尺，著有《数学秘诀》等。

③ 尼古拉·佩雷斯克(Nicholas Claude Fabri de Peiresc，1580—1637)，法国古玩家、人文主义者、学术赞助人，发现猎户座大星云，证实哈维的血液循环论，鼓励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法学研究，喜欢通信，无著作发表。

④ 威廉·施卡尔德(Wilhelm Schickard，1592—1635)，德国数学家、博学家，1623年制作了第一个能进行六位以内数加减法的计算器。

⑤ 马丁·霍滕秀斯(Martinus Hortensius，1605—1639)，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发明行星直径测量法。

⑥ 凡·海耳蒙特(Van Helmont，1580—1644)，比利时化学家、生理学家和医学家，炼金术到化学的过渡人物。

以巴黎为中心的网络为17世纪的科学进步提供了基础，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其根源是一种常见的习惯：把早期的科学传播与科学出版物的组织分割开来。这个错误观念给中心定位时只考虑不同形式的交流以及研究活动，却不考虑出版活动。因此，佩雷斯克在普罗旺斯的住所，加上位于巴黎的“迪皮伊兄弟的密室”[20]，再加上小兄弟会修士的信箱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从伽利略的意大利（最早的科学社团在此产生）到马兰·梅森的法国，有一种“翻译研究”的活动。虽然梅森时代有闯劲的法国人启动了一些颇有希望的科学出版，但没有一个出版计划得到继续不断的支持，这些计划全都中断夭折了。[21]

643

马兰·梅森的努力经常受挫，最近有人把他描绘为一位“宣传活动失败的人士”[22]。在当时烫手的问题上，即使在谴责“神秘巫术”的积习时，他也始终抱谨慎的态度（甚至篡改了寄往罗马的一件印刷品）。梅森尽力使科学中立，以平息疑虑。[23]但他并不能真正维持“超越混战”的形象。相反，他被迫与地下渠道接触，介入了地下的图书贸易，想办法尽快翻译出版那些上了《禁书目录》的书籍。[24]

在这些地下活动中，关键的中介角色不是梅森扮演的，而是驻巴黎的日内瓦外交官埃利亚斯·迪奥达蒂（Elias Diodati）扮演的。他竭力让伽利略的著作亮相，就像雷蒂库斯宣传哥白尼、哈维宣传牛顿一样。他出身新教名门望族，祖上于16世纪从意大利北部移居日内瓦，他的一位表亲翻译了《圣经》。[25]埃利亚斯加入了一个精英组成的“自由思想”的法国人的圈子，成为其核心成员。他积极参与佩雷斯克在普罗旺斯住所里的活动，经常在迪皮伊兄弟的巴黎密室聚会。皮埃尔·伽桑狄①、加布里埃尔·诺代②、弗朗索瓦·拉默特·勒韦耶③是他最亲密的朋友。[26]他

644

经常到西欧的中心城市做商务旅行或执行外交使命，和出版商、书商、信使及邮政官建立了很有用的关系。用勒内·平塔德（René Pintard）的话说，他成了“文坛学界的商贩”，在让·勒克莱尔和皮埃尔·培尔时代出现之前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他以这样的身份将“新哲学”从修道院和僻静的别墅里带出来，介绍给埃尔西韦尔们的印刷世界；在这个方面，他比法兰西同道更大胆。他陪同格劳秀斯旅行，支持巴黎的托马索，宣传弗朗西斯·培根，在法国为“自然神学之父”切尔伯利的赫伯特勋爵（Lord Herbert of Cherbury）赢得了一批追随者。在伽利略研究中，他的名字常常以小字号字钉出现，他很少得到足够的承认。其实，在将软禁之中的伽利略的

---

① 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法国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复兴伊壁鸠鲁学说，以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率先观测水星凌日，代表作为《哲学论文》。

② 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1600—1653），法国医师、图书馆学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创建图书馆指南》。

③ 弗朗索瓦·拉默特·勒韦耶（François de La Mothe Le Vayer，1588—1672），法国政治家、作家，法王路易十四御师，著作涵盖地理、修辞、伦理、经济、政治、逻辑、外交、教育等领域。

著作翻译、印行和广为人知的宣传工作中，他真是劳苦功高。

同样的评价适用于迪奥达蒂最重要的盟友、荷兰的印刷商路易·埃尔西韦尔。许多人到伽利略遭政治软禁的阿尔切特里(Arcetri)去造访，但荷兰印务公司这位伟大的成员对伽利略的造访则具有最为重大的历史意义，罕有能与之匹敌者。[27]奇怪的是，在见过这位著名的囚徒的访客里，很少有人像路易·埃尔西韦尔这样被后人的记述忽视。

印刷业中心迁离古老的文化中心，这一变化对“伽利略时代的欧洲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7世纪的知识产业并不是建立在巴黎；在支持科学研究中，佛罗伦萨和普罗旺斯的别墅的贡献也不如荷兰的印刷机。实际上，虽然让·巴蒂斯塔·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担心从荷兰进口的书籍具有颠覆的内容，担心它们对巴黎印刷业的冲击，但他还是接受劝说，没有禁止图书的进口。劝告他的人说，法国的博学人士离不开这样的书籍。[28]有人说，17世纪荷兰人印的书超过了

世界各国印数的总和。[29]欧洲人口最多、国力最强、政权最巩固的国家的科学著作却少得可怜，而尼德兰联合共和国这个小国却出版了大量的印刷品，这个强烈的反差突出说明本书稍早一章里的论断：民族国家激励的印刷产业在扩张中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由于“中央”宫廷的虚弱和地方城镇的强大，荷兰企业家获得了事实上的出版自由，虽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出版自由。[30]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躲躲闪闪地承认荷兰印刷商对西方科学扩张的意义。在以下引文里，他把西方科学置于历史舞台的时间几乎晚了一个世纪。

> 在这个时期，变革绝不限于法国……但这一运动定位在局部地区，它与正在发生的热气腾腾的印刷活动相关，这一活动不仅在英国、荷兰和法国进行，而且在它们之间穿梭，编织出即将出现的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西方文化。那时，文明的领袖……确定不移地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方……
>
> 不仅英国与荷兰居于领导地位，而且法国最积极推动新秩序的是胡格诺教徒或以前的胡格诺派，尤其是流亡国外的胡格诺派……1685年《南特敕令》撤销以后……胡格诺教徒流亡英国与荷兰，他们在荷兰印制法文期刊，成为传播英国思想的中介人……[31]

在宣传“新哲学”，唤起“欧洲良心的危机”中，法国流亡者在低地国家经营的印刷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总是被人忽视了。比如，卡尔尼说：“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在科学上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在荷兰，笛卡尔主义遭到猛烈的抨击。”[32]然而事实上，经营出版社的法国胡格诺教徒印行了一些

笛卡尔派人士比如马勒伯朗士[①]的书籍，他们有机会打上自己的印记。(33) 尽管如 646
此，17 世纪晚期“热气腾腾的活动”有必要和《南特敕令》撤销之前法国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这些事情也走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前头)。和“埃尔西韦尔们的世界”相比，17 世纪国际性的法语印刷业其实是晚辈，虽然它传播了牛顿和洛克的思想。荷兰的独立战争为荷兰印刷业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而且在莱顿建立了一所了不起的新教大学，这些事件甚至走在《南特敕令》发布之前。在《南特敕令》撤销之前，荷兰的出版商已经印行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第三版、笛卡尔和伽利略的著作，以及培根、夸美纽斯、霍布斯[②]、格劳秀斯、伽桑狄等人的著作。(34) 推动 17 世纪晚期科学进步的“热气腾腾的活动”并不肇始于巴黎的一所修道院，也不肇始于 17 世纪 80 年代的胡格诺派流亡者，甚至不肇始于此前的弗朗西斯·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启动的研究计划，而是肇始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在 16 世纪荷兰战争中的失败——虽然那场战争仅限于地球一隅的小打小闹，但它却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回响。

普朗坦的两位女婿追求不同的出版计划，信天主教的让·默雷图斯(Jan Moretus)留在安特卫普，信新教的弗兰斯·拉菲伦吉乌斯(Frans Raphelengius)却奔赴莱顿。两人不同的出版计划总体上显示了天主教欧洲和新教欧洲不同的出版政策。(35) 考虑和这些不同的出版政策相关的问题时，我们发现一个看似奇怪的问题：北京的耶稣会出版人(其政策很快就受到罗马的谴责)更引人注目，比地理上更加接近罗马的普朗坦的后继者更吸引人。(36) 在伽利略的时代，天主教的安特卫普的出版业专门满足天主教教士的需要。新教的阿姆斯特丹的出版业却多种多样， 647
以满足世界各地世俗读者的需要。17 世纪的科学出版步伐加快，就此而言，科学出版业的发展处在服从罗马制定的反宗教改革的地区之外。

这并不是说，旅居中国的耶稣会天文学家和传教士的活动应该被忽视。西方科学对亚洲的思想征服是在天主教的活动中启动的，和历法改革有关系，回顾这一事实十分有用。(37) 中国的耶稣会后继者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上一章试图阐明的主题：天文学研究早就受到罗马天主教的鼓励。解读天象的宗教动机始于宗教改革之前，此前人们就相信，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喜欢人们研究他的杰作。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宗教动机深深扎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不能被认为是新教的特殊副产品。

---

①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哲学家，继承并发展笛卡尔哲学，主张偶因论，试图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新柏拉图主义及圣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进行综合，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神，万物包含在神之中，代表作有《真理的探索》、《基督教沉思》等。

②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哲学对象是物体，排除神学，拥护君主制，提出社会契约说，代表作有《利维坦》、《物体论》等。

8.2 分道扬镳的新教出版政策与天主教出版政策

如果强调新动机而不是旧动机的实施，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天主教—新教的分歧与早期的科学进步有何关系？

> 毕竟，科学的兴起是当下的热门话题。但问题不是为何从长远的观点看新教更加灵活，而是在刺激所谓科学革命即解剖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进步中，宗教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伟大的进步到17世纪30年代多半已经完成。到17世纪40年代，伽利略、哈维和笛卡尔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完
> 648 成之后，你可以有把握地说，科学业已兴起……(38)

我们不必寻找新教与科学的直接关系。如果首先考虑印刷商在“刺激伟大的进步”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更有帮助。一旦廓清印刷商的角色，“宗教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明朗了。比如，你就更容易看清，在使伽利略、哈维和笛卡尔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完成”方面，新教出版商比天主教出版商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你还可能觉得有把握设想，到1640年，“科学业已兴起”，虽然欧洲大陆出版中心的命运仍然受到“三十年战争”变幻莫测战局的影响。最后，你可能不仅会承认，“从长远的观点看，新教更加灵活”，而且会注意到，天主教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那么激发科学研究的兴趣。

当新出现的印刷机没有被纳入考虑的对象时，以下论点就显得似是而非了：“只有在忽略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之间天主教从事的大量科学活动时”，“关于新教重要性的重要论断才能成立”。(39)然而，考虑技术文献的出版情况以后，你仍然可以在承认天主教活动的同时做出那些“重要的论断”：新教鼓励科学的发展和扩张，而天主教并不鼓励其进步。“如果你认为，改革以后的宗教的固有属性是助长科学，甚至就是新形式的探询兴起的原因，那就必须要解释……为何在抵制变革方面，新教和天主教并没有显著的差别。”(40)然而事实上，抵制印刷术影响的情况厘清以后，两个教派的差别就不仅明显，而且是非常引人注目了。一般人把16世纪新教徒反对哥白尼的言论等同于17世纪天主教徒反对哥白尼的措施，这一做法具有误导人的作用。许多数学家由此而误入歧途。比如，雅各布·布罗瑙斯基(Jacob Bronowski)与布鲁斯·马兹里希(Bruce Mazlish)断言，路德鄙视哥白尼，因而“扼杀”了德国的科学革命，这就严重误导了他们的读者。(41)(更何况雷
649 蒂库斯、莱茵霍尔德、梅斯特林和开普勒取得了伟大成就！)神学言论对变革的阻挡未必很严重，阻止出版的具体措施产生的后果则严重得多。(42)天主教敌视科学的措施威胁到科学的生命，新教敌视的态度则不至于这么严重。

新教印刷商出版政治或宗教小册子时常常和当局冲突，但当他们出版数学和

天文学著作时，当局与他们倒相安无事。不仅 17 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是这样，因为（人们常说）那时的宗教狂热快要偃旗息鼓了，而且即使在宗教狂热的路德和梅兰希顿时代，情况也是如此。从一开始，推动维滕堡印刷机和其他宗教改革中心的福音传道驱力就促进了图书市场的扩张。同时，宗教改革家的神学汲取了基督教传 650
统，促进了科学研究。[43] 就我所知，创办印刷所、推进科学出版计划的积极冲动从来就没有受到钳制，也没有被逆转。因此，路德和梅兰希顿反对哥白尼的言论阻挡不住维滕堡教授雷蒂库斯或纽伦堡印刷商佩特雷乌斯的努力，他们出版了天主教天文学家哥白尼的著作。[44] 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接过编务，和出版商共同策划写下这样的序言：《假说》（*Ad Lectorem*），暗示作者提出的是一个纯虚构的图式。[45] 许多权威学者认为，奥西安德尔的立场显示，新教神学和天主教神学一样，他们都只让天文学家做一点“维持门面”的工作，不让天文学家赋予任何行星模式物质的现实。然而，奥西安德尔这篇序言未能阻止新教徒发表不同的观点。相反，它引起彼得·拉米斯发出那著名的挑战：谁能够设计“符合天体真相的天文学”，他就拱手让出自己在皇家学院的教授席位；换句话说，应战的人应该避免诉诸“错误的”假设，比如奥西安德尔《假说》里描绘的假设。反过来，拉米斯的挑战促使开普勒应战说，他证明了地动说的物质真实性，所以他有资格夺取拉米斯的法国教授席位。[46] 由此可见，新教神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都持非常相同的立场，他们都尝试给地动说赋予临时性的假设地位，然而，新教宣传者和天文学家并不怕摒弃地动说是“假设”立场，在 1616 年教廷谴责地动说以后，新教神学家和天主教徒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照。

即使在 1616 年教廷谴责地动说之前，在路德和梅兰希顿宣示地动说之后，天主教出版商也不如新教出版商那样尽力提倡哥白尼的事业。在这个方面，过分强调哥白尼的天主教立场，认为他一生多半依靠教会的惠助，会使人误入歧途，萨尔顿的说法就是一例：“哥白尼得到一位新教数学家的帮助，但对他最大的鼓励来自 651
高级教士……他的书是在天主教最高权威的支持下出版的。”[47] 在哥白尼的天主教教士生涯中，他曾经得到几位高级教士的帮助，他把自己主要的论著献给教皇。[48] 然而，《天体运行论》的实际出版工作是由新教徒完成的。从雷蒂库斯的《天文学初步》（*First Narration*）开始，描述或介绍哥白尼理论的图书源源不断地由新教徒的出版社印行，这些图书或者以新天文学的伪装掩护，或者被称为“新近复活的毕达哥拉斯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天主教修士比如乔达诺·布鲁诺和托马索·坎帕内拉也用了这样的策略，英国的托马斯·迪吉斯和威廉·吉尔伯特也用了同样的策略。威尼斯和巴黎率先印行布鲁诺著作是不真实的谣传。率先印行布鲁诺著作的是英国印刷商约翰·查理伍德，1583 年至 1585 年布鲁诺旅居英国期间，查理伍德出版了他的三部主要著作。伦敦有一批出版商利用《禁书目录》提供

的免费宣传印行禁书，从中谋利，查理伍德即为其中之一。他搞“偷”印，出版外国的通俗语著作，用外国出版商的标记，旨在占领大陆市场。(49)

新教出版商推进早期的哥白尼学说，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与此相比，天主教出版商似乎相当不积极——直到 1610 年春印行伽利略的《星空信使》。该书一夜之间就引起轰动，不仅使作者名噪一时，而且使天文学广为人知，其贡献堪比路德的小册子对神学的贡献，它激发了人们著书立说的兴奋情绪，产生了新的宣传效应。“伽利略望远镜的发现流布之广之快，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星空信使》问世五年以后，伽利略宣告的主要事实已经由旅居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出版了。”(50)不仅侨
652 居中国的耶稣会出版商积极行动，而且威尼斯和罗马的意大利印刷商也调动起来了。文坛曾经指望维滕堡等北方出版中心印行轰动一时、立竿见影的故事，此后再次回过头寄希望于意大利了。甚至在英国，在“伽利略管子”的故事激发的热潮中，早期英国精英的成就也显得黯然失色。“我们在英国诗歌里看见的是‘意大利的月亮’和‘佛罗伦萨的新世界’，这样的月亮和昔日伦敦的托马斯·哈里奥特以及威尔士的洛威尔(Lower)笔下的月亮就是不一样的了。”(51)一位畅销的作家诉诸通俗语阅读的公众，使之兴奋，意大利出版商急忙利用久违了几十年的激情。(52)一阵风似的小册子给本土的出版商带来利润，小册子和观测仪器及图书一道，掀起了新的观天浪潮。但意大利出版商这一笔前途可观的横财只维持了五六年。伽利略激起的狂潮飞到了国外，最终获利的是外国出版商。“人们用通俗语写书”以“传播”哥白尼的观点，产生了“危险的后果”(53)。1616 年关于《禁书目录》的宣教敕令遏制了这个势头。对天主教印刷商而言，公开宣传哥白尼理论甚至出版通俗语的天文学和物理学著作都要冒风险，所以新教印刷商出版这方面的著作更加赢利了。这一情况发生在 17 世纪初；应该注意的是，此后很久，笛卡尔等人的著作才“真正完成”。

你也许会同意，伽利略《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反映了“悠久的大陆传统”，其观点绝不仅仅是弗朗西斯·培根之类的新教徒的观点，而且在许多天主教的精英里也很普遍。(54)但还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伽利略只得到天主教同胞的支持，
653 这封信就会永远不见天日。在 1635—1636 年间，埃利亚斯·迪奥达蒂和路易·埃尔西韦尔在其他友好精英人士及斯特拉斯堡的帮助之下，合作出版了拉丁文版的《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以及上了《禁书目录》的《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使之在整个学界流通。(55)一位科学社会学家认为，这次合作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新教欧洲“积极的‘科学游说’”出现的标志。本-戴维(Ben-David)认为，对伽利略的审判在新教地区被科学宣传者搞得沸沸扬扬，其目的是让自己的事业得到更多官方的支持。这一案例提供了强有力游说的机会，使正在成长的科学社群的集体意识得到提高。不过他认为，事件本身并不重要。

> 在特色鲜明的新教科学政策形成过程中，第一个显著的机会是在教廷加重迫害伽利略时到来的……巴黎、斯特拉斯堡、海德堡和蒂宾根的一群新教学者决定……把伽利略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几个新教社区的普遍支持，以前这些社区对哥白尼思想的宽容并不太引人注目。伽利略的原著在教义僵化的加尔文派的日内瓦搜寻到了；这群学者之一来自蒂宾根大学，前不久，开普勒在这里申请神学学位受阻……我们难以断定，伽利略这个案例在多长时间里被用来将科学新教社区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这个案子在科学地位的确立中并不是主要的因素……(56)

就我所知，日内瓦、蒂宾根这样的“新教社区”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哥白尼思想”不宽容的态度。开普勒在蒂宾根申请学位的麻烦主要是来自他的加尔文派倾向，他在接受路德派的《协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时表现得过于谨慎。(57)毕竟，迈克尔·梅斯特林在蒂宾根的授课使开普勒大开眼界，使他看到托勒密天文学的不足和哥白尼天文学的长处。而且，通过梅斯特林教授的努力，蒂宾根大学评议会还批准出版了开普勒的第一部著作；然后，他又亲力亲为，到印刷所督察，直至他的学生的书问世。1596 年《神秘的宇宙志》出版时，雷蒂库斯的《天文学初步》的第四版也同时印行。雷蒂库斯这部书简述哥白尼理论，一直得到蒂宾根大学的支持，它的问世距哥白尼上《禁书目录》还有 20 年，距所谓“新教游说团”的形成还有 40 年。

“至于教义僵硬的日内瓦”，加尔文反对哥白尼的神话被揭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58)加尔文对哥白尼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他不可能对哥白尼的著作持任何立场。他支持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为他那时的科学家似乎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在支持古代哲人的同时，加尔文反对把《圣经》用作天文学指南，所以他推动了神学与科学的最终分离。事实上，加尔文离反对哥白尼的僵化立场相去甚远；而且，开普勒和倾向哥白尼的荷兰神学家还用上了他的主张；在这些荷兰神学家中，既有抗议派①，也有更加狂热的反阿米尼乌斯派的领袖。在多尔德会议②上胜出的正是反阿米尼乌斯派的领袖。(59)

和蒂宾根及其他路德派中心不一样，加尔文派的日内瓦出版的科学著作寥寥无几。但加尔文派的荷兰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著作。既然荷兰出版商对各国精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下的说法就使人误入歧途了：“在小型自足的新教社区比如日内瓦等地的社区……德国的大部分新教社区以及 17 世纪晚期荷兰的新教社区

---

① 抗议派(Remonstrates)，17 世纪荷兰基督教派别，即阿米尼乌斯派，1610 年向连省议会提出抗议书，反对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其神学观点开明，颇有影响。

② 多尔德会议(Synod of Dort)，基督教荷兰规正会 1618—1619 年在荷兰多尔德举行的会议，旨在解决阿明尼乌派引起的争论，会议通过的《多尔教理》阐述抗议派的谬误，肯定五种教义。

里，科学的命运欠佳，不如科学在意大利、法国和中欧伟大的天主教中心那样走运。”[60]事实上，对寻求出书途径的精英而言，大型的天主教中心提供的帮助少得可怜，而较小的新教社区提供的帮助则非常可观。

在荷兰的加尔文派里，有人拒不认为《圣经》会与任何关怀不搭界，他们反对新哲学与《圣经》相对的观点；所以，以乌特勒支教区长为首的沃伊特派（Voetian party）教徒谴责笛卡尔的信徒和哥白尼的信徒，认为它们与阿米尼乌斯派和自由思想者勾搭有罪。然而荷兰神学家的争吵从来没有对荷兰印刷商的出版计划构成障碍，它们一直为哥白尼信徒、笛卡尔信徒和各种科研工作者服务。[61]在德国的小型
655 新教社区比如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印刷商也能够很好地为科学家（以及各种异见群体）服务；在与罗马关系友好的大型社区里，情况则刚好相反。17 世纪 30 年代伽利略的朋友们迁居莱顿和斯特拉斯堡并不是什么新发展的结果，而是由早已成型的图书贸易模式决定的。

许多新教教授和教士反对新天文学；一些天主教精英则是其助产婆。事实上，新教权威人士很少给科学出版设置障碍，他们积极地助长了（即使是无意之举）世俗图书市场的扩张，这样的市场吸引出版商来到新教地区。而反对宗教改革的教会则与之背道而驰。从禁止通俗语《圣经》和世俗畅销书开始，印刷商就一直受到各种压制，其印刷品难以多样化，结果导致越来越依靠“保险”的虔敬文学以及为教士服务的图书。

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读者谨慎。为教士服务未必给科学帮倒忙。17 世纪的耶稣会士就给严肃的天文学家提供大量有用的数据。人们常作这样的比方：“新教徒为自己解释圣言，科学家为自己解释自然”，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比方持谨慎的态度。“人人是自己的科学家”——清教徒小册子的作者常常把这样的口号推向极端。希尔说：“卡尔佩珀把医学教材翻译成英语……他希望，这些教材能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医生，就像《圣经》能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神学家一样……”[62]卡尔佩
656 珀怀疑拉丁处方和医学学位的用处，鼓励慢性病人自疗，他绝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63]在近代早期，医师们的所作所为很难得是利多弊少，我们有一切理由批评培训医师的方式。即使在那个未启蒙的时代里，医学的进步仍然从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的拉丁文著作受益良多。

比较激进的新教小册子作者鼓励外科医师和药剂师提高文化素养，要求学校多学数学，少学希腊语和拉丁文，就此而言，它们领导的运动无助于科学。但这些运动也可能采取过分反知性的形式。正如前几章所示，掌握古籍以超越古人和模仿帕拉切尔苏斯、焚烧古籍、抨击古人是截然不同的。[64]

新教教义……宣告人人有责任自己读《圣经》。结果……就提出了人人有

责任读自然之书，产生了可以不尊重……亚里士多德、普利尼、托勒密、盖仑等权威的后果……人人都可能成为自然之书的牧师，都能蔑视古代的权威。有人讥笑帕利西不懂古典语言时……他自豪地回答……我只有天地之书，没有其他的书，认识并阅读这本美丽的书人人有责。(65)

作为匠师—作家，帕利西既对公共知识作出了贡献，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陶釉。他在公开演讲中阐述了一个研究计划，后来的弗朗西斯·培根践行了这一计划，证明其意义重大。不过，抨击学术权威、捍卫人人有权读“自然之书”并非总是有助于科学的进步。后来的原教旨主义者宣称有权自己判断达尔文的学说时，难道不是站在与此大致相同的立场上吗？偶尔，伽利略也越过读拉丁文的教授而直接诉求于同胞的“常识”。即便如此，他还是指出，理解人体器官或天体运动还需要特殊的训练，仅凭肉眼观察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专门训练。 657

愚人的眼睛看人体外表时，他能够觉察的东西很少；相比而言，细心且训练有素的解剖学家和哲学家却发现大量美妙的机巧……同理，一般肉眼所见的表象少得可怜，相比而言……经过长期而精确的观测，博学之士凭借自己的天才就能够发现奇妙无比的天象……(66)

在另一段著名的文字里，伽利略再次强调自己的信念：虽然“自然之书”总是敞开让公众视察，但它并非真的“容易人人理解和阅读”。

哲学写在这本伟大的书里，宇宙总是敞开让我们观察。但除非你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学会阅读其书写，否则你就读不懂这本书。这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67)

当然，数学语言和希腊语或拉丁语不同，其不同之处是，它不像母语那样容易学。相反，17 世纪的数学语言越来越复杂，其变化越来越大。“对一般的机械工而言，牛顿像托马斯·阿奎那一样难以理解。知识不再锁定于必须由基督教学者解释的拉丁文《圣经》中；而是越来越锁定在科学的技术词汇里，这些词汇必须由新型的专家来解释。”(68) 如果将“一切信徒皆牧师”的主张用于研究自然，那就既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契合，也要考虑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如拉布所言，人们经常对早期新教思想和科学思想所说的相似性“并不能证明两种运动存在着重要的联系”(69)。

我同意，单纯的比附并不能证明什么，而且我相信，这样的比附有时走极端。但我要再次指出，如果赋予出版计划更重要的意义，你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联系。比如，通俗语读者越多，可资利用的科学才能的资源就越丰富，因受到鼓励而愿意袒露行业秘密的工匠就越多，他们就会出版论著，以吸引更多顾客到自己的店铺或作坊。由于文化知识在社会里的深入，出版商和读

658 者新型而有益的交流就受到鼓励。地图和药谱作者呼吁读者寄去介绍海岸线的笔记或植物和种子标本时，一种形式的数据搜集就启动了，“人人”都能够扮演支持的角色。普利尼的《自然史》和托勒密的《地理学》没有被帕拉切尔苏斯的追随者或清教徒焚毁，但它们最终却永远过时了。即使宣扬预言的出版物也刺激了年鉴和星历表的销售，可能还激励了一些读者去购买望远镜；仪器制造商也受到鼓励去出版更多的小册子，以争取顾客光临自己的店铺。(70)

人数众多、成分多样的读者日益壮大，对书商、仪器制造商、算师和其他作者而言，他们对产品的需求都至关重要，因为他们都对应用科学作出了贡献。人们在描绘新的科学精神时，常常引用作者的序言。雷耶尔·胡卡斯对此作了描述：

> “新”科学的捍卫者呼吁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为自然史、地理和物理学知识作出贡献，请他们报告自己的观察：飞鸟与鲜花、潮汐的涨落、天象的变化……以及磁针。他们特别注重邀请旅行者和航海人报告自己的观察。(71)

胡卡斯把这类邀请与新教观念联系起来，这有点似是而非；他指的新教观念是：“一切信徒皆神父”，“人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读自然之书。”事实上，并非每一位请求读者回应的人都是虔诚的新教徒，或“新科学”的有意识的捍卫者。许多情况下，他们有意识的行为是制造地球仪、绘制地图、编纂年鉴，或者撰写其他指南，或者制造其他工具。他们希望以可靠和实用的产品而扬名，借此吸引顾客、战胜对手，确保销售稳定。

659 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时，胡卡斯气愤地批评新教这样一个观点：

> 新教坚持认为，实用发明给人类的裨益……不是新兴商业阶级资产阶级心态的表现，因为这个阶级把自己的拜金主义意图隐藏在虔诚的外表之下。对上帝和他人的真诚的爱才是主要的驱动力……(72)

我们再次指出，把一种动机和另一种动机对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因为“两种情况皆而有之”是大多数人的追求。就推动技术出版的动机而言，驱动力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上帝之爱或财神之爱，而是两种爱皆而有之，而且还要加上对同胞、对自己的爱。总之，技术出版的驱动力是利他和利己两种动机有力的混合，正是这种混杂的动机推动了早期的《圣经》印刷，以及地图出版和工具制造。（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两种活动携手并进，因为印刷商常常把新的小册子和其他技术指南作为《圣经》的附件同时出售。）我想，在追名逐利的同时有机会敬奉上帝、帮助人类，这对天主教和新教的仪器制造商、算师和地图出版商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不过，教会的官方政策差别很大。天主教徒的努力遭遇刹车，而新教徒则推进到高速挡。于是，审查政策使印刷商沮丧，削弱其市场，以至于堵塞了天主教地区的科学出版路径。

另一方面，助长通俗语《圣经》扩大市场的力量同时又促进了通俗语读者和出版商的交流。

8.3　堵塞思想试验，提倡创造行为

当然，一些权威人士质疑，实用的通俗语著作和培根式的研究计划是否应该和真正的科学进步联系起来。他们强调的是一小群精英的创造行为，精英们使17世纪获得了天才世纪的美名。这一派学者把搜集数据、推进"实用知识"搁置一边，认为这类工作与帕斯卡、哈维、开普勒、伽利略、马尔皮基[①]等人的研究工作没有关系。

> 无疑，科学革命的功利主义是有限度的……经典的实验没有丝毫应用价值……人在世上的命运的改善与此无关……
>
> 我们对帕斯卡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开普勒的行星研究、伽利略的力学研究、梅森的音乐研究、笛卡尔的宇宙论、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和牛顿的《原理》。思想上的好奇心在这里至关重要，粗俗的功利主义在这里并不重要……社会学研究……不是要注重技术和经济需求，而是要注重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社会思想环境。(73)

660

我们在此重申，避免非此即彼的态度似乎是可能的。思想上的好奇和实用的三角学同时进入了"开普勒的行星研究"。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钻研《鲁道夫星表》，自己又写了一本书，这不仅是要满足"思想上的好奇"，事实证明，这本书对星图表的编者和天图的出版商都有用。编制函数表、开发对数表和计算尺的活动既生产实用的工具，又促进了新的创造行为。

在这个方面，回忆拉普拉斯[②]的有关论述是有价值的。他说，对数表的发明相当于使天文学家的寿命延长一倍。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强调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忽视了早期近代科学活动中的其他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印刷品节省的脑力劳动，就可以解释被他们忽视的因素。目前工作伦理的指针源自于马克斯·韦伯，他重点研究的是如何防止有闲阶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一套价值观。(74)关于印刷术给予有闲阶级新的闲暇，我们还得多讲几句。在知识阶级内部，有条不紊的工作习惯和免于繁重劳动的闲暇是同时发生的。思想实验需要免于死抄文献而获得的时间，需要免于手工编制冗长的数字表格而获得的空闲。课堂上较少依赖死记硬背也给

---

① 马尔切罗·马尔皮基(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意大利生理学家、医师、解剖学家，率先用显微镜研究人体和动植物细微结构，发现了毛细血管循环系统。

② 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

新的思想才能以用武之地。印刷术使自然哲学家有更多时间去从事思想游戏，去设计有新意的试验和新工具，甚至使他们有时间去捕捉蝴蝶和昆虫，以搜集标本。

在这个方面我赞同刘易斯·费尔(Lewis Feuer)的意见(虽然我认为他在其他
661 场合把这个主题玩得过火了)：只讲科学家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那是错误的。(75)卡尔达诺(Cardano)期待创立概率论，因为他喜欢研究赌博，但他未能创立这门学科，因为他的《论赌博游戏》(*De Ludo Aleae*)(与他的《伟大的艺术》[*Ars Magna*]不同)要等到帕斯卡和费马的相关著作出版以后才得以问世。尽管如此，纸牌游戏、打赌和掷骰子(都是清教徒极其厌恶的)还是为17世纪概率论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76)帕斯卡的詹森主义使他和清教神学有关系，但他那著名的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打赌"显然有迥异于清教的弦外之音。研究人们快速发展的解谜技巧时，快乐原理是不能够排除在外的。玩弄这些技巧的人被描绘为半吊子或爱好者。印刷术发明以后，工匠人和游戏人受到鼓励将自己的脑力用于新的途径①，近代出现的弈棋人和观鸟人足以为例。早期近代科学的兴起既得益于虔诚的情怀和谋利的驱动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游戏的心态和"闲暇"的好奇心。

即使穿黑袍的执业律师、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也利用新出现的休闲，他们到书市浏览，玩数学游戏，用印刷手段发布公开信函、提出挑战，以调动欧洲的才俊。利用这一手段的人并不限于官僚主义者和资本家，他们赞助自己认为有用的发明，比如在海上测定经度的方法。牛顿回忆童年时代在海滨戏水的情景时说，他"寻找比较光滑的石子或比较美丽的贝壳"，这似乎和工作伦理格格不入，甚至有几分异教
662 的含义。(77)正如休·卡尔尼所言，我们需要给纯精神上的好奇心适当的分量。

尽管如此，即使乍看实用的脑力成果以及卡尔尼提及的一切"经典的试验"都需要反复求助于各种印刷材料。图表和表格不是有闲阶级在慵懒时刻绘制的。更好的地图和地球仪的生产，数据搜集的新冒险改进了地球测量的估算，这些成果既有利于应用型科学，也有利于纯科学。(78)远征船队一回港，出版商就争先恐后抢夺新闻，仪器制造商出门去叫卖库藏，这些举动都有助于一切科学试验——无论其宗旨是能够开花结果还是仅限于给人启示。

即使只考虑少数天才人物进行的仅限于给人启示的试验，他们的出版物设计的许多实际问题也必须要予以考虑。凡是出版途径遭遇危害的地方，思辨的自由就受到危害。官方的审查制度甚至可能影响到隐秘的精神生活。比如，你难免会问："笛卡尔的宇宙论"是否完全被揭示出来了？甚至对他自己而言，这一理论是否

---

① 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区别工匠人(*Homo Faber*)、智人(*Homo Sapiens*)和游戏人(*Homo Ludens*)，借以说明人类的三种功能。见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译序第3页。

已经完全揭开了面纱？1633 年听说伽利略的命运时，笛卡尔停止写作他那宇宙论的鸿篇巨制，也许这一负面的举动剪断了他那想象的翅膀。[79] 相反，牛顿的创造力却可以自由发挥。确保思辨自由的条件大概和“原创性的发展”有关系。这样的条件大概和经济、技术等世俗的事物有关系，和教会及国家事务也有关系。 663

拉布告诉我们，到 1640 年，“科学业已兴起”；笛卡尔、伽利略和哈维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然而事实上，笛卡尔的工作显然尚未完成。他完整的手稿《论世界》从未发表，即使身后也未能出版。而且，到 1640 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尚未被人接受。三种行星运行模式、六套互相矛盾的星表正在流通。椭圆形运行轨道远不能和抛物线运行轨道接触。在此期间，刊印开普勒、伽利略和哈维的利用欧洲大陆出版商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因此，“科学业已兴起”的断言也许并不保险，尤其在出版商受到新的控制的地区，我们更没有把握说，科学业已兴起。比如在意大利，虽然秘密图书贸易已经站稳脚跟，但科学出版计划却在减少。因此，我们不妨设想，在伽利略的同胞中，科学不是在“兴起”，而是在潜入地下。不过，由于皇家学会的努力，意大利科学至少可以走向国外了，英国皇家学会支持值得推广的外国科学成果。

皇家学会资助出版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遇到困难，不仅是因为出版英国精英的著作比如威洛比等人卷帙浩繁、耗资不菲的著作耗尽了财力，而且是因为印行意大利学者的著作需要花钱，这些学者在意大利工作，但在那里难以出书。比如，马尔切罗·马尔皮基所有的主要论著、1669 年以后出版的一切著作全都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印行的。[80] 正如雷蒂库斯为出版哥白尼的著作努力、迪奥达蒂为伽利略张罗、哈维为牛顿奔走一样，马尔皮基著作的出版没有得到同胞的帮助，而是得到英国人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和罗伯特·胡克的帮助。这些皇家学会的秘书长为伟大的胚胎学家马尔皮基提供最新出版的技术文献(等待邮自英国的书容易，在本地书店买书反而难)。他们请马尔皮基撰稿，反复向他保证：他的文稿“得到海外哲学家们”的欢迎。[81] 总体上说，他们给予这位意大利精英 664
在国内得不到的鼓励和支持。意大利的氛围使他的著作不那么受欢迎，从他的书信可以看得出这样的气氛。他还在信中透露，他担心由于“和新教徒的商业往来”而受到报复。他又说，据朋友相告，“受意大利审查官谴责的书漂洋过海到英国印行”对他很有好处。[82]

奥尔登伯格当时就认识到，这样的机会不仅对马尔皮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知识界也有利。这位皇家学会的秘书长和马尔皮基的通信显示，他充分意识到印刷机为科学进步做出的特殊贡献。[83] 他要焦急的马尔皮基放心，他论蚕虫的著作将用“豪华本”出版。奥尔登伯格指出，这本书的出版“将促使所有的学者发表各自的意见，也许还包括你尚未看清的观点，他们的意见将要给人更充分的启示”[84]。奥

尔登伯格这段话强调的主题正是贯穿本书的主题:印刷术为阅读拉丁文的学界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研究成果的出版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熟悉马尔皮基技术性很强的论蚕虫的专著,但“将促使所有的学者发表各自的意见”,换言之,它将为所有合格的研究者作出贡献,他们核查别人发表的观察所得,重做试验,或设计新的检测,发表新的数据。奥尔登伯格对科学出版的价值有清晰的理解,为科学出版而积极努力,但一般的论著中并未经常认可他这方面的活动。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印刷术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科学社团的承认,勒诺多与黄金协会的创建人都认识到其重要性。然而,由于围绕所谓“培根式”运动的辩论悬而未决,在这一运动对 17 世纪科学进步的作用上尚未统一认识,人们在其核心作用和边缘的作用上各执一端,所以印刷术对科学社团的重要作用仍然被搞得朦
665 朦胧胧。有人鄙视“培根们”,认为他们仅仅是科学的提倡者,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也有人拥护培根式的学者(同时又将其描绘为苦战中的清教徒式的人物,试图打倒阅读拉丁文的精英),而这两种人又强化彼此的立场和主张。至于昂贵的科学技术出版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论战的双方往往都重视不够。

在这场辩论中,皇家学会的特殊贡献被打了折扣,同时出版审查制度的特殊威胁往往也被打了折扣。如今,模糊伽利略受审产生的回响俨然成为时髦之举,人们往往把这场审判引起的轰动当作新教徒的精明的宣传。

> 谴责伽利略的戏剧性事件本身是否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个问题很值得怀疑。由此而引起的义愤……大概强化了科学的普及。伽利略被谴责之后,科学活动并没有停止的迹象……诚然,林塞学会①的活动夭折……但一些成员还是继续积极活动……而且积极参与组建西门托学会②……(85)

虽然 1632 年以后意大利的科学活动并没有停止,但对林塞学会、西门托学会和研究者学会(Investiganti)及其成员的研究表明,这些学会都被搞得残缺不全。林塞学会不得不停止研究物理学和天文学;短命的西门托学会完全依靠一位美第奇家族公爵的支持,十年之后就被解散,其成员两人被宗教裁判所囚禁,其论文集《例证》(*Saggi*)1667 年才得以印行,即便如此,该书却不能在意大利书店出售。(86)实际上,由于英国皇家学会将其付梓,《例证》才在国外广泛传播开来。(87)

将 17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的政策和与其对应的意大利西门托学会略作比较,似乎是值得的,即使仅仅是为了显示,不同的出版政策可能会刺激或窒息科
666 学进步,那也值得作一番比较。在出版《皇家学会通讯》的同时,皇家学会继续不断

---

① 林塞学会(Lincean Academy),直译“目光敏锐者”学会,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学术社团。

② 西门托学会(Academia del Cimento),直译“试验者”学会,伽利略曾在其中活动。

地推出丛刊[88]，吸引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订户和读者。相反，西门托学会只出过一个“汇编”，题名《例证》，而且其第一版在意大利国内是买不到的。皇家学会的《通讯》鼓励署名来稿，以扬名的诱惑力吸引国外作者。编者们注意保护知识产权，记录来稿日期，以裁定作者的优先权争议。西门托学会的《例证》则匿名发表论著，以保护投稿人免受迫害。如此，《例证》就剥夺了作者成名的机会，又使之失去投稿的动机。[89]

> 作为未能存活的机构……[西门托学会]显示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科学的“奖赏结构”。在近代科学的社会体制内，原创性研究……首要的刺激因素之一就是获得认可和地位的欲望……这个学会失败了……因为其成员中最有才华者的热情遭遇劈头冷水，其唯一出版物采用的是作者匿名制。[90]

正如麦克斯·费希(Max Fisch)的文章《研究者学会简介》所示，不利的政策还损害了那不勒斯这个主要的科学研究会。其成员常常跃跃欲试，想要发表论著却止步不前，不愿跨出冒险的一步。例如，托马索·柯内里奥(Tommaso Cornelio)因再三推迟发表的时间而“失去信誉”，人们难以相信他那重要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英国学者的成果比他晚，却很快就赢得盛名。[91]有人说，那不勒斯应该和帕杜瓦、佛罗伦萨、哥本哈根、巴黎和伦敦齐名，应该是17世纪的科学活动中心之一。[92]诚然，17世纪的那不勒斯有许多杰出的学术精英，但那不勒斯并非科学家的福地，凡是想要在这里发表论著的人往往都会遭遇成果过时的命运。柯内里奥的老师马可·奥雷利奥·塞维利诺(Marco Aurelio Severino)1656年去世时，留下了75卷未刊稿。他接待过许多来访的英国学者，他仔细研究哈维的开创性著作，也曾经给英国的朋友去信以寻求出版渠道。[93]塞维利诺的老师托马索·坎帕内拉被一位教皇从那不勒斯的监狱里解放出来以后，到巴黎一所女修道院避难，其避难所离梅森的修道院不远。但在命途多舛的1616年，他在那不勒斯撰写的《为伽利略辩护》(*Apologia Pro Galileo*)不得不靠他的德国弟子偷运出境；在玫瑰十字会的支持下，该书在法兰克福印行。[94]

1616年，加尔默罗会修道会的长老福斯卡里尼表示，哥白尼的学说可能与《圣经》一致，他由此而被剥夺说话的机会。17世纪稍晚的时候，英国国教的主教托马斯·斯普拉特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也遭到反对。有鉴于此，英国医师亨利·斯塔布(Henry Stubbe)动情地写了《关于〈皇家学会历史〉里某些文字危害现存宗教和英国国教的审查报告》。[95]然而，和福斯卡里尼及其印刷术不同的是，斯普拉特主教及其同事可以比较宽宏大量地看待这样的“审查”。争论吸引公众注意，可以促销。英国各种反教廷的力量使英国人团结，这些力量保护着《皇家学会史》的作者。许多人容忍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其中一位说：“倘若詹姆斯王仍然在位……

冒犯教皇的诗歌……还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96]和那不勒斯的西门托学会会员不一样，皇家学会这位辩护士可以吸收《圣经》人文主义者和通俗语译本的遗产，借以给科学新事业提供宗教保护。英国国教和皇家学会都可以宣称拥有“宗教改革”的成就。斯普拉特说道：

668

> 两者大致相同的历程产生了这样的遗产；双方都绕开讹误丛生的文本，直接引证可用于传授的完美的原本；一方引证《圣经》，另一方引证浩瀚无际的《万物之书》(*Volume of Creatures*)。他们的对手都指控他们犯了同样的罪行：抛弃了古老的传统、冒险尝试新奇的事情。他们都认为，祖先可能会出错；同时又维护对祖先足够的尊敬……[97]

斯普拉特所谓“足够的尊敬”暗示，公共知识的确立需要谨慎和自制的态度。即使在英国，那些把富有争议的事业推向极端的人也可能得不到保护和赞助。在王政复辟时期，这一现象尤其突出，因为人们害怕引起内战。精英学者容易把魔术师和巫术师混为一谈，他们的队伍中有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所以他们在推进事业时有理由持谨慎的态度。“宗教改革”者的宣示和玫瑰十字会及革命者的宣言掺合在一起，这一事实绝不是没有政治含义。[98]况且，精英人士从事的“真资格试验”和江湖骗子那一套神秘—巫术伎俩之间还残存着混淆不清的局面。作为“爱好者”和未获授权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的创建者，这些试验者也容易遭到非难，容易被认为是狂热的清教徒和平均主义者一类的人；这些人和试验者相反，他们抨击拉丁学问、大学教授，反对授予任何专业学位。[99]

为了得到对新形式“公共知识”的支持，皇家学会创始人采用了类似于马兰·梅森的策略。[100]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中性、无害的外表表现自然研究，在霍布斯“无
669 神论唯物主义”和“爱之家—平均主义—巫术”的潮流之间小心翼翼地走一条中间道路。[101]斯普拉特主教主张宗教改革，欢迎工匠投稿，提倡朴素的通俗语散文，与此同时，他强调皇家学会非政治、非派别的性质。他不发表诗歌和巫术，而且拒绝宗教和政治题材。他的《皇家学会史》不只是暗暗地为学会的政策辩护：中性的科学学会接过了中世纪教会为不同教派提供平安保护的功能，使冲突的教派不至于彼此割喉残杀。稍后，约瑟夫·艾迪生说道，皇家学会的宗旨“与其说是推进自然知识，不如说是让当代许多最伟大的天才远离政治，使其不至于使国家陷入火海”[102]。在他的笔下，吸引精英人士的“无害的娱乐”旨在使之远离以前那种清教徒似的狂热，旨在召唤摆脱原罪的伊甸园似的自由。在自然研究的庇护下，国教教徒和清教徒可以向“平安王国”居民那样行事，在那里狮子和羊羔可以同眠。“自然那美丽的胸脯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进入其乐园，品尝其硕果，用丰饶的果实满足自己的需要。”[103]在他的笔下，科学能恢复人类堕落之前的地上天堂，许多权威学

者表达了这类异端的含义。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数据搜集、扩张的知识产业和期刊景观，另一方面是封闭的乐园、谦恭的少女和禁果的风情，两种画面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含义尚待我们去探索。

8.4　为伽利略的审判重新搭台

对意大利的精英人士而言，构建类似英国人的庇护所根本就不可能；剑与火堵塞了这条路。“自然之书”没有敞开让公众审视，而是被删削了，大片的领地被宣告为禁区。图书馆被洗劫，印刷商被监禁。对迫害的恐惧导致一种独特的自我审查，这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受到的审查截然不同，英国人不得不远离政治和神学，但他们可以到大自然里去自由徜徉。

> 史学家没有清楚阐述《禁书目录》兴起的原因。他们没有阐明不同情况不同地方的实际差别……某些图书、出版商、进口书籍的销售和流通的背后……战斗在静悄悄地进行……一百五十年来富有活力的新颖的一切文化果实正在被肢解、受压迫…… 670
>
> 旨在保护天主教世界、使之不受欧洲知识进步影响的那场大战役的秘史，尚待我们书写……伽利略时代的文化界笼罩在猜忌、密谋和压制的氛围中，这样的气氛难以理解。一切都危险……异端从词典的字里行间被抠出来，从格言警语集子里被挖出来；有人相信，异端就隐藏在印刷商的名字里，这样的异端必须要斩草除根……[104]

自 1965 年尤金尼奥·加林的《科学与文明生活》(*Science and Civic Life*)里的这段引文面世以来，几位史学家已经比较清楚地阐述了意大利一些地区那一场“静悄悄的战斗”。约翰·泰德斯基研究了 1592 年到 1606 年间佛罗伦萨的文献，描绘那“有增无减的混乱”和无限期延宕致使书商和出版商破产的局面。他同意加林的论断：“罗马审查制度给意大利文化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05]保罗·格伦德勒研究了威尼斯更长一段时间(1540—1605 年)的情况，他描绘的图画不那么黑白分明，这是因为威尼斯的政策常常和罗马抵触。据他的描绘，威尼斯贯彻教皇敕令起初磨磨蹭蹭，后来，熬过了禁令危机以后，行政官员们最终削弱了教士审查官的权力。格伦德勒还指出，即使在与罗马宗教法官合作的日子里，对创新性文学的“肢解和压制”也不是完全成功的。在 1570 年至 1590 年间，威尼斯精英人士仍然可以得到禁书。“宗教裁判所无法阻止图书走私”，无法“阻止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图书被偷运到意大利”。不过，图书走私的利润并没有进威尼斯印刷商的钱包，由于和罗马合作了 20 年，他们遭到惨重的损失，外国竞争者则深受其惠。在威尼斯，“按照《禁书目录》实施禁书的政策几乎完全有效”，这就给本地的书商和出版商以“长期

671 的打击”[106]。

意大利的精英学者似乎和国外的创新性文学保持着联系，至少16世纪威尼斯的精英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后来，威尼斯的文人对亲共和、反教皇的宣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为争取出版自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精英学者和文人筹集出版资金成功吗？他们能够找到甘愿冒险实施他们的出版计划的印刷商和赞助人吗？人们很少提这样的问题，所以教会审查制度给早期近代科学的沉重打击常常被人忽视了。研究者没有明确指出1616年教皇敕令和1633年对伽利略的审判所构成的清晰而现实的威胁，相反，他们仔细研究教士们的神学立场在这两次事件中的细腻差别。然而，无论这样的细腻差别多么有趣，它们给我的印象始终是文不对题。[107]

1616年的教皇敕令把哥白尼学说描绘成与《圣经》唱反调的异端，谁也不能捍卫它，甚至不能接受它。不过，朗福德告诉我们，哥白尼的理论仍然可以当作假设来表现（虽然是难以自辩、荒诞不经的假设）。而且，“即使有天主教天文学家肯定哥白尼的体系是正确的”，他们也不必违背他们内心的信念。敕令要求有错误的权威“发自内心的赞同”，对此深信不疑的人“就得到宽恕”[108]。内心里的赞同可以抗拒，但外在的异见呢？在出版这个关键问题上，近年的天主教辩护者几乎未置一词。在那样的情况下，内心不怀疑（且肯定哥白尼正确）的天主教科学家仍然被期待保持沉默，否则他们就因为不能证实自己的科学主张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至少这一结局是伽利略被审判自然产生的后果。

> 伽利略……公开违抗明确禁止他宣示自己理论的禁令，显然他也未能证明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尽管如此，我们也难以看懂这场审判的逻辑。没有理由谴责他的《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这本书以扎实的理由捍卫了新天
672 文学。倘若它有什么值得反对的地方，它就应该像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样被禁止，直到修订完毕并带有更多假设的性质。至于伽利略个人，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令其忏悔，因为他违背红衣主教贝拉明的劝诫……至于《禁书目录》的敕令，那是针对书的，而不是针对作者的。[109]

显然，1633年谴责伽利略的高级教士们对问题的认识和朗福德之类的现代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朗福德认为，伽利略的案子常常被抽离历史语境，虽然如此，他难以理解“审判的逻辑”说明，他在重构17世纪教士们的心态时并不完全成功。无论如何，针对任何图书的敕令必然会打击印刷商和作者。无论今人如何解释1616年和1633的敕令，毋庸置疑，它们在天主教国家产生了抑制科学出版计划的后果。那时的教会主张，只要新体系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旧体系就必须维持；教会禁止伽利略进一步“演示”新体系“事实上正确”的尝试。[110]由此可见，教会并

不是在鼓励暂缓做出判断，也不是在鼓励进一步的研究。对伽利略的谴责不仅使出版计划夭折，而且还堵塞了以哥白尼图式为真实基础的“思想试验”。

> 可怜的博雷利[①]！他正走在伟大发现的路上……他放弃了试验结果背后的理论，故而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胡克和牛顿比他勇敢。牛顿翻越了堵塞博雷利的路障，使他成功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的思想勇气……(111)

把胡克和牛顿与博雷利进行比较时，你的讨论不能仅限于“内在”因素。当然，天才的解谜人的技艺水平和特殊才能是必须要考虑的，但你也必须要给分布不平衡的“外部”因素足够的分量。否则，你的比较就是不公平的。博雷利既可能不如牛顿勇敢，也可能比牛顿勇敢。毫无疑问，推动他前进的刺激因素比较少，需要他克服的障碍更加令人畏惧。

针对哥白尼的敕令也可能被当作挑战，促使人提出更多恰当的证据来证明日心说，就此而言，能够比较勇敢应战的是新教科学家，而不是天主教科学家。天主教神父拉米斯把奥西安德尔为《天体运行论》所作的序言当作挑战。他致欧洲天文学家的公开信促使新教科学家开普勒努力向前。然而，当伽利略不能为日心说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时，他的案子就算铁定了——至少就教皇敕令所能达到的地区而言就算定案了。你难以想象，意大利科学社团的成员能够像英国人哈维那样勇敢，他敦促牛顿战胜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圆满完成宏大的设计；这些社团的成员很难有哈维那样的勇气；哈维自始至终负责牛顿著作的出版，并确保进行有效的宣传。天主教精英更倾向于劝阻朋友，使之不要太认真地对待遭到谴责的理论。即使没有朋友劝阻，虔诚的天主教徒继续自己的研究时也会感到内心的阵痛。

就这样，西门托学会的成员在小心翼翼从事实验时，就避免宏大的理论，因而妨碍自己的思想试验。在准备出版该学会论文集《例证》的文件堆里，人们找到了这样一张字条：“提出原创性构想是危险的，所以文稿付梓前，一定要仔细检查。”(112) 由于害怕发表颠覆性的题材，《例证》排除了关于彗星的有趣的探讨和研究成果。1633 年以后，宇宙论和天文学都成了潜在危险的领域。尽管博雷利讥笑实行作者匿名发表成果的制度，而且他最终还离开托斯卡纳以便靠自己出版著作，但他刊布一本论彗星的书时，还是选择了匿名，在出版《彗星轨迹论》(*Theoricas Mediceorum Planetarum*)时，他还是掩盖了一段有哥白尼含义的文字。(113) 皇家学会捍卫率真直言的发言人比如斯普拉特，其目的不仅是要将诗人、修辞学家和寓言

---

① 焦瓦尼·阿方索·博雷利(Giovanni Alfonso Borelli，1608—1679)，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家，率先推导出天体的抛物线运动轨迹，率先用静力学和动力学研究肌肉运动和其他身体功能，著有《动物的运动》等。

家排除在学术界之外。这一立场既有负面的影响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还反映的是这样一种意识:“伊索寓言式”语言虽然足以愚弄审查官,却常常欺骗了科学界的同行,有时还抑制了自己条理清晰的思维。

674 也许,上述议论足以说明,几位权威学者笔下描绘的兴旺的意大利科学活动有必要加以修正。虽然西门托学会成立且做了重要的工作,但它的科学出版计划却瘫痪了。意大利的其他科学团体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个方面,近人对 16 世纪中叶威尼斯学会(*Accademia Venetiana*)的记述给人以启示。该学会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重振威尼斯作为领头出版中心的威名”。它决定借重保罗·马努提乌斯的印务公司,以刊布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1557 年成立以后,学会无力筹措大量的经费,纸张的采购费、印刷商和编辑的服务费、书店的租金都不能支付,到 1561 年就宣告破产。[114] 16 世纪 50 年代,教廷施压,要求控制印务公司,要求威尼斯的审查和《禁书目录》保持一致。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威尼斯的书商们遭遇到官方制造的重重困难,威尼斯学会创建者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似乎选错了时机。但检视下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时机从来就不曾到来,意大利的出版路径从来就没有摆脱突然被堵死的风险。

在这个方面,为审判伽利略而搭建的舞台和其他的历史事件一样,是很蹩脚的。1616 年,教皇的敕令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列入《禁书目录》。接着,福斯卡里尼的《书简》也被禁(该书出版于 1615 年,是这位加尔默罗会修会长老的论著,计 64 页,他认为,哥白尼的理论不仅实际上可行,而且神学上健全)。这两件事已经有许多人做了研究。但《书简》的出版商拉扎罗·斯科里焦(Lazaro Scoriggio)由此吸取的教训却很少有人问津。“1616 年 2 月初,伽利略……觉得……胜利在望。他致信教会人士,请求准许他……造访那不勒斯,大概是去见出版商福斯卡里尼甚至坎帕内拉,以阻止一场支持哥白尼的运动……”[115]

3 月 5 日,有关哥白尼学说的教皇敕令正式发布。福斯卡里尼的《书简》本来是要调和哥白尼的观点与《圣经》,但它“全然被禁,并遭到强烈的谴责”。而《天体
675 运行论》只是“暂停发行,直至得到矫正”。神学著作被禁,天文学论著暂停——这是两种不同的遭际,天主教的辩护士常常强调两者的差别,其他人则试图借此缓和禁书造成的打击。于是我们看到,朗福德断言:这“并没有使天文学的进步严重受挫”。柯斯特勒认为,虽然这给“市井小民”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但“敕令对科学探讨和研究的影响实际上还是维持原状”[116]。但他们两人都没有指出,敕令发布的第二年即 1617 年,一家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印行了《天体运行论》的第三版,这位出版商是荷兰的天文学家、地球仪制造商和地图出版商威廉·詹森·布劳。[117] 也许,和许多竞争者一样,布劳希望利用禁书的好处,当然也有可能他早就在准备印行 1617 年这个版本——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第三版出现时,影响物理学和天文学的

科学出版计划陷入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模式。这个模式曾经对伊拉斯谟、薄伽丘、拉伯雷、路德和马基雅弗利产生过类似的影响。新教出版商获得了靠出版禁书赢利的新机会。同时，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却压制着天主教国家的科学出版商。林塞学会的一位会员退会，他指控伽利略坚持他已被禁的观点。[118] 伽利略放弃造访那不勒斯的计划，表面上的原因是“路况不好”。但正如德雷克所言，1616 年 3 月 5 日之后，“通向那不勒斯的道路……崎岖不平……就不止一种意思了”。“印行福斯卡里尼《书简》的出版商不久就锒铛入狱，福斯卡里尼本人同年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119] 就科学出版计划而言，通向那不勒斯的道路根本就没有改善。

在 1633 年以后的十年里，伽利略的处境颇像 1517 年以后十年里路德的处境，他得到许多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的支持，他们既赚了钱，同时又使教皇的禁令失效。他那被禁的《关于两个世界的对话》再一次证明，《禁书目录》提供的书名使新 676
教出版商获益匪浅，相当深奥的被禁的科学论著也增加了不少的吸引力。[120] 据乔治·桑蒂拉纳的精彩记述，伽利略的《对话》一书的黑市利润相当可观：

> 牧师、修士、高级教士争先恐后地到黑市上去买《对话》……黑市上的书价从半个斯库多银币涨到 4 个斯库多、6 个斯库多（接近 100 美元），意大利全境都卖这样的高价。[121]

然而，伽利略的《关于两个世界的对话》既引人入胜又富有争议，在众多的科学著作里，它遭遇的审查是很不典型的。但他稍后出版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Discourses on Two New Sciences*）却不能说不典型，该书为经典物理学奠定了基础。

> 没有了不起的宇宙问题或哲学问题渗入这部没有激情的论著……像初级力学讲稿一样，它不可能富有争议、激动人心，他研究的是力学的终极源头。
>
> 伽利略生涯里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遭遇挫折的《对话》非常有趣，而无争议的《谈话》却一路顺风。[122]

难以想象还有比《谈话》更好的“纯科学”例子，它自然被放进“超越混战”的书籍之中，不是那种“初级力学讲稿”的“终极源头”。然而，那了无趣味、“没有争议”的《谈话》也引起了争论。软禁伽利略的人不会认为它“没有争议”；如果你考虑该书借以出版的手段，其成功就不能说是“了无趣味”的。一位年迈而坚定的政治囚徒，囚禁他的人不准他出书，甚至不准他写东西；一位荷兰印刷商到意大利登门造访，又用外交邮袋将囚徒的手稿偷运出境——这些故事调料并不乏趣味性。它们可以编织成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677

《谈话》于 1636 年写成，伽利略年届 72 岁，由于不可能在意大利出版，手

稿被偷运到莱顿，由那里的埃尔西韦尔公司印行。但《谈话》还有可能在维也纳出版了，那里的耶稣会士保罗印行这本书可能得到了皇家的恩准。(124)

你难免会问，柯斯特勒关于《谈话》可能曾在维也纳出版的乐观说法有何根据，因为维也纳印刷商必然要冒遭遇报复的危险。毕竟那里有许多大官不允许《谈话》出版，而且认为给伽利略的任何支持都是颠覆之举。柯斯特勒这里的记述，亦如他在其他地方的描绘一样，似乎低估了反弹的实力，应该用其他记述提供的例证来加以平衡。

奥尔穆茨(Olmutz)的主教获准出版《谈话》，显然是得到皇帝的恩准；接着，耶稣会士保罗又在维也纳得到《谈话》的出版许可证，于是，其他耶稣会士立即争先恐后搜寻《谈话》。1639 年，伽利略写道："我从未得到一本我的新书《谈话》……但我知道，所有的北方国家都在流传这本书。之所以不见这本书的踪影，恐怕是因为，一旦运抵布拉格，耶稣会士们就立即抢购一空，连皇帝本人也得不到一本。"宽宏大量的解释是，耶稣会士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至少有人知道，伽利略对动力学的研究正在悄悄地为这一学科体系奠定基础，而这样的研究过去是被禁止的。这些耶稣会士想用许可证把《谈话》控制起来，就像弥尔顿笔下的公园管理人那样：以为关上公园大门就可以把鸟儿囚禁在公园里了。(124)

考虑影响近代科学静悄悄奠基的因素时，我们必须要记住两种出版方式的区别：一是由荷兰的埃尔西韦尔公司出版发行，二是由耶稣会士保罗在维也纳争取官方的许可证。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道："幸运的牛顿！科学的快乐童年！对他而言，自然就是一本敞开的书，他能够毫不费力地看懂这本书里的文字。"正如"可怜的博雷利"的遭遇所示，牛顿的幸运不仅是因为他有天才，而且是因为他生在最恰当的世纪，出生在恰当的国家。印刷术出现以后，一切才俊都从手抄和死记的局限中解放
678 出来。然而，识字率的分布不平衡，获取新形式的公共知识的机会就不一样；即使在文化精英里，由于不同政权的不同政策，他们面对的刺激、惩罚和奖赏就不一样。牛顿的侄子约翰·孔迪特(John Conduitt)写道："艾萨克爵士有幸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像伽利略那样畏惧宗教裁判所……不像笛卡尔那样被迫流亡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发表自己的学说，以阐述他用哲学证明了圣餐变体论。"这里有一丝讽刺意味，因为牛顿实际上非常讨厌"自由发表意见"，远远比不上伽利略那样喜欢宣示自己的主张。牛顿告诉友人，即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他也故意"用隐秘而复杂的方式书写，以挫败那些愚昧的吹毛求疵者"(125)。和哥白尼一样，他生性隐秘，喜欢古老玄妙的手抄书传统。热情张罗科学

出版的人鼓励牛顿这类静默的天才，以推动他们出版自己的著作，让许多人阅览。我们有理由给这些热心人记功。

分析那个天才世纪令人惊叹的众星云集的现象时，既可以考虑某种基因库提供的偶然因素，也可以更加仔细地观察具体的历史决定因素，这样的思考有用，也更加完全。[126] 查尔斯·吉里斯皮(Charles Gilispie)写道，和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法兰西科学院的设计更完备，组织更专业。

> 但这一绝妙的设计由于其遗传属性的任意性而受挫。在路易十四治下成熟的科学头脑远不如笛卡尔和帕斯卡那一代人的头脑丰饶，远不如牛顿时代皇家学会济济一堂的英国天才那样多产。[127]

除了“遗传属性的任意性”之外，我们应该考虑法国胡格诺教徒和造纸商流亡国外的事实，还应该考虑法王和法兰西学院的出版政策。难道他们的政策没有使科学生产力倒退吗？即使笛卡尔和帕斯卡也不觉得摆脱了限制。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精英学者出版也遭遇重重障碍，机会渺茫。包含“多产头脑”充足证据的手稿在巴黎的修道院里堆积如山，这一困境和那不勒斯及罗马的困境没有区别。[128] 即使流亡国外的书斋型的哲学家也必然会对罗马审查官的决定非常敏感。 679

虽然他们时常对国内政权的性质漠不关心，虽然他们欢迎各界人士的赞助，包括天主教高级教士、贵族或国王的赞助，但他们对罗马的审查制度还是非常敏感的。

在这个方面，似乎有必要修正一般人对科学的描绘：科学精神是资产阶级、冷静的清教徒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观点是需要修正的。[129] 你可以承认，深入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素养促进才能的开发，增加有效回馈的机会。你还可以承认，开拓之中的商业精神和发展之中的数据搜集有关系。最后你还可以承认，许多重要的科学出版计划是由兴旺的企业发动的；在埃蒂安纳、奥珀利努斯、普朗坦、埃尔西韦尔和布劳等出版家中，很少有正宗的天主教徒，他们都是冷静的商人、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然而，对早期印刷商及其服务的精英学者而言，帝王、贵族和教士的支持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机械玩具和机巧的小玩意一直受各国宫廷的欢迎。在帝王的庇护下，数学怪才和植物园、动物园一样继续兴旺，莱布尼兹和高斯的名字足以为证。波旁王朝周边一些小公国的王公们对国际化的法语做出很大的贡献，身处巴黎、垄断图书贸易的那些企业家反而大为逊色。清教徒抨击查理一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同时，学界也抨击托勒密和盖仑理论；尽管如此，早期近代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之间的联系至多不过是微不足道的。 680
伽利略越过用拉丁文写作的教授们直接为通俗语读者写书，其目的并不是谋求平民支持，以对抗贵族。相反，他反复求助于帝王，以便从身为教士而不得不抄书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以预防他出的书激起敌手的反对。[130]

由于需要得到官方的保护，需要官方批准出版计划，所以科学团体发动了清除巫术和魔术的运动。加尔文反对巫术，也反对祈求超自然力，有人因此把他和马克斯·韦伯的追随者发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妥当的。不过，英国国教和天主教发动的反巫师和巫术的运动也需要予以考虑。在寻找“宗教与巫术衰落的关系”时，审查制度的压力值得考虑。对审查制度的担忧可能推动了天主教精英人士大力推进机械主义的事业。梅森、伽桑狄和笛卡尔特别热心抛弃自然的灵气。然而，国王对印刷出版的控制在英吉利共和国[①]时期被扫荡干净时，更加极端的英国清教徒却站到了帕拉切尔苏斯派和秘术信仰者一边。(131) 和 18 世纪的法国梅斯梅尔催眠师一样，这些英国革命者了无贡献，唯一的贡献恐怕就是“世界的去魅”。即使在王政复辟以后，新教徒主导的皇家学会提倡的“新哲学”的机械主义色彩也仅仅是略逊于天主教徒笛卡尔的版本而已。牛顿理论为吸引人的力量和令人反感的力量都留下了更多的余地，而且为自然神的神秘举止留下了更多的余地。(132)

毫无疑问，把科学追求当作无害的举动对英国权威人士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无论对清教徒或英国国教徒都比较容易；相比而言，在秘密图书贸易进行的地区，物理学著作和各种颠覆性印刷品同时流通；在这些地区，把科学追求当作无害的举动，就比较困难。虽然法国笛卡尔主义者在清除科学中的巫术时走得更远，虽然他们竭力远离神学论争，但他们在使科学追求中性化方面就不太成功；相反，在复辟

681 后的斯图亚特国王治下，昔日的清教徒摇身一变，成为国教的主教，他们比较成功地使科学追求中性化了。“在英国人为 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所作的彩排里，只缺少一个特征，那就是没有对基督教的敌视。”(133) 此外，教会审查的麻烦也比较少。实际上光荣革命以后，出版自由问题在英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正如伏尔泰所言，海峡对岸的法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波旁王朝时期，与学问进步相关的计划、文化知识的传播以及“大众力学”的教育都不是中性的，也不是和平的。为了看清这样的差别，你只需对英法两国接受厄弗伦·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编辑的《百科全书》(*Cyclopedia*)的态度作一比较：英国人平静地接受它，法国人将其翻译成法语的计划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如何，在出版业审查制度的问题上，把科学描绘为中性、客观、“超越混战”的事业的人，绝对不会持中性的立场，他们追求的是自由的思想交流。(134) 这样的追求是否掩盖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呢？是否有一种和资产阶级既得利益有关的动机呢？也许这样说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这样的追求是精英学者对自己工作的必需条件的精确的评估。

---

① 英吉利共和国(Commonwealth，1649—1660)，克伦威尔父子统治下的英国，从 1649 年查理士一世去世起到 1660 年王政复辟。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已经不时髦、绝对旧派的一个观点或许仍然有用："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解释"或许还能够给我们传达一种有用的讯息。弥尔顿呼吁"无须特许证的出版自由"，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里，他用人们对伽利略的造访做了一些影射；他当然有宣传的意向，但我们不应该轻率地斥之为反教皇的宣传。他说："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的软禁中老态龙钟，因为他的天文学思想和颁发特许证的多明我会教士不一样。"即使新教宣传家和小册子作者比如弥尔顿利用伽利略的案子完全是另有他图，那也不仅仅是为了把科学和新教联系在一起。在利用这个案子的宣传中，他们揭示了早已锻造好的链环：早在印刷业在维滕堡和日内瓦开始兴盛、在维也纳和里昂开始衰落的时候，科学和新教联系的链环就已经打造好了。在罗马鞭长莫及的地区，印务公司继续运行，这对西欧科学家至关重要。伽利略的案子使这样的教益进一步深入人心。 682



结束语：《圣经》与自然的转化

构成“现代性”要素的端倪可见于……16 世纪和 17 世纪。一些史家把这一变革归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人的思想解放。今天，许多史家可能更倾向于强调……“科学革命”。

首先这意味着和哥白尼、伽利略及牛顿的名字相关联的想象力方面的成就……在一个半世纪里，人们看待宇宙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最重要原因是将数学用于研究自然界的问题……

如今，这一切已经广为人知……不过许多细节尚待研究……尚不清楚这一切何以发生……[1]

本书旨在提出一种新的战略，用以研究上述引文提出的各种问题。就“构成现代性的要素”进行论争似乎徒劳无益，因为“现代性”总是处在流变之中；其概念会有变化，其定义必须要跟上变化的时代。由于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时代正在退入历史，“和哥白尼、伽利略及牛顿的名字相关联的成就”大概将要遭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的成就相同的命运。实际上，正如最新的哥白尼诠释所示，他的成果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保守；从传统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的迹象看上去越来越少。
683 如果将早期近代科学指向难以捉摸的现代性，这将导致不公平的比较：较晚的运动总带有“解放性”，较早的运动则带有“保守性”。这样的比较不可能使我们更接近于理解“这一切如何发生”。

要求史学家搜寻那不明确的“现代性”构成要素，似乎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考虑每一场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的传播变革产生的影响，那似乎更有希望。这种研究路径的优势之一是，它给我们机会去揭示“现代性”论辩掩盖的关系。这一路径可以使我们避免纠缠不清的论辩：近代欧洲的头胎子究竟是什么人？是文艺复兴时

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还是稍后违抗教皇的路德，抑或是将日内瓦变成新教罗马的加尔文呢？真正的现代性和科学革命一道出现，还是要等到工业化时才出现呢？我们的经历可以指向更有建设性的任务：在这些有争议的运动中，究竟有什么特征是历代不曾有过的呢？运动中依靠的文本传统究竟有什么特征呢？

如果把探索理论上的“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搁置一边，且专注于真实文本复制机制的矛盾后果，解决断代问题就应该比较容易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旨在回归黄金时代（古典时代或早期基督教时代）的运动经过重新定向以后，指向了远离起初设定的目标；恢复失传文本的过程本身使历代的人越来越远离教会创建者的经验，越来越远离古代诗人和演说家的经验。我们还可以看到，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教士和自然哲学家分享相同的经验：他们获取新手段以求旧目标，其经验却反过来引起意见分歧，最后导致他们重新评价传承的观点。

这一新战略不可能完全回答“这一切如何发生”的问题，但它的确能够为提供更加充足的答案开辟道路，其答案比迄今为止的答案略胜一筹。于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新的观察、新的试验、新的工具出现之前早就存在的科学理论，长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 我们必须要研究的是整个故事的悖论之一：早在发现望远镜之前——甚至早在……肉眼观测……改进之前，导致天文学科学革命的最轰动的一步就到来了……早在任何显微镜出现之前，威廉·哈维……就完成了他那革命性的研究成果……甚至伽利略也讨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他在倾斜的平面上用小球玩游戏，这也是人们早已习惯的方式……[2]

目前，人们试图解释这一悖论，但效果不彰。有人要我们猜想，科学家“戴上新的思维帽”去凝视不变的天空时，“他们脑子里的变化”引起了什么样的变革。然而，即使在他们戴上“新的思维帽”之前，天文学家倚重的技术文献就已经改变了。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虑文献产出和吸收的变革，那就有助于解释“轰动的一步”发生的时间，有助于分析这一步与其他现代性趋势的关系。

考虑哥白尼的思想所处的环境时，印刷术带来的变革应该被放在更加核心的地位。当前的研究策略有两种偏向：要么离题太远，编纂许多种详尽无遗的事件清单，惊叹时代的大动荡；要么就陷入没完没了的陈旧的辩论——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辩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英国国教徒和清教徒的争辩，甚至有时还陷入意大利人、德国人、丹麦人和波兰人的争辩。如果更强调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变革，我们既可以把许多不妥当的趋势调和起来，而不必借助不加区分的大杂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长期的思想纷争。可以说，16 世纪的天文学家既受益于新柏拉图主义者，又受益于文艺复兴时

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既受益于天主教波兰和意大利的老师,又受益于维滕堡的一位新教使徒;既受益于古亚历山大人的计算,又受益于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天文观测,还受益于路德诞生时纽伦堡编辑出版的一本三角书。

如果我们将许多不同的文本并置并体会到其重要意义,我们就不太可能把柏
685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立起来,或者把一种文本传统和另一种文本传统对立起来。哥白尼学问的特性以及影响他的思潮当然值得研究,但这一研究不应该妨碍我们承认,能够将不同的记录和参考书搜集起来是很新奇的事情,能够研究这些记录和参考书而不必抄写它们也是很新鲜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解释对不规则现象更加敏锐的觉悟,想要解释何以对传承的图式不满,那么,强调一个人一双眼睛一次扫描时的阅读面比过去更加宽广,显然就特别重要了。

与此相似,如果要解释为何肉眼观测能够产生前所未有的成果,值得我们更加注意的是:彗星和行星交汇的材料增加了,许多人同时观测一种天象的资料增加了。我们不应该忽视,机印的地图取代手绘的地图以后,淡出天空的星星(和遥远海岸的登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准确定位了。这一取代发生后,虽然有人继续复制劣质地图,虽然许多地图出版商的错误稽延了一个半世纪,但传播机制的重新定向从根本上已经解决。惯性运动的类比不能解释这样的逆转。考虑方向变化时,沿直线前进的匀速运动的比方有误导作用。因为讹误的数据被复制,而且靠印刷媒介长期保存下来,所以你可以说手抄书的错讹延续了一段时间。但你必须考虑,历史悠久的错讹过程被决定性地遏制了,并最终被逆转了。只要适当地监管,新数据的复制终于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模糊了,也不会被抹去了。如果我们考虑给印刷术的新特征留下更多的余地,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释"数学用于研究自然界"发生的时机问题。如果你考虑手抄书时代的天文学家、分析师、测量师、商人、铸币师和其他各种人在手抄书时代遇到的困难,如果你承认新的刺激鼓励仪器制造商和算师去宣传自己的产品,你就可以更好地解释量化分析的成就。如果我们更注意图像表述的复制,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为何生命科学不输物理科学,而
686 站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为何普林尼、盖仑和托勒密的权威却受到损害了。即使承认经验主义运动以及"从书本到自然"的口号的重要意义,我们也应该指出,对手抄文献的不满正是和新形式的数据搜集发展过程同时出现的。印刷术的出现使更多的自然现象可以写进书本。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在宣示具体领域(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进展时,还应该更多地注意不同领域(比如画家和医师不同的才能)的进展是如何协调和结合的。当阿格里科拉和维萨里雇插图画家为自己的图书描绘"静脉"、"动脉"时,他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而不是简单地继承手稿插图师开启的图书装饰业。

向分散的观测者发布相同标签的相同的图像,而不同的观测者又可以向出版

商反馈信息,这就使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迅速地扩充资料库,而且能突破前人的一切局限——即使生命力持久的亚历山大博物馆无与伦比的资源设定的极限也可以突破了。赫拉克勒斯之柱和希腊人九重天的极限不可能容纳日益扩版的世界地图和星图里收录的新发现。古人封闭的世界被打开了,以往和神秘现象相联系的广袤的空间(以及后来的时间)此时要靠人来计算和探索了。激励宇宙论思辨的累积性的认知进步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知识观念。代代相传的封闭空间或单一的文献库被开放的研究过程取代了,这个新空间的边疆日益向前推进。

最后,在试图解释"这一切如何发生"时,协调与合作的新成分值得更多的关注,应该放进更核心的位置。寻找新哲学的温床时,在任何地区、大学、宫廷或城镇逗留太久似乎都收效不大,专注任何一种特别的技能或科学领域也效果不彰。需要更多注意的主要的新特征是许多不同的才能同时得到开发的现象。正如田野考察、公开信、仪器广告和各种技术手册的赞助人一样,早期印刷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就像我们目前特别注意某些特殊的群体一样;目前我们特别注意的特殊群体有帕杜瓦大学的教授、维滕堡的植物学家和15世纪的艺术家—工程师。许多地区的都市印刷所发起的出版计划使分散的努力协调起来,使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真正的世界范围。布劳的《大地图集》就是这样的出版计划。

在17世纪这个发现的世纪里,科学事业得到快速的增长和扩张。我们解释这一现象时,可以仿照研究苗圃、温床和鸟雀的办法。解释"科学进步加速"的原因时,往往是众说纷纭:究竟是强调个人天才、思辨传统的内在演化、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互动,还是强调许多同步的社会经济或宗教变革即影响"这些发现所处的外部环境"呢?[3]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解释难以达成一致。如果说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切"因素"都在起作用,那么它们如何、为何起作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除非提出某种新的战略去研究这个问题,否则过去的辩论还会再次爆发。因为辩论始终围绕相同的问题展开,回报递减的局面很快就会到来。把印刷术引进这场讨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直接对付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不至于使同样的辩论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正如上文所示,印刷术的效应可以和创新行为的发生率、思辨传统的内部演化、知识分子和工匠的交流联系起来考虑,实际上可以和当前人们辩论的所有因素联系起来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召唤某种"人类基因库的突变"来解释"天才的世纪",也不必否认,随意的动机(包括个人的动机和游戏的动机)在成功解决世纪之谜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减少创新行为个人色彩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为新的印刷术留下余地,因为印刷术使思想食粮更加丰富,使脑力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开发。

688 一个类似的路径可以使我们向着弥合科学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二元分割前进一步。印刷术对脑力劳动和学术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对许多种“外部”事件的影响则比较小。以前的师徒关系发生了变化。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技术文献这种静默的老师，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敬畏权威，他们更善于接受革新的潮流。有了最新图书尤其数学书以后，年轻人开始超越长者，并且开始超越古人的智慧。计量的方法、观察的记录以及各种形式的数据搜集都受到印刷术的影响。同理，教师和牧师、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算师和艺术家—工程师可以追求的生涯也受到印刷术的影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一刀切的分割根本就不可能……这个问题上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但正如 G. R. 埃尔顿几年前所言，我们需要做工作，而不仅仅是呼吁。”(4)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开辟一些有希望的新的研究路子，更加注意与课堂并驾齐驱的新印刷所，然后才能够更好地进行研究。我们应该承认，印刷材料能够影响思维模式，促进问题的解决，并且能够深入到“精神生活”里去。我们还应该承认，印刷商和用拉丁文写作的教授以及用通俗语写作的宣传者和小册子作者在并肩工作。换句话说，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学者与工匠、大学与城市作坊被人为分割的二元模式。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研究其他一些理论问题。有些理论把科学问题的解决内化到忽视传播革命的程度，它们忽略了传播革命与学者的授课和研究之间的关系；还有些理论否认，教士和教师能够发动创新的潮流。对这些理论，我们都有必要予以重新评价。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似乎起到阻碍而不是帮助的作用。把早期资本家的前锋和阅读拉丁文的教士这样的后卫对立起来，无助于澄清中世纪的发展，反而掩盖了印刷所遍地开花以后出现的新的交流。我们完全有
689 理由把印刷商和商人及资本家联系起来考虑。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和教授及修士分离开来，在学者—印刷商集于一身的时代里，尤其不能将这两种人区分开来，因为合作是他们的惯例。实际上，布道者和教士常常诉诸新的宣传形式，他们不太可能产生冲突，而工匠则习惯于保守行业秘密。早期印刷商应邀到修道院和大学去创办印刷所，印刷商很需要大学教师和私人教师担任编辑和翻译。在大学校园之外，世俗文化中心创建起来，通俗语翻译运动形成，这样的趋势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教师的变化与影响攻读学位的学生的变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如果把新技术的影响和用拉丁文写作的专业精英隔离开来，学术界的内部分割就不必要地令人难以理解，观察“外部”力量进入科学“内部”生活的难得机会就失去了。

以上诸点超越了科学史的特殊领域，进入了更加一般的问题，即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把注意力聚焦于传播变革，将有助于我们把思想和社会联系起来，同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把经济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联系起来，避免把两者的关系强行塞进预制的图式里。如果考虑新的传播网络提供的链环，我

们就可以追寻到两者的关系,因为这个网络既生产商品去上市赢利,又协调各种思想活动。既然这些商品由文坛学界的人消费,同时又得到官员的赞助,并受到他们的审查,早期印刷商的活动就给思想运动、经济发展和教会及国家事务提供了天然的联系。

传统的看法是,"前瞻的"集权统治者及建国的政界人士与"落后的"小公国和中世纪晚期的城邦形成对立的关系,出版商的政策有助于矫正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印刷业是"前瞻的"、大规模的产业,往往在小型而松散的公国和城邦里兴旺发达,在集权巩固的大国里反而不能蓬勃发展。此外,印刷商还给新教文化注入了异域世俗文化的成分;除非考虑审查制度下图书贸易独特的运作机制,否则新教文化的异域成分就难以理解。当我们追溯思想从天主教南方向新教北方的运动时,印 690
刷业先行从南到北的运动就应该被给予适当的分量。文坛学界的重心如何从16世纪的威尼斯迁移到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在任何思想社会史的研究里,这个问题都特别值得注意。

当我们"搜寻启蒙思想的温床"时,著名的印刷商(如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罗伯托·埃蒂安纳、奥珀利努斯、普朗坦)的运作模式值得仔细研究,其顾客相当程度的贵族性质也应该仔细审视。正如马丁·劳里积极出版的阿尔杜斯的传记所示,这位威尼斯印刷商放弃了对开本的大型书,转用八开本的小型书,意在方便学者—外交家和国务贵族。阿尔杜斯心中想的不是开发大众市场——用古希腊经典去开发市场是有些荒唐。从16世纪初的阿尔定八开本到17世纪30年代埃尔西韦尔的十二开本的书,使用便利的袖珍书的流通首先改变了学界的环境。如果你假设,变化了的世界观意味着一个新阶级的兴起,那么你首先应该多考虑阅读拉丁文的精英内部的思想重组。如此,我们还可以矫正当前研究中的失衡:太强调普及趋势和大众运动。

> 在这个时代,纸皮书对科学教育进程的影响可能超过了新教学方法的总和,评估印刷商的技艺和科学技艺的密切关系应该不难……
>
> 倘若科学催生了机印书,那么显而易见,机印书把科学从其中世纪的习俗直接送进沸腾的科学革命……产生近代人新态度的根源当然是知识在新兴阶级里的快速传播,到15世纪末,人们对科学和宗教的态度都改变了。(5)

这段话对宗教改革似乎有效,但对早期近代科学似乎不适用。约翰·门特林(Johann Mentelin)印行的德文版《圣经》问世于1460年;为1517年路德的反叛置景时,我们需要考虑已经有40年通俗语《圣经》印行的历史(再加上其他宗教文献印刷品的增加)。虽然雷乔蒙塔努斯的纽伦堡印刷机投产很早(1474年),即使将 691
其背景推迟到15世纪末,也还是太早;即使15世纪末,科学知识借助印刷词"在新

兴阶级里快速传播”的情景，仍然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业已指出，即使在稍后的时间里，哥白尼、哈维和开普勒的拉丁文论著也不可能像路德派《圣经》、大单张和小册子那样迅速而广泛地传播。预言书和萨克罗伯斯柯的《地球》才能够成为畅销书。1500 年，拉丁学问范围狭窄，科学翻译运动刚刚启动，讹误丛生的古籍的复制本尚未来得及整理。从“机印书的诞生”到“近代人新态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用普及的手段一夜完成；认为印刷术一出现就带来科学变革，难免使人生疑。那种一步到位的判断还将宗教改革与哥白尼革命分割开来，而且强化这样的观点：“新阶级的整体动员”是主要历史变革的唯一可以想象的动力。

福音传道的冲动给早期的印刷机提供动力，很快产生了蔚为大观的后果，激发了新型的大众参与。但这不应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更加微妙然而同样重要、不可逆转的变革，这些变革改变了那些阅读拉丁文的精英们的世界观。除了印刷术的引入，还有几种新特征进入了科学革命，并且在宗教改革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研究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要考虑学界内部的旧习惯稽延的情况，然后才考虑新态度的创生；至于知识在新阶级里的广泛传播，更不用说要稍后才能考虑了。即使在研究福音传道的趋势时，这一新的研究路径也有许多优点。罗拉德派、韦尔多派、胡斯派和共同生活兄弟会早期的态度是印刷术产生的态度，成熟的新教教义稍后才能够诞生。此外，在为宗教改革搭台置景时，我们必须要注意许多宗教改革以前发生的争鸣，这些论辩和古三语研究及拉丁文本的注解有关，和后来的通俗语翻译运动则没有关系。在学者—印刷商的作坊里，教父遗著和亚历山大时代古籍的编辑们有缘相会。如果更注意影响学界精英中的文本传播如何变革，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早期近代思想史的多头线索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具体地说，这一新的研究路径有助于澄清宗教变革和科学变革的关系。

692 由此可见，从亚里士多德、盖仑和托勒密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本与圣哲罗姆传承下来的文本有许多共同之处。《圣经》学者尽力修正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使之不再产生进一步的讹误；同理，中世纪天文学家竭力保存并修正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先进学人反复呼吁古三语研究，但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古三语研究是不可能启动的；同理，有人再三呼吁儒略历的改革，但这一改革从未实现。印刷术出现之后，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受到保护，不再产生进一步的讹误，但掌握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学者的注经又对它造成威胁。与此相似，经过矫正和净化之后的托勒密的著作不久就受到抨击。因为被誉为“托勒密第二”的哥白尼（尽管他远离印刷所）的角色就是修正托勒密，正如伊拉斯谟的角色就是修正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一样。两人的出发点都是使传统的计划得到圆满的结局：伊拉斯谟的目的是修正《圣经》、改革教会；哥白尼的宗旨是修正《天文学大成》，辅助历法改革。

然而,两人借助的手段都是非传统的手段,这就把他们的著作推到非传统的方向,于是,他们追求旧目标的举动本身就是在开辟新的道路。

与此相似,16 世纪开创性的著作提出的新问题使自然哲学家和神学家沿着类似的路子分成不同的派别。保守派捍卫现状,却偏离了先例,因此处境尴尬。亚里士多德和盖仑的捍卫者对偏离固定教材的教授进行处罚,颇像圣哲罗姆拉丁文译本的捍卫者对《圣经》评注本进行审查一样。与此同时,由于印刷商的吸引,许多教士和教授受出版商的吸引都写书,以求拥有更多的读者,争取更多的赞助,希望借此扬名显声。教士和教授都担任编辑、翻译和作者,既为学术潮流服务,也为流行的潮流服务。主张"人人皆可为牧师"、翻译《圣经》的神学家是一类,编纂技艺手册、翻译数学和医学文献的修士、物理学家和教师是另一类,两种人的处境则大同小异。通俗语翻译运动不仅使福音传道者把福音送达每个人,而且开发了潜在科学人才的巨大宝库,印刷商聘请算师、仪器制造商和艺术家一工程师撰稿。新教鼓 693
励非神职人员读书,鼓励教徒自助,这特别有利于读者和出版社的交流,结果就使古代权威比如普林尼悄然被后来人取而代之,就产生新型资料搜集的扩张。最后要说明的是,审查政策和精英倾向挫伤了天主教《圣经》印刷商的积极性,最终把天主教国土上的科学出版路子堵死了。

新教利用印刷术,以多种方式把宗教改革和科学出版联系起来,且科学出版日益由新教印刷商承揽。相反,福音传道者和精英人士却为了根本不同的目而利用新的印刷术力量,其宗旨不是传播上帝的话语,而是破解上帝手创的自然。奇怪的是,"打开"自然之书,让公众阅览首先需要的不是解码,而是对数据进行编码,是把这些数据注入复杂的方程式、表格、模型和图式。对精英人士而言,利用宣传手段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福音传道者却不介意宣传。在这个方面,伽利略的情况可能会使人误解。他利用自己的宣传才能和论辩才能,竭力劝说人们接受哥白尼的理论。天主教修士比如布鲁诺、坎帕内拉和福斯卡里尼也为这一事业表现出福音传道的热情。同理,雷蒂库斯也为老师哥白尼倾注了这样的热情。然而,托勒密、盖仑和亚里士多德的衰落并不是卡通和小册子产生的后果。科学变化的模式和宗教复兴的模式不一样。宣传对任何要做科学贡献的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经营畅销书的宣传常常是不尽如人意的。即使现在声誉卓著的科学家也害怕过早暴露自己观点的轰动性报导。早期近代的精英人士更有担心宣传的理由。许多哥白尼思想的拥护者(包括哥白尼自己)既利用印刷材料,又避免抛头露面。许多清教宣传者和弗朗西斯·培根的信徒劝人信仰"新科学",同时自己却不喜欢甚至看不懂拉丁文论著,须知,拉丁文的技术性论著是重大进步的标志。

诚然,提倡实用知识的幻想图式、为普通市民服务的科学信仰、为千百万人服务的数学都纳入了皇家学会《哲学通讯》(*Transactions*)创办人的视野。凡是达到 694

了创刊宗旨的来稿都被接受，都被认为是对这一拓荒性科学杂志具有意义的贡献。奥尔登伯格致信马尔皮基时传达了这一宗旨："调动一切学人的意见。"为了调动一切训练有素的观测者、试验者和数学家共同努力，使之为了一致确认某一观点而利用印刷机的方式，有别于向一切人传播福音的方式。说到底，接触科学期刊和科学学会的机会仅限于专业精英，其他人无缘接触。近代科学的兴起不仅使人怀疑亚里士多德派、盖仑派或托勒密派，而且使自封的江湖郎中、"经验主义者"和奇迹术士失去信誉，这些人一边自吹一边抨击书本学习。从帕拉切尔苏斯到梅斯梅尔直至现在，印刷机不仅为真正的科学家服务，而且为伪科学家效力，这两种人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区别。目前，区分科学期刊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杂志相对容易。但在皇家学会创建之初，神怪和奇迹还为人所信，并且被记录在案，这两种样式的刊物和报道是容易混淆的。《禁书目录》使混乱有增无减，在执行过程中，枯燥的物理学论著和耸人听闻的被禁小册子被混为一谈，并且把提倡哥白尼理论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新教事业。

于是，英国一位帕拉切尔苏斯的追随者就把用拉丁文写作的、神秘兮兮的天主教徒哥白尼和路德派的新教徒放在一起，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协调。他认为，他们共同努力"恢复了天文学规律和星表的纯洁性"。他的话说明，新教徒把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沿着本书读者业已熟悉的路子联系在一起了。他说，"通过驱散圣言真理上笼罩的罗马宗教乌云"，新教徒净化了《圣经》；同理，哥白尼净化了因"过久使用"而讹误众多的星表。[6] 于是，哥白尼就被赋予了伦敦合参本《圣经》编者一样保守的角色；这位编者在内容提要里宣称，该版本《圣经》"没有错讹，清除了抄书人的疏漏、时间造成的损害、教徒和异端任意的修改"[7]。这一相对保守的伊拉斯谟式的主题强调修正和净化，适合皇家学会创建者力图使之合法化的宗旨；斯普拉特主教的《皇家学会史》有一段常常被人征引的文字可以为证。他说，皇家学会与英国国教"两者都可以宣称有同等权利使用'改革'(Reformation)一词"。

695

> 英国国教将其用于宗教，皇家学会将其用于哲学……两者经过了类似的历程，两者都绕过讹误众多的文本，都查阅完美的文本，从中受益；一家阅读《圣经》，另一家阅读自然之书……[8]

神学家们征引上述言论时，并没有看到，它们与手抄稿到印刷品的迁移是有关系的(虽然斯普拉特提到"绕过讹误众多的文本")，他们用这段话来重申斯普拉特主教有关这一段三百年历史的文字：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有某种联系。这似乎耐人寻味。只要历史记述中不考虑印刷术，这一主题注定会产生没有结论的论辩。如果把印刷术排除在勾勒的情景之外，那就不仅掩盖了重要的纽带，而且忽略了同

样重要的断裂。

诚然,《圣经》传统和科学传统在手抄书时代"经过了类似的历程",然而,到宗教改革时,它们就分道扬镳了。一方面,印刷术为《圣经》学者和自然哲学家提供了新的媒介去达到长期渴望的目标;另一方面,这一新技术又在两类学者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并且把他们推到不同的方向。

印刷术出现之前,"天体如何运行"的科学探询和"如何上天堂"的宗教关怀是联系在一起的。伊拉斯谟和哥白尼的共同兴趣是破解古地名、给古籍断代。由于游移不定的复活节提出了历法的问题,所以教会在纪念福音真理时就需要天文学家的帮助。然而,印刷术出现以后,天体力学的研究就被推进到新的方向,而且达到很精妙的程度,把历法问题和古老的算法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696

掌握语文学、学习希腊语对研究《圣经》日益重要,对研究自然却不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在语文学的帮助下,不同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表达、中世纪拉丁文的缩略语、罗马字母和数字的混淆、新词语、抄书人的讹误等问题都成功地解决了,所以现代学者常常忘记了,手抄书的程序曾经给数学科学的发展强加过一些局限。(9)从罗杰·培根的时代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时代,对几何学、天文学或光学的掌握与古籍的恢复和希腊研究的追求是同时并进的。然而,到了 17 世纪,自然的语言逐渐从古老语言的混乱中解放出来。一旦被放在对应的图像之下以后,同种植物和动物异名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一旦被置于统一的地图和地球仪上,星座和大陆的名字就可以定位,而不必借助不太确定的来源了。对数表和计算尺为不同地区的测量师提供了共同的计量标准。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以后,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的多语版《圣经》和众多的变异版本;相反,托勒密《天文学大全》的衰落却为牛顿几条精美而简单的宇宙定律开辟了道路。中性图像词汇和数学词汇的发展使分析数据的大规模的人才积累水到渠成,最终产生了跨越陈旧边界的共识。

维萨里诉诸图像表述,而伽利略喜欢圆形和三角形表述,这就说明,如果喋喋不休地论述缔结协定时为何用通俗语或拉丁文,那是不明智的;同理,如果把福音传道者和早期近代科学家的相似性推向极端,那也是不明智的。许多主张新哲学的人喜欢朴实的语言,反对神秘化,他们和福音改革派一样。尽管如此,天文学家和解剖学家使用的语言对外行仍然是难以理解的,与普通人的市井语言截然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科学家的语言是不用嘴巴说的语言,不像新教徒喜欢的语 697
言;新教徒传播圣言时保存了布道坛和印刷机的纽带。技术文献诉诸"静默的老师",传达准确、详细的非语音的讯息,这有助于技术文献摆脱语义陷阱。1733 年,贝尔纳·丰特奈尔(Bernard Fontenlle)指出,"语词的统治"结束了,"事物"成了人之所需。可见两百年前,人们就逐渐放弃了言语的论争,转而爱上了图像的演示。

我敢说，依靠完美图像和图表学习一个星期就会获益良多，相比而言，只靠阅读或聆听同样的科学规律所学到的东西就大为逊色，前者一个星期的收获至少要超过后者半年的收获。

1531 年，托马斯·埃利奥特向教师推荐绘画课时写下了上述文字。(10)

印刷术之前的出版过程往往有一个听写和朗诵的程序。手抄书文化培育“聆听学科的规律”的学习方式；与此相比，印刷文化使同步发行“完美的图像和图表”成为可能。如此，印刷文化不仅改变了学界内部的交流，而且为人获得新的信心奠定了基础，使人能够获得有关“自然规律和自然神规律”的知识。

对教会的基础构成威胁的是伽利略发布的新的真理观。和神启真理并驾齐驱的新真理是自然界独立和原创性的真理。这一真理不是靠圣言揭示的，不是建立在《圣经》的验证或传统上的，在任何时候，它对我们都是明明白白的真理。但只有那些懂得“造化手书”、知道如何破解其文本密码的人，这一真理才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真理不能够只用语词来表达……还要用数学图形、几何图形和数字来表达。凭借这些符号，自然以完美的形态和清晰度展示自己。而凭借圣言的启示，这样的精确度……是无法达成的，因为语词总是……晦涩的……语词的语义总是人赋予的……在自然界……宇宙的整个蓝图展示在我们眼前。(11)

这段著名的文字生动地描绘了一场重大的思想变革，至于它为何发生，卡西尔
698 却未予解释。卡西尔的描绘需要予以补充，我们要指出：“数学图形、几何图形和数字”并非总是“以完美的形态和清晰度”展示自己。约翰·洛克写道：“发现欧几里得命题里的真理，几乎不需要或借用神启。上帝给我们提供了天然和可靠的手段去认识这些命题。”(12)然而实际上，在 11 世纪，上帝并未给西方学者提供掌握欧几里得定理的天然而可靠的手段。相反，在寻求欧几里得所谓的内角是什么意思时，基督教学者的研究徒劳无功。(13)

对数学图形、几何图形和数字精确性的新信心必须要建立在一种复制方法的基础上，这一方法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向人提供相同形式的相同数据，否则，人们就会被文化边疆和地理边界分割开来。亦如约瑟夫·班克斯勋爵所言，图像表述也产生同样的信心，给人提供共同的计量标准，这些标准“用通用语言向全人类说话”。这一通用的标准是由地图传达的，肯尼斯·博尔丁赋予地图“超越一切经书的非凡的权威”(14)。但这一通用语言不是在学术争论中产生的；在西方基督教经典增补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学术争论。

自然研究日益摆脱翻译造成的问题，而《圣经》研究却日益受困于重重的陷阱。通俗语译本的《圣经》使拉丁基督教世界人民的宗教经验支离破碎，导致长期内战；

而且，连续不断的多语版《圣经》也没有使博学的人士更接近于找到圣言的纯净源头。第谷·布拉赫面对讹误数据引起的矛盾的天文学星表时，他可以履行誓言用“纯净的源头”去核查两种矛盾的版本——也就是以新鲜的、没有讹误的“天空中的书写”的观测资料为标准去矫正有错误的星表。然而，对圣哲罗姆拉丁文《圣经》译本不满的情绪是不可能用上述方式克服的。相反，这种方式导致多语种引起的混乱和一个专门领域里文献的堆积，以及有关各种版本和多种构造理论的堆积。主导创世的神秘论述越来越晦涩，学究们争论的是某一事件的断代问题，以及如何证明创世的各种版本的问题。旨在澄清神的意志的深奥的巴洛克纪念碑不仅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而且最终使之越来越难以捉摸。

《圣经》研究旨在穿透哥特式的黑暗以恢复纯粹的基督教真理，也就是剥去浓墨重彩的外表和枝蔓丛生的注解以解释纯净而“朴素”的文本，其结果却是在《圣经》读者和《圣经》之间插入了难以穿透的玄秘晦涩的注解。这实在是西方文明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在维滕堡大学就职典礼的讲演辞里，年轻的梅兰希顿以鄙夷不屑的语气批评天使派别的博士对希腊研究的漠视，批评愚昧的抄书人崇尚虚饰的做法，批评用异域材料污染《圣经》的积习。他呼吁回到“纯净的”希腊和希伯来源头去研究。(15)但随着古三语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为词语的意义甚至为元音点的位置而争论不休。随着论争的稽延，拉丁学者的“饮水”本身被搅得越来越浑浊。霍布斯和斯宾诺莎①投身《圣经》研究，他们在欧几里得的著作里发现清澈澄明的证据。这些证据和浑浊晦涩的《圣经》文本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耳目一新。威廉·配第爵士②反对教儿童学习《圣经》里“难学的希伯来词语”，强调“学习事物和学习乱糟糟的词语”的强烈对比。(16)我们读到托马斯·布朗爵士的一些论述，他喜欢“阿基米德说话之精确”，不喜欢“《圣经》里那些大话”。罗伯特·玻义耳也许会赐予我们一系列讲演，以调和《圣经》的启示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艾萨克·牛顿可能会努力证明，《旧约全书》故事的纪年与天球时钟是啮合的。然而，上帝的“两本书”来到了分道扬镳的岔路口。

> 18世纪的一天，一些瑞典科学家发现波罗的海海岸的变化……有些神学家向政府提出控告说：“有些科学家的言论……不符合《圣经·创世纪》的精神，必须予以谴责。”科学家们的回答是，波罗的海和世界都是上帝的创造……

---

①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唯哲学家、唯理论代表之一，从“实体”即自然界出发提出“自因说”，认为只有凭借理性认识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著有《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等。

② 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著有《赋税论》、《货币略论》、《举一反三》、《政治算术》等。

倘若上帝的两种产品有矛盾，错误必定出在我们手里的《圣经》副本里，而不是
700 出在波罗的海，因为波罗的海是上帝的原版。(17)

印刷术对《圣经》研究的影响与其对自然研究的影响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只强调普及《圣经》的主题，把《圣经》的传播与技术文本的传播结合在一起，《圣经》研究和自然研究的反差就会被掩盖起来。同理，反教廷的宣传也会把两者的反差搞得模糊起来，因为这样的宣传把托勒密《天文学大全》的修订和圣哲罗姆拉丁文《圣经》的修订联系在一起。抄书人的笔误为教士和天文学家树立了共同的敌人，然而，一旦这个敌人被消灭，原来合作的教士和天文学家就分道扬镳了。若要洞悉两者分手的情况，你就需要研究知识界内部的变化。早在多语版《圣经》问世之前，知识界已经在研究拉丁文《圣经》了。《圣经》的多种版本为知识界提出了新问题。除此之外，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原来搜集数据的局限，机印版星表、海图和地图提供的新优势。然后，你就可以为启蒙思想搭建舞台，而不必诉诸“现代性”之类的晦涩观念，也不必被围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论捆住手脚。至少我认为，印刷术带来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最行之有效的出发点，我们可以据此解释：人们的信念如何从神的启示转向数学推理和印制的地图。

印刷术对宗教传统和科学传统的影响迥然不同，这些差异指向传播变革复杂而矛盾的性质，向我们暗示，企图用一个公式去囊括印刷术的一切后果是徒劳之举。思考新教的反偶像崇拜或日益增多的《圣经》阅读时，构想一幅从“图像到语词”的迁移过程似乎能使人获益良多；然而当你为科学的兴起布置舞台时，你必须要准备把那个公式颠倒过来，那就是“从语词到图像”。在后面这个公式里，印刷术把翻译问题简化，超越语言分割，帮助弥合大学授课与工匠技艺之间的鸿沟。然而，在宗教事务中，传播变革起到了分割的作用，它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沿着地理和社会两条路子永久性地分割得支离破碎了。不仅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分隔开来，而且各地的宗教经验也经历了内部的分化。放眼四海的精英对圣言的信念失
701 去了；与此同时，福音传道者和教士传播福音、复苏信仰的机会也增加了。开明的自然神论者坚守“自然规律和自然神”，和卷入一波又一波宗教复兴的狂热分子拉开距离了。

各地的宗教虔诚热像潮汐的涨落，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圣经》成为卑贱者的宝藏，其难以逆料的后果仅见于新教地区。在新教徒中，传播福音的普遍冲动产生了特别矛盾的后果。新教统治者钦定的通俗语《圣经》使基督教世界巴尔干化，使过去普世的《圣经》带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阅读《圣经》的家庭精神上的尊严提高了，家庭成员个人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印刷词点亮的“心灵之光”成为不同教派共享神秘体验的基础。然而，精神生活在得到充实的同时，也沾

染了商业驱动力。兜售赎罪券的人信誉扫地以后,推销《圣经》的人就成倍增长了。

传统的传教冲动和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需求结合起来,这一现象在印刷所里尤其显著。但近代早期的印刷所里还冒出了其他一些冲动。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否胜过历史悠久的求名驱动力呢?两种驱力的结合无疑会大于一种驱力。印刷机是否为统治者提供了延伸个人魅力的路径呢?是否给没有人情味的官僚主义者提供了重大的帮助呢?如上所见,在地图出版商、算师和工匠中,印刷术像奇妙的炼金术,把个人利益转换成了公共利益。印刷术还满足了书斋人、艺术家和文人的虚荣心。在研究印刷机的新力量时,你可以在强调单个的创新的同时做出富有说服力的多重解释。许多动机的混合提供的强大动力,胜过任何单一的动机提供的动力,无论这单一的动机是牟利的资本家的动机或福音传道者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西欧早期印刷机的使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同冲动的交会难以抗拒,从而产生了能量巨大、不可逆转的"突变"。

1460 年和 1480 年间投入生产的第一批印刷机使用的动力多种多样,这些动力是在手抄书时代孵化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同样的技术可能会被用于截然不同的目的(比如中国和韩国就是这样的),还可能不受欢迎而被弃之不用(欧洲之外、西方传教士安装的印刷机在一些地方被放弃)。有鉴于此,你可能会赞同一些权威的意见:15 世纪美因兹开发的复制机理本身并不比其他无生命的工具更重要。但我们知道,除非对人有用,印刷机是不可能在 15 世纪的欧洲城镇里运行的。而且,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印刷机可能受到了欢迎且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用途——比如一些教士和统治者就垄断印刷机,不让随心所欲的都市企业家利用。

如此背离事实的思辨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思考技术革新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事实上,一旦印刷机在许多欧洲城镇里配置以后,印刷术改变社会的力量就开始生效。新的印刷所和都市精英互动,精英们欢迎印刷所,职业突变和思想重组随之发生。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你可能会同意:即使成了变革的动因,早期的印刷机只有在与其他力量结合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实际上,印刷机成了催化剂和协调的力量,具有特殊的意义。无论你多么希望强调互动模式并避免单纯的"冲击"模式,你也必须为那些特殊现象留下余地,这些特征使印刷术的出现有别于其他的革新。

你不能仅仅把印刷术当作复杂因果关系中的许多要素之一,这是因为传播变革使因果关系的性质变了。印刷术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使主流的连续和变革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点上,你必须强烈反对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敌视技术,甚至贬低他们自己本行工作里最必不可少的工具。

> 塑造人生的力量可能会表现在书本和字钉里,但印刷术本身……仅仅是

一种工具，工具和仪器的倍增本身并不会影响思想生活和精神生活。[18]

思想生活和精神生活绝不是未受影响，相反，由于15世纪欧洲复制书籍新工具的倍增，思想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播变革改变了西方基督徒看待《圣经》和自然界的方式。它使圣言表现出更多样的形式，却使上帝的手创更加统一。印刷机既为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科学做好了铺垫。它始终是人文主义学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我们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产生的动因。



最后的话

本书讲到木制的手摇印刷机时代就戛然而止，造纸术的工业化和铁制蒸汽印刷机仅点到为止。许多事项未置一词，比如15世纪中叶将欧洲都市连接起来的铁路和电报线路、与整行铸排机和单字铸排机携手同行的普及识字和通俗小报略而不论。打字机、电话机和大批更晚的媒介完全略去了。现在看来，本书踏足的领地太多，而作者的行迹则匆匆忙忙。然而，由于本书还传达了一些相反的观点，因此有必要指出，15世纪中叶开始的进程在电脑打印和电视指南的时代并没有停止聚集力量。实际上，继续不断的传播革命的后续阶段似乎和我们的家庭、学校或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尤为重要的是，传播革命的后续阶段和近代知识分子及文人对当代西方文化发布的预言的关系是至为紧密的。

自活字印刷出现以后，储存和恢复、保存和传输能力的提高与创造和损毁、革新或淘汰的能力的提高同步前进。略显乱象的近代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印刷术的复制力量，亦如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世纪对新能源的开发一样。如果我们考虑五百年前那场宏大的、决定性的文化“突变”里一些被忽视的方面，我们就可以用历史的眼光来观照晚近的发展。 *704*

谷登堡发明以后接踵而至的某些后果出乎意料，如今我们可以回头去加以分析。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的比培根时代多。还有一些未预料到的后果尚处在展现的过程中，严格地说，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目前尚难以估量。本书勾勒的变化很少是前人预料到的。即使以后见之明而论，这些变化也难以描绘。即使为了防止黑暗之中的鲁莽一跃，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这是显而易见的。印刷材料继续不断的积累有一些弱点。（过去害怕的是克洛诺斯软件式的狼吞虎咽，现在令人恐怖的呕吐能力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不过，扫描众多记录的能力也给人某些小小的优势。我们可以审视前人如何解读各种征兆，并将其预言和实际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人们倾向于一笔勾销、提前送终的一些问题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好比是要强行结束仍在展开的故事。这种冲动和 19 世纪稽延的历史图式尤其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有很大关系，这些图式把逻辑辩证的冲突指向逻辑辩证的目的。这些宏大设计似乎不考虑根本矛盾的潮流无限期稽延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似乎仍然在经历几百年前开始的那个历史进程的矛盾后果，那个进程既煽动宗教狂热和偏执，又培育普世和谐和宽容。一方面，那个进程更加持久地固化了语言和民族的分割，另一方面，它又造就了一个国际的学术共同体，而且使传播网络涵盖全世界。本书至少表明，时下的宏大设计及由此演绎而来的寻求潮流的时尚是不成熟的。抄书人和印刷商之间的鸿沟究竟有多宽多深，尚待我们充分探索。15 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这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中，恢复和革新的发展阶段是不平衡的，尚待我们去描绘。

如果以本书各章为基础，从印刷术以来的力量、效应与后果去演绎任何其他结
705 论，那也是不成熟的。我作了诸多推测，但相关资料提供的知识并不均衡，不少资料是不可靠的一般记述，所有的资料来自于很有限的几个地区。许多缺口是靠逻辑推理填补的。如果这种推理为更加富有学理的推测铺平道路，而这样的推测又基于更多经验的实证，那么，发表一些未必可靠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些推测不容易证明为无效，因为其中有难以估量的因素，这个问题更加麻烦。研究这个问题时，无论我们抛弃或细化多少粗糙的概括，似乎都难以排除这类难以估量的因素。你可以计量各种印刷品的产量，分析其内容，考察其分布，估计其销售速度。至于文本的“解读”、“远程作用”的效果，如果不借助推测，是无法计量的。如果不考虑不确定性，谁也不能声称读懂了读者的脑子；如果要阅读墓园里逝者的脑子，那就更加困难。相反，任何寻找事情缘由的努力，都必须要考虑这类难以估量的因素。如果静默、无形的互动难以精确分析就将其置之不顾，那么，更加神秘的精神、伦理、主义就可能取代这些互动的因素。用一定精确度界定非确定性的边界有一些好处，我们可以借以排斥策划密谋的杜撰人。

讨论 19 世纪的通俗小说作家时，萨墨维尔说道：否认这些学术界里“对普选有影响的人”“一定是很大胆的人”[19]。把阅读习惯和纯文学排除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的史学家似乎在小心翼翼地规避难以驾驭的资料，因为靠这些资料是难以得出结论的。然而，如果将分析建立在“刚性的事实”上，把那些“柔性的”、“模糊的”问题留给别人，那就可能是轻率而不是谨慎了。有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未必就像表面上那样“柔软”和“模糊”，因为大多数研究思想史、文学史和纯文学的人继承了一个脆弱的传统，他们对物质的、机械的或商务的事情的态度往往是孤傲而无知的。谴责脑力劳动的分工无济于事。康拉德·格斯纳 16 世纪编纂《通用目录》开

风气之先，他还是最后一位单枪匹马在一卷之内包罗一切书籍的学者。由于知识产业日益扩大，知识的日益专门化是必然趋势。即使不同领域的深度开发必然是 706
分科进行的，也没有理由把一切“刚性的”事实分配给某些领域，而把一切“柔性的”事实就分配给其他的领域。专家们必须要考虑两种事实，无论他们探索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变迁。

那些关注“近代思想塑造过程”的人，如果更加注意早期印刷所里的资料加工，就可能多有斩获。因为印刷所支撑着先进学问的实验室，生产并发行着可以计量的实体商品。尽管有一些编造的权宜地址，大多数印刷品的出版地点和日期是可以相当准确地断定的。出版物的内容可以用图表来分析。变迁中的生产和发行网络可以在地图上定位。凭借更多诸如此类的分析“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许多比较研究大概是能够清楚阐明的。然而，关心近代社会塑造机制的人所必须处理的问题却不可能用严格的量化分析，这些人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法制、教会事务或国家大事。他们面对的是印刷品消费的比较间接的影响。在研究“理性化”、“现代化”、“集中化”、精英的重组、宗教分裂、向上的社会流动、上升的期望值或企业的组织时，关于识字、读书和新的心灵习惯等富有争议的问题是无法规避的。一方面，影响纸张生产、信贷或契约的变化和印刷业的扩张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和阶级意识有关的变革与印刷业的扩展却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和任何形式的群体身份有关的变革与印刷业的扩展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思想交汇和心灵接触的理论，我们需要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如此，为了弄清楚影响意识和身份的变化，这样的理论还是必须要提出来予以阐明的，因为这些变化必然要影响人的思想感情。由此可见，如果探索尾随印刷机的发明而产生的后果，我们就可能把习以为常的排列颠倒过来而获益匪浅。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史家不妨多尊重刚性的事实和物质技术；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变迁的学者何妨多看重难以捉摸的因素、难以触摸的现象。果如此，不同的专家群体就必然能够进行更加卓有成效的合作。 707

我相信，接受培根的忠告有很多好处。他最重要的忠告似乎是这样去看问题：目前被分割开来的许多生活现象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个类别的。 708

注 释

前言

(1) Dibdin, ed.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preface of 1749 by Joseph Ames, I, 12.

(2) Bridenbaugh, 'The Great Mutation'. 欲见当时这一主题的其他著作，请参见 Eisenstein 'Clio and Chronos'一文的注释。

(3) 参见 Henry Adams, *The Education*, p. 5，作者在这部自传里流露出的感觉是，由于波士顿到奥尔巴尼铁路的修建、第一艘肯纳德蒸汽船的下水和电报的出现，他觉得和 18 世纪的联系被切断了。又见 Samuel Eliot Morison, *Vistas in History*, p. 24，莫里森觉得，自己这一代和前辈的联系被"内燃机、核裂变和弗洛伊德医生"切断了。

(4) 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在《邂逅》(*Encounter*)杂志上推荐《谷登堡星汉》的书评《两种星汉之间》('Between Two Galaxies')，引起了我对此书的注意。

(5) 第一、二、三章初次露面时的文章分别题名为：'The Position of the Printing Press in Current Historical Literature', 'Some Conjectures about the Impact of Printing on Western Society and Thought'和'The Advent of Print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第四章部分内容的节略版发表时题名为'L'Avènement de l'Imprimerie et la Réforme'。

(6) Vansina, *Oral Tradition*, par I, section 2, pp. 2 ff.

(7) 参见 Natalie Z.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8) 我早期的训练和特殊兴趣使我喜欢挑选法国和英国的例子。我意识到，西欧其他地方也能够找到丰厚的资源(德意志的文献尤其丰富，因为本书研究的印刷术是德国人的发明；我还意识到，威尼斯人的自豪产生的学术产业所集中研究的是威尼斯的印刷人，如此等等)，可惜我所能做到的仅仅是触及个别地区的皮毛而已。

(9)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p. 26.

第一章

(1) St. John,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p. 255. (欲求充分了解脚注的内

容，请查阅书末的参考文献。）

(2) 据《古籍通讯》('Nouvelles du Livre Ancien')第 1 期(1974 秋)(古籍检索与历史研究所主办，每年三期)，自 1970 年以来，海牙发布的 *Annual Bibil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inted Book and Libraries* 已经收录的期刊接近 1000 种。仅 1972 年那一期(不包括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期刊)就有 2800 左右的条目。弗吉尼亚大学传记学会每五年发布一期 *The Selective Check List of Bibliographical Scholarship* 特别有助于读者了解最新成果。最早由西德于 1956 年出版的《书目历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比其前身《书籍销售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涵盖的地理和主题范围宽，加上 1970 年起荷兰和法国的两种新期刊，读者可以从 20 世纪后半叶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活动中选取自己的样本。与 *Archiv Quarendo: A Quarterly Journal from the Low Countries Devoted to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前身为《书籍》)一样，《法国书籍史评论》(*Revue Français d'Histoire du Livre*)也强调书籍史广泛的文化含义。Berry and Poole 的 *Annals of Printing*，pp. 287-294 提供的选目很有用，注意 Philip Gaskell 在 *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一书中的告诫。为了入门，这本书无论如何应该请教。

(3) 学科范围很广的杂志刊载的许多相关资料颇能说明问题。除了专门研究某个领域的杂志比如 *The Library*、《谷登堡研究》(*Gutenberg Jahrbuch*)之外，我还在《学人杂志》(*Le Journal des Savants*)、《UCLA 法律评论》(*UCLA Law Review*)、《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丛书》(*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宗教改革文献》(*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伊希斯》(*Isis*)、《莎士比亚研究》(*Shakespeare Studies*)等看似无关的专业期刊里找到有用的资料。

(4)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我认为，该书丰富而详细的发现对专家而不是一般读者更有用。1974 年再版时，作者增补了文献概览，但正文未动。第二版遭到不太公允的批评，见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21, 1967), p. 848。

(5)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书尚未写完费弗尔就去世了，主要的功劳属于马丹。)马丹稍后的大作 *Livre, Pouvoirs et Soci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被誉为"了不起的续篇"。(见'Books in Franc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Nov. 20. 1967], p. 1344。)该书实至名归，内容比书名涵盖的范围更广。不过，该书的两卷只介绍 17 世纪法国的期刊，不足以成为那个一卷本的《书籍的出现》的"续篇"，因为《书籍的出现》囊括欧洲三百年的期刊。作为一卷本综合著作，尚无其他书能出其右；和其他概述不同，这本书有一个内容丰富的分类目录。其英语版 *The Coming of the Book* 刚刚问世。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以更短的篇幅跨越更长的时期，其丰富性和深度都不如《书籍的出现》；在处理最近几百年方面，该书尤其单薄；但在介绍谷登堡之后的第一个一百年方面，他提供的一些资料不见于其他同类的概论书。

(6) Hay, 'Literature: The printed book,' pp. 359-386. see n. 64 below.

(7)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p. 11.

(8)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2.

(9) 图书馆学的学者时常指出，大多数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漫不经心，效果甚微。参见

Uhlendorf 在 *The Invention and Spread of Printing*, p. 179 中的评论。

(10)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p. 238.

(11) 请将库尔提乌斯(Curtius)论抄书人的话和伊文思(Ivins)的话作一番比较。库尔提乌斯说抄书人勤奋、有爱心、坚韧不拔(p. 328),伊文思却说"潦草、笨拙、难看、匆忙粗心抄写的手稿",转引自 Curt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 87。库尔提乌斯说:"每一本手抄书都是个人的成就。"他忽视了大量的事实,一切证据说明多人分段抄写也是司空见惯的——至少在 9 世纪就是这样的。见 Jean Destrez, *La Pecia*, pp. 21; 44。图书馆珍品室收藏的漂亮手抄本给人错误的印象,见 Butler,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p. 11。

(12)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p. 16.

(13) McMurtrie, *The Book*, p. 238.

(14)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11.

(15) Berelson and Janowitz, *Reader in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 收录了几篇相关的文章。

(16) 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用意义隽永的丰富想象区分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且将其用于分析希腊文化的不同阶段,见其 *Preface to Plato*。杰克·谷迪(Jack Goody)和伊恩·瓦特(Ian Watt)用人类学观点作了同样的研究,见 Goody and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又见谷迪所编的文集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中相关的文章。虽然谷迪在该文集的序言里提到麦克卢汉和沃尔特·翁的研究成果,但他对比的重点是拼音文字与会意文字、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他模糊了手抄书文化与印刷文化的区别。稍早有一篇比较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的文章被人忽视,见 Gandz, 'The Dawn of Literature'。我在本书序言里指出,近年对非洲研究的兴趣催生的新文献如雨后春笋。见凡西纳(Vansina)整理的文献。

(17) 欲知其详,请参考我的文章'Clio and Chronos'。

(18) 我发现"手抄书文化"(scribal culture)这个术语有用、简略且方便,用来指文字发明以后、印刷术发明以前生产和复制书籍、传送书简、报告消息、储存数据的活动。最近,翁(Walter Ong)用"chirographic culture"(口语文化)和"typographic culture"(印刷文化)这样一对术语,但他这对术语对我而言太学究气。我在本书序言里说,"print culture"只用来指称谷登堡以后西方世界的发展。至于印刷术如何影响谷登堡之前的亚洲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我们不得不留给他人来研究。

(19) 研究书籍历史的专家们认识到,有必要区分前谷登堡手稿和后印刷术手稿。关于手稿书的考古学探讨,参见 Pierre Josserand, 'Les Bibliothèques'。一位学者建议保留"codicology"(手稿学)一词专指印刷术前手稿书的研究,用"manuscriptology"一词用来指谷登堡之后的手稿。参见格鲁吉斯(Albert Gruijs)的重要文章《手稿学还是书籍考古学?》('Codicology or Archeology of the Book?'),该文征引了赫林加(Wytze Hellinga)1952 年在荷兰语文学会上的讲话。关于大多数现代书籍使用者对手稿书性质心不在焉的忽视,戈尔德施密特阐述得很清楚,参见 Goldschmidt, *Medieval Texts and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n Print*, p. 9。

(20) 吕西安·费弗尔在《问题》(*Le Problème*)一书里构拟了印刷术之前的欧洲心态,其想象异常精彩。尤其注意他论印刷机和异端的章节(pp. 418-487)。另一个敏于观察手抄书文化

的例子见 Smalley, *English Friars*, pp. 9-10。研究手抄书机制如何塑造中世纪文献的一部开创性著作是柴特尔(H. J. Chaytor)的 *From Script to Print*。

(21) 我这里没有提穆斯林或拜占庭文化中心,仅仅是因为它们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实际上,在中世纪的一千年里,手抄书文化在拉丁文的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一些中心更加繁荣。

(22) 鲁特(Root)的文章《印刷术之前的出版》('Publication before Printing')非常陈旧,却仍然是该课题的最佳入门读物,见 Bennett,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Vernacular Manuscripts'。

(23) 早期印刷商的经营情况和现在的版本学家的想象不一样,McKenzie, 'Printers of the Mind: Some Notes on Bibliographical Theories and Printing House Practices'对此作了精彩的描绘。布莱克(M. H. Black)告诫今人不要将现代的标准化附会到早期版本上,见其文章'The Printed Bible'。又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24)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人们的观点见仁见智。关于 13 世纪巴黎一个版次的《圣经》"印数",见 Robert Branner, 'Manuscript Makers'和'The Soissons Bible Paintshop'。

(25) 参见德·拉·马尔(De la Mare)对韦斯巴西亚诺(Vespasiano)的研究,详见本章注释(28)。

(26) 所谓"典型"手稿书一说要谨慎,见 Delaissé, *Le Manuscrit Autographe*, pp. 1, 50。

(27) 汉弗莱斯(K. W. Humphreys)对 12 世纪的"书籍革命"作了简明的描述,见 *The Book Provisions of the Medieval Friars*, p. 13。牛津、巴黎、博洛尼亚的大学书商实行"分工抄写制",他们把手稿分解开来分发给抄书人,定期用一个范本检验,德斯特雷斯(Destrez)对此作了详细的描绘。

(28)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18-19 断定"确有抄书房",而 Delaissé 对此却作了深刻的批评,见其在 *Art Bulletin* 上发表的对 Millard Meiss 著作的评论。生产 13 世纪法国《圣经》手抄本的抄书人后来分散了,见 Branner 的两篇文章:'Manuscript Makers'和'The Soissons Bible Paintshop'。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韦斯巴西亚诺(15 世纪佛罗伦萨最著名的书商)有一间抄书房,De la Mare 的深入研究不支持这一观点,见 Branner 的'Vespasiano'和 Messer Piero Strozzi 的'A Florentine Scribe'。Strozzi 认为,韦斯巴西亚诺把书稿分发给斯特罗兹之类的公证人,这些人在业余时间抄书。没有资料显示,韦斯巴西亚诺雇用正规的雇员。有关韦斯巴西亚诺和德·拉·马尔的研究成果,又见本书第二章注释(6)、(13)、(14)。与此同时,我还没有见到有人挑战 14 世纪早期伦敦有"世俗抄书房"的观点,见 Loomis 发现的'The Auchinleck Manuscript'或 John Shirley 的'publishing firm'。欧文(Raymond Irwin)在 *The English Library Before 1700* 的序言里对此作了介绍。人们经常说起迪博尔德·劳伯(Diebol Lauber)在阿尔萨斯的阿热瑙经营的"书籍工厂"以及斯特拉斯堡和斯图加特的抄书房,见 Hellmut Lehmann-Haupt, 'The Heritage of the Manuscript'和 *Peter Schoeffer*, pp. 64-65。关于传统的观点(已经过时?),见 Harrington 的未刊稿'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ooks in Western Europe to the Year 1500',其第五章论述 12 世纪到 15 世纪的"公共商业抄书房"。有证据表明,直到中世纪晚期,巴黎几所大学的议事厅仍然被用作抄书房,见 C. C. Willard, 'The Manuscripts of Jean Petit's Justi-

fication'。为了快速同步抄书,许多抄书人聚在一间抄书房里听一个人朗读有好处,这似乎是非常明显的。在手工生产书籍的几百年里,完全放弃抄书房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29) 一些权威学者常常认为,"分工抄写"收到实际的效果——阻遏了错讹的势头,促进统一文本的生产(见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10-11;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xi)。但如果仔细看看 Destrez 的《分工抄写的书》(*La Pecia*),你就会发现,情况常常相反(见该书第 70-71 页对"错讹文本"的介绍;又见该书第 35,40-41 页)。该书还介绍了不受这种制度管束的其他类别的手抄书,但人们记述手抄书时常常忽略这些类别。

(30) Destrez, *La Pecia*, pp. 25 指出,纸张普及以后"分工抄写"制就衰落了,其原因不明,István Hajnal, *L'Enseignement*, p. 238 指出,这一制度实施的时间不长。牛津大学从 13 世纪 20 年代直到 14 世纪中叶实施这一制度,见 Graham Pollard, 'The University and the Book Trade'。

(31) 引语见 Klaus Arnold 为特里特姆斯(Johannes Trithemius)的 *In Praise of Scribes* 所作的序言。

(32) Southern,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hurch', p. 350.

(33) Gerson, 'De Laude Scriptorum'.

(34) Trithemius, *In Praise of Scribes*, chap. 7, p. 63. 曾引用这句话的权威学者有:Clapp, 'The Story of Permanent Durable Book Paper' 11, 108; Bühler,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p. 35; Fussner,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p. 8。他还引用了 G. S. Ivy,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Manuscript-Book'里的一段文字。

(35) 特利泰姆斯(Trithemius)在其他著作里也依靠热尔松,阿诺德(Arnold)在为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所作的序文里(p. 20)就指出,热尔松在该书第 31 页表明,他更喜欢耐久的羊皮纸而不是容易损毁的纸张(由于序言年代较早,所以它未提及手抄本和机印本的差别)。在 4 世纪的一封信里,圣哲罗姆描绘了凯撒利亚的潘菲卢斯(Pamphilus)图书馆所藏莎草纸卷损毁的情况,而且说明了它们被比较耐久的羊皮纸卷取代的过程。犹太经典《塔木德经》(*Talmud*)也训谕,要用羊皮纸书写,而不是用纸张书写。见 Kenyon, *Books and Read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pp. 44-45, 115。

(36) 关于特利泰姆斯与巴塞尔印刷商和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接触,关于他的目录学家、编年史家、密码家和巫师的角色,见本书第 94-97 页。

(37) 阿诺德在 *In Praise of Scribes* 的序文里指出,特利泰姆斯密切监察美因兹的弗莱堡(Peter von Friedbergr)的印刷所的工作。在 1490 到 1500 的十年间,这位印刷商一共印制了 23 卷特利泰姆斯写的书,还为特利泰姆斯的朋友印制了 6 部著作。

(38) 15 世纪 70 年代,加尔都西会修士维纳·罗勒文克(Werner Rolevinck)和科隆印刷商阿诺德·特尔霍南(Arnold Therhoernen)合作出书,罗勒文克在其《祈福圣母布道辞》(*Sermo de Presentacione Beate Virginis Marie*)(Cologne, 1470)的序言里介绍了两人的合作关系,马尔克斯(Richard B. Marks)正在对此进行研究,见他最近的专论 *The Medieval Manuscript Library* 以及他论晚期手抄书和科隆加尔都西会早期机印书的文章。多谢他正式出版前

就向我提供样稿。进一步论"用手布道"的材料见本书第 316-317,373-374 页。

(39)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54。5 世纪 70 年代,德意志地区就有 7 所修道院安装了印刷机。Paul Kristeller, 'The Contribution of Religious Orders to Thought and Learning,' p. 99, n. 13 介绍了意大利和英格兰修会使用印刷机的情况(该页介绍了利珀里的圣雅科珀修道院[Convent of San Jacopo of Ripoli]的印刷所,认为这是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印刷所之一)。Febvre, *Au Coeur Religieux*, p. 33n 介绍了沙特尔修士安装印刷机的情况。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 264 提及勃艮第的几所法国修道院。低地国家的共同生活兄弟会使用印刷机,和该会创始人杰拉德·格鲁特(Gerhard Groote)关系不太稳定的德文特印刷所生产大批印刷品。L. A. Sheppard, 'Printing at Deventer' 对此作了介绍。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思想影响及其在德文特印刷业里所起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见 R. R. Post, *The Modern Devotion*, pp. 8-10, 551-553。M. Schoengen, *Narratio de Inchoatione Domus Clericirum in Zwollis*(1908)中详细描绘了兹沃勒地区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变革,转引自 Sowthern,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hurch*, p. 349。

(40)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59)里赫林加的文章,又见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对路德态度和韦伯主题的探讨。

(41) 参见 McLuhan, *The Getenberg Galaxy*,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也阐述了同样的主题。本书对麦克卢汉的进一步评论见第 40-41 页。

(42) "我们的时代是印刷文化的时代",与之相伴的倾向是将印刷术的功能视之为理所当然;Butler,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阐明了这种判断和倾向的广泛渗透。

(43) Eisenstein, 'Clio and Chronos,' p. 63,当前虚无主义和混乱无序的审美倾向还是要归因于印刷术的保存力量,其力量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大。又见本书"结束语"。

(44) *Riligio Medici*(1643) sec. 24, in *The Prose of Sir Thomas Browne*, p. 32. 又见 Lope de Vega 引语,转引自 Smith, *A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 II, 276。史密斯暗示,到了 17 世纪,人们才感觉到书籍倍增的压力,但稍早的伊拉斯谟已经在抱怨书籍泛滥。见其 'Festina Lente', *The 'Adages' of Erasmus*, pp. 182-183。他的抱怨大概和古代抄书人的常规有关系。毕竟,彼特拉克(Petrarch)和尤维纳利斯(Juvenal)在各自的时代里也抱怨过抄书人。

(45) 参见本书第 154 页曼海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46) 孔多塞(Condorcet)颇有影响的图式及米什莱(Michelet)借用此图式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三章注释(420);关于新教的历史记述,参见本书第 304-305 页的讨论。近年发表的《路易·菲力普回忆录》(*Mémoires de Louis Philippe* I, 4)将印刷术描绘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明",认为它在摧毁封建主义中扮演了领衔的角色。

(47) 当前对手抄书赋予"博物馆文化"的崇拜态度与历代漫不经心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在 16 世纪,机印书问世之后,人们常常"像扔旧报纸一样地"扔掉手抄书和古版书(见 Destrez, *La Pecia*, p. 18 页);在 17 世纪,莎士比亚第三版的对开本著作出版之后,牛津图书馆管理员就把他的第一版对开本卖了(见 Bühler,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p. 101, n. 44)。这些事实说明,印刷术来临之后,人们对待手抄书的态度有时就是愚昧者对手抄书的鄙视。见 Allen, *The Age of Erasmus*, p. 159-60。即使在谷登堡之前,一些人文主义者在抄录手抄书

时也不注意保存这些抄本。见 Reynolds and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p. 116。另一方面，Sweynheim 和 Pannartz 的编辑 de Bussi 抱怨吝啬的藏书人不愿意将手抄书借给他的出版社使用，因为他们认为印刷技艺使他们的财产贬值。见 Botfield, *Praefationes*, pp. vi-vii。Ralph Franklin, 'Conjectures on Rarity'认为，"善本书藏书室"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

(48) 过去一百年里技术史学会的出版物说明，谷登堡的发明被扔进了拥挤的发明库房里。该会的刊物 *Technology and Culture* 发表的文章、评论和书目提到印刷术的时候并不多。

(49) 关于教廷图书馆长焦瓦尼·托特里(Giovanni Tortelli)列出的发明清单，见 Kelle, 'A Renaissance Humanist'。1449 年编纂的《正字法》(*De Orthographia*)1471 年在罗马(by Gallus and Nichollaus)和威尼斯印行。这本书的机印本一共有 13 版。

(50) Keller, '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 p. 22-23. Marcel Bataillon, 'Philippe Galle et Arias Montano'对印制版画《新发明》的安特卫普印刷所作了很有趣的介绍。镌刻家兼出版商与版画说明文字撰写者(名字叫科尼利斯·基里安或基里安努斯·杜夫利乌斯)都和安特卫普的印刷商普朗坦的圈子过从甚密。

(51) Sarton, *Six Wings*, pp. 248-249, n. 35 和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 135, n. 1 都指出，《新发明》的书名页都把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与马镫、机械钟、美洲的发现、丝绸、酿酒、淋病治疗术并列。这个清单似乎拥挤，但它已经比托特里的清单有所减少，托特里的清单加上了印刷术和其他次要的发明，比如 Polydore Vergil, *De Inventoribus Rerum*(Venice, 1499)就把长筒袜和贝雷帽列进去了。*De Inventoribus Rerum* 的书名页还区别印刷机和大炮的比例尺和地位(大炮尺度大，且居中)，美洲和罗盘的发现(放在两侧)，其他小发明散乱地放在地上。(感谢 Alice McGinty 为我提供她刚刚在波士顿大学完成的研究斯特拉达努斯的博士论文，她让我看见了全套镌刻画图片，让我能够回顾这个课题上的文献。)

(52) 除了上文引用的亚历山大·凯勒的文章之外，Wolper, 'The Rhetoric of Gunpowder'和 Kinser, 'Ideas of Temporal Change'也为火药和指南针的同时出现提供了很有用的背景。

(53) 见培根：《新工具》(*Novum Organum*)，警语 129，本书第二章引用了其中一段。16 世纪的其他评论有 Guillaume Budé and Rabelais(1532)、Jean Fernel(1542)、Joachim Du Bellay(1549)、Fazio Cardano(1551)、Jean Bodin(1556)、Martin Frobisher(1578)、Louis Le Roy(1557)和 Guillaume Postel(1560)等人的评论。到了培根的时代，他们的评论已经使印刷术引人注目。关于类似培根的英国宣传者，还可以加上 John Bale 和 John Foxe。

(54) 由于晚近划时代事件及主要发明的增加、反复出现的危机时代以及和过去的彻底决裂，当代人的视野被扭曲了，我的文章'Clio and Chronos'对此作了介绍(pp. 38-39)。

(55) Robert Lopez, 'Hard Times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 p. 33;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pp. 134-37; Dana B. Durand, *The Vienna-Klosterneuberg Map Corpus*, p. 282.

(56) Clapham, 'Printing'.

(57) 关于古籍生产、图书馆和图书贸易的英语文献，见 Kenyon, *Books and Read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Reichmann, 'The Book Trade at the Time of the Roman Empire';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相比而言，Putnam, *Authors and Their Public*

in Ancient Times 就不值一读;其 *Books and Their Makers in the Middle Ages* 过时,且偏重趣闻轶事、散漫,但有一些有用的资料(虽然混乱)。Reynolds and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意在解释"向古典研究新手"传播的问题,但同时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中世纪手抄书文化。除了 McMurtrie, *The Book* 之外,David Diringer, *The Hand Produced Book* 和 *The Illuminated Book* 也是很好的入门书。Knowles 研究了中世纪英国修道院图书供应的情况,见其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11,331-351。关于中世纪晚期手抄书贸易到早期机印书的顺利过渡,见 Lehmann-Haupt,'The Heritage of the Manuscript'和 Harrington 的博士论文'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ooks in Western Europe to the Year 1500'。

(58) 阿尔伯特·厄尔曼(Albert Ehrman)研究了印刷术出现后半个世纪内日益壮大的印务公司拓展辽阔的市场和启动宣传的情况,见其文章'The Fifteenth Century'。埃德勒·卢福尔(Edler de Roover)靠研究印刷商的账本显示早期资本主义的若干方面,见其文章'Cost Account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和'New Facets on the Financing and Marketing of Early Printed Books'。F. 盖尔德纳(F. Geldner)也作了类似的研究,见其文章'Das Rechnungsbuch des Speyrer... Grossbuchh? ndlers Peter Drach'。

(59) Zilsel,'The Origins of Gilbert's Scientific Method', p. 24.

(60)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p. 374.

(61) 弗朗西丝·耶茨这个课题是关于印刷商的许多角色的课题。他们的女儿或遗孀常常接管家族的企业,伦基(Susan V. Lenkey)等人注意到这一点。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36)。

(62) 见本书第三部分,我们试图说明,所谓印刷术的"外部"理论如何与科学史的所谓"内部"历史条件相联系。这部分多次论及历史撰写的问题,我的文章'Clio and Chronos'也谈到这个问题,但充分阐述则需要另写一本书。

(63) 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将"文艺复兴"一词限制在文化运动的范围,在 *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里,他阐述了"运动"和"时期"的区别,但编教材的人对这样的忠告置若罔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本书第三章。

(64) 因此,虽然初期机印本的末尾属于《新剑桥近代史》第二卷《改革:1520—1559》覆盖的那个时代,但海伊还是把印刷术那一章放进了第一卷。我想,海伊论印刷术这一章不应该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思潮放在一起,而且我认为,他这一章为 Roberto Weiss 的'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470 to 1520'作了铺垫。

(65) 中国人最先发明火药和印刷术,16 世纪传教士的报告阐述了这一主题,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比如蒙田普及了这一主题,见其'On Coaches'(1588)(tr. John Florio, 1600),转引自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ed. Ross and McLaughlin, p. 157。17 世纪初的著作比较中国的雕版印刷和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时,常常认为谷登堡占优势,Keller,'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对此作了描绘。关于这一课题的标准研究,见 Carter and Goodrich,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和 Fuhrman,'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自 17 世纪以来的研究发现,谷登堡之前的亚洲人(韩国人)已经发明了金属活字。现在讨论的重点放在拼音文字和会意文字的区别上,拼音文字容易充分利用凸版印刷机。

(66) Braudel, *Capitalism*, chap. 6, pp. 285; 300.

(67) Sarton, 'The Quest for Truth', p. 67. 萨尔顿早期对印刷术的论述比较含糊，后来他修正了对印刷术影响的看法。

(68) Gilmore, *The World of Humanism*, p. 186. 又见 Eugene F. Rice 内容丰富的 *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10。J. R. Hale 有一段论新印刷机的文字很有见地，见其 *Renaissance Europe*, pp. 188-190。

(69) 进一步的讨论见本书第四章。

(70) 克拉克(George N. Clark)关于传播革新的文字见其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47-60; 330-333。又见该书的以下论述：关于计算尺与对数(p. 235)；关于教育(chap. 18)；关于文学(chap. 20)。默顿(Robert K. Merton)论科学史的重要著作继承了克拉克的方法论，虽然默顿的著作较旧，但仍值得一读。进一步的讨论见本书第 460 页之后。

(71) 这段文字写好以后，出现了许多论高等教育两阶段的著作(H.-J. Martin 及其同事撰写第四卷，Robert Mandrou, François Furet 及其同事撰写第六卷)。这些研究显示，书籍的历史已经被拓宽，涵盖了文化和政治趋势。见 Alphonse Dupront, *Livre et Culture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ois au XVIIIe Siècle*。又见 Dupront 的书评'Livre et Culture'; Louis Trénard,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Collectives'; Manddrou, 'Le Livre: Ce Ferment'。不过我认为，即使这些新成果也模糊了印刷术的影响，Dupront 的文章'Le Livre retarde'对"书籍的滞后"的评论足以为证(pp. 895)。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许多领先的著作(见书末文献)里揭示出更多爆炸性的发现。至于 1976 年以后的文献研究，见 Birn, '*Livre et Société*, after ten years'。

(72) 这句话是 1970 年写下的，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例外。Joseph Klaits, *Printed Propaganda under Louis XIV* 有一章论"太阳国王及传播革命"。该书研究印刷术以后新发展的意义，将"传播革命"用于专指 17 世纪的新现象比如期刊。不过他的"传播革命"所指的范围比我这本书的范围窄。

(73) North and Paul,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74) 关于对 16 世纪幼稚观点的评论，见 Clapham, 'Printing', p. 377。我在'Clio and Chronos'一文里举例说明，发明和发现被当作单独的事件已经饱受争议(p. 39, n. 9)。

(75)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23.

(76) Ibid. p. 22.

(77) Ibid. p. 25.

(78) Ibid. p. 29.

(79) Ibid. p. 133.

(80) Hugh H. Davis, book review, *Renaissance Quarterly* (1973), p. 353 所评的书显示，"codex"这个词既指手抄书又指机印书。

(81) 见上文所引柴特尔、戈尔德施密特、吕西安·费弗尔等人的著作。

(82) 这种不情愿的态度在专业史学家和大学教授中比较普遍，在中学历史教员中比较少见。后者比前者更可能赋予谷登堡发明更重大的意义。一位昔日中学教员的新作开宗明义地强

调"印刷术的影响",见 Antonia McLean, *Humanism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m in Tudor England*, chap. 1。不过,该书以后的章节似乎更倾向于遵循传统的指南,见本章注释(85)。

(83)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2.

(84) 见 Chap. *L'Apparition*: 'preface', xxiii-xxix; 'introduction', pp. 1-24 and chap 1。他们的观点和斯坦贝格的论述形成强烈的反差,马丹强调的是书籍版式的渐进变化,而不是革命性变化(p. 108)。

(85) Ibid. pp. 420-421。许多人引用这一段文字。他们都倾向于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旧文本印数的增加可能会促进新思想的形成。本书以后各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重要的观点。

(86) Ibid. pp. 193, 377, 394, 443.

(87) Stephenson, *A Brief Survey of Medieval Europe*, p. 369.

(88) Hay, introduction,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pp. xxii. (本书的副标题"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容易误导人。该书是一个扩版的描述性书目,约有四百个条目,讲述 1963 年伦敦博览会上展示的初期机印书的善本。)在《新剑桥现代史》的序言里(*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4),海伊告诫人们不要过高估计印刷术的影响。

(89) Saenger, 'Colard M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ted Book.'

(90) Ibid. p. 414. 文中提到的西尼尔(Saenger)的后继者令人困惑。据 Erich von Rath, 'The Spread of Print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 79, 1484 年曼逊(Mansion)离开布鲁日以后再也没有下落,其他权威人士也说不知道曼逊的下落,所以,其"后继者"是谁、他们出了什么书,这些问题并不清楚。

(91) 据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66-67 的估计,以及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327-328 的估计。两本书的作者都以引用 Haebler, *The Study of Incunabula* 的发现开篇;他们指出,根据意大利的早期印刷商斯 Sweynheim 和 Pannartz 自己的统计,他们在 1465 年和 1471 年间印行的书籍有 275 种。15 世纪 80 年代,400 册到 500 册是一版书印量的常态。这十年间机印书的价格下降。(西尼尔说:"大体上,起初的机印书并不比手抄书便宜[p. 411, n. 14],这句话无助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到 15 世纪 90 年代,一个版次的印数又有所增加,拉丁文《圣经》的印数达到 900 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达到 1500 册,见 Lenhart, *Pre-Reformation Printed Books: A Study in Statistical and Applied Bibliography*, p. 9。伦哈特这本书专门研究前宗教改革的书籍生产,其中的资料正好是西尼尔放进后宗教改革时代的资料。关于佛罗伦萨商人杰罗拉默·斯特罗兹(Strozzi)印行三种通俗语翻译的图书后威尼斯出版社增加的详细情况,参见 Edler de Roover, 'Per la Storia dell'arte della Stampa in Italia: come furono stampati a Venezia tre dei primi libri in volgare'。在 1475 年和 1476 年间,由斯特罗兹、罗马、锡耶纳、比萨和那不勒斯的分销商销售或用船运到布鲁日和伦敦的书就达 1,500 种。可见即使科拉德·曼逊在布鲁日印书的情况下,威尼斯的出版社也在布鲁日的市场上售书。

(92) 关于曼逊与卡克斯顿的关系,最新、最有用的记述见 Painter, *William Caxton*, chap. 9。最详细的研究仍然是 William Blades, *The Life and Typography of William Caxton*, I, 39 ff.。又见 Bühler, Review article. *The Library*, (1953); Blake, *Caxton and His World*, p. 62。

(93) Saenger,'Colard Mansion' p. 416. 他笔下的"抄书房"一词是否妥当这个问题,最好是由 L. M. J. Delaissé 笔下的学者来决定吧。见本章注释(28)。

(94) Painter,*William Caxton*,p. 102。

(95) Jowett 在'Toward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中指出这些领域里缺乏历史视角的想象。又见 Katzman,'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关于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变革,Katzman 提出的一些命题值得我们审视。

(96) 书评题为'Battle of the Senses'。

(97) 沃尔特·翁在最近出版的著作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中反复提到这样的影响。翁牧师在已故的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指导下研究思想史,他研究拉米斯(Peter Ramus)的博士论文很扎实。他似乎倾向于历史型的论争而不是麦克卢汉那种论争。他关于媒介变革对寓言、意识和修辞的影响见诸他的论文集 *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该书提供了他的著述目录。

(98) Peter Burke,introduction,*A New Kind of History*,p. x:"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生涯建立在重申费弗尔言论的基础上。"这句话似乎言重了,因为麦克卢汉在他的书里确认了许多权威的论述。关于他依靠费弗尔之前的哈罗德·伊尼斯、路易斯·芒福德等人的情况,参见 Kuhns,*The Post-Industrial Prophets*,part 2。

(99) Morison,'The Learned Press as an Institution,' p. 153.

第二章

(1) 关于印刷所数量和地区的估计,见 Lenhart,*Pre-Reformation Printed Books*,p. 7。关于印刷术初期发展的图像表述,见 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p. 7 的地图,其涵盖时间有两段:1471—1480 和 1481—1500。又见 Hirsch,*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p. x,参见他介绍了泰克尔(R. Teichl),'Der Wiegendruck im Kartenbild'一文里更加详细的表述。乌伦多夫(Uhlendorf)的文章'The Invention and Spread of Printing'(1932)有一点前无古人:它简明扼要地介绍印刷术快速传播的经济原因以及印刷机密集在一些中心地区的原因。研究早期近代贸易路线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但研究传播中心迁移的著作少得可怜,此情此景真令人欷歔。关于印刷所数量和地区的估计,见 Lenhart,*Pre-Reformation Printed Books*,p. 7。

(2) Stillwell,*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of Books* 是有用的向导。尤其参考其附录 A,pp. 75-78。她挑选 1470 年作为这门新技艺快速传播的起飞点(p. x)。

(3) 初期机印本的起始点应该拓宽,以涵盖首批印刷所创办人在世的时期,以包括 16 世纪初那几十年,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pp. 15-17 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4) Clapham,'Printing,' p. 17. 他所谓的"全体欧洲抄书人"是否包括拜占庭的抄书人,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如果不包括,他这句话就成问题了。

(5) 中世纪"书"的概念成问题,其性质常常相当复杂,记录它们的目录学家里没有统一的常规,戈尔德施密特介绍了许多中肯的例子,见 Goldschmidt,*Medieval Texts*,pp. 95-101。

(6) 韦斯巴西亚诺印制的《名人传》(*Lives of Illustrious Men*)提供了古典书的数字,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 part 3, chap. 3, p. 201 对此做了介绍。B. L. Ullma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cript, pp. 132 怀疑这一数字。他的怀疑在以下文献中有详细的描绘：菲索尔(Fiesole)幸存的手稿；德·拉·马尔所著的'Vespasiano,'pp. 74-76 和附录。(马尔的另一篇文稿即将出版，题为'Vespasiano and the Library of the Badia at Fiesole'，该书将会提供更多的资料。)马尔说明，韦斯巴西亚诺用各种办法搜集图书以满足馆藏，其办法包括买二手书、依靠其他书商等；搜集工作超过两年，1461 年为一段，1466 年至 1467 年是另一段。关于不久前使用如今不再被人相信的手写书的"平均"册数，见 Burke, *Culture and Society*, p. 59。

(7) De la Mare, 'Vespasiano,' p. 207. 这本书洛阳纸贵，"印刷量极大"，"五年之内售罄"，而且还重印了一次，雷诺兹和威尔逊对此做了记述，见 Reynolds and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p. 130。据克里斯特勒记述，Ripoli 印刷所是"佛罗伦萨最早的出版社之一"，见 Kristeller, 'The Contribution of Religious Orders', p. 99。除了印行 Ficino 的第一版 Plato(1484)之外，'Donatus'(1476)和 *Book of Revelation*(1478)也值得注意，Ripoli 女修院的修女经营出版社，她们是"最早印制书籍的女人"，见 Gies, 'Some Early Ladies of the Book Trade', p. 1421。关于该印刷所的基本情况，见 Nesi, *Il Diario della Stamperia di Ripoli*。

(8) 哈林顿指出这种受误导的情况，见 Harringto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ooks in Western Europe to the Year 1500', p. 3。考虑谷登堡之前的 50 年时更容易受误导，在那 50 年里，加快大量发行学术书籍的"分工抄写"的体制不再实行。

(9) 我从与斯特雷耶尔(Joseph Strayer)的交谈中获悉，15 世纪的法王诏书用一种"连锁信"的技巧快速复制和传递。御前雇用 10 位抄书人，迅速记录 10 个副本，这些副本迅速被信使送到各省的抄书中心，以同样的方式复制成数以千计的副本。又见 Willard, 'The Manuscripts of Jean Petit'。

(10) 关于 13 世纪巴黎版的《圣经》，见上文所引的布兰纳(Robert Branner)的两篇文章(本书第一章注释(28))。关于路德之前机印《圣经》版本的情况，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148)。

(11) 见本书第三部分的相关讨论。

(12) 关于纸张引进后拉丁古籍手抄本"大量"生产的情况，参见 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pp. 14-15。该书论及被忽视的拉丁文书籍，他孜孜不倦地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写书。他编纂 *Iter Italicum* 和 *Latin Manuscript Books before 1600*。印刷术发明之前手抄本"大量"生产的情况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你还是得承认这一事实：虽然手写书看上去可能会很多，但和印刷术之后机印书的数量相比，手写书还是很短缺的。纸张的使用并不能减少抄书的工时，所以手抄书生产的速度达不到印刷机生产书的效果。

(13) 佛罗伦萨的书商一般只搞装订，出售书写材料，而不是购书或生产书(虽然手边有一些书可供出售)。欲知其详，参见 De la Mare ,'The Shop of a Florentine"cartolaio"in 1426'。

(14) De la Mare, 'Bartolomeo Scala's Dealings,' p. 240.

(15) De la Mare, 'Vespasiano,' pp. 95-97; 226.

(16) De la Mare 的赞誉见其'Vespasiano', pp. 108-109。

(17) *Art of the Printed Book 1455-1955*, introduction by Joseph Blumenthal, p. 9. 展览会第 55 件展品的标签上也写着这句话。

(18) Shenker, 'Books as an Art Form Through Five Centuri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0, 1973), 2nd sect., p. 1.

(19)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p. 204. 乌尔比诺公爵之所以自惭形秽，那是因为他藏有一册机印书；红衣主教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的使节在康斯坦丁·拉斯卡里斯(Constantine Lascaris)的家里发现一册机印书时，"嘲笑在德意志某个城市找到了一本野蛮人的书"。关于布尔克哈特对韦斯巴西亚诺的利用，见 Helen Wieruszowski, 'Burckhardt and Vespasiano'，又见本书第三章注释(420)。

(20)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 62; De la Mare, 'Vespasiano,' p. 112; Moranti, *L'Arte Tipografia in Urbino*, p. 9.

(21) De la Mare, 'Bartolomeo Scala's Dealings,' p. 241.

(22) Goldschmidt, *Gothic and Renaissance Bookbindings*, 1, 43-44.

(23) 1910 年，菲利普斯(W. A. Phillips)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11 版撰写的"浮士德"词条(*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10, n. 1)断言："富斯特和浮士德为同一人的看法如今被普遍放弃了。"有证据表明，富斯特 1466 在巴黎售书时死于瘟疫，说明他的第一次巴黎之行并没有使他放弃稍后再去巴黎。

(24) 学者们爱恨交织，他们诅咒早期印刷商粗心的错误，就像过去诅咒抄书人粗心的错误一样，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p. 50-51 和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48. n. 20 介绍了这样的矛盾心态。史迪威搜录了人们对这一"神奇"的技艺的赞美，检索很方便，见 Stillwell,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of Books*, appendix A; 2, pp. 88 ff。这些赞词呼应人们过去对抄书人的赞美——这个主题至少可以回溯到卡西奥多鲁斯，热尔松的《抄书人赞》和特里特姆斯的《抄书人礼赞》印行了这样的赞词，见本书第一章的介绍。

(25) 贾南德里亚·德·比西(Gianandrea de Bussi)帮助斯韦因海姆和潘纳兹(他们两人在罗马开办了印刷所)编辑图书。比西当时是一位低级教士，曾任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主教的私人秘书，后来任阿勒利亚的主教。在 1469 年罗马版的圣哲罗姆《使徒书》(*Epistles*)里，他将这本书献给教皇保罗二世；这篇献词把"神的技艺"(divine art)献给库萨努斯(Cusanus)主教。毋庸赘言，早期印刷商想要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个短语。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讲述了不广为人知的反应，尤其一位多明我会修士未刊的谩骂早期印刷术的言论，这位修士曾任抄书人；他对 15 世纪晚期威尼斯的印刷机很反感；马丁·罗利(Martin Lowry)这篇文章题名'Intellectuals and the the Pres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Venice'，即将由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刊发。

(26) De la Mare, 'Vespasiano,' pp. 113. 于手抄书的价格，参见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p. 68-73;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chap. 4; Pettas, 'The Cost of Printing a Florentine Incunable'。

(27) 当然，只有事后诸葛亮才知道，印刷术造成的失业现象并不严重，无论后来证明是否有道理，对失业的担心被激起来了。关于印刷术造就的新职业，见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

ry Book, pp 25-7;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p. 48-49。印刷机出现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佛罗伦萨的书店从 12 家增加到 30 家,见 De la Mare, 'Vespasiano', p 44。

(28) 关于小牛犊销售量的有趣猜想,见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 41。

(29) Lehmann-Haupt, *Peter Schoeffer*, pp. 37-38.

(30)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 16. Cora E. Lutz, 'Manuscripts Copied from Printed Books'详细描绘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是卢兹在耶鲁的 Beinecke 图书馆找到的。

(31) 卢兹注意到耶鲁馆藏的早期印刷商交给排字工的手稿,见 Lutz, 'Manuscripts Copied from Printed Books', pp. 262。他还注意到,一位 13 世纪的抄书人的愠怒;因为一位书商所做的一处修改破坏了托马斯·阿奎那两页纸的对称。

(32) 相关的例证见印刷商奥尔杜斯·马努蒂尔乌斯(Aldus Manutius)的总编辑马库斯·穆苏鲁斯(Marcus Musurus)1498 年为排字工准备的阿里斯托芬剧本的工作程序。又见 Reynolds and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pp. 132-133。

(33) Lehmann-Haupt, *Peter Schoeffer*, pp. 53-54 有一些相关数据。

(34)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28.

(35) Ibid, p. 145. 和其他权威人士一样,Steinberg(pp. 145 ff)和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p. 66-67 都夸张了书名页的新奇,将其描绘成纯粹印刷术之后的现象。福尔杰(Folger)图书馆有一册瓦拉(Lorenzo Valla)的 *De Elegantiis Linguae Latinae*—Philips Ms 2966; 'v. a. 102';据德·拉·马尔考证,这本书的抄书人是斯基奥珀(Cristoforo Schioppo)。作者的名字洛伦佐·瓦拉和书名都誊写在一张纸上,看上去就像镌刻在石碑上。德·拉·马尔证明,这并不是手抄书有书名页的孤例。斯坦贝格对书名页的记述并不是没有根据;他忽略了 15 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手稿,把北方手抄书的风格当作规范。印刷术之前,书名页并不常见,末页提供的作者和抄书人等方面的信息也不常见。

(36) Ivins,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后来的学者在科技资料和田野报告中探讨过伊文思评述的一些版画。见本书第 262 页以后。

(37) 比如,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 p. 89; Skelton, *Explorer's Maps*, p. 12; Robinson, 'Map Making and Map Printing', *Five Centuries of Map Printing*, p. 1。Robinson 这篇文章显示的相关工具及技法的插图清晰而有用。

(38) 关于中世纪的图样书,见本章注释(123)。

(39) 维萨里(Vesalius)《人体的结构》(*De Fabrica*)的第二版由巴塞尔的镌刻师作画,他的刻刀锋利,字体清晰,线条分明,所以这版书能赢利。据韦利·维甘德(Willy Wiegand)记述,如果雕版用桦木,纸张带潮气,亚麻仁油比较热,镌刻画就可以印 3000 份到 4000 份。1935 年,他用旧木刻印行维萨里的《解剖学图谱》(*Icones anatomicae*)。见 Robert Herrlinger, *History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p. 113。

(40) Ivins,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pp. 2, 11, 163.

(41) Ibid. p. 27.

(42) Herrlinger, *History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pp. 53-60 对标记线的描绘很精彩。谢谢卡伦·利兹(Karen Reeds)提醒我注意这一文献。

(43) 关于雕版印刷和书籍印刷的关系，关于雕版印书是否走在活字印刷之前的讨论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在此无法赘述。仅举最新的几例：Heinrich T. Musper，'Xylographic Books'，pp. 341-347(尤其文献第 347 页)；Lehmann-Haupt，*Gutenberg and the Master of the Playing Cards*。若要细察手工插图与早期美因兹印刷术交叉的情况，参见 Elgin Vaassen，*Die Werkstatt der Mainzer Riesenbibel in Würzburg und Ihr Umkreis*。又见 A. Labarre，'Un Atelier Mayen，cais d'Enluminure vers 1450-1500'。关于作坊结构与新型插图手册的关系，见哈利·波贝尔(Harry Bober)评 *The Göttingen Model Book* 的文章。

(44) Sarton，*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1450—1600*，p. xi.

(45) 这几个术语借用自 Derek de Solla Price 的'Geometrical and Scientific Talismans'。

(46) 关于阳模雕刻工、字模工、铸模工为何全都统称为印刷工，Harry Carter，*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 1600*，pp. 29 做了讨论。

(47) 早期印刷商的社会背景和职业背景宽广。素材取自 E. 乌列梅(Voullième)和约瑟夫·本钦(Josef Benzing)编纂的德语地区的传记词典，见 Hirsch，*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pp. 18-23。该书页提及"牧师们蜂拥投身印书的工作"，第 47 页提及参与校对的牧师和主教的人数。一位修士和修道院院长放弃修道院生活，转行担任印刷商彼得·舍费尔的全职编辑，见 Lehmann-Haupt，*Peter Schoeffer*，p 83，n. 6。安妮·帕伦特(Annie Parent)的新作详细描绘了 16 世纪中叶巴黎的图书贸易，证实了我们的印象：进入该行的人背景驳杂，见其 *Les Métiers du Livre à Paris au XVIe Siècle*，pp. 175 ff。她还指出，宗教文献由主教派出的一位牧师指导，印刷商为这位牧师提供食宿(p. 122)。

(48) Hirsch，*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 有相关的研究(p. 51)；Bühler，*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有一个签署合同、出版学术书的例子(pp. 15-16)。乔万尼·马德斯泰格(Giovanni Mardersteig)的 *The Remarkable Story* 描绘了一场非常复杂的安排，评述为学术而印行《教规》(*Canon*)的浩繁的工作，该书一千余页，为大页对开本。

(49) 他的角色和身份多种多样，"印刷商"一个标签不足以概括，关于我给他的标签"master printer"，参见本章注释(136)。

(50) 马德斯泰格(Mardersteig)的 *The Remarkable Story* 记述了彼得·莫弗尔(Petrus Maufer)对付罢工等棘手问题的故事：1477 年 5 月大批纸张到货后，工人罢工，许多其他问题相继爆发，等到这些问题逐一化解之后，他才能够开机印书。从罢工之日起到 12 月 1 日最后一页印完下机，没有"浪费一个工作日"。从黎明到夜晚，4 台手摇印刷机不停地工作，他采购了 680 万颗字钉，并悉数采用谷登堡之后的几百年里印刷所日常工作的复杂工艺。麦肯齐(McKenzie)的文章'Printers of the Mind'无与伦比。赫林加夫妇(Lotte and Wytze Hellinga)的'Regulations'使我们能够管窥普朗坦的经营计划。马斯伦和杰里琛(Maslen and John Gerritsen)则认为，印刷所的日常工作比麦肯齐或赫林加夫妇描写的情况更加有条不紊。见其书简载 *The Library*(June，1975)。

(51) 即将出版的马丹·罗利(Martin Lowry)的'Manutius'里有这样一段描绘。

(52) 为了维护在印刷商影响的研究中采用的渐进方法论，书籍史权威自然会强调：书商是印刷

商的先驱。然而,印刷商们情愿用"scriptor"而不用"inpressor"来表示这一变革,这就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抄书人的后继者,而不是书商的后继者。

(53) Lehmann-Haupt, *Peter Schoeffer*, *passim.*

(54) 费弗尔和马丹对此做了详尽的论述,见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chap. 6; Ehrman and Pollard, *The Distribution of Books* 对此亦有详尽的记述。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p. 63-64)指出,施罗考尔(Schirokaur, 1951)大大低估了早期印刷商开发的市场规模。

(55) Hellinga, 'Thomas à Kempis,' pp. 4-5. 关于各地修道院印刷所的情况,见本书第一章注释(39)。

(56)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22 强调指出,谷登堡的发明在这个方面的影响是最深刻的,然而,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却不予注意,因为他们重点考察的是"书籍"。除了一个例外,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和伯爵宫廷举行的"印刷术与人的思想"展览会(1963 年 7 月 16—25 日)也省掉了"小印件"。见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展品目录(London, 1963), p. 8。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p. 52-53)讨论了教会与世俗政府的官方印刷品。据 Lehmann-Haupt, *Peter Schoeffer*, (pp. 78-79)记述,"小印件"在舍费尔的印刷品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57) 见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展示的目录第七项(1973 年 9—10 月)展品: *Le Cinquième Centenaire de l'Imprimerie dans les Anciens Pays-Bas* (Brussels, 1973), pp. 11-12。又见 Kruitwagen, 'Het Schrijven op Feestdagen in de Middeleuwen'的脚注。你不妨将该书对中世纪抄书的虔诚态度和皇家学会一位会员对出版商因宗教节日而延误出版的愤怒进行比较,转引自 Hill, book review,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73)。

(58) Hirsch ,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51)和 Parent, *Les Métiers du Livre à Paris au XVIe Siècle* (p. 142)描绘了相关的书籍勒口上印刷的大学讲座。关于作家、艺术家和匠师地位上升的讨论,参见本书 232 页以后和第六章的论述。

(59) 关于印行赎罪券的情况,参见本书第 375 页之后的记述。

(60) Cipolla, *Literacy*, p. 60.

(61) Ibid, p. 52 讨论了斯通(Lawrence Stone)所谓的英国的"教育革命"的观点,看看它是否与欧洲大陆的潮流有关。在'Literacy and Education'一文里,斯通强调廉价纸张与活字印刷的重要性;相反,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探讨斯通的"教育革命"所涵盖的那一段时间时,却根本不提印刷术,见其 *The Long Revolution*, pp. 132-133。威廉斯提到了印刷术(pp. 156-57),可是他把阅读公众的增多回溯到第八世纪,甚至推回到罗马时代。另一种倾向是强调蒸汽印刷机出现以后的大规模阅读公众,当威廉斯的研究路径和这一倾向结合时,15 世纪的印刷革命必然就要退居幕后了。在《传播学》(*Communications*)里(p. 22),威廉斯确实提到印刷术与书写相比的重要性,但那仅仅是蜻蜓点水。教育史尤其容易低估印刷术的重要性。见 John E. Talbott,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其文献概述显示,在早期近代英格兰"触发教育扩张"的诸多因素中,印刷术不见踪影(p. 136)。

(62) "穷人的书"(Liber Pauperum)这一说法本身至迟可以回溯到 12 世纪的英格兰,一位伦巴

第抄书人为贫穷的律师助理编辑了一本法律文摘。参见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p. 211。

(63) 佩斯(Richard Pace)讲述了一位都铎时代乡绅的著名故事,这位乡绅怀疑儿子为何需要识字,因为狩猎与纸上谈兵是对立的。见本书第四章注释(315)。

(64) Jacob, *The Fifteenth Century*. 又见 Adamson, 'The Extent of Literacy in England'; Bennett,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Parkes, 'The Literacy of the Laity'。Thrupp, *The Merchant Class*, p. 157 提供了有用的图表和相关的数据。

(65) Yves Renouard, *E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Pierre Jeannin, *Merchant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80-86; Sapori, *The Italian Merchant*, *passim*. Bec, *Les Marchands Ecrivains*, *passim*。克里斯琴·贝克(Christian Bec)的《文书代理人》(*Les Marchands Ecrivains*)披露,许多商人既记账,又记日记。关于著名的文盲元帅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趣闻,见本书第 395 页。

(66) Natalie Z.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在这方面提出了有用的忠告。

(67) 在 13 世纪多明我会的一本小书《布道的艺术》(*De Arte Predicandi*)里,Murray, 'Religion among the Poor'讲"如何迅速组织一篇布道辞",如何吸引不同兴趣的群体比如"城市里的富裕女人"、"集市里的人群"或"年轻姑娘"。

(68) James Strachan, *Early Bible Illustrations: A Short Study*, p. 7 讨论了节略的书名 *Biblio Pauperrum* 是否妥当的问题。

(69) 这一区分是由克拉克(T. J, Clark)提出的;他研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并且把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在'Printing and the People'一文中提出的 16 世纪的"通俗"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但是这两个术语已经在大量的文献中互换使用,限制其使用会徒劳一场。因此我倾向于用"设想的公众"(戴维斯本人在这篇文章的其他地方也用这个术语),因为它不太可能被误解。

(70)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7.

(71) Saunders, 'From Manuscript to Print,' pp. 507-28.

(72) 关于簿记书、年鉴、药典等"实用"指南,参见 Natalie Z.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又见本书第 243 页以后和第 554 页以后的讨论。

(73) 哈利·波贝尔(Harry Bober)在《反射镜》(*Speculum*)发表的评 *The Göttingen Model Book* 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插图(画葭苕叶的 16 个步骤),其目标读者想必是未经训练的新手,因为抄书人不用这样的插图,正如"大厨师不必看听装罐头汤的说明一样"。即使这一观点适用于书籍的印制,用于其他行业的手册还是有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些行业里作坊的结构没有戏剧性变化,也没有许多新手。比如,早期用通俗语为两位德意志石匠马提亚斯·罗利泽(Matthias Roriczer)和汉斯·施密特梅尔(Hans Schmuttermayer)印制手册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就令人困惑。我在隆·谢尔比(Lon R. Shelby)的两篇文章里读到这样的困惑:见 Shelby, 'The Education of Medieval English Master Masons', pp. 1-26; 'The Geometrical Knowledge', pp. 395-421 以及他的书信。汉斯·施密特梅尔印制手册的目的何在,同样令人困惑。

(74)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 31.

(75) 引文出自 Jacobo Filippo Foresti, *Supplememtum Chronicarum* (Venice, 1483), 转引自 Martin Lowry 即将出版的 *Aldus*。

(76)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p. 131.

(77) Ibid, p. 271.

(78) 参见本章注释(154)。1974 年,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承办的"中世纪学术暑期研究班"上,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豪斯(Richard House)教授用幻灯片的形式讲演,演示教师和布道者在编纂手写书时常常采用的图表、圆括号、互相参照记号、页边索引等方法(注解索引和教父遗著用得尤其多)。

(79) Gilmore, 'Italian Reactions to Erasmian Humanism,' pp. 87-88.

(80) 斯通在'Literacy and Education', p. 76 里引述我早期发表的一些"猜想"时说,机印书使欧洲"决定性地从图像文化向语词文化"过渡,然而我本人并不认为他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倘若我的话演绎出了这样的变化趋势,那不是我的本意,我为此而表示遗憾。基督教新教的书籍崇拜和偶像崇拜与早期的印刷术具有比较大的兼容性,比特伦托公会议之后的天主教与书籍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兼容性更强,这是我在早期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本书第四章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然而,那样说是一回事,说欧洲文化从图像文化走向语词文化则是另一回事。至于我为何反对这第二种表述,请回头看本书的前面几段话。

(81) Gardiner, *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 pp. 258-59. 这条注释和下文有关路德的注释都承蒙阿斯顿(Margaret Aston)惠助。她正在研究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的偶像崇拜。

(82) Hindman, 'The Transition from Manuscripts to Printed Books.' See esp. p. 205.

(83) Luther, '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in the Matter of Images and Sacraments,' (1525), *Luther's Works* XL 99—100. 关于路德《圣经》的插图,见 Schmidt, *Die Illustration der Lutherbibel 1522—1700*。

(84)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p. 134;377. 只要翻检福卢德(Robert Fludd)的任何作品,你就可以欣赏到宏伟的巴洛克版画,这些画使 15 世纪和 17 世纪形成的繁复的记忆系统一望而知。耶茨注意到,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和玫瑰十字会宣言对夸美纽斯的《世界图绘》(*Orbis sensualium pictus*)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5) 关于地图、建筑设计图和解剖示意图,参见本书第五章。

(86) Sarton,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1450—1600*, pp. 91;95. 本书第三章指出,准备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人相信,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压缩了很多信息,直到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在 19 世纪被发现。

(87) Elyot, *Boke Called the Gouvernour*, 1531, 转引自 Watson, *The Beginning of the Teaching of Modern Subjects in England*, p. 136。本书"结束语"引述了这一观点。

(88)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420-421.

(89) 分散的读者能够用同样的书,我赞同萨尔顿这一意见:版次的出现必须要和标准化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参见本书第 81 页的评论。

(90) Hay, 'Literature, The printed book', p. 365 指出,人文主义著作早期的泛滥引起了危机。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p. 59-61 指出，印刷商不能准确估计市场的规模是某些书籍泛滥成灾的原因之一。起初不充分的发行网络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奥斯堡的印刷商冈特尔·扎伊纳(Gunther Zainer)印行了 36,000 册图书，而奥斯堡的人口一共才 18,000人(p. 56)。

(91) Craig Thompson, *The Colloquies of Erasmus*, tr. and ed. p. 458(Note to 'The Art of Learning,' 1529).

(92) Hay, 'Literature, The printed book,' p. 366. 据 A. R. Hall, 'Science', p. 389 的记述，即使默默无闻的学者的专题藏书也有相当大的规模。

(93) Taylor, *Thought and Expression* 1, part 3: 'The French Mind,' chap. 4. 转引自泰勒致高康大(Gargantua)的信，译者是乌尔克哈特(Urquhart)(1653)，该信见于拉伯雷小说《庞大格吕埃》(*Pantagruel*)第八章。

(94) 关于格斯纳，参见本书 97-99 页。

(95) 关于斯卡利杰频繁交往的博学鸿儒圈子，参见 Mark Pattison, *Isaac Casaubon*。虽然卡索本娶亨利·埃蒂安纳二世的女儿为第二任妻子，却未能继承他渴望得到的埃蒂安纳家族的学者兼印刷商的藏书室。当时的人们赞美斯卡利杰的称号有"世界明灯"、"科学之海"等，参见 Preserved Smith,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1543-1687*, p. 268。

(96) P. M. Rattansi,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p. 7.

(97) 彭罗斯(Boies Penrose)注意到手绘地图比早期的机印地图优越，见其 *Travel and Discovery*, chap. 16。其逻辑结论必然是：16 世纪精明而有文化的印刷商并不知道沿海地区的地图绘制人和航海人已经掌握的知识，可惜彭罗斯并没有做出这个结论。

(98) Sarton, 'The Quest for Truth,' p. 57.

(99) Arthur Koestler, *Act of Creation*. 欲仔细阅读两本主题不同的书并将这些不同的主题结合起来思考而产生的卓有成效的互动，参见 Peter Vorzimmer, 'Darwin, Malthus and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7 世纪是所谓"天才的世纪"，这个世纪"创造行为"的真正爆发可以这样来解释：部分是思想的转换和结合剧增的结果。

(100) 普朗坦的藏书室起初搜集的是校对工作所需的图书，包括小辞书、义类词典和埃蒂安纳出版的其他参考书。利昂·沃特(Leon Voët)对这间藏书室的情况作了描绘，见其 *The Golden Compasses*, p. 1339。关于埃蒂安纳家族和这个王朝(通过联姻与诉讼)收藏的巨量而珍贵的图书，参见 Elizabeth Armstrong, *Robert Estienne*; Robert Kingdon,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Printers Henri and François Estienne'。

(101) 拉米斯在巴塞尔逗留期间感兴趣的是艺术家，而不是学术中心。在 1571 年出版的《巴尔颂》('Panegyrique de Bâle')里，他讴歌大学和地方的学界，同时却把高度的赞颂留给了阿梅尔巴赫(Amerbach)、弗洛本(Froben)、比斯科夫(Bischoff)、佩特利(Petri)、伊辛格林(Isingrin)、奥珀利努斯(Oporinus)等出版商。见 J. O. Fleckenstein, 'Petrus Ramus', pp. 119-123。市民与大学师生未必对立，而是在早期印刷商的吸引之下开展了良好的合作——这一点应该牢记。见本书第 524 页之后对斯提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论点的评判。

(102) 见本书第 251 页之后。

(103)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104)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assim*. 同样的古埃及成分存在于公元后编纂的文献中，见该书第 2-3 页、第 431 页。耶茨认为，由于 17 世纪初伊萨克·卡索本证明，菲奇诺翻译的古籍被断代为公元 3 世纪，于是主张这些古籍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神秘性"就随之终结。但希腊学术不足以揭开金字塔的秘密。对透特神和《象形文字集》(Horapollo)神秘性的兴趣流传下来，直到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然而即使在此之后，每一次"揭开伊希斯神面纱"之后，重重神秘现象还是云遮雾罩，连罗塞塔石碑文字的破译也不能够驱散那重重迷雾。见本书第 179-84 页的讨论。

(105) Gilmore, *World of Humanism*, p. 190.

(106) 见本书第 227 页所引用的 Ortelius 对此的评述。

(107) Galileo,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p. 186.

(108) 内皮尔(Sir John Napier)和牛顿这种杰出的人物费心思研究针孔能够穿过多少骆驼的故事广为人知。John Craig,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169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理性的理论和数学技能如何被用于计算基督再临的日子。他计算的日子建立在对《福音书》(Gospels)不信仰的增加上，他把这一趋势描绘为"怀疑的快速增长"，认为其增长速度是算术级数，直到基督再临的日子不可避免。

(109) 吉尔莫认为，印刷术对学术的影响更加重要，见 Gilmore, *World of Humanism*, p. 189。

(110) Tillyard,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p. 8.

(111) Sarton, 'The Quest for Truth,' p. 57.

(112) 关于把标准化玩过火的后果，见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p. 408-414 以及他对斯坦贝格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的书评。

(113)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1974 edition), pp. xl; 13.

(114) 见本书第 15 页相关注释关于人们对德斯特勒兹(Destrez)主题的误解。据 Saenger, 'Colard Mansion', p. 413 记述，5 世纪勃艮第宫廷的抄书活动"高度标准化"，他们只用一个标准的母本。但对我而言，用一个范本准确、大量而快速地复制书是令人困惑的。

(115) 1631 年"可恶的"《圣经》漏掉了第七戒律里那个"不"字，参见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 412。其他版本的《圣经》也有一些标准化的错误，1611 年的'Judas Bible'即为一例。在《印刷术五百年》里(第 204 页)，斯坦贝格指出 1702 年'Printers'Bible'和 1717 年'Vinegar Bible'里存在的错误。

(116) Gilmore, *The World of Humanism*, p. 189. P. S. Allen, *Erasmus: Lectures and Wayfaring Sketches*, pp. 4-5 清楚阐述了标准化对学问的意义。

(117 Sarton, 'The Quest for Truth,' p. 66.

(118) 这句话对古典学问特别重要。根据 E. J. Kenney, *The Classicat Text* p. 19, n. 1，虽然有将不同状态的书页混淆的情况，但相对而言，古典文本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文本一致的大量副本成为规范。"

(119) Kenneth Boulding, *The Image*, pp. 64-8 对"分离的抄本"(disassociated transcript)作了探

讨，我对他的批评见本书第 478 页以后。

(120)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25; Goldschimitdt, *The Printed Book of the Renaissance*, p. 38.

(121) 关于书名页装饰对 16 世纪美术的影响，以及在研究新审美风格时有必要考虑印刷术的问题，参见 André Chastel, 'What is Mannerism?' p. 53。又见 J. Adhémar, 'L'Estampe et la Transmission des Formes Maniéristes'。

(122) 15 世纪一例标准的图案样张是厄尔哈特·拉特多尔特(Erhard Ratdolt)1496 年 4 月 1 日从奥斯堡发出的，见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54。斯坦贝格还讨论了卢多维科·德格里·阿利基(Ludovico degli Arrighi)1522 年率先推出的"作文手册"(pp. 55 ff)。又见 Philip Hofer, 'Variant Issues', p. 95。他认为，Sigismondo Fanti, *Therioa et Practica* (Venice, 1514)是论述职业抄书人的第一部专著。Frederick Goudy, *The Capitals from the Trajan Column at Rome*, pp. 11-12 注意到稍早印行的一本论字母形式的书，这是 1477 年到 1483 年间在帕尔马印行的书。无论如何，阿利基的《歌剧》(*Operina*)有力地证明，虽然早期机印本难免有变异，但总是有助于标准化的发展。

(123) 关于中世纪抄书人标本的单张，见 S. J. P. von Dijk, 'An Advertisement Sheet'。国会图书馆馆藏多萝西·迈纳(Dorothy Miner)的小册子 *The Giant Bible of Mainz* 非常细腻地描绘了"中世纪匠人对范样的永恒需要"以及按羊皮纸范样制作副本的过程，还描绘了不同匠人编辑的草图和范样的画册。关于一位 13 世纪画家使用"图案书"的情况，见 Virginia Wylie Egbert, *The Medieval Artist at Work*, pp. 38-9, plate ix。关于 15 世纪初朗巴德艺术家一本素描的精细研究，见 Otto Pächt, 'Early Italian Nature Studies', 13-47。关于所谓中世纪"素描书"与"图案书"的区别，参见 D. J. A. Ross, 'A Late Twelfth Century Artist's Pattern Sheet'。关于令人赞叹的哥廷根的波贝尔(Harrow Bober)在《反射镜》(*Speculum*)上发表的评 *The Göttingen Model Book* 的文章，见本章注释(73)。

(124) 关于英语发蒙书和语法书的标准化，见本书第 350 页。

(125)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 37.

(126) Gombrich, *Norm and Form*, pp. 83, 84.

(127) 见本书 201 页以后。

(128) Burns, 'Quattrocento Architecture', chap 27, pp. 283-285 描绘对古老秩序的执著，在 1483 年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头版《建筑学十书》(*De Re Aedificatoria*)(10 卷)印行以后，这样的追求占据了主导地位。

(129) Hay, 'Geographical Abstractions'里有一些论地图学对地区观念影响的设想，颇为有用。

(130) 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见本书第 230-231 页。

(131) 弗朗西丝·耶茨描绘并图示了 16 世纪服装手册和版画展示的不同群体的图像，这些图像以各地的景观和设计为背景，见其 *Valois Tapestries*, pp. 12-15。

(132) Ivins,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pp. 38 对此的介绍很有趣。同一本书把同样的版画用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印刷商把同样的版画用于不同的目的，见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49。关于影响《圣经》插图的例子，见 Hindman, 'The Transition

from Manuscripts to Printed Books', p. 199。

(133) Bland, *A History of Book Illustration*, p. 106.

(134) 关于布雷登巴赫(Bernhard von Breydenbach)的《圣地朝觐图》(*Peregrinatio in Terram Sanctam*)的 1486 年的拉丁文版本和继后的通俗语版本,见 Davies, *Bernhard von Breydenbach*。乌得勒支的卢维奇为《圣地朝觐图》作插图,而且他很可能就是那位"精明而富有才华的画家",与《德意志植物志》(*Gart der Gesundheit*)的主要撰稿人(法兰克福的医师,名为 von Cube)合作完成这本植物志,撰稿人在《德意志植物志》的序言里对卢维奇表示由衷的感谢。Arthur M. Hind, *An Introduction to a History of Woodcut*, pp. 1, 350, 354 指出,为这两部书做插图的艺术家很可能就是卢维奇。奇怪的是,在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里,作者伊文思后悔不认识《德意志植物志》的插图艺术家,但在稍后的两段话里他又说,卢维奇陪伴《圣地朝觐图》的出版商布雷登巴赫并为该书制作了威尼斯、罗德岛和耶路撒冷的图版。伊文思稍早的一部文集《版画与图书》(*Prints and Books*)里有一篇文章论"布雷登巴赫的朝觐路线"(第 10-21 页),而且描绘了卢维奇的角色:既是插图家又是印刷商,布雷登巴赫《圣地朝觐图》的拉丁文版本和通俗语版本都是卢维奇推出的。这篇文章指出,卢维奇自己说《圣地朝觐图》的德文版(1486,美因兹)是在自己的家里印制的,而且说字钉是从舍费尔的公司借用的。关于《德意志植物志》(舍费尔 1485 年在美因兹印行)插图的意义,见本书第 262 页之后。这些植物图谱是在朝觐路上绘制的,其风格上的相似性使海因德同意贝尔(L. Baer)1925 年的意见:卢维奇同时承担两本书的插图。他与彼得·舍费尔关系密切,所以他参与这部通俗语版本的《植物志》应该是合理的猜想。Herrlinger, *History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p. 47 理所当然地认为,为《德意志植物志》作插图也可能是家庭用书的印刷商——这是一位著名的早期铜版画镌刻家。

(135) Bland, *A History of Book Illustration*, p. 197 征引 Kristeller, *Early Florentine Woodcuts* 并指出,*Nuremberg Chronicle* 的图版意在成为使读者获益的路标,而不是用作细腻的视觉手段。16 世纪相继出版的百科全书显示,刻板的图谱逐渐被实际的城镇图像取代,以显示不同对象的本真状态;Strauss, 'A Sixteenth-Century Encyclopedia', pp. 154-155 描绘了这个趋势。

(136) 出版商—印刷商(或印刷商—书商)尤其要事必躬亲、扮演多重角色,例子见 Elisabeth Armstrong, *Robert Estienne*, pp. 18, 68。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许多独立的印刷商,适用于一些商人—印刷商(从原本意义来界定,他们根本不是印刷商,但他们密切监察文本的加工过程——甚至亲自编辑并编纂文稿),还适用于熟练工人(他们担任校对、搜集古本、为大众市场提供廉价复制品)。这些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千差万别,Natalie Z. Davis, 'Strikes and Salvation in Lyons', p. 48; 'Publisher Guillaume Rouillé', pp. 73-76 对此有所介绍。至于印刷所作坊内部的情况,直到 18 世纪,其分工千差万别且界限模糊,限于本书的宗旨,我们不得不存而不议。因此,我所谓"印刷商"的意义比较松散,涵盖了所有这些群体,且模糊了他们的性别:书中始终提及"他"的印刷所,而不是"她"的印刷所。正如 Susan V. Lenkey, 'Printers' Wives', p. 331 所述,虽然有遗孀和女儿接管家族企业的情况,但一般的继承人是其他亲属。至于 16 世纪一位杰出的女印刷商,见 Parent, *Les*

Métiers, p. 138 对夏洛特·吉拉德(Charlotte Guillard)巴黎印刷所的介绍。

(137) 关于英格兰排字工在正字法和语法上的责任意识，见 Hereward T. Price, 'Grammar and the Compositor', pp. 540-548。

(138) Peters, 'Editing Inquisitors' Manuals,' 95-107.

(139) Abraham Ortelius, 'Message to the Reader,' *Theater of the Whole World*.

(140) 转引自 Natalie Z. Davis, 'Guillaume Rouillé', p. 100。

(141) Lloyd W. Daly, *Contributions to a History of AIphabetization*, p. 91, 转引自 Robert Cowdrey, 'table alpheabetical'。

(142) 语出"热那亚的焦瓦尼"(Giovanni di Genoa)(即约翰·巴尔布斯[Johannes Balbus]修士)1286 年版的《万用书》(*Catholicon*)，转引自 Daly, *Contributions to a History of AIphabetization*, p. 73。1460 年，谷登堡在美因兹印行了这部百科全书，使这部 13 世纪流行的百科全书名声大振。在末页的出版后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详细描绘这一"高贵的书"印行了，"没有凭借苇管笔、硬笔或鹅管笔，在冲压机和字钉协调、匀称与和谐的美妙配合下印制的……在美因兹这个著名而高贵的德意志城市印制的"，"它得到了上帝的神恩"，"上帝赋予这个民族高尚的天才，使之比世界上一切民族都更加优越"。见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19。这段高调宣示谷登堡发明的话，难道应该和那位修士声称的"设计"了字母表顺序同日而语吗？比勒对声称印刷术发明的论述非常深刻，认为前人对这一发明的感受和我们对"发明"的看法是大不相同的，见 Butler,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p. 97。关于"发明"概念富有争议的性质，见本章注释(251)、(252)。

(143) 关于中世纪字母表的资料，见 Berthold L. Wolpe, 'Florilegium Alphabeticum'。

(144) 见 Daly, *Contributions to a History of AIphabetization*, 亦见 Francis Witty, 'Early Indexing Techniques', pp. 141-148。谢尔曼·库恩(Sherman Kuhn)在对戴利《贡献》一书的评论里介绍了不完全字母表化的演变过程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情况。库恩的另一篇文章《15 世纪字母表检索简介》('The Preface to a Fifteenth Century Concordance')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词汇表的安排可以追溯到 8 世纪。

(145) Reynolds and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p. 76.

(146) 即使托钵僧为大学城里编制的藏书目录都保留着总体清单或书架清单的特征。见 K. W. Humphreys, *The Book Provisions*, p. 83。

(147) 这似乎是戴利在《贡献》里做出的结论，也是谢尔曼·库恩(Sherman Kuhn)在《反射镜》(*Speculum*)发表的书评所做的结论。虽然库恩认为完全字母表化的编目和索引只有等到印刷术出现之后才能确定下来，但他这篇书评还是暗示，字母表化"并非印刷术的直接产物"，而是"印刷术普及、纸张价廉的产物"。

(148) 一本手抄书的索引难以适用于其他副本，使同一母本的手抄本索引相同的努力受挫，见 Beryl Smalley, *The English Friars*, pp. 33-35。丹尼斯·海伊注意到藏书家索引的特异性，见其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pp. xviii-xix。

(149) Hay,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p. 57.

(150) Albert and Pollard Graham, *The Distribution of Books*, p. 53.

(151) DeWitt T. Starnes, *Robert Estienne's Influence on Lexicography*, pp. 86-87. 斯塔尼斯还指出,埃蒂安纳还在以前的希腊—罗马语义类词典的基础上拓宽,补充了大量的参考文献;这些文献是他在长期刊印《圣经》的过程中搜集的。他又指出,埃蒂安纳为英格兰诗人(到弥尔顿及以后的诗人)编订了经典和文献的典故。

(152) Daly, *Contributions to a History of Alphabetization*, p. 70 指出,这部希腊语—拉丁语词汇书是很珍稀的双语参考书,非同寻常,因为它非常接近完美的字母表顺序。格罗斯泰斯特还很善于编制索引,见 Hunt, 'The Library of Robert Grosseteste'。关于罗伯特·埃蒂安纳印行《圣经》的情况,见本书第二章注释(338)。

(153) Herrlinger, *History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有大量的医学图谱和天文学图谱。Fritz Saxl, 'A Spiritual Encyclopedia', pp. 82-136 配了一些插图说明抽象概念的相互关系。这部 15 世纪手稿的配图给人的印象是,萨克塞尔非同寻常,这可能和当时的胡斯战争(Hussite Wars)引起的神学鼓动有关系(第 83 页)。又见 Yates, *Art of Memory* (plate 11),这幅 14 世纪的微型画显示拉蒙·吕尔(Ramon Lull)的艺术,说明和记忆术有关系的图表可见于许多手稿中。耶茨这本书里的其他插图选自早期的机印书,也很有趣。见该书图表 7C 里视觉化的字母表。

(154) 在几件意义隽永的成果中,沃尔特·翁阐明了印刷术给思想世界注入的"图表规整性";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会使一些急性子的读者对印刷术之前图表的使用打折扣。见他的著作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System Space and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Symbolism'; 'From Allegory to Diagram in the Renaissance Mind'。实际上,翁并不把印刷术以后彰显出来的许多心灵习惯归之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 'Tudor Writings on Rhetoric, Poetic and Literary Theory,' (*Rhetoric, Romance* [1968], p. 85)一文里,他说:"使用图表和其他视觉模式既是经院哲学逻辑促进的方法,又是印刷术推动的方法。"然而,中世纪提要书和字母表索引里使用的括号、图表和相互参照等视觉符号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注意。关于中世纪为现代学术手段所做的一些先行的努力,Malcolm B. Park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s of Ordinatio and Compilatio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一文作了详细的描述。

(155) C. S. Lewis, *The Discarded Image*, p. 10.

(156) 除了上文指出的斯马利对制作索引的评述之外,亦见 G. S. Ivy,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Manuscript-Book', p. 57 对编排纸张序号的评述。

(157) Besterman, *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pp. 7-10.

(158) 最新的研究专著是 Klaus Arnolds, *Johannes Trithemius*。阿诺德为特里特姆斯的《抄书人赞》(*In Praise of Scribes*)的英语—拉丁语对照版作序,该序文扼要介绍了特里特姆斯的生平。Kristeller, 'The Contribution of Religious Orders to Thought and Learning'精选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特里特姆斯研究资料(appendix B, p. 156)。

(159)《基督教著者名录》(*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收录了塞巴斯蒂安·布兰特赞扬罗伊希林的一篇文章,布兰特时任出版商阿梅尔巴赫的编辑。这篇颂词的节选于 1495 年由阿梅尔巴赫印行,又收进了《德意志名人著述目录》(*Catalogus Illustrium Vivorum Ger-*

maniae, Mainz, 1495)。在'Johann Reuchlin and Sebastian Brant'这篇文章里,泽德尔(E. H. Zeydel)列举了"布兰特对罗伊希林的赞扬、罗伊希林对阿格利帕(von Nettlesheim Agrippa)的赞扬、特里特姆斯对布兰特的赞扬"(第 117-119 页)。关于特里特姆斯和阿梅尔巴赫周围的德国人圈子,见阿诺德的序文第 6-7 页;亦见 Febvr, *Au Coeur Religieux*, p. 140。1514 年夏天,德国一位本笃会修士为一种长期流传的"名人录"式的书《作者名录》(Schriftstellerlexicon)编订新版,该书也指出凭借印刷术成名的基督教名人,见 Schweibert, 'New Groups and Ideas', 69。

(160) Arnold, introd., p 5.

(161) Arnold, introd., p 10. 虽然 15 世纪修道院里的纪事不乏杜撰造假之举,阿诺德还是对历史文献和纪事里的杜撰造假感到不安。他接受了特里特姆斯编造的故事:浮士德博士怕见修道院院长;他又把学者特里特姆斯和江湖郎中浮士德进行比较(第 11 页)。看来,阿诺德也持简单化的观点。

(162) Noel Brann, 'The Shift from Mystical to Magical Theology'详细描绘了特里特姆斯与波韦勒斯的会见及其结果。上述引文均出自这篇文章。布兰还指出,特里特姆斯的一封信玩弄波韦勒斯姓名的双关意义,布兰在为阿格利帕的《奥秘哲学》(*De Occulta Philosophia*, Clogne, 1520)所作的序文里指出这一双关语义。该书献给特里特姆斯,1520 年在科隆出版。

(163) Butler, *Origin of Printing*, pp. 106, 107. (特里特姆斯笔下的谷登堡的赞助人以及他讲述的巫师浮士德的轶事引起了这样的混乱,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呢?)

(164) 约翰·舍费尔对祖父约翰·富斯特和父亲彼得·舍费尔的敬意印在特里特姆斯《汇编》(Compendium sive breviarium primi voluminis chronicarum sive annalium de origine regum et gentis Francorum, Mainz, 1515)的末页上,转引自 Butler, *Origin of Printing*, p. 93。这段文字集孝敬、爱国主题为一体,十分典型。这种公民豪情在早期机印书的末页上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反过来又得到强化。这种现象值得研究,尤其与德意志帝国里宗教改革扎根的城市形象相关的现象值得研究。

(165) 这两部《密码学》都是他身后出版的,*Poygraphia* 1518 年问世,*Steganographia* 1606 年印行。约翰·迪伊认为,前者为后者做宣传,见本书稍后的讲解。

(166) D. P. Wa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pp. 85-8. Agrippa, *De Occulta Philosophia*, p. 85(1533)提及特里特姆斯赞许他的信。

(167) John E. Bailey, 'Dee and Trithemius,' pp. 401-402. 贝利记录了这段话,同时还作了一些说明,第 422-423 页。

(168) Peter French, *John Dee*, pp. 36-37. 这部传记使我找到了上文引述的贝利那封不可或缺的信件。迪伊清楚表明,他在那里会晤了"许多荷兰印刷商",所以希望延长逗留时间,以便和"高地德国的印刷商面谈",说明他这方面的活动被当地人忽视了。显然,迪伊离开英格兰之前,西尔维尔(Sylvius)1564 年为他刊布的《摩纳斯象形文字》(*Monas Hieroglyphica*)已经运抵英格兰,这有助于他寻求赞助人。他这趟欧洲大陆之行造访了乌尔比诺的康曼迪诺(Federigo Commandino),可能也是为了出书。西尔维尔本人擅长书法,喜欢写字,所

以他成为刊布《摩纳斯象形文字》一书的难得一求的合作者。1548 年至 1550 年在卢万大学时，他曾经担任过奥兰治公爵儿子的家庭教师。见 Colin Clair，*Willem Silvius*，pp. 192-205。迪伊 1564 年的大陆之行还包括到苏黎世造访，约斯顿(C. H. Josten)注意到迪伊的造访，见其'A Translation of John Dee's"Monas Hieroglyphica"'，pp. 84 ff。1623 年，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为玫瑰十字会编纂的一个书目里收录了迪伊的 *Monas Hieroglyphica* 与特里特姆斯的 *Steganographia*。见 Frances Yates，*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p. 107。

(169) 目前，《密码学》(*Steganographia*)召唤天使和魔鬼的理论得到权威学者比如沃克和耶茨的支持。但该书引起的兴奋部分归因于希望更多地了解数字—字母代码的人。应该承认，迪伊陶醉于特里特姆斯的《密码学》有召唤精灵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打算。

(170) 有趣的是，在诺代的玫瑰十字会书目里发现了两篇未刊布的中世纪研究默顿型"计算器"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和迪伊及特里特姆斯的文章放在一起，见 Frances Yates，*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p. 108。特里特姆斯努力整理各种纪事并且协调占星术与历史事件，阿诺德在《特里特姆斯传》的序文里多次作了介绍。

(171) Besterman，*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p. 21 指出，格斯纳处理巨量知识增长、重组学问的尝试预示培根与百科全书的到来。

(172) Fischer，'Conrad Gesner(1516-1565)'，pp. 77-269 显示，格斯纳在编纂卷帙浩繁的书目时用了马努蒂乌斯和埃蒂安纳印刷所印行的索引，也用了书商发行的书目。在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一书里，萨尔顿(Sarton)也评述了格斯纳的成就，指出他对当时成功印刷商表示的谢忱，见第 108-113 页；尤其第 109-110 页。

(173) 格斯纳征引的资料包括丢勒提供的著名的犀牛木刻。见 Gesner，*Historia Animalium* (Zürich：Froschauer，1551)。

(174) 格斯纳处事的周到表现在他为瓦勒利乌斯·科尔德斯(Valerius Cordus)身后的留名做出的贡献。1561 年，他在斯特拉斯堡编辑出版了科尔德斯的植物学著作。见 Dannenfeldt，'Wittenberg Botanists'，pp. 230，233。不过，该文似乎低估了维滕贝格之外的出版物对路德派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关于维滕贝格的印刷业对决定科研形态的重要性，参见 Thibodeau，'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p. 49。

(175) 海因里希·佩特利(Heinrich Petri)1566 年印行了哥白尼(Copernicus)的第二版《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stium*)。海因里希·佩特利是亚当·佩特利之子，娶了杰洛姆·弗洛本(约翰·弗洛本之子)的遗孀。海因里希与迈克尔·伊辛格林(Michael Isingrin)合作，准备出版一本希腊语词汇，他在巴塞尔印刷业圈子里的根基很深。见 entry no. 16 in Josef Benzing，*Buchdrucker-Lexicon des 16 Jahrhunderts*，p. 24。

(176) Sarton，*Appreciation*，p. 110. 关于弗洛绍尔，参见 G. R. Potter，'Zwingli and His Publisher'。

(177) Voët，*The Golden Compasses*，1，132. 沃特认为，普朗坦的成就完全靠自己，而 Clair，*Christopher Plantin*，pp. 118-124 比较详细的描绘却说明，科尼利乌斯·基尔(Coenelius

Kiel,1528)的贡献亦不少。他精通词典学,是"新发明丛书"介绍辞的撰稿人,见本书第一章注释(50)。

(178) 引文见 Bernardo Machiavelli,*Libro di Ricordi*,ed. C. Olschki(Florence,1954),pp. 14; 35; 222-223。转引自 C. H. Clough,*Machiavelli Researches* and introd. to *The Discours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I,xliv。

(179) Garin,*Italian Humanism*,p. 23. 又见本书第 250-251 页贬低解剖学为"机械技艺"的引文。

(180) Rabb,'Debate,The Advent of Print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 *Past and Present*,p. 138.

(181) Gerald Strauss,'Sixteenth-Century Encyclopedia,'p. 152.

(182) Gilbert,*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ethod*,p. 66.

(183) 沃尔特·翁的重要著作 *Ramus: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集中研究"三艺"。他极力主张教育学改革,他还把矛头还指向"四艺"。拉米斯主义对数学和天文学教学的影响尤其大。见本书第 542 页的讨论。

(184) 那时,刚出版的一部专著论述化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兴起,该书论证了这一时尚。1597 年,安德利亚斯·利巴维乌斯(Andreas Libavius)编写的教材出版,化学随之兴起。见 Owen Hannaway,*The Chemists and the Word*,pp. 110-114。汉纳维的方法论从翁对拉米斯的研究成果中获益良多,他自己反复表示感谢。关于教材的编写,又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185) Julian Franklin,*Jean Bodin*,pp. 14-15;137-138. 与其方法论近似的有雅科珀·阿孔奇奥(Jacopo Aconcio)所著的在笛卡尔之前面世的《方法论》(*De Methodo*)(Basel,1558)以及他论如何读史的专著,这一方法进入了英国人第一部论同一课题的著作,见 Blundevill,*The True Order and Methode of Wryting and Reading Hystories*(London,1574)。

(186) N. Gilbert,*Renaissance Concepts*,pp. 71-75.

(187) Julian Franklin,*Jean Bodin*,pp. 27-28.

(188)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1,205.

(189) Destrez, *La Picia*,p. 14 探讨了这些一天之内授完的段落,其起止点标注在手稿上,这是讲授民法和教会法的习惯。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pp. 202-203 介绍了博洛尼亚大学讲授《查士丁尼法典》时文本的排序和分段。

(190)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1,255 描绘了注经者到博洛尼亚大学来"朝觐"的情况。

(191) 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pp. 67;113.

(192) 比代和安德利亚·奥尔恰托(Andrea Alciato)的贡献参见 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chaps. 3 and 4。至于阿梅尔巴赫的贡献,参见 Gilmore,*Humanists and Jurists*,chap. 6,pp. 146-47。伊拉斯谟、阿梅尔巴赫家族和庇突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都属于巴塞尔印刷业这个圈子,他们是激励奥尔恰托的主要力量;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p. 93 对此做了说明。但该书并未探索比代和印刷商巴迪乌斯的关系,而且第 56-57 页的注释(5)的印刷错误把罗伯特·埃

蒂安纳说成是主要的承印人，而不是把他的岳父比代作为主要的承印人。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pp. 183，224 页勾勒了巴迪乌斯的生涯，将其生涯和阿梅尔巴赫的圈子交织在一起。总体上说，我认为学者—印刷商经营的作坊在 15 世纪的法学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大多数记述里的评述都更加重要。

(193) 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p. 114.

(194) Gilmore，'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the Lessons of History，'p. 85 征引雅克·居雅斯的话为证，见本书第 194 页。

(195)马塞和吉利森(Masai and Gilissen)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见论文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与社会》(*Individu et Société à la Renaissance*：*Colloque International*(*April*，1965)，pp. 86-87；两人的文章排在 Gilissen，'Individualisme et Sécurité Juridique'，pp. 35-38 之后。

(196) Bennet，*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1475—1557*，pp. 135-136 有一段出版人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致读者序言的引语。

(197) 约翰·拉斯泰尔是法律书籍印刷商、剧作家、剧场建筑师、词典学家、音乐书籍印刷商。他推动海外殖民，其妻是托马斯·莫尔的姐妹伊丽莎白，他似乎印证了 16 世纪初印刷商的多才多艺。介绍他生涯的著作有：Reed，*Early Tudor Drama*，pp. 11-12，187-201；David B. Quinn，*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pp. 166-69；H. J. Graham，'The Rastells and the Printed English Law Book of the Renaissance'。关于平森等人的情况，见 Bennet，*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pp. 76-85。

(198) Bennet，*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p. 77.

(199) Cowley，'The Abridgement of Statutes，'See esp. p. 128.

(200) 见本书第 119 页。

(201) H. J. Graham，'Our Tong Matemall Marvellously Amendyd and Augrnentyd.'该文还表达了拉斯泰尔的爱国(与拓荒)的圣战，他试图将一切法律"英格兰化"，因为当时的法律多半还是用拉丁文或"法律用法语"写成的。

(202) Starton，'Incunabula Wrongly Dated，'pp. 322-323. 阿拉伯数字(13 世纪的印刷商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已经将其用于相互参照)出现在弗洛本印制的《圣经》的每一页上，这是 1516 年他为伊拉斯谟的译本印制的《新约圣经》，用阿拉伯数字标注页码的做法"确定了风格"，为现代图书章节标题分明的款式奠定了基础，其他的《圣经》印刷商群起效尤。见 Black，'The Printed Bible'，p. 419。又见 Francis Witty，'Early Indexing Techniques'。

(203) 在 14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的手抄书里，偶尔能够看见标注页码的情况，但这不会使后来印刷品中正规标注页码的意义有所减弱。

(204) 早期印刷商对这种习惯养成的具体贡献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厄尔哈特·拉特多尔特(Erhard Ratdolt)为优西比乌斯(Eusebius)印行的《编年史》(*Chronicle*)(1483)里就记录了出版商生活中的大事。截止到 1476 年，他列举的大事有雷乔蒙塔努斯(Johann Regiomontanus)的去世和他自己的《年历》('Kalendar')的出版。在手抄书时代，修道院的死亡名册在编年史中往往占有主导的地位；相反，印刷术出现之后，时间的步伐往往和图书印刷商认为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了。

(205) 在福尔杰(Folger)笔下,第一部单独装订,说明文字是"第一部由约翰·温德贝特(Windbet)为安德鲁·蒙塞尔(Andrew Maunsell)印行(1595)";第二部由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为安德鲁·蒙塞尔印行(1595),与第三部合订。这个版本来自于哈姆斯沃斯(Harmsworth)的收藏,在1920年3月的彭布洛克书展的编号为318。第一部单独装订,说明文字是"第一部由约翰·温德贝特(Windbet)为安德鲁·蒙塞尔(Andrew Maunsell)装订(1595)";第二部由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为安德鲁·蒙塞尔印行(1595),与第三部合订。(感谢凯特·弗罗斯特[Kate Frost]为我提供这一信息。)

(206) "书目的第二部……涉及数学即算术与几何、天文学、占星术、音乐、兵法与航海,还包括……物理与外科……""音乐"条目下包括学吹笛子的简明教程、颂歌集,而"建筑、沐浴、烹调、梦境、预兆"也纳入其中,这说明当时的学科领域和我们今天的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和以前的划分也截然不同。

(207) 见 Middleton 在 *The Experimenters*, p. 81 使用的"科学的"一词。他指出,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追溯,这个词的原本意义与"艺术的"意义相对;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在1678年版的《印刷工操作手册》(*Mechanick Exercises*)里首次使用这个意义。见《牛津英语词典》"科学"词条(第221页)。据1421年的《议会议事录》(Rolls of Parliament)记载,研究生院三门学科即神学、物理和法学被描绘成"三门科学"。这与蒙塞尔(Maunsell)的划分形成的反差颇为有趣:在蒙塞尔的三分图式中,法学被置于人文学科之下,医学被置于科学之下。

(208) Kenney, *The Classicat Text* 强调"盲目照抄"的好处:有利于保存古典文本的原貌,比徒有其表的所谓有学问的编辑去搞校勘更加保险。

(209) Strachan, *Early Bible Illustrations*, *passim.*

(210) Ivins,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p. 40.

(211) 见本章注释(39)。

(212) Gerald Strauss, 'Sixteenth-Century Encyclopedia,' p. 158. 他认为,其中的31版是由 Petri 在巴塞尔的出版社印制的(p. 145)。最早印行 Gesner 著作的也是这家出版社。见本章注释(175)。

(213) Lloyd Brown, *The Story of Maps*, pp. 163-64. 奥特利乌斯向读者征求信息,允诺他将"尊敬地指名道谢"这一请求写入"致读者"的前言里(第31-32页)。密歇根一位名叫盖尔·波森加(Gail Bossenga)的研究生在克莱门茨图书馆的初步研究证明,奥特利乌斯根据读者意见所作的校正并没有规律,仅仅是偶尔为之,但他的确经常利用附录的形式予以补充。1887年,J. H. 赫塞尔(J. H. Hessel)搜集并出版了多卷本的《奥特利乌斯书简》(*Epistulae Ortelianae*);1969年,奥托·泽勒(Otto Zeller)缩编的965页的一卷本《奥特利乌斯书简》问世。杰拉德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的《墨卡托书简》(*Correspondence Mercatorienne*)由凡·杜梅(van Durme)编印。古代和现代的地理学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史蒂文斯(Henry N. Stevens)在《托勒密的地理学》(*Ptolemy's Geography*)(第9页)里说,几乎每一个后继的版本都经过修订和扩容,新地图加上了,旧地图重新绘制。如欲进一步探讨地理学与地图学,请见本书第479-483页。

(214) 关于奥特利乌斯出版业的一些副产品，参见 F. J. Levy，'The Making of Camden's Britannia'，pp. 70-79； E. G. R. Taylor，*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 32。

(215) Sarton，*Six Wings*，p. 137.

(216) Fischer，'Conrad Gesner，'p. 271.

(217) Zilsel，'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pp. 344-345. 又见本书第 241 页之后和第 558 页之后的讨论。

(218) 关于 Vasari，*Lives of the Artists* 的增补本(1568)以及该书引起的通信和田野考察，参见本书第三章注释(198)。Fairfield，*John Bale：Mythmaker for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提到，贝尔建议瓦萨里向所有为他的《艺术家列传》提供传略的艺术家表示感谢。据莫兰的《威廉·卡克斯顿》的记述：卡克斯顿在 1484 年版的前言中谈及与一位读者就其第一版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1478)交流的情况。那位读者寄给他一个"更好的"版本，希望他将其作为第二版的基础。Blake，*Caxton：England's First Publisher* p. 99 贬低卡克斯顿收到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手稿后那种随意的、不正规的编辑校正，然而实际情况是：卡克斯顿收到一位不知名的读者的抱怨和新资料后，的确花费了时间和心血去修正第一版。

(219) 转引自科 J. A. Cochrane，*Dr. Johnson's Printer*，p. 19，n. 2。

(220) Thomas S. Kuhn，*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p. 131. 关于印刷术与天文学发展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本书第七章。

(221) 研究这些特征的成果有：Fussner，*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Sypher，'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Revolutions'，pp. 353-368。这两种文献特别需要我们根据上述讨论去审视。

(222) Butler，*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p. 23； Sarton，'The Quest for Truth'，p. 67； 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flyleaf. 这三本书都强调印刷术的保存功能。Kenney，*Classical Text*，pp. 2-3 注意到，不精明的校勘盲目追随讹误丛生的手抄本时，印刷术如何固定并冻结古典文本。又见该书第 18-19、69 页，肯尼探讨所谓"普遍接受的文本"提供的"特有的稳定参照点"。

(223) Goody and Watt，'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p. 345. 又见本书第一章注释(16)。

(224) Innis，*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p. 7 征引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一句话说明这个道理。

(225)特里特姆斯指示修士们誊写机印书，见本书第 14 页。

(226) Clapp，'The Story of Durable Book Paper'指出这一现象。一些早期中世纪手稿似乎比许多 18 世纪的小说更不容易毁损。Chambers，'The Lost Literature of Medieval England，'p. 287 指出，18 世纪小说失传的比例可能要超过令人尊敬的圣徒比德(Venerable Bede)的著作失传的比例。不过，中世纪许多杰出的学者不如彼德那样幸运。关于中世纪手稿幸存的情况，参见 Gold schmidt，*Medieval Texts*，p. 12；J. W. Thompson，'The Wanderings of Manuscripts'，p. 659。

(227) Boyd, 'These Precious Monuments of... Our History,' pp. 175-176. 感谢赖德·贝多(Reid Beddow)博士向我推荐这段引语。

(228) Ibid., pp. 175-176.

(229) 试比较两本书里相关资料的多寡: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Febvre*,第八章的资料丰富,而 H. Stuart Hughes, *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 pp. 38-40 则资料缺失。休斯在此讨论了语言的固化与民族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关系。他敦促历史学家利用语言学研究成果,但和人类学家一样,语言学家仔细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对手抄书文化和机印书文化的差别却三缄其口。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判断,语言学书籍深奥难懂,似乎离印刷术太远。但我发现的情况正好相反: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很重要。我在研究论印刷术的文献中发现了印刷术的战略价值。

(230)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p. 120-126. 书中列举的例子有英格兰的康沃尔方言、威尔士的赛尔特语、苏格兰及爱尔兰的盖尔语、拉脱维亚语、爱沙尼亚语、立陶宛语、芬兰语、波罗的海的波美拉尼亚语、捷克语、巴斯克语。当然,他没有列举的例子里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就其所举例子而言,16 世纪的字钉铸造似乎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是值得注意的。有一个详细的个案研究指出了斯坦贝格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伴随因素,见 Marion L. Huffins, 'Sixteenth Century Printer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New High German', pp. 60-72。遗憾的是,胡芬斯研究的是两位德国权威学者的争鸣,这似乎与我关心的问题仅仅有擦边的关系。

(231) Kingdon, 'Patronage, Piety, and Printing in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pp. 32-3. 又见其文章'The Plantin Breviaries'。

(232) 追寻这一探索思路,用多伊奇(Karl Deutsch)的观点来补充颇有裨益。他在《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里表现出来的思路更加植根于经验和历史。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参见本书第 356-357、363-364 页。

(233) Holt, *Magna Carla*, pp. 288-290.

(234) Graham, 'Our Tong Matemall,' p. 93.

(235) Franklin Ford, *Robe and Sword*, p. 80 描绘了印刷术的固化机制,不过他没有描绘其变化情况。他还描绘了"宣传技巧的伟大进步",描绘法国议会的主要抗辩记录是如何刊印的(p. 101)。

(236) Butler,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pp. 88-110. 作者在这里讨论了早期印刷文献里的各种宣示和相应的征引,他还对 16 世纪"发明者"等词语的歧义做了探讨。关于谷登堡的宣示,参见本章注释(142)。

(237) 见爱德华·罗森的两种著作:《眼镜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Eyeglasses*)和《望远镜的命名》(*The Naming of the Telescope*)及本章注释(251)和(252)。确定眼镜发明的主要资料是一篇布道辞,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说明印刷术发明前后的宣传有不同之处。参见本书第 553 页对技术文献的讨论。有一位教廷图书馆员对语文学感兴趣,他编纂了一张后古典"发明"的清单,见本书第一章注释(49)。

(238) 除了一般人提到 Martin Waldseemüller,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 之外,我们需要考虑

补充其他材料，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不仅“在宣传方面比哥伦布更有效”，而且他的《新世界》(*Mundus Novus*)率先阐述了航海到新大陆的意义。在 1503 年至 1508 年间，他在 9 个欧洲出版中心印行了这本书。David B. Quinn，'The New Horizons of Geographical Literature'描写维斯普奇在自我推销里的作用。Richard B. Reed，*The Expansion of Europe* 描绘了印刷术在发现的时代里的许多重要意义。

(239) 1469 年，一位威尼斯印刷商获准在指定的时间里印制并销售一本书，这是文化产权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许多人已经讲述过这一事件。见 C. Blagden，*The Stationers Company*，p. 32。据 R. J. Forbes and E. J. Dijksterhuis，*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147，威尼斯是 1474 年率先对发明提供司法保护的城邦。又见本书第三章注释(218)。

(240) McKerrow，'Booksellers，Printers，and the Stationers Trade'，p. 222 勾勒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情况，出版和销售的专利被分配给不同的公司，此间出版和销售的图书有《圣经》、法律书、年鉴、教材、入门书和问答小册子、音乐书和乐谱纸等。Webster，*The Great Instauration*，pp. 343-355 探讨了弗朗西斯·培根的活动，专利垄断对发明造成一定的阻碍。

(241) 在《古罗马的博学杂志》('Le Journal des Savants sous L'Anciea Régime')一文里(pp. 29，33)，伯恩(Raymond Birn)证明，不同领域的学问(以及“严肃”文学和“轻浮”文学的分野)显然是由这种杂志被授予特权后做出的界定，官方允许它探讨许多严肃的课题。这篇文章和 Siebert，*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都多次论述，有关印刷业的立法提出了关于特权与垄断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是贯穿 16 世纪的尖锐冲突的源头。

(242) Kline，'Rabelais and the Age of Printing，'p. 54. 又见 Delaissé，*Le Manuscrit Autographe de Thomas A Kempis*，1，149 的相关的评论。亦见 Chaytor，*From Script to Print*，p. 193。印刷术来临之前，有人编纂了有关语文学的后古典“发明”的清单；与此相似，中世纪的托钵僧中也存在剽窃的观念。据 Smalley，*The English Friars*，pp. 37-38 讲述，有人担心在布道之前就被人窃走他将要讲的趣闻。

(243) 有关这些术语风趣幽默的讨论，见 Merton，*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pp. 63-65。

(244) Burrow，'The Medieval Compendium，'p. 615.

(245) Margaret Aston，'The Author and his Ghosts，'p. 1121. 又见 Marshall McLuhan，*The Gutenberg Galaxy*，pp. 130-137 对作者身份和权威的讨论。

(246) Merton，*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p 68，转引自 Glanvill's *Essays* of 1976。关于《圣经》作者的探讨，参见本书第 320-323 页。

(247) 关于通俗语翻译运动，见本书第 366 页以后，亦见 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p. 410。

(248) Baron，'The Querelle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3-22，亦见本书第三章注释(51)。

(249) Curtius，*European Literature*，pp. 252-256 谈到手抄书时代使用的“古人”和“今人”，但没有指出印刷术之后其意义的变化。默顿关于巨人和侏儒的箴言(幽默语)有重要意义，指明了这个课题上汗牛充栋的文献。

(250) Harbison，*The Christian Scholar*. p. 5.

(251) Rosen，'The Invention of Eyeglasses'，p. 34，n. 99 认为，14 世纪一位布道师的言论自相矛

盾，因为他说："要说的已经说完……今天不可能再写新书，也不可能再创造一门新的艺术。"在此前的另一篇布道辞里他却说："人已经找到一切艺术，而且将要创造新的艺术。"然而，找到一门新的艺术未必就等于创造一门新的艺术。关于这一观点以及12世纪的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于格创造了艺术的观点，又见 Paul Lawrence Ros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pp. 255-256。

(252) 爱德华·罗森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献里翻箱倒柜搜寻，发现"发明"一词只使用了一次。据 Rosen, 'The Invention of Eyeglasses', p. 192 记述，彼特拉克把琐罗亚斯德描绘成巫术的发明者。透特(亦名"特利斯米吉斯图的赫耳墨斯")发明了文字、计数或计量。当然，亚当给万物命名，而且(在人类堕落前的状态下)可能还认识万物。一个完整的名录将包括无数其他声称扮演了原初创造者角色的人。据 Yates, *Art of Memorg*, p. 43 所述，所谓公元前264年那块"巴黎记事"的大理石碑上记载着发明笛子、引种谷物，甚至"奥菲士诗歌发表"的日期。但这块石碑是17世纪才发现的，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普林尼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切发明的主要源泉。

(253) Sarton, 'The Quest for Truth', p. 66.

(254) 转引自 Hiram Haydn, *The Counter Renaissance*, p. 208。

(255) 据 J. Finegan, *Han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 p. 57 记述，"Amen"一词容纳了三个希伯来字母：Aleph, Mem, Num(每一个字母都被赋予不同的数字)，形成了记忆以91天为一个季节、四个季节为一个周期的太阳年的方案。查阅这个论题的著作时，我难以断定，这里展示的巧妙安排究竟是古人的智慧还是今人的智慧。这种困惑尤其适用于金字塔或巨石阵的研究成果：它们究竟是如何用于天文观测的，但我们的困惑几乎推展到现代人一切有关古人保存数据的理论。

(256) D. P. Walker, *The Ancient Theology* 里有几篇研究这种现象的文章。

(257) 见本书第283-284页的讨论。

(258) Bennett,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p. 158 指出英国和法国出书的"显著不同之处"。他说，在16世纪的法国，大量异教的古典译成了法语，而在同一时期，更多"使人向上"的虔修著作译成了英语。

(259) William Haller, *The Elect Nation*, *passim* 把两者在16世纪英格兰的啮合描绘得明白晓畅，这本书把印刷术与历史发展过程结合得很好。如今，还有人在根据约翰·福克斯的《辩护》(*Apologia*)写儿童故事书，故事的主角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260) 最重要的例外是法兰西和日内瓦，到17世纪中叶，这两个地方还有两种取向不同的本土文学传统与一个国际传统并行。这就为卢梭、斯塔尔夫人(Mme de Stäel)等法国人和让·查理·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等日内瓦人提供了"传声结构"，否则，他们还不是和与之类似的德意志人、瑞士人或荷兰人一样默默无闻。高卢语被征服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这真是充满悖论：一个人口最多、强大而巩固的王朝统治的天主教国家，其中只有一个小小的新教家园的孤岛，而且它还拥有国际化的欧洲文明，但它的高卢语却被征服了。Louis Réau, *L'Europe François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研究了这个课题，但忽视了严密的分析。David Pottinger, *The French Book Trade* 提供了一些有用的

数据(第 19-23 页)。又见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p. 118。本书第 145 页也谈到法语扩张的影响。

(261) 通俗语《圣经》深深地嵌入斯堪的纳维亚语、荷兰语、德语和英语民族的书面文化,相反,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的通俗语《圣经》的影响却很肤浅,本书将在第 351-352 页讨论这一反差。

(262) McLuhan, *The Getenberg Galaxy*, p. 170.

(263) Robert Mandrou, *De Ia Culture Populair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passim*. Natalie Z.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详细阐明了早期近代的法国在这个课题上的情况。本尼特的三卷本的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和阿尔提克(Altick)的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的第一章谈到英格兰的情况。至于 18 世纪以后各地发展的情况,文献就更多了。

(264) 甚至在 16 世纪的一些印刷所里,这一条鸿沟也是存在的,这是临时工和工头之间的鸿沟。见 Natalie Z. Davis, 'The Protestant Printing Workers of Lyons in 1551', pp. 252-253; 256-257。然而,不识字的短工唱的诵诗则是由泰奥多尔·贝扎(Theodore Beza)和克莱芒·马罗(Clement Marot)创作的,而且是为印刷和发行而创作的。

(265) 转引自 Wright, *Middle Class Culture*, pp. 232-233。

(266) 艾迪生语,见 1712 年英国《墨丘利》(*Mercury*)杂志,转引自 Preserved Smith, *The Enlightenment 1687—1776*, p. 284。

(267)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 128.

(268) 关于截至 1760 年英格兰创办的 30 余种地方报纸的讨论,见 R. M. Wiles, *Freshest Advices*, *passim*。又见 Plumb, 'The Public,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he 18th Century', pp. 22-24。法国的地方报纸发展较晚,参见 Trénard, 'La Presse François', pp. 323-402。

(269) Laslett, 'Philippe Ariès and"La Famille,"' p. 83.

(270) 转引自 Arthur Wilson, *Diderot: The Testing Years*, p. 162。

(271) Kelley, 'Martyrs, Myths and the Massacre.'这篇文章纪念圣巴塞洛缪屠杀四百周年,其中沉淀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又见 Soman, ed.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收录的文章。

(272) 动乱和分离造成的长期问题受到印刷术的影响在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有关颠覆性的小册子宣传战比如法国投石党运动时攻击马扎然的文章和歌曲(Mazarinades)的大量文献一般止步不前,不把印刷品的产量和投石党的反叛或政府对付反叛的动作联系起来研究。

(273) 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书评'Fanfare for Princes',评玛格丽特·麦高文(Margaret McGowan)编的四卷本 *Renaisance Triumphs*。书评研究 16 世纪庆祝王公入城式的节日,拷问仪式的目的及官方记述有限的原因。构成这些仪式的昂贵木刻的复制、铜版画的重要意义都值得进一步考虑。

(274) 这一机制始于 17 世纪的巴黎。霍华德·所罗门(Howard Solomon)的近著 *Public Welfare, Science and Propaganda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对此作了描绘。该书研究法国新闻业之父泰奥福雷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支

持下推行的宏伟计划。关于印刷品如何推进16世纪德意志城市的法律改革，参见Cole，'The Dynamics of Print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 101-103。

(275) 关于"家庭"和"儿童"的指南，参见本书第427页以后。研究淑女和女性作家的文字越来越多，但对女性读者群的研究却不够注意。Miller，'Eighteenth Century Periodicals for Women，'p. 279 ff指出针对这个专门市场的分化较早的印刷品。关于18世纪法国的情况，Trénard，'La Presse François'，pp. 315-319探讨了"法国女性出版物的滥觞"。

(276) Jacob，*The Fifteenth Century*，p. 665提到卡克斯顿印行的《骑士的等级》(*Ordeyne de Chevalrie*)和其他论纹徽的早期著作。关于印刷术之前纹徽非常独特的形式，见Denholm-Young，*History and Heraldry 1254—1310*。Altick，*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p. 31讲述了"等级"观念刚性化的过程。《哥达年鉴》(*Ammanach de Getha*)直到现在的印行有助于欧洲世袭贵族的永久化，虽然在法律意义上世袭贵族是不存在的。

(277) Curtis，*Oxford and Cambridge*，pp. 89-111.

(278) Arthur B. Ferguson，*The Articulate Citizen*，*passim.*

(279) Rothkcrug，*Opposition to Louis XIV*，pp. 458-459.

(280) 如上所示，由于纸币上印了路易十六的头像，他就非常令人注目了。

(281) Joseph Klaits，*Printed Propaganda under Louis XIV*，pp. 6-7. 引文摘自Seguin非常有用的专著*Information en France de Louis XIII à Henri II*；关于克伦威尔的宣传机器的材料取自Elton，*Policy and Police*，chap. 4。关于新的宣传形式对法国王室活动的影响，见Martin，*Livre à Paris* 1，258 ff。

(282) 参见John Hale，'War and Public Opinion，'pp. 18-36。他注意到一种现象：军事领袖中拥有"大量论武器和战略的书籍"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283)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chap. 4；Lawrence 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p. 673；Franklin Ford，*Robe and Sword*，进一步的探讨见本书第395页之后。

(284) Curtis，'The Alienated Intellectuals of Early Stuart England，'pp. 25-41. 又见Brin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285) 关于达恩顿(Darnton)的研究，参见本章注释(71)。Paul F. Grendler，*Critics of the Italian World* 描绘了在阿雷蒂诺成功后威尼斯一条文人街出现的情况。有许多著作研究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这一现象，Edwin H Miller，*The Professional Writer in Elizabethan England* 即为其中之一。

(286) 关于近代早期"地下"文学的定义这个复杂的问题，见本书第三章注释(333)。

(287) "文坛"(Republic of Letters)概念本身就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Annie Barnes，*Jean Le Clerc e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pp. 14-15对17世纪这一制度做了精彩的描绘。稍早，雨果·格劳秀斯有一个与之类似的说法"基督教文坛"(Respublica Literaria Christiana)，Paul Dibon，''L'Université de Leyde e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au 17e Siècle，'pp. 25-32对此进行了阐述。至于"文坛"一语的起源，后者说"有争议"。据我追踪，"恢复"(rinascita)的最早用法指的是古本的恢复。出自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巴巴罗(Francesco Barbaro，1398-1454)致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一封信，祝贺

波焦恢复古代文献的成就。见 W. G. Gordan(ed.), *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 appendix:letter IV, p. 199。从此往下搜寻,我们看到瓦拉(Giorgio Valla)广泛流布的对伊拉斯谟、戴塔普尔(Jacques Lefevre d'Etaples)、瓦狄亚努斯(Joachim von Vadianus)、庇突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等人的颂扬。约翰·迪伊致西塞尔(Cicel)信中出现了"文坛"一词,这封信的内容是讨论特里特姆斯的密码学。他在 *Monas Hieroglyphica*(Antwerp, 1564)的献辞里也用了"文坛"一词(见本章注释(167)和(168)对 Bailey 和 Josten 的论述)。迪伊这封信是在其印刷商威廉·西韦尔的作坊里写的,威廉·西韦尔与普朗坦的其他荷兰印刷商有往来。迪伊的介绍就与迪本笔下 17 世纪初莱顿那一段的"文坛"联系起来了。

(288) Haley,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Gentury*, p173. 也可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394)。

(289) 因为这句话不适用于莱布尼兹的《学术通讯》(*Acta Eruditorium*),也不适用于牛顿拉丁文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因此把欧洲各国使用拉丁文的知识界(Commonwealth of Learning)和更加"世俗化"用法语的"文坛"(Republic of Letters)区分开来好一些。拉丁文用于学术和科学发现的传播手段的持久性常常被人遗忘了。试比较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两篇书评。一篇是在让·勒·克莱尔编辑的《通用目录学》(*Bibliographie Universelle*)上发表的法语书评(作者也许是约翰·洛克),另一篇是在莱布尼兹编辑的《学术通讯》上发表的拉丁文书评(作者也许是莱布尼兹)。这就可以说明,拉丁文绝不仅仅是有人所谓的天主教教士和古板学究使用的载体。相反,直到牛顿那个时代,拉丁文仍然是富有革新精神的数学家交流的工具。

(290)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 298.

(291) Folke Dahl, *Dutch Corantos 1618—1650 A Bibliography*, p. 23; Louis Trénard, 'La Presse François,' p. 295; Myriam Yardeni, 'Joumalism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I'Epoque de Bayle.'

(292) 比较早为拉丁化名字辩护的是瑞士人文主义者"瓦狄亚努斯",其真名是约西姆·瓦特(Joachim von Watt)。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接任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教授职位的"利图斯"(Laetu)形成的文人圈子,其真名是居里奥·庞珀里奥·里托(Giulio Pomponio Leto)。见 Archer Taylor and Frederick Moshe, *The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Anonyma and Pseudonyma*, pp. 18-19。Delof, 'Comment déjouait-on la censure en France au XⅦe siècle?'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17 世纪法国人用来欺骗审查官的策略。

(293) 关于虚拟的地址,见 S. H.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p. 264-265;亦可见 M. E. Kronenberg, 'Forged Addresses', p. 82。他指出,早在 1516 年,一位莱顿的印刷商就用一个编造的地址来掩护伊拉斯谟辛辣的讽刺作品。"威尼斯的居安·菲勒德尔弗"(Juan Philadelpho of Venice)是让·克雷斯宾(Jean Crespin)喜欢用的笔名,见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126。Grendler, *Critics of the Italian World*, p. 33 指出,奥腾西奥·兰多(Ortensio Lando)在多种场合用"乌托邦"这个笔名。Bennett,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1475-1557*, p. 210 一个有趣的例子:'Printed in Jerico in the land of Promes by Thome Truth'(London, 1542)。谷登堡之后的几百年里,相当数量的非法出版物(含黄色和政治两种)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见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p. 30-31。

Wade, *The Clandestine Organization* 指出，此传统贯穿 18 世纪的法国。这一传统（打字机稿和油印机稿取代了手写稿）延续到现在。虽然手抄本政治讽刺文和黄色诗歌有吸引力，但其流传不应该干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要注意有组织的地下机印图书产生的范围更大的影响。

(294) Niceron, *Mémoires.*

(295) Darnton, 'The Encyclopédie Wars' 描述 *Grande Encyclopédie* 一次又一次重印获得的丰厚利润。

(296) 见本书 443 页之后。注意第 463-473 页的相关研究，那里有不少的引文将介绍这一时代精神的相关因素。

(297) 几百年间，不同的印刷公司和印刷中心有一些有趣的交叉，显示一定的连续性。仅举两例：邦贝格（Bomberg）公司把 16 世纪初威尼斯的一家出版社和稍后安特卫普的普朗坦出版社联系起来，见本书第四章注释（468）。莱顿的巴松（Basson）公司印行"爱之家"和玫瑰十字会的材料，见 Jan van Dorsten, 'Garter Knights'。又见 Dorsten, *Thomas Basson*。格弗特·巴松（Govert Govert）也为路易·埃尔西韦尔公司印书（据 Paul Dibon, 'L'Université', p. 19 记述）。

(298) 西德尼的东道主是约翰·维谢尔；布鲁诺的东道主是安德利亚·韦谢尔，他是胡格诺教徒，继承父亲在巴黎从事学术出版的传统，直到巴托罗缪屠杀使他被迫流亡法兰克福，他因此避免了朋友彼得·拉米斯的命运。安德利亚·韦谢尔因为一共印行了拉米斯 180 版左右的著作而留名。约翰和安德利亚的亲属关系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叔侄关系。1519 年，约翰重印了迪伊的《摩纳斯密码学》和布鲁诺身前留下的最后一些著作。1518 年，他率先出版了德·布莱对美洲大陆的记述，见伊万斯（Ivens）的权威论述，'The Wechel Presses: Humanism and Calvinism in Central Europe 1572-1627,' pp. 3-4, 12, 17。

(299) Yates, *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pp. 73; 216. 又见本书第 219 页对"秘密主题"的论述，该书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奥秘潮流与早期近代科学联系在一起。

(300) 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最近的研究把尼科德默斯派（Nicodemite）运动追溯到 16 世纪初的前宪章主义和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的草本专家奥托·布伦费尔（Otto Brunfels）。Ginzburg, *Il Nicodemismo: Simulazione e Dissimulazione religiosa nell'Europa del'*500.

(301) Margaret C. Jacob, *The Newtonian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9-1720*, chap. 6, esp. pp. 206-207, 217-231. 雅各布指出，托兰德（Toland）的秘密团体喜欢讨论布鲁诺的著作。鉴于布鲁诺的观点和托兰德的《泛神论》（*Pantheisticon*），雅各布相信，把托兰德描绘成"泛神论唯物主义者"比"自然神论者"更恰当（p. 227）。雅各布还强调布鲁诺和秘术传统对托兰德 *Letters to Serena* 的影响（p. 234），这个观点对弗朗西丝·耶茨早些时候的猜想提供了支持：布鲁诺是共济会的先驱。

(302) 除了雅各布在 *The Newtonian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第 210 页的引述外，又见 Venturi, *Utopia and Reform*, pp. 48-68。托兰德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善于篡改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埃德蒙·勒德洛（Edmund Ludlow）、弥尔顿、内维尔（Nevile）、詹姆斯·哈林顿的著作为己所用，他对知识界传统的贡献见 Worden, 'Edmund Lud-

low', pp. 15-16。

(303) 除了 *The Newtonians*, chap. 6 之外,雅各布还有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Clandestine Culture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其中有一些关于"欢乐骑士团"的新资料,这是她在伦敦和莱顿搜寻托兰德足迹的过程中发现的。

(304) Christiane Berkvens-Stevelinck, 'Prosper Marchand, Auteur et Editeur'提供了相应的资料,他提到 Marchand, *L'Histoire de l'Origine et du Premier Progrès de L'Imprimerie* (The Hague, 1740)。

(305) Dorothy Schlegel, 'Freemasonry and the Encyclopédie Reconsidered'.《百科全书》(*Encyclopedite*)扉页插图出自科钦(Charles Nicolas Cochin),他可能是共济会员。在围绕共济会对《百科全书》影响的争鸣中,印刷业还在其他关系中发展。《百科全书》的四位书商—出版商之一是洛伦·迪朗(Laurent Durand),他为书名页设计了徽标,施莱格尔认为这个徽标是共济会的象征。另一位是勒·布雷顿(André François Le Breton),其主要职责是筹款和监察工作。围绕他的争论久拖不决:他是否就是在法国一间储藏室里找到的名单上的那位勒·布雷顿?对于这些文献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见 Robert. Shackleton, 'The Encyclopédic and Freemasonry'。最近对勒·布雷顿的评论见 Frank Kafker, '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 leading French Bookseller-Printer: André François Le Breton, Chief Publisher of the Encyclopédie'。

(306) 皮卡尔(Picart)1707 年的扉页插图表现密涅瓦如何清除这个主题上的愚昧。萨克塞尔(Saxl)的《真正的时代儿女》('Veritas Filia Temporis')重新思考这个主题,认为密涅瓦插图用来指牛顿的自然哲学而不是指笛卡尔的哲学,见该文第 220-223 页。这样的再加工符合约翰·洛克对牛顿《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Principia*)的评论,符合伏尔泰后来对牛顿而不是笛卡尔的支持。1589 年,"爱之家"会员、莱顿的出版商—书商托马斯·巴松印行了一本小册子论"真正的时代儿女"这一主题,见多斯腾的文章《嘉德骑士团》的第 187 页。在此再次说明,与密涅瓦和墨丘利一样,"真正的时代儿女"这个拉丁文标签未必有什么特殊的派别含义,因为它分布广泛,在陶器、金属器皿和图书上都有复制。见 Saxl, 'Veritas Filia Temporis,' p. 199, n. 2。

(307) Colie, book review, *Renaissance Quarterly*, 1973.

(308)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87.

(309) 伊拉斯谟的著作被禁始于 1526 年索邦神学院的谴责,至 1558 年保罗四世禁书目录禁止伊拉斯谟全集达到高潮。Paul Grendler and Marcella Grendler, 'The Survival of Erasmus in Italy'对此做了简明扼要的记叙。《伊拉斯谟全集》(*Opera Omnia*)的再次印行是在新教的荷兰,出版人是胡格诺教徒文人圈子里的一员:让·勒克莱尔(Jean LeClerc)。关于伊拉斯谟著作的出版从天主教印刷中心转向新教印刷中心的情况,参见 Trevor-Roper, 'Desiderius Erasmus', p. 51。进一步的探讨见本书第四章。

(310)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 278. David Pottinger, *The French Book Trade*, p. 76 指出,很大一部分法语书来自新教地区。关于小公国的角色,参见 Birn, 'Pierre Rousseau',这是一个精细的个案研究,详细描绘了这位剧作家到国外去为百科全书

派出版著作、摇旗呐喊的情况。A. Bachman, *Censorship in France from 1715 to 1750*, *passim* 研究法国出版商在议会、官僚和审查官的干预下遭到的困难，是为数不多的这类著作之一。犹如一切天主教地区一样，本地书商所受的打击比作者还要沉重，因为作者可以而且的确转向了相邻地区的印刷商。18 世纪法国图书贸易和审查这个课题的文献正在迅猛增加。关于近期的书评，见 Birn, '*Livre et Société*, After Ten Years'。

(311) Pottinger, *The French Book Trade*, p. 11.

(312) Gay, *The Party of Humanity*, p. 117.

(313) 如果印刷术对传统的哲学生涯的影响被赋予更多的注意，我们就可以用新的观点去看"围绕他们的哲学家地位而展开的陈旧的论争"。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p. 33 注意到从深奥到通俗转变的路子。Venturi, *Utopia and Reform*, pp. 5-9 注意到对贺拉斯"敢于独立思考!"的重新定向。在我看来，这样的转变和重新定向似乎和新的宣传体系有关系。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 Ginzburg 在'High and Low'里提出的问题。

(314) Pottinger, *The French Book Trade*, p. 79. 很有象征意义的是，从 1770 年到 1776 年，数千册《百科全书》被锁在巴士底城堡。又见 Lough, *Essays on the Encyclopédie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 p. 52。

(315) 转引自 Trénard, 'La Presse François', p. 280。

(316) 参见 Peyre, 'The Influence of Eighteenth Century Ideas'。

(317) Morner,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p. 281.

(318) 这一观点不仅与莫纳的观点冲突，而且与最近法国人对 18 世纪图书世界的研究是矛盾的——18 世纪图书世界是当前深入研究的课题。费弗尔和马丹认为，印刷术在 16 世纪的作用是复制旧书，从而对采纳新思想起到迟滞的作用，同样，阿方斯·杜普隆(Alphonse Dupront)认为，18 世纪的书籍生产非但没有提供革命动力，反而强化了传统，成了进步的刹车。见本书第一章注释(71)。

(319) 关于讲演厅的功能，参见 Augustin Cochin, *Les Sociétés de Pensée* I, 20。关于潘恩(Pain)的 *Age of Reason* 从 1791 年到 1793 年在英国销售数十万册的"通信社会"的情况，参见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 70;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chap. 5. 关于潘恩许多版本的著作 1776 年以后在法国发行的情况，见 Echeverriad, *Mirage in the West*, p. 44。

(320) Roberts, *The Mythology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以怀疑和宽容的眼光概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我们指出了他这个研究路径的局限，见 Eisenstein,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3)。

(321)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 Norman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该书研究捏造的"锡安山长老的协议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书末的洞见颇为有用，但亦不明智，因为它重复了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和恶意的漫画，使原来的病毒继续流通，甚至复活了一些冬眠的病毒。顺便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讥讽拿破仑三世的王朝，说它是"新闻的化身"，提供标准的礼仪模式。又见 Kulstein,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the Press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322) 关于对玫瑰十字会"媒介事件"的讨论,见本书第 275-276 页。印刷术对集体心理病理的影响亟须进一步研究。理查德·霍普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对"政治偏执狂作风"的研究意义隽永,最近一些论猎巫狂以及论中世纪和现代泛犹主义的区别,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323) Q. D. 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passim.*

(324)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pp. 136-137.

(325) 转引自 Hiram Haydn, *The Counter Renaissance*, pp. 198。关于海登的主题及其相关问题,见本书第 475 页以后。

(326)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p. 144.

(327) D. C. Somervell, *English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8-9,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把埃德蒙·伯克的主张"转变成一把小说的钥匙"。

(328) 除了 Altick 的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之外,参见 Dudek, *Literature and the Press*; 又见艾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ésar Grana, *Bohemian versus Bourgeois*;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Coser, *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 Molnar, *The Decline of the Intellectuals*。

(329)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 8.

(330)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rt 2, section 2, p. 101.

(331) Winton, 'Richard Steele,' pp. 22-23.

(332) Cited by Coser, *Men of Ideas*, p. 55.

(333) 布瓦洛(Boileau)语,转引自 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p. 177。

(334) César Grana, *Bohemian versus Bourgeois*, p. 56.

(335) 19 世纪英格兰的小说读者主要是女性,妇女为小说提供的市场越来越大,科林斯(Philip Collins)的书评'The Fiction Market'注意到这样的现象。

(336) Théophile Gautier, Preface to *Mademoiselle de Maupin* (1835), p. 82. 这篇著名的序文阐述 19 世纪初法国专业作家遭遇的各种压力、审查和竞争。

(337) 关于较早使用"多头怪兽"这一政治术语的主题,参见 Hill, 'The Many-Headed Monster'。卡莱尔(Thomas Carlyle)强烈抨击硬塞给千百万读者的垃圾。杜代(Louis Dudek)的 *Literature and the Press*, p. 207 指出管束文学的"金钱关系"。

(338) 麦克卢汉反复强调指出,印刷术业已过时,已被电子媒介取代,他不仅在《谷登堡星汉》而且在《理解媒介》中重申这一观点。又见 Steiner, 'The Retreat from the Word'; 亦见 Winetrout, 'The New Age of the Visible'。

第三章

(1) Butler,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p. 9.

(2) Fergu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naissance'对支持这个过渡期的理由进行阐述。丹能菲尔德(Dannenfeldt)编选的文摘'The Renaissance Humanists'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指南,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方面的主要著作。

(3)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40; 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p. 393; Santillana, *The Age of Adventure*, p. 12.

(4) Warnke, 'Mazzeo on the Renaissance,' p. 288.

(5) Huizinga,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 p. 278.

(6) Ibid.

(7) 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p. 391.

(8) 语出 Louis Le Roy, *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 Choses en l'Univers* (1575), 译文见 J. B. Ross,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p. 98。

(9)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pp. 21-22.

(10) McMurtrie, *The Book*, p. 136; Gilmore, *World of Humanism*, p. 186.

(11) 比勒将这一术语翻译成"art of writing by mechanical means",见 Bühler,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96。这一事实说明,印刷术出现之前,就有人在用这一术语指某些抄书人传授的技艺;又见 Swierk, 'Was bedeutet "ars artificialite scribendi"?' *Der Gegenwaertige Stand der Gutenberg-Forschung*, pp. 243-251。

(12)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注意到这些棘手的问题(pp. 30-31); Goldschmidt, *Medieval Texts*, passi, esp. pp. 14-15 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印刷术第一百年为学术市场优先印制的书籍"起源于"(有歧义)13 世纪和 14 世纪。至于整个领域,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 13 的结论是,75%以上的早期机印是谷登堡那个时代的人"编纂的"(有歧义)。另一方面,Hay, Introduction,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p. xxiii 说,"旧"文本在印刷术第一百年里出的书里占了"很大一部分"。

(13) 比较 H. de la Fontaine. Verwey, 'The Netherlands Book', p. 9 和 George N. Clark, *Early Modern Europe*, p. 35。

(14) Steele, 'What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are About.' 又见 Lenhart, *Pre-Reformation Printed Books*; Haebler, *The Study of Incunabula*。

(15) Hauser,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II, 3.

(16) Duran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p. 3. 这句话的依据似乎与萨尔顿初期著作里的依据类似。迪朗认为,早期的托勒密的 *Almagest*、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的著作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品,只不过是 12 世纪和 13 世纪手抄本的"潦草的中世纪"拉丁语译本而已。参见本书第 508-517、558 页的介绍。

(17) 见本书第一章。最典型的例子见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pp. 7-8。

(18) Chaytor, *From Script to Print From Script to Print*, p. 823; 萨尔顿的断言(*Appreciation*, xi)引起克里斯特勒(Kristeller)的反驳,见 Kristeller, *Iter Italicum: A Finding List of Uncatalogued Humanistic Mss* 的自序, I, xxii。关于萨尔顿的"爱恨交织"的观点,参见本书第 507-508 页。

(19) 1971 年 12 月 28 日,沃尔特·翁在美国历史学会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欢迎这样的建议,并指明这一建议是我提出的。

(20) 相关材料见本章其他地方对保罗·克里斯特勒、汉娜·格雷、汉斯·巴伦等人的研究。

(21) 彼特拉克对医学院的抨击就是证明，见本书第 251-252 页。

(22) 在'Erasmus and the Visual Arts'(pp. 200-227)一文里，潘诺夫斯基认为，伊拉斯谟对文艺复兴持"狭隘的观念"，伊拉斯谟预见到医学、哲学和法学里"美文"的复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争辩说，伊拉斯谟表达了"广义"的文艺复兴。虽然他未能提及视觉艺术，只谈及拉丁学术，但他还是在拓宽研究领域的观念，他提出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以前的手抄书学者排除的领域；那些学者只赞美 12 世纪的"复兴"，其研究领域只限于和"人文研究"相关的领域。见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The Classic*，*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p. 10。

(23) 在'The New Learning'一文里，切斯特(Alan G. Chester)指出，率先使用"新学问"这一语词的是英格兰的神学家，他们反对路德派的教义；但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他们受雇于宗教改革的捍卫者，这些捍卫者认为，自己捍卫的无非是圣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的教义。(我在本章里使用的"新学问"是近年才获得的比较松散的常规的意义，包括克里斯特勒描绘的前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领域。)

(24) 关于反对教廷的宣传者如何操弄"黑暗时代"的主题，参见 Ferguson，*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又见本书第 304-305 页的引语。

(25) Allen，*The Age of Brasmus*，pp. 260-63. Woodward，*Vittorino da Feltre and Other Humanist Educators*，pp. 182；206，(1897)；该书还指出两个阶段的区别，早期文艺复兴阶段从彼特拉克去世到 15 世纪 70 年代，后期阶段即伊拉斯谟和路易·比维斯(Luis Vives)的时代。艾伦的划分突出了印刷术的影响。

(26) 基督教的文艺复兴的观念本身也随之复杂化，因为各种互相矛盾的分割图式激增。Albert Hyma，*The Christian Renaissance* 研究的是起源于 14 世纪的近代虔敬运动；Lewis Spitz，*The Religious Renaissance of the German Humanists* 研究的时间段是 15 世纪中叶以后。Enno van Gelder，*The Two Reformatio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书名与内容不太一致，它研究的主要是 16 世纪文艺复兴的宗教方面。Hiram Haydn，*The Counter Renaissance* 研究的也是这一段历史。

(27) Bernard S. Levy，ed.，*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该书收录的另一篇文章也在"早"期之外，这是威特考尔(Rudolf Wittkower)考察文艺复兴时期象形文字研究的文章，其关注点是阿尔定出版社推出的《象形文字集》(*Horapollo*)和阿尔恰提(Alciati)的《浮雕装饰》(*Emblemata*)。

(28) 在《丢勒传》(*Albrecht Dürer* I，33-34 ff)里，潘诺夫斯基强调，丢勒的古代观深受铜版画影响，同时探讨丢勒对各种媒介的运用，但他仍然把丢勒置于北方语境而不是后印刷术文艺复兴的语境。后印刷术文艺复兴对他的总体历史图式很陌生，这一点有他的其他著作为证。又见本书本章下文的介绍。

(29) 在'Erasmus and the Visual Arts'(pp. 218-220)一文里，潘诺夫斯基做了这样的对比：意大利人习惯将肖像画紧锁深藏，而霍尔拜因(Hans Holbein)为伊拉斯谟作的肖像画却被大量复制，放进伊拉斯谟的《愚人颂》里，但这幅作者肖像首次被印到书里，他得到意大利人的赞助，而不是北方人的赞助(in Milan，1479)，见 Hirsch，*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p. 602。

(30) 见本书第 228 页对阿雷蒂诺宣传技巧的讨论。

(31) 关于保密—宣传问题的探讨,见本章第四节以及本书第 562 页之后。

(32) Vasari, *Lives of the Artists*, p. 228.

(33)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ction VII, 119ff.

(34) Weiss, *The Spread of Italian Humanism*, pp. 86-87. 该书第 46 页提到印刷术的发明很"及时"。不过,该书对印刷术这个增殖因素的注意不如对教廷的重视。他又说,在传播意大利人文主义方面,机印书的角色"给人的印象不亚于"手抄书,这样的表述似乎低估了印刷术的力量。又见 Kristeller, 'The European Diffusion of Italian Humanism', p. 82。

(35) Vervliet, 'Printing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p. 356. 1921 年一位爱书人在讲演时表达的观点几乎与之相同:"印刷术未成就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成就了印刷术。"转引自 Slater, *Printing and the Renaissance*, p. 1。他这句话的后半句"文艺复兴成就了印刷术"至今使我困惑不解。

(36) DeMole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p. 16. 又见 Randall,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p. 119:"对学识的需要似乎无法满足,解决的办法就是纸印书的生产。"

(37) Fedou, 'Imprimerie et Culture,' pp. 1-27.

(38) Kingdon, 'Patronage, Piety and Printing'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39) Hirsch, 'Printing and the Spread of Humanism', pp. 24-37 就做过这样的论断。

(40) 'The Life of Erasmus by Beams Rhenanus' (1540),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Erasmus*, ed. and tr. by J. G. Olin, p. 48.

(41)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6.

(42) Bolga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p. 280.

(43) 除非我们把萨尔顿上数引文前的一句话当作解释。那句话是:"这就是中世纪复兴为何短暂而文艺复兴却持久的原因。"(Sarton,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13.)他说,文艺复兴在古典的墓前哭泣哀悼并成功地复活了古典的"灵魂";这是他用诗性语言对同一问题所做的重新表述,但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解释。

(44) 见本书第 173 页。波尔加说,这些特征在印刷术起作用前就已经出现,就此而言,我同意他的看法。然而我同时又认为,倘若印刷术的固化功能没有干预,这些特征在 15 世纪初意大利"困难的时期"是可能受损或被抹掉的。

(45)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p. 98.

(46)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8. 这段文字被广泛征引或被人以赞同的态度加以解释,比如 Gilmore, *The World of Humanism*, p. 236。

(47) Gilmore, *The World of Humanism*, p. 236 和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93 提供了相关的引文,且做了适当的评论。

(48) 转引自 Chenu, *Nature, Man and Socie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 320。切努(Chenu)援引的许多其他的 12 世纪文字里也含有类似的情绪,可是,人们往往把这些 12 世纪的情绪说成是 15 世纪文艺复兴才产生的新的历史意识。

(49) Chabod,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pp. 168-69. 和恰博(Chabod)一样,西奥多·莫姆森(Theodor E. Mommsen)讲述人文主义者见到罗马遗存时有感而发的议论,对比了他们的"复活的希望"与终局的失落。他援引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8 世纪晚期的怀旧情绪,将其作为彼特拉克的观点而不是中世纪诗歌的陪衬。见 Mommsen,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Dark Ages"', p. 223。罗伯托·魏斯引用了希尔德伯特(Hildebert)的挽歌,但坚持认为,中世纪人"没有注意到古代与自己时代的分割",见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p. 3。

(50) Baron,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p. p 460-461. 巴伦(Baron)强调佛罗伦萨与"永恒的罗马"观念的决裂;相反,切努探讨的是中世纪的政治转换主题,从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再到法兰克帝国、伦巴第帝国、德意志帝国的转换过程。弗赖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发挥了这个主题。见 Chenu, *Nature, Man and Socie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p. 1-2, 186-187, 200-201。研究从希腊到罗马再到巴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巴黎大学的学者作如是观)这个"文化转化"主题的学者还有魏辛格(Herbert Weisinger)和金塞尔(Samuel Kinser)。见 Weisinger, 'Who Began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Kinser, 'Ideas of Temporal Change', pp. 720-721。诚然,一个移植的帝国可能会与连续的主题比较协调,而罗马的陷落和新民族国家诞生的关系的主题就不那么协调了。然而,中世纪"帝国的历程向西发展"的理念对后世史学的意义和巴伦强调的 15 世纪佛罗伦萨的观念一样重要。"转化"主题也说明以下观念站不住脚:历史上有一个相信罗马永恒的固有的、精致的观念。至于全面的、以同情态度记述的中世纪历史,参见 Southern,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

(51) Baron 的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和'The Querelle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都捍卫通俗语,反对将拉丁文说成是"人文主义的"发展,主张注意研究印刷商对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本翻译所提供的强大动力。即使没有 15 世纪初零零星星捍卫通俗语的主张(这些主张受到主张拉丁文的抗衡),印刷术出现之后,大概总会有人捍卫通俗语的,通俗语总是要胜出的。

(52) 潘诺夫斯基首先在 *Studies in Iconology*, p. 28 里提出这个观点,然后在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里又重申了这个观点。

(53) McLuhan, *The Getenberg Galaxy*, pp. 56, 111-112. 他在这里的解释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多半源于 Siegfried Giedion,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后者追随潘诺夫斯基的观点,赋予焦点透视的发明以重要的文化角色的地位。

(54)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pp. 5-6.

(55) 关于巴塞尔印刷商如何推动古代钱币、服饰等人工制品研究的有趣资料,参见 Bietenholz, *Basle and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ap. 4。

(56) 这个时空语境移植维持到 16 世纪末,费弗尔对此的描绘很敏锐,见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pp. 418-437。

(57)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41 和 Gilmore, *The World of Humanism*, p. 237 也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中世纪人不能够区分文艺复兴产品和古代产品。在 15 世纪初,雕

塑家们仍然把古典形式和非古典题材结合起来创作，见 H. W. Janson，'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58) Panofsky，*Studies in Iconology*，p. 27.

(59) Panofsky，*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p. 294.

(60) Ibid，p. 158. 瓦萨里的这位学生是斯特拉达诺(Giovanni Stradanus)，关于其《新发明》(*Nova Reperta*)的介绍，见本书第 20 页。

(61)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p. 21.

(62) 见本书第 121-122 页援引的圣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给"作者"所下的定义。布卢尼对波焦说，如果他被认为是其恢复的古籍的"第二作者"，他会感到不胜荣幸。见 1416 年 9 月 15 日书简 in Gordan(ed.) *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p. 191。稍后哥白尼被誉为"托勒密再世"、维萨里乌斯被誉为"盖仑再世"的时候，这个手抄书文化的主题就阐述得更加精细了。

(63) 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chap. 2 充分肯定了瓦拉(Valla)对史学的许多贡献。凯利运用库恩(Thomas Kuhn)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图式来分析中世纪的史学，认为瓦拉可以被认为是"史学革命的哥白尼"。凯利似乎低估了把库恩的分析用于分析印刷术以前历史时可能会遭到的困难；换句话说，那是在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或"常态研究"存在之前的情况(参见本书第 605 页之后对库恩的批判)。瓦拉作为先驱的地位似乎与印刷术之后的研究活动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有关。他身后的名气和他的著作反复被重印有关系，见本章注释(114)。

(64) Yates，*The Art of Memory* 生动表现了如何用古典的形象、人物、神话等手段来辅助记忆基督教的抽象教义的艺术，这有助于解释欧文·潘诺夫斯基赋予"哥特式思想"的断裂。

(65)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 62.

(66) Gerlo，'The Opus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pp. 103-115 探讨了书信虚构的艺术以及彼特拉克和伊拉斯谟在这个文体上的变化，书信艺术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修辞训练。格洛注意到，15 世纪后半叶以后，书信艺术手册和书信选迅速增加，但他没有论述印刷商在满足这一时尚中扮演的角色。

(67)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 61. 公允地说，他援引但丁的目的是做对比，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比喻为彼特拉克的观点，他的目的是澄清诗人但丁的超历史领域与彼特拉克散文的"社会与世俗"语境的区别。

(68) 皮克罗密尼(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认为，研究地方纪年史毫无意义，他将其称为"胡说八道"的"大杂烩"。见 Woodward，*Vittorino da Feltre and Other Humanist Educators*，p. 152(见本书第 216-218 页)。

(69) Momigliano，'Ancient History，'p. 7.

(70) 文艺复兴时期政治纪年史家的断代方法与研究文化变迁的文人提出的断代方法不一致，Nicolai Rubinstein，'Il Medioevo nella Storiagraphia Italiana della Rinascimento'，pp. 429-448 指出了两者不一致的地方。同时他又指出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编年史不一致的地方。

(71) 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p. 237.

(72) Herbert Weisinger, 'Ideas of History during the Renaissance' (1945), p. 76 指出,"黑暗时代"一片空白的感觉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觉得自己是与古人同时代的人"。

(73) 路德对使徒保罗的感情率真、亲切,就像彼特拉克对西塞罗的感情、伊拉斯谟对圣哲罗姆的感情一样。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134 对此作了评述。

(74) Shumaker, *The Occult Sciences in the Rtnaissance*, p. 256. 又见他在该书第 255 页上提出的一个问题:给最早的作者的智慧赋予最高的价值。William von Leyden, 'Antiquity and Authority' 干脆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给最古老的言论赋予"特权的"地位,却不给予任何解释。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多半是由手抄书文化造成的。

(75) 见 Mann, 'The Problem of Originality'。又见 Bate, *The Burden of the Past*。

(76) Gadol, *Leon Battista Alberti*, pp. 157-95 探索了"托勒密复兴"及与其相关的革新成果。又见 Edgerton, *The Renaissance Rediscovery*。

(77) Ortelius, 'Message to the Reader,' p. vj. 多谢波辛加(Gail Bossenga)让我参考这一文献。

(78)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8.

(79) Oestreich, 'Die Antike Literatur als Vorbild der Prakt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16 and 17 Jahrhundert', pp. 315-312.

(80) Sarton, *Appreciation*, p. 4.

(81) Gilmore,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the Lessons of History,' p. 85.

(82)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8.

(83) Gilmore,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the Lessons of History,' p. 85. 他似乎认为,瓦拉和居雅斯的立场相差比较大,而凯利却把瓦拉的观点与后世的历史相对论联系在一起。见 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pp. 36-46。凯利忽略瓦拉"那种牌号的古典主义",认为瓦拉呼吁回归源头仅仅是为了让古代"用自己难以模仿的口音说话"(第 46 页)。由此可见,凯利把瓦拉的观点现代化了,他对瓦拉的解释与其他人的解释是冲突的。见 Hanna Gray, 'Valla's Encomium... and the Humanist Conception of Christian Antiquity', pp. 37-51。

(84) Seznec, *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 p. 256.

(85) 评估文艺复兴学者的能力时,我们缺乏一致赞同的标准,其反映是塞内克眼里的批判和潘诺夫斯基热情洋溢的赞誉所形成的强烈的反差。潘诺夫斯基称赞吉拉尔迪(Giraldi)"真正的学术"让使薄伽丘首创的"批判的、科学的"方法论开花结果。见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p. 23(又收入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p. 47)。对薄伽丘的评价也不一致,塞内克并不认为薄伽丘的《神谱》(*Genealogy of the Gods*)是"批判的、科学的",而是认为《神谱》是中世纪神话艺术的继续(第 224 页)。既然吉拉尔迪等人继承了薄伽丘的神话研究,我不明白为何塞内克说 16 世纪的神话学"倒退"了。

(86) Seznec, *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 pp. 241-242.

(87) Ibid, p. 322.

(88) Ibid, p. 224.

(89) 在这本书里，塞内克指出“在薄伽丘和吉拉尔迪之间，意大利没有产生研究诸神历史的作品”(第 320 页)，他强调这个事实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其他相关的著作里他却说，这段时间的神话研究作品在欧洲泛滥(包括薄伽丘的新版本和其他手抄书)(第 20-21、103、226-228 页)。他排除一些新作品，比如 J. Textor, *Officina*, Basel, 1503，以及 Pictor, *Treatise*, Freiburg and Antwerp, 1532，似乎是不公平的；同理，他说吉拉尔迪在巴塞尔出版的拉丁语手册是“意大利”的书，也是不公平的。

(90) 塞内克注意到镌刻画的重要意义(*Survival*, pp. 203, 209, n. 75)，但他没有详细阐述，(通过木刻和版画而不是实物)间接接触古典模式是恢复逼真形象的原因。已如前述，塞内克赋予丢勒作品关键的角色(*Survival*, pp. 185-187, 209-211)，但那仅仅是通过间接的接触。后印刷语境下重新整合的好例子是，斯特拉达诺(Stradano)的“太阳神阿波罗”以米开朗基罗的“基督升天”为模本。由此可见，塞内克的结论应该做这样的修正：“‘世代相传’但有变异的图像类型几乎处处被放弃了，‘重新发现’的类型以其‘原初的本真’更受欢迎。”“环视周围的世界、聆听本能的声音”(*Survival*, p. 320)不足以认识世界，在 15 世纪和过去的时代都是如此。

(91) 15 世纪晚期《纽伦堡纪事》(*Nuremberg Chronicle*)的编辑谢德尔(Hartmann Schedel)孜孜以求，收藏了大量的古籍，也收藏和复制了许多古文物和图像。见 Panofsky, *Albrecht Dürer* I, p. 31。但就在这本书里，潘诺夫斯基指出，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收藏希腊罗马钱币，借以写经济学论文，却忽视其考古学意义和文化意义。而且，《纽伦堡纪事》的中世纪韵味说明，虽然其编辑谢德尔收藏文物，但他几乎没有受到文物精神的影响。

(92) Seznec, *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 p. 243.

(93) Ibid, n. 89.

(94) 吉拉尔迪(Giraldi) 的《神谱》(*De Deis Gentium*)1548 年问世，由巴塞尔的奥珀里努斯印行。据 Seznec, *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 p. 229 记述，孔迪(Natale Conti)的《神话》(*Mythologiae*)1551 年由威尼斯的马努蒂乌斯印行。

(95) 潘诺夫斯基确定的文艺复兴三百年从 1250 年到 1550 年，见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40。

(96) Julian Franklin, *Jean Bodin*, pp. 6-83 探讨了 16 世纪法国这方面的发展。

(97) Johannes Trithemius, *Catalogus Illustrium Vivorum Germaniae* (1495)是最早的文化编年史的里程碑之一，它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创造了条件。见 Arnold, inttroduction to *De Laude Scriptorum*, p. 7。

(98) 转引自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p. 15, n. 4。这本书的大量内容与上文的讨论有关系。又见 Gossman, *Medievalism*; 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hap. 10; Franklin, *Jean Bodin*, *passim*。

(99) 胡珀特(George Huppert)认为，“法国人文主义者把人文主义头首倒立起来”，开始“欢呼中世纪……”如此，他们打造了“现代历史记述的模式”。见 Huppert, ‘The Renaissance Background of Historicism’, p. 108。

(100)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8.

(101) 从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开始，经过爱德华·吉本直到布尔克哈特，抗拒(抑或是依靠?)哥特式成分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就像古典文化“复兴”的观念一样，哥特式风格的思想起源于手抄书文化，由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用于建筑，由瓦拉用于誊写的书法，最后被推进为印刷的字体。关于哥特这一词的源头，见 Paul Frankl, *The Gothic*, p. 260。

(102) 各种标签的字体比如“古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哥特体”、“尖角体”、“施瓦巴赫体”是“后世作者丰富想象的发明”。见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p. 10。“字体”和“风格”的词源以及谷登堡之后它们被赋予的新义大概能够写成一篇有趣的文章。关于字体风格的选择与“国民性”的特征、通俗语的捍卫和早期哥特式复兴的新思想是有关系的，格朗戎(Claude Granjon)16世纪在法国设计“文明”字体时，就掀起了这样的宣传。见 Carter and Vervliet, *Civilité Types*, p. 15。

(103)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7.

(104) Wardrop, *The Script of Humanism*, pp. 4-5. 关于加洛林时期书写改革家(比如 Boniface)和后来的人文主义者(比如 Petrarch and Salutati)的远见，乌尔曼(Walter Ullmann)做了非常有趣的思考，见 Ullman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cript*, pp. 13-14。据厄普代克(D. B. Updike)所言，老花眼对法国第一台印刷机采用“古体”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见 Updike, *Printing Types*, 1, 83。索邦神学院院长有老花眼，他希望“古体”有助于他校读清样。

(105) 关于修道院用的手写体和大学用的手写体的差别、不同大学所用的手写体的差别，以及不同学科所用的手写体的差别，见 Destrez, *La Pecia*, pp. 44-48。(该书第48页介绍了1227年一本书目里的“古美术体”。)其他的区别见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109-111。

(106) 关于加洛林书写体演变并构成“哥特”体的阶段，见 Updike, *Printing Types*, 1, 50-53, esp. p. 53, n. 1。

(107) Carter, *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 pp. 46-47 对这一过程的阐述尤其清楚。

(108) Carter, *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 p. 71 介绍了菲利奇亚诺(Felice Feliciano)理想字体所持的新柏拉图主义态度产生的影响。菲利奇亚诺(1433-1479)是维罗纳城的书法家和装帧家，与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交好，将一本铭文书献给曼特尼亚，参见马尔德斯泰格(Giovanni Mardersteig)编辑、菲利奇亚诺撰写的 *Alphabetum Romanum*。菲利奇亚诺晚年转入印刷业，在维罗纳城办了一家印刷厂。关于帕奇奥里(Luca Pacioli)、丢勒、托里(Geoffroy Tory)提倡的“几何形”字母表，见本书第六章注释(82)。他提倡在结构理想的字母上描绘比例理想的人体，这就形成了有趣的非古典形式，参见 Tory, Book 2 *Champ Fleury*(1529)。他提倡人们把大写字母A中间那一横尽力放低，以便掩盖依附在字母A上的男性生殖器，以表达“谦虚和贞洁是高于一切的要求”。见 Tory, *Champ Fleury*, p. 48。

(109) Pächt, 'Notes and Observations,' p. 189.

(110) Wardrop, *The Script of Humanism*, p. 42 描绘了印刷术初期的大量字体对各种手写体和

和草书的影响，他赋予手写体和和草书“印刷体那样的恒久性和普遍性”。他还描绘了失业的誊写人如何成为书法家，以及过时的手写体如何保存在书法书或样品书里。机印书放弃的字体保存在供展示的特别字体里和零星的印刷品里，见 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p. 40。

(111) 这一字体被描绘为“最早的人文主义字体”，见 Scholderer，*Fifty Essays*。

(112) 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p. 31；Goldschmidt，*The Printed Book of the Renaissance*，p. 2.

(113) Bühler，‘Roman Type and Roman Print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p. 101. 整篇文章(pp. 101-110)都与以上讨论相关。

(114) Harbison，*The Christian Scholar* 断定，Valla，*De Elegantiis Linguae Latinae* 的出版年代是 1444 年。瓦拉本人也吹嘘说：“我几乎在所有门类的学问中都出版了许多书。”但我个人认为，出版日期的确立应该保留给机印书。从 1471 年到 1536 年，瓦拉的这本书印行了 60 版。同理，虽然他的 *Notes on the New Testament* 是在 1444 年和 1452 年之间编写和修订的，虽然它成了《圣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但它真正起作用是 1505 年之后。那一年，伊拉斯谟在一座修道院里找到其手抄本并将其付印。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出版”究竟是什么意思无论如何还不是很清楚，它可能是大声朗诵或抄写几份。见本书第一章注释(22)。

(115) 哈利·卡特断言，意大利人并不觉得哥特体比罗马体优越，见 Carter，*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p. 89。Bühler，‘Roman Type’，pp. 102-103 列举的大英博物馆馆藏早期机印书目录证明，和一般的说法相反，古典文本用的是“哥特体”，中世纪法律书用的是“罗马体”。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希望得到一本用“古体”字印的亚布拉德(P. Abelard)神学著作，这说明，一位人文主义手抄书的改革家可能会多么的反传统。见 Ullmann，*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cript*，p. 14。

(116)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哥特体或“粗黑”印刷体起源于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圈子，丢勒可能是其中一员，见 Degering，*Lettering*，pp. xvi-xvii。丢勒试图将古典原理和几何构图应用于“哥特体”和“罗马体”设计，Panofsky，*Albrecht Dürer*，pp. 258-259，fig. 7a and b 对此做了说明。格朗戎所谓的“文明”字体以半哥特草书为基础，用于法语的通俗语文本，提倡这种字体的有伟大的学者兼印刷商罗伯特·埃蒂安纳以及和普莱埃德(Pléaide)相关的圈子。见 Carter and Vervliet，*Civilité Types*，pp. 15ff。这些字体被认为是法国人对阿尔定意大利体的回击。

(117) 比如西班牙的萨拉曼卡(Salamanca)提倡“罗马体”，阿尔卡拉(Alcala)提倡“哥特体”。法国印刷商让松(Nicholas Jenson)起初提倡“罗马体”，后来却为自己的威尼斯造印刷机重新配置了“哥特体”。法国的第一台印刷机用的是“罗马体”；但直到 16 世纪中叶，法国的机印书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字体偏好。在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用什么字体的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见 Carter，*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pp. 28，88-89。

(118) 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p. 126. 虽然科隆被贬为“蒙昧人之乡”，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对人文主义者喜欢的古典文本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见 Bühler，*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p. 182。除了其他的印刷所之外，海因里希·昆特尔(Heinrich Quentell)1479 年出

版的印刷书有助于抗衡经院式正统，在文艺复兴之前推动了科隆的人文主义活动。见 Bissels, *Humanismus und Buchdruck: Vorreden Humanistischer Drucke in Köln*; Benzing, *Buchdrucker-Lexicon des 16 Jahrhunderts*, pp. 220, 223。多谢詹姆斯·梅尔(James V. Mehl)未刊的文章'Ortwin Gratius: Cologne Humanist'，该文有一节介绍昆特尔的印刷所。英格兰的罗马字钉和意大利字钉是从科隆进口的，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118 注意到这一事实。和其他地方一样，维滕堡难以决定用哪一种字体。路德著作的第一版用的是罗马体，后来的许多小册子却转用哥特体，见 Goldschmidt, *The Printed Book of the Renaissance*, pp. 214-216。

(119) Lehmann-Haupt, *Peter Schoeffer*, p. 23. 又见该书第 368 页注释 8，其中谈到戈培尔与纳粹的宣传，又谈到德国人对哥特体的喜爱。这样的偏好在 19 世纪的德国不是比希特勒兴起以后的德国更加明显吗?

(120)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p. 436-454 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又见其 book review, *The Library*, p. 302。据 Carter and Vervliet, *Civilité Types*, p. 18 所述，加尔文 1541 年版的《基督教原理》用的是罗马字体，这也推动了这一长久的时尚。又见 Carter, *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 p. 88。

(121) 又见 Black, 'The Typography of Luther's Bible and its Influence', pp. 110-116。

(122) 见 Hay, 'Literature: The printed book', p. 366。又见 Hay, Introduction,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xxvi，该序描绘了意大利字体胜出的过程。他用"文明的"一词来形容罗马字体，说明直到今天人文主义的宣传还在被放大。

(123) Verwey, 'Pieter Coecke van Aelst,' p. 192.

(124)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Summary, p. 118; Carter, *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 p. 89ff. 低地国家用"文明"字体(普朗坦用于莱顿印刷所)印书直到 18 世纪，Vervliet, 'Les Caractères de Civilité et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p. 27 对此作了记述。

(125) 英语报纸用哥特体标题是 18 世纪晚期"哥特体复兴"的产物(归类为"老茶馆"拼写)。Hutt, 'The Gothic Title-piece and the English Newspaper' 的描绘很风趣。哈特赞同"工人阶级"共和党人和激进报刊对这一风格的批判。这篇文章表明，反哥特体的争鸣获得了反贵族的弦外之音，倘若文艺复兴时期的红衣主教和王公赞助人地下有知，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

(126)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 p. 104.

(127) Ibid, pp. 14-17.

(128) (虽然令人遗憾地出错，)印刷术使"固化"文本成为可能，并且为不同解读和翻译的学术讨论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基础，参见 Kenney, *The Classical Text*, p. 69。

(129) Gilmore, *World of Humanism*, p. 185 记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几批著名的藏书散佚的情况。维罗纳图书馆化为乌有的命运并非不典型，让·马比雍(Jean Mabillon)寻觅其遗址也失败了。Leo Deuel, *Testaments of Time*, pp. 45-46 对此作了描绘。

(130) Gay, *The Enlightenment*, 1, 262.

(131) Sailor, 'Moses and Atomism,' p. 4.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卢克莱修的崇拜，见 Gay,

The Enlightenment,1。盖伊(Gay)指出,伏尔泰一人就藏有 6 个版本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其他启蒙思想家也孜孜以求地收藏卢克莱修的著作。

(132) Gilmore,*World of Humanism*,p. 182.

(133)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pp. 13-14.

(134) Ibid,p. 14.

(135) Krinsky,'Seventy-eight Vitruvius Manuscripts,'pp. 34-46. 关于克拉吉特(Clagget)的情况,见本书第 496-497 页。

(136) Wilson,'The Contents of the Medieval Library',p. 85 指出其中的一些困难。

(137) 手写书作者的姓名"极其不稳定,变动不羁,难以把握",关于这一点,参见 Goldschmidt, *Medieval Texts*,p. 86。一个名号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其不同的意思,比如该书第 98 页的《圣波拿文都拉的布道辞》(*Sermones Bonaventurae*)。

(138) Deuel,*Testaments of Time*,pp. 329-32.

(139)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p. 152,n. 20 引述三种马内蒂(Manetti)的《诗篇》手稿,说明"它的流布相当广泛"。

(140) Bolgar,*The Classical Heritage*,pp. 13-14.

(141)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p. 93. 许多权威学者把欧文·潘诺夫斯基的主张应用到广泛的领域。

(142) Panofsky,*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p. 162. 又见 pp. 42,101-103。

(143) 潘诺夫斯基明确摒弃"传输过程中的意外",认为这不足以解释他描绘的偏离,见 Panofsky,*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p. 106。尽管如此,他描绘的那种偏离古典表征传统的现象似乎说明,这些意外事件是如何反复出现的。

(144) Seznec,*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pp. 180,213. 魏茨曼(Kurt Weitzmann)对誊写人和艺术家的分离做了探讨,见其 *Illustration in Roll and Codex* pp. 144,151,160-161。关于古卷上的插图如何迁移到碗碟、墙壁和石棺的讨论,见该书 pp. 5-7。

(145) 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p. 101. 后来的"人文主义建筑"与阿奎那的宇宙观更加协调,13 世纪的尖形拱顶和穹隆形拱顶与阿奎那宇宙观的协调就差一些。这就说明即使在建筑领域,哥特—古典这样的二分术语也可能被用得太滥了。见 Scott,*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passim*。

(146) Panofsky,*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p. 104;Seznec,*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 pp. 185-87.

(147) 据 Jean Destrez,*La Pecia*,p. 44 记述,大量的缩略语使中世纪手书体难以辨认,这反映了书籍生产从修道院向大学的转移。在这里,教士誊写人和世俗的誊写人都为金钱而工作,他们寻求抄写的捷径,以加速生产。我们不妨对古代奴隶劳动的抄书修士为救赎而无偿劳动的抄书和 13 世纪为工资而抄书的变化作一对比。

(148) De la Mare,'Vespasiano,'pp. 64-65.

(149) Le Roy,*De la Vicissitude* 节选,tr. J. B. Ross,*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p. 98。

(150) 抄写簿和笔记簿有重要意义,可以辅助记忆,有助于学习古籍,见 Bolgar,*The Classical*

Heritage, pp. 272-275 对此作了说明。

(151)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2)。

(152) 我心里想到的研究成果本章已经提到的有：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Kelle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Gilmore,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其他参考材料有：Kelley, 'Faces in Clio's Mirror'。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 2 有这样一段话："历史研究方法全都建立在区别原生权威和派生权威的基础上。"虽然这一点区分"到 17 世纪末"才司空见惯，但这一区分的分界线可能是在机印书的次生记录与手写书的原生记录形成对照的时候。

(153) 'Festina Lente,' tr. from 1508 edition of *The 'Adages' of Erasmus*, pp. 180-191, ed. Margaret Mann Phillips.

(154) 关于这个宇宙论的转变，参见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Hiram Haydn, *The Counter Renaissance* 和 Marjorie Hope Nicolson, *The Breaking of the Circle* 讨论了相关的发展，引述了相关的文本。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书第 517 页之后。

(155)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156)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 205.

(157) Weisinger, 'Who Began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p. 629 转引坎皮恩(Thomas Campion)的几段话，赞扬北方人文主义者，同时又贬低愚昧的"修士和托钵僧"。以谷登堡为文艺复兴启动者的倾向受到德国和法国文人爱国情怀的推动，这就为后来误解"文艺复兴"一词铺平了道路，后世误解盖茨的学者有诺代(Gabriel Naudé)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详见本章注释(420)。早期人文主义者发掘湮灭的作者、恢复错乱的作者及其著作，他们走在印刷术发明和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前。这一主题的生动表达见菲利斯·戈登编辑的波焦的书信选 *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比如布卢尼 1416 年 9 月 15 日书简，又见该书第 191 页之后。

(158) 罗伊希林说，没有阿尔定出版社的书助他一臂之力，他就不可能在德国教希腊语。这句话转引自 Deno J. Geanokoplos, *Greek Scholars in Venice*, pp. 297-298。阿尔杜斯向世人发出警讯，他出版的书会使到意大利的游客减少，本书第 180 页已经提到这一名言。说服客居意大利的希腊学者到寒冷的北方去工作颇为困难，探讨印刷术之前的希腊研究时，这是首先必须考虑的一点。

(159) 关于出版商阿尔杜斯和维滕堡大学图书馆，见 Grossmann, *Humanism in Wittenberg 1485—1517*, chap. 7 以及 Schweibert, *Luther and His Times*, pp. 249-253。关于哥白尼，参见本书第 578 页之后。

(160) 布尔克哈特说："希腊化研究者对威尼斯的阿尔定出版社感激不尽。"见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 206。布尔克哈特书中的人名拼写似乎不一致，阿尔杜斯的拼写是意大利语"Aldo"，埃蒂安纳(Estienne)的拼写是"Stephani"。

(161) 关于印刷和翻译希腊古籍的情况，见 Bolga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p. 375；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pp. 16, 96。

(162) 一些教父遗著或古籍的早期机印书是在意大利之外出版的，这些书常常为希腊语留下空白。见 Proctor，*The Printing of Greek*。据 Pattison，*Isaac Casaubon*，p. 111 记述，到 1586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才买到希腊语字钉。

(163) 新近的研究文献积累（主要是莎草纸卷）涵盖了一千年的历史，使学者们注意到影响希腊语和抄本的变化，Deuel，*Testaments of Time*，p. 157 对此做了小结。

(164) 这个观点得到劳里（M. J. C. Lowry）的支持，见其文章'Two Great Venetian Libraries'。劳里说明，很难得到允许去查阅红衣主教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的藏书；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他开始大量藏书，1406 年将藏书遗赠威尼斯。劳里又说明，出版商阿尔杜斯不应该仅仅被当作马尔齐亚纳（Marciana）图书馆的受益者，他也不仅仅是格利马尔迪（Grimaldi）手抄本藏书的受益者。劳里还有一篇更新的文章'The"New Academy"of Aldus Manutiu'，他透露即将推出阿尔杜斯的长篇传记，这篇文章显示，阿尔定出版社的"学院"并不像其他人说的那种实体。

(165) Geanokoplos，*Greek Scholars in Venice*，p. 293. 遗憾的是，书中核心人物从来没有从边缘地位冒出来。作者注意到，几乎书里述及的每一位人物都和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有交往，他又承诺在"稍后一章里"讨论印刷商阿尔杜斯的工作及其意义（p. 60）。虽然每一位和阿尔杜斯交往的人都专辟一章论述，阿尔杜斯反而没有享受到主要的待遇。连阿尔杜斯的传略也和其他的资料纠缠在一起，而且这一章还是用来介绍马库斯·穆苏鲁斯（Marcus Musurus）的。见该书第 116-122、128-132、156-157 页。

(166) Geanakoplos，'Erasmus and the Aldine Academy' in *Greek Scholars in Venice*. 有关伊拉斯谟 1508 年在阿尔定"家庭"逗留的情况很吸引人，但作者对这一幕的描绘是："虽然是高潮，但这是孤例，这是威尼斯传统的中世纪功能，它成为拜占庭和西欧拉丁文化的中介"（p. 134）。但我认为，这一幕揭示了一场重大的文化革命的早期阶段，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去考虑问题。

(167) 这表明高深的学问从大学转向了印刷所。在阿尔定印刷所逗留期间，伊拉斯谟的希腊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后来他转到巴塞尔，在 Bruno Amerbach 的印刷所工作，以寻求希伯来语方面的帮助。伊拉斯谟在研究圣哲罗姆书简里对这一问题的描绘是"赫拉克勒斯的艰辛"，见 *The Adages* pp. 208-209。关于 Johann Amerbach 印刷所的圈子，见 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pp. 218-219 的描绘。

(168) Beryl Smalley，*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p. 44. 又见另外两篇文章：Singer，'Hebrew Scholarship in the Middle Ages'；Box，Hebrew Studies in the Reformation'。比较新近研究中世纪基督教与犹太学术和希伯来学术接触时那种矛盾而复杂的性质，见 Grabois，'The Hebraica Veritas'。

(169) 据 Box，'Hebrew Studies in the Reformation'，p. 333 记述，列维塔（Elias Levita）是"近代希伯来语法的真正奠基人"。他在罗马被洗劫后来到威尼斯，1527 年至 1549 年为丹尼尔·邦贝格工作。Dannenfeldt，'The Renaissance Humanists'指出，丹尼尔·邦贝格赞助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的东方之旅，还赞助了一位卢万城的学者掌握阿拉伯语。关于邦贝格与安特卫普的关系（和普朗坦的圈子交叠），见本书第 468 页之后。关于列

维塔的背景，亦见 Weil，*Elie Lévita : Humaniste et Massorète*(1469—1549)。

(170) Updike，*Printing Types* Ⅱ，p. 98. 印制这一合参本《圣经》的字钉全都是在英格兰铸造的，它们成为 18 世纪东方字体的样板。

(171) 波尔加确认了印刷术为新学科发展奠定基础的意义，见 Bolgar，*The Classical Heritage*，pp. 374-375，但他的论证方式使引述他的人容易忽视印刷术的作用，见 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pp. 4-5。

(172) Weiss，*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Antiquity*，p. 203.

(173)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143. 这段话是其第二卷'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的卷首语，译者 Nelson 和 Trinkaus 指出(p. 8)，这段话含有该书的"基本主题"或"核心"。Huizinga，'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p. 257 也作了类似的判断。Gombrich，*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pp. 19-20 也作了类似的强调。

(174)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chap. 2，n. 130.

(175) Chaytor，*From Script to Print* ，p. 26.

(176) Ortelius，preface，*Message to the Reader*，1606 年英国版的复印件，ed. p. ij。

(177) 如上所示(本书第二章注释(129))，丹尼斯·海伊有一篇意义隽永的文章论制图法对地区群体组合的影响，见 Hay，'Geographical Abstractions and the Historian'，p. 11。但手绘地图与机印地图的不同如何影响政治意识，这个问题尚待讨论。

(178)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143. Colin Morris，*The Discovery of the Individual* 进行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论述，他在 12 世纪的法国发现了布尔克哈特在 13 世纪的意大利发现的一幕。精于选择性地利用史料、善于描绘生动画面的史学家几乎可以把任何时候的任何地区描绘成"个性特征蜂拥而起"的一幕。

(179) Ibid，I，170-171.

(180) 有一个关于行吟诗人的故事相当有趣，诗人恫吓赞助人，要赞助人给他满盆满钵的银子，否则他就要诅咒，使庄稼受灾、瘟疫流行。见 Karl Holznecht，*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Middle Ages*，p. 4。霍尔兹内赫特指出，阿雷蒂诺铅印的敲诈材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发明。

(181) 阿雷蒂诺用书信体促销，见 Mesnard，'Le Commerce Epistolaire'，pp. 17-18。阿雷蒂诺成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格拉布街"的快速兴起，不敬的通俗文学生产所谓"黄色的、低贱者的冒险故事"，见 Grendler，'The Rejection of Learning'，又见其 *Critics of the Italian World*，chap 1。

(182) Mesnard，'Le Commerce Epistolaire'，p. 26，亦见该书第 17 页对文坛的评论，他把文坛叫做欧洲事务里的"第三力量"，意味深长。关于探索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参见本书第二章注释(287)。

(183) 伊拉斯谟是"雄心勃勃"的无名小辈时，努力自我推销，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 400 页之后，那里介绍的雄心勃勃的文学新人有拉伯雷、加尔文等。

(184) 比如 Ullmann，*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Cassirer，'O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Renaissance'；Hauser，*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II，70。1967 年 9 月 29 日

在多伦多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社会与个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会场,涵盖面广,可惜无人提及印刷术的出现。1965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会上,这个论题偶尔现身。

(185) 关于自传体和传记体的兴起,见 Zimmerman,'Confession and Autobiography';Delany,*British Autobio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ap. 2;Fairfield,'The Vocacyon of Johan Bale and Early English Autobiography',p. 327ff。

(186) “天才的艺术家”的观念和“知识产权”的新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Hauser,*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II,70 强调了这一观念。不过,豪瑟似乎不知道如何解释知识产权这一观念,他仅仅指出,它“源自于基督教文化的分解”:他这个命题令人生疑。

(187) 科里的研究公开展示私密思想的矛盾性,给人以启发,见 Colie,*Paradoxia Epidemica*,chap. 12。

(188) Trimpi,'The Meaning of Horace's“Ut Pictura Poesis",'pp. 4-7.

(189) Winter,'Mon Livre et Moi'.

(190) Cassirer,'O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Renaissance'专挑蒙田的随笔探讨,却不将它与印刷术联系起来考虑。Delany,*British Autobiography*,p. 11 描绘了扮演角色的人格与内在“真我”的区别,认为这是一种源头不清楚的新现象。

(191) 见本书第 84 页。

(192) 波普金(Richard Popkin)对塞克斯都·恩批里柯(Sextus Empiricus)的重新发现、古典怀疑传统的复活以及印刷商亨利·埃蒂安纳二世和散文家蒙田的贡献做了研究,见 Popkin,*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pp. 34-35 ;又见 Haydn,*The Counter-Renaissance*,chap. 2。本书第五章将要论述,海登描绘的许多思想潮流似乎与印刷术带来的变化有关系。

(193)复制品有助于“广泛传播”艺术家比如拉斐尔的作品,Shearman,*Mannerism*,pp. 46-47 对此作了论述。关于瓦萨里述及拉斐尔与马坎托尼奥的合作,本书本章注释(32)业已提及。再介绍 1976 年 12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举办的一场相关的展览,展览题名“提香与威尼斯的木刻”。展出的附件'Titian and the Venetian Woodcut'显示:1567 年,提香从威尼斯政府得到版权,荷兰镌刻画家科尼利乌斯·科特(Cornelius Cort)住在他家里为他复制画作。

(194) 随着岁月的流逝,艺术家的绘画、素描和手迹被赋予的价值会越来越高,Hauser,*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II,71 对此作了介绍。他没有提及印刷术在艺术品升值方面带来的影响,不过他引用菲拉雷特(Filarete)的论文说,艺术品的形式好比是手稿书里的书法,可以显示艺术家的手法。

(195) 许多著作研究了相关的手写书,包括但丁对乔托及其后继者的赞扬,要者有 Baxandall,*Giotto* 和 Larner,*Culture and Society*。维拉尼(Filippo Villani)在他对佛罗伦萨公民的赞词里包括了画家。阿尔贝蒂的画论、菲拉雷特论建筑的专著和法奇奥(Bartolomeo Facio)的《论插图画》(*De Viris Illustribus*)都专辟了论画家(含弗兰芒画家)的章节。

(196) 这方面的一部重要作品是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的三卷本 *Commentaries*(积几十年

之心血，1455 年去世时未竟），尤其第二卷书末附录的艺术家自传。见 Krautheimer and T. Krautheimer-Hess，*Lorenzo Ghiberti*；Krautheimer，'The Beginnings of Art Historical Writing in Italy'。Wittkower，'Individualism in Art and Artists：A Renaissance Perspective'引述了吉尔贝蒂的《评论》。又见 Wittkower，*Born Under Saturn*，chap. 3，以及 Gombrich，'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197) Krautheimer，'The Beginnings of Art Historical Writing in Italy，'p. 268；Gombrich，'Art and Scholarship'；Blunt，*Artistic Theory*，chap. Vii，p. 98.

(198) 见 Petrucelli，'Giorgio Vasari's Attribution of the Vesalian Illustrations to Jan Stephan of Calcar'。又见 T. R. Boase 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组织的梅隆讲座中的讲演'Vasari：the Man and the Book，'其中有许多相关的资料。你不妨将瓦萨里为《艺术家列传》所做的调查与法奇奥为《论插图画》所做的研究加以比较（法奇奥慈曾经向波焦请教，询问有关 Giannozzo Manetti 和 Ambrosio Traversari 的情况，见 Kristeller，'Bartolomeo Facio and his Unknown Correspondence'）。关于类似的广度扩张和一版接一版的容量扩张，参见 Vergil，*De Inventoribus Rerum*，维吉尔这本书在 16 世纪后半叶就发行了三十来版，其参照的"文献极其丰富"。见 Denys Hay，*Polydore Vergil*，pp. 56-8。

(199) Einar Rud，*Vasari's Life and Lives* 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200) Pächt，'Early Italian Nature Studies，'p. 26，n. 3 描绘了 16 世纪的药物书混淆作者肖像的情况。

(201) 参见本书第 95-96 页。

(202) 本书第二章注释(135)业已说明，16 世纪的百科全书用比较真实的肖像取代了"刻板的"形象和头像。16 世纪初，利昂一位出版商印行了"肖像图案"，Natalie Z. Davis，'Publisher Guillaume Rouillé'，p. 89 记述了这一出版物。又见 Davis，'Printing and the People'，p. 215。Saerton，*Six Wings* 刊有现代版的 30 幅肖像。该书序文对这些肖像的"真实性"做了说明（p. ix），肖像旁边注明了它们的出处。第 134 页的三幅肖像是为 1542 年福克斯版的"药典"绘图的两位画家和一位版画家。这是早期印刷商盛极一时的自我推销的典型例子。

(203) Larner，*Culture and Society*，p. 266.

(204) 见本书第一章注释(11)对柯蒂斯（Mark Curtis）的相关评论。

(205) 古文本学家对中世纪匿名的誊写人的手稿和署名的人文主义者更加"人性化的文件"的感觉，有着十分强烈的反差，Wardrop，*The Script of Humanism*，p. 3 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沃尔特·乌尔曼对历史情况不敏感，他对中世纪"作家、学者、小册子作者、大法官、建筑师、抄书人"匿名的情况不理解，因而感到"恼怒"，见 Ullmann，*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pp. 32-34。

(206) John Benton ed. and introd.，*S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appendix 1，pp. 229-233 指出，人物的年代、出生地、家庭背景等基本细节的缺乏带来很多麻烦。Tuchman，'Hazards on the Way to the Middle Ages'有一段文字描绘了一位史学家的震撼，非常有趣，由于习惯于现代人生平材料充足的记述，当他遭遇 14 世纪传记材料稀缺的情况时难免会感

到震撼。

(207) Gallick,'A Look at Chaucer and His Preachers,'p. 458.

(208) 沃戈尔(Kurt Vogel)撰写的词条'Leonardo Fibonacci'注意到《算经》(*Liber Abaci*)序文里提到了少数细节。又见 Joseph and Frances Gies,*Leonardo of Pisa*;Ore,*Carnado*。

(209) 卡尔达诺(Carnado)的《我的一生》(*De Vita Propria*)1543 年印行时,离他去世已经过去 67 年。与此类似,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的自传到 1728 年才得以印行。这些出版日期的延后使德拉尼(Paul Delany)在 *British Autobiography* 里讨论这种新文体时,不禁对其重要性大打折扣(p. 7)。但在我看来,虽然这两部自传长期以手写稿的形式流传,但它们反映了印刷文化产生的新特征。

(210)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 pp. 149-50.

(211) Ibid,I, p. 147.

(212) Rose,*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pp. 256-257,罗斯对 16 世纪这一新的发展势头做了探讨。

(213) Gilmore,*World of Humanism*,p. 265.

(214) Panofsky,'Artist,Scientist,Genius,'p. 128.

(215) Bainton,'Man,God and Church,'p. 80.

(216) 进一步的讨论见本书第 564-566 页。(有许多权威描绘了列奥纳多参阅过的技术资料,相关的书名见本书第六章注释(135)。)潘诺夫斯基猜想,如果瓦萨里曾经登门拜访过梅尔奇(Melzi),他就可能见过列奥纳多的解剖草图;这似乎是列奥纳多身后仍然能够对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一书以启示的唯一途径,也是把他描绘为"解剖学创始人"的唯一基础。因为维萨里与在世的艺术家提香的工作室合作,所以他在那里看见的东西对他创作《人体的结构》一书里的图版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即使列奥纳多对维萨里有一些影响,也是间接的。见 Panofsky,'Artist,Scientist,Genius',pp. 142,147-151,n. 269。又见本书第 269 页的讨论。

(217) Panofsky,'Artist,Scientist,Genius,'p. 166.

(218) Maximilian Frumkin,'Early History of Patents'有许多罕见的相关材料,但没有明确探讨印刷术的影响。其他有用的材料见 White,'Jacopo Aconcio'。Rosen,'The Invention of Eyeglasses'考察了中世纪晚期与手抄书文化发明相关的问题(可惜同样没有明确阐述与传播技术相关的问题)。M. I. Finley,'Technical Innovation'概述了古代发展,也有一些有用的参考材料。

(219) Keller,*A Theatre of Machines*,p. 3.

(220) 转引自 Saerton,'The First Explanation of Decimal Fractions and Measures',pp. 189-190。

(221) 这一段长文转引自 Zilsel,'The Origins of William Gilbert's Scientific Method'。几位权威学者注意到,巴黎的制陶商贝尔纳·帕利西(Bernard Palissy)建议读者到他的作坊去免费参观。见 Rossi,*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pp. 70-71; Natalie Z.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p. 216。帕利西的建议恐怕是指望吸引更多潜在的顾客,这一目的比其他的解读更值得注意。

(222) 见本书第二部分对齐尔塞尔(Zilsel)方法论的批评(第 558 页之后),以及对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介绍(第 545 页)。

(223) Natalie Z. Davis,'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p. 215-217. 一位助产士居然出书批评盖仑(无论正误),这就足以说明,古籍的通俗语译本发挥了作用。

(224) Rossi,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pp. 8-9.

(225) 参见塞西尔(Cecil)1559 年书信,转引自 White,'Jacopo Aconcio as an Engineer', p. 430。

(226)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 p. 147, n. 1.

(227) Holborn, *Ulrich von Hutten and the German Reformation*, p. 2.

(228) Wright, *Middle Class Culture* 提供了许多例子,散见各处。

(229) 许多研究描绘了这样的"雪崩"。除了 Wright, *Middle Class Culture*,参见 Gille, *Renaissance Engineers*; Charlton, *Educat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 298; Curtis,'Educ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330) 和手把手传授知识的人比较,图书和图表传授技能自有其不足,Carlo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p. 6 对此作了阐述。(尤其参考他转述奥克肖特[Walter Oakeshott]文章第 176 页的例子。)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本书第 554 页之后。

(231) Morley, *A Plain and Easy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Music*, pp. 9-10.

(232) "静默的老师"是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教授朱伯特(Isaac Joubert)的用语,他重新编印了父亲劳伦·朱伯特(Laurent Joubert)的《外科大全》(*La Grande Chirurgie de M. Gui de Chauliac restituée par M. Laurent Joubert*)(1578)(Tournon, 1598)。Sherrington, *The Endeavour of Jean Fernel*, p. 111 引用了这一说法。朱伯特父子都热情地提倡外科大夫提高业务水平,主张他们多读通俗语写的业务书。见本书第 538-539 页。

(233) Bolga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p. 309.

(234) 科恩(I. Bernard Cohen)评怀特海(Whiteside)等人的 *The Mathematical Papers of Isaac Newton*。关于莱布尼兹如何自学成才,见 Meyer, *Leibniz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pp. 85-86。关于第谷·布拉赫如何自学成才,见本书第 596-597、623-624 页。

(235) 见本书第 387 页以后。

(236)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p. 663-664.

(237) Ibid, p. 659.

(238) 见本章下一节"揭开秘密"。

(239)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 662.

(240) Ibid, p. 659.

(241) 这种异常并非不言自明。早期近代医学未能解决如何对付疾病的问题,这可能导致人们对传统权威的不信任,谋求某种自助。于是,无论"巫术的"或"实用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自助都应运而生了。

(242) Solomon, *Public Welfare*, pp. 175-176.

(243) Gilbert, *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ethod*, p. 73.

(244) 丢勒在纽伦堡博学鸿儒的圈子里享有盛名,他和雷乔蒙塔努斯的后继者舍内尔(Johannes

Schöner)和维纳(Johann Werner)等人过从甚密,Margolin,'La Réalité Sociale',pp. 215-218 作了描绘。Rose,*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pp. 108,116n.,35 记述了丢勒与雷乔蒙塔努斯的后继者的关系。罗斯提到德哈斯(K. H. de Haas)一篇相关的著作 *Albrecht Dürer's Engraving:Melancholia* 1,说明这幅铜版画与德哈斯这位天文学家—印刷商的关系。关于雷乔蒙塔努斯的进一步讨论以及后来纽伦堡印刷商对哥白尼革命的贡献,见本书第 586-588 页之后。

(245) Zilsel,'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pp. 334-335.

(246) Margolin,'La Réalité Sociale,'*passim*。考虑 15 世纪纽伦堡的社会环境时,必须要考虑印刷术的新影响,关于其他忽略印刷术影响的著作,见本书第 403-405 页的进一步讨论。

(247) 萨尔顿将丢勒亲近印刷的态度和达·芬奇讨厌印刷的态度作了比较,见本书第 564-566 页。贡布里希指出,丢勒的名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印刷机的力量,见 Gombrich,*The Printed Book*,pp. 55-56。丢勒"最早的版画"对意大利的铜版画家产生重大的影响,1500 年前夕在意大利开辟了版画印刷的新篇章,奥伯休伯(Konrad Oberhuber)阐述了丢勒在这方面的影响,见其 *Introduction to Early Italian Engravings* 一书的序文,第 xx 页。

(248) Panofsky,*DürerI*,pp. 7-8.

(249) Panofsky,'Artist,Scientist,Genius,'pp. 135-136.

(250) Ibid,p. 136,n. 13.

(251) 在'Music of the Renaissance as Viewed by Renaissance Musicians'和'Music in 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这两篇文章里,罗温斯基(Edward Lowinsky)探讨了区隔唱诗班指挥与器乐手和音乐学者的壁垒。如果考虑印刷术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考虑乐谱和音乐书,我想罗温斯基讨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阐述得很清楚。Santillana,'The Role of Art in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p. 48 指出,建筑在脑体结合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维萨里和菲内尔断言,医学院同样坚持威特鲁威的主题。让·菲内尔认为,医学是涵盖一切领域的艺术:"从地球敞开的内脏到天体的运行都要考虑。"见 Sherrington,*The Endeavour of Jean Fernel*,pp. 3-22。

(252) Panofsky,'Artist,Scientist,Genius,'p. 137.

(253) 本书第 48 页曾经指出,一位手抄书书商贬低机印书,因为他从销售手抄书中获利,他的话经过第二手的反复重述后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都贬低大批量生产的机印书。Durant,*The Reformation* 指出:"贵族反对印刷术,认为它是一种机械的庸俗化,害怕它压低自己收藏手抄本的价值。"实际上,大多数贵族藏书家对机印书和手写书同样积极,常常赋予机印书更高的价值,见 Bühler,*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p. 62。关于密涅瓦作为"印刷术之母和知识女神"的主题,见 N. Z. Davis,'Strikes and Salvation in Lyons',p. 5 对 15 世纪里昂熟练工的节日的描绘。关于后人把密涅瓦作为印刷术的庇护者和秘密智慧的监护者的情况,见本书第 143 页。

(254) 纪尧姆·菲歇致盖冈(Robert Gaguin)的信,这封信成为巴黎第一家印刷所的赠品,和它出版的第二本书同时发行,赠送购书人。这一家印刷所设在索邦神学院里(1470—1472),书名 *Gasparini Orthographia*(作者为 Barzizi Gasparini);转引自 Updike,*Printing Types* 1,84。

(255) 相关资料见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chap. 5, section 111。

(256) Panofsky, 'Artist, Scientist, Genius,' p. 138. 又见 Baron, 'Toward a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 p. 42 类似的探讨。

(257) 古罗马人的论著敦促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的结合，塞尔苏斯(Cornelius Celsus)尤其强调两者的结合(其 *De Medicina* 1481 年在米兰印行)，转引自 Martin Kemp, 'Il Concerto dell'Anima，尤其注意 pp. 116，130。

(258) 见本书第六章注释(46)和(47)。

(259) 据 Frumkin, 'Early History of Patents for Invention', p. 47 记述，古人将实用发明贬为"卑下、低俗、酸朽"，认为这些发明不值得记载。M. I. Finley,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里有这样一段话："唯有舌头得到上帝赋予的灵感，手绝不可能得到灵感。"(pp. 33-34)努力干体力活(包括抄书和誊写)可能对这样的鄙视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反，中世纪教会鼓励修士从事体力劳动，这就可能减少了人们对体力劳动的鄙视。圣威克多修道院的于格在 12 世纪设计了七种"机械技艺"，以便和文理学科的"七艺"对应。见 Kristeller, 'The Modem System of the Arts', p. 175; Chenu, *Nature, Man and Socie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 43。White, 'The Iconology'阐述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对机械艺术的肯定态度。

(260) Eugenio Garin, *Italian Humanism*, p. 24 引述并讨论了彼特拉克的《对医师的恶语》(*Invectiva in Medicum Quendam*)。又见加林该书第 35 页之后有关"艺术争鸣"方方面面的介绍，参考加里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当然，相反的例证也是有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并不那么歧视体力劳动和机械技艺。见 Keller, 'A Renaissance Humanist', esp. p. 345。

(261) 除上文所引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书之外，相关资料见 Zervas, 'The Trattato dell'Abbaco'。泽瓦斯注意到，她描绘的意大利情况与隆·谢尔比(Lon R. Shelby)的几篇文章描绘的北方情况是不一样的。

(262) 有关彼埃罗(Piero)和阿尔贝蒂(Alberti)著作的评论，见本书第六章注释(81)和(82)。

(263) Kristeller, 'The Modem System of the Arts,' p. 182. 又见 Mary Jack, 'The Accademia del Disegn'，该文以她未刊的博士论文(Chicago, 1972)为基础。

(264) 关于中世纪石匠向文艺复兴建筑师的转化，见 Shelby, 'The Geometrical Knowledge,'; 'The Education of Medieval English Master Masons'。至于器乐师和"四艺"教师鸿沟的弥合如何影响音乐人，见本章注释(251)里 Lowinsky 几篇文章的介绍。

(265) Oberhuber, *Introduction to Early Italian Engravings*, p. xv.

(266) 即使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典修辞里的"发明"一词就被文艺复兴理论家移植到绘画领域了。关于这个过程，可参见 Rensselaer W. Lee, *Ut Pictura Poesis*, p. 17 and appendix 2, p. 70。

(267) Blunt, *Artistic Theory in Italy*, p. 56.

(268) 16 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已经在对"批评的牛虻"做出反应，Gombrich, 'The Leaven of Criticism'。又见 Blunt, *Artistic Theory in Italy* 里的相关资料。

(269) *The Divine Michelangelo: The Florentine Academy's Homage on his Death in* 1564 非常

详细地描绘了这方面的学术宣传。

(270) 16 世纪的图书插图迁移到搪瓷、陶瓷、窗户、梳妆台、橱柜和“艺术品”上的情况，有一个突出的例子，见 Jacques Thirion，‘Bernard Salomon’。注意，萨洛蒙(Salomon)的设计反过来借用的又是马坎托尼奥·拉伊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为拉斐尔的画作镌刻的铜版画(p. 65，n. 22)。

(271) 从少数几个母题和原型视觉形式到许多不同的主题和形式汹涌而出，George Kubler，*The Shape of Time*，p. 29 对此作了评述。库布勒把这个转折点确定在 1400 年左右，但他同时指出：“新形式的洪流在 15 世纪初就日益高涨。”我把这一发展势头归之于印刷术的固化功能。他的研究没有提到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折，但包含了一些相关的猜想，比如他对“首要对象与复制品”、“发明与变异”和“审美疲劳”等问题的思考。

(272) 西蒙尼得斯(Simonides)说：“绘画是无声的诗歌，诗歌是有声的绘画。”贺拉斯说：“诗歌像图画。”两人的箴言引起一些混乱。Wesley Trimpi，‘The Meaning of Horace’s“Ut Pictura Poesis”’，pp. 31-34 对此的分析很得要领。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II，182 指出，诗与画的相似性在 16 世纪的论著里“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现”，“其魅力一直维持到 18 世纪”。

(273) R. W. Lee，*Ut Pictura Poesis*，pp. 40-41.

(274) 摘自 G. A. Gilio da Fabriano，*Errors of Painting*(1564)，转引自 Burke，*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p. 28。17 世纪的法国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非常用心地避免这一类历史错误，伯克在书里评述这段引文时强调指出普桑的细心。

(275) 斯特拉坎(James Strachan)在 *Early Bible Illustrations* 里评述布尔戈斯的保罗(Paul of Burgos)所绘诺亚方舟的局部，又评述了里拉的尼古拉(Nicholas of Lyra)的 *Postillae*，这是安东·柯贝尔格等印刷商 1481 年起印制的里拉的尼古拉的作品。斯特拉坎的书(p. 17)评述了女士披肩的插图。插图第 50 借用的是 1506 年在威尼斯印行的捷克语《圣经》的一幅小木刻；这幅木刻画不合自然比例，十分突出，诺亚及其家人的头部与诺亚方舟处在同一平面。

(276) Milburn，‘The“People’s”Bible’，pp. 296-296 介绍了表现肘尺的中世纪词汇及其宗教寓意。

(277) 诸如此类的问题出现在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16 世纪中叶的《圣经》评注里(Basil Hall，‘Biblical Scholarship’，p. 83)，成为后世自由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攻击经院哲学家和直解《圣经》派的弹药。关于诺亚方舟设计的其他问题(需要更多的绵羊为食肉兽提供营养吗？需要多大的空间储存食品和清洗牲畜粪便的工具?)及其巧妙解决办法，阿贝·马雷(Abbé Mallet)为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撰写的“诺亚方舟”词条做了很好的归纳。冷面表演在现代读者身上产生滑稽的效果，无疑是编者刻意引起读者疑问的目的。然而，作者似乎是一位保守的神学家，并不注意他的归纳产生的疑问效果。见 Walter E. Rex，‘Arche de Noé and Other Religious Articles by Abbé Mallet in the Encyclopédie’。雷克斯的文章(p. 340)选用了 1777 年版的《大百科全书》附录里显示几何学原理的“诺亚方舟”插图，图中的诺亚方舟似乎根本就不可能漂浮。

(278) 见本书第 108 页的讨论。

(279) 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里说,文艺复兴人比中世纪人"更了解"中世纪,我们应该用这个观点来修正他这句话。即使经过机器印刷的中世纪文本"更加轻便,读起来更容易",书中的木刻画传达的观点常常和插图画家起初的观点有一点不同,有一点扭曲了。

(280) Seznec, *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 p. 213 和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0 都强调了这个观点。

(281) 一般如此,但并非总是如此。在 15 世纪的乌特勒支,劳动分工极为细致,文本和微型画是分别生产的,微型画的副本经常单独用于出口。见 L. M. J. Delaissé, *A Century of Dutch Manuscript Illuminatio*, pp. 70-71,正如他所言,这些荷兰微型画的经营模式不太像一般手稿插图的经营模式,而是更像画家作品的经营模式。据 Jean Destrez, *La Pecia*, pp. 58-59 记述,中世纪学术书的配图由一位高手指导,他在页边上批注一句话,有时甚至画一幅草图,插图人按照其指示作画。

(282) Ivins,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p. 24.

(283)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32)。

(284) Trénard, 'La Presse François,' pp. 32-33.

(285) 复制勃鲁盖尔(Breughel)的画作'The Ugly Bride'(弗兰芒民间文学母题)的镌刻画被用来配维吉尔的田园诗,这是"极不妥当的",也不知道究竟是出版商、镌刻工还是画家本人的安排。这种图文不匹配的情况给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爵士以灵感,使他创作了《阿卡迪亚》里的滑稽人物。这是麦克菲森(David McPherson)在'A Possible Origin for Mopsa in Sidney's Arcadia'里所做的解读。

(286) Fritz Saxl, 'A Spiritual Encyclopedia', pp. 100-101 指出木刻被随意使用和仆人闯入主人领地的情况。斯坦贝格提到 1572 年版所谓的"notorious'Leda'Bible",认为这一误用很粗心,见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287) Rosenthal, 'The Renaiss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t,' pp. 61-62.

(288) McPherson, 'A Possible Origin for Mopsa in Sidney's Arcadia'认为这是有意的。

(289) 16 世纪的意大利出版了许多"建筑学、数学、医学、解剖学、人像学……"的图文并茂的图书,我们可以为它们写一首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英国歌词作家——译者)式的顺口溜。这是特拉普(J. B. Trapp)在'The High Renaissance at Harvard'中的评论(p. 41)(所论对象是 Ruth Mortimer 的豪华插图本书目第二卷,藏胡夫顿图书馆)。特拉普说:"这是新型的科学—实用书,而不是喧宾夺主的豪华版道德教谕。"

(290) Forbes and Dijksterhuis,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I, 313, 316。该书第 16 章标题"技术走向出版"名副其实。

(291) Keller, '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 p. 22 引用蒙田 1580—1581 年度的报告和那时的其他相关杂志。

(292) Keller, '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 p. 22.

(293) 见凯勒为贝松(Jacques Besson)1579 年版《机器图解》(*A Theatre of Machines*)所作的序文。该书从拉梅里(Agostino Ramelli)的《机器图谱》(*Le Diverse ed Artificiose Macchine*

Composte nLingua Italiana ed Francese)(Paris,1588)选取了 40 幅插图。《机器图谱》有 195 幅整版的图片;后来,它被一位德国仪表制造商鲁波尔德(Leupold)复制、分类和借用来用于自己的多卷本《机器图解》(*Theatrum of Machinarum*)(莱布尼兹,1724-1739)。后来的瓦特(James Watt)又参考了鲁波尔德的《机器图解》并为此目的而学习德语。见 Ferguson,'Leupold's *Theatrum Machinarum*', pp. 64-66。Jacques Proust, *Diderot et l'Encyclopédie*, pp. 177-178 讲述了狄德罗借用拉梅里图谱的情况。

(294) A. R. Hall,'Science,'p. 193.

(295) 法布利齐乌斯(Hieronymus Fabricius)有一段文字说,自然的阀门放入人体血管"颇像人造阀门放进磨房的机器"。转引自 Gweneth Whitteridge, *William Harv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p. 21。这段话至少有将人体和机器作类比的意思。

(296) 见本书第 588 页。

(297) Ivins,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pp. 33-36.

(298) 见本书第 108 页及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299) A. R. Hall,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ppendix A*:'Botanical Illustration,'p. 396。参考这个附录里的文献以及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在这个问题上的参考材料。

(300) 利曼-霍普特生动描绘了两者的反差:笔墨的绘画设计和素描细腻而自然,木刻则笨拙而粗糙。见 Lehmann-Haupt ,'The Heritage of the Manuscript',pp. 18-19。

(301) Hutchinson,'Aposematic Insects',esp. p. 161 探讨了 14 世纪在热那亚附近发现的所谓"科卡雷利手稿"(Cocharelli Ms.),哈钦森转引柯隆比(A. C. Crombie)的论述:这样的旁注文字促进了"现代生物学的兴起"。哈钦森本人描绘了这样一场运动:"出版正式的自然历史论著……从 16 世纪开始……从未停止。"

(302) Pächt,'Early Italian Nature Studies',p. 161 描绘"令人震惊的逼真的动物",惊现于 14 世纪初东盎格鲁人的《诗篇》里的页边上和教士的法衣上。Hall, *Scientific Revolution* 的附录 A 里指出,画家耶尔的奇波(Cybo of Hyères)所作的装饰画和书里的文字没有关系。

(303) 关于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新研究方法,见本书第 469-70、545 页。

(304) 在中世纪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版的植物志里,出现了图文的分离,斯坦纳德(Jerry Stannard)对此进行了讨论,见其'The Herbal as a Medical Document',p. 217。其他参考文献见本书第 454 页。

(305)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52.

(306) 如上所述,伊文思令人奇怪地后悔说,出版《德意志植物志》(*Gart der Gesundheit*)的合作者的名字都不清楚(*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p. 36)。其实,许多第二手的资料都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出版商彼得·舍费尔、法兰克福的医师约翰·冯·库布(Johannes von Cube)和画家厄尔哈特·卢维奇。就在他感到遗憾的那一页书上,伊文思本人就说卢维奇是布雷登巴赫(Breydenbach)《圣地朝觐图》(*Peregrination*)的插图画家。进一步的信息见本书第 86 页相关注释。

(307) 阿尔伯(Agnes Arber)对植物志里新插图的技术进步作了图文并茂的描绘,见其'From

Medieval Herbalism to the Birth of Modern Botany', pp. 317-336。注意图版显示天仙子的三种前后相继的图示。

(308) 露丝·布什(Ruth G. Bush)赠给瓦萨(Vassar)图书馆里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所著的袖珍版的《草本学》(*De Stirpium*)(Basel: Isengrin, 1549)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里面有整整 516 页的木刻,这些插图是福克斯 1542 年豪华版图谱的缩印图。除了拉丁文和德文的手写体图名外,这位 16 世纪的出版商还为这个版本增加了当代法文手写体的图名,显示这个袖珍版是用于田野考察的。

(309) Sarton, *Six Wings*, pp. 137, 144 提供了相关的参考文献。进一步的讨论见本书第 484 页之后。

(310) 关于手绘图与机印图生动的区别,参见 Otto Kurz, 'The Medical Illustrations' 里为理发师—外科大夫使用的"受伤人"(wound-men)图谱。

(311) 伊文思(Ivins)的观点(呼应 Panofsky, 'Artist, Scientist, Genius', pp. 163-164, n. 36)是,卡尔加(Calcar)扮演了主导的角色,奥马利(C. D. O'Malley)却提出异议,见 Malley, *Andreas Vesalius*, p. 124ff。伊文思认为,瓦萨里本人是成就卓著的誊写人,他严格督查手下人的工作,瓦萨里给卡尔加记功一说是不可信的。这场辩论一直有人检讨,Kemp, 'A Drawing for the *De Fabrica*' 根据新的证据做了重新评估,他认为,瓦萨里的记述比奥马利的争辩更可靠。

(312) O'Malley 和 Saunders 将《人体的结构》(*De Fabrica*)描绘为"伺服机制",见两人合编的 *Leonardo da Vinci on the Human Body*, pp. 20-21。

(313) A. R. Hall,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p. 41-50.

(314)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印刷术出现之后,大量素描书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文艺复兴时期图像常规的形成,参见该书第 157-167 页。

(315) 见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pp. xi, 276, 299。又见帕尔特(Robert Palter)对哈里斯(E. E. Harris)的 *Hypothesis and Perception* 的评论文章。帕尔特指出,贡布里希对丢勒程式化犀牛(被康拉德·格斯纳借用来作为动物学书籍的插图)的评论本身倾向于过度程式化(pp. 208-209)。

(316) 亚历山大图书馆技术资料尤其托勒密地理学的再发现,对 15 世纪艺术家新的透视表达具有重要的意义。Edgerton 的 *The Renaissance Rediscovery* 和 Gadol 的 *Leon Battista Alberti* 展示了这样的意义。我觉得,加多尔低估了印刷术对测地学和地图绘制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她将印刷术的功能限定于使"小册子出版的数量更多"(p. 171)。不过,她清楚说明,阿尔贝蒂早期在 15 世纪 30 年代的罗马所做的制图学、测量学和地图绘制工作对文艺复兴时期图像常规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317) Panofsky, 'Artist, Scientist, Genius,' p. 146.

(318) Ibid, p. 128.

(319)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6.

(320)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少数学者能接触到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天文学占有特殊的地位,参见本书 536 页的讨论以及第七章注释(98)。

(321) Yates, *Art of Memory*, p. 340. 又见她相信古埃及数学与力学效率的有趣叙述，Yates, 'The Hermet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Science', pp. 259-600。

(322) 关于如何界定石匠的所谓"秘密"的问题，见 Shelby, 'The "Secret" of the Medieval Masons'。

(323) 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认为纺织工、面包师或园艺师都是"炼金术士"，Rossi, *Francis Bacon: From Magic to Science*, p. 20 有这样的记述。

(324) Bolga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p. 180.

(325) 林·桑代克(Lynn, Jr. Thorndike)两卷本的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对此做了详细的描绘。他认为，印刷术产生很大的恶劣效应——使伪科学的东西充斥图书市场。本书第 529 页将有所讨论。

(326) 转引自 Clapham, 'Printing', p. 385。莫克森(Joseph Moxon)的 *Mechanick Exercises* 从 1667 年开始以丛书形式刊布(1683 年出了合订本)，是技术出版上的里程碑。他对印刷术的记述特别令人注目，后来被融入 *L'Encyclopédie* 的相关条目。1652 年，他造访阿姆斯特丹(并参观布劳的印刷所)，考察印刷术，然后在孔希尔开办工厂制造地球仪和仪器。E. G. R. 泰勒对此做了描述，见 Taylor, *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pp. 231-233。

(327) 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姆提亚努斯·卢弗斯(Mutianus Rufus)坚持小心谨慎的立场，避免在有生之年发表任何著作，F. E. Baumann, 'Mutianus Rufus', pp. 567-598 就此作了详细的介绍。他参考的主要著作是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该书指出从奥秘到公开的富有哲理的态度转变(p. 33)。我则认为，这个转变建立在印刷术的基础上，对早期近代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尚待研究。

(328) 见本书第 563 页。

(329) Rossi, *Francis Bacon*, p. 27.

(330) 比较长的引文及讨论见本书第 562 页。

(331) 转引自 Rossi, *Francis Bacon*, p. 27。其他相关的参考材料(包括就智慧之珠提出的警告)也在这段话里。John Dee 在"Monas Hieroglyphica"的末尾请求印刷商限制印数，因为其中隐藏着不为"庸人"所知的"秘密"，见 Trattner, 'God and Expans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p. 23。

(332) Yates, *Bruno*, p. 407. 她认为，伊萨克·卡索本(Isaac Casaubon)1614 年给赫耳墨斯式神秘著作重新断代，并证明这批文献是在后基督教时代编辑而成的，所以她认为，这一事件"粉碎了文艺复兴时期巫师的立足之地"，迫使赫耳墨斯式的神秘传统潜入底层。

(333) 在其他复杂的区别里，"下层社会"一词很复杂；总体上说，在早期近代欧洲思想史里，不同的权威人士用它所指的现象五花八门、迥然不同。Yates, *Giordano Bruno* 里的所指是知识界根据新的证据和共识的规矩决定的新疆界来划定的区域。更常见的用法是指明显具有颠覆性的区域，但这个颠覆性区域不是学术精英确立的，而是由官方的审查人决定的，这些审查官判定秘密图书贸易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知识界人士识被迫转入"地下"；在天主教地区，新教学者比如伊萨克·卡索本就是"地下"作家。

(334) Yates,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p. 207.

(335) Ibid. ,pp. 74,91. 第一篇《玫瑰十字会宣言》(*Fama Fraternitas*)用四种语言发布,在 1614 年至 1617 年间印行了 9 版,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回应",Allen Debus,*Science and Education*,pp. 21-24 对此作了评论。又见 Debus,'The Chemical Debat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他和耶茨两人都注意到,福卢德(Robert Fludd)第一次在印刷品里露面(在莱顿市巴松印刷所的支持下出版,该公司和"爱之家"会社有联系,见本书第二章注释(297)),这是他对"看不见的"会社的回应,也是为了捍卫该会的行动,他还击路德派经院学者利巴维乌斯(Andreas Libavius)对玫瑰十字会的抨击。利巴维乌斯和写化学教材的帕拉切尔苏斯论战。关于印刷品如何进入两人的论战,参见 Hannaway,*The Chemists and the Word*。利巴维乌斯主张公开披露观点,反对帕拉切尔苏斯的神出鬼没,见该书第 84 页。关于利巴维乌斯的教谕式态度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印刷出版的书籍,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沃尔特·翁神父研究拉米斯的路子,见该书第 112-113 页。帕拉切尔苏斯对印刷词语持矛盾的态度,他善于利用印刷术和镌刻术,同时他又谴责书本学习,汉纳维的书却没有把帕拉切尔苏斯的矛盾态度表现出来。关于奥本海姆的出版商德·布莱为福卢德和迈克尔·梅耶尔(Michael Maier)印制的豪华版的图文并茂的书籍,见 Yates,*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chap. 6。德·布莱的一位女婿叫威廉·菲齐尔(William Fitzer),他印行了哈维的《论血液循环》(*De Motu Sanguinis*)。他的一位女婿是瑞士的镌刻家马修·梅里安(Matthieu Merian),梅里安为迈克尔·梅耶尔(Michael Maier)的《亚特兰大·弗金斯》(*Atlanta Fugiens*)做插图(Oppenheim;de Bry,1618)。关于德·布莱印刷所和韦谢尔家族(Wechels)印刷所都在法兰克福经营时彼此的关系,见 R. J. Evans,'The Wechel Presses',pp. 12,28。这个家族出版了利巴维乌斯的对手帕拉切尔苏斯派别的奥斯瓦尔德·克罗尔(Oswald Croll)的著作,本书第 474 页将就此进行讨论。

(336) Yates,*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p. 103.

(337) 在巴塞尔印刷商弗洛本的引荐下,帕拉切尔苏斯获得了医师的职位,他雇佣奥珀利努斯做自己的副手。关于克罗尔和维谢尔出版社的关系、弗卢德和莱顿市的巴松出版社的关系以及德·布莱和奥本海姆出版社的关系,本书第 275 页的注释已经做了说明。关于约翰·迪伊在安特卫普出版商西尔维尔斯家长期逗留以及特里特姆斯使用美因兹出版社的情况,参见本书第 15、44、223 页相关注释。在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里,耶茨把许多线索归之于英国的约翰·迪伊,但我认为这些线索的原生地是欧洲大陆。毕竟,特里特姆斯对巫术和密码的研究走在约翰·迪伊之前。又见本书第 547 页之后对卢卡·帕奇奥里(Pacioli)的讨论。

(338) Rossi,*Francis Bacon*,pp. 17-19;Yates,*Giordano Bruno*,pp. 107-111;Nauert,*Agrippa and the Crisis of Renaissance Thought*,*passim*.

(339) Yates,*Giordano Bruno*,p. 107.

(340) 如果这样出书,他们甚至可以成为学者和印刷商兼于一身的名人。人们曾经把谷登堡的助手约翰·富斯特与浮士德博士的历史原型联系在一起;如今,这个长期流传的传说不再有人相信(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61)和(163))。这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巫术师获得了新的地位和角色。印刷术本身起初被认为是"巫术"发明。

(341)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 362.

(342) 在 *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 的序文里，德雷克·普莱斯(Derek Price)介绍了罗杰·培根的著作里使用的记忆术、离合诗字谜和密码。见 Price, *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 pp. 182-832。

(343) 关于和名称及词源相联系的神秘—巫术性质，参见 F. Borchardt, 'Etymology', p. 417。

(344) 其他的编纂有西比林的先师(Sybilline Prophecies)的《奥菲士》(*Orphica*)、毕达哥拉斯的《卡尔米纳先兆》(*Carmina Aurea*)和《巴比伦神谕》(*Oracula Chaldaica*)。关于这些文献，沃克(D. P. Walker)在他主编的 *The Ancient Theology* 的序文"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里都有论述(p. 27)。据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研究，奥菲士颂歌里的神名隐藏在自然力和神力的名称里。

(345) Blau, *The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passim*. Yates, *Giordano Bruno*, pp. chap. 5; Spitz, 'Reuchlin's Philosophy'。关于斯皮兹(Spitz)的秘术研究如何进入了罗伊希林关于《圣经》构成的理论，见 W. Schwartz,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Biblical Translations*, pp. 64-82。

(346) 主要的著作是匿名出版的《揭开元音点标记的秘密》(*Arcanum Punctationum Revelatum*)，作者是索穆尔神学院的教授、胡格诺教徒路易·卡佩尔(Louis Cappel)。关于元音点的有争议的作品至少可以追溯到 1560 年安特卫普出版商普朗坦编辑出版的合参本《圣经》，到达高潮则是在 17 世纪初，参见本书第 332 页。伊萨克·卡索本的著作被发现并出版之后十年，Cappel 的 *Mystery of the Vowel Points Revealed* 问世，这就将赫耳墨斯式的文献置于后基督教时代，说明犹太秘术和赫耳墨斯秘术的亡佚大约发生在同一时期。在 17 世纪，"旧的巫术系统被剥夺了满足精英的能力"；虽然这一点和他的中心主题相关，但托马斯的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中只是简单地提及(p. 645)。

(347)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 271.

(348) Yates, *Bruno*, p. 107 提到皮柯(Pico)谴责的态度，他摒弃"盗用所罗门、摩西、以诺或亚当名义兜售的邪恶的巫术"。

(349) Giorgio de Santillana, , book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该文有一些观点预示他和赫瑟·狄尚(Hertha von Dechend)稍后合作的 *Hamlet's Mill*。两人认为，古代许多神话意在传播有关长期、缓慢的春分秋分的信息。

(350) 阿尔定出版社的早期出版物和古籍手稿由博厄斯(George Boas)编辑并翻译，见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pp. 22ff。又见 Erik Iversen, *The Myth of Egypt*, pp. 48-49, 151, n. 34。亦见 Madeleine David, *Le Débat*。

(351) 这一次讨论是伊拉斯谟引起的。他描绘阿尔杜斯让他看大主教皮埃特洛·本博(Pietro Bembo)的一枚罗马银币，书面镌刻着泰特斯·韦斯巴西亚诺(Titus Vespasiano)的肖像以及锚和海豚。伊拉斯谟写道，根据"象形文字图书"的解释，锚和海豚的寓意是"急而稳"，曾经是奥古斯都的座右铭。接着他又探讨银币上刻印的符号(见菲利普斯翻译的 1508 年版的伊拉斯谟《格言集》[*Adages*]第 174-176 页)。于是，伊拉斯谟刺激了读者对象形文字书籍的兴趣，他还在这本《格言集》里宣传出版社的商标。

(352) Iversen, *The Myth of Egypt*, p. 65ff。又见贡布里希对菲奇诺(Marsilio Ficino)象形文字

观点的评论，见 Gombrich，'Icones Symbolicae'，pp. 171-172。

(353) 罗萨里奥(Raúl Rosarivo)在《炼金术符号》('Simbolos Alquimicos')里描绘了印刷商借用的炼金术符号(比如猎犬、鹈鹕等)的习惯。因为这些符号充满中世纪基督教的寓义，又辅助记忆，所以在给它们贴上"炼金术"的标签时，我们需要留下很大的不确定性余地。见本书第 260 页对"勒达"插图版《圣经》的讨论。

(354) 阿尔恰提(Alciati)的《浮雕装饰》(*Emblemata*)掀起了强劲的时尚之风，这股风与阿尔定出版社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有关，阿尔定利用这些手段来表现含蓄的意义——关于这股风，参见 Goldschmidt，*The Printed Book of the Renaissance*，pp. 85-86。又见 Praz，*Stud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ery*，p. 23ff。关于丢勒为马克西米连皇帝的凯旋门作的镌刻画上使用象形文字的情况，参见 Panofsky，*Albrecht Dürer*，I，177。

(355) Walker，*The Ancient Theology*，p. 192 告诫世人，不要夸大卡索本断代的摧毁性效应。

(356) Trevor-Roper，review essay，*History and Theory* (1966)，p. 80，n. 32。特雷弗-罗珀指出，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前后不一致：他赞扬"卡索本大师的杰作"，卡索本显示"秘义书不会比伪作好"，可是稍后评论赫耳墨斯的预言时，罗利又平静地说："赫耳墨斯与摩西、琐罗亚斯德同时代或稍后……"一方面他鄙弃"伪书"，另一方面他又拥戴圣贤的古籍。看来，罗利的评论可能前后不一致。

(357) Walker，*The Ancient Theology*，p. 193，转引自 Gerard Vossius，*De Idolotria* (1642)。

(358) Yates，*Bruno*，p. 431. Shumaker，*The Occult Sciences*，p. 210 指出，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埃及的宗教教义并未在这批秘义书中"准确而详细地保存下来"，但这句话又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359) Yates，*Bruno*，pp. 427-31 对库得沃斯(Cudworth)观点的讨论。沃克显示，17 世纪的法国方济各会借用这个观点。*The Travels of Cyrus* 的作者 André Michel Ramsay 宣告，方济各会将在 1737 年着手编纂一部《万用词典》(*Universal Dictionary*)。参见 Walker，*The Ancient Theology*，pp. 231，241。

(360) Manuel，*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fronts the Gods*，p. 191.

(361) Ibid.，p. 190.

(362) Iversen，*The Myth of Egypt*，pp. 86-97。伊维尔森称基歇尔(Kircher)为"埃及学真正的奠基人"，认为基歇尔的贡献超过曼努埃尔(Manuel)，应该更受尊敬。

(363) Manuel，*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fronts the Gods*，pp. 189-190.

(364) Peter Tompkins，*Secrets of the Great Pyramids* 引述了 1638 年格利弗斯(John Greaves)丈量金字塔所得的数据(格利弗斯稍后成为牛津大学的萨维里安教授)，又引用了布拉蒂尼(Tito Livia Burattini)丈量金字塔所得的数据，布拉蒂尼是威尼斯人，受基歇尔神父派遣去埃及。该书有一篇斯特齐尼(L. C. Stecchini)编制的附录，附录说明，解读象形文字隐藏意义的艺术存续至今。斯特齐尼最早解读"埃及大地测量学"获得的洞见来自于阅读"受犹太秘法家影响的意大利启蒙科学家"(p. 301)。

(365) 诺克(A. D. Nock)为《赫耳墨斯秘义书》所作的序言揭示了这一点和该书的关系，见 Nock，introduction，*Corpus Hermeticum*，1，i-ii。

(366) Sprat,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p. 5. 关于翻译家们抨击拉丁文、捍卫通俗语的讨论，见本书第四章。

(367)转引自 Manuel, *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 p. 409, n. 17。

(368) Madeleine David, *Le Débat*, pp. 31-37 介绍了古代多种文字和现代人试图发明的普世语言混淆的情况。

(369) Panofsky, 'Artist, Scientist, Genius,' pp. 129-120. 顺便需要说明的是，很多这样的"超常的混杂"仍然在酝酿——只需看一看奥秘书读书俱乐部发行的小册子，只要看一看波林根出版社正在大量刊布的图书，你就可以体会到这样的酝酿了。

(370) Shumaker, *The Occult Sciences*, p. 205.

(371) 可以列举的束缚有 1277 年巴黎大主教谴责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言论。关于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和皮柯(Pico)围绕"赫耳墨斯秘义书"的有始无终的辩论，参见 Walker, *The Ancient Theology*, chap. 2。

(372) 罗杰·培根相信从亚当到琐罗亚斯德、赫耳墨斯等再到所罗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一直到阿维森纳传承下来的启示；Paolo Rossi, *Francis Bacon*, pp. 69-70 对此作了介绍。但罗杰·培根手里并没有掌握皮柯归之于赫耳墨斯、琐罗亚斯德、柏拉图等人的全部著作，见 Walker, *The Ancient Theology*, pp. 12-13。关于菲奇诺翻译的古代手稿和早期机印书的概况，参见 A. J. Festugière, *La Révélation* II, 1-28。关于勒费弗尔·戴塔普尔 1494 年印行的菲奇诺翻译的《创世记》(*Pimander*)，见 Walker, *The Ancient Theology*, pp. 67-69。

(373) 见本书第 196-199 页塞内克的解释。

(374) Shumaker, *The Occult Sciences*, p. 204.

(375) 除了 Yates 的 *Bruno* 和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之外，特别注意 McGuire and Rattansi, 'Newton and the "Pipes of Pan"', 以及 Walter Pagel, *Paracelsus*。至于批评，参见 Mary Hesse, 'Hermeticism and Historiography'; Robert S. Westman, 'Magical Reform and Astronomical Reform'。进一步的讨论和文献见本书第八章注释(15)和(16)。

(376) Yates, *Art of Memory*, p. 168.

(377) Shumaker, *The Occult Sciences*, pp. 208, 235.

(378) 关于对乌尔人语言的信仰，斯坦纳(George Steiner)做了总体上很有用的论述，见其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尤其第二章。

(379) 比如上文(本书第二章注释(255))所举的"阿门"的紧缩式，见 J. Finegan, *Han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 p. 57。Shumaker, *The Occult Sciences*, p. 254 批评中世纪人"令人注目的不足"，说他们未能意识到诗歌是暗喻式的而不是直陈事实的；在这里，他忽略了印刷术发明之前韵律和诗歌承载的功能是表现事实。

(380) George Boas,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p. 22. 根据 Gombrich, 'Icones Symbolicae', p. 183, 17 世纪的教士仍然认为，象形文字来自于逻各斯。有些 16 世纪的法国人认为，这些符号是赫耳墨斯发明的，意在隐藏神学真理。见 Walker, 'The Prisca Theologia in France', p. 232。

(381) Shumaker, *The Occult Sciences*, p. 205 暗示，中世纪人赋予古代巨人思想上的优越性是事后才想到的——附加在有关他们长寿和博学的传说之上。我认为，他强调的似乎是这些古代先贤的最不重要的特征。

(382)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隽语第 125 条。

(383) Gilmore, *World of Humanism*, p. 199.

(384)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p. 49.

(385) 至少，其人为性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中叶。此后，历史哲学家用新内容去填充“自然衰变”的主题；受到前所未有的、持久的传播革命造成的新压力时，他们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去抵挡。若需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请见我的文章‘Clio and Chronos’, pp. 36-65(esp. p. 57)。

(386) Shumaker, *The Occult Sciences*, p. 255.

(387) 转引自 Burns, book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8), p. 181。

(388) 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389) 布卢瓦的彼得(Peter of Blois)语，转引自 Chenu, *Nature, Man and Society*, p. 90。

(390) 引自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p. 40。布鲁诺早些时候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见 Butterfield, *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 pp. 37-46。

(391)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p. 145.

(392)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 430.

(393)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9. 薄伽丘赞扬乔托时，实际上是在重新编织他从但丁那里演绎出来的一个主题，这一点参见该书第 13 页。

(394) 艺术史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仿照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普林尼的模式打造的，贡布里希在 *Norm and Form* 里对此做了探讨(pp. 100-101; pp. 1-10)。参见巴克桑德尔(Baxandall)最新、最富有启迪意义的长篇专著 *Giotto* 和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15th Century Italy*。

(395) 据 Baxandall, *Giotto*, pp. 62-63，彼特拉克抄写普林尼的 *Natural History* 里有大量的评注，有关画家阿佩利斯(Apelles)的段落尤其多评注。

(396) Cited in Chabod,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p. 153.

(397) Mommsen,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Dark Ages”,’ p. 228. 潘诺夫斯基承认，莫姆森这篇颇具影响的文章是他做类似解释的基础，见 Panofs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p. 10, n. 1。

(398) 西蒙(Franco Simone)语，转引自 Mommsen,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Dark Ages”’, p. 227。

(399) 见 Richard and Rouse, ‘The Texts Called Lumen Anime’, pp. 12, 22。这些布道辞之一是彼特拉克客居阿维尼翁时由教皇钦定的。关于阿维尼翁在彼特拉克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对选集和简编的厌恶，见 Simone, *The French Renaissance*, chap. 1, esp. p. 47。

(400) 见本书第 215 页洛夫乔伊(Lovejoy)所做的解释。

(401) Panofsky, ‘Erasmus and the Visual Arts,’ p. 201. 潘诺夫斯基有一个新黑格尔主义的欲望，那就是证明基督教、哥特式和经院哲学的中世纪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关于这一点，贡

布里希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见 Gombrich，*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p. 28。

(402) 彼特拉克试图回归纯净的古典源头，借以强化基督教真理，他从来不曾想，古典真理和基督教真理可能会分道扬镳。西蒙强调指出彼特拉克的这个追求，见 Simone，*The French Renaissance*，p. 47。

(403)《黑死病》(Black Death)讲述了佩鲁贾、锡耶纳和帕维亚各城邦的瘟疫，这场瘟疫和学问的衰败有关系，这是否促使早期人文主义者觉得刚刚过去的时代是黑暗时代呢？见 Campbell，*The Black Death*，pp. 149，161。

(404) Mommsen，'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Dark Ages"，'p. 395.

(405) 见本书第三章注释(68)对皮克罗密尼(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的介绍。

(406) Gray，'Renaissance Humanism，'p. 503.

(407) 彼特拉克语，转引自 Panofsky，*Renaissance and Renaissances*，p. 10。

(408) 关于彼特拉克对记忆术的关切，以及这一关切如何使他与阿奎那联系起来，参见 Yates，*Art of Memory*，pp. 109-113。汉娜·格雷描绘了对记忆丧失的关注(在一切手抄书文化里都显得突出)如何进入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如何进入复兴和"雄辩术追求"的思想，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思考。赖斯(Eugene F. Rice)认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认为雄辩术是一种"固化剂"，见其'The Humanist Idea of Christian Antiquity'，p. 130。

(409) Panofsky，*Renaissance and Renaissances*，pp. 10-11.

(410) 修士们没有把古代看作黑暗时代，让·勒克莱尔对此作了描述，见 Jean Leclercq，*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passim*。关于记忆术被用于基督教的教谕目的(包括记颂布道辞)，见 Yates，*Art of Memory*，pp. 55-57，85。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象被用来代表需要记忆的事物的类群，见该书第 250 页。

(411) 早期的基督教神父被认为是古典文人，赖斯对此作了阐述，见 Rice，'The Humanist Idea of Christian Antiquity'，p. 130。奥古斯都核定了异教和基督教的界线，但 14 世纪的多明我会在评论 *City of God* 时却模糊了两者的界线，Smalley，*The English Friars*，pp. 61-63 对此作了描述。

(412) 关于薄伽丘良心的危机，见 Meiss，*Painting in Florence*，chap. 7。

(413) 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对古罗马文化可能遭到的破坏表示关切，佛罗伦萨的狂热分子"焚毁虚荣的书"，这使人文主义者感到沮丧。彼特拉克本人有一部装饰精美的手稿就在 15 世纪 90 年代的狂热中被人付之一炬。见 Wardrop，*The Script of Humanism*，p. 9，n. 1。

(414) 从"精神的和抽象的"逻各斯关怀和神性关怀过渡到了对道成肉身的更加"自然主义的"关怀，这可以从中世纪艺术里看出来，Ernst Kitzinger，*Review of Ladner's Ad Imaginem Dei: The Image of Man in Medieval Art* 对此作了讨论。又见 Charles Trinkaus，*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该书举例说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使上帝人性化并使人神化的倾向。这场运动发生在手抄书文化里，被放大、强化并转向印刷文化的语境。

(415) Mommsen，'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Dark Ages"，'p. 241.

(416) "中世纪历史"一语似乎有时代错乱，其含义是"相当远的而且已经结束的篇章"，而不是"前不久的动乱时期"。早期人文主义者所谓的"中世纪"是用来描绘"世俗的复兴"和"近

代的"文化。特林考斯(Trinkaus)的评论很有见地,见其'Humanism, Religion, Society: Concepts and Motivations of some Recent Studies', p. 684。

(417) Gay, *Enlightenment*, p. 259.

(418) Chaytor, *From Script to Print*, p. 1.

(419) 见本书第 165 页引自沃恩克(Warnke)的一段话。

(420) 米什莱所谓"文艺复兴"一语涵盖的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他走在布尔克哈特的前面(Simone, *The French Renaissance*, pp. 33-34 以及 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pp. 177-78 均已指出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将诺代的实践和孔多塞的实践结合起来,诺代用"文艺复兴"指称法国文化的一个阶段,孔多塞的世界史放弃了"文艺复兴"一语。米什莱将孔多塞的第八阶段更名为"文艺复兴",这个阶段从印刷术的发明到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时代。见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Ⅶ, introduction, chap. 7 and 17。(米什莱坦承,作为印刷商的儿子,他信仰印刷术,见 pp. 294-295,这把他和孔多塞联系在一起;孔多塞《纲要》[*Esquisse*]的第八阶段一开篇就"讴歌印刷术",见 pp. 177-183。)布尔克哈特重复米什莱的语汇,直到同一时期(伽利略等人的时代),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中走的是反向的道路,完全绕开印刷术,而且只停留在意大利。他以彼特拉克的"复兴"开篇,大量引证手稿书书商韦斯巴西亚诺(鄙视新出现的印刷机)的回忆录,把米什莱"文艺复兴"名目下的一切发现都归功于意大利。("意大利优先"这一主题对历史科学起到干扰注意力的作用,本书第五章将就此进行论述。)由此可见,布尔克哈特将"文艺复兴"这一标签重新用于描绘意大利的那场运动,他这个标签是法国历史学家用得不太妥当的"文艺复兴"标签。此外,布尔克哈特还将意大利手抄书文化的"复兴"与世界史上的一切"复兴"联系在一起;相反,孔多塞所说的"复兴"则始于印刷术。

(421)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p. 40.

第四章

(1) Arthur Dickens, *Reformation and Society*, p. 51.

(2) Louise Holborn, 'Printing,' p. 1.

(3) Geoffroy Atkinson, *Les Nouveaux Horizons*, p. 57. 又见 Bohnstedt, *The Infidel Scourge of God*。

(4) Spitz, *The Religious Renaissance*, pp. 84-85. 又见 Hajo Holborn, *Ulrich von Hutten*, p. 42。

(5) 路德语,转引自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 432。

(6)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语,转引自 Aston, 'Lollardy and the Reformation', p. 169。又见 Aston, 'John Wycliffe's Reformation Reputation', pp. 23-52。根据这篇文章的记述,福克斯追随"约翰·巴尔的足迹",赞美威克里夫的人使用"光明的暗喻"。日内瓦版的《圣经》的译者序提到"上帝揭示的光明",这句话表明,早期人文主义者承认第一代学者—印刷商对《圣经》研究的贡献。见 Berry, imtroduction, *The Geneva Bible*, pp. 10-11。

(7) 转引自 Strauss,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 584。经院哲学将宗教包裹在黑暗之中,以后德国人睁开眼睛看这个主题,胡腾在路德登场之前围绕罗伊希林和"蒙昧人"的论战

中已经提出这个主题。见 James Overfield,'A New Look at the Reuchlin Affair',p. 205。

(8) Plattes,'A Description of the Famous Kingdome of Macaria'(1641),见 Charles Webster, *Samuel Hartlib 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p. 89。如果和路德的"世界毁灭前的最后一把火"比较,普拉特斯这一解释提供了一个从千禧年到乌托邦运动的极好例证,恩斯特·图维逊(Ernst Tuveson)对此作了描绘;不久前,韦伯斯特在《伟大的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第一章里也对此作了描绘(韦伯斯特在该书第 47 页上指出,《马卡利亚王国》的作者是加布里埃尔·普拉特斯,而不是萨缪尔·哈特立伯)。

(9) 福克斯提出的图式闻名世界,他强调的是印刷术,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pp. 54,97 对此做了讨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曾提及教皇控制的"黑暗王国"与"仙女、鬼怪和精灵的关系",Wille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p. 96 作了转述。

(10) Haller, *The Elect Nation*,p. 110,转引自 Foxe, *Book of Martyrs*。又见 Heath, *The English Parish Clergy*,p. 193。

(11) Elton, *Reformation Europe*,p. 15.

(12) Iserloh, *The Theses Were Not Posted* 并没有证明九十五条论纲这件事不存在,但它认为,当代人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些论纲的确贴在门口。Heinrich Grimm,'Luther's"Ablassthesen"',pp. 139-150 认为,的确有一张手写的"论纲"贴在门口,但时间是 11 月中旬,而不是 10 月 31 日。Harold Grimm,'Introduction to Ninety-Five Theses', *Career of the Reformer*,I,22-23 说:"论纲是先印刷后张贴的。"然而,路德的"论纲"究竟是用铁钉钉在门上还是印制以后邮寄出去的,这个问题迄今尚无定论,McNally,'The Ninety-five Theses of Martin Luther,'p. 461 n. 1 指出了尚无定论的现状。我想,它们起初究竟是用手复制还是用印刷机复制,这个问题同样尚无定论。读者无论如何要查阅海因里希·格林(Heinrich Grimm)文章提供的文献。

(13) Myconius, *Historia Reformationis*, in Hans Hillerbrand, ed. and tr. *The Reformation*,p. 47.

(14) 路德 1518 年 5 月书信,载 Hans Hillerbrand, ed. *The Reformation*,p. 54。又见 Roland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pp. 63-64,贝因顿认为,"路德没有采取措施在民众里传播他的论纲……","他张贴这些论纲时,心里并没有想要普及这些观点"。

(15) Hans Hillerbrand, ed. *The Reformation*,p. 32.

(16) 席勒布兰德(Hillerbrand)分析了路德抗议教皇的消息不胫而走的原因,见'The Spread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又见 Kortepeter,'German Zeitung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115。

(17) 根据 Harold J. Grimm,'Introduction to Ninety-Five Theses',pp. 22-23 和 Ernest C. Schweibert, *Luther and His Times*,p. 315 记述,率先印行路德著作的是维滕堡的约翰·谷登堡。但 Heinrich Grimm,'Luther's"Ablassthesen"',p. 142 却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说,维滕堡没有适合的印刷商,所以路德不得不转向莱比锡的印刷商雅各布·坦纳(Jacob Thanner)。坦纳对谷登堡印刷术的评价不高,认为它不太适用,与之对立的是格罗斯曼(Grossman)在'Wittenberg Printing,Early Sixteenth Century'里表达的观点(p. 181)。关于印刷商的资料,1508—1525 年活跃于维滕堡的约翰·劳-格鲁能伯格(Johannes Rhau-

Grünenberg)，见 Josef Benzing，*Buchdrucker-Lexicon des 16 Jahrhunderts*，p. 181。然而无论如何，统一的看法是：到 1517 年 12 月，三位印刷商已经刊布了路德的著作，他们是纽伦堡的霍尔泽尔(Hölzel of Nuremberg)、莱比锡的坦纳(或赫比珀伦西斯[Herbipolensis])和巴塞尔的佩特利(Heinrich Petri)。

(18) Heinrich Grimm，'Luther's "Ablassthesen"'，p. 145 指出，三个版本的同时印行可能受到"一只指挥手"的指引。纽伦堡的"斯托皮兹研究会"(Sodalitas Staupitziana)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克里斯托弗·舒贝尔(Christoph Scheurl)和卡斯帕·纳特泽尔(Kaspar Nutzel)在刊布路德的"论纲"中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版本既有德语版，也有拉丁文版。几位权威学者对此做了评述。见 Bebb，'The Lawyers，Dr. Christoph Scheurl and the Reformation in Nuremberg'，p. 59；Strauss，*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 160ff。

(19) 1518 年 3 月 5 日路德致舒尔(Scheurl)的信，转引自 Schweibert，'The Theses and Wittenberg，'p. 142，n. 55。

(20) Heinrich Grimm，'Luther's "Ablassthesen"'，p. 144. 据格林记述，路德不认可莱比锡版本，且表示惊讶；他的意图是只让巴塞尔和纽伦堡出"论纲"。既然巴塞尔的佩特利从维滕堡的朋友那里得到"论纲"，既然斯陶皮兹(Staupitz)圈子承印了纽伦堡版本，路德的"惊讶"给我的印象是他不真诚。(格林这一段话难以和他所谓的"一只指挥手"协调。)

(21) 1517 年 5 月 6 日，路德致信舒尔说，他出版的忏悔诗德语译本针对的是"粗鲁的撒克逊人"，而不是有修养的纽伦堡人；看到纽伦堡人读他的《忏悔诗》，他感到沮丧，见 Grossmann，'Wittenberg Printing'，p. 73ff。其他相关资料亦见格罗斯曼这篇文章。

(22) Nauert，'The Clash of Humanists and Scholastics，'p. 7. 又见其'Peter of Ravenna'。(该文详细描绘了校园内的辩论如何转变为更加广泛的公众争鸣，p. 639。)

(23) 伊拉斯谟有一幅很好的工作像，显示他在巴塞尔的弗洛本印刷所工作的情景，周围簇拥着一群人，他们阅读伊拉斯谟写下的文字，当场就作出回应，见 Tracy，'Erasmus becomes a German'，p. 288。

(24) 1519 年 6 月 2 日庇突斯致茨温利的信，收入 Hans Hillerbrand，ed. *The Reformation*，p. 125。(又见该书第 123 页之后关于"九十五条论纲"的通信。)关于茨温利组织销售路德书籍的情况及其他相关资料，见 Hillerbrand，'Spread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p. 274。

(25) Rupp，*Luther's Progress to the Diet of Worms*，p. 54.

(26) Stone，*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in England*，p. xxii 探讨了这样的区分。

(27) G. R. Elton，*Reformation Europe'*，p. 15.

(28) Gravier，*Luther et l'Opinion Publique*，p. 19.

(29) Aston，*The Fifteenth Century*，p. 76.

(30) 胡斯(John Hus)和威克里夫与路德之间不仅有一个技术发现相隔，而且还有时间、环境和信仰的隔离，Aston，*The Fifteenth Century*，p. 50 已经对此予以说明。除了以上引文外，又见 Dickens 在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第二章里的探讨，以及亨利·豪瑟(Henri Hauser)《新教的诞生》(*La Naissance du Protestantisme*)里的相关讨论(第 51 页之后)。

(31) Arthur Dickens，*Reformation and Society*，p. 37.

(32) 见于19世纪版的《殉道者列传》(*Book of Martyrs*),转引自 Loade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ensorship,p. 15。

(33) 莱夫(Gordon Leff)在 *Heres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里指出,异端要在附近的天主教会的语境中去界定,它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共生,只能在这个语境下生存。新教反叛以后,异端与中世纪教会一道终结。但究竟异端如何"进入宗教改革",莱夫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福克斯等人发起罗拉德派的复活,他们充分利用印刷术,重印文本,撰写赞词,亚瑟·狄更斯、阿斯顿等人对此作了研究。韦尔多派如何推进加尔文教义(比如印行奥利维坦的法语版《圣经》)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法国南部早期的新教浪潮进入韦尔多派宣传、通俗语《圣经》和《诗篇》已经渗透的地区,LeRoy Ladurie 的 *Les Paysans*,I,334 已对此做了说明。(该书题名"文字的道路"那一节充满了相关的材料。)Carlo De Frede 的《16世纪意大利的印刷术与宗教改革》(Per la Storia della Stampa nel Cinquecento in Rapporto con la Diffusione della Riforma in Italia)勾勒了印刷术对意大利异端的影响。关于胡斯派的中欧的遗存与复活,见 Gravier,*Luther et l'Opinion Publique*,pp. 22 and p. 220,n. 16。

(34) 在1962年的洛亚蒙研讨会上,曼德罗(Robert Mandrou)在《异端的传播》(La Transmission de l'Hérétsie)一文里已经提出这条分析思路。他探讨印刷术超越时空传播异端的作用,又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印刷品:16世纪异端创始人采用的学术性大部头、小册子和张贴都值得更加广为人知。感谢 J. B. 罗斯提醒我注意这一很重要的文章,遗憾的是,我是在写完本章以后才得到这一信息的。

(35) Geoffrey Elton,*Policy and Police*,p. 206.(又见该书第171页之后的延伸讨论和相关资料。)许多其他研究注意到克伦威尔及其圈子对印刷术的利用,描绘他们如何提倡通俗语版本的《圣经》和其他小册子。

(36) 关于如何向一群誊写人口授以复制文件去宣传政治论战的问题,Willard,'The Manuscripts',pp. 274-277 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

(37) 围绕对印刷术的不同态度而产生的新教—天主教文化分歧,本书第409页之后有进一步的探讨;关于科学文献出版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八章。

(38) J. Daniélou,A. H. Contratin and John Kent,*Historical Theology*,p. 233.

(39) 见本书第118页罗伯特·金顿有关腓力二世和普朗坦版的《每日祈祷书》的记述。

(40) Binz,*Vie Religieuse*,I,338-356 仔细考察了一个主教管区改革的情况,指出印刷术带来的特别有利的条件——尤其可以买到 Guy de Montrocher 的 *Manipulus Curatorum* 而不必由教区牧师用手抄写之后的情况。

(41) 比较 Jean Delumeau,*Le Catholicisme*,pp. 227-292。德鲁默这个主题和奥康内尔(Marvin O'Connell)的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阐述的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见 Eric Cochrane,Book 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7),7,p. 88。我觉得,如果考虑印刷术的影响,两位作者的观点就可以兼容。

(42)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完成三百年后,一直未能取代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的《教父名言集》(*Sentences*);到了16世纪,《神学大全》才成为教材,Knowle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p. 182。Kristeller,*Le Thomisme*,pp. 36-39 有一句话

是:“托马斯主义的第二阶段始于15世纪晚期;在德意志的多明我会教友中,《神学大全》开始取代《教父名言集》。”到这个阶段结尾时,耶稣会士和特伦托公会议的教父们采用了《神学大全》。《教父名言集》之所以四面楚歌,部分原因会不会是它更适合手抄书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呢?

(43) Evennett, *The Spiri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p. 32-34.

(44) Arthur Dicken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p. 28. 又见该书第19页对15世纪90年代开始的托马斯主义复兴的记述。

(45) Dicken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pp. 25-26. 16世纪50年代,腓力二世推行国家万能论,使西班牙神秘主义书籍的出版溪流暂时受阻。见 H. J. Martin, *Livre à Paris*, I, 17-20。

(46) Evennett, *The Spiri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p. 17-19. 15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拉蒙·吕尔(Ramon Lull)的著作大量印行,这一时尚在1510年左右进入法国。见 J. M. Victor, 'The Revival of Lullism', pp. 530-531。

(47) 里加尔(Peter Rickard)论述了马蒂兰·科尔迪埃(Mathurin Cordier)的《布道辞校勘》(*De Corrupti Sermonis Emendatione*),见 Richard, *La Langue Française au Seizième Siècle*, p. 2。

(48)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8 引述这一段话时,没有把意思讲清楚。关于罗勒文克(Rolevinck)与一位科隆印刷商的合作,见 Richard B. Marks, 'The Significance of Fifteenth-Century Hand Corrections' 和本书第一章注释(38)。

(49) 引自 *The Storm* (1704), by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p. 103。

(50) 转引自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80。

(51) 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p. 128. 关于路德如何利用这一主题,以及布道与印刷的关系问题,见本书第373-374页。

(52) 参见 M. S. Khan, 'The Early Bengali Printed Books,'; Barnett, 'Silent Evangelism'; E. E. McDonald, 'The Modernizing of Communication'。又见 Boxer *et al*. *Exotic Printing*。

(53) 比如 Hirsch,转引自'Bulla Super Impressione Librorum',1515引述的文本和参考文献。

(54) 转引自 Tentler, *Sin and Confession*, p. 21。

(55) 《心灵之镜》(*Peycht Spigel*)这本小书二百来页,读起来不容易。藤特勒(Tentler)还在《罪孽与忏悔》(*Sin and Confession*)里讨论了一本篇幅略短的、用拉丁语而不是通俗语写的《教区牧师手册》(*Manual for Parish Priests*)。他认为,《教区牧师手册》实际上比《心灵之镜》触及了更多俗人的生活。因为《心灵之镜》旨在绕开牧师,所以其隐含的意义更具革命性。Steven Ozment, *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 pp. 22-28 对机印的忏悔书的其他方面做了探讨。他强调指出,用图画书戏剧性地表现对罪人的惩罚使改革家们感到不快。

(56) 标准的参考资料有:Crosby, 'Oral Delivery in the Middle Ages'; Root, 'Publication before Printing'; Chaytor, *From Script to Print*, *passim*。又见佛罗伦萨人有趣的记述:1373年,薄伽丘每天(假日除外)朗诵但丁的《神曲》,转引自 Harry Bober, 'Boccaccio's Dante', p. 969。当然,古代哲人争辩过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的不同规则(比如 Trimpi, 'The Meaning of Ut Pictura Poesis' 里的引语)。当出版书籍再也不是一人口授或朗诵多人誊写时,两种话语的差别就更加鲜明了。

(57) Preus, *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p. 5 以后和 Tavard, *Holy Writ*, p. 3 提供了相关的资料。Teeple, 'The Oral Tradition that Never Existed'证明，这个传统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58) 有趣的是，路德派认为，《圣经》的"精髓"并没有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Preus, *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pp. 17-18)。麦克卢汉坚持说，媒介和讯息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似乎与天主教教义更协调，而不是和新教教义协调。沃尔特·翁强调手抄书文化的神启性质，手抄书文化设计完美，意在确保圣言"通过历史而实现最大限度的在场"，见 Wong,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pp. 190-191。

(59) 摘自 1545 年 3 月 22 日教皇关于接受《圣经》和使徒传统敕令的初稿，转引自 Herbert Jedin, *A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p. 403。

(60) 早期的一个例子见皮亚琴察的约翰(John of Piacenza)编辑的 *Psalterium Graecum cum Versione Latina*(1481 年 9 月印行)。该书序文里有一封致贝加莫主教(Bishop of Bergamo)的信，序言捍卫对《圣经》文本的批判态度，反对"愚昧"人的观点：《圣经》不应该受制于语法。Beriah Botfield, ed. *Praefationes*, pp. 13-14.

(61) 伊拉斯谟致亨利·布洛克(Henry Bullock)的信，in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p. 405。

(62)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pp. 240-241.

(63) Kinser, 'Ideas of Temporal Change,' p. 738.

(64) 转引自 Baker, *The Wars of Truth*, p. 93。

(65) Barnes, *Jean Le Clerc*, p. 111. 但美国浸信会教徒至今认为，摩西五经出于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摩西，见 *New York Times*(Thurs,, June 4, 1970), pp. 1, 9。

(66) Preserved Smith,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1543-1687*, p. 255.

(67) 关于现场听众消失的影响，见 Bronson, 'The Writer'；又见 Trimpi, 'The Meaning of Ut Pictura Poesis'以及 Tigerstadt, 'Furor Poeticus'。

(68) 汉娜·格雷相信，《福音书》作者的文采很重要，所以瓦拉(Valla)努力恢复《新约圣经》的原貌，纠正代代相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伊拉斯谟试图继续瓦拉勘误的工作。见 Gray, 'Valla's Encomium', pp. 49-50。

(69) 这是约希姆·荣基乌斯(Joachim Jungius, 1587—1657)的非难，转引自 Preserved Smith,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 263。17 世纪的路德教条主义者认为，断言语法错误和瑕疵使经文失色是渎神，见 Preus, *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pp. 64-66。

(70) 今天的一则涂鸦之作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把现代作者的观念用于《圣经》。据《时代》杂志 1970 年 4 月 13 日第 61 版载："上帝没有死！他活着，今天就在布论塔诺(纽约市第 110 地铁站)写《圣经》。"同一期《时代》杂志(第 58 版)报导，一个用电脑计算的研究报告云，《以赛亚书》由一位先知完成的可能性只有十万分之一。

(71) 引自 Thoams Bambridge, *An Answer to a Book Entituled Reason and Authority*(1687), in L. I. Bredvold,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John Dryden*, p. 96。

(72) Gay, introduction to *Deism*, p. 9。

(73) 语出伏尔泰《五十人布道书》('Sermon of the Fifty'),in Gay,*Deism*,pp. 154-156。

(74) 新教徒还抨击教士告密(见 Arthur Dickens,*Reformation and Society*,p. 73 对殉道者威廉·廷代尔的讨论),但新教徒反对教阶体制是为了维护他们对《圣经》的信仰。伏尔泰对神圣历史的激愤观点对天主教辩护士的怀疑论做了新的戏说;这些辩护士使徒靠攻击理性来支撑信仰,他们反对新教徒对《圣经》的依赖。一位名叫阿杜安(Jean Hardouin)的偏执的耶稣会士(他在耶稣会大学接受教育)可能给伏尔泰做了铺垫,他怀疑 14 世纪之前的一切《圣经》文本,并声称,这些经文全部是"无神论修士"伪造的。见 Robert R. Palmer,*Catholics and Unbelievers*,p. 66。阿杜安的"病态"怀疑并不止于《圣经》。他研究金属辅币上的"铁证"并断言,几乎一切古籍都是 14 世纪一帮意大利人伪造的。见 Momigliano,'Ancient History',p. 16。

(75) Rice,'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p. 143. 又见 Anthony Blunt,*Artistic Theory*,pp. 108-109,布伦特认为,反宗教改革前的教会对异端的绘画作品所持的态度"令人吃惊地宽宏大量"。

(76) 在《印刷术五百年》(p. 234)里,斯坦贝格勾勒了"宣教会讲演堂"(1626 年创建)的情况;他指出,法国革命摧毁了罗马教会的职能,把令人难忘的印刷设备迁入国家印刷局。关于同一时期"宣教"(propaganda)一词的世俗化问题,参见 James Leith,*Media and Revolution*,pp. 11-21。

(77) 17 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弗朗索瓦·维隆(François Véron,1575-1625)的论点特别有说服力。见 Richard Popkin,*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又见 Preus,*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p. 127ff;Bredvold,*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John Dryden*,p. 78ff。

(78) 提勒努斯(Tillenus)1606 年批驳一位法国主教如是说,因为主教支持不成文传统,且质疑《圣经》。转引自 Bredvold,*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John Dryden*,p. 777。

(79) Sykes,'The Religion of the Protestants,'pp. 178-179.

(80) Nyhus,'Caspar Schatzgeyer.'他与奥西安德尔(Osiander)的论战见第 201 页。

(81) Smalley,*The Study of the Bible*,p. 366; Samuel Berger,*Histoire de la Vulgate* p. 329;and Branner,'The Soissons Bible Paintshop.'这些文献传达的印象都是相同的:巴黎版本的"修订"是有利的,而洛韦(Raphael Loewe)传达的印象却没有那么好,见其'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Latin Vulgate',p. 134ff。洛韦认为,这个"严重衍文和错乱的版本""在一定意义上是专门或正式编辑发行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弊端,那仅仅是因为它是巴黎书商不负责任大规模誊写的结果(p. 147)。根据 Sutcliffe,*Jerome*(pp. 99ff),"通俗语版本"(textus vulgatus)常用来指称巴黎 13 世纪的校订本。在中世纪,直到 16 世纪,"Vulgate"(拉丁文《圣经》)一词才用来专指圣哲罗姆编订的古本。但在中世纪,它既可能指古拉丁语的文本,又可能指圣哲罗姆翻译的文本。

(82) Basil Hall,'Biblical Scholarship,'p. 67.

(83) Black,'The Printed Bible,'p. 438.

(84) Basil Hall,'Biblical Scholarship,' p. 69. 据 Loewe,'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Latin Vulgate',p. 152 记述,克雷芒八世版本的拉丁文《圣经》的基础是 13 世纪的巴黎版,错讹甚

多，见本章注释(81)。

(85) 语出 Alphonse de Castro, *De Justa Haeriticorum Punitione* (Salamanca, 1547), in Cavallera, 'La Bible en Langue Vulgaire', p. 55。

(86)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 423.

(87) Daniel-Rops,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p. 47.

(88) Kingdon, 'Patronage, Piety and Printing ,' p. 26.

(89) Ston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p. 77. 又见 Foster, *Traditional Cultures*, p. 146。新教对识字的强调是早期近代一个重要的变量，参见 Foster, *Traditional Cultures*, pp. 414-415, 421-426。

(90) Cameron, 'The Attack on the Biblical Work of Lefèvre d'Etaples';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p. 88-89; Anselm Hufstader, 'Lefèvre d'Etaples'; McConica, *English Humanists*, p. 217; Nauert, 'Peter of Ravenna' and 'The Clash of Humanists and Scholastics'; Nyhus, 'Caspar Schatzgeyer.'

(91) Basil Hall, 'The Trilingual College.'

(92) Rekers, *Benito Arias Montano 1527—1598*, p. 25.

(93) Ibid, p. 52.

(94) Ibid, p. 63, n. 1. 有关拉菲伦吉乌斯和普朗坦及蒙塔诺两人的关系，见该书 pp. 95-96。该书提出的证据说明，奉国王腓力二世之命，西班牙教士蒙塔诺到安特卫普去监察普朗坦的印制工作，但在共事的过程中，他卷入了非正统教义网络，竟然在腓力二世卧榻之旁组建了一个颠覆性的"分部"。见本书第 443-445 页。

(95) Louis Cappel 的 *The Mystery of the Vowel Points Revealed* (*Arcanum Punctationum Revelatum*) 和稍早之前蒙塔诺的论文一样，是在莱顿印行的(1624)。见 Preserved Smith,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p. 250-251; Barnes, *Jean Le Clerc*, p. 26。17 世纪关于元音点的争论见 Preus, *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p. 141ff。

(96) Whereas Sykes, 'The Religion of the Protestants' 指出，西蒙被逐出教会，但 Crehan, 'The Bible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pp. 218-220 却说，西蒙是 1678 年自己脱离奥拉托利会的。至于西蒙的研究工作，见 Preserved Smith,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p. 254-256。又见 Paul Hazard, *La Crise*, I, 243-264。西蒙稍后出版的评注本《新约圣经》(1702)加速了以波舒哀为首的自主论教会与保罗·庞恰夏雷恩(Paul Pontchartrain)为首的官方的斗争，这场争论关乎宗教著作的审查权，争论的结果是大主教波舒哀败阵。见 John Woodbridge 的新作 'Censure Royale et Censure Episcopale'。

(97) Hendricks, 'Profitless Printing.' 又见 Martin, *Livre à Paris*, I, 9; Kingdon, 'Christopher Plantin and His Backers', pp. 311, 314-315; Basil Hall, 'Biblical Scholarship', p. 54。

(98) Martin, *Livre à Paris*, II, 894. 关于科学出版计划，见本书第八章。法国天主教修道院院长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强烈反对荷兰《圣经》学者从事的东方研究，Bréhier, 'The Formation of our History of Philosophy', p. 161 作了评述。你得到的印象是：尽管 17 世纪以前天主教徒编订了合参本《圣经》，尽管稍后波朗德派(Bollandists，比利时耶稣会士小团

体——译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这样的耶稣会士展示出令人惊叹的学问,在17世纪和18世纪,借用希伯来语和东方语言的《圣经》研究主要还是由新教推动的。

(99) Crehan,'The Bible in the Catholic Church,'p. 223.

(100) Henri Hauser,*La Naissance du Protestantisme*,p. 58. 又见 Droz,'Bibles Français',pp. 210-215。

(101) Auerbach,*Literary Language*,p. 269 强调,中世纪的拉丁语不是"死亡了的语言",它仍然是"活的语言",16世纪的一些家庭比如埃蒂安纳家族在日常会话里还在用,见本书第447页。所谓"哥特式"通俗语的字母表是乌尔菲勒斯(Ulfilas)在翻译并誊写《圣经》时发明的,许多中世纪的变异体出现在近代的通俗语里,成为早期印刷术复制图书的字体,见本章注释(148)。"口头记忆"传统很强大,足以使誊写人记住圣哲罗姆拉丁文《圣经》里大段的古拉丁文。见 Loewe,'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Latin Vulgate',p. 104。韦尔多教派(Waldensian)也用这一字体来教不识字的教徒读《圣经》。

(102) 据 Kenyon,*Books and Readers* 记述,羊皮纸替代莎草纸主导地位的时间几乎完全和基督教发展的一千年(400—1400)吻合。他还认为,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具有重大意义,帝国范围内对《圣经》的大量需求也具有重大意义(pp. 113-114)。Reichmann,'The Book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p. 55 断言,羊皮纸卷在罗马帝国的图书生产有较大发展,但在用于誊写《圣经》前并不普及。

(103) Gandz,'The Dawn of Literature,'p. 495.

(104)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p. 495.

(105) 鉴于托马斯·布朗勋爵(Sir Thomas Browne)把诺亚方舟、金牛犊、天赐圣餐等相关的一切麻烦问题全部归咎于撒旦,所以浮士德的比喻似乎特别恰当,这个比方对布朗和他的同时代人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见 Willey,*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pp. 57-58。

(106) Starnes,*Robert Estienne's Influence*,pp. 13,17,33.

(107) D. R. Jones,'Aids to the Study of the Bible,'appendix I,524.

(108) Voët,*The Golden Compasses*,1,60.

(109) Hendricks,'Profitless Printing',pp. 110-113 描绘了这篇预告书。关于这篇预告书和斯普拉特主教为皇家学会写的辩护词的相似性,见本书第695页。关于1645年巴黎版的合参本《圣经》,见 Martin,*Livre à Paris*,I,100。关于所有这些合参本,又见 Darlowe and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110) Preserved Smith,*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p. 251.

(111) 研究《马太福音》里"Q"和"M"及其区别以后,连《登山宝训》都难以确定作者了。见'The Man Behind the Sermon',*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Feb. 27,1964),p. 175。

(112) Basil Hall,'Biblical Scholar ship',p. 63;见 Bouyer,'Erasmus in Relation to the Medieval Biblical Tradition,p. 499 和 Metzger,*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pp. 102-103 相关数据。16世纪后期,所谓"普遍接受的文本"("textus receptus")所指为何?究竟是伊拉斯谟的希腊语《新约圣经》,抑或是贝扎和埃蒂安纳合作的校勘本呢?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清楚。据梅茨格考证,这一说法首见于艾尔西维尔在莱顿为伊拉斯谟的版本所做的广告词。见 Jarrott,'Erasmus's Biblical Humanism',p. 121,n. 14。据 Kenney,*The Classical Text*,

pp. 59-60 考证，丹尼尔·海因休斯(Daniel Heinsius)担任艾尔西维尔的学术编辑，这个广告词出自海因休斯。肯尼强调需要一个基础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各种文本的偏离。

(113) 在许多文本里，“圣言之书”(the book of God's word)和“圣行之书”(the book of God's works)常常并列，这一现象可以回溯到中世纪的布道辞文献里。Francis Bacon 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第一卷‘To the Kings’那篇文章提供了许多例子。该主题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下一章第一节。

(114) 引自 Hillerbrand, ed. *The Reformation*, pp. 59-60。

(115) 理查德·本特利答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 *Remarks upon a... Discourse of Free Thinking*, 引自 Gossman, *Medievalism*, pp. 227-228。

(116) Richardson, ‘The Rise of Modem Biblical Scholarship, p. 301.

(117) Delaissé, *A Century of Dutch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p. 16.

(118) Aidan(即红衣主教 Gasquet), ‘Roger Bacon and the Ladtin Vulgate’。

(119)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59.

(120) Schwarz,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pp. ix-x.

(121) Smalley, *Study of the Bible*, p. 44. 又见 Smalley *English Friars*, p. 56。

(122) Loewe,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Latin Vulgate,’ p. 134.

(123) Smalley, *Study of the Bible*, p. 357.

(124) 伯埃提亚的底比斯拉丁大主教(Latin Archbishop of Thebes in Boetia)(1336-1385)建议编纂古三语的《圣经》，这个文本有一篇希腊语的残卷，这一工程“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见 Singer‘Hebrew Scholarship’, p. 301。

(125) Morison, ‘The Learned Press as an Institution,’ p. 154.

(126) 见上一章就印刷术对这两种永久性恢复有何影响的讨论。Bouwsma, *Concordia Mundi*, pp. 88-89 探讨了 1311 年维也纳的教会会议关于多语研究的指令，这一指令在巴塞尔的教会会议上又得到重申，证明拉蒙·吕尔对这样的决议产生了影响。鲍斯玛把这样的影响归之于其他因素而不是印刷术，但他指出，维也纳会议的指令本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为自 1460 年起，教皇《克莱芒五世判令集》(Constitutiones Clementinae)就在很频繁地印行了。

(127) Basil Hall, ‘The Trilingual College,’ pp. 115-116.

(128) 参见康拉德·佩利根(Pellican)在多明我会牧师会礼堂的挫折，他试图在雷根斯堡抄写一份《塔木德经》及其词汇单，但被禁止，理由是：抄书人接触异端的著作可能会受到伤害。又见 Nyhus, ‘Caspar Schatzgeyer’, pp. 188-189。据 Grendler, *The Roman Inquisition*, pp. 52-53 记述，1553 年教廷下令焚烧一切《塔木德经》，威尼斯人的顺从导致犹太著作在威尼斯的出版出现了十年的断档。

(129)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95. 参见本书第 144 页所述伊拉斯谟与朋友的“共谋”。

(130) 沃尔夫冈·斯图伯(Wolfgang Stuber)为路德做的一幅镌刻画很流行，他描绘的路德享有丢勒笔下“圣哲罗姆在书房”那样的地位(见 Bluhm, *Martin Luther, Creative Translator*

卷首插画),这样的描绘也充满历史的反讽。和伊拉斯谟一样,斯图伯、丢勒、路德的历史地位归因于印刷术,早期基督教圣贤绝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媒介。

(131)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101.

(132) Droz, 'Bibles François', p. 211 探讨了勒费弗尔的法语版《圣经》,叙述了它从 1523 年第一次印行(由罗伯特·埃蒂安纳的继父西蒙·科里内刊布)到 1569 年上禁书目录的情况。

(133) Droz, 'Bibles François,' pp. 214-15. 据德洛兹介绍,这本小册子出版于 1554 年,以后又出了许多版本。

(134) 注意特伦托红衣主教在 1546 年 3 月 17 日的会议上说的话:"教会可能错;使徒保罗不会错。"见 Cavallera, 'La Bible en Langue Vulgaire', p. 41。关于特伦托公会议上围绕通俗语《圣经》的分歧,又见 Schmidt, *Liturgie et Langue Vulgaire*, p. 85ff; Droz, 'Bibles François', pp. 209; Herbert Jedin, *A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p. 67ff。热丹反复把会上的争论形容为"烫手"。它的确导致烧书和烧人。

(135) 克雷汉(Crehan)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尤其含糊其辞,见其'The Bible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p. 199ff。

(136) Greenslade, 'Epilogue', pp. 490-491.

(137) Schmidt, *Liturgie et Langue Vulgaire* 指出,新教徒说早期教会接受通俗语,那是时代错乱,因为古人没有"语言学原理"的感觉(p. 179ff)。Bouwsma, *Concordia Mundi*, pp. 241-42 指出,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急于用一切可能的语言翻译《圣经》,这使他偏离了天主教"神圣真理由僧侣照管"的重心,使他转向新教的立场。(还使他进入了普朗坦的非正统圈子。)所以,波斯特尔(Postel)赞赏圣哲罗姆,喜欢引用早期翻译成亚美尼亚语、科普特语等语言的基督教文献;他用法语做弥撒遇到了麻烦。

(138) Schmidt, *Liturgie et Langue Vulgaire*, pp. 130-134 描绘了特伦托公会议上的争辩,说明反通俗语一方的精英和权威的立场延伸到保护拉丁文学了,他们认为拉丁文学高雅而高尚,与低俗的通俗语截然相对。Richard Jones, *The Triumph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 63ff 描绘了英格兰天主教会对"没有学问的……乌合之众"的鄙视,以及他们所谓的"明珠暗投"。特伦托公会议上反通俗语一方的主要发言人采用了同样的论点,Cavallera, 'La Bible en Langue Vulgaire', p. 46 对这一论点作了描绘。

(139) Schmidt, *Liturgie et Langue Vulgaire*, p. 177 揭示,天主教会强调服从、尊敬和虔诚,这和新教为有文化的非神职人员设定的目标反差强烈。

(140) Droz, 'Bibles François,' p. 210.

(141) Crehan, 'The Bible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p. 223. Thompson, *The Bible in English*, pp. 12-13 对类似拉丁文的英语进行评述,又对天主教的兰斯一杜埃版《圣经》(Rheims-Douai)的序言做了评述。该序警告不加区分的《圣经》阅读,这就使天主教《圣经》不同于新教《圣经》。关于英格兰新教徒对教皇拥护者引起的混乱,见 Jones, *The Triumph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p. 113-349。

(142) 比如 Margaret Deanesly, *The Lollard Bible*, p. 2。夸张中世纪宗教垄断和宗教迫害的倾向可以追溯到对威克里夫的颂扬,有人说他是殉道者,实际上他是自然死亡的。见 As-

ton,'Wycliffe's Reformation Reputation',p. 38。

(143) Robson,'Vernacular Scriptures in France',p. 451 指出,在 14 世纪的法国贝布,通俗语《圣经》既没有被禁,也没有得到特许,这一点和英格兰的情况形成对照。他又说,勒费弗尔·戴塔普尔主要的原创性贡献是根除实际文字里的浮华词语(p. 437)。

(144) Post,*The Modern Devotion* p. 98ff.

(145) Verwey,'The Netherlands Book,'p. 7. 该兄弟会一位抄书人使用的哥特体对荷兰的书籍印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p. 15)。格鲁特的兄弟会对荷兰南部和低地德国的许多手抄本译作产生了影响,Lockwood,'Vernacular Scriptures,'p. 431ff 对此作了评述。

(146) Sheppard,'Printing at Deventer'指出,迪温特的第一位印刷商借宿在那里的修道院(pp. 116-117)。许多人探讨过格鲁特创建的兄弟会装备印刷机的史料。见 Verwey,'The Netherlands Book',chap. 1,n. 39。

(147) Kenelm Foster,'Vernacular Scriptures in Italy,'p. 465.

(148) 罗伯特·斯梯尔(Robert Steele)提及德语、撒克逊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波希米亚和荷兰语的《圣经》,见其'What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are About',p. 340。希尔施记述了 1466 年到 1552 年间欧洲通俗语《圣经》印制的编年史,见 Hirsch,*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pp. 92-93。赫伯特·热丹(Herbert Jedin)注意到,关于通俗语翻译,教会缺乏明确而统一的政策,见其 *A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II,67。关于手抄本《圣经》见 Foster,'Vernacular Scriptures in Italy',pp. 338-491。

(149) 希尔施引述了这一诏书英译本的一部分,见 Hirsch,'Pre-Reformation Censorship',p. 102。这仅仅是审查通俗语《圣经》的一个标志。较早的一次审查是 1478 年科隆以"滥用""新技艺"为中心的审查(同时出现的还有两种出版许可证:nihil obstat 和 imprimatur)。美因兹大主教的命令常常被错误地断定为 1486 年和 1487 年,这两个年代是大主教命令它重新颁布的年代。除了'Pre-Reformation Censorship'和 *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pp. 87-91 之外,Hirsch 还在《关于印书的教皇敕令》('Bulla Super Impressione Librorum')一文里为研究这方面的文献和早期的教会法规提供指引。G. H. Putnam,*The Censorship of the Church of Rome*,I(1906),vii 指出,有必要对教会的审查制度做扎实而没有偏颇的研究,这一需要至今仍然明确无误。有两种论"禁书目录"(*De Index der Verbotenen Bücher*)的标准著作,海因利希·罗伊希(Heinrich Reusch)的书基本上是分类检索,约瑟夫·希尔杰斯(Joseph Hilgers)的书是一篇辩护词。

(150) Hirsch ,*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p. 90.

(151) 有几篇文章评述了皇帝和国家颁布的针对印刷通俗语《圣经》的命令,见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参见其中的 pp. 113,125,430-431。从 1487 年起,索邦神学院一直反对出版法语通俗语的《圣经》,见 Rickard,*La Langue Française*,pp. 9-10。

(152) Putnam,*Censorship*,I,176-177,182-189. 又见 Jackson,'Printed Books and the Mass Media',pp. 45-46。

(153) Kenem Foster,'Italy Versions,'p. 112. 这一禁令的持久影响在一位意大利电影导演的访谈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蒂诺·德·洛伦迪斯(Dino de Laurentiis)在制作关于《圣经》的

电影时如是说:“五年前,我没有读过《圣经》,因为我们意大利人的宗教知识完全来自于神父。”转引自 Lillian Ross,'Our Far-Flung Correspondents',p. 197。

(154) de Frede,'Per la Storia della Stampa,'pp. 175-177; Paul F. Grendler, *The Roman Inquisition*, *passim.*

(155) McNair, *Peter Martyr in Italy*, *passim* 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颇像 Grendler, *The Roman Inquisition*。

(156) Crehan,'The Bible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p. 204. 一位耶稣会士认为,受“圣灵”激励的聪明谋士提出“柔性公式”,见 Schmidt, *Liturgie et Langue Vulgaire*, pp. 82, 95。罗伯托·帕默(Robert R. Palmer)注意到早期天主教学者对这一柔性公式的各种解读,见其 *Catholics and Unbelievers*, p. 64。

(157) Victor Baroni, *La Contre Réforme devant la Bible*, introduction, article ix.

(158) Droz,'Bibles François,'p. 211. (René Benoist 的法语《圣经》是一个有趣的案例;1566 年它获准在巴黎印行,后来又受到谴责;获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批准后又由普朗坦再版。德洛兹的书第 222 页描绘了这样的坎坷。)又见 Black,'The Printed Bible', pp. 44-48; Martin, *Livre à Paris*, pp. 610-611。

(159) *Le Sancuaire Fermé au Prophane ou la Bible defendue au Vulgaire* 一书的作者是王室告解神父让·勒梅尔(Le Maire),马丹对这本书做了评述,见 Martin, *Livre à Paris*, pp. 610-611。

(160) 和英格兰比较,路德反叛时,“法国迫害异端的机器已经生锈了”。Knecht,'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对两国的情况作了比较(p. 6ff)。Sidney Lee, *The French Renaissance in England*, pp. 139-145 指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圣经》翻译走在英格兰前面。

(161) 转引自 Baldwin, *William Shakespere's Small Latine* I, 179-180.

(162) 1545 年 5 月 6 日国王诏书语,转引自 Butterworth, *The English Primers*, p. 257。

(163) Wood, *The Reformation and English Education*, p. 261.

(164) R. Chartier , M. M. Compère, D. Julia. , *L'Education en France*, p. 162.

(165) Martin, *Livre à Paris* I, 104, 127.

(166) 法国革命前,主要的教育改革计划是 1762-1763 年由布列塔尼议会的检察总长拉·夏洛泰(La Chalotais)制订的,计划的发布和耶稣会的解散同时。他的 *Essay on National Education* 影响后来革命的立法,主张世俗教育,反对教权主义教育,首先敦促更多地使用机印版的教义问答书。参见该书各处。

(167) 和英国的主教制相比,法国教会有分离倾向,诺曼·拉维奇(Norman Ravitch)早已在 *Sword and Mitre* 里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强调的是财政和政治政策,而不是文学和文化问题。

(168) 波特—雅尔修道院的詹森派教徒伊萨克·萨希(Isaac le Maistre de Sacy)被囚禁在巴士底狱时开始翻译《旧约圣经》,他翻译的《新约圣经》由阿姆斯特丹的埃尔西韦尔印刷所刊布时没有他的署名,署名人是蒙斯的加斯帕·米热(Gaspard Migeot),所以它又名为“蒙斯

《新约圣经》"(1667)。见 R. A. Sayce,'French Versions',pp. 348-349。詹森派喜欢用法语教学,耶稣会喜欢用拉丁语教学,Frederick Artz,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Education* 对此作了比较,p. 14。

(169) Sayce,'French Versions,'p. 114.

(170) 关于 1561—1562 年法国《诗篇》大规模发行的情况,参见 Kingdon,'Patronage,Piety and Printing,'pp. 28-30。关于熟练工人在里昂街头以战斗姿态高唱诗篇的一景,见 Natalie Davis,'The Protestant Printing Workers',pp. 252-257。

(171) 转引自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05。

(172) 关于异见传统如何进入英国的雅各宾主义者的情况,以及不顺从国教的教派和教会互相竞争的情况,见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51。关于约翰·班扬(John Bunyan)、笛福和弥尔顿对阅读公众的探讨,又见 Q. D. 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pp. 97-118。

(173) Arthur Dicken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 115. 他这种新教式的解释和克雷汉的天主教式的解释截然不同,见 F. J. Crehan,'The Bible in the Catholic Church',p. 203。克雷汉断言,"参加会议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不理会在大学设置《圣经》教席的保守建议,在其他问题上也不置一词。

(174) 罗马法庭镇压新教,同时又遏制其他更加基本和长久的力量。William Bouwsma, *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 pp. 293-295 对此作了描绘。他把新教的威胁与"文艺复兴的价值"联系起来,认为罗马的"首要……对手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象征的力量,而不是维滕堡和日内瓦象征的力量"(p. 294)。与此相反,我认为,那种威胁是印刷术释放出来的。在我看来,作为重要印刷中心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代表着 16 世纪罗马的"头号对手"。日内瓦印刷所在激起法国舆论反对罗马教廷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Kingdon, *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France*, pp. 93-129 对此作了描绘。

(175) Evennett, *The Spiri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 25.

(176) 关于德意志印刷商亲路德、反天主教的倾向,见 Gravier, *Luther et l'Opinion Publique*, pp. 20,72-74,251。

(177) Louise Holborn,'Printing and the Growth,'p. 11.

(178) 比如 Allison and Rogers, *A Catalogue of Catholic Books*。

(179) 教廷反对法国 1789 年的《人权宣言》,主要是针对其中宣告出版自由的条款,这似乎完全符合教廷一如既往的立场。

(180) 比如,'Pontiff says Media Lead Youth Astray,' *The Washington Post* (Tuesday, May 5, 1970), p. A14. ,这一标题总结了教皇保罗六世在《世界社会交往日》宣教时发布的信息。

(181) 中世纪《查士丁尼法典》被誉为"法学拉丁语版《圣经》",我认为和圣哲罗姆《圣经》的威望相似。(见本书第 103—104 页的评述。)12 世纪论《圣经》的"普通词语"和中世纪论《查士丁尼法典》的科隆版词汇书很相近,Milburn,'The"People's"Bible',p. 294 的论述很清楚。既研究印刷术对中世纪法律文本的影响又研究印刷术对中世纪《圣经》文本的影响是大有

裨益的。

(182) 关于《圣经》翻译家比如路德和勒费弗尔利用机印的参考书和其他印刷术资源的情况，参见 Bluhm，'The Sources of Luther's September Testament'。

(183) 关于向政府持续施压希望政府支持英文版《圣经》的记述，见 Dickens，*Thomas Cromwell*，p. 115。

(184) Harbison，*The Christian Scholar*，p. 110. 史华兹对《圣经》翻译研究中"哲学"方法论和灵启方法论作了探讨，见其 Schwartz，W. *Principles and Problems*，pp. 16，27-29，37，40。

(185) 见 Deanesly，*The Lollard Bible*，p. 12 和 Wood，*The Reformation and English Education*，pp. 229-230。这两本书探讨了伊拉斯谟与莫尔的差异。E. J. Devereux，'English Translators of Erasmus'，p. 47ff 也提到廷代尔对莫尔的挖苦，责备他没有追随伊拉斯谟版的《新约圣经》(Paraclesis)。

(186) Devereux，'English Translators of Erasmus，pp. 50-53 生动描绘了亨利八世突然剧变的政策。

(187) Greenslade，'English Versions of the Bible，'p. 153，n. 1.

(188) 1543 年的诏书禁止阅读的类别选自 Bennett，*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1475—1557，p. 27。

(189)《圣经》的出版印行在爱德华六世治下加速，但在玛丽·都铎治下"几乎停顿"。Bennett，*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p. 141 对此作了描绘。英格兰在这段时间的经验是一个缩影，反映了新教和天主教统治者的登基可能会产生的不同时势走向。

(190) 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p. 14.

(191) 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pp. 143，618—620 述及波兰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等文学语言的形成。《圣经》翻译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芬兰语等文学语言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Dickens，*Reformation and Society*，pp. 99-91 对此作了描述。又见 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pp. 120-126。

(192) 见 Martin，*Livre à Paris* I，23-24 对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Justus Lipsius) 的介绍，利普西乌斯游走四方，几次改变信仰，在莱顿生活了 12 年，后来迁居卢万。

(193) 本书第 446-448 页将述及学者—印刷商组建的那种多语"家庭"。

(194) Berry，*The Geneva Bible*，pp. 10-11 记述了玛丽女王治下外国流亡者从事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研究，他们与日内瓦、斯特拉斯堡等地的印刷商关系密切。关于詹姆斯一世网罗的《圣经》编委会，参见约翰·布瓦(John Bois)的笔记 *Translating for King James*，*passim*，该书是由沃德·艾伦(Ward Allen)翻译并编辑的。

(195) 托马斯·培根(Thomas Becon)捍卫英语版《圣经》和母语，其言论见 Jones，*The Triumph of the English Language*，p. 19。

(196) 除了琼斯《英语的胜利》记述的"英语化"运动以外，又见 Ebel，'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Graham，'Our Tongue Matemall'，pp. 58-98；Eleanor Rosenberg，*Leicester：Patron of Letters*。从分散的文章判断，16 世纪的翻译运动的比较研究(或许以译者序文为基础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大有裨益的；这些文章有：Grendler，

'Francesco Sansovino', p. 141; Theodore S. Beardsley, 'The Classics and Their Spanish Translators', p. 3ff.; Rickard, *La Langue Française*, *passim*; Gerald Strauss,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197) 第一本论翻译的机印书的作者是法国印刷商埃蒂安纳·多莱(Etienne Dolet),他是胡格诺教徒、殉道者,书名叫《优秀翻译的方法》(*La Manière de bien Traduire d'une Langue à L'Autre*)(1540)。又见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133。

(198) 1572 年帕克大主教致伯利勋爵信,转引自 Oastler, *John Day*, p. 19。

(199) Oastler, *John Day*, p. 15; Haller, *The Elect Nation*, pp. 114-117。奥斯特勒纠正霍勒的一个观点,霍勒认为大主教帕克是戴伊的特别赞助人。

(200) Oastler, *John Day*, p. 16. (弗朗西斯·耶茨高度评价约翰·迪伊这篇序文,认为其环宇地图的理论很重要。)

(201) Thomas Norton, *The Ordinall of Alchemy* (1447),转引自 Jones, *Triumph*, p. 5, n. 8。

(202)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 18. 又见 Caxton 所谓"粗鲁而愚笨的人",引文见 Bennett,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1475-1557*, pp. 16-17。这些序文对市场进行界定,同时又以新的方式阐述阶级区分。1613 年出版的《圣经索引》(Bible Concordance)的序文指出,该书的读者既不是"最有学问的人,也不是最没有学问的人,而是地位居中的人",这段引文见 Wright, *Middle Class Culture*, p. 235。这个"居中的"用法很特别,它指的是"设想中的公众",这恐怕是将都铎王朝文化与英格兰中产阶级联系起来的唯一理由。反对这一用法的立场见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75。

(203) 在 16 世纪的法国,捍卫通俗语医学论文的主张(这种论文旨在有利于外科医师、助产士和药剂师等)"颇像捍卫通俗语《圣经》的主张",见 Natalie Z.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 223。

(204) Webste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p. 268. 关于通俗语科学文献和拉丁文文献的进一步探讨,见本书第 531、545-547、657-558 页。

(205) A. W. Reed, *Early Tudor Drama*, p. 204.

(206) 语出'England's Birth-Right Justified' (1645),转引自 Gregg, *Free-born John: A Biography of John Lilburne*, p. 128。

(207) 转引自 Ebel,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pp. 595-98。

(208) 'A Garland for Gutenberg,'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ne 22, 1967), p. 561.

(209)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33.

(210) 见本书第二章注释(260)。

(211)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及其同事在 16 世纪 50 年代印行日内瓦《圣经》的英译本,到 17 世纪居功至伟,对班扬笔下的牧师和弥尔顿的诗歌产生重大影响,参见 Lloyd Berry, introduction to *The Geneva Bible* 以及 Hardin Craig, 'The Genevan Bible'。

(212) 所以卡尔·布利登堡(Carl Bridenbaugh)在'The Great Mutation', p. 320 里悲叹,"《圣经》阅读共同的宗教和文化纽带"失落,一去不复返了。

(213)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61. 在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 381 里，作者 R. Altick 似乎也有一点心不在焉，他说《圣经》为英格兰的乡间小屋提供了“永恒的食粮”。难道我们不该用“后印刷术”取代“永恒”吗？

(214) 洛威尔·格林(Lowell C. Green)就此提请人们注意，见其‘The Bible in Sixteenth Century’, p. 120。

(215) Greenslade, ‘Epilogue,’ p. 485.

(216)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p. 217.

(217) Preface to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559) edited by John Booty, pp. 14-15,

(218) Smalley, *English Friars* 和 Owst, *Literature and Pulpit* 都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英格兰修士如何用奇闻轶事布道。A. J. Krailsheimer, *Rabelais and the Franciscans* 也提供了类似的法国和意大利素材。

(219) 宗教改革以前，教士“罕有《圣经》”，英格兰教区牧师布道时也很少用《圣经》，见 Heath, *The English Parish Clergy*, pp. 74-75。

(220)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p. 29.

(221) Delany, *British Autobiography*, p. 34.

(222) Ibid, p. 29.

(223) 除了盗版印行《新约圣经》之外，希望有所作为的学者—印刷商还面对其他问题，M. H.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 431 对此作了说明。不过，学术出版计划的损失和风险可以从富有而强大的赞助人那里得到补偿，这样的赞助比迅速赢利更有助益。Hendricks, ‘Profitless Printing’提供了这样的例证。伦敦出的多语本《圣经》靠捐赠人支撑，见 Sarah Clapp, ‘The Subscription Enterprises of John Ogilby and Richard Blowe’。

(224)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 423 援引 1510 年一种法语《圣经》的序文，那篇序文把《圣经》当作可以打发时间的“有趣故事书”。

(225) 据 Box, ‘Hebrew Studies’记述，除了 Reuchlin,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之外，路德还有一本希伯来语的《圣经》，是布雷斯劳(Brescian)版本(1488 年由 Soncino 出版社印行)，见 Box, ‘Hebrew Studies’, p. 322。关于路德如何利用罗伊希林的著作，见 Kooiman, *Luther and the Bible*。16 世纪初，路德迫不及待地接受伊拉斯谟的希腊语《新约圣经》，“几乎立刻开始使用”这本《圣经》，Bluhm, *Martin Luther*, pp. x-xi 对此作了说明。弗洛本催促伊拉斯谟赶在既定日期翻译完这本希腊语的《新约圣经》，因此伊拉斯谟抱怨说，这本书是“急就章，而不是仔细编辑而成的”。Jarrott, ‘Erasmus’s Biblical Humanism’, pp. 120-121 就此作了记述。雅洛特还指出，伊拉斯谟研究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以后，于 1527 年刊出修订后的第四版《新约圣经》。路德在瓦特堡居住期间参阅了伊拉斯谟的希腊语《新约圣经》、通俗德语版的《圣经》和拉丁文《圣经》，但他用的这些书究竟是什么版本，这个问题至今仍不清楚。显然，在他被迫与世隔绝的那段时间里，印刷商给他提供的机印书远远胜过了誊写人可能给他提供的手抄书。

(226) 见本书第三章注释(159)。

(227) Basil Hall, ‘Biblical Scholarship,’ pp. 38-39.

(228) Chrisman,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chap. 7, pp. 98-117. 又见其 appendix A-I。

(229) Natalie Z. Davis,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68) p. 589.

(230) Chrisman,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p. 99.

(231) 斯特拉斯堡开始配置印刷机是在 1458 年，见 Josef Benzing, *Buchdrucker-Lexicon*, p. 157ff.。

(232) Chrisman,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pp. 63-65.

(233) Ibid, pp. 264-268.

(234) Ibid, p. 81. 印刷术的出现使人更加担心英格兰“不读书的教士”，见 Heath, *The English Parish Clergy*, p. 73ff.。

(235) 在伊拉斯谟的领导下，德国北部的人文主义者在“追求雄辩术”的过程中，改变了基督教牧师追求的主题，R. W. Scribner, 'The Social Thought of Erasmus'（尤其 pp. 8-9, 15）对此作了描述。Hirsch 介绍了 Reuchlin, *Art of Preaching* 的素材，Hirsch, 'Printing and the Spread of Humanism', p. 35 还介绍了 Albrecht von Eyb 编纂书稿的情况。

(236) Chrisman,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p. 120.

(237) 关于卡皮托在斯特拉斯堡的活动，见 Kittelson, 'Wolfgang Capito', pp. 126ff.。

(238) Chrisman,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p. 238.

(239) 关于盖勒为让·热尔松编印的全集，Renaudet, *Préréforme et Humanisme*, pp. 101-102 作了评论。

(240) 为热尔松立传的两位作者是温普斐灵（Jacob Wimpfeling）和庇突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两部传记出版于 1510 年，重印了几次。见 Giesey, book review,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p. 207。

(241) Chrisman,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p. 78.

(242) Dickens, *Reformation and Society*, p. 86.

(243) Eels, *The Attitude*, p. 9.

(244) 转引自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 18。又见上文所引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pp. 316-317 的话。卡西奥多鲁斯这句话是否是路德向魔鬼扔墨水瓶的灵感之源呢？毫无疑问，约翰·福克斯用印刷机刺伤教廷的伪基督的观念来自于这个传统。

(245) 查尔特勒修道院（Grande Chartreuse）院长，《吉谷言论卷一》（Coutumes de Gigue I），12 世纪手稿（国家图书馆馆藏手稿 4342 档）第 410 号；*Le Livre*（Catalogue of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xhibition），p. 134。

(246) Greenslade, 'Epilogue,' p. 485.

(247) 也许我们应该先说印刷商门特林（Johann Mentelin）1460 年印制的拉丁文《圣经》，而不是他 6 年以后印行的德语《圣经》，见本书第 440 页。

(248) 关于 1454-1455 年美因兹印行赎罪券的情况，见 Butler,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pp. 67-77。大多数文本将印刷术的出现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定在同一时间，那是因为第一种标注日期的印刷品是谷登堡印制的；那是因为第一种标注日期的印刷品是谷登堡应一位代理人的请求印制的；这位代理人代表塞浦路斯的守卫者反对奥斯曼人的侵略。以支持反抗奥斯曼人入侵的斗争。见 Douglas McMurtrie, *The Book*, p. 149。关于为十字

军东征去讨伐土耳其人而印行的赎罪券，见 Hirsch，*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pp. 122-123。卡克斯顿印制的最早标注日期的印刷品也是赎罪券(1476 年为阿宾顿修道院印刷)；见 Carter and Muir(eds.)，*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p. 8。有关卡克斯顿 1476 年至 1489 年继后发行的一些印刷品，见 N. F. Blake，*Caxton and His World*，pp. 77-78，232-233。

(249) 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p. 139.

(250) 1480 年，米歇尔·格雷夫(Michael Greyff)在罗伊特林根印行了一份大单张，题名《罗得斯解围的奇迹》(Miracula quae tempore obsidionis Rhodi Contingerunt)，描绘 1480 年 6—7 月土耳其人围攻罗得斯时出现的奇迹，目的是帮助赎罪券的推销员，他们受雇为包围罗德斯城而筹款。

(251) 13 世纪多明我会描绘教会的善行，教会动用功库所完成的交易和现金支付，见 F. J. Crehan，'Indulgences'，pp. 84-90。又见 Rosenwein and Little，'Social Meaning in the Monastic and Mendicants Spiritualities'，pp. 84-90。

(252) Dickens，*Reformation and Society*，p. 35.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敕令就用机器印行，其宣传效果就比过去的手写敕令好。据 Nikolaus Paulus，*Indulgences*，pp. 32-33 记述，1473 年，布塞尔印刷商印行的一份有关赎罪券的教皇诏书就达 1 000 份。又见该书第 56-58 页有关印刷商得到补偿的数据(正如手写诏书的誊写人得到补偿一样)，他们印制赎罪券的特许权几乎就相当于现金补助。

(253) Kenneth Cameron，book review，*Renaissance Quarterly* (1971)，p. 555.

(254) Carter and Goodrich，*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p. 181 注意到纸牌和圣像同时生产的情况。McMurtrie，*The Book*，p. 104 描绘了 15 世纪初版画印行的情况。到 1441 年，威尼斯市议会已经在采取措施，禁止从德国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等城镇进口纸牌和圣像，以扭转"纸牌和圣像生产的艺术和秘密"下滑的颓势，见 Clapham，'Printing'，pp. 380-381。

(255) 一本指南书列举各教堂收藏的圣物，分类编订了教徒可以"请购"的赎罪券，见 Guilleretus and Nani，*Indulgentiae Ecclesiarum Urbis Romae*(Rome，1511)。这类复制的目录使收藏者疯狂，路德的庇护人萨克森选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堆积如山的收藏就说明了这种疯狂。1509 年，印刷商克拉纳克(Lucas. Cranach)就用木刻画印行了这一收藏的分类目录，题名"维滕堡的收藏"('Wittenberg Heiligtumsbuch')。

(256) 选自加尔文的 *A very profitable treatise... declarynge what great profit might come... if there were a regester made of all reliques*。Wythers 译，1561 年伦敦印行(STC 4467)。承蒙戴 David H. Stam 让我参阅这一文献。

(257) Natalie Z. Davis，'Printing and the People，'pp. 202-203.

(258) 转引自 Black，'The Printed Bible，'p. 432. 路德反对医生的贪婪，抨击他们滥用神圣的印刷术，他似乎在呼应美因兹大主教 1485 年发布的审查指令。(参见本书第 347 页。)研究德国人对最伟大的"德国"发明所持的矛盾态度，可能是有价值的。

(259) 据 Bainton，'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formation，'p. 77 记述(吸取了 Erich Hassinger 的意

见),路德神学立场的首创性在于他特别强调读《福音书》,以此作为克服有幸聆听耶稣的几代人和后世人的距离。对路德而言,从耶稣复活到印刷商发明之间的间隔实在是像一个黑暗时代。

(260) 引自 1641 年版福克斯印行的 *Book of Martyrs*,这段文字出现在 Thomas Dibdin,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I 的扉页上。又见 Trithemius, *In Praise of Scribes*, chap. 1, lines 10-12,以兹比较。

(261) 见 Eric Fenn, 'The Bible and the Missionary', pp. 402-403 以及 Greenslade, 'Epilogue', pp. 478-479。两人研究过去五百年《圣经》继续不断的出版与翻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到 1960 年,每年有 1 100 多种语言和方言翻译的《圣经》在世界各地流通,发行量年平均三千万册。

(262) 本杰明·纳尔逊(Benjamin Nelson)对韦伯著作做了肯定的评价,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截至 1970 年),见其'Weber's Protestant Ethic'。作者序言第 13-16 页提到西方印刷文献和报刊特有的现象,可惜作者将其放在不令人注目的地方,使之掩盖在大量混杂的现象中了。这些独特的现象是理性的化学、教会法、对位法、乐谱、哥特式拱顶、中心透视等。

(263)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pp. 121;235, n. 79.

(264) Chenu, *Nature, Man and Socie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 224 讨论了中世纪相关的布道辞。Benjamin Nelson, 'Weber's Protestant Ethic'认为,虽然中世纪的布道人可能会认为世俗的工作有用、合法甚至光荣,但韦伯显然明确区别俗人的工作和修士的特别神圣的工作,因为他们完成的是宗教的功课。

(265) 转引自《吉谷言论卷二》(Coutumes de Gigue II),吉谷是查尔特勒修道院的第五任院长(1180 年卒),见该修会规章,载该修会规章 *Patrologia Latina*, t. 153;Marks, 'The Scriptorium and Library of St. Barbara's, Cologne'对此做了评论。

(266) 见本书第一章注释(39)。

(267)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p. 74.

(268) 见韦伯就富兰克林和阿尔贝蒂的"伦理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比较;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pp. 194-196, n. 12.。韦伯的措词是:佛罗伦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货币市场",18 世纪宾夕法尼亚州"落后的中产阶级环境",这里的"商业可能会……倒退回以货易货的方式"(p. 75)。这样的措词助长了无关问题的滋生。倘若他的讨论集中在比较佛罗伦萨一位手抄书贸易商和 18 世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印刷商,我认为那会给人更明显的启迪。关于近年研究美国殖民时期印刷商的情况,参见 Stephen Botein, 'Meer Mechanics and an Open Press'。Lewis Simpson, 'The Printer as a Man of Letters', p. 1ff. 对我的一些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William Miller, *Benjamin Franklin's Philadelphia Printing* 扼要介绍了富兰克林的印刷业生涯,描绘了他印制 800 多件印刷品的情况。关于富兰克林的合伙人戴维·霍尔(David Hall),见 Robert D. Harlan, 'David Hall and the Stamp Act'和'David Hall and the Townshend Acts'。

(269) 见韦伯在"天职"、"专业"、"职业"等的词源上的旁生枝节,*The Protestant Ethic*, pp. 204-211。即使这样的旁生枝节揭示了许多历史学家感兴趣的素材,即使加尔文在高利贷问题

上的立场由于近年仔细的研究成果而被澄清了，在韦伯追踪这种错误线索的过程中，许多做学问的宝贵精力就被浪费了。

(270) Robertson, 'A Criticism of Max Weber,' p. 81.

(271) 中世纪的《算经》(*Liber Abaci*)手稿共 459 页，Joseph and Frances Gies, *Leonardo of Pisa* 对《算经》做了评述；Karl Menninger, *Number Words and Number Symbols*, p. 459ff. 对此也做了介绍。特雷维索(Treviso)描绘了第一部机印算术书(1478)，其封面(指向"商业艺术")被人复制；门宁格尔(Menninger)还探讨了各地早期刊布的其他算术书(p. 334ff.)。关于这个课题，又见 Cosmo Gordon, 'Books on Accountancy'。

(272) Goldthwaite, 'Schools and Teachers.' 参见第 420 页(Sapori)的发现，以及第 425 页注释 20 的说明：在 1500 年之前，学徒的见习比正规上学更重要。

(273) Guy Beaujouan, 'Motives and Opportunities,' p. 235.

(274) Kenneth Charlton, *Educat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p. 258-260.

(275) N. F. Blake, *Caxton and His World*, p. 62 讲述了 15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科隆人掌握"印刷机的秘密"时遭遇到的困难。

(276) Goldthwaite, 'Schools and Teachers' 相关的章节题名和讨论，以及 Charlton, *Educat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p. 279, 298。又见 Curtis, 'Educ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pp. 68-70。亦见 Wright, *Middle Class Culture*, p. 162。

(277) Raymond de Roover,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 of the Plantin Press'; Florence Edler (de Roover), 'Cost Accounting in the 16th Century'; Kingdon, 'Christopher Plantin and His Backers,' p. 309.

(278) Yamey, 'Scientific Bookkeeping.'

(279) R. E. Taylo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又见同一文集里卢福尔(Raymond de Roover)的文章 'Accounting Prior to Luca Pacioli', pp. 114-174。卢福尔将复式记账法在意大利之外的传播归功于印刷术(p. 174)。关于帕奇奥里等人如何普及"四艺"，见本书第 547 页之后。

(280) Yamey, 'Scientific Bookkeeping', pp. 102-104 征引了笛福及其先行者的宣传用语。

(281) Natalie Z. Davis, 'Sixteenth Century French Arithmetics,' p. 43. 应该仔细阅读全文。有些作者的确提出了一些告诫和禁条，但这些告诫和禁条淹没在大量的实例中了。文章提到所论作者的宗教信仰(p. 44)，其中有一位西班牙修士和一位法国修士(p. 21)。

(282) Dirk Struik, 'Mathematics in the Netherlands'(尤其注意 p. 52)。

(283) 见 Louis Wright, *Middle Class Culture* 引述的书籍，p. 162。

(284) Paolo Saropi, *The Italian Merchant*, p. 102 讨论了 14 世纪的"商业手册"，其内容涵盖度量衡换算表、计算公式、货币监管的细节、关税和年历。

(285) Bosanquet, 'English Seventeenth Century Almanacks,' p. 162，又见其 *English Printed Almanacks*。亦见 Noriss S. Hetherington, 'Almanacs and the Extent of Knowledge of the New Astronomy', p. 257, n. 1。至于年鉴印行(与新天文学的接受程度相关)的其他方面，见本书第 631-632 页。对这一文体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是值得的。法文资料

里的数据似乎有所不同(比英语年鉴更加古旧,偏重乡间和文化水平比较低的读者),不过这一差别可能是作者不同的研究方法造成的,而不是材料本身固有的特征。参见 Geneviève Bollème, *Les Amanachs populaires*,以及我对这本书的评论,见 *The French Revew*, pp. 777-778。

(286)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chap. 5.

(287) Sarton, *Appreciation*, p. 151.

(288) Armstrong, *Robert Estienne*, p. 34. 关于查理·埃蒂安纳印制解剖书的情况,见本书第 567 页。他论述蓬勃向上的地主精神,其 *L'Agriculture et Maisons Rustiques* 很成功,印行了好多版。

(289) Burk, *Culture and Society*, p. 14.

(290)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批判了这些公式(pp. 33-34)。辉格党人和新教作家对这些公式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93 对此做了介绍。

(291)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34.

(292) 见本书第 363-364 页。

(293) 我对"危机"时代从 14 世纪开始就接踵而至的观点做了批评,见我的文章'Clio and Chronos', p. 38。

(294)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39.

(295) Kaplow,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500.

(296) Kingdon, 'Patronage, Piety and Printing,' pp. 27-35.

(297) Delaissé, *Le Manuscrit Autographe* 详细讲述了《效法基督》撰写的情况。围绕该书作者的身份有争论,德尚(J. Deschamps)的书评记述了这样的争论,载 *Quaerendo*(1973), p. 78。

(298) 有一本使用方便的序跋集,Beriah Botfield, *Praefationes et Epistolae* 提供了希腊罗马古籍和早期教父著作第一版的序文。

(299) Natalie Z. Davis, 'Sixteenth-Century French Arithmetics', p. 29 指出了印刷商的这种宣传手法。

(300) Natalie Z. Davis, 'Strikes and Salvation in Lyons,' p. 52.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 201 也强调指出印刷工人高度的自尊心。印刷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是在巴塞尔,见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p. 48。

(301) 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引述德·拉·马尔的研究清楚显示了这一点。

(302) 麦肯齐(McKenzie)生动描绘了 17 世纪印刷所里的工作分配,见 McKenzie, 'Printers of the Mind'。他强调作坊运作的复杂性,并指出,老板需要让员工忙碌。又参见本书第二章注释(50)。

(303) Cicero, *De Arte Rhetorica* (1514-1515) 序,转引自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pp. 394-401。

(304) D. D. Raphael, 'Adam Smith,' p. 248.

(305) Hodgart, *Satire*, pp. 44, 95. 关于拉伯雷的先驱,见 A. J. Krailsheimer, *Rabelais and the*

Franciscans ,*passim* 以及 Ruth Mohl,*The Three Estates*,p. 37。值得注意的是,从流浪学生吟游诗人(Goliard)出现开始,学生聚居区常常和反教权主义文学结成密切的同盟。针对教士的尖刻讥讽多见于学术界的"下层",而不是市民的或匠人的环境中。

(306) Dickens,*Reformation and Society*,p. 28.

(307) Heath,*The English Parish Clergy*,pp. 193-194,196.

(308) Grendler,*Critics of the Italian World*,pp. 4-7 提供了有关阿雷蒂诺和威尼斯人的素材。意大利人不准德意志印刷商印行这些著作,胡腾对其垄断塔西佗著作的出版持反对立场,见 Hans Hillerbrand,ed. *The Reformation*,p. 77。

(309) 这是圣埃弗里蒙德(Saint-Evremond)记述的 17 世纪一位法国贵族说的话,转引自 Lough,*An Introduction to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p. 203。

(310) Hale,'War and Public Opinion,' pp. 20-22. 又见 Irene Q. Brown,'Philippe Ariès',pp. 364-365 对法国贵族军事教育的讨论。

(311) 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p. 673. 又见 MacCaffrey'Elizabethan Politics',pp. 32-33。亦见 Stone,'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312) Major,'Crown and Aristocracy in Renaissance France.'

(313) 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pp. 298-299;Franklin Ford,*Robe and Sword*,pp. 217-221,246-252。

(314) Elliott,'Revolution and Continuity.'

(315) Hay,'The Early Renaissance in England,'p. 105. 他在正文里写的日期是 1516 年,在脚注里写的日期是 1517 年。福尔杰图书馆收藏的那一册《文科教育之裨益》(*De Fructu qui ex doctrina*,*percepitur*,*liber*)的出版日期也是 1517 年。

(316) Kagan,*Students and Society*,p. xxi.

(317)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p. 56.

(318) 于是,在 17 世纪的法国,佩剑贵族就获得了对"乡下佬"的优势。他们使法国文学获得至尊的地位,贬低拉丁学问,为"有教养的人"的理想作出了贡献,见 Martin,*Livre à Paris*,II,964。威尔金森阐述了与之对应的英国"有教养的人",见 R. H. Wilkinson,'The Gentleman Ideal'。

(319) 印刷术到来之后,初级教育缺乏监管,迅速发展,西班牙教会感到震惊,于是就开始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参见 Kagan,*Students and Society*,p. 11。

(320) 见本书第 371 页。16 世纪 20 年代,世俗学校在新教的斯特拉斯堡创办,这和 18 世纪 80 年代天主教的昂热(Angers)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昂热,教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占优势。见 John McManners,*French Ecclesiastical Society*,*passim*。

(321) Clifford Maas,'German Printers,'pp. 118-126.

(322) Grendler,*Critics of the Italian World*,pp. 4-7.

(323) 法国的第一家印刷所不是"大学印刷所",而是索邦神学院的两位教师创办的,见 Hirsch,*Printing*,*Selling*,*and Reading*,p. 51。稍后,图书馆馆长约翰·埃兰(Johann Heynlin)及其合伙人转到巴塞尔,与其同行的有阿梅尔巴赫和罗伊希林,他们为阿梅尔巴赫—弗洛本

印刷所的建立做了铺垫。见 Earl Hilgert,'Johann Froben',pp. 141-149;Zeydel,'Johann Reuchlin and Sebastian Brant',p. 119。后来,埃兰的合伙人、索邦神学院的校长纪尧姆·菲歇又转到罗马,他身后留下了一群颇有权势的追随者。其中著名者有罗伯特·盖冈(Robert Gaguin),菲歇在致盖冈的信中赞颂了印刷术,盖冈给伊拉斯谟提供了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机会。菲歇将印刷机带进索邦神学院的兴趣和神学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他感兴趣的是抢在特雷比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的 *Rhetorica*(Venice,1472)之前印制他自己写的 *Rhetorica*。菲歇与红衣主教贝萨里翁以及斯韦因海姆和潘纳兹印刷所的编辑、阿勒利亚的主教德·比西(de Bussi)合作,与特雷比宗的乔治竞争抢时间。蒙发萨尼(John Monfasani)的新作 *George of Trebizond* 描绘了这场竞争,pp. 215-216,227,321-322。第一批大学印刷所是大学官员建立的"虚荣印刷所",他们想要印行自己的著作;E. P. Goldschmidt,*The First Cambridge Press*,pp. 3-4 对此做了介绍。于是,亨利·布洛克(Henry Bullock)对红衣主教沃尔西致的欢迎辞就成了剑桥大学的希伯克印刷所 1521 年刊布的第一件印刷品。菲歇和埃兰引进巴黎的德意志印刷商于 1474 年在圣乔治街创办了印刷所,他们为传统的学术品味服务——放弃了人文主义者喜欢的字钉和文本,偏重用哥特体印制布道手册和教会法文件。参见 Lucien,*Au Coeur Religieux*,p. 34; Augustin Renaudet *Préréforme et Humanisme*, pp. 83-84; Arthur Tilley, *The Dawn of the French Renaissance*, pp. 88, 212-214; 以及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521-522。

(324) 1521 年索邦神学院谴责图书贸易,引起强烈的反响,见 P. G. Bietenholz, *Basle and France*,p. 30。仅仅等待索邦神学院的审查官的评审意见就会引起重重困难,见本书第二章注释(310)。

(325) Armstrong,*Robert Estienne*,p. 203.

(326) 关于 16 世纪的法国学者比如皮图(Pierre Pithou)和拉波普利尼埃(Lancelot La Popelinière)对教士知识垄断的抨击,见 Huppert,*The Idea of Perfict History*,p. 20。印刷所为教士和布道者开启了新的机会,有人对多职位、多补贴的现象进行抨击;1879 年加拿大历史学会在克里克托夫召开的研讨会指出了这样的现象。见 M. J. Kraus,'Patronage and Reform'和 Natalie Z. Davis,'New Monarchs',pp. 46-73。

(327) 修士奥腾西奥·兰多(Ortensio Lando)在里昂印刷商格里菲乌斯(Sebastien Gryphius)的印刷所找到工作,然后才转向威尼斯的印刷商,他在那里上了《禁书目录》,Grendler,*Critics of the Italian World*,pp. 26-37 对此作了描绘。兰多的兼职也类似拉伯雷的模式。

(328) Kline,'Rabelais and the Age of Printing';Armstrong,*Robert Estienne*,pp. 251-252 指出,埃蒂安纳既反对拉伯雷口出狂言,又喜欢他对索邦神学院的抨击。

(329) P. S. Allen,'Erasmus' Relations with his Printers,' pp. 297-323. 比较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chap. 3 和 Hugh Trevor-Roper,'Desiderius Erasmus'。

(330) Hoyaux,'Les Moyens d'Existence d'Erasme.'额外的收入来自于销售赠书,赠书的数量比一般的估计多,每一版超过一百册。

(331) 关于伊拉斯谟兼有学者和宣传者的双重角色,见 R. W. Scribner,'The Social Thought of

Erasmus', pp. 24-26。

(332) 引语出自加尔文书简，见 Hillerbrand, ed. *The Reformation*, pp. 170-175。

(333) Harbison, *The Christian Scholar*, p. 147.

(334) 日内瓦扮演了一个非凡的角色，成了法国大动荡酝酿的基地，Kingdon, *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 做了最清楚的描绘。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说日内瓦"既是麦加又是莫斯科"。金顿(Kingdon)对日内瓦成为莫斯科的宣传做了很好的描绘。

(335) Natalie Z. Davis, 'Peletier and Beza Part Company', pp. 197-202 描绘了巴黎一家印刷所的工作一景，这是瓦斯科桑(Michel de Vascosan)印刷所 1547-1548 年冬天里的一幕。文章探讨的范围涵盖通俗语翻译的利弊、文化改革的时机、什么问题应该进入商务计算书籍等文体以及印刷术的革命性后果。

(336) Dickens, *Reformation and Society*, p. 44.

(337) Luethy, *From Calvin to Rousseau*, p. 34 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评论。他认为，"中世纪都市公众的精神"在宗教改革里持久地保存下来。

(338)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151.

(339) Ibid, pp. 129-130.

(340) Bebb, 'The Lawyers,' p. 62.

(341) Fedou, 'Imprimerie et Culture.' *Cinq Etudes Lyonnaises*. 该书收入的其他文章也有参考价值，如 James Wadsworth, *Lyons 1473-1503*。

(342) Bietenholz, *Basle and France*, p. 26.

(343) 神圣罗马帝国宫廷无法执行反路德派的诏书和敕令，因为德意志君王和城邦在审查制度方面彼此独立，见 Gravier, *Luther et l'Opinion Publique*, p. 60。

(344) David Hackett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pp. 8-12, 165-166 对虚假的二分对子和虚假的"错误分析"作了很好的探讨。

(345) Natalie Z. Davis, 'Strikes and Salvation in Lyons', pp. 58-64 有一些冲突的例子；又见 Kingdon,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p. 265。

(346) Bietenholz, *Basle and France*, p. 30.

(347)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p. 194.

(348) Beardsley, 'The Classics and Their Spanish Translators,' p. 5.

(349)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p. 109-110;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292-294; Martin, *Livre à Paris*, I, 305-318.

(350) Voët, *The Golden Compasses*, 1, 388-392. 沃特对普朗坦—默雷图斯在安特卫普的印务公司日益萎缩的视野做了分析，这和 Frank J. Smolar 在'Resiliency of Enterprise'里提出的几个问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351) Voët, *The Golden Compasses*, 1, 197. 关于普朗坦 1583 年至 1585 年在莱顿的活动，见 ibid., 1, 105-116。拉菲伦吉乌斯曾师从纪尧姆·波斯特尔，参与岳父普朗坦编纂多语版《圣经》的工作，他还在莱顿大学教东方语言。在他的出版物中，有一种是经过审查的论希

伯来语元音点的附录(见本书第 332 页),还有一种是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1595)。

(352) David W. Davies, *The World of the Elseviers*, *passim*. 又见 Paul Dibon, 'L'Université de Leyde', p. 19。

(353)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2. 又见 Paul Hazard, *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chap. 3, pp. 70-104。

(354) Monter, *Calvin's Geneva*, p. 21.

(355) Ibid, pp. 5, 166. 又见 Kingdon, *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pp. 98-99。

(356) 这个课题上最深刻的研究是 H. J. Bremme, *Buchdrucker und Buchhändler zur Zeit der Glaubens-kämpfe*。又见 Kingdon, book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0), p. 1484。

(357) Paul F. Geisendorf, 'Lyons and Geneva,' p. 150.

(358) 关于里昂的衰落和资本向日内瓦的逃亡,除了以上参考文献之外,还可以参考 Martin, *Livre à Paris* 1, 31-32。

(359) 见 Brian Pullan,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和 R. T. Rapp, *Industry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enice*。拉普认为,"衰落"是相对而言的,与其说有客观的指数,不如说是有赖于自我界定。我认为,威尼斯的印刷商肯定有理由"忧心忡忡"。

(360) Armstrong, *Robert Estienne*, p. 254 将威尼斯图书贸易的衰落归因于过分热心的审查。威尼斯停止印行《圣经》以后,欧洲大陆《圣经》印刷的中心重新布局,M. H. Black, 'The Printed Bible', pp. 44-45 对此作了介绍。

(361) 格伦德勒(Grendler)最近基于深入档案研究的专著 *The Roman Inquisition* 对这一观点做了详细的描绘。又见他此前的同名文章'The Roman Inquisition'。

(362) Sarpi,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book 6, chap. 1), in *Sarpi: Selections*tr tr. Peter Burke, p. 207. 这本书在 17 世纪的发行"主要是在新教地区"(新教地区印行了 24 版,天主教地区只印行了 5 版),p. xxiv。不出所料,天主教版本是在法国与罗马争吵的时候印行的。

(363) Bouwsma, 'Venice, Spain and the Papacy,' p. 367.

(364) Burke, introduction to *Sarpi*, p. xx.

(365) 关于英格兰接受并刊布萨尔皮(Sarpi)手稿的详细情况,见 Yates, 'Paoli Sarpi's History'; 又见 Lievsay, *Venetian Phoenix*。

(366) Burke, introduction to *Sarpi*, p. xvii.

(367) Bouwsma, 'Venice, Spain and the Papacy,' p. 358. 同一主题在他的专著 *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 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368) 关于 Sarpi,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如何通过走私流行的情况,彼得·伯克在他为该书作的译者序里给了两个版本,pp. xxiii-xxix。教皇禁令解除以后,威尼斯人还容许宗教裁判所审查官在威尼斯共和国逞威,英格兰人对此感到失望,见 Yates, 'Paoli Sarpi's History', p. 134。受这一审查制度损害的还有其他作者,英王詹姆斯一世即为其中之一。

(369) Kingdon, book review,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76), pp. 210-211.

(370) 荷兰人以前从法国进口原材料。法国驱逐胡格诺教徒以后，荷兰成为主要的造纸中心，见 Verwey，'The Netherlands Book'，p. 39。胡格诺教徒的出走重创了法国出版商，使业已显露病态的法国出版业进一步衰落，见 Martin，*Livre à Paris*，II，698。

(371)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p. 35.

(372) 见 Cipolla，*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和 Stone，'Literacy and Education'。此外，目前还有几个合作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关于近年的发现，见 Chartier，Compère and Julia，*L'Education en France*，chap. 3；见 Furet and Sachs，'La Croissance de l'alphabétisation'，载论文集 *Literacy ahd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感谢密西根大学的同事雷蒙德·格鲁(Raymond Grew)、弗朗索瓦·弗雷特(François Furet)和肯尼斯·洛克里奇(Kennth Lockridge)向我介绍这个课题上的最新成果。

(373) Lerner，'Toward a Communication Theory，'p. 145.

(374) 占南美人口少数的新教徒识字的比例高，形成一个突出的例子，见E. Willems，'Cultural Change'，p. 198。在 16 世纪法国的一个地区，新教渗透程度高和识字率高表现出同步特征，见 LeRoy Ladurie，*Paysans*，I，chap 1。

(375) 见 Haller，*The Elect Nation*，p. 118 以及第 25 页对面一页上的插图。

(376) Margaret Aston，review article，*Shakespeare Studies*(1968)，p. 388.

(377) BeClasrry，introduction to *Geneva Bible*，p. 21. 伊丽莎白时代的家庭有义务教孩子、学徒和仆人读书，见 Wright，*Middle. Class Culture*，pp. 106-107 所作的讨论。

(378) 另一方面，西班牙人胡安·佩雷斯·德·皮内达(Juan Pérez de Pineda)用母语印制《圣经》，于是，发财的命运就落到了伊丽莎白时代一位英国人菲尔德(Richard Field)的手里，这就是天主教印刷商受损的证据。见 Dennis Woodfield，*Surreptitious Printing in England*，p. 39。

(379) 16 世纪巴黎的印刷商认为，销售路德和伊拉斯谟的禁书是维持他们的公司运转的必要条件，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pp. 456ff. 对此作了说明。

(380) Trevor-Roper，'Desiderius Erasmus，'p. 51. 1559 年的《禁书目录》严禁伊拉斯谟的著作在德国南部、波西米亚和波兰印行，那里的教士习惯于在教材里列举其著作的选段。Jackson，'Printed Books'，p. 45 对此作了介绍。又见 Paul and Marcella Grendler，'The Survival of Erasmus in Italy'。

(381) Putnam，*Censorship*，I，12-13 引用巴罗主教(Bishop Barluo)1693 年论《禁书目录》价值的话，认为它们记录的是"罗马讨厌"的文献。

(382) Ibid，I，40.

(383) Ibid，I，12-13 引用托马斯·詹姆斯(Thomas James)语，詹姆斯在 1627 年论著的序文里论及《禁书目录》。他稍早时候的 *Treatise of the Corruption of Scriture Coumcels，and Fathers*……London，1611)也值得一读。

(384) Dennis Woodfield，*Surreptitious Printing in England*，p. 8.

(385) Lievsay，*The Englishman's Italian Books*，p. 17 介绍了沃尔夫(John Wolfe)、托马斯·沃特罗里尔(Thomas Vautrollier)、理查德·菲尔德、约翰·查理伍德(John Charlewood)和

约翰·比尔(John Bill)等出版商。又见 Woodfield, *Surreptitious Printing in England*。

(386) 引自 Torriano, *Piazza Universale*: *Dialoghi*(1666)by Lievsay, *The Englishman's Italian Books*, pp. 17-19。

(387) Woodfield, *Surreptitious Printing in England* 介绍了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与印刷商沃尔夫和沃特罗里尔的关系, p. 25。

(389)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97.

(390) Bietenholz, *Basle and France*, p. 132.

(391) 日内瓦是所谓"新教的罗马"。16 世纪 80 年代的伦敦公会议批判"日内瓦的宗教裁判所",日内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Trevor-Roper, *The Crisis* 对此作了讨论。

(392) Kingdon, 'Reactions to the St. Bartholomew Massacres,' p. 28.

(393) Barnes, *Jean Le Clerc*, pp. 200-201 指出,经过让·克莱尔的努力,弗朗索瓦·杜雷迪尼(François Turretini)很有影响的《共识的历史》(*Histore du Consensus*)得以在荷兰出版。虽然《赫尔维西同意书》(*Consensus Helveticus*)1706 年在日内瓦被推翻,大多数瑞士新教神学家仍然坚守其精神。再者,不久举行的多尔德宗教会议(Synod of Dort)又说明,加尔文教派在荷兰胜出,阿尔尼乌斯教派战败。不过,在荷兰召开的历届宗教会议还是给荷兰的印刷机留下相当自由的天地,见 Haley,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Gentury*, pp. 88;123。

(394) Haley, *The Dutch in the Seuenteenth Gentury*, p. 173. 关于皮埃尔·培尔在鹿特丹的经历以及他和出版商雷尼尔·里尔斯的关系,见 Elisabeth Labrousse, *Pierre Bayle*, I, chap. 7, esp. pp. 167-183。Martin, *Livre à Paris* II, 748 简述了里尔斯印刷所地域辽阔的经营。

(395) Luethy, *From Calvin to Rousseau*, p. 38. 该书原来收入 *Cashiers Vilfredo Pareto*(1961-1963)。它还提到天主教地区占少数派的新教徒的识字率(pp. 30-31)。

(396) Haller, *The Elect Nation*, p. 52.

(397)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pp. 24-25. 当然,早在谷登堡之前,基督徒(和犹太人)就被描绘为"读书的人"(people of the book)。这一指称出现在《可兰经》里。见 H. I. Marrou,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pp. xiv-xv。

(398) Gregg 的 *John Lilburne* 传记作品充分表现了印刷机对约翰·利伯恩的影响。17 世纪的法国是否有类似于"生而自由的约翰"这样的人物呢?从 16 世纪喜欢争吵的胡格诺教徒埃蒂安纳·多雷(Etienne Dolet)到 18 世纪晚期的自学成才、自我标榜为"护民官"的"格拉古式"的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的法国人中,没有一位像"生而自由的约翰"。据 Albert Soboul, *The Parisian Sans-Culott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240-243 记述,在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有许多巴黎斗士担任重要职务,却目不识丁。相反,在一百多年前英格兰的清教徒斗士里却无人不识字,见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art 1。

(399) 富克斯(Foxe)把普通人放进《殉道者列传》这样一部史诗, Haller, *The Elect Nation*, p. 251ff. 阐述了这一主题。大量印行的小册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新教殉道者思想,其结果就是富克斯这部不断增版的《殉道者列传》; Fairfield, *John Bale*: *Mythmaker for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探讨了这样的殉道者思想。富克斯和贝尔(Bale)在奥珀利努斯之类印刷所里接触到欧洲大陆的传统。

(400) 参见我未刊的博士论文 Eisenstein, 'The Evolution of the Jacobin Tradition in France 1815-1848'(Radcliffe, 1952)。论文搜罗了通俗指南和共和党人小册子的大量数据,介绍了传授法国史的成人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几乎专讲 1789 年至 1815 年战争与革命的三色时代,它们赋予"人民"和所谓"热月"烈士领导者的角色。

(401) 见 Hill, *Society and Puritanism* 第十三章题名与题记。

(402) Ibid, p. 447. 希尔指出,'The Household Philosophie'可能翻译了意大利天主教诗人托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1588 年的作品,但希尔忘记指出家长的宗教责任。

(403) Keith Thomas, 'Women and Civil War Sects,' p. 333. 又见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p. 190 所论清教徒父亲承担的责任。

(404) Schücking, *The Puritan Family*, pp. 56-57。许金还将清教徒家庭与《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时代的情况作比较,那时普遍缺乏教育设施,所以家庭举行宗教仪式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p. 65)。

(405) 其他的例子见 Charlton, *Education in England*, p. 201。又见 Hill, *Society and Puritanism*, pp. 446-447。亦见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p. 241; n. 3。书中还列举了许多其他相关的书名。

(406) 引语见 Wright, *Middle Class Culture*, p. 245。该书还列举了许多其他相关的书名。

(407) Ibid, pp. 239-241.

(408) Haller, *The Elect Nation*, pp. 182-183 强调指出,《圣经》阅读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自信的源头。迈克尔·沃尔泽指出,在政治上有进取心的教士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学成才的人,阅读《福音书》是构建教友兄弟情谊的关键因素,见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pp. 135, 120-121。不过,沃尔泽和霍勒有所不同,在论述印刷词语对清教徒"新人"的塑造中所扮演的角色,沃尔泽不像威廉·霍勒那样旗帜鲜明(p. 4)。

(409)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p. 30 引述托马斯·史密斯的话说,16 世纪 60 年代,"商人、裁缝、鞋匠"等的地位很低,他们"没有自由的土地……在他们的社区里既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权威"。在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王朝时期的教堂里排放的长凳使教堂"不仅成为社交中心而且成为社会记事簿",见 C. V. Wedgwood, 'Rural 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 p. 509。

(410) 这似乎和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pp. 248-249 的讨论相矛盾:根据沃尔泽的记述,此时出现了一种"在自我提升中感到不安的文学",这是英国商人面对日益增多的论家族纹章艺术的著作而感到地位焦虑时的自然回应。沃尔泽还征引专门以"未来绅士"为对象的著作(p. 250)。关于以不同的读者群为对象的文字比如前言、内容介绍、分类目录等材料里如何影响阶级意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无论新教商人和天主教商人在社会地位上有什么共同的焦虑或矛盾心态,我还是认为,新教徒(尤其有清教徒倾向的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具有更强烈的自尊意识。拉斯勒探讨了"崇敬的"(worshipful)一词的由来,见其 *The World We Have Lost*, p. 27。

(411) 詹森派的圈子例外，这个教派强调，读《圣经》是俗人的责任（这一提议受到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四世发布的尤金尼图斯诏书的谴责），见 Crehan，'The Bible in the Catholic Church'，p. 222。

(412) Droz，'Bibles Française，'pp. 213. 尼科尔·格雷尼尔（Nicole Grenier）的长篇（600 页）论著 *Bouclier de la Foy* 用对话的形式写成，由"好人"和"坏人"对谈，夹杂着一些胡格诺教徒的驳斥。

(413) 这篇讲演题名'Speech to the Citizens of London on behalf of religious houses'，转引自 Blench，*Preaching in England*，'pp. 50-51。

(414) Bossy，'The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the People of Catholic Europe'，pp. 68-69，整篇文章都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

(415) 为了防止误解，请特别注意"部分原因"这样的措辞。在比较英国和法国的地位稳定性和社会流动性时，首先要考虑许多变量。贝伦斯（C. B. A. Behrens）指出，和乔治王朝的英格兰比较，在旧制度的法兰西，进入贵族的行列比退出容易。两者之间有许多差异必须注意。我只想建议，在进行这一复杂问题的比较时，家庭内部的宗教角色的差异是应该考虑的因素。

(416) Clifton，'The Popular Fear of Catholics'.

(417) Wiener，'The Beleaguered Isle'.

(418)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p. 36.

(419) Hauser，*Etudes sur la Réforme Française*，pp. 86-87.

(420) 这是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1598 年一本书的副标题，转引自 Wright，*Middle Class Culture*，p. 211。

(421) 见 Wright，*Middle Class Culture*，pp. 226-227。他对"奇怪的相同"现象做了评述，指出 1558 年市民得到的指导和 1640 年给他的孙子的忠告完全是相同的。

(422) Wright，*Middle Class Culture*，p. 203，n. 3. 赖特（Wright）注意到，巴尔达萨尔·卡斯第里欧尼（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朝臣宝典》（*Courtier*）和贵族指南的英译本引起的时尚很有限。

(423) Ong，*Ramus：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p. 314.

(424) Chartier，Compère and Julia，*L'Education en France*，pp. 136-137；Verwey，'The First "Book of Etiquette"for Children'；Verwey，'Les Caractères de Civilité.'

(425) Ariès，*Centuries of Childhood*，*passim.*

(426) 作者在该书的法文新版序言里对稍后涌现出来的这一类文献进行了讨论，见 Ariès，*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pp. i-xx。又见 Stone，'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pp. 25-31。

(427) McLaughlin，'Survivors and Surrogates，'p. 102.

(428) Ariès，*Centuries of Childhood*，pp. 412-413.

(429) 写下这段话以后，一篇研究印刷术和对待儿童的新态度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B. M. Berry，'The First English Pediatricians'。

(430)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p. 413.

(431) 在中世纪，与“三艺”和“四艺”相关的功课既可能在初级学生中传授也可能在高级学生中传授，见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p. 145ff. 的评论。罗伯特·利科尔(Robert Recorde)写了一系列教材，排序考究，让读者能够从“基础功课”经过“知识之路”到达“知识城堡”；据我所知，手抄书文化阶段没有与之对应的教材。

(432) Marc Soriano, 'Les Contes de Perrault'引起了有趣的“辩论和争吵”，这一点似乎和那一场辩论具有类似的意义。

(433) 这些问题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癫疯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里提出的问题；在最近的著作里，他探讨了“语词与事物”变迁的观点。我认为，这些情况似乎和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文化的变迁有关系。

(434) Schücking, *The Puritan Family*, p. 68.

(435)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91.

(436) Pierre Chaunu, 'Sur la Fin des Sorciers.'

(437) Febvre, 'Sorcellerie'.

(438) 关于印刷术对奥秘故事和巫师立场的影响，见 Febvre, 'Sorcellerie', pp. 276-277。

(439) Chaunu, 'Sur la Fin des Sorciers', p. 906.

(440) 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强调指出，基督徒的婚礼是冲突的核心，因为它干扰土著警惕不育、保证婚育硕果的仪式。我认为，凡是削弱接生婆或草药医师权威的举动都可能会引起焦虑，因为接生婆主持降生仪式，草药医师被赋予了治死人或治愈人的权力。

(441)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16. 威廉·蒙特尔也觉得，特雷弗-罗珀显示出“贵族式的轻蔑，令人反感”，见 William Monter, 'Chronique', pp. 205-213, 209。

(442)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128-129.

(443) Steele, 'What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are About,' pp. 351-353.

(444)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128-129.

(445) Ibid, p. 101.

(446)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 456.

(447) Ibid, p. 455.

(448) Ibid, p. 456.

(449) 特雷弗-罗珀把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神秘主义”与科学进步联系在一起，又武断地将其与“庸俗”、“滑稽”和“粗陋”的“巫术信仰”割裂开来，见其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132-133。在这里，我同意蒙特尔(Monter)在《编年史》('Chronique')中的断言：没有理由不将赫耳墨斯神秘主义和 16 世纪的其他轻信上当分割开来。

(450) Wa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from Ficino to Campanella*, chap. 1.

(451) Yates, *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pp. 103-107. 她的描述和 1623 年的一本小册子引起的恐惧类似：'Horrible Pacts made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pretended invisible ones'和后来的反犹文献也类似，这种秘术和集体心理病理的关系值得注意，见本书第二章注释

(322)。

(452) Trevor-Rope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40.

(453)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 570. 他认为,在对猎巫狂热持怀疑态度的人里有《圣经》直解派。作为新教徒,他们反对那些异端的"托钵僧"迷信,因为这样的迷信把《旧约圣经》里的巫师变成了魔鬼崇拜者。另一方面,路德派里也有猎巫狂,他们"从头到尾阅读《圣经》,多达 53 次……可是他们却处死了 20,000 人"。这是特雷弗-罗珀指出的现象,见其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59。

(454) Steinberg, S. H.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p. 47.

(455) 比如 Henri Meylan, ed.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所收文章。

(456) Bietenholz, *Basle and France*, pp. 36-37.

(457) 罗伯特·金顿的几篇文章评述了这样的灵活政策:'The Business Activities';'The Plantin Breviaries';'Christopher Plantin and His Backers';'Patronage, Piety and Printing'。

(458)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 42.

(459) 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用这句话来评论科里内(Coines)的两手政策,他既出版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的著作,又出版索邦神学院神学家对戴塔普尔的抨击,见 Armstrong, *Robert Estienne*, pp. 13-14。普朗坦以王室"首席印刷商"的身份为西班牙国王效力,又以正式印刷商的身份为荷兰的加尔文教徒服务,这不过是两手策略最著名的例子之一。见本书第 443 页。

(460) Voët, *The Golden Compasses*, 1, 29-30 指出,普朗坦的圈子和"爱之家"教派里存在这种"第三势力"。Verwey, 'Trois Hérésiarques', p. 329 也用了"第三势力"这一说法,这篇文章率先研究"爱之家"的创建人。又见 Friedrich Heer, *Die Dritte Kraft*。

(461) Kamen, *The Rise of Toleration* 以苏黎世和英格兰这两个地方为例。关于奥珀利努斯对卡斯特利奥等主张宽容的作家的支持,见 Bietenholz, *Basle and France*, p. 131。奥珀利努斯在巴塞尔经营的这家印刷所刺激了日内瓦的加尔文派和反宗教改革的罗马当局。1559 年,它成为特伦托公会议确定的黑名单上的 15 家公司之一,见 Steinmann, *Oporinus*, p. 97ff.。普朗坦和昆赫特(Dirk Coornhert)及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的关系都不错;昆赫特翻译卡斯特利奥的著作并且相信,应该谴责强制人改宗的政策,而利普西乌斯则持更加消极的、新斯多葛主义的政治立场。关于昆赫特和利普西乌斯在 16 世纪 90 年代的辩论,见 Jellema,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 1143 和 Rekers, *Montano*, pp. 84-86,雷克尔斯强调审查制度在辩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研究宗教宽容时,需要在审查制度造成的新问题上下更大的工夫。见 Joseph Lecler, *Toleration and the Reformation*。)关于昆赫特与"爱之家"的关系,见 Verwey, 'Trois Hérésiarques', pp. 322-324。关于昆赫特与普朗坦的关系,见 Voët, *The Golden Compasses*, 1, 385。利普西乌斯是普朗坦家的常客,所以普朗坦家有一间客房就用他的名字命名。

(462) Kirsop, 'The Family of Love in France'评述了 1965 年前的有关"爱之家"文献。近年这方面的评述见 Verwey, 'The Family of Love'。关于巴松印刷所,见本书第二章注释(297)。

(463) Kirsop, 'The Family of Love in France,' p. 107.

(464) Kingdon,'Patronage,Piety and Printing,'pp. 24-25.

(465) Rekers,*Benito Arias Montano*,p. 430.

(466) George H. Williams,*The Radical Reformation* 第 19、22 和 23 章提供了大量有关"爱之家"和"尼科德默派"的背景。据 Carlo Ginzburg,*Il Nicodemismo*,著名的草药先驱奥托·布伦费尔(Otto Brunfels)率先主张在宗教敌意的地区伪装信奉当地的宗教。后来的加尔文谴责这样的伪装,将其斥之为"尼科德默派"。罗兰·贝因顿(Bainton)在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71),p. 309 撰文评论 Ginzburg 的 *Il Nicodemismo*。又见 Walker,'A Secret Conspiracy Exposed',pp. 42-44。

(467) Kingdon,'Christopher Plantin and His Backers,'p. 315.

(468) 关于奥珀利努斯(Oporinus)周围的圈子,见 Bietenholz,*Basle and France*,pp. 124,141,203;Martin Steinmann,*Oporinus*,pp. 76-177;Verwey,'Trois Hérésiarques',p. 315。关于造访过普朗坦的学者,见 Voët,*The Golden Compasses*,1,367-369。邦贝格的印务公司为几个印刷商的圈子和几代人的联系提供了有趣的联系。该公司的创建者丹尼尔·邦贝格在低地国家起家,移居威尼斯,率先印制希伯来《圣经》,留下几个儿子和侄儿在安特卫普继续经营印刷所,让他们继承各种字钉;他向北非犹太人社区出口希伯来《圣经》,为普朗坦提供财务支持。从 1517 年到 1559 年,邦贝格在威尼斯经营印刷厂。维萨里派遣邦贝格的一位工头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巴塞尔的奥珀利努斯印刷所,要这位工头带上《人体的结构》的所有图版。邦贝格这家印刷所有一位著名希伯来语校对埃利亚斯·列维塔(Elias Levita,卒于 1549 年),是当时最著名的希伯来学者。列维塔 1538 年论元音点的著作(1539 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重印)为阿里亚斯·蒙塔诺和路易·卡佩尔准备了条件,见 Box,'Hebrew Studies',p. 333。丹尼尔·邦贝格为波斯特尔等学者的西伯利亚研究和阿拉伯研究提供帮助,见 Dannenfeldt,'The Renaissance Humanists'(esp. 101;113)。安特卫普的"冯·邦贝格"以"富商"的伪装活动,他是"爱之家"创建人尼克理(H. Niclaes)最早的追随者之一,见 Verwey,'Trois Hérésiarques',p. 324。他们成为加尔文派在安特卫普的活跃人士,但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的谋士们将他们放进著名异端人士的名单以后,他们被迫逃离安特卫普。见 Kingdon,'Christopher Plantin and His Backers',pp. 309-10;Verwey,'The Family of Love',p. 235。

(469) 让诺克普洛斯(Deno Geanokoplos)在 *Greek Scholars in Venice* 里指出,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在阿尔卡拉主持编印多语版《圣经》时,其中的希腊语版本就得到阿尔杜斯的主编之一的帮助。

(470) Armstrong,*Robert Estienne*,p. 15.

(471) 约翰·阿梅尔巴赫的通讯网不亚于普朗坦的通讯网。他的通信朋友包括:罗伊希林、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瓦尔德塞米勒、丢勒、特里特姆斯、柯贝尔格,形成了一个联系希伯来学者、拓荒性地图绘制人、镌刻家等博学鸿儒的圈子,堪与后来的安特卫普圈子一比。见 Lucien Febvre,*Au Coeur Religieux du XVIe Siècle*,p. 140 提供的名单。至于以法兰克福的维谢尔印刷所为中心的中欧通讯网,见 Evans,*Rudolf II and His World*,p. 282 以及他的文章'The Wechel Presses'。其他互相交叠的圈子见 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 chap. 5, section III。

(472) "全球规模"(global scale)是世界地图的出版先驱奥特利乌斯提供的,关于他和普朗坦的通信,见 René Boumans, 'The Religious Views of Abraham Ortelius'。有趣的是,奥特利乌斯和《圣经》编务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他的父亲和叔叔,他的父亲和叔叔把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的英文版《圣经》翻译成德语。关于"人类家庭"观念不断拓宽的情况,见 Bouwsma, *Concordia Mundi*, *passim*。波斯特尔(Postel)出身寒门,自学成才,是诺曼人,掌握了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其他外语,在威尼斯和邦贝格共事,在巴塞尔与奥珀利努斯合作。在和普朗坦及奥特利乌斯的通信里,他提到"爱之家",把印刷所描绘为"基督胜利的长矛与短剑"(第 240-242 页)。

(473) Voët, *The Golden Compasses*, 1, 383.

(474) Trevor-Roper, *The Crisis*, pp. 200-202 描绘了三个阶段:将伊拉斯谟、培根和牛顿的三个时代称为"三个光明阶段",将其视为"国际思想交流"的三个间歇,这三个阶段没有"意识形态之战",冷战热战都没有。

(475) Hillerbrand, 'The Spread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pp. 270;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pp. 12-13.

第五章

(1) Price, *Science since Babylon*, pp. 98-99,他强调这一普及的主题,将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联系在一起。又见本书第 691 页"结语"里引用的普莱斯(Price)的一段话。

(2) McLean, *Humanism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p. 22. 麦克林的观点来自于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里的一段话(引文见本书第一章注释(85))。最先提出倒退主题的是乔治·萨尔顿,见其'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pp. 62-68; Thorndike 予以支持,见其 *A History of Magic*, pp. 5-6。萨尔顿在以后的一些著作里强调,印刷术使科学进步成为可能,但他同时又不放弃印刷术产生"倒退"的观点,见其 *Six Wings*, pp. 3, 116-119; *Appreciation*, pp. xi, 89-95; 'The Quest for Truth', p. 65。他最后的结论恐怕最好是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为"两难"。见其 *Appreciation* 第 168 页以及本书第 508 页对他所谓"文化滞后"的讨论。萨尔顿分散的估计和普赖斯关于"催化剂似的"效应暗示,有必要修正一切科学史家认为印刷术的出现不重要的意见。Drake, 'Early Science and the Printed Book: The Spread of Science Beyond the University'指出了这样的不足。正如该文副标题所示,斯提尔曼·德雷克的文章和普莱斯的评论都把印刷术与科学的传播及通俗语翻译联系起来。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见本书第六章。

(3) Sarton, *Six Wings*, p. 6.

(4) Thomas Browne, *Religio Medici* (1643), part 1, chap. 16,转引自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p. 323(可惜这段引文和该书第 15 章里的一段文字混淆了)。见 Endicott, ed. *The Prose of Sir Thomas Browne*, p. 21。

(5) 在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第一卷里,培根把"圣言之书"和"圣行之书"并列,稍后他又说:"我们的救世主……将这两种书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学习,使我们免予出错:

先读《圣经》,然后研究万物生灵。"见 Warhaft, *Francis Bacon. A Selection of His Works*, pp. 205,242。巴西尔·韦利认为,"布朗借用培根式的表述……将自然称为'圣书'",见 Wille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p. 51。因为培根的同时代人比如罗利、坎帕内拉和伽利略也论述这一主题(布朗也读他们的书),所以"培根式"这一标签应该慎用。见 Raleigh,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1614)第一、二卷论"苍天"上的"象形文字的相关段落……以及论生灵和植物在陆地和海洋上的书写的文字"。又见本书第 458 页伽利略的引语。关于精英人士利用这一主题的哲学背景,见 Nelson, 'The Quest for Certitude', pp. 363-372。

(6)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p. 319.

(7) 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p. 135.

(8) Rouse and Rouse, 'The Texts Called Lumen Anime,' p. 28. 该书序言的意译版大约是 1332 年完成的,编纂者可能是一位奥古斯丁修士,名叫沃劳的戈德弗莱(Godfrey of Vorau)。

(9) 传统的"记忆术"给生动、多彩和多样的课题赋予重要意义,Yates, *The Art of Memory*, *passim* 对此做了精彩的阐述。她还描绘教士如何调动这些技艺来达到基督教的教谕目的。伊拉斯谟延长了这一传统的寿命,他鼓励人们为讲演和写作去学习地理;华生对此做了描绘,见 Watson, *The Beginning of the Teaching of Modern Subjects in England*, p. 111。

(10) 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p. 137. 注意这样的描绘和库尔提乌斯描绘的布道坛文献有关,和勒克莱尔研究的修院文化有关;但他们的描绘未必包含中世纪其他职业群体比如商人、木刻家、药剂师等群体的观点。中世纪晚期的博物学家关注的是自然现象的属性,而不是其用作记忆辅助手段的用途。勒克莱尔还强调了经院和修院的其他差异。

(11) 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pp. 186-187 探讨了这一类序文,典型的例子有兰兹伯格(Landsberg)为《快乐花园》(*Hortus Deliciarum*)作的序文:"这是为自己编纂的书,我是一只小蜜蜂……用我从《圣经》采集的花蜜……",见 Straub and Kellered, *Herrade de Landsber*, p. vi。他将读者比喻为"反刍与选择的蜜蜂",这个基本主题至少可以追溯到普鲁塔克和巴西尔。这个比方还见于卡克斯顿早期的一篇序文。见 Montgomery, 'William Caxt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Tudor Critical Thought', pp. 100-101。其变异形式可见于马修·阿诺德对"甜蜜与光明"的探讨。

(12) 这是拉伯雷的讥讽,见《巨人传》第七章,Michael Kline, 'Rabelais and the Age of Printing', p. 13ff. 对此作了介绍。

(13) 关于托马斯·迪吉斯的论文,见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pp. 35 以及本书第七章注释(146)。

(14) 语出《化验师》(*Assayer*)(1623), in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ed. and tr. by Stillman Drake, pp. 237-238。在上文所引的布朗有关"两本书"的那段话中,布朗将"异教的《圣经》和神学"与"太阳的自然运转"联系起来,以便和"以色列的儿童"羡慕的"超自然状态"进行对比。Chambers, 'Sir Thomas Browne'探讨了布朗对哥白尼观点的谨慎态度、对伽利略的钦佩,显示了他对当代科学文献的熟悉。

(15) Thomas Kuhn, 'Scienc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 78.

(16) Manuel, *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pp.* 111-114, 122-123.

(17) 尤其注意参考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th Century England*。在'Reason, Tradition an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Science'里, M. D. 金(M. D. King)介绍了莫顿和库恩的方法论并主张,"研究传统……形成和传输的分析"是社会学家的任务(p. 25)。我希望,本章的论述将会说明,这个问题为何还需要社会学家的帮助。

(18) George Basalla,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External or Internal Factors?* 一书的序文(pp. ix-x)列举了目前学界提出的"内因",却没有提及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化。我认为如下文所示,如果更注意这一转化,巴萨拉这本书副标题里的二分术语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19) 有人认为,"政府公办邮政的兴起"是"真正够得上革命的"传播变革,见 George N. Clark,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54。关于强调改善的邮政(和改善的陆上交通)促进了"思想领域的交流"和"科学的发展"的类似的例子,见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th Century England*, p. 222。

(20) Vann(ed.), *Century of Genius*, part I, 'The Medium and the Message,' p. 1.

(21) 比如 Ornstein, *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p. 198。

(22) Rosen, 'In Defense of Kepler', pp. 141-149 引用了开普勒赞誉印刷术的一大段文字,文字的出处是 1606 年出版的著作。

(23) 关于开普勒的艰苦奋斗以及梅森和伽利略的活动,见本书第八章。

(24) Stillwell, *The Awakening Interest in Science*, pp. 32-34 提供了雷乔蒙塔努斯在 15 世纪 70 年代刊布的印刷品的数据。进一步的讨论见本书第 586 页之后。

(25) Merton and Zuckerman,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26)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p. 136-137 强调科学教材的"保守"功能, Merton and Zuckerman,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强调期刊论文的创新功能。但两人都忽略了创新性著作这个范畴。在我们这个世纪,创新性著作仍然可能以专著的形式出版, Anthony Parker, 'The Difficult Publishing Art of Persuading Scientists to Sit Down and Write Books', pp. 831-834 对此作了说明。帕克以华生(G. N. Watson)论"贝塞耳函数"(Bessel function)的专著为例说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在这个书单里加上保罗·迪拉克(Paul Adrian Maurice Dirac)的 *Quantum Mechnics*。科学出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前印刷品"的流通增多,超过了期刊的数量,以至于史蒂芬·陶尔曼(Stephen Toulmin)做了似是而非的表述:"只有过时的思想才得到出版",见 Toulmin, *Human Understanding*, p. 275。当然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始终是对的。除非学术写作付梓问世,否则出版工作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27) Merton and Zuckerman,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p. 68.

(28)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p. 27-28.

(29) 许多学者强调指出《天文学大成》在阿拉伯天文学家里拥有的权威;见 Aydin Sayili, *The Observatory in Islam*, p. 80; S. H.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 pp. 172-174;

Watt,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Medieval Europe*, , pp. 24-25。三人一致指出，托勒密的阿拉伯批评者和校勘者发挥的作用类似于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学者所起的作用。偶尔有人提出不同于托勒密的模式，亦有人提出增删和修改，但目的都在于解释托勒密，而不是抛弃托勒密，是要继承其流传下来的抄本。关于这一点，又见 Pannekoek, *A History of Astronomy*, p. 169。

(30)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p. 188.

(31) Ravetz,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p. 21.

(32) 特雷比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1451 年从希腊语翻译的本子是 1528 年印行的。据 North, 'Medieval Background', p. 8 记述，拉维兹(Ravetz)所谓足本的《天文学大成》在 16 世纪之前完全不为人知是过分夸大之词。据 Gingerich, 'Crisis versus Aesthetic i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88 所言，在 15 世纪 60 年代，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能够理解托勒密，这一评论似乎相当公允。

(33) Toulmin and Goodfield, *The Fabric of the Heavens*, p. 169。这本书对印刷术的强调(pp. 201-202)超过了其他书。

(34) 关于这一点，见 Derek de Solla Price (ed.) *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 p. 151。Benjamin and Toomer, *Campanus of Novara*, pp. xii-xiii 指出，手抄书经常弄错数字，手抄本有"被污染"的传统。

(35) 关于"印刷术之前这座最伟大图书馆"的情况，见 Parsons, *The Alexandrian Library*。他指出，这座图书馆在七百年甚至九百年里实际使用的情况，"仍然是一块待研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p. ix)。帕森斯几乎不加批判地接受有关亚历山大城的古代传说，他这一倾向应该用裴弗尔的观点来平衡一下，见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esp. pp. 236-237)。裴弗尔指出，即使文艺复兴时期也没有任何亚历山大图书馆那种宏伟的图书馆(p. 110)。埃德加·齐尔塞尔探讨古代"有系统、有组织合作"的缺失时提到亚历山大城，对它扮演的非凡角色重视不够，见 Zilsel,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p. 328。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齐尔塞尔未能给印刷术出现前后的差异留下充分的余地。

(36) Hoyle, *Astronomy*, p. 35.

(37)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383. 进一步的讨论见本书第七章。

(38) Muller, *Freedom in the Western World*, p. 239.

(39) Karpinski and Staubach, 'An Anglo Norman Algorism,' p. 126.

(40) Joseph and Frances Gies, *Leonardo of Pisa*, p. 98. 算盘在 12 世纪重新露面，R. W.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pp. 186-187 对此作了记述。"算盘派"和"十进制派"长期争论。印刷术到来并胜出以后才有定论，见 Tobias Dantzig, *Number: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pp. 33-34。

(41) A. R. Hall,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234.

(42) 关于人如何作为"万物的测量尺度"，见 Dupree, 'The Pace of Measurement from Rome to America', pp. 19-40 以及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p. 204-240。该书有一段

有趣的描绘(pp. 35-36):水手用一个想象的人的形体(头朝北,脚朝南,两臂伸展东西向)来测定星相导航。

(43)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200 转引 Leonard Digges 的副标题"准确计量并快速演算一切土地、方形、木材、石料、尖塔、梁柱和球体"。莱昂纳德·迪吉斯是托马斯·迪吉斯之父,本书第 458 页曾经引用托马斯·迪吉斯对哥白尼学说的描绘。

(44) Crombie(ed.), *Scientific Change*, p. 316 ff.

(45) Sarton, 'The First Explanation,' p. 160.

(46) Bernard Smith, 'European Vision and the South Pacific', p. 67. 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评述的是陪同库克船长远征的画家所做的镌刻画,这些画表现土壤、岩石和植物。

(47) 转引自 Rossi,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pp. 48。

(48) 见 Krinsky, 'Seventy-eight Vitruvius Manuscripts',又见 Zoubov, 'Vitruve et ses Commentateurs du XVIe Siiecle', pp. 69-70。祖波夫(Zoubov)在这里述及,插图人如何努力重新为维特鲁威笔下的雅典风塔配图。我觉得,为维特鲁威和托勒密失传的插图重新作画的努力,似乎应该投以更多的注意力,这一强大的刺激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中心透视的发明,以及新的地图投影术,和歌剧的发明一样,可能是试图恢复古人作为(其实是被误解的作为)的结果。见本书第三章注释(281)。

(49) 托勒密的《地理学》被发现时,其中的地图早已散佚,见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33。首版 500 册的《地理学》(*Geographia*, Bologna, 1477),让许多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首次看到地图这样的东西,见 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 p. 89。

(50) Rossi,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p. 53.

(51) Ibid, pp. 47-49. 罗西引用 A. R. 霍尔论维萨里的文字,又转述萨尔顿论新插图的文字,萨尔顿认为,新插图促成对"老框框语词"更清楚的意识。但罗西没有说明,印刷术之前,手抄书插图是如何退化变形的。

(52) Thomas Kuhn, '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p. 192.

(53) 布朗非常熟悉 17 世纪《圣经》学者在希伯来语元音点等问题上的争论,见 Browne, 'Of Language', *The Prose of Browne* (Endicott, ed.), p. 602 ff.。恩迪科特在序文里指出,布朗对皇家学会有关列文虎克(Anthony van Leeuwenhoek)研究成果的报告感兴趣(p. xiii)。

(54) Wille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p. 68. 相关的文字见 Browne, *Paradoxia Epidemica*, chap. 9 *The Prose of Browne* (Endicott, ed), p. 143。

(55) 中世纪一位抄书人(12 世纪巴塞罗纳一种手抄本)使阿基米德的著作不准确,他把从 C 点到 L 点的一条线和罗马数字 150 混淆起来了。Marshall Clagett, *Archimedes*, p. 17 指出了这一错误。

(56) Westman, 'Kepler's Theory,' pp. 253-254.

(57) 帕拉切尔苏斯语,转引自 Pagel and Rattansi, 'Vesalius and Paracelsus', p. 316。

(58) 语出 Peter Severinus, *Idea Medicinae Philosophicae* (1660), by Allen Debus, *The English Paracelsians*, p. 20。

(59)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p. 19, 28.

(60) 科卢奇奥·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及其朋友以人文主义的立场反对经院哲学,认为不用凭借书本和基础文本研究而进行论证是极大的罪恶,见 Gilber,'The Early Italian Humanists',p. 219。萨卢塔蒂强烈反对医学研究中的经验主义立场,见 Kemp,'Il Concerto dell'Anima',p. 130。

(61) 1559 年,皇家内科医师学会迫使约翰·盖因斯(John Geynes)退会,要他收回原来的观点:盖仑并非不会出错。见 Debus,*Science and Education*,p. 6。

(62) Temkin,*Galenism Rise and Decline of a Medical Philosophy*,p. 132.

(63) 威廉·佩蒂勋爵(Sir William Petty)对"语词的暴众"嗤之以鼻。转引自 R. F. Jones,*Ancients and Modern*,p. 91。关于追求口才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见 Gray,'Renaissance Humanism'。

(64) 引文见 Vives,*De Anima*(1538),转引自 Haydn,*The Counter Renaissance*,p. 199。

(65) Hannaway,*The Chemists and the Word*,p. 113.

(66) R. J. W. Evans,*Rudolf Ⅱ and His World*,p. 142.

(67) 关于帕拉切尔苏斯的情况,见本书第三章注释(337)。关于阿雷蒂诺的追随者,见 Garin,*Italian Humanism*,p. 215。

(68) 尤其参见 Haydn,*The Counter Renaissance*,chap. 4。

(69) 托马索·坎帕内拉 1607 年书简,转引自 Garin,*Italian Humanism*,p. 215。

(70) "自我形象"被认为是"比里当座右铭",常见于 14 世纪的文献里,见 Astrik Gabriel,*The College System*,p. 18。

(71) 笛卡尔的自述即为一例,他决定放弃"文字研究",动身去研究"伟大的世界之书",见其 *A Discourse on Method*,Part I,pp. 6-7。

(72) Adelmann, Introduction to *The Embryological Treatises of Hieronymus Fabricius of Aquapendente*,p. 54.

(73) 见皇家学会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665/6 年 1 月 8 日)通告,转引自 Bernard Smith,'European Vision',p. 65。

(74) Hale,*Renaissance Exploration*,p. 9.

(75) Ziman,*Public Knowledge*,p. 35.

(76) Ibid, p. 45. 关于"公共知识而不是私密知识"的定义,见 Merton,*Science, Technology*,p. 219。

(77) Boulding,*The Image*,p. 77. 谢拉(J. H. Shera)对这一观点表示肯定,见其'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Library Science',p. 23。

(78) Lloyd Brown,*The Story of Maps*,p. 23.

(79) Boulding,*The Image*,p. 66.

(80) 见本书第 109-110 页。

(81) 素材见 Keuning,*Willem Jansz. Blaeu*;Koeman,*Joan Blaeu and His Grand Atlas*。1973 年第二期《探询》(*Quaerendo*)是纪念约翰·布劳的特刊,撰稿人有维茨·海林哈(Wytze Hellinga)、恩斯特·克罗恩(Ernst Crone)、拉方丹·韦尔维(H. de la Fontaine Verwey)等。

(82) 布劳在 1612 版的《航海之光》里介绍了他印制的“航海卡”的优点，这本书是他为水手印制的通俗语手册。他注意到，有些水手喜欢手写的卡片，因为它们“可以每天写，每天改”；但他认为，“手写的卡片不可能好，速度也不可能快”，不如机印的，而且由“不懂的人抄写”，手写的卡片更容易出错。他向读者担保，机印的卡片同样“容易纠正”。而且，“任何人向我们指出”错误时所花的经费“都由我们负担”。见 Blaeu, *The Light of Navigation* 1612 版的复印本。（多谢福尔杰图书馆的蕾切尔·多吉特让我注意到这一信息。）

(83) 除了本书第 600 页的讨论外，参见 Verwey, 'Willem Jansz. Blaeu', pp. 87-105 的相关材料。

(84) 开普勒曾经受到他喜爱的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和墨卡托的误导，见 Rosen, *Kepler's Somnium*, appendix 224-225。

(85) Hale, *Renaissance Exploration* p. 9.

(86) Issawi, 'Arab Geography,' p. 117.

(87) Durand, *The Vienna-Klosterneuberg Map-Corpus*, *passim*。克罗斯特斯堡的学术圈子是奥古斯丁修士与帕多瓦和维也纳学者的结合，他们引进天文学、地理学和数学的手抄本，雇佣专业抄书人誊写；这似乎是 15 世纪一种独特的企业行为，和后世互相竞争的地图出版商不同。到了 17 世纪，欧洲的地图制作中心不下 18 个，见 Lloyd Brown, *The Story of Maps*, pp. 156-157。

(88) 见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给一位佛罗伦萨珠宝商的信，转引自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p. 99。据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p. 25 记述，1375 年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 Atlas)一定会使乔叟和彼特拉克大吃一惊。又见从修道院壁画上看到的对但丁世界地图观念的提示，Orr, *Dante and the Early Astronomers*, pp. 224-245。Skelton, *Explorer's Maps* 的插图 3 对马可波罗的 *Travels* 里粗糙的象形文字做了图示说明。

(98) Endicott, introduction, *The Prose of Sir Thomas Browne*, p. xv.

(90) Sarton, *Six Wings*, p. 6.

(91) 据我所知，这种“田野调查”最早的例子是威廉·伊文思(William Ivins)描绘的一次考察；15 世纪 80 年代，谷登堡的助手彼得·舍费尔(Peter Schoeffer)为编纂《德意志植物志》(*Gart der Gesundheit*)所进行的考察。见本书第 266 页。

(92) Sarton, *Appreciation*, p. 57.

(93) Ibid, p. 60.

(94) Reeds,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Botany,' pp. 27-29.

(95) Ibid.

(96) William Ivins, *Three Vesalian Essays*, pp. 50-51. 书里转引了普林尼的言论，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关于植物插图，除了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尼桑(Nissen)、艾格尼丝·阿尔伯(Agnes Arber)、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等人的标准描述外，Jerry Stannard, 'The Herbal as a Medical Document', p. 212 ff. 描写了中世纪医学文本里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笔下的药草与插图互相脱离的情况，生动有趣(p. 217)。

(97) Sarton, *Appreciation*, p. 5.

(98) Arber,'From Medieval Herbalism to the Birth of Modern Botany',pp. 322-333 描绘了汉斯·韦迪茨(Hans Weiditz)作画的情况,他在为 1530 年著名的药草书作画时排除了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常规的图式。这本书成为植物描绘史上的里程碑。A. R. Hall,*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pp. 43,47 指出,维萨里《人体的结构》里的一些插图比传统文本里的插图更加准确。

(99) Reeds,'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Botany,'pp. 540.

(100) 关于公众对林奈的回应,见 Loren Eisley,*Darwin's Century*,p. 17。本书第二章第四节讨论过植物学和动物学里的回馈机制。

(101) 关于福克斯(Fuchs)出版的袖珍本药草书,见本书第三章注释(308)。

(102) Sarton,*Six Wings*,pp. 138-139,又见该书 pp. 144-146 普朗坦公司出版植物学著作的情况。

(103)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II,part iv,'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and Man',esp. chaps 1 and 2. 又见 Durand,'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15th Century Italy',p. 25. 迪朗认为,布尔克哈特的"断代图式几乎完全"忽视科学,我则认为,迪朗的批评需要修正。这是因为虽然布尔克哈特论述科学时匆匆一掠,但科学"在他的断代图式"里还是很重要的,后来的辩论显示了科学在他的图式里的地位。

(104)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II,p. 283.

(105) 波莱沃洛(Pollaiuolo)和曼坦那(Mantegna)的镌刻画见 Mayor,*Prints and People*,*figuresnos.* 184-191。

(106) Gillispie,*The Edge of Objectivity*,p. 57. 稍后(p. 60),吉里斯皮提到维萨里曾经工作过的布鲁塞尔、卢万和巴黎,但他说,维萨里"恨他的老师",不说他从老师那里获益良多,也不说维萨里因协助老师编辑盖仑的古籍而获益匪浅。"潦草的哥特体"常常比"粗黑的意大利体"读起来容易,这一事实也常常被忽视了。

(107)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II,pp. 281-282.

(108) Wightman,*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I,p. 111.

(109) 关于林·桑代克对桑特里特(Santritter)等相关材料的讨论,见 Thorndike,*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pp. 332-337。

(110)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II,p. 286.

(111) Wolf,*A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I,8.

(112) Ibid,I,2. 这一"近代主义"观点本质上和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观点是相同的,盖伊的两卷本 *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 第一卷的副标题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足以为证。

(113)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I,part III,pp. 175 ff.

(114) Thorndike,*Science and Though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pp. 19-20.

(115) 关于 China 与 Cathay 是否都指中国,以及前人难以分辨 Sina 和 Seres 的困难,见 J.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I,chap. 7,(d)(2),pp. 168-170。

(116) Pächt,'Early Italian Nature Studies.'关于罗伯特·索斯韦尔(Robert Southwell)的雕塑

和 12 世纪的药草，特别参阅该书第 29-30 页。

(117)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 28.

(118) Marsak(ed.), *The Rise of Science in Relation to Society*, introduction, p. 1.

(119)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II, 286. 这句话也经常被人引用，这是布尔克哈特对利布里(Libri)的 *Histoire des Sciences Mathématiques en Italie* (1838)所做出的勉强的让步。

(120) Rosen, 'Renaissance Science as Seen by Burckhardt and His Successors,' p. 79.

(121)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27.

(122) 威廉·惠韦尔(Whewell)语，这是他对古希腊到近代欧洲那段黑暗而荒漠的时期的描绘。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I, 5 对此做了评述。又见 Hall, 'On the Historical Singularit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203。

(123) 20 世纪许多数学史家仍然持这个观点。比如，Tobias Dantzig, *Number: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p. 129 说"千年昏睡"。又见 Sabetai Unguru, 'Witelo and Thirteenth century Mathematics'。

(124) 当然，这一观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支持。比如伍尔夫就说，中世纪教会是科学的"主要障碍"，见 Wolf,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I, 8。上文业已指出，虽然 Randall,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Method at the School of Padua'把人文主义视为应该诅咒的东西，但他和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之类的中世纪研究专家还是有距离的，因为他强调世俗的反教会的成分。

(125) Schmitt, 'Essay Review: A Fresh Look at Mechanics' I, 161.

(126) Pierre Duhem, *Système* VII, 3—4，转引自 Rosen, 'Renaissance Science', p. 94。抨击 16 世纪编者序的类似的观点见 Thorndike,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pp. 332-334。

(127) Crombie, *Augustine to Galileo*, pp. 268-269.

(128) Randall,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p. 212. 又见该书修订版(1940，纽约)的一段话(p. 212)："到 1375 年，笛卡尔、伽利略和哥白尼这类人物的天才已在人们的期待之中。"

(129) Randall,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rev. ed.), pp. 215; 217. 又见其'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Method at the School of Padua,' p. 197。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断言："古代科学的最后一小块领地……的恢复成为……近代科学形成的一个要素；这一小块地盘是阿基米德的著作，由于 1643 年的翻译，他的著作广泛普及了。"见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p. 58。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广泛普及了"。

(130) Clagett, *Archimedes in the Middle Ages* I, 14.

(131) Clagett and Moody, *The Medieval Science of Weights* 提到，约达努斯(Jordanus)在排印他们的序文时没有用莫尔贝克(Moerbeke)的译文(p. 10)。他们还指出，16 世纪的作家比如卡尔达诺(Cardano)、塔尔塔利亚(Tartaglia)和本尼德蒂(Benedetti)似乎借用了卡尔达诺的理论却没有表示感谢，甚至还批评卡尔达诺的工作(p. 20)。

(132) 据 Duran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 p. 45 的记述，阿基米德译本的早期版本(1503,

1543)"悍然剽窃"莫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的译文。那个时候对剽窃的指控相当频繁,但你会质疑,在知识产权尚未明确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这样的指控是否妥当。无论如何,迪朗(Durand)认为,16 世纪莫尔贝克那代人之前,阿基米德一直"处在冬眠状态"。

(133) Clagett, *Archimedes*, p. ix. 应该指出,尽管只掌握了"几何学的基础知识",13 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还是比 11 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后者根本闻所未闻欧几里得,更不知道波伊提乌(Boethius)所谓的三角形的内角为何物,即使在请教了沙特尔的福尔拜(Fulbert of Chartres)之后,也弄不清内角的意思。见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pp. 201。

(134) 迪昂语,转引自 Rosen, 'Renaissance Science', 96(from *Système* X, 45)。

(135) Clagett,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in the Middle Ages*, p. 638. 又见帕尔玛的布拉秀斯(Blasius of Parma)在一篇论文中就"衰落"和"停滞"发表的类似观点,该文写成的年代大约在 1400 年前后,收入 Clagett and Moody, *The Medieval Science of Weights*, p. 20。

(136) Moody, 'Galileo and his Precursors,' p. 2.

(137) Crombie, *Augustine to Galileo*, p. 269.

(138) Rosen, 'Renaissance Science,' p. 95.

(139) Ibid, pp. 94-97. 迪克斯特乌斯(Dijksterhuis)重申迪朗反对口头辩论的立场(转引自 Rosen from *Système* VII, 621-622)。又见本书第 506 页的讨论。

(140) Rosen, 'Renaissance Science,' p. 94-95. 中世纪人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描绘天使的运动,描绘爱的烈度的增减;罗森对此的研究很清楚,他似乎比其他学者略胜一筹,因为其他学者的记述常常忽略了中世纪玄想的超自然语境。

(141)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27.

(142) 关于人文主义者在意大利复活古希腊数学文本的详细讨论,见 Rose, 'Humanist Culture and Renaissance Mathematics'。(关于那场辩论的书目见第 46-47 页的脚注。).

(143) Gandz, 'The Invention of the Decimal Fractions,' p. 25. 邦菲尔斯(Bonfils)的名气主要是靠他天文学图表的贡献,他用这些图表来确定希伯来年历。

(144) Gandz, 'The Invention of the Decimal Fractions,' p. 31.

(145) 关于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的工作,见 Sarton, 'Simon Stevin of Bruges(1548—1620)',以及'The First Explanation of Decimal Fractions and Measures(1585)'。又见 Dijksterhuis, *Simon Stevin*;亦见 Struik, 'Mathema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46) Thorndike,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pp. 407-408.

(147) 哥白尼渴望简约,但有人过分夸张他的这一追求,以至于到了歪曲托勒密天文学所需要的本轮的数量。Robert Palter, '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Early Astronomy'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区分专业天文学家的观点和普通人的观点;任何复杂的计算图示都会使普通人感到困惑;例子有中世纪一位国王一段常常被人引用的话。阿方索十世(Alfonso X)命人解释天文学图表时,"他说太糟糕,因为上帝创造宇宙时没有请教他。"(见 Toulmin and Goodfield, *The Fabric of the Heavens*, p. 179;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p. 69。)

(148) Crombie, *Augustine to Galileo*, p. 269.

(149) Rosen, 'Renaissance Science,' p. 88.

(150) 比如 Garin, *Science and Civic Life*, p. 127 的引文。伽利略的告诫使人想起古人对手抄书里图像失真的警告。又见本书第 485-486 页。

(151) 维萨里仔细研究了盖仑的每一部著作,获得了新的认识。埃德温·克拉克(Edwin Clarke)强调了这样的继承关系,见其 Review, *Medical History* (1964), pp. 380-383。16 世纪的解剖学家常常重复这样一句话:"他想信任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书本。"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盖仑的论断。Gernot Rath, 'Charles Estienne', pp. 354-359 指出了这一事实。拉希还指出,大脑底部一个"奇妙的神经网络"表现出令人感兴趣的现象,这是盖仑在牛身上发现的而不是在人身上发现的。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家在做人体尸解时看见了这个奇妙的网络,或者说声称自己看见了这个网络。他们习惯于解剖人体时在身边放一只牛头或羊头,以便更加清楚地显示动脉,这反而使问题更加混乱。(见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p. 142-143 n.。)无论如何,这正好说明,"亲眼所见"不足以创建科学理论。

(152) 早在 1612 年,伽利略就注意到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理论,但开普勒的不系统的、笨拙的行文可能给他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见 J. L. Russell, 'Kepler's Laws of Planetary Motion, 1609-1666', p. 6。

(153) 不久前,阿姆斯特丹的《世界地图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出版社推出的两本书的书名富有表现力:de Vrij, *World on Paper*; Ira C. Koeman, *Sea on Paper*。

(154) Moody, 'Galileo and his Precursors,' p. 42.

(155) Butterfield,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p. 58.

(156) Moody, 'Galileo and his Precursors,' pp. 42-43.

(157) Crombie, 'Quantification in Medieval Physics,' pp. 158-159.

(158) 关于进一步的讨论和例子,见本书第 214 页之后和第 556 页之后。

(159) Nagel, comment in *Critical Problems* (ed. Clagett), pp. 153-154.

(160) Dijksterhuis,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p. 167, section II, no. 98.

(161) Lindberg, 'The Theory of Pinhole Images in the 14th Century,' pp. 299; 323.

(162) Dijksterhuis,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pp. 167-168, section II, no. 99.

(163) 关于争取优先权的竞争,见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率先的研究成果。

(164) Sarton, *Six Wings*, p. 3.

(165) Ibid, pp. 116, 119.

(166) Sarton, *Appreciation*, p. xi. 他又说(p. 89):"初期机印书的时代是文艺复兴的婴幼期。"正如本书第 171 页所言,如果追随他这一说法,那就会使这个用得过滥的术语更加混乱。

(167) Sarton, *Appreciation*, p. 92; Sarton, *Six Wings*, pp. 27; 246, n. 14。正如本章注释(2)所示,早期机印书"倒退的"性质是他 1938 年在《奥西里斯》(*Osiris*)杂志上发表的'Scientific Literature'里提出来的,而他这篇文章又是在阿诺德·克雷布斯(Arnold Klebs)开创性的

'Incunabula Scientifica et Medica'的启示之下完成的。在 1943 年的'The Study of Early Scientific Textbooks'里,他重申了这一观点。

(168) Sarton, *Appreciation*, p. 168.

(169) Sarton, *Six Wings*, p. 6.

(170) Sarton, *Appreciation*, p. 27 评述费拉拉的物理学家时说,他们不仅"睁眼看图书馆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藏书",而且眼睛盯着看"自然之书"。这段文字还赞赏帕拉切尔苏斯的观点。

(171) Sarton, *Appreciation*, p. 5.

(172) Thorndike,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p. 6. 在我看来,桑代克过分夸大了 16 世纪创新性著作以手抄本的形式"停滞"的现象。他列举的从作者死亡到其著作问世的间隔并不是很久——至少和亚历山大时代的人相比是不算长的。"毫无价值"、"毫无用处"放在括号里,以传达一些权威比如桑代克的观点。我认为,它们所谓的"垃圾"应该按照人类学家提出的分析路子重新予以评估。

(173) 这一可能性不应该被夸大。1539 年之前,哥白尼并没有看到雷乔蒙塔努斯最重要的著作,其原因就是它一直是手抄本,从 15 世纪 70 年代到 16 世纪 30 年代一直没有刊布印行。(见本书第 591 页。)

(174)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30. 在这段引文的上一段里(pp. 29-30),博厄斯论述"印刷术与科学",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

(175)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191. 对于柯斯特勒无根据的判断所做的严厉批评,见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406-407。又见本书第七章里的讨论。

(176) 本书第三章讨论过基督教主题的宣传和围绕技术和技艺的"神秘色彩"的反差,见第 270 页。

(177) 关于萨克罗伯斯柯的约翰(Joannes de Sacrobosco,亦名 John of Holywood)的《地球》(*Sphaera*),见 Thorndike, *The Sphere of Sacrobosco and Its Commentators*, introduction。又见 Rosen 在 *Isis*(1949)发表的对该书的评论(pp. 257-264)。亦见 Stillwell, *Awakening Interest*, p. 22, no. 70。Francis Johnson 在'Astronomical T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里说:"这部极端受欢迎的小册子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版本",因为新版本"不断涌现"。1472 年在威尼斯印行首版,到 1501 年之前至少已经出了 30 版,到 1600 年之前,至少出了 200 版。本书第 517 页将要指出,萨克罗伯斯柯的约翰的《地球》像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一样,成了新评论的载体,新数据往往以附录、增刊等形式出现。

(178) 见本书第 79 页对提尔亚德(Tillyard)的介绍。大多数表现"托勒密体系"的近代图表都有误导作用,Hanson,'The Copernican Disturbance and the Keplerian Revolution'强调指出这种误导的性质。关于手抄本的图表的讹误走形,见 Van der Tak,'Calcidius' Illustration of the Astronomy of Heracleides of Pontus', *Mnemosyne* (1972)。

(179) Hellman,'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 p. 186; Wightman, *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 I, 70; Febvre and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 148.

(180) McLean, *Humanism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p. 22.

(181) Sarton, *Appreciation*, p. 4.

(182) Stillwell, *Awakening Interest*, pp. ix-x 评述了早期印刷商可供货的大量库存图书。

(183) 托马斯·库恩批评霍利乌的约翰(John of Holywood)"盲目照抄一本初级的阿拉伯著作",见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p. 123。批评他不懂希腊语的文字见爱德华·罗森对林·桑代克版本的《地球》的书评,p. 259。又见本杰明和图默(Benjamin and Toomer)对诺瓦拉的坎帕努斯(Campanus of Novara)的《行星运行论》(*Theorica Planetarum*)的批评,Benjamin and Toomer, *Campanus of Novara*, p. 25。

(184)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p. 12.

(185) 见 Durand, *The Vienna-Klosterneuberg Map-Corpus*, p. 18。Oakeshott, 'Some Classical and Medieval Ideas in Renaissance Cosmography', p. 248 指出,中世纪文人和手抄书的插图师不懂球体理论。亦见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p. 25; Orr, *Dante and the Early Astronomers*, pp. 224-225; 以及 Skelton, *Explorer's Maps*, fig. 3。

(186) 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 p. 91.

(187) Hunter, 'Elizabethans and Foreigners,' p. 39.

(188) McIlwain, 'Medieval Instit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p. 73. 又见米歇尔·布瓦德(Michel de Boüard)类似的评论,他将伊西多尔的《语源学》(*Etymologies*)和 13 世纪末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的《哲学大全》(*Compendium Philosophae*)进行对比,见 Boüard, 'Encyclopédies Médiévales, Sur la"Connaissance de la Nature et du Monde"au Moyen Age', p. 301。

(189) Taylor, *No Royal Road*, p. 200.

(190) 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 p. 91.

(191)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p. 318.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悖论:机印版地图问世之后,手绘者反而能够放开手脚绘制新的地图,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描绘旧的地图。

(192)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p. 299.

(193) Ibid, p. 318.

(194) Ibid, p. 325.

(195) Skelton, 'The Vinland Map,' p. 111.

(196) 见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一系列相同轮廓的世界地图传达了"西方人关于地球的知识",这一知识逐渐增加,第一个世纪聚焦于一个小区域,第二个世纪即 15 世纪凸显的区域略为增大,第三个世纪即 16 世纪重点描绘的区域进一步增大。实际上,在那三百年里,谁也不曾拥有这样描绘的世界地图。

(197) C. R. Beazley, *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III, 517.

(198) Durand, *The Vienna-Klosterneuberg Map-Corpus*, pp. 12-13.

(199) 16 世纪《地球》(*Sphera*)的若干重印本的第二章很能说明问题,Goldschmidt, 'Not in Harrisse'一文里指出,《地球》一书最早提到"新世界"。又见本书第 590 页的例子。

(200) 布朗介绍了奥特里乌斯及其合作者在十年内规划和设计新颖出版物所遭遇到的一些困

难，见 Brown，*Story of Maps*，pp. 160-161。

(201) A. R. Hall，*Scientific Revolution*，p 10.

(202) R. F. Jones，*Ancients and Moderns*，p. 290，n. 25.

(203) Sarton，'A Summing Up，'p. 370.

第六章

(1) Zilsel，'The Origins of William Gilbert's Scientific Method，'p. 17.

(2) 'Toward a New History of the New Science，'*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Sept. 15，1972).

(3) 比如见 Zilsel，'The Sociological Roots of Science；Struik，'Mathematics in the Netherlands'；Baron，'Toward a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

(4)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学说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有一些很好的总结，见 Schmitt，*A Critical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n Renaissance Aristotelianism* 和'Toward a Reassessment of Renaissance Aristotelianism'。我个人认为，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变革如何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14 世纪和 15 世纪巴黎和牛津学者的科学论著在 1470 年和 1520 年之间印行，Clagett，*Science of Mechanics in the Middle Ages*，pp. 652-653 和 Schmitt，'Essay Review'，p. 173，n. 10 对此作了很好的记述。

(5) Rattansi，'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pp. 7-8.

(6) 阿威罗伊论者(Averroists)对托勒密的批评 1473 年在帕杜瓦印行；雷蒂库斯(Rheticus)长期被学校放逐以后回归他古代受尊敬的地位；关于这两种形象，见 Rosen，*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pp. 132，141，195n，251。又见本书第七章注释(15)。

(7) 玛格丽特·霍尔姆斯(Margaret L. Holmes)讨论了阿拉伯人评注本和盖仑与希波克拉底的原本之间的"鸿沟"；1507—1533 年辛富利恩·尚皮尔(Symphorien Champier)印行的盖仑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揭示了这样的鸿沟；见 Holmes，'A Brief Survey of the Use of the Renaissance Themes'，pp. 38-39。又见 Temkin，*Galenism*，pp. 126-129。

(8) A. R. Hall，'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p. 7.

(9) Drake，'Early Science'，*passim.*

(10) 见 Schmitt，'Essay Review'对德雷克(Drake)方法论的批评。虽然施密特没有提出与印刷术相关的问题，但他提出的几条反对意见还是和我们这里表达的几种观点一致。特别注意他对拉丁文和通俗语的讨论(p. 167)和专注于力学的讨论(p. 175，n. 41 and 42)。

(11) 这本通俗语的小册子题为《比例规用于几何和军事演算》(Le Operazioni del compasso geometrico et militare)，1606 年印行，是用他家里的印刷机排印的，献给科西莫二世(Cosimo II)。该书描绘一种比例规即尺规，大概"发明于 1597 年"；引起伽利略和另一位发明人争夺优先权的争端，大学当局裁定伽利略的发明优先。1607 年，他印书自卫，声讨对手的"诽谤和欺诈"，首次展露出令人生畏的辩才。见 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p. 16 和 McMullin，*Galileo，Man of Science* 里收录的两篇文章：S. A. Bedini，'The Instruments of Galileo，'pp. 256-292；Boyer，'Galileo'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p. 237。

(12) Cochrane，'Science and Humanism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p. 1057. 既然伽利略已经把

他 1606 年的小册子献给科西莫二世，1610 年以后，他并不是在转向他这位昔日的学生即托斯卡纳的大公爵，“以寻求支持”，而是继续培养这样的赞助关系。关于伽利略的生平，见 Geymonat，*Galileo Galilei*。

(13) Baron，‘Toward a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强调大学一作坊的对立，见 Garin 的两篇文章：‘Galileo and the Culture of His Age’和‘Galileo the Phelosopher’，两篇文章均载他编辑的 *Science and Civic Life*，这些论著把伽利略描绘为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

(14) Drake，introduction to‘Letters on Sunspots，’*Discoveries and Opinions*，p. 78. 德雷克认为，佛罗伦萨宫廷里的实务人比伽利略的赞助人更适宜他相处，这些赞助人使他离开“以前的专业同事”；这一看法似乎忽略了威尼斯的环境为他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机会。该书第 70-71 页引用了多尼(Doni)的《据我所知》(*I Marmi*)对比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一段文字：佛罗伦萨的氛围生动活泼、饶有趣味，而威尼斯的氛围则有一丝“梦幻”。不过，多尼本人从威尼斯印刷所得到的帮助超过了他从佛罗伦萨印刷所得到的帮助。两个城市的反差使印刷商和审查人拥有改变立场的余地，在对待早期近代科学的态度上尤其如此。

(15) Galileo，‘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1615)指出“庸俗”和“野蛮的观点”的弱点(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pp. 196-197)。又见 Shea，*Galileo'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p. 47，n. 36 的评论，他质疑伽利略绕开大学教授直接针对“普通”非神职人员那种陈规的观点。

(16) Garin，*Science and Civic Life*，pp. 94-97，101. 在上面的几段话里，他间接提到印刷术的影响，指出《禁书目录》对意大利文化生活的压抑。他抨击帕杜瓦大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帕杜瓦大学的哲学家是骗人的“自由思想家”，他们利用《禁书目录》审查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著作。也有人对帕杜瓦大学持相反的看法，见 Randall，‘Scientific Method’以及 Schmitt，‘The Faculty of Arts at Pisa’里多次提到的看法。在 p. 250，n. 24 里，施密特驳斥大学是“自由探询中心”的说法，认为那是“浪漫的理想”，而不是历史事实。

(17) 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pp. 3-4. 他指出，剑桥大学哈维医学院的创建者约翰·凯厄斯(John Caius)和帕杜瓦大学的维萨里是朋友；在担任皇家医学会院士期间，凯厄斯曾经在伦敦现场观摩理发师一解剖师从事解剖工作，这就弥合了市民和大学师生的鸿沟。沃尔特·佩吉尔强调指出哈维引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情况，见 Pagel，‘William Harvey’。

(18) 威廉·哈维仔细研究了雷尔杜斯·哥伦布(Realdus Columbus)1593 年版的《解剖学》(*De Re Anatomica*)。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pp. 49，70-72，924 指出，雷尔杜斯·哥伦布的《解剖学》有一个重大的印刷错误：心脏收缩(systole)印成心脏舒张(diastole)。

(19) Drake，‘Early Science，’p. 49. 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与尤金尼奥·加林所见略同。

(20) 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pp. 105-106. 哈维的《论血液循环》(*De Motu*)第一版选了一家不太有名气的外国出版社(由法兰克福的 De Bry 家族的一位英格兰亲戚经营)，据说他听从了罗伯特·福卢德的劝告，见 E. Weil，‘William Fitzer the Publisher of Harvey’，pp. 142-143。哈维与福卢德的友谊使他和异端的玫瑰十字会思潮有了瓜葛，惠特利奇的哈维传记似乎漏掉了这样的关系。哈维初次得到好评的书是 1629 年由法兰克福的福卢德出版的。重大的推动来自于笛卡尔的《方法论》(1637)，见 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

pp. 150-153。

(21) Thorndike,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pp. 5 ff.

(22) 这些算师和仪器制造者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稍后才可能产生费马和笛卡尔告别“传统方法和解题标准”的成就，见 Michael S. Mahoney, *The Mathematical Career of Pierre de Fermat*, pp. 8-10; Struik, 'Mathematics in the Netherlands'; E. G. R. Taylor, *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23)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p. 164-165；又见汉纳维(Hannaway)对利巴维乌斯(Libavius)及其团队的讨论。

(24) 伽利略在 *Letters on Sunspots* 中的一封信对朋友说，给阅读通俗语的“普通人”写书时，不排除外国科学家是不可能的，例如他的德国耶稣会劲敌谢纳(Christopher Scheiner)就看不懂意大利语著作。见 Drake, introduction to 'Letters on Sunspot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p. 8。又见伽利略的《星空信使》(*Sidereus Nuncius*)，他想要使自己的讯息超越同胞的范围，将其“尽快送达全欧洲的天文学家和哲学家”(Drake, introduction to *The Starry Messenger*, p. 19)，所以伽利略用拉丁文写《星空信使》。不过，无论是用通俗语还是拉丁文，他都用清新、朴实的散文，目的是澄清问题，而不是搞神秘化。关于伽利略的文风，见 Dante Della Terza, 'Galileo, Man of Letters', pp. 1-23。

(25) 见 Mahoney, *The Mathematical Career of Pierre de Fermat*, pp. 8-10。用拉丁文写作的天文学家非常欢迎这些“实用的”发明，雷蒂库斯(Rheticus)及其后继者在内皮尔(Napier)发明对数之前呕心沥血地编制函数表，由此可见这些发明多么受欢迎。见本书第七章注释(162)。

(26) 相关的资料见本书第 548-549 页对卢卡·帕奇奥里(Luca Pacioli)研究成果的讨论。

(27) R. G. Frank, 'Science, Medicine,' p. 200. 这一点需要用不可否认的规章制度的保守性来平衡，这样的保守性并非是毫无意义的。见 Charles Webste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p. 199。他捍卫清教徒狂热者对“学院派”教育的抨击。

(28) 关于 Robert Recorde, *Ground of Artes* 的一系列版本的研究，见伊斯顿 J. B. Easton, 'The Early Editions of Robert Recorde'。

(29) E. P. Goldschmidt, *Medieval Texts*, p. 23.

(30) 例如，W. P. D. Wightman, *Science in a Renaissance Society*, p. 60。他对萨克罗伯斯柯《地球》(*Sphaera*)的许多早期版本进行了对比，但忽略了早期印刷商为学术市场隐形的更加值得注意的中世纪的论著。实际上，萨克罗伯斯柯的 *Sphaera* 成了新信息的载体。见本书第五章注释(199)；本书第 590 页。

(31) Christianson, 'Tycho Brahe.'

(32) 约翰·克里斯琴森在'Tycho Brahe'里指出，第谷的藏书中有一册印行的萨克罗伯斯柯所著的《地球》(*Sphaera*, Wittenberg, 1558)，还有一册格马·弗利休斯(Gemma Frisius)编辑的亚皮阿努斯(Apianus)的 *Cosmography*。斯特卢克(Struik)指出，格马的新三角论述成为亚皮阿努斯 *Cosmography* 一书的附录。

(33) Struik, 'Mathematics in the Netherlands,' pp. 48-49. 顺便指出，格马·弗利休斯和维萨里

在卢万大学相识，说明这一“经院哲学”堡垒如何容纳早期近代科学的先驱。鉴于该校开设的三语课程，它可能比斯特卢克描绘的大学更加反常规。

(34) Struik，‘Mathematics in the Netherlands.’芭芭拉·夏皮罗(Barbara Shapiro)指出布利格斯(Briggs)扮演的多重角色、牛津和伦敦的交流、有关英国大学抵制新哲学的荒谬描绘，见其 *John Wilkins* p. 15 and *passim*。又见 R. G. Frank，‘Science，Medicine’。

(35) W. P. D. Wightman，*Science in a Renaissance Society*，p. 101. 关于利科尔，见 E. G. R. Taylor，*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 50-53。利科尔的第一本通俗语教科书曾经是伊斯顿学习的教材，利科尔的一系列再版本最终为他 1699 年的 *Decimals Made Easy* 做了很好的广告。他编写了一系列的教材，第一本题为《知识之路》(*The Pathway to Knowledge*)(1551)，接着的书题名《知识之门》(*The Gate of Knowledge*)和《知识之城堡》(*The Castle of Knowledge*)，最后一本未竟之作名为《知识宝库》(*Treasure of Knowledge*)。这一系列教材暗示一种教育的“朝觐之旅”——从“基础”经过“路径”到“门口”再到“城堡”(在此过程中解释哥白尼的学说)直到最后的“宝库”(根据弗朗西丝·耶茨描绘的通向“玫瑰十字会启蒙”的路子)。利科尔和约翰·迪伊是牛津同窗，有相似的教育关怀。以后各版的 *The Ground of Artes* 为比林斯利(Henry Billingsley)翻译的《欧几里得》做广告，并有迪伊为之作序。

(36) D. W. Davies，*The World of the Elseviers*，p. 12.

(37) 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p. 15. 关于维滕堡大学，见 Dannenfeldt，‘Wittenberg Botanists’和 Westman，‘The melanchthon Circle’以及‘Three Responses to the Copernican Theory’。

(38) Saunders and Malley，*The Illustrations*，p. 16. 关于这种解剖图谱对拉伯雷著作的重要性，见 Kline，‘Rabelais and Printing，’p. 550。

(39) Cohen，‘Diagrams and Illustrations’用图示说明维萨里的演示解剖时引起的公众兴趣，将其与过去解剖课观摩者的厌倦和冷漠进行比较，他对比的插图来自两本书：一是柯坦(Joannes de Ketham)的《医学六论》(*Fasciculus Medicinae*)(Venice，Gregoriis，1493/4)的插图，一是维萨里《人体的结构》(*De Fabrica*)的卷首插图。或许，这样的对比应该被认为是不太准确的技术，是两位艺术家表达的观念。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两者的反差都值得注意。

(40) Crombie，*Augustine to Galileo*，p. 149 提到，中世纪牛津大学规定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是必读书，但是其他的中世纪课程研究似乎提供了相反的证明。例如，James A. Weisheipl，‘Curriculum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t Oxford’，pp. 142，170，172。又例如 Gabriel，*The College System*，pp. 19，41 n，140。

(41)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诺瓦拉的坎帕努斯究竟是否当过大学教授并不是很清楚，相反他在教廷效命的情况倒是描绘得十分详尽。见 Benjamin and Toomer，*Campanus of Novara*，p. 11。

(42) 保罗·罗斯(Paul Rose)对斐波纳契(Fibonacci)论著的撰写和有限的流通做了研究，见 Rose，*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pp. 82-83。关于对他论“实用几何”的著作流通情况

的有趣猜测，见 Shelby，'The Geometrical Knowledge'，p. 404。关于腓特烈二世的宫廷，见 C. H. Haskins，*Studies*，p. 249。

(43) 关于教授私下传授数学以及约达努斯、布鲁塞尔的杰拉德(Gerard of Brussels)等人是否担任过教职的情况，见 A. C. Crombie，*Scientific Change* 收录的居伊·博若安(Guy Beaujouan)的文章'Motives and Opportunities'，p. 235。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15 世纪初在帕杜瓦大学执教时，数学还不是正规课程；关于这一点，见 W. H. Woodward，*Vittorino da Feltre*，p. 7。

(44) A. R. '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p. 9.

(45) 关于早期近代数学那些"驳杂的活动"以及缺乏界定的术语，见 Mahoney，*The Mathematical Career*，p. 14。

(46) White，'Pumps and Pendula,' p. 102. 又见 Singer，'The Confluence'，p. 263。

(47) 印刷术之前，外科医师著书立说的努力难以为继，见 J. F. Malgaigne，*Surgery and Ambrose Paré*，pp. 33，63。又见 Talbott and Hammond，*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Medieval England*，p. viii。1501 年之前，居伊的《外科学》出了许多版本，分别用法语、拉丁语、荷兰语和德语印行。见 Sarton，*Six Wings*，p. 300，n. 71。

(48) Sherrington，*The Endeavour*，p. 111. 引语出自伊萨克·朱伯特(Isaac Joubert)，他与父亲劳伦·朱伯特(Laurent Joubert)均在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院执教，其父亲任医学院院长和蒙彼利埃大学副校长。这些基督教新教的医学教授为通俗语翻译运动作出了贡献，见 Sherrington，*The Endeavour*，pp. 108-114。

(49) William Brockbank，'Sovereign Remedies'，pp. 1-13.

(50) Pagel，*Paracelsus*，pp. 24-25.

(51) 许多人注意到 17 世纪和 18 世纪法国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之间的敌对关系。见 Sherrington，*The Endeavour*，pp. 104-06；Solomon，*Public Welfare*，chap. 5；Barber，*The Bourgeoisie*，p. 24。关于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se Paré)16 世纪在巴黎大学受聘的情况，见本章注释(58)。

(52) Drake，'Early Science,' p. 52. 巴黎的这种关系比其他大学城比如维滕堡、蒂宾根、莱顿或科隆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断言似乎令人怀疑。

(53) Bietenholz，*Basle and France* 提供了巴黎公司与外地公司的图书贸易网络的资料。Annie Parent，*Les Métiers du Livre à Paris*，pp. 51，124-25，168 讨论了居住在大学区的大约 500 位书商的情况，她指出调控的权力从索邦神学院到王室的迁移。

(54) Sherrington，*The Endeavour*，pp. 3-4 讨论了外地学者为西蒙·科里内和埃蒂安纳两家出版社服务的情况。《谢灵顿传》结尾的文章提供了有用的地图，准确显示 16 世纪巴黎大学周围著名的印刷所的位置。

(55) Clagett，*Science of Mechanics*，pp. 652-653 列举了蒙塔古学院印行的一些书名。Renaudet，*Préréforme*，pp. 463 ff. 描绘了蒙塔古学院教师反人文主义的、盖仑式的、奥卡姆式的观点。

(56) 关于药剂师皮埃尔·布拉耶尔(Pierre Braillier)的著作在里昂出版的情况，见 N. Z.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 215。

(57) Rossi,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pp. 1-4 评述了近年论帕利西的文献，讨论了他可能对年轻的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见 Sarton, *Six Wings*, pp. 164-171。

(58) 关于圣柯梅学院的阅读拉丁文的、博学的、"穿袍外科医师"和理发师－外科医师的区别，见 Sarton, *Six Wings*, p. 197。不懂拉丁文的帕雷应聘到圣柯梅学院(Collège de Saint Côme)任教这件事引起轰动。进一步的参考见 Sarton, *Six Wings*, pp. 300-301, n. 75, n. 76。

(59) 这方面的资料见 N. Z. Davis 的两篇文章：'Sixteenth-Century French Arithmetics'；'Mathematicia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French Academies'。这些文章和"资本主义精神"可能存在的相关性见本书第 384 页。

(60) Drake, 'Early Science,' pp. 49-50.

(61) 见本书第 651 页。

(62) Ros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p. 259 指出，拉米斯在巴塞洛缪大屠杀前夜被害时，正在写《数学家》(*Scholarum Mamaticarum*)的增订第二版，贝纳迪诺·波尔迪(Bernardino Baldi)以拉米斯的第一版为基础，完成了大部头的《数学家列传》(*Lives of Mathematicians*)，该书囊括了二百多位数学家的传略，但未能出版。

(63) Hooykaas, *Humanisme, Science et Réforme*, chap. x 讨论了拉米斯在推广数学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评述了他对 16 世纪欧洲数学的总览。德国城市的发展使他印象深刻，他宣称：梅兰希顿是"欧洲的导师"，维滕堡是科学的温床。又见 1569 年巴塞尔出版的拉米斯的《文科七艺研究》(*Scholae in Liberales Artes*)。

(64) N. Z. Davis, 'Peletier and Beza Part Company'对上述情况做了记述。

(65) 米歇尔·瓦斯科桑(Michel de Vascosan)继承家族的传统，殷勤款待佩尔迪埃。他的岳父约西·巴德(Josse Bade)即巴迪乌斯(Badius)也殷勤好客。见 Parent, *Les Métiers du Livre à Paris*, p. 179。

(66) N. Z. Davis, 'Sixteenth-Century French Arithmetics,' pp. 30-31. 欧文·金杰里奇告诉我说，斐奈(Finé)技不如人。关于斐奈研究的基本情况，见 Rose, 'Studies on Oronce Finé'以及他的另一文章'Oronce Fine's *De Sinibus Libri II*', p. 397 ff。其他有关斐奈的资料有：Hilliard and Poulle, 'Oronce Fine et l'Horloge Planét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pp. 320-321; Brun, *Le Livre François Illustré de la Renaissance*, p. 43。

(67) Sarton, *Six Wings*, p. 125. 远古崇拜和人们对冶金和机械的好奇可以兼容，鉴于人们对这一趋势估计不足，值得指出的是：古代技术文献的研究"唤醒并加强了"阿格里科拉所谓的"卡西尔好奇心"，见 Sarton, *Six Wings*, p. 125。近来，有人详细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伪亚里士多德《力学》的版本，他们有益地揭示了古典学者、文人和印刷商出版古籍的积极性(率先出版古人著作的有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和印刷商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Rose and Drake, 'The Pseudo-Aristotelian"Questions of Mechanics."'

(68) Thomas Norton, *The Ordinall of Alchemy*, 1447, 转引自 *The Triumph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 5, n. 8。

(69) 卡罗卢斯·克鲁西乌斯(Carolus Clusius)为普朗坦工作，其工作是将荷兰语、西班牙语、葡

萄牙语和法语的科学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见 Sarton, *Six Wings*, pp. 143-144。Schmidt, 'Essay Review' I, 166-168 指出,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的拉丁文著作比荷兰文著作影响大。又见本章有关伽利略《星空信使》(*Sidereus Nuncius*)的注释(24)。

(70) 英格兰托钵僧注重用新奇的趣闻轶事使教徒注意听他们布道(且不愿意和同道分享这些趣闻),见 Smalley, *The English Friars*, pp. 37-44。斯莫利(Smalley)又指出,虽然他们用了新的事例,但布道的内容还是传统的。陈旧、老套的主题使采用新鲜而新奇的传闻轶事更合胃口。

(71) 在 14 世纪一本布道辞选集的序言里,编者说:编者将这本"用新奇风格编纂的集子"送给"欣赏新奇事物的当代人"。Rouse and Rouse, 'The Texts Called Lumen Anime,' p. 28. 又见 Rosen, 'The Invention of Eyeglasses', p. 34,文章说到 1305 年到 1306 年的一篇意大利布道辞时,有一句话是"兴致很高的公众对新奇事物的兴趣"。

(72) 林德伯格(D. C. Lindberg)认为,皮切姆的《共点透视》(*Perspectiva Communis*)就是为此目的撰写的。见 Lindberg, introduction, *John Recham*, p. 17。

(73) Drake, 'Early Science,' p. 51. 关于奥雷姆(Oresme)的译著,见 Sherman, 'Some Visual Defmitions', p. 319n。谢尔曼引述奥雷姆为其'Some Visual Defmitions'所做的序言,这篇序言里含有一些通俗语译者普及了的主题和语词。

(74) Ross, 'Venetian Schools', p. 531 介绍了布鲁诺·纳尔蒂(Bruno Nardi)那篇重要的研究文章《里阿尔托的学校》(La scuola di Rialto)。文章把卢卡·帕奇奥里的活动与里阿尔托的学校联系起来,又把该校和帕杜瓦大学的亚里士多德派的学问联系起来。在这篇文章里,罗斯博士搜集了有关埃格纳奇奥(Giovanni Battista Egnazio Battista)教学方面的资料,埃格纳奇奥为阿尔丁出版商编了几本书。

(75) R. E. Taylor, '*No Royal Road*,' p. 197. 帕特拉斯的大主教亚利桑德罗·皮克罗密尼(Alessandro Piccolomini)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说有必要出版通俗语译著,以便使意大利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受益(由比林古乔转述);转引自 Rose and Drake, 'The Pseudo-Aristotelian "Questions of Mechanics"', p. 85。

(76) R. E. Taylor, 'Luca Pacioli, p. 183. 帕奇奥里效命教皇乌尔班四世,修订诺瓦拉的坎帕努斯为教皇翻译的欧几里得著作(printed first by Erhard Ratdolt, Venice, 1482),哥白尼使用的就是这个译本,帕奇奥里的校订本 1509 年在威尼斯出版。出这个校订版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挽救坎帕努斯的名声,使之免受抨击。见 Rose, 'Humanist Culture and Renaissance Mathematics', p. 99。

(77) R. E. Taylor, '*No Royal Road*,' p. 187.

(78) Pacioli 的 *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et proportionate* 进入了两种主要的算术教材,这些教材取代了波伊提乌(Boethius)的著作,成为 16 世纪的大学教材。关于这一点,参见滕斯托尔(Tunstall)主教的《计算的艺术》(*De Arte Supputandi*)(1522),载 Stillwell, Awakening Interest in Science, p. 71。又见 M. A. Ore 为 Cardano's *Ars Magna* (1545)所做的序言里对该书的评论(p. vii)。关于滕斯托尔和卡尔达诺的著作到 1549 年时如何在牛津大学取代波伊提乌的地位,成为必读书,见 Johnson, *Astronomical Thought*, pp. 83-84。

(79) 帕奇奥里在威尼斯的圣安东尼奥·迪·卡斯特罗图书馆发现斐波纳契《算经》的一个抄本，Ros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作了记述。

(80) 见 preface to Pacioli's *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et proportionate*, p. 191。帕奇奥里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及经院哲学家，他追随红衣主教贝萨里翁的《伪柏拉图主义者》(*Calumniatorum Platonis*)(首印拉丁文版于1649年问世)开辟的道路前进。又见 Kristeller, *Renaissance Concepts*, p. 101。

(81) Sarton, *Appreciation*, p. 135. 乔奇奥·瓦萨里指责卢卡·帕奇奥里剽窃并出版彼埃罗(Piero)的《绘画透视学》(*De Prospectiva Pingendi*)。见 Vasari, *Lives of the Artists*, p. 93。据 Panofsky, *Albrecht Dürer*(I vol. Ed.)的描述，该书到1899年才出版。丢勒1506年到博洛尼亚去向一位老师(可能是帕奇奥里)请教透视的"秘密"(pp. 251-252)。当然，对纽伦堡人丢勒而言，彼埃罗的《绘画透视学》仍然是看不懂的外语。

(82) 见 Morison, *Fra Luca Pacioli*, p. 7。刘易斯(John Lewis)的 *Anatomy of Printing* 也提出一些相关的文字和插图。试图调和人的比例与罗马字母和欧几里得几何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刘易斯(p. 56)认为，这已经将逻辑绷到崩溃的边缘。他们痴迷对称，坚持完美和谐，这就超越了"人文主义的建筑"，导致"疯狂的"逻辑；反映在17世纪完美城市的乌托邦设计中，或反映在开普勒对完美立方体的痴迷中(见本书第七章注释(43))。有些字母形式的透视图和小册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帕奇奥里的启示，见 Mayor, *Prints and People*, pp. 173-178。丢勒强制将哥特体字母塞进以模块为基础的系统，潘诺夫斯基(Panofsky)的 *Albrecht Dürer*(I vol. Ed.)作了很好的说明，见该书插图 6a-7b，以及第 258-259 页。

(83) Yates,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p. 147-148 描绘了"基督城"的设计图，其中对数学的重视部分归因于约翰·迪伊(Dee)的影响。当我们考虑17世纪欧洲大陆乌托邦设计中突出的欧几里得和维特鲁威特征时，帕奇奥里的《大全》(*Summa*)和《神奇的比例》(*Divine Proportion*)似乎比后来的约翰·迪伊或罗伯特·福卢德(Fludd)的著作更重要。约翰·迪伊的几次意大利之旅使他结识了帕奇奥里的继承者比如菲德里戈·康曼迪诺(Federigo Commandino)。迪伊带来一卷手抄本，据信是欧几里得的著作，康曼迪诺将其付印出版。见 Rose, 'Notes and Correspondence'。关于迪伊客居地的安特卫普出版商威廉·西韦尔(Sylvius)家的情况，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68)。

(84)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p. 347.

(85) John Dee, Preface, *The Elements of Geometrie of the Most Ancient Philosopher Euclide of Megara*(tr. and ed. Henry Billingsley)(London, John Day, 1570), pp. Aiij v-Aiiij r。关于约翰·戴伊，见欧斯特勒(Oastler)最近的《约翰·戴伊传》(感谢 Alice McGinty 向我介绍这一资料)。

(86) 语出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学校的考试》(*Academiarum Examen*)(London, 1654)。转引自 Pagel, 'News, Notes and Queries'。韦伯斯特对迪伊的称颂遭到牛津大学教授塞斯·沃德(Seth Ward)的反驳，他把韦伯斯特"朗朗的美言"比喻为"闷闷不乐修士"的高调，沃德贬低热心数学的人士比如迪伊和福卢德，同时却称颂培根式的实验哲学。见 Yates,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pp. 186-187。这场辩论的详细情况见 Debus, *Science*

and Education。

(87) Zilsel,'The Genesis,'pp. 342,n. 31.

(88) 见本章注释(81)。又请注意,L. B. Alberti 的《建筑学十书》(*De Re Aedificatoria*)并不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得到莱昂内罗·德斯特(Lionello d'Este)的赞助,将书献给教皇尼古拉五世。克劳泰默(Richard Krautheimer)也强调指出《建筑学十书》出版的情况,见 Krautheimer ,'Alberti's Templum Etruscum',p. 328。

(89) 据 Keele,'Leonardo da Vinci's Influence',p. 361 记述,达·芬奇大概是在与卢卡·帕奇奥里共事时学会数学根的运算的。他与帕奇奥里合作的程度难以判定,就像卡尔加的让·斯蒂芬(Jan Stephan of Calcar)与维萨里合作的程度难以判定一样。达·芬奇的著作里列入了维萨里的《算术、几何与比例大全》;这本书有一个机印本,还有一篇未署名手稿。论欧几里得的手稿被列入了达·芬奇的著作。见 Ladislao Reti,'The Two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Leonardo da Vinci',p. 81 ff.。

(90) 参见 Lindberg(tr. and ed.),*John Pecham*,p. 17。Keele,'Leonardo da Vinci's Influence'引用意大利语翻译的皮切姆的论述和达·芬奇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具有重大的影响。B. S. 伊斯特伍德评论林德伯格编辑的皮切姆的《反射镜》(*Speculum*,1972,p. 324),认为林德伯格夸大了皮切姆对 15 世纪艺术家比如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的影响。当然,和达·芬奇一样,吉贝尔蒂没有机印书参考。

(91) Zilsel,'The Genesis,'pp. 50-52.

(92) M. A. Ore 在卡尔达诺《伟大的艺术》(*Great Art*)的序言(pp. ix-xi)里详细记述了饶有趣味的争夺发明优先权的情况。塔尔塔利亚(Tartaglia)实际上"重新发现"了(三次方程 $x^3+ax=b$)已经被证明的解法。他将这一秘密告诉卡尔达诺,叫卡尔达诺发誓"永远不公布,而且用密码记录下来"。*Ars Magna*(p. 7)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此艺术源于摩西遗留在路边的儿子穆罕默德。比萨的列奥纳多是这一判断的可靠源头。"

(93) Mahoney,*The Mathematical Career*,p. 7.

(94) 见本章注释(90)。至于列奥纳多研究机印书技术文献的情况,见本章注释(135)。

(95) 这两个群体的交流以个人接触为基础,而不是以书面材料的交流为基础,隆·谢尔比对此作了描绘,见 Shelby,'The Education of Medieval Masons',pp. 16-18:石匠和赞助人合作建造哥特式教堂。罗杰·培根提到马齐斯特·彼得(Magister Petrus)渴望"向金属工人学习"等等。见 Zilsel,'Origins of William Gilbert's Method',p. 30。其他的参考材料见 A. C. Crombie,'Commentary';Clagett(ed.),*Critical Problems*,p. 73。

(96) 见 Rossi,*Philosophy,Technology*,p. 35。他转引隆齐(V. Ronchi)的一篇文章,隆齐强调指出,在各种研究中,透镜都长期未用于科学目的,例子有望远镜和显微镜。

(97) 见 Rosen,'The Invention of Eyeglasses',其中述及 1306 年比萨的乔达诺(Giordano of Pisa)修士为大斋节写的一篇布道辞——这是现存最早的一篇意大利语记录的样本之一。

(98) 关于指南针发明的一些"零碎证据",见 Kreutz,'Mediterranean Contributions'。Hale,'Gunpowder and the Renaissance',pp. 115-117 讨论了炸药起源的各种观点。

(99) McLean,*Humanism and the Rise of Science*,p. 142 认为,约翰·迪伊针对技师和工匠作序

时，心中一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一设想是错误的。关于技术文献和发明的总体情况的讨论，见 Peter Mathias，'Who Unbound Prometheus?' chap. 3；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chap. 6。

(100) 见本书第 383 页。关于早期复式记账法那种专业的"过度杀伤"效果，详见 Yamey，'Scientific Bookkeepi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01) Mahoney，*The Mathematical Career*，p. 60.

(102) Morison，*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pp. 141-42. 又见本书第 582 页之后对哥伦布携带的星表的讨论。

(103) 关于年轻时的牛顿，见 Manuel，*Portrait of Isaac Newton*，p. 406 以及本书第 245 页的引语。关于威尔金斯(Wilkins)的著作，见 Shapiro，*John Wilkins*，p. 43。

(104) A. R. Hall，'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60。

(105) 见本书第 261-262 页。

(106) A. C. Crombie，'Commentary'，Clagett(ed.)*Critical Problems*，p. 77.

(107) Keller，*A Theatre of Machines*，p. 3.

(108) Ibid.

(109) A. R. Hall，'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p. 16.

(110) 除 Zilsel 和 Rossi 等人的著作以外，又见 Walter Houghton，'The History of Trades'。

(111) 见 Keller，'Zilsel，The Artisans'，pp. 281-286。

(112) Zilsel，'Genesis，' p. 335.

(113) Zilsel，'Genesis'，pp. 344-345，齐尔塞尔挑选地图出版商来说明这种新方式。

(114) Lilley，'Robert Recorde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似乎太强调工艺传统，而忽略了印刷术启动的新潮流。他的理论给吉斯·托马斯(Keith Thomas)以启示；但在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p. 430 里，吉斯·托马斯未能分析"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又见本书第 245-246 页的讨论。

(115) 在此我们得再次指出例外：一些重要的手抄书中心比如亚历山大博物馆。

(116) Zilsel，'Genesis，' p. 348.

(117) 转引自 Lilley，'Robert Recorde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p. 10。

(118) Panofsky，*Albrecht Dürer*，p. 44.

(119) Rossi，*Philosophy，Technology*，pp. 70-71. 罗西追随埃德加·齐尔塞尔的路子，征引了各种作者的论著；在这些作者中，既有用通俗语写作的工匠和工程师(塔尔塔利亚、丢勒、帕雷、诺曼)，也有阅读拉丁文的天文学家一出版商亚皮阿努斯和地图出版商墨卡托。见 Zilsel，'Genesis'，pp. 343-347。

(120) 见本书第 241 页有关亨利·赖特、罗伯特·诺曼和贝尔纳·帕利西等人的例子。布劳也详细告诉读者到哪里去寻购买他的地图、地球仪和海图。早期印刷术的书尾题署和书商的书目是最早问世的印刷品，这些设计旨在吸引潜在的购书人，指引读者到哪里去买书。

(121) 伽利略将两种角色结合起来，在帕杜瓦大学执教时发明了"比例规"(见本章注释(11))。他的竞争对手比如克里斯托弗·谢纳(Scheiner)也将这两种角色结合起来，谢纳是耶稣会

士,所著《日晷制作的基本原理》(*Exegeses Fundamentorum Gnomonicorum*)(Ingolsadt, 1615)含有一个椭圆规的新设计图。见 Rose,'Renaissance Italian Methods of Drawing the Ellipse',pp. 399-400。

(122) Kinser,'Ideas of Temporal Change,'p. 170.

(123) Keller,'Zilsel,The Artisans,'p. 286.

(124) 法布利齐乌斯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出书计划,由于大量繁复的插图却再三延宕,见 Adelmann,*Embryological Treatises of Hieronymus Fabricius*, p. 23。又见 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p. 19。

(125) Prat,*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part 2,section viii,p. 74. 又见本书第 274 页之后给予秘密与公开宣传的讨论。

(126) Sherrington,*The Endeavour of Jean Fernel*,p. 46.

(127) Rattansi,'Alchemy and Natural Magic,'p. 135.

(128) Rossi,*Francis Bacon*,pp. 30-35.

(129) 转引自 Raleigh's *History of the World*(book 1,part 5,chap. 3,section 15)。

(130) Prat,*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p. 5.

(131) 见 Gandz,'The Invention of the Decimal Fractions',pp. 29-30。据他描述,中世纪数学家邦菲尔斯(Bonfils)掩盖其运算程序,改用易于记忆但笨拙而难看的"经验法则"。又见本书第 277 页之后的讨论。

(132) 关于林切王储(Prince Lincei)的林切学院(Academy of Lincei)所用的代码和密码,见 Preserved Smith,*A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 Smith I,155-156。印刷术对代码和密码的影响值得单独研究。复杂的字母一数字系统(并非不像犹太秘法)是在两种传统中形成的,一是手抄书时代的记忆术,二是为大型的编纂书或选集做的索引或相互参照表。手写稿铅印以后,外交家们再也不可能设想,密写的字条误入他人之手后会难以辨认。从阿尔贝蒂发明"密码轮"(据 Gadol,*Alberti*,pp. 207-208 记述,这一发明的灵感可能要归因于活字印刷)开始,经过特里特姆斯的《密码》(*Steganophia*)和《复写器》(*Polygraphia*),直到 17 世纪精英比如约翰·威尔金斯和莱布尼兹,编码术和解码术的工作就推进到新的方向了。见 Madeleine David,,*Le Débat*,pp. 26-27。

(133) Sarton,*Six Wings*,pp. 232-233.

(134) Ibid,pp. 228-229.

(135) Reti,'The Two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Leonardo da Vinci',p. 81ff. 列举了列奥纳多的藏书,书目显示,他的藏书在 1497 年之后的十年间增多了。他研究新出版的古籍和同时代人的通俗语著作,尤其是瓦尔图里(Valturi)的《论军事》(*De Re Militari*),这些书进入了他的工程研究中,Bertrand Gille,*The Renaissance Engineers*,pp. 52-53,122-123,144 作了详细的描绘。又见 E. J. E. J. Aiton,'Essay Review',*History of Science*(1970-71);Reti,'Leonardo and Ramelli',p. 577。他在解剖学研究中得到的指引仅限于他有限的技术文献,他接触盖仑的著作很迟,但这丰富了他的著作。Kemp,'Il Concerto dell'Anima'和'Dissection and Divinity'对此作了描绘。

(136) Kemp,'Dissection and Divinity,'p. 201. 肯普和基尔(Keele)都接受维萨里的判断:帕维亚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托雷的马坎托尼奥(Marcantonio della Torre)大概指导过列奥纳多的解剖学研究,盖仑对列奥纳多后期研究的改进大概和马坎托尼奥的指导有关系。关于马坎托尼奥的词汇单,见奥古斯托·马利诺尼(Augusto Marinoni)在 *Technology and Culture* 上发表的书评(1972)。

(137) 塞尔维特(Servetus)在巴黎师从维萨里,担任安德纳克的君特尔(亦作温特尔)的助手;和拉伯雷一样,塞尔维特在 16 世纪 30 年代为里昂的特雷舍尔(Trechsel)印务公司效力。他的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圣经》研究与地理学和医学研究有交叠。见 O'Malley, *Michael Servetus*。

(138) 维萨里研究盖仑的 *Anatomical Procedures*,这使他"踏上凯歌高奏的生涯",见 Singer (ed. and tr.),*Galen on Anatomical Procedures*, pp. xiii, 2。罗伯托·埃蒂安纳的继父西蒙·科里内所做的其他工作有资助"生理学之父"让·菲内尔在医学院求学,直至毕业。见 Sherrington, *The Endeavour of Jean Fernel*, pp. 3-4。菲内尔(Fernel)早期出的书是他从医之前研究"四艺"的结果,这些书有:《独一的星球》(*Monolasphaerium*)(de Colines, 1526)(其书名页上有一个用"四艺"符号的图框标题,据说由奥隆斯·斐奈设计);《宇宙论》(*Cosmotheoria*)(1527),内含地球测量术,这一点于 1671 年被天文学家让·皮卡尔(Jean Picard)确认。菲内尔 1542 年的《对话》('Dialogue')里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论及印刷术加速恢复和发现机制的作用。见 Sherrington, *The Endeavour*, pp. 3-4, 12, 15-17, 21-22。又见 Sarton, *Six Wings*, pp. 191-196。

(139) 见 Kellett,'Two Anatomies', pp. 342-50。文章介绍了埃蒂安纳与其合作者利维埃(de la Rivière)的一场官司,这场官司使维萨警惕他们的合作项目。又见 Rath,'Charles Estienne'。本书第 387 页提到过埃蒂安纳编印道路交通图。埃蒂安纳撰写的《农事与农舍》(*L'Agriculture et Maisons Rustiques*)(Paris: J. Du Duys, 1564)印行了许多版次,其对象是业主和土地管理代理商。

(140)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142.

(141) Kline,'Rabelais and Printing,'pp. 8-9. 他又指出,编印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著作以后,拉伯雷在里昂的一家大医院谋到医师的工作。他论述了格里菲乌斯(Gryphius)的助手们如何将医学文本的编辑与法律文本及《圣经》的编辑联系在一起,颇有说服力。

(142) Rossi, *Philosophy, Technology*, p. 49.

(143) Ibid.

(144) Ibid, p. 82.

(145)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p. 134-135.

(146) 关于维萨里和提香助手的合作,见本书第 267 页相关材料。

(147) 见维萨里 1542 年 8 月 24 日致奥帕利乌斯的信,信中注明,他委托尼古拉·斯托皮乌斯(Nicholas Stopius)押送这些雕版,斯托皮乌斯任丹尼尔·邦贝格在威尼斯公司的经理,他"通晓人文学科"。见 Saunders and O. Malley, *Illustrations from the Works of Andreas Vesalius*, p. 46 ff。又见本书第二章注释(39),罗伯特·赫林杰(Herrlinger)探讨过这些雕

版之精湛和耐用。

(148) 本书第 446 页还讨论了奥帕利乌斯的圈子。除了斯坦因曼(Steinmann)为他做的传记之外,关于他和维萨里接触的相关资料有 Pagel and Rattansi,'Vesalius and Paracelsus';O. Malley,*Andreas Vesalius*,pp. 131-133。

(149) Alan G. R. Smith,*Science and Society*, pp. 45-46;至于古典复兴语超越古希腊科学的关系的类似表述,见 A. R. Hall,'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p. 11。A. R. Hall,'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p. 11.

(150) Pagel and Rattansi,'Vesalius and Paracelsus,'p. 324.

(151) 见本书第三章注释(260)。

(152) 关于这个主题,见本书第三章注释(251)和(257)。

(153) 见 Pagel and Rattansi,'Vesalius and Paracelsus'的相关引文。

(154) A. R. Hall,Ca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e History? p. 208. 霍尔在这里有所特指,尤指 McGuire and Rattansi,Newton and the"Pipes of Pan"'文章里对牛顿的解释。

(155) A. R. Hall,*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p 40. 蒙蒂诺(Mondino)仅仅用解剖来演示盖仑著作里记述的真理,见 Singer,'The Confluence of Humanism,Anatomy and Art',p 265。

(156) 见 Edwin Clarke,book review,*Medical History*(1964),pp. 380-383,他强调了发现盖仑 *Anatomical Procedures* 的重要意义。又见 Pagel and Rattansi,'Vesalius and Paracelsus', p. 319。

(157) 除了本书第三章注释(39)指出的有所改进的插图外,埃德尔曼(Adelman)还指出维萨里第二版《人体的结构》(*De Fabrica*)(Basel:Oporinus,1555)的优点,见 Adelman,*The Embryological Treatises of Hieronymus Fabricius*,p 60;亦见 O'Malley,'Vesalius',p. 306。

(158) 据 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p. 461 记述,在 1555 年版《人体的结构》里,维萨里对毛孔深入隔膜的怀疑日益加重。这可能使下一代人注意到了前人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16 世纪 50 年代和 17 世纪 20 年代之间提出的各种理论、产生的各种辩论为哈维的《论血液循环》(*De Motu*)准备了条件,见 Whitteridge,*William Harvey*,p. 19 和 Adelman,*The Embryological Treatises of Hieronymus Fabricius*,p. 23。

(159) Marie Boas,*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p. 130.

第七章

(1) Steneck,*The Scientific Press at the Time of Copernicus*,p. 12.

(2) Gillispie,*The Edge of Objectivity*,pp. 56-57 含有这样的意思,他将"令人惊叹的木刻"和"令人生畏的计算"进行比较。

(3) 比如,Niccolò Tartaglia,*Nova Scientia*(Venice,1550;first ed. 1537)的书名页上就复制了几何学家"内部圈子"的图像;又比如 Steneck,*The Scientific Press*,p. 9 的讨论。Rosen,'Copemicus's Attitude',pp. 281-283 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列奥纳多也说,唯有数学家才能够读他的书,见 Kline,*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p. 133。列奥纳多的态度说明,除了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之外,其他人也可能喜欢这一主题,所以,深奥解剖学图谱和深

奥数学图表的反差也可能被过度夸大了。

(4) 哥白尼删去有关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的一段话,他对一出校园剧的讥讽表示反感,对维滕堡神学家表示谴责,详情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收录的'Biography of Copernius', pp. 294, 375。又见 Rosen 为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撰写的"哥白尼"词条, p. 402。哥白尼大概从瓦拉(Giorgio Valla)的《自然之谜》(*De Rebus Expetendis*)(Venice: Aldus, 1501)里读到普卢塔克(Plutarch)的一段文字,普卢塔克谴责阿里斯塔克斯顽固地主张日心说,见 Thomas Africa, 'Copernicus' Relation to Aristarchus and Pythagorus'。据 Pamela Askew, 'A Melancholy Astronomer'记述,伽利略和哥白尼对阿里斯塔克斯的态度很不一样,一位巴洛克艺术家在阿里斯塔克斯这位古代天文学家的肖像画中影射了他对哥白尼学说的抨击。

(5) Steneck, *The Scientific Press*, p. 1. 又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401。斯滕内克注意到,哥白尼坦承,他"隐藏"自己著作的时间很长,是贺拉斯推荐的隐藏时间的四倍。

(6) A. R. Hall,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p. 51-52.

(7) 哥白尼"仔细审察"前人的成果,所以他能够在"两位杰出的中世纪穆斯林天文学家"的观察报告中发现不一致的地方。爱德华·罗森对此做了描绘,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388。*Letter against Werner*,见本章注释(13)。

(8) 另一种观点责备哥白尼,认为他在发现相当于第谷的观察计划之前,曾经全盘接受前人的一切观察所得,见 Swerdlow, 'On Copernicus' Theory of Precession', pp. 50-51。

(9) 《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书简代序,转引自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41。

(10) 语出 Rheticus, *Narratio Prima*,转引自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111-114。

(11) 哥白尼的这本译著于 1509 年由克拉科夫的让·霍勒(Jan Haller)出版社印行,1973 年国会图书馆举办的哥白尼展览会展示了一个复印件。哥白尼的希腊语文本取自 1499 年由阿尔杜斯在威尼斯出版的一种文选。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325 记述,博洛尼亚(哥白尼 1496 年在此入学)的希腊语教授和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的关系很有趣。又见 Ros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pp. 120-121。

(12) Kimble, *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p. 122 记述,忒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是用希腊语写作的埃及人,其《书简》(*Letters*)的成书年代大约在 678 年,涉及的地区靠近突厥人控制的土地。哥白尼这本译著由克拉科夫的地理老师拉贝(George Rabe)赐序,这也说明,对地理的好奇是刺激他翻译这本书的原因。关于拉贝其人以及《书简》的印刷,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337-338。

(13) 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所收书简 *Letter against Werner*, pp. 94-98。Jerome Ravetz,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p. 58 指出:"注意编年史是天文学的主要成分。"Gingerich, Commentary,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指出,哥白尼"仅仅为了有序地组织埃及的月份"就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p. 104, n. 9。

(14)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31.

(15) Ravetz, 'The Origins of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92 断言,在哥白尼的学生时代,克拉

科夫尚无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但没有提供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该书的手抄本难以获得。在大多数地方,天文学高级知识的传授在正规的大学课程之外进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抄本在流行,它们都不太可能在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不像医学院、法学院或神学院的"普通"讲稿那样流行。见 Gabriel, *The College System*, p. 19 对瑞典教师的介绍。那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学校里传授,托勒密的天文学演算在学校外传授,这样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何不可调和的两种路径能够长期共存。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印刷术发明之后,这两种路径接触更多,冲突也更甚。1482 至 1483 年,布卢则沃的阿尔贝蒂(Albert of Brudzewo)不仅在克拉科夫大学传授波伊巴赫的天文学,而且 1494－1495 年在米兰刊布了他的讲稿。1493 年哥白尼在此求学时,阿尔贝蒂还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论天》(*De Caelo*)并指出其与托勒密观点的矛盾。1473 年,帕杜瓦印行了阿威罗伊的《评论》(*Commentary*),该书把托勒密天文学描绘为"计算非存在的学问"。雷蒂库斯的《天文学初步》(*Narratio Prima*)认为,托勒密"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应该解除其"被流放"的状态,"恢复其古代的崇高地位"。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132, 141, 195n. 251 和 274。

(16) Dreyer, *Tycho Brahe*, pp. 14-19. 他指出,第谷始终不渝地关心新书的出版,他努力增加藏书,渴望利用法兰克福书展(pp. 81, 131, 135)。J. A. Gade, *The Life and Times of Tycho Brahe*, pp. 54-55 指出,1575 年,第谷去参观法兰克福书展,想要在此会见克里斯托弗·普朗坦。见本书第 596-597 页记述少年第谷如何用零花钱买书的情况。他一心一意要买哥白尼的书。他买到《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并做了评注,还买到了哥白尼的 *Commentariolus* 以及 *Letter against Werner* 的未刊稿。在后哥白尼的天文学家中,机印本《天体运行论》很受欢迎,他们为该书做词汇表,通信讨论其中的某些段落,见 Westman, 'Three Responses to the Copernican Theory', appendix, pp. 342-343。

(17) Francis Johnson, *Astronomical Thought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 64, n. 62. 唯一的例外:阿基米德著作是次年在巴塞尔印行的,由雷乔蒙塔努斯编辑,见本章注释(33)。

(18) A. R. Hall,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11. 怀特曼介绍了波伊巴赫(Peurbach)和雷乔蒙塔努斯身价的涨落,见 Wightman, *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 I, p. 103。起初的身价上涨回溯到 16 世纪坦斯塔特(Georg Tanstetter, 1514)和梅兰希顿(1545)的著作里,雷蒂库斯定下的主题由拉米斯继承。意大利人声称自己结束了中世纪,德国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争论在早期科学史的著作中比比皆是。

(19) 16 世纪初的许多序言自吹"恢复"的古籍和星表,实际上却是中世纪学者翻译和计算出来的,见 Thorndike,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chap. xvi, pp. 332-377。16 世纪的编辑比如坦斯塔特缺乏现代学者掌握的历史信息,他们自吹得到"几乎完全从人的记忆中抹掉了的资料",确有一些道理,桑代克似乎对此估计不足。但布尔克哈特的追随者容易忽视中世纪学者恢复和传播亚历山大时代古籍的功劳。关于这两种态度的不足,见本书第 300-303 页。

(20) Caspar, *Kepler*, p. 327.

(21) 见本书第 554 页。又见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pp. 154-156, 653-655。关于哥伦布接触不少印刷品(尤其在 15 世纪 70 年代在里斯本与其兄弟巴托罗缪[Bartholomew]

同住时接触印刷品比较多，因为其兄弟是“提倡印刷品的鹰派”）以及他绘制海图的技能，参见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p. 35，哥伦布起航之后，莫里森似乎就低估了他这种技能。然而在这本传记和其他著作中，莫里森讨厌“扶手椅里的大洋司令”，赞美不通文墨的水手，因此，他能够提出一些重要问题，并探讨“历书、教材和海图”等印刷品实际的应用情况。又见 E. G. R. Taylor，*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莫里森的眼中钉）；Waters，'Science and the Techniques of Navigation'，p. 233。令人吃惊的是，莫里森似乎相信这样一个故事：哥伦布 1504 年用雷乔蒙塔努斯的星表推算日食，给轻信的牙买加人留下很深印象。“即使不真实，也像是真的！”这样的故事表现的心态后来成为马克·吐温笔下不朽的康涅狄格美国佬的心态。其实，这一形象早在路德时代之前就已经从地中海向外流传了。欧洲人就这样吓唬“阴郁”、“迷信”的土著人，不是靠炸药恐吓，也不是用福音真理召唤土著人，而是用优越的知识吓唬土著人。这是有关天文钟表结构的知识，用印刷词语传达的知识。

(22) Cipolla，'Diffusion of Innovations，'p. 47. 又见本书第 554 页。

(23) Gingerich，'Crisis versus Aesthetic i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关于拉特多尔特 1483 印行的《阿方索星表》（*Alphonsine Tables*）的早期版本，见 Stillwell，*The Awakening Interest in Science*，p. 8。据 Swerdlow，'The Derivation and the First Draft of Copernicus's Planetary Theory'记述（pp. 425-446），哥白尼使用了 1492 年版的《阿方索星表》（Venice：Johann Hamman）；哥白尼写的《评论》（*Commentariolus*）借用了雷乔蒙塔努斯的《方位表》（*Tabulae Directionum*）。关于他 1500 年在博洛尼亚上大学时使用雷乔蒙塔努斯《方位表》的情况，见本章注释（53）。关于拉特多尔特（Ratdolt），见本书第 587 页之后。

(24) Cajori，*History of Mathematics*，p. 132.

(25) Dreyer，*Tycho Brahe*，p. 4；Pannekoek，*A History of Astronomy*，pp. 200-203. 关于雷乔蒙塔努斯在三角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见 Rose，*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p. 99 和 Hughes，ed. and tr.，*Regiomontanus on Triangles*。注意罗森（Rosen）在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p. 300，n. 1026 里指出的休斯（Hughes）的错误。

(26) Durand，'Tradition and Innovation，'p. 35.

(27) 正如 Durand，'Tradition and Innovation'，p. 34，n. 21 所指出的，Ernst Zinner，*Leben und Werken des Johannes Müller*，pp. 60-63 对此作了强调。关于桑代克与齐纳围绕雷乔蒙塔努斯地位的争论，见迪朗的注释。据 Swerdlow，'Derivation'，pp. 425-426 记述，《托勒密天文学精要》（*Epytoma in Almagestum Ptolemai*）的优点不可估计过高，只不过是“托勒密天文学最优秀的教材”。同时斯沃德罗又认为（p. 461，n. 5），1496 年约翰·哈曼（Johann Hamman）在威尼斯刊印的第一版“很糟糕”。这就是哥白尼使用的版本。据 Gingerich，'Copemicus and the Impact of Printing'，p. 204 记述，学生时代的哥白尼感谢使他得到托勒密著作的新媒介，即使不完善，印刷术也使他受益。

(28) 拉普拉斯（Lapalce）认为，对数表“减少劳动，使天文学家的寿命增长一倍”，转引自 A. G. R. Smith，*Science and Society*，p. 69。

(29) 关于托勒密《天文学天大全》的早期印行版本，见 Stillwell，*The Awakening Interest in Sci-*

ence, pp. 30-31, 33-34。关于哥白尼的藏书或能够读到的书，见 Gingerich, 'Copemicus and the Impact of Printing', p. 204, n. 8。

(30) 斯沃德罗对雷乔蒙塔努斯的机印本手稿《托勒密天文学精要》质量之差感到失望(见本章注释(27))，大多数天文学家检查 15 世纪的手稿并将其与早期机印本比较时，常常有这样的反应。

(31)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74. 然而，Ravetz,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p. 55 认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实际上告别托勒密《天文学天大全》的地方相当多，比这段经常被人引用的文字的变化大。如果拉维茨此言不错，那就别有一番讽刺意味了：现代史学家自己成了遗忘教科书"依样画葫芦的盲从者"，他们盲目接受这段引文对哥白尼的描绘，比哥白尼的"盲目抄写"有过之而无不及。

(32) 见本书第 597 页的讨论。

(33) 关于雷乔蒙塔努斯这个著名的书目，见 Sarto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pp. 115, 163(figure 42)。据欧文·金杰里奇(Gingerich)记述，这个书目仅存两册，一册存大不列颠图书馆，一册存慕尼黑的斯塔茨图书馆，见 'Copemicus and the Impact of Printing', p. 209, figure 70。关于马提亚·科维努斯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见 Bühl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pp. 18-19, 96。又见 Csapodi, *The Corvinian Library History and Stock*。关于雷乔蒙塔努斯在该图书馆工作的情况、他的预告书目以及他去世后对 1544 年巴塞尔版的阿基米德著作的贡献，见 W. P. D. Wightman, *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 I, p. 110; II, p. 13, n. 38。坦斯塔特和亚皮阿努斯编辑的维泰洛(Witelo)的《透视学》(*Perspectiva*)1535 年由纽伦堡的印刷商约翰·佩特雷乌斯(Johannes Petreius)印行(见 Stillwell, *Awakening Interest*, p. 75, n. 254)；此前两年，佩特雷乌斯印行了雷乔蒙塔努斯的《论三角形》；此后 8 年，佩特雷乌斯又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关于雷乔蒙塔努斯与红衣主教贝萨里翁的关系，关于他重视用新发明的印刷机以"恢复"天文学的出版计划，见 Ros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chap. 4 对雷乔蒙塔努斯的论述。但由于罗斯集中介绍"雷乔蒙塔努斯在意大利"及其意大利后继者，所以他在追踪潮流时未能把北方人的重要贡献表现出来。罗斯还论述了难以查阅贝萨里翁藏书的情况。这批书遗赠给威尼斯，成为马尔齐亚纳图书馆的核心藏书；罗斯暗示，在雷乔蒙塔努斯在世和 1532 年大主教本博(Bembo)执行更加宽松的借阅政策之间，这批藏书的使用情况出现了断裂。Lowry, 'Two Great Venetian Libraries' 也做了相同的论述(见本书第三章注释(164))。在这样的断裂中，雷乔蒙塔努斯去世后拉特多尔特及其同事在威尼斯和奥格斯堡出版新书，以及 16 世纪初纽伦堡印刷商出版的书似乎就非常重要了。

(34)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p. 164 过分强调雷乔蒙塔努斯作为科学出版商的独特地位。其实，威尼斯拉特多尔特的后继者海尔布隆的桑特里特(Santritte of Heilbronn)和纽伦堡的彼得·比内维兹(亦名 Apianus)就是许多扮演同样角色的印刷商的代表。

(35) 关于出版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纽伦堡印刷商佩特雷乌斯印行的图书，见 Shipman, 'Johannes Petreius'。关于拉特多尔特(Ratdolt)的情况，见 Gilbert R. Redgrave, *Erwin Rat-*

dolt;该书第 3-5 页指出雷德格雷夫与雷乔蒙塔努斯在纽伦堡的关系;1476 年至 1486 年,雷乔蒙塔努斯在威尼斯自办的印刷所工作,然后回到奥格斯堡并于 1490 年出版哥白尼的《方位表》(见本章注释(53))。如前所述,Ros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漏掉了许多有意识地继承雷乔蒙塔努出版计划的后继者;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察阿尔卑斯山以北同时期的发展,以弥补这一缺失。约翰·斯托夫勒(Johann Stöffler)和雅各布·普劳姆(Jacob Pflaum)继续出版雷乔蒙塔努斯启动的星表系列。斯托夫勒在蒂宾根大学执教,梅兰希顿就出自他门下;普劳姆是纽伦堡大学的数学教授,雷蒂库斯(Rheticus)曾将《天文学初步》(*Narratio Prima*)献给他,普劳姆还为雷乔蒙塔努斯 1472 年论彗星的书作序(雷乔蒙塔努斯去世后,这本书于 1531 年在纽伦堡出版)。斯托夫勒和普劳姆是雷乔蒙塔努斯和哥白尼的纽带,他们是将两人联系起来的非意大利数学家的代表。雷乔蒙塔努斯预告的新书目录中的 11 种在蒂宾根数学教授约翰·舒贝尔(Johan Scheubel)的藏书里找到,见 Barnabas Hughes, 'The Private Library of Johan Scheubel', p. 417, n. 1。

(36) Mayor, *Prints and People*(图版第 74、75 对页);Updike, *Printing Types*, I, 77。

(37) Duran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 p. 42.

(38) Sarto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p. 64.

(39) Bühler, 'A Typographical Error', pp. 102-104 记述,一位印刷工排错了一个字钉,拉特多尔特发现之后,立即停机,纠正错误,然后才继续印书,在发行的 39 册中防止了 35 册出错。

(40) 关于这些图表及其制作材料,见 Mayor, *Prints and People* 图版第 74、75;Redgrave, *Ratdolt*, p. 16; Thomas-Stanford, 'Early Editions of Euclid's *Elements*', pp. 40-41。

(41) 关于卢卡·帕奇奥里与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等 15 世纪艺术家的关系以及他对普及欧几里得的关心,见本书第 548、551 页。帕奇奥里修订诺瓦拉的坎帕努斯的拉丁文版《欧几里得》并于 1509 年将其出版,目的之一是回击赞伯蒂(Zamberti)1505 年出版的一个新译本;赞伯蒂在这个新译本中抨击坎帕努斯版本的"野蛮",吹嘘自己的希腊语造诣。见 Rose, 'Humanist Culture', pp. 98-99。帕奇奥里修订版的《欧几里得》是否影响了法国数学家弗兰西斯库·坎达拉(Franciscus Candalla)? 和开普勒一样,坎达拉对立体的属性似乎感兴趣,开普勒引用了坎达拉对欧几里得的评注。见 Weatman, 'Kepler's Theory of Hypothesis', p. 256。

(42) 比如 Pacioli 的 *Divine Proportion*(Venice, Pagano, 1509)里的镌刻八面体,见 Mayor, *Prints and People* 插图第 174。关于达·芬奇是否参与设计 15 世纪 90 年代这些镌刻画的问题,见本书第六章注释(89)。至于印刷插图产生的效应,不妨与乔治·桑蒂拉纳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见 Santillana,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p. 33-66。Cyril Smith, 'Art, Technology and Science' 做了一些有力的论述,但他对"无色、线性的图表"(p. 530)赋予的意义不如我那样多。

(43) 1595 年,开普勒上课时在黑板上画图,突然感到灵感袭来,关于这一灵感以及他为《神秘的宇宙志》(*Mysterium Cosmographicum*)设计的插图,见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p. 247-61;又见罗伯特·维斯特曼的批评:Westman, 'Kepler's Theory of Hypothesis', p. 256。关于开普勒的视觉想象及其从温策尔·詹姆尼泽的(Wenzel Jamnitzer)的《正立方

体透视》(*Perspectiva Corporum Regularum*)(1568)以及其他人那里得到的灵感,见 Otto Benesch,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pp. 156-158, 183。詹姆尼泽从丢勒的《用圆规和直尺测量》中(*Unterweisung*)得到灵感,见 Benesch,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n. 38), Pacicoli 的 *Summa* 也指出他从丢勒那里得到的灵感。

(44) 几位作者指出了这样的关注。见 N. R. Hanson, 'The Copernican Disturbance', 他指出(p. 176),现代教科书插图造成一个误导人的印象:统一的"托勒密"体系。哥白尼谈到"宇宙的设计及其组成部分固定的对称", Gingerich, 'Crisis versus Aesthetic', p. 6 对此作了阐述。

(45) 著名的例子有东迪(Giovanni de Dondi)1348 年至 1364 年制作的"天文时钟"(Astrarium)。见 Bedini and Maddison, 'Mechanical Universe', esp. p. 27。两位作者指出克拉科夫人的兴趣(雷乔蒙塔努斯在布达的同事与后继者马尔欣·比利卡[Marcin Bylica]引起的兴趣),他们又指出,东迪论自己仪器的论文撰写的时间正好和哥白尼在那里求学的时间吻合。Zdenek Horsky, 'Astronomy and the Art of Clockmaking'强调指出,公开场合展示的大量齿轮影响到哥白尼时代的学人对"机器世界"的观感。哥白尼构想的世界是像时钟一样的神奇世界即"机器世界",与此相对,托勒密构想的世界更富于脉动的、更自主的"生命世界";Curtis Wilson, 'Rheticus, Ravetz and the "Necessity" of Copernicus's Innovation'阐述了两者的反差,尤其注意该书第 37 页。当然,托勒密的图式并非总是和时钟的观念不兼容,东迪的"天文时钟"观念本身足以说明其兼容性。关于古希腊齿轮时钟那种历法机制是否存在的问题,见 Price, 'Gears from the Greeks'及 Drachmann 在 *Technology and Culture*, pp. 112-116 上发表的书评。

(46) 见本书第 512 页。

(47) 见 Westman, 'Three Responses', pp. 322-323 的有趣记述:1573 年,威尼斯一本天文学教材里印制的马蒂亚努斯·卡佩拉和哥白尼体系的图式如何激发第谷·布拉赫的灵感,那时的布拉赫正在构想自己的图式。

(48) 中世纪手抄本里表现皮切姆的《共点透视》的插画有不足之处,与此相比,维泰罗、阿尔哈镇(Alhazen)和皮切姆光学著作的机印本里反映文艺复兴观念的插图则略胜一筹,见 Lindberg, *John Pecham*, pp. 248-249。但伊斯特伍德对此立论表示反对,见 Eastwood, book review, *Speculum* (1972), p. 326。他认为,1535 年维泰罗(Witelo)的《光学》(*Optics*)一书的插图中有中世纪的成分。

(49) 见 Redgrave, *Ratdolt*。他指出,在 1482 年版的《地球》(*Sphaera*)里,拉特多尔特提供的"美丽的"木刻画是用手绘着色的;因为彩色印刷是 1485 年才发明的(pp. 17-19)。

(50) Redgrave, *Ratdolt*, p. 19 指出,拉特多尔特 1482 年印行的《地球》里包含了雷乔蒙塔努斯"唱反调的评论"和波伊巴赫的"新理论"。R. E. Johnson, 'Astronomical Textbooks, p. 295 指出,此举开启了一种新的时尚。至少从 1482 年至 1518 年间,在威尼斯印行的《地球》的 11 个版本都收录了雷乔蒙塔努斯的这篇评论,这篇评论在《地球》里最早露面的时间是 1472 年至 1474 年在纽伦堡印行的版本里。见 Houzeau and Lancaster,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 l'Astronomie* I, IE partie, item 2256, p. 552。

(51) Thorndike,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p. 339 忽略了这一点。他指出雷乔蒙塔努斯这所停业的印刷所未能刊布其新书预告并借题发挥。保罗·罗斯详细阐述了这个新书预告对 16 世纪意大利精英和编辑的指引作用，见 Ros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pp. 64, 293。

(52) Sarton, *Six Wings*, p. 257, n. 105.

(53)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326. 罗森也记述了哥白尼得到雷乔蒙塔努斯的《方位表》(*Tables of Directions*)(Augsburg, 1490)的情况：正好赶上他 1500 年在博洛尼亚进行的天文观测。

(54)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31.

(55) E. A. Burt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p. 40.

(56) 然而，我们不该因此就断言，航海探险的新闻必然会瓦解人们对托勒密《地理学》及其天文学的信心。相信托勒密理论的学者们很清楚如何计算地球的维度，他们比热那亚人哥伦布更胜一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也证实了他们的直觉。见 Morison, *Admiral*, p. 384。

(57) Gillispie, *The Edge of Objectivity*, pp. 21-22. 又见其他被滥用的陈词："潦草的北方哥特体"和"意大利粗黑清晰的字体"对比，尽管实际印行的版本证明这样的对比是不妥当的——本书第 490 页已经对此做了阐述。

(58) Rheticus, 'Narratio Prima,' p. 111.

(59)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393.

(60) 哥白尼使用过一本克雷斯通(Crestone)编纂的希腊语－拉丁语词典(Modena, 1499)十分破旧，见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123。

(61)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23.

(62) Ibid, pp. 123-31.

(63) Rabb, 'Debate: The Advent of Print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 p. 139.

(64) 据托马斯·库恩记述，哥白尼反对托勒密传统的扩散和差错"这两个主要的特征"，见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40。其他权威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 Gingerich, 'Crisis versus Aesthetic', pp. 85-97。

(65) 见本章注释(4)。哥白尼在许多古籍里找到支持日心说宇宙论的文字，其中之一取自赫耳墨斯秘义书，《天体运行论》里的这段引文在近年的研究中被过分夸大了，爱德华·罗森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趋势，Rosen, 'Was Copernicus a Hermetist?' p. 171。

(66) 应该提出阿尔定出版社选编的《天文学古籍汇编》(*Astronomici Veteres*)(Venice, 1499)以及乔治奥·瓦拉的《自然之谜》(*De Rebus Expetendis*)。见 Rose, 'Humanist Culture', p. 99, n. 241。

(67)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40.

(68) Dreyer, *Tycho Brahe*, pp. 18-19.

(69) 在 1574 年和 1575 年间，第谷买到了《普鲁士星表》(*Prutenic Tables*)，他在哥本哈根大学讲授"托勒密第二"即哥白尼时，把这种星表送给最贫困的学生。见 Moesgaard, 'Copernican Influence on Tycho Brahe', p. 32。

(70) Thoma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p. 116-117.

(71)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209.

(72) "标杆之长"常被用来描绘彗尾之长,直到多丽丝·赫尔曼(C. Doris Hellman)在《测量的作用》('The Role of Measurement')第 43 页指出雷乔蒙塔努斯的观测工具。第谷用雷乔蒙塔努斯的球面三角学进行观测,见 W. P. D. Wightman, *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 I, 123 ff。

(73) Westman, 'The Comet and the Cosmos,' p. 11.

(74) 观天需要的工具不止一根线,雷乔蒙塔努斯的学生约翰·沃基利努斯(Johann Vogelinus)观测时就不止用一根线,他试图计算出 1532 年彗星的视差,雷乔蒙塔努斯本人推测彗星的 16 点规划也证明,一根线的工具是不够的。见 Hellman, *The Comet of 1577*, pp. 81-82, 97。罗伯特·维斯特曼描绘了梅斯特林的研究,见 Westeman, 'The Comet and the Cosmos', pp. 7-30。

(75) Hellman, *The Comet of 1577*, pp. 7-6, 111-112 指出,1472 年的彗星引发了更多的论著,吸引了比 1456 年和 1468 年更多的观星人;她又指出,此后的观测报告稳步增加,"部分原因是印刷术的使用","部分原因是后来出版的观测报告丢失得比较少"。我认为,文献保存量的增加大概和新的复制工艺有关系,而且说明,12 世纪到 15 世纪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这种继续不断的、记述得很细密的、类似的文献。据 Bernard Goldstein, 'Theory and Observation', p. 46 记述,第谷之前,彗星没有"正式进入天文学",但在雷乔蒙塔努斯的时代,彗星"开始被当作天文现象研究"。戈尔德斯坦因强调,由于"文本证据"的缺失,所以难以"解释人们态度的变化",但他没有提到印刷术的出现。

(76) 1533 年的彗星引起阿皮亚努斯(1552 年去世)、杰罗姆·卡尔达诺、格马·弗利休斯和哥白尼等人的辩论,见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i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373-374。他在那里引用了雷蒂库斯的书信。

(77) Hellman, *The Comet of 1577*, p. 80 ff. 她指出雷乔蒙塔努斯的先锋角色,批评林·桑代克贬低雷乔蒙塔努斯的言论。她还对以下期刊做了详细的描绘:卡尔达诺和弗利休斯公布的如何寻找视差的方法(pp. 91-96),1556 年的彗星如何促成了首批彗星目录的出版,1572 年的新星如何产生了更多的小册子,吸引了更多的观星人(pp. 110-111),赫文的第谷和布拉格的哈吉丘斯如何互相吸引,并协调各自对 1577 年彗星的观察所得的结果(p. 118 ff.)。Westman, 'The Comet and the Cosmos', p. 8, n. 20 指出,时值 6 岁的开普勒由妈妈带到一块高地上去看这颗彗星。

(78) "压倒许多人的喧哗之声"(第谷·布拉赫语),转引自 John Christianson, 'Astronomy and Printing'。

(79) Warner, 'The First Celestial Globe,' p. 36.

(80) S. G. Nichols, Jr., 'The Interaction of Life and Literature', pp. 51-77 阐述了这一观点。

(81) Warner, 'The First Celestial Globe,' p. 36.

(82) Ibid, p. 36, n. 24. 布劳这段话是对第谷《天文学新机制》(*Astronomiae Instauratae Mechanica*)的呼应。

(83) Warner, 'The First Celestial Globe,' p. 37.

(84) 沃纳(Warner)说,这颗星亮了几年以后完全淡出。在 1657 年至 1658 年间,它又露面,但星等降到第五级。印刷术出现之后,印刷商可以给肉眼看不见的星星定位,以便其重新露面时被人发现,这样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85) Warner, 'The First Celestial Globe,' p. 38.

(86) Wightman, *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 I, 120.

(87) Sprat, *Royal Society*, part 2, section 5, p. 62.

(88) Hellman, *The Comet of* 1577, pp. 47, 67 ff. 描绘了中世纪的天文观测。在"测量的角色"(p. 43)那一段文字里,她指出,杰弗里的观测"在他那个时代的记录里异乎寻常"。Goldstein, 'Theory and Observation', p. 46 指出,一位 1337 年月食的观星人注意到《阿方索星表》有误,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尝试修正这个错误。除非与旨在修正并复制的天文学数据与某一专门的信息中心挂钩,否则任何观星者个人在修正星表上实在是无能为力,直到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改变了这一局面。在手抄书时代,编纂星表里的长串数字的刺激因素也处在低潮。见本章注释(162)。

(89) 作为"自学成才"者,第谷的异乎寻常的立场当然是有局限的,因为他毕竟走完了寻常的本科学习周期。如上文(第 533-534 页)所示,接受传统的"三艺"、"四艺"学习周期时,他也接受了新的数学训练和语言学训练,也接触到一些新的信息(虽然这些新信息常常以被遮蔽的形式出现)。

(90) 第谷的图式不尊重"对称和比例",迈克尔·梅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为此而感到不快。他由此而强烈反对第谷的宇宙论。见 Westman, 'The Comet and the Cosmos', p. 27。

(91) 这一点还可以进一步阐述:哥白尼在费拉拉大学获得教会法学位,第谷却出自一所"市侩味"的大学,在那里,教会法被认为是教廷反基督的可怕工具。哥白尼对不和谐的托勒密和阿拉伯文本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不和谐的教会法之和谐"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这是理查德·舒克(Richard J. Schoeck)在'Copernicus and Humanism'里提出的建议。

(92)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38.

(93)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序,转引自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37。

(94) 这一点被过分夸大了,有些托勒密式的天文学家甚至伪造本轮圈数以符合托勒密体系。罗伯特·帕尔特(Robert Palter)令人信服地揭示这样的过火行为,见 Palter, '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y'。又见 Gingerich, 'Crisis versus Aesthetic', n. 7 和 n. 8。

(95)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序,转引自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37。

(96)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pp. 68-69.

(97) 转引自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38。这段诉诸审美原理的文字似乎和 15 世纪的人文主义理论有关系。例如,阿尔贝蒂(Albert)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原理和其他古典修辞学的常规做了一些变通,将其转换成视觉语汇,在判断画作的艺术性时强调其构造上的一致性。见迈克尔·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乔托》,各处。哥白尼观念中的上帝像一位"伟大的匠师",设计了一台完美的天国机器;相反,按照托勒密的构想,颇有几分神性的星球在宇宙里徜徉;柯蒂斯·威尔逊生动阐述了这两种宇宙论的反差,

见 Curtis Wilson,'Rheticus,Ravetz'。

(98) Thomas Kuhn,*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pp. 138-139. 这段引文里的"十多种"托勒密式的体系究竟是何意思,并不完全清楚,其中"体系"一词不严密,其他权威学者可能会认为用得不妥。哥白尼本人使用"数学家所谓的体系"(转引自 Thomas Kuhn,*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pp. 137-138)时,他暗示的意思是够不上称为体系。过去的权威学者质疑,托勒密天文学能否与"体系"攀缘;不过,贝尔纳·戈尔德斯坦因证明:在完整的托勒密文献中,行星的确有一个确定的秩序,见 Goldstein,'Thc Arabic Version of Ptolemy's Planetary Hypotheses',part 4,*passim*。

(99) "少数欧洲人"、"少数能读到托勒密论著的人":这些文字见诸 Thomas Kuhn,*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p. 135。但这些文字和他同一本书里稍后的一些说法不太协调: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广泛被人阅读","该书拥有大批读者;能够发现哥白尼的和谐构架的读者虽然不多,但人数肯定在逐渐增多"(第 186 页)。研究者对《天体运行论》第一版发行量的各种估计"相差很大",欧文·金杰里奇估计的数字是在 500 到 800 册之间。见 Gingerich 'Copemicus and the Impact of Printing',p. 207。

(100) Thomas Kuhn,*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p. 123.

(101) Ravetz,*Astronomy and Cosmology*,p. 44. 他这里所指的是库恩在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里所说的"常态科学"。我在这里谈论的也是库恩的观点。

(102) 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随着事件的流逝……许多天文学家常态研究的纯效应"指向托勒密范式的危机,见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p. 68-69。

(103)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 69.

(104) 参见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库恩断言(第 67 页),"在这一点上,历史证据毫不含糊,早在哥白尼宣告自己的主张前,托勒密天文学已经成为丑闻",但成为丑闻的实际"时间点"似乎并不清楚。在脚注中,库恩要读者参考 A. R. 霍尔的论断:日月食的图表和教会的年历有误。据霍尔判断,年历错误"最可怕",历史证据毫不含糊,丑闻长达千百年。在'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p. 181,n. 39)里,库恩还强调,年历改革的作用"强化了危机",言下之意是,长期"稳定状态"的危机似乎处在酝酿之中。(库恩所用"危机"一词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见 Gingerich,'Crisis versus Aesthetic'。)

(105) Sarton,*Six Wings*,p. 70。关于教会反复的历法改革要求,见 Thorndike,*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p. 18。

(106) 见本书第 340 页。

(107) Ravetz,*Astronomy and Cosmology*,p. 55 说,历法改革在"哥白尼之前不可能完成",因为他提供的方法和数据使《阿方索星表》过时了。Rosen,'Galileo's Misstatements About Copernicus',pp. 328-329 说,"格里高利历并未从哥白尼那里得到任何启示",其历法修改并不是建立在《普鲁士星表》上,而是建立在《阿方索星表》界定的回归年上。感谢罗伯特·帕尔特(Palter)提供的《教廷年报》(Pontificia Academia Sceintarium)相关资料,他帮助我澄清了这个问题。据 J. de. Kort,'Astronom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Gregorian Calen-

dar'记述，格里高利年建立在《阿方索星表》变通的基础上，其"月份"的长度"取自哥白尼用在《普鲁士星表》中的数据"(p. 57)。当然，使用《普鲁士星表》未必就意味着接受哥白尼的地动说。比如，伊拉斯谟·莱茵霍尔德编制了《普鲁士星表》，但他并不接受哥白尼的图式。

(108) Sarton, *Six Wings*, 70.

(109) Crombie, 'Rejoinder', pp. 318-319。

(110) 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Grosseteste)对彼得·南丁格尔(Nightingale)1292 年的历法做了一些调整，有人对此做了记述。南丁格尔的历法含 76 年周期及详细的微调(1369 年和 1440 年做过微调)，见 Olaf Pedersen, 'The Life and Work of Peter Nightingale', p. 6。

(111) Rheticus, *Narratio Prima*, p. 127.

(112) Ravetz,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pp. 7, 9, 38-39, 51-52。拉维茨又说(p. 38, n. 23)，萨尔顿的研究方法太幼稚。

(113) Crombie, 'Rejoinder,' pp. 318-319.

(114) Philip, *The Calendar*, p. 68.

(115) Ibid, p. 68.

(116) Bosanquet, *English Printed Almanacks*, p. 59. 参见巴黎圣母学院 14 世纪使用的教材《计算》(*Computus*)，维尔迪埃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de Villedieu)撰写的这种教材用通俗语歌谣的形式，见 Astrik Gabriel, *Garlandi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p. 110。

(117) D. E. Smith, *Le Comput*, p. 13. 该书也讨论早期机印书(始于 1488 年的斯特拉斯堡小册子)，还介绍中世纪的其他记忆术著作，亦介绍了 1504 年里昂出版的插图本手指头计算练习(pp. 28, 49)。

(118)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24. Pannekoek, *History of Astronomy* p. 219 把历法改革的延宕归咎于教会的"内部争吵"。

(119) 据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III, 152 记述，中国数学的发展推动了历法问题的解决，但成功的历法改革却要等到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到来以后才能完成。见 Pasquale D'Elia, *Galileo in China*, apperdix, pp. 61ff.。

(120) 穆罕默德语，由阿尔·比如尼斯(Al Bîrûnîs)转述，Sayili, Aydin, *The Observatory in Islam*, pp. 22。

(121) Philip, *The Calendar*, p. 26. 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继承了犹太人的朔望月一回归年历法，但基督徒将其复杂化，而穆斯林则将其简化。又见 Peter Archer, *The Christian Calendar*, pp. 39-52。

(122) 据 Sayili, *The Observatory in Islam*, pp. 23-25 记述，由于伊斯兰教没有太阳历或闰年闰月闰日的安排，税收和收成都受到影响。11 世纪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马力克萨观象台(Malikshāh Observatory)曾经使用太阳历，但只用了 20 年(1072—1092)。清真寺的朝向容许很大的变通(大到 45 度甚至大于 45 度)，所以这个问题给天文学的动力可能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然而，非神圣的关怀比如沙漠灌溉问题的确推进了穆斯林的观测技术，使之比西方哥伦布时代的观测技术大大超前。(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p. 184.)

(123) 尼西亚公会议坚持避开"犹大式的复活节",这使历法问题更加复杂,见 Philip, *The Calendar*, pp. 63, 78。Archer, *The Christian Calendar*, pp. 18, 53 认为,这一决定不是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而是避免庆祝耶稣复活时间上的不一致,避免复活节出现在犹太人逾越节屠宰羔羊的前一天或同一天,因为屠宰羔羊是耶稣受难的征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采用非此即彼的态度。也许,反犹情绪和寓意上的一致性都有一定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一种历法能够避免复活节偶尔和逾越节在同一天相遇的情况,这正是基督教历法的许多复杂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始终在挑战基督教教士的创造性。

(124) 开普勒多次提到斯卡利杰的《时间的修正》(*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以及他与斯卡利杰的通信,他们探讨古代天文学,见 Palter,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分类目录第 118 条。这一条题名 *Calendars and Chronology*,列举了许多相关的书名。牛顿为弗兰克·曼努埃尔的专题研究提供了灵感,见 Manuel, *Isaac Newton Historian*。关于斯卡利杰《时间的修正》,见 Anthony T. Grafton, 'Joseph Scaliger and Historical Chronology'。

(125) Clagett, *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 pp. 162-165.

(126) Zilsel, 转引自 Lewis Feuer, *The Scientific Intellectual*, p. 249。

(127) Price, 'The Book as a Scientific Instrument', p. 102.

(128)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360 指出,哥白尼应邀参与历法改革前就已经在写《评论》,罗森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杰洛姆·拉维茨认为:"哥白尼对天文学的重构源自于历法改革。"而柯蒂斯·威尔逊则反对这一判断,见 Curtis Wilson, 'Rheticus, Ravetz', pp. 4-5。我们则认为,这个问题的确进入了哥白尼修正托勒密天文学的工作中,只不过是在稍晚的一个阶段。见本章注释(131)。

(129)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362.

(130) Ibid, p. 388.

(131) 教皇利奥十世邀请福斯布龙(Fossebrone)的主教米德尔堡的保罗(Paul of Middleburg, 1445—1533)参与历法改革,米德尔堡的保罗又于 1515 年"敦促"哥白尼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个课题,见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359-362。米德尔堡的保罗本人研究历法,走向希伯来研究,见 Adrib Offenberg, 'The First Use of Hebrew'。

(132) Marie Boas,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69.

(133)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34.

(134)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213. 据该书 p. 191 描绘,《天体运行论》没有人读。爱德华·罗森猛烈抨击柯斯特勒这一"荒谬的、非历史性"的判断,见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406-408。实际上,意大利宣教人多尼(Doni)笔下的两位佛罗伦萨人就引起争论,他在布道辞里驳斥"假设即理论"的观点,见多尼《据我所知》(Venice, 1552);迪巴尔塔(Du Bartas)在 1587 年的流行诗《岁月》('La Semaine')里讥笑这个观点。又见 Preserved Smith,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p. 52-53。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充分描绘 16 世纪宣传的正反两面效应。这方面的拓荒之作是 Dorothy Stim-

son, *The Gradual Acceptance of the Copernican Theory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1917),但近年的研究业已使之过时,见 Hilfstein and Rosen 对芭芭拉·边考斯卡(Barbara Bienkowska)出版社印行的一本波兰书的评论。

(135)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p. 11-12. 尤其在伽利略转向印刷术之后,"近代科学的静悄悄兴起"接近于对立教派吵吵嚷嚷的冲突,并不像怀特海这段话描绘的那样遥远。见本书第八章对怀特海观点的批评。

(136)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 185. 由于《天体运行论》的技术性质,由于印刷术之前的审查制度不那么严格,只要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完全压制这本书"的意图看来就是不太可能的;实际上,《天体运行论》很容易删节,这就使之"完全"受压制没有必要。还应该记住的是,在不接受其中的地动说的情况下,这本书也是可以用的。见本章注释(107)所举的 Reinhold 的 *Rudolphine Tables* 的例子。

(137)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191 指出,萨克罗伯斯柯的《地球》(*Sphaera*)印了 59 次,克里斯托弗·克拉维(Christoph Clavius)的《专论》(*Treatise*)印了 19 次,梅兰希顿的教材印了 9 次,他还记述了托勒密《天文学大全》和波伊巴赫《行星理论》(*Planetary Theory*)印行的情况:到 1600 年,这几种书在德意志已经印行一百多次;相反,《天体运行论》只重印了一次,借以证明他说《天体运行论》是"销售最差的书"是有道理的。这有点像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Die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orie*)拿来和过去 50 年间基于"古典"牛顿力学理论的所有的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作一番比较。此外,亦如上文所示,许多版本的书籍含有附录,而这些附录指向的是一种新的天文学。

(138) Mayor, *Prints and People* 图 108 的文字说明。该书没有标注页码,故我们无法确定引文页码。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把开普勒的肖像误用为哥白尼的情况没有得到纠正。这种愚蠢的大错显然危害甚重(它还强化了两种文化的分野)。但 17 世纪之前,科学创新尚未进入机印书这个错误的观点具有更大的危害,它扭曲了人们对这个"天才世纪"的视角。

(139) A. Castiglioni, *A History of Medicine*, p. 425. 围绕维萨里《人体的结构》引起的辩论,见本书第 574 页。

(140) 雷蒂库斯的《天文学初步》的首版在但泽印行,以后在巴塞尔印行(1540—1541),其第三版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 1566 年同时问世。第四版和开普勒的《神秘的宇宙志》(*Mysterium Cosmographicum*)在 1596 年同时问世(梅斯特林指导),第五版和开普勒的《神秘的宇宙志》1621 年在法兰克福同时印行。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11; J. L. E. Dreyer, *History of Astronomy*, p. 349。关于印行《天体运行论》的决定,见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pp. 406-407。海因里希·佩特利(Heinrich Petri, 1527—1579)是杰出的巴塞尔印刷王朝的继承人、弗洛本寡妇的丈夫,关于他的情况,见 Josef Benzing, *Buchdrucker-Lexicon*, p. 24,又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75)。

(141)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458 漏掉了这个重要的第三版,那是 1617 年由布劳印行,时值《天体运行论》被谴责之后不久。柯斯特勒给不知情的读者错误的印行:因为低估的观测、开普勒的发现和伽利略的望远镜,《天体运行论》过时了,谁也不会自找麻烦去重印它。至于布劳再版《天体运行论》的时机,见本书第 676 页的讨论。

(142)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149.

(143) 据 Rosen,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p. 343 记述，无疑，罗森所谓小册子指的是克拉科夫大学博士论文馆藏里的哥白尼的《评论》，即哥白尼"地动说和日心说"的初稿。

(144)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209.

(145) 1574 年第谷在哥本哈根讲演时赞扬"托勒密第二"，见本章注释(68)。Dreyer, *History of Astronomy*, p. 397 引用了乌尔斯提修斯(Urstisius)赞颂哥白尼的话，赞词"真正神圣的天才"出自 1573 年的一本书；Ravetz,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p. 49 指出，连克拉维(Clavius)都把哥白尼誉为"天文学的恢复者"。Westman, 'Three Responses'历数了专业天文学家对《天体运行论》的敬佩及各种反应，这些天文学家属于梅兰希顿的圈子，他们把哥白尼遗产的各个方面传给下一代。

(146) 托马斯·迪吉斯(Digges)1576 年出版的 *A Perfit Description of the Caelistiall Orbes according to the Most Aunciente Doctrine of the Pythagoreans, lately Revived by Copernicus and by Geometrical demonstrations approved* 是他父亲莱昂纳德·迪吉斯的《星历表》再版的附录；题名为《永恒的预言》(*The Prognostication Everlasting*)的星历表到 1605 年印行了 6 次。见 Francis Johnson, *Astronomical Thought*, pp. 100-102。约翰逊这本书含有《天体运行论》第一卷大段大段的材料，这也可以用来反驳《天体运行论》"销售最差"的说法。印行《永恒的预言》的出版商托马斯·马什(Thomas Marsh)还于 1556 年刊布了著名的《1557 年安尼星历表》(*Ephemeris Anni 1557*)，这一星历表包含了《普鲁士星表》(而《普鲁士星表》是在此之前 5 年出版的)；在这一星历表里，约翰·菲尔德(John Feild)调整了伦敦的子午线；该星历表由约翰·迪伊作序，序言中提到哥白尼和伊拉斯谟·莱茵霍尔德。见 Bosanquet, 'English Seventeenth-Century Almanacks', pp. 33-34；又见 Dreyer, *History of Astronomy*, pp. 346-347。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213 说："开普勒和伽利略之前，哥白尼的理论简直被忽视了。"他这样说实际上把托马斯·迪吉斯当作"非天文学家"。然而，托马斯·迪吉斯的确对第谷 1572 年研究新星的著作作出了贡献。16 世纪 40 年代进入剑桥的学生很早就对哥白尼的理论产生兴趣，他们常常到约翰·切克爵士(Sir John Cheke)和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图书馆去读哥白尼的著作，Francis Johnson, *Astronomical Thought*, p. 89 对此作了记述。1556 年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图书馆的分类目录证明，早期印刷商扮演了创新角色，雷乔蒙塔努斯具有广博的知识。

(147) Aston, *The Fiery Trigon*, n. 66.

(148) 据 Bosanquet, 'English Seventeenth-Century Almanacks', p. 4 记述，印刷术之前，很少有人发布预言。吉斯·托马斯记述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有过倾泻而出的逃亡文学，见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p. 283-389。

(149)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p. 335ff. 断言，"大量且反复的错误"并未减少人们对预言的需要，同时又指出(p. 300)，1652 年上院发布的文件裁定，日月食是自然事件，没有政治含义，以便抵消匿名小册子的冲击。该书第 350 页又表明，由于日益精确的预测比如哈雷彗星的预测，异兆预言的效应逐渐减弱了。

(150)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p. 149-150 指责哥白尼"充满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崇拜"，"傲

慢的蒙昧主义”和“反人文主义”，因此他与伊拉斯谟、罗伊希林、冯·胡腾和路德等人截然相对。事实刚好相反，毕达哥拉斯崇拜和许多形式的北方人文主义是相当协调的，罗伊希林即为一例，从现代人的研究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Spitz，*The Religious Renaissance* 和‘Reuchlin’s Philosophy’。

(151) 见本书第五章第 501-503 页及本章注释(152)。其他读者如何最终被说服去研究开普勒那难读的散文，如何从中清理出重要的定理，见本书第 631 页。

(152) Carl Boyer，*History of Mathematics*，p. 358 提出一些有关日月食和抛物线的意义隽永的评论，又对开普勒桶装液体的计量做了很中肯的探讨。配有统一的、棱角分明的图示的文本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圆锥截面有关的问题因此而得以澄清。开普勒问道：“有多少史学家愿意耗费心血去读完帕加马的阿波罗尼奥的《圆柱体》(Conics)？”(见 Marie Boas，*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p. 305。)在中世纪的拉丁文手稿中，帕加马的阿波罗尼奥的定理(和欧几里得的定理一样)不能清楚而直接地向“理性的内耳”(reason’s inner ear)述说，部分原因是，这些定理并没有清楚地向眼睛展示。Rose，‘Renaissance Italian Methods of Drawing the Ellipse’详细描绘了帕加马的阿波罗尼奥的《圆柱体》传播的情况，介绍了“弱小的”中世纪传统、雷乔蒙塔努斯根据希腊文本出版《圆柱体》新译本的计划、乔治奥·瓦拉《自然之谜》(*De Rebus*，1501)包含《圆柱体》文字的情况以及截止到菲德里戈·康曼迪诺(Bologna，1566)刊布其他版本的情况。保罗·罗斯(Rose)这篇文章包含了传授圆锥截面的方法以及用于其教学的新工具的宝贵材料。参见 Koestler，*The Sleepwalkers*，pp. 330-331。

(153) 见本章注释(99)。

(154) 但爱德华·罗森提供的证据以及本书第 591 页的讨论显示，雷蒂库斯 1539 年到福隆堡造访并带来首版的雷乔蒙塔努斯《论三角形》(*On Triangles*)；在此之前，哥白尼从未见过这本书。

(155) 见 Rosen，*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p. 8。这种 16 世纪手抄本书简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后来的铅印文章和书评所起的作用。罗森还指出，第谷搜求到哥白尼的 *Letter against Werner* 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转抄本，这一手抄本 19 世纪曾经在柏林和维也纳现身。Swerdlow，‘Derivation of Commentariolus’也指出，第谷收藏的哥白尼《评论》的手稿成为复制的蓝本。斯沃德罗评述稍后抄本的讹误，说明任何时候的手抄本传播都会出问题。但第谷从开普勒那里得到的手稿是新鲜的原件，未经转抄，所以第谷收藏的这个手稿不存在讹误的问题。

(156) Drake，‘Early Science and the Printed Book，’p. 48.

(157) 见 Gabriel，*The College System*，p. 28；Humphreys，*The Book Provisions of the Medieval Friars 1215—1400*，*passim*。又见伯利齐亚诺(Poliziano)1491 年在马尔齐亚纳图书馆得到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手稿的体验(Rose，‘Humanist Culture，’p. 93)，亦见纪尧姆·比代有幸在佛罗伦萨窥视羊皮纸卷的《法规汇集》(*Digest*)时的心情，本书 103 页对此做了记述。

(158) Hughes，introduction，Regiomontanus’*On Triangles*，p. 7. 很长一段时间，北欧的三角书供不应求。甚至 16 世纪末开普勒进入蒂宾根大学读书以后，他也不知道“正弦的科学”和

"三角的计算",直到他从一位路经格拉兹的意大利博士那里借到一本书才略有所知。此后,他才搜寻到欧几里得和雷乔蒙塔努斯的书。见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583, n. 20。雷蒂库斯分别(由路德喜欢的书局)出版了《天体运行论:三角形综述》(*De Lateribus et Angulis Triangulorum*)第一卷的前两章(Wittenberg: Johannes Lufft, 1542),此举的重要作用超乎一般人的认识。

(159)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287. 关于《普鲁士星表》(Prutenic Tables)的介绍,见本书第 213 页。

(160) 皮埃尔·伽桑狄用心搜集第谷的传记资料,见 Christianson, 'Tycho Brahe's Facts of Life', pp. 21-22。伽桑狄为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家立传所起的作用颇像瓦萨里为艺术家立传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见 Gassendi, *Tychonis Braheii... Vita. Accessit Nicolai Copernici, Georgii Peurbachii et Joannis Regiomontanii* (The Hague: A. Vlacq, 1654)。据 Dreyer, *Tycho Brahe*, p. 127 记述,伽桑狄还从荷兰地图出版王朝开山祖师威廉·詹森·布劳那里搜集到第谷的资料,布劳的出版业绩见本书第 480 和 600-601 页。第谷为这些伟大的天文学家镌刻画像、出版书籍,并使自己的工作后继有人。第谷自己也被收入了拉米斯的《数学家》(*Scholarum Mathematicarum*, Basel, 1569)一书之中(他与拉米斯在奥格斯堡结识)。从拉米斯到伽桑狄再到贝尔纳·丰特奈尔(Bernard Fontenelle)直到伏尔泰的学者讴歌牛顿,法国学者(常常受到胡格诺教徒出版商或外国出版商的推动)带头讴歌创立新天文学的观星人。意大利人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始于贝纳迪诺·波尔迪(Baldi)1587 年至 1595 年陆续刊布的《数学家列传》(*Vite dei Matematici*),可惜该传记未能完稿。见 Ros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chap. 11。意大利出版商的贡献使第谷、开普勒、伽利略不朽,还使托勒密、基歇尔、萨克罗伯斯柯、谢纳不朽,因为他们把这些人的名字放进一种反对哥白尼的月图中,这张月图见 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 *Almagestum Novum Astronomiam Veterem* (Bolgna, 1651)。里奇奥利确定了月亮地形的专名,不久前,Van de Vyer, 'Original Sources of some early lunar maps'指出,其中一些专名出自里奇奥里。

(161)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199.

(162) 雷蒂库斯在维滕堡与伊拉斯谟·莱茵霍尔德共事,可能还协助他编制《普鲁士星表》(*Prutenicae Tabulae Coelestium Motuum*, Tübingen: Ulricus Morhardus, 1551)。他本人还开创了几件宏大的工程,包括一系列的三角函数表,后来由弗朗索瓦·维埃特、瓦伦丁·奥托(L. Valentine Otho)和巴塞洛缪·比蒂斯库(Bartholomaeus Pitiscus)接手开拓完成。Sarton, *Appreciation*, p. 161 对手工完成这类宏大工程的投入表示赞赏。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 189 也表示钦佩,并且说,雷蒂库斯需要这种"职业疗法"以保持精神健康。他们新近获得了免于手抄这类图表的自由,而且用铅印来保存新编制的图表又获得新的进展,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中考虑的因素。从雷乔蒙塔努斯到内皮尔这段时期是对数出现之前、印刷术出现以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数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因为它激励了一种特殊的脑力劳动。无疑,台式计算器将使未来的史学家惊叹,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前辈们用计算尺完成了多么巨量的艰苦劳动啊。像对数一样,计算尺是另一种

被人忽视了的印刷术革新的产物。

(163) Gade, *The Life*, p. 102 描绘，第谷从丹麦王那里得到一张“空白支票”，供他在丹麦和挪威采购纸张，但即使这样的采购也不够需求，于是他就在岛上建了一座造纸厂。Dreyer, *Tycho Brahe*, p. 239 ff. 描绘第谷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旅程，1597 年到 1598 年，他在去哥本哈根和罗斯托克的路上，用马车带上印刷机，边走边印。

(164) 见 John Christianson, 'Astronomy and Printing'。

(165) 有趣的是从第谷通过布劳到莫克森(Moxon)的这条线，布劳为第谷工作，又为莫克森印制《印刷工操作手册》(*Mechanick Exercises*)，他将当时先进的印刷技艺传授给莫克森。见 E. G. R. Taylor, *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pp. 92, 231-33。莫克森是少数被批准加入皇家学会的仪器制造商和印刷商之一。

(166) 在《天文学新机制》(*Astronomiae Instauratae Mechanica*)里，第谷用镌刻画显示他那台巨大的四分仪和助手们的工作情况；该书献给鲁道夫二世，1589 年由汉堡一位印刷商印制。见 Marie Boas, *Scientific Renaissance*, p. 96-97 的插图。

(167)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p. 410-411. 第谷的 777 颗星球的星表在托勒密和阿拉伯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见 Warner, 'The First Celestial Globe', p. 30。关于《鲁道夫星表》的编制和内容，又见 Caspar, *Kepler*, p. 327。凯斯帕指出，第谷在书中印制世界地图的计划在最后一刻受挫。“折光表”从多种光学著作尤其从维泰洛(Witelo)的《透视学》(*Perspectiva*)学到不少东西；《透视学》一书纳入了雷乔蒙塔努斯的“新书预告”中，但到 1535 年才由纽伦堡印刷商佩特雷乌斯刊布，《透视学》也是雷蒂库斯 1539 年带给哥白尼的图书之一。

(168) 据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p. 191, 410 记述，这两种书的首版都印了 1,000 册，但他这一猜测没有根据；欧文·金杰里奇的估计是，《天体运行论》的首版只有 500 册至 800 册。

(169) 关于合参本《圣经》推动的研究，见 Preserved Smith,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p. 251。又见本书第 337 页之后的探讨。关于开普勒的《圣经》研究和技术编年研究，见 Caspar, *Kepler*, pp. 317-319。这两种出版物都需要纪年表和地名表，这两种书的编纂都需要掌握三种语言，这说明《圣经》学者和天文学家的研究兴趣有交叠。比如，天文学家率先提出耶稣出生年代的问题。见 Caspar, *Kepler*, p. 228。弗兰克·曼努埃尔的两种书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 和 *Isaac Newton Historian* 含有大量牛顿研究《圣经》纪年和历法问题的资料。

(170) Caspar, *Kepler*, pp. 317-324. 开普勒此前研究桶容积的书《容积测量法》(*Stereometria*)也说明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pp. 406-409 描绘了开普勒长期的磨难(p. 415)，又描绘了他如何经过 18 个月的努力终于在萨根的住所置备印刷机，以及他 1629 年至 1639 年印行《星历表》的过程。

(171) 这幅镌刻画由纽伦堡的镌刻师乔治·科勒(Georg Coler)完成，其署名在画底。如上所示，这说明天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事实用的工作，亲自动手。印刷术出现之前，他们就设计星盘和日晷，参与铸币。印刷术出现以后，他们和仪器制造商、镌刻师、字钉设计师合作，将

自己的才能用于诸如此类的工作。因此，我们不必借助“清教徒”精神来说明牛顿愿意自己动手磨制棱镜的现象（见 Manuel，*Portrait of Isaac Newton*，p. 47）。

(172) 印刷所占据画底 5 幅面版中的 2 幅。紧靠正中那幅面版的右侧（显示赫文岛）有两人在开印刷机；在最右边那幅面版那里，有一位排字工，手握铅字和木框。开普勒很看重新的印刷技艺（印刷术与恢复古籍以及新技术、医学、天文学等的出现联系在一起），Rosen，‘In Defense of Kepler’，pp. 141-149 的引文显然能说明他对印刷术的重视。

(173) 见 Koestler，*The Sleepwalkers*，p. 407。该书第 411 页描绘了这幅卷首插图，但没有提其中的印刷机。在凯斯帕（Caspar）的《开普勒》（*Kepler*）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遗漏，柯斯特勒的描绘是以凯斯帕的描绘为基础的。

(174) 见 Koestler，*The Sleepwalkers*，p. 124。

(175) Ibid，p. 590，n. 5.

(176) 关于里奇奥利（Riccioli）的《新天文学大全》（*Almagestum Novum Astronomiam Veterem*）里更加常规的评述，见 Stimson，*Gradual Acceptance*，pp. 77-8。

(177) Drake，‘Early Science，’p. 49.

(178) 到牛顿时代，英国大学的本科生可以读皮埃尔·伽桑狄的《天文学体系》（*Institutio Astronomica*），借以学习几种矛盾的版本；1647 年至 1702 年间，这本书至少印行了 6 版，后来还成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材。见 Palter(ed.)，‘Kepler Catalogue’，条目 n. 93。Stimson，*Gradual Acceptance*，p. 90 指出，“根据托勒密、第谷和哥白尼的体系描绘的附有说明书的天球”在 1670 年的伦敦书市上出售。

(179)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 77 阐述了面对不同选择的重要意义。

(180) 见 Russell，‘Kepler’s Laws’，p. 9。又见该书第 13 页就 1550 年的一套星表和 1660 年的另一套星表所做的比较。彼得·克鲁杰（Peter Cruger）皓首穷经钻研开普勒那“晦涩的”著作，像阿方索王一样祈祷，渴望寻找到一种解答，终于在 1629 年完全接受了开普勒的理论，使他能够重新评估开普勒《哥白尼天文学提要》（*Epitome Astronomiae Copernicanae*）；他“此前尝试读但被束之高阁”的书在他细腻的笔下呈现出迷人的光彩（p. 8）。

(181) 见 Russell，‘Kepler’s Laws’，pp. 10-11。

(182) 见本书第 501 页引文。

(183) 除了卢塞尔（Russell）神父的文章《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Kepler’s Laws’）提供的数据之外，又见 Curtis Wilson，‘From Kepler’s Laws，so-called，to Universal Gravitation’，该文介绍了伊斯梅尔·布尔耀（Ismael Boulliau）和塞斯·沃德（Seth Ward）的公开论战（pp. 100-119）以及星历表出版商诺尔·丢雷（Noel Duret）接受开普勒理论的情况（p. 100，n. 29）。威尔逊、卢塞尔和怀特塞德（Whiteside）的文章含有与赫瑟林顿（Hetherington，‘Almanacs，’pp. 275-279）相反的证据。赫瑟林顿觉得文森特·温的介绍“太粗略”（pp. 277），相反，怀特塞德的‘Before the Principia：The Maturing of Newton’s Thoughts’显示，牛顿参阅了文森特·温提到的书籍（托马斯·索尔兹伯里[Thomas Salusbury]翻译的伽利略的著作）并以其作为阅读指南。

(184) Russell,'Kepler's Laws,'pp. 18-19.

(185) 见 Curtis Wilson,'From Kepler's Laws,so-called,to Universal Gravitation',1,pp. 123-124。又见 Whitehead,'Before the Principia:The Maturing of Newton's Thoughts',p. 5ff。

(186) Whitehead(ed.),*The Mathematical Papers of Isaac Newton I:1664-1666*,转引自 Bernard Cohen,book review,*Scientific American*(1968),pp. 139-144。在书评的另一段里,科恩提到"威廉·奥特雷德(William Oughtred)的算术符号",这段话似乎印证了E. G. R. Taylor,*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p. 374 的观点:在 17 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学校里,奥特雷德(Oughtred)的《数学秘诀》(*Clavis Mathematica*)取代了 16 世纪罗伯特·利科尔(Recorde)的课本。

(187) 见 Robert Gorham Davis,'Speak of the Devil',p. 55,从中管窥这种神秘兮兮的传说(伏尔泰、黑格尔等人都曾参与)。

(188) Manuel,*Portrait of Isaac Newton*,p. 151.

(199) 牛顿造访的布特比·帕格内尔教区长的汉弗莱·巴宾顿(Humphrey Babington)图书馆,距他母亲在沃尔索普的住宅东北三英里;关于他借阅剑桥的伊萨克·巴罗(Isaac Barrow)私人藏书的情况以及他购书的情况,比较 Manuel,*Portrait*,pp. 81-82 和 Whiteside,'Newton's Marvellous Year'。

(190) J. A. Lohne,'Isaac Newton'描写了少年时代的牛顿在沃尔索普的生活,他试验油漆配方、研究染料和印刷油墨(p. 128)。Whiteside,'Before the Principia'详细描绘了"自修生"牛顿读书的情况。

(191) Koestler,*The Sleepwalkers*,p. 190.

(192) Manuel,*Portrait of Isaac Newton*,p. 154.

第八章

(1)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p. 12.

(2) Sarton,'Quest for Truth',p. 62.

(3)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p. viii.

(4)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p. 12.

(5)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p. 16.

(6) Axtell,'Locke's Review of the Principia'描绘了哈雷在皇家学会的《哲学通讯》(*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为牛顿《原理》(*Principia*)的出版发布的通知;又描绘了莱布尼兹在《学术通讯》(*Acta Eruditorium*)上的拉丁文书评,还记述了《博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的法文书评,以及让·勒克莱尔编辑的《通用目录学》(*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里未署名的评论,最后这篇书评支持牛顿,贬低笛卡尔派的学者。阿克斯特尔(Axtell)将这篇未署名的书评归之于洛克,对其重要性做了高度评价。这一评价受到科恩(I. B. Cohen)质疑,见 Bernard Cohen, *Introduction to Newton's 'Principia'*, p. 46, n. 9。在评价较早的书评时(pp. 149-162),科恩认为,《学术通讯》上的拉丁文书评更值得注意。正如埃顿(E. J. Aiton)在'Essay Review',*History of Science* 中所言,《学术通讯》的书评不仅使牛顿修订文稿,而

且刺激莱布尼兹在读牛顿的《原理》之前就发表了三篇文章。然而，无论让·勒克莱尔的《通用目录学》杂志上发表的书评多么不值一读，它还是更容易吸引文坛主要宣传人的注意。它为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在以后的一百年里充分利用的主题定下了调子；它又使人怀疑玛格丽特·雅各布的论断：欧洲人要等到玻义耳的讲稿问世以后才知道牛顿的科学成就。见 Margaret Jacob，'Early Newtonianism'，pp. 142-146。

(7) Caspar，*Kepler*，p. 298.

(8) Ibid，p. 299.

(9) 见本书第 654、656 页本-戴维(Ben-Dzvid)的引语，又见 A. R. Hall，*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p. 77 的评论："伽利略被罗马传唤的重要性容易被夸大"。

(10)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开普勒寻求出版商、确保印务继续进行的努力就遇到了麻烦，见 Caspar，*Kepler*，pp. 310-322。

(11) "科学家"一词起初由惠韦尔(William Whewell)普及，普莱斯(Derek da Solla Price)下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定义："凡是给专业科学杂志撰写过一篇论文的人"。其主张似乎是，学术刊物的庙堂出现之前，庙里的神就已经降生。这似乎将笛卡尔、伽利略、开普勒和哈维等人逼到专业工作的边缘，把"天才的世界拦腰斩断"，只能帮倒忙。

(12) 鲁道夫二世去世以后，他调动的人才人间蒸发，Evans，*Rudolf Ⅱ and His World*，p. 192 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绘。

(13) 关于意大利优先发展的情况，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14) Dannenfeldt，'Wittenberg Botanists'引述 Ferdinand Cohrs，*Melanchthon，Deutschlands Lehrer* 的一句话："任何其他大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都不如维滕堡大学发达"(p. 242)。(这个观点可以回溯到彼得·拉米斯，他赞扬德国人的目的是借以推动法国国王。)关于主要的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路德教的德意志再转到欧洲其他地方的加尔文教的趋势，见 Mason，'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 Reijer Hooykaas，'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胡卡斯的文章还很好地小结了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观点。在 *Humanisme，Science et Réforme* 里(p. 86)，他又转引拉米斯对德国是"数学温床"的赞词以及拉米斯对梅兰希顿和维滕堡大学的颂扬。至于皇家学会内与世隔绝的辩论，围绕英国国教、清教、宗教宽容、自然神论、学院式与非学院式的观点的辩论产生的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能在这里兼顾。Mason，*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th Century England*，1970，pp. 267-273 提供了更新的文献(截至 1970 年)，还可以查阅 Webster，ed.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5) 见 Yates，*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p. 227。又见 McGuire and Rattansi，'Newton and the"Pipes of Pan"'。此外，再参见两篇批判性文章：A. R. Hall，'Magic，Metaphysics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Rossi'Hermeticism，Rationalit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这两篇文章都收入 Bonelli and Shea(ed.)，*Reason，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16) 见 Rosen，'Was Copernicus a Hermetist?'p. 171。Westman 的'Magical Reform'的批判是对耶茨的沉重打击。

(17) 去神秘化和去痴迷化的主题至少可以回溯到启蒙运动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及其19世纪的赞赏者:孔德与马克思。Rossi,*Francis Bacon* 及其他论著摒弃神智学、偏离巫术。反教会的观点在安德鲁·怀特的旧著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里非常突出;近年的著作仍然引用这本书,但在新教对哥白尼审查的论述方面,该书有误导作用(见 Hooykaas,'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pp. 238-289,n. 100; 104)。反教会的思想亦见于许多后来的实证主义记述,比如本书第五章里提到的 J. H. 兰德尔和 A. 伍尔夫的著作。刘易斯·费尔(Feur)借用兰德尔等人的观点,在 *The Scientific Intellectual* 中强调唯物主义和伊壁鸠鲁的快乐论的思潮。

(18) A. R. Hall,'On the Historical Singularity'强调了多重方法论的必要性。查尔斯·施密特指出,英语里的"科学"一词用单数(欧洲大陆的法语却喜欢用复数"les sciences"),这就模糊了科学事业的多样性,见 Schmitt,'Essay Review',p. 175,n. 45。

(19) Kearney,'Puritanism and Science,'pp. 108-109.

(20) Harcourt Brown,*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17th Century France* 对这些会晤场所做了介绍。

(21) 泰奥福雷斯特·勒诺多出版计划遇到困难,据 Harcourt Brown 记述,该出版商的《通讯报》(Feuille du Bureau d'Addresse)可以被视为"第一种科学期刊"。创办《博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的德尼·萨罗(Denis Sallo)也受挫,见 Brown,*Scientific Organizations*,pp. 21-24,109。出版商勒诺多对萨缪尔·哈特立伯(Hartlib)等人产生了影响,关于创办科学杂志的生涯,又见 Solomon,*Public Welfare*,*passim*。关于萨罗及其杂志,见 Birn,*Le Journal des Savants*。

(22) 见 Whitmore,*The Order of Minim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p. 21。梅森率先搞"极端庸俗化"的潜力和他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措施之间存在着冲突,Whitmore 这本书第21页对此做了描绘。

(23) 听到伽利略被谴责的风声之后,梅森编纂了一个特殊版《神学问答》(*Questions Théologiques*)送往罗马,以取代一些论为天文学准备音乐的文字。见 William Hine,'Mersenne and Copemicanism',p. 30;'Mersenne Variants'。梅森试图分离巫术与科学,见 Yates,*Giordano Bruno*,chap. 22。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是 R. Lenoble,*Mersenne*。

(24) 切尔伯利的赫伯特(Herbert of Cherbury)的自然神著作《论真理》(*De Veritate*)被列为禁书以后,梅森立即将其译成法语,"并在他的帮助之下秘密地印行"。据 Walker,*The Ancient Theology*,p. 170 记述,这是梅森 1640 年致信夸美纽斯时袒露的消息。据 Nati H. Krivatsky,'Herbert of Cherbury's "De Veritate"'记述,《论真理》传播的路线是从埃克斯的佩雷斯克到罗马的康帕内拉再到巴黎的梅森和皮埃尔·伽桑狄。1632 年至 1633 年,伦敦的埃利亚斯·迪奥达蒂(Elias Diodati)多次捎带《论真理》回法国。关于迪奥达蒂和梅森所做的其他工作,见 Martha Ornstein,*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p. 140-141;又见 Hine,'Mersenne Variants',p. 30 以及 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p. 11,n. 33。

(25) de Santillana,*The Crime of Galileo*,p. 173 把埃利亚斯·迪奥达蒂描绘为伽利略的巴黎通

信友人，又说迪奥达蒂是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的移民，认为迪奥达蒂参与了法语版《圣经》的翻译。你不禁要怀疑他把 Elias Diodati 和他的表亲 Jean Diodati 混淆了，Jean 参与了意大利语版《圣经》的翻译(1605)，又翻译了 *Sarpi* 的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1621)，见本书第 412 页。

(26) 见 René Pintard，*Le Libertinage Erudit* I，129-130；175-176。承蒙迪奥达蒂的努力，福斯卡里尼(Paolo Antonio Foscarini)的《书简》和伽利略的 *Letter to Grand Duchess* 才得以出版，见 *Le Libertinage Erudit* II，593。但斯宾克(Spink)的 *French Free Thought* 却没有使读者意识到埃迪奥达蒂。平塔德(Pintard)把迪奥达蒂纳入那个关系密切的四驾马车，其他三人是伽桑狄、诺代和勒韦耶。斯宾克也探讨同样的三驾马车(伽桑狄、诺代和勒韦耶)，但说到第四驾马车时，他用居伊·帕坦(Gui Patin)取代迪奥达蒂。

(27) 在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著《伽利略的新思想》(*Les Nouvelles Pensées de Galilée*)的编者序言里(I，17-24)，科斯塔贝尔和勒纳(Costabel and Lerner)描绘了埃尔西韦尔与梅森的接触。关于埃尔西韦尔印务公司及其创建人和普朗坦印务公司的关系，见 David Davies，*The World of the Elseviers*，*passim*。

(28) 见 Febvre and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 pp. 374-375。查理一世在位时，英国人喜欢荷兰印刷商的图书，引起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的不满，见 Haley，*The Dutch in the Seuenteenth Gentury*，p. 123。

(29) 语出 de la Fontaine. Verwey，'The Netherlands Book'，p. 29，其根据是 Haley，*The Dutch in the Seuenteenth Gentury*，p. 123。

(30) 见本书第 405 页。Price，*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Dutch Republic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apter 7 对荷兰印刷业的阐述很清楚，比其他权威著作略胜一筹。

(31) 见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pp. 140-141。他这段文字以保罗·哈扎德(Hazard)的《欧洲良心的危机》(*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为基础。在该书第三卷里，哈扎德描绘了有影响力的文化中心从天主教南方向新教北方的迁移。

(32) Kearney，'Puritanism and Science，'p. 109.

(33) Martin，*Livre à Paris*，pp. 874-879 提供了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的资料，又见 Kearney，'Puritanism and Science'，pp. 108-109 关于皮埃尔·培尔与出版商雷纳·里尔斯(Reiner Leers)的关系，本书第 420 页对此做了介绍：里尔斯给培尔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34) 关于 17 世纪 80 年代之前法国文化影响并渗透到荷兰的情况，见 Haley，*The Dutch in the Seuenteenth Gentury*，p. 190 ff.。又见 Gustave Cohen，*Ecrivains François en Hollande*，*passim*。16 世纪中叶以后，旅居日内瓦的意大利新教徒(如迪奥达蒂家族)发迹了，他们也为肇始于荷兰的法语出版业作出了贡献。见 Annie Barnes，*Jean Le Clerc e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passim*。

(35) Voët，*The Golden Compasses*，1，197 描绘了这些不同的政策，又见本书第 408-409 页。

(36) Rabb，'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p. 117 和 Koestler，*The Sleepwalkers*，p. 495 都谈到 17 世纪中国的耶稣会天文学出版物，仿佛他们的出版计划和欧洲的新教一天主教政策有关系。然而，耶稣会在中国传播的教义使之在罗马声名狼藉(见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I, 29)。

(37) Rabb,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p. 133 说，反宗教改革的教皇比如保罗三世和格列高利八世"至少欢迎新天文学的发现，这些发现为历法改革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哥白尼的研究成果和格列高利的历法改革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见本书第七章注释(107)。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教皇欢迎"新天文学的发现"(除非你把所谓的"新"天文学解释为包括托勒密的图示或第谷的图示)。据唐纳德·门泽尔(Donald Menzel)为德·埃利亚的《伽利略在中国》所作的序言第 vii 页记述，驻北京的耶稣会士宣传了伽利略的发现，协助了中国的历法改革，但由于伽利略 1611 年被谴责并于 1633 年受到审判，这些耶稣会士并没有在中国传授他的日心说。

(38) Rabb,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p. 112.

(39) Ibid, p. 117.

(40) Ibid, p. 113.

(41) 见 Bronowski and Mazlish,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p. 124。与这句话配对的另一句是："1596 年，开普勒寻求耶稣会的庇护。"但就在这一年，开普勒的第一部著作由梅斯特林在蒂宾根印行了——这很难说是哥白尼革命在德国被扼杀的迹象。

(42) Rabb,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p. 112 称："新教徒早期的敌视"态度由于后来天主教徒"官方的反对"而被摆平了，言下之意是，两者的"角色互换了"。他认为，开普勒"在德国神学家和大学教授的手里历经磨难"，主要的宗教改革家"公开而激烈地反对日心说"，于是，他就把新教的态度等同于 1616 年教廷对伽利略的谴责，等同于教廷迫使伽利略放弃自己的主张。然而，所谓宗教改革家"公开而激烈的"反对只不过是路德的一句话，大概是 1539 年说的，后来录入了《漫谈》(*Table Talk*)，加上梅兰希顿 1541 年说的一句话，再加上他后来在教材中对哥白尼理论的批评。他们的反对意见从来没有阻碍或延误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三个版本的印行，也没有影响其内容的推广和宣传。关于开普勒在蒂宾根大学教授那里遇到的麻烦，见本书第 654 页。

(43) Hooykaas, '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 p. 214 介绍了相关的新教观点。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十字架、星座与炼丹炉》('Cross, Constellation and Crucible')(请勿与他的《安德雷》[Andreae]两卷本传记《十字架与炼丹炉》[*Cross and Crucible*]混淆)描绘了德国路德派发挥的积极作用。经过梅兰希顿的教育改革，北方大学推动了植物学和天文学研究，几位权威学者描绘拉米斯宣传梅兰希顿的情况。参见本章注释(14)。又见 Westman, 'The melanchthon Circle'，这篇文章是对维滕堡天文学家复杂立场最新、最透彻的研究。

(44)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p. 400-401 猜想，敌视的态度的确妨碍了雷蒂库斯，他在维滕堡印刷商的帮助下出版了哥白尼论三角的著作后，转向纽伦堡印刷商佩特雷乌斯。他请印行路德著作的印刷商汉斯·卢福特帮助，但只印制了"哥白尼论三角"里的一节《三角形综述》(Wittenberg, 1542)。后来，卢福特印行了梅兰希顿的《物理学初阶》(*Initia Doctrinae Physicae*)。早在 1549 年，佩特雷乌斯就有兴趣印刷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佩特雷乌斯以前印行的图书以及他的名声使他成为雷蒂库斯自然而然的选择。(见 Shipman, 'Johannes Petreius'。)再者，佩特雷乌斯本人和维滕堡的神学家的关系密切，和安德里斯·

奥西安德尔合作编印了《天体运行论》。Elert, *The Structure of Lutheranism*, pp. 420-422 考察了雷蒂库斯离开维滕堡的原因,其结论是:雷蒂库斯的惜别和他对哥白尼的信仰没有关系。

(45) 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给《天体运行论》加上一篇《导读》,赋予哥白尼体系以纯假设的地位,意在保护《天体运行论》。Bruce Wrightsman, 'Andreas Osiander's Contribution to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阐述了奥西安德尔的积极贡献以及他保护哥白尼的意向。《导读》(发表时用笔名)的作者是奥西安德尔(他公开说作者是彼得·亚皮阿努斯),下一代的许多专业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出版商都知道作者就是他。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400;又见 Koyré, *La Révolution Astronomique*, p. 99, n. 13。

(46) Curtis Wilson, 'Newton and Some Philosophers on Kepler's "Laws"', pp. 246, 250-252 介绍的相关的引语。开普勒曾于 1597 年致信梅斯特林谈拉米斯的挑战,但在书中谈这一挑战则是在 1609 年的《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里。在这本书里,开普勒还首次披露,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伪造了哥白尼的观点,在《天体运行论》里附加了一些未经授权的文字。由此公开的主要问题挑起了 1616 年教廷对哥白尼的谴责。

(47) Sarton, *Six Wings*, p. 61.

(48)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406 暗示,把《天体运行论》献给教皇保罗三世,加上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的《假说》序言,使《天体运行论》幸免于立即被列为禁书。红衣主教勋贝格(Cardinal Nicholas Schönberg)希望哥白尼同意他复制其著作,但遭到拒绝;哥白尼的朋友提德曼·吉斯(Tiedemann Giese)主教计划出版哥白尼的著作,这些情况见 Rosen,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p. 393。乔治·桑蒂拉纳说,勋伯格赞助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吉斯协助其出版,见 Santillana, *The Crime of Galileo*, p. 22, n. 14。和萨尔顿的记述一样,桑蒂拉纳过分夸大了天主教实际参与《天体运行论》出版的作用。

(49) Woodfield, *Surreptitious Printing in England*, p. 20.

(50) Drake,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p. 59, n. 1.

(51) Nicolso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p. 34.

(52) *Letters on Sunspots* 是伽利略用印刷品明确支持地动说的首次表示,该书 1613 年在罗马出版,得到林赛学院的支持,他刻意用通俗语写这本书。他知道,用"口语"写这本书不仅能够诉求于潜在的意大利赞助人,而且可以推迟外国对手谢纳(Christopher Scheiner)的快速报复,因为这位德国耶稣会神父不懂意大利通俗语。见伽利略致保罗·瓜尔多(Paopo Gualdo)的信,转引自 Drake,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pp. 84-85。

(53) 引文见开普勒 1619 年 8 月 13 日收到的信件,该信描绘了禁书令对福斯卡里尼的通俗语著作"实际上造成的压制",见 Langford, *Galileo, Science and the Church*, p. 104。

(54) Rabb,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p. 117.

(55) Drake,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p. 171, n. 33 介绍了埃利亚斯·迪奥达蒂在 1636 年在印行伽利略著作中发挥的作用,记述了天主教压制出版这两本书的情况。据 Costabel and Lerner, *Les Nouvelles Pensées*, p. 17 记述,路易·埃尔西韦尔承担了这次斯特拉斯堡印书的费用。

(56) Ben-David,'The Scientific Role,'p. 571.

(57) Caspar,*Kepler*,pp. 52,188,205,258-259.

(58) Rosen,'Calvin's Attitude Toward Copernicus',亦见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1)xxii,382-388 的笔谈。

(59) Hooykass,'Science and Reformation,'pp. 227; 234-235.

(60) Ben-David,'The Scientific Role,'p. 570.

(61) Hooykass,'Science and Reformation,'pp. 234-235 介绍了荷兰两派加尔文教徒的立场:反哥白尼的沃伊特派(Voetians)和亲哥白尼的科齐乌斯派(Cocceians),该书第 239 页注释 104 反对怀特(A. D. White)在这个问题上误导人的记述。

(62)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p. 240. 关于这些趋势的进一步探讨,见 Brockbank,'Sovereign Remedies',又见 Rattansi,'Paracelsus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和'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亦见 Debus,*Science and Education*,最后参见 Webster,*The Great Instauration*,*passim*。

(63) 关于 16 世纪法国外科医师推动的通俗语翻译著作,见本书第六章注释(6)朱伯特父子(Jouberts)的主张。Solomon,*Public Welfare*,pp. 17,175-176 介绍的雷诺德(Augustin Renaudet)的《缺席的在场》('Présence des Absens')以及本书第 246-247 页的描述,就是这一趋势的很好的例子。韦伯斯特和希尔(Hill)也描绘了清教革命者与这一趋势的关系,得到红衣主教黎塞留资助的一位新教宣教者提倡这一趋势,激起法国医务界的敌视。这样的现象为后来法国革命前如何处理梅斯梅尔催眠师和内科医师的斗争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在这场斗争中,让·保罗·马腊(Jean Paul Marat)崭露头角,见 Robert Darnton,*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64) 参见 472 页。1527 年,帕拉切尔苏斯模仿路德焚烧教皇敕令,他焚烧了阿维森纳(Avicenna)的《医典》(*Canon*),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的《编年史》(*Chronica*)(Strasbourg,1531)对此做了记述,见 Pagel,*Paracelsus*,pp. 20-21。

(65) Hooykaas,'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pp. 214-216.

(66) 伽利略《致大公爵夫人的信》,载 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p. 196。在致保罗·瓜尔多(Paolo Gualdo)的信里,伽利略解释他为何用"常识"一语,为何他用通俗语写《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见 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p. 85,关于这封信,见本章注释(52)。

(67) 'The Assayer',in 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p. 237-238.

(68)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p. 239.

(69) Rabb,'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p. 120.

(70) 莱昂纳德·迪吉斯(Digges)印行《永恒的预言》(*Prognostication Everlasting*),借以发布哥白尼学说。1595 年安德鲁·蒙塞尔(Andrew Maunsell)印行'Catalogue of English Printed Bookes'(见本书第 106-107 页根据近代研究路子对"科学"的界定)。书中提到:"莱昂纳德·迪吉斯先生印行了《永恒的预言》……,此后,其子托马斯·迪吉斯刊印了 *A Perfit Description of the Caelistiall Orbes according to the Most Aunciente Doctrine of the Py-*

thagoreans 等著作。1592 年由托马斯·欧文(Thomas Orwin)重印。"托马斯·迪吉斯翻译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一卷 1576 年印行,很著名,见本书第七章注释(146)。

(71) Hooykaas,'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p. 216.

(72) Ibid,p. 216.

(73) Kearney,'Puritanism and Science,'pp. 108.

(74) Merton,*Science*,*Technology*,p. 96.

(75) Feuer,*Scientific Intellectual*,*passim.*

(76) Ore,*Cardano*:*The Gambling Scholar*,pp. 176-177. 卡尔达诺的《伟大的艺术》(*Ars Magna*)1545 年由纽伦堡的 Ptetreius 出版社印行,这家出版社 1543 年刊布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77) 这个著名的类比可能出自多恩(John Donne)的一篇布道辞,见 Hill,'Newton and His Society',p. 46,n. 96。也可能多恩和牛顿都取自于共同的古典主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维吉里乌斯(Petrus Paulus Vergerius)喜欢引述希皮奥(Scipio)和利图斯(Laelius)的习惯:脑子疲倦时,他们在海滩漫无目的地徜徉,拣石子和贝壳,借以驱赶慵懒的惰性;他们说(据阿诺德博士转述),费力气的娱乐和宗旨明确的工作比恢复性的娱乐效果更好。见 Woodward,*Vittorino da Feltre and Other Humanist Educators*,p. 116。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文主义者维吉里乌斯似乎比 17 世纪的清教徒科学家更喜欢工作伦理。牛顿也说:"真理的汪洋大海就在他四周,只不过尚未发现。"这一言论引发了巴洛克镌刻师喜欢的一个主题:圣奥古斯丁的传说;他思考神秘的三位一体时,看见一个小孩,想用贝壳把海水汲光;于是顿悟,人试图理解神的神秘性同样是毫无希望的。这一传说最早的镌刻画表现见 Cesare Ripa,*Iconologia*(Rome,1603),p. 109。又见 Ripa,*Baroque and Rococo Pictorial Imagery*,图谱第三号《神》('The Deity')。

(78) Keuning,*Willem Jansz. Blaeu Willem Jansz. Blaeu*,pp. 22-24 描绘了布劳对地球测量的贡献,指出天文学家让·皮卡尔(Jean Picard)对这些贡献的利用。1672 年,皮卡尔参加远征,在法属圭亚那首府卡宴和巴黎同时测量火星的纬度,更精确地估算了太阳与地球的平均距离。许多学者在牛顿研究中引述了皮卡尔的测量,见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p. 120。许多研究者认为,1684 年看到皮卡尔的测算之后,牛顿才为他自己的《原理》做最后的计算。但卡约利(Florian Cajori)在他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做的附录里(p. 663)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卡约利显示,牛顿已经在此前借用了斯奈尔(Willebrord Snel)相当精确的测量数据;牛顿还借用了诺伍德(Richard Norwood)的数据,诺伍德矫正了瓦雷尼乌斯(Bernhardus Varenius)所著的《牛顿地理学的校勘与图释》(*Geographia Generalis emendata et illustrata ab Isaaco Newton*)(Cambridge,1672)修订版中星际距离中的错误。当然,牛顿在借用斯奈尔和诺伍德最新的可靠数据时,也可能在等待皮卡尔充分证明的结论。Manuel,*Portrait of Isaac Newton*,p. 117 描绘了牛顿对瓦雷尼乌斯《牛顿地理学的校勘与图释》的研究,认为这对他与时俱进的研究有用。瓦雷尼乌斯这本书也成了牛顿天文测量的参考书。

(79) 笛卡尔致印刷商马兰·梅森的信说,听闻伽利略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张时,他决定撤回自己

的手稿《论世界》(*Le Monde*),不再出版;Hine,'Mersenne and Copemicanism',p. 30 对此作了记述。梅森谨慎地对付法国的审查制度,委托荷兰的印务公司出版自己的制作,Martin, *Livre à Paris* 1I,pp. 874-876 对此作了记述。

(80) Adelman,*Marcello Malpighi and the Evolution of Embryology* I,pp. 669-726. Kearney,'Puritanism and Science',p. 109 列举了马尔皮基的贡献,借以证明,意大利的科学活动并没有受到宗教政策和政治政策的影响。Rabb,'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p. 123 也对意大利的学术团体和精英做了类似的解说,他们忽略了出版途径的问题。

(81) Adelman,*Marcello Malpighi and the Evolution of Embryology* I,p. 670. 见该书第 712-715 页介绍的奥尔登伯格(Oldenburg)邮寄给马尔皮基(Malpighi)的最新论著,全都是拉丁文的材料,以便于他阅读。

(82) Adelman,*Marcello Malpighi and the Evolution of Embryology* I,p. 347. 马尔皮基并非向英国求助的唯一的意大利学者。1661 年,维森佐·维维亚尼(Vicenzo Viviani)致信未来的皇家学会会长索斯韦尔(Robert Southwell),请求协助出版自己的著作;该信的口吻像"销售经理向他喜欢的推销员说话的口吻",见 Middleton,*The Experimenters*,p. 282。

(83) 奥尔登伯格高度评价出版的好处,重视改进科学传播体系的需要,许多皇家学会的相关人士赞同他的看法。见 Shapiro,*John Wilkins*,pp. 32; 223。

(84) 见 Adelman,*Marcello Malpighi and the Evolution of Embryology* I,p. 674(1669 年 3 月 25 日书简)。

(85) Ben-David,'The Scientific Role,'p. 571.

(86) Ornstein,*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pp. 76,78-79;Middleton, *The Experimenters*, *passim.*

(87) 理查德·沃勒(Richard Waller)把《例证》译成英语,1684 年,该书由皇家学会刊布。奥尔登伯格 1665 年至 1666 年的书简表露出来急不可耐的情绪,他盼望意大利人早日收到这个英译本,见 Middleton,*The Experimenters*,p. 289。

(88) 皇家学会出版丛书的计划几乎中断。1687 年到 1691 年间,理查德·沃勒接任会长之前,这个出版计划曾经中断。此前的 1665 年 和 1669 年,由于瘟疫、伦敦大火以及奥尔登伯格被囚禁在伦敦塔(罪名是用法语和法国学者通信),这个出版计划也遭遇过重重困难。见 Stimson,*Scientists and Amateurs*,*A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pp. 107-108 页; Espinasse,'Decline and Fall of Restoration Science,'pp. 347-369。

(89) 关于《例证》(*Saggi*)的第一版,见 Ornstein,*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pp. 88-90;关于奥尔登伯格如何对付"剽窃"的问题,见 p. 130。关于皇家学会《通讯》的角色的社会学分析,见 Merton and Zuckerman,'Patterns of Evaluation'。

(90) Westman,book review,*Renaissance Quarterly*(1974),p. 223.

(91) Fisch,'The Academy of the Investigators'I,528。又见其对"研究者学会"另一位成员瓦雷塔(Joseph Valetta)再三推迟发表著作的介绍,pp. 544-545。Whitmore,*The Order of Minims* 追溯了一个类似的模式,马兰·梅森的法国修会在发表成果方面也犹豫不决。见本章注释(128)。

(92) Schmitt,'A Garin Compendium,'p. 420.

(93) Schmitt and Webster,'Harvey and M. A. Severino.'

(94) 这两位弟子是托比亚斯·阿达米(Tobias Adami)和威廉·文斯(Wilhelm Wense),他们都是约翰·瓦伦丁·安德雷(Johann Valentin Andreae)的朋友,安德雷还在法兰克福印行了坎帕内拉的 *City of the Sun*。见 Yates,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pp. 137-138。关于这家和玫瑰十字会有关系的法兰克福出版商,见 Evans, *The Wechel Presses*, pp. 281-282。关于坎帕内拉的《阳光城》,又见 Grant McColley, *The Defense of Galileo of Thomas Campanella* 以及他的文章'The Debt of Bishop John Wilkins'。关于玻义耳支持哈特立伯出版《阳光城》英译本和安德雷出版《基督城》(*Christianopolis*)的情况,见 Rattansi,'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p. 20。

(95) Ornstein, *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p. 132.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pp. 249-262 大段引用了斯塔布(Stubbe)的《审查报告》('Censure')。詹姆斯·雅各布认为,斯塔布实际上是以反讽的口吻抨击英国国教,而不是捍卫英国国教,见他即将发表的文章'Clandestine Culture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96) 下院记事录第 15 条"解释为何没有更新《特许法案》(Licebsing Act)(1695)",见 Richard T. Vann, ed. *Century of Genius*, p. 7,转引自 *Lords' Journals* xv,545。

(97) Sprat,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part 3, section 23, p. 371.

(98) 博卡利尼(Traiano Boccalini)的《文坛报道》(*Ragguali di Parnaso*)(Venice,1612-1613)里有一段文字呼吁"世界普遍改革";据 Yates, *Bruno*, pp. 408-11 所示,其英译本名为 *Advertisements from Parnassus*(London,1669),译者是亨利·蒙毛斯(Henry Monmouth)伯爵;又据耶茨所示,该书的德语译本和玫瑰十字会的第一篇宣言合订为一册印行(Cassel,1614)。又见 Yates,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chap. 10。皇家学会内部还特别注意摆脱秘术信仰和赫耳墨斯秘义书。关于人们对詹姆斯一世《鬼魔学》(*Demonologie*)的初期反应,见 Rattansi,'Alchemy and Natural Magic'。亦见本章注释(101)。

(99) 关于清教徒对英国大学的攻击,见本章注释(62)。

(100) 据 Yates, *The Rosicrucia Enlightenment*, p. 111 记述,"梅森—福卢德争鸣引起全欧洲的注意"。争鸣的导火索是梅森 1623 年的《创世问答》(*Questione in Genesim*)。关于"去神话化"过程中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和玫瑰十字会狂怒的关系,见 Yates, *Giornado Bruno*, p. 435 ff。

(101) Prior,'Joseph Glanvill, Witchcraft and 17th Century Science'指出,英国科学(通过霍布斯)摆脱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努力反而产生了相反的后果:有人声称,巫术信仰有科学根据。

(102) *The Spectator* 262(31 Dec.,1711),转引自 Espinasse,'Decline and Fall', p. 353。

(103) Prat,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part 3, section 1, p. 327.

(104) Garin, *Science and Civic Life*, pp. 85-86.

(105) John Tedeschi,'Florentine Documents,'pp. 579-605.

(106) Grendler,'The Roman Inquisition,'pp. 48-66.(这篇文章后来增写为同名专著,所论细节就更加清楚了。)

(107) 比如，Langford，*Galileo*，*Science*，pp. 98-104。本杰明·纳尔逊对相关的神学和哲学立场做了很好的总结，见 Nelson，'The Early Modem Revolution'，pp. 1-40(尤其参考书目和附录)。他很好地转述了红衣主教贝拉明的传记作者布罗德里克(Brodrick)反复推敲的意见，在这个方面，本杰明·纳尔逊比其他权威学者略胜一筹。

(108) Langford，*Galileo*，*Science*，p. 103，n. 50.

(109) Ibid，pp. 150-151.

(110) Ibid，pp. 98-99.

(111) Koyré，*La Révolution Astronomique*，p. 506.

(112) Middleton，*The Experimenters*，p. 72.

(113) Thomas B. Settle，'Borelli，Giovanni Alfonso，1608—1679，'*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II，306-314.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改宗天主教以后，博雷利得到她的赞助出书，但他还是沦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成为政治嫌疑人，在罗马教初等数学。塞特尔描绘的 17 世纪意大利科学所受的挫折(p. 305)应该和其他权威学者的论述进行比较，其他学者谈到反哥白尼的敕令产生的冲击时，持比较温和的批判态度。.

(114) Rose，*Accademia Venetiana*. 他在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里专辟一章讲述贝纳迪诺·波尔迪(Baldi，卒于 1617 年)，波尔迪准备仿效维萨里给史学家立传，他搜集了二百多位数学家的"生平"，但未能将《数学家列传》(*Vite de'Matematici*)刊布于世。

(115) 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pp. 218-220.

(116) Langford，*Galileo*，*Science*，pp. 58-59；Koestler，*The Sleepwalkers*，p. 458.

(117) 《天体运行论》的第三版题名《新天文学》(*Astronomiae Instauratae*)，编者是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尼古拉·穆勒(Nicolas Müller)。据权威学者介绍，穆勒本人并不信奉哥白尼学说，但他作的校订使第三版胜过以前的版本。.

(118) Ornstein，*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p. 76.

(119) Drake，*Discoveries and Opinions*，pp. 219-220.

(120) 英国人利用伽利略上了《禁书目录》的宣传价值，其中的主要代表是托马斯·索尔兹伯里(Thomas Salusbury)。他仿照博德莱图书馆馆长托马斯·詹姆斯利用《圣经》里被删节文字的先例；1660 年的王政复辟时期过后不久，索尔兹伯里就着手翻译了 1616 年 和 1619 年《禁书目录》里的论著以及被删节的段落，并按照读者预订的情况印行。见 Stimson，*Gradual Acceptance*，p. 90。据 Nicolson，'English Almanacs and the "New Astronomy"'，pp. 22-23 记述，为索尔兹伯里的译著打广告宣传的是年鉴出版商文森特·温。索尔兹伯里把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著作翻译成英语出版，文森特·温本人的著作则由牛顿评注。

(121) de Santillana，*The Crime of Galileo*，p. 325.

(122) Gillispie，*The Edge of Objectivity*，p. 52.

(123) Koestler，*The Sleepwalkers*，p. 494. 伽利略与诺耶尔(François de Noailles)就《谈话》进行的协商相当复杂，经过伪装的手稿送交埃尔西韦尔出版，见 Costabel and Lerner eds.，*Les Nouvelles Pensées*，pp. 18-20 的记述。

(124) de Santillana，*The Crime of Galileo*，p. 326.

(125) Manuel, *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 pp. 267, 365.

(126) 见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chap. 9 非常中肯的评价。我认为，该书第 220-224 页讲述的社会互动和交流应该予以补充，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印刷术的影响。

(127) Gillispie, *The Edge of Objectivity*, p. 112.

(128) 据 Anne Sauvy, *Livres saisis à Paris* 记述，1678 年到 1701 年是旧王朝时代出版审查最严厉的时期。马丹《巴黎的图书》第二卷第四章也含有相关的数据。Roger Hahn, *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的第一章描绘了 1699 年之前妨碍出版的匿名制政策和其他困难。1698 年，英国动物学家李斯特(Martin Lister)到巴黎一所修道院去造访查理·普鲁米耶尔(Charles Plumier)，这一次造访和 17 世纪早些时候英国精英到那不勒斯去造访研究者的塞维利诺等人一样，是令人失望的。普鲁米耶尔修士和马兰·梅森同属一个修会，他自己论美洲航海的手稿都难以找到出版商，去世时留下成堆的未刊稿。Whitmore, *The Order of Minims*, pp. 186-197 对此作了记述。据该书记述，法兰西科学院出书遭遇到困难，战争期间它还收不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通讯》；由于拒不吸收普鲁米耶尔等修士入会，法兰西学院遭到了沉重的打击(pp. 109, 189-190)。

(129) Gillispie, *The Edge of Objectivity*, pp. 114-115.

(130) 比如，他致信潜在的赞助者美第奇家族，抱怨他承担教书的苦差事；他说："我想将自己的书永远献给大人，想让它们成为我收入的来源。"语出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载 Drake,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p. 62。

(131) 见 Debus, *Science and Education*; Webste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又见 Rattansi, 'Paracelsus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 (p. 28);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1-33)。

(132) Westfall, 'Newton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assim* 介绍了牛顿力学思想中非机械主义的成分。E. A. Burt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和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对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两种观念做了介绍："远距离操作"和"绝对空间"。

(133) Gillispie, *The Edge of Objectivity*, p. 114.

(134) 在《皇家学会史》里，斯普拉特表达了精英学者的渴望，他希望皇家学会能成为"世界的大库房和自由港"，见 Sprat,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part 2, p. 64。

结束语

(1) Kearney, Introduction, *Origin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xi.

(2)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p. 1.

(3) Kearney, 'Puritanism, Capitalism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81.

(4) 'Toward a New Histor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5) Derek Price, 'The Book as a Scientific Instrument,' pp. 102-104.

(6) 语出博斯托克(R. Bostocke)1585 年伦敦版的一本小册子，转引自 Allen Debus, *The English Paracelsians*, p. 59。博斯托克的话指的似乎是伊拉斯谟·莱茵霍尔德为刊布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而编制的《普鲁士星表》，但他却不接受哥白尼的地心说，大概他认为地心说仅仅

是一种假说。

(7) 语出沃尔顿(Brian Walton)为 1657 年合参本《圣经》撰写的内容提要,转引自 Hendricks, 'Profitless Printing'。

(8) Sprat, *Royal Society*, part 3, section 23, p. 371. 引用这段文字的有本书第八章提到的 S. F. Mason, D. S. Kemsley, R. Hooykass 等人的著作。

(9) 由于现代出版的一些豪华本,这种健忘的情况常常被强化,比如卡拉吉特(Clagett)论中世纪阿基米德手抄本的豪华本《阿基米德》,克拉吉特用心剔除了"错误和荒唐的解读",重建了图表,纠正了其中含糊和错误的地方,把混乱的罗马数字和逻辑表达整理成始终使用阿拉伯数字等(pp. xv, 36-37)。总之,他清除了印刷术出现之前主要的技术性著作里的混乱。关于翻译自同一阿拉伯语词汇"零"的两个词"cipher"和"zero",参见 Dantzig, *Number*, p. 32。

(10) 语出 Thomas Elyot, *Boke called Gouernour*, 转引自 Watson, *The Beginning of the Teaching*, p. 136。

(11)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 43.

(12) John Locke, *An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 book IV, chap. xviii.

(13) 见本书第五章注释(133)里萨瑟恩(Southern)对沙特尔的福尔拜(Fulbert)的记述。

(14) 见本书第五章注释(46)里提及的约瑟夫勋爵的论述。又见本书第 478 页之后博尔丁对"错乱手稿"的讨论。

(15) 梅兰希顿(Melanchthon)的讲演辞见 Hillerbrand(ed.), *The Reformation*, pp. 59-60。

(16) 配第(Petty)语,转引自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p. 91。

(17) Arthur Wilson, *Diderot*, p. 143.

(18) Archer Taylor, 'The Influence of Printing,' p. 13.

(19) Somervell, *English Thought*, p. 8.

文 献

本书第一章已对相关文献作了概述，各章节也有一定的篇幅做历史记述。有鉴于此，再撰文论述文献就显冗赘。传统的详尽文献也排除在外，因为百余页的参考文献不能有效地利用宝贵的篇幅。索引能够帮助读者检索注释里征引的书名，也能够展示全书研究的广度。有些重要的著作注释里没有提及，只列入这里的文献。意欲追踪最新著作的读者请注意，本书文献截止到 1976 年。第一章注释(2)提到的期刊里载有最新的研究成果，读者可自己查阅。

Adams, Henry.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An Auto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1918). **x.**

Adamson, J. W. *The Illiterate Anglo Saxon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1956).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The Extent of Literacy in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Notes and Conjectures,' *The Library*, 4th ser. x (1929) 163–93. **62.**

Adelmann, Howard B. Introduction to *The Embryological Treatises of Hieronymus Fabricius of Aquapendente* (Ithaca, New York, 1942). **476, 562, 573–4.**

Marcello Malpighi and the Evolution of Embryology (5 vol. Ithaca, New York, 1967). **664–5.**

Adhémar, J. 'L'Estampe et la Transmission des Formes Maniéristes,' *Le Triomphe du Maniérisme Européen* (Amsterdam, 1955). **82.**

Africa, Thomas. 'Copernicus' Relation to Aristarchus and Pythagorus,' *Isis* 52 (1961) 403–9. **577.**

Aidan, Francis (Cardinal Gasquet). 'Roger Bacon and the Latin Vulgate,' *Roger Bacon Essays*, ed. A. G. Little (Oxford, 1914) 89–99. **339.**

Aiton, E. J. 'Essay Review,' *History of Science* 11 (1973) 217–30. **638.**

'Essay Review,'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 (1970–71) 265–73. **565.**

Allen, P. S. *The Age of Erasmus* (Oxford, 1914). **19, 175.**

Erasmus: Lectures and Wayfaring Sketches (London, 1934). **81.**

'Erasmus' Relations with his Printers,'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XIII (Oct. 1913–March 1915) 297–323. **401.**

Allen, Ward, tr. and ed. *Translating for King James: Notes Made by a Translator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9). **360.**

Allison, A. F. and Rogers, D. M. *A Catalogue of Catholic Books in English Printed Abroad or Secretly in England, 1558–1640* (London, 1964). **354.**

Altick, R.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hicago, 1963). **65, 130–1, 134, 149, 153, 361, 364, 422.**

Ames, Joseph. *See* Thomas F. Dibdin.

Arber, Agnes. 'From Medieval Herbalism to the Birth of Modern Botany,' *Science, Medicine, and History. Essays . . . In Honor of Charles Singer*, ed. E. A. Underwood (2 vol. Oxford, 1953) I, 317–36. **266, 487.**

Archer, Peter, S.J. *The Christian Calendar and the Gregorian Reform* (New York, 1941). **610.**

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 R. Baldick (New York, 1962). **431–2.**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1973). **431.**

Armstrong, Elizabeth. *Robert Estienne, Royal Printer* (Cambridge, 1954). **75, 87, 387, 399, 401, 411, 442, 447.**

Arnold, Klaus, ed. and introduction to Johannes Trithemius, *In Praise of Scribes – De Laude Scriptorum*, tr. R. Behrendt (Lawrence, Kansas, 1974). **14–15, 94–5, 97, 200.** *See also* Johannes Trithemius.

Artz, Frederick.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France, 1500–1850* (Cambridge, Mass., 1966). **351.**

Askew, Pamela. 'A Melancholy Astronomer by Giovanni Serodine,' *The Art Bulletin* XLVII (March 1965) 121–8. **577.**

Aston, Margaret.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rospect of Europe* (London, 1968). **310.**

'The Fiery Trigon Conjunction: An Elizabethan Astrological Prediction,' *Isis* 61 (1970) 159–87. **619.**

'John Wycliffe's Reformation Reputation,' *Past and Present* 30 (April 1965) 23–52. **304, 345.**

'Lollardy and the Reformation: Survival or Revival?' *History* XLIX (1964) 149–70. **304.**

Review article, *Shakespeare Studies* IV (1968) 388. **415.**

Atkinson, Geoffroy. *Les Nouveaux Horizons de la Renaissance Française* (Paris, 1935). **303.**

Auerbach, Erich. *Literary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tr. R. Manheim (New York, 1965). **334.**

'The Author and his Ghost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22, 1972) 1121. **122.**

Axtell, J. L. 'Locke's Review of the *Principia*,'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XX (1965) 152–61. **638.**

Bachman, A. *Censorship in France from 1715 to 1750* (New York, 1934). **145.**

Bacon, Francis. *Francis Bacon. A Selection of His Works*, ed. S. Warhaft (College Classics in English, ed. H. Northrop Frye) (Toronto, 1965). **455.**

Bagrow, Leo. *History of Cartography*, rev. and ed. R. A. Skelton (Cambridge, Mass., 1964). **53, 469, 512, 514.**

Bailey, John E. 'Dee and Trithemius' Steganography,' *Notes and Queries* (May 24, 1879), 5th ser. XI, 401–2, 422–3. **96, 137.**

Bainton, Roland.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New York, 1950). **307.**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form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VI (Oct. 1960) 74–84. **378.**

'Man, God and Church,' *The Renaissance: Six Essays* (New York, 1962) 77–96. **238.**

Review,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 (June 1971) 309–10. **445.**

Baker, Herschel. *The Wars of Truth* (Cambridge, Mass., 1952). **321.**

Baldwin, T. W. *William Shakespere's Small Latine & Lesse Greeke* (2 vol. Urbana, Ill., 1944). **350.**

Barber, Elinor. *The Bourgeoisi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1955). **539.**

Barnes, Annie. *Jean Le Clerc e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Paris, 1938). **137, 321, 332, 420, 647.**

Barnett, S. W. 'Silent Evangelism: Presbyterians and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1807–1860,'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49 (Winter 1971) 287–302. **317.**

Baron, Hans.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rev. edn, 1 vol.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6). **185.**

'The *Querelle*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as a Problem for Renaissance Scholarship,'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 (Jan. 1959) 3–22. **123, 185.**

'Toward a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V (Jan. 1943) 21–49. **251, 521, 526.**

Baroni, Victor. *La Contre Réforme devant la Bible* (Thèse de Doctorat) (Lausanne, 1943). **349.**

Baroque and Rococo Pictorial Imagery: The 1758–1760 Hertel edition of Ripa's Iconologia, ed. E. A. Moser (New York, 1971). **662.**

Basalla, George, ed. and introduction.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External or Internal Factors?* (Lexington, Mass., 1968). **459.**

Bataillon, Marcel. *Erasme et L'Espagne.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Spirituelle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37) chap. xi.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Etudes sur le Portugal au Temps de l'Humanisme (Coimbra, 1952).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Philippe Galle et Arias Montano,'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II (1942) 132–60. **20.**

Bate, W. Jackson. *The Burden of the Past and the English Poet* (Cambridge, Mass., 1970). **192.**

'Battle of the Sens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 1963) 156. **40.**

Baumann, F. E. 'Mutianus Rufus and Natural Religion: A Test Case,'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IX (1976) 567–98. **273.**

Baxandall, Michael. *Giotto and the Orators: Humanist Observers of Painting in Italy and the Discovery of Pictorial Composition 1350–1450* (Oxford, 1971). **232, 293, 604.**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15th Century Italy (Oxford, 1972). **293.**

Beardsley, Theodore S. 'The Classics and Their Spanish Translator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VIII (Toronto, 1971) 2–9. **360, 408.**

Beaujouan, Guy. 'Motiv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cience in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Scientific Chang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A. C. Crombie (New York, 1963) 219–36. **382, 537.**

Beazley, C. R. *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3 vol. Oxford, 1906). **516.**

Bebb, P. N. 'The Lawyers, Dr. Christoph Scheurl and the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Festschrift for Harold Grimm) ed. L. P. Buck and J. W. Zophy (Columbus, Ohio, 1972) 52–73. **308, 404.**

Bec, Christian. *Les Marchands Ecrivains; Affaires et Humanisme à Florence 1375–1434* (Paris, 1967). **62.**

Bedini, S. A. 'The Instruments of Galileo,' *Galileo, Man of Science*, ed. Ernan McMullin (New York, 1967) 256–92. **525.**

Bedini, S. A. and Maddison, F. R. 'Mechanical Univers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6 (Oct. 1966) 3–67. **589.**

Ben-David, Joseph. 'The Scientific Role; The Conditions of Its Establishment in Europe' (1st pub. in *Minerva* IV (1965) 15–20), *Western Civilization: Recent Interpretations*, ed. C. D. Hamilton (2 vol. Chicago, 1973) 556–78. **654–5, 666.**

Benesch, Otto.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in Northern Europe* (rev. edn, London, 1965). **589.**

Benjamin, F. S. and Toomer, C. J. *Campanus of Novara and Medieval Planetary Theory* (Madison, Wis., 1971). **465, 512, 536.**

Bennett, H. S.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1475–1557* (Cambridge, 1952). **62, 104–5, 127, 130, 139, 358, 361.**

English Books and Readers 1558–1603 (Cambridge, 1965). **358.**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Vernacular Manuscript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Library*, 5th ser. I (1947) 167–78. **11.**

Benton, John, ed. and introduction. *S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The Memoir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1064?–c. 1125)* (New York, 1970). **236.**

Benzing, Josef. *Buchdrucker-Lexicon des 16 Jahrhunderts* (Deutsches Sprachgebiet) (Frankfurt, 1952). **99, 206, 307, 371, 617.**

Berelson, Bernard and Janowitz, Morris. *Reader in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l., 1953). **8.**

Bergendorff, C. *See* Luther. *Luther's Works.*

Berger, Samuel. *Histoire de la Vulgate pendant les premiers siècles du Moyen Age* (Paris, 1893). **328.**

Berkvens-Stevelinck, Christiane. 'Prosper Marchand, Auteur et Editeur,' *Quaerendo* V (1975) 218–34. **143.**

Berry, B. M. 'The First English Pediatricians and Tudor Attitudes toward Childhoo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V (1974) 561–77. **431.**

Berry, Lloyd, introduction. *The Geneva Bible: A Facsimile of the 1560 Edition* (Madison, Wis., 1969). **305, 360, 364, 415.**

Berry, W. T. and Poole, H. W. *Annals of Printing: A Chronological Encyclopaed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950* (London, 1966). **4.**

Besson, Jacques. *A Theatre of Machines* (1579) ed. Alexander G. Keller (New York, 1965). **240, 262, 557.**

Besterman, Theodore. *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Oxford, 1936). **94, 98.**

Bevan, E. R. and Singer, Charles, eds. *The Legacy of Israel* (Oxford, 1927). Includes articles by Box, G. H.; Singer, Charles.

Bietenholz, P. G. *Basle and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Basle Humanists and Printers in their contacts with Francophone Cult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1). **187, 399, 405, 407, 419, 441–2, 446, 540.**

Billanovich, R. 'Petrarch and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Liv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IV (1951) 137–208.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Binz, Louis. *Vie Religieuse et Réforme Ecclésiastique dans le diocèse de Genève pendant le Grand Schisme et la Crise Conciliaire (1378–1450)* (2 vol. Geneva, 1973). **314.**

Birn, Raymond. '*Livre et Société* After Ten Years: 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LI–CLV (1976) 287–312. **29, 146.**

'Le Journal des Savants sous L'Ancien Régime,' *Journal des Savants* (1965) 15–35. **120, 643.**

'Pierre Rousseau and the Philosophes of Bouillon,'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XXIX, ed. T. Besterman (Geneva, 1964). **145.**

Bissels, Paul. *Humanismus und Buchdruck: Vorreden Humanistischer Drucke in Köln* (Nieuwkoop, 1965). **206.**

Black, M. H. 'The Printed Bibl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408–75. **11, 80–1, 106, 206, 304, 328–9, 349, 367, 377, 411.**

'The Typography of Luther's Bible and its Influence,' *Gutenberg-Jahrbuch* (1969) 110–13. **206.**

Review of Steinberg's *Five Hundred Years*, *The Library*, 5th ser. XIV (1959) 300–2. **80, 206.**

Blades, William. *The Life and Typography of William Caxton ... with Evidence of His Connection with Colard Mansion, The Printer at Bruges* (2 vol. London, 1861). **38.**

Blaeu, W. J. *The Light of Navigation*: Facsimile of 1612 Edition, ed. and introduction by R. A. Skelton (London, 1964). **480–1.**

Blagden, C. *The Stationers Company, A History 1403–1959* (London, 1960). **120.**

Blake, N. F. *Caxton and His World* (London, 1969). **38, 375, 383.**

Caxton: England's First Publisher (London, 1975). **112.**

Bland, David. *A History of Book Illustration* (2nd edn, Berkeley, 1969). **85–6.**

Blau, J. *The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Cabala in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1944). **278.**

Blench, J. W. *Preaching in England in the lat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 Study of English Sermons 1450–c. 1600* (Oxford, 1964). **426.**

Bloch, Eileen. 'Erasmus and the Froben Press: the Making of an Editor,' *Library Quarterly* XXXV (April 1965) 109–20.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Bloch, Marc. *The Historian's Craft*, tr. P. Putnam (New York, 1964). **xv.**

Bluhm, Heinz. *Martin Luther, Creative Translator* (St Louis, Mo., 1965). **341, 368.**

'The Sources of Luther's September Testament: Galatians,' *Luther for an Ecumenical Age: Essays*, ed. Carl S. Meyer (St Louis, Mo., 1967) 144–71. **356.**

Blumenthal, Joseph. Introduction. *Art of the Printed Book 1455–1955* (New York, 1973). **48.**

Blunt, Anthony. *Artistic Theory in Italy 1450–1600* (1st edn 1940, Oxford, 1966). **232, 254, 325.**

Boas, George, ed. and tr. *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Bollingen Series, XXIII) (New York, 1950). **279, 288.**

Boas, Marie.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New York, 1962). **220, 265, 468–9, 494, 499, 502, 509, 530, 567, 569, 574, 585, 614, 620, 625.**

Boase, T. R. 'Vasari: the Man and the Book.' (Mellon lectures given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Washington, D.C.) **233.**

Bober, Harry. Review of *The Göttingen Model Book*, ed. H. Lehmann-Haupt, *Speculum* XLIX (April 1974) 354–8. **54, 65, 82.**

'Boccaccio's Dant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v. 4, 1965) 969. **319.**

Bohnstedt, J. W. *The Infidel Scourge of Go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1968). **303.**

Bolgar, R. 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and Its Beneficiaries: From the Carolingian Age to the End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1964). **181, 212, 217, 222, 224, 244, 272.**

ed.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European Culture A.D. 500–1500* (Cambridge, 1971). Includes article by Gerlo, A.

ed.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European Culture A.D. 1500–1700* (Cambridge, 1976). Includes article by Oestreich, G.

Bollème, Geneviève. *Les Almanachs populair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ecles* (Paris, 1969). **386.**

Bonelli Righini, M. L. and Shea, W. R., eds.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1975). **641.** Includes articles by Debus, A.; Hall, A. R.; Rossi, P.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1559) ed. John Booty (Charlottesville, Va., 1976). **365.**

Borchardt, F. 'Etymology in Tradition and in the Northern 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X (July–Sept. 1968) 415–29. **277.**

Bosanquet, E. F. *English Printed Almanacks and Prognostications, A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to the Year 1600* (London, 1917). **386, 608, 618–19.**

'English Seventeenth-Century Almanacks,' *The Library*, 4th ser. X (1930) 361–97. **386.**

Bossy, Joh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the People of Catholic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47 (May 1970) 51–70. **426.**

Botein, Stephen. 'Meer Mechanics and an Open Pres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IX (1975) 127–225. **381.**

Botfield, Beriah, ed. *Praefationes et Epistolae Editionibus Principus Auctorum Veterum* (Cambridge, 1861). **20, 320, 392.**

Boüard, Michel de. 'Encyclopédies Médiévales, Sur la "Connaissance de la Nature et du Monde" au Moyen Age,'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58 (1930) 258–305. **513.**

Boulding, Kenneth. *The Image* (Ann Arbor, Mich., 1961). **81, 479.**

Boumans, Rene. 'The Religious Views of Abraham Orteliu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VII (July–Dec. 1954) 374–7. **448.**

Bouwsma, William. *Concordia Mundi: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Guillaume Postel (1510–1581)* (Cambridge, Mass., 1957). **340, 343, 448.**

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 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Berkeley, 1968). **353, 413.**

'Venice, Spain and the Papacy: Paolo Sarpi and the Renaissance Tradition,' *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 1525–1630*, ed. Eric Cochrane (New York, 1970) 353–77. **412–13.**

Bouyer, Louis. 'Erasmus in Relation to the Medieval Biblical Tradition,'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492–505. **338.**

Box, G. H. 'Hebrew Studies in the Reformation Period and After,' *The Legacy of Israel*, ed. E. R. Bevan and Charles Singer (Oxford, 1927) 315–75. **224, 367, 447.**

Boxer, C. R., *et al. Exotic Print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1492–1840*, catalogue of Exhibition,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317.**

Boyd, Julian. 'These Precious Monuments of... Our Histo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XXII, 2 (1959) 175–6. **116.**

Boyer, Carl.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1968). **620.**

'Galileo'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Galileo, Man of Science*, ed. Ernan McMullin (New York, 1967) 232–55. **525.**

Brann, Noel. 'The Shift from Mystical to Magical Theology in the Abbot Trithemius.' Paper given May 5, 1976, 11th Conference on Medieval Studies (Kalamazoo, Mich.). **95.**

Branner, Robert. 'Manuscript Makers in Mid-thirteenth Century Paris,' *The Art Bulletin* XLVIII (March 1966) 65–7. **11, 13, 46.**

'The Soissons Bible Paintshop in Thirteenth-Century Paris,' *Speculum* XLIV (Jan. 1969) 13–34. **11, 13, 46, 328.**

Braudel, Fernand.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 M. Kochon (1st Fr. edn 1967, New York, 1974). **27.**

Bredvold, L. I.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John Dryden* (Ann Arbor, 1956). **323, 326.**

Bréhier, Émile. 'The Formation of our History of Philosophy,' *Philosophy and History: The Ernst Cassirer Festschrift*, ed. R. Klibansky and H. J. Paton (rev. edn, New York, 1963) 159–73. **333.**

Bremme, H. J. *Buchdrucker und Buchhandler zur Zeit der Glaubenskämpfe: Studien zur Genfer Druckgeschichte, 1565–1580* (Geneva, 1969). **411.**

Bridenbaugh, Carl. 'The Great Mut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VIII (Jan. 1963) 315–31. **ix, 364.**

Briel, J. G. C. A. *See* Kingdon, R. M.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38). **136.**

Brockbank, William. 'Sovereign Remedies: A Critical Deprecia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Pharmacopoeia,' *Medical History* VIII (1964) 1–13. **539, 656.**

Bronowski, Jacob and Mazlish, Bruce.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From Leonardo to Hegel* (New York, 1960). **649.**

Bronson, Bernard. 'The Writer,' *Man Versus Socie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ed. J. L. Clifford (Cambridge, 1968) 102–32. **322.**

Brown, Harcourt.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17th Century France 1620–1680* (New York, 1934). **643.**

Brown, Irene Q. 'Philippe Ariès 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Fall 1967) 357–68. **395.**

Brown, Lloyd. *The Story of Maps* (Boston, 1959). **110, 479, 482, 517.**

Browne, Sir Thomas. *The Prose of Sir Thomas Browne*, ed. Norman Endicott (New York, 1967). **18, 471, 483.**

Brun, Robert. *Le Livre Français Illustré de la Renaissance* (Paris, 1969). **544.**

Buck, L. P. and Zophy, J. W., eds.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Festschrift for Harold Grimm) (Columbus, Ohio, 1972). Includes articles by Bebb, P. N.; Cole, R.; Dannenfeldt, Karl.

Bühler, Curt. *The Fifteenth Century Book, the Scribes, the Printers, the Decorators* (Philadelphia, 1960). **6, 14, 19, 49–51, 72, 83, 139, 206, 250, 586.**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Address and a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Grolier Club (April–June 1952) (New York, 1952). **167–8.**

The University and the Press in 15th Century Bologna, Texts 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ducation, vol. VII (South Bend, Indiana, 1958). **56.**

Review article. *The Library*, 5th ser. VIII (1953) 53–6. **38.**

'Roman Type and Roman Print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ibliotheca Docet: Festgabe für Carl Wehmer*, ed. S. Joost (Amsterdam, 1963) 101–10. **204–5.**
'A Typographical Error in the Editio Princeps of Euclid,' *Gutenberg-Jahrbuch* (1966) 102–4. **588.**
Burckha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 S. G. C. Middlemore, ed. B. Nelson and C. Trinkaus (2 vol. New York, 1958). **45, 48, 221, 226, 228, 237–8, 243, 300, 488–91, 494.**
Burke, Peter. *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 (London, 1972). **45, 88.**
Introduction, *A New Kind of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from the Writings of Lucien Febvre* (New York, 1973). **41.**
The Renaissanc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History*, ed. H. F. Kearney) (London, 1964). **177.**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Documents of Modern History*, ed. A. G. Dickens and A. Davies) (New York, 1970). **257, 300.**
'Fanfare for Princ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0, 1976). **133.**
Burns, Howard. 'Quattrocento Architecture and the Antique,'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European Culture A.D. 500–1500*, ed. R. R. Bolgar (Cambridge, 1971) 269–89. **83.**
Burns, R. E. Book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V (Oct. 1968) 181. **290.**
Burrow, John. 'The Medieval Compendiu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y 21, 1976) 615. **122.**
Burtt, E. A.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1st edn 1932, rev. edn, New York, 1955). **592, 681.**
Butler, Pierce. *Th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Chicago, 1940). **6, 17, 89, 95–6, 113, 119, 163, 375.**
Butterfield, Herbert.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 (rev. edn, New York, 1951). **496, 503, 637, 646, 663, 685.**
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 (New York, 1960). **291.**
Butterworth, C. *The English Primers (1529–1545)* (Philadelphia, 1953). **350.**

Cajori, Florian.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1919). **583.**
See also Newton, Isaac.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3 vol. Cambridge, 1963–70).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Includes articles by Black, M. H.; Bouyer, Louis; Crehan, F. J.; Fenn, Eric; Foster, Kenelm; Greenslade, S. L.: Hall, Basil; Jones, D. R.; Lockwood, W. B.; Loewe, R.; Milburn, R. L. P.; Richardson, A.; Robson, C. A.; Sayce, R. A.; Sutcliffe, E. F.; Sykes, 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New (14 vol. Cambridge, 1957–79). Vol. I.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ed. G. R. Potter (Cambridge, 1957). Vol. II. *The Reformation, 1520–59*, ed. G. R. Elton (Cambridge, 1958). Includes articles by Hall, A. R.; Hay, Denys; Weiss, R.
Cameron, Kenneth W. Book review.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IV (Winter 1971) 555. **376.**
Cameron, Richard. 'The Attack on the Biblical Work of Lefevre d'Etaples (1514 1521),' *Church History* XXXVIII (1969) 9–24. **331.**
Campbell, Anna M. *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 Learning* (New York, 1966). **295.**

Cardano, G. *The Great Art*, tr. and ed. T. R. Witmer (Cambridge, Mass., 1968). **548, 552.**

Carter, Charles Howard, e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Garrett Mattingly* (New York, 1965). Includes articles by Hale, J. R.; Hay, Denys; Hill, Christopher; Kristeller, P. O.; Smolar, F. J.; Strauss, G.

Carter, Harry. *A View of Early Typography up to about 1600* (Oxford, 1969). **55, 203, 205–7.**

Carter, Harry and Vervliet, H. D. L. *Civilité Types* (Oxford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New Ser. XIV) (Oxford, 1966). **202, 205–6.**

Carter, J. W. and Muir, P. H., eds.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London, 1967). **375.**

Carter, T. F. and Goodrich, C. L.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1st edn 1925, New York, 1955). **27, 376.**

Caspar, Max. *Kepler*, tr. C. Doris Hellman (London, 1948, rev. edn 1959). **582, 626–7, 639, 654.**

Cassirer, Ernst.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tr. F. Koelln and J. Pettegrove (Princeton, 1951). **698.**

'O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V (Jan. 1943) 49–56. **229, 230.**

Castiglioni, A. *A History of Medicine*, tr. E. B. Krumbhaar (rev. edn, New York, 1958). **616.**

Cavallera, Ferdinand. 'La Bible en Langue Vulgaire au Concile de Trente: IVe Session,' *Mélanges E. Podechard* (Lyon, 1945) 37–56. **329, 343–4.**

Chabod, Frederico.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tr. David Moore, introduction, A. P. d'Entrèves (New York, 1965). **185, 293.**

Chalotais, Louis René de Caradeuc de la. *Essay on National Education, or Plan of Studies for the Young*, tr. H. R. Clark (London, 1934). **351.**

Chambers, G. K. 'Sir Thomas Browne, True Scientist,' *Osiris* II (1936) 28–79. **458.**

Chambers, R. W. 'The Lost Literature of Medieval England,' *The Library*, 4th ser. V (1925) 293–321. **115.**

Charlton, Kenneth. *Educat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 (London, 1965). **243, 383, 425.**

Chartier, R., Compère, M. M., Julia, D. *L'Education en Franc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6). **350, 414, 430.**

Chastel, André. 'What is Mannerism?' *Art News* (Dec. 1965), 64. **82.**

Chaucer, G. *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 ed. Derek de Solla Price (Cambridge, 1955). **277, 465.**

Chaunu, Pierre. 'Sur la Fin des Sorciers au XVII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XXIV (July–Aug. 1969) 895–911. **434.**

Chaytor, H. J. *From Script to Print* (Cambridge, 1945). **10, 121, 171, 227, 299, 319.**

Chenu, M. 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d. and tr. J. Taylor and Lester Little (Chicago, 1968). **184–5, 251, 290, 379.**

Chester, Alan G. 'The New Learning: A Semantic Note,'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II (1955) 139–47. **174.**

Chrisman, Miriam Usher.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New Haven, 1967). **370–3.**

Christianson, John. 'Astronomy and Printing,' paper presented at Sixteenth Century Studies Conference, October 26, 1972, 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 Mo. **599, 625.**

'Tycho Brahe at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559–1562,' *Isis* 58 (1967) 198–203. **533–4.**
'Tycho Brahe's Facts of Life,' *Fund og Forskning i Det Kongelige Biblioteks* 17 (1970). **624.**
Cipolla, Carlo M.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6). **244, 554.**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London, 1969). **61, 414.**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4 (1972) 46–52. **583.**
Clagett, Marshall. *Archimedes in the Middle Ages I: The Arabo-Latin Tradition* (Madison, Wis., 1964). **471, 497, 697.**
ed.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ept. 1957) (Madison, Wis., 1959). Includes articles by Crombie, A. C.; Santillana, G. de; Hall, A. R.; Nagel, E.
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 (London, 1957). **611.**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in the Middle Ages (Madison, Wis., 1959). **497, 522, 541.**
Clagett, M. and Moody, E., eds. *The Medieval Science of Weights* (Madison, Wis., 1952). **497.**
Clair, Colin. *Christopher Plantin* (London, 1960). **100.**
'Willem Silvius,' *The Library* 5th ser. XIV (1959) 192–205. **96.**
Clapham, Michael. 'Printing,'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Charles Singer, E. J. Holmyard, A. R. Hall and Trevor Williams (4 vol. Oxford, 1957) 377–411. **21, 31, 45, 273, 376.**
Clapp, Sarah L. C. 'The Beginnings of Subscrip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odern Philology* XXIX (1931) 199–224.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The Subscription Enterprises of John Ogilby and Richard Blowe,' *Modern Philology* XXXI (May 1933) 365–79. **367.**
Clapp, V. W. 'The Story of Permanent Durable Book Paper, 1115–1970,' *Scholarly Publishing, A Journal for Authors and Publishers* II (Toronto, 1971) 108 ff. **14, 115.**
Clark, Sir George N.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 to about 1720* (revised excerpt from *The European Inheritance*, ed. E. Barker and P. Vaucher) (Oxford Paperbacks University Series no. 4) (Oxford, 1966). **169.**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v. edn, Oxford, 1947). **29, 460.**
Clarke, Edwin. Review, *Medical History* VIII (1964), 380–3. **502, 573.**
Clifton, Robin. 'The Popular Fear of Catholics i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52 (Aug. 1971) 23–55. **427.**
Clough, C. H. *Machiavelli Researches* (Naples, 1967). **100.**
Introduction. *The Discours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tr. Leslie J. Walker (2 vol. London, 1965). **100.**
Cochin, Augustin. *Les Sociétés de Pensée et la Révolution en Bretagne 1788–1789* (2 vol. Paris, 1925). **149.**
Cochrane, Eric.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2 (Feb. 1977) 88. **314.**
'Science and Humanism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 (Dec. 1976) 1039–57. **526.**
Cochrane, J. A. *Dr. Johnson's Printer: The Life of William Strahan* (London, 1964). **112.**
Cohen, Gustave. *Ecrivains Français en Holland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Paris, 1920). **647.**
Cohen, I. Bernard. *Introduction to Newton's 'Principia'* (Cambridge, 1971). **638.**

'Diagrams and Illustrations in relation to Scientific Idea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he first of three lectures in a series: *Words, Images, Ideas*, A. S. W. Rosenbach Lectures in Bibliograph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November 27, 1973). **536.**

Review of Whiteside ed. *The Mathematical Papers of Isaac Newton*, *Scientific American* (Jan. 1968) 139–44. **245, 555, 633.**

Cohn, Norman. *Warrant for Genocide* (New York, 1969). **150.**

Cole, Richard G. 'The Dynamics of Print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Festschrift for Harold J. Grimm) ed. L. P. Buck and J. W. Zophy (Columbus, Ohio, 1972) 93–105. **133.**

Colie, Rosalie. *Paradoxia Epidemica, The Renaissance Tradition of Paradox* (Princeton, 1966). **230.**

Book review.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VI (Spring 1973) 75. **144.**

Collins, Philip. 'The Fiction Marke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20, 1977) 537. **157.**

Compère, M. M. *See* Chartier, R.

Condorce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2nd edn, Paris, 1866). **300.**

Contratin, A. H. *See* Daniélou, J.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tr. and ed. Edward Rosen (1st edn 1939, 3rd edn, New York, 1971). **523, 577, 579–81, 583, 617, 621, 650–2.**

Coser, Lewis A. *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1965). **153, 155.**

Costabel, P. and Lerner, M. P., eds. *Les Nouvelles Pensées de Galilée par Marin Mersenne* (2 vol. Paris, 1973). **645.**

Cowley, John. 'The Abridgement of Statutes,' *The Library*, 4th ser. XII (Sept. 1931) 125–73. **105.**

Craig, Hardin. 'The Genevan Bible as a Political Document,'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II (1968) 40–9. **364.**

Craig, Joh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1690) tr. from Latin in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4 (1963). **79.**

Crehan, F. J., S.J. 'The Bible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from Trent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199–237. **333–4, 343–4, 348, 353, 426.**

'Indulgences,' *A Catholic Dictionary of Theology* (3 vol. London, 1971) III 84–90. **375.**

Crombie, A. C. *Augustine to Galile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D. 400–1650* (London, 1952). **495, 498, 501, 536.**

'Commentary,'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ept. 1957) ed. Marshall Clagett (Madison, Wis., 1959) 66–79. **553, 556.**

'Quantification in Medieval Physics,' *Isis* 52 (1961) 143–60. **504.**

'Rejoinder,' *Scientific Chang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A. C. Crombie (New York, 1963) 316–23. **607–8.**

ed. *Scientific Chang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ew York, 1963). **468, 537.** Includes article by Beaujouan, G.

Crosby, R. 'Oral Delivery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I (1939) 88–110. **319.**

Csapodi, C. *The Corvinian Library History and Stock* (Budapest, 1973). **586.**

Curtis, Mark. *Oxford and Cambridge in Transition 1558–1642* (Oxford, 1959). **134.**
'The Alienated Intellectuals of Early Stuart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23 (Nov. 1962) 25–41. **136.**
'Educ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Shakespeare Survey* XVII (1964) 53–72. **243, 383.**
Curtius, Ernst.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 W. Trask (1st edn 1948; New York, 1963). **6, 123, 455–6.**

Dahl, Folke. *Dutch Corantos 1618–1650. A Bibliography* (The Hague, 1946). **138.**
Daly, Lloyd W. *Contributions to a History of Alphabetization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Brussels, 1967). **89–90, 92.**
Daniélou, J., Contratin, A. H. and Kent, John. *Historical Theology* (The Pelican Guide to Modern Theology) (London, 1969). **313.**
Daniel-Rops, Henri.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r. A. Butler (New York, 1961). **330.**
Dannenfeldt, Karl. 'The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Knowledge of Arabic,' *Studies in Renaissance* II (1955) 96–117. **224, 447.**
'Wittenberg Botanists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ed. L. P. Buck and J. W. Zophy (Columbus, Ohio, 1972) 223–46. **98, 535, 641.**
Dantzig, Tobias. *Number: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4th edn, New York, 1967). **467, 494, 697.**
Darlowe, T. H. and Moule, H. T.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 1903). **337.**
Darnton, Robert.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Cambridge, Mass., 1968). **657.**
'The Encyclopédie Wa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 (1973) 1331–52. **29, 139.**
'The Grub Street Style of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 (1968) 301–27. **29.**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 Life of Literature . . . ,' *Past and Present* 51 (1971) 81–115. **29.**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Daedalus* (1971) 214–57. **29.**
David, Madeleine. *Le Débat sur les Ecritures et l'Hiéroglyph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65). **279, 284, 564.**
Davies, David W. *The World of the Elseviers, 1580–1712* (The Hague, 1954). **409, 535, 645.**
Davies, H. W., ed. and introduction. *Bernhard von Breydenbach and His Journey to the Holy Land 1483–4: A Bibliography* (London, 1911). **86.**
Davis, Hugh H. Book review,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VIII (Autumn 1975) 353. **33.**
Davis, Natalie Zemon. 'Mathematicians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French Academies: Some Further Evidence,' *Renaissance News* XI (Spring 1958) 3–10. **542.**
'New Monarchs and Prudent Priests,'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VI (March 1971) 46–73. **400.**
'Peletier and Beza Part Company,'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I (1964) 188–222. **403, 543.**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Palo Alto, California, 1975). **xiii, 63–5, 130, 234, 241–2, 362, 377, 541.**

'The Protestant Printing Workers of Lyons in 1551,'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ed. H. Meylan (Geneva, 1957) 247–57. **130, 352.**

'Publisher Guillaume Rouillé, Businessman and Humanist,' *Editing Sixteenth Century Texts*, ed. R. J. Schoeck (Toronto, 1966) 72–112. **87–8, 234.**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 (Dec. 1968) 589. **370.**

'Sixteenth-Century French Arithmetics on the Business Lif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 (1960) 18–48. **384, 392, 542, 544.**

'Strikes and Salvation in Lyons,'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LVI (1965) 48–64. **87, 250, 392, 406.**

Davis, Robert Gorham. 'Speak of the Devil,'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25, 1972) 55. **633.**

Deanesly, Margaret. *The Lollard Bible* (Cambridge, 1920). **345, 357.**

'Débats et Combats'. *See* Soriano, M.

Debus, Allen. *The English Paracelsians* (New York, 1966). **472.**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Webster–Ward Debate (London, 1970). **275, 473, 550, 656, 681.**

'The Chemical Debat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ed. M. L. Bonelli Righini and W. R. Shea (New York, 1975) 19–44. **275.**

ed. *Scienc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the Renaissance* (Essays to Honor Walter Pagel) (New York, 1974). Includes articles by Keller, A.; Westfall, Richard.

Dechend, Hertha von. *See* de Santillana, G.

De Frede, Carlo. 'Per la Storia della Stampa nel Cinquecento in Rapporto con la Diffusione della Riforma in Italia,' *Gutenberg-Jahrbuch* (1964) 175–84. **311, 348.**

Degering, H. *Lettering: Modes of Writing in Western Europe from Antiquity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29). **205.**

Delaissé, L. M. J. *A Century of Dutch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Berkeley, Calif., 1968). **259, 339.**

Le Manuscrit Autographe de Thomas A Kempis et 'L'Imitation de Jésus Christ' (2 vol. Brussels, 1952). **12, 121, 391.**

Book review of Millard Meiss' work, *The Art Bulletin* LII (1970) 206–12. **13.**

De la Mare, Albinia. 'Bartolomeo Scala's Dealings with Booksellers, Scribes and Illuminators, 1459–63,'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IX (1976) 237–45. **48–9.**

'Messer Piero Strozzi, A Florentine Scribe,' *Calligraphy and Pale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A. J. Fairbank*, ed. A. S. Osley (London, 1965) 55–68. **13.**

'The Shop of a Florentine "cartolaio" in 1426,' *Studi Offerti a Roberto Ridolfi* (Florence, 1973) 237–48. **47.**

'Vespasiano and the Library of the Badia at Fiesole' to be published by the Warburg Institute. Forthcoming. **45.**

'Vespasiano da Bisticci Historian and Bookselle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1965). **12–13, 45–6, 48–50, 217.**

Delany, Paul. *British Autobio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9). **229–30, 236, 366.**

D'Elia, Pasquale. *Galileo in China. Relations Between Galileo and the Jesuit-Scientist-Missionaries 1610–1640*, tr. R. Suter and M. Sciascia (Cambridge, Mass., 1960). **609.**

Delof, G. Turbet. 'Comment déjouait-on la censure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III (1975) 113–15. **138.**
Delumeau, Jean. *Le Catholicisme entre Luther et Voltaire* (Paris, 1971). **314.**
DeMolen, Richard L.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The Me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ed. R. L. DeMolen (Boston, 1974) 1–25. **178.**
ed. *The Me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Boston, 1974). Includes articles by DeMolen, R.; Reed, R. B.
Denholm-Young, N. *History and Heraldry 1254–1310* (Oxford, 1965). **134.**
Descartes, René. *A Discourse on Method*, tr. John Veitch, introduction A. D. Lindsay (Everyman's Library edn, 1912). **476.**
Deschamps, J. Book review, *Quaerendo* III (1973) 78. **391.**
Destrez, Jean. *La 'Pecia' dans les Manuscrits Universitaires du XIIIe et du XIVe Siècle* (Paris, 1935). **6, 13–14, 19, 103, 203, 216, 259.**
Deuel, Leo. *Testaments of Time: The Search for Lost Manuscripts and Records* (New York, 1965). **209, 211, 222.**
Deutsch, Karl.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Cambridge, Mass., 1953). **118.**
Devereux, E. J. 'English Translators of Erasmus 1522–1557,' *Editing Sixteenth Century Texts*, ed. R. J. Schoeck (Toronto, 1966) 45–58. **357–8.**
Dibdin, Thomas F.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or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begun by the late Joseph Ames, augmented by William Herbert and Greatly Enlarged by the Reverend Thomas Frognell Dibdin* (4 vol. London, 1810). **ix, 378.**
Dibon, Paul. 'L'Université de Leyde e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au 17e Siècle,' *Quaerendo* V (Jan. 1975) 25–32. **137, 140, 409.**
Dickens, Arthur Geoffrey. *The Counter-Reformation* (London, 1969). **315, 353.**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New York, 1964). **310, 324.**
Reformation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New York, 1968). **303, 359, 373, 376, 394, 403.**
Thomas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London, 1959). **356.**
Dijk, S. J. P. von. 'An Advertisement Sheet of an Early 14th Century Writing Master at Oxford,' *Scriptorium* X (1956) 47–64. **82.**
Dijksterhuis, E. J.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tr. C. Dikshoorn (Oxford, 1961). **505–6.**
Simon Stevin (The Hague, 1943). **500.**
See also Forbes, R. J.
Diringer, David. *The Hand Produced Book* (London, 1953). **22.**
The Illuminated Book (London, 1958). **22.**
Dorsten, Jan van. *The Radical Arts* (London, 1973).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Thomas Basson 1555–1613: English Printer at Leiden (Sir Thomas Browne Institute) (Leiden, 1963). **140.**
'Garter Knights and Familists,'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4 (1974) 178–88. **140, 143.**
Drachmann, A. G. Review,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7 (Jan. 1976) 112–16. **589.**
Drake, Stillman, ed. and tr.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 1957). **458, 525, 526–7, 530, 644, 652–4, 658, 675–6, 681.**
'Early Science and the Printed Book: The Spread of Science Beyond the University,'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6 (1970) 38–52. **454, 524, 529, 540, 542, 546, 552, 622, 629.**

See also Rose, P. L.

Dreyer, J. L. E. *History of Astronomy, From Thales to Kepler* (rev. edn, New York, 1953). **617–18.**

Tycho Brahe (Edinburgh, 1890). **581, 583, 597, 624–5.**

Droz, Eugénie. 'Bibles Françaises après le Concile de Trente,' *Journal of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VIII (1965) 210–15. **334, 342–4, 349, 426.**

Dudek, Louis. *Literature and the Press* (Toronto, 1960). **153, 157.**

Dupree, Hunter. 'The Pace of Measurement from Rome to America,' *The Smithsonian Journal of History* III (1968) 19–40. **468.**

Dupront, Alphonse. 'Livre et Culture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 Réflexions sur une Enquêt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65) 867–98. **29, 149.**

Durand, Dana B. *The Vienna-Klosterneuberg Map Corpus: A Stud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Science* (Leiden, 1952). **21, 482, 512, 516.**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15th Century Italy: "Il Primato dell'Italia"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Toward Modern Science*, ed. R. Palter (2 vol., New York, 1961) II, 25–48. **170, 488, 497, 584, 588.**

Durant, Will and Ariel.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6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57). **250.**

Durme, M. van, ed. *Correspondance Mercatorienne* (Antwerp, 1959). **110.**

Easton, J. B. 'The Early Editions of Robert Recorde's Ground of Artes,' *Isis* 58 (1967) 515–32. **533–4.**

Eastwood, B. S. Review of Lindberg's edition of Pecham, *Speculum* XLVII (1972) 324. **551, 590.**

Ebel, J. G.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 (Oct.–Dec. 1969) 593–602. **360.**

Echeverria, Durand. *Mirage in the West* (Princeton, 1957). **149.**

Edgerton, Samuel. *The Renaissance Rediscovery of Linear Perspective* (New York, 1975). **192, 268.**

Edler de Roover, F. 'Cost Account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ccounting Review* 12 (1937) 226–37. **22, 383.**

'New Facets on the Financing and Marketing of Early Printed Books,' *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 27 (1953) 222–30. **22.**

'Per la Storia dell'arte della Stampa in Italia: come furono stampati a Venezia tre dei primi libri in volgare,' *La Bibliofilia* LV (1953) 107–15. **38.**

Eels, Hastings. *The Attitude of Martin Bucer toward the Bigamy of Philip of Hesse* (New York, 1924). **373.**

Egbert, Virginia Wylie. *The Medieval Artist at Work* (Princeton, 1967). **82.**

Ehrman, Albert.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Ehrman and Pollard, *The Distribution of Books by Catalogue* (Roxburghe Club, Cambridge, 1965). **22.**

Ehrman, Albert and Pollard, Graham. *The Distribution of Books by Catalogue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A.D. 1800* (Roxburghe Club, Cambridge, 1965). **58, 91.**

Eisenstadt, S. N. ed.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1968). Includes articles by Hooykaas, R.; Willems, E.

Eisenstein, E. L. 'The Advent of Print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 *Past and Present* (Nov. 1969) 19–89. **xi.**

'L'Avènement de l'Imprimerie et la Réform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Nov.–Dec. 1971) 1355–882. **xi.**
'Clio and Chronos,'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6 (1966) 36–65. **xi, 9, 17, 21, 24, 31, 289, 389.**
'The Evolution of the Jacobin Tradition in France 1815–1848'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Radcliffe, 1952). **424.**
'The Position of the Printing Press in Current Historical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 (Feb. 1970) 727–43. **xi.**
'Some Conjectures about the Impact of Printing on Western Society and Though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 (March 1968) 1–56. **xi.**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 (October 1973) 1049–50. **149.**
Book review, *The French Review* (March 1971) 777–8. **386.**
Eisley, Loren. *Darwin's Century* (New York, 1958). **487.**
Elert, Werner. *The Structure of Lutheranism*, tr. W. A.Hansen (St Louis, Mo., 1962). **651.**
Elliott, J. H. 'Revolution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42 (Feb. 1969) 34–56. **396.**
Elliott, J. H. and Koenigsberger, H. G., eds. *The Diversity of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Ithaca, New York 1970). Includes article by Hall, A. R.
Elton, G. R. *Policy and Polic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omas Cromwell* (Cambridge, 1972). **135, 312.**
Reformation Europe 1517–1559 (New York, 1966). **306, 310.**
Endicott, Norman, ed. *See* Browne, Sir Thomas.
Erasmus. *The 'Adages' of Erasmus: A Study with Translations*, tr. and ed. Margaret Mann Phillips (Cambridge, 1964). **219, 223, 280.**
The Colloquies of Erasmus, tr. and ed. Craig Thompson (Chicago, 1965). **72.**
Escarpit, Robert.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1958). **153.**
Espinasse, Margaret. 'Decline and Fall of Restoration Science,'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ed. C. Webster (London, 1974) 347–69. **666, 670.**
Estienne, Henri. *The Francofordiense Emporium of Henri Estienne*, ed. J. W. Thompson (Chicago, 1911).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Evans, R. J. W. *Rudolf II and His World: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1612* (Oxford, 1973). **448, 474, 640.**
'The Wechel Presses: Humanism and Calvinism in Central Europe 1572–1627,' *Past and Present*, Sup. 2 (Oxford, 1975). **141, 275, 448, 668.**
Evennett, H. O. *The Spiri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ed. John Bossy (Cambridge, 1968). **315, 354.**

Fairfield, Leslie P. *John Bale: Mythmaker for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W. Lafayette, Indiana, 1976). **112.**
'John Ba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 Hagiography in England,'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XXIV (April 1973) 145–60. **423.**
'*The Vocacyon of Johan Bale* and Early English Autobiography,'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IV (Autumn 1971) 327–39. **229.**
Febvre, Lucien. *Au Coeur Religieux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57). **15, 94, 399, 448.**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Evolution de L'Humanité LIII) (Paris, 1942). **10, 187.**
'Sorcellerie, Sottise ou Révolution Menta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III (Jan.–March 1968) 9–15. **434.**

Febvre, Lucien and Martin, H.-J.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1958). **5, 13, 15, 35–7, 44, 50, 54, 59, 71, 104, 117, 123, 138, 145, 149, 153, 203, 207, 223, 250, 392, 395, 399, 408, 415, 448, 454, 511, 645.**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r. David Gerard (London, 1976). **5.**

Fedou, René. 'Imprimerie et Culture: La vie intellectuelle à Lyon avant l'apparition du livre,' *Cinq Etudes Lyonnaises*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VI) (Geneva, 1966) 1–27. **179, 405.**

Fenn, Eric. 'The Bible and the Missionary,'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383–407. **378.**

Ferguson, Arthur B. *The Articulate Citizen and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Durham, N.C., 1965). **135.**

Ferguson, Eugene. 'Leupold's *Theatrum Machinarum*,'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71) 64–6. **262.**

Ferguson, Wallace K.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ass., 1948). **165–6, 175, 300, 305.**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Suggestions for a Synthesis,' *The Renaissance: Medieval or Modern?* ed. K. H. Dannenfeldt (New York, 1959) 101–9. **165.**

Festugière, A. J. *La Révélation d'Hermès Trismégiste* (4 vol. Paris, 1944–54). **285.**

Feuer, Lewis. *The Scientific Intellectual* (New York, 1963). **611, 642, 661.**

Finegan, J. *Han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 (Princeton, 1964). **125, 287.**

Finley, M. I.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Aug. 1965) 29–45. **240, 251.**

Fisch, Max. 'The Academy of the Investigators,' *Science, Medicine, and History. Essays ... in honor of Charles Singer*, ed. E. A. Underwood (2 vol. Oxford, 1953) I, 521–63. **667.**

Fischer, David Hackett. *Historians' Fallacies* (New York, 1970). **406.**

Fischer, Hans. 'Conrad Gesner (1516–1565) as Bibliographer and Encyclopedist,' *The Library*, 5th ser. XXI (Dec. 1966) 269–81. **98, 111.**

Fleckenstein, J.-O. 'Petrus Ramus et l'Humanisme Bâlois,' *La Science au Seizième Siècle* (Colloque de Royaumont 1957) (Paris, 1960) 119–33. **76.**

Forbes, R. J. and Dijksterhuis, E. J.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vol. London, 1963). **120, 261.**

Ford, Franklin. *Robe and Sword*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LXIV) (Cambridge, Mass., 1953). **119, 136, 395.**

Foster, George.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New York, 1962). **330.**

Foster, Kenelm. 'Italian Version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358–60. **348.**

'Vernacular Scriptures in Italy,'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452–65. **346.**

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 R. Howard (New York, 1965). **433.**

Frank, R. G.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Universitie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Background and Sources,' *History of Science* (2-part article) XI (Sept. and Dec. 1973) 194–216, 239–69. **533–4.**

Frankl, Paul. *The Gothic: Literary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Eight Centuries* (Princeton, 1960). **201.**

Franklin, Julian.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New York, 1963). **103, 200–1.**

Franklin, Ralph. 'Conjectures on Rarity,' *The Library Quarterly* (Chicago) 44 (1974) 309–31. **20.**

French, Peter. *John Dee: The World of an Elizabethan Magus* (London, 1972). **96.**

Frumkin, Maximilian. 'Early History of Patents for Inven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Newcome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XXVI (1947–9) 47–56. **240, 251.**

Fuhrman, Otto W.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A History of the Printed Book*, ed. L. C. Wroth (New York, 1938) 25–57. **27.**

Furet, F. and Sachs, W. 'La Croissance de l'alphabétisation en France, XVIIIe-XIXe Siècl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74) 714–37. **414.**

Fussner, F. Smith.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 1580–1640* (London, 1962). **14, 113.**

Gabriel, Astrik. *The College System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Universities* (Baltimore, Md., n.d.). **475, 536, 581, 622.**

Garlandi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Frankfurt, 1969). **608.**

Gade, J. A. *The Life and Times of Tycho Brahe* (Princeton, 1947). **581, 625.**

Gadol, Joan. *Leon Battista Alberti* (2nd edn, Chicago, 1973). **192, 268, 564.**

Galilei, Galileo.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1615),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tr. and ed. Stillman Drake (New York, 1957) 175–216. **78, 527.** (*See also* entries under Drake.)

Gallick, Susan. 'A Look at Chaucer and His Preachers,' *Speculum* L (July 1975) 456–76. **236.**

Gandz, Solomon. 'The Dawn of Literature: Prolegomena to a History of Unwritten Literature,' *Osiris* VII (1939) 261–515. **9, 334.**

'The Invention of the Decimal Frac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ponential Calculus by Immanuel Bonfils of Tarascon (c. 1350),' *Isis* XXV (May 1936) 16–45. **500, 563.**

Gardiner, Stephen. *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 ed. J. A. Muller (Cambridge, 1933). **68.**

Garin, Eugenio. *Italian Humanism: Philosophy and Civic Life in the Renaissance*, tr. P. Munz (New York, 1965). **100, 252, 475.**

Science and Civic Life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tr. P. Munz (New York, 1969). **502, 526, 528, 671.**

'A Garland for Gutenberg,'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ne 22, 1967) 561. **363.**

Gaskell, Philip. *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Oxford, 1972). **4.**

Gautier, Théophile. Preface to *Mademoiselle de Maupin* (1835) tr. F. de Sumichrast, in *Paths to the Present*, ed. E. Weber (New York, 1960). **157.**

Gay, Peter. Introduction, *Deism: An Anthology* (Princeton, N. J., 1968). **323–4.**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2 vol. New York, 1966). **209, 299, 491.**

The Party of Humanity (New York, 1964). **146.**

Geanokoplos, Deno J. *Greek Scholars in Venice: Stud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Greek Learning from Byzantium to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62). **221, 223, 447.**

'Erasmus and the Aldine Academy of Venice, A Neglected Chapter in the Transmission of Greco-Byzantine Learning to the West,' *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 III, nos 2 and 3 (1960) 107–35. **223.**

Gedenkboek der Plantin-Dagen 1555–1955 (Memorial volume of the Plantin Celebration) (Antwerp, 1956). *See* Roover, R.

Geisendorf, Paul F. 'Lyons and Genev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Fairs and Printing,' *French Humanism 1470–1600*, ed. W. Gundesheimer (New York, 1969) 146–63. **411.**

Gelder, H. A. E. van. *The Two Reformatio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1961). **175.**

Geldner, F. *Die Deutschen Inkunabeldrucker* (2 vol. Stuttgart, 1968).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Das Rechnungsbuch des Speyrer . . . Grossbuchhändlers Peter Drach,'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 (Frankfurt, 1962) V, 1–195. **22.**

Gerlo, A. 'The *Opus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 of Erasmus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Ars Epistolica*,'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European Culture A.D. 500–1500*, ed. R. R. Bolgar (Cambridge, 1971) 103–15. **190.**

Gerritsen, John. *See* Maslen, K. I. D.

Gerson, Jean, 'De Laude Scriptorum ad Fraters Coelestinos et Carthusienses,' *Joannis Gersoni . . . Opera Omnia*, ed. by L. E. Du Pin (5 vol. Amsterdam, 1706), II, cols 694–703. **14–15, 50.**

Geymonat, Ludovico. *Galileo Galilei*, tr. and ed. Stillman Drake (New York, 1965). **526.**

Giedion, Siegfried.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1941). **186.**

Gies, Dorothy. 'Some Early Ladies of the Book Trade,' *The Publishers Weekly* (Oct. 5, 1940). **46.**

Gies, Joseph and Frances. *Leonardo of Pisa and the New Mathematic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69). **236, 382, 467.**

Giesey, Ralph. Book review,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Travaux et Documents* XXXIII (1971) 207. **373.**

Gilbert, Neal. *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ethod* (New York, 1960). **102–3, 247.**

'The Early Italian Humanists and Disputation,'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ed. A. Molho and J. Tedeschi (DeKalb, Ill., 1971) 203–26. **473.**

Gilissen, John. 'Individualisme et Sécurité Juridique,' *Individu et Société à la Renaissanc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April, 1965 (Brussels, 1967) 35–58. **104.**

Gille, Bertrand. *The Renaissance Engineers* (London, 1966). **243, 565.**

Gillispie, Charles C. *The Edge of Objectivity* (Princeton, 1960). **490, 576, 593, 677, 679–80, 682.**

Gilmore, Myron P. *Humanists and Jurists* (Cambridge, Mass., 1963). **104.**

The World of Humanism 1453–1517 (*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 ed. W. Langer) (New York, 1952). **28, 78–9, 81, 183, 184, 187, 209, 210, 238, 289.**

'Italian Reactions to Erasmian Humanism,' *Itinerarium Italicum*, ed. H. Oberman (Leiden, 1975) 61–115. **67.**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the Lessons of History,' *Facets of the Renaissance*, ed. W. Werkmeister (Los Angeles, 1959) 73–87. **104, 194–5, 218.**

Gingerich, Owen, ed.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Copernican Symposiu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75). Includes article by Nelson, B.

'Commentary,'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ed. R. S. Westman (Los Angeles, 1975) 99–108. **580.**

'Copernicus and the Impact of Printing,' *Vistas in Astronomy* 17, ed. A. Beer and K. A. Strand (Oxford, 1975) 201–9. **584–6, 604.**

'Crisis versus Aesthetic i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Vistas in Astronomy* 17, ed. A. Beer and K. A. Strand (Oxford, 1975) 85–95. **464, 583, 589, 595, 603, 605.**

Ginzburg, Carlo. *Il Nicodemismo: Simulazione e Dissimulazione religiosa nell'Europa del '500* (Turin, 1970). **141, 444–5.**

'High and Low: The Theme of Forbidden Knowledge,' *Past and Present* 73 (1976) 28–42. **147.**

Goldschmidt, E. P. *The First Cambridge Press in Its European Setting* (Cambridge, 1955). **399.**

Gothic and Renaissance Bookbindings (2 vol. Amsterdam, 1967). **49.**

Medieval Texts and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n Print (London, 1943). **10, 45, 115, 168, 211, 533.**

The Printed Book of the Renaissance: Three Lectures on Type, Illustration, Ornament (Cambridge, 1950). **82, 204, 206, 248, 280.**

'Not in Harrisse,' *Essays Honoring Lawrence C. Wroth* ed. F. Goff (Portland, Maine, 1951) 129–43. **517.**

Goldstein, B. R. 'The Arabic Version of Ptolemy's Planetary Hypothes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7 (1967) part 4, 1–55. **604.**

'Theory and Observation in Medieval Cosmology,' *Isis* 63 (1972) 39–47. **598, 601.**

Goldthwaite, Richard. 'Schools and Teachers of Commercial Arithmetic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 (Fall 1972) 418–33, **382–3.**

Golino, C. L., ed. *Galileo Reappraised* (Berkeley, Calif., 1966). Includes articles by Moody, E. A.; Terza, D. D.; White, Lynn.

Gombrich, E. H.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rev. edn, Princeton, 1972). **268.**

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1969). **25, 226, 295.**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s,'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66) 1–10. **83, 293.**

'Art and Scholarship,' *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 (London, 1963) 106–19. **232.**

'Icones Symbolicae: The Visual Image in Neo-Platonic Thought,'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I (1948) 163–92. **280, 288.**

'The Leaven of Criticism in Renaissance Art,' *Art,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ed. C. S. Singleton (Baltimore, 1967) 3–43. **254.**

Goodfield, J. *See* Toulmin, S.

Goodrich, C. L. *See* Carter, T. F.

Goody, Jack,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1968). **9.**

Goody, Jack and Watt, Ian.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 (1963) 304–45. **9, 114.**

Gordan, Phyllis W. G., ed. *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 The Letters of Poggius Bracciolini to Nicolaus de Niccolis* (New York, 1974). **137, 189, 221.**

Gordon, Cosmo. 'Books on Accountancy 1494–1600,'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XIII (1916) 145–70. **382.**

Gordon, D. J., ed. *Fritz Saxl 1890–1948: A Volume of Memorial Essays* (London, 1957). Includes articles by Oakeshott, W.; Pächt, O.; Singer, Charles.

Gossman, Lionel. *Medievalism and the Ideolog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World and Work of La Curne de Sainte-Palaye* (Baltimore, 1968). **201, 338.**
Goudy, Frederick. *The Capitals from the Trajan Column at Rome* (New York, 1936). **82.**
Grabois, Aryeh. 'The *Hebraica Veritas* and Jewish-Christian Intellectual Relation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Speculum* L (Oct. 1975) 613–34. **224.**
Grafton, Anthony T. 'Joseph Scaliger and Historical Chronology,' *History and Theory* XIV (1975) 156–85. **611.**
Graham, H. J. '"Our Tong Maternall Marvellously Amendyd and Augmentyd": The First Englishing and Printing of the Medieval Statutes at Large, 1530–1533,' *UCLA Law Bulletin* XIII (Nov. 1965) 58–98. **105, 119, 360.**
'The Rastells and the printed English Law Book of the Renaissance,' *Law Library Journal* 47 (1954). **105.**
Graña, César. *Bohemian versus Bourgeois* (New York, 1964). **153, 156.**
Gravier, Maurice. *Luther et l'Opinion Publique* (Paris, 1942). **310–11, 354, 405.**
Gray, Hanna. 'Renaissance Humanism: The Pursuit of Eloqu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V (1963) 497–514. **296, 473.**
'Valla's Encomium . . . and the Humanist Conception of Christian Antiquity,' *Essay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resented to Stanley Pargellis*, ed. Heinz Bluhm (Chicago, 1965) 37–51. **195, 323.**
Green, Lowell C. 'The Bible in Sixteenth Century Humanist Education,'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IX (1972). 112–34. **364.**
Greenslade, S. L.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Bible A.D. 1525–1611,'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141–74. **358.**
'Epilogu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476–519. **343, 364, 374, 378.**
Gregg, Pauline. *Free-born John: A Biography of John Lilburne* (London, 1961). **362, 423.**
Grendler, Paul F. *Critics of the Italian World* (Madison, Wis., 1969). **137, 139, 228, 394, 399, 400.**
The Roman Inquisition and the Venetian Press 1540–1605 (Princeton, 1977). **348, 411, 671.**
'Francesco Sansovino and Italian Popular History 1560–1600,'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VI (1969) 139–80. **360.**
'The Rejection of Learning in Mid-Cinquecento Italy,'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III (1966) 230–49. **228.**
'The Roman Inquisition and the Venetian Press 1540–1605,'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 (March 1975) 48–66. **341, 348, 411, 671.**
Grendler, Paul and Marcella. 'The Survival of Erasmus in Italy,' *Erasmus in English Newsletter* (University of Toronto) No. 8 (1976) 2–22. **145, 416.**
Grimm, Harold J. Introduction to Ninety-Five Theses, *Career of the Reformer I* (*Luther's Works* XXXI, ed. H. T. Lehman) (Philadelphia, 1957) 19–23. **306–7.**
Grimm, Heinrich. 'Luther's "Ablassthesen" und die Gegenthesen von Tetzel-Wimpina in der Sicht der Druck- und Buchgeschichte,' *Gutenberg-Jahrbuch* (1968) 139–50. **306–8.**
Grossmann, Maria. *Humanism in Wittenberg 1485–1517* (Nieuwkoop, 1975). **221.**
'Wittenberg Printing,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Sixteenth Century Essays and Studies* (St Louis, Mo., 1970), I, 53–74. **307–8.**

Gruijs, Albert. 'Codicology or Archeology of the Book? A False Dilemma,' *Quaerendo* II (1972) 87–108. **10.**

Haas, K. H. de. *Albrecht Dürer's Engraving: Melancholia I, A Symbolic Memorial to the Scientist Johann Müller (Regiomontanus)* (Rotterdam, 1951). **247.**

Haebler, K. *The Study of Incunabula*, tr. L. E. Osborne, intro. A. W. Pollard (rev. edn, New York, 1933). **37, 169.**

Hahn, Roger. *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1660–180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1). **680.**

Hajnal, István. *L'Enseignement de L'Ecriture aux Universités Mediévales*, ed. László Mezey (2nd edn, Budapest, 1959). **14.**

Hale, J. R. *Renaissance Europe: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1480–1520* (Fontana History of Europe, ed. J. H. Plumb) (New York, 1971). **28.**

Renaissance Exploration (New York, 1968). **477, 481.**

'Gunpowder and the Renaissan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ed. C. H. Carter (New York, 1965) 113–45. **554.**

'War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22 (July 1962) 18–36. **136, 395.**

Haley, K. H. D.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2). **138, 420, 645–7.**

Hall, A. Rupert.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00–1800: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cientific Attitude* (Boston, 1957). **263–4, 267, 467, 487, 517, 573, 578, 582, 639.**

'Ca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e History?'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V (1969) 207–20. **572.**

'Magic Metaphysics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ed. M. L. Bonelli Righini and W. R. Shea (New York, 1975) 275–82. **641.**

'On the Historical Singularit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Diversity of History*, ed. J. H. Elliott and H. G. Koenigsberger (Ithaca, New York, 1970). 199–223. **494, 642.**

'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M. Clagett (Madison, Wis., 1969) 3–24. **523, 537, 556–7, 570.**

'Science,'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I. *The Reformation, 1520–59*, ed. G. R. Elton (Cambridge, 1958) 386–413. **72, 262.**

Hall, Basil. 'Biblical Scholarship: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38–93. **257, 328, 338, 369.**

'The Trilingual College of San Ildefonso and the Complutensian Polyglot,'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V, ed. G. J. Cuming (Leiden, 1969) 114–46. **331, 340.**

Haller, William. *The Elect Nation: The Meaning and Relevance of Foxe's Book of Martyrs* (New York, 1963). **128, 306, 361, 415, 421, 423, 425.**

Hammond, E. A. *See* Talbott, C. H.

Hannaway, Owen. *The Chemists and the Word: The Didactic Origins of Chemistry* (Baltimore, 1975). **102, 275, 474.**

Hanson, N. R. 'The Copernican Disturbance and the Kepler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I (1961) 169–84. **510, 589.**

Harbison, E. Harris. *The Christian Scholar in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56). **76, 123, 144, 184, 191, 205, 316, 331, 339, 341–2, 357, 401–2.**

Harlan, Robert D. 'David Hall and the Stamp Act,'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61 (1967) 13–37. **381.**

'David Hall and the Townshend Acts,'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68 (1974) 19–38. **381.**

Harman, R. A., ed. *See* Morley, Thomas.

Harrington, J. H.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ooks in Western Europe to the Year 1500'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56). **13, 46.**

Haskins, C. H.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39). **62, 10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 (1st edn, Cambridge, Mass., 1924; rev. edn, New York, 1960). **537.**

Hauser, Arnold.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II Renaissance, Mannerism, Baroque*, tr. S. Godman (New York, 1957). **170, 229, 232.**

Hauser, Henri. *Etudes sur la Réforme Française* (Paris, 1909). **428.**

La Naissance du Protestantisme, ed. G. Dumézil (Paris, 1962). **310, 334.**

Havelock, Eric.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ss., 1963). **9.**

Hay, Denys. *Polydore Vergil: Renaissance Historian and Man of Letters* (Oxford, 1952). **233.**

'The Early Renaissance in Englan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Garrett Mattingly*, ed. C. H. Carter (New York, 1965) 95–113. **396.**

'Geographical Abstractions and the Historian,' *Historical Studies: Papers Read Before the Third Irish Conference of Historians* (London, 1959) 1–17. **83, 227.**

Introductio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ed. G. R. Potter (Cambridge, 1957) 1–19. **36.**

Introduction,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The Impact of Print on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During Five Centuries*, ed. J. W. Carter and P. H. Muir (London, 1967). **36, 90, 169, 207.**

'Literature: The printed book,'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I.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ed. G. R. Elton (Cambridge, 1958) 359–86. **5, 27, 72, 207.**

Haydn, Hiram. *The Counter Renaissance* (New York, 1950). **125, 151, 175, 219, 231, 473, 475.**

Hazard, Paul. *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3 vol. Paris, 1935). **333, 410, 646–7.**

Heath, Peter. *The English Parish Clergy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London, 1969). **306, 365, 372, 394.**

Heer, Friedrich. *Die Dritte Kraft* (Frankfurt, 1960). **442.**

Hellinga, Wytze. *Copy and Print in the Netherlands: An Atlas* (Amsterdam, 1962). Includes an article by Verwey, H. de la Fontaine.

'Thomas A Kempis – The First Printed Editions,' *Quaerendo* IV (1974) 3–30. **59.**

Hellinga, Lotte and Wytze.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Work by the Master Printer in the Ordinances of Christopher Plantin,' *The Library*, 5th ser. XXIX (March 1974) 52–61. **56.**

Hellman, C. Doris. *The Comet of 1577: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New York, 1944). **598–9, 601.**

'The Role of Measurement in the Downfall of a System,' *Vistas in Astronomy* 9, ed. A. Beer and K. A. Strand (1967) 43–52. **598, 601.**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 A Survey,' *Renaissance News* VIII (Winter 1955) 186–200. **511.**

'Tycho Brahe' i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14 vol., New York, 1970) II, 401–16.

Helton, T., ed. *The Renaissanc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ge* (Madison, Wis., 1964). Includes articles by Rosen, E.; Rosenthal, E.

Hendricks, Donald. 'Profitless Printing: Publication of the Polyglots,'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II (April 1967) 98–115. **333, 367, 695.**

Herrlinger, Robert. *History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from Antiquity to 1600*, tr. G. Fulton-Smith (New York, 1970). **53–4, 86, 92.**

Hesse, Mary, 'Hermeticism and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ed. R. Stuewer (Minnesota Studies v) (Minneapolis, Minn., 1970) 134–60. **286.**

Hessel, J. H. *Epistulae Ortelianae* (1887) reissued one-vol. edn by Otto Zeller (Osnabrück, 1969). **110.**

Hetherington, Noriss S. 'Almanacs and the Extent of Knowledge of the New Astronom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19 (Aug. 1975) 275–9. **386, 631.**

Hexter, J. H.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Evanston, Ill., 1961). **136, 361, 363, 386, 388–9, 397, 441.**

Hilfstein, Erna and Rosen, Edward. Book review, *Isis* 63 (June 1972) 254–5. **614.**

Hilgers, Joseph. *Der Index der Verbotenen Bücher* (Freiburg, 1904). **347.**

Hilgert, Earl. 'Johann Froben and the Basel University Scholars 1513–1523,' *The Library Quarterly* XLI (April 1971) 141–9. **399.**

Hill, Christopher. *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New York, 1967). **424–5.**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London, 1972). **656, 658.**

Book review,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VIII (April 1973) 383–5. **59.**

'The Many-Headed Monster in late Tudor and early Stuart Political Think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ed. C. Carter (New York, 1965) 296–325. **157.**

'Newton and His Society,' *1666 the Annus Mirabilis of Sir Isaac Newton*, ed. R. Palter (Cambridge, Mass., 1970) 26–51. **662.**

Hillerbrand, Hans, ed. and tr. *The Reformation: A Narrative History Related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 (New York, 1964). **306–7, 309, 338, 394, 402, 700.**

'The Spread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LXVII (Spring 1968) 265–86. **307, 309, 449.**

Hilliard, D. and Poulle, E. 'Oronce Fine et l'Horloge Planét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XXIII (May 1971) 311–50. **544.**

Hind, Arthur M. *An Introduction to a History of Woodcut* (2 vol. London, 1935). **86.**

Hindman, Sandra. 'The Transition from Manuscripts to Printed Books in the Netherlands: Illustrated Dutch Bibles,' *In Navolging, Een bundel studies aangeboden aan C. C. de Bruin* (Leiden, 1975) 189–209. **68, 85–6.**

Hine, William L. 'Mersenne and Copernicanism,' *Isis* 64 (1973) 18–32. **644, 663.**

'Mersenne Variants,' *Isis* 67 (1976) 98–103. **644.**

Hirsch, Rudolf.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1450–1550* (Wiesbaden, 1967; rev. edn,

1974). **5, 6, 13, 15, 34, 37, 44, 50, 52, 55–60, 64, 80, 85, 168, 176, 206, 263, 316, 346–7, 360, 375, 399, 405, 587.**

'Bulla Super Impressione Librorum, 1515,' *Gutenberg-Jahrbuch* (1973) 248–51. **317, 347.**

'Pre-Reformation Censorship of Printed Books,' *The Library Chronicle* XX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55) 100–5. **347.**

'Printing and the Spread of Humanism in Germany: The Example of Albrecht Von Eyb,' *Renaissance Men and Ideas*, ed. R. Schwoebel (New York, 1971) 23–39. **180, 372.**

Hodgart, Matthew. *Satire*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1969). **394.**

Hofer, Philip. 'Variant Issues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Ludovico Arrighi Vicentino's "Operina",' *Calligraphy and Pale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A. J. Fairbank*, ed. A. S. Osley (London, 1965) 95–107. **82.**

Holborn, Hajo. *Ulrich von Hutten and the German Reformation*, tr. Roland Bainton (New Haven, 1937). **243, 304.**

Holborn, Louise. 'Printing and the Growth of a Protestant Movement in Germany from 1517–1524,' *Church History* XI (June 1942) 1–15. **303, 354.**

Holmes, Margaret L. 'A Brief Survey of the Use of the Renaissance Themes in Some Works of the Lyonese Doctor... Symphorien Champier,' *Cinq Etudes Lyonnaises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 VI)* (Geneva, 1966) 27–55. **523.**

Holt, J. C. *Magna Carta* (Cambridge, 1965). **119.**

Holznecht, Karl. *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Middle Ages* (1st edn, 1923; New York, 1966). **228.**

Hooykaas, Reijer. *Humanisme, Science et Réforme: Pierre de la Ramée 1515–1572* (Leiden, 1958). **543, 641.**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Edinburgh, 1972; rev. edn, 1973).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ed. S. N. Eisenstadt (New York, 1968) 211–39. **641–2, 650, 655, 657, 659–60.**

Horsky, Zdenek. 'Astronomy and the Art of Clockmaking in the fourteenth,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Vistas in Astronomy* 9, ed. A. Beer (Oxford, 1967) 25–35. **589.**

Houghton, Walter. 'The History of Trades: Its Relation to Seventeenth Century Thought as Seen in Bacon, Petty, Evelyn, and Boy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I (1941) 33–60. **558.**

Houzeau, J. C. and Lancaster, A.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 l'Astronomie* (3 vol. Brussels, 1889). **590.**

Hoyaux, Jean. 'Les Moyens d'Existence d'Erasme,'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 (1944) 7–59. **401.**

Hoyle, Fred. *Astronomy* (London, 1962). **466.**

Huffines, Marion L. 'Sixteenth Century Printer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New High German,'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LXXIII (Jan. 1974) 60–72. **117.**

Hufstader, Anselm. 'Lefèvre d'Etaples and the Magdalen,'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VI (1969) 31–60. **331.**

Hughes, Barnabas, 'The Private Library of Johan Scheubel, sixteenth century mathematician,' *Viator* III (1972) 417–32. **587.**

ed. and tr. *See* Regiomontanus.

Hughes, H. Stuart. *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 (New York, 1964). **117.**
Huizinga, Johan.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 (1920), in *Men and Ideas: Essays by Johan Huizinga*, tr. J. S. Holmes and H. van Marle (New York, 1966) 243–88. **165, 226.**
Humphreys, K. W. *The Book Provisions of the Medieval Friars 1215–1400* (Amsterdam, 1964). **12, 90, 622.**
Hunt, R. W. 'The Library of Robert Grosseteste,' *Robert Grosseteste: Scholar and Bishop*, ed. Daniel Callus (Oxford, 1955) chap. 4. **92.**
Hunter, G. K. 'Elizabethans and Foreigners,' *Shakespeare Survey 17* (Cambridge, 1964) 37–52. **513.**
Huppert, George.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Urbana, 1970). **400.**
'The Renaissance Background of Historicism,' *History and Theory* v (1966) 48–60. **201.**
Hutchinson, G. Evelyn. 'Aposematic Insects and the Master of the Brussels Initials,' *American Scientist* (March–April 1974) 161–71. **264.**
Hutt, Allen. 'The Gothic Title-piece and the English Newspaper,' *Alphabet and Image* 3 (1946) 3–20. **207.**
Hyma, Albert. *The Christian Renaissance: A History of the 'Devotio Moderna'* (Grand Rapids, Mich., 1924). **175.**

Inalcik, Halil.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tr. N. Itzkowitz and C. Imber (London, 1973). **335.**
Individu et Société à la Renaissanc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April 1965) (Brussels, 1967). **104, 229.** Includes article by Gilissen, J.; Mesnard, P.; and correspondence of Gilissen and Masai.
Innis, Harold.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1951).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1950). **114, 171.**
Irwin, Raymond. Introduction, *The English Library Before 1700*, ed. Francis Wormald and C. E. Wright (London, 1958) 1–14. **13.**
Iserloh, Erwin. *The Theses Were Not Posted* (London, 1968). **306.**
Issawi, Charles. 'Arab Geography and the Circumnavigation of Africa,' *Osiris* x (1952). **482.**
Itinerarium Italicum (in Honor of P. O. Kristeller) ed. H. Oberman (Leiden, 1975). Includes article by Gilmore, M.
Iversen, Erik. *The Myth of Egypt and its Hieroglyphs in European Tradition* (Copenhagen, 1961). **279–80, 282.**
Ivins, Jr., William M. *Prints and Books: Informal Papers* (Cambridge, Mass., 1926). **86.**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1953). **53–4, 85–6, 108, 259, 262–3, 266–7.**
Three Vesalian Essays (New York, 1952). **485.**
Ivy, G. S.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Manuscript-Book,' *The English Library before 1700*, ed. Francis Wormald and C. E. Wright (London, 1953) 32–65. **14, 94.**

Jack, Mary Ann. 'The *Accademia del Disegno* in Late Renaissance Florenc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II (Oct. 1976) 3–21. **253.**
Jackson, Sydney L. 'Printed Books and the Mass Media: Some Sixteenth Century Views,' *Libri: International Library Review* (Copenhagen, 1968) vol. 18, 35–50. **348, 416.**

Jacob, E. F.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99–1485*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1961). **62, 134.**

Jacob, Margaret C. *The Newtonian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9–1720* (Ithaca, N.Y., 1976). **142.**

'Clandestine Culture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forthcoming in Festschrift to Henry Guerlac. **143.**

'Early Newtonianism,' *History of Science* 12 (June 1974) 142–6. **638.**

Janowitz, Morris. *See* Berelson, Bernard.

Janson, H. W.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Early Renaissance Sculptur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 (Chapel Hill, N.C., 1971) 80–102. **187.**

Jarrott, C. A. L. 'Erasmus's Biblical Humanism,'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VII (1970) 119–52. **338, 368.**

Jeannin, Pierre. *Merchant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r. P. Fittingoff (New York, 1972). **62.**

Jedin, Herbert. *A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tr. E. Graf (2 vol. Edinburgh, 1961). **320, 343, 346.**

Jellema, D. W.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 (April 1970) 1143–4. **442.**

Johnson, Francis. *Astronomical Thought in Renaissance England* (2 vol., 1st edn, 1937, New York, 1968). **548, 582, 618.**

'Astronomical Textbook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cience, Medicine and History, Essays . . . In Honor of Charles Singer*, ed. E. A. Underwood, II (2 vol. Oxford, 1953) 284–302. **510, 590.**

Jones, D. R. 'Aids to the Study of the Bible, appendix I,'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520–30. **336.**

Jones, Richard Foster. *Ancients and Moderns: 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St Louis, Mo., 1961; 2nd edn, Berkeley, 1965). **289, 291, 473, 518, 668, 700.**

The Triumph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1953). **344, 360–1, 545.**

Josserand, Pierre. 'Les Bibliothèques,' *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 ed. C. Samaran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XI) (Paris, 1961) 1087–9. **10.**

Josten, C. H. 'A Translation of John Dee's "Monas Hieroglyphica" (Antwerp, 1564)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Ambix* (Double issue) XII (1964) 84–221 **97, 137.**

Jowett, Garth S. 'Toward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History* II (Summer 1975) 34–7. **39.**

Julia, D. *See* Chartier, R.

Kafker, Frank. '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 leading French Bookseller-Printer: André François Le Breton, Chief Publisher of the Encyclopédie,' *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 ed. R. C. Rosbottom, v (Madison, Wis., 1976) 371–85. **143.**

Kagan, Richard. *Student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Spain* (Baltimore, 1974). **396, 398.**

Kamen, Henry. *The Rise of Toleration* (New York, 1967). **442.**

Kaplow, Jeffry.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Jan. 1967) 497–502. **390.**

Karpinski, L. C. and Staubach, C. N. 'An Anglo Norman Algorism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sis* XXIII (1935) 121–52. **467.**

Katzman, Natan.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mis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4 (1974) 47–59. **39.**

Kearney, Hugh F. Introduction, *Origin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History) (London, 1966). **683.**

'Puritanism and Scienc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Past and Present* 29 (July 1965) 104–10. **643, 646, 661, 664.**

'Puritanism, Capitalism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28 (July 1964) 81–101. **688.**

Keele, K. D. 'Leonardo da Vinci's Influence on Renaissance Anatomy,' *Medical History* VIII (1964) 360–70. **551.**

Keller, Alexander G. '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 and the Growth of the Idea of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cienc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the Renaissance*, ed. Alan Debus (New York, 1974) 11–27. **20, 27, 261.**

'A Renaissance Humanist Looks at "New" Inventions: The Article "Horlogium" in Giovanni Tortelli's *De Orthographia*,'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1 (1970) 345–65. **20, 252.**

'Zilsel, The Artisans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the Renaissance,' *Roots of Scientific Thought*, ed. Wiener and Noland (New York, 1957) 281–6. **558, 561.**

ed. *See* Besson, Jacques.

Kellett, C. E. 'Two Anatomies,' *Medical History* VIII (Oct. 1964) 342–50. **567.**

Kelley, Donald R.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New York, 1970). **103–4, 189, 191, 195, 201, 218.**

'Faces in Clio's Mirro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 (Dec. 1975) 679–90. **218.**

'Martyrs, Myths and the Massacre: The Background of St. Bartholom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 (Dec. 1972) 1323–42. **133.**

Kemp, Martin. 'Dissection and Divinity in Leonardo's Late Anatomie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V (1972) 200–25. **565–6.**

'A Drawing for the De Fabrica and some thoughts upon the Vesalius Muscle-Men,' *Medical History* XIV (July 1970) 277–88. **267.**

'"Il Concetto dell'Anima," in Leonardo's Early Skull Studie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IV (1971) 115–34. **251, 473, 565.**

Kemsley, Douglas S. 'Religious Influences in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Annals of Science* XXIV (1968) 199–226. **696.**

Kenney, E. J. *The Classical Text: Aspects of Editing in the Age of the Printed Book* (Berkeley, Calif., 1974). **81, 108, 113, 209, 338.**

Kent, John. *See* Daniélou, J.

Kenyon, Frederick G. *Books and Read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Oxford, 1951). **15, 22, 334.**

Kermode, Frank. 'Between Two Galaxies,' *Encounter* 113 (Feb. 1963) 76–82. **x.**

Keuning, J. *Willem Jansz. Blaeu*, rev. and ed. M. Donkerslootde Vrij (Amsterdam, 1973). **480, 663.**

Khan, M. S. 'The Early Bengali Printed Books,' *Gutenberg-Jahrbuch* (1966) 200–8. **317.**

Kimble, George H. T. *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38). **580.**

King, M. D. 'Reason, Tradition an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Science,' *History and Theory* 10 (1971) 3–32. **459.**

Kingdon, Robert M. *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France 1555–1563* (Geneva, 1956). **353, 402, 410.**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Printers Henri and François Estienne,'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ed. H. Meylan (Geneva, 1957) 258–75. **75, 406, 441.**

'Christopher Plantin and His Backers 1575–1590: A Study in the Problems of Financing Business during War,' *Mélang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Hommage à Antony Babel* (Geneva, 1963) 303–16. **333, 383, 441.**

'Patronage, Piety and Printing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A Festschrift for Frederick Artz*, ed. D. Pinkney and T. Ropp (Durham, N.C., 1964) 19–36. **118, 179, 313, 330, 352, 390, 441, 443.**

'The Plantin Breviaries: A Case Study . . .'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1960) 133–50. **118, 441, 445, 447.**

'Reactions to the St. Bartholomew Massacres in Geneva and Rome,'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Reappraisals and Documents*, ed. Alfred Soman (The Hague, 1974) 25–49. **420.**

Book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 (June, 1970) 1481. **411.**

Review of J. G. C. A. Briel's *Zuidnederlandse boekdrukkers en boekverkopers*, *The Library Quarterly* 46 (April 1976) 210–11. **414.**

Kinser, Samuel. 'Ideas of Temporal Change and Cultural Process in France 1470–1535,'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ed. A. Molho and J. Tedeschi (DeKalb, Ill., 1971) 703–57. **21, 185, 321, 561.**

Kirsop, Wallace. 'The Family of Love in Franc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III (1964–65) 103–18. **443.**

Kittelson, J. M. 'Wolfgang Capito, the Council, and Reform Strasburg,'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63 (1972) 126–40. **372.**

Kitzinger, Ernst. Review of Ladner's *Ad Imaginem Dei: The Image of Man in Medieval Art*, *Speculum* XLIII (April 1968) 355–9. **298.**

Klaits, Joseph. *Printed Propaganda under Louis XIV* (Princeton, New Jersey, 1976). **30, 135.**

Klebs, Arnold. 'Incunabula Scientifica et Medica: Short Title List,' *Osiris* IV (1938) 1–359. **508.**

Klibansky, R. and Paton, H. J., eds. *Philosophy and History: The Ernst Cassirer Festschrift* (New York, 1963). Includes articles by Bréhier, E.; Saxl, F.

Kline, Michael B. 'Rabelais and the Age of Printing,' *Etudes Rabelaisiennes IV; Travaux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LX (Geneva, 1963) vol. 60, 1–59. **121, 401, 457, 535, 568.**

Kline, Morris.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Oxford, 1953, reprinted 1968). **576.**

Knecht, R. J. '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 A Comparison,' *History* 57 (1972) 1–16. **349.**

Knowles, David.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 (New York, 1964). **314.**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3 vol. Cambridge, 1948–50). **22.**

Koeman, Ira C. *Joan Blaeu and His Grand Atlas* (Amsterdam, 1970). **480.**

The Sea on Paper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msterdam, n.d.). **503.**

Koenigsberger, H. C. *See* Elliott, J. H.

Koestler, Arthur. *Act of Creation* (New York, 1966). **75.**

The Sleepwalkers (London, 1959). **509, 589, 614–15, 617–18, 620, 623–4, 626–8, 634, 647, 676, 678.**

Kohn, Hans.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1944). **359.**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New York, 1955). **359.**

Kooiman, Willem Jan. *Luther and the Bible* (Philadelphia, 1961). **367.**
Kort, J. de. 'Astronom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Pontificia Academia Scientarium, Acta* XIII 4, 55–62. **606.**
Kortepeter, Max. 'German Zeitung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diting Sixteenth Century Texts*, ed. R. J. Schoeck (Toronto, 1966) 113–29. **307.**
Koyré, Alexandre.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altimore, 1957). **219, 458, 468, 681.**
La Révolution Astronomique: Copernic, Kepler, Borelli (Paris, 1961). **651, 673.**
Krailsheimer, A. J. *Rabelais and the Franciscans* (Oxford, 1963). **365, 394.**
Kraus, M. J. 'Patronage and Reform in the France of the Prereforme: The Case of Clichtov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VI (March 1971) 45–73. **400.**
Krautheimer, Richard. 'Alberti's Templum Etruscum' (1961), *Studies in Early Christia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rt* (New York, 1969) 333–45. **551.**
'The Beginnings of Art Historical Writing in Italy' (1929), *Studies in Early Christia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rt* (New York, 1969) 257–75. **232.**
Krautheimer, Richard and Krautheimer-Hess, T. *Lorenzo Ghiberti* (Princeton, 1956). **232.**
Kreutz, B. M. 'Mediterranean Contributions to the Medieval Mariner's Compas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XIV (1973) 367–83. **554.**
Krinsky, Carol H. 'Seventy-eight Vitruvius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 (1967) 36–70. **211, 469.**
Kristeller, Paul. *Early Florentine Woodcuts* (London, 1897). **86.**
Kristeller, Paul Oskar. *Iter Italicum: A Finding List of Uncatalogued Humanistic Mss* (2 vol. London and Leiden, 1963–67). I, preface, xi–xxviii. **47, 171.**
Latin Manuscript Books before 1600 (New York, 1965). **47.**
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a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72). **548.**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 (New York, 1961). **47, 174, 183, 188, 208, 210–11, 213, 218, 222.**
Le Thomisme et la Pensée Italienne de la Renaissance (Montreal, 1967). **314.**
'Bartolomeo Facio and his Unknown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ed. C. H. Carter (New York, 1965) 51–65. **233.**
'The Contribution of Religious Orders to Thought and Learning,' *Medieval Aspects of Renaissance Learning: Three Essays*, ed. E. P. Mahoney (Durham, N.C., 1974) 95–159. **15, 46, 94.**
'The European Diffusion of Italian Humanism,' *Renaissance Thought II* (New York, 1965) 69–89. **177.**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Renaissance Thought II* (New York, 1965) 163–228. **251, 253.**
Krivatsky, Nati H. 'Herbert of Cherbury's "De Veritate" (1633) Given to Leiden Professor by English Pupil,' *Quaerendo* VI (1976) 197–9. **644.**
Kronenberg, M. E. 'Forged Addresses in Low Country Book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ation,' *The Library*, 5th ser. II (1947) 81–94. **138.**
Kruitwagen, B. 'Het Schrijven op Feestdagen in de Middeleuwen,' *Tijdschrift voor boek en bibliotheek wezen* V (1907) 97–120. **59.**
Kubler, George. *The Shape of Time* (New Haven, Conn., 1962). **255.**
Kuhn, Sherman. 'The Preface to a Fifteenth Century Concordance,' *Speculum* XLIII. (April 1968) 258–73. **90.**
Review of Daly's *Contributions*, *Speculum* XLVII (1972) 300–3. **90.**

Kuhn, Thomas S.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Cambridge, Mass., 1957). **113, 466, 512, 579–80, 592, 594–6, 598, 603–4, 609, 614–15.**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rev. edn, Chicago, 1970). **189, 459, 461, 500, 597, 603, 605, 630.**

'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in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Isis* 52 (1961) 161–93. **470, 605.**

'Scienc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ed. D. L. Sills, XIV (Chicago, 1968) 74–83. **459.**

Kuhns, William. *The Post-Industrial Prophets: Interpretations of Technology* (New York, 1971). **41.**

Kulstein, David.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the Press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Gazet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Mass Communications Studies* X (1964) 125–44. **150.**

Kurz, Otto. 'The Medical Illustrations of the Wellcome 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 (1942) 137–42. **267.**

Labarre, A. 'Un Atelier Mayençais d'Enluminure vers 1450–1500,' *Revue Français d'Histoire du Livre* IV (1974) 127–31. **54.**

Labrousse, Elisabeth. *Pierre Bayle* (2 vol. The Hague, 1963). **420.**

Lancaster, A. *See* Houzeau, J. C.

Langford, Jerome. *Galileo, Science and the Church* (rev. edn, Ann Arbor, Mich., 1971). **653, 672–3, 676.**

Larner, Joh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 1290–1420* (New York, 1971). **232, 235.**

Laslett, Peter. *The World We Have Lost* (New York, 1965). **425–6.**

'Philippe Ariès and "La Famille",' *Encounter* (March 1976) 80–3. **131.**

Le Cinquième Centenaire de l'Imprimerie dans les Anciens Pays-Bas, catalogue of exhibition held in the Royal Library of Brussels (Sept.–Oct. 1973) (Brussels, 1973). **59.**

Le Livre (Catalogue of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xhibition) (Paris, 1972). **374.**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Les Paysans de Lanquedoc* (2 vol. Paris, 1966). **311, 415.**

Leavis, Q. D.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1939). **150, 352.**

Lecler, Joseph. *Toleration and the Reformation*, tr. T. L. Westow (2 vol. London, 1955). **442.**

Leclercq, Jean. *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 tr. C. Misrahi (New York, 1962). **297, 317, 456–7.**

Lee, Rensselaer W. *Ut Pictura Poesis: The Humanistic Theory of Painting* (rev. edn, New York, 1967). **254, 256.**

Lee, Sidney. *The French Renaissance in England* (Oxford, 1910). **349.**

Leff, Gordon. *Heres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The Relation of Heterodoxy to Dissent c. 1250–1450* (2 vol. Manchester, 1967). **311.**

Lehmann-Haupt, Hellmut. *Gutenberg and the Master of the Playing Cards* (New Haven, 1966). **54.**

Peter Schoeffer of Gernsheim and Mainz (Rochester, New York, 1950). **13, 51–2, 55, 58–9, 206.**

'The Heritage of the Manuscript,' *A History of the Printed Book*, ed. Lawrence C. Wroth (The Dolphin no. 3) (New York, 1938) 3–23. **13, 22, 263.**

Leith, James. *Media and Revolution* (Toronto, 1968). **326.**

Lenhart, John M. *Pre-Reformation Printed Books: A Study in Statistical and Applied Bibliography* (Franciscan Studies no. 14) (New York, 1935). **44, 38, 169.**
Lenkey, Susan V. 'Printers' Wiv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 *Gutenberg-Jahrbuch* 1975, 331–6. **24, 87.**
Lenoble, R. *Mersenne ou la Naissance du Mécanisme* (Paris, 1943). **644.**
Lerner, Daniel. 'Toward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1963 essay), reprinte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Change*, ed. S. N. Eisenstadt (Boston, 1968). **414.**
Lerner, M. P. *See* Costabel, P.
Levy, Bernard S., ed.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Albany, New York, 1968). **175.**
Levy, F. J. 'The Making of Camden's Britannia,'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XVI (1964) 70–97. **110.**
Lewis, C. S. *The Discarded Imag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1st edn, 1964; Cambridge, 1974). **93.**
Lewis, John. *Anatomy of Printing* (London, 1970). **459.**
Leyden, William von. 'Antiquity and Author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IX (1958) 473–92. **191.**
Lievsay, J. L. *The Englishman's Italian Books 1550–1700* (Philadelphia, 1969). **417.**
Venetian Phoenix: Paolo Sarpi and some of His English friends 1606–1700 (Lawrence, Kansas, 1974). **412.**
'The Life of Erasmus by Beatus Rhenanus' (1540), in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Erasmus*, ed. and tr. John C. Olin (New York, 1965) 31–55. **180.**
Lilley, S. 'Robert Recorde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II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1958) 3–38. **559–60.**
Lindberg, D. C. 'The Theory of Pinhole Images in the 14th Century,'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Exact Sciences* VI (1970) 299–325. **506.**
tr. and ed. *John Pecham and the Science of Optics: Perspectiva Communis* (Madison, Wis., 1970). **551, 590.**
Ling, Wang. *See* Needham, J.
Little, Lester K. *See* Rosenwein, B. H.
Littleton, A. C. and Yamey, B. S., ed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London, 1956). Includes articles by Roover, Raymond de; Taylor, R. E.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2 vol. Paris, 1965). **29.**
Loodes, D. 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ensorship in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London, 1974) vol. 24, 5th ser., 141–57. **311.**
Lockwood, W. B. 'Vernacular Scriptures in Germany and the Low Countries before 1500,'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415–36. **346.**
Loewe, Raphael.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Latin Vulgat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328–9, 334.**
Lohne, J. A. 'Isaac Newton: The Rise of a Scientist 1661–1671,'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 (Dec. 1965) 125–39. **634.**
Loomis, L. H. 'The Auchinleck Manuscript and a Possible London Bookshop of 1330–1340,'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57 (1942), 595–627, **13.**

Lopez, Robert. 'Hard Times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 *The Renaissance: Six Essays* (New York, 1962) 29–55. **21.**

Lough, John. *Essays on the Encyclopédie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 (Oxford, 1968). **147.**

An Introduction to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60). **155, 395.**

Louis Philippe. *Mémoires de Louis Philippe* (2 vol. Paris. 1973). **19.**

Lovejoy, A. O.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ss., 1948). **215.**

Lowinsky, Edward. 'Music in 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X (1954) 509–53. **249.**

'Music of the Renaissance as Viewed by Renaissance Musicians,'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Man and the World*, ed. B. O'Kelly (Columbus, Ohio, 1966) 129–77. **249.**

Lowry, M. J. C. 'The "New Academy" of Aldus Manutius,'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58 (Spring 1976) 378–420. **222.**

'Two Great Venetian Libraries in the Age of Aldus Manutius,'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57 (Autumn 1974) 128–66. **222, 586.**

Luethy, Herbert. *From Calvin to Rousseau*, tr. S. Attanasio (New York, 1970). **403, 421.**

Luther, Martin. '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in the Matter of Images and Sacraments' (1525), *Luther's Works*, ed. C. Bergendorff and H. T. Lehmann, XL (Philadelphia, 1958) 99–100. **68.**

Lutz, Cora E. 'Manuscripts Copied from Printed Books,' *Essays on Manuscripts and Rare Books* (Hamden, Conn., 1975) 129–39. **51, 52.**

MacCaffrey, W. T. 'Elizabethan Politics: The First Decade 1558–1568,' *Past and Present* 24 (April 1963) 25–43. **395.**

McColley, Grant, Introduction, *The Defense of Galileo of Thomas Campanella*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XXII) (Northampton, Mass., 1937). **668.**

'The Debt of Bishop John Wilkins to the "Apologia Pro Galileo",' *Annals of Science* IV (April 1939) 150–69. **668.**

McConica, James K. *English Humanists and Reformation Politics Under Henry VIII and Edward VI* (Oxford, 1965). **331.**

McDonald, E. E. 'The Modernizing of Communication: Vernacular Publish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Maharashtra,' *Asian Survey* VIII (July 1968) 589–607. **317.**

McGuire, J. E. and Rattansi, P. M. 'Newton and the "Pipes of Pan",'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21 (Dec. 1966) 108–43. **286, 572, 641.**

McIlwain, Charles. 'Medieval Instit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 ed. Warren Hollister (New York, 1969) 72–81. **513.**

McKenzie, D. F. 'Printers of the Mind: Some Notes on Bibliographical Theories and Printing House Practices,'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XXII (Charlottesville, Va., 1969) 1–75. **11, 56, 393.**

McKerrow, R. B. 'Booksellers, Printers, and the Stationers Trade,' *Shakespeare's England* II (2 vol. Oxford, 1916) chap. 23, 212–39. **120.**

MacKinney, Loren. *Medical Illustrations in Medieval Manuscripts* (London, 1965).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McLaughlin, Mary M. 'Survivors and Surrogates: Children and Parents from the Ni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ed. Lloyd de Mause (New York, 1974) 101–83. **431.**

McLean, Antonia. *Humanism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in Tudor England* (London, 1972). **34, 35, 454, 511, 554.**
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al Man* (Toronto, 1962). **16, 35, 122, 129, 151, 159, 186, 258.**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1965). **16, 159.**
McManners, John. *French Ecclesiastical Society under the Ancien Regime* (Manchester, 1960). **398.**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New York, 1970). **352.**
McMullin, Ernan, ed. *Galileo, Man of Science* (New York, 1967). Includes articles by Bedini, S. A.; Boyer, Carl.
McMurtrie, Douglas. *The Book* (Oxford, 1943). **7, 167, 375–6.**
McNair, Philip. *Peter Martyr in Italy: An Anatomy of Apostasy* (Oxford, 1967). **348.**
McNally, R. L. 'The Ninety-five Theses of Martin Luther,' *Theological Studies* XXVIII (1967) 439–80. **306.**
McPherson, David. 'A Possible Origin for Mopsa in Sidney's Arcadia,'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I (Winter 1968) 420–9. **259–60.**
Maas, Clifford. 'German Printers and the German Community in Renaissance Rome,' *The Library*, 5th ser. XXXI (June 1976) 118–26. **398.**
Machiavelli, Bernardo. *Libro di Ricordi*, ed. C. Olschki (Florence, 1954). **100.**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Discours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tr. Leslie J. Walker (1950)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C. H. Clough (2 vol. London, 1975). **100.**
Maddison, F. R. *See* Bedini, S. A.
Mahoney, Michael S. *The Mathematical Career of Pierre de Fermat (1601–1665)* (Princeton, N.J., 1973). **530, 532, 537, 552, 554.**
Major, J. Russell. 'Crown and Aristocracy in Renaissance Fra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X (April 1964) 631–45. **395.**
Malgaigne, J. F. *Surgery and Ambrose Paré*, tr. W. B. Hamby (Norman, Okla., 1965). **538.**
'The Man Behind the Serm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Feb. 27, 1964) 175. **337.**
Mandrou, Robert. *De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La Bibliothèque Bleue de Troyes* (Paris, 1964). **130.**
'Le Livre: Ce Ferment,'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I (1971) 1–9. **29.**
'La Transmission de l'Hérésie à l'époque moderne,' *Hérésies et Sociétés dans l'Europe pré-industrielle, 11e–18e Siècles* (Colloque de Royaumont, 1962) ed. Jacques Le Goff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10) (The Hague, 1968) 281–9. **311.**
Mann, E. L. 'The Problem of Originality i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1750–1800,' *Philological Quarterly* XVIII (1939) 97–118. **192.**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ed. and tr. E. Manheim (Oxford, 1956). **18, 154.**
Manuel, Frank.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fronts the Gods* (Cambridge, Mass., 1959) **282–3.**
Isaac Newton Historian (Cambridge, 1963). **611, 626.**
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 (Cambridge, Mass., 1968). **283, 459, 555, 626–7, 633–4, 663, 679.**
Mardersteig, Giovanni.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a Book Made in Padua in 1477*, tr. H. Schmoller (London, 1967). **56.**
Margolin, Jean-Claude. 'La Réalité Sociale dans l'Univers d'Albert Dürer,' *Individualisme et Société* (Brussels Colloquium) 215–56. **247–8.**

Marinoni, Augusto. Book review, *Technology and Culture* XIII (1972) 301–9. **566.**
Marks, Richard B. *The Medieval Manuscript Library of the Charterhouse of Saint Barbara in Cologne* (*Analecta Cartusiana* vol. 21–2) (Salzburg, 1974). **15.**
'The Scriptorium and Library of St. Barbara's Cologne,' lecture at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July 9, 1974. **379.**
'The Significance of Fifteenth-Century Hand Corrections in the Düsseldorf Exemplars of Some of Therhoernen's editions of the Works of Werner Rolevinck,' *Gutenberg-Jahrbuch* (1977) 49–56. **316.**
Marrou, H. I.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tr. George Lamb (1st edn, 1948; New York, 1956). **422.**
Marsak, L. M., ed. *The Rise of Science in Relation to Society* (New York, 1964). **493.**
Martin, H.-J.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2 vol. Geneva, 1969). **5, 135, 315, 333, 337, 349–50, 397, 408, 411, 414, 420, 646, 663, 680.**
See also Febvre, Lucien.
Masai, François. *See* Gilissen, John.
Maslen, K. I. D. and Gerritsen, John. Correspondence, *The Library* XXX (June 1975) 81–94, 134–6. **56.**
Mason, S. 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nals of Science* IX (1953) 64–88. **641.**
Mathias, Peter. 'Who Unbound Prometheus?' *Science and Society 1600–1900*, ed. P. Mathias (Cambridge, 1972) 54–81. **554.**
ed. *Science and Society 1600–1900* (Cambridge, 1972). Includes articles by Mathias, P.; Rattansi, P. M.
Maunsell, Andrew. *Three Part Catalogue of English Printed Bookes* (London, 1595). **106, 107.**
Mayer, C. A. 'The Problem of Dolet's Evangelical Publications,'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VII (1955) 405–14.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Mayor, A. Hyatt. *Prints and People* (New York, 1971). **489, 549, 588, 616.**
Mazlish, Bruce. *See* Bronowski, Jacob.
Mehl, James V. 'Ortwin Gratius: Cologne Humanis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Mo., 1975). **206.**
Meiss, Millard. *Painting in Florence and Siena After the Black Death* (Princeton, N.J., 1951). **297.**
Menninger, Karl. *Number Words and Number Symbols: A Cultural History of Numbers*, tr. Paul Broneer (rev. edn, Cambridge, Mass., 1969). **382.**
Menzel, Donald. Introduction to Pasquale D'Elia, *Galileo in China: Relations between Galileo and the Jesuit-Scientist-Missionaries 1610–1640*, tr. R. Suter and M. Sciascia (Cambridge, Mass., 1960). **648.**
Mersenne, Marin. *Les Nouvelles Pensées de Galilée*, ed. and introduction by P. Costabel and M.-P. Lerner (2 vol. Paris, 1973). **645.**
Merton, Robert K.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Shandean Postscript* (New York, 1965). **121–2.**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rev. edn offset reprint, New York, 1970). **459–60, 478, 641, 661, 679.**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hicago, 1973). **506.**
Merton, Robert K. and Zuckerman, H.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Institutionalis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 *Minerva* 9 (1971) 63–102. **461–2, 667.**

Mesnard, Pierre. 'Le Commerce Epistolaire comme Expression Sociale de l'Individualisme Humaniste,' *Individu et Société à la Renaissance: Colloque International-1965* (Brussels, 1967) 15–21. **228–9.**

Metzger, Bruce M.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xford, 1968). **338, 373.**

Meyer, Carl S., ed. *Luther for an Ecumenical Age: Essays* (St Louis, Mo., 1967). Includes articles by Bluhm, H.; Schweibert, E. G.

Meyer, R. W. *Leibniz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tr. J. P. Stern (Cambridge, 1952). **245.**

Meylan, Henri, ed.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Travaux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XVIII) (Geneva, 1957). **441.** Includes articles by Davis, N. Z.; Kingdon, R. M.

Michelangelo. *The Divine Michelangelo: The Florentine Academy's Homage on his Death in 1564* (a facsimile edition of the 'Esequie del Divino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Florence, 1564), introduction, tr., annot. Rudolf and Margot Wittkower (London, 1964). **254.**

Michelet, Jules. *Histoire de France: VII Renaissance* (16 vol.) (Oeuvres Complètes de J. M. 40 vol.) (Paris, Flammarion, 1893–99). **300.**

Middleton, W. E. K. *The Experimenters: A Study of the Accademia del Cimento* (Baltimore, 1971). **107, 665–6, 674.**

Milburn, R. L. P. 'The "People's" Bible: Artists and Commentator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280–308. **257, 355.**

Miller, C. William. *Benjamin Franklin's Philadelphia Printing 1728–1766: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Memoir: 102) (Philadelphia, 1974). **381.**

Miller, Edwin H. *The Professional Writer in Elizabethan England: A Study of Non Dramatic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1959). **137.**

Miller, P. J. 'Eighteenth Century Periodicals for Women,'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Fall 1971) 279–86. **134.**

Miner, Dorothy. *The Giant Bible of Mainz: 500th Anniversary: 4 April 1952.* Library of Congress Pamphlet, Washington, D.C. **82.**

Moeller, Bernd.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Three Essays*, tr. H. E. Midelfort and M. U. Edwards (Philadelphia, 1972). **366, 449.**

Mohl, Ruth. *The Three Estat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New York, 1933). **394.**

Molho, A. and Tedeschi, J. ed.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DeKalb, Ill., 1971). Includes articles by Gilbert, N.; Kinser, S.; Nauert, C.; Strauss, G.; Zimmerman, T. P.

Molnar, Thomas. *The Decline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1961). **153.**

Momigliano, Arnald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1950),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1966) 1–40. **186, 190, 218, 325.**

Mommsen, Theodor E.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s",' *Speculum* XVII (April 1942) 226–42. **185, 294–5, 298.**

Monfasani, John. *George of Trebizond: A Biography and a Study of His Rhetoric and Logic* (Columbia Studies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1) (Leiden, 1976). **399.**

Monter, E. William. *Calvin's Geneva* (New York, 1967). **410.**

'Chronique: Trois Historiens Actuels de la Sorcellerie,'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Travaux et Documents* XXXI (1969) 205–13. **436.**
Montgomery, J. W. 'Cross Constellation and Crucible,' *Ambix* XI, no. 2 (June 1963) 65–87. **650.**
Montgomery, R. L. 'William Caxt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Tudor Critical Thought,'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XXXVI (Feb. 1973) 91–103. **457.**
Moody, Ernest A. 'Galileo and his Precursors,' *Galileo Reappraised*, ed. C. L. Golino (Berkeley, Calif., 1966) 23–44. **498, 503–4.**
See also Clagett, M.
Moran, James. 'William Caxton and the Origins of English Publishing,' *Gutenberg-Jahrbuch* 63 (1967) 61–5. **112.**
Moranti, Luigi. *L'Arte Tipografia in Urbino* (Florence, 1967). **49.**
Morison, Samuel Eliot.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Boston, 1942). **583, 592, 610.**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Boston, 1969). **554.**
Vistas in History (New York, 1964). **x.**
Morison, Stanley. *Fra Luca Pacioli of Borgo San Sepolcro* (New York, 1933). **549.**
'The Learned Press as an Institution,' *Bibliotheca Docet: Festgabe für Carl Wehmer*, ed. S. Joost (Amsterdam, 1963) 153–79. **41, 340.**
Morley, Thomas. *A Plain and Easy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Music (1597)*, ed. R. A. Harman, foreword by Thurston Dart (London, 1952). **244.**
Mornet, Daniel.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1st edn, 1933; Paris, 1947). **148–9.**
Morris, Colin. *The Discovery of the Individual 1050–1200* (New York, 1973). **228.**
Moser, E. A., ed. *See Baroque and Rococo Pictorial Imagery.*
Mosher, Frederick. *See* Taylor, Archer.
Moule, H. T. *See* Darlowe, T. H.
Moxon, Joseph. *Mechanick Exercises on the Whole Art of Printing* (1683–4) ed. Herbert Davis and Harry Carter (London, 1962). **273, 625.**
Muir, P. *See* Carter, J.
Muller, Herbert. *Freedom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Dark Ages to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64). **467.**
Muller, J. A. *See* Gardiner, Stephen.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21, 151.**
Murray, Alexander. 'Religion among the Poor in thirteenth-century France,' *Traditio* XXX (1974) 287–324. **63.**
Musper, Heinrich T. 'Xylographic Books,' *The Book Through Five Thousand Years*, ed. H. D. L. Vervliet (Brussels, 1972) 341–8. **54.**
Myconius, Friedrich. Selection from *Historia Reformationis in The Reformation*, ed. and tr. Hans Hillerbrand (New York, 1964) 43–4. **306.**

Nagel, E. Commentary,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onference held at Madison, Wis., Sept. 1957) ed. M. Clagett (Madison, Wis., 1959) 153–61. **505.**
Nardi, Bruno. 'La scuola di Rialto' (1963), *Saggi sulla Cultura Veneta del quattro e cinquecento* (Padua, 1971) 93–139. **547.**
Nasr, S. 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 (New York, 1970). **463.**
Nauert, Charles G. *Agrippa and the Crisis of Renaissance Thought* (Urbana, Ill., 1965). **276**
'The Clash of Humanists and Scholastics: An Approach to Pre-Reformation. Controversie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IV (April 1973) 1–18. **308, 331.**

'Peter of Ravenna and the "Obscure Men" of Cologn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ed. A. Molho and J. Tedeschi (DeKalb, Ill., 1971) 609–40. **308, 331.**

Needham, J. and Ling, Wa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1954). **492.**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I.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Cambridge, 1959). **609.**

Nelson, Benjamin. 'The Early Modern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Fictionalism, Probabilism, Fideism, and Catholic "Prophetism",'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64/66*, ed. R. S. Cohen and M. W. Wartofsky (Dordrecht, Holland, 1968) 1–40. **672.**

'The Quest for Certitude,'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Copernican Symposiu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ed. Owen Gingerich (Washington, D.C., 1975) 363–72. **456.**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Beyond the Classics?*, ed. C. Glock and P. Hammond (Berkeley, Calif., 1974) 71–130. **378–9.**

Nesi, Emilia. *Il Diario della Stamperia di Ripoli* (Florence, 1903). **46.**

Newton, Isaac. *Sir Isaac Newton's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tr. A. Motte, 1729, appendix by Florian Cajori (Berkeley, Calif., 1934). **663.**

Niceron, Jean Pierre.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hommes illustres dans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43 vol. Paris, 1729–45). **139.**

Nichols, S. G., Jr. 'The Interaction of Life and Literature in the *Peregrinationes ad Loca Sancta* and the *Chansons de Geste*,' *Speculum* XLIV (Jan. 1969) 51–77. **599.**

Nicolson, Marjorie Hope. *The Breaking of the Circle* (New York, 1962). **219.**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Ithaca, N.Y., 1956). **653.**

'English Almanacs and the "New Astronomy",' *Annals of Science* IV (Jan. 1939) 1–33. **677.**

Nock, A. D. Introduction, *Corpus Hermeticum*, ed. A. D. Nock, tr. A. J. Festugière (4 vol. Paris, 1945). **283.**

North, D. C. and Paul, T. R.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 (2nd ser. 1970), 1–17. **30.**

North, John. 'Medieval Background,' *Copernicus: Yesterday and Today* (conference held in Washington, D.C., Dec. 27 and 28, 1972) *Vistas in Astronomy*, ed. A. Beer and K. A. Strand, 17 (Oxford, 1975) 3–16. **464.**

Norton, F. J. *Italian Printers 1501–1520* (London, 1958).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Printing in Spain 1501–1520 (Cambridge, 1966).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Nouvelles du Livre Ancien' (Fall, 1974) no. 1. **4.**

Nyhus, Paul L. 'Caspar Schatzgeyer and Conrad Pellican: The Triumph of Dissension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61 (1960) 179–204. **328, 331, 341.**

Oakeshott, Walter. 'Some Classical and Medieval Ideas in Renaissance Cosmography,' *Fritz Saxl Memorial Essays*, ed. D. J. Gordon (London, 1957) 245–60. **512.**

Oastler, C. L. *John Day, the Elizabethan Printer* (Oxford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 10) (Oxford, 1975). **360–1.**

Oberhuber, Konrad. Introduction to *Early Italian Engravings from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1973). **248, 254.**

O'Connell, Marvi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1559–1610* (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74). **314.**

Oestreich, G. 'Die Antike Literatur als Vorbild der Prakt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16 and 17 Jahrhundert,'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European Culture AD 1500–1700*, ed. R. R. Bolgar (Cambridge, 1976) 315–25. **194.**

Offenberg, Adri. 'The First Use of Hebrew in a Book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Quaerendo* IV (1974) 44–54. **613.**

Olin, John C., ed. and tr. *See* 'The Life of Erasmus by Beatus Rhenanus.'

Olschki, C., ed. *See* Machiavelli, Bernardo.

O'Malley, C. D.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 (Berkeley, Calif., 1964). **267, 570.**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In Memoriam,' *Medical History* VIII (Oct. 1964) 299–308. **573.**

See also Saunders and O'Malley.

Ong, Walter J., S.J.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New Haven, Conn., 1967). **41, 319.**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 (Cambridge, Mass., 1958). **41, 92, 102, 275, 430.**

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 (Ithaca, N.Y., 1971). **41, 92.**

'From Allegory to Diagram in the Renaissance Mind,'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XVII (June, 1959) 423–40. **92.**

'System Space and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Symbolism,'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VIII (1956) 222–40. **92.**

Ore, Oyestein. *Cardano: The Gambling Scholar* (Princeton, N.J., 1953). **236, 662.**

Origo, Iris. *The Merchant of Prato* (rev. edn, London, 1963). **483.**

Ornstein, Martha. *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1928). **460, 644, 667–8, 676.**

Orr, M. A. *Dante and the Early Astronomers* (London, 1913). **483, 512.**

Ortelius, Abraham. 'Message to the Reader,' *Theater of the Whole World* (London, 1606) (Facsimile edn, Antwerp: Theatrum Orbus Terrarum Ltd, 1968). **88, 193, 227.**

Osley, A. S., ed. *Calligraphy and Pale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A. J. Fairbank* (London, 1965). Includes articles by de la Mare, A.; Hofer, P.; Wolpe, B. L.

Overfield, James. 'A New Look at the Reuchlin Affair,'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VIII (1971) 165–207. **305.**

Owst, G. R. *Literature and Pulpit in Medieval England* (Oxford, 1966). **365.**

Ozment, Steven. *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 (New Haven, Conn., 1975). **318.**

Pächt, Otto. 'Early Italian Nature Studies and the Early Calendar Landscape,'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III (1950) 13–47. **82, 233, 264, 492.**

'Note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Origin of Humanist Book Decoration,' *Fritz Saxl Memorial Essays*, ed. D. J. Gordon (London, 1975) 184–94. **204.**

Pagel, Walter. *Paracelsus: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Medicine in the Era of the Renaissance* (Basel, 1958). **286, 539, 657.**

'News, Notes and Queries,' *Medical History* VIII (1964) 78–83. **550.**

'William Harvey: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Medic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II (1944) 144–53. **528.**

Pagel, W. and Rattansi, P. 'Vesalius and Paracelsus,' *Medical History* VIII (Oct. 1964) 309–34. **472, 570–1, 573.**

Painter, George D. *William Caxton: A Quincentenary Biography* (London, 1976). **38.**

Palmer, Robert R. *Catholics and Unbelievers in 18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1939). **325, 348.**

Palter, Robert. '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Early Astronom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 (1970) 93–133. **500, 603.**

Review of *Hypothesis and Perception* by E. E. Harris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3) 202–10. **268.**

ed. *Jóhannes Kepler 1571–1630*, Catalogue of Exhibition held Nov.–Jan. 1971–2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71). **611, 630.**

Pannekoek, A. *A History of Astronomy*, tr. from Dutch (1st edn, 1951; London, 1961). **463, 583, 609.**

Panofsky, Erwin. *Albrecht Dürer* (2 vol., Princeton, 1945). **176, 197, 205, 248, 280.**

The Life and Art of Albrecht Dürer (1 vol. rev. edn, Princeton, N.J., 1955). **548, 549, 560.**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Papers in and on Art History (New York, 1955). **188, 196.**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in Western Art (Uppsala, 1960). **165, 181–3, 186–7, 193–4, 200–2, 213, 215, 218, 258, 270, 293–4, 296.**

Studies in Iconology (New York, 1939). **186, 188, 196.**

'Artist, Scientist, Genius: Notes on the "Renaissance-Dämmerung",' *The Renaissance: Six Essays* (New York, 1962) chap. 6. **238–40, 249, 251, 267, 269–70, 284.**

'Erasmus and the Visual Art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II (1964) 200–27. **174, 176, 295.**

Parent, Annie. *Les Métiers du Livre à Paris au XVIe Siècle (1535–1560)* (Geneva, 1974). **55–6, 60, 87, 540, 544.**

Parker, Anthony. 'The Difficult Publishing Art of Persuading Scientists to Sit Down and Write Book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7, 1971) 813–14. **461.**

Parkes, Malcolm B.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s of Ordinatio and Compilatio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Medieval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Essays Presented to R. W. Hunt* (Oxford, 1976) 115–45. **92.**

'The Literacy of the Laity,' *The Medieval World*, ed. D. Daiches and A. Thorlby (*Literatur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 II) (London, 1972–6) 555–76. **62.**

Parsons, Edward. *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msterdam, 1952). **465.**

Paton, H. J. *See* Klibansky, R.

Pattison, Mark, *Isaac Casaubon 1559–1614* (2nd edn, Oxford, 1892). **73, 222.**

Paul, T. R. *See* North, D. C.

Paulus, Nikolaus. *Indulgences as a Social Factor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2). **376.**

Pedersen, Olaf. 'The Life and Work of Peter Nightingale,' *Vistas in Astronomy* 9 (ed. A. Beer) (1967) 3–11. **607.**

Penrose, Boies.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 (New York, 1962). **74, 483, 512, 514–15.**

Peters, Edward M. 'Editing Inquisitors' Manuals in the 16th Century . . .' *The Library Chronicl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XL (Winter 1974) 95–107. **87.**

Petrucelli, R. J. 'Giorgio Vasari's Attribution of the Vesalian Illustrations to Jan Stephan of Calcar,' *Bulletin o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Baltimore) XLV (1971) 29–37. **233.**

Pettas, William. 'The Cost of Printing a Florentine Incunable,' *La Bibliofila* LXXV (1973) 67–85. **50.**

Peyre, Henri. 'The Influence of Eighteenth Century Idea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tellectual Movement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ed. Franklin L. Baumer (*Main Themes in European History*, ed. B. Mazlish) (New York, 1965) 63–85. **148.**

Pfeiffer, Rudol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Oxford, 1968). **22, 465.**

Philip, Alexander. *The Calendar: Its History, 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Cambridge, 1921). **608, 610.**

Phillips, W. A. 'Faus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X (28 vol. 11 edn, London, 1910–11) 210–11. **50.**

Pintard, René. *Le Libertinage Erudi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2 vol. Paris, 1943). **644.**

Plant, Marjorie. *The English Book Trade* (London, 1939).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Plumb, J. H. 'The Public,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Emergence of Leisure*, ed. M. M. Marrus (New York, 1974) 11–37. **131.**

Pocock, J. G. A.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1957). **201, 224.**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1975). **189–90.**

Pollack, Michael.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oden Printing Press,' *Library Quarterly*, vol. 42 (April 1972) 218–64.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Production Costs in Fifteenth Century Printing,' *Library Quarterly* XXXIX (Oct. 1969) 318–30. Consulted but not cited.

Pollard, Graham. 'The University and the Book Trade in Medieval Oxford,' *Miscellanea Mediaevalia* III (Berlin, 1964) 336–46. **14.**

See also Ehrman, Albert.

'Pontiff says Media Lead Youth Astray,' *The Washington Post* (Tuesday, May 5, 1970) A14. **355.**

Poole, H. W. *See* Berry, W. T.

Popkin, Richard.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Descartes* (New York, 1964). **231, 326.**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ed. and tr. J. B. Ross and M. M. McLaughlin (New York, 1969). **27, 166, 217, 320, 393.**

Post, R. R. *The Modern Devotion: Confrontation with Reformation and Humanism* (Leiden, 1968). **16, 346.**

Potter, G. R. 'Zwingli and His Publisher,' *The Library Chronicle* XL (Winter 1974) 108–17. **99.**

Pottinger, David. *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the Ancien Regime 1500–1791* (Cambridge, Mass., 1958). **128, 145–7, 399.**

Poulle, E. *See* Hilliard, D.

Praz, Mario. *Stud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ery* (Rome, 1964). **280.**

Preus, R. *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Edinburgh, 1957). **319, 323, 326, 332.**

Price, Derek de Solla. *Science since Babylon* (enlarged edn, New Haven, 1975). **453–4.**

'The Book as a Scientific Instrument,' *Science* 158 (6 Oct. 1967) 102–4. **612, 691.**

'Gears from the Greeks: 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64 (Philadelphia, 1974) part 7, 1–70. **589.**

'Geometrical and Scientific Talismans,'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Joseph Needham*, ed. M. Teich and R. Young (London, 1973) 250–64. **55.**

ed. *See* Chaucer.

Price, Hereward T. 'Grammar and the Compositor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XXXVIII (1939) 540–8. **87.**
Price, J. L.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Dutch Republic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4). **646.**
'Printing and the Mind of Man,' Catalogue of Exhibition at the British Museum and Earl's Court July 16–27, 1963. **59.**
See also Hay, Denys.
Prior, Moody. 'Joseph Glanvill, Witchcraft and 17th Century Science,' *Modern Philology* 30 (1932–3) 167–93. **669.**
Proctor, Robert. *The Printing of Greek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00). **222.**
Proust, Jacques. *Diderot et l'Encyclopédie* (Paris, 1967). **262.**
Pullan, Brian.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Debates in Economic History*, ed. Peter Mathias) (London, 1968). **411.**
Putnam, G. H. *Authors and Their Public in Ancient Times* (New York, 1894). **22.**.
Books and Their Makers in the Middle Ages (2 vol. New York, 1896). **22.**
The Censorship of the Church of Rome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2 vol. New York, 1906). **347–8, 416.**

Quinn, David B.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 (New York, 1974). **105.**
'The New Horizons of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Paper given at Conference on First Images of America, UCLA, Feb. 7, 1975,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 *First Images of America*, ed. F. Chiappelli (Berkeley, Calif., 1975). **120.**

Rabb, T. K. 'Debate, The Advent of Print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 *Past and Present* 52 (August 1971) 135–44. **101, 595.**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Past and Present* 31 (July 1965) 110–26. **647–50, 653, 658, 664.**
Ramus, Petrus. *Scholae in Liberales Artes*, introduction by W. J. Ong (facsimile edn of Basel, 1569, New York, 1970). **543.**
Randall, J. H.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Cambridge, Mass., 1926). **178, 496.**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Method at the School of Padua,'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 (1940) 177–206. **494, 496, 528.**
Raphael, D. D. 'Adam Smith and "The Infection of David Hume's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 (April–June 1969) 225–48. **393.**
Rapp, R. T. *Industry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enice* (Cambridge, Mass., 1976). **411.**
Rashdall, H.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ed. F. M. Powicke and A. B. Emden (3 vol. Oxford, 1936). **103.**
Rath, Erich von. 'The Spread of Print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Printed Book*, ed. Lawrence C. Worth (The Dolphin no. 3) (New York, 1938). 59–80. **37.**
Rath, Gernot. 'Charles Estienne: Contemporary of Vesalius,' *Medical History* VIII (Oct. 1964) 354–9. **502, 567.**
Rattansi, P. M. 'Alchemy and Natural Magic in Raleigh's "History of the world",' *Ambix* XIII (Oct. 1966) 122–38. **562–3, 669.**
'The Helmontian–Galenist Controvers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Ambix* XII (Feb. 1964) 1–24. **656.**
'Paracelsus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 *Ambix* XI (Feb. 1963) 24–33. **656, 681.**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cience and Society 1600–1900*, ed. Peter Mathias (Cambridge, 1972), 1–33. **74, 523, 668, 681.**

See also McGuire, J. E.

See also Pagel, W.

Ravetz, Jerome.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in the Achievement of Nicolaus Copernicus* (Warsaw-Krakow, 1965). **464, 580, 585, 605–7, 618.**

'The Origins of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15 (Oct. 1966) 92. **581.**

Ravitch, Norman. *Sword and Mitre: Government and Episcopate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Age of Aristocracy* (The Hague, 1966). **351.**

Réau, Louis. *L'Europ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L'Evolution de l'Humanité LXX) (Paris, 1938). **128.**

Redgrave, Gilbert R. *Erwin Ratdolt and His Work at Venice* (London: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Illustrated Monograph no. 1, 1894, rev. edn 1899). **587–8, 590.**

Reed, A. W. *Early Tudor Drama* (2 vol. London, 1962). **105, 362.**

Reed, Richard B.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The Me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ed. R. de Molen (New York, 1974) 295–325. **120.**

Reeds, Karen M.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Botany,' *Annals of Science* 33 (1976) 519–43. **485, 487.**

Regiomontanus. *Regiomontanus on Triangles*, tr. and ed. Barnabas Hughes (Madison, Wis., 1967). **583, 623.**

Reichmann, Felix. 'The Book Trade at the Time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Library Quarterly* VIII (1938) 40–76. **22, 334.**

Rekers, B. *Benito Arias Montano, 1527–1598* (Studies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 XXXIII) (London and Leiden, 1972). **332, 442, 444.**

The Renaissance: Six Essays (Metropolitan Museum Symposium, 1953) (New York, 1962). Includes articles by Bainton, R.; Lopez, R.; Panofsky, E.; Sarton, G.

Renaudet, Augustin. *Préréforme et Humanisme à Paris pendant les premières guerres d'Italie, 1494–1517* (rev. edn, Paris, 1953). **373, 399, 541.**

Renouard, Yves. *E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2 vol. Paris, 1968). **62.**

Reti, Ladislao. 'Leonardo and Ramelli,' *Technology and Culture* XIII (1972) 577–605. **565.**

'The Two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Leonardo da Vinci in the Biblioteca Nacional of Madrid – II,'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CX (Feb. 1968) 81–9. **551, 565.**

Reusch, Heinrich. *Der Index der Verbotenen Bücher* (3 vol. Bonn, 1885). **347.**

Rex, Walter E. 'Arche de Noé and Other Religious Articles by Abbé Mallet in the Encyclopédi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IX (Spring 1976) 333–53. **258.**

Reynolds, L. D. and Wilson, N. G. *Scribes and Scholars* (Oxford, 1968). **19, 22, 46, 52, 90.**

Rice, Eugene F., Jr. *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1460–1559* (Norton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ed. Felix Gilbert) (New York, 1970). **28, 325.**

'The Humanist Idea of Christian Antiquity: Lefèvre d'Etaples and his Circle,'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IX (1962) 126–42. **296–7.**

Richardson, Alan. 'The Rise of Modern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Recent Discuss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294–338. **339.**

Rickard, Peter. *La Langue Française au Seizième Siècle* (Cambridge, 1968). **316, 348, 360.**
Ripa, Cesare. *Iconologia* (Rome, 1603). **662.** *See Baroque and Rococo.*
Roberts, J. M. *The Mythology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New York, 1972). **149.**
Robertson, H. M. 'A Criticism of Max Weber and His School' (Excerpt from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in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The Weber Thesis and Its Critics*, ed. R. W. Green (Boston, 1969) 65–86. **382.**
Robinson, Arthur H. 'Map Making and Map Printing,' *Five Centuries of Map Printing*, e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1975) 1–25. **53.**
Robson, C. A. 'Vernacular Scriptures in Franc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436–52. **345.**
Rogers, D. M. *See* Allison, A. F.
Root, Robert K. 'Publication before Printing,'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XXVIII (1913) 417–31. **11, 319.**
Roover, Raymond de. 'Accounting Prior to Luca Pacioli,'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ed. A. C. Littleton and B. S. Yamey (London, 1956) 114–74. **384.**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 of the Plantin Press in the Setting of 16th century Antwerp,' *Gedenkboek der Plantin-Dagen 1555–1955* (Antwerp, 1956) 230–46, **383.**
Rosarivo, Raúl. 'Simbolos Alquimicos en Marcas Tipograficas del Siglo XV y XVI,' *Gutenberg-Jahrbuch* (1966) 310–14. **280.**
Rose, Paul Lawrenc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 Studies on Humanists and Mathematicians from Petrarch to Galileo* (Geneva, 1975). **123, 238, 247, 537, 542, 548, 580, 583, 586, 591, 624, 675.**
'The Accademia Venetiana: Science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Venice,' *Studi Veneziani* XI (1969) 191–242. **675.**.
'Humanist Culture and Renaissance Mathematics: The Italian Libraries of the Quattrocento,'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X (1973) 46–105. **499, 547, 586, 588, 596, 622.**
'Notes and Correspondence,' *Isis* 63 (1972) 88–93. **549.**
'Renaissance Italian Methods of Drawing the Ellipse . . . ' *Physis* XII (1970) 371–404. **561, 620.**
Rose, Paul Lawrence and Drake, Stillman. 'The Pseudo-Aristotelian "Questions of Mechanics" in Renaissance Culture,'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VIII (1971) 65–104. **545, 547.**
Rosen, Edward. ed. *Kepler's Somnium* (Madison, Wis., 1967). **481.**
The Naming of the Telescope (New York, 1947). **119.**
'Biography of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tr. and ed. Edward Rosen (3rd edn, New York, 1971) 313–409. **509, 576–8, 580, 591, 593, 599, 613–14, 617, 621, 650–2.**
'Calvin's Attitude Toward Copernicu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 (July 1960) 431–41. **655.**
'Copernicus's Attitude Toward the Common Peop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II (April–June 1971) 281–8. **576.**
'Copernicus,'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14 vol. New York, 1970) III 401–11.
'In Defense of Kepler,' *Aspects of the Renaissance*, ed. Archibald R. Lewis (Austin, Texas, 1967) 141–9. **461.**

'Galileo's Misstatements About Copernicus,' *Isis* 49 (1958) 319–30. **606.**
'The Invention of Eyeglass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XI (1956) 13–46, 183–218. **119, 123, 240, 546.**
'Renaissance Science as Seen by Burckhardt and His Successors,' *The Renaissance: A Reconsideration*, ed. T. Helton (Madison, Wis., 1964) 77–103. **494–5, 497–8, 501.**
Review of Thorndike's edition of Sacrobosco's 'Sphera,' *Isis* XXXX (1949) 257–64. **510, 512.**
'Was Copernicus a Hermetist?'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ed. R. H. Stuewer (Minnesota Studies v) (Minneapolis, Minn., 1970) 163–71. **595, 641.**
See also Hilfstein, Erna.
Rosenberg, Eleanor. *Leicester: Patron of Letters* (New York, 1955). **360.**
Rosenthal, Earl. 'The Renaiss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t,' *The Renaissance: A Reconsideration*, ed. T. Helton (Madison, Wis., 1964) 53–77. **260.**
Rosenwein, B. H. and Little, Lester K. 'Social Meaning in the Monastic and Mendicants Spiritualities,' *Past and Present* 63 (May, 1974) 4–33. **375.**
Ross, D. J. A. 'A Late Twelfth Century Artist's Pattern Sheet,'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V (1962) 119–28. **82.**
Ross, J. B. 'Venetian Schools and Teachers, Fourteenth to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XIX (1976) 521–60. **547.**
See also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Ross, Lillian. 'Our Far-Flung Correspondents: The Bible in Dinocittà, Rome, Sept. 15,' *The New Yorker* (Sept. 25, 1965) 197. **348.**
Ross, Richard P. 'Oronce Fine's *De Sinibus Libri II*,' *Isis* 66 (1975) 379–86. **544.**
'Studies on Oronce Fine (1494–1555),' Columbi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71. **544.**
Rossi, Paolo. *Francis Bacon: From Magic to Science*, tr. S. Rabinovich (Chicago, 1968). **272–4, 276, 285, 563.**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 S. Attansio, ed. Benjamin Nelson (1st Italian edn, 1962; New York, 1970). **241, 243, 469–70, 541, 553, 560, 568.**
'Hermeticism, Rationalit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ed. M. L. Bonelli Righini and W. R. Shea (New York, 1975) 247–83. **641.**
Rothkrug, Lionel. *Opposition to Louis XIV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5). **135.**
Rouse, Mary A. *See* Rouse, Richard H.
Rouse, Richard H. 'The Archeology of the Book,' Medieval Academy Summer Institute Lecture, Catholic University, 1974. **67.**
Rouse, Richard H. and Mary A. 'The Texts Called Lumen Anime,' *Archivum Fratrum Praedicatorum* XLI (1971) 4–113. **294, 456, 546.**
Rubinstein, Nicolai. 'Il Medioevo nella Storiagraphia Italiana della Rinascimento,' *Concetto, Storia Miti e Immagini del Medio Evo*, ed. Vittore Branca (Florence, 1973) 429–48. **191.**
Rud, Einar. *Vasari's Life and Lives*, tr. R. Spink (London, 1923). **233.**
Rupp, Gordon. *Luther's Progress to the Diet of Worms, 1521* (Chicago, 1951). **310.**

Russell, J. L. 'Kepler's Laws of Planetary Motion, 1609–1666,'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I (June 1964) 1–24. **503, 630–2.**

Sachs, W. *See* Furet, E.

Saenger, Paul. 'Colard M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ted Book,' *The Library Quarterly* 45 (Oct. 1975) 405–18. **37–8, 80.**

Sailor, Danton B. 'Moses and Atom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V (Jan.–March 1964) 3–16. **209.**

St John, N.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1967). **3.**

Santillana, Giorgio de. *The Age of Adventure* (New York, 1956). **165.**

The Crime of Galileo (Chicago, 1955). **644, 652, 677–8.**

Book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 (1965) 455. **279.**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Marshall Clagett (Madison, Wis., 1959) 33–66. **249, 589.**

Santillana, Giorgio de and Dechend, Hertha von. *Hamlet's Mill. An Essay on Myth and the Frame of Time* (Boston, 1969). **279.**

Sapori, Armando. *The Italian Merchant in the Middle Ages*, tr. P. A. Kennen (New York, 1970). **62, 385.**

Sarpi, Paolo. *Sarpi: History of Benefices and Selections from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ed. and tr. by Peter Burke (*The Great Histories*, ed. H. Trevor-Roper) (New York, 1967). **412–13.**

Sarton, George.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1450–1600* (New York, 1958, 2nd edn). **55, 69, 98–9, 171, 194, 454, 484, 486, 507–8, 511, 548, 624.**

Six Wings (Bloomington, Indiana, 1957). **20, 111, 234, 267, 454–5, 484, 488, 507–8, 538, 541, 545–6, 564–5, 567, 591, 606–7, 652.**

'The First Explanation of Decimal Fractions and Measures (1585),' *Isis* 23 (1935) 153–245. **241, 468, 500.**

'Incunabula Wrongly Dated,' *Sart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D. Stimson (Cambridge, Mass., 1962) 320–5. **106.**

'The Quest for Truth: Scientific Progres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he Renaissance: Six Essays* (New York, 1962) chap. 3. **27, 75, 79, 81, 113, 124, 454, 637.**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Incunabula,' *Osiris* 5 (1938) 62–8. **454, 508, 586, 588.**

'Simon Stevin of Bruges (1548–1620),' *Isis* 21 (1934) 241–303. **500.**

'The Study of Early Scientific Textbooks', *Sart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D. Stimson (Cambridge, Mass., 1962) 339–54. **508.**

'A Summing Up,' *Sart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D. Stimson (Cambridge, Mass., 1962) 367–70. **519.**

Saunders, J. B. and O'Malley, C. D. *The Illustrations from the Works of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Cleveland, Ohio, 1950). **535, 569.**

eds *Leonardo da Vinci on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1952). **267.**

Saunders, J. W. 'From Manuscript to Print: A Note on the Circulation of Poetic Manuscrip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Leed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Society* VI (May 1951) 507–28. **65.**

Sauvy, Anne. *Livres saisis à Paris entre 1678 et 1701* (The Hague, 1972). **680.**

Saxl, Fritz. 'A Spiritual Encyclopedia of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 (1942) 82–136. **92, 259.**

'Veritas Filia Temporis,' *Philosophy and History: The Ernst Cassirer Festschrift*, ed. R. Klibansky and H. J. Paton (New York, 1963) 197–222. **143.**

Sayce, R. A. 'French Version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347–52. **351–2.**

Sayili, Aydin. *The Observatory in Islam and its Place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Observatory* (Ankara: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Series) VII (1960). **463, 610.**

Schlegel, Dorothy. 'Freemasonry and the Encyclopédie Reconsidered,' *Studies i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90 (1972) 1433–60. **143.**

Schmidt, Herman A. P., S.J. *Liturgie et Langue Vulgaire: Le Problème de la Langue Liturgique chez les Premiers Réformateurs et au Concile de Trente* (Rome, 1950). **343–4, 348.**

Schmidt, Ph. *Die Illustration der Lutherbibel 1522–1700* (Basel, 1962). **68.**

Schmitt, Charles B. *A Critical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n Renaissance Aristotelianism 1958–1969* (Padua, 1971). **522.**

'Essay Review: A Fresh Look at Mechanics in 16th-Century Ital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 (1970–1). 161–75. **495, 522, 525, 546, 642.**

'The Faculty of Arts at Pisa at the Time of Galileo,' *Physis* XIV (1972) 243–72. **528.**

'Toward a Reassessment of Renaissance Aristotelianism,' *History of Science* XI (Sept. 1973) 159–94. **522.**

Book review, 'A Garin Compendium,' *Isis* 63 (Sept. 1972) 419–22. **667.**

Schmitt, Charles B. and Webster, C. 'Harvey and M. A. Severino: A Neglected Medical Relationship,'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XLV (1971) 49–75. **668.**

Schoeck, Richard J. 'Copernicus and Humanism,' paper given at a Folger Library Seminar, Spring 1974. **602.**

ed. *Editing Sixteenth Century Texts* (Toronto, 1966). Includes articles by Davis, N. Z.; Devereux, E. J.; Kortepeter, M.

Scholderer, V. *Fifty Essays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Bibliography* (Amsterdam, 1967). **204.**

Schücking, Levin L. *The Puritan Family*, tr. Brian Battershaw (London, 1969). **425, 433.**

Schwartz, W.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Biblical Translations: Some Reformation controversies and Their Background* (Cambridge, 1955). **278, 339, 357.**

Schweibert, Ernest C. *Luther and His Times* (St Louis, Mo., 1950). **221, 307.**

'New Groups and Idea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49 (1958) 60–78. **94.**

'The Theses and Wittenberg,' *Luther for an Ecumenical Age: Essays*, ed. C. S. Meyer (St Louis, Mo., 1967) 120–43. **308.**

Scott, Geoffrey.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aste* (London, 1924). **215.**

Scribner, R. W. 'The Social Thought of Erasmus,'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I (June 1970) 3–27. **372, 401.**

Seguin, J. P. *L'Information en France de Louis XII à Henri II* (Geneva, 1961). **135.**

Servetus, Michael. *Michael Servetus: A Translation of his Geographical, Medical, and Astrological Writing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 C. O'Malley (Philadelphia, 1963). **566.**

Settle, Thomas B. 'Borelli, Giovanni Alfonso, 1608–1679,'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14 vol. New York, 1970) II 306–13. **674.**

Seznec, Jean. *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 The Mythological Tradition and Its Place in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Art*, tr. B. F. Sessions (rev. edn, New York, 1961). **195–8, 214–15, 258.**

Shackleton, Robert. 'The Encyclopédie and Freemasonry,'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Studies Presented to Theodore Besterman* (St Andrews, 1967) 223–40. **143.**

Shapiro, Barbara. *John Wilkins, 1614–1672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Berkeley, 1969). **534, 555, 665.**

Shea, William. *Galileo'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Middle Period 1610–1632* (New York, 1972). **527.**

See also Bonelli Righini, M. L.

Shearman, John. *Mannerism* (Pelican Style and Civilization Series) (London, 1967). **231.**

Shelby, Lon R. 'The Education of Medieval English Master Masons,' *Medieval Studies* (Toronto) XXXII (1970) 1–26. **65, 253, 553.**

'The Geometrical Knowledge of Medieval Master Masons,' *Speculum* XLVII (July 1972) 395–421. **65, 253, 537.**

'The "Secret" of the Medieval Masons,' *On Pre-Moder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Studies in Honor of Lynn White, Jr.* (UCL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publication) (Malibu, Calif., 1976) 201–19. **272.**

Shenker, Israel. 'Books as an Art Form Through Five Centuri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0, 1973). **48.**

Sheppard, L. A. 'Printing at Devente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Library* XXIV 5th ser. (1944) 101–19. **16, 346.**

Shera, J. H. '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Library Science,' *The Foundations of Access to Knowledge: A Symposium*, ed. E. B. Montgomery (Syracuse, N.Y., 1968). **479.**

Sherman, Claire R. 'Some Visual Definitions in the Illustrations of Aristotle's *Nichomachean Ethics* and *Politics*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s of Nicole Oresme,' *The Art Bulletin* LIX (Sept. 1977) 320–30. **546.**

Sherrington, Charles. *The Endeavour of Jean Fernel* (Cambridge, 1946). **244, 249, 539, 540, 562, 567.**

Shipman, Joseph. 'Johannes Petreius, Nuremberg Publisher of Scientific Works, 1524–1550,' *Homage to a Bookman, Essays ... for Hans P. Kraus* (Berlin, 1967) 154–62. **587, 650.**

Shumaker, Wayne. *The Occult Sciences in the Renaissance* (Berkeley, 1972). **191, 281, 284–5, 287–8, 290.**

Siebert, Frederick S.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overnment Control* (Urbana, Ill., 1952). **120.**

Simone, Franco. *The French Renaissance*, tr. H. G. Hall (London, 1969). **294–5, 300.**

Simpson, Lewis. 'The Printer as a Man of Letters,' *The Oldest Revolutionary: Essays on Benjamin Franklin*, ed. J. A. Leo Lemay (Philadelphia, 1976) 3–21. **381.**

Singer, Charles, ed. and tr. *Galen on Anatomical Procedures* (Oxford, 1956). **567.**

'The Confluence of Humanism, Anatomy and Art,' *Fritz Saxl Memorial Essays*, ed. D. J. Gordon (London, 1957) 261–70. **538, 573.**

'Hebrew Scholarship in the Middle Ages Among Latin Christians,' *The Legacy of Israel*, ed. E. R. Bevan and Charles Singer (Oxford, 1927) 283–314. **224, 340.**

Singleton, C. S., ed. *Art,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Md., 1967). Includes articles by Gombrich, E. H.; Waters, D. W.; Yates, F.

Skelton, R. A. *Explorer's Maps* (London, 1958). **483, 512.**
Maps: A Historical Survey (Chicago, 1972). **53.**
'The Vinland Map,'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New Haven, Conn., 1965) 107–240. **515.**
See also Blaeu, W. J.
Slater, John Rothwell. *Printing and the Renaissance: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Fortnightly Club of Rochester, N.Y.* (New York, 1921). **178.**
Smalley, Beryl. *The English Friars and Antiquity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Oxford, 1960). **10, 90, 121, 297, 339, 365, 546.**
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 (South Bend, Indiana, 1964). **224, 328, 339–40.**
Smith, Alan G. 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72). **570, 584.**
Smith, Bernard. 'European Vision and the South Pacific,'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III (1950) 65–110. **469, 476.**
Smith, Cyril Stanley. 'Art Technology and Science: Notes on Their Historical Interac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1 (Oct. 1970) 493–549. **589.**
Smith, D. E. *Le Comput: Manuel de Magister Anianus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u XVe Siècle)* VI (Paris, 1928). **608.**
Smith, Preserved. *A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 I The Great Renewal* (New York, 1930 rev. edn) retitled *Origins of Modern Culture 1543–1687* (New York, 1962). **73, 321, 323, 332–3, 337, 563, 614, 626.**
A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 II: The Enlightenment 1687–1776 (New York, 1934). **18, 131.**
Smolar, Frank J. 'Resiliency of Enterprise: Economic Crises and Recovery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ed. C. H. Carter (New York, 1965) 247–68. **408.**
Soboul, Albert. *The Parisian Sans-Culott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 G. Lewis (Oxford, 1964). **423.**
Solomon, Howard. *Public Welfare, Science and Propaganda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Innovations of Théophraste Renaudot* (Princeton, 1972). **133, 247, 539, 643, 656.**
Soman, Alfred, ed.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Reappraisals and Documents* (The Hague, 1974). **133.** Includes article by Kingdon, R.
Somervell, D. C. *English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40). **153, 707.**
Soriano, Marc. 'Les Contes de Perrault,'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iés Civilisations* XXV (May–June 1970) 633–53. **432.**
Southern, R. W.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1st edn, 1953; New Haven, Conn., 1967). **365, 464, 467, 497.**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Pelican History of the Church II (London, 1972). **14, 16.**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Sense of the Past,'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Transactions*, 5th ser. 23 (1973) 243–63. **185.**
Spink, J. S. *French Free Thought from Gassendi to Descartes* (London, 1960). **644.**
Spitz, Lewis. *The Religious Renaissance of the German Humanists* (Cambridge, Mass., 1963). **175, 304, 620.**

'Reuchlin's Philosophy, Pythagoras and Cabala for Christ,'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47 (1956) 1–20. **278, 620.**
Sprat, Thomas.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1667) ed. J. I. Cope and H. W. Jones (St Louis, Mo., 1958). **283, 562, 563, 601, 669–70, 682.**
Stannard, Jerry. 'The Herbal as a Medical Document,'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XLIII (May–June 1969) 212–20. **265, 485.**
Starnes, DeWitt T. *Robert Estienne's Influence on Lexicography* (Austin, Texas, 1963). **91, 336.**
Staubach, C. N. *See* Karpinski, L. C.
Stavrianos, L. 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Englewood, New Jersey, 1966). **516.**
Steele, Robert. 'What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are About,' *The Library*, 2nd ser. IV (Oct. 1903) 337–55; V (Oct. 1904) 337–56; VI (Jan. 1905) 137–55; VIII (July 1907) 225–38. **169, 346, 436.**
Steinberg, S. H.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rev. edn, Bristol, 1961). **5, 7, 32–3, 44, 52, 59, 80–2, 89, 113, 117, 128, 138, 202, 204, 206, 259, 326, 359, 375, 392, 407, 440.**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1975). **287.**
'The Retreat from the Word,' *Kenyon Review* (Spring 1961) 187–216. **159.**
Steinmann, Martin. *Johannes Oporinus: Ein Basler Buchdrucker um die Mitte des 16. Jahrhunderts* (Basel, 1967). **442, 446, 570.**
Steneck, N. H. *The Scientific Press at the Time of Copernicus, 1530–1550* (Catalogue of Exhibition held at Ann Arbor, Michigan, April 3–5, 1973). **575–7.**
Stephenson, Carl. *A Brief Survey of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1941). **36.**
Stevens, Henry N. *Ptolemy's Geography A Brief Account of all the Printed Editions down to 1730* (London, 1908). **110.**
Stillwell, Margaret Bingham. *The Awakening Interest in Science Dur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Printing, 1450–1550. 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First Editions* (New York: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70). **461, 510–11, 548, 583, 585–6.**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of Books 1450 to 1470. A Chronological Survey of the Texts Chosen for Printing... With a Synopsis of the Gutenberg Documents (New York, 1972). **44, 50.**
Stimson, Dorothy. *The Gradual Acceptance of the Copernican Theory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1917). **614, 629–30, 677.**
Scientists and Amateurs, A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New York, 1948). **666.**
Stone, Lawrenc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1965). **136, 395.**
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40–1640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History, ed. H. F. Kearney) (London, 1966). **310.**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60–1640,' *Past and Present* 28 (July 1964) 41–80. **395.**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42 (Feb. 1969) 69–139. **61, 67, 330, 414.**
'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 14, 1974) 25–31. **431.**
Strachan, James. *Early Bible Illustrations: A Short Study* (Cambridge, 1957). **64, 108 257.**
Strauss, Gerald.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66). **308, 403–4.**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The Lutheran Interpretation,'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ed. A. Molho and J. Tedeschi (DeKalb, Ill., 1971) 665–86. **305, 360.**

'A Sixteenth-Century Encyclopedia: Sebastian Münster's Cosmography and its Edi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ed. C. H. Carter (New York, 1965) 145–63. **86, 102, 109.**

Strauss, Leo.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encoe, Ill., 1952). **147, 273.**

Struik, Dirk. 'Mathematics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XVIe Century,' *Isis* 25 (1936) 46–53. **385, 500, 521, 530, 534.**

Stuewer, R. H., ed.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Minnesota Studies v) (Minneapolis, Minn., 1970). Includes articles by Hesse, M.; Rosen, E.

Sutcliffe, E. F. 'Jerom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1969) 80–101. **328.**

Swerdlow, Noel. 'The Derivation and the First Draft of Copernicus's Planetary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17 (Dec. 31, 1973) 423–513. **583–4, 621.**

'On Copernicus' Theory of Precession,'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ed. R. S. Westman (Los Angeles, 1975) 49–99. **578.**

Swierk, Alfred. 'Was bedeutet "ars artificialite scribendi"?' *Der Gegenwaertige Stand der Gutenberg-Forschung* (Stuttgart, 1972) 243–51. **168.**

Sykes, Norman. 'The Religion of the Protestant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3. *The West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ed. S. L. Greenslade (Cambridge, 1963) 175–82. **327, 333.**

Sypher, Wili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Revolutions at the End of the 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V (July–Sept. 1965) 353–68. **113.**

Tak, J. G. van der. 'Calcidius' Illustration of the Astronomy of Heracleides of Pontus,' *Mnemosyne* (The Netherlands) series IV, XXV, Fasc. 2 (1972) 148–56. **510.**

Talbott, C. H. and Hammond, E. A.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Medieval England: A Biographical Register* (London, 1965). **538.**

Talbott, John E.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Daedalus* 100 (Winter 1971) 133–51. **61.**

Tavard, George H. *Holy Writ or Holy Church: The Crisi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London, 1959). **319.**

Taylor, Archer. 'The Influence of Printing 1450–1650' (Lecture delivered Oct. 2, 1940,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inting and Progress: Two Lectures* (Berkeley, 1941). **703.**

Taylor, Archer and Mosher, Frederick. *The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Anonyma and Pseudonyma* (Chicago, 1957). **138.**

Taylor, E. G. R. *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1954). **110, 273, 530, 534, 583, 625, 633.**

Taylor, Henry Osborn. *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2 vol. New York, 1920). **73.**

Taylor, R. E. *No Royal Road: Luca Pacioli and His Times* (Chapel Hill, N.C., 1942). **514, 547.**

'Luca Pacioli,'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ed. A. C. Littleton and B. S. Yamey (London, 1956) 175–85. **384, 547.**

Tedeschi, John. 'Florentine Docu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ed. A. Molho and J. Tedeschi (DeKalb, Ill., 1971) 579–605. **671.**

See also Molho, A.

Teeple, Howard M. 'The Oral Tradition that Never Existed,'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LXXXIX (March 1970) 56–69. **319.**

Teichl, R. 'Der Wiegendruck im Kartenbild,' *Bibliothek und Wissenschaft* I (1964) 210–65. **44.**

Temkin, Owsei. *Galenism, Rise and Decline of a Medical Philosophy* (Ithaca, New York, 1974). **473, 523.**

Tentler, Thomas. *Sin and Confession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Princeton, 1977). **318.**

Terza, Dante Della. 'Galileo, Man of Letters,' *Galileo Reappraised*, ed. C. Golino (Berkeley, Calif., 1971) 1–23. **531.**

Thibodeau, Kenneth. '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 The Case of Strasbourg,'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II (1976) 34–50. **99.**

Thirion, Jacques. 'Bernard Salomon et le Décor des Meubles Civils Français à Sujets Bibliques et Allégoriques,' *Cinq Etudes Lyonnaises*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VI) (Paris, 1966) 55–68. **255.**

Thomas, Keith.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1971). **245–6, 277–8, 292, 437, 439, 559, 619.**

'Women and Civil War Sects,'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ed. Trevor Aston, (London, 1965) 332–58. **424.**

Thomas-Stanford, C. 'Early Editions of Euclid's Elements 1482–1600,' *The Library*, 4th ser. V (1924–5) 39–42. **588.**

Thompson, Craig. *The Bible in English 1525–1611* (Folger Booklet) (Washington, D.C., 1958). **344.**

tr. and ed. *The Colloquies of Erasmus*. *See* Erasmus.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3). **149, 352, 423.**

Thompson, J. W. 'The Wanderings of Manuscripts,' *The Medieval Library*, ed. J. W. Thompson (repr. New York, 1957) 647–61. **115.**

Thorndike, Lynn, Jr.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 V and VI, in one vol.) (New York, 1941). **273, 454, 490, 495, 500, 509, 529, 582, 591, 606.**

Science and Though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st edn, 1929; New York, offset reprint, 1963). **492.**

ed. and tr. *The Sphere of Sacrobosco and Its Commentators* (Chicago, 1949). **510.**

Thrupp, Sylvia.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Ann Arbor, 1962). **62.**

Tigerstadt, E. N. 'Furor Poeticus: Poetic Inspiration in Greek Literature before Democritus and Plato,'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I (April–June 1970) 113–79. **322.**

Tillyard, E. M. W.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New York, 1942). **79.**

Tilley, Arthur. *The Dawn of the French Renaissance* (New York, 1918). **399.**

Tompkins, Peter. *Secrets of the Great Pyramids* (with appendix by L. C. Stecchini) (New York, 1971). **283.**

Toomer, C. J. *See* Benjamin, F. S.

Tory, Geoffroy. *Champ Fleury*, tr. George B. Ives (New York, 1967) (republication of Grolier Club edn, 1927). **203–4.**

Toulmin, Stephen. *Human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1972). **461.**

Toulmin, S. and Goodfield, J. *The Fabric of the Heavens* (London, 1963). **465, 500.**

'Toward a New History of the New Scienc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5, 1972, 1058. **521.**

Tracy, James D. 'Erasmus becomes a German,' *The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I (Autumn 1968) 281–8. **309.**

Trapp, J. B. 'The High Renaissance at Harvard,'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 14, 1977, 41. **261.**

Trattner, W. I. 'God and Expans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John Dee 1527–1583,'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V (Jan.–March 1964) 17–34. **274.**

Trénard, Louis.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Collectives: Les Livres: Bilan et Perspectiv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5 (1968) 691–703. **29.**

'La Press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788,'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ed. C. Bellanger *et al.* (4 vol. Paris, 1974) 27–376. **131, 134, 138, 147, 259.**

Trevor-Roper, Hugh R.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1968). **364, 388, 410, 418–19, 434, 436, 438–9, 449.**

'Desiderius Erasmus,' *Men and Events* [English title: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1957) 35–61. **145, 401, 416.**

Review essay, *History and Theory* V (1966) 61–82. **281.**

Trimpi, Wesley. 'The Meaning of Horace's "Ut Pictura Poesi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VI (1973) 1–34. **230, 256, 319, 322.**

Trinkaus, Charles. *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Italian Humanist Thought* (2 vol. Chicago, 1970). **298.**

'Humanism, Religion, Society: Concepts and Motivations of some Recent Studies,'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IX (Winter 1976) 676–714. **298.**

Trithemius, Johannes. *In Praise of Scribes – De Lande Scriptorum.* **14–15, 50, 378.** *See* Klaus Arnold, ed.

Tuchman, Barbara. 'Hazards on the Way to the Middle Ages,' *The Atlantic Monthly* (Dec. 1975) 72–8. **236.**

Uhlendorf, B. A. 'The Invention and spread of printing till 147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Library Quarterly* II (1932) 179–231. **6, 44.**

Ullman, B. L.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cript* (Rome, 1960). **45, 203, 205.**

Ullmann, Walter.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Baltimore, 1966). **229.**

Underwood, E. A., ed. *Science, Medicine and History. Essays . . . In Honor of Charles Singer* (2 vol. Oxford, 1953). Includes articles by Arber, A.; Fisch, M.; Johnson, R. F.

Unguru, Sabetai. 'Witelo and Thirteenth century Mathematics: An Assessment,' *Isis* 63 (Dec. 1972) 496–508. **494.**

Updike, D. B. *Printing Types: Their History Forms and Use: A study in Survivals* (2 vol. Cambridge, Mass., 1937). **203, 224, 250, 588.**

Vaassen, Elgin. *Die Werkstatt der Mainzer Riesenbibel in Würzburg und Ihr Umkreis* (Frankfurt-am-Main, 1973). **54.**

Vann, Richard T., ed. *Century of Genius: European Thought 1600–1700* (Englewood, New Jersey, 1967). **460, 668.**
Vansina, Jan. *Oral Tradition: A Study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r. H. M. Wright (1st French version, 1961; London, 1973). **xiii, 9.**
Vasari. *Vasari's Lives of the Artists*, abridged and ed. by B. Burroughs (New York, 1946). **176.**
Venturi, Franco. *Utopia and Reform in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1971). **142, 147.**
Vervliet, Hendrik D. L., ed. *The Book Through Five Thousand Years* (New York and Brussels, 1972). **178.** Includes articles by Musper, H. T.; Vervliet, H. D. L. 'Printing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355–82.
See also Carter, Harry.
Verwey, H. de la Fontaine. 'Les Caractères de Civilité et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Travaux et Documents* XXVI (1964) 7–27. **207, 430.**
'The Family of Love,' *Quaerendo* VI (1976) 219–71. **443, 447.**
'The First "Book of Etiquette" for Children . . .' *Quaerendo* I (1971) 19–30. **430.**
'The Netherlands Book,' *Copy and Print in the Netherlands*, ed. Wytze G. Hellinga (Amsterdam, 1962) 3–70. **169, 346, 414, 645.**
'Pieter Coecke van Aelst and the Publication of Serlio's Book on Architecture,' *Quaerendo* VI (1976) 166–94. **207.**
'Trois Hérésiarques dans les Pays-Bas du XVIe Siècle,'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de Renaissance Travaux et Documents* XVI (1954) 312–30. **442, 446–7.**
'Willem Jansz. Blaeu and the Voyage of Le Maire and Shouten,' *Quaerendo* III (1973) 87–105. **481.**
Victor, J. M. 'The Revival of Lullism,'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VIII (Winter 1975) 504–34. **315.**
Voët, Leon. *The Golden Compasses: A Histo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the Officina Plantiniana at Antwerp* (2 vol. Amsterdam, 1969). **75, 100, 337, 408–9, 442, 446, 448, 647.**
Vogel, Kurt. 'Fibonacci, Leonardo,'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14 vol. New York, 1970) IV 604–13. **236.**
Vorzimmer, Peter. 'Darwin, Malthus and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 (1969) 527–42. **75.**
Vrij, M. de. *The World on Paper*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artographical material published in seventeenth-century Amsterdam)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msterdam, n.d.). **503.**
Vyer, O. van de. 'Original Sources of some early lunar maps,'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II (June 1971) 86–97. **624.**

Wade, Ira O. *The Clandestine Organization and Diffusion of Philosophic Ideas in France from 1700 to 1750* (Princeton, 1938). **139.**
Wadsworth, James. *Lyons 1473–1503, The Beginnings of Cosmopolitanism* (Cambridge, Mass., 1962). **405.**
Walker, D. P. *The Ancient Theology* (Ithaca, New York, 1972). **125, 277, 281–2, 285, 644.**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from Ficino to Campanella (London, 1958). **96, 438.**
'The *Prisca Theologia*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VII (July–Dec. 1954) 204–59. **288.**

'A Secret Conspiracy Expos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 23, 1971) 42–4. **445.**
Walzer, Michael.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New York, 1968). **424–6.**
Wardrop, James. *The Script of Humanism: Some Aspects of Humanist Script 1460–1560* (Oxford, 1963). **203–4, 235, 298.**
Warner, Deborah H. 'The First Celestial Globe of Willem Janszoon Blaeu,' *Image Mundi* 25 (1971) 29–38. **599–601, 626.**
Warnke, Frank J. 'Mazzeo on the 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VIII (April–June 1967) 289–92. **165.**
Waters, D. W. 'Science and the Techniques of Navigation in the Renaissance,' *Art,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ed. C. S. Singleton (Baltimore, Md., 1967) 189–237. **583.**
Watson, Fos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Teaching of Modern Subjects in England* (London, 1909). **67, 487, 698.**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rev. edn, Berkeley, Calif., 1967). **316, 321.**
See also Goody, J.
Watt, W. M.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Medieval Europe* (Edinburgh, 1972). **463.**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 Talcott Parsons (London, 1948). **378–81, 414, 427.**
Webster, Charles. *The Great Instauration: Science Medicine and Reform 1626–1660* (London, 1975). **120, 305, 362, 533, 656, 681.**
ed.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Series) (London, 1974). **641.** Includes article by Espinasse, M.
Samuel Hartlib 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Cambridge, 1970). **305.**
See also Schmitt, C. B.
Wedgwood, C. V. 'Rural 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 *History Today* (July 1968) 509–10. **426.**
Weil, E. 'William Fitzer the Publisher of Harvey's De Motu Cordis 1628,' *The Library*, 4th ser. XXIV (1944) 142–64. **529.**
Weil, G. E. *Elie Lévita: Humaniste et Massorète (1469–1549)* (Leiden, 1963). **224.**
Weisheipl, James A. 'Curriculum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t Oxford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Medieval Studies* 26 (Toronto, 1964) 143–85. **536.**
Weisinger, Herbert. 'Ideas of History during the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Essays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P. O. Kristeller and P. P. Wiener (New York, 1968) 74–94. **191.**
'Who Began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Papers of the Michigan Academy of Science, Arts and Letters* XXX (1944) 625–38. **185, 221.**
Weiss, Roberto.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xford, 1969). **185, 218, 225.**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470 to 1520,'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ed. G. R. Potter (Cambridge, 1957) 95–126. **27.**
The Spread of Italian Humanism (London, 1964). **177.**
Weitzmann, Kurt. *Illustration in Roll and Codex: A Study of the Origins and Method of Text Illustration* (Studies in Medieval Illumination II, ed. A. M. Friend) (Princeton, 1947). **214.**
Westfall, Richard S. 'Newton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Scienc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the Renaissance*, ed. Allen Debus (2 vol. New York, 1973) I 183–98. **681.**

Westman, Robert S. Book review,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VIII (Summer 1974) 221–3. **667.**

'The Comet and the Cosmos; Kepler, Mästlin and the Copernican Hypothesis,' *The Reception of Copernicus' Heliocentric Theory, Studia Copernica V*,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held in Torùn, Poland, 1972, ed. Jerzy Dobrzycki (Warsaw, 1972) 7–31. **598, 599, 602.**

'Kepler's Theory of Hypothesis and the "Realist Dilemm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II (1972) 233–64. **471, 588, 589.**

'Magical Reform and Astronomical Reform: The Yates Thesis Reconsidered,' *Hermeticism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lark Library Seminar, 1974) (Los Angeles, 1977) 5–91. **286, 641.**

'The Melanchthon Circle, Rheticus and the Wittenberg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pernican Theory,' *Isis* 66 (June 1975) 165–93. **535, 650.**

'Three Responses to the Copernican Theory,'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ed. R. S. Westman (Los Angeles, 1975) 285–345. **535, 581, 590, 618.**

ed.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Los Angeles, 1975). Includes articles by Gingerich, Owen; Swerdlow, Noel; Westman, Robert; Wilson, Curtis; Wrightsman, Bruce.

White, A. D.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2 vol. London, 1896). **642.**

White, Lynn,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rev. edn, Oxford, 1967). **20.**

'The Iconology of Temperantia and the Virtuousness of Technology,' *Action and Convic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Festschrift to E. H. Harbison) (Princeton, 1969) 197–219. **251.**

'Jacopo Aconcio as an Engine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Jan. 1967) 425–45. **240, 243.**

'Pumps and Pendula: Galileo and Technology,' *Galileo Reappraised*, ed. C. L. Golino (Berkeley, Calif., 1971) 96–110. **538.**

Whitehead, A. N.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st edn, 1926; London, 1938). **463, 472, 493, 615, 636, 637, 638.**

Whiteside, D. T. 'Before the Principia: The Maturing of Newton's Thoughts... 1664–1684,'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1 (1970) 5–20. **632, 634.**

'Newton's Marvellous Year: 1666 and All That,'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1 (June 1966) 32–42. **633.**

ed. *The Mathematical Papers of Isaac Newton* Vol. 1 *1664–1666* (Cambridge, 1967). **245, 633.**

Whitmore, P. J. S. *The Order of Minim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Hague, 1967). **644, 667, 680.**

Whitteridge, Gweneth. *William Harv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London, 1971). **262, 528–9, 535, 562, 574.**

Wiener, Carol Z. 'The Beleaguered Isle: A Study of Elizabethan and Early Jacobean Anti-Catholicism,' *Past and Present* 51 (May 1971) 27–62. **427.**

Wieruszowski, Helen. 'Burckhardt and Vespasiano,' *Philosophy and Humanism: Essays in Honor of P. O. Kristeller*, ed. E. P. Mahoney (New York, 1976) 387–405. **48.**

Wightman, W. P. D. *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 (2 vol. Edinburgh, 1962). **490, 494, 511, 582, 586, 598, 601.**

Science in a Renaissance Society (London, 1972). **533–4.**

Wiles, R. M. *Freshest Advices: Early Provincial Newspapers in England* (Columbus, Ohio, 1963). **131.**

Wilkinson, R. H. 'The Gentleman Ideal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Political Elit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XXXVII (Fall 1963) 9–26. **397.**

Willard, C. C. 'The Manuscripts of Jean Petit's Justification: Some Burgundian Propaganda Method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Studi Francesi* 38 (1969) 271–80. **13, 46, 312.**

Willems, E.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ed. S. N. Eisenstadt (New York, 1968) 184–211. **415.**

Willey, Basil.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London, 1942). **306, 336, 455, 471.**

Williams, George H.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 1962). **444.**

Williams, Raymond. *Communications* (London, 1962). **61.**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1960). **153.**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1966). **61.**

Wilson, Arthur. *Diderot: The Testing Years, 1713–1759* (Oxford, 1957). **132, 700.**

Wilson, Curtis. 'From Kepler's Laws, so-called, to Universal Gravitation: Empirical Factors,'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VI (1970) 89–170. **631–2.**

'Newton and Some Philosophers on Kepler's "Law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V (April–June 1974) 231–58. **651.**

'Rheticus, Ravetz and the "Necessity" of Copernicus's Innovation,'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ed. R. S. Westman (Los Angeles, 1975) 17–40. **589, 604, 613.**

Wilson, N. G. *See* Reynolds, L. D.

Wilson, R. M. 'The Contents of the Medieval Library,' *The English Library before 1700*, ed. F. Wormald and C. E. Wright (London, 1958). 85–111. **211.**

Winetrout, Kenneth. 'The New Age of the Visible. A Call to Study,' *A. V. Communication Review* XII (Spring 1964) 46–52. **159.**

Winter, I. J. 'Mon Livre et Moi,'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V (Autumn 1972) 297–307. **230.**

Winton, Calhoun. 'Richard Steele, Journalist and Journalism,' *Newsletters to Newspapers: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ism*, ed. D. Bond and R. McLeod (Morgantown, W.Va., 1977) 21–30. **155.**

Wittkower, Rudolf. 'Individualism in Art and Artists: A Renaissanc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I (July–Sept. 1961) 291–302. **232.**

Wittkower, Rudolf and Margaret. *Born Under Saturn* (New York, 1963). **232.**

Witty, Francis. 'Early Indexing Techniques: A Study of Several Book Indexes from the Fourteenth,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 *Library Quarterly* XXXV (1965) 141–8. **90, 106.**

Wolf, A. *A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2 vol., rev. edn, New York, 1959). **491, 494.**

Wolpe, Berthold L. 'Florilegium Alphabeticum: Alphabets in Medieval Manuscripts,' *Calligraphy and Pale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A. J. Fairbank*, ed. A. S. Osley (London, 1965) 69–75. **88.**

Wolper, Roy S. 'The Rhetoric of Gunpowder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I (1970) 589–98. **21.**

Wood, Norman. *The Reformation and English Education: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Uniformity on English Educ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1). **350, 357.**

Woodbridge, John. 'Censure Royale et Censure Episcopale, le Conflict de 1702,' *Dix-Huitième Siècle* (1976) 333–55. **333.**
Woodfield, Dennis. *Surreptitious Printing in England 1550–1690* (New York, 1973). **415, 416, 417, 652.**
Woodward, W. H. *Vittorino da Feltre and Other Humanist Educators*, ed. Eugene Rice (New York, 1963 [reprint of 1897 edn]). **175, 190, 537, 662.**
Worden, Blair. 'Edmund Ludlow: the Puritan and the Whig,'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 7, 1977) 15–16. **142.**
Wormald, F. and Wright, C. E., eds. *The English Library before 1700* (London, 1958). Includes articles by Ivy, G. 3.; Irwin, R.; Wilson, R. M.
Wright, C. E., ed. *See* Wormald, F.
Wright, Louis B. *Middle Class Cultur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Chapel Hill, N.C., 1935). **130, 243, 361, 383, 385, 415, 425, 428–9.**
Wrightsman, Bruce. 'Andreas Osiander's Contribution to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The Copernican Achievement*, ed. R. S. Westman (Los Angeles, 1975) 213–43. **651.**
Wroth, Lawrence C., ed. *A History of the Printed Book* (The Dolphin no. 3) (New York, 1938). Includes articles by Fuhrman, O. W.; Lehmann-Haupt, H.; Rath, Erich von.

Yamey, B. S. 'Scientific Bookkeepi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 (1949) 99–114. **383–4, 554.**
ed. *See also* Littleton, A. C.
Yardeni, Myriam. 'Journalism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l'Epoque de Bayle,' *History and Theory* XII (1973) 208–29. **138.**
Yates, Frances. *The Art of Memory* (London, 1966). **23, 66–7, 69, 92, 123, 189, 272, 286, 296–7, 457, 549.**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 1964). **77, 274, 275, 276, 278, 281, 282, 286, 644, 669.**
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London, 1972). **97, 141, 275, 276, 286, 438, 534, 549, 550, 641, 668, 699.**
The Valois Tapestries (London, 1959). **84.**
'The Hermet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Science,' *Art,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ed. C. S. Singleton (Baltimore, 1967) 259–60. **272.**
'Paoli Sarpi's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II (1944) 123–44. **412–13.**

Zervas, D. F. 'The *Trattato dell'Abbaco* and Andrea Pisano's Design for the Florentine Baptistery Door,' *Renaissance Quarterly* XXVIII (Winter 1975) 483–504. **252.**
Zeydel, E. H. 'Johann Reuchlin and Sebastian Brant: A Study in Early German Humanism,' *Studies in Philology* LXVII (April 1970) 117–39. **94, 399.**
Zilsel, Edgar.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I (1945) 325–49. **112, 248, 465, 550, 552, 558–60.**
'The Origins of William Gilbert's Scientific Metho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I (1941) 1–32. **23, 241, 520.**
'The Sociological Roots of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7 (1942) 544–60. **521.**

Ziman, John. *Public Knowledge: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cience* (Cambridge, 1968). **478.**

Zimmerman, T. P. 'Confession and Autobiography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DeKalb, Ill., 1971) 121–40. **229.**

Zinner, Ernst. *Leben und Werken des Johannes Müller von Königsberg, genannt Regiomontanus* (Munich, 1938). **584.**

Zophy, J. W. *See* Buck, L. P.

Zoubov, V. P. 'Vitruve et ses Commentateurs du XVIe Siècle,' *La Science au Seizième Siècle* (Colloque de Royaumont) (Paris, 1960). 69–90. **469.**

Zuckerman, H. *See* Merton, Robert K.

索 引

A

abacists versus algorists，算盘计算者对阵用十进制计算者 467n，532

'Abbey of Free Will(Rabelais)，《自由意志的修道院》(拉伯雷) 393

Abbot of Sponheim，斯蓬海姆修道院院长 see Trimius，Johannes

ABC books，入门书 78，89，247，432

Abelard，P.，彼得·阿伯拉尔 230，284

'Abuses and Ignorance of Physicians'，内科医师的陋习和愚昧 541

Academiarum Examen (Braillier，P.，London：J. Webster，1654).《学校的考试》(皮埃尔·布拉耶尔，伦敦：约翰·韦伯斯特) 550n

Académie des Sciences，法兰西科学院 679-80n

Accademia Venetiana，威尼斯学会 675

accounting，记账法，簿记 385，542

books，会计书 65，384

bookkeeping，double-entry，复式记账法 381-4，548，550，554-5

see also arithmetic；Pacioli，Luca

Aconcio，Jacopo，雅科珀·阿孔奇奥 103n

Acta Eruditorium (periodical)，《学术通讯》(期刊) 138n

Actes and Monuments (Foxe，J.)，《行动与丰碑》(约翰·福克斯) *see* Book of Martyrs

'Ad Lectorem' (Osiander，A.)，《假说》(奥西安德尔) 651

Adages (Erasmus)，《格言集》(伊拉斯谟) 219n，279，280n

Adami，Tobias，托比亚斯·阿达米 668n

Adams，Henry，亨利·亚当斯 x

Addison，Joseph. 约瑟夫·艾迪生 670

Address to Estates of Empire (Sleiden，J.，1542)，《致帝国各界人民书》(斯莱登，1542) 305

Adelard of Bath，巴斯的阿德拉德 210，556，588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Bacon，F.，1605)，《学问的进步》(培根)338n

Advertisements from Parnassus (London，1669)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arl of Monmouth of Boccalini's Ragguagli di Parnaso)，《文坛报道》(博卡利尼意大利语的英译本，译者是亨利·蒙毛斯伯爵) 669n

advertising，广告 52，59-60，145 (provided by Index)，《禁书目录》提供的免费广告

156，229，234n，240-1，244，376，392，406，539，553，562 587，687 *see* also blurbs；publicity
Aesopian language，伊索寓言式的语言 273,674
Age of Reason（Paine，T.），《理性时代》（托马斯·潘恩）149n
Agricola（Bauer，Georg），阿格里科拉（格奥尔格·鲍尔）221，242，265，469-70，545，555-6，568，571，687
Agrippa，Henry Comelius von Nettlesheim，冯·内特斯海姆·阿格利帕 94-6，276，531
Albert of Brudzewo，布卢则沃的阿尔贝蒂 581n
Alberti，Leon Battista，利昂·巴蒂斯达·阿尔贝蒂 201n，232n，237-8，243，252，255-6，268n，280，283-4，381，548-9，551n，556，564n，604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图斯 513n，552-3
alchemy，炼金术 76，272，274，275n，280n，437，474,562-3，641 *see* also Paracelsus
Alciato，Andrea，安德利亚·奥尔恰托 104
Alcuin，阿尔昆 80，90，316，339
Aldine editions，阿尔定出版社版本 *see* Aldus Manutius
Aldrovandi catalogue，阿尔德罗万迪书目 198
Aldus Manutius（Aldo Manucci），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阿尔多·马努奇）48，52n，57，178，180，218-24，340，393，398，409，412-13，441，447，545n. 691
Aldine editions，阿尔定版本 175，180n，205，221-3，280n，473，569n，691
Aldus' firm，奥尔杜斯印刷所 98n，139，198，221n，222，279，580
Alexander de Villedieu，维尔迪埃的亚历山大 608n
Alexander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339
Alexandrian Museum and Library，xiv，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10，89，111，195，219，465，559n，687
Alexandrian science，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科学 193，216，220，462-6，469，494-6，505，512，516，578，580，584-6，593，605-6
Alfonso X（Wise，King of Castile and Leon），阿方索十世（贤明者，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国的国王）500n，603，630n
Alhazen，阿尔哈镇 590n
allegory，寓言 195-9，260，280n，297，457，471 *see* also mythography
Allen，P. S.，P. S·艾伦 175-6，401
Almagest（Ptolemy），《天文学大成》（托勒密）170n，271，288，336，382，462-4，466，505，510-11，516，523，536-7，581-2，584-5，594，604，612，618，621，623，629-30，693，695，697，701
Almagestum Novum Astronomiam Veterem（Riccioli，G. B.，Bologna，1651），《新天文学大全》（里奇奥利，博洛尼亚，1651）624n，629
Almanac de Gotha，《哥达年鉴》134n
almanacks，年历，年鉴 178，583n，631,659
alphabet，alphabets，字母表，多种字母表 *see* also ABC books Gothic，334n
Greek，希腊字母表 91,279
Hebrew，希伯来字母表 91,277,279
Latin，拉丁字母表 91，203,279
alphabetic versus ideographic，拼音文字对会意文字 27n
alphabetical order，按字母顺序 89-90，93，105，see also indexes
Alphabetum Romanum（Feliciano），《罗马字母表》（菲利奇亚诺）203

Alphonsine Tables (Ptolemaic), 《阿方索星表》(托勒密式的) 582, 583, 596, 601n, 606n, 623, 629-30
Amerbach 阿梅尔巴赫
Johann (printer, founder of firm), 约翰·阿梅尔巴赫(印刷所创办人) 76n, 94, 104, 139, 223n, 372, 399n, 447n, 570
Boniface (son, Erasmus friend and literary executor, legal scholar), 卜尼法斯·阿梅尔巴赫(伊拉斯谟的朋友和文学经济人,法学学者)104n
Bruno (son, assisted Erasmus with Hebrew), 布鲁诺·阿梅尔巴赫(儿子,伊拉斯谟的希伯来语助手) 223n
Amerbach-Froben firm, 阿梅尔巴赫—弗洛本印刷所 447 *see* also Froben
America, 美洲 *see* New World
American men of letters, 美洲文人 154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138, 413, 416, 420, 647
Amyot, Jacques (transl. of Plutarch), 雅克·安约(普卢塔克著作译者) 351
An Answer to a Book Entituled Reason and Authority (Bambridge, T., 1687), 《答〈理性与权威〉》(托马斯·班布里奇, 1687) 323n
Anabaptists, 再洗礼派 423
analphabetism, 文盲 *see* illiteracy
Anathomia (*Anatomia*) (Mondino dei Luzzi), 《解剖学》(卢兹的蒙蒂诺) 512, 538, 573
Anatomical Procedures (Galen), 《解剖程序》(盖伦) 567, 569, 572, 573n
anatomy, 解剖 267-9, 502n, 525, 528, 535, 538-9, 566-74, 616, 657-8, 667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法国 1789 年前的王朝) 135, 145, 427n, 431-2, 680n
'ancients and moderns', 《古人与今人》 122-4, 289-92, 299, 469, 485-7, 492, 504, 513-18, 565n, 576, 600, 614, 627n, 633, 687, 689
Andernach, Guinther or Winter of, 君特尔(或温特尔)·安德纳克 see Guinther
Andreae, Johann Valentin 约翰·瓦伦丁·安德雷 668n
Anglicans, 英国国教徒 354, 421, 681, 685
'anima mundi' (Ptolemy). "生命世界"(托勒密) 589n
Annales school, 年鉴学派 41
Antarctic Pole, 南极 600
Antichitàà (Mauro, Lucio), 《古董》(卢奇奥·莫罗) 198
Anti-clericalism, 反教士主义 19, 350, 393-4, 399, 424, 491, 494n, 495, 641-2
Antioch, 安条克 340
Antiquitates Judaicae (Leiden: Raphelengius, 1593)《犹太古事记》(莱顿:拉菲伦吉乌斯,1593), 332*see* also Arias Montano, Benito
antiquity, antiquities, 古代,古董 22, 219, 248, 392, 575
languages of, 古代的语言 116, 224, 280, 340, 342, 464, 474, 483
texts of, 古代文本,古籍 74, 108n, 124-5, 137n, 173, 224, 287, 288-94, 325n, 471, 484, 494, 514, 538, 582n, 692, see also Greek, Hebrew; hieroglyphs
views of, 古代观 183-90, 194-6, 200-1, 213, 225, 299-300, 491, 499, 545n, 572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150n, 438n, 610n
Antwerp, 安特卫普 99, 118, 139, 142, 206, 250, 403, 413, 420, 480, 647
Apelles, 阿佩利斯 293n
Apianus, Petrus (Bienewitz, Peter, 1495—1552), 彼得·亚皮阿努斯(彼得·比内

维兹，1495—1552） 521，534，560n，586n，587n，599n，651n
Apologia Pro Galileo（Campanella，T.），《为伽利略辩护》(坎帕内拉) 668
'apostolate of pen'，"笔的使徒传道功能" 317，335，373
apocaries，药剂师 65，242，246，253，272，362，457n，530，538—9，541，572，657 *see also* Culpeper，N.
Appollonius of Perga，帕加马的阿波罗尼奥 499，502，586，620n
Aquinas，Thomas，托马斯·阿奎那 52n. 215n，271，286，294，314，320，391，496，513
Arabic science，阿拉伯科学 74-5，216，502 (medicine)医学，512，523，538 (medicine)医学，548，610，697
astronomy，天文学 215，463-4，466，484，580，584，586，593，602n，606，610 (calendar)日历，624，626n，685
numerals (Indo-Arabic)，数字(印度—阿拉伯数字)105-6，277，467，471，499，532，*see* also arithmetic
Arabic studies，阿拉伯研究 223，see also Koran
Aramaic，阿拉姆语 335，337
Arcadia（Sidney，Sir Philip），《阿卡迪亚》(菲利普·锡德尼爵士) 259n
Arcanum Punctationum Revelatum（Cappel，Louis，Leiden，1624），《元音点揭秘》(路易·卡佩尔，莱顿，1624) 278n，332n
Arcetri，阿尔切特里 645
archeology，考古学 183，195，198，200，218，225，237，289，336
Archimedes，阿基米德 170n，193，211，237，242，288，459，471，494，496，497，499，500，502，504，531，541，563，582n，586，638，697n，700
Areopagitica（Milton，J.），《论出版自由》(弥尔顿) 682
Aretino，Pietro，皮特罗·阿雷蒂诺 137n，147，228，394，399，405，417-18，474-5
Arias Montano，Benito，博尼托·阿里亚斯·蒙塔诺 323，332n，443-4，447-8
Ariès，Philippe，菲利普·阿利耶 431-2
Aristarchus，阿里斯塔克斯 576n，577n
Aristides，亚里斯泰迪斯 211
Aristophanes' works (1498'edn.)，阿里斯托芬的剧作 52n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ian philosophy，亚里士多德哲学 74-5，199，216，290，314-15 (cosmology)，(宇宙论) 321，362，459，463n，475，495，503-4，522-5，527-9，532-3，536，542，545n，550，579，595，685，692-5
Aristotelian texts，亚里士多德著作 74，271，2889，336，470，511，522
De Caelo，《论天》581n
Logic，《逻辑学》611
Physics，《物理学》537
Poetics，《诗学》604n
Politics，《政治学》38n，546. 604n
arithmetic，算术 242，382-7 (business)，商务算术 429，467 (abacus)，(算盘) 468，532-3，542，544，548，554 see also reckon masters
Arithmetica（Gemma Frisius），《算术》(格马·弗利休斯) 534
Arminians，阿米尼乌斯派 418-20，655
Arminius，阿米尼乌斯 304
Arnold，Matw，马修·阿诺德 457n
Arrighi，Ludovico degli，卢多维科·德格里·阿利基 82n
ars artificialiter scribendi，用机械手段复制

的技艺 159，168n
Ars Magna (Cardano, G., 1545)，《伟大的艺术》(卡尔达诺，1545) 548，552，662
ars memorandi，《记忆术》see memory arts
art history，艺术史 83，112，232，234，293n
Art of Preaching (Reuchlin)，《布道的艺术》(卢克林) 372n
'Art of Tens or Decimall Arithmeticke' (London, 1619) (Henry Lyte)，《十进制艺术》(伦敦，1619)(亨利·赖特)241
Artisan-authors，工匠—作者 242-3，474，485-6，525，545-6，559，657 *see* also new occupational groups
artists and painters，艺术家与画家 84，188，214，232-5，240，247-9，253-8，293，493，535，542，548，551，564-5 *see* also new occupational groups
Aston, Margaret，玛格丽特·阿斯顿 68n，311n
'Astrarium' (Giovanni de'Dondi)，"天文时钟"(焦瓦尼·德·东迪) 589n
astrolabes，星盘 589
astrology，占星术 76，97，437，669
Astronomia Britannica (Wing, Vincent)，《不列颠天文学》(文森特·温) 32
Astronomia Instaurata，《天文星象的机械复制》676n
Astronomia Nova (Kepler, 1609)《新天文学》(开普勒，1609) 651n
Astronomiae Instauratae Mechanica (Tycho Brahe)，《天文学新机制》(第谷·布拉赫) 600n，625n
Astronomici Veteres (Aldine anthology: Venice, 1499)，《天文学古籍汇编》(阿尔定"选编"：威尼斯，1499) 596n
astronomy，天文学 74，78，216，271，463-6，484. 490，500，502，509-12，523，536，544，575-635，648，650-6，672-4，685-7 *see also* Brahe; Copernicus; Kepler et al.
Atlanta Fugiens (Maier, M., Oppenheim: de Bry, 1618)，《亚特兰大·弗金斯》(迈克尔·梅耶尔，奥本海姆：德布莱) 275n
atlases and maps，地图集与地图 9-10，53，74，78-9，81，83，88，99，108-10，113，124-5，193，197，227，241. 268n，287，586-7，446，461，465，469，472.，479，481-3，492，503，504，510-18，520，531，545，557，626n，661，663，686-7，697，701；map publishers，地图出版商 119，124，193，200，558-9，659-60，702 *see also*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y; globes
Augsburg，奥格斯堡 179，376n，403-5，586n
Augustine St，圣奥古斯丁 100，174n. 199，226，281，287，297n，320，343，357，662n
authorship，作者身份 59，63. 121-2，146，153-4，155-8，229-30，233-4，242-3，261，324 (scriptural authorship)，《圣经》作者身份 337，454，543
autobiography，自传 229，232n，236n，501 *see also* biography
autodidacts，自学者，自学成才者 154，244-5，247-8，425n，474，602n *see also* self-help
Ave Maria (College of Paris)，圣母学院(巴黎) 608n
Averroes，Averroists，阿威罗伊派学者 496，523，581n
'avertissement' "广告" 59 *see also* advertising
Avicenna，阿维森纳 56n，266，285n，502，523，657n
Avignon，阿维尼翁 294，538

B

Babeuf，'Gracchus'，"格拉古式"的巴贝

夫 423n
Babington, Humphrey, 汉弗莱·巴宾顿 633n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3-4, 18-19, 21, 42-3, 98n,120n, 243,273, 288, 291, 338n, 455-6n, 541n, 542, 543, 550n, 562-3, 625, 642, 645, 647, 653, 657, 665,694, 697, 706
Bacon, Roger, 罗杰·培根 73, 214, 277n, 285n, 320, 339,551, 553, 606, 697
Bade, Josse, 约西·巴德 *see* Badius
Badia library, 巴迪亚图书馆 45
Badius (Josse Bade, Paris printer, far-in-law of Vascosan and Robert Estienne), 巴迪乌斯(约西·巴德,巴黎印刷商,瓦斯科桑和罗伯特·埃蒂安纳的岳父) 104n, 544n
Badius, Perrette (daughter of Josse Bade), 佩蒂特·巴迪乌斯(约西·巴德之女) 104n, 447
Baer, L., L. 贝尔 86n
Balbus of Genoa, Friar Johannes, 热那亚的修士约翰·巴尔布斯 89n
Baldi, Bernardino, 贝纳迪诺·波尔迪 542n, 624n, 675n
Bale, John, 约翰·贝尔 21n, 107, 112n, 305n, 423n
ballads,民谣 130,
Bambridge,Thomas, 托马斯·班布里奇 323n
Banks, Sir Joseph, 约瑟夫·班克斯勋爵 469, 699
banned books, 禁书 405, 416, 444, 639, 656, 676
  forbidden books, 禁书 137, 416-17, 420
  prohibited books, 禁书 345n, 347-8. 358, 406,415, 420, 675
  see also censorship; clandestine presses;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Barbari, Jacopo de', 雅各布·巴巴里 547
Barbaro, Francesco (Venetian humanist), 弗朗切斯科·巴巴罗(威尼斯人文主义者) 137n
Bardi, Cosimo di, 科西莫·迪·巴尔蒂 526
'Barlaam and Josephat', 《巴拉姆和约萨发特》 211
Baron, Hans, 汉斯·巴伦 185
Baronius. Cardinal, 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 78
Baroque styles, 巴洛克风格 68, 77, 219, 260, 312, 408, 627, 662
Barrow, Isaac, 伊萨克·巴罗 633n
Bartolus (Bartholists), 巴尔托鲁(巴尔托鲁法学注释派) 524. 548
Barzizi, Gasparini (writer on orthography), 加斯帕利尼·巴齐齐(正字法作者)250n
Basel, 巴塞尔 76n, 94, 99, 104n, 139, 179, 187n, 250, 308n, 309n, 340n, 349, 372, 376n, 392n, 399n, 405, 407, 411, 419, 441-2n, 446-7, 474, 490, 569-70, 585, 616-17, 624n
Basilica Chymica (Croll), 《奇米卡大教堂》(克罗尔) 474
Bauer, Georg, 格奥尔格·鲍尔 *see* Agricola
Basson 巴松
Govert (son of Thomas), 戈弗特·巴松(托马斯之子) 140n, 443
Thomas (founder), 托马斯·巴松(公司创建人) 140, 143n
  firm (Leiden), 巴松公司(莱顿) 140
Bastille, 巴士底城堡,巴士底监狱 147, 351
Bayle, Pierre, 皮埃尔·培尔 xv, 138, 143, 418, 420, 645, 646
Beatus Rhenanus, 庇突斯·雷纳努斯 104n, 137n, 180, 309, 373n, 377
Becon, Thomas, 托马斯·培根 360n
Bede, (圣徒)比德 115n, 595
Behrens, C. B. A., 贝伦斯 427n

Bellarmine, Robert, Cardinal, 罗伯托·贝拉明,红衣主教 80, 672
belles lettres, 美文,文学 28, 153,214, 216, 254, 397n, 473,494, 498, 707
Belon, Pierre, 皮埃尔·贝隆 484-5
Bembo, Pietro, Cardinal, 大主教皮埃特洛·本博 280n. 586n
Benedetti, Giovanni Battista, 焦瓦尼·本尼德蒂 497n
Benedictine orders, 本笃会 16, 95, 393-4, 398, 493
Benoist, René, 勒内·伯努瓦 349n
Bentley, Richard, 理查德·本特利 338-9
Bernard, St, 圣贝尔纳 226,456,458
Berlet, Thomas (printer), 托马斯·伯特勒(印刷商) 105
Bessarion, Johannes, Cardinal, 约翰·贝萨里翁,红衣主教 48n, 222n, 399n, 545n, 548n, 585-6
Besson, Jacques, 雅克·贝松 240, 555-6
Besterman, Theodore, 西奥多·贝斯特曼 94
bestiary,《动物寓言集》457
best-selling works, 畅销书 122, 153, 156, 274, 279, 309,318, 348, 356, 367, 373, 400, 411, 415-16, 453, 614, 653, 656, 692, 694
Bettmann Archives, 贝特曼档案馆 237
Beza, The The odore, 泰奥多尔·贝扎 130n, 338n, 352, 419
bible Belt, 圣经带 364
Bible, editions and versions《圣经》,版本与译本
  Greek and Hebrew versions: *Erasmus Greek New Testament*, 希腊语·希伯来语版:伊拉斯谟译《新约圣经》357, 367-8n, 372; *Pentateuch*,《摩西五经》321; *Septuagint*,《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119, 335, 339; *see also Talmud*
  Latin Vulgate (Jerome's translation), 拉丁文版《圣经》(圣哲罗姆译本)327-59(esp. 328n), 367, 368n, 369, 522, 606, 612, 695, 697, 699, 701
  editions: of Robert Estienne,《圣经》版本:罗伯特·埃蒂安纳版本 91, 108; of Gutenberg, 谷登堡版本 49-51, 179; of Mentelin(1460), 门特林版本(1460) 179, 374n, 440
  Paris 'edition' (13th c. ms.), 巴黎版本(13世纪手抄书) 46, 91, 328n
  prohibitions against edi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被禁《圣经》版本与译本 328-9, 346-9; *see also* Trent, Council of
  Separate books of: Chronicles, 471《历代记》单行本; Genesis,《创世纪》323, 699; Hebrews,《希伯来书》259; Isaiah,《以赛亚书》323n, 335; Revelation,《启示录》46n; *see* also Gospels
  Special editions: 'Leda' 特殊版本:有"勒达"插图的《圣经》(1572), 259-60; 'wicked' "可恶的"版本 (1631), 81n
  Polyglot versions, 多语版本《圣经》*see* polyglot Bibles
  Vernacular translations of, 通俗语译本《圣经》328-9, 346-9, 358-9, 374, 389, 405-6, 411, 415, 440, 691, 701-2
  Czech, 捷克语版本《圣经》257n
  Dutch, 荷兰语版本《圣经》68, 346n
  English: Geneva, 英语:日内瓦版本《圣经》93, 360, 424; King James (Authorized), 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352, 358, 360n; Louard, 357n; Mathew,《马太福音》356; Rheims-Douai, 兰斯—杜埃版本《圣经》344, 349; Tyndale-Coverdale, 廷代尔—科弗代尔版本《圣经》358, 448n

French: Benoist, René, 法语:勒内·伯努瓦版本《圣经》349n; Lefevre D'Etaples, 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版本《圣经》342, 345; Olivetan, 奥利维坦版本《圣经》311n, 345; Sacy (Mons), 萨希(蒙斯)版本《圣经》351n
German: Luther, 德语版:路德译本《圣经》179, 206-7, 357 363, 614; Mentelin (1466), 179, 374, 440, 691
Italian, 意大利语版本《圣经》348-9, 411-12
Spanish, 西班牙语版本《圣经》349, 415n
Bible, illustrations of, 《圣经》插图 63, 85, 108
Bible-printing, 《圣经》的印行 106n, 130, 180, 311, 325, 330, 337, 346-8, 356, 358n, 374, 377, 415, 440, 447, 449, 660, 691
Bible-reading, ix, 《圣经》的阅读 79, 283, 319, 325-6, 330, 333-4, 339, 343, 348, 351, 396, 700-2
Biblia Pauperum Praedicatorum, 《穷人的〈圣经〉》64
Bibliographie Universelle (periodical) (Le Clerc, J.), 《通用目录学》(期刊)(让·勒·克莱尔编) 138n, 638n
bibliography, 目录学 23, 73, 94, 97-9, 106, 112-13, 219, 591
bibliophiles, 爱书人,藏书家 21, 34, 290, 345, 446
Biblioteca Marciana, 马尔齐亚纳图书馆 *see* Marciana
Biblioca Universalis (Gesner, Conrad, 1545), 《通用书目》(康拉德·格斯纳,1545) 97
Bienewitz, Peter, 彼得·比内维兹 *see* Apianus, Petrus
Bill, John (English printer), 约翰·比尔(英格兰印刷商) 417n
Billingsley, Henry (tr. of Euclid), 亨利·比林斯利(欧几里得著作的翻译家) 361, 550n
biography, 传记 229, 233, 236, 238, 373, 542n see also autobiography
Biringuccio, V., 比林古乔 545, 547n, 555
Black Death, 黑死病 25, 294
black market, 黑市 *see* banned books
Blackstone, Sir William, 威廉·布莱克斯通 364
Blaeu 布劳
Joan (son of Willem Janzoon), 约翰(威廉·詹森之子)480, 688
Willem Janzoon, 威廉·詹森·布劳 480-1, 484, 560n, 600, 617, 624n, 625n, 663n, 676
firm of, 布劳的印务公司 273n, 480, 617, 680
Blasius (of Parma) writer on mechanics, 帕尔马的布拉秀斯,力学作家 497n
Bloch, Marc, 马克·布洛克 xv
Block-printing, 雕版印刷 *see* woodblocks
Blundevill, Thomas, 托马斯·布伦德维尔 103n
blurbs, 夸张的广告词 50, 108, 229, 250, 338, 384, 426n
Boas, Marie, 玛丽·博厄斯 530
Boccaccio, 薄伽丘 196n, 197n, 217, 221, 292-3n, 297, 319, 484, 676
Boccalini, Traiano, 特拉亚诺·博卡利尼 669n
Bodin, Jean, 让·博丹 21n, 102-3, 194
Boethius, 波伊提乌 191, 392, 497n, 532
Bohemia, 波希米亚 474
Bois, John, 约翰·布瓦 360n
Boke called Gouernour (Thomas Elyot, 1631), 《治人者书》(托马斯·埃利奥特) 69n
Bolgar, R. R., R. R. 波尔加 181-2

Bollandists，波朗德派 333n
Bollingen Press，波林根出版社 284n，286
Bologna，波洛尼亚 13，100，103n，355n，538，548n，572，579，580n，591n，593
Bolsheviks，布尔什维克 150
Bomberg，Daniel（Venetian printer），丹尼尔·邦贝格(威尼斯印刷商) 139，224，383，447n，569n
Bomberghe，van (Bomberghen，von) Antwerp relatives of Daniel，凡·邦贝格，丹尼尔在安特卫普的亲戚 447n
Bomberghen，Cornelius von (grand-nephew of Daniel)，科尼利乌斯·邦贝根(丹尼尔的侄孙) 383，447n
Bonaventura，St，圣波拿文都拉 121
Bonfils，Immanuel (c. 1350)，伊马内利·邦菲尔斯(约 1350 年) 500，563
Boniface. St，圣卜尼法斯 203n
Book of Abacus，《算经》see Liber Abaci
Book of Common Prayer (1559)，《英国国教祈祷书》，《公祷书》(1559) 350，365
Book of Martyrs (Foxe，J.)，《殉道者列传》(福克斯) 361，378n，415，423
'book of nature' (topos)，《自然之书》(主题) 289，455-6，471-2，474，476，478，486，501-2，508，629，657，659，670，694
A Booke Named Tectonicon (Digges，Leonard)，《计量筑造学》(莱昂纳德·迪吉斯) 468
book collectors，图书收藏家 222，250n，633n
book fairs，书展 57，167，240，245，307，392，407，460，555，568，581n，622，627，662
book hands，手写体 26，82-3，100，188，202-4，216，299
book hunters，搜求(古)书的人 19n，47，473，492，494，521
book lists，书目 52，59，99，517，579 (Regiomontanus advance book list，586-7，590-1)(雷乔蒙塔努斯的新书预告) see also catalogues
book peddlers，图书零售商 130，377，583n
bookbinders，图书装订商 47，50
bookkeeping，记账法，簿记 *see* accounting
bookshops，书店 132，138，140，144-5，149，386-7，399，444，633
'books versus nature'，"书籍对阵自然" 492-4. 501，503
Borelli，Giovanni Alfonso，焦瓦尼·阿方索·博雷利 673-4
Bossuet，波舒哀 333，351
Bostocke，R.，R. 博斯托克 695n
botany，植物学 98，108-11，258，265-7，484-5，488，535，687 *see* also herbals
Bouclier de la Foy (Grenier，N.)，《弗伊的盾牌》(尼科尔·格雷尼尔) 426n
Boulding，Kenneth，肯尼斯·博尔丁 478-82，699
Boulliau，Ismael，伊斯梅尔·布尔耀 631n
Bourbon dynasty，波旁王朝 146，350-1，363
Bourgeois，Louise，路易丝·布尔热瓦 242
bourgeoisie，资产阶级 146，388，394-6，474-5 *see* also capitalism；middle class
Bovillus(Bouelles，Charles)，95 波韦勒斯(查理·波韦勒)
Boyd，Julian，朱利安·博伊德 116
Boyle，Robert，罗伯特·玻义耳 633，638n，668n，700
Bracciolini，Poggio，波焦·布拉乔利尼 *see* Poggio
Brahe，Tycho，第谷·布拉赫 66，459，467，480-1，500-1，520，533-4，536，577-8，581，583，585，590n，593，596-9，601-3，617n，618n，621，623-6，628-30，632，

634, 640, 648n, 699
Tychonis Braheii… Vita. Accessit Nicolai Copernici, Georgii Peurbachii et Joannis Regiomontanii by Pierre Gassendi (Hague: A Vlacq, 1654),《第谷·布拉赫……生平,哥白尼、波伊巴赫和雷乔蒙塔努斯传略》,皮埃尔·伽桑狄著,(海牙:维拉克,1654) 623-4n
Braillier, Pierre, 皮埃尔·布拉耶尔 541n
Brant,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布兰特 94
Braudel, Fernand,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27
Brescia, 布雷西亚 209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共同生活兄弟会 15, 16n, 58n, 345-6, 692 *see* also'devotio moderna'
Breughel, Pieter (elder), 彼得·勃鲁盖尔(父)
breviaries,《每日祈祷书》118, 178, 312, 354, 357, 390
Breydenbach, Bernhard von, 冯·伯恩哈特·布雷登巴赫 85-6n, 266
Bricot, Thomas, 托马斯·布里科特 497
Brief Narration, (Cartier, J., 1545),《航海记略》(雅克·卡蒂埃)124
Briggs, Sir Henry, 亨利·布利格斯勋爵 532, 534
broadsides, 单张,传单 133,135,304, 375n
Brothers of the Rosy Cross, 玫瑰十字会兄弟会 *see* Rosicrucian
Browne, Sir Thomas, 托马斯·布朗勋爵 18, 336n, 455-8, 471,472, 478, 700
Bruges, 布鲁日 37-8,179
Brunfels, Otto, 奥托·布伦费尔斯 141n, 445n, 487n
Bruni, Leonardo Aretino, 列奥纳多·阿雷蒂诺·布卢尼 189, 221, 233n
Bruno, Giordano, 乔达诺·布鲁诺 140, 141n, 142n, 291n, 418, 421, 551, 652, 694
Brussels, 布鲁塞尔 490, 643
Bucer, Martin, 马丁·布塞尔 370, 373
Buda, 布达 586-7, 589
Budé, Guillaume, 纪尧姆·比代 21n, 103-4n, 221,244, 321,561
Bühler, Curt, 寇特·比勒 51,204
Bullock, Henry, 亨利·布洛克 399n
Bunyan, John 约翰·班扬 352n, 366
Buonarroti,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 *see*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Michelangelo, Jr, 小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 526
Burattini, Tito Livia, 蒂陀·李维亚·布拉蒂尼 283n
Burckhardt, Jacob,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 26, 48, 164, 171, 182, 201, 220, 225-8, 235, 237-9, 243, 285, 300, 378, 456, 488-98, 582
Burghley, Lord, 伯利勋爵 *see* Cecil, Sir William
Burgo, Lucas de, 卢卡斯·伯格 *see* Pacioli, Luca
Burgundian court, 伯艮第宫廷 46n, 80n
Buridan, Joannes, 若安内·比里当 497, 594
Burke, Peter, 彼得·伯克 177, 300, 387, 412
Bury St Edmunds herbal, 伯利·圣埃德蒙兹的药草 492
Bussi, Gianandrea de (Bishop of Aleria), 贾南德里亚·德·比西(阿勒利亚的主教) 19n, 50n, 317, 399n
Butler, Pierce, 皮埃尔·巴特勒 164. 170
Butterfield, Sir Herbert,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勋爵 503, 637, 646
Bylica, Marcin, 马尔欣·比利卡 589n

Byzantium，拜占庭 45n，222-3n，288

C

Cabala，犹太秘法 277-8，289，437 564n，641

'Cabinet des Frères Dupuy'，"迪皮伊兄弟的密室" 644

Caius，John，约翰·凯厄斯 528n

Calcagnini，卡尔卡尼尼 617

Calcar，Jan Stephan of，卡尔加的让·斯提芬 see Stephanus，Joannes

calendar reform，历法改革 466，536，578，594-5，606-13，626n，629，648，693，696

calendars，历法 17，30，60，78，81，178，386，446，580

calligraphy，书法 50，82，96n，258

'Callippic cycles'，"卡利普周期" 580

Calvin，加尔文 67，363，376，381，391，401-2，405，410，445n，594，655

Calvinism，加尔文宗，加尔文教派 311，342，350，377，388-9，409，411，418-19，421，427-8，439，441-2，447n，641，654，681，684

Cambridge Platonists，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 281

Campanella，Tommaso，托马索·坎帕内拉 18-19，412，456n，551，644n，645，652，668，675，694

Campanus of Novara，诺瓦拉的坎帕努斯 500，512n，536n，547n，548，588

Campion，Thomas，托马斯·坎皮恩 221n

Candalla，Franciscus（Condale，François Foix de，16th c. French mathematician），弗兰西斯库·坎达拉（弗朗索瓦·孔达尔，16世纪法国数学家） 588n

Canon（Avicenna），《医典》（阿维森纳） 5-6n，657n

Canterbury Tales（Caxton's ed. 1478），《坎特伯雷故事集》（卡克斯顿版） 112n

Capella，Martianus，马蒂亚努斯·卡佩拉 512，590n

capitalists；capitalism，'spirit' of，资本家；资本主义"精神" 16，22，24，27，30，32，34，57，60，88，93，153，155，179，378-404，410-13，421，445，448，459，522-3，550，552，554，560，660，680，689，702 *see* also Weber，Max

Capito，Wolfgang，沃尔夫冈·卡皮托 372

Cappel，Louis（French Protestant scholar），路易·卡佩尔（法国新教学者） 278n，332-3，337，447n

Cardan，Jerome，杰洛姆·卡当 *see* Cardano，Girolamo

Cardano，Fazio，法奇奥·卡尔达诺 551

Cardano，Girolamo（Jerome Cardan），基罗拉摩·卡尔达诺（杰洛姆·卡当） 236，497，537，541，548，552，562，599n，661

caricatures，讽刺画 68，304

Carlyle，Thomas，托马斯·卡莱尔 157n

Carmelite Order，加尔默罗会修道会 668 *see* also Foscarini

'Carolingian Renaissance'，"加洛林王朝的中兴" see under classical revivals

Cartari，Vincenzo，文森佐·卡尔塔里 195，198

Cartesians，Cartesianism，笛卡尔信徒，笛卡尔主义 286，434，467，638n，646，655，661，681 *see* also Descartes

Carthusians，加尔都西会信徒 14，15，316，374，379n

Cartier，Jacques，雅克·卡蒂埃 124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y，绘图学与地理学 69，83n，109-10，esp. 192-3，227，256，268n，457n，469，478-9，481-2，484，514-18，536，545，555，580，610 *see* also Mercator；Ortelius；Ptolemy

cartolai，书商 12，33，45n，47-8 see also Vespasiano da Bisticci
cartoonist，卡通艺术家 68，303
Casaubon，Isaac，伊萨克·卡索本 73n，77，274n，275n，278n，281-2，321
Cassiodorus，卡西奥多鲁斯 14，15n，50n，316，373
Castellio，Sebastian，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 257n，419，442n，446
Castiglione，Baldassare，巴尔达萨尔·卡斯第里欧尼 429n
The Castle of Knowledge（Recorde，R.），《知识之城堡》(罗伯特·利科尔)534n
Castro，Alphonse de，阿方斯·德·卡斯特罗 329n
Catalan Atlas (1375)，加泰罗尼亚地图(1375) 483n
'Catalogue of English Printed Bookes' (1595)（Maunsell，A.），《英语机印书目录》(1595，安德鲁·蒙塞尔) 106
catalogues，目录，编目 17，52，99，108，198，219，426n，446
  booksellers'，' 书商的销售书目 91，97，98n，106，168，234，274
  library，图书馆的编目 63-4，89-90，618n
cataloguing，编目 45，90-1，93，96，98，106，255
Catalogus Illustrium Vivorum Germaniae（excerpt from Trimius'Liber 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 1495），《德意志名人著述目录》(特里特姆斯《基督教著者名录》的节本) 94n，200n
catechisms，教义问答书，用问答形式撰写的书 12，117，120n，349-51n，356，423-4，435
Catholicon (13th c. Encyclopedia compiled by Friar Johannes Balbus of Genoa ('Giovanni di Genoa') printed by Gutenberg，1460)《万用书》(13 世纪热那亚修士约翰·巴尔布斯[热那亚的焦瓦]编纂的百科全书，由谷登堡印行) 89n
Caxton，William，威廉·卡克斯顿 38-9，104，112n，179，361n，375n，383，457n
Cecil，Sir William (Lord Burghley)，威廉·希塞尔勋爵(伯利勋爵) 96，137n，243，360n，417n
Celestines，塞勒斯坦修会 14
Cellini，Benvenuto，本文努托·切里尼 236n
Celsus，Cornelius，科尼利乌斯·塞尔苏斯 251n
Celtic language，凯尔特语 342
Cennini，Cennino di Drea，德里亚·迪·琴尼诺·琴尼尼 556
censors，censorship，审查者，审查制度 19，138n，142，145n，273，283，332，333n，341n，399，401，405，411n，415-17，420，442，615n，636-82
  decrees and edicts，敕令和诏书 317，328，347，348
'A Censure upon Certaine Passages Contained in History of Royal Society As Being Destructive to Established Religion and Church of England'(Stubbe，H.)，《关于〈皇家学会历史〉里某些文字危害现存宗教和英国国教的审查报告》668
Chabod，Federico，弗雷德里克·恰博 184-5
Chambers，Ephraim，厄弗伦·钱伯斯 682
Champ Floury（Tory，G.，1529)，《田野花》(杰弗里·托里，1529) 203n
Champier，Symphorien，辛富利恩·尚皮尔 523n
Champollion，Jean François，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77n
Charlemagne，查理曼大帝 182，211

Charles I of England, 英王查理一世 645n, 680
Charles V, Habsburg Emperor, 查理五世,哈布斯堡皇帝 396
Charlewood, John, 约翰·查理伍德 417n, 652
charts and diagrams, 图表与图示 47, 53, 67n, 81, 88, 92, 113, 461, 466-9, 471, 483, 510, 512-13, 520-1, 535, 576, 588-9, 590, 599, 611, 620n, 623-4, 663, 694, 698, 701
Châteaubriant, Edict of, 夏多布里昂敕令 328
Chaucer, Geoffrey, 杰弗里·乔叟 112n, 365, 483, 493
Chauliac, Gui de, 居伊·肖里亚克 244n, 251, 538-9
Chaunu, Pierre, 皮耶尔·肖努 434, 435
Cheke, Sir John, 约翰·切克爵士 618n
chemistry, 化学 102n, 275n, 286, 530 *see* also Libavius; Paracelsus
Chenu, M. D., M. D. 切努 290
Cherbury, Lord Herbert of, 切尔伯利的赫伯特勋爵 644n, 645
childhood, 童年 8-9, 430-3 *see* also family
China, printing in, 中国,印刷术 27n, 647n, 648, 652, 702
'Chirographic' culture, "书法"文化 9n *see* also scribal cultue
Chirurgia (Chauliac, Gui de), 《外科学》(居伊·肖里亚克) 538-9
chorography, 地志学 516
Christianopolis (Andreae, J. V.), 《阳光城》(约翰·瓦伦丁·安德雷) 668n
Christina of Lorraine, Grand Duchess of Tuscany, 洛林的克里斯蒂娜,托斯卡纳的大公爵夫人 526
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 克里斯蒂娜,瑞典女王 674n
Chronicle (Eusebius, 1483 ed.), 《编年史》(优西比乌斯,1483 年编) 106n
chronicles, 编年史 95-6, 127, 190, 234, 296, 352, 599
Chronicles, 《历代记》, separate books of chronologies, Chronologies, 年代学,年表 10, 106n, 113, 124, 186-7, 197, 199-200, 483, 580, 610-11, 700 *see*
Church Councils, 基督教会公会议 *see* Fifth Lateran, Nicea, Trent, Vatican II, Vienne
Church fathers, 教会之父,早期基督教教士 225, 297-8, 319, 341, 392
Cicero, 西塞罗 191n, 204, 217, 279, 293
Ciceronian, 西塞罗风格的 297, 298, 372, 524
Cimento (*Academia del Cimento*), 西门托(西门托学会) 666-8, 674
ciphers, 密码 96-7, 137n, 277, 551, 563, esp. 563n
Cipolla, Carlo, 卡洛·奇博拉 60
City of the Sun (Campanella, T.), 《阳光城》(康帕内拉) 69n, 668n
Clagett, Marshall, 马歇尔·克拉吉特 211, 496, 497, 611
clandestine book trade and presses, 秘密图书贸易和出版社 19, 137-45, 274n, 283, 348-9, 354, 411, 413, 416-17, 441, 644, 664, 671, 682
Clark, T. J., T. J. 克拉克 64n
classical revivals, 古典的复兴 163-302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卡洛林王朝的复兴 94, 173, 182-4, 215
Twelfth century, 12 世纪的古典复兴 173, 175-6, 182-4, 538
quattrocento, 12 世纪的古典复兴 73, 170, 173-5, 183-4n, 188, 212, 286, 294, 298
cinquecento, 16 世纪的古典复兴 116, 180, 188, 200, 286, 302, 369

see also Renaissance; 'rinascita'
Clavis Mathematica (Oughtred),《数学秘诀》(奥特雷德) 633n
Clavius, Christoph, 克里斯托弗·克拉维 615n, 618n
Clement Ⅷ, Pope, 教皇克雷芒八世 328
clocks, mechanical, 机械时钟 589
Clusius, Carolus, 卡罗卢斯·克鲁西乌斯 267, 546n
Cocceians, 科齐乌斯派 655n
Cochin, Charles Nicolas, 查理·尼古拉·科钦 143n
Code and Digest (Justinian),《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 *see* Corpus Juris
codex form of book, 羊皮纸卷抄本 22, 33n, 334
'codicology', (羊皮纸卷)手稿学 10n
Colbert, Jean Baptiste (Louis XIV's minister), 让·巴蒂斯塔·柯尔贝尔(路易十四的大臣) 645
Coler, Georg, 乔治·科勒 627n
Colet, John, 约翰·科利特 396
Colie, Rosalie, 罗萨莉·科里 144
Colines, Simon de (16th c. Paris printer), 西蒙·科里内(巴黎印刷商) 342n, 442, 540n, 545, 567n
College of Physicians (London), 内科医师学会(伦敦) 362, 473n
Collège de Saint Côme, 圣柯梅学院 541n
Collins, Anthony, 安东尼·科林斯 338n
Cologne, 科隆 15, 179, 206, 316n, 347, 383n, 400, 540
Colonna, Agapito, 阿加皮托·科隆纳 295
colophons, 书末题署,版权页标记,图书宣传用语 59, 89n, 96n, 138, 145n, 235, 560n,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490, 508, 512, 582-3, 585, 591, 592n, 595, 601
Columbus, Realdus, 雷尔杜斯·哥伦布 529n
Comenius, Johann Amos, 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 68-9, 284, 362, 644n, 647
comets, 彗星 598-9, 602, 619n, 686
Commandino, Federigo, 菲德里戈·康曼迪诺 96n, 620n
Commentariolus (Copernicus),《评论》(哥白尼) 581n, 583n, 613n, 617n, 621n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知识界,欧洲各国使用拉丁文的知识界,学界共同体, xiv, 56, 69, 76, 109, 112, 137-42. esp. 138n, 243, 275n, 359, 409, 480, 529-31, 563, 638, 654, 665, 674, 691, 698-701, 706 *see also* Republic of Letters
Compendium... de origine regum et gentis francorum (Trimius, 1515),《汇编》(特里特姆斯,1515) 96n
compositors, 排字工 52, 81, 87n, 167, 224, 441, 461n, 588n, 627n
computus, 计算 608, 611-12 *see* also calendars; Easter
Computus (Villedieu, Alexander de),《计算》(维尔迪埃的亚历山大) 608n
Comte, Auguste, 奥古斯特·孔德 641n
concordances, 字母表顺序索引 67n, 92, 97
Concordance of Discordant Canons (Gratian),《论不和谐教义之和谐》(格拉提安) 284
Concordia Mundi, 和谐世界 448 *see also* Guillaume Postel
Condillac, Étienne de, 艾狄安·孔狄亚克 146
Condorcet, Marie, Marquis de, 马尔基·孔多塞 26, 146, 299, 300n
Conduitt, John (nephew of Isaac Newton), 约翰·孔迪特(艾萨克·牛顿的侄子) 679
Confessions (Augustine),《忏悔录》(奥古斯丁) 230

confessors，忏悔人 64，87，318
Confrérie des Libraires，Relieurs，Enlumineurs，Ecrivains et Parcheminiers，书商、装订工、插图师、代写书信书者与羊皮纸制造人组成的书业行会 49
Conics（Apollonius），《圆柱体》（阿波罗尼奥）620n
Consensus Helveticus（1674），《赫尔维西同意书》，即《瑞士信条》（1674）332，420
conspiracies，secret networks，密谋，秘密网络 140-5，149-50，274-6（underworld of learning），学界的秘密活动 438，443-4 *see* also clandestine book trade；Rosicrucians
Constantine，君士坦丁 296-7，334n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25，45，210，220-1，222n，223，369-70，463，586
Constitutiones Clementinae，《克莱芒五世判令集》340n
Consuetudines（*Coutumes*，Customs）from Grande Chartreuse（Carthusian chapter house），查尔特勒修道院（加尔都西会修院）的修行（习俗）374，379
Conti，Natale，（Comes，Natalis），纳塔尔·孔迪（纳塔利斯·科梅斯）195，198n
'contra Cremonensia'（Regiomontanus），"唱反调的评论"（雷乔蒙塔努斯）590n
Convent of San Jacopo of Ripoli，利珀里的圣雅科珀修道院 15n，46n
conversion tables，换算表 *see* tables
cookbooks，烹饪书 64，429
Cook，Captain，库克船长 469，487
Coornhert，Dirk，迪尔克·昆赫特 442n
Copenhagen，哥本哈根 533，581，625n，667
Copernicus，Nicholas，尼古拉·哥白尼 113，189n，191，221，262，273，298，454，458，459，466，483，490，500-1，503，509-10，516，523，525，536，547n，637，639，648n，650-55，659n，664，679，683，685，692-6
Copernican Revolution，哥白尼革命 71，299，462，575-635，638，649，672-6，692；*see also De Revolutionibus*
Coptic language，科普特语（埃及古语）343n
copyists，口授记录人，誊写人 *see* scribes
copyright，版权 229，231n，401，556-7 *see als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rdier，Mathurin，马蒂兰·科尔迪埃 316n
Cornelio，Tommaso，托马索·柯内里奥 667
Corpus Juris（Justinian），《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62n，103-4，339，355n，503
Florentine codex，佛罗伦萨藏羊皮纸抄本 103，622n
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ts，通信，通信人 29，98，109，121，190n（epistolography），（书信技法）217，232-3，266，359，448，460-1，642（Mersenne's network）梅森的网络
'open' letters（printed）"公开"信（机印本）630-1，643，662，674，687
corresponding societies，通信社团 149
Cort，Cornelius（Dutch engraver），科特·科尼利乌斯（荷兰镌刻画家）231n
Corvinus，Matthias，（King of Hungary），马提亚·科维努斯（匈牙利国王）Ⅲ，580n，586
cosmographers，宇宙志学者，宇宙结构学家 144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Waldseemüller，M.，St Dié，1507），《宇宙结构学导论》（马丁·瓦尔德西米勒，圣迪耶，1507）120n
Cosmography（Apianus），《宇宙结构学》（亚皮阿努斯）534
Cosmography，（Munster，S.，1554），《宇宙结构学》（塞巴斯蒂安·明斯特，1545）109
cosmology，天文学 315，466，498，503，510，

518，595n，596-9，602，663，674，687
'Cosmopolis'（as colophon），"大都会"（图书宣传用语）138-9
Cosmooria（Fernel，Jean，1527），《宇宙论》（让·菲内尔）567n
Coster，J.，J. 科斯特 31，119
costume manuals，服饰手册 84-5
counterfeiters，伪造者 324
Counter-Reformation，反宗教改革 125，314（Catholic Reformation），（天主教改革）325-7，344-5，348，354，389，406-9，411-16，421，426-7（English reactions to），（英格兰对宗教改革的反应）444，648，652-3，656 *see also* censors；Index；propaganda；Trent，Council of
Courbet，Gustave，古斯塔夫·库尔贝 64
Courtier（Castiglione，B.），《朝臣宝典》（巴尔达萨尔·卡斯第里欧尼）429n
Coverdale，Miles，迈尔斯·科弗代尔 448n
Craig，John，约翰·克雷格 79n
Cranach，Lucas，卢卡斯·克拉纳克 68，376n
Cranmer，Thomas，托马斯·克兰麦 349，365
Crespin，Jean，让·克雷斯宾 139n
Crete，克里特岛 222-3
Croll，Oswald，奥斯瓦尔德·克罗尔 275n，276n，474
Crombie，A. C.，A. C. 柯隆比 264n，468，498，504-5
Cromwell，Thomas，托马斯·克伦威尔 135，312，349，357
Cronberger，Jakob，雅各布·克隆伯格 404
Cruger，Peter，彼得·克鲁杰 630n
cryptography，密码学 96，97
Cujas，Jacques，雅克·居雅斯 103-4，194-5
Culpeper，Nicholas，尼古拉·卡尔佩珀 362，656
Curtis，Mark，马克·柯蒂斯 134
Curtius，Ernst，恩斯特·库尔提乌斯 7，456-7n
Cybo of Hyères，耶尔的奇波 264n
Cyclopedia，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Chambers，1728），7《艺术与科学百科全书》（钱伯斯，1728），682
Cyprus，塞浦路斯 375n

D

Dante，但丁 190，232n，293n，319n，510
Danzig，但泽 617n
Dark Ages，黑暗时代 175，258，294-8，304-5，378n，470，582n
Darnton，Robert，罗伯特·达恩顿 136n
Darwin，Charles，查尔斯·达尔文 75n，461，617，657
data collection，数据搜集 107-13，219，227，262，267，379，422，465，476，479-80，483，487，505，518，520，531，559，592，596，600，640，659，663，670，687，689，694，701 *see* also correspondents，'feed-back'
Davis，Natalie Z.，纳塔利·Z. 戴维斯 384，543
Day，John（printer），约翰·戴伊（印刷商）89，360-1，549
De Arte Predicandi，《布道的艺术》63n
De Arte Supputandi（Tunstall，C.，1522），《计算的艺术》（滕斯托尔，1525）548n
De Bry，Johann odore，约翰·泰奥多尔·德布莱 141，275n，276n，529
De Caelo（Aristotle），《论天》（亚里士多德）581n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Erasmus），《论男孩的礼貌教育》（伊拉斯谟）430
De Corrupti Sermonis Emendatione（Cordier，Mathurin，1530），《布道辞校勘》（马蒂兰·科尔迪埃，1530）316n

De Deis Gentium (Giraldi, G. B.),《神谱》(吉拉尔迪) 198n
De Elegantiis Linguae Latinae (Valla, L.),《优美的拉丁语》(洛伦佐·瓦拉) 52n, 137n, 205n
De Emendatione Temporum (Scaliger, J. J., 1583),《时间的修正》(斯卡利杰) 611n
De Fabrica (Vesalius, 1543),《人体的结构》(维萨里) 53n, 239n, 262, 267, 447n, 487n, 489-90, 536n, 568-74, 575-7, 616-17
De Fructu qui ex doctrina, percepitur, liber (Pace, R.),《文科教育之裨益》(理查德·佩斯) 396
De Historia Piscium (Willoughby),《双鱼座的故事》(弗朗西斯·威洛比) 634
De Idolotria (Vossius, 1642),《偶像崇拜》(沃西乌斯,1642) 281n
De Inventoribus Rerum (Vergil, P.),《伟大的发明》(波利多尔·维吉尔) 21n, 233n
De Justa Haeriticorum Punitione (Castro, A. de, Salamanca, 1547),《对异端的惩罚》(卡斯特罗,萨拉曼卡,1547) 329n
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 Choses en l'Univers (Le Roy, Louis, 1575),《宇宙万物之沧桑》(路易·勒罗伊) 166n
De Lateribus et Angulis Triangulorum (Copernicus, N.; 'Sides and Angles of Triangles', ed. Rheticus, Wittenberg, 1542),《三角形综述》(哥白尼,雷蒂库斯编,维滕堡,1542) 623n, 650n
De Laude Scriptorum (Gerson),《抄书人赞》(热尔松) 50n
De Laude Scriptorum (Trimius),《抄书人礼赞》(特里特姆斯) 14, 50n, 378n, 380
De Ludo Aleae (Cardano, G.),《论赌博游戏》(卡尔达诺) 662
De Magnete (Gilbert, W.),《论磁体》(威廉·吉尔伯特) 520
De Medicina (Celsus, C.),《医学》(科尼利乌斯·塞尔苏斯) 251n
De Methodo (Aconcio, J., Basel, 1558),《方法论》(雅各布·阿孔奇奥,巴塞尔,1558) 103n
De Motu Sanguinis (Harvey, W.),《论血液循环》(哈维) 275n, 489, 528-9n
De Occulta Philosophia (Agrippa),《奥秘哲学》(阿格利帕) 95-6
De Oratore (Cicero, 1465 ed.),《论雄辩》(西塞罗,1465) 204
De Prospectiva Pingendi (Francesca, Piero della),《绘画透视学》(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 548
De Re Aedificatoria (Alberti),《建筑学十书》(阿尔贝蒂) 83n, 551n
De Re Anatomica (Columbus, R.),《解剖学》(雷尔杜斯·哥伦布) 529n
De Re Metallica (Agricola),《金属学》(阿格里科拉) 242, 568
De Re Militari (Valturi),《论军事》(瓦尔图里) 565n
De Rebus Expetendis (Valla, G., Venice: Aldus, 1501),《自然之谜》(乔治奥·瓦拉,威尼斯:阿尔杜斯,1501) 577n, 620n
De Rerum Natura (Lucretius),《物性论》(卢克莱修) 209, 409n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stium (lst edn Nuremberg, 1543; 2nd edn Basel, 1566) (Copernicus, N.),《天体运行论》(纽伦堡首版,1543;巴塞尔第二版,1566) 99n, 453, 462, 480, 490, 509-10, 575-7, 581n, 585n, 586n, 587, 589, 591, 595n, 614-18n, 620-1, 623, 626, 647, 650-2, 662n, 672, 675-6, 695n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Reuchlin)《希伯来语基础》(罗伊希林) 367n
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 (Trimius),《基督教著者名录》(特里特姆斯) 94n
De Stirpium (Fuchs, L.),《草本学》(里昂哈特·福克斯) 266n
De Triangulis (Regiomontanus, 1533),《论三角形》(雷乔蒙塔努斯, 1533) 586n, 591, 621n
De Veritate (Cherbury, H.),《论真理》(切尔伯利的赫伯特) 644n
De Viris Illustribus (Facio, B.),《论插图画》(巴托罗米奥·法奇奥) 232n, 233n
De Vita Propria (Cardano, G.),《我的一生》(基罗拉摩·卡尔达诺) 236
Decades (Livy),《历史》(李维) 100
Decimals Made Easy (Recorde, R.),《轻松学习十进制》(罗伯特·利科尔) 534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1789, French),《人权宣言》355n
dedications, 奉献,献词 106, 401
Dee, John, 约翰·迪伊 96-7n, 99, 144, 274n, 276, 361,534n, 549-50, 554n, 618n
Defoe, Daniel, 丹尼尔·笛福 316, 321, 352n, 384
deists, 自然神论者 142n, 641n, 645, 701
Delumeau, Jean, 让·德鲁默 314
Demonologie (James I),《鬼魔学》(詹姆斯一世) 669n
demonology, 鬼魔学,鬼神观 433-4, 437-9 *see also* magic; witches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125, 143n, 245, 290, 300n, 409, 418, 420, 459, 530n, 616, 633, 640n, 642, 647-9, 653, 663-4, 679, 681
'A Description of the Famous Kingdome of Macaria' (Plattes, G.),《著名的马卡迪亚王国素描》(加布里埃尔·普拉特斯)305n
Destrez, Jean, 让·德斯特勒兹 13n, 80n
Deventer, 迪温特 15n, 16n, 346n, 401, 403-4
devotio moderna, 近代虔敬运动 14, 175n, 315 *see also* Brethren of Common Life
devotional literature, 虔修读物 78, 127n, 315, 380, 391, 542, 656, 691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151
diagrams, 图表,示意图 *see* charts
Dialogue on Two World Systems (Galileo),《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 672,676-7
Dialogues (Plato, Ficino tr., 1483),《对话》(柏拉图著,菲奇诺译) 46
Dickens, A. G., 亚瑟·G.. 狄更斯 310-11n, 353, 368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130
dictation, 听写 11, 70, 524, 698
dictionaries, 词典 17, 81, 88-9, 91, 99-100, 177, 220-2, 245, 337, 362, 566, 579, 671
  trilingual, 三语的 78, 224
  see also lexicography
Dicionnaire (Boyle, P.),《词典》(玻义耳) 143,420
Diderot, Denis, 德尼·狄德罗 265
Die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orie (Einstein),《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 615n
Die Sieben Busspsalmen (Luther),《圣诗七首》(路德) 308n
Digges, Leonard, (far of Thomas), 莱昂纳德·迪吉斯(托马斯之父)468,618n, 659n
Digges, Thomas, 托马斯·迪吉斯 458, 618n, 652
Dijksterhuis, 迪克斯特乌斯 498n, 506
Diodati, Elias (Elie), 埃利亚斯·迪奥达蒂

644-5, 647n, 653-4n
Diodati, Giovanni (Jean), 焦瓦尼·迪奥达蒂(让) 349, 411-12, 644n, 647n
Dioscorides, 迪奥斯科里德斯 110, 484-5, 487-8 *see also* Mattioli
Dirac, *Paul Adrian* Maurice, 保罗·亚德里安·莫利斯·迪拉克 461n
'Directions for Seamen bound for far Voyages' (Royal Soc. pub., 1665), 《远航水手指南》(皇家学会,1665) 476
Discours Admirables (Palissy), 《奇妙的讲演录》(帕利西) 541
Discourses on Livy (Niccolò Machiavelli), 《论李维》(尼科罗·马基雅弗利)101
Discourses on Two New Sciences (Galileo), 《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伽利略) 677-8
dissent, 异见,异端 311, 345n
Dissenters, 持不同政见者,非国教教徒 316, 352n
Divina Commedia (Dante), 《神曲》(但丁) 319n
Divina Proportione (Pacioli), 《神奇的比例》(帕奇奥里) 588
'Divine Art' (description of printing), "神圣的艺术"(用以描绘印刷术) 50n, 62, 155, 217, 250, 317, 347
Doctrinal des Filles, 《淑女教程》64
Dolet, Etienne, 埃蒂安纳·多雷 360n, 423n
Dominican order, 多明我会 50n, 63n, 297n, 314n, 375n, 398, 419, 433, 436-9, 495
'Domus Charitatis', "慈善会" *see* Family of Lov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皇帝捐献的"伪书" 281
Donatus, 多纳图斯 46n, 187
Dondi, Giovanni de, 焦瓦尼·德·东迪 589n
Doni (Italian publicist), 多尼(意大利宣教者) 614n
Donne, John, 约翰·多恩 662n
Dort, Synod of, 多尔德会议 420n, 655
Drake, Stillman, 斯提尔曼·德雷克 524-5, 528-9, 622, 676
Dreyer, J. L. E., 德雷尔 500
Dryden, John, 约翰·德莱顿 192
Du Bartas, Guillaume de Saluste, 迪巴尔塔,纪尧姆·萨鲁斯特 614n
Du Bellay, Joachim, 约金·迪贝莱 21n
Duhem, Pierre, 皮埃尔·迪昂 494n, 495, 497-8, 501, 506
Duns Scotus, John, 约翰·邓斯·斯各特 499, 548
Durand, Laurent, 洛伦·迪朗 143n
Durant, Will, 韦尔·杜兰特 44
Dürer, Albrecht, 阿尔布雷特·丢勒 68, 98n, 176, 188, 203n, 205n, 243, 247-8, 268n, 280n, 341n, 404, 447n, 546, 548-50, 559-60, 564, 589n
Duret, Noel, 诺尔·迪雷 631n

E

Easter, 复活节 610, 612, 696 *see also* calendar reform
Edward VI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 358n
Egnazio, Giovanni Battista (16th c. Venetian pedagogue and editor), 焦瓦尼·巴蒂斯塔·埃格纳奇奥(16 世纪威尼斯教育家与编辑) 547n
Egypt (ancient culture of), 埃及(古埃及文化) 69n, 77, 272n, 287, 563 *see* also Hermetic writings; hieroglyphics
Einstein, 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615n, 618
The Elements of Geometric of the Most

Ancient Philosopher Euclide of Megara (Billingsley tr. of Euclid, 1570),《最悠久的哲学家梅加拉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亨利·比林斯利编译,1570) 361, 550

Eleuthera (as colophon),埃流特拉(图书宣传用语中的梦幻之地) 139

Elizabeth I of England,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106, 128n

Elizabethans,伊丽莎白时代人 79, 361, 385, 429, 618

Elliott, J. H., J. H. 艾略特 496

Elsevier 埃尔西韦尔

Louis,路易·埃尔西韦尔 140n, 409, 645, 653

firm,埃尔西韦尔公司 338n, 351n, 480, 645n, 645, 678, 680,691

Elyot, Thomas,托马斯·埃利奥特 69, 698

Emblemata (Alciati),《浮雕装饰》(阿尔恰提) 175n, 280n

emblem books,寓意画书籍 68-9, 280

émigrés,出境移民 23, 177, 414, 446, 449 *see also* Huguenots; Marian exiles

Emile (Rousseau, J.-J.),《爱弥尔》(让·卢梭) 151

empiricists,经验论者 472-3, 476-7, 485, 491,494-5, 508, 568

encyclopedias,百科全书 86n, 89n, 98n, 102, 109, 436,514, 550 *see* also Cyclopedia, Grande Encyclopédie

engineers,工程师 535, 551, 688-9, 693

England's Birth-Right Justified (Lilburne, J., 1645),《英格兰的出生权是合法的》(利尔伯恩,1645) 362n

The English Tradesman (Defoe, D.),《英格兰商人》(迪福)384

engravers,雕刻师,雕工 56, 77, 84-5, 109, 143, 176, 231n, 234n, 238, 248n, 259-60, 262, 276, 280, 283, 447n, 480, 510, 532, 535, 541, 548, 567, 577, 625

engraving, art of,镌刻艺术 68, 171-2, 200, 263, 302, 575, 625

engravings,镌刻画,铜版画 85, 234, 259-60 *see also* illustrations; visual aids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 18, 29, 136, 146, 148, 284,393, 410, 418-20, 439, 443, 449, 558, 563, 619, 691, 701

ephemerides,星历表 81, 619, 659, 661

Ephemerides (Regiomontanus),《星历表》(雷乔蒙塔努斯) 583, 587, 618

Ephemerides (Stadius),《星历表》(斯塔狄乌斯) 596n

Ephemeris Anni 1557 (London: John Feild, 1556),《1557 年安尼星历表》(伦敦:约翰·菲尔德,1556) 618n

Epistles (St Jerome, Rome: Sweynheim and Pannartz, 1469),《使徒书》(圣哲罗姆,罗马:斯韦因海姆与潘纳兹) 15n, 50n

epitomes,提要,精要 169-70, 464, 630

Epitome Astronomiae Copernicanae (Kepler),《哥白尼天文学提要》(开普勒) 630n, 632, 639

Epytoma in Almagestum Ptolemai (Peurbach and Regiomontanus),《托勒密天文学精要》(波伊巴赫与雷乔蒙塔努斯) 584n, 585

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 (Chaucer),《行星的赤道》(乔叟) 277n

Erasmus,伊拉斯谟 18, 104n, 106n, 136, I44-5, 174n, 175-6, 180, 184, 190n, 191n, 205n, 219, 221, 223n, 234, 279-80, 297, 309n, 316-17, 320, 323n, 331, 338n, 341-2, 346, 353, 357, 372, 396, 399n, esp. 400-2, 405, 415-16, 429-20,

430，439，457n，545，571，620n，676，693，696
'Erasmians','Erasmian humanism'，"伊拉斯谟追随者","伊拉斯谟人文主义" 207，248，301，323，356，364-8，418，421，444，449
errata，勘误表 80，85，587
The Errors of Painting (Fabriano)，《绘画中的错误》(法布里亚诺) 257n
Escorial，El，埃斯科里亚尔 444，448
Essay on National Education，or Plan of Studies for Young (La Chalotais)，《论国民教育》(拉·夏洛泰) 351n
Essex，earl of，艾塞克斯伯爵 106
Estienne 埃蒂安纳
Charles，查理·埃蒂安纳 387，509，541，566-7
Henri Ⅱ，亨利·埃蒂安纳二世 73n，231n，447
Nicole，尼科尔·埃蒂安纳 242
Robert，罗伯特·埃蒂安纳 91，99，104n，108，205n，328，331，336，342n，356，399-401，411，441，447，540，567n，691
firm，埃蒂安纳印刷所 221n，334n，680
etiquette books，礼仪书 64，430-1
Etymologies (Isidore of Seville)，《语源学》(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513-14
Euclid (of Megara)，欧几里得(梅加拉的) 23，170n，187，193，212，214，237，242，288，290，361，471，494，497n，499，505，531，534，541，546-54，552，588-9，593，620n，623n，699-70
Translations：English (Billingsley)，欧几里得著作译本：英语译本 361，534n，549，550n；French，法语译本 541；Italian (Tartaglia)，意大利语译本(塔尔塔利亚) 546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 180
Eusebius，优西比乌斯 106n
evangelism，lay，俗人(非神职人员)的福音主义 318，345-6，348，357，360-1，371
Exegeses Fundamentorum Gnomonicorum (Scheiner，C. Ingolstadt，1615)，《日晷制作的基本原理》(谢纳，英格尔斯塔特，1615) 561n
Eyb，Albrecht von，阿尔布雷希特·冯·艾布 372n

F

Fabriano，G. A. Gilio da，G. 法布里亚诺 257
Fabricius，Hieronymus，法布利齐乌斯 262n，562n
Facio，Bartolomeo，巴托罗米奥·法奇奥 232n，233n
Fama Fraternitas (Rosicrucian manifesto)，《玫瑰十字会宣言》275n
Familists，"爱之家"会员 *see* Family of Love
family，家庭 133-4，424-31，447 *see also* childhood
'Family of Love'，"爱之家" 140-1，144，275，443-6，448n，669
Fanti，Sigismondo，西吉斯蒙多·凡蒂 82n
Fasciculus Medicinae (Ketham，Venice：Gregoris，1493-4)，《医学六论》(柯坦，威尼斯，格雷高利，1493-4) 536n
Faust (Johann Fust)，富斯特(约翰·富斯特) 50，95n，277n，438
Febvre，Lucien，吕西安·费弗尔 41，434
Febvre，Lucien and Martin，. H.-J.，吕西安·费弗尔与马丹 . H.-J.，5，33，35-6，153，511
Federigo da Montefeltro，Duke of Urbino，菲德里戈·蒙特费尔特罗，乌尔比诺公爵 48

'feed-back', 反馈,回馈 111, 127, 268, 462, 479, 481-2, 487-8, 518, 573, 631, 680, 687 *see* also data collection 数据搜集
Feild, John, 约翰·菲尔德 *618n*
Feliciano, Felice, 菲利奇·菲利奇亚诺 203n
Fermat, Pierre de, 皮埃尔·费马 530, 537, 554, 662
Fernel, Jean, 让·菲内尔 21n, 567n,
Ferrara, 费拉拉 349, 508n, 593, 602
'Festina Lente'(Erasmus), "急而稳"(伊拉斯谟) 280n
Fibonacci, 斐波纳契 *see* Leonardo of Pisa
Fichet, Guillaume, 纪尧姆·菲歇 250, 399n, 561
Ficino, Marsilio, 马西里奥·菲奇诺 46n, 77, 98, 280n-1, 285n-6, 288, 438
Field, Richard, 理查德·菲尔德 415n, 417n
field trips, 田野调查 53n, 110, 112n, 233, 266, 484, 687 *see also* data collection
Fiesole, 菲索尔 45n
Filarete, 菲拉雷特 232n
Finé, Oronce, 奥隆斯·斐奈 521, 544-5, 567n
First Narration (Rheticus), 《天文学初步》(雷蒂库斯) 652
Fitzer, William (William Harvey's publisher), 威廉·菲齐尔(威廉·哈维的出版商) 275n
Florence, 佛罗伦萨 12, 15n, 46-7n, 49-50n, 178-9, 185n, 189, 207, 217, 227-3, 23-3, 252-3, 293-4, 353n, 382-3, 483, 492, 525-8, 553n, 643, 645, 653, 667, 671
Florio, John, 约翰·弗洛里奥 27n, 362
Fludd, Robert, 罗伯特·福卢德 69n, 275n, 276n, 529, 549n, 550n, 669n
Fontenelle, Bernard, 贝尔纳·丰特奈尔 624n, 698
forbidden books, 禁书 *see* banned books
Foresti, Jacobo Filippo, 雅各布·菲利普·福雷斯蒂 66n
forgery, 伪造 *122*, 147, *281-2*, 321, 323-5,437
Foscarini, Paolo Antonio, 保罗·安东尼奥·福斯卡里尼 551, 644n, 653n, 668, 675-6, 694
Foxe, John, 约翰·福克斯 21n, 128n, 304, 305n, 311n, 373n, 378, 415, 419, 423,446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会员 393,495,551
François I of France, 法兰西的弗朗索瓦 104, 545
Frankfurt, 法兰克福 57, 139-42, 250, 275n, 407, 474, 529n, 617n, 627, 655, 668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154-5, 380-1
Frauenberg (Frombork), 福隆堡 579, 593, 621n
Frederick Ⅱ, Holy Roman Emperor, 腓特烈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498, 537n
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 萨克森选侯智者腓特烈 376n
Freemasons, 共济会员 *see* Masons
freethinkers, 自由思想家 142, 257n, 644-5n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85, 138, 149, 326n, 362,388, 394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xn
friars, 修士,托钵僧 73,125, 285, 315, 384, 394, 495, 546n-51, 689, 693
Friedberg, Peter von, 彼得·冯·弗莱堡 15n
Frisius, Gemma, 格马·弗利休斯 529, 534, 599n
Froben 弗洛本
Jerome (Son of Johann), 杰洛姆·弗洛本(约翰之子) 99n, 276n, 617n

Johann (Basel printer), 约翰·弗洛本(巴塞尔印刷商) 99n, 106n, 368, 372, 570
firm, 弗洛本印刷公司 76n, 309n, 341, 396, 430n *see* also Amerbach
Frobisher, Martin, 马丁·弗洛比歇 21n
Frombork, 福隆堡 *see* Frauenberg
Froschauer, Christopher (16th c. Zürich printer), 克里斯托弗·弗洛绍尔(16世纪苏黎世印刷商)99
Frost, Robert, 罗伯特·弗罗斯特 493
Fuchs, Leonhart, 里昂哈特·福克斯 234n, 266n, 486
Fuggers, 富格尔家族 539
Fulbert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福尔拜 497n
Fulda, 弗尔达 316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360, 364, 366-7, 439-40, 657, 704 *see* also literalism (Biblical)
Fur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弗雷特 29n, 414n
Fust, Johann, 约翰·富斯特 31, 49-50, 60, 95-6, 179

G

Gaguin, Robert, 罗伯特·盖冈 250n, 399n
Galen, Galenism, 盖仑, 盖仑的解剖学 69, 75, 189n, 193, 242-3, 362, 453-4, 473, 475, 484-5, 486-7, 490n, 502-3, 523-5, 529, 566-74 (Galenic revival), (盖仑的复兴) 616, 693
Galileo, 伽利略 119, 137, 273, 409, 412-13, 456n, 458-9, 495, 496, 501-2,504, 523, 525 30n, 553, 555, 561n, 577n, 619, 620, 630, 631, 632, 633, 637, 639n, 640n, 643, 644-5, 647-9, 652-4, 656, 657-8, 660-1, 663-4, 683, 685, 694, 697-8
Galileo's Trial, 伽利略受审 461, 636, 648n, 654, 666, 670-82
Galleus (Antwerp publishing firm), 加拉斯(安特卫普的印刷所) 20
Gallus (Roman printer), 加卢斯(罗马印刷商) 20n
Gardiner, Stephen, 史蒂芬·加德纳 68
Gargantua (Rabelais), 《巨人传》(拉伯雷) 73, 400
Gart der Gesundheit (von Cube, Mainz: Peter Schoeffer, 1485), 《德意志植物志》(冯·库布, 美因兹: 彼得·舍费尔, 1485) 86, 266
Gasparini Orthographia (Barzizi, G.), 《加斯帕利尼正字法》(加斯帕利尼·巴齐齐) 250n
Gassendi, Pierre, 皮埃尔·伽桑狄 623, 624n (Life of Tycho Brahe), 《第谷传》 629n, 631, 642, 644, 647
The Gate of Knowledge (Recorde, R.), 《知识之门》(罗伯特·利科尔) 534n
Gauss, Karl Friedrich, 高斯 607, 680
Gautier, Théophile, 泰奥菲尔·戈蒂埃 157n
Gay, Peter, 彼得·盖伊 298
Genealogy of the Gods (Boccaccio), 《神谱》(薄伽丘) 196n
Genesis, 《创世纪》 *see* Bible, separate books of
Geneva, 日内瓦 206-7, 328, 331, 349, 360n, 363, 402n, 405, 410-13, 418-20, 441-2n, 446, 644, 647n, 654-5, 682, 684
Geoffrey of Meaux (medieval astronomer), 莫城的杰弗里(中世纪天文学家) 601
Geographia (Ptolemy, Bologna, 1477), 《地理学指南》(托勒密, 博洛尼亚, 1477) 192-3, 469, 516, 592n, 594,659
Geographia Generalis emendata et illustrata

ab Isaaco Newton (Varenius, Cambridge, 1672),《牛顿地理学的校勘与图释》(瓦雷尼乌斯,剑桥,1672) 663n
geography, 地理学 *see*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y
Geometrie (Descartes),《几何学》(笛卡尔) 633
geometry, 几何学 252, 277, 497, 525n, 531-3, 541-2, 547-50, 576, 588-9, 697, 699 *see also* Euclid; quadrivium
George of Trebizond, 特雷比宗的乔治 399n, 464n
Gerard of Brussels, 布鲁塞尔的杰拉德 537n
Gerard of Cremona, 克雷莫纳的杰拉德 210, 590
Germania (Tacitus),《日耳曼人》(塔西佗) 127, 201
Gerson, Jean, 让·热尔松 14-15, 50n, 373
Gesner, Conrad, 康拉德·格斯纳 73, 96n-9, 107, 109, 111, 268n,301, 483, 708
Geynes, John, 约翰·盖因斯 473n
Ghiberti, Lorenzo, 洛伦佐·吉贝尔蒂 232n, 252, 293, 551n
ghost writers, 捉刀人 146
Gianandrea de'Bussi, 贾南德里亚·德·比西 *see* Bussi, G.
Gibbon, Edward, 爱德华·吉本 185n, 201n, 295, 393
Gide, André, 安德烈·纪德 352
Giese, Tiedemann (Bishop of Kulm, friend of Copernicus), 提德曼·吉斯(库姆主教,哥白尼的朋友) 652n
Gilbert, Neal, 尼尔·吉尔伯特 102-3
Gilbert, William, 威廉·吉尔伯特 520, 652
Gillispie, Charles, 查尔斯·吉里斯皮 679
Gilmore, Myron, 米隆·吉尔莫 27-8, 301
Gingerich, Owen, 欧文·金杰里奇 544n
Giordano of Pisa, Friar, 比萨的乔达诺,修士 553n
Giotto, 乔托 164, 232n, 238, 254, 292-3, 493
Giraldi, Giovanni Battista, 焦瓦尼·巴蒂斯塔·吉拉尔迪 195-7n, 198
globes, and globe-makers, 地球,与地球仪制造商 273n, 480-1, 484,516, 557, 560n, 599-600, 659, 663, 676, 697 *see* also Blaeu, W. J.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 光荣革命(1688) 142, 682
glyphs, 象形文字,刻画符号 76, 277, 287-8
Godfrey of Vorau (14th c. canon), 沃劳的戈德弗莱(14 世纪修士) 456n
'Godly private prayers for householders to meditate upon and to say in ir families' (1576),《在家里静思和念诵的祈祷书》((1576) 425
Go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493
Goliard poetry, 流浪学生的吟游诗 393-4n
Gombrich, Ernst, 恩斯特·贡布里希 152, 268
Gospels,《福音书》79n, 317, 342-3, 353, 365, 372, 377-8, 428, 579, 616
Gothic Revival, 哥特式风格的复兴 201, 213, 494
Gothic styles, 哥特式风格 83, 173, 187, 213-15, 294
Gothic typeforms and bookhands, 哥特字体与手写体 201-7, 216, 346n, 490, 549n
The Göttingen Model Book,《哥廷根图样书》65n, 82n
Grafton, Richard (English printer), 理查德·格拉夫顿(英国印刷商) 104n, 350, 356
grammar, 语法 87n, 91,350 (Lily) (利利) *see also* trilingual studies; trivium

Grand Atlas (Joan Blaeu),《大地图集》(约翰·布劳) 480, 688
Grande Chartreuse, priors of, 查尔特勒修道院的修士 374, 379n
Grande Encyclopédie (Diderot, 1751-7),《大百科全书》(狄德罗,1751-7) 139n,143n, 147n, 258n, 261, 265, 273n, 556
Granjon, Claude (type designer), 克劳德·格朗戎(字体设计者) 202n, 205n
Gratian, 格拉提安 284
Gray, Hanna, 汉娜·格雷 173,296
Graz, 格拉兹 623n
'Great Boke of Statutes 1530-1533' (Rastell, John),《法律全书:1530—1533》(约翰·拉斯泰尔) 105
Greek émigrés, 希腊移民 139, 220, 221n, 222-3, 359, 512
Greek studies, 希腊研究 180, 213, 220-3, 337-8, 355-6, 496, 499, 523 (Greeks versus Arabs), 希腊人与阿拉伯人的比较 545, 588n, 593-4, 657-8, 696-7, 700 *see* also trilingual studies
Gregory I (Great), Pope, 格列高利一世(大贵格利教皇) 67, 213,493
Gregory XIII, Pope, (1572-85), 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 648n
Grenier, Nicole, 尼科尔·格雷尼尔 426n
Greyff, Michael, 米歇尔·格雷夫 375n
Griffin, Edward (English publisher), 爱德华·格利芬(英格兰出版商) 241
Grimaldi manuscript collection, 格利马尔迪手抄本藏书 222n
Grimm, Heinrich, 海因里希·格林 147, 308
Groote, Gerhard, 杰拉德·格鲁特 14-15n, 345-6 *see also* devotio moderna; Windesheim
Grosseteste, Robert, 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 92, 106n, 551, 607
Grotius, Hugo, 雨果·格劳秀斯 137n, 418n, 420, 421, 480, 647
The Ground of Artes (Recorde, R.),《艺术基础》(罗伯特·利科尔) 533n, 534n
'Grub Street',"格拉布街",新闻街 136, 142, 302, 392, 619
in Venice, 威尼斯的新闻街 137n, 176, 228
in London, 伦敦的新闻街 360
Grünenberg, Johannes (also known as Rhau-Grünenberg) (Wittenberg printer), 约翰·格鲁能伯格(又名劳-格鲁能伯格)(维滕堡印刷商)307n
Gryphius, Sebastien (printer in Lyons), 塞巴斯蒂安·格里菲乌斯(里昂印刷商) 400,568n
Guide des Chemins de France (Estienne, C., 1553),《法国道路指南》(查理·埃蒂安纳)387
guidebooks and handbooks, 指南与手册 65, 78-9, 87, 315, 318, 392, 428-9, 545, 555, 593, 659 *see also* self-help
Guidobaldo da Montefeltro, duke of Urbino, 圭多巴尔多·达·蒙特菲尔特罗,乌尔比诺公爵 48, 49, 547n
Guillard, Charlotte (16th c. Parisian printer), 夏洛特·吉拉德(16 世纪巴黎印刷商) 87n
Guilleretus (Roman printer), 基勒雷特斯(罗马印刷商) 376n
Guinther (or Winter) of Andernach, Johannes 安德纳克的约翰·君特尔(亦作温特尔) 566n, 567, 569
Guizo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基佐 388
Gunter, Richard, 理查德·冈特 532
The Gutenberg Galaxy (McLuhan, M.),《谷

登堡星汉》(麦克卢汉) x,16-17, 40-1
Gutenberg, Johann, 约翰·谷登堡 49, 60, 119, 178
tributes to, 对谷登堡的赞誉 25-7n, 48, 89n, 250, 305
Guy de Montrocher (or Guido de Monte Rocherii), 居伊·德·蒙特罗谢(或居多·德·蒙特·罗谢伊) 314n

H

Habsburg realms, 哈布斯堡王朝 84, 118, 405, 407-8, 647
Hagecius, (16th c. astronomer), 哈吉丘斯(16 世纪天文学家) 599n
hagiography, 圣徒传 315
Hale, John, 约翰·黑尔 136, 477
Hall, A. R., A. R. 霍尔 557, 605n
Hall, Basil, 巴西尔·霍尔 371
Halley, Edmund, (comet), 埃德蒙·哈雷(彗星) 619n, 634, 638, 644,674
Hamman, Johannes, (15th c. Venetian printer), 约翰·哈曼(15 世纪威尼斯印刷商) 583, 584
Hannaway, Owen, 欧文·汉纳维 474, 530
Hardouin, Jean, 让· 阿杜安 324-5
Hariot (Harriott), Thomas, 托马斯·哈里奥特 642, 653
Harrington, James, 詹姆斯·哈林顿 142n
Hartlib, Samuel, 萨缪尔·哈特立伯 305n, 362, 643n, 668n
Harvey, William, 威廉·哈维 275n, 459, 489, 525, 528-9, 616, 640n, 648-9, 660-1, 664, 667, 685, 692
Hassinger, Erich, 埃里克·哈辛格 378n
Haydn, Hiram, 希拉姆·海登 475
Hazard, 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E. 哈泽德(《历史文献汇集》) 116
Hazard, Paul, 保罗·哈泽德 409
Heath, Peter, 彼得·希斯 394
Hebrew studies, 希伯来研究 223-4, 245, 257, 277-8, 282, 289, 321, 332-3n, 337-8, 340, 359, 367, 372, 409n, 613n, 700 *see* also Bible; Talmud; trilingual studies
Hebrew vowel points, 希伯来语元音附点 278-9, 332, 471, 477n
Hedio, Caspar, 卡斯帕·黑丢 370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633n, 706
Heidelberg, 海德堡 420, 654
Heilbronn, 海尔布隆 490,587n
Heinsius, Daniel, 丹尼尔·海因休斯 338n
heliocentric theory, 日心说 577n, 620, 648n, 650n, 673 *see also* Copernicus
Hellinga, W., 维茨·海林哈 10n
Helvétius, Jean, 让·爱尔维修 146
Hening, William W., 威廉·赫宁 116
Henri IV of Navarre. 纳瓦拉的亨利四世 441
Henricpetreius (Heinrich Petri), 海因里佩特雷乌斯(海因里希·佩特利) *see* Petri, Heinrich
Henry Ⅷ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 135, 326, 357-8
Henry Navigator, 航海家亨利 192, 515
heraldry, 纹章 134, 426n
herbals, 草本书,植物志 86, 108, 262, 265-6, 487n, 492n, 538, 659 *see* also botany
Herbipolensis 赫比珀伦西斯 *see* Thanner, Jacob
Herbst, 赫布斯特 *see* Oporinus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 197, 215-16
heresies, 异端 *see* Hussites; Lollards; Waldensians
'Hermes Trismegistus', "赫耳墨斯·特利斯米吉斯图" 77, 123n, 272, 277, 281-2,

285, 288n, 321
Hermetic writings, 赫耳墨斯秘义书 142n, 274n, 277-8n, 279-81, 283n, 285n, 572, 579, 641, 669n
Herodotus, 希罗多德 127
Heron (Her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希罗 586
Het Licht《航海之光》*see Light of Navigation*
heterodoxy, 异端, 非正统教义 313, 332n, 343n, 404, 418-19, 442-3, 447, 480 *see also* Family of Love; Nicodemite sects; Rosicrucian
Hexter, J. H., 赫克斯特 364, 386, 388-9, 394, 396, 441
Heynlin, Johann (15th c. librarian, U. of Paris), 约翰·埃兰(巴黎大学 15 世纪图书馆馆长)399n
Heywood, John, 约翰·海伍德 376
hieroglyphics, 象形文字 69n, 77-8, 278-84, 288, 563 *see also* 'Horapollo'; Egypt
Hildebert of Le Mans, 勒曼斯的希尔德伯特 184-5n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237, 523n
Histoire des Sciences Mathématiques en Italie (Libri, 1838),《意大利数学史》(利布里, 1838) 494n
Historia Animalium (Conrad Gesner, Zürich: Froschauer, 1551),《动物的故事》(康拉德·格斯纳, 苏黎世: 弗洛绍尔, 1551) 98n, 483
Historia Reformationis (Myconius),《宗教改革史》(米科尼乌斯) 306n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Sarpi, P.),《特伦托公会议的历史》(萨尔皮) 412, 413n, 644n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Sprat, T.),《皇家学会史》(斯普拉特) 668, 682n, 696
History of the World (Raleigh, Sir W., London, 1614),《世界史》(罗利勋爵, 伦敦, 1614)456n, 563n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647, 669n
Hofstadter, Richard, 理查德·霍普斯塔特 150n
Hohenzollerns, 霍亨索伦王室 363, 492
Holbein, Hans, 汉斯·霍尔拜因 68, 176n
Holland, 荷兰 *see* United Provinces
Hollandia, voyage of (1595-7), "荷兰号"航行(1595-7) 600
Holy Land, 圣地 85-6n, 337
Hölzel of Nuremberg (printer), 霍尔泽尔(纽伦堡印刷商) 307n
Homer, 荷马 220, 381, 321
Hondius, Jocundius (17th c. Dutch map publisher), 约昆狄乌斯·洪第乌斯(17 世纪荷兰出版商) 480-1, 558, 600
Hooke, Robert, 罗伯特·胡克 633, 664, 673
Horace, 贺拉斯 147n, 256, 577n
'Horapollo' (Hieroglyphics of),《象形文字集》77n, 78, 175n, 279, 280n, 437
'Horrible Pacts made between Devil and pretended invisible ones' (1623) (attack on Rosicrucians),《魔鬼和假装的隐身人之间签订的恐怖的契约》(1623)(抨击玫瑰十字会) 438n
Hortensius, Martinus, 马丁·霍滕秀斯 643
The Household Philosophie, probably translated by Thomas Kyd from Tasso's 1588 Italian work,《家用哲学》,可能译自意大利天主教诗人塔索,译者可能是托马斯·基德 424n
Hugh of Saint Victor, 圣威克多修道院的于格 123n, 251n, 257, 340 (Victorines) (威克多修道院的修士)

Hugo, Victor, 维克多·雨果 66
Huguenots, 胡格诺派,胡格诺教徒 19, 140n, 141, 143, 145n, 326, 350, 351, 352, 410-11, 414, 624n, 646-7,679
Hume, David, 戴维·休谟 112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 538
Hus, John, 约翰·胡斯 310n
Hussites, 胡斯派 311, 345,692
Hutten,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胡腾 243, 305n, 394, 620n
Hven, 赫文岛 480, 599n, 625-7n

I

I Marmi (Doni, Venice, 1550),《据我所知》(多尼,威尼斯,1550) 614n
Icones anatomicae (Vesalius),《解剖学图谱》(维萨里) 53n
iconoclasm, 反偶像崇拜者 66-8, 293
Iconologia (Rome, 1603) (Ripa, C.),《肖像学》(罗马,1603)(利帕) 662n
ideographic writing, 会意文字 9n, 27n
illiteracy, 文盲 60-1, 67 129-30, 334, 370
illuminators, 插图艺术家 47, 50, 53, 55, 65n, 234, 258, 263, 265, 267, 512n, 589, 687
illustration 插图
  general, 一般插图 68-70, 85-6, 133, 258-9, 261-3, see also images; visual aids
  scientific, 科学插图 98, 108-9, 266-9, 469-70, 486, 524, 538, 556, 562n, 566-9, 573, 575-6,601, 625
  scribal, 手抄书插图 52, 65n, *see also* illuminators
  scriptural and religious,《圣经》和宗教插图 108, 448
images, 形象,图像,意象 53, 66-9, 81, 85, 125, 135, 197, 200, 259-60, 263-5, 280, 293, 478-9, 701
Imhotep, 伊姆霍特普 237
Imitation of Christ (Thomas à Kempis),《效法基督》(坎普腾的托马斯) 318,346, 391
Imprimatur, 出版许可证 329, 347n, 355, 407,678
In Calumniatorum Platonis (Bessarion, C., 1649),《伪柏拉图主义者》(贝萨里翁, 1649) 548n
In Praise of Folly (Erasmus),《愚人颂》(伊拉斯谟) 176n
In Praise of Scribes,《抄书人赞》*see De Laude Scriptlrum*
incipits, 卷首的文字,创作的初期 121, 235
incunabula, 早期机印书,古版本 11, 26, 28, 33, 35-6, 44, 166, 168n, 204-5n, 462, 508, 515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禁书目录》125, 145n, 147, 329, 342, 347n, 348, 355, 364, 407, 411, 413, 415-17, 528n, 639, 644, 652-3, 655, 670, 673, 675, 676-7, 695 *see* also banned books; censorship
indexes, 索引 57, 75, 88, 90-4, 98n, 100-2, 104-6,109, 246, 277, 328, 517, 564n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个体本位 228-30, 234-7, 254, 321
Indo-Arabic, 印度—阿拉伯 *see* under Arabic science
indulgences, 赎罪券 58, 60, 178, 244, 306, 310, 368, 375-7, 702
Indulgentiae Ecclesiarum Urbis Romae (Rome,1511),《罗马印行的基督徒赎罪券》(罗马,1511 年) 376n
Initia Doctrinae Physicae (Melanchthon, P.),《物理学初阶》(梅兰希顿) 650n
Innis, Harold, 哈罗德·伊尼斯 41n

Innocent Ⅲ, Pope, 教皇英诺森三世 301
Inquisition, Roman, 罗马宗教裁判所 283, 340, 347, 413n, 444, 527, 666, 671, 679, 682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Calvin), 《基督教原理》(加尔文) 67, 206n, 402
Institutio Astronomica (Gassendi), 《天文学体系》(伽桑狄) 629n
Instrument-makers, 工具制造者 59, 240-1, 246, 261, 273, 504, 526, 530n, 531, 545, 557-8, 561, 587, 619, 627n, 640, 659-61, 663, 687, 693
An Introduction of the Eyght Partes of Speche (Lily, 1542), 《埃及语词类导论》(威廉·利利) 350
Invectiva in Medicum Quendam (Petrarch), 《对医师的恶语》(彼德拉克) 252n
inventions, inventors, 发明, 发明家 20-1, 119-20, 240-1, 246, 251n, 254, 260n, 292, 525 (Galileo), 发明家伽利略 553-4, 556-8, 564n (Alberti's cipherwheel) (阿尔贝蒂的密码轮) *see also* instrument-makers; patents
Investiganti (17th c. Neapolitan scientific society), 调查者学会(17世纪那不勒斯的科学学会) 666-7, 680n
Isaiah, 《以赛亚书》 *see* Bible, separate books of
Isidore of Seville, 塞韦尔的伊西多尔 191, 513-14, 548
Isingrin, Michael, 迈克尔·伊辛格林 76n, 99n
Islam, 伊斯兰 288, 330, 335, 337, 463, 466, 609, 610n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see* Constantinople
Ivins, Jr, William, 威廉·伊文思 6n, 53-4, 265-6

J

Jacobins, Jacobinism, 雅各宾派, 雅各宾主义 150, 424
James I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351, 358, 360, 412, 413n, 669n
James, Thomas (Bodley's librarian), 托马斯·詹姆斯(博德莱图书馆馆长) 416n, 677n
Jamnitzer, Wenzel, 温策尔·詹姆尼泽 589n
Jansenism, 詹森主义 333, 351, 396, 426n, 662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115-16, 237
Jenson, Nicholas, 尼古拉·让松 205n
Jerome, st, 圣哲罗姆 80, 174n, 191, 297, 331, 571, 693
Epistles, 《使徒书》 15n, 50n *see also* Vulgate
Jesuits, 耶稣会士 282-3, 314n, 324n, 326, 329, 333-4, 348n, 350-1, 397, 407, 423, 523, 530n, 561n, 624n, 640, 647-8, 652-3n, 656, 678
Jewel, John, Bishop, 约翰·朱厄尔主教 437
Job-printing, 零星杂件印刷 59-60, 375
John of Holywood, 好莱坞的约翰 *see* Sacrobosco
John of Piacenza, 皮亚琴察的约翰 320n
John Scot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 约翰·司各特(约翰·司各特·艾利乌杰纳) 339
Jordanus Nemorarius (de Nemore), 约达努斯·内摩拉利乌斯(德·内莫雷) 497n, 498, 537n
Joris, David, 戴维·若里斯 446
Josephus, 约瑟福斯 324
Joubert, Isaac and Laurent (16th c. Montpel-

lier professors of medicine)，伊萨克和劳伦·伊萨克·朱伯特(16 世纪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教授) 244n，539n
Journal des Sçavans，《博学者杂志》460，638，643n
journalism，journalists，新闻业，新闻学，新闻记者 130-3，150n，156，228，246，316，394，643n，695
journals，杂志 *see* learned journals
'Juan Philadelpho of Venice'，"威尼斯的居安·菲勒德尔弗" *see* Crespin，Jean
Jung，Carl，卡尔·荣格 69
Juvenal，尤维纳利斯 18n，121

K

'Kalendar'（Ratdolt)，《年历》(拉特多尔特) 106n
Kearney，H. F.，H. F. 卡尔尼 663
Kepler，Johann，约翰·开普勒 18-19，262，460-1，501-3n，536，542，549，577，582，585，588-9，599n，611n，616，617n，618n，620-1，623n，624n，626-32，639，640n，649，650n，651n，654-5，660-1，664，674，692
Ketham，Joannes de，约翰·柯坦 536n
Keysersberg，Geiler von，盖勒·冯·凯瑟斯伯格 236，316，373
Kiliaan，Cornilis (b. Cornelius Duffel，1528) (also known as Cornelius Kiel，Cornelius Kilianus or A. C. Kilianus Dufflaeus)，科尼利斯·基里安(又名科尼利乌斯·杜夫尔)(亦名科尼利乌斯·基尔或 A. C. 基里安努斯·杜夫利乌斯) 20n，100n
Kingdon，Robert，罗伯特·金顿 330，445
Kircher，Athanasius，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 282，333n，624n
Klosterneuberg，克罗斯特斯堡 482
Knox，John，约翰·诺克斯 364n
Koberger，Anton，(15th c. Nuremberg publisher)，安东·柯贝尔格(15 世纪纽伦堡出版商) 248，257n，404，447n
Koestler，Arthur，亚瑟·柯斯特勒 75，509，614-15，617，620，623，626-8，676，678
Kohn，Hans，汉斯·科恩 359
Koran，《古兰经》330，334-5，337，419，422n，570，612 *see* also Arabic studies；Islam
Kristeller，P. O.，P. O. 克里斯特勒 173n，174n，208
Kuhn，Thomas，托马斯·库恩 609，615

L

L' Agriculture et Maisons Rustiques (Estienne，C.)，《农事与农舍》(查尔斯·埃蒂安纳) 387n
L' Apparition du Livre，《书籍的出现》*see* Febvre，Lucien and Martin，Henri-Jean
L' Histoire de I' Origine et du Premier Progrès de L' Imprimerie (Marchand，Hague，1740)，《印刷术的起源与早期历史》(马尔尚，海牙，1740) 143n
La Chalotais，Louis René de，拉·夏洛泰 351n
La Grande Chirurgie de M. Gui de Chauliac restituée par M. LaurentJoubert (Joubert，Isaac，ed. 1578)，《外科大全》(伊萨克·朱伯特，1578) 244n
La Manière de bien Traduire d'une Langue à L'Autre (Dolet，E.，1540)，《优秀翻译的方法》(多莱，1540) 360n
La Mothe Le Vayer，François de，弗朗索瓦·拉默特·勒韦耶 644
La Popelinière，Lancelot Voisin de，兰斯洛·拉波普利尼埃 400n
'La Semaine' (Du Bartas，1587)，《岁月》(迪

巴尔塔,1587) 614n
Labé, Louise, 路易丝·拉贝 242
Laelius, Gaius, 盖尤斯·利图斯 662n
'Laetus' (Giulio Pomponio Leto), "利图斯"(真名居里奥·庞珀里奥·里托) 138n
Lamartine, Alphonse de, 阿方索·拉马丁 153
Lando, Ortensio, 奥滕西奥·兰多 139n, 400n
Langford, Jerome, 杰罗姆·朗福德 673,676
Laplace, Pierre Simon, Marquis de, 拉普拉斯 584n, 661
Lascaris,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拉斯卡里斯 48n
Lateran Council, Fifth (1515), 第五届拉特兰公会议 347, 613
Latin language, 拉丁语 20, 78, 187, 189, 191, 256, 279, 294, 297,313, 316, 330, 334, 359, 363 *see also* De Elegantiis (Valla)
Latin-reading élites, 阅读拉丁文著作的精英 xiv, 63-4, 118, 127-8, 242, 269, 283, 309, 345, 359, 397, 453, 472,480,490, 520, 522, 524-5, 528, 531, 534, 538, 541, 545, 569, 575, 622, 654, 662,690, 691-2, 700
Lauber, Diebold, 迪博尔德·劳伯 13n
Laud, William, 威廉·劳德 645n, 680
Laurentii, N. (Florentine printer), N. 劳伦蒂伊(佛罗伦萨印刷商) 100
Lausanne, Academy of, 洛桑学院 99
law printing and legal studies, 法律的印行与法律研究 103-5, 119-20n, 133n (poor laws), (不适合国情的法律) 194-5, 355n, 362
Le Breton, André François, 安德烈·弗朗索瓦·勒·布雷顿 143n
Le Maire, Jean, 让·勒梅尔 349n
Le Monde (Descartes), 《论世界》(笛卡尔) 664
'Le Operazioni del compasso. geometrico et militare' (Galileo, 1606), 《比例规用于几何和军事演算》(伽利略,1606) 525n
Le Roy, Louis, 路易·勒罗伊 21n, 166n
Le Sancuaire Fermé au Prophane ou la Bible defendue au Vulgaire (Le Maire), 《俗气不能染指的圣经》亦名《禁止俗气的圣经》(让·勒梅尔) 349n
learned journals, 学术刊物 460-2, 638n, 640n, 643n, 695 *see* also serial publication
LeClerc, Jean, 让·勒克莱尔 xv, 138n, 145n, 420, 638n, 645,
Leers, Reiner, 雷纳·里尔斯 138, 420n, 646n
Leeuwenhoek, Anthony van, 安东尼·列文虎克 471n
Lefèvre d'Etaples, Jacques, 勒费弗尔·戴塔普尔 137n, 285n, 331,342, 345, 353, 356, 369-70, 442n, 447n
Lehmann-Haupt, H., 赫尔姆德·利曼-霍普特 57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兹 68, 138n, 245n, 284, 537, 563-4n, 638n, 680
Leicester, Robert Dudley, Earl of, 罗伯特·达德利,莱斯特伯爵 360
Leiden, 莱顿 99, 137n, 332, 338, 359, 409, 416, 419n,480, 535, 540n, 641, 643, 647, 656, 678
Leipzig, 莱比锡 307-8n, 539, 581
Leo X, Pope, 教皇里奥十世 306, 347, 613n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238-9, 248n, 269, 484, 509, 550-2, 564-6, 588n
Leonardo of Pisa (also called Fibonacci), 比萨

的莱奥纳尔多(亦名菲伯纳奇) 236,381, 467, 537, 548, 552n *see also* Liber Abaci (Book of Abacus)

Les Nouvelles Pensées de Galilée (Mersenne, ed.),《伽利略的新思想》(梅森编) 645n

Letter against Werner (Copernicus),《驳维纳》(哥白尼) 578, 580n, 581n, 621

Letter to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Galileo),《致大公爵夫人的信》(伽利略) 644, 653-4

Lettera (Foscarini),《书简》(福斯卡里尼) 644n, 675

Letters to Serena (Toland),《致赛丽娜书简》(托兰德) 142n

Letters on Sunspots (Galileo),《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伽利略) 530n, 653n

Letters (ophilactus Simocatta),《书简》(忒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 579

Leviathan (Hobbes),《利维坦》(霍布斯) 306n

Levita, Elias, 埃利亚斯·列维塔 224n, 447n

lexicography, lexicons, 词汇学,词汇 75n, 91-3, 99-100n, 279, 336

Libavius, Andreas, 安德利亚斯·利巴维乌斯 102n, 275n, 474, 530n

Liber Abaci (*Book of Abacas*, c. 1202, Leonardo of Pisa),《算经》(约 1202 年,比萨的莱奥纳尔多) 236n, 381-2, 467, 537, 548,548n

'Liber Pauperum',《穷人的〈圣经〉》62n

Liber de Scriptoribus Ecllesiasticis (Trimius, J.),《基督教著者名录》(特里特姆斯) 94

libraries, 图书馆 22n, 45, 73-5, 78, 132, 145, 149, 158, 220, 221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维滕堡大学), 245, 288, 367-8 (U. of Wittenberg),(维滕堡大学), 395, 400, 473, 503, 511, 518-19, 558,578, 587n, 61 8n, 625, 634, 670

libraries, manuscript, 图书馆,手稿 48, 209, 222n, 517, 586n, 593,622

library catalogues, 图书馆目录 *see* catalogues

licensing (of printers), (印刷商的)特许证 120, 347, 444, 639, 678,682 *see also* privileges

life sciences, 生命科学 69, 469, 530, 537 *see also* anatomy, botany, medicine

Light of Navigation (1612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et Licht*, Blaeu, W. J.),《航海之光》(1612 年布劳的荷兰文原著的英译本) 481n

Lilburne, John, 约翰·利尔伯恩 362, 423n

Lily, William (Elizabethan grammarian), 威廉·利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语法学家) 350

Lincean Academy (*Lincei*), 林塞学会(林塞) 653n, 666, 676

Linguet, Simon Nicholas Henri, 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 147

Linnaeus (Carl von Linné), 林奈(卡尔·冯·林奈) 487

Lipsius, Justus, 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 359n, 442n

Lister, Martin (17th c. English zoologist), 马丁·李斯特(17 世纪英国动物学家) 680n

lists of prohibited books,《禁书目录》*see*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literacy, 识字,读写能力,基本文化素养 8, 17, 27, 32-3, 35-6, 60-3, 65, 71,130, 158, 167, 173, 227, 244n, 247, 252, 333, 346, 363, 386n, 396, 414-15, 422, 424, 432, 529, 538, 639, 657, 678-9, 682,690, 704, 707 *see* also Bible-reading

literalism (Biblical), 直解主张(《圣经》) 332, 357, 523, 576 *see also* fundamentalism

literary property rights，版权，知识产权 120-2，229，240，320，324，337，497n，526，543，559，667 *see also* authorship；copyright
literati，men of letters，文人，23，30，47，76，112，145，147，153-8，171-2，182，188，217，221n，228，242，250，254，258，274，283，286，371，374，392，400，404，445，446，493，512n，535，545n，559，618，672，702，704 *see also* Latin-reading élites；Republic of Letters
liturgy，圣餐仪式，礼拜仪式 313，351，408，446
Lives of the Artists（Vasari，1550），《艺术家列传》（瓦萨里，1550）112n，232-3，
Lives of Illustrious Men（Vespasiano），《名人传》（韦斯巴西亚诺）45n，48
'Lives of Mamaticians'（Baldi，Bernardino），《数学家列传》（贝尔纳迪诺·波尔迪）542n
Livy，李维 100-1，188-90
Locke，John，约翰·洛克 xv，138n，143n，418，420，638，647，699
logarithm tables，对数表 20n，467-8，520，531，583-4n，624n，626，628，631，661，697 *see* also mathematics；trigonometry
Logic（Aristotle），《逻辑学》（亚里士多德）611
Lollards，罗拉德教派 245，310-11n，325，345-6，349，423，692
Lombard，Peter，彼得·朗巴德 314n，365
Lopez，Robert，罗伯特·洛佩兹 386-7
Louis XIII of France，法王路易十八 135，349
Louis XIV of France，法王路易十四 30n，135，679
Louis XVI of France，法王路易十六 85，135n，352
Louvain，卢万 359，489-90n，534n，535
Lowry，Martin，马丁·罗利 691
Loyola，St Ignatius，圣罗耀拉 234，354，439
Lucretius，卢克莱修 209-11，409n
Ludlow，Edmund，埃德蒙·勒德洛 142n
Luethy，Herbert，赫伯特·卢希 421，445
Lufft，Hans，汉斯·卢福特 650n
Lull，Ramon，拉蒙·吕尔 92n，315n，340n
Luschner，Johann，约翰·卢施纳 375
Luther，Lutherans，路德，路德宗教徒 68，98n，191，234，303-13（Luran revolt），（路德的反叛）319n，323n，329，341，347，350，353-4，356-7，367-75（Strasbourg Reformation），（斯特拉斯堡改革）375-8，381，391，404-7，415，439n，449-50，453-4，614-16，641n，649-52，654，684，695
Lyell，Sir Charles，查尔斯·赖尔勋爵 461
Lyons，里昂 179，234n，250，349，352n，392，399-400，402，404，409-11，441，538，541，543-4，566n，568n，570，682
Lyte，Henry，亨利·赖特 241

M

McGuffey Reader，《麦克古费识字课本》430
McLuhan，Marshall，马歇尔·麦克卢汉 x，xi，xvii，9n，16，40-1，88，129，151，171，186，319n，429
Mabillon，Jean，让·马比雍 209n
Mably，Gabriel Bonnot de，加布里埃尔·马布利 146
Macaulay，Thomas Babington，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19，388
Machiavelli，Bernardo，贝尔纳多·马基雅弗利 100-01
Machiavelli，Niccolò，尼科罗·马基雅弗利 100-1，129，189，418，594，676

Machlinia, William de (printer), 威廉·麦克里尼亚(印刷商) 104
Mademoiselle de Maupin (Gautier, 1835), 《莫邦小姐》(戈蒂埃,1835) 157n
Maestlin, Michael, 迈克尔·梅斯特林 525, 597-8, 602n, 617n, 628-9, 649, 651n, 654
Magellan, Ferdinand,麦哲伦 508, 592n
magic, magicians, 魔法,魔法师 76, 95-6, 246, 272, 274-9, 284, 286, 289, 438, 562, 644n, 669-70, 681
Magna Carta, 《大宪章》 119
Magnum Abbreviamentum (Rastell), 《豪华版法律节本》(拉斯泰尔) 105
Maier, Michael, 迈克尔·梅耶尔 275n
Maitland, Frederic William, 弗里德里克·威廉·梅特兰 201
Malebranche, Nicolas, 尼古拉·马尔伯朗士 646
Malesherbes, Chrétien-Guillaume de Lamoignon de, 马尔塞布 132
Malikshāh Observatory, 马力克萨观象台 610n
Mallet, Abbé, 阿贝·马雷 257n
Malleus Malefuarum (1486), 《女巫的铁锤》(1486) 436-7, 439
Malpighi, Marcello, 马尔切罗·马尔皮基 660, 664-5, 695
Mandrou, Robert, 罗伯特·曼德鲁 29n, 434
Manetti, Giannozzo,加诺佐·马内蒂 211n, 233n
Manilius, 马尼利乌斯 210
Manipulus Curatorum (Guy de Montrocher or Guido de Monte Rocherii), 《心灵手册》(居伊·德·蒙特罗谢或居多·德·蒙特·罗谢伊) 314n
Mannerism, 风格主义 83, 260, 430
Mannheim, Karl, 卡尔·曼海姆 154-5
Mansion, Colard, 科拉德·曼逊(布鲁日印刷商) 37-9
Mantegna, Andrea, 安德利亚·曼坦那 203n, 489, 548
Manual for Parish Priests, 《教区牧师手册》 318n
manuals, 手册 65, 82 (writing), (手册的书写) 87 (confessors), (忏悔者手册) 241, 247, 249, 294 (preachers), (布道者手册) 372, 383, 385-7, 392, 399n, 424n-5, 428-9, 456, 510n, 590
see also self-help
manuscript book production and trade, 抄本书的生产与贸易 6n, 10-16, 22 (12th c. 'book revolution'), 12 世纪的"书籍革命" 36-9, 47, 55, 59, 65n, 216-17, 251n, 380, 391, 540, 622
see also scribes; scriptoria; stationers
Manutius, Paul, 保罗·马努蒂乌斯 118, 398, 675 *see also* Aldus Manutius
mappaemundi, 世界地图 479, 512, 514-16
maps, 地图 *see* atlases and maps
Marat, Jean Paul, 让·保罗·马腊 657n
Marcantonio della Torre, 托雷的马坎托尼奥 566n
Marcantonio Raimondi of Bologna (engraver), 波洛尼亚的马坎托尼奥·拉伊蒙迪(镌刻画家) 176, 231
Marchand, Prosper, 普洛斯珀·马尔尚 143
Marciana (library), 马尔齐亚纳(图书馆) 222n, 586n, 622
Mardersteig, Giovanni, 焦瓦尼·马尔德斯泰格 203n
Marian exiles, 英女王玛丽一世时代的流亡者 305, 360n, 446, 570
mariners and navigators, 水手与航海家 74n, 455, 468, 492, 508, 554, 558, 561, 583

Mariolatry, 圣母崇拜 433
Marlowe,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马洛 72
Marot Clement, 克莱芒·马罗 130n, 352
Marot-Beza (Huguenot) psalter, 马罗-贝扎《圣诗集》130n, 352
Marsh (Marshe), Thomas, 托马斯·马什 618n
Martin, H. J., H. J. 马丹 5n, 29n
martyrs, 殉教者,烈士 133, 297, 325, 345n, 361, 423, 424n, 441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25, 146, 388-90, 459, 522, 550, 659, 689, 706
Mary Tudor, Queen of England, 英国女王玛丽·都铎 358, 426
Masons (Free Masons), 石匠,(共济会会员) 77,125, 141-4, 150, 274, 282n, 443
Masonic lodges, 共济会会所 142-3, 149
masons (stone-workers), 石匠(共济会会员) 65n, 553n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s eve, 圣巴塞洛缪夜的屠杀 133n, 140, 542n
Mathematical Magick (Wilkins, J.), 《数学的魔力》(约翰·威尔金斯) 555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Craig, J., London, 1690), 《基督教神学的数学原理》(克雷格, 伦敦, 1690)79n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Newton, I., 1687),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 1687) *see* Principia
mathematics, mathematicians, 数学,数学家 54, 102n, 240-1, 245, 290, 458, 467-8, 494-500, 504, 521, 529-35, 537, 542-3, 557, 562-3, 576, 657-8, 662, 680, 689, 694, 698-9 *see also* astronomy; geometry; trigonometry
Mattioli, Pietro Andrea Gregorio, 马蒂奥利 110, 267, 488
Maufer, Petrus, 彼得·莫弗尔 56n
Maunsell, Andrew, 安德鲁·蒙塞尔 106-7, 659n
Mauro, Lucio, 卢奇奥·莫罗 198
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 马克西米连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95, 280n
'Mazarinades', "投石党运动时攻击马扎然的文章和歌曲" 133n
Meaux, 莫城 399
Mechanica (pseudo-Aristotelian), 《力学》(伪亚里士多德作品) 545n
Mechanick Exercises (Moxon, J., 1683 ed.), 《印刷工操作手册》(约瑟夫·莫克森, 1683 年版) 107n,154
medical studies, medicine, 医学研究,医学 107, 174, 194, 246-7, 251, 253, 270, 362, 400, 473, 496, 502, 533, 535, 537-41, 566-74 (anatomy), 656-7 *see also* Galen, Galenism; physicians; surgeons
Medici, 美第奇 48, 182, 492, 526-7, 666, 681n
Medici, Cosimo de, 科西莫·德·美第奇 45, 77, 98, 526
Melanchthon, Philip, 菲利普·梅兰希顿 221, 331, 338-9, 533, 543, 582n, 587n, 615n, 615n, 641n, 650-1, 700
memory arts, use and need of, 记忆术的使用和需求 66-9, 92n, 125n, 174, 189, 215-16, 217n, 254, 270, 277, 287, 291, 296-7n, 334, 336, 456-7, 475, 608-9
men of letters, 文人 *see* literati
Menander, 米南德 208
mendicant orders, 托钵僧修会 12, 90n, 380, 393, 546

Mentelin, Johann (printer), 约翰·门特林(印刷商) 374n, 440, 691
Mercator, Gerardus 杰拉德斯·墨卡托 110n, 200, 301, 448, 514, 516, 558, 560n
Merchants Mappe of Commerce (Roberts, L.),《商人的商业地图》(L. 罗伯茨) 385
Mercier, Sébastian, 塞巴斯蒂安·梅西埃 352
Mercury, 墨丘利 143-4, 213
Merian, Matthieu, 马修·梅里安 275n
Mersenne, Marin, Friar, 马兰·梅森修士 333n, 460-1, 551, 640, 642-5n, 661, 663n, 667n, 668-9, 680n ,681
Merton, Robert K., 罗伯特·默顿 29n, 126, 478, 552
Merton school (medieval Oxford), 默顿学院(中世纪牛津) 97n
Mesmer, Mesmerists, 梅斯梅尔,梅斯梅尔式的催眠师 274, 657n, 681, 695
Mesnard, Pierre, 皮耶尔·梅斯纳尔 228
metallurgy, 冶金术 22, 413, 545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ies' (Bodin, J.),《轻松理解历史的方法》(让·博丹) 102
Methodism, 循道宗,卫理宗 424
Meung. Jean de, 让·德·默恩 394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175-6, 187-8, 238, 260
Michelet, Jules, 儒勒·米什莱 19, 221n, 300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361n, 394, 397, 557, 680 *see also* bourgeoisie; capitalism
midwives, 助产士 362n, 435
Migeot, Gaspard, 加斯帕·米热 351n
Milan, Dukes of, 米兰公爵 492
Miller, Perry, 佩里·米勒 41n
Milton, John, 约翰·弥尔顿 91n, 142n, 352n, 364n, 678, 682
Minerva, 密涅瓦 143-4, 250
'Miracula quae tempore obsidionis Rhodi Contingerunt',《罗得斯解围的奇迹》375n
mnemonic devices, 记忆术 *see* memory arts
Moeller, Bernd, 伯恩德·莫勒 365
Mohammed, 穆罕默德 335, 337, 552n, 610
Mommsen, The odor, 西奥多·莫姆森 295-6
Monas Hieroglyphica (Dee, John),《摩纳斯象形文字》(约翰·迪伊) 96n, 97n, 137n, 141n, 274n, 280
monastic presses, 修道院办的印刷所 15-16, 46, 58, 380, 398 *see also* scriptoria; monastic
Mondino dei Luzzi (medieval anatomist), 卢兹的蒙蒂诺(中世纪解剖学家) 512, 538, 572-3
Monmouth, Henry, Earl of, 亨利·蒙毛斯伯爵 669n
Monolasphaerium (Fernel, J., Paris: de Colines,1526),《独一的星球》(让·菲内尔,巴黎:德柯林斯) 567n
Montaigne, Michel de, 米歇尔·蒙田 27n, 74, 84, 230-1, 261n, 351
Montano, 蒙塔诺 *see* Arias Montano, Benito
Monte Cassino, 蒙特卡西诺修道院 212, 217
Montmorency (16th c. Constable of France), 蒙莫朗西(16世纪法国元帅) 62n, 395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244n, 538-9
Montserrat, Abbey of,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375
Moody, E., E. 穆迪 497
More, Elizabeth, 伊丽莎白·莫尔 105n
More, Thomas, 托马斯·莫尔 105, 331, 357
Moretus, Jan, 让·默雷图斯 408-9, 443, 647
Morhardus, Ulricus (16th c. Tubingen printer), 乌尔里库斯·莫尔哈杜斯(蒂宾根印刷商) 624n
Morison, Samuel Eliot, 塞缪尔·埃利奥特·

莫里森 x，554，582-3
Morley，Thomas，托马斯·莫特利 244
Mortimer，Ruth，露丝·莫蒂默 261n
Moxon，Joseph，约瑟夫·莫克森 107n，154，273
Moyllus Damianus（15th c. Parmesan printer），达米阿努斯·莫伊勒斯 82n
Muller，Herbert，赫伯特·穆勒 466-7
Müller，Nicolas，尼古拉·穆勒 676n
Mumford，Lewis，刘易斯·芒福德 41n，151
Mundus Novus（*New World*；Vespucci），《新世界》(维斯普奇) 120n
Munich，慕尼黑 407
Munster，Sebastian，塞巴斯蒂安·明斯特 109
Muscovy，(古)俄罗斯 110
Musset，Alfred de，阿尔弗雷德·缪塞 153
Musurus，Marcus，马库斯·穆苏鲁斯 52n，223n
Myconius，Friedrich，弗里德里克·米科尼乌斯 306n
Mysterium Cosmographicum（Kepler，Tubingen，1596），《神秘的宇宙志》(开普勒，蒂宾根，1596) 589n，617n，654
Mystery of Vowel Points Revealed（*Arcanum Punctationum Revelatum*；Cappel，L.，Leiden，1624），《元音点揭秘》(路易·卡佩尔，莱顿，1624) 332n
mythography，神话学，神话艺术 195-7，200
mythographers，神话学家 180，195-6，198，200，285
Mythologiae（Conti，N.，Venice，1551），《神话》(孔迪，威尼斯，1551)198n

N

Nani（Roman printer），纳尼(罗马印刷商) 376n
Nantes，Edict of，南特敕令 414，646-7
Napier，Sir John，约翰·内皮尔勋爵 79n，468，531，532n，534，624n，628
Naples，那不勒斯 667-8，675-45，679-80n
Napoleon Ⅲ，拿破仑三世 150n
Nardi，Jacopo，雅阁珀·纳尔蒂 526
Narratio Prima（Rheticus），《天文学初步》(雷蒂库斯) 587，616-17，654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117-18，350-2，358-60，363-4，371，389，702，706
Natural History（Pliny Elder），《自然史》(老普林尼) 194，293n，454，469，659
Naudé，Gabriel，加布里埃尔·诺代 97n，221n，276，300n，644
navigators，航海家，航海人 *see* mariners
Nerthelands，Dutch 低地国家，荷兰 *see* United Provinces
new occupational groups，新职业群体 4，23，28，43，55-6，57，59，75，167，173，232-8，240-3，247-57，261，267，320，391-2，493，521，531-2，537-42 *see also* artisan-authors；engravers；reckon masters；scholar-printers
New World，新世界 110，120（naming of），(新世界的命名) 364，389(discovery of)，(新世界的发现) 481-3（mapping of），(新世界地图的绘制) 510，517n（early references to）(早期文献中提到的新世界) *see also* Columbus；geography；atlases
'The Newe Attractive ... concerning declyning of Needle（Norman R.，London，1581），《关于磁针磁性衰减后新的增磁力方法》(罗伯特·诺曼，伦敦，1581) 241
'News from Republic of Letters'（Bayle，P.），《文坛新闻》(皮耶尔·贝勒) 137-8
newspapers，报纸 *see* journalism

Newton, Isaac, 艾萨克·牛顿 xv, 78-9n, 125, 138n, 143n, 244-5, 273, 286, 290-1, 520, 555, 620, 631n, 632-4, 638, 641, 644, 658, 661-4, 673-4, 677n, 678-9, 681, 697, 700
Niccoli, Niccolò, 尼科罗·尼科利 210
Niccolò (sculptor), 尼科罗(雕塑家) 235
Nicea, Council of, 尼西亚公会议 327, 609
Nicholas V, Pope, 教皇尼古拉五世 220
Nicholas of Cusa (Cusanus), 库萨的尼古拉(库萨努斯) 50n, 210, 317, 582, 617
Nicholas of Lyra, 里拉的尼古拉 257
Nicholaus (Roman printer), 尼古拉(罗马印刷商) 20n *see also* Gallus
Niclaes, H., 447n 尼克理 *see also* Family of Love
Nicodemite sects, 尼科德默斯派 141, 443-5 *see also* heterodoxy
Nightingale, Peter, 彼得·南丁格尔 607n
Ninety-Five ses (Luther), 《九十五条论纲》(路德) 306-10, 315, 367-8, 614
Noailles, François de, 弗朗索瓦·德·诺耶尔 678n
Norman, Robert, 罗伯特·诺曼 241, 560n
Norry, Miles de, 迈尔斯·诺里 242
Norton, Thomas, 托马斯·诺顿 361n, 545n
Norwood, Richard, 理查德·诺伍德 663n
Notes on the New Testament (Valla, Lorenzo), 《〈新约圣经〉评注》(洛伦佐·瓦拉) 205n
Notre Dame de Paris (Hugo, Victor), 《巴黎圣母院》(维克多·雨果) 66
'Nova Reperta' (Stradanus), 《新发明》(斯特拉达努斯) 20-1, 100n, 188n
Novara, Domenico Maria de (Copernicus teacher), 多梅尼柯·玛利亚·诺瓦拉(哥白尼的老师) 602
novels, novel-reading, 小说,小说阅读 115n, 150, 152-3, 157n
Novum Organum (Bacon, Francis), 《新工具》(弗朗西斯·培根) 21n
numerals, 数字 96, 123n, 125, 549
Indo-Arabic, 印度·阿拉伯数字 105-6, 277, 47t, 499, 532, 587
Roman, 罗马数字 193, 449, 531-2
Nuremberg, 纽伦堡 179, 205n, 247-8. 307-8n, 317, 376n, 403-4, 490, 541, 548n, 590n, 627n, 640, 685 *see also* Petreius, J.; Regiomontanus
'Nuremberg Chronicle' (*Liber chroncarum*, Nuremberg, 1493), 《纽伦堡纪事》(纽伦堡,1493) 85-6, 197n
Nutzel, Kaspar, 卡斯帕·纳特泽尔 308n

O

observatories, 天文台,观象台 535, 558, 587, 625
Occam William of, 威廉·奥卡姆 500
Ochino, Bernardino, 贝纳蒂诺·奥基诺 446
Oecolampadius, 厄科兰巴丢 446
Oedipus Aegyptiacus (Kircher, A., 1652—4), 《埃及的俄狄浦斯》(基歇尔,1652—54) 282
Officina (Textor, Basel, 1503), 《药房》(德克斯托,巴塞尔) 197n, 443
Oldenburg, Henry, 亨利·奥尔登伯格 664-5, 666n, 667n, 695
'On Coaches' (Montaigne, 1588, tr. John Florio, 1600), 《论马车》(蒙田,1588,约翰·弗洛里奥译,1600) 27n
On Divine Proportion (Pacioli, L.), 《神奇的比例》(帕奇奥里)548
On Teaching of Disciplines (*Vives*, 1531), 《论学科教学》(比维斯,1531) 102

On Triangles,《论三角形》*see* De Triangulis
Ong, Walter, 沃尔特·翁 9n, 67, 92n, 102, 172n, 275n, 430
Operina (Arrighi, Ludovico degli),《歌剧》(卢多维科·德格里·阿利基) 82n
Oporinus, Johannes, Herbst (16th c. Basel printer), 赫布斯特·奥珀利努斯(16世纪巴塞尔印刷商)76n, 139, 198n, 276n, 419, 423n, 442n, 446, 447n, 448n, 490, 509, 535, 569, 680, 691
Oppenheim, 奥本海姆 276n
optics, 光学 590n, 626n, 697
Optics (Witelo),《光学》(维泰洛) 590n, 626n
Oracula Chaldaica,《巴比伦神谕》277n
Orbis sensualium pictus (Comenius, 1658),《世界图绘》(夸美纽斯,1658) 69n
The Ordinall of Alchemy (Norton, T., 1447),《炼金术仪式书》(托马斯·诺顿, 1447) 361n, 545n
Oresme, Nicole, 尼科尔·奥雷姆 497-8, 546, 594
Origen, 奥利金 340
Orleans, 奥尔良 216
Orpheus, 奥菲士 123n, 285
Orphica,《奥菲士》277n
Orphism. 奥菲士教 284
Ortelius, Abrabam, 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 88, 108-11, 193, 200, 227, 301, 479-81n, 483, 514, 516, 558
orthography, 正字法 87, 199, 544
Osiander, Andreas, 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 327, 650-2n, 674
Otho, L. Valentine, 瓦伦丁·奥托 624n, 634
Otto of Freising, 弗赖辛的奥托 185n
Ottomans, 奥斯曼土耳其人 *see* Turks
Oughtred, William, 威廉·奥特雷德 245, 633n, 642
Ovid, 奥维德 38, 210-11, 260
Oxford, 牛津 13, 134, 492, 495, 522, 534n, 536n, 541, 623

P

Pace, Richard, 理查德·佩斯 62n. 396
Pacioli, Luca, 卢卡·帕奇奥里 203n. 384n, 531, 547-51, 588-9n
Padua, University of, 帕多瓦大学 100, 482, 489, 494n, 496, 523, 525, 528, 530n, 535, 537n, 547n, 561n, 579, 641
Paine, Thomas, 托马斯·潘恩 149n
Palissy, Bernard, 贝尔纳·帕利西 241n, 242-3, 486, 541, 546, 560, 657
Pamphilus, 潘菲卢斯图书馆 15n
pamphlets, pamphleteers, 小册子,写小册子的人 133n, 147-8, 174, 261, 276, 304, 326-7, 342-3, 375, 400, 599, 619n, 656, 682, 694 *see also* propaganda
Pandectae (Gesner, C., 1548),《图书总览》(康拉德·格斯纳,1548) 97-8
'Panegyrique de B? le' (Ramus, 1571)《巴尔颂》(拉米斯,1571) 76n
Panofsky, Erwin, 欧文·潘诺夫斯基 176, 181, 184-6n, 187-9n, 193-4, 200-3, 208, 213, 215, 239, 249, 269-70, 293, 295, 498, 549
Pannartz, 潘纳兹 see Sweynheim
Pantagruel (Rabelais),《庞大格吕埃》(拉伯雷) 73, 457n
Panisticon (Toland),《泛神论》(托兰德) 142n
Papacy, papal court, 教皇职位,教廷 177, 326n, 377, 536n, 538, 586, 675 *see also* post-Tridentine Church
paper, 纸张 47, 61n, 90, 114, 121, 173, 179, 217-18, 392, 627, 675
papyrus, 莎草纸 15, 208

Paracelsus, Paracelsians, 帕拉切尔苏斯 151, 272n, 274-5n, 276, 446, 473-4, 485-6, 502, 508n, 529, 539, 541, 562, 570-1, 657n, 659, 681, 695

parchment, 羊皮纸 14-15, 114, 214, 217

Pardoner and the Friar (Heywood, John), 《赎罪券推销人与托钵僧》(约翰·海伍德) 376

Paré, Ambrose (French barber-surgeon), 昂布鲁瓦兹·帕雷(巴黎理发师—外科医师) 242-3, 541, 546, 560-1

Paris, first press, 巴黎的第一台印刷机 *see* Fichet, Guillaume

Parker, Archbishop Matw, 大主教马修·帕克 360

Pascal, Blaise, 帕斯卡 352, 537, 549, 660-2, 679

Passover, 逾越节 610n

patents, 专利 119-21, 229, 240, 246, 396, 521, 556-7

The Pathway to Knowledge (Recorde, R., 1551), 《知识之路》(罗伯特·利科尔, 1551) 534n

Patin, Gui, 居伊·帕坦 645n

pattern books, 图案书 53, 82, 84

Pattison, Mark, 马克·帕提森 73

Paul Ⅱ, Pope, 教皇保罗二世 50n, 343

Paul Ⅲ, Pope, 教皇保罗三世 648n, 652n

Paul Ⅳ, Pope, 教皇保罗四世 348

Paul Ⅵ, Pope, 教皇保罗六世 355n

Paul of Burgos, 布尔戈斯的保罗 257n

Paul of Middelburg, Bishop of Fossebroue, 米德尔堡的保罗, 福斯布龙的主教 613

Pavia, University of, 帕维亚大学 566n

Pecham, John, 约翰·皮切姆 505-6, 546n, 551-2, 590n

'pecia', "分工抄写"工作制 6n, 12-14, 46n, 80

Peiresc, Nicholas Claude Fabri de, 尼古拉·佩雷斯克 642-4n

Peking, 北京 647, 652

Peletier du Mans, Jacques, 曼斯的雅克·佩尔迪埃 543-4

Pellican, Conrad, 康拉德·佩利根 331, 341n

Peregrination in Terram Sanctam (Breydenbach, 1486), 《圣地朝觐图》(布雷登巴赫, 1486) 85-6n, 266n

Perfecte Arte of Navigation (Dee, J.), 《完美的航海术》(约翰·迪伊) 361

A Perfit Description of the Caelistiall Orbes according to the Most Aunciente Doctrine of the Pythagoreans, lately Revived by Copernicus and by Geometrical demonstrations approved (Digges, Thomas, 1576), 《根据毕达哥拉斯悠久学说完美描绘的天体运行轨道, 由哥白尼修订并用几何方法演示的成果》(托马斯·迪吉斯, 1576) 458, 618n, 659n

Pergamum, 帕加马 463

periodicals, 期刊 *see* learned journals

Perseus, 珀尔修斯 215-16

Perspectiva (Witelo, ed. Tanstetter and Apianus, Nuremberg: Johannes Petreius, 1535), 《透视学》(维泰罗编译, 纽伦堡, 出版商约翰·佩特雷乌斯) 586n

Perspectiva Communis (Pecham), 《共点透视》(皮切姆) 506, 546n, 551, 590n

Perspectiva Corporum Regularum (Jamnitzer, Wenzel), 《正立方体透视》(温策尔·詹姆尼泽) 589n

perspective (focused or central), invention of, (共点或中心)透视的发明 186, 193, 268-9, 292, 469n, 548

Peter of Blois, 布卢瓦的彼得 290

Peter of Ravenna，拉韦纳的彼得 308
Peter the Stranger，陌生者彼得 498
Peter the Venerable，圣徒彼得 316
Petit，Jean，让·帕蒂 46n
Petrarch，彼特拉克 18n，26，100，123n，167，184-5，189-90，200，203n，209，212，217-18，221，251-2，292-9，483n，492，571
Petrarchan revival，彼特拉克的复兴 *see* 'rinascita'
Petreius，Johannes (Petri，Hano，Nuremburg printer)，佩特雷乌斯(佩特利，哈诺，纽伦堡印刷商) 586n，587n，591，626n，650，662n
Petri，Adam (Basel printer)，亚当·佩特利(巴塞尔印刷商) 99n，307-8
Petri，Heinrich (or 'Henrici-Petri' or 'Henricpetreius' Basel printer，son of Adam)，海因里希·佩特利(海因里佩特雷乌斯，亚当·佩特利儿子) 99，109n，307n，308n，616-17
Petty，Sir William. 威廉·配第勋爵 700
Peurbach，George，乔治·波伊巴赫 581n，584，586，615n
Peycht Spigel der Sunder，《心灵之镜》318
Pflaum，Jacob，雅各布·普劳姆 587n
Phaedrus (Plato)，《斐德罗篇》(柏拉图) 281
Pharmacopeia Londinensus (Culpeper's translation)，《伦敦药典》(卡尔佩珀的译本) 362
Philadelphia，费拉德尔菲亚(英)，费城(美)，(图书宣传用语中的梦幻之地) 381，386
Philip Ⅱ of Spain，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118，313n，315n，332n，349n，357，390，442n，443-4
'Philip Fair' (Philip Ⅳ of France)，"美男子腓力"(法国国王腓力四世) 312
philologists，philology，语文学家，语文学 119n，183，189，194-5，200-1，218，256，284，289，320，356，357n，483-5，561，696-7
philosophes，哲学家，启蒙思想家 19，147，149，201，209n，257n，298，305，323，362，410，413，423，447，624n，638n，641n *see also*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Royal Society)，《哲学通讯》(皇家学会) 460，462，476n，488，559，633，638n，666-7，680n，694
physicians，物理学家 194，242-3，266，276n，535，538-9，541，545，656-7 *see also* anatomy；Galen；medical studies；surgeons
Piazza Universale：*Dialoghi* (Torriano，1666)，《公共广场：对话》(托里安诺) 417n
Picard，Jean (astronomer)，让·皮卡尔(天文学家) 567n，663n
Picart，Bernard (engraver)，贝尔纳·皮卡尔(镌刻画家) 143-4
Piccolomini，Aeneas Sylvius，Cardinal (Pope Pius Ⅱ)，伊利亚斯·西尔维尔斯·皮克罗密尼，红衣主教(教皇庇护二世) 190n，220
Pico della Mirandola，皮柯·德拉·米兰多拉 278，285n，475
Piero della Francesca，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 252，548，550-1，588n
Pilgrim's Progress (Bunyan，J.)，《天路历程》(班扬) 363
Pimander，《创世记》285n
Pineda，Juan Pérez de，胡安·佩雷斯·德·皮内达 415n
pirated editions，盗版本 108，120，367n，430
Pirckheimer，Willibald，韦利波尔德·皮尔克海默 197n，248

Pirenne, Henri, 亨利·皮雷纳 114n
Pisa, 比萨 103, 528
Pithou, Pierre, 皮埃尔·皮图 400n
Pitiscus, Bartholomaeus, 巴塞洛缪·比蒂斯库 624n
Pius Ⅳ, Pope, 教皇庇护四世 348
plagiarism, 剽窃 121-2, 321, 495, 497n, 548, 667n *see also* authorsh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lain and Easy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Music (Morley, Thomas), 《轻松入门学习音乐手册》(托马斯·莫利) 244
Planck, Max, 麦克斯·普朗克 683
Planetary Theory (Peurbach), 《行星理论》(波伊巴赫) 615n
Plantin,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普朗坦 20n, 56n, 75, 99-100n, 118, 137n, 139-40, 144, 224n, 278n, 332, 336, 343n, 349n, 359, 383, 408-9, 442n, 443, 546n, 581n, 645n
Plantin-Moretus firm, 普朗坦—默雷图斯印务公司 110, 408, 443 (museum), (普朗坦—默雷图斯博物馆)488n, 647
see also Raphelengius, Frans
Platter, Thomas, 托马斯·普拉特 570
Plattes, Gabriel, 加布里埃尔·普拉特斯 305n
Plato, (Ficino's tr. of), 柏拉图(菲奇诺译本) 38n, 46, 77 199, 220, 281, 285, 548n, 576
Platonism, neo-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 286, 322n, 438n, 459, 466, 494, 528, 549, 551, 579-80, 589, 594-5, 602, 640, 681n, 685
Pliny the Elder, 老普林尼 194, 293, 454, 469, 485n, 494, 657, 659, 686, 694
Pliny the Younger, 小普林尼 53
Plotinus, 柏罗丁 285
Plumier, Charles, 查理·普鲁米耶尔 680n
Plutarch, 普卢塔克 351-2, 457n, 577n
Poetics (Aristotle), 《诗学》(亚里士多德) 604n
Poggio (Bracciolini), 波焦(布拉乔里尼) 137n, 189n, 209-11, 221n, 228, 233n
Pole, Reginald, Cardinal, 雷金纳德·波尔 426
Politics (Aristotle),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38n, 546
Poliziano (Politian; Angelo Ambrogini), 伯利齐亚诺(政界人士;安吉洛·安布罗吉尼) 622n
Pollaiuolo 波莱沃洛 489
polychrome printing, 套色印刷 590n
polyglot Bibles, 合参本《圣经》 73, 93, 179, 224, 278, 333, 340, 357, 359-60, 367, 447, 466, 566, 609, 699
Alcalà (Complutensian) edition (1517-22), 阿尔卡拉合参本《圣经》(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331, 336, 340, 368n
Antwerp edition (1569-72), 安特卫普合参本《圣经》(1569-72)332, 409n, 443, 447, 626
Paris edition (1645), 巴黎合参本《圣经》(1645) 337
London edition (1657), 伦敦合参本《圣经》(1657) 337, 695
polyglot households, 多语家庭 139, 447
Poygraphia (Trimius, J., 1518), 密码学(特里特姆斯,1518) 95, 96, 564n
polymaths, 博学鸿儒 73, 113,239
Pontchartrain, Paul de, 保罗·庞恰夏雷恩 333n
'poor man's' Bible, 《穷人的〈圣经〉》 *see* Biblia Pauperum

Poor Richard's Almanack (Franklin, B.), 《穷人理查德的年鉴》(本杰明·富兰克林) 381, 385
popularization, 普及 63, 130, 315, 361, 383-4, 546-7, 552, 619, 690-1
see also vernacular translation movements
portraits, 肖像 85-6, 176n, 233-4, 341n, 430
Postel, Guillaume, 纪尧姆·波斯特尔 21n, 224n, 343n, 409n, 446, 447n, 448
Postillae (Nicholas of Lyra), 《评注》(里拉的尼古拉) 257n
Post-Tridentine Church, 后特伦托公会议的教会 67,118, 343, 354
see also Counter-Reformation
Poussin, Nicolas, 尼古拉·普桑 257n
Prague, 布拉格 640, 678
prayer books, 祈祷书 346, 349, 356, 380, 390, 417, 425, 444
'preaching with one' hands', 15, 316-17, 374
preparatio evangelica, 预备福音神学 369-70, 374
pre-Reformation controversies, 前宗教改革争论 308, 331, 692
'Présence des Absens' (Renaudot) 《缺席的在场》(勒诺多) 246-7, 656n
press, freedom of, 新闻自由 333, 355n, 412-13, 672, 682
Price, Derek da Solla, 德雷克·普莱斯 640n
The Prince (Machiavelli, N.), 《君主论》(尼科罗·马基雅弗利) 101
Principia (Newton),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 78, 138n, 143n, 462-3, 633, 638, 661, 663-4, 679
printers, women, 女性印刷商 24n, 46n, 87n
printers workshops, 印刷商作坊 xv, 18, 23, 43-4, 55-6, 56n, 75-6, 85, 87, 94, 100, 109, 130n, 139, 140n, 154-5, 166-7, 178-80, 222, 223, 248, 250, 269, 309, 319, 336, 341-2, 356, 371, 374, 387, 393n, 399-400, 403n, 404, 423n, 440, 443, 521, 523, 540, 561, 577, 627n, 650, 689 *see also* scholar'printers
printing (as a capitalist enterprise), 印刷业(作为资本主义产业) 22n, 30, 55-8, 139n, 370, 375-7, 378- 94, 398, 404-5, 410-15, 419, 421, 440-1, 445-6, 541, 559-61, 680, 689
printing centers, location and movement of, 印刷业中心,定位与迁移 4, 36-8, 44n, 58, 138, 140n, 145n, 166-7, 178-9, 317, 398-9, 403-21, 443-5, 446-8, 640, 645-50
printing press, invention of, 印刷机的发明 xv, 20-1, 25, 31-3, 36, 54-5, 89n, 95-6, 119, 249-50, 304-5, 317, 436-7, 463, 507, 521, 561, 703 *see also* Gutenberg
prints, 印刷,印刷术,印刷品 *see* engravings
privileges (to print), 出版特许,特权(享受印刷品)58, 118, 120, 154, 361, 390,415-17, 432, 441, 446, 550
The Prognostication Everlasting (Digges, L.), 《永恒的预言》(L. 迪吉斯) 618n, 659n
prognostications, 预言 453, 509, 619, 656, 659
prohibited books, 禁书 *see* banned books
propaganda, 宣教,宣传 4, 23, 28, 46n, 59, 68, 132-3, 135,147-8, 172, 175n, 202n, 271, 304, 312, 326, 362, 402n, 416-18, 420, 424, 427, 454, 477 614, 616, 666, 677n
Propaganda, Congregation of (established in 1626), 宣教会讲演堂(1626 创建) 147, 326n (printing office), (宣教会印刷所) 354, 407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锡安山长老的协议书" 150n
Prutenic Tables (*Prutenicae Tabulae Coelestium Motuum*; Reinhold, E., Tübingen: Ulricus Morhardus, 1551), 《普鲁士星表》(莱茵霍尔德,蒂宾根:莫尔哈杜斯,1551) 581, 596-7, 606n, 618n, 623-4, 629, 695n
Psalterium Graecum cum Versione Latin? (ed. John of Piacenza, 1481), 《〈诗篇〉形式与拉丁诗》(皮亚琴察的约翰编辑)320n
Ptolemy (Claudius Ptolomaeus),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托勒密) 69, 170n, 192-3, 214, 268n, 382, 465, 469, 470, 488, 492, 495, 503, 512, 515-16, 525, 527 549, 586, 589n, 603, 605, 613, 621, 624, 654, 657, 680, 686, 694-5
see also Almagest; Geographia
publicists, 宣教者,宣传者 59-60, 120n (Vespucci), 142 (Toland), 147-8, 176, 276, 316-17, 357, 362, 547, 551, 651, 654, 694
publicity, 宣传 59-60, 119n, 120, 129, 142, 228-30, 434 (witchcraze), 442-6, 553, 611, 619-20, 659n, 665, 694-5
attitudes toward, 对宣传的态度 95, 156, 176 (Italians vs Northerners), (意大利人和北欧人态度的区别)273-4, 509, 546-53, 556-66, 564-5 (Leonardo vs Dürer), (莱奥纳尔多和丢勒态度的区别)690, 694-5
exploitation and use of by: artisan-authors (engineers, instrument-makers, reckon masters) 各色人等对宣传的利用:工匠—作者(工程师,工具制造者,计算师) 241-2, 261, 383, 504-5, 530, 552-4, 556-66; astronomers and anatomi, 天文学家和解剖学家 510, 576, 618-20, 632, 694-5; Galileo, 伽利略 525, 527-8, 619; literati, 文人 94, 228-30, 394; Lutherans, 路德派 306-10, 367, 377, 614; Paracelsus, 帕拉切尔苏斯 276, 474, 539; preachers and teachers, 布道师与导师 384, 546-51, 694; Rosicrucians, 玫瑰十字会 274-6;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665, 694-5; *see also* propaganda; Pacioli; Tartaglia inadvertent and free (see Index Libroum)
pulpit oratory, 布道坛讲演 129, 174, 236, 308, 315-16, 365, 370, 372-4, 457n, 546-7, 553-4
Puritans, 清教徒 19, 332, 358, 364, 424-5, 428, 433, 522, 533n, 550, 641, 669, 680-1, 685
Pynson, Richard (16th c. English printer), 理查德·平森(16 世纪英格兰印刷商) 104-5
Pythagoras, pythagorean, 毕达哥拉斯 193, 203, 245, 279, 284, 392, 458, 494, 510, 548, 551, 563, 577, 589, 618, 620, 652

Q

quadrivium, "四艺" 102n, 253n, 384, 432n, 532-4 esp., 537, 543-4, 567n, 589, 602n
Quentell, Heinrich, 海因里希·昆特尔 206n
Questione in Genesim (Mersenne, 1623), 《创世问答》(马兰·梅森,1623)669n
Questions Théologiques (Mersenne), 《神学问答》(马兰·梅森) 644n

R

Rabelais, François, 弗朗索瓦·拉伯雷 21n, 72, 229n, 365, 393, 400-1, 405, 418, 457, 473, 541, 566n, 568, 676

Racine, Jean, 让·拉辛 351
Ragguali di Parnaso (Boccalini, Venice, 1612-13),《文坛报道》(博卡利尼,威尼斯,1612—13) 669n
Raimondi, Marcantonio, 马坎托尼奥·拉伊蒙迪 *see* Marcantonio
Raleigh, Sir Walter, 沃尔特·罗利爵士 273, 281n, 456n, 563
Ramadan, 斋月 610, 612
Ramelli, Agostino, 阿戈斯蒂诺·拉梅里 555-6
Ramsay, André Michel, 安德烈·米歇尔·拉姆齐 282n
Ramus, Peter, 彼得·拉米斯 41n, 67 (Ramism), 76n, 102, 140n, 275, 321, 542-3, 624n, 641n, 650n, 651, 674
Randall, J. H., Jr, 兰德尔 495-6, 504, 642n
Raphael, 拉斐尔 175-6, 231, 238, 255n, 564
Raphelengius, Frans, 弗兰斯·拉菲伦吉乌斯 332, 409, 647
Rastell, John, 约翰·拉斯泰尔 105, 362
Ratdolt, Erhard, 厄尔哈特·拉特多尔特 82n, 106n, 547n, 583, 586n, 587-8, 590
Ravetz, Jerome, 杰罗姆·拉维茨 605, 607, 613n
reading rooms (chambres de lecture), 读书室(课室) 132,149
reckon masters, 算师 59, 382-3, 532, 537, 542, 552, 660, 686, 689, 693, 702
Recorde, Robert, 罗伯特·利科尔 432n, 531, 533n, 534, 633n
Redman, John (printer), 约翰·雷德曼(印刷商) 104-5
Regiomontanus, Johann (J. Mullex of Königsberg), 约翰·雷乔蒙塔努斯(孔尼斯堡的穆勒赫) 106n, 247n, 464, 490, 509, 534, 581-5, 589n, 590-1, 598-9n, 604, 618, 620n, 621, 623n, 624n
Nuremberg press of, 纽伦堡印刷界的雷乔蒙塔努斯 461, 536, 577 586-7, 626n, 632, 691
Reinhold, Erasmus, 伊拉斯谟·莱因霍尔德 583, 597, 607n, 615n, 618n, 623, 624n, 649, 695n
Remarks upon a... Discourse of Free Thinking (Bentley, Richard, 1713),《关于自由思想的话语……的评论》(理查德·本特利,1713) 338n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25, 27, 37, 73, 77, 163-302 (esp. 300n), 306, 368, 377, 410, 412-13, 418-19, 456, 459, 465n-6, 471, 474-5, 485, 488-98, 521-2n, 592, 594-5, 602,683
see also classical revivals; 'rinascita'
renascences, 复兴 *see* classical revivals
Renaudot, Théophraste, 泰奥福雷斯特·勒诺多 133n, 246-7, 643n, 656, 665
Republic of Letters, 文坛,文学界,文人共同体 xv, 128, 136-58 (137n history of term 历史由来), 228-9, 397, 401, 409, 413, 420, 448, 619, 624n, 638, 645, 647, 653, 691
see also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Respublica Literaria Christiana (Grotius),《基督教文坛》(格劳秀斯) 137n
Reuchlin, Johann, 约翰·罗伊希林 94n, 221, 278, 305n, 331, 347, 367 372n, 399n, 400, 447n, 620
Reuwich (or Rewich), Erhard (illustrator), 厄尔哈特·卢维奇(插图艺术家) 85-6, 266n
Revelation,《启示录》*see* Bible, books of
Rhau-Grünenberg, 劳·格鲁能伯格 see Grünenberg, Johannes

Rheticus，雷蒂库斯 525，532n，577，581n，582n，583，587n，591，593，599，607，614，617，62In，623n，624n，626n，634，637-8，644，649-50，651n，652，654，664，694

Rhetorica（George of Trebizond，Venice，1472），《修辞学》(特雷比宗的乔治，威尼斯，1472)399n

Rhetorica（Fichet，G.），《修辞学》(纪尧姆·菲歇）399n

Rhodes，罗得斯 86n，375n

Riccioli，Giovanni Battista，焦瓦尼·巴蒂斯塔·里奇奥利 624n，629

Rice，Eugene，尤金·赖斯 325

Richelieu，Cardinal 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红衣主教黎塞留 133n，135，441，656n

Ridley，Nicholas，尼古拉·里德利 68

Rienieri，Vincento，文森托·莱因涅利 630

'rinascita'（Petrarchan revival），"复兴"(彼特拉克用语）137n，164，172，174-5，177-8，184-5，194-5，217-18，294n，298，300，306，368

Ripa，Cesare，切萨雷·利帕 662n

Ripoli press（convent of San Jacopo），利珀里印刷所(利珀里的圣雅科珀修道院）15n，46

robe nobility，穿袍贵族 147，395

Robertson，H. M.，罗伯逊 381

Robespierre，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罗伯斯比尔 352

Rolevinck，Werner，维纳·罗勒文克 15n，316

Rome（as an ecclesiastical centre），罗马(作为基督教中心）178，305，348，355，390，398-9n，405，412，647-8，656，671，682

Roriczer，Matthias，马提亚斯·罗利泽 65n

Rose，P. L.，保罗·劳伦斯·罗斯 675n

Rosen，Edward，爱德华·罗森 498，501，631，641

Rosetta Stone，罗塞特石碑 69n，77n，563

Rosicrucians，玫瑰十字会 68-9n，77，97n，125，140-1，274-6，438，529n，534n，669

Rostock，罗伯斯比尔 625n

Rotterdam，鹿特丹 138，401，420，646n

Rousseau，Jean-Jacques，让-雅克·卢梭 128n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皇家内科医师学会 528n

Royal Society（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皇家学会(伦敦，以改进自然知识为宗旨）59n，283，337，471，476，488，494，556，559，601，629，625，634，641n，647，664-70，674，679，681，694-6

Rudolph Ⅱ，of Prague，Holy Roman Emperor，布拉格的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74，625n，640

Rudolphine Tables，《鲁道夫星表》461，626，628，631-2，661

Rutherford，Lord Ernest of Nelson，卢瑟福，纳尔逊的欧内斯特爵士 562

S

Sacrobosco，Joannes de（John of Holywood），萨克罗伯斯柯的约翰(霍利乌的约翰）537，624n；

Sphaera，《地球》510-12，517，533-4n，590，615n，692

Sacy，Isaac le Maistre de，伊萨克·萨希 351n

Saenger，Paul，保罗·西尼尔 38n

Saggi（Papers of the Cimento），《例证》(西门托学会论文集）666-7，674

Saint-Evremond，Charles de Saint-Denis，圣埃弗里蒙德，查理·圣-德尼 395n

Saint-Simon, Henri, 亨利·圣西门 447
Salamanca, 萨拉曼卡 386,408,444
'Salomon's House' "萨洛蒙宝屋" 255n, 625n
Salusbury, Thomas, 托马斯·索尔兹伯里 631n, 677n
Salutati, Coluccio, 科卢奇奥·萨卢塔蒂 189, 203n, 205n, 251,473
Samaritan language, 撒玛利亚语 337
San Antonio di Castello (Venetian library), 圣安东尼奥·迪·卡斯特罗(威尼斯图书馆) 548n
Santritter, J., of Heilbronn, 海尔布隆的桑特里特 587n
Sanuto, Marco, 马尔科·萨努托 547
Sappho, 萨福 122
Sarpi, Paolo, 保罗·萨尔皮 412-13, 418, 644n
Sarton, George, 乔治·萨尔顿 27, 55, 72n, 75, 170n, 171n, 248n, 387, 484, 486, 507-9, 564-5, 591, 637, 642, 652n
Saumur, academy of, 索穆尔神学院 278n
Savonarola, Girolamo, 基罗拉摩·萨沃纳罗拉 236, 285n, 316
Scaliger, Joseph Justus, 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 73-4, 200, 301, 611n
Schatzgeyer, Caspar, 加斯帕·斯卡茨盖耶尔 327
Schedel, Hartmann, 哈特曼·谢德尔 197n
Scheiner,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谢纳 530n, 561n, 624n, 653n
Scheubel, Johan, 约翰·舒贝尔 587n
Scheurl, Christoph, 克里斯托弗·舒贝尔 308n
Schickard, Wilhelm, 威廉·施加尔 642
Schioppo, Cristoforo, 克里斯托弗罗·斯基奥珀 52n
Schmuttermayer, Hans, 汉斯·施密特梅尔 65n
Schoeffer, John, 约翰·舍费尔 96n
Schoeffer, Peter (Mainz printer), 彼得·舍费尔(美因兹印刷商)31, 49, 51,55n, 57-8, 85-6, 91, 95-6, 266, 484n
Scholar-printers, 学者—印刷商 xv, 4, 75, 85, 87, 98-9, 101,104n, 139, 174, 177, 179-80, 221-4, 250-1, 277n, 279, 309, 320, 328, 331, 336-7, 356, 359-60n, 367n, 369-70, 399-400, 403n, 443-9 esp., 509, 521, 524, 542, 545, 561, 566, 569-70, 689, 692 *see also* Amerbach; Estienne; Oporinus; Plantin; *et al*
Scholarum Mamaticarum (Ramus), 《数学家》(拉米斯) 624n
scholasticism, schoolmen, 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家 212-14, 257, 294, 314-15, 457n, 459, 466, 472-3, 548, 595, 602
scholastic natural philosophy, 经院学派的自然哲学 495-9,503-6,522-4 *see also*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Schönberg,Cardinal Nicholas, 尼古拉·勋贝格红衣主教 652n
Schöner,Johannes (mamatician) 约翰·舍内尔 247n,587n
schooling, 学历 151,395-8 ('educational revolution'), ("教育革命")430-3
Schriftstellerlexicon, 《作者名录》94n
Schwenckfelt,Kaspar, 卡斯帕·施温克菲尔特 446
science,scientist (definitions of), 科学,科学家(科学家的若干定义) 107,640,642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科学仪器,科学工具 480,504,519,554,561n,583,587,597-8, 625, 627, 659, 661 *see also* instrument makers; inventions
Scoriggio,Lazaro, 拉扎罗·斯科里焦 675

Scott, Michael, 迈克尔·斯科特 537
Scott, Sir Walter, 沃尔特·司各特 155
scribes and copyists, 抄书人,誊写人 xiii, xiv, 6n, 11-16, 33, 45-7, 55. 59, 62, 70, 216, 251n, 312n, 334n, 379-80, 540
scriptoria, 抄书房 11-16, 38, 59, 70, 216, 251, 312n, 317, 346, 379-80, 391, 515
secrecy, 秘密 270-80, 383, 434, 510, 551, 554, 562-4, 620-1, 658, 690 *see also* ciphers, clandestine presses; publicity attitudes toward
Secret (Petrarch), 《我的秘密》(彼特拉克) 230
secret societies, 秘密会社 *see* conspiracies; Rosicrucians
secularism, secularization, 世俗主义,世俗化 73, 79, 131, 133, 326n, 370-4, 379, 398, 417-18, 441-3
self-help, 自助 87, 243-7, 273, 318, 366, 385, 425, 448n, 525, 535, 537, 546, 554, 602 *see also* autodidacts
Seneca, 塞内加 210, 401-2
Sentences (Lombard, Peter), 《教父名言集》(彼得·朗巴德) 314n, 339, 365
Septuagint, 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see* Bible, Greek and Hebrew versions
serial publications, 丛刊,丛书 462, 587, 619 *see also* Dioscorides; ephemerides
Sermo de Presentacione Beate Virginis Marie (Rolevinck, W., Cologne, 1470), 《祝福圣母布道辞》(维纳·罗勒文克,科隆,1470) 15n
'Sermon of Fifty' (Voltaire), 《五十人布道书》(伏尔泰) 324n
sermons, 布道 73, 119n, 129, 236, 297n, 318, 346, 365, 372-3, 546, 553
Servetus, Michael, 迈克尔·塞尔维特 419, 421, 446, 535, 566
Severino, Marco Aurelio, 马可·奥雷利奥·塞维利诺 667-8, 680n
Sextus Empiricus, 塞克斯都·恩批里柯 231n
Seznec, Jean, 让·塞内克 195-200, 214, 285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19n, 236, 364
Shirley, John, 约翰·雪利 13n
Shelton, Thomas, 托马斯·谢尔顿 283
Shumaker, Wayne, 韦因·舒梅克 285-6, 290
Siberch's press at Cambridge, 剑桥大学的希伯克印刷所 399n
Sic et Non (Abelard), 《是与否》(阿伯拉尔) 284
Sidereus Nuncius (Galileo), 《星空信使》(伽利略) 530, 546n, 652
'Sides and Angles of Triangles', 《三角形综述》*see De Lateribus...*
Sidney, Algernon, 阿尔杰农·西德尼 142n
Sidney, Sir Philip, 菲利普·西德尼勋爵 140, 259-60
'silent instructors', "静默的老师" 244n, 246, 538-9, 698
Simler Josias, (16th c. bibliographer), 约西亚·西姆勒(16世纪目录学家) 107
Simocatta, Theophilactus (7th c. Byzantine writer), 忒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7世纪拜占庭作家) 579-80
Simon, Richard (French Catholic Bible scholar), 理查德·西蒙(法国《圣经》学者) 332-3, 418, 420
Simone, Franco, 弗兰科·西蒙 294n
Simonides, 西蒙尼得斯 256
Sismondi, 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让·查理·西斯蒙第 128n
Sixtus IV, Pope,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 376
Sixtus V, Pope, 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 261
Sleidan, Johann, 约翰·斯莱登 305

slide rules，计算尺 29n，520，661，697 *see also* scientific instruments
Smith，Adam，亚当·斯密 393
Smith，Sir Thomas，托马斯·史密斯勋爵 618n
Snell，Willebrord，韦尔布洛德·斯奈尔 663n
Society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技术史学会 20n
Socinians，索齐尼派 327，333，418-19
Socrates，苏格拉底 122，237
'Sodalitas Staupitziana'，"斯托皮兹研究会" 307n-8n，
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 327，365
Sombart，Werner，沃纳·桑巴特 381
Soncino press，松齐诺出版社 367n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 180，237
Sorbonne，Sorbonnistes，145n，207，250n，328，340，348n，356，399-401，407，411，442n，522，540-2 索邦神学院，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
Southwell，Robert，罗伯特·索斯韦尔 665n
Sozzini，Lelio，雷里奥·索齐尼 446
Speculum（Vincent of Beauvais），《窥镜》（博韦的樊尚）513-14
Sphaera，《地球》*see* Sacrobosco
Spinoza，Benedict de，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 700
Sprat，Thomas（Bishop），托马斯·斯普拉特（主教）274，283，337，562，601，668-70，674，696
Stadius，斯塔狄乌斯 596-7
Staël，Mme de，斯塔尔夫人 128n
The Starry Messenger（Galileo），《星空信使》（伽利略）*see Sidereus Nuncius*
stationers，书商 12-13，16，23，47，55，58，514，540 *see also* cartolai
Stationers，Company（England）文具商（伦敦）106
Statutes of Virginia（Hening），《弗吉尼亚法令汇编》116
steam press，蒸汽动力印刷机 31，61n，130，156，423，704
Stecchini，L. C.，斯特齐尼 283n
Steganographia（Trimius，J.，1606），《密码学》（特里特姆斯，1606）96-7n，564n
Steinberg，S. H.，S. H. 斯坦贝格 5，7，52n，117，407
Stephanus，Joannes（Stephan，Jan，of Calcar），约翰·斯提芬努斯（卡尔加的让·斯提芬）267，551n
Stereometria（Kepler），《容积测量法》（开普勒）627n
Stevin，Simon，西蒙·斯蒂文 241，468，500，529，531，535，546n，555
Stöffler，*Johann*，约翰·斯托夫勒 587n
Stone，Lawrence，劳伦斯·斯通 61n，330，334
Stopius，Nicholas，尼古拉·斯托皮乌斯 569n
Straet，Jan van der（'Stradano'，'Stradanus'），让·凡·德·斯特拉特（"斯特拉达诺"，"斯特拉达努斯"）20，188n，197n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 13n，98n，141n，179，350，370-4，398n，440，608n，645-6
Strayer，Joseph，约瑟夫·斯特雷耶尔 46n
strikes，罢工 22，392
Strozzi，Gerolamo（Florentine merchant），杰罗拉默·斯托齐（佛罗伦萨商人）38n
Strozzi，Piero（Florentine notary and scribe）皮埃罗·斯特罗兹（佛罗伦萨公证人和抄书人），13n
Struik，Dirk，德克·斯特卢克 530，534
Stubbe，Henry（17th c. English physician and pamphleteer），亨利·斯塔布（17 世纪英国医师和小册子作者）668
Stuber，Wolfgang，沃尔夫冈·斯图伯 341n

Subiaco，苏比亚科 204，398
subscription lists，订户名单 64，132，367n，677n
Summa theologica（Aquinas），《神学大全》(阿奎那) 286，314n，513
Summa de arithmetica，geometria et proportionate（Pacioli，Venice：Paganini，1494），《算术、几何与比例大全》(帕奇奥里，威尼斯：帕格尼尼，1494) 547-8，550-1，589n
Supplementum Chronicarum（Foresti，J. F.，Venice，1483），《编年史补记》(雅各布·菲利普·福雷斯蒂，威尼斯，1483) 66n
surgeons，surgery，外科医师，外科手术 251-3，270，539，541，560-1
surreptitious printing，秘密出版 *see* clandestine book trade
surveyors，测量师 545，548，551，557，686
Survival of Pagan Gods（Seznec），《异教诸神的遗存》(让·塞内克) 195
Sweynheim (cleric，helped set up first press in Italy，with Pannartz)，斯韦因海姆(教士，与潘纳兹合作创办意大利第一所印刷厂) 19n，37n，50n，204，398
Sybilline Prophecies，西比林先师诗篇 78，277n，324
Syllabus of Errors（1864），《邪说汇编》(1864) 183，355
Sylvius，Willem (Antwerp printer)，威廉·西韦尔(安特卫普印刷商) 96，99，137n，276n
Syriac language，古叙利亚语 77，337，448

T

Tabulae Directionum（*Tables of Directions*；Regiomontanm，Augsburg：Ratdolt，1490），《方位表》(雷乔蒙塔努斯，奥格斯堡：拉特多尔特，1490) 583n，587n，591n
Tabulae Medicae（Rienieri，1639），《美第奇星表》(莱因涅利) 630
Tabulae Rudolphinae，《鲁道夫星表》*see* Rudolphine Tables
Tachygraphy，(Shelton，T.，1641)，《速记术》(谢尔顿，1641) 283
Tacitus，塔西佗 127，201，210，211 (Tacitus-Apuleius codex)，(塔西佗—阿普列乌斯抄本) 394n
Talmud，犹太经典《塔木德经》15n，340，341，448
Tanstetter，Georg，乔治·坦斯塔特 582n，586n
Tartaglia，Niccolò，尼科洛·塔尔塔利亚 23，497n，525，537，546-7，550，552，560n
Tasso，Torquato，托夸托·塔索 424n
Taylor，E. G R.，E. G R. 泰勒 530
Taylor，H. O.，H. O. 泰勒 73
telescope，望远镜 119，525，553，583，625，652-3，685
Tetzel，Johann，约翰·特泽尔 377
Textbooks，textbook-writing，教材，教材编写 102-3，383-5 (business arithmetic)，(商务算术) 474，530，534-5，543-52
see also quadrivium；trivium
Textiles，纺织品 21，30，173，413
Textor，J.，J. 德克斯托 197n
'textus receptus'，"普遍接受的文本" 113n，331，338，581n *see also* Bible，Vulgate
Thanner，Jacob (or 'Herbipolensis'，16th c. Leipzig printer)，雅各布·坦纳(16世纪莱比锡印刷商) 307n
Theatre of Machines（Besson，Jacques），《机器一览》(雅克·贝松) 556
Theatrum Orbis Terrarum（Ortelius atlas），《世界地图集》(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 *88，109-10，193，227，517*

Theodore of Freiburg, 弗赖堡的狄奥多尔 498
Theophilus (priest), 狄奥菲卢斯(牧师) 556
Theophrastus, 泰奥弗拉斯托斯 484-5
Theoria et Practica (Fanti, S., Venice, 1514), 《理论与实践》(凡蒂,威尼斯,1514) 82n
Theorica Planetarum (Campanus of Novara), 《行星运行论》(诺瓦拉的坎帕努斯) 512n
'Theoricae Novae'' (Peurbach), "新理论"(波伊巴赫) 590n
Theoricas Mediceorum Planetarum (Borelli, G.), 《彗星轨迹论》(焦瓦尼·博雷利) 674
Therhoernen, Arnold (15thc. printer), 阿诺德·特尔霍南(15世纪印刷商) 15n
Thesaurus utonicae Linguae (Plantin, C., 1573), 《条顿语义类词典》(克里斯托弗·普朗坦,1573) 99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626,637,639, 643,649,661
Thomas à Kempis, 坎普滕的托马斯 391,401
Thomas, Dylan, 迪伦·托马斯 130
Thomas, Keith, 吉斯·托马斯 246,436-7
Thomas, Marcel, 马塞尔·托马斯 35
Thomist revival, 托马斯主义的复活 314-15
Thorndike, Lynn, Jr, 林·桑代克 483,492, 500-1,529-30,582n,584n,621
Thoth (Egyptian God), 透特(埃及神) *see* Hermes Trismegistus
'Tipografia della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宣教会讲演堂, *see* Propaganda
Titian, 提香 175, 239n, 267, 489, 569
title pages, 书名页 52,59,82,106,168,234, 242,411,513,579,587
Titus Vespasianus, 泰特斯·韦斯巴西亚诺 280n
Toland, John, 约翰·托兰德 142-3
topography, 地形学 110,186,483
Torquemada, Juan de, Cardinal, 胡安·德·托尔克马达红衣主教 398
Torriano, Giovanni, 焦瓦尼·托里安诺 417n
Tortelli, Giovanni (15th c. papal librarian), 焦瓦尼·托特里(15世纪教廷图书馆馆长) 20n,21n
Tory, Geoffroy, 杰弗里·托里 203n,541,548
Toscanelli, Paolo, 保罗·托斯卡内里 584,586
Toumes, Jean Ⅰ de, 让·图尔内一世 544
Tournes, Jean Ⅱ de, 让·图尔内二世 411,544
transportation, 运输 29,460n,462
Travels (Marco Polo), 《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 483n
The Travels of Cyrus (Ramsay, A. M.), 《居鲁士大帝巡游记》(拉姆齐) 282n
Traversari, Ambrosio. 安布罗西奥·特拉维萨里 233n
Treasure of Knowledge (Recorde, R.), 《知识宝库》(罗伯特·利科尔) 534n
Trechsel printing firm in Lyons, 里昂的特雷舍尔印务公司 566n
Trent, Council of, 特伦托公会议 3,145,314, 329,331,333,344-6n,348,350,353,355, 415,421 *see also* Counter-Reformation
Trevor-Roper, Hugh, 休·特雷弗-罗珀 409, 418,420,433-6,438-9,448
trigonometry, 三角 583,587,597,623n,661
trilingual studies, 古三语研究 321,331,333, 340,353,356,359-60,370,524,606,626n, 692-3,700
Trimius, Johannes, abbot of Sponheim, 约翰·特里特姆斯,斯蓬海姆修道院院长 14-15, 50n, 94-9, 137n, 200n, 276, 378n, 380, 447n, 564n
trivium, "三艺" 102n,432n,602n
The True Order and Methode of Wryting and Reading Hystories (Blundevill, Thomas,

London,1574),《写史读史的真正秩序和方法》(托马斯·布伦德维尔,伦敦,1574) 103n
Tübingen, university of, 蒂宾根大学 540n, 587n,629,643,649n,650n,654-5
Tunstall,Cuthbert,Bishop, 库特伯特·滕斯托尔主教 548,551
Turks,'Turkish threat', 土耳其人,"土耳其威胁" 132,178,303-4,317,375n,594
Turretini, François, 弗朗索瓦·杜雷迪尼 420n
Twain,Mark, 马克·吐温 155,583n
Tyndale,William, 威廉·廷代尔 356-8
type faces,fonts,forms, 字体,字形,形式 58, 77,82-3, 201-7, 224, 279, 407, 430, 448, 490,548-9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Dibdin,T.),《印刷术的古代技术发展》(托马斯·迪布丁) 378n

U

Ulfilas, 乌尔菲勒斯 334n
Ulm, 乌尔姆 85, 627
underground book trade, 地下书籍贸易
see clandestine presses; conspiracies
United Provinces, 尼德兰联合共和国,北方七省联盟,荷兰 145, 333, 409, 418, 420, 446, 637, 642, 645-7, 655
'Uraniborg' (Tycho's island), "天文堡"(第谷观天的赫文岛) 625-6, 640
Urban IV,Pope, 教皇乌尔班四世 547n
'Utopia' (as colophon), "乌托邦"(图书宣传用语中的梦幻之地) 138-9

V

'Vadianus', "瓦狄亚努斯"
see Watt,Joachim von
Valetta,Joseph, 约瑟夫·瓦雷塔 667n
Valla,Giorgio (of Piacenza,1447—1500), 乔治奥·瓦拉(皮亚琴察的) 577n, 595-6, 620n
Valla, Lorenzo, 洛伦佐·瓦拉 52n, 137n, 138n, 189, 191, 194-5, 201n, 205n, 256, 301, 320, 323n
Valturi, Roberto, 罗伯托·瓦尔图里 555,565n
Van Helmont, 凡·赫尔蒙 643
Vansina,Jan , 简·凡西纳 xiii
Varenius,Bernhardus, 伯恩哈杜斯·瓦雷尼乌斯 663n
Vasari,Georgio, 乔奇奥·瓦萨里 20,112n, 176, 188, 232-3, 253, 267n, 542, 548n, 566n
Vasco da Gama, 伽马 463
Vascosan, Michel de, 米歇尔·瓦斯科桑 403, 544
Vatican II,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355
Vautrollier,Thomas (*Elizabethan printer*), 托马斯·沃特罗里尔(伊丽莎白时代的印刷商) 417n
Vedel, Anders Sörensen (Tycho Brahe's tutor), 安德斯·索伦森·韦德尔(第谷的老师)623
vellum, 羊皮纸 15, 114, 334n
Venice (as a printing center), 威尼斯(印刷业中心) 20n,23,38n,50n,57,106n,120n, 139-40n,176,221-4,240,250,302,341n, 348, 376n, 393, 398-400n, 402, 409-13, 447n,547,569-70,671, 675, 682
Vergerius,Petrus Paulus, 彼得·维吉里乌斯 662n
Vergil,Polydore,波利多尔·维吉尔 21n,233n
vernacular translation movements, 通俗语翻译运动 23,63,123,127-8,177,185n,242,

283, 312, 342-4, 346-7, 353, 355-6, 389, 403n, 405-6, 525-7, 530-1, 539, 544-51, 653n, 656-8, 656n, 690, 693 *see* also Bible-reading
Véron, François (1575-1625), 弗朗索瓦·维隆(1575-1625) 326n
Verrocchio, Andrea del, 安德利亚·德尔·韦罗基奥 548
Vervliet, H., 维夫列特 180
A very profitable treatise... declarynge what great profit might come... if re were a regester made of all reliques (Calvin), 《大有裨益的论文……宣示如何受益……条件是为一切圣物编制目录》 377n
Vesalius, Andreas, 安德利亚·维萨里 189n, 191, 239n, 249n, 267, 269, 273, 446, 470, 486-7, 489-90, 502n, 503, 523, 525, 528n, 534n, 535, 562, 565, 566n, 567-78, 616, 687, 697 *see also* De Fabrica
Vespasiano da Bisticci (15th c. Florentine bookdealer), 韦斯巴西亚诺(15世纪佛罗伦萨的书商) 13n, 45, 48-9, 57, 100, 178; 300n
Vespucci, Amerigo, 阿美里戈·维斯普奇 120n
Victorines, 威克多修道院的修士 *see* Hugh of Saint Victor
Vienne, Church Council at (1311), 维也纳教会会议 340
Viète (Vieta), François, 弗朗索瓦·维埃特 532, 537, 624n
Vikings, 维京人 210, 482
Villani, Filippo, 菲利珀·维拉尼 232n
Vincent of Beauvais, 博韦的樊尚 514, 552
Virgil, 维吉尔 190, 210-11, 259-60
visual aids, 直观教具, 视觉辅助手段 53, 70, 86n, 252-3, 258, 261-9, 458, 468-71, 485-7, 489, 555, 588-90, 698 *see also* (illustration; images)
'Vite de' Matematici' (Baldi, B.), 《数学家列传》(贝纳迪诺·波尔迪) 624n, 675n
Vitruvius, 维特鲁威 69, 83, 207, 211, 237, 242-3, 249n, 469, 549, 555, 571
Vittorino da Feltre, 费尔特雷的维多里诺 537n
Vives, Juan Luis, 路易·比维斯 102, 175n, 473-4
Viviani, Vicenzo, 维森佐·维维亚尼 665n
Voetian party, 沃伊特教派 655n
Vogelinus, Johann, 约翰·沃基利努斯 598
Voltaire, 伏尔泰 136, 143n, 209n, 324n, 404, 419-20, 624n, 633n, 682
Vossius, Gerard, 杰拉德·沃西乌斯 281n
vowel points, 元音点 *see* Hebrew vowel points
voyages of discovery, 地理发现的航海 74, 480, 516, 592n, 594-5, 600
Vulgate, 拉丁文《圣经》(圣哲罗姆编订) *see* Bible

W

Waldensians, 韦尔多教派 303, 311, 328 (Vauldois), (亦名沃尔多派) 334n, 692
Waldseemüller, Martin, 马丁·瓦尔德塞米勒 120n, 447n
Wales, 威尔士 110
Walker, D. P., D. P. 沃克 97n
Waller, Richard, 理查德·沃勒 666n
Walter of Henley, 亨利的沃尔特 556
Walton, Brian, 布赖恩·沃尔顿 695n
Warburton, William, Bishop, 威廉·沃伯顿主教 282
Ward, Seth, 塞斯·沃德 550n, 631n
Wartburg, 瓦特堡 368n
Watt, James, 詹姆斯·瓦特 262n
Watt, Joachim von ('Vadianus'), 约西姆·瓦

特（拉丁化名字“瓦狄亚努斯”）137n，138n
Weaver，Robert，罗伯特·韦弗 428n
Weber，Max，马克斯·韦伯 378-403，414，427，445，459，641，661，681
Webster，John，约翰·韦伯斯特 550n
Wechel 韦谢尔家族
Andreas (Chrétien's son)，安德利亚·韦谢尔(克雷蒂安之子) 140n
Chrétien (Paris printer)，克雷蒂安·韦谢尔(巴黎印刷商)140n
firm，工厂 139-40，275n，276n，448n，474
Wechel，Johann (Frankfurt printer)，约翰·维谢尔(法兰克福印刷商) 140n
Weiditz，Hans，汉斯·韦迪茨 487n
Weiss，Roberto，罗伯托·魏斯 225
Wense，Wilhelm，威廉·文斯 668n
A Werke for Householders (1530)，《家用指南》(1530) 425
Werner，Johann (16th c. astronomer)，约翰·维纳(16 世纪天文学家)247n
Wesley，John，约翰·韦斯利 439
Whewell，William，威廉·惠韦尔 494-5，640n
Whitehead，A. N.，A.N. 怀特海 462，466，472，475，493，636-8
Whitman，Walt，沃尔特·惠特曼 493
Wiegand，Willy，韦利·维甘德 53n
Wiligelmo (sculptor)，韦利杰尔摩(雕塑家) 235
Wilkes，John，约翰·威尔克斯 133n
Wilkins，John，约翰·威尔金斯 555，564n
Willey，Basil，巴西尔·韦利 471
William of Moerbeke，莫尔贝克的威廉 497
William of Orange，奥兰治的威廉 96n
Willoughby (Willughby) Francis，弗朗西斯·威洛比 634，664
Wimpfeling，Jacob 雅各布·温普斐灵 94n，371，373n
Windesheim congregation，温德舍姆修道院会众 346，380
Wing，Vincent，文森特·温 631n，632，677n
Wingate，Edmund，埃德蒙·温盖特 532
witches，witchcraze，巫师，女巫，巫术狂热 150n，324，433-9，521，619，669n，681
see also magic；demonology
Witelo，维泰洛 586，590n，626n
Wittelsbach，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407
Wittenberg，维滕堡 179，206，307-9，323，338，367，405，401，412，535 540n，543n，576n，624n，641，650，653，682，685，688，700
‘Wittenberg Heiligtumsbuch’，“维滕堡的收藏” 376n
Wittkower，Rudolph，鲁道夫·威特考尔 175n
Witzel，Georg (Catholic polemicist)，格奥尔格·韦泽尔(天主教论战者) 354
Wolfe，John (16th c. English printer)，约翰·沃尔夫(16 世纪英国印刷商)416-17
Wolsey，Thomas，Cardinal，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 396，399n
woodblocks，木刻，雕版 52-3，53n，54，82，85n，98，133n，233-4，255，257n，259，261-2，263 (comparison with drawing)，(与绘画比较) 264-6，302，376，394，468，485-6，514，560，569，576n，588n，590n
Wordsworth，William，威廉·华兹华斯 493
writing masters，书写高手 96n，203n，204n，430
Würzburg，维尔茨堡 95
Wycliffe，John，约翰·威克里夫 305n，310，345n

Wycliffites，威克里夫教派 303
see also heresies
Wythe,George，乔治·怀特 115

X

Xenophon，色诺芬 429
Ximenes (Jimenes de Cisneros) Francisco,Cardinal，希梅内斯(吉梅内斯·德·齐斯内罗斯)，方济各会士，红衣主教 331，340,447n
xylography，镌刻术 *see* woodblocks

Y

Yates,Frances，弗朗西丝·耶茨 23，66，68，97n，142n，279，286，361n，438，627，641

Z

Zainer，Gunther（Augsburg printer），冈特尔·扎伊纳(奥斯堡印刷商) 72n
Zamberti，赞伯蒂 588n
Zanobi di Mariano，扎诺比·迪·马里阿诺 49
Zell,Matthäus，马修·泽尔 370,372-3
Zeller,Otto，奥托·泽勒 110n
Zilsel,Edgar，埃德加·齐尔塞尔 112,249，558-61
Ziman,John，约翰·齐曼 478
Zinner,Ernst，恩斯特·齐纳 584n
Zoroaster，琐罗亚斯德 123,126,281n,285
Zürich，苏黎世 96n,99,353,405,442
Zwingli,Ulrich，乌尔里希·茨温利 99,309，405,450
Zwolle，兹沃勒 16n



译后记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的关键词之一是“历史”，所以本书毫无疑问是历史书，而且是讲印刷术的专著。但它又不是单纯的历史书，更不是单纯的只讲印刷技术的著作。作者把印刷术作为欧洲近代史的推动力之一去研究，尤其注意印刷术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关系。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是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把技术作为人造环境和传播媒介，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长效影响，特别注重研究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传播革命：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本书是她学术生涯的丰碑，在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术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以及传播思想史、媒介环境学等学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成为《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的重要选题实在是实至名归。

在我的诸多译著中，和历史尤其和传播史、文化史密切相关的不在少数，比如《文化树》、、《交流的无奈》、《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模仿律》、《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中世纪的秋天》、《文艺复兴盛期》等。我的体会是：历史的各个分支是彼此相通的。推而广之可以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是相通的。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的翻译极其艰难，夙兴夜寐，苦不堪言，语言、历史的机关险阻似乎没有尽头。今天终于走出来了，不亦快哉！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对华人世界的传播学和史学研究起到一点铺路和推动的作用。

感谢周丽锦、徐少燕两位女士为本书的策划和编辑付出的极其艰辛的劳动和卓越的编务。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9 年 2 月 18 日

补 记

本书编辑过程中，经与徐少燕女士反复商量，对中译本的结构做了一些调整：

（1）作者注由脚注改为书末注，分章排。原因是：原书有些页面上，作者注太多、篇幅太大，压缩了正文的空间，有点“喧宾夺主”。目的只有一个：使正文读起来更加顺畅。

（2）作者注的处理上采取了“瘦身”的办法：外文文献由原来的全部翻译改为视情况处理，但以不影响读者理解为原则。

（3）为了进一步给中译本“瘦身”，减少“译注”数量，非常著名的各界历史人物予以删节，希望不影响读者的理解。

这个调整的过程非常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善于编务，电脑操作过程事倍功半；二是难以把握作者注里文献翻译还是不翻译的尺度。

爱森斯坦的《印刷机》这座珠穆朗玛峰终于翻过来了，徐少燕女士和我一道吃尽了苦头，感谢她的精心编辑，感谢她一切为了读者的敬业精神。

何道宽

2009 年 8 月 31 日



译者简介

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市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二十余年，著译约 1100 万字。著作有《中华文明颉要》(汉英双语版)、《创意导游》(英文版)。电视教学片有《实用英语语音》。译作四十余部，要者有《思维的训练》、《文化树》、《超越文化》、《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麦克卢汉书简》、《传播与社会影响》、《新政治文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模仿律》、《莱文森精粹》、《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中世纪的秋天：14 世纪和 15 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传播学批判研究》、《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重新思考文化政策》、《17 世纪的荷兰文明》、《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等。长期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一系列专业论文，要者有《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比较文化之我见》、《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崇“二”的心理定势》、《试论中国人的隐私》、《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论非言语交际》、《比较文化的新局面》、《水向高处流》、《媒介即是文化——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麦克卢汉在中国》、《和而不同息纷争》、《媒介革命与学习革命》、《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我们为什么离不开纸媒体和深度阅读：从纸媒体阅读到超文本阅读》、《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

《媒介环境学辨析——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二》、《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三》、《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媒介环境学评论之四》、《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破解史诗和口头传统之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评析》等。